【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闻一多年谱长编

上卷

闻黎明 侯菊坤◎编著
闻立雕◎审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闻一多年谱长编

增订版

上卷

闻黎明 侯菊坤◎编著
闻立雕◎审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按年谱长编体例编写，客观、完整和系统地记录闻一多先生各个时期的生平历史。全书由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组成。谱前主要记录家世渊源，正谱包括家庭生活、求学经历、社会政治活动、文艺创作理论、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思想发展、个人情操、友朋交谊等，谱后记录闻一多殉难后，国内外的反响和查处过程以及各界人士的追悼、纪念活动等。本书以原始或直接资料为基本史料，广泛收集宣言、函电、演讲记录、听课笔记、时事答问、报刊报道、档案文献、友朋学生的回忆和日记等相关信息，并参考走访记录和信访复函等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年谱长编：全2卷／闻黎明，侯菊坤编著.
—增订本.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ISBN 978-7-313-08647-1

Ⅰ. ①闻… Ⅱ. ①闻… ②侯… Ⅲ. ①闻一多(1899～1946)—年谱 Ⅳ.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5996号

闻一多年谱长编(上卷)
——增订本

编　　著：闻黎明　侯菊坤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960 mm　1/16　　总 印 张：65.75　　插页：12
总 字 数：1190千字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08647-1/K
总定价(全2卷)：3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61453770

聞一多年譜長編

趙樸初署



闻一多先生

（时为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剃去胡须后之留影，张友仁摄）



1917 年清华学校中等科毕业留影



1913 年 11 月辛酉级演出《革命军》合影(右一蹲者为闻一多)



1921 年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留影



1921 年为《清华年刊》绘制的《梦笔生花》



1922 年出国前与父亲等人合影(右一为闻一多)



1922 年在芝加哥美术馆前



1923 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中国同学会(后排右二为闻一多,梁文蔷提供)



1928 年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



1937 年抗战爆发初，闻一多与全家在湖北浠水老家



1939 年闻一多演出《祖国》时留影



1938 年春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途中留影(前蹲者为闻一多)



闻一多做伏羲研究时的绘图



闻一多用古籀文录写的《离骚》



1944 年闻一多与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合影
（左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1945 年闻一多春游石林（董公勗摄）



1946 年 6 月,闻一多与全家在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前
(左起：闻立鹏、闻一多、闻立鹤、高孝贞、闻惠、闻名、赵妈、闻立雕,赵沨摄)



1946 年 6 月闻一多在家里治印(赵沨摄)



闻一多与妻子高孝贞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闻一多撰

自从民国三十三年双十节昆明各界举行纪念大会，发表国是宣言，提出积极的政治主张，昆明的学生，配合着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的青年，便向始国结起来，展开空前的民主运动，不断地喊出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各大中学师生响应民主政治的座谈次演讲会，讨论和各种文艺活动的集会，各界人士许多次国是的宣言，以及三十四年双十国庆纪念，三十四年五四纪念的西水大游行，和其它许多大城市的讽默，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昆明的学生，怀着

欣喜，

期望！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正式投降，全国

欣慰欢舞，以为八年的

婚，从此结束。

不出两月，本月三日，重庆者政府

，驻军杀害衅实，使血案的市民饱受惊扰，

且造成一次新的空袭。

昆明市民的鸣

的死伤。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手稿



民主周刊

第三卷第十九期

三十五年八月二日

中國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發言人

為聞一多同志慘遭暗殺的緊急申明

本期要目

1946 年《民主周刊》刊登的闻一多为李公朴殉难题词



湖北浠水闻一多纪念馆



北京八宝山公墓的闻一多、高真(高孝贞)合葬墓

序　一

闻一多之孙、闻立雕之子黎明同志，怀着对于革命先烈无限敬爱的赤忱，花费了大量心血，搜集了很多珍贵资料，编辑出这部《闻一多年谱长编》。考虑到我的时间与精力，只将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六月这两年半（这一段我比较熟悉）的稿本交我阅读，这已经是沉甸甸的六本复印件了。我说它重甸甸，不仅指的是这几本稿件的重量；更指的是，它所包含的那一段历史内容的分量；闻一多及其战友们崇高的思想感情的分量；还有闻一多周围的一代革命青年爱祖国、爱人民、爱民主从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巨大革命热情的分量。我一遍一遍地抚摸着这些复印本，我感到它不仅是沉甸甸的，而且是火辣辣的。它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带回到四十年代中期昆明民主运动、学生运动的热潮中。闻一多、李公朴及其战友们的高大形象重现眼前。

从这本《长编》中可以看到，作为诗人、学者和一代哲人的闻一多，他愈来愈坚定地走向革命，走到人民革命的前锋，是他和周围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和广大革命青年思想感情互相交融的必然结果。他热爱青年，信任并帮助青年，也就得到青年们的热爱、信任和帮助。他从青年群众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用更高的智慧和力量引导青年向前进。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都从中锻炼出一代一代的革命英雄和文化战士。

五四运动也许离我们够远了。虽然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任务尚待继续努力，而五四时代的老战士，迄今健在者已寥若晨星。“一二·九”运动涌现出大批男女健将，在党的领导下，和革命群众，特别是和武装的革命群众相结合，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光辉的作用，现在也都老了，到了写回忆录的年岁了。“一二·一”运动直到解放前夕波澜迭起的青年爱国民主运动，与解放区的人民武装斗争相结

合，也做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并锻炼出大批的勇士，其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各方面的社会栋梁。闻一多及其光荣战友们——李公朴、吴晗、张奚若、周新民、楚图南们，都是热爱青年、寄希望于青年一代的，他们的希望并没有落空。

记得毛泽东曾对一批留苏青年学生说过这样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这话说得对，是符合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近十年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新时期，教育文化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在国内外高等院校进行科学文化钻研的有志之士，数量与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他们今天是祖国的希望，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四个现代化的重任，要靠他们继续担当。固然前进的道路远非一帆风顺，但是跨过艰难险阻，同时也克服自身的缺点和弱点，他们将变得更聪明，更刚毅，更具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本领。我们也像闻一多烈士那样，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我们相信青年的大多数，也就是相信祖国的明天、新中国的未来，必将属于爱国、爱党、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和科学真理的青年一代。

我深深感谢黎明同志的辛勤劳作。这部《长编》不但展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若干轨迹，也展现了一位文化巨人成长发展的身影。但在定稿时候，最好作些剪裁或压缩。例如，昆明民主运动中经一多起草或润色的大量长篇文件，包括昆明民盟对时局的宣言、声明及文化界的呼吁书、签名信等（其中有些文稿是1946年秋北平政治空气紧张期间吴晗移存我处，又经我交徐冰转移妥善地方保存下来的），这些革命文献资料的各篇全文，似可汇编成附册，附在《年谱长编》之后，使全书眉目更加清晰，这作为一个参考意见吧。进一步的希望，则是从这部《长编》中提取精华，编出一部内容精审、思想性文学性兼美的年谱或传记，使读者披书可见闻一多其人，又从一个人看到一个时代。这更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了。

张光年

一九八九年四月于北京

序　二

《闻一多年谱长编》是闻黎明同志积年奋发努力的成果。这本内容十分丰富而翔实的书，足可以令读者对闻一多其人和他的时代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闻一多先生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和充满激情的诗人。他从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同人民一起奋斗的战士；从一位接受美式教育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他所走的道路，以及他为民主革命而牺牲，对今天乃至今后的几代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仍会发生很大的教育与感召的作用。

像近代一切奋发有为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鼓舞闻一多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是他那浓挚的爱国热情。他在美式教育的学堂里读书，身历中西文化冲突的激烈震荡，而能独立打下中国文化的深厚根柢，并产生文化兴国的理想。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歧视的刺激，日夜思念祖国。他丝毫不曾迷醉于异国的富有繁华，更不曾有半点仰人鼻息的念头。他努力提前完成学业归国，以展其文化兴国的抱负。这想法自然是不切实际的。那时，他的爱国主义还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经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实践，他的思想境界大为转变。这时，他已把反抗侵略和争取人民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了，爱国的感情植根于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之上。

深切了解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闻一多思想转变最重要的关键。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闻一多同清华大学一起南迁，继之又与同学生们一起徒步走到云南。整整八年，他与普通老百姓一样，时在饥饿的威胁之中，对人民的苦难和牺牲有了切肤之感。同时，他也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军政当局丧师失地，毫无悔

过之心，官吏贪污，军官扣饷，流血奋战的士兵却有的沦为乞丐。闻一多开始觉醒了。当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的大批官员“劫收”自肥，苦熬了八年的人民却更加痛苦。人民想望民主，统治当局却施以法西斯特务统治；人民要求和平，蒋介石却发动内战，国家、人民的命运将何以堪？闻一多挺身站到人民的前列，他愤慨，他抗议，他痛斥蒋介石、国民党，而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成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早在他牺牲的前一年，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一多先生明知特务的枪口正在向他瞄准，他毫无畏惧，继续斗争，他心中想着亿万的人民。他是作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英雄倒下去的。

闻一多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人民英雄，因为他是一位无私的勇士。他在斗争中总是自我刻励，经常解剖自己。他认为“民主运动必须从自己身上先做起，时时刻刻先要检讨自己”。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精神。只有自身具备真正的民主精神，才配作民主的战士。

闻一多先生是中国最有天才的诗人和最富有创造力的学者之一。他的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史（包括上古神话、古代诗歌及文学、古文字学、民俗学，等等）的研究，极多创获，广为海内外学者所称引。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书画艺术家。

一多先生深谙中国古典，却不流为蠹鱼；他了解西方艺术，却不屑止于稗贩。他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用批判的眼光整理和发掘古代文化遗产，多发前人所未发，为后来者开许多门径。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健将。他始终坚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并不断推向前进。他反对任何复古倒退的思想。当他献身于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同时仍是一位向封建主义旧文化冲锋陷阵的猛士。在一九四四年纪念五四的会上，他大声疾呼，不要退回五四以前的路上去，并重新喊出：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

一多先生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这本《年谱长编》，为我们重现了一多先生的生活、奋斗与思想，也部分地重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了解一多先生的思想发展和奋斗的历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反过来，我们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会更易于理解一多先生所走的道路。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和他

所走的道路，会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及其意义。

历史是人类最伟大的教师。没有一个聪明人会拒绝向历史中汲取人类以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研究历史可以有多种入手的方法，其中历史人物的研究是迄今人们运用得最广泛最有成效的方法之一，中国历史学宝库中尤多典范。历史人物研究可以有多种方式，多种体例。年谱（包括年谱长编，下同）要算是中国历史学家的一个创例。宋代以来，蔚为壮观。一部编得好的年谱，它的价值决不亚于一本优秀的传记。清人王懋竑著《朱子年谱》，一向被公认为史学佳作。近人丁文江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至今还没有一本梁启超的传记可以超过这部年谱的价值。

有一种流俗之见，以为年谱是历史学初级产品，名家不屑为此，这是一种偏见。梁任公说："王白田（王懋竑字——引者）之《朱子年谱》，彼终身仅著此一书，而此一书已足令彼不朽。"丁文江一世声名，固不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但，倘彼不为地质学家，不为中研院总干事，不为……单此一书，亦"足令彼不朽"。因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能不研究梁启超，而研究梁启超的人不能不读此书。

历史学的基本任务不外重建历史，即尽可能充分地占有历史材料（遗憾的是，迄今人们还无法做到真正完全地占有历史材料），运用尽可能精密的方法（任何精密的方法，实行起来仍难免发生失误。所以大学问家在运用其方法时，总能自觉地注意防弊。做学问，讲究方法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迷信方法却是危险的），把过去的历史重现出来。历史学家所做的分析、裁断，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过是使历史中本有的内在联系变得醒目而已。年谱是再现谱主一生历史的良好形式。这里并非只是材料的堆积，必须有分析，必须有考辨与裁断。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作年谱，照样可以发挥其史识与史才。而且作年谱是历史学的最好训练。许多著名的大学者和历史学家都曾作过年谱，如毛奇龄作《王阳明年谱》，钱大昕作《陆放翁年谱》、《王应麟年谱》，段玉裁作《戴东原年谱》，缪荃孙作《孔融年谱》，梁启超作《朱舜水年谱》、《陶渊明年谱》，王国维作《太史公系年要略》，胡适作《章实斋年谱》，等等。

闻黎明同志以数年心血，成就此书。书中收入大量第一手文献，又广泛地作过调查访问，留下珍贵记录。许多关系谱主的重要事件，既引用了谱主的言论著作，

又有当时的文献佐证，又有多位当事者的回忆，使事件的来龙去脉，左右关联，诸多侧面，都得到比较完全、比较生动的反映，读起来，如见其人，如临其境。这就是收到了重建历史的效果。读此书，不能不赞赏作者搜求之勤，排比之细，可谓功力俱见。自然，再好的书，也难免有不足之处。此书有关谱主的言行，材料翔实，脉络清晰。相比之下，于时代相关的背景材料，似稍嫌疏略。譬如一幅画，不但中心人物、景物要表现有力，还须有适当的远景与近景为衬托。没有衬托，或衬托不够满意，也会影响整个画面的艺术效果。这点小缺欠不足以掩此书的大成功，提出来，只是希望作者精益求精。

黎明同志是闻一多先生嫡孙，为乃祖作谱，能够不存一丝一毫为尊者讳的旧观念，一本史家求实的精神，此点亦极令人赞佩。

黎明同志与我一九八四年始相熟，现在同我一道工作。彼颇具乃祖遗风，黾勉好学，谦虚热诚。此书稿初成，即送给我看，并索序。自度学浅德薄，安敢言序？不过通读书稿，敬仰前贤，略抒所感而已。同时，于平日为学略有体会处，不避琐屑、亦稍稍连带及之。拉杂书此，还就正于黎明同志及时下俊彦。

耿云志

一九九〇年四月三日

编写说明

一、本书以年谱长编为体例，恪守客观态度，尽量完整、系统记录闻一多各个时期的生平历史。

二、全书由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组成。谱前主要记录家世渊源。正谱包括求学经历、社会活动、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政治活动、思想发展、家庭生活、个人情操、友朋交谊等。谱后记录闻一多殉难后国内外的反响和查处过程以及各界人士的追悼、纪念等活动。

三、本书基本史料以原始或直接资料为重点，来源为：

1. 闻一多全集、诗集、文集。

2. 佚诗、佚文。

3. 手稿、书信、联名文章及题字题词、篆刻铭文。

4. 起草修改润色的各类宣言、函电。

5. 他人记录的演讲记录、听课笔记、时事问答。

6. 亲朋好友学生的回忆、日记，编者的走访记录和信访复函。

7. 报刊、杂志的报道、档案文献。

四、所有资料以时间顺序排列。作品系于写作时间，未能确知者列于发表时间，发表时间未知者酌情处理，其他材料亦然。

五、征引资料首次出现时，均注明详细出处；复出者简略注之。未注出处内注者，多为谱主家属回忆。本书正文行文俱用中文数字，出处及括号公元用阿拉伯数字，以示醒目。

六、为叙述方便，必要处采用本末记述。

七、行文中当改当补之字，标以[ ]，漫漶或缺字处标以□。

八、本书完成于一九八九年，包括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辑之《闻一多全

集》及其他著述、档案等诸多文献均未结集出版。因逐一核查工程浩繁，且难以扫尽，故增订版引文出处标注仍依初版原貌，未做改动。又，时隔多年，若干馆藏机构改名他称（如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国家博物馆，清华大学档案室、校史组，分别改为档案馆、校史研究室等）。为尊重历史起见，本书仍称原名。

目　录

上卷

谱前……1
一八九九年　一岁……7
一九〇〇年　二岁……9
一九〇一年　三岁……10
一九〇二年　四岁……11
一九〇三年　五岁……12
一九〇四年　六岁……13
一九〇五年　七岁……14
一九〇六年　八岁……16
一九〇七年　九岁……17
一九〇八年　十岁……18
一九〇九年　十一岁……19
一九一〇年　十二岁……20
一九一一年　十三岁……21
一九一二年　十四岁……22
一九一三年　十五岁……25
一九一四年　十六岁……28
一九一五年　十七岁……31
一九一六年　十八岁……36
一九一七年　十九岁……48
一九一八年　二十岁……60
一九一九年　二十一岁……68
一九二〇年　二十二岁……91
一九二一年　二十三岁……111
一九二二年　二十四岁……156
一九二三年　二十五岁……206
一九二四年　二十六岁……225
一九二五年　二十七岁……239

一九二六年　二十八岁……276
一九二七年　二十九岁……310
一九二八年　三十岁……324
一九二九年　三十一岁……338
一九三〇年　三十二岁……344
一九三一年　三十三岁……357
一九三二年　三十四岁……374
一九三三年　三十五岁……383
一九三四年　三十六岁……397
一九三五年　三十七岁……413
一九三六年　三十八岁……424
一九三七年　三十九岁……436
一九三八年　四十岁……453
下卷
一九三九年　四十一岁……495
一九四〇年　四十二岁……514
一九四一年　四十三岁……530
一九四二年　四十四岁……551
一九四三年　四十五岁……575
一九四四年　四十六岁……608
一九四五年　四十七岁……713
一九四六年　四十八岁……835
谱后……948
附录……1012
一、“蒋介石日记”手稿选录……1012
二、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选录……1015
三、台北“国史馆”藏《事略稿本》选录……1024
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选录……1028
初版后记……1032
初版后记补……1034
增订版后记……1035

谱前

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闻一多先生的故乡。

浠水地处鄂东，位于长江中游北岸，距武汉二百余里。浠水西为黄冈，乃古之黄州，苏轼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唱《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与黄冈隔江的鄂城，为三国孙权称吴帝之地，后人谓之吴大帝城。与浠水相邻之蕲春，古称蕲州，是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故里。浠水之北的罗田县，为元朝末年红巾军揭竿而起的地方。

浠水作为县名原称蕲水，出现于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五年（公元四四八年），原址在今浠水之东。唐初，其地并入蕲春。至唐玄宗天宝初，改兰溪县名蕲水，延绵历年，一九三三年，为避免与蕲春县名相混，湖北省政府咨文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拟将蕲水县改名浠水县。旋经内政部查核，行政院批准，转呈国民政府备案。五月，蕲水正式更名浠水。（据《准内政部咨为奉令核准湖北蕲水县改名为浠水县一案仰知照由》，《司法行政公报》第34期，1933年5月31日）

浠水县背依峻岭，面临长江，浠水河流经城旁。县境名胜颇多，有玉台书院、清泉寺、笔沼、散花洲、茶泉、斗方寺等，均与历代文化、军事有关，流传着引人入胜的故事。元末红巾军首领徐寿辉在蕲水定都，一时，这里成为南方农民起义的政治军事中心。

巴河镇以长江支流巴河水为名，是江淮鄂岳光蔡诸地之要冲，自古帆樯云集，商贾、骚客往来不断。便利的交通与繁荣的经济，促使这里文化发展起来，养育出不少人才。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恩科状元陈沆，即巴河人至今引以自豪的前辈文人。闻家与陈家仅隔一小阜，两家世代联姻，关系很深。

浠水闻氏为客籍，据家谱记载，其原为文天祥之后裔。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闻大棚撰族谱序云："吾族本姓文氏，世居江右吉安之庐陵。宋景炎二年，信国公军溃于空阮，始祖良辅公被执，在道潜逃于蕲之兰清邑，改文为闻因家焉。兰清者，今兰溪镇，蕲之属地也。良辅祖明哲保身，以绵宗祀，生四子。伯仲季皆卒无后，其叔子谷瑞祖威猛善谋，元末以义勇破走红巾，保障乡邑，录功镇守蜀之衢州卫。亦生四子，长真一，次真二，次真三，次真四。后真一祖留蜀，真二祖迁江南之英山，惟真三、真四两祖归于蕲，后复散处。真三祖之后居河坪，真四祖之后盛桂等之高祖显高居巴河，其余或在罗田，或在武昌，支分派别蕃衍昌隆。"（《总理前修

族谱序》,《闻氏宗谱》第1卷第42页,敦本堂1916年刻本)

四修《闻氏宗谱》卷五《一世祖至三世祖世传述略》亦云:"一世祖良辅公,举南宋孝廉,官副使,由江西吉安府庐陵县迁居蕲水永福乡二十七都十三图,生子四:长应珍,次谷瑛,三谷瑞,四谷璋。珍、瑛、璋三祖均无出,瑞祖以军功镇四川衢州卫,生子四:真一、真二、真三、真四。真一祖子孙留蜀,真二祖子孙迁皖,真三真四两祖归于蕲。真三祖之后居邑河坪附近之闻家湾一带。真四祖之后初居河坪闻家铺,后徙居邑之巴河及邑城附近之钟师楼等处。两祖后裔旋复近徙黄冈、罗田、蕲州、武昌、襄阳、谷城等县,或远迁陕西、河南、湖南、江南、江西等省。"(第1页)

敦本堂刻《闻氏宗谱》云浠水闻氏与文天祥的关系,语焉未详,家族多年传言浠水闻氏为文天祥的后人。但,浠水闻一多纪念馆工作人员赴湖北武穴市龙坪镇五里村考察时,发现"闻一多与文天祥同根共祖",但"不是文天祥的嫡系后裔",而"是文天祥的家族的旁系后裔"。

龚成俊、朱兴中、王润《关于改"文"为"闻"的考证》云:"一九九九年八月,笔者赴湖北武穴市龙坪镇五里村考察时,文天祯(文天祥的堂兄)的二十二世裔孙明杰、二十四世裔孙尚雄、尚志,及二十五世裔孙善之等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并捐了一套《文氏宗谱》,计十四本。""这套谱以记载文氏鄂济(今湖北武穴市)祯公世系为主,谱首以清朝乾隆丁亥(公元一七六七年)刻本的七省(赣、鄂、湘、蜀、粤、桂、闽)通谱为准,记述了文氏自西周受姓起,至天祯、天祥二公七十一世的《江右统宗世系》。其中,西周文叔以文为姓,十八传至周敬王时任越国大夫文种;又十六传至西汉循史文翁,再十二传至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球。按景定旧谱,以文球为江右始祖,传至天祯、天祥为二十五世。就在以这文球为始祖的世系中,第二十世孙中有良彦、良辅弟兄俩,且均注明'世系未详'"。据《文氏宗谱·江右统宗世系》,文氏江右统宗世系一世祖文球,传至第十世为文仲良。仲良有三子,长子文玉英,传至二十五世为文天祥;三子文玉简,传至二十世为文良辅。根据名字相同、籍贯吻合、世系衔接、背景同一等因素,作者认为:浠水闻氏一世祖"闻良辅",很可能就是"文良辅",并且"良辅、天祥完全有同时共世的可能性"。

由此,作者考证的结论是:① 浠水闻氏"改'文'为'闻'是真实可信的";② "闻一多与文天祥同根同祖,但闻一多不是文天祥的直系后裔,是文天祥的家族的旁系后裔"。作者还认为:从世系来看,"以文氏受姓起,文天祥为七十一世,闻一多为八十五世";"以文球为始祖,文天祥为二十五世,闻一多为三十九世";"如果他们共同的第一个先祖仲良为始祖,则文天祥为十六世,闻一多为三十世"。(陆耀东、赵慧、陈国恩主编《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第292至29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浠水闻氏自良辅始，传至先生已二十世。其脉如下：

一世：良辅

二世：谷瑞

三世：真四

四世：冕

五世：思通

六世：大玉（明征仕郎）

七世：仲森（明邑庠生）

八世：克己（明郡庠生。字行仁，号颜斋）

九世：砺山（明太学生。字琢庵）

十世：显高（明邑庠生。字荣升，号均辅。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崇祯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十一世：证胜（太学生。字尚儒，号书田。生于明崇祯元年五月初四，卒于清康熙五十二年八月初四）

十二世：启谟（清郡庠生。字世则，号德斋。生于清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五，卒于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十三世：澄昌（清优增贡生。字象潭，号相周。生于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卒于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七）

十四世：盛梅（清例贡生。名兴邦，字雪友，又字燮友，号理斋。生于康熙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卒于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九）

十五世：猷（清贡生。例赠文林郎。贡名大猷，字秩廷，号升亭，亦号允斋。生于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卒于嘉庆十年六月初四）

十六世：贤筠（清太学生。勑赠朝议大夫。监名其乐，字翠衔，号竹轩，亦号松山。生于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七，卒于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十七世：良锜（清贡生。敕封文林郎。贡名兆兰，字佩香，亦字佩湘，号采夫。生于嘉庆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卒于光绪九年七月二十日）

十八世：佐淦（清太学生。中书科中书衔，例授文林郎。官名子淦，字禧凝，号香泉，亦号丽生。生于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卒于宣统三年正月初九）

十九世：邦本（清邑优增生。庠名彬，更名廷政，字固臣，号道甫。生于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二十世：即先生。

先生一脉，于十世显高渐盛，并自永福乡迁居巴河镇箭楼口。然时逢明末张献

忠、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明军乘机劫掠，四子中养胜、悦胜、玉胜皆卒于兵，唯有显高及幼子证胜匿逃得脱。旋，十一世证胜被族众推为户首。康乾之际，天下靖宁，传至十三世澄昌，家道再兴。至十五世猷，迁居造化策缺塘左角，人口繁衍，子孙多有入泮，以至门闾高大，乡党士林莫不啧啧称颂。至十六世贤筠，此脉进入鼎盛，虽不似贤墉、贤垌二兄子孙显耀，却也有孙中进士、举人。其中长子良铭之子佐溥（名捷，字泽农，号敏泉，亦号鹿樵）为光绪丙戌科进士，曾三次出任河南乡试同考官。相比之下，先生高祖良锜却门丁不旺，生三子仅存长子佐淦。时遇捻军起义，家财尽失，用度维艰。为传嗣，匆匆于避难之河坪佃舍，为佐淦娶妻，即先生祖母、冈邑太学生刘庆藜之女。

旋，良锜以患血疾，不得不弃举子业，独守孤子，寄托于子孙辈。先生祖父佐淦发奋读书，某次下场作《孙权钓鱼台赋》，为正在视学之张之洞所赏，暗编堂号待取，然揭榜时竟未高中。良锜叹曰："嗜词章学雅，不喜作制艺，故不利有司试。"（《先考丽生大人行状》，《闻氏宗谱》第22卷，第48页）值此打击，佐淦亦心灰意冷。然良锜不肯作罢，"以为书香不继，大是恨事。每于试后见族有报捷者，终夜涕泣，又强自解曰，有孙可弄，岂无后望。爰筑书室于屋侧，延名师课孙辈。"（闻子淦《敕封文林郎贡生先考佩香大人行述》，同前，第21卷，第15至16页）一八八三年五月，佐淦长子廷炬以经古入泮，良锜时重病卧床，强起坐堂中，笑对客曰："心愿足矣，夫复何言。"不弥月而逝。

佐淦亦承父志，筑诱善学舍，延师督子。他并不强求诸子读经作八股，而重视"鸠探各专门学诸书"，令之"各以其性之所近者习焉"。（《先考丽生大人行状》，同前，第22卷，第49页）

佐淦生四子：长子邦柱，生于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五，官名廷炬，字石臣，号侍宸。以古场取录词赋入学，后复再取考史论史骈体文法律等学，补廪膳生。宣统元年考授恩贡，选授直隶州州判，敕授征仕郎。三子邦材，生于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古场取词赋入学，为邑庠生，庠名一泽，更名廷基，字用臣，号诵承，卒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四子邦梯，生于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以解经入学，庠名治，更名廷治，字丹臣，号云甫，亦号丹忱。

邦本，佐淦之次子，先生之父，生于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取论史学补邑之优增生。邦本庠名彬，更名廷政，字固臣，号道甫。先生的亲戚、对先生全家了解甚多的王康说：邦本"是清末秀才，对国学有相当的造诣，是位十分严谨的长者，早年参加过一些维新变革的活动，是较早地接受新思潮影响的一代文人，认识到时代潮流的趋向。老人深怀救国之心，为人耿介正直，不愿随俗浮沉，在政界呆过一阵子

后，就退隐家园，深居简出，读书写字，以教读儿孙为己任，所给予闻一多弟兄品格上的影响是明显的。”（王康《闻一多传》，第7至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出版）邦本娶黄冈县人、太学生刘廷熙之女为妻，即先生之母。刘氏生于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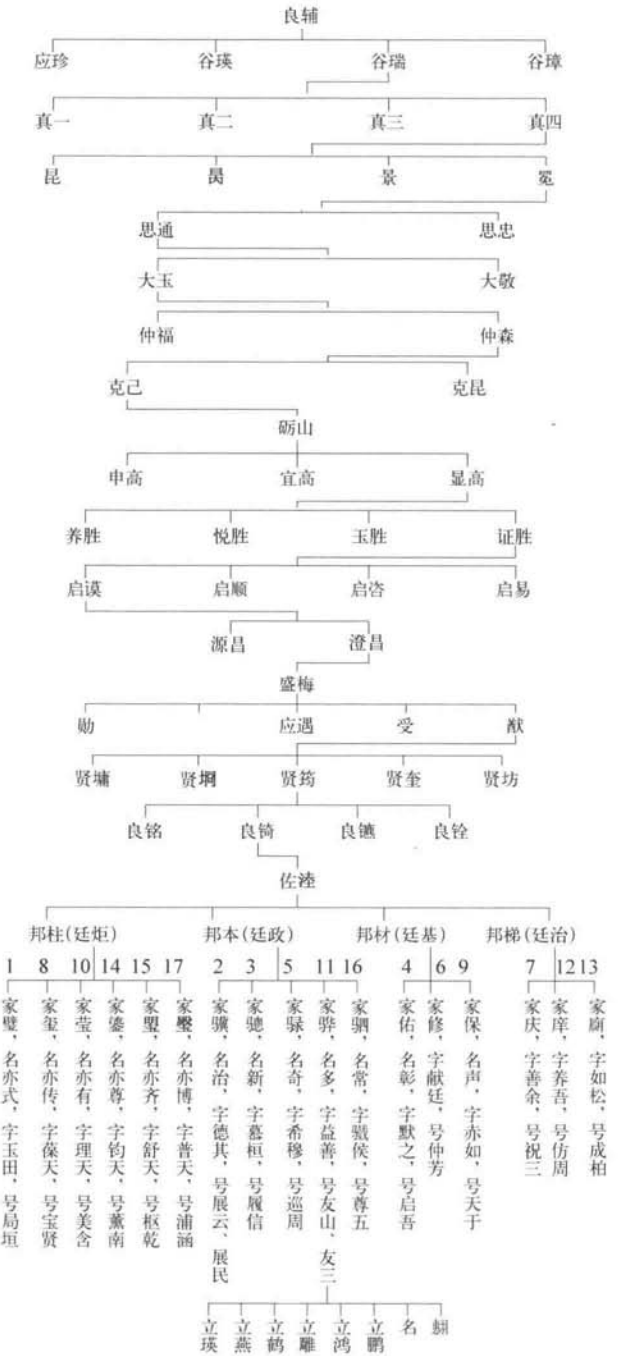
邦本生子五：长子家骥，生于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九，校名治，字德其。号展云，后以展民行，大排行第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娶太学生毕衍箴之长女为妻。次子家骢，生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七，校名新，字慕桓，号履信，大排行第三。湖北省方言学校法文预科毕业。娶候选从九品陈正纬之女为妻。三子家骒，生于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三日，校名奇，字希穆，号巡周，大排行第五，湖北省中等工业学校毕业，考入北京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娶太学生高奎光次女为妻。先生为四子。五子家驷。

邦本亦生女五：长女归太学生陈正绪之子陈邦畴，次女归邑庠生陈丙章之子陈邦懋，三女许光绪十一年拔贡、十七年举人、湖南浏阳宁乡县知县冯廷桂之子冯景文。四女、五女待字。[①]

浠水闻氏自第十一世起定有世派，原定世派为“佳启昌盛世，贤良佐邦（即国字派）家（即畴字派），立心期中正，厚德焕光华。”后又增定世派：“广学成嘉品，崇儒有道时，泽长源达远，衍庆本先培。”（《闻氏宗谱》，第3卷，第1页）

① 以上截止于一九一六年刻印《闻氏宗谱》之时。

附：浠水闻氏世系列表：


良辅
应珍 谷瑛 谷瑞 谷璋
真一 真二 真三 真四
昆 昺 景 冕
思通 思忠
大玉 大敬
仲福 仲森
克己 克昆
砺山
申高 宜高 显高
养胜 悦胜 玉胜 证胜
启谟 启顺 启咨 启易
源昌 澄昌
盛梅
勋 应遇 受 猷
贤墉 贤堉 贤筠 贤奎 贤坊
良铭 良锜 良鏞 良铨
佐逵
邦柱(廷炬) 邦本(廷政) 邦材(廷基) 邦梯(廷治)
1 8 10 14 15 17 2 3 5 11 16 4 6 9 7 12 13
家璧，名亦式，字玉田，号局垣
家玺，名亦传，字葆天，号宝贤
家莹，名亦有，字理天，号美含
家鎏，名亦尊，字钧天，号薰南
家墅，名亦齐，字舒天，号枢乾
家鑿，名亦博，字普天，号浦涵
家骥，名治，字德其，号展云、展民
家驰，名新，字慕桓，号履信
家騄，名奇，字希穆，号巡周
家骅，名多，字益善，号友山、友三
家驷，名常，字骥侯，号尊五
家佑，名彰，字默之，号启吾
家修，字献廷，号仲芳
家保，名声，字赤如，号天于
家庆，字善余，号祝三
家庠，字养吾，号仿周
家廉，字如松，号成柏
立瑛 立燕 立鹤 立雕 立鸿 立鹏 名 翮

一八九九年　一岁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六月京师大学堂成立。

十一月二十四日　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月二十二日未时，先生诞生于湖北省蕲水县巴河镇望天湖畔闻家铺。浠水闻氏是从十世祖显高公时迁至巴河镇，至第十五世祖大猷公时，在紧依望天湖的造化策缺塘左角购置田地，从此在这里繁衍。巴河靠近长江，当地地名多冠以“洲”、“港”、“塆”、“矶”等，而“闻家铺”之名因来自家族中有人做生意，开货铺之故。“闻家铺”今名“闻家铺村”，为巴河镇所属的十二个行政村之一。

先生初名亦多，族名家骅，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大排行第十一。先生之名与字皆出自《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据访问闻家驷记录，1989.3.6）后，入清华学校，改名单字“多”，五四运动后又改为“一多”。

先生生活于三世同堂之家，祖上世代耕读。先生自传《闻多》：“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清华学校辛酉级中等科毕业纪念刊《辛酉镜》，1917年6月15日出版）

先生祖上原有宅院，因人口增多，又于一里许外筑起一所大院落，于是有了新屋、老屋之别。分家时，诸兄抽签，三房仍住老屋，大、二、四房搬入新屋。新屋为一进三重院，有三个厅堂，内可耍龙灯。两旁有小厅、书房、寝室、天井等。各房各有二三十间屋子，典型湖北大家族式格局。大门悬匾额，上书“春生梅阁”，故人称此院落为“春生阁”。大门两边的对联书“七十从心所欲，百年之计树人”。院内有书房，即“绵葛轩”，内藏经史子集群书字画，数量很可观。（据访问闻钧天记录，1986.9.15）

先生家二房住院内入门左侧，各房虽同住一个院内，但分开过日子。分家时，每房每年可得六百多石租子，后来先生的父亲又买了些地，大约能收七百石谷子。不过租子常收不齐，家里人口又多，所以经济上并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宽裕。（据访问

闻家驷记录，1986.11.20）

新屋面临浩淼的望天湖，每年祭屈原时，湖上龙舟竞渡，热闹非凡。隔望天湖可见远处群山，最高者为碧峰岩。先生后在《红烛》中收有《二月庐》一诗，诗中描写新屋：

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
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
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
紧紧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

一九〇〇年　二岁

上半年，义和团运动爆发。

六月十七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七月十四日天津陷落，八月五日北京陷落。

是年　大病。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一岁多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叫'热症'，这回险些送命，祖母已经把装殓的衣鞋都准备好了。"（《闻朱年谱》，第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一九〇一年　三岁

九月七日，《辛丑条约》在北京签字，清政府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保。

一九〇二年　四岁

十二月，京师大学堂恢复开学。

一九〇三年　五岁

是年，《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革命小册子发行。

是年，“癸卯学制”在全国推行，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形成。

一九〇四年　六岁

二月九日，日俄战争爆发。

二月十五日，华兴会在长沙成立。

三月十一日，商务印书馆编辑之《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刊。

十一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

是年　始入私塾。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开始入塾上学，老师是一位姓徐的老先生，读的是《三字经》、《幼学琼林》、《尔雅》和四书之类。"（《闻朱年谱》，第3页）这位启蒙老师用的是老方法，教书很认真，一丝不苟，只是脾气有点古怪，管教学生格外严厉。不过先生读书很用功。闻展民《哭四弟一多》："汝初就外傅，群季争嬉戏，汝独哦哦不休。"（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376页，1948年8月出版）

一九〇五年　七岁

三月十日，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九月五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取代俄国攫得在南满的侵略特权，俄国势力退至东北北部。

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为庶务长。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一月十七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

九月二日，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开始废科举、兴学堂。十二月，谕令设立学部，为全国教育最高行政机构。

十二月二日，载泽等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

三月十二日　胞弟闻家驷生。闻家驷学名常，字骥侯，号尊五，大排行第十六。闻家驷之名来自《论语·颜渊》中之"驷不及舌"之典，故又号及之，字亦趋。入学时，觉"亦趋"不好听，一度改名闻藉。后到昆明，还用过几次笔名"砚田"。（访问闻家驷记录，1989.3.6；1989.3.12）

四月六日　祖母刘氏逝，享年七十五岁。

是年　"春生梅阁"内办起一所改良家塾——"绵葛轩小学"，既读诗云子曰，也教博物、算学、美术。（据闻立清《深切怀念一多叔，满腔豪血忆当年》，中共浠水县委统战部编《故乡人民的怀念》，第36页，1979年10月印行）先生就在这儿读书。

在家塾中教书的先生叫王梅甫，"出身于师范学堂"，"用当时新编的学校教材，如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课本。这是先生接触新思潮的开始"。（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3页）王梅甫先生经历坎坷，但教书很认真。王康《闻一多传》云："塾师是一位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旧学'的根底不错，又多少学过一些'新学'，是个颇有些见解和抱负的人。但他像那时代许多没有什么后台的文人一样，在外面消磨了不少时光，也难找到栖身之所，更谈不上施展什么抱负了。只好回到乡间帮人课读，把自己的一点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他教书十分严格，要学生们除了熟读《三字经》、《朱子家训》等，还要读洋学堂新编的修身课本；除了背诵《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还要学新的国文、历史、博物等等。"四十年后，先生在昆

明昆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时，“还深情怀念他启蒙的老师，据说这个人脾气有点古怪，管教也太严厉，还是老一套的方式方法，叫人害怕；不过教书很负责任，真是一丝不苟。”（第8至9页）

每入夜，还从父亲读《汉书》。自传《闻多》：“时多尚幼，好弄，与诸兄竞诵，恒绌，夜归，从父阅《汉书》，数旁引日课中古事之相类者以为比。父大悦，自尔每夜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辛酉镜》）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先生好学，可说‘发于自然’。每逢新年，门外玩着龙灯，或者平时门外来了花轿，孩子们没有不跑出去看热闹的，先生总是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或画画。祖父看见这种情形，当然很喜欢。”（《闻朱年谱》，第4页）

先生从小便喜欢画画。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先生爱好美术也是从小就开始的。往往逼着别人剪纸花样给他玩。譬如看见有人坐轿子回来，他就要求大姑母剪两个轿夫抬着轿子的样子；看见轿夫把笠帽放在桌上，他又要求剪出笠帽放在桌上的样子；轿夫们吃饭去了，他又定要剪一张吃饭的样子。”（《闻朱年谱》，第5页）

先生喜爱绘画，与爱看戏有一定关系。老家人韦奇常带先生去巴河镇看戏，回来先生就画戏中的人物。韦奇发现书中的绣像，也叫先生去看，并用纸描摹。这样时间长了，先生与韦奇关系不断加深，并很同情这个据说参加过太平军起义的老家人。韦奇爱吃狗肉，闻家有人不让他在炊上炖，还有人张口责骂，先生却总护着他。（据刘烜《闻一多评传》，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

一九〇六年　八岁

四月，俄、法、比等国修建的京汉铁路全线修通。

九月一日，清政府颁诏“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开始。

十二月二日，孙中山在日本作《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演讲，首次提出“五权宪法”概念。

是年，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一方主张武力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土地国有；一方主张拥戴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反对平均地权。

一九〇七年　九岁

三月八日，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一九〇八年　十岁

十一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溥仪继位。

一九〇九年　十一岁

六月，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办理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派遣学生留学美国事务。

八月，清政府将清华园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

是年　可以看到新潮流的书刊了。闻家驷《忆一多兄》：我们家庭“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73页，三联书店1980年8月出版）这些书刊有些是大哥闻展民带回来的。闻家驷回忆：“大哥是我们四房中最早外出参加社会活动的，他第一个到外面上学、工作，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里读过书，并在京津、云南、绥远等地任职，干的是不大不小的差事。他曾和代理过湖北省主席，也是浠水人的孔庚（字文仙）来往较多；与曾担任过湖北省财政厅长的黄永熙是老同学老朋友。黄永熙在政治上属政学系进步党，思想保守，但人很热情，他的儿子上学是大哥供给的。大哥在外面活动，辛亥前后就参加过与宋教仁有关系的某个社团。他常把新的思想和书刊带回家，对我们兄弟几人影响很大。”（据访问闻家驷记录，1986.11.20）

一九一〇年　十二岁

三月，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

是年　“至武昌，入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闻多》，《辛酉镜》）同入该校者还有堂兄六哥家修、七哥家庆、八哥亦传、九哥家保、十哥亦有。时，由各房出资，在武昌芝麻岭三佛阁庙内租了一所房子，是一个小楼隔开的半边。家里自带米油，起火做饭，孩子们统由长房闻廷炬照料。（据访问闻钧天记录，1986.9.15）

该校附属于两湖师范学堂，后者是两湖地区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完全师范学堂，其前身为两湖高等学堂，一九〇四年七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派武昌知府梁鼎芬改建为此名。一九〇六年十月，仁、义两斋（即文史专科）及附属高、初等学堂首先开办，为两湖师范学堂之首。先生所在附属高等小学校，采用的是新式教材与方法。

同时，又“在叔父丹臣（廷治）先生主持的改良私塾里补习，中文之外，并有英文、算学”。（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3页）[①]

① 季谱系此事于1909年，据《闻多》所述，当是1910年之事。

一九一一年　十三岁

四月二十七日，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黄花岗起义。

五月二十日，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引发粤汉、川汉铁路沿线各省爆发大规模保路风潮。

十月十日，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

二月七日　祖父闻佐湀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十月十日　夜，武昌起义。是日，中秋方过，傍晚登黄鹤楼观月，未久密云至，不得见月。夜深，起风雨，与枪炮声相杂。望窗外，见总督府大火，映墙壁皆赤。见门外有右臂束白巾之持枪士兵，知军中举义。十一日晨，匆匆至文昌门渡口，不得渡。步行至汉阳门，始得小船渡江，抵汉口已日暮。旋乘轮赴黄州，返巴河老家。后做《辛亥纪事》（收《古瓦集》），述目睹武昌起义之经历。文云：

> 曩者诸兄弟游学武昌，馆于三佛阁。辛亥秋诸兄弟至者益众。季父督课严，匪故莫得入肆。八月之望，校中有假，乃以其夕登黄鹤楼观月。天高风寒，江流有声。徘徊久之，密云从东南起，滃浥涔郁，气薄无际，遂不见月，索然而返。置茗小憩，各就榻，相与笑语失寐。及夜深，闻风雨飒然至屋瓦皆鸣，霹雳轰砉，腾响不绝；漂洒皆呛之音相杂，遥迩崇庳，耳听皆满。起自牖中视之，四檐无溜，月在高树。疑未释而响益蒸；甚恐，率拥衾屏息，相嫭不敢反侧。有顷，季父从沙门至，呼曰："起闻战声乎？不速去，性命且不保。"乃皆起拭目相瞋视者顷之，抗生曰："有变乎？是革命党也。"季父急曰："毋妄言，诛矣。"于是牖中露微光，谓且曙，各胠筐霄釐衣物图籍寘其中而键之。少待，声益厉而光益大，映墙壁皆赤。仆至，始知督署大火。昧爽，出户见躄兵右臂束白巾，支枪而遇，因问所以出城，则西指。乃毕鼜食，趣文昌门，不得渡，步柢汉阳门，始得舟渡江。至汉口，日莫。以轮舟柢黄州，方中夜。更水行溯□而东，据舷美睡，惊始集；达巴河，闻鸡唱矣。

回家后，继续读书。还把武昌起义的见闻画成"成套的革命故事，贴得满墙的"。（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5页）其中"画过一个人手执小旗，振臂高呼，表示拥护共和"。（刘烜《闻一多评传》，第7页）

一九一二年　十四岁

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二月十二日，清政府颁布退位诏。十五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三月十一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四月二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五月，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经严复为校长。

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成立，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实际党务由宋教仁负责。两天后，汤化龙等立宪党人组织民主党，后拥梁启超为领袖。次年，民主党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

十一月三日，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是日签订《俄蒙协约》，北京政府声明概不承认。

是年春　武昌局势逐渐平静，先生"复晋省，入民国公校，旋去而之实修学校"。（《闻多》，《辛酉镜》）

是年夏　北京清华学校来鄂招生，先生投考，录为备取第一名。堂弟闻钧天回忆："清华来鄂招生，闻廷政在教育司门前看到告示，回来便让一哥去投考。因为报名有年龄限制，别人都过了年限，只有一哥一人符合条件。"（据访问闻钧天记录，1986.9.15）长兄闻展民《哭四弟一多》回忆："汝幼好读梁任公文字，此乃汝认识政治之发轫。十三岁出应清华入学考试，主司赏汝文，以此获选。"（《人民英烈》，第376页）

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多闻阙疑》，这正应了先生名字的来历，又用梁启超文笔，故得主考赞许。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清华学校在鄂招生，规定湖北省只取四名。先生报名投考，初试时，一篇文题《多闻阙疑》的中文作文，大得主考人赞许，据说是模仿当时最时髦的梁任公笔调而作的；不过因为其他学科成绩平平，结果录为备取第一名。"（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4页）

考试情形，当年与先生同入清华学校的江西籍同学刘师舜回忆可兹参考。其云："民国元年，清华招考新生，我同（邱）大年都到教育司报考应试。还记得那时清

华招考，好像未用校名，我所听到的似乎只是'游美预备科'的名义，而得到招考消息的人也并不多。所以应试的不过廖廖数十人，我和大年均在内，记得头场考过以后，成绩稍优的，都召到楼上试场受试。其中英文一科，似乎只考默写，而默写之时，仅由主试人报几个单字，应试人照样录于考卷上面。我还记得很清楚，单字之一为 lnksamd。……江西教育司考试的结果，一共取了正取五名，备取若干名。正取除大年和我以外，有贺季贞(以字行，原名贞元)、程其佳、王朝梅，大年考了第一名。后来因为还有缺额，备取游嘉谷、汤承鑫也都补上了。"(刘师舜《悼念同级好友邱大年》，台湾《传记文学》第 11 卷第 2 期)

是年冬　由闻家骒伴送赴北京参加清华学校复试[①]，"临时背熟一些应用的英文成语，因而复试的结果，在规定鄂籍应取四名中，先生以第一名录取了"。(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 4 页)当时，虽然社会风气尚未全开，各省报考者数量不一，但已有竞争。潘光旦说他报考的一九一三年，江苏名额仅 11 人，而报名的却达 200 多人，原因是"留美"的金字招牌很能吸引人。(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 31 辑，中华书局 1962 年 10 月出版)

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庚款办起来的学校，创办于一九一一年三月。此前一九〇九年六月清政府在北京即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交部与学部共管。同年八月招收直接送美学生，并筹建游美肄业馆，选定清华园为校址。一九一一年三月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一九一二年十月又改称清华学校。这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生名额按各省分担赔款数额分配，学生入校学习八年，毕业后全部资送美国留学。当时社会风气未开，一般家长对于子弟出洋多存畏惧心理，大家子弟又囿于父母之邦、蛮夷之国的成见，所以应考者不像以后那么踊跃。但闻廷政思想开明，一则为了清华学习的是近代科学文化，二则学生学膳费全免，可省家庭不少开销，因先生入学时，学、膳、宿费全免。一九一六年后入学者，始实行半膳费，再以后入学者则改全膳费。

清华学堂成立时，学制分高等、中等两科，均为四年，后改为高等科三年、中等科五年。先生这年入学，因高等科毕业于一九二〇年庚申年，故称庚申级。庚申级共四十二人，来自十三个省。其情形见庚申级中等科毕业纪念刊《级史》："民国元年秋八月，校中初始业，生徒先后至，级友新自直隶至者二人，孟继懋、李耀慈。自山西至者五人，梁治国、师淑痒、张省、秦文蔼、刘和。自四川至者四人，罗经绶、吴际泰、王德郅、吴泽湘。至张心生、何锡藩、何锡瑶、马恒□，由河南咨送。萨本铁、

① 季谱说由父亲伴送，据闻钧天、闻家驷回忆，当是由闻家骒伴送。

吴世晋、杨天成，由福建咨送。黄大恒、蒋祖烈，自湘至。闻多、罗发祖、时昭涵、何钧、王度、宗植心，自鄂至。至陈宗泽、陈本鋆，自粤至。江西六人，邱椿、刘师舜、程其佳、王朝梅、游嘉谷、汤承鑫。江苏四人，姜家汉、赵学海、徐荫昌、贾观林。山东二人，孙建中、高长庚。贵州一人，周兹绪。云南一人，陈复光。凡四十有二人，籍隶十三省，尔时年近十四五者居多，游嘉谷十岁，称最幼。受号，复试，就班。班有长，二班为级，级有长，吴际泰年长，性温厚，众推为级长，兼长乙班。甲班则吴泽湘长之。"（清华学校庚申级编《级史·纪·一年纪》，清华学校1916年4月编印）

时，清华学校尚在试验阶段，中等科之中文课程，依各生程度分别编入一至五年级。先生因中文甚佳，被单独编入五年级。《级史》载课程及课外活动云："当是时，中等科五年卒业，本级居末，故称中等科一年级。课程总分中英两科，英文七类，一曰读本，二曰默书，三曰文法，四曰图画，五曰数，六曰乐，七曰博物。郑乃文先生教读本、默书、文法，刘先生授数学，章先生授博物，画师为美女士施达先生，乐师为沙菩女士，亦美人。中文以文境之深浅，定级次之高下。闻多列入五年级，邱椿、罗发祖、徐荫昌列入四年级，程其佳、萨本铁等列入三年级，余皆入一二年级。三年级以上，日讲文一小时，下此者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作文皆每周或间周一次不等。运动时，级友类踟蹰道旁，观望而已。当时以初入学，奉法谨，相知浅，常默不交谈。至十月十日，国有庆，校令生徒习礼于礼堂，如西礼，各级以次起立欢呼，至本级，相顾笑，不立。继立者二十余人，不呼。高三学生潘文炳君劝诱数四，遂呼之。是夜，堂中座有次，秉烛，联行，齐歌，欢呼，各以级次，不可乱，尽欢焉。他日乃欣然相告曰，吾今而后知有一九二〇。一九二〇者，西历千九百二十年也，本级于是年毕本校业。要其终而言，故以名本级。"（同前）

据《级史·分班表》，先生编入乙班，同班者有邱椿、贾观林、何钧、时昭涵、罗发组等；甲班有刘师舜、王朝梅、萨本铁、周兹绪等。又，一年级所学课程，读本采鲍尔文氏《英文读本》第二、三集，文法采邓尼氏《英文法程》，算术采斯密司氏《中等英文算术》，博物采吴秀三《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钱承驹《中学动物学教科书》与《普通植物学教科书》，会话采爱德夏氏《异邦之人》。

先生考取清华，对他的大家庭也有不小影响。兄弟们十分羡慕，看到除上学读书外，还有一条出洋的路，于是有几个暗暗下决心走这条路。后来堂兄闻亦传、堂弟闻亦齐相继考入清华，在家乡引起哄动。（据访问闻钧天记录，1986.9.15）

一九一三年　十五岁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所派枪手刺杀，两天后不治身亡。

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

十月六日，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遂组建北洋政府。

十一月四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

二月　寒假后开学，重新编班。先生编入甲班。同班中还有徐笃恭、王朝梅、师淑庠、何钧、时昭涵、周兹绪、罗发组、吴世晋、高长庚等。（据《级史·分班表》）

六月　因英文跟不上而留级。自传《闻多》："来校时，距大考仅一月，又不审英文。次年夏，遂留级。"这年庚申级留级或离校者十人，几乎占全级四分之一。

九月　重新从中等科一年级读起。是年六月三日，校令改高等科、中等科各为四年，恢复最初学制。因该级高等科毕业为辛酉年（1921 年），故称辛酉级。自庚申级留级者还有贾观林、师淑庠、何钧、周兹绪、时昭涵等。该级共七十三人，分甲乙丙三班。先生乙班二十四人，有师淑庠、贾观林、何钧、周兹绪、顾德铭、王际真、彭开煦、瞿世英、薛祖康、吴泽霖、钱宗堡、沈有乾、萨本栋、任宗济、徐宽年等，由陆锦文先生负责管理。甲班有时昭涵、潘光亶、王世圻、罗隆基等，丙班有何浩若、程绍迥等。（据《辛酉镜·班次》）

先生去年入校时，便改名"闻多"，并取消字号。辛酉级一些同学在他的影响下，也只用一人一名。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有人提倡废除别名与号，主张一人一名，名号统一。一多就竭力拥护响应。他在族中属'家'字辈，原名家骅，考清华时就改名'多'。入校后就宣布以后只用'闻多'，取消原来的'友三'和'友山'的号和别号。在他的带头下，很多同学就取消了别名，我就是其中之一。"（《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161 至 162 页）

十一月八日　与何钧等发起课余补习会，并被推举为副会长。《辛酉镜·大事记》："十一月，何钧、闻多等发起课余补习会，所以磨厉道德、交换智识，而联络感情也。会为三部：曰图书，藏中西书报图籍，俾会友以时往观。曰演讲，周有常会一次，以练习演说或辩论，期之终有比赛，优者奖之，以资鼓励。曰练习，分中西文及

科学三科，科有长，析疑难拟论辩，间一周归其所作于科长，科长课其殿最，择其优，别存之以饷众。议粗成，既以请于校长而许之，遂以八日开全级大会于博物教室，以征议于级友，赞成者大半，乃以赞成者为会员。又推何钧为会长，闻多副之。"十一日，请桂质廷、陆锦文两教师为名誉会长。

十一月十五日 课余补习会开成立大会，先生祝词。《辛酉镜·大事记》："下午一时大会，全体会友于博物教室，庆成立也。会长何钧首为开会词，次为副会长闻多祝词，三为合唱，四为赵校长演说，五为瞿世英英语述故事，六为名誉会长桂质廷先生演说，七为贾观林独唱。会将终，桂先生复起以英语述是日会序以告诸美教员。"

同日 清华学校举行全校性各级戏剧比赛。辛酉级演出独幕剧《革命军》(又名《武昌起义》)，先生参与编剧，并饰革命党人。该剧获全校第二名。

《辛酉镜·戏剧》云其剧情为："瑞澂闻武昌革命党蛰伏，朝夕惴恐，一日召张彪至，与议守御之法，又以妻孥委之，属先遁去，以防不虞。彪行，吏拘二党人至，澂亦不加详鞫，坐以死罪。俄而报事变，澂惊而仆，兽行往复室中，不知所措。从者将之起，亟为芟须易服，戴之于舆以逃。既出，署中火举，枪举四起。舆夫惧，步趋相问，旋起旋踬，伏至颠顿。"

这是先生参加戏剧活动的第一试，此后便热衷戏剧。当时在该剧中饰仆人的吴泽霖云："一多在中等科时确曾爱好戏剧，但他的兴趣主要在编写剧本，特别是推敲台词。常与罗发组等搞到深更半夜，好像还有顾德铭和贾观林等人。"(吴泽霖给编者的信，1986.6.27) 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亦云："伊又喜欢编写剧本。最初几年，高中两科八年，每年辄写演短剧比赛；吾级多次之短幕戏剧均由他一手创作，演出之后，总能名列前茅。"(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7)

十二月六日 课余补习会推先生编辑《课余一览》。《辛酉镜·大事记》："六日常会时，有议述半年来成绩以为杂志者，众曰善，遂以闻多等司编辑，定名曰《课余一览》。"次年一月寒假中，《课余一览》第一期编成，二月印行，"分言论、科学、文艺、小说、杂俎、纪事，凡六类，以油印"。这是先生初次编辑的刊物。

十二月三十日 辛酉级开年终俱乐会，有演说、谐语、唱歌，并演出趣剧《打城隍》。先生饰差役。

《辛酉镜·戏剧》记该剧剧情为："秦筑长城，强民为役，民患之，皆相引去，乃遣吏巡于乡野以捕民。有农夫耕于亩，见二吏，遥知有变，亟逃匿于城隍庙中。遇士人，亦言避乱至。旋一樵夫又至。僧惧获罪，迫令三人出，三人哀求，僧乃设计取神像之衣冠，使三人著之，坐龛中，佯为偶像，以避吏之索。于是士人为城隍，农为判

官，樵为小鬼。坐定，二吏果至，称不得人，将祷于神以求佑，乃列俎豆于案，再拜而去。三人方饥甚，因分取其馔而食之。次日吏仍不得人，又至，责神素餐，鞭之乃出。士愤甚，恐明日再来，求与判官易服使代受鞭。次日吏又至，言城隍必听判官之谗言，乃鞭判官。既去，士又求为小鬼。明日吏至，言城隍、判官均受责，今日必小鬼为之祟也，遂鞭小鬼而出。于是士大号，余人亦不觉失笑，吏闻声返，则见人，遂拘之以去。”

次年一月七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及夫人来校参观，清华学校特以该剧作为欢迎节目之一。

一九一四年　十六岁

一月十日，袁世凯命令解散国会。

五月一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七月八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重结革命力量。

二月二十一日　课余补习会改选，先生任书记，仍任《课余一览》中文编辑。寒假后开学，担任乙班班长。（据《辛酉镜·大事记》）

三月十四日　辛酉级与庚申级举行联合辩论会，题为“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读经”。先生任本级主辩，获胜。辩论会主席为校长周寄梅（贻春）。

《辛酉镜·演说辩论》：“吾级初有课余补习会设演讲部，每星期开会，以资练习。然其时规模甫具，于演说一门，未臻完备，不过为改革进行之根据耳。至民国三年春，与二年级博约会举行联合辩论会，始稍著成绩也。是会于三月十四日举行，场设博物教室，校长周先生实为主席。辩论题为‘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读经’。吾级主辩闻多，助辩陈念宗、钱宗堡，为正组。博约会主辩罗发组，助辩邱椿、吴泽湘，为反组。[①] 其结果吾级获胜。裁判乃陈筱田、李仲华、张恺三先生也。”

周寄梅主持清华学校期间，十分注重演说训练。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为提倡演说专门发布布告。布告云：“言为心之声，即所以代表意者也，故这言语一端，孔门列为专科。演说一道，又为今文明各国所必注重，况共和政体，演说之用途益广，启导国民，演说之收效较速。吾邦于此端，近鲜研究，未始非一缺点。诸生等值此学年之际，正宜从事练习，将来施诸实用，必能大有裨益。兹拟订国语演说竞赛章程六条，以为鼓励之资，诸生等各自奋励，共夺锦标，本校长不禁有厚望焉。”（吴景超《清华的历史》，清华周刊社编《清华生活》，1923.4.28）由于周寄梅的提倡，清华学生演说练习形成风气，先生亦得到训练。

时，袁世凯通令各省崇祀孔子，康有为以孔教会长名义电袁，要求将读经一科

① 《辛酉镜·大事记》载辛酉级为反组，庚申级为正组，与此所述不同。

加入学校课程。

六月十五日　《课余一览》第一期第二号出版，先生参与编辑。

该号刊有先生的论说《名誉谈》、小说《泪蕊》（与时昭涵合著）、杂俎《曹大镐先生绝命词》、《髯仙》、《人名妙对》五篇。原刊已残，上文仅见于目录，唯存《名誉谈》一篇，目录署名闻多，然正文署名"漱仙"，当是笔名。《名誉谈》为现今发现之先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言写成，内容主张为社会做贡献，反对独善其身。该文全文如下：

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所谓结驷连骑之游，侈袂执圭之贵，乐既乐矣，特黄粱一梦耳。其能存纪念于世界，使体魄逝而精神永存者，惟名而已。名之大小久暂，常视其有益于一群之深浅高下以为之衡。吾辈今日所享之文明，其何以致之，皆古人好名之一念所留耳。文明无极境，故求名之心亦无穷期。所求之名大，其所遭拂戾之境益众，而其人之价值亦与俱高。古今丰功伟烈，当其发端之始，莫不有至艰至险之象横于其中，稍一迟回立归失败。惟有此千古不朽之希望，以策其后，故常冒万难而不辞，务达其鹄，以为归宿。古来豪杰之士，恒牺牲其及身现存之幸福，数濒于危而不悔者，职此故耳。然则名之一字，固斯人第二之生命，而九洲风云之生气，所以稽天柱而垣地维者也。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而见于色。（此章赵注本极分明，自晦庵误解，翳障始生，宋儒贱名学说，半以此为根据，不知其字正上文好名者之代名词，明白易晓，过于求深，反不辞矣。是故文法不可以不急讲也。）圣人之重名也至矣。惟老氏始以名为大戒，其言道也，曰无名天地之始；其训世也，曰为善无近名。今讲圣贤行义达道之学，而傅之以老庄绝望弃智之旨，吾不知其何说也。自秦汉以及唐，好名之念，犹未绝于士大夫之心，跅弛不羁之士，史不绝书，而国威赖以不替。洎宋学家言，风靡一世，神州俗尚，为之一变，尚知足而绝希望，重保身而戒冒险，主退让而斥进取，谬种传流，天下事乃尽壤于冥冥之中。千年以来，了无进步，而退化之征，不一而足。束身自好之士，读孔孟之书，而坚守老子不为天下先之教，凡慷慨尚气磊落光明者，皆中以好名之咎而摈斥之。彼乡里谥为善人，庙堂进为耆德者，曾无雄奇进取之气，惟余靡靡颓惰之音。宋明之丧，皆若辈之毒炎致之耳。士生今日，人格之高下，当以舆论之荣辱判之；而舆论予夺之衡，必以有益人群与否为准，凡一切独善其身之说，皆斯世之蝥贼也，学者苟力崇进取，不避艰难，以急切近名之心，而蕲于开物成务之哲，神州之患，岂无豸乎。而我清华士子，际此清年，旭日方东，曙光熊熊，叱咤羲轮，放大光明，以嚇吓寰中。河出伏流，狂涛怒吼，乘风扬帆，破万里浪，以横绝五洲，腾云驾雾。海阔天空，美哉前

途，郁郁葱葱，大好良机，正吾人大有作为之日，幸勿交臂失之也。岳武穆词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良有以也。

是年夏 参加图画校外写生团。《辛酉镜·美术》："甲寅夏，图画教员司达尔女士组织校外写生团，闻多、时昭涵、潘光亶等皆与焉。"

图画校外写生团由司达尔女士负责，其"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威斯林大学，历任该州洛第高等学校教授，暨迪科他威斯林大学绘画教授。富有学识经验。辛亥春，来清华本校绘画教务"。（清华学校庚申级编《级史·图画志》）

先生善画，闻于清华，人称"闻多之水彩景画，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辛酉镜·美术》）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亦称："吾级吴泽霖、方来、杨廷宝与本人，对绘画亦有兴趣，兼受美术教师司达女士之鼓励。惟一多铅笔与水彩画成绩特好，最受赏识，是为其留美学习绘画之根源。"（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7）较先生低一年级的张闻骏曾见过一幅画，说那是先生用各种碎片拼起来的，很特别。在级会的布告栏里，常见有花鸟之类的画，不少出自先生手笔。（据访问张闻骏记录，1986.8.28）

清华中等科一至三年级均设有图画课，任教者前后有两位美籍女教师。司达尔（Miss Starr）教白描，画石膏像；里格卡特（Miss Lyggate）教写生。课上有炭画、水彩画练习，先生颇有兴趣。《闻多》云："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

九月十四日 暑假后举行开学典礼。先生升入中等科二年级，编入甲班。同班中有时昭涵、顾德铭、薛祖康、吴泽霖、钱宗堡、郭殿邦、萨本栋、罗隆基、廖芸皋、熊祖同、聂鸿逵等。（据《辛酉镜·班次》）

九月十八日 课余补习会改选，"举定闻君多为会长"。（《清华周刊》第13期，1914.9.22）十一月上旬课余补习会改组，更名为中二级会，凡级友均为会员。

十二月十二日 中二级会"常会时表决陈列近来文学及美术成绩为游艺会，以闻多、陈念宗为汇稿员"。（《辛酉镜·大事记》）后因条件未成熟，游艺会被取消。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二级会"开年终俱乐部会，选举下学期职员，闻多为级长兼会长，顾德铭为副会长"。（《辛酉镜·大事记》）浦薛凤说："一多，原是单名'多'，以聪慧见称。读书而外，从事各项课外活动，加之写字秀逸，作文华美，图画高明，口才卓越，是以被推担任级长，知名校内。"（《忆清华级友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7）

一九一五年　十七岁

一月十八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激起全国民众强烈反对。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将是日定为“国耻日”。

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第一期起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

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改国号“中华帝国”，定一九一六年为“洪宪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

六月十三日　中二级会改选，“先由闻君多叙述该会经过之情形，闻者莫不感发。次选举下学期正副会长，其结果陈君念宗为正会长，闻君多副之。次由新旧会长致就职交代词，茶点，继以各种游戏，尽欢而散”。（《清华周刊第一次临时增刊》，1915.6.26）

六月二十六日　《清华周刊第一次临时增刊》载《本校三育最优成绩得奖表》，智育类图画项下云：“二级第一闻多”，获“景画一幅。”《辛酉镜·美术》：“闻多以图画冠全级，奖景画一幅。方来亦获名誉奖。其年，本级图画成绩甚优，多选到巴拿马展览会。”

《增刊》所附职员表中有先生之名，这是先生初次担任《清华周刊》编辑。《清华周刊》原为《清华周报》，创办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为同学所办校内刊物。其编辑均由校方指派。秋，改为《清华周刊》，总编辑陈达，编辑还有吴宓、洪深、汤用彤、罗发组等。该刊目的有二：“一、求同学之自励，促教育之进步，以光大我校固有之荣誉，培养完全国民之性格。二、荟集全校之新闻，编列新鲜之历史，使师生之感情日益密，上下之关系日益切。”（《清华周报·发刊词》）

是年暑假　回浠水老家。

清华功课很重，只有暑假才能集中时间读各自喜爱的书籍。自传《闻多》云：“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

扰人也!'所居室中,横庐群籍,榻几恒满。"闻展民《哭四弟一多》云:"其后远游,虽暑归省。虽值炎午,汗挥雨注,犹披览不辍。比薄暮,蚊蚋袭人,以扇摇曳,油灯照影,伴汝书声,母氏悯汝劳,命之辍,汝不应。一日傍晚,汝方立露井观书,蜈蚣缘汝足而上,家人乍见呼汝,罔顾,代而驱之,汝反讶其扰。"(《人民英烈》,第376页)有时,家里人叫他"书痴",有的责备他"不事俗务",先生则曰:"吕端大事不糊涂!"(《闻朱年谱》,第4页)

家中有间书屋,不大,但安静,两扇窗户打开,光线充足。先生在这里读书二月,故称"二月庐"。暑假中所做读书札记,亦题作《二月庐漫纪》,中文稿曾在《清华周刊》连载过一些。

先生回乡,给家里也带来新的气氛和欢乐。闻家驷《忆一多兄》:"在经史子集四类书籍中,父亲主张读经,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稿本,重叠沓杂,每隔几天,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从他青年时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学以前,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念书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对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来了。"(《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73页)

侄子闻立勋《回忆四叔闻一多》中说:"他对我们晚辈的学习非常关心,常出题目教我们做文章。望天湖的荷花开了,他出《咏荷花》的题目教我们做诗。那时候,军阀混战,溃兵横行乡里,有时为了躲避骚扰,家里人不得不在湖中船上度过。一多叔知道了,就出了个《溃兵行》的题目叫我们做。文章做好,他亲自给我们修改。谁的文章做得好,他就把自己的牙刷、牙膏、镜子、梳子等日常生活用品奖给我们。……他时常带我们去钓鱼、摘菱角,等我们玩够了,又把我们集在一起,教我们做诗、学算术。一多叔很喜欢画画,每天大早起床就带着画夹画笔到望天湖边画荷花。他画的荷花栩栩如生,我们都争着要。……有年暑假,他特地给我糊了把扇子,并在上面画了个牧童骑牛,手拿着书看。还题了四句话:'王冕牧牛,骑牛读书,试问尔儿,自比何如?'"(未刊,汪德富整理)

先生与胞弟闻家驷感情尤深。闻家驷《忆一多兄》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讲解苏子瞻留别其弟子由的一首诗(题作《辛丑年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讲到'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时,他不禁感慨系之。这时,他心里显然是以子瞻自比,而把我比作子由的,因为岁月如流,眼看暑假就要结束了。"(《闻一多纪念文

集》，第 373 页）

九月十三日　清华学校开学典礼。先生升入中等科三年级，编入乙班，并担任班长。同班有时昭涵、顾德铭、薛祖康、何浩若、罗隆基、王昌林、熊祖同等。（据《辛酉镜·班次》）

是月　《清华周刊》改为单行小册子式样，先生继续担任编辑。时，总编辑为陈达，副编辑为曾宏逵、施济元，编辑除先生外，还有吴宓、沈鹏飞、洪深、汤用彤、罗发组、张鹤年，经理为陈俊。（《清华周刊》，《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

十月十六日　在级会上演说。“中三级会，于上星期六，举行第四次常会，主席王君世圻，演说者有杨君廉正、闻君多、姚君永励，皆畅所欲言，娓娓动听，历一时余始散”。（《清华周刊》第 51 期，1915.10.20）

十一月三日　清华决定出版《清华年报》，职员由校长指定，高等科学生任正职，中等科学生为副职，先生被指定担任图画副编辑。时，图画编辑为朱彬，副编辑还有曹栋、欧阳勋、徐笃恭、陶世杰。（据《清华周刊》第 55 期，1915.11.17）《清华年报》为“中国高等学校中最早的周年出版物，印刷这报的宗旨，是送到巴拿马赛会展览。全书用英文，多图画照片，附以简单说明，所以使人一看，即如见清华一样”。（《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1922.4.4）

十一月六日　中三级为款待本级教员及协和学校足球队，在工字厅演出《两仆计》，（《清华周刊》第 54 期，1915.11.10）先生饰律师。

《辛酉镜·戏剧》介绍剧情为：“有劳普同者，雄于资，子维新留学欧洲有年，尝以书归，请于父，将娶西妇，普同不许。后维新归，携一西妇，普同见而大怒，将逐之。维新哀求于母，母怜之，颇有留意，而普同终牢不可破。维新不得已，挈妇去。普同又惧无嗣，谋诸仆高三。高三称普同之甥吴氏子颇警敏，可引为嗣。普同之妻独不以为然，谓吴氏子素不谨礼法。普同不听，召之至，与之语，大悦，遂以为嗣子。初吴氏子本贪婪，垂涎于劳氏资财者有年矣，至是则益大喜过望，与其仆陶晏谋，乞力为之说项，事成，当分资以为酬。陶晏既见普同，言吴氏子警敏而好学，试尝冠其曹，故最为父母所钟爱。普同信以为真，事遂成。吴与仆既至普同家，每喜外出，数日不归。后普同微病，吴未尝入寝门，普同怒，明日以高三计，佯称病重，命速召律师至析产。吴大喜，俟律师至，导之别入一室，使陶晏卧病以为普同，告律师，尽以家资为吴氏。后为高三所觉，以闻诸普同，普同召吴至，重责其不义。吴与仆愧而私逸去，普同乃复遣人觅维新妇。”

十一月十三日　中三级与中四级举行联合辩论会，先生参加，为本级助辩，获胜。《辛酉镜·演说辩论》：“本级与庚申级开联合辩论会，题曰‘国家之富强在政欤

抑在人欤'。四年级主'在政',主辩邱椿,助辩萨本铁、陈复光。吾级主'在人',主辩钱宗堡,助辩闻多、周兹绪。裁判员为陈筱田、戴梦松、王庆孙三先生。结果,吾级获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清华学校举行第三次戏剧比赛。中三级演出《兰言》,赞浪子回头。先生饰伍澹阶之母。①

《辛酉镜·戏剧》记述剧情为:"伍澹阶者,尝毕业于某陆军学校。父早世,母老弟幼。澹阶恃有厚资,不勤学,尝至市井,与人博,至数日不归。友劝之,不听。事闻于母,母遣仆召之,亦不归。明日仆来,报母病,澹阶以为诳,博如故,翌日始归,见母,母大怒,杖之。适其舅至,言乌将军方有事于西藏,拟命澹阶偕行。乌将军者,澹阶之父执也,父死时尝以澹阶托焉。母初尚犹豫莫决,卒从舅言,修书命澹阶持往见将军。既至,将军与之语,大悦,乃以为参谋,军兴后,屡建奇功,擢为少将。后军事竣,归家,母见之,为之大喜。"

十二月十八日 在中三级会英文演说会上讲故事。"中三级会于上星期晚举行第八次常会,会序为英文演说,主席为袁君昶熙,演说员为徐宽年、宋珣、熊祖同三君,题目徐君为《排除恶魔试探法》,宋君为《如何能为完全学生》,熊君为预备。言语清雅,意想高尚,可为修道养德之助。末由闻君多讲故事,欢聚一室,历一时始散"。(《清华周刊》第59期,1915.12.22)

十二月二十四日 在中三级会举行"演装国会"上担任国会主席,"中三级会于月之二十四日午后开会,讨论各项事宜。其布置均仿国会仪式,因名演装国会,既可练习口才,亦可唤起兴味。闻君多为主席,讨论逾时而散"。(《清华周刊》第61期,1915.12.29) 这种"演装国会"在月初曾举行过一次,当时"议件为'日本下哀的美敦书要求中国将南满归并日本,中国宜取如何行动'一事。会友有主和者,有主战者,雄辩滔滔,秩序井然,俨如一小国会"。(《清华周刊》第58期,1915.12.8)

十二月二十五日 参与创办贫民小学。时,民间提倡向西方学习,普及教育风气颇为盛行,清华学校教职员亦怜悯附近贫寒子弟幼年失学,由周寄梅、赵月潭等先生发起成府贫民小学。成府贫民小学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开办,经费全部由发起人及赞助人捐助。(《学生方面·德育·社会服务》,《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 清华同学受此影响,亦提议在海甸镇创办一所贫民小学,并得高等科全体同学多数人同意。二十四日,高等科各级级长、班长开会讨论进行手续,认为贫民小学既为清华学生创办,自应高、中两科"合力进行"。是日,"开高、中两科各级长、班长

① 《兰言》演出时间,《辛酉镜》作12月31日,这里依《清华周刊》所载日期。

联合大会，张君光圻主席，议定此事由高、中两科合办，其筹款方法，校内则同学临时捐及常年捐，校外则以音乐体操各种美术之余兴开会募捐。其余详章及施行手续已举定朱成厚、关颂韬、闻多、白敦庸、陈烈勋、吴世晋、傅葆琛、吴曾愈、林振彬、孟继懋、陆梅僧诸君分别担任”。(《清华周刊》第 61 期，1915.12.29)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三级开会选举下学期职员，先生当选会长。“中三级会于上星期五晚在博物教室举行年终俱乐会，初由会长报告本期大概事略及下期应行改良之处，继选举正副会长，其结果闻君多被选为正会长，沈君有乾副之，戏剧茶点，尽兴而散。”(《清华周刊》第 62 期，1916.1.5)

一九一六年　十八岁

一月一日，云南成立都督府，“护国战争”爆发。

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国号，复任大总统。

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殁，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

八月一日，国会复会。

十二月，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一月九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此为迄今所存先生最早的信函。信中报告平安消息，又问及在云南的长兄闻展民的情况。时，云南已举护国义帜，但袁世凯极力封锁消息，故信中云：“滇事真相，颇不易知，据此间舆论，无大暴动也。”（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时，学校对中等科学生管理甚严，其中定有学生家人通信十条规则。吴景超在《清华的历史》中说：规则规定“每个学生，一月至少要写两封家信，送斋务处注册，即投入该处邮櫈内。不按定章与家属通信的。查出后由斋务处督其面书，以示相当之罚”。（清华周刊社编《清华生活》，1923.4.28）

是月中旬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缺前，仅存后半封，云明日起大考。

二月二十六日　清华学校学生为创办贫民小学筹募资金，于是晚在市内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演出《卖梨人》与《贫民惨剧》。先生参加总务部与招待部工作。这是清华的一次大规模活动，参加者颇多，如陈达、刘崇鋐、陈长桐、汤用彤、向哲濬、罗发组、李济、陆梅僧、林志煌、时昭瀛等均担任了组织或演出工作。

《卖梨人》为趣剧，《贫民惨剧》为悲剧，由洪深编写，并在演出前做了说明。剧情紧扣人民困苦生活，说明“贫贱小民幼时无适当之教育，长成无一定之职业，不能自活，强横者或竟为社会蝥贼，愚儒者亦冻馁而死，哀惨莫甚”。（《清华周刊》第66期，1916.2.29）是晚观者中有外交部次长、教育部总长及次长、萨镇冰上将。外交次长曹汝霖当场捐款百元。三月四日，复在青年会再次演出该两剧。

此次演出本是清华学生为创办贫民小学筹募经费，但原拟设在海甸镇的贫民小学离校较远，办事诸多不便，周寄梅等清华教职员所办的成府贫民小学则需费甚亟，于是决定将此款充作成府小学基金。（《学生方面·德育·社会服务》，《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

这次演出，也是清华学生第一次进城演剧。至先生一九二二年赴美留学前，清华学生为筹募捐款共入城演剧四次，先生除本年四月为北京青年会留学部筹款的一次未参加外，其余均参加了。

二月二十九日　《清华周刊》刊登各年级职员，先生为辛酉级班长、第八自修室室长。中等科"中三级长闻多，甲班班长沈有乾，乙班班长薛祖康，丙班班长吴泽霖。"中等科自修室室长名单中，云"第八自修室闻多"。（《校闻·职员选定》，《清华周刊》第66期，1916.2.29）

三月初　因级会与年级组织并立，"行事多有冲突"，"级长闻多及丙班班长吴泽霖建议级与会合治。级分三部，有体育部、有毕业纪念筹备部，而以会为总务部。议粗成，既以谋诸甲班班长沈有乾、乙班班长薛祖康，及中三级会长陈念宗而许之。又于上课时征议于级友，亦获多数赞成"。（《辛酉镜·大事记》）

三月十一日　中三级召开全级大会，决定接受先生与吴泽霖建议，"选举钱宗堡、康德馨、刘沛漳、闻多、沈有乾、薛祖康、陈念宗、姚永励九人为（级会改组章程）起草员"。（《辛酉镜·大事记》）

三月二十五日　中三级召开大会，通过改组章程。此后，中三级改称辛酉级。新会长由薛祖康担任，先生任英文书记。（据《清华周刊》第70期，1916.3.29）

四月五日　清明节。下午，参加全校西山植树，步行七里许，至红石山（清华校产），每人植树五六株。（据梁《本校西山种树记》，《清华周刊》第76期，1916.5.10）

四月十二日　《清华周刊》调整职员，先生仍担任中文编辑。时，总编辑为汤用彤，中文编辑还有沈鹏飞、苏乐真、刘庄、汪心渠、李权时、沈浩、曹明銮、桂中枢、严继光、廖永忠。英文编辑为王祖廉、刘崇鋐。经理为林志煌，副经理为姚永励。此外，学校还加派了顾问，顾问为夏廷献、杨恩湛、叶醴文、周辨明、王文显、唐悦良、陈达、吴宓、洪深、谭少藩。（据《清华周刊》第72期，1916.4.12；《清华周刊》，《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

四月十九日　《二月庐漫纪》开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七十三期。全文十六篇，均收入《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此文为读书札记，体现了先生"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闻多》）的读书特点。首篇四则，其一则与闻氏姓氏有关：

余祖信国公天祥，军隳于空阮，被执；家属潜逃于楚北蕲水之永福乡，改文为闻，史亦失传，而家乘相沿久矣；其与取韩之半为韦事将毋同？或疑景炎二年，元人送公家属于燕，二子死；其明年，长子复亡，家属皆尽。是犹云汉之诠所云，黎民靡有孑遗耳！古称尽信书不如无书，有以也。

先生为弄清"闻"姓源流，曾做有《闻氏先德考》，搜集若干史料，但终因语焉不详未能成文。

四月二十六日 《二月庐漫纪》续一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七十四期。共四则，有取《史记》、《汉书》之典故引以发叹者，有因宋宣和年间禁苏轼文字的感慨。

四月二十七日 辛酉级会召开辩论会，"辩论题为'今日中国修练甲兵较普及教育为尤要'。正面主辩康德馨，助辩陈华庚、浦薛凤；反面主辩闻多，助辩罗隆基、王际真。结果由会友公决，反面获胜"。(《清华周刊》第75期，1916.5.3)

五月三日 《二月庐漫纪》续二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七十五期。共三则，前两则为两汉史事，后则为读《晋书》而发现史笔有所不同。

五月十日 《二月庐漫纪》续三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七十六期。共三则，其一记康熙征准噶尔时俘厄鲁特一乐工，其歌音调悲壮，颇有骨气。

五月十七日 《论振兴国学》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七十七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时，清华课程分西学、国学两部。西学课程与留学密切，学生多所重视。而国学课程相反，且为下午开课，即使不及格亦可毕业。于是某些学生在国学课上常演闹剧，先生很看不惯，故撰文强调国学乃国运所寄。文云：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罗马之强在奥开斯吞时代，及文气芟敝，礼沦乐弛，而铁骑遂得肆其蹂躏焉！吾国汉唐之际，文章彪炳，而郅治跻于咸五登三之盛。晋宋以还，文风不振，国势披靡。洎乎晚近，日趋而伪，亦日趋而微。维新之士，醉心狄鞮，幺么古学。学校之有国文一科，只如告朔之饩羊耳。致有心之士，三五晨星，欲作中流之柱，而亦以杯水车薪，多寡殊势，卒莫可如何焉。呜呼！痛孰甚哉！痛孰甚哉！吾国以幅员寥廓，人物骈阗之邦。而因循苟且，廓庵自大，政治窳黩能是，工艺薛暴若是者，职是故也。夫赋一诗不能退虏，撰一文不能送穷，恒年矻矻，心瘁肌瘦。而所谓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者，遍于天下，斯诚然矣。顾礼《礼》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违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亘万世而不渝，胪万事而一理者，古学之为用，亦既广且大矣。苟披天地之纯，阐古人之

真，俾内圣外王之道，昭然若日月之揭。且使天下咸知圣人之学在实行，而戒多言。葆吾国粹，扬吾菁华，则斯文不终丧，而五帝不足六矣。尤有进者，以吾国文字，发明新学，俾不娴呿庐文字者，咸得窥其堂奥。则讵第新学日进，新理日昌而已耶。即科斗之文，亦将渡太平洋而西行矣。顾不盛欤？今乃管蠡自私，执新病旧，斥鷃笑鹏，泽鲵嗤鲲。新学浸盛而古学浸衰，古学浸衰，而国势浸危。呜呼！是岂首倡维新诸哲之初心耶？《易》曰："硕果不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吾言及吾国古学，吾不禁怒焉而悲。虽然，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今之所谓胜朝遗逸，友麋鹿以终岁；骨鲠耆儒，似中风而狂走者，已无能为矣。而惟新学是骛者，既已习于新务，目不识丁，则振兴国学，尤非若辈之责。惟吾清华以预备游美之校，似不遑注重国学者，乃能不忘其旧，刻自濯磨。故晨鸡始唱，踞阜高吟，其惟吾辈之责乎！诸君勉旃。

五月二十四日　《二月庐漫纪》续四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七十八期。共四则，均为摘古诗词之句加以评比。首则引张翰、王赞、苏轼三人之诗，诗中均有"鲈"，称三人一人胜一人。次则记述乡里闵佩锷事，云："吾乡有闵佩锷者，字侣华，诗有清才，曩尝读其《茶余清课》诗集，玲珑满目，美不胜收。近复得其《咏渔舟》云：'一叶蒲舟雨后收，芦花浅水便勾留。任他前处风波恶，只傍垂杨下钓钩。'语亦可味。"先生留意故乡名贤之事，此中可见一斑。

五月二十六日　清华学校中等科三月成立联合演说辩论团，先生为成员。是日，该团举行英文演说决赛，六人参加，先生为其一，演说题为"公众动力"。（《清华周刊》第 79 期，1916.5.31）

五月三十一日　《二月庐漫纪》续五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七十九期。共四则。其一记魏源为陈沆《简学斋诗集》之题记。陈沆，字太初，号秋舫，嘉庆间状元，其居与先生家为邻，陈、闻两家世代为姻。先生对陈沆事格外留心。

六月三日　辛酉级级会选举下学期职员，选出"会长沈君有乾，演说部长闻君多，国文书记罗君隆基，英文书记钱君宗堡，会计刘君沛漳，图画员杨君廷宝，图书管理员吴君宗儒及吴君泽霖"。（《清华周刊第二次临时增刊》，1916.6.17）

六月十七日　《美国学校毕业典礼之一斑》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次临时增刊》。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此为听了美籍教员力绮萨女士讲述美国大学毕业礼节情形后，有所感触而作。其序中云：

> 棫朴勉勉，文王亹亹。三王之大学曰辟雍，五帝之大学曰成均，吾国昔日学校之盛若此。其毕业、升学之典，在有所闻，奈失之庞樊，莫由稽考。洎后王

失政，教育薛暴，学校寝衰，科举制作，士子惟于应试时仅一觌面。常日黄卷青灯，株守牖下，与古人相对，与世人无缘，致埋首闭户，而以勤称，奚怪其孤陋寡闻而遗讥鼠目也。稽欧美各邦，每视学校毕业为重典，其风俗有大别于吾人者。故学者幼而同学，有朋友丽泽之益；长而共事，有明良翼赞之功。其所裨益，顾不巨欤！

六月二十九日 暑假开始。回浠水故乡度假。

时，闻氏族众第四次修纂《闻氏宗谱》，督修为先生堂伯祖闻瑛（族名佐澍，字瑞霖，号紫卿，同治壬申考取誊录官国史馆汉誊录，编纂臣工列传，议叙盐大使）。总纂为堂叔祖闻凯（族名佐泗，字杏亭，号鲁泉、定三）。先生伯父闻廷炬任纂修，编修有先生之父廷政与叔廷治。先生与胞兄家骢、家骏及堂兄亦尊、亦齐等亦参与誊写与校对。（据《四修任职谱务名目》，《闻氏宗谱》卷首，第 22 至 23 页）

假期间，接级友浦薛凤来信，内附一诗，先生亦作唱和。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葱汤麦饭撑肠食，明月清风放胆眠。自是读书非习改，不妨避世学逃禅。'此是级友闻一多兄在六十五足年以前，亦即在一九一六年暑假，自其湖北家中复信所附之律诗一首，迄今只能记诵之四句。先是，予曾寄笺，钦佩其才华，并赠以夏夜寄怀一章：'才华洋溢孰能俦？窃喜同窗益友求！铁划银钩书法遒，金声玉振论文优。铅描水彩画图俏，谈笑风生意气流。夏夜乘凉星月皎，思君一日如三秋。'此为予肄业清华七年中惟独一次与同学之唱和，足征予对一多甚深仰慕。"（台湾《传记文学》，第 39 卷第 1 期，1981.7）

浦薛凤所说的唱和之诗，即自编古诗文集《古瓦集》所收之《答浦瑞堂》三首，内中个别文字与浦文记载有出入。全诗如下：

君问生涯应矗然，
疏狂尤甚两年前；
葱汤麦饭撑肠食，
明月清风放胆眠；
自是读书非学政，
不妨接世类逃禅；
寂寞荒邨何求喜，
盼来青鸟报吴燕。

风波浮蔼岂由期？
奄忽相逾邈莫追。

千里空争尺素短，
五年悔失寸心知。
淡交君子原如水，
殷慕鲰生早向葵。
为约断金崇令往
景光记取惜随时！

忝许雕龙亦太憿，
应知焚砚有君苗。
遥知读毁苏秦股，
应更吟瘴沈约腰。
敢为丽珠藏爪甲？
漫将燕石引琼瑶。
锦囊且待西窗夜，
莫枉双鱼度渭桥。

秋后又有致潘光亶信，后以《致友人书》发表于次年二月二十二日《清华周刊》第九十七期，并编入《辛酉镜》。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潘光亶，字仲昂，江苏宝山人，一九一三年考入清华中等科一年级。一九一六年初因踢足球一腿受伤，未及重视竟发炎溃烂，不得已于一月十八日锯去，回家休养。先生当时事务繁忙，为未能赴市内协和医院探望甚为内疚，特致书表明心境，并勉励其振奋。信云：

白日不居，别来半载，引企兰光，瞻思何极！常欲裁尺一书，面付河鲤。只以足下剖蛤之医百就，飞蓬之客长驰，山河有戒，萍趾无方，良恐歧违，遂成阻辍。今春某君等约诣院省舰，本拟借行，嗣以鱼忙勘暇，命驾不发，鹤望兴嗟，鼓瑟弥感，邢非避尹，参若仇商，咫尺天涯，恨何如也！伏谂迩来餐卫适时，定动多豫。国手折肱，终逢越□；蒙足迅步，健于邯郸。倏将驱车北平，稽吕之来辄千里；剪烛西牖，杜李之文可细论，甚善甚善！某荆楚委蜕，因艳多才之士，燕赵负书，剧怜慷慨之夫。自辞鹳室，跼迹蜗居，人事罕接，素心靡梦。湖水灏瀚，望天不波，岩峰巉屼，帽云欲碧（望天湖碧峰岩俱近二月庐也）。锲镂疲瓠，涵饫搜猎。永叔蚕食，落纸有声；义山獭祭，陈书如此。油镫不辉，尚胜车胤之萤；雄鸡警宵，起舞越石之剑。讵不知诗莫退虏，文靡送穷；太白谪仙，尚讥杯水；子云壮夫，亦悔雕虫哉！第苟能伐毛九度，学务立言，诵《诗》三百，使能专

对，则圣籍传德，金纸满籯；太玄阐道，文不覆瓿。以视生弗益时，死莫闻后，蜉蝣寄身，草木同腐者，不犹愈乎！不犹愈乎！足下江东独步，冀北擅名，驾学浩浩之表，飞才博博之区，矧复体匪彦伯之涩，诀获昌黎之真；领袖英绝，润色鸿业，斯文不坠，大匹必扶，直券受耳，尚其勉旃。时因朔风，辄抒近感，摛词多狂，倘所乐耳。鲈脍正鲜，季鹰在吴；鳣序伊始，我驾独北。长安近日，梦月为劳，江南有梅，逢驿可达。

潘光亶于一九一七年回校，因滞学一年故低先生一级，但两人友情甚笃，为莫逆之交。

九月六日 辛酉级召开级会，时无级长，“举定闻多君为书记”，总负责任。同时，决定出版一种杂志，以钱宗堡为总编辑，先生为中文编辑。此外，先生还担任了级会演说部长、演剧部编辑部主任。（据《清华周刊》第 81 期，1916. 10. 4；《辛酉镜·大事记》）

九月十一日 清华学校开学典礼。先生升入中等科四年级，编入甲班。同班中有王朝梅、王德郅、时昭涵、周兹绪、袁昶熙、顾德铭、王际真、姚永励、薛祖康、吴泽霖、钱宗堡、沈有乾、萨本栋等。（据《辛酉镜·班次》）

九月二十六日 清华学校成立全校性文艺团体“游艺社”，下分演剧、音乐两部。先生担任副社长，时社长为林志煌，后为罗发组。“游艺社成立于一九一六年秋季，分戏剧、音乐两部”，“第一任社长林志煌，副社长闻多，演剧部长陆梅僧，音乐部长徐笃恭。第二任社长罗发组，副社长闻多。”（《学生方面·智育》，《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 4. 28）是日游艺社开第一次大会，推举先生兼任中等科会计。“九月二十六日午后一时，本校游艺社假高等科一百四十一号教室开会，讨论进行办法。由社长林君志煌提出，全体职员业经多数社员通过矣。据列于下：音乐部长桂中枢，演剧部长陆梅僧，书记张兰阁，会计白敦庸，干事沈诰、温祖荫，编剧员蒲逊谷、乔万选、张廷玉、姚醒黄、罗发祖、童锡祥，布景员向哲濬、陈长桐、程树仁、吴泽湘、吴泽霖，中等科会计，由副社长闻君多担任。”（据《清华周刊》第 85 期，1916. 11. 1）一九一九年底，游艺社改称新剧社，专事排演新剧。

九月二十七日 《二月庐漫纪》续六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八十期。共三则，有诗品之风。末则引“风马牛不相及”典故，云：“近有解者，牛走逆风，马走顺风，故不相及。”可知先生颇留意新说。

十月四日 《二月庐漫纪》续七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八十一期。共五则，皆论先秦经史。有疑《诗经》朱熹传序者，有论及“匏瓜”之星名来历者。

十月九日 为庆祝双十国庆节，清华学校举行全校化装竞赛。辛酉级由先生

所司之演剧部筹备，是日演出《蓬莱会》，获全校“最优，获奖绣旗一面”，(《辛酉镜·大事记》) 演毕全体合影。先生在剧中饰驴。

该剧剧情见《辛酉镜·戏剧》：“一道人美髭髯，王冠袞衣，跣其足，手一尘塵上。二仙童舞于其前，又歌灵芝之曲，‘I Know A Bank’。即毕，道人自称曰牛鼻道人，尝从太上老君游，得奇术，能立致风雨。旋问二童曰：‘今曰何日？’童曰：‘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也。’道人赧然而笑，麾塵，众徒以次上，与道人习礼。礼毕，比肩而立：茶碗者，道人之侍者也，最先出；次上之须妇，四不像也；再次上胡髻而西服，束钟手腕以代镯表者，五不像也；又次为半面人，左半男，右半女，如二人并而为一；阶行者为狼狈，二面，皆具口鼻，如二人背立而为一；又次为侏儒与长人；又次为秃浮图与怪物；又次为笨伯；驴最末出，振耳长鸣，众皆失笑。于是道人命茶碗唱名，众皆应诺，独六不像不到。道人曰：今日为双十节，当作游戏以志庆，若曹之运动者，曷作百码之竞走，胜者吾奖之。众推笨伯、怪物与驴比赛，而侏儒为评判者。其结果，驴第一，怪物次之，笨伯居末。驴驰速度为四十八分又五之一，遂获以金牌，文曰‘勿走草地’。会毕，道人率其徒谒玉帝，且行且歌。歌曰：‘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it's a 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to the sweetest ... girl Iknow. Good-night ladies. Good-night ladies. Good-night ladies. We are going to leave you now.’”歌词大意为：它是到梯别来瑞的漫长的路，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它是到梯别来瑞的漫长的路，是到我所知道的最甜蜜的姑娘那里去的路。晚安，女士，晚安，女士，现在我们将离你而去了。

十月十一日　《二月庐漫纪》续八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八十二期。共三则，为读诗赋之评论。

十月十八日　《二月庐漫纪》续九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八十三期。共五则。

十月二十一日　辛酉级召开级会，“举钱宗堡、刘沛漳、闻多三君为中等科联合演说辩论团该级演说代表”。(《清华周刊》第 84 期，1916.10.25)

十月二十七日　担任贫民小学开办手续起草员。“清华学生创办贫民小学，自前学期来，已筹得款项二百余元。现学生代表团，特于前星期五下午五时，开会讨论进行方法，并选定程其保、闻多、陈烈勋、黄勤、刘庄五君，为开办手续起草员。”(《校闻》，《清华周刊》第 85 期。1916.11.1)

十一月一日　《二月庐漫纪》续十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八十五期。共六则。有以诗征谚者：“‘尾大不掉’，此非寓言也。古言西域有兽曰羯，尾大于身之半，非以车载尾则不可行。先白湛渊有《咏羯》诗：‘羯尾大于斛，坚车载不起；此以不掉灭，彼以不掉死。’”又有辨字辨物者：“柳生于叶间，成穗作鹅黄色者，柳花也；花既褪，

就蒂结实，熟则乱飞如絮者，柳絮也。杜诗：‘雀啄江头黄柳花。’又云：‘生憎柳絮白于棉。’花与絮不同，显然可见。”

十一月四日 辛酉级举行英文辩论，分三团，先生为丙团主辩之一，“题为‘解决体育馆与图书馆孰为重要’”。“丙团主席杨廉正，书记何浩若。正组主辩吴泽霖，助辩聂鸿逵、王德郅；反组主辩闻多，助辩王际真、宋珣。结果由会友公判，三团俱正组胜。”（《清华周刊》第86期，1916.11.8）

十一月八日 《二月庐漫纪》续十一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八十六期。共六则，有辨名者，有辨物者。

其一则云：“宋朝废后入道，谓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华阳教主’，其实乃一师号耳；厥后群黄冠乃敢上道君尊号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出瑶华宫遂去教主之称以避尊号，吁可怪也。及今尊孔氏为教主，则益滥矣。”又一则云：“宋儒辟佛老者，目曰虚无之教。观之诗曰，无声无臭，未尝以为讳也。世亦有疑及无声无臭者乎？《易》曰：无方无体，《易》未尝以无为讳也。世亦有疑及无方无体者乎？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即《论语》亦未尝以无为讳也；世亦疑及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无，实若虚。’则是为道者政患不虚不无耳，世亦有疑及若无若虚者乎？使之数言者不出于儒书，而出于佛氏之口，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又一则云：“有人作《游女诗》云：‘不曾怜玉笋，相竞采金盐。’人多不识‘金盐’为何物，或以为花名。按《煮石经》云：‘五加皮亦名金盐。’”

十一月十五日 《二月庐漫纪》续十二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八十七期。共四则，皆读诗词以品味。

十一月十八日 参加游艺社会议，通过社章，并由副校长赵国材讲释新剧。（据《清华周刊》第88期，1916.11.23）时，赵新编一剧，欲由游艺社演奏，二十二及二十四日，赵特邀先生等至其宅商议。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月庐漫纪》续十三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八十八期。共两则。

一则为读《史记》时所发之疑问，颇见功底，云：“《史记》谓孔子见卫灵公之宠姬南子。非也。孔子适卫，门人为仆，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游，令宦者雍渠骖乘，使孔子为次乘，游于市，孔子耻之。夫圣人方以季桓子受齐女乐而去鲁适卫，至卫而耻为灵公南子之次乘，岂肯轻身往见之？南子盖鲁之南蒯耳。南蒯以费畔，昭公十四年奔齐，侍饮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张公室，夫子见之，将以兴鲁也，与见佛肸事不约而合。佛肸之召，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悦。夫子以坚白匏瓜，微言不足以醒之，故复有天厌之，誓比类以观，则知其非

见卫之南子，而见鲁之南子必矣。”

十一月二十五日　辛酉级级会举行中文辩论与英文演说，前者题为“有名英雄较无名英雄对于中国关系更大”；后者参加者有先生等人，（据《清华周刊》第89期，1916.11.30）演说内容未详。

十一月三十日　《二月庐漫纪》续十四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八十九期。共五则。

一则嘲曾国藩，甚有趣：

> 清曾文正公振镛，儿时好弄；尝于塾中为龟戏，匍匐地上，覆大木盆于背，手足并进，蠕蠕然固一大龟也。太翁亦显宦，深怒其无状。一日侦其为是戏时，突入塾中。公窘急，即缩其四体于盆内；太翁佯为不知也，就坐盆上，与塾师谈，日昃而退。师惧公不堪，揭盆视，乃呼噪而出，如无所苦焉；顾自是不复敢为是戏矣。

又三则赞少年聪慧：

> 明戴大宾幼聪颖，读书辄过目不忘。在馆时嬉戏，邻师过之，以其幼也，因出联曰：“月圆”，大宾应声曰：“风扁”。师笑曰：“风何以言扁？”大宾曰：“风不扁，何穿透门隙也？”师又曰：“马嘶”，对曰：“牛舞”。师曰：“牛何以舞？”曰：“大舜作乐，百兽率舞，牛不在中乎？”时方七岁也。
>
> 吾友罗君鲁参（罗隆基），言今夏尝与人戏作辩论，以牛与羊孰为有用为题。鲁参曰：“牛音乐家也。”其人曰：“何以言之？”曰：“语称对牛弹琴，牛得非音乐家乎？”闻者不禁失笑。引用成语之妙，视大宾殆尤过之。
>
> 王禹偁七学能文，毕文简公为郡从事始知之。闻其家以磨面为生，因命作“磨”诗。元之对曰：“但存心里正，何愁眼下迟！得人轻借力，便是转身时。”文简大奇之。

古诗《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读项羽本纪》亦发表于是期《清华周刊》。这是先生首次正式发表的古诗，似颇看重，次年编入《辛酉镜》。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是月　辛酉级王际真、高长庚等发起唱歌团，“请林玉堂先生为教员”，团员十四人，先生亦加入，唱男低音，兼书记。时，辛酉级“音乐程度进步最速，平日习乐时，已能分音”，美籍音乐教员施丽“女士尝许为全校之冠。是年夏，女士返美，秋间遂无音乐”，但“级友练习之勤如昔”。（《辛酉镜·乐歌》）

是月　又参加特别图画班。时，“入第四学年，无图画，西教员白西玲集级友之习画者十余人为特别图画班，每周习画一次，成绩甚富”。（《辛酉镜·美术》）

十二月七日 担任《清华年报》图画副编辑。时,"《清华年报》编辑部现以事繁,特添派中等科闻多、杨廷宝二君为绘画副编辑"。(《清华周刊》第90期,1916.12.7)这年年报图画副编辑只两人,均系辛酉级级友。

十二月十四日 《二月庐漫纪》续十五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九十一期。共两则。末则记一少年聪慧,流露出先生的少年抱负。

十二月二十一日 《新君子广义》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九十二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是月八日,周辨明先生在中等科作伦理演说,题为"童子军之创始者英将波威事略"。演说中提出"新君子",先生听后甚觉"良新,退而思其义,盖精且博,因为之说以广先生之意",乃作此文。文中主张提倡进取的新君子精神,云:

> 夫新君子者,对于旧君子而言也。礼义自绳,审几烛微,造次颠沛,靡斯须之或弛,此我国人所称为"君子"者,吾称之曰"旧君子"。《易·系辞》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以旧君子之旨主静,静则尚保守;其弊不外徒言道义,而鲜实践;马迁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是也。新君子之旨主动,动则尚进取;其学以博爱为本,而体诸人群日用之间。盖君子习夫人群日用之务,则不赖于人,而廉耻立;知夫人群日用之务,则不夺于人,而礼让兴。廉耻立,礼让兴,此泰西之治,治于多新君子也。夫吾国自四民之途分,农以给食,工以成器,贾以资用,以及监门畜之,臧获任之,皆莫非益我者。独士自称君子,弗屑于细人之务,于是舒步簷簾之谓道,裒衣博袖之谓儒,咕哔咿唔之谓学;谬种流传,每况愈下。而所谓伪圣贤者,遂接迹于天下,以成今日之苶惫焉。呜呼!袁枚氏所谓士少则天下治,讵无谓哉?!今童子军之所习者,若结绳、烹饪,若缝纫,皆所以锻炼而范成新君子者也,岂得以琐屑病之哉!吾校前者有筑路之举,以士人而劳身役形,以事版筑之琐务,盖以也,吾同学其毋堕此新君子之精神焉可。

十二月三十日 清华学校举行年终戏剧比赛,由高、中两科各演出一剧。中等科演出了先生参与编写的四幕剧《紫荆魂》,被评为优胜。其剧情"第一幕图渔利奸人施诡计,争意气富户闹分家。第二幕开大会师徒同聚乐,接快信兄弟急归乡。第三幕吃酒席流氓图抢劫,住饭店学生窥阴谋。第四幕御外侮警长进忠言,敦人伦夏氏昌家道"。演出后人评到"布景之精巧,谈谐之奇诡,运用匠心,惨淡经营之处,中等科尤见出色"。(《清华周刊》第94期,1917.1.5)

是年冬 因病住进校医院,触景生情,想起同学贾观林,作《招亡友赋》,发表于次年二月八日《清华周刊》第九十五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贾观林，字觐君，上海人，一九一三年入清华学校，与先生同级。喜戏剧，曾同编写剧本，在《革命军》中饰瑞澂、《打城隍》中饰差役、在《两仆计》中饰陶晏，皆与先生同台演出。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等科同学王锡纯患猩红热病故，学校即将与王同寝室的贾观林等十余人迁入校医院分居，但贾观林仍不幸被传染，于二十四日病逝。（深《猩红热之发见及治法》，《清华周刊》第62期，1916.1.1）一夕，先生住在医院觉得"恍恍惚惚，觐君来前，惊而延之，神定景逝。更寐而求，苦不交睫，起视牖外，疏星出没，月在高树，巡字而呼，仰空而泣，踟蹰搔首，不知所措，乃作赋以招之"。《招亡友赋》十分感人，文云：

呜呼噫嘻！子胡不归？精气不失，凝神显质，道出于躬，子胡不神以逸哉？王弼谭玄，嵇康傳琴，越昔之哲，罔阻于幽扃，子胡为而弗灵哉？土伯魑魑，咆哮念叩，薛荔攫人，挟劂荷剞，子独不之惰哉？豪骑鲸游，突杌逍遥，促以长飚，迅于赤熛，子胡不来与走共此宵哉？子死之所，今为吾圂，子或弗臆，道无险阻，烛子以炬，夫畴复敢子拒哉？厥室之左，楼峨峨哉；厥室之右，洞浏浏哉；厥室之前，行轩辇哉；厥室之后，圃百亩哉；厥室之门，无卫屯哉；厥室之幌，阔且晃哉；子胡不归！夫畴复敢酗嫚哉？走有青琼，醍醐轻哉；濡鳖臞蠖，实鼎煌哉；粔籹侈腑，如饴膏哉；绿蚁新醅，泛玉罍哉；炉可温哉，榻可眠哉，故籍从衡，可供研哉；鸿谈狂笑，无人诮哉；言之不足，承歌啸哉；子胡不归！走迟子于室之突哉，走思畴昔，泪如汐哉；订交清华，比云霞哉；乙卯之冬，谊蔑如哉；蝌文象胥，学不颇哉；惟子与走共切磋哉！鞅掌会务，维勤恳哉，惟子与走共此厘哉；少年志越，拯时难哉，惟子与走共此自悯哉！睥睨宙合，嗤慕愚贤，慷慨悲歌，愤言誽稗，于傺迈何，不可再哉！高谭雄辨，深扣清酬，隽语解颐，睿音箴尤，于询哗何？不如昔哉！明月丽天，庭阶垩雪，狂语欣罗，清歌裂帛，如风疋何？不可复哉！秋飙雨夕，素友杂坐，羽觞忽接，秦声同和，如豪狂何？令其已哉！子说走书，玉润金生，走兹擘笺，子来为走评哉；子嗜走画，幛涛有声，走调丹青，子来助走成哉；已走之志，昔尚功而贱言，兹务言以立功，子来以为走之折衷哉。已走之学，曩蔑古而恬今，兹戾今而淫古，子来为决舍取哉。呜呼噫嘻！子胡不归哉？

辞毕，有声冥冥，不见其形；其言曰：二人同心，幽明不乖，交子以神，匪以形骸；闵免崇德，勿复相怀！

先生很喜欢这篇赋，后将它编入中等科毕业纪念刊《辛酉镜》。

一九一七年　十九岁

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个月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两文均提倡“文学革命”。

七月一日，溥仪在北京称帝复辟，复国号“清”，改年号为“宣统九年”。

七月十二日，段祺瑞率军攻占北京，溥仪宣布退位，复辟结束。黎元洪辞大总统，冯国璋继任。复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重新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八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八月二十五日，南下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护法运动开始。

二月三日　辛酉级级会讨论编辑中等科毕业纪念刊事，“议既定，选举职员，以闻多司编辑，吴泽霖司经理，薛祖康司会计，他职员均由编辑或经理指派”。（《辛酉镜·大事记》）

三月三日　二月十二日级友陈宗泽病逝。是日辛酉级在清华礼堂开会追悼，先生诵祭文。（据《辛酉镜·大事记》）

三月十五日　辛酉级中等科毕业纪念刊编辑部召开会议，决定将该刊名称定为《辛酉镜》（此前作《级鉴》），由先生任总编辑，罗隆基、何浩若、钱宗堡、周兹绪四人为编辑。是月十日，曾请杨仲达、李寿先、赵瑞侯三先生为该刊顾问。（据《辛酉镜·大事记》）

三月十七日　辛酉级级会举行英语辩论会，题作“普通教育较人才教育为要”，先生担任辩论会的主席。（据《清华周刊》第101期，1917.3.22）

三月二十二日　《辨质》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一〇一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该文认为“君子为学，必光明气质”，“质之不明，学将焉本？是以蛀蚀之木，雕镂不加；粪土之墙，髹垩不施；君子质有未明，则学莫成，即成亦适增天下之害耳”。从体裁看，很像是古文“辨”体，可能是课中关于写作方法的训练，但表现了先生对

"气质"的认识。其中云：

> 夫气质之病，未可胜穷，要之毗于动者为妄，毗于静者为惰，而动者不妨妄，静者不妨惰；妄者惰之因，惰者妄之果；妄者必惰，惰者必妄；心无所主，时而气溢于外故为妄，气蕴于内故为惰；譬之感疾者，凉燠交作，靡有定象也。凡少年多发扬之气，故喜动，好矜而乐群；质之不明，则流为妄；负意气，骜声誉，卓诡其行；嵬然与人争，胜则沾沾自憙，以为天下莫己若，于是益为之横暴而无艺；隅见屈于人，则必嫉之、仇之，至不谋所以摈斥之而不快；甚或结俦侣，图标榜，小以害大，寡以胁众，是之谓嚣张，是妄之病也。耆老多衰颓之气，故喜静而好独，旧之学者多病是；今则犹有其伦，甘其味，华其服，读书以求一己之利；非己也，莫肯费锱铢，莫肯举手足；或则鼠作而夕暝，孜孜而修，逍遥而息；观书矣，不窥园也；对古人矣，不接今人也；是之谓旷夫，是惰之病也。惰者蠹已，犹不失为庸懦；妄者则为小人：辨察以资声色之契券，淹博以为权门之禽犊，通达时务以为盗贼之嚆矢；其为害有不止于天下后世者哉！是故，多庸懦，昔之中国之所以不振；多小人，今之中国之所以乱。虽然，学者气质之病而至于妄，妄盖蔑以以加矣。欲疗斯疾，则奈之何？《说命》曰："逊志务时敏"，斯言可味矣。方寸之明，皎如白日；人之为惰为妄，盖莫不自知；知为妄则务逊志，知为惰则务时敏；此其事不求诸人，而求诸己，不求诸己之气质，而求诸己之心。盖气质传于四体五官，四体之惰，心之惰也，五官之妄，心之妄也。务逊志时敏者亦以心，以心治心，无不成；不则心有不明而反役于质，则掩饰弥缝之事生，若是病不入于膏肓者几希。吁！可不慎哉！

三月二十四日　为中国运动员赴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募集捐款，游艺社在校内演出《都在我》，先生有力焉。《清华周刊》报道云："本校游艺社为远东运动会募集捐款，以充派遣运动员赴日所需旅费，编演新剧一种，名曰《都在我》。特于前星期六（三月二十四日）晚，先在校内排演，座设食堂，七时半开幕，十时半始毕。化装精工，表情细致，极淋漓之妙。由游艺社社长罗发祖君主席，观者踊跃阗塞，而中美教员之眷属亲友，远东与观者亦甚众。票价分优待（不取资）、特别（五角）、普通（二角）三种。更拟于四月十三、十四晚，在北京青年会开演。兹录《都在我》剧目如左。第一幕霍得信，第二幕债累远游，第三幕途穷遇救，四幕寿辰私逢子，第五幕罹疾团聚。"（《校闻》，《清华周刊》第 102 期，1917.3.29）

其后，该剧复增加一幕，并于四月七日再次在清华礼堂演出。《清华周刊》报道云："游艺社排演之《都在我》新剧，现又增加一幕，并将剧情略加修改，较前更有精彩。定于月之十三、十四日，假北京青年会排演，售票每张一元，得资补助远东运动

会队员路费。并拟于本星期六晚,先在礼堂排演一次,凡本校校役,及星期六星期天学校学生,及其家属,均可来与观云。"(《校闻》,《清华周刊》第 103 期,1917.4.5)

四月十三日 应远东运动会中国董事会邀请,《都在我》在市内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演出,由外交部参事刁作谦主持,十四日继续演出,由外交部次长王正廷主持。两次演出均甚成功,《清华周刊》报道云:"本校游艺社应远东运动会中国董事会之请,特于十三、十四两日晚,在北京青年会排演《都在我》一剧。座券每张取价一元。十三日晚七时半开演,由外交部参事刁作谦先生主席,并先说明演剧募捐之宗旨。中西士女来观者六百余人,每幕终,掌声雷动,盖剧员均振作精神,视在校初演时,为大进步也。十一时毕。十四日晚,由王正廷先生主席,观客八百余人。演至第三幕时,电灯遽坏,全堂黑暗,而剧员在台上者,并不停演。急燃烛以代电灯,约经三分钟,电灯复亮,而其间烛之去取,均由剧中之店仆为之,故观者尤以为妙,盖合于剧中情节也。又每次闭幕布景时,皆在赵、曹二女士互奏洋琴,以破岑寂,而增兴趣云。"(《校闻》,《清华周刊》第 105 期,1917.4.19) 此次远东运动会,中国派出运动员、职员等近百人。运动员中有清华学校孟继懋、程树仁、姚醒黄、邝寿堃、关颂韬五人,他们于四月二十八日与中国北部运动员离京。运动会上,程树仁获标枪第三,孟继懋获铁饼第三。

四月十九日 《清华周刊》更换职员,先生仍任中文编辑。时总编辑为李权时,中文编辑还有桂中枢、廖永忠、邱椿(大年)等。(据《清华周刊》第 104 期,1917.4.12) 九月下旬,先生辞此职。

四月二十一日 参加辛酉级级会举行之英语辩论会。辩论"题为'今日中国科学家较文学家为要'。正面主辩王德郅,助辩周天骥、陶世杰、杨廷宝;反面主辩方来,助辩区沛玖、沈乃正、闻多。评判员刘寰伟先生。结果反面胜。"(《清华周刊》第 106 期,1917.4.26)

五月十七日 《清华周刊》刊登辛酉级中等科毕业级刊《辛酉级》编辑消息,云:"中四级会。中四级书,定名《辛酉级》,自筹备以来,积极进行,约于月底可付印云。"(《校闻》,《清华周刊》第 109 期,1917.5.17)

六月十五日 《辛酉镜》印行。总编辑为先生。封面为一展翅飞翔雄鹰,背绘光芒四射的太阳,正中以篆书书写"辛酉镜"三字。杨廷宝回忆:"《辛酉镜》封面那只鹰是谁具体画的,我已记不太清楚,我和一多都可能有份。"(杨廷宝致黄延复信,1980.7.17,未刊)

全书分十三类:班次、课程、教员、级友、课艺、论著、艺林、译丛、辩论演说、体育、美术、乐剧、大事记。系统扼要记述了辛酉级同学在中等科四年的学习与生活。

收入该书的先生著述有数种，除《致友人书》、《招亡友赋》、《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读项羽本纪》已发表过外，还新发表有《发刊词》、《陈涉亡秦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论》、《马赋》、《松赋》、古诗《春柳》、《月夜遣兴》、《七夕闺词》和自撰小传《闻多》。上述诸篇均收入《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发刊词》署名"闻多"，述《辛酉镜》成书原因及编辑思想、体例，反映了先生对各项栏目的认识。其云：

吾校中等科诸级，值毕业时，述其学绩以为杂志者：戊午有《进步》，己未有《留音》，庚申有《级史》。阳林舒荫，众羽并翔，康衢扬镳，千马合辙，志同体殊，然胥归于纪念云尔，谓为嗜学则夸矣。丁巳夏，吾辛酉级，将升入高等。级友等愧大道之未明，幸小成之可喜，乃缀成绩，纪沿革，表姓氏，摄像影，以编辑成书，颜之曰《辛酉镜》；而付诸剞劂，亦所以纪吾学，志吾脩，而藉云自镜耳。顾或谓灵均制骚，班氏谓其露才；李泌夙颖，张子戒以韬晦；是故和光可以成德，扬己必致损慧；今纵有成绩可纪，奚必显以示诸人哉！夫游夏之科，照耀孔门；艺文一志，炳麟汉史；万宝争辉始能夺目；五音繁会斯乃铿耳。兹者才短袜线，匪子产之博物；学愧肤受，无夷吾之通疋；而欲巧弄翰墨，遽灾梨枣；是亦啄菢之慕鸾音，疲驴之追骏步也！记者闻之，喟然而叹曰：夫榆枋橘柚，约为弟昆；翔麟哀骥，共试鬃蹄；四载以来，三育兼进，兹值毕业，可无纪念？同人虽陋，岂不知杯水坳堂，仅载芥舟，支辞片论，无当崇议哉！特以衡阳之木，萌于拱把，千里之程，肇自跬步；苟蚍蜉弗舍，丘垤可成；精卫不辍，溟渤可塞；是故椁椁侏儒，椳闑居楔，靡不竭智殚精，旁收远绍，诠实胪陈，用资自镜；不侈扈(卮)言之滥，不希躐等之功；抑亦往事不忘，用师后事，前车覆辙，以鉴来车之意云尔。而必欲以比于古之作者，是犹强燕雀以步鸿鹄，挟泰山以超北海也。且岁华轮转，身世飘浮。今共砚席，倏作箕斗；苟鸿爪不忘，尺简恒握，则兼葭怀想，千里如面。盖上景下景，墨子之别传可籍；人相我相，如来之大意犹存；顾不懿与！兹出版有日，为括其门类，约十有三；各诠其义，列之于后，读者鉴焉：

班次之分，以便教授，升降靡定，只以合数，甲乙殊号，不区程度。诠班次第一。

学术百端，陆厨虾架，充栋汗牛，兹之所肄，胥尚普通，未能深求，书籍表帙，久惧失徵，表以备佚。诠课程第二。

启蒙解惑，师德难忘，桶椟楛质，缪厕门墙，游杨立雪，感祝瓣香。诠教员第三。

榆枋橘柚，异苔同岑，兑能丽泽，豫应盍簪，学脩并载，用资规箴。诠级友第四。

欧学东来，群忘国粹，学校有文，奚翅疣赘，清华规课，新旧靡整，同人虽陋，尚知濯厉，亘兹四载，不乏合制。诠课艺第五。

精研覃思，蕴奥云披，锐比莫邪，秀类青芝，并蓄俱收，大放厥辞。诠论著第六。

韩欧徐庾，骈散异体，各擅厥趣，未可偏诋，茹古含今，我心则取，幼稚不揣，操觚喜试。诠艺林第七。

维兹之世，种族繁浩，黄晰棕黑，译移斯宝，呿卢鸿制，愧鲜深造，爬罗剔抉，简易是考。诠译丛第八。

矫尾厉角，独号季子，嘘枯吹生，允推公绪，碧鸡白马，能究天人，宣尼四科，亦重言语。诠辩论演说第九。

文育韬龄，跃高六尺，羊侃总髻，蹋壁五寻，血气之勇，固匪君子，筋骨之秀，讵乏儒林？中士尚文，积弱既久，愿作先声，雄鸡踯躅。诠体育第十。

淘性怡神，书画不废，墨翟制鸢，始肇儒工，孔称游艺，由来尚矣，新学东渐，于兹尤崇。诠美术第十一。

折扣皇荂，嗑然增噱，优孟滥觞，淫靡风作，慨兹横流，用振光铎。诠乐剧第十二。

校风尚竞，借区优劣，外务乃敓，级事辏辐，改弦更张，日新月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钩玄纂要，用作箴规。诠大事记第十三。

《陈涉亡秦论》是课堂上的一篇作文，先生用问答来评述了自己对这一历史的看法：

客或问于闻子曰："陈涉亦尝亡秦乎？"对曰："秦之亡久矣，商君亡其法度，李斯亡其文献，吕不韦亡其宗嗣；三者，国之所与立，三者亡，而斧扆图籍虽存，亡无日矣！涉特亡其斧扆图籍者耳，岂真亡秦者哉！"曰："秦无道，故家遗俗，豪人侠士之弯弓报怨者，尚鲜其人；涉聚罢散之众，揭竿斩木，奋臂一呼，而豪俊蜂起，天地瓦崩，其所福吾民者大矣！"曰："唯唯。否否。嬴秦虐民，海内侧目，涉首义诛秦，以苏民困；吾子称涉以罪秦，当矣；然而涉起谪戍而首事，非有一日之规，计自免于刑耳！称之，吾恐后世乱臣贼子，将假涉之名，以玩法殃民；无如贬之，以无贻以口实也。夫秦犹桀纣也，人胥知其暴，以得而诛之；斯辈假汤武之名，以肆其蹂躏，人莫敢罪之者矣，其为害不且百倍于秦耶？！"客乃喟然而叹曰："诚如子言，则苗莠莫分，是非混淆；孰也仁，孰也暴，何莫非吾民

之蠢贼哉！呜呼，吾用是为天下后世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论》也是一篇作文，对孟子这一名言发生了疑问：

天道循环也，忧患之极，安乐随之；安乐之极，忧患随之；故天下无忧患，而天下皆忧患；天下无安乐，而天下皆安乐；惟圣贤明乎此。忧患而安乐之，是能忍；安乐而忧患之，是能虑；能妨能虑，故无往而不生。愚庸昧乎此，忧患而忧患之，是无勇；安乐而安乐之，是无智；无勇无智，故无往而不死。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斯言也，窃有疑焉。夫生人者岂必忧患？而死人者必安乐耶？抑能忍能虑，有以生之，而无勇无智，有以死之也？是故天不生无用之物，亦不造无用之境。忧患安乐，皆所以益我者；处之不以其道，斯害也已。异哉！物之害者，即其益我者也，可不恫欤！

《马赋》是今存先生的第一首古体译诗，其序云：

古罗马爱部鲁洲之艾阙城中，有巨钟焉。民间有冤滥者，则鸣钟以闻诸县令。约翰王时有武士，垂老，贪婪货利，尽市其鹰犬、甲胄以取资。畜马一匹，旋弃之。马食蔓触钟，钟鸣，县令至，则见老马，左右言属武士；乃亟召武士至，重责之，武士大惭，复携马归。美人亨曼长卿以诗纪之。兹译其意，广其辞，而为之赋。

《闻多》是先生的自传，原作未署名。郭道晖、孙敦恒《关于闻一多少年时代的自传——〈闻多〉》：“我们最近访问了闻一多在清华学校时的同班好友吴泽霖教授，他当时也是《辛酉镜》负责人之一（总经理）。据他回忆，这些小传大多是由彼此要好的同学互写，也有的是由本人自撰，最后由总编辑闻一多审定。至于《闻多》一文究竟是谁写的，吴先生已记不清了。但他一读这篇小传，就认定是闻一多的手笔：其行文完全是闻一多的风格；小传中爱用一点生僻的古字，这也是闻一多当时的癖好；其中所述的一些情节，也只有闻一多自己才能写出。所以可断定是他的自传。至少，闻一多作为总编辑，对这篇小传也是亲自审定过的。”（《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第4至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闻多》全文如下：

闻多，字友三，亦字友山，湖北蕲水人。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緜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时多尚幼，好弄，与诸兄竞诵，恒绌，夜归，从父阅《汉书》，数旁引日课中古事之相类者以为比。父大悦，自尔每夜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十二岁，至武昌，入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甫一载，革命事起，遂归。翌年春，复晋省，入民国公校，旋去而之实修学校。越月，试清华，获选。来校时，距大考仅一月，又不审英文，次年夏，遂留级。喜任事，于会务无洪纤剧易悉就理。所见独不与人同，而强于自

信，每以意行事，利与钝不之顾也。性简易而慷爽，历落自喜，不与人较短长，然待人以诚，有以缓急告者，虽无赀，必称贷以应。好文学及美术，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箫笛以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

又，《级友》栏有贾观林传，据吴泽霖给编者信，认为它也是先生所作或手订，兹录以参考：

贾观林，字觐君，江苏上海人，少聪颖，年七岁，入龙门师范附属小学，谨礼法，试冠其曹，师友皆敬爱之。年十二，闻清华招生，即欣然投考，卒获选。将入京，父念其幼，恋恋不舍。观林慨然曰：男儿志在四方，讵当踡局于一隅哉，父何阻儿行耶。父壮其志而许之。来校后益勤奋，智育体育皆见长于侪辈，尤以新剧称。广交游，校中上自校长，下及厮役，类能道其名。乙卯暑假南旋，补习英文，夜以承昼，积劳成疾，几濒于危，阅月乃愈，然体质则大亏。秋间偕弟观鑫及同乡之新入校者数人北来，途中絮巨釐细，观林独任之，人称其能。来校时，勤谨如昔，而于级务则尤号热诚，尝与同学数人等筹划演剧比赛事，至更三四夜弗寝。稿成，将练习，而观林剧病，作狂热，身皆赤，不能安眠。乃起蹀躞往复于室中，凡百数十匝不已。时博颡歌乐府，惨厉悲壮，哀动四邻，神气惘惘，若无所丽，倏步倏趋，倏泣倏笑，毫发蝟张，戟手作势，宛如短兵之相接，则方拟所编戏中之情节也。数日病益臻，属其弟曰：吾病行将愈，幸勿以告家中，致增父母忧。语次，据枕大泣，呜咽不能成声。明日遂逝，时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观林风采闲润，温恭蕴藉，性伉直而警敏过人，级务中有干事者，非观林莫属。又喜体育，尝为本级长跑队员。其死也，同学靡不叹昔，昆弟四人，长兄蚤世，观林居次，二弟均幼，今肄业本校之名观鑫者，其从弟也。

《辛酉镜》各类之序，多由先生手订，其中颇能反映某些思想与认识。如《课艺·序》特别强调国学，与《论振兴国学》一文如出一辙。其云：

文字者，国粹之所凭，而文明之所寄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罗马之强为奥开斯吞时代，迨文风芟蔽，而政治窳坏，士艺薛暴，铁骑遂得肆其蹂躏焉。吾国自战国以及汉唐，文章彪炳，称为最盛，五季而后，日趋委靡，国运以衰。今维新之士，管蠡自私，弃国学而重鞮狄之文，其孰知旧学体也，新学用也，微体则用将何施，蔑体而求用，得毋不可乎。吾清华以预备游美

之校，乃能刻自濯厉，以崇国学，日课中英文各半，每周作文以觇进展，法至善也。而吾级中能体是意，孜孜不懈者，尤不乏人，每值作文，靡弗殚思竭力，精益求精，四年来，成绩有可观矣。兹录其最可诵者若干首，以示不忘国粹之意，倘亦爱国志士所共许乎。

又，《艺林·序》亦强调国学重要性：

文之为物，无津涯无畔岸至广博也。为文者，学以明之，气以行之，神以化之，乃能中肯。然技非止乎此也，举吾国一国之文由来已二千余年矣，其间硕士通人，焚膏继晷，演而为雄富流丽高雅清逸，虽竭毕生精力，犹人执一端不克尽趣，然令读者色飞神移望尘不及。时代变迁，学途演益，幻不能与古人抗衡，故文自浅也。况吾清华学子，学术之外加以象寄龌龊，日不暇给，未能专攻国学。今著艺林，枯涩满篇，虽名曰文，自知其实非文矣。

《辛酉镜》之序，为林纾所作，迄今林纾之集均未见收入，故录以参考："余尝再至清华园讲论语，见学者彬彬然，部署井井然，司其事者温温而有礼。余太息以为此校讲新学，乃一本于礼衷古道一线其犹存于斯矣。兹者薛君书来，以其级所刊之《辛酉镜》一书属余序于余。书分十三类，文咸通赡，不悖于理，将刊以行世。方今学者东涂西抹，鲜能专心致志以崇实际，而诸君乃能聿自濯励，勤学不懈。兹植中学毕业复辑其四年来之成绩著于篇，此固有志之所为，而未可数数觏者也。故草数言以归之，益以励其响往焉。丁巳四月闽县林纾叙。"

先生亦喜爱林纾著述，某年暑假返乡，在武汉买了《畏庐集》及续集，在家认真披阅，还让闻家驷也共读。（据访问闻家驷记录，1986.11.20）

是月　与时昭涵合著的《童子军》发表于《清华学报》第二卷第八期。

童子军是少年学生的一种准军事组织，它在清华学校刚刚出现不久，《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三期曾有文介绍世界童子军历史概要。先生觉其叙述过略，乃搜集诸书资料，以述其创始、历史、课程及各大洲之组织。其文云：

童子军之关系于文明者甚巨，其进步之速，成功之著，颇足供吾人之研究。兹所述，特其大略耳，未可以概全豹也。

童子军之由来尚矣。亘古以来，殆无代无之，古昔士卒之选与小战者，童子军也，殖民者童子军也，武士之为宗教而战者，童子风也，以及班超之西征张骞之通西域皆庶几近之也，其他类此者更仆难数。然而童子军之名称，则创自英之国白敦波威将军。将军之始来非洲也，初无心于发起童子军也，及见投效之土人，其操作之力，胜于英兵，始悟高尚之学识，不若寻常事物之适用也。乃得兵士中经验幼稚者区为二三小队，使居旷野，以自求生活，而资实习。未几

事颇有效，而办理童子军之心以萌。洎战事毕，率新联军返英伦，见国内少年，大都类于本国兵卒，乃决意提倡童子军。一九零七年之夏。将军集童子若干人，于多科地方(Dorset)编制之童子军，明年著童子军要旨一书(Seousing for Boys)，而童子军始风行天下矣。

童子军之目的，在教童子以自治与自术之法，童子每喜习于郊外之生活，故恒视童子军为极大乐趣。童子之亲长，亦以其能使子弟强健身体，改良气质，故乐为之勖勉，而国家则以童子军，能造就完善国民，故亦乐为之提倡也。英国鲁斯伯(Lord Rosebery)、美国罗斯福、威尔逊诸人，皆极口称赞童子军者正以此也。虽然，童子军诚善矣。苟徒作空言，不能施之实行，亦不足贵也，故童子军之格言，为"预备"军人之常语为"每日作一善事"。

童子军可分二种：曰军事童子军，曰寻常童子军。军事童子军，必警敏机练，故常为军中侦探，纵观青史，童子军之死于疆场者，比比而是，即于今之欧战中，亦数见不鲜焉。寻常童子军，必习于森林中之生活，视日星以辨方向，见微隐之记号，必能立明其义，能自协卫，而不假援于医，遭大危险，必能措置自如，盖与军事童子军之所当习者，无大异也。

人每误童子军为军人之预备，此实大谬。童子军者，所以练习童子之爱国心，及他种美德也。童子军含防范军事之性质，非军事之预备也。

童子军亦教育之一大端也。教育之旨，在于实用，而实用必于经验中求之，不可求之书籍也。哥伦比亚大学卢色尔氏 Dean Ruesell 尝称童子军为近世教育法之最高者，盖有以也。童子军童专技奖章，有救火者，有治伤者，有操舟者，有救生者，皆所以资鼓励者也。他如各种游戏，及运动，尤足以廉制其筋骨。诸如此者，苟求之于丹铅几席之间，吾未见其有成也。盖学者，逆其意必败，顺其性则成者，理固然也。质而言之，童子军之动作，多使童子，时具乐观，以促其成。故童子军人，只能娴诵军律。或华于军服者，非真童子军。真童子军者，必求务实。

童子军之课程：童子军必能周于事变，故其所当学者，不一而足，其课程至庞杂，而难于划一。兹述其最要者数种，为童子军所当一习者。

射猎：射猎之技，至不一也。习斯技者，必先知虫鱼鸟兽之天性，与夫果木之根实，以便亟需时，知所求食。但不可藉此以暴殄天物，盖童子军，必知爱物，是其军律也。童子军又当习潜行，潜行时，置身处之颜色，必与衣服之颜色相同。如见敌时，切不可行动，以防敌之知觉。行经旷野，当能辨人类或禽兽之足迹。居城市，当能于人民之行动，及装饰中，辩其性质，以逃于险难，或过

他人有危厄时，则当救之。此皆所以练习其观察之力也。

帐幕：帐幕乃野居之生活。居帐幕者，吸新鲜之空气，作快愉之游戏，围帐大宿，野外观星，朝则习泅，暮则打桨，其乐无涯也。然身体之强健，亦靡不由此。

至于扎帐幕，燃火柴，安榻治馔，以及觇察方向，皆练习自治之良机也。或野居时，建桥梁，作游戏，猎鸟兽，陟巉岩，以及治濯涤器，巡防守卫，互相为助，则又增进协力精神之良机也。至于眠时，以鼻代口作呼吸，以油或皂液洁耳，饭后寝前，刷牙齿，剪指甲，常粪除秽污等事，此又养成清洁勤俭之习也。

童子军亦当恭敬妇女，而保护之。古之武士，恒遇妇孺孱弱，必极力相助。信宗教，崇俭德，有服从心，具冒险性，节口体，以周人之急，冒生命，以赴人之难，以信义相勗，不侥倖以取利，不苟且以伦生。今之童子军犹昔之武士也，故亦当如是。

风云变幻，未可预测，童子军既有救生之责，则当随时随地，考察变故之由，而预防之。譬如救火可一事，尤当注意，救火时，最不可藉口于幼稚，以图逸豫。盖既为童子军，则当为童子军一份子之义务也。

荷兰之童子军，亦甚众，善用拉所 Lasso。拉所者，结绳之一种也，可以建桥、作梯，或以救火中之人。比利时之童子军亦称精练，其旗号通信治伤造室等技，为他国童子军所不可及。法俄之童子军，大有功于现今之战争。法之童子军，以治伤及秘密通信称。俄之童子军，以通警信友扶助弱者称。美国之童子军，占世界最多数，其在纽约一城者，长官约有一千三百人，童子军二十万人，又有混成队以华人及黑人组成，又有盲人童子军，其成绩如操练木[术]之缝经[纤?]音乐绘图打字等技，有足令人惊怿者。

爱国：吾人尽知人人皆当爱国，然知爱国而不能为国尽力者，是人体之徒具形骸，而无筋骨也。既知爱国，则当随地为国尽力，尽力之道，无论巨细轻重，皆足以表其爱国之热诚也。

童子军流行之速，有足令人惊怿者。其在欧洲，于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兰西俄罗斯诸国，为尤盛。诸国童子军之办法皆无大异，然其或[成]绩则各有特长，挪威之童子军，与英国大相仿佛，丹麦之童子军，为数最伙，其于治伤一技尤精。

加拿大之童子军，多英人或印度土人，皆习于游猡迹狩摇船等技，及他种户外工作。

南美洲童子军之组织寥寥无几，然土人于视察游猎以及热火等术甚为精，为他人所不及。

近数年间童子军始传入中国，有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设于上海，入会者不论属何信仰，凡敢赞助童子军之进行者，皆收录之。会中组织法，大都根据于英国童子军，今上海广东南京汉口北京天津苏州各处，皆有支部，中国之童子军尚在幼稚时代，然睹其进步之速，及踊跃之精神，将来童子军之发达，可预卜也。

是月 清华学校举办成绩展览，先生的书法作品亦入展。先生初习隶书，《辛酉镜》有所记载："本级第一年级时有字课，第四年又有字课，其成绩多选到校中展览会。闻多、时昭涵习隶，周兹绪、浦薛凤、杨长龄等习苏，皆其中之最著者也。"闻钧天在《诗二首——忆一多哥》"附志"中说先生在家曾"临汉礼器碑"。(《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378 页)

九月三日 清华学校有学生应英国招工局所招，充作华工译员，是日乘轮东渡，中有先生同班的刘沛漳等人。而吴泽湘等被学校发现所阻，并勒令退学。(据《清华周刊》第 112 期，1917.9.20)

时，段祺瑞政府于八月十四日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正式宣战。旋，英国招工局来华招考华工译员。段政府参战，未发一兵一卒，为清华学生所愤慨。他们见清华园西面关押着在青岛缴械的德国军官，以为祖国历史上所蒙受的欺凌从此可以逐步摆脱了，于是感到应征就是报国的时机。第二批相约应征并被录取者有辛酉级的钱宗堡、吴泽霖等，但在威海卫待船出发时被学校侦知强行带回，并要给予记大过处分。先生十分气愤，据理力争。说："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事后，同学们都认为这句话"义正词严，铿锵有力，极为精辟，在班上也就传开了"。(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163 至 164 页)

九月十日 清华开学典礼。升入高等科一年级。时，堂弟闻亦齐(字舒天，大排行第十五)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一年级，与高仕锲(即高士其)、李效泌、汤佩松、王造时、杨世恩等同级。

十月二十一日 为提倡社会服务精神，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参加筑路劳动，先生所在年级由陈筱田先生督率。校内近春园西南至成府村是师生出行的必经之路，但这段路高下不齐，遇雨便泞泥不堪。去年清明植树节时，曾修筑了近春园石桥北的一小段，而桥南如故，故学校决定动员学生修筑桥南至成府一段，长约半里许。是日，全校按年级分段负责，除中等科一、二年级外，其余为六组，一日即完工。修路办法是："以大石缘路之两旁，中实以砖砾，上敷以土，碾而平之，复敷以煤屑，又碾平之。路旁掘小沟以通雨潦，而工以毕。"(承《本学期筑路记》，《清华周刊》第 117 期，1917.11.1) 这次修路的技术指导为庄达卿先生。

十月三十日 清华将组织全校性国语演说辩论会，辛酉级"选出罗隆基、康德

馨、聂鸿逵、沈乃正、闻多、周兹绪、姚永励七君为清华国语演说辩论会会员”。(《清华周刊》第 117 期,1917.11.1) 次月三日,国语演说辩论会开成立大会。后,又请胡适之演讲中国文学改良问题,主张“用白话作文为改良我国文学之利器”。(《清华周刊》第 121 期,1917.11.29)

十二月一日　清华国语演说辩论会开会,“演说者有乔万选、杜庭修、罗发组、闻多、康德馨五君。裁判员为马绍良、梅月涵(贻琦)、孟伯洪三先生,结果尚未宣布”。(《清华周刊》第 122 期,1917.12.6)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清华岁末联欢,演出各级联合排练的《可以风》。先生与陆梅僧、杨光泩、卢默生、何浩若、罗发组、全增嘏、时昭瀛、董修甲等共二十五人登场。(据《清华周刊》第 121 期,1917.11.29) 人评“剧中情节新奇,而演者又素以艺术者,摹情写景,大有可观”。

一九一八年　二十岁

八月十二日，北京新国会（“安福国会”）开幕。

九月四日，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

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

一月二十五日　有家信一封，仅存后半函。收《闻一多书信选集》。知近有作文《修学自述》、《辛亥避乱纪事》、《助战篇》、《论文一则》、《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论》、《清华工字厅后荷花池记》、《瓯鱼说》。

《修学自述》、《瓯鱼说》，今佚。《辛亥避乱纪事》即《辛亥纪事》、《助战篇》即《助战平议》，《论文一则》可能即《〈史记·曹相国世家〉读后》，三者与其他均编入自编古诗文集《古瓦集》。

《助战平议》、《〈史记·曹相国世家〉读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论》，皆是“应课底作品”。其中《助战平议》可了解先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思考。其文云：

> 或问“欧西各国相战，力疲财殚，势不能自已。协约国更嗾我绝德，复乞兵助战。我义不容辞，投鼠忌器，进退维谷。此其臧否，莫可预逆；敢问孰为近？”
>
> 对曰：“辛亥以还，中国无宁日，今兹益甚。西南称戈，海内骚动，不能抚也；武夫强梁，弁髦中央，不能讨也；封豕长蛇，上下交竞，不能禁也；赭衣半道，群盗莽蝨，不能戢也；河渠阙淤，沉竈产蝇，不能治也；饥馑荐臻，易子为食，不能恤也。为今之计，补苴罅漏，惟日不足，尚何暇及于干戈哉？□之八口之家，饥其父母妻子，节食以豢门者使助邻人斗；门者胜不能活父母妻子，况其人朽弱不习于斗乎？况贼有搴刃以临其堂者乎？是故力不足战者不能战，势不可战者不能战。返乎是灭亡之道也。今之出兵，奚以异此？”
>
> 客曰：“不然，庚子之役，残吾民，据吾土，掠吾财，火吾□□宝货者，非诸国邪？尔后蜂集吾宇，日切齿以求噬吾肉者，非诸国邪？夫耻不可久蓄敌不可宽纵，乘人之惫，并吾之力，一击以复吾仇，而振吾气，此其时也。即不幸而败，吾将士以羞愤之余，观夫他人士卒之忾，器械之精，军备之整，与其人民之勇武好

义，亦将罪然而思，默而然赧，必有所激励而猛醒矣。此机又不失哉？”

曰：“众敌相斗，我之利也；敌众势分，相持莫敢为先，我之幸也。助一而胜，胜之则势专而力厚；彼存我薄，必反目相搏。人之亟难，我则济之，我或受虐，谁助我者？若曰藉资观摩，则又非的论矣。欧美士卒之侨吾华者伙矣，我将士之游欧美者亦伙矣，不足以资观乎。甲午之衅，庚子之辱，乙卯之屈，不足以厉其耻，辛亥以来之屯蹇从艰不足以激其气，则虽去故国，走万里，亦奚以为？”

且夫善谋国者，求诸己，不求诸人，求诸内不求诸外。郑伯不耻城下之盟，越王不耻稽会之困者，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鸷鸟未击，不能胜其身也。是以“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不经盘根错节者功不就。

列强非吾敌，武夫专横，群小党争，敌之劲者；战败非吾耻，草莽遍野，水旱频仍，耻之甚者。数者不除，虽今日克一城，明日却一敌，无益也。若能内治修而国基固，天下且倒戈相向，外患何自来哉？惜乎，今之谋国者，徒知黩武以自耀，而不足察也。

《〈史记·曹相国世家〉读后》全文云：

天下治乱之所系，天子而下，相臣而已。故天子为太甲、成王，得相如伊、周，犹不失为贤王。汉惠帝以问幼履至尊，曹参为相，饮酒歌呼，无所事事。参殁无几，帝遭吕后之虐，亏损至□，抑郁以死；诸吕因而危刘氏，赖平、勃、朱虚以仅全。是自匈奴骄横，南粤潜帝，宗亲侯王，异姓功臣，鞅鞅无宁日矣。

天下治安之日，恒视若无事，乃有大疑大难，出耳目智虑之外，非二三小臣所及知，知之亦莫敢言，此责乃在相臣。高帝新崩，主弱臣悍，不测之祸，昭然无可讳。参诚心乎汉宝，汉丞相权最重，孝惠尤宽仁优礼大臣，则深谋敏事，罅漏补苴，以杜其渐，绝其萌，甚或迫不得已，犯太后之严，冒群臣之怨，毅然为之，大患何自来哉？计不此出，而尸位素餐，以贻忧社稷，参之辜，无可逃矣。而世或称之合道，何哉？自来贤相，自舜、禹以至韩、范，咸莫不有丰功假烈，彰彰在人耳目，至于曹参，吾不知其何以不贤也。

且夫恙者出死再甦，神耗血涸，余徽未灭，则凡餐卫与居，调护之劳，至烦以瑮；忽之，病且再作，危乎殆矣。暴君□刘，生民倒悬，一旦□于水火，养民者宜抚之，恤之，慰之，育之，因其疾苦，奉法顺流，以与之更始，然后元气可复。故守成之功难如创始。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吐餔，犹不免三监之叛。今孝惠之为君，不贤于成王，诸吕之为吕，不亲于管、蔡、嬴秦之暴，不减于商受，而曹参为相，饮酒歌呼，不事事，然则参乃贤于周公乎？太史公谓参攻城野战之功

所以多若至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吾亦谓参究为庸人，方其居相，非不知大乱未形，有如积薪厝炎者，其谨守管籥，一遵酂侯之旧，以苟安旦夕者，惟力不足耳。姚崇以十事要玄宗，伪命之议不行，李忠定免冠求去；为相臣者不当若是耶？

呜呼！自曹参以饮酒不事事称贤，汉、唐以还，相沿成风；为大臣者不敢决天下事，与进退贤不肖，曰："吾知循故事尔，专则罪也。"为郡，为县，以至廉察一道，视政之弊不敢革，视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尔，违乃辟也。"若是，不惟时君以为贤，天下亦以为贤，于是内外相济以成俗，而不之怪，国日削，民日弊，因循以须乱亡而已，岂不哀哉？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如参者，苟且媮惰，容悦骫骳，先其身而后国家，是吝之类与。近古以来，失于此者，盖不可枚计。然其有厉精图治之志，如王荆公、张江陵者，又皆以骄自败，为天下后世所诟病。呜呼！骄者吾哀其志，爱其才，而惜其无量，吝者吾耻焉。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论》全文云：

天下不患无才智，而常患无圣人。虽有才智不由训迪，不就陶坛，亦终于汩没，不以才智称也。才智者之巧能恒有以过人，注错之不当，且欲不流于污僈突盗不可得。是以有志之士，其求师也汲汲；中才求师于贤智，贤智者又求师焉，则归圣人。圣人众所赖以成其才者；然圣人更得所谓才者而教之，则孕为政教，历万禩，薄九闼，弥厚土；圣人之于才，求之固不可不亟哉？盖传之或非其人，至并其真以失之，虽传犹不传，圣人之于才，求之尤不可不亟哉？夫才智之出幸遇圣人，圣人作焉，复有以成就天下之才智，谅哉其难之欤；惟其难而得之，其为乐也何以乎？

昔孔孟之徒皆数千人，而得之散游诸侯，又友其士之仁，其大夫之贤。二圣人之安贫乐道，优游耄耄，岂不以此？虽然天下才智之众，必不尽出于孔孟之门；不然，九流十家倡异说者，不至若是其众。九流十家者其言虽庞，要榷其旨，未尝大倍于圣。其亦不幸而不折衷于孔孟以轨于正也，惜哉！

呜呼！成康以还，数百年间，圣人凡再见，士之不获被其泽者，乃多至此。今又二千年已，不闻又有圣人者，缀学之士，诵其言而向往之，更莫得其人以为依归，则相嫪乎其差近于圣人者；若文中子、朱子、阳明子者，门下士咸以千万计，不为不盛，及睹其其间，求能踪迹闵、颜、万章之伦者，寥寥耳，又何怪哉！

呜呼！去圣人益远，微言益希，而士乃益孤，能不令人益思慕圣人乎哉！

是月　暂停阅《汉书》，改阅《史记》，并随时做札记。又，阅毕黎庶昌选《续古文

辞类纂》，该书二十八卷。

二月九日　开学典礼。开始读姚鼐选《古文辞类纂》，全书七十五卷，选战国至清代古人辞赋，依文体分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书首序目论及各类文体特点及义例。

二月十六日　在图画特别班听司达尔女士"演讲建筑上之美术"。（《清华周刊》第129期，1918.2.21）

五月上旬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云："清华学校于下礼拜举行周年纪念会，近日正值一切预备，急形忙碌。"纪念会即清华学校七周年校庆，于十一日举行。

五月十二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说到读史情况，觉得读周秦文字太少：

> 父亲手谕问兄《汉书》已阅多少，兄自去腊起，实已改阅《史记》。札记亦随阅随做，并未拘前后，每次字数亦不拘定。近稍温阅《左传》，但札记仍用《史记》材料。此外自修功课，去岁寒假前已阅毕黎（莼斋）选《续古文辞类纂》，本学期正阅姚选本，未毕。近以大考在即，中文自习功课多未照格履行。兄现为文，气息尚不能醇厚，总由读周秦文字太少，暑假回家，当从此下手。

又云近有评注司马光《谏院题名记》：

> 寄来作文二篇，均已改就，并附评语，当详细参阅。兄近作二篇，亦附寄归。又评注司马温公《谏院题名记》，文法甚明显，可仔细揣摩。

六月二十七日　暑假开始。与闻亦齐同归浠水。

是年暑假　作古体诗《夜泊汉口将发遇同学王君》、《晚步湖上》、《为陈甥画扇》、《夜雨》、《初起》、《漫书》、《芦褐行》、《答浦瑞堂》（三首）、《感事》、《戊午秋日惩志，七十七韵》、《入都，留题二月庐》（二首录一）等。均编入自编古诗文集《古瓦集》。

其中《漫书》为：

> 负笈八年不称意，湖居二月鸟鱼亲；
> 采莲未异求君子，待月真如望美人；
> 豪气五车追日驭，闲情一曲拟天钧。
> 士行寂寞成悲壮，过尔优游报国身。

《感事》为：

> 金火精神云汉鹤，几人稽绍许吾俦！
> 已羞龙首华歆席，又失神仙郭泰舟。

忠信纵逃三省愧，苍黄能忽五丝忧？

从今何处分清浊，濯足淘缨任汝求。

《戊午秋日惩志，七十七韵》中写到童年与入清华后的情景，其前部分为：

高霁月三望，埋头更夕昼；

肝肠一荡涤，六凿忽通透。

黄昏坐陈编，绝发感秋飓；

检点廿年事，翘首愧屋漏。

忆音犹童騃，燕颔挺轩秀，

强勉学诗文，夏楚疲师授。

入塾数因循，分食勇攫斗，

蒙昧送伏腊，对镜失冲幼。

开轩临门野，仰俯悼宇宙；

翡翠巢高堂，麒麟卧幽□。

金匮垂史册，畏垒列俎豆；

男儿百年事，首当五车富。

负笈走鄂渚，孰孰穷四候，

舆算尽粪土，文章侈饤饾。

倏焉岁云秋，曷尝改昏昏？

浩劫大运转，豪杰万方凑。

紫气郁云霄，华城灼燔□。

避难窜穷邨，饱暖惭赘瘤。

造次试清华，承乏侥入彀；

已暗朱蓝染，复废大小扣。

三余度等闲，两载益纠缪。

鹈鴂已先鸣，百草失芳茂。

灭裂误播耕，努力事耘耨。

攘臂领级事，锐意图急就，

独力扛龙文，未敢爱颈脰。

往往僊烦剧，后钝瞋恂愁；

时或举艰巨，腐谈叱迂狃。

鏖文战辨说，一虎敌诸狖。

积疑布腾沸，众痏生肤腠。

群口嘘赤熛，吹毛此庇瘘。

因之成怪民，未免讥槛猷。

《入都，留题二月庐》(二首录一)，为对家乡和二月庐的留恋：

萧萧木落雁初鸣，未吐阳关泪已淫。

书急故人图晤意，密缝慈母望归心；

假中日月空流水，圣处工夫只愧衾。

想见秋风悲卫玠，大江□□日西沉。

九月上旬　清华开学，升入高等科二年级。时，堂兄闻亦传(字葆天，大排行第八)亦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一年级(即一九二二级)，与潘光亶、时昭瀛等同级。清华遂有"闻氏三兄弟"之称。

十月上旬　辛酉级选举职员，选先生为中文书记及国语辩论代表。(据《清华周刊》第 145 期，1918.10.10)

十月十九日　清华同学追悼暑假中逝于天津的孙作周同学。先生诵祭文，后以《代清华全体同学祭孙作周文》为题，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清华学报》第四卷第六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中云：

维中华民国七年七月，孙君作周殁于天津。十月十九日，清华全体同学始克开会追悼，并致清泉庶核之奠，为位而哭之曰：云火孕劫，豺虎集庐，噬脔嗥膏，遂滋疮疽；澶渊却币，阿房遗墟，鸠工靡籍，群士是居。于中有人，维吾作周：浑刚其德，夐厉其修，士气之卑，言甘貌柔；君企古人，砭失针尤，凡吾顽骙，孰敢且偷。铜驼寂寂，麦秀离离，有触君目，太息嗟咨；亦憾彼贼，亦哀此蚩，烹桑祸罹，及我何时；前车之鉴，念兹在兹；感发愤励，苦研湛思，灌新沃旧，蔚为华滋；学则锐进，身先年哀，凶徵夙觊，发斑鬈鬇。析津度假，诸父是依，胡为一病，溘然永辞。呜呼作周！天脱骏骅，聊浪九野，半驾而蹉，纵不君恤，谓邦国何！君器未利，君学方始，匪曰邦国，惟君是倚；有生虽众，庸庸难恃，卓卓如君，远大可企；怀才不伸，而竟以死，昊天罔极，吾悲曷已！岂惟悲君，兼悼吾类，自君之殁，继逝者二。济济清华，数百同辈，七年于兹，死亡相逮。死也曷既，生者有涯，生我父母，育我国家，师迪友砻，后望正奢。匆匆一逝，万古长嗟，藏舟亡壑，痛孰有加！死者死耳！君则何恫，惟君英灵，宜为鬼雄。夷氛日逼，蟊蚌方讧，相国毋乱，惟君之忠。呜呼哀哉！尚飨。

十一月十四日　与清华师生同赴天安门，参加畿辅学界一万五千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之集会。时，大战于十一日结束，中国忝列战胜国。

夜，作《提灯会》一首。后发表于次年五月《清华学报》第四卷第六期。收《闻一多

青少年时代诗文集》。序云:“德虏既克,寰区额庆。京师学生万五千人,以某月某日之夜,提灯为贺。是夜吾校亦有提灯游海淀者,吾弗与焉;俯思国难,感而成韵。”先生认为战争双方均为“强狼”,只是“失性沸相噬,绝脰决肝脾”,战争的结果是“田禾灼涂炭,中藏老农尸”,所以庆贺胜利之“吉金镗尘鼜,我听思斗钲;华灯耿黑树,我睹疑磷燧”,甚至“思此肝腑裂,仰天泪淋漓”,恨不得“何当效春雷,高鸣振聋痴”。

十一月十五日 致父母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详报在校一应各项开销,并云收到湖北省给旅外本籍学生的首次津贴二十九元。各项开销计有“欢迎新同乡一元五角,《学报》一元八角五,《周刊》八角,图画特别班器用费一元,杂项捐款如国庆纪念级会常费、级会俱乐会捐款、高等科二三四年级欢迎一年级捐款,及欧战协济会捐款,共三四元。”足见先生热心,如《闻多》所自谓:“性简易而慷爽,历落自喜,不与人较短长,然待人以诚,有以缓急告者,虽无赀,必称贷以应。”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嘱弟多读经史:“经史务必多读,且正湛思冥鞠,以通其义,勿蹈兄之覆辙也。兄近每为文,非三四日稿不脱,此枯涩之病,根柢脆薄之故尔。今课程冗杂,惟日不足,尝求闲晷稍读经史,以补昔之不逮,竟不可得,因动私自咎悔,呜呼!亦何及哉!”又询及弟之健康:“弟腹病近发否?摄生不可不讲,然亦不可以此自馁。病者身也,心志则不能病。起居以时,饮食惟适,立心坚确,向学不懈,阴阳亦退而听命矣。”

十二月十九日 游艺社改组后分为编剧、演剧、总务、化装、布景五部。是日出版之《清华周刊》报道云:“游艺社自改组以来,积极进行,共分为五部。编剧、演剧两部设于高等科新楼下层,总务部设于高等科斋务处,化装、布景二部设于高等科寝室侧。并敦请校长张先生为名誉社长,及教职员多人为各部顾问。现年终俱乐会已届该社编演一剧,名《鸳鸯仇》,师生全演,共分六幕,(一)鹏飞,(二)鹤逝,(三)鹣比,(四)鸠逐,(五)鹑奔,(六)鹃啼。现正演习,将于除夕八时在体育馆开演。演券值,头等伍角,贰等二角。此次化装布景,均力求改良,并闻开幕前有著名新剧大家刘艺舟先生演说云”。(《校闻》,《清华周刊》第 154 期,1918.12.19)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晚,游艺社在校内体育馆演出《鸳鸯仇》、《黑狗洞》。《鸳鸯仇》为先生参与编写、排练。剧情为:“郭伯渠商人也,子女各一。女,前妻出,许婚莫良新。莫幼志学,未娶即游学美洲。郭没,妻虐其女,家日落,其女孑然一身,独于贫困中见一番贞节性,所期望者,莫良新学成归国,光耀门庭,遂人伦之乐耳。谁知人心难测,莫良新而没良心,出家忘家,因新忘旧,眷新知之情,忘未婚之妻,别娶贾爱琴而弃郭女。女于此时无望于世,去发为尼,盖节女之末路也。莫良新寅缘得官,奔走于王大老之门。莫良新忘其良心而别娶人,亦忘其良心而私其妻,求荣得

辱，求乐得苦，天演之报应也。其捷如响，贾爱琴竟成假爱情，没良心适以自害也。莫盗矿山而贾嫭王，禁之不可而反见挟，争执之间，误毙假爱情之贾爱琴，天理难逃，而没良心之莫良新，亦因以自毙，产没入官，家败人亡，此又没良心之报也。母流为丐，祸及其母，适以大其罪，女竟自裁，轻其生更足以贞其贞。"（廖永忠《记七年除夕新剧〈鸳鸯仇〉》，《清华周刊》第157期，1919.1.9）

《鸳鸯仇》演出是清华同学戏剧活动的一大盛况。《清华周刊》报道其情云："戊午除夕，本校游艺社编演新剧《鸳鸯仇》于体育馆，本校上自教职员，下至同学，皆得购票往观。座有头等、二等之别，故票价亦随之而有五角、二角之分。自是晚八时许开演，至十一时余始毕。除本校教职员及同学外，来宾到校观剧者甚众。每演幕毕时，由军乐队奏乐，乐之抑扬顿挫，高下曲折，咸中声律，不异于戏戏之？喜有因，怒有由，哀乐忧戚，曲尽事情，不异于乐戏。戏毕而乐，乐毕而戏，戏之中有乐，乐之中有戏，观戏而思戏中之乐，闻乐而思乐中之戏，目有观观戏，耳有听听乐，心有思思乐，口有道道戏。戏之描写，事情曲尽世态，自成其戏。乐之歌咏，性情纯厚，温和自成。其乐凡当时得闻是乐者，皆知乐之所以为乐，得观是戏者，皆知戏之所以为戏也。是晚天气甚寒，暴风时起，杨树柳枝，随暴风而支援有声，门窗户牖，因暴风而叮当动响。听其所以响而响，思其所以然而然。因情动感斯，盖乐中之乐，戏中之戏也。体育馆内电光明烂，人声嘈杂，每幕之事情不同，而景致因之。千态万状，变化无穷。细心而思，又一乐中之乐，戏中之戏也。天地自然之变化，因是晚之乐而成其乐，戏场人之布设，亦因是晚之戏而成其戏。知天然人为之乐乃可以听，是晚之乐而乐其乐，明天然人为之戏乃可以观。是晚之戏而戏，其戏宇宙内亦乐歌馆也、演戏场也。人生之得失利害，喜怒忧乐，亦如乐歌馆、演戏场也。变化无常也，大地茫茫，无事非乐也，无事非戏也，知万事皆乐，故记者因是晚闻乐而乐，于乐知万事皆事，故记者因是晚而观戏而明于戏，乐于乐，故不忘言乐明于戏，故不忘记戏。"（廖永忠《记七年除夕新剧〈鸳鸯仇〉》，《清华周刊》第157期，1919.1.9）观众席有特别座、头等座、二等座，均仿西式，似为戏剧改良之一次尝试。

是月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仅存后半函，云："清校演剧已毕，寒假中大概要进城去演。"

一九一九年　二十一岁

四月三十日，《巴黎和约》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于日本。

五月五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

五月，美国哲学大师杜威抵达上海，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访华讲学。

七月十四日，少年中国学会成立。

十月十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自任总理。其纲领为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

十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

一月一日　元旦。“晚餐集诸友十余辈，罗馔大嚼，笑语甚欢”，先生称此为其“理想团体之首次会合”。（《仪老日记》）

一月二日　“作英文演说一首”。（《仪老日记》）

一月三日　“作《读关雎章札记一首》”。（《仪老日记》）

一月四日　为近来演说练习较少而担心，说：“近来演说课练习渐疏，不猛起直追，恐便落人后”。（《仪老日记》）

一月五日　决定应游艺社社长罗发组之请，担任该社编辑部部长。（据《仪老日记》）

一月六日　为“作文演说果降列中等”，感到“此大耻奇辱也”。（《仪老日记》）

清华学校功课采用科学计分法，先后改过多次。其中一种是将学生分为六等，即：超等、上等、中等、下等、及格、不列等。“每班学生人数，不拘多寡，概以百分法计算。每次计分时，列入超等的，不得过百分之分；列入上等的，至少须有百分之二十，至多不得过百分之二十五；列入中等的，约百分之五十；列入下等的，至多不过百分之二十五，至少须有百分之二十；列入及格或不列等的，共计不过百分之五。”对于学生来说，“各科都在中等以上的，于升级及毕业都无关系。各科都得下等，能升级而不能毕业。各科都得及格，第一年仍可升级，第二年如无长进，即须开除。得不列等之科目，须补习，如两科得不列等，即有开除的危险。在这种计分法之下，大家都觉得不得中等，是不安稳的，所以对于功课，不敢不念熟，不敢存‘混’的思

想。”（吴景超《清华的历史》，清华周刊社编《清华生活》，1923.4.28）

一月七日　午，“在钟台下练‘CROSS OF GOLD’演说八遍”。八日“夜偕德明习演说”，九日“夜出外习演说十二遍”，十日云：“演说略有进步，当益求精至。”十四日，“夜至凉亭练演说三遍，祁寒不可禁，乃返”，睡前又“温习演说五遍”。（《仪老日记》）

一月十日　参加饶麓樵先生追悼会。饶为光绪十六年举人，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十年，一九一二年到清华，教授过先生文学史等课，逝于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夜，与顾德明“谈修身持心之道”。（《仪老日记》）时，游艺社内出现分歧，有讥毁先生者。

一月十四日　为游艺社意见不一而烦忧，于“忱上忽思，屏弃百事，专心读书”。（《仪老日记》）

一月二十三日　根据吴泽霖九日所建议改组游艺社计划，是日改组为新剧社，下午召开新职员及顾问会议。（据《仪老日记》）新剧社专司编演新剧事，分庶务、编演两部，校中派定罗发组、陆梅僧两人分司部长职，但似乎罗、陆未就任，故公布的新剧社职员名单，先生为编演部总经理，吴泽霖任庶务部总经理。（据《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1919）编演部下设编剧、演剧两股，主任分别为段茂澜、张祖荫。庶务部下设布景、化装、总务三股，主任分别为程绍迥、王世圻、吴泽霖（兼）。游艺社为学生团体，改组为新剧社后，则直隶学校。（《清华新剧社纪要》，《清华周刊第五次增刊》，1919；《学生方面·智育》，《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

一月二十六日　为胞弟闻家驷修改作文。晚，与潘光亶、杨荫溥开新剧社编辑会议，商议修改《鸳鸯仇》。（据《仪老日记》）

一月二十七日　召开新剧社编辑第二次会议，商量修改《可以风》，计划分十幕。参加者有潘光亶、吴泽霖。（据《仪老日记》）

一月二十八日　为新剧社会务事繁忙。夜，参加第三次编辑会，再改《鸳鸯仇》。虽“两日人少”，但“成绩咸可观”。（《仪老日记》）

一月二十九日　为写论文《北京明故城》，到北京大学查阅资料，同往者还有闻亦传。晚，宿鸿雪缘旅店，经理是浠水同乡。

一月三十日　仍留鸿雪缘。夜与闻亦传“谈家乡事，又引称摩诘《重九》诗，相与欷歔良久也”。（《仪老日记》）

一月三十一日　除夕。仍留鸿雪缘。晚，与闻亦传、闻亦齐“纵论今昔人物世故，悲愤追憾，莫能自已”，后“据枕假寐，灯熄视东方既白矣”。（《仪老日记》）

同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报告英文诸课成绩：作文，上；读本，中；历史，中；代数，上；地质，上。

二月一日 返清华，与潘光亶议《鸳鸯仇》分幕法。后，两人又“论教义”。(《仅老日记》) 时，先生对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活动较感兴趣，且正在读《旧约》及《旧约轶事》。清华初创，在美国聘请教员多由青年会负责，故校中美籍教师大多为基督信徒，这对先生也不无影响。

二月二日 “作《北京明城考参考汇录》稿本”。(《仅老日记》)

二月三日 得家信，知胞妹十五妹噩耗，“惊恸不已，即作报书”，“谓骨肉死亡之惨，吾生庶未之见”，“去岁乡里大疫，亲戚邻里毙亡无算，而余家独全，方私幸奇福，以为愉快。孰谓妹不死于彼时，而死于今乎。妹则死矣，妹之孝谨，妹之智慧，一日不能忘，即令人一日不堪耳”。(《仅老日记》)

二月五日 新剧社召开编辑会议，决定排练两剧。晚，赶编《巾帼剑》第一幕词，至十日编定，共成六幕，(据《仅老日记》) 仅六日即完成矣。

晚，“与仲昂议办北京学生新剧联合会”。(《仅老日记》)

二月九日 清华一九一八级毕业生卢默生、李济自美国来信，“愿捐款助鄂友协进会”，(《仅老日记》) 甚喜。

二月十日 清华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后被指定为《清华学报》编辑。又计划两年内之读诗步骤，云：“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选，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仅老日记》)

二月十四日 开始读《天演论》。(据《仅老日记》)

二月十九日 “作英文《二月庐记》”。(《仅老日记》)

二月二十日 有读《天演论》感想，称其：“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移译之能事也。《新潮》中有非讥严氏者，谓译书不仅当译意，必肖其词气笔法而后精，中文选句破碎，不能达蝉联妙邃之思，欲革是病，必摹西文云云。要之严氏之文，虽难以上追诸子，方之苏氏不多让矣。必谓西方胜于中文，此义蛄蜣丸转，癖之所钟，性使然也，吾何辩哉。”(《仅老日记》)

二月二十五日 “作《愤言》”。(《仅老日记》)

二月二十七日 参加《清华学报》编辑部会议，“某先生提倡用白话文学，诸编辑率先附和之”，先生亦觉“无可如何也”。(《仅老日记》)

二月二十八日 “作《体育馆歌》”，(《仅老日记》) 次日完成。

三月三日 访陈曾寿先生。(据《仅老日记》) 陈曾寿，字仁先，湖北蕲水下巴河人，陈沆曾孙，光绪二十八年乡试中举，次年殿试中二榜第一一六名进士及经济科

二榜十八名进士，官曾至监察御史。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陈为报君恩出为学部侍郎，复辟失败，于本年二月十七日来清华，接替饶麓樵所遗之教职。陈曾寿与先生大伯闻侍臣相熟，论起辈分长先生一辈。先生八日家信中特书："陈仁先前辈在清华任教习，授男文学史，前偕八哥造谒，曾询问伯父也。"

三月四日　对白话文改变态度，云："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余不愿随流俗以来讥毁。"（《仅老日记》）

三月八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报告二月份成绩："英读本，中十；英作文，上；历史，上；代数，中。"又云："此学期任新剧社事，又《学报》中文编辑，虽稍忙，志乃在于服事、读书两全。暇时不能钻研经史，稍稍读诗文期于不间断耳。读经史终以暑假为宜，以时宽而志专也。"

三月十四日　"译《波兰千年进化史》"，（《仅老日记》）次月十四日再译。

三月十七日　忙于剧务，"日不暇给"，是日至次月二日无日记。（据《仅老日记》）

四月三日　下午入城，至第一舞台。（《仅老日记》）

四月四日　"上午练《巾帼剑》，下午练《是可忍》"，"晚，陈大悲先生述《我先死》事实"。（《仅老日记》）

四月五日　晚八时，先生与清华学校新剧社，为本校各社会服务机关募集捐款，在前门外第一舞台演出《我先死》与《巾帼剑》两剧。后者即据《可以风》改编，八幕。

四月六日　清华新剧社在前门外第一舞台演出《是可忍》与《得其所哉》两剧。潘光旦说这次演出是为救济河北旱灾募集捐款，全剧"由同学自己集体编写的，学校在'义举'两字的压力下，还掏了不少的一笔钱，其中一部分就消耗在各编写人于漫长的冬夜里吃火锅的上面。记得演出的那晚上，梅兰芳先生是包厢中的一员观众，后来事隔多年，我还听到当年参加编写的一个同学说，他从来没有看过梅老板演的戏，而梅老板却看过他编的戏。当年同学们搞的几乎全都是话剧，京剧是不屑搞的。"（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91页）《是可忍》即《鸳鸯仇》，原六幕，后延长至八幕，"情节更为拗折"，（《清华周刊》第165期，1919.4.3）该剧演出时，梅兰芳亦来观看。

两日来共演出四剧，除《得其所哉》外，先生均参加演出。此四剧都具有时代精神，演出效果颇佳，共得洋四千元。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某年春季，清华为爱国运动募集款项，曾由一多与高班罗发组同学共编一部五幕新话剧，假座北京一大戏院演出，由庚申级陆梅僧担任女主角，扮演剧中之一位'姑姑'。演到悲伤最高潮处，声泪俱下，博得台下观众不少同情之泪。于是梅僧与一多之名遍传遐迩。"（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

四月八日 遇某君，其称先生“精神上之耐忍与躯体上之忍耐俱全”，先生听罢，觉“为讥为实，不可知也。然其人实获我心，可发一噱”。（《仅老日记》）

四月九日 “作水彩画一幅”。（《仅老日记》）

演剧结束，先生说：“数月来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不贻讥于人，亦滋幸矣。今事毕，甚喜，从此可以读书也。”（《仅老日记》）

四月二十七日 先生与新剧社在清华学校后工字厅开俱乐大会，酬劳“往京演剧勗助诸人”。（《清华周刊》第168期，1919.5.3）

五月四日 五四运动爆发。清华学校因在郊区，未能参加白天的天安门集会与游行。是日为星期日，晚间有进城同学返校，讲诉了白天城内的爱国热潮，先生听了很受感动，连夜抄出《满江红》。二十五年后，先生才说出这一事：“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贴去的。”（《五四历史座谈》，1944.5.3，《闻一多全集》第3册第535页，三联书店1982年8月出版）

五月五日 上午，清华沸腾起来，高、中两科科长及各级级长、各会社负责人共五十七人集会，讨论如何配合城里的爱国运动。先生以《清华学报》中文编辑和“新剧社”副社长身份参加会议，并担任临时书记，负责记录。晚上，全校同学大会，会后组织了清华学生代表团，先生与罗隆基担任临时书记，学生代表团中还有潘光旦、吴泽霖、何浩若、黄钰生等。下面的《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就是先生参加并整理出来的，它是清华同学这天活动的最早记载：

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烜，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召集各级长各会长及各机关领袖，于上午九时在高等科一三五号开会讨论对于山东及青岛问题。主席为乔万选，临时记录书记为罗隆基、闻多。所通过事件可分二种。（一）对外，（二）对内。胪列于次：

（甲）对外：（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上书或派代表。

（乙）对内：（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

推举代表五人：罗发组、陈长桐、罗隆基、孔令烜、陆梅僧。

十时半代表出发，同时代表团继续会议。至十一时半始散。午食时代表自京先后来电，有称下午二时北京有校长会议者，于是下午一时至二时代表团先后往谒赵校长，力请与会。赵校长三时进城，言先谒外交次长，如蒙许可，始能与会。代表团退至一一号会议，乔万选因病退席，即以徐笃恭为主席。代表自京来电，称本晚有学生大会，本校需加派代表五人与会，乃公决加举代表二人，为陈复光、何浩若。又讨论本晚大会事，公决俟赴京代表报告至再定办法。

五时，代表孔令烜返校，又在一四一号开会，报告情形，又加举代表三人，为黄钰生、潘钟文、姚永励。后举五代表出发，会议继续进行，公决派人往海甸疏通商界，作学生后盾，举刘驭万、沈克非司其事。又决举行通俗演讲，分散传单，鼓吹爱国心，以本校通俗演讲部及白话报分任其事，孟治、华凤翔为委员。

晚七时半在体育馆门首开全体学生大会，陈长桐主席，报告昨日北京情形。孔令烜报告调查情形，罗发组报告调查情形，徐笃恭报告本日本团经过情形，陈长桐报告调查情形，又劝勉同学严守秩序。散会。

散会后学生代表团在一三五号会议，主席陈长桐。

（甲）先拟简章三条：（一）定名：学生代表团。（二）宗旨：以救国及作外交后盾为宗旨。（三）组织：设团长一人，副团长一人，书记七人，干事五人，印刷四人，会计三人，代表十人。

（乙）选举：团长：代理科长陈长桐。副团长：王国华。书记：英文桂中枢、沈克非、赵学海。中文闻多、潘光亶、段茂澜、周兹绪。会计：薛祖康、周良相、徐笃恭。印刷：王世圻、黄大恒、丁嗣贤、邵家麟。干事：刘聪强、曾昭承、张祖荫、刘驭万、吴泽霖、杜庭修。外交即以前被选之往京十代表充之。

（丙）募款：（一）拟由膳费内扣出（惟此项须要同学同意）。（二）更由同学随意任捐。（三）当由新剧社认捐五十元，并允暂时垫出现需款项。（四）德文生字团捐款七元又五十枚。

十一时，见本校校长五代表及派往北京代表皆回。校长谓本午校长会议未及出外，并提出五项问题：（一）与北京学界一致进行至何地步。（二）如以后事有变更学生将取何态度。（三）为何代表出校不请假。（四）遵否校章。（五）家庭质问学校，将何以答复。以上问题，当由代表团议决于明晨开会，有职教员到报告本团情况，藉资答复。地点：一四一号。时间：九时。

校长又谓同学有寄以匿名信者，代表团闻之，议代查。北京归来代表何君浩若报告京中开会情况，并决定下列事项：（一）五月七日如开大会，无论如何，我校必到。（二）罢课事坚持到底。（三）北京学会经济支绌，我校必极力

设法补助。(四)蔡孑民先生所谓出版物宜小心,本校须注意。(五)本校与京交通不灵,且近日信息甚多,应派员守电话室。(六)预备七日派人到京于开会时演说。(七)明日既罢课,于下列事应注意,甲不得私往上课,乙不得出校,丙不得乱写条告,丁不得随意游戏(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八)明日开学生大会。(九)举定孔令烜、黄钰生、陆梅僧、罗发组四君明日往京赴联合会出席。(十)组织校内纠察部以防奸细。(《清华周刊》第170期,1919.5.15)

六日,清华同学开始罢课。七日,正式成立学生代表团,设正副团长各一人,下设秘书、外务、纠察、会计、干事、推行、编辑七部。又设义勇军军长,救国十人团总务部长、救国实业团筹备处长各一人。先生任职于秘书部。

五月九日 北京各校原定七日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遭北洋政府强行禁止。是日,清华同学齐集校内体育馆,召开"国耻纪念会"。会上,陈长桐致开会辞,乔万选演说,姚永励讲青岛痛史,康德馨演说,潘钟文读二十一条,全体向国旗行鞠躬礼,并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后由闻君多报告本校学生代表团职员,并由沈君克非读巴黎我国外交专电",遂之"将售品所及同学所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清华周刊》第170期,1919.5.15)

五月十七日 致父母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报告清华及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情况,充满了爱国的热情。信中云:

山东交涉及北京学界之举动,迪纯兄归,当知原委。殴国贼时,清华不在内,三十二人被捕后,始加入北京学界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此事目的达到后,各校仍逐日讨论进行,各省团体来电响应者纷纷不绝,目下声势甚盛。但傅总长、蔡校长之志亦颇受影响。现每日有游行演讲,有救国日刊,各举动积极进行,但取不越轨范以外,以稳健二字为宗旨。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所以北京学界为全国所景仰,不亦宜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现校内办事机关曰学生代表团,分外务、推行、秘书、会计、干事、纠察六部。现定代表团暑假留校办事。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

又,言及暑假要留校编辑新剧坚持爱国活动,希望父母理解:

又新剧社拟于假中编辑新剧，亦男之职务。该社并可津贴膳费十余元，今年暑假可以留堂住宿，费用二十六元，新剧社大约可出半数（前校中拟办暑假补习学校仅中等科，男拟谋一教习，于经费颇有补助。现此事未经外交部批准，所以作罢论），尚须洋十余元。男拟如二哥、五哥可以接济更好，不能，可在友人处通挪，不知两位大人以为何如？本年又拟稍有著作，校中图书馆可以参览，亦一便也。男每年辄有此意，非有他故，无非欲多读书，多作事，且得与朋友共处，稍得切磋之益也。一年未归家，且此年中家内又多变故，二哥久在外，非独二大人愿男等回家一集，即在男等亦何尝不愿回家稍尽温省之责。远客思家，人之情也，虽曰求学求名，特不得已耳。此年中与八哥共处，时谈家务，未尝不太息悲哽，不知忧来何自也。又男每岁回家一次，必得一番感想，因平日在学校与在家中景况大不同，在校中间或失于惰逸，一回想家中景况，必警心惕虑，益自发愤。故每归家，实无一日敢懈怠，非今为家计问题，即乡村生计之难，风俗之坏，自治之不发达，何莫非作学生者之责任哉？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五哥回家，自不待言，二哥如有福建之行，亦可回家。男在此多暇时时奉禀述叙情况，又时时作诗歌奉上，以娱尊怀，两大人虽不见男犹见男也。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为男此议论为大言空谈，如俗语曰"不落实"，或则曰"狂妄"，此诚不然。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以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此番议论，原为驷弟发。感于日寇欺忤中国，愤懑填膺，不觉累牍。驷弟年少，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前托十哥转禀两大人，新剧社赴汉演戏，男或可乘机回家，现此问题已打消，男必不能回家也。或者下年经济充足，寒假可回家一看。寒假正在阴历年。男未在家度岁已六七年，时常思想团年乐趣，下年必设法回家，即请假在家多住数日，亦不惜也。区区苦衷，务祈鉴宥，不胜惶恐之至！

先生暑假留校事，《清华周刊》曾有披露："明年国耻纪念日，新剧社拟排演戏剧，募集本校实业团经费，该社已请闻君多、时君昭瀛、段君茂澜、张君祖荫、裴君庆彪，留校编辑，以免临时匆促。"（《校闻》，《清华周刊第五次增刊》，1919）

五月二十八日　致父母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因久不见家中来信，恐前

函被当局扣压,故又报告暑假将留校进行爱国活动:

> 前奉一禀,言暑假在校办事不能回家,一切经费,均有著〔着〕落。许久未见赐示,或因前函中颇论时局,被邮局收没,兹再述一过。清华学生代表团留校办事,男厕要职不能离身,又新剧社拟于假期中编辑新剧,并有薪金十余元。校中今年可以留堂,纳膳费二十六元,新剧社可任半数,余款已蒙五哥允许接济。如五哥款不即来,亦可向友人处通挪。男此举五哥甚赞成,以为出于爱国之热忱。今年年假,定能回家一看。此次不能回家,出于不得已,务望大人许可。详情后禀,现甚忙,不暇多渎。

是月 《清华学报》自第四卷第六期重新派定学生部职员,先生继续任中文编辑。本年《清华学报》职员仍分教员、学生两部,教员部国文编辑为孟宪承、左霈、高祖同、杨喆。学生部总编辑赵学海,中文编辑还有潘光亶、段茂澜、王箴、陈复光、曾昭抡、聂鸿逵、蔡公椿、李榦。(受注《学生各团体》,《清华周刊第五次增刊》,1919)

译 Mathew Arnold 之《渡飞矶》(*Dover Beach*)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四卷第六期。全文如下:

平潮静素漪　　明月卧娟影
巨崖灿冥湾　　清光露俄顷
夜气策寒牖　　铿锵入耳警
游波弄海石　　揭来任扑打
中流断复续　　长夜发悲哽
在昔希腊贤　　此声听伊景
苦海叹茫茫　　溯洄递灾眚
北海千载下　　吾乃同深省
怀彼上世民　　天真曷完整
方寸生春潮　　忠信溢耿耿
季叶风陵迟　　此道不复永
希微荡归汐　　凄风送余骋
但见新奇生　　大地成幻境
岂知嚼腊味　　亲仇出暖冷
风雷无定姿　　洪波恣骄逞
翳曜有浮云　　援溺孰从井
深屑短兵接　　奔腾杂顽犷
月黑风雨晦　　终古无怡靖

六月四日　先生与清华学校一百六十多同学(约占全校四分之一)步行入城做宣传,行前大家都带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作了坐牢的准备。

先是六月二日,全校同学在体育馆前开会,拥护市学联关于派人上街宣传的号召,通过了第二天进城讲演的决议。三日,北京学生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清华进城之百余人全体被捕。先生等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先生很少提及此事,直到抗战胜利前一年的五四纪念会上,他才谦虚地说:"后来的街头演讲,清华倒干得很起劲。一千多人被关起来,其中有许多是清华的。我那时候呢?也是因为喜欢弄弄文墨,而在清华学生会里当文书。……我一直在学校里管文件,没有到城里参加演讲,除了一次是特殊的之外。"(《闻一多全集》,第3册第535页)

后来,先生作了一幅画,画面为一青年学生在门楼前的高台处讲演,周围有不少市民认真听着。这应当是他的亲身感受。

六月八日　北洋政府当局被迫释放各校被捕同学。清华学校派代表和军乐团及义勇军第二连同学前往欢迎,一起胜利返校。次日,清华举行盛大联欢晚会,庆祝斗争取得胜利。十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五四运动中,先生始终怀着饱满的爱国热忱,做着许多具体的工作。梁实秋《谈闻一多》:"一多在这潮流里当然也大露头角。但是他对于爱国运动,热心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五四运动之际,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是陈长桐,他有清楚的头脑和天然的领袖的魅力,继起的是和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他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第6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1月1日出版)

那一时期里,先生还和一些同学热心地办起校工夜校,并为附近村民们设立过一个图书室、筹集小款为货郎提供借贷,这些都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做的一些社会服务工作。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长期罢课使我们有充分时间在学校附近进行宣传活动,同时也扩大和加强了我们原先的社会服务工作。一多和程绍迥、吴宗儒等人特别热心于组织校工,几乎把全校工友都编入了校工夜校,在那里,一方面宣传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一方面帮助他们识字读报、提高文化。一九四六年我由昆明回到清华,一位老校工见到我时还谈到那时夜校的情况,还记起一多是怎样耐心教他们识字的。此外,在那段时期,一多等人还鼓动同学们尽量捐募一些通俗读物,在校外小村中设立了一间小小的图书室,供村民们阅览,尽管那里识字的人并不多。当了解到村内一些货郎小贩经常苦于无处借贷来周转进货,我们设法筹

集了五六十元小款作为小本经营借贷之用，一人一次可以无息借贷五元。凡此种种受到村民群众的欢迎。"(《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65页)

是年暑假 留校，参加清华学校暑期学生代表团工作，并筹备编演新剧。《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明年国耻纪念日，新剧社拟排演戏剧，募集本校实业团经费，该社已请闻君多、时君昭瀛、段君茂澜、张君祖荫、裴君庆彪留校编辑，以免临时匆促。"

六月十六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召开成立大会，罗发组作为清华学校代表出席。旋，召开学联常会，清华又派先生与罗隆基、钱宗堡、陆梅僧四人为代表与会，并参加会务工作。(据《京华短简》，《申报》1919.6.27)

六月二十七日 下午二时，全国学联召开本届第一次临时干事会。推定罗隆基等为本会各股办事细则起草员。会上又讨论了出版日刊问题，时天津《民钟报》已归并于学联日刊，编辑主任为陆梅僧，由于工作繁多，先生此时亦正式担任编辑，参加日刊股工作。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时，在永安公司参加全国学联饯别会长段锡朋宴会。

同日 下午，有致闻家驷信，今存后半函，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认为学联会议"未有伟大之建议，根本之维持"，决计辍学为建立学联会所"游行国内，演讲劝募"，以期坚持爱国运动：

> 今日联合会宴会，饯别段锡朋会长，肴核罗列，仅能茹其浆而已。本拟偕五哥回家藉以休息，而五哥函来谓归期必在八月初，重以清华同人方为联合会经营建筑会所事，需才孔多，闭会后，日刊仍继续出版，以资鼓吹，诸友谆谆劝留，责任所在，义不容辞，故乐集尚遥遥无期也。自会务开幕以来，所称成绩者数纸文电而已，从未有伟大之建议，根本之维持。清华同人之穷日夜废寝馈，以从事于斯者，不计日矣，及其提议建筑会所(参阅附件)，实行改造社会，诸代表至有目为无藉者，可以知其浅见矣。履行此议，首重醵款，此非易事，必得一般学生辍业一载，游行国内，演讲劝募，乃可望奏功。在此五人(二罗、钱、陆暨弟)既为提议人，责有难逃矣。此外陈君长桐、黄君钰生、桂君中枢颇有意暂缓出洋以共襄盛举，吴君泽霖亦将来沪，亦为此事也。诸君在校皆籍籍，陈、黄尤为代表团中坚人物，竟肯为此举牺牲赴美，足见清华之真精神非他校之比矣。弟亦拟辍学一年，正以为读书之机会方多，此事诚千载一时矣，况将来是否必需一年，尚不定，或半年数目已足，则无碍于出洋矣。此书并附寄章程草案及建议案，均祈兄转呈父亲大人并仰候钧裁示覆。

时，先生牙痛越周，"病齿嚼咽维艰，绝粒四五日矣"，只能食牛奶面包，但仍坚

持工作，《齿痛》一诗即当时所作。编入自编古诗文集《古瓦集》。诗云：

兼旬信餐餮，九鼎疲郇厨。
讵知病入口，积毒潜辅车！
养患更来复，一溃无肌肤。
初尚碍咀嚼，继乃难吞茹。
卢医衡在望，走访无仗扶；
刀圭所不到，卮药徐涤祛。
日日望疗治，臃肿迄不纾。
垂涎对盘餐，忍饥仰欷歔。
斯世久啜醨，曹曹匪吾徒。
夷齐倘可接，俄乡亦足娱！

同日　学联代表在永安公司楼顶合影。照片刊于二十九日《申报》。其第一图有康白情、瞿世英、周炳琳、屈武、盛世才等；第二图有先生、罗隆基、陆梅僧、黄日葵、潘公展等；第三图有徐屏南、水楠、吴震寰等。

七月二十九日　全国学联召开评议会，讨论提案共十三项，第三案为“统一建筑会所办法案”，为先生等清华代表所提出。“讨论结果，众赞成”，并决定首先由北京、上海两地学生组织募捐，“九年京沪、十年津川闽湘、十一年皖浙山西江西、十二年云南南京吉林西安开封、十三年广西兰州黑龙江贵阳汉口迪化。但各地学生联合会如愿提前建筑者，得由该地学生会募集经费，本筹备处补助之。补助之额不得过规定数之半。惟该地常年义务捐仍当缴纳筹备处。”（《全国学生会评议会纪事》，《申报》1919.7.30）

是月　《清华学生代表团祭徐君曰哲文》、《清华体育馆》、《清华图书馆》、《台湾一月记》（译文）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四卷第八期。前三者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徐曰哲，字菊畦，江西吉水人，清华高等科一年级学生。五月十六日，徐参加清华通俗演讲团，晋京演讲，道感风寒，返即卧病，于二十二日逝世。先生为清华代表团起草此祭文，痛悼这位本校在五四运动期间第一位捐躯的同学，也表达了自己的忧国爱国思想感情：

萃群祆于九区兮，莫赤匪狐；启层关以揖盗兮，瓯我版图；目负豕于道路兮，孰敢诣而张弧，徐君哀彼啜醨兮，距六衢以疾呼。君之居兮病在身，君之行兮不戚以嚬，君朝出兮莫来归。搴两旗兮风幡，宛言笑兮在耳，胡一夕兮已陈？念鲁难之未艾兮，何以慰兹忠魂？指九天以为正兮，誓三户以亡秦。谨陈辞而

荐醴兮，魂来享其无懂。

附：陈钦仁《徐君曰哲传略》(节录)："本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因外交失败，大难将临，举行示威运动，奋臂争先，共鞭国贼。清华僻处西郊，未克参与，消息传来，君投笔欢呼，击掌称快。五月十一日，本校通俗讲演团赴京演讲，君闻信加入，慷慨激昂，观者动容，听者变色。迨十四日，演讲团二次赴京，是时也，君已微有不适矣，然犹力疾从公，带病而往，虽赤日当空，精神不渝，言辞飚发，痛快淋漓。及晚返校，尚无大异。次日至体育馆游泳，凉燠不调，而君疾重矣。遂于十六日迁入本校医院。君虽卧病床褥，犹以国事为念，日必按时阅报，详询校中情形，尤期其于义勇队之组织。君之友人，以君体质素健，当无别患，不意君之疾日益深，逮月之二十二日，容消唇黑，辗转呻吟，呼吸急促，势极危殆。诸友人至，君犹曰'坐'，询以病势，则曰'没进步'。诸友人大骇，乃为延医京中，冀得挽救。讵知君已病入膏肓，竟于是日午后三钟有半，与世长辞。"(《清华周刊第五次增刊》，1919)

清华体育馆和图书馆，兴建于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九年建成，属校中四大建筑之内，在全国高等学校中也是不多见的宏伟建筑。图书馆有两个大阅览室，可同时容纳二百多人。体育馆有健身房、游泳池、篮球场、五十米跑道和多种运动器械。两馆图样都由美国建筑师设计，许多材料也从美国进口，外观和内部都极力欧美化，当时的清华同学都以此两馆为自豪。先生赋诗赞美外，还力倡要充分利用这两馆。《清华体育馆》中有："清华士子好身手，北方体育诸校群星我其斗。八年成绩堪不朽，诱掖鼓奖之功国家有。""国家不惜糜巨万，岂供吾辈为弄场？"《清华图书馆》中有"京师学校数百十，谁推秘府追东壁？大学充栋三万签，清华规模更无匹。""我生乃值廿世纪，北走名校窥石渠。河间真本此焉见，收拾闷籍二酉余。""何当长蝇系白日，假我数十空五车。"

《台湾一月记》，原著莫尔斯(Hosea B. Morse)。先生译此文，与愤恨日本霸占青岛同出一意。译文全文如下：

>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七月，中日开衅；明年四月十二日，马关约成；战事寝，中国割台湾澎湖诸岛以归日本。日人方经营满洲军事，不及入，台湾已厉兵相待。台湾固弱小，合步骑当计四万至六万。满洲战事毕，日人并力向台湾，以三月二十三日入澎湖，二十五日台湾澎湖下。
>
> 日人称克台时，战不烈，输械来降者千余人，各炮台营垒抗御亦不力。顾台北总督所接报告则曰："二十三日午候，日舰八艘进攻，诸炮台力御之。明日，敌舰沉者二，重创者二。越二日，晨三时，又来攻，我军坚守，敌不得逞而退。二十七[四]日夜，报挫，士卒窜退者可千人。日军初犹逡巡，后乃猛击，遂

以二十五日，尽夺我炮台，然两军损失皆甚巨"云。

三十一日，居民知台湾不列和议，佥大恚，以为见弃于朝廷，群疑腾沸，发怒如水火，誓死力拒。告诸吏，不得絷眷离岛，又悉发其素所攫取于民之财货，或日人之贿赂，及军械于民间，以资取用，于是日本公司遂有私为诸官吏收匿资财者。

总督有母，年迈，请离岛，许之。将行，传行李中藏宝货，遂击溃其扈从，包解，罄其藏。扈从复聚，则又追北之。次督署第三门，不得前，遂退，死者十六人(或作三十)，伤者五六十人。自是多巷战，然皆不烈。

四月二十一日，德大将及水手二十五名登陆保护侨商。五月二日，英大将亦以水手三十名至，有武装汽轮一艘，驶行 Twatutia 及 Tamsui 之间，又有英炮艇"红胸"号，德炮艇"臭猫"号，泊港内，Twatutia 之洋商亦咸震骇。某公司代香港汇丰银行存款甚巨，因台湾人民之请，又以战事发生，金融日紧，遂不能钞转他处。是公司距督署仅一哩，富于居蓄，咸以为苟有变，此必首受劫掠，公司中所佣华工制台湾茶者达千人，其间接为之役转运者亦以千数，以不欲此辈失业，又私赖有英德兵二三十人之保护，即不他徙，仍张其国旗，贸易如故。初居民闻台湾隶日本，咸忿激震恐，谣诼猬起。或传俄法德迫日人还辽东于中国，台湾亦且归中国，实则台湾公决，将递属于列强为殖民地，如塞勃瑞斯之于土耳其也。嗣以列强意稍弛，其议遂堕，然台湾人民之精神终以是益振，而挽留总督之志亦益坚。

五月八日，马关条约经中日两政府正式承认，日政府遂实行合并台湾，未几乃有应募之广东兵二千五百人，挟军火至台湾求战，以是知李鸿章所定和策之不满意于人也。

五月十六日，居民举代表数人入督署，要求悉以行政军备及财政权交出。是日午后，有正式宣告，又奏闻清廷，岛民仍愿奉正朔。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民主国宣布独立，其国旗蓝地绘虎，总督被选为大总统，坚辞不果，乃召集临时国会。列席之议员，日受俸金一先，人民咸大慰，列强亦无反对之表示。中国以新缔条约，故不加干涉。明日，各炮台举升旗礼，时有日舰数艘尚泊 Tamsui 也。

六月一日，清廷钦差李晋芳(一千九百〇七年至十年曾充驻英钦差大臣)偕法律及外交顾问，前美国国务卿 John W. Foster 抵 Tamsui，既得闻十日来之情形于莫尔斯君(Morse)，乃乘舟赴 Kelung，与日本海军大将完结交涉。时台湾诸官吏，除总统皆离岛赴华境。

日本政府闻台湾独立，即准备军事。三十日，日本禁卫军三千人抵 Aotikong，

去 Kelung 仅二十哩。是军乃事前遣赴满洲之后备队，未尝历战事，抵岛时，犹冬服。五月三十一日，日军与前至之粤军战于 Polon Point，粤军仅有毛塞枪及有烟火药，又饮食不给，遂败溃，死者达百人，日军死者仅十七人。六月三日，小战于 Kelung 城外，历时十五分钟，此外台民更无抗拒也。

Kelung 炮台守者满万人，大炮计十二吋口径者一，十吋口径者二，七吋口径者十。三日中午，日人来袭，咸自降。又日军驻台北（Tamsui）者约万五千人，防范甚密。

台湾民国既隳，四日晨，北部官吏悉自窜，士卒四出劫掠，居民大扰。

四日，台北督署先被劫，然骚及全城，Twatutia 居民三日内无幸免者，而豪族巨绅受害尤甚。七日，日本军至，居民皆悬日旗，大书日本帝国良民住宅。外国商民以有英德海军之保护，皆免于害。

Tamsui 受害最烈，作者皆目击其状，兹胪述于次：

官吏避乱者悉窜集于阿苏（Arthur），轮舟中，舟属台湾政府，计载重七百吨，是日凡容人二千五百。未启碇，叛军扬言苟启碇，即立沉之，船长被拘，夜深乃释，恐有水雷潜伏，不敢轻驶，盖叛军必留是舟，乃以不得饷，怨官吏富豪挟赀远去耳。

四日夕，Kelung 军至，则联 Tamsui 炮台于次日九时自岸上击阿苏，阿苏时距岸仅百码。日既莫，枪声渐稀，迄翌晨，炮弹复大哄。声隆隆然，如是者数小时。至午，台湾政府银行经理，悉出其所携之银四万五千元（约五千磅），令各叛军士卒分取之，每人获一月饷。犹以为未足，复拘系总督之侄于其宅中，旋逸去，则坼隳其宅。计是次避乱舟中，无辜死伤者，亦五六千人。

是日（即六月五日）午前，Tamsui 酣战时，叛兵去来倏忽，络绎不绝，岸上常驻兵亦三四千人，皆轰击阿苏者也。午后，阿苏仍不得启碇。自税关至河，不越五十码，武装兵士巡逻其间者数百人，意皆在劫掠，然私家财物，非食品，皆不犯。其有颜某某官衔者，皆攫取无遗，一若已有，至于税关营业，仍秋毫不犯。是辈亦知其中存现金数千元，鸦片值约十万元，而外人侨居中国，又虽号富有，顾余（作者自称，下同此）当时未曾令一外兵登陆，而叛兵终不敢相侵。余之司员有就叛兵谈者，则亦咸无激言，凡此者皆炮艇泊口内有以威之也。

是时商业尚不停滞，茶叶出口仍如故，自澎湖陷后（五月二十五日）港口闭，轮舶悉止口外，凡转货小舟，必经察验，无富绅官吏匿其间，或代运公款军火者，乃许放行。按清律税金悉入国帑，税关司员不得过问，惟是时银行司员，皆窜舟上，以是六月五日茶叶出口税，余不得不躬亲之。是日计得现金四千五

百元，厦门银行支票一万元。余方计其数，声锵锵然，恐为叛兵所闻，且不得运归，乃置，迳移金于税关。余之薪赀，固先存厦门，此四千五百元，乃于次夜之事，大有裨益。

先是步兵得金乃散，炮兵犹以为不足，仍沮舟不使启碇，且扬言翌晨必沉舟。午后，或匄余为调停人，余乃造炮台司令，司令称赀匮，已不能令其部下，苟得千金赎全舟生命财产，决其麾下勿扰乱也。

余羁于公事，恒留税关中。是晚九时返私宅，遇国家银行司员，台湾共和国外交总长，及著作家郑启彤将军，请余为说项，释阿苏出港，以济全舟生众。余问总督去向，皆曰不知，更问总督之侄，亦不知，总督之侄承总督命，来Tamsui传递消息，余又允保护其家族，故余欲之之心，良不后于救总督，又恐调停或不利于 Tamsui 及 Twatutia 之西人(妇稚早至厦门，此专指壮丁言)，乃谋于英国交涉员，皆决调停非上策，且颇望英国一等巡洋舰斯巴旦(Spartan)于次日抵埠也。余既返寓，总督侄适亦至，求保护，且言总督实匿阿苏船中，余既决为之助，洎余返海关，郑将军谓余曰："此事文明国亦有之乎？"余不觉失笑，此人之文明观念，余盖自视弗及也。

余计算余之赀财，得洋四千五百元，益以私蓄为五千元，于是遣二人诣炮台，其一为瓦特斯君(Waters)历任皇家炮队炮手，税关办事员，及台湾共和国炮兵教授，现避难于阿苏中，一为余之司员，赖廷格君，赖君机练强干，且娴中文，是日自请前往者也。二人之行，将洋五千元，请尽断水雷线，并以炮门交税关。以十时出发，出发后，余视积银累然，中心忐忑，至不怿也。半小时后，二人偕炮台司令官来，争辩二小时，始可。但面峡口有四十二吨大炮，其炮门必得款后，乃交出。司令官又请得驻阿苏舟中，余漫应之，告以彼身利害，余不能负责任。午后三时，水雷线断，炮门除大炮外悉交来。四时，大炮门亦至，余乃加以包裹，藏之栈中。彻晓，潮不至，不能行舟。八时，距河之南岸三千码，有过山炮飞弹至，德国炮舰伊尔提师(Iltis)反击之，遂止。八时半，阿苏始启碇脱险而出。

余既以金钱，易得一炮台，并一百六十吨之炮，皆实以药弹，为此炮台之主人翁者，凡三日。第四日，傍晚，方巡视与大陆交通之电信，遇电报局司机者，衣裳楚楚，将藉阿苏以离岛，余劝止之，且允保护其生命财产，一如余之中国司员，遂不行。明日复相遇于局中，时枪弹交轰，颇生畏惧，又将潜行以去，余又止之，保护之益力，且移其机械于余宅中，于是岛国与大陆之交通，赖以不断。其尤奇者，福州电局能辨及发报人之触法，非是人之电不收。是以日人占台后，亦必藉余及此司机者，以与其政府传递消息。

六月六日，被解散之中国兵群集于 Tamsui 市中，或微有余蓄，或无，然皆知祸变已亟，不自戢，且罹不测，故大势尚不破。七日皆散走境内。先是六日有三百人集余户乞饮食，咸身怀余资，以闭市不得饮食，又不欲出之抢夺。余乃称若能去武装，则饮食立至。然是辈无武装，即不能自卫，余又许为保护，于是武装悉去，余立命余之二随员，侍于院之左右，二人虽无武装，而气象森严，足令人生畏惧，故秩序卒不乱。盖是时三百余人集食院中，三五武装游兵椓腹立门外，以一二白人之故，卒不敢入，吾白人何令人畏惧若此哉。

上述二事，可见当时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概。未几，大势日平，居民亦渐安堵。

外人之杂居此地者，有英法德美丹麦人，Twatutia 商民咸受卫于新至之巡士。旅居 Tamsui 者，有炮艇二相卫，卫兵虽不登陆，然犄角相望，有响斯应，市面因以渐复故常。

六月七日，平明，日军抵台北。八日薄暮，先锋骑兵十八人抵 Tamsui。明日，午前，全军抵埠，是时中国兵已溃，日本兵服毡屦，往来烈日下，窜芟残丑，而北部以粗安。台之南部，刘永福之军在焉。至十日，日军至，与战，大败，全军尽没，于是台湾不复为中国有。

是役交战者咸旧军，不由训练，枪械不完，饷亦不给。李鸿章所训北军差胜，然一望日军，辄走。此后所制新军，颇受识者称美，他日陆军之振兴，将惟是之赖乎。

八月五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闭幕式，到会者两百余人，有上海各团体来宾、外国领事、报界人士等。孙中山先生莅会并演说。这是先生第一次聆听孙中山演说，留下极深刻印象，二十五年后先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西南联大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上，还谈到："那年暑假到上海开学生总会，周先生(炳琳)代表北大，我代表清华到上海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3册，第535页) 孙中山演说有一小时之久，"其大意略谓：现在中国最大弊病在不能统一，各界莫不皆然。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故望学生能力图统一，以促进人民之团结，知有国家而牺牲个人云云。"(《全国学生联合会之闭幕会式》，《申报》1919.8.6) 曹慕管、邹静斋、张子廉、包世杰、王大伟、温世霖、沈卓吾、田梓琴等各界人士亦相继演说。

八月六日 清华学校本年赴美同学齐集上海，是日清华学生同学会在东亚旅馆开话别会，主席陆梅僧，先生亦参加。"席间复有种种游戏及各样声乐以为余兴。次为赴美学生代表答词、合唱校歌、三呼万岁，复同摄一影，尽欢而散。"(《清华赴美学

生消息》,《申报》1919.8.7)

在上海,有诗四首,除《齿痛》外,还有《夜坐风雨雷电交至凛然赋此》、《上海寄弼弟》、《朝雾》,均编入自编古诗集集《古瓦集》。

《夜坐风雨雷电交至凛然赋此》为:

暗淡虞渊玉虎追,飞廉蹙勒泻来迟;
文书小阁邀孤檠,车马长衢听折箠。
天地不仁悲李耳,风雷有意动宣尼——
而今十手虽无畏,懔懔能忘天怒时?

《上海寄弼弟》为:

南游载霁月初弥,迻译文书叹手胝。
不谓"老饕"几绝粒,翻因微病得吟诗。
东阳思苦腰能瘦,季子囊空面未黧,
寄语子由相告慰,联床风雨近前期。

《朝雾》为:

倚楼学熊经,玉露涂空廛。
朝日初到地,草际浮轻烟。
万绿浑一气,粉彩霾新鲜。
微飔拂长空,湿雾纷腾褰,
楼□忽中截,一角当空悬。
长啸发幽籁,清商入云天。
似闻答响者,不知何处边。

是月上旬　先生与诸友离开上海,前往常熟,为建立全国学联会所筹募资金。钱宗堡、吴泽霖均为常熟籍,到他们的家乡去募捐可能会顺利些。

此行作了古诗数首。《昆山午发》、《自言子文学书院射圃谒言子墓》、《辛峰亭远眺》、《寻桃源石屋二涧皆涸溯石屋上游乃得水因濯足焉》、《维摩寺》、《北郭即景》六首编入了是年十一月编辑的《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从诗中可知先生的行程。

先生等先到昆山,再乘船至常熟。《昆山午发》:"半日疲车驾,风尘顿仆仆。停午发昆山,登船如入屋。"

到常熟后曾游虞山。绵延秀丽的虞山,东端伸入县城,素有"十里青山半入城"的美誉。山上古迹众多,先生主要看的是东部古建筑。《自言子文学书院射圃谒言子墓》,抒发了先生对言子——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的敬慕。顺山路登

山，即辛峰亭，这里左可观常熟城，右可见淼淼湖水，《辛峰亭远眺》："礼墓得奇趣，造极鼓余勇。细草受芒鞯，赋滑如踏氈。路穷值孤亭，天风趁云涌。一山压半城，二水浮双珙。尘闤骈群栉，逼视高塔竦。……"维摩寺是虞山主要寺庙，在最高峰处。《维摩寺》赞美到："维摩古寺天下名，金粟堂前午荫清。山禽楚雀皆梵响，金灶石坛非世情。说法天仙思缥缈，随缘万鬼忆狰狞。游人不识广长舌，小立清溪听赞声。"先生还在雨后游了著名的桃源涧，但很败兴，直到石屋涧源头才看见泉水。《寻桃源石屋二涧皆涸溯石屋上游乃得水因濯足焉》："昨夜闻倾盆，沥沥直达卯。心知二涧涨，急流想淼淼。鹘步乘兴健，笑语入窅窈。日中抵桃源，积石赪枯燥。更进探石屋，龟坼蒸郁燠。枯鱼叹未休，上游发渟潦。清泉不可求，得此亦绝倒。因之咏沧浪，濯足弄浮藻。"先生在这儿还作了画："硬黄不盈尺，写图复草草。"诗末又少年意气："慷慨起浩歌，旧邦赞新造。再歌颂紫白，休誉慎相保。曲止继狂呼，曳履向归道。回首众青山，云收白日皎。"

在常熟，受到吴泽霖、钱宗堡、浦薛凤的招待。吴泽霖说："暑假期间，闻一多与罗隆基等人代表清华学生会与北大学生会代表等一起到上海参加全国性学联会议。我和熊祖同被推为留守清华的负责人，因此没有同他们一起南下。后因我家中有事，曾回返常熟一次，刚巧那时一多与罗隆基等几个人前来常熟，我就同另外两位同乡级友钱宗堡、浦薛凤招待了他们。"（吴泽霖给编者的信，1986.5.15）

在常熟等地募捐，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先生没有北上，而是返回了故乡。

八月二十六日　与闻家驷、闻家骏、闻家驹离开浠水至黄州。闻家骏将东下，先生等则乘轮至汉口。

八月二十九日　至北京。次日返清华学校。

八月三十一日　致闻家骥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言父母"撑持家政"，"有无米难炊之忧"。

九月中旬　清华学校开学。先生升入高等科三年级。继续担任《清华学报》中文编辑。时，《清华学报》编辑部教员部国文编辑为戴元龄、左霈、汪鸾翔先生，学生部总编辑仍为赵学海，国文编辑还有国文编辑：洪绅、曾昭抡、陈复光、王箴、萧公权、李幹、段茂澜、聂鸿逵、周兹绪、浦薛凤、张锡禄、潘光亶、蔡公椿、闻亦传、吴景超、裴庆彪。（《清华学报》，《清华周刊第六次增刊》，1920.6）

是月　与杨廷宝、方来等发起组织美术社。

该社成立约两年多时间，其活动《清华周刊》有所介绍。《美术社》云："在一年前就有了美术社，不过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去年九月，由杨廷宝、方来、闻多诸君发起组织正式的会，一方面读中外美术底书，一方面练习各种画，于是召集了

会员二十余人，议定章程，开了成立会，公请司达女士为教师。习画时间系定于每星期六上午，所习的画分铅笔、水彩、钢笔、炭油等类，此外兼习静物写生、花草写生、野外写生及想像插画等。至于所阅的书系由各人认定一门，就一门内专考求他的源流、变迁，及现在的情形。所阅的书，由司达女士指定，于每月常会时报告一次。各人所认定的题目，大半是中外古代织物图案、磁器图案、塑像、金属图案以及美术史等类。所有应用各书籍，由图书管理员置于特别贮器书架。以上是内部组织的情形，及进行的方针。下面是关于会外的练习及讲演二种。在去年寒假期内，曾设有特别清寒画室，无论何时会员均可随意练习，寒假完了，此室亦取消。自此室取消后，会员鉴于平时练习时间太少，于是设一个永远的画室。水彩、铅笔及钢笔等画，均置于该室内，其一切置□，都由杨君廷宝管理。除每星期六正课外，每月有常会一次。会序有报告、演讲等类。报告系由会员将平日所看的美术书或详细调查，向大家报告。演讲一层，不必每次都有，不过间一次或二次，由司达女士演讲欧洲美术史、太西塑像美术等类，并佐以幻灯片指示一切。"(《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1920.6)

又，《美术社》亦云："一九一九年秋天，教师司达尔女士示意于闻一多、杨廷宝、吴泽霖、方来等发起一个美术社。起初会员有二十余人。他们的职员有会长、书记、会计并会所管理。他们的进行方法分两种：一实习，二研究。实习每星期自二小时至四小时。所用的画具有铅笔、钢笔、水彩、油彩、木炭等。所作的资料有静物、花草、人物同户外写生、插画及图案等。关于研究便是考阅书籍。社员各择一题研究其源流、变迁及现状，作为报告，于每月常会时宣读。所择题目多系中外织物图案、瓷器图案、雕塑、绘画、美术史及名家传略。每月常会除读书报告以外，间有用幻灯演讲泰西绘画及雕刻等题。他们有一个画室 Studio 以备平时非常实习时间工期中用。以上是他们第一年的情形。一九二〇年秋天他们于形式同具文上稍有更改。关于宗旨，则除实习研究外，加了宣传美术一条。关于职员长则废除社长，留书记、会计兼干事及画室管理各一人。这年底会员到五十多人，分两班练习，有时还分三班。他们的成绩还是在实习方面。有几位国内名家看见他们这几年的作品曾讲过，不独是国内各普通学校所望尘莫及的，便是有的美术专门学校也很难同他们比肩。但是他们于作品研究方面，完全是个失败。至于宣传底成效也只有些微的痕迹可寻。会友间有鼓吹美术见之文字的，城里几次各处的展览会，他们带领了许多同学去参观了，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可讲的。"(《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

十月六日　致父母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报告大考成绩和本学期功课："大考成绩已揭晓，男成绩如下：英文读本中，作文上，历史中，地质上，代数末，

中文作文超,图画超,文学史上。本学期所习功课为:英文(每星期四点),法文(四点),社会学(二点),政治学(二点),生物学(六点),中文讲文(二点),法制史(二点),阅书(一点)。"

是月上旬 辛酉级职员选定,级长罗隆基,先生担任书记。《清华周刊》报道云:"高三级长本由薛君祖康、熊君祖同两位中复选,继以二君固辞,遂另选罗君隆基任本期级长之职。其余职员亦均选定,书记为闻君多、熊君祖同,干事为王君德郅,级室管理为方君来,会计为沈君有乾、吴君宗儒"。(《校闻》,《清华周刊》第 174 期,1919,10.19)

十月十七日 出席《清华学报》中文编辑会议,筹商本学期进行事宜。(据《清华周刊》第 174 期,1919.10.19)

十一月一日 晚七时,辛酉级级会召开第一次常会,议决"暂停演说等竞赛,而以研究新学说及讨论时事为本年进行方针"。(《清华周刊》第 178 期,1919.11.16)

辛酉级会于上星期六晚七时,开第一次常会。"首由会长时昭泽发表进行意见,并请会员讨论办法。后由多数议决暂停止演说等竞赛,而以研究新学说及讨论时事为本年进行方针,凡开会之前一星期由会员提出关于新学说无或时事问题,择其中之一为标准,至开会时各表所见,互相讨论,以增进常识。"会上"拟定欧洲和会条件为下期讨论之题目"。(《校闻》,《清华周刊》第 179 期,1919.11.28)

十一月十四日 作新诗《雨夜》、《月亮和人》。这可能是先生最早的新诗作品,后均编入自编诗集《真我集》。[①] 此两诗编入《红烛》时,均有改动,后者还改题为《睡者》。

十一月十六日 作新诗《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编入《真我集》。沈尹默的诗刊于是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先生读后不禁想起病逝的小妹。诗中说暑假里一个晚上,听见母亲提起小妹,"我忽然觉得屋子起了一阵雾,灯光也发昏了,书上的字也迷糊了;温热的泪珠一颗颗的往我的双腮上淋着"。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晚七时,出席辛酉级级会第二次常会,"讨论题目为'和约'"。(《清华周刊》第 179 期,1919.11.28)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与全校同学入城参加两万人大游行,抗议十六日日本暴徒制造的"福州惨案"。

---

① 《真我集》所编诸诗一般均署有日期,但均未署年份,然据先生编《红烛》与《死水》习惯,一般按写作时间排列顺序,故暂系于是年。

是月　《建设的美术》发表于《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这是先生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只刊登了前半部，即前言和第一部分“振兴工艺的美术”。它似乎是在美术社活动中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美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前言云：

> 世界本是一间天然的美术馆。人类在这个美术馆中间住着，天天摹仿那些天然的美术品，同造物争妍斗巧。所以凡属人类所有东西，例如文字、音乐、戏剧、雕刻、图画、建筑、工艺都是美感的结晶，本不用讲，就是政治、实业、教育、宗教也都含着几层美术的意味。所以世界文明的进步同美术的进步，成一个正比例。
>
> 文明分思想的同物质的两种。美术也分两种，有具体的美术，有抽象的美术。抽象的美术影响于思想的文明，具体的美术影响于物质的文明。我们中国对于抽象的美术，从前倒很讲究，所以为东方旧文化的代表；对于具体的美术，不独不提倡，反而竭力摧残，因此我们的工艺腐败到了极点。
>
> 欧战完了。地球上从前那层腐朽的外壳已经脱去了。往日所梦想不到的那些希望，现在也不知不觉的达到了。其中有一种反抗陋劣的生活的运动，也渐渐的萌芽了。欧美各国的人天天都在那里大声急呼的鼓吹一种什么叫作国家美术(National Art)，他们都说无论哪一个国家，在现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代——科学进步、美术发达的时代，都不应该甘心享受那种陋劣的、没有美术观念的生活，因为人的所以为人，全在有这点美术的观念。提倡美术就是尊重人格。照这样看来，只因为限于世界的潮流，我们中国从前那种顽固不通的、轻视美术的思想，已经应该破除殆尽了。况且从国内情形看起来，像中国这样腐败的工艺，这样腐败的教育，非讲求美术决不能挽救的。现在把怎么挽救这两样东西的方法，同为什么要挽救他们的道理，稍微讲一讲，可见得美术不是空洞的，是有切实的建设力的。

是月　新剧社从演剧余利中抽出票洋七百七十元、现洋四十元，赞助成府贫民小学。(《学生方面·德育·社会服务》，《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　这是清华学生继一九一六年在北京城内青年会募捐演出后，给予成府贫民小学的第二次经济支援。

十二月中旬　清华学生会正式成立，先生被推举为辛酉级代表之一。这是清华学生成立的第一个永久性自治机关，以代替此前诸临时代表团。

学生会分评议、干事两部，前者为最高决策机构，后者为执行机构。学生会设

总务、交际、文牍、会计、新闻、干事六科，先生担任文牍科主任，潘光亶为副主任。（据《清华周刊》第183期，1919.12.26）

十二月二十三日 清华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校长张煜全只许可成立级会一类的组织，不准成立全校性学生会，并派校警干涉大会进行，引起公愤。学生会宣布罢课，先生作漫画"垂床听政"，讽刺张无病久养，不理校务。这就是清华校史上的"一赶校长"，不久，张即离开学校。

张煜全是周诒春校长被诬辞职后，于一九一八年四月被外交部任命为校长的。但他经常因病请假，很少与学生见面。吴景超说民国"八年的上半年，他简直在病榻上度日。我们且看看他的次数。八年一月，他以鼻血不止，请假二十日。三月，以咯血请假一个月休养。四月，再请假一个月，五月，又请续假二十日。一直到了六月十六日，才报部勉强视事。学生对于这个多病的校长，早就不满意了，所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学生会开成立大会受他干涉的时候，便激成罢课的风潮。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张上书辞职，略谓'办理校务，未见偷安，才其整顿觉，不图适以集矢，近虽勉力支持，然以久病新痊之躯，实难当上艰巨之任，自应退避，以让贤能。'一月三十日，部令准张辞职，同日派罗忠诒为校长。"（吴景超《清华的历史》，清华周刊社编《清华生活》，1923.4.28）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晚八时，至高等科食堂参加全校年终俱乐大会。"是夕晚餐毕，各同学皆连袂而往，济济一堂，共庆新年。当时并有本校军乐队及滑稽之影片以助兴。至十二句钟始散。又是夜全校电灯通宵不息，以便诸同学散会后，开各团体之俱乐会及各种之游戏，以尽一夕之乐云。"（《校闻》，《清华周刊》第184期，1920.1.9）

一九二〇年　二十二岁

七月，直皖战争爆发。二十三日，直奉军进驻北京，共同控制北京政府。

八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上海印刷。

是年，北方各省大旱，国内开展大规模赈灾活动，国际社会也给予援助。

一月八日　清华学生会决定改新闻科为出版委员会。是日，出版委员会议决改良《清华周刊》。二十日，出版委员会提出改良条件："一改封面，二改门类，三不取陈古文，四用标点，五采横写法，六改编辑制为集稿制，每期一人负责，次期者助理。由评议部选出集稿员十二人。"（潘如澍《清华周刊小史》，《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先生被选为集稿员。集稿员的产生首先经过全体学生初选，再经学生会复选。

一月二十二日　《清华周刊》集稿部成立。会上分工，暂定每两人负责编辑一期，先生和潘光亶合编第五期。其余还有时昭瀛、陈石孚、施滉、董凤鸣、吴景超、周念诚、黄方刚、裴庆彪、何浩若、罗隆基，分组编辑各期。（据《本校一年来大事记》，《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1920.6）次月，集稿员又增加到十八人。同时出版委员会修订《周刊》改良条件，为：一集稿员十八人每学期改选，二经理五人每学期改选，三取消顾问，四取消英文校闻，五稿件由全体同学负责。

三月中旬　与潘光亶、吴泽霖、闻亦传四人组成一个小团体，主要进行交流读书报告和开展问题讨论，后来增加了刘聪强、孔繁祁，一共六人，便取名"亅社"。这个团体人数不多，"每周集会，读与讨论具备，但是富于讨论的色彩。该社产生虽然不久，会录亦很可观。"（沈干、翟桓、周念诚《本学期会务一瞥》，《清华周刊》第185期，1920.4.24）

暑假前，亅社曾向全校介绍了他们的情况。《亅社》云："亅社在今年三月中方始成立，从产生到现在，还不过三个月，成绩当然是很幼稚，起始的时候，会友只有四人，后来才加到六人。当时我们议决，不立名称，但是后来同别人接洽的时候，实在不便，因此采'亅'字做我们的标帜。我们采这个'亅'字有二层意思，'亅'字是古'上'字，借此以时时上进自勉，我们的会友是六人，'亅'字恰是我国数目中的六字。我们没有职员，每次开会只有记录一人，大家轮流充任，他就是会中的临时主席。

每星期开会一次，时间在星期六下午四时半，每次限二点钟——一半时候作报告用，一半作讨论用。每次开会有三人任读书报告，三人任预备讨论。每人恰好二星期轮到一次。每次开会大家准时而集，有时也有因为别种冲突要改期的，然大半我们宁可牺牲个人的事，来到这会。我们的读书报告，是就各人的读书录中，摘取要者，编制成的。起初是就成本书为范围，但是现在的趋向是不限于一本书。我们的问题讨论，起初完全是一个失败。因为预备讨论的人多，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有完善的预备，发言很没有中心点，有二三次弄到没有结果，到时而散。近来改为每次一个人专预备一个问题，详细写出来，到开会时宣读，别人再就他的报告上讨论，此法一直行到现在，还可以说是有一点小小的成功。我们的读书报告、问题讨论，都写在一种同样式的纸上，三个月来，合在一起，也有一百五十余页了——这就可以算是我们的成绩。我们开过十次常会，计有读书报告十六编，问题讨论六编。它们分起类来，是：读书录：历史 2；娼妓 2；美学 3；经济 2；文学 5；哲学 1；农业 1。问题讨论：称谓姓氏 2；校内问题 2；服饰 1；中国目录法 1。我们会友有一种通病——只说不做——虽然别人指点我们，我们亦有时觉得，想战胜这个病，但是因为时势同环境的关系，总不能免，我们希望，以后尽力革除这病。"(《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1920.6)

"⊥社"这个名字，是先生提议的。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他提议这个组织称作'⊥社'。我们都不认识这个字，他说，'这是古文上字，与尚字通。纯朴的水木清华，不应该遭受那种颓唐、靡朽的风尚所侵蚀。由出自民脂民膏的公费培养出来准备出国深造的青年，应该保持良心的纯洁性。我们是⊥社人。他们不认识⊥字，让他们莫测高深吧！'"(《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163 页)

吴泽霖还回忆说："关于⊥社最初并不想搞什么组织形式，这些人本来都是知己朋友，天天混在一起的，用不着什么组织形式。其所以要有一名称而且取名⊥社，主要是一多和光旦的主张，旨在玩弄别人，使人看到'⊥'，既不会读，也不知什么意思。当时我们反对学校连续放映恐怖性质的电影，我们当时很反感，认为没有教育意义，徒然浪费宝贵的时间。当然也有人反对我们的主张，背后风言风语，说我们是一批怪物！我们赌气地说：'我们是怪人，⊥不是怪字吗？你们认识都不认识！'"(吴泽霖给编者的信，1987.7.30)

潘光旦《谈留美生活》："我们在清华时，六个同学成立了一个'⊥社'。闻一多也在内。⊥即古'上'字。这个社什么都管，电影不好，我们提出批评；有人上厕所不守秩序，屎尿撒在外边，我们也管。"(《文史资料选辑》第 71 辑，第 200 页，1980 年 10 月出版)

是年春 《清华学报》"总编辑赵君学海满任，校中派闻君多继任。闻君复因事

辞职，校方一时未能再派，故学报进行遂停顿"。(《本校一年来大事记》，《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1920.6)

是年春　作新诗《雪》。编入《真我集》，收入《红烛》时有较大改动。

这是一首应课诗，不料引起教师赵瑞侯的批评。原诗编入《真我集》时，下附小注，云："有一次作文课底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赵瑞侯先生底评语讲：'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真是可笑，特地把他录下来。"

《古瓦集》卷首序亦云："一九二〇年春作了一首应课诗，赵瑞侯先生评曰：'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这时已经做了很多的白话诗。第二次月课勉强用文言文译《点兵行》，是敷衍面子的。"

《点兵行》收《古瓦集》，有序，说明文言译诗难以成功。序云：

> 读工部《兵车行》，拟书所感，久而不成。适见英人坎白尔《点兵之歌》，其写战事惨况，亦复尽致，以视杜作，特异曲同工尔，爰译之。译事之难，尽人所知，而译韵文尤难。译以白话或可得其仿佛，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今之译此犹以文言者，正使读者得持以证原作，乃知文言译诗，果能存原意之仿佛者几何？亦所以昭文言之罪也。

赵瑞侯名玉森，字瑞侯，自号醉侯，一九一六年任清华学校国文教师。他很器重先生，曾对人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赵同《醉人为瑞——记我的祖父》，转引自浦薛凤《读赵醉侯老师"醉人为瑞"遗诗集稿书后》，《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17册，第14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 此四人即先生与罗隆基、浦薛凤、何浩若。多年后，赵瑞侯还赋诗云："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翔颂声和。"(《梦与清华高等弟子共论文》，同前，第140页)

是年春　学校指定先生为《清华学报》总编辑，旋辞之。"今年春，总编辑赵君学海满任，校中派闻君多继任。闻君复因事辞职，校中一时未能再派，故学报进行遂停顿。当闻君辞职时，正是学生会有人提议改良，拟将中文学报改为清华月刊，英文的改为季刊，编辑制换为集稿制，其中种种进行及组织，未能一时定好，所以这下学期不能出版，已经出版的只有上学期的中英文学报一本。从下学期起就实行变更的制度做照旧出版。"(《清华学报》，《清华周刊第六次增刊》，1920.6)

四月十九日　上社"第六次常会，报告题目有《中国古代娼妓史》、《梅特林克底戏剧》及《欧战原因》，讨论题目为《如何补救清华学生底细行》"。(《清华周刊》第186期，1920.4.30)

四月二十四日　《清华周刊》第一八五期起实行集稿员制。集稿员设主席一人，首任主席浦薛凤，其只担任了一个月，五月二十九日起由先生接任。

同日 《旅客式的学生》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一八五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该文是对清华一部分只是等待出洋的学生的一幅文字画像，先生认为这也应是清华改良的内容。文中云：

洋楼、电话、电灯、电铃、汽炉、自来水，体育馆、图书馆、售品所、"雅座"、电影，胡琴、洋笛，中西并奏，象棋、"五百"，夜以继日，厨房听差，应接不暇，汽车胶皮，往来如织——你看！好大一间清华旅馆！"只此一家"，"中外驰名"的旅馆！如何叫他的生意不发达呢？于是官僚来养病，留学生来候补差事，公子少爷们来等出洋——我说"等"出洋，不是预备出洋。旅馆的生意好了，掌柜的变大意了！瞧不起旅客了。旅客不肯受他的欺负，就闹起来要改良旅馆。诸位！想一想，你们旅客有什么权柄可以要求旅馆改良！你们爱住不住！你们改良了旅馆于你们有什么利益？等到旅馆改良了，你们已经走了。

中国有一位文学家讲，"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呸！这是什么话？中国的文化底退步，就是这般非人的思想的文学家底罪孽。人类是进化的。我们生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天性叫我们把这个世界造成如茶[荼]似锦的，所以我们遇着事，不论好坏，就研究，就批评，找出缺点，就改良。这是人底天性，没有这种天性，人不会从下等动物进化到现在的地位，失这种天性，社会退化到本来的地位。

我们把眼光放开看，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学校是社会里一种组织，我们应该改良社会，就应从最切近的地方——我们的学校做起点。学校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旅馆。学校之中，学生是主体，职员、教员、校役都是客听。对于学校，我们不负责任，谁负责任呢？有人自视为世界的旅客，就失了做人的资格；有学生自视为学校的旅客，就失了做学生的资格。

旅客式的学生有三种。对待他们的方法有四种。实行这四种方法，才是真正的改良。

（一）旅客式的少爷学生。贵胄子弟，自己可以出洋的，年纪太轻，不能立刻出洋，先要在本国等一等！但上了别的学校，又太吃苦了，只有清华旅馆里"百应俱全"，刚合少爷们的身份。所以他们除了打球、唱戏、"雅座"、售品所以外，不知道别的。对于功课，用"满不在乎"四字了结他。横竖他们是不靠毕业出洋的，他高兴几时走，就几时走。这种旅客式的学生，是人人承认的。

（二）旅客式的孩子学生。清华中等科底学生有住过高等小学的，有住过初等小学的，有住过幼稚园的，有什么也没有住，乳臭未干的婴儿，总之真正高

小毕业，刚合中等科程度的有几个？这般同学，当然[不]能怪他们没有成人的思想。等他们毕了中等科的业，到高等一二年级，还是年纪很轻。就算到了成人的年岁，还脱不了孩子气。他们初进学校的目的，固然跟少爷学生不同，不过他们的行为跟少爷们一样的。他们年幼连自己本身都顾不了，还说别的吗？

（三）旅客式的书虫学生。有一般人本知道学校应该改良，但是出洋问题要紧。功课一急竞争的烈，每天点洋烂[烛]的工夫都不够，不用说别的。所以他们目击各种腐败的情形，也只好叹一口气道曰："没有法子！"这种学生，也是旅客式的学生。他们是读书的旅客，同那打球、唱戏、"雅座"、售品所的旅客，不过是臧与谷底比例。

以下是整顿旅客式的学生底方法。

第一种旅客式的少爷学生可算是不可救药了。他们横竖不是来念书的。如果要住旅馆，他们有的是钱，六国饭店，比清华旅馆舒服得多呢。

第二种，对于旅客式的孩子学生，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没有到上学的年纪，最好是不要来，免得他们的父母担忧。他们上学还要带听差来替他们铺床叠被，收检衣服；他们不会用功，还要请高等科的学生当他们的"指导员"。清华中等科不是幼稚园，高等科的学生，也不是来替人家管孩子的，这些幼稚园的儿童应该送到幼稚园里去。

第三种，旅客式的书虫学生，我们只好鼓励他们，劝他们，把读书的勇气，分一点到书本外头来。

第四种，在学生一方面，固然应当自己觉悟，打破这种旅客式的思想，但是学校一方面，也应当有一番整顿，使得那些旅客式的少爷、孩子们，不会混到学堂里来，并且同时解放这种玉成学生底[奴]隶性的积分制度，庶几学生不致把一切都牺牲到书券[卷]本里去了。

同日　夜，作《出版物底封面》。发表于是年五月七日《清华周刊》第一八七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该文撰写以周刊封面改换为诱因，述对封面装帧的看法。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一多与予，先后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予主持时，心血来潮，曾自绘紫白两色相间长条之封面。周刊经理沈镇南同学因节省时间，未将样本送予过目。刊发以后，一多认为色式两劣，大加批评，并当面向予指摘。予素知其个性，不以为忤，只谓吾清华校旗系紫白两色，用此乃是表示爱校，印刷厂所用紫色太深则有之，倘色泽浅淡，当较雅静。数周之后，予即自动改换封面，并另换新型图案。"（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7）

《出版物底封面》对那一期周刊的封面设计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认为“违反图案底组织底要素”，“违反图案底实用基础”、“与本书内容无连属或象征的意义”、“字没有艺术底价值”、“三样色彩，太费经济，仍无益于美观”。文章主要部分是起草了一个封面设计的批评大纲：

我要批评的不只《周刊》，凡我所见的目前社会上底出版物（专指杂志之类）都在内。现在先把这个题底各方面讨论一下，作批评底背景。我没有工夫详细地说明，只得写一个大纲。

（一）出版物底封面图案底价值。

（甲）主体的。

1. 美的封面可以引买书者注意。

2. 美的封面可以使存书者因爱惜封面而加分地保存本书。

3. 美的封面可以使读者心怡气平，容易消化并吸收本书底内容。

（乙）客体的。

1. 美的封面可以辅助美育。

2. 美的封面可以传播美术。此外还有别种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价值，不胜详述。

（二）中国出版物底封面图案底艺术不发达底原由。

（甲）艺术不精。

（乙）印刷不良。

（丙）发行者底经济不足——推源还是社会生活程度太低。假使买者能出高价买，发行者当然肯费钱印华丽的封面；横竖他们总不会亏本。

（丁）以前的书籍没有美术的封面底习惯——结果，现在的社会没有美术的封面底要求。

（三）补救底方法——这层，我只能在艺术上着手。别的方面，不是作这篇文底本旨底范围以内的。

（甲）美的封面图案底要例——图案是广义的，不专指图画底构造，连字底体裁、位置，他们底方法，同封面底面积，都是图案底全体底元素。

1. 画底要例。

A. 须合艺术底法义——如条理（Oder）、配称（Proportion）、调和（narmony）等。

B. 须与本书内容有连属的或象征的意义。

C. 不宜过于繁缛。

2. 字底要例。

A. 须清楚。

B. 总体须合艺术的法义。

C. 宜美术的书法(除篆、籀、大草外)——刻版的宋体同日本式方体字宜少用。

D. 最忌名人题签——除非他是书法名家。

E. 集碑帖可以用——不可太背 A、C 两条。

3. 面积的要例

A. 宜长方,忌正方。

恐怕还有许多要点不能尽举,只待图案的作者用他的脑经[筋]去酌定。总而言之,图案是一个专门的艺术,不深知艺术的,不宜轻试。

四月二十五日　上社"第七次常会,报告题目有《美底教育》、《经济思想底历史》及《姆士底学说》,讨论题目为《称呼问题》、《长姓问题》及《服制问题》"。(《清华周刊》第 186 期,1920.4.30)

先生在名字中加了"一"字,大约即在讨论称呼问题这一时期。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一多既取了单名,人们只能连名带姓一起叫他,根据那时的传统,这是对人的不恭敬,于是他决定换一双名,就同一些级友商量是否可以在'多'字前后加一个简单字。当时潘光亶和我同时与他半开玩笑地说,前面加个'一'字,不是再简单不过了!他一听,立刻跳起来说,'好,一多既好写,又易记,以后就叫我一多好了!'可是教务处不让改,因为学生名册已上报教育部。但他并不灰心,总是说,坚持就会胜利。每逢外国教员或新教员上课点名时,他总是说,多字前面还有一个'一'字,试卷上他总是写闻一多。每逢发榜或布告有他名字时,只要有可能,他总是设法去添上'一'字,墙报上他所发表的文字、白话诗或插图都署名'一多'。日久以后,人们也就把闻多这个旧名逐渐忘记了。快到毕业年头,学校终于正式承认了他的新名,在证书和同学录上所印的是闻一多而不再是闻多了"。(《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162 页)约在这时,潘光亶亦改名为潘光旦。

五月十二日　作新诗《朝日》、《雪片》(译 Mary mapes Dooge 诗)。均编入《真我集》。

五月十四日　作新诗《率真》、《忠告》。均编入《真我集》。

五月十五日　作新诗《一个小囚犯》。编入《真我集》。这首诗仿佛是先生小时候的经历和感想。说某年四月在外边玩耍,跌了一跤,弄了一身泥污,结果被母亲关在家里不让出门。一关两个月,竟关出病来,于是又得饱尝药味。诗中描写一个孩子要冲破幽禁,渴望到大自然天地中呼吸新鲜空气的心声。

五月十七日 作新诗《伤心》、《志愿》(译 Wishes by Besworth Crocker 诗)。编入《真我集》。

五月二十二日 作新诗《黄昏》。编入《真我集》。后发表于十月二十二日《清华周刊》第一九五期时,有较大改动。收入《红烛》时又有修改。

是月 上社讨论"暑假里做些什么"。(《清华周刊》第 189 期,1920.5.21)

是月 约这时,有致闻家驷信,现存前半函。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写信很可以用白话,并且告诉我你求学的心得。白话文现在已经通行了。"又鼓励闻家驷投考清华中等科二年级,并将应试的功课都开了出来。

六月 暑假。返武昌,换乘小火轮至巴河,回望天湖畔老家。

七月一日 作新诗《晚霁见月》、《所见》,又译韩愈古诗《南山诗》为新诗。均编入《真我集》。

七月十三日 作新诗《西岸》,发表于九月二十四日《清华周刊》第一九一期。收《红烛》。这是先生生平发表的第一首新诗。

是年暑假 新诗集《真我集》大概编于此时(集中没有此后所作之诗),共收十五首。另有一首已编入后又被删去的《一句话也不讲》,后来亦未再发表,特录如下:

太阳辛苦了一天,才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
喜得满脸通红,一直的向山洼里狂奔。
这时候窗子外边笑语歌呼的声浪,
一阵阵的往窗子里边淌。
但是窗子里边坐着我们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讲。
因为我们喝醉了彼此的秋水一样的目光,
所以就知道低着头微笑,一句话也不讲。
一本远古的诗集放在桌子上。
有时两双眼睛都对着这本书上看。
但是我们总是一句话也不讲。
呵!莫非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志趣,我们的怀抱,
都已经被这位诗人替我们讲过了吗?

假期中,上社成员采用通信方法讨论"本社进行底改良、隔词法、伦理主义和基督教等等"。(《上社》,《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

九月上旬 暑后开学,先生升入高等科四年级,这是清华旧制的最高年级,毕业后即可放洋。升入这年级的同学,都搬到一所设备齐全的宿舍,为的是让同学们体会一下国外的生活。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将届毕业之一学年,予与一

多同住高等科楼上宿舍一大房间。高等科一二三三个年级同学，均由学校分配，住入前后排列之中式宿舍，正中有长廊贯通，无数房间则在长廊左右胡同之内。惟行将毕业之高四级，则可移住西式建筑之高等科入门右边楼上与楼下。每一房间装置暖气设备，一到冬季，户外尽可北风怒号，积雪冰冻，而室内则仍和暖如阳春。此外，另有西式浴室与抽水马子。寝室之中，每人使用大书桌、小书架各一。窗户宽大而光线充足。一多与予共住长方形之最大一间，各自觉得享受。"（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7）

开学后，仍任《清华学报》中文编辑。暑假前，《清华学报》已决定改编辑制为集稿员制，在集稿员未选举出之前，由先生与罗隆基、何浩若、潘光里、吴景超五人负责集稿，并已着手集稿。暑假中，他们又进行了许多联系。但是，开学后竟然没收到一篇稿子，这让先生等很是不满，吴景超甚至还主张取消《清华学报》。吴景超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学报》新集稿员未举出之前，集稿的责任是同我五人担任。我们在暑假之前，就着手集稿。我们对同学说，你们的稿子，不问是那一门，那一类，交换智识的稿子也好，发扬学术的稿子也好，我们都很欢迎。罗君隆基对于集稿这件事尤其热心，他在暑假期内，写了好些封信，问同学要稿子。开学以后，我们以为这次《学报》一定不怕稿子少了。那知道出条告收集，没有一个人投稿子来。我们当时真是急的了不得。恰好开学以后，不多天，评议部就提议举新集稿员，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如释重负。我因为感受那种困难，所以才主张取消《学报》。潘光亶君是局内人，所以也与我同样的主张。"吴景超还说："许多人以为别的学校里，杂志那么多。我们学校里的杂志，以前有《年报》、《学报》、《周刊》、《白话报》，《年报》去年取消了，现在又有人主张取消《学报》，这个实在是清华学校退步的征象。我的意思，不以为然。在一九三期里，我说同学由高谈放论而搁笔，实在是好现象。现在我把这个意思，再说得透彻一点。同学凡想到《清华学报》的，一定要联想到北大的《新潮》，以为《新潮》是学生办的，《清华学报》也是学生办的，我们为什么就比不上他。大家都存了这种心理，所以总想要拿《清华学报》去与《新潮》比赛，一定不肯把《清华学报》牺牲了。我现在大胆说句话，就是《清华学报》要想学《新潮》，不是难事，像《新潮》里那种文章，清华学生未尝做不出。但是我们所以不做的缘故，最要紧的因为不经济。《新潮》里那种文章，作者不知道费了许多心力，他们因为作文章，常有牺牲读书的事。诸位想一下，我们在青年的时代，分阴寸金，何必去干这种事体呢？《新潮》里的傅君斯年是最能作文章的一个人，他受的损失也最大，所以他在《新潮》一卷三号里说：'我们现在却有件极危险的事，到了头上，就是因为办杂志，害了求学，作文章减了读书。二十几几的人，每每被这种情形所误。'别人办杂

志，已经在那儿叫苦，我们何必学呢。不知相差多少呢！"（吴景超《再论清华学报应否取消并答张忠绂君》，《清华周刊》第197期，1920.11.5）这些话，不仅是吴景超的个人感触，先生也有同感。

九月十一日 作新诗《印象》，发表于十月二十二日《清华周刊》第一九五期。收《红烛》。

九月十八日 美术社选举先生为书记。时，美术社取消社长，由书记负总的责任。

开学以来，美术社活动十分活跃，《清华周刊》报道："美术社自开学以来，开过三次会，讨论改良底计划。闻其结果，关于宗旨，则除实习、研究外，加了宣传美术一条；关于职员，则废除社长，留书记、会计兼干事，及'斯条提欧'Studio管理各一人；关于经费则减为五角。该社又拟对内方面，注重互助的精神，对外注重服务的精神，如演讲、游览等，一律公开，及择优公布，学理底研究底结果，等等计划，均期以美术的知识灌输于同学，以引起其美术的兴趣。该社新旧社员共达五十余人，上星期六选举结果，书记闻多，会计兼干事吴泽霖，'斯条提欧'管理杨廷宝。会后举行第一次常课，为户外写生，到者三十余人。"（《清华周刊》第191期，1920.9.24）

十月一日 《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一九二期。均收入《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第一次公开署"闻一多"之名。文章反映了先生早期的艺术观，它针对同学中正在讨论不止的两个问题，开卷即道明："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艺术能替个人底生计保险。"文章也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论述的，末尾说：

> 现在把全篇的大意综括起来，申述一遍。艺术、科学本当并重，当今中国，科学已有萌蘖了，艺术却毫无消息。艺术的人才既是有限，有艺术的天能的自当急起负责。他们还当拿全副精神，专攻艺术。因为我们希望于他们一种新艺术的实现，这种事业决不是一知半解的艺术家所能胜任的。讲到以艺术专门为职业，我们总喜欢牵涉到生计问题，但这是一个大错。如果我们都认官僚富豪的生活为最理想的生活，当然瞧不起艺术。但是生计若专指人生的需要品——衣、食、住——加以寻常的繁华品同相当的贮蓄，艺术准能供给。况且讲到组成社会的集合的实力同个性的发展，一切的职业，就同时是我们的义务与权利，存了这个观念，恐怕也想不到什么生计问题了。
>
> 现在应讲的话都完了，我再学只踬阜的雄鸡，引嗓高呼一声：
>
> 有艺术天能的朋友们，快起来呀！

《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一方面批评清华的出版物不够发达；另一方面指出这种状况是由于“一般言论家都巧避著作，争趋口论”。先生称这种人为“搁笔派”。吴景超亦有同感，他在《再论〈清华学报〉应否取消并答张忠绂君》中说：“在学报新集稿员未举出之前，集稿的责任，是罗隆基、何浩若、闻一多、潘光旦同我五人担任。我们在暑假以前，就着手集稿。我们对同学说，你们的稿子，不问是那一门，那一类，交换智识的稿子也好，发扬学术的稿子也好，我们都很欢迎。罗君隆基对于集稿这件事尤其热心，他在暑假期内，写了好些封信，问同学要稿子。开学以后，我们以为这次学报一定不怕稿子少了。那知道出条告收集，没有一个人投稿子来的。我们当时真是急的了不得。恰好开学以后，不多天，评议部就提议举新集稿员，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如释重负。我因为感受那种困难，所以才主张取消学报。潘光旦是局内人，所以也与我同样的主张。”（《清华周刊》第197期，1920.11.5）

《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文字尖锐，也是一篇出色的杂文，兹录如下：

清华的出版改良，自从在“去张”运动底风潮里酝酿成熟了，后来便七节八枝，荆天棘地，急进的既灰了心，守旧的也瘪了气，于是风波陡落，一告[觉]瞌睡睡到今年四月，《周刊》才醒起来了。《学报》底纠葛更深，到暑假前才有集稿部底会议同宣言，也算他睁开眼皮，打了一口呵欠。但就那七期周刊底成绩论，我们的出版界敢吹“改良”两字吗？改良就是换上几句白话文，插进几个新标点吗？《周刊》如此，《学报》可知。唉！清华底出版物！清华底言论家！

但这是集稿员底过吗？——集稿员也不能尽辞其咎——不过最大的罪名，应加在全体同学里那一部分负有言论底特殊责任的身上。怎样讲呢？我们既采了集稿制，供给言论底泉源就在集稿部外——在全体同学里。但根据分工论，一校内人人应各依他的本能底特长，在各种课外作业里，择负一种责任；言论就是这许多责任中间底一种。（这里负责是对于学校的，不是个人的；“挖”是个人的责任，有人当他对于学校的责任，自然变了分数底奴隶。）不是说言论家以外，就没有别人可以发表言论，他们在执行他们的职务底余暇，也应该时时告些奋勇，大大方方地讲几句话。

言论同社会底关系是怎样呢？人人底脑筋都有受对象底戟刺而起冲动底本能，环境里有这个缺点，我们的脑海里才起这种“不快感”；有这种感觉，影响到理性底活动，才有这种理想；有这种理想，才发为这种言论，口头的或笔著的。所以每篇言论，在环境里，必有个确定的根据；环境不需要这种言论，这篇言论就无从产出；人人不肯发表这篇言论，这个需要，就永远不能补足。言论

里所包含的解决问题底方法，不一定都同环境底需要，针锋相对，但社会自有裁判力，决不致盲从，所以取舍言论，是社会底事，联续地接济社会取舍底材料，是言论家底事。

言论家当然包括两种，口头的同著作的。出版物所欢迎的，是著作的言论家，其余一种，有与没有，跟他毫无关系。清华出版物不能发达，只因一般言论家都巧避著作，争趋口论底一条道上。记者不知道别人，却愿将我个人现在所以渐趋这"搁笔派"底原因照直供来，做大家讨论底资料，藉以志我的罪。

自己缺少心性底修养，失了批评家底地盘，见了别人底行为，本能辨得黑白分明，只不敢提起笔写。关于学术问题底讨论，自己的脑筋干枯，读书还读不及，哪有工夫著作呢？而且稍稍一开书本，更像河伯到了海洋似的，哪里还有胆量去著作呢？再加平日专喜冷讥热嘲地批评别人，所以每到提起笔来，就仿佛看见那里森森地排着无数的韩□仇的笔锋，等着这张纸一出世，便一齐射来似的。于是愔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有一篇稿子写完了，终久不敢塞到投稿箱里去。这种由懦弱产出的滑头政策为个人计，未尝不是上策；殊不知言论是为社会的，哪能带着一点主观的滋味？纵他惹起社会底反击，那更应是我们无任欢迎的了。

像我这样不才，原不足轻重。还有一般品学远出我上的朋友们，老手的言论家，现在既流入"搁笔派"了，新进的，天天喊道："研究！批评！改造！奋斗！"但查查他们所发表的言论，也是比凤毛麟角还稀奇些呢。我希望他们都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足以塞同学底口实，我不希望，却又害怕他们同我患了一样的"怯弱症"。唉！鼓吹出版改良，不是我们这般朋友吗？到了实行改良底时候，一个个却都"噤若寒蝉"呢！周君念诚在他的《投稿用别名是不负责》里骂道："所以卑怯的作者更是狡猾，更是盗窃，我无以名之，名之曰蠢贼。"我说用别名，"隐在雾里放暗箭"，总算是有责任心的呵！一张白嘴，说得天花乱坠，嘴唇一关，都化为乌有了，谁还能代他负责呢？大家抱着"搁笔"主义，比抵制仇货还狠心些，可怜那两家铺子，再不关门，才怪呢！

但是诸君不要误会，以为我把口头的言论家，当作一文不值。其实，是言论，我都尊敬，不过对于著作的言论家，比清谈的言论家还要十倍地尊敬。须知更有"三缄其口"的金人，那才真是社会底蠹贼。中国人最卑劣的表德，就是"顾面子"，"不好意思"。多多批评，多多发表言论，正是打破这种恶习，练习公开的精神底妙法。你骂完了我，我又骂你，两人都受了"闻过"底益。梁山泊底弟兄，不打不亲热。世界上哪有公开底快乐？

朋友们总说我们那里想的清华出版物底实现，是不可能的。试问我们可曾奋斗到最末的一分钟？现在正当一个学年底新纪元，上半年还只一家《周刊》，现在《学报》也快开张了，零售趸批，家家缺货。我谨将这两句话送给言论界底同行们，做首座右铭，并祝两家出版物底生意兴隆：

"小心些做文章！大胆些发表文章！"

此文在同学中引起不小反响。次期《清华周刊》刊登吴景超《我对于清华出版物的意见》，说看了先生的文章，"很有点感触"，它"把我们学校里的出版物情形，可谓形容尽致了"。潘光旦在《校事杂评·学报》中说："胡适之先生说过，我们大家忙着的，并不是新文化运动是新名词运动，我想大家承认他这种话是有见地的。这样，在出学报以前，大家不妨斟酌斟酌我们的言论里到底有多少可提高文化的材料，我们能不能逃出胡先生的断语。上星期一多君作了一篇《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很责备同学底缄默，便是我们脑子里没有多少可以提高文化的材料底明白表示，那是责备不出来的。"

开学以来，工社活动也很活跃。"召集过三次会。第一次是讨论本期该社怎样进行，并社友个人本年计划。第二次是讨论隔词法等四问题。前礼拜开第三次会，讨论家庭改革和儿童教育二问题"。（《清华周刊》第 192 期，1920.10.1）

十月八日　诗《时间底教训》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一九三期。收《红烛》。

十月十日　国庆节。这年的国庆典礼第一次由清华学生会主办。先生写了《对于双十祝典的感想》，发表于二十二日《清华周刊》第一九五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文章主题有二：一为"以节期证明美育的实力"，一为论述"清华艺术的破产"。

是月上旬　清华学校选举本学年《清华周刊》集稿员，先生等十八人当选。集稿员分六组，先生与浦薛凤、费培杰为第二组。（据《清华周刊》第 194 期，1920.10.15）十一月初，集稿员分工，先生负责联系美术社、唱歌团、工社，并做新闻访查。（据《清华周刊》第 197 期，1920.11.5）

十月十五日　美术社是月八日至十日国庆节假期内曾组织户外写生团，在学校附近写生。（据《清华周刊》第 194 期，1920.10.15）是日又举行演讲会，请北京美术学校吴新吾先生演讲。此时美术社"已达六十人，现分三班，星期五下午一班，星期六上午两班，"（《清华周刊》第 195 期，1920.10.22）活动很频繁。①

① 据 1921 年出版《清华年刊》所载美术社成员合影照片，该社有：张治中、张光、张咏、张永镇、冀朝鼎、周传玮、黄人杰、黄懋礼、黄仕俊、何鸿烈、高仕锜、过元熙、梁思成、罗家选、马杰、沈宗濂、史国刚、孙成玙、戴照然、汤家宝、谭广德、唐亮、邓健飞、曾骏全、闻亦传、闻多、吴幹。还有些人未参加合影。

十月二十三日 上社"开第四次常会。这次的读书报告有两篇:《信仰与信仰底应该》及《俄国底研究》。该社于前次常会时曾决定研究电影问题,本次又将全题分为十三项:'清华底电影'、'中国底电影'、'欧美底电影'、'教育中之电影'、'艺术中之电影'、'电影与道德及电影底审查'、'电影与卫生'、'科学中之电影'、'宣传事业底电影'、'实业中之电影及电影底实业'、'电影底历史'、'电影在清华底势力'及'改良清华电影底计划'。每人担任两项(除末尾一项),分途研究,或参考书报,或实地调查,于每星期常会时报告一次。至于原有的读书报告则暂时停止"。(《清华周刊》第196期,1920.10.29)

关于电影问题,起初研究的范围较广,但很快便集中到对清华电影的改革上来了。

十一月十一日 清华学校改办大学之议再起,个别同学已填写了入大学志愿书。高等科同学对改办大学后旧生是否仍可出洋颇为关心,辛酉级因次年即将放洋,利益更加尤关,曾率先往见校长及谒董事会会长,但未得到明确答复。是日,校长金邦正向辛酉级全体同学发表谈话,表示:"一、清华往年派赴美国之学生,习文科者大半可入大学三四年级,习实科者大半入一二年级。本校学生似偏重文科,以后实科方面应加高程度。二、大学是否即将办成,现时尚不能说定,故已签志愿书入大学之学生,究应如何处理,尚谈不到。三、签入大学志愿书者,毕业后如体育及格,并无他项意外之事发生,当均派赴留学。"学生会闻董事会不日即将开会讨论此事,故于会前去函询问四事:"究否办大学?如办大学,又从何年起?办大学与未填愿入大学志愿书之学生有何关系?办大学后,旧学生出洋及格即送抑改为选送?"此函去后,学生会评议部推举何浩若、蔡公椿、翟桓、沈本强、杨世恩、徐致璋、曾远荣组一委员会,专司与校方交涉,各级亦委派委员参加,辛酉级派出先生与沈有乾、张杰民、浦薛凤、罗隆基、何浩若、熊祖同、钱宗堡、聂鸿逵、薛祖康十人参加该委员会。(据《出洋问题上星期内学生方面之消息》,《清华周刊》第199期,1920.11.19)

其后,学校决定新制旧制以轨进行,对按旧章入学的同学并无影响。《清华周刊》报道:"本校改办大学计划,现定中等科三年,高等科三年,大学二年,修业年限共八年。中等科二年级还是留着,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第一个,增加大学二年级一年。此计定一九二一年暑假后实行。改办大学与出洋是没有关系的,大学毕业后,留学年限并不减少,仍旧五年。此计与未签志愿书学生不生关系,暑假后开办大学,由高四已签入大学志愿之六人起,其余仍旧照章派留学,以后也是如此。大学课程,虽至屡次开会,但尚未决定。"(《校闻·本校暑假后添设大学班》,《清华周刊》第208期,1921.1.21) 后又报道:"悉校中已定设大学一年级,该级课目,亦已定妥,大致

分文、实二科。文科有政治学科、社会学科、经济学科、银行学科等；实科有医学预备科、农林科及工程科。下学年高四即为大学一年，而今年在高四之六位新生则为大学二年。至大学二年之课程，目下尚未定云。"(《教务处纪事》，《清华周刊》第211期，1921.3.11)

十一月十二日　《黄纸条告》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一九八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所谓"黄纸条告"是清华电影的广告，当时学校放映的电影被诲淫诲盗的内容充斥，先生等人看不惯，撰文进行批评。这期周刊还发表了周先庚的《改良清华电影的发端》。

清华学校是一九一六年开始放映电影的。那年春天，学校为教学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但一直使用的机会，一位教物理的美国教授提议向北京影片公司租片放映，这件事曾经过同学签名赞同，并得到时任校长的周寄梅同意。起初，放映没有定期，后来改为两星期一次，一九一九年下学期起，改为每星期一次，时间均在星期六晚上，几乎没有间断。租选影片一事，初由庶务处林玉棠先生经管，后改陈长桐负责，一九一九年陈长桐毕业赴美后，先生同级同学董大酉接管了这项工作。最初播放的影片，多是有价值的教育片，但渐渐就连续放映侦察、滑稽的多集影片了，有的甚至要放映八、九个星期。"而这种片子，又最动人，多看几次，立刻中迷，二次、三次就有不得不看之势，于看者的金钱、时间上发生很大的妨碍。并且这种片子，多半是讲巨奸大蠹，使人看了，生出一种谬讹的观念——以为外国的社会，比中国还要坏。此外因为刺激太甚，好奇心油然而生，因此就模仿起来了。"(聪强《清华电影之过去与现在》，《清华周刊》第202期，1920.12.10)

关于此事起因，潘光旦在《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中，对当时的情况也有记述："几个河南同学，是一家的兄弟叔侄，不知通过什么方式与条件，一面从城里搞到了片子，一面取得了学校的同意，借用当时的礼堂，即后来称为'同方部'的那座建筑，作为演出的场所，居然一周一次地开业放映起来。可奇怪的是，学校并没有招商承办，而平白地多了这一行私营企业。这家弟兄叔侄无疑地掌握着这企业的全部权利，接洽片子，张贴广告，卖票收票，真是经营奔走，不遗余力。放映的又是什么片子呢？美国片子是不消说得的了。美国的哪一类片子呢？如今虽事隔四十年，大家还留着极深刻的印象的一例是一系列称为《黑衣盗》(*The Hooded Terror*)的片子，一续、再续……、十几续，前后不知演了多少场，每场总是满座。这片子的内容，顾名思义，便知非奸即盗，充满着极不健康的刺激与诱惑。但学校始终不管，教师们，即在一个教数学的美国教师的儿子按照这张影片所传授的手法开始盗窃行为

之后，也还不管。最后，我们一个爱管闲事的小团体，其中包括闻一多先生，终于忍不住的出头管了一下。我们利用《清华周刊》和其它方法，一面主张非带有教育意义的影片不得上演，一面发动同学对诲淫诲盗的今天所称的黄色片子，共同抵制，来逼使这一家学生商人不得不改换另一路质量的片子。小小的运动算是成功了。"（《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92至93页）

《黄纸条告》的批评方法也很特别，用不同人的口气，不同角度的认识来体现不健康的电影对不同人的影响，但主旨让人一读就明白：

万头攒动，接踵摩肩，挤在礼堂的赭色门前，好像庙会时候护国寺的香客们朝见佛爷似的；他们的馨香顶祝的热诚，即表现于那波涛澎湃的声潮里。"好极了！陡[抖]起来了！这个星期有好片子看了！"过路的人碰着这一团"触手可炙"的热气，他们的神经也被溶化了，他们的身体不觉流入这人群里，越流越多，赭色门前的大道竟遭人涛泛滥，断绝交通了，于是站岗的听差未免小起恐慌。

什么神通广大的魔力竟能绊住许多视线，捣烂许多神经？

一张方不满尺的鹅黄纸上，斜撑着几条黄子[纸]久皱的赤痕。这算是什么东西的图形？是锻铁的锤子？哪里？你瞧那鲜血淋漓；便知道是一把杀人的斧子。都错了，不是什么希奇的玩意儿，是你我都有的那只手——你我当工匠最宝贵的工具。

慢着，你我的手是这样的么？你瞧那里大书特书着三个日本式的隶体字："毒手盗"。"毒"，你我的手肯受这个头衔么？你我的手肯替"盗"当经理么？不！他是你我当工匠最宝贵的工具。

但是我们的手拒绝罪恶，我们的眼却欢迎他，眼把罪恶的图形进贡到脑官里去，又使天心大悦，立刻喉、舌、唇收到圣旨、奏了这阕颂歌："好极了！好片子呀！……"

好片子？怎样好法？《黑衣盗》、《毒手盗》，好盗，可敬可爱的盗，"飞弹走肉"，杀人如同打鸟！

好片子，多谢你输入无量的新财宝到我们智囊里来了。若不是你的鸿赐，这些财宝，我们除非攒进地狱，哪能找得这样齐备？我们整星期囚在这"水木清华"的但是平淡的世界里，多亏你常常饷以"五花十色，光怪陆离"的地狱的风光，我们的眼福不小。

不过我很怀疑假若你熟悉天堂的路，要领我们去那里游览，我们会不会一样的兴高采烈。

有人说不会。淫暴是我们兽族的鼻祖。遗风余韵，我们置身于古物陈列所里，谁不顾盼低徊，为之神往？所以喜入地狱是人情。但天堂是个新地方，我们没有去惯。

我说却不尽然。我引卜郎林(Browning)一句诗来申释我的意思。

Ao, but a man's reach should exceed his grasp. Or what's a heaven for?

《清华周刊》第二〇〇期刊登署名"果"的《电影话》，赞扬先生的立场，说："一多君一篇，大意我极表同意。(不过刻薄个人的地方，我不敢赞一辞。)这种盗贼长片的电影，实是无味。"这期还刊登了择片人董大酉的《电影问题》，对选择放映影片的原因做了表白和解释。不久，董大酉辞去择片工作。

十一月十三日　美术社举行"第一次幻灯演讲会，演讲者为本校教员司达女士，讲题为西洋建筑，到会者三十余人"。(《清华周刊》第 199 期，1920.11.19)

十一月二十二日　出席清华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会议。一九二一年为清华成立十周年，为组织有关纪念活动，学校成立筹备委员会，委员均由校长金邦正指定。该委员会初仅有教员，后增加学生委员，先生与吴泽霖、刘聪强、蔡公椿、罗隆基五人经清华学生会干事会推定，被校方指定为学生会方面筹备十周年纪念会专门委员。《十周年纪念之筹备》云："本校将于一九二一年举行十周年纪念，并经校长派定委员，力事筹备一切，已详前刊。兹闻该委员会又于二十二日晚八时开第二次讨论会，筹商一切办法。当时由赵副校长主席，余日宣先生记录。其暂定会序如下：纪念会决定于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分三日举行。第一日(二十八日)为校中俱乐日，下午二时举行十周年纪念正式会式。二时至三时半举行庚申级'日晷落成式'。三时半以后本校学生与清华同学会比赛运动。五时至六时本校同学及教职员与清华回国生茶叙。七时至九时，回国清华同学宴会。九时以后音乐会及花爆待俱乐。第二日(二十九日)上午为成绩展览会，下午二时后为新视觉开幕礼，及童子军兵操、拳述等操演。夜间有英文剧。是日会序稍近巩性质，以便外人及留心本校西文者考察。第三日上午仍为成绩展览，下午二时起有本校体育方面各种演试，及社会服务部之展览。五时以后，有化装游行。夜间复有中文新剧，以助余兴。此外又欲筹备十周年纪念册，及《清华周刊》增刊各一本，并闻委员会中各人已他门担任，立即进行云。又委员中除上次派定之人数外，已添派梅贻琦、王赓二先生加入。学生方面，前系由校中指派学生会评议、干事两部正主席，加入委员会协助一切。后因学生会职员，系半年一任，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之职，须至明

年五月方可完毕,中途更易新手,于筹备进行诸多不便。故"经学生会方面评议、干事两部议决,另组专门委员会加入协助,闻结果,已由干事主任会推定吴泽霖、闻多、刘聪强、蔡公椿、罗隆基五人为学生会方面筹备十周年纪念会专门委员,并已由校长加行委派该五人等加入本校委员会"。(《十周年纪念之筹备》,《清华周刊》第200期,1920.11.26)

十一月二十七日 担任清华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国剧委员负责人之一,专司编剧事。《十周年纪念筹备演戏底近闻》云:"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所拟会序中有排演中英文戏一节","兹闻校长处已派本校国剧及英剧常期委员会,会同闻多、蔡公椿、翟桓(国剧)、吴泽霖、熊祖同、时昭瀛(英剧)六人分途进行。国剧委员会已于上星期六开会决定暂分编辑同庶务两部,并举闻多司编辑,蔡公椿、翟桓司庶务"。(《十周年纪念筹备演戏底近闻》,《清华周刊》第201期,1920.12.3)

十二月一日 上星期先生与浦薛凤、梁思成"曾发起一研究文学、音乐及各种具形艺术底团体",起名"美司斯"(The Muses)。是晚,"会友十四人集会,选杨廷宝、方来、梁思成、浦薛凤、闻一多五人为章程起草委员"。(《研究艺术的新团体出现》,《清华周刊》第201期,1920.12.3) 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入高等科后,一多与本人几度研商,决定组织一个文艺团体,定名'美思丝',音义各半,盖本于希腊神话中所谓司理文学和艺术之九位女神(The Nine Muses)。参加之社友,计有吴泽霖、方来、杨廷宝、董大酉、梁实秋、梁思成、黄自等二十人左右。"(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7) 美司斯有五人委员会,"干事梁思成、徐宗涑,书记闻一多,会计浦薛凤,会所管理王绳祖"。(《美司斯》,《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美司斯宣言》云:

> 我们深信人类底进化是由物质至于精神,即由量进于质的。生命底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
>
> 我们深信社会底生命这样僵枯,他的精神这样困倦,不是科学不发达实在是艺术不发达底结果,所以断定我们若要求绝对的生活底满足,非乞援于艺术不可。
>
> 我们又深信艺术底研究包括高超的精神底修养,精深的学理底考究,同苦励的技能底练习。前两样是艺术底灵魂,后一样是他的形体。有形体,无灵魂,当然不能成为艺术。
>
> 我们因此觉悟了我们——向往各种练习艺术的组织里,学习一点音乐、图画或文学的技能,那决不能算研究艺术。那样研究的艺术只可以作投时髦、供

消遣、饰风流底用；那样研究艺术的确乎是社会底赘疣，生活的蟊贼。

我们既觉悟了从前的谬误，决定从今以后要于艺术底原理加以精细的剖析，于他的精神加以深邃的体会，使一面我们的技能得着正确的南针，一面我们的生命被着醇美的陶化。

质言之，我们既相信艺术能够抬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底质料，我们就要实行探搜"此中三味"，并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

我们更希望同学们都觉得他们的生命底僵枯、精神底困倦，也各各试向艺术讨点慰藉同快乐，我们敢保他们不致失望。我们并且极愿尽我们的绵力帮助他们。

我们还要申明，"美司斯"同现在校中各练习艺术的组织（如美术社、铜乐队、唱歌团、国声社等）没有冲突。我们研究，他们练习，实在彼此有"唇亡齿寒"底关系。（《清华周刊》第202期，1920.12.10）

十二月四日　参与发起"清华演讲记录团"。《清华周刊·校闻》报道："本校近来名人演讲，日见增加，同学听讲者，亦十分热心，惟记录一节，颇乏统系，实为憾事。现已由闻一多、罗隆基二君邀集吴景超、周念诚、王造时、时昭瀛、谢文炳、梁思成、翟桓、何浩若、陈石孚、周兹绪诸君发起一种团体，专司此事，并已于上星期六晚开会讨论一切，其大概情形如下：1. 该组织暂定名为清华演讲记录团。2. 团中事务分记录、研究、刊行三项。3. 凡有发起人中五人的介绍，清华同学均可以加入为团员。4. 记录事分班任事，分班法以学科为主体，而后各就语言之所长者分司记录。又该团议决，将来所有刊行演讲录的经费，均需要求校中设法帮助云。"（《清华周刊》第202期，1920.12.10）

十二月十日　《电影是不是艺术》写定。发表于是月十七日《清华周刊》第二〇三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文章认为电影不是艺术，因为它"永久脱离不了机械底管辖"；营业的目的"只有求利底欲望，哪能顾到什么理想？"；"结构的非艺术"。但是先生也认为"电影底存在是以教育的资格存在，电影底发展是在教育底范围里发展。教育一日不灭亡，即电影一日不灭亡"。

其实，先生的指责是基于清华滥放影片的义愤，后来到美国看过几场艺术性较高的影片，认识也有所改变。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致吴景超等友信中说："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时发达到这种地步呢？我们东方人这几千年来机械没有弄好，艺术也没有弄好，我们的精力到底花到那里去了呢？啊！这里便是东西文明的分别了。西方的生活是以他的制造算的；东方的生活是以生活自

身算的。西方人以 accomplishment 为人生之成功,东方人以和平安舒之生活为人生之成功,所以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东方的则是精神的。"(《闻一多书信选集》,第 45 页)

时,工社关于电影问题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于《清华周刊》。载入第二〇一期的有刘聪强《电影之由来》、孔繁祁《电影事业》、闻亦传《世界各国电影底情形》。第二〇二期有潘光旦《电影与道德》、《电影与视觉》、吴泽霖《电影与教育》、孔繁祁《电影与宣传》、刘聪强《清华电影之过去与现在》。第二〇三期有潘光旦《清华电影和今后的娱乐》。

"又,该社因社友所研究问题渐趋专门,所作报告颇乏共同兴趣,特于进行方法稍加变动。除旧有的问题讨论外,加有常识报告,及社友底近状报告。至读书报告则改为大纲式的读书录,每月交一次"。(《清华周刊》第 201 期,1920.12.3)

同日 "美司斯"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陈师曾、吴新吾、江少鹣、刘雅农到会。《美司斯成立会》报道:"会序中有梁任公先生及中国当代美术名家陈师曾、吴新吾、江少鹣、刘雅农四先生之演讲。陈先生讲题为《中国画是进步的》、吴先生《法国绘画小史》、江先生《画学之评论与作品》、刘先生《艺术与个性之关系》,梁先生略讲《中国古代真善美之理论》,皆历陈名说,推阐致尽。宾主畅谈,佐以铜乐,历时一时之久,尽欢而散。"(《清华周刊》203 期,1920.12.17)

十二月十一日 美司斯"开第一次研究会,讨论研究会进行方法。当时决定分音乐、绘画(包括雕塑、建筑)、文学、美学四门,每星期开研究会一次,每次有三人,由四门中各择一门,负责参考书籍,陈列论证,以为全体讨论之导线。"(《美司斯成立会》,《清华周刊》第 203 期,1920.12.17)

同日 工社"举行常会,报告底题目有《植物底分类》、《宗教的派别》同《国际条约考略》"。(《清华周刊》第 203 期,1920.12.17)

同日 晚,出席高四级全体会议,"讨论该级请顾问事,并已通过马伦、梅贻琦、狄码、麦克劳氏、司美施五先生为该级顾问。又,该级友以马伦先生教授历史,过于严厉,已组织委员会,预备上请愿书于马先生,请其稍变方针。"(《校闻》,《清华周刊》第 203 期,1920.12.17)

一九二一年　二十三岁

一月，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作人等在北京成立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六月，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在日本成立注重主观抒情色彩和浪漫主义倾向的“创造社”。

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月六日　清华同学参加赴灾区救灾工作，吴泽霖、王际真、王世圻、罗隆基四人赴德州。是日，在山东德州地区的吴泽霖写信给先生与刘聪强、潘光旦、孔繁祁、闻亦传、梅贻宝等上社社友，叙述沿途情况和德州红十字会组织等情况，及个人此行感想。信云：“我本来定星期二动身，后来王世圻从北京回来说当日就要去，所以我就不能和你们话别。现在，我略略地把一路的情形，告诉你们一下。我们星期一晚上在中西旅馆，第二天早晨四点半就起来，六点钟在前门开车，下午四半到德州。照例一切路费及路上用费，都可以向红十字会开支，我们这次领到了头等免票四张，因为票子不够，所以 Bavcr 又给了我们大洋二十元，教我们买二张二等车票，不够的钱到德州补领。后来我们想要是我们替红十字会多省几块钱，就可以多救活几条命，所以我们就买了二张三等票。查余的人对我们非常恭敬（他们以为我们是那一部底大员），所以我们买三等柰的二个人，也坐到头等车上，一直到了德州。该处红十字会已经知道清华有人去，星期二就派人往车站接我们，可是没有接着。第二天我们真到的时候，他们没有去□，一到公事房，他们不止地向我们道歉。当夜住在卫生医院内，这个医院很新很大，伙食也不算十分坏，可是晚上冷得睡不了，这种苦处，在清华还未受过。昨天早晨有一位 E. wing 先生来领我们参观医院及附近各学校。十一点钟我们六人都到医院内的祈祷会。正午此处红十字会底总理 Drucher 请我们到他家吃饭。正午要先派二人出发，我们都想去，没有法子，只好用抽签法定去留，结果王际真及罗隆基中了头二彩，立刻卷铺盖上火车。他们到平原以后再乘火车或骑马到各路线。我们送他们二位去了以后，就到德州城内看了一下。大概今天下午，我们也都去了。德州红十字会分四部——粮食部、工程部、

会计部、工人部——每部有部长,但是事情非常地繁琐,办事的人很少,所以一切秩序手续都不很桃李满天下。这一般外国人都有职业的,他们牺牲了他们的正业来作这很苦的事情,这种精神不能不使我们回想到我们本国人对待灾民态度底冷淡,实在使我们惭愧。这个钦佩和惭愧心同时发现在我们心里,就产生出一种新的牺牲心和进取心。现在我们四个人和高四同学考完了大考,等教务处底报告的时候差不多,一听见了'Pass',就立刻飞上大楼,搬行李到上海。我们所望的就是'今天出发'。现在红十字会已募得一百万金元,拟先由德州筑路至临清县,共长一百九十五里,分为三大段:第一段由德州至恩县,第二段由恩县至夏津,第三段由夏津至临清。第一大会分为三区,每区有一工程师及一翻译。每一大段有分发粮食所分送各区。工人即本地灾民,每三十人为一队 gang,每队有一队长,和一厨子,每日每队举一代表领粮食,至星期六可以告假半日回家,并领二十斤高粱和豆子,可以四人一星期底用。现在工人底总数,大概有四千,不久就要加到一万。合情合理一个工人能够养四个人,那么修这条路,就可以养活五万人。这边帮忙的人很少,除了齐鲁大学来了三十几人外,别处来的只有几个人。听说上星期他们在济南招了十几个翻译员,到了这边,话译不出来,所以就送回去了。清华底英文程度在华北很有名,所以我们一到,他们非常欢迎。齐鲁学生在二月四五号就要回去,那时也许要需用些清华学生,无论如何,我们于二月十五六号应当回校。在我们回校以先,第二批就应当出发。我们交代清楚后,才可以离开德州。你们大考完了,就要想法动身。天冷得很,我的手不能写字,以后路线上情形,下次再告诉你们。"(《通信》,《清华周刊》第 207 期,1921.1.14)

一月八日 美司斯请钱稻孙先生讲演,"题目乃关于美学"。(《美司斯讲演会》,《清华周刊》第 207 期,1921.1.14)

是月中旬 清华学校校长金邦正召见先生与工社社友,征求对于放映电影的意见。事后《清华周刊》报道云:"金校长现在以电影所发生之坏结果太多,决定减少电影次数,故本星期六及下星期将不展览影片,同时并拟改组校内俱乐委员会,重组游艺室。"(《校闻》,《清华周刊》第 207 期,1921.1.14)

时,工社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下面选择的是几则有代表性的议论:

李迪俊在《电影与工社》中说:"工社社员在周刊上接连发了几篇关于'电影问题'的牢骚,'上惊九重',不日把他们招进府中谘议。结果是:减少开演次数,改良片子,加设大规模的俱乐委员会。大多数中高同学,听了这个消息,群情激动,对于工社社员和校长先生,都加以极严厉的批评。"文中还说电影"是清华大多数的教职

员和学生的娱乐品”，工社只“六个私人组织的研究学术的机关。“拿工社社员的资格出来批评、废除、减少清华大多数的教职员和学生的娱乐品”，显然存在着“法律上的违法”和“智识上的缺乏”两个问题。因为在法律上，“工社社员是个少数私人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没有代表大多数的清华教职员和学生的法权。换句话说，工社社员擅与校长私地停止、减少清华大多数的教职员和学生的电影，就是违法，就是蔑视大家的人权，就是学生自治的蝥贼！”在智识上，“工社社员，是老不看电影的——这个谁也知道。拿老不看电影的眼光，来批评、废止大家爱看的电影，其中利弊得失，当然有许多‘伪造’和‘失真’的地方，而且他们不爱看电影，电影的存废，与他们不发生利害，也就不妨发‘过激’的言论了。”（《清华周刊》第 208 期，1921.1.21）

丁济祥在《对于电影问题之不平鸣》中说：“无论何事，总是以寡从众，若以五六人来破坏大家的快乐，于理讲不下去。近有一个小组织，叫作‘工社’，时常讨论，有一次这米里的会员，研究本校的电影，所以连发了几篇议论。或者校长看了这种言论，后来又无人与他辩驳，以为是我们大家的公意，所以就向他们有一个谈话。岂知为不过是五六个人的意见，他们既然喜欢道德片子、历史片子、教育片子，何不到图书馆，多看几本道德经，多读几本历史呢？”（《清华周刊》第 208 期，1921.1.21）

钱宗堡亦在《清华园电影问题的我见》中说：“第一九八期周刊上一多君做了《黄纸条告》，‘振纸一呼’之后，大家在清华园电影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文章式的也有，条告式的也有，多得不胜枚举。”该文还记述了金邦正校长与先生等谈话的经过、内容及校内的反应：“上星期工社社员用‘个人名义’和校长先生对于电影问题谈过一番话。谈话的结果引起了一个取消电影的消息，这消息被影片选择委员（这是假定的名目）一报告，又引起了工社一番声明。这面一声明，那面也声明：你说校长说了这句话，我说校长并没有说这句话——于是乎枪去刀来花一团，刀去枪迎锦一簇，酣呼厮杀，异常热闹。但是校长的话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想双方的辩论都是空费唇舌，我们只消研究校长到底说了什么话就可以明白其中真相，谁也不用怪谁。我本来是极爱看电影的，这回得了取消的报告，心中大着其急。恐慌之际，不免就上校长处询问了一番。现在我把我所听见的也报告出来，大家可以根据各方面的话，将这问题切实的研究一下。校长所说的不外以下这几层：一、电影本来不必取消，虽说每次一角，花钱不少，然而若是没有电影，星期六上北京去所费更多。二、但是以前所演的片子也有不妥当的地方。三、本学期大考已近，可以停止，以后演也未尝不可，不过次数要减少些，余下来的时候可以开别种俱乐会。如此片子也可以挑得好一点。四、然而若是别种俱乐会办不到，每月演一二次也行。总结

起来，自从上社诸君和校长谈话之后，学校里对于演电影的方针已经改变，从前的办法是固守成例，现在是：一减少、二替代、三改良。"(《清华周刊》第208期，1921.1.21)

由于清华园内对电影问题反应强烈，特别是一些爱好看电影的同学怕失去这一娱乐机会，非议颇多，以至校长金邦正亦不得不出来表态，云："余认电影有好处，亦有坏处，而此好处坏处各人不同。此次停演之意，一为大考将近，各生当预备功课；二常看电影于目力上有害。此后并非不演，与其他娱乐会可间行之。每星期必演，于选片上发生困难，已是必演，无好片时，不得不以常片充数，因此之害或得多。但以前不禁止之原因，为此种常期电影虽不能较益城内各种娱乐方法高尚得多，每星期六能使学生留校未斯非策也。每次铜元二十枚，较进城一次车费尚少。此法虽有此作用，但亦有害，故亦应设法改良，以后定组织大规模委员会专管娱乐事宜，遇有电影好的片仍可开演。"(《校长对于星期六演电影之意见》，《清华周刊》第208期，1921.1.21) 同时，《清华周刊》也报道："本校庶务长已向美国使馆借得风景片及实业片多卷，将于明晚在礼堂开演。不收入门券，诸位同学可以随便入览。"(据《校闻》，《清华周刊》第208期，1921.1.21)

是月中旬 清华学校致函将毕业之同学家属，嘱出美选择学校应考虑家中财力。清华早期学生在美生活津贴每月六十美元，后加十元，但仍有不足。时，在美学生要求清华董事会再次增加津贴，故学校特函学生家属说明。《清华周刊》报道云："本校派赴留美学生，以前，月发膳宿费六十元，后因美国生活费增高，加给十元，每月发美金七十元。在美学生，今又屡次函电，致董事会请求增加，董事会因在美学生人数众多，每月增加几元，总数目甚大，为将来多送学生计，不宜于此时允此巨数。况美国各地生活费用并不一致，在东部纽约等地，每月此数却甚为难，但在中部数省，每月所发之款，若能节省用，尚可有除，为此种种困难，不能照准。并留美官费，尚有教育部所派往者，教育部所发之款，与清华所发相同，清华加费，教育部不得不加，因此困难索连更大矣。依上所述，在美每月七十元，有几处可够，有几处甚为难，故选择学校，不得不慎加商酌。本校为此事，已致函现高四同学各家属，家中财力充裕者，请自酌补，使学生得任意选择学校。家中无力贴补者，免到后发生困难，选择学校暂不取生活费用高昂之地。此信发后各方尚可妥洽。"(《校闻》，《清华周刊》第208期，1921.1.21)

二月十四日 开学典礼。这学期，先生当选为《清华周刊》集稿部集稿员。堂弟闻亦齐亦当选。当选的集稿员还有浦薛凤、费培杰、罗隆基、何浩若、廖芸皋、李吟秋、陈石孚、周念诚、梁治华、吴景超、时昭瀛、翟恒、冀朝鼎、王造时、沈本强、施滉。另，沈镇南、潘光迥、胡毅、何标当选为经理。(《清华周刊》，《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

念号》,1921.4.28)

二月二十一日　清华学生会干事部召集《清华周刊》、《通俗周刊》新集稿员开会,讨论改革学校出版物等问题,会上"公举闻一多主席,罗隆基报告上学期本刊(《清华周刊》)集稿部情形,彭文应报告《通俗周刊》情形。又讨论集稿制问题,通过继续进行"。(《本刊记事》,《清华周刊》第 210 期,1921.3.14)

晚七时,《清华周刊》集稿部开会,"闻一多主席。通过议案如下:1. 设集稿部委员三人,由本部公推。2. 集稿员长期负责。3. 分栏集稿。4. 分言论新闻学术文艺四栏,言论七人,新闻三人,学术文艺各四人。5. 每周常会(星期四晚饭后)"。(《本刊记事》,《清华周刊》第 210 期,1921.3.14)　会上推举集稿部三委员,先生任主席,周兹绪负责与经理部、校长及同学的交涉,姚永励负责物品及事务所的管理。

二月二十二日　出席《清华周刊》集稿部会议。"午后一时底会,集稿员择任采访各处新闻。通过将本刊革新底情形作为宣言登载首期,并推闻一多作。"(《本刊记事》,《清华周刊》第 210 期,1921.3.14)

同日　作《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发表于三月四日《清华周刊》第二一〇期。这篇文章是代表《清华周刊》集稿部撰写的,故未署名。

全文如下:

二月十四日金校长在开学式底演说里再三提及《周刊》改良底问题,十七日又召集旧集稿员开会,征求革新底意见。校长所致意的可括为两大点:1. 对于集稿制的怀疑,2. 关于内容的改良,即增多学术底讨论。以后评议部选出我们新集稿部,便将这些问题移给我们讨论,我们开过两次会,还讨论些别的问题。今将其结果揭出,并附以简略的解释如下:

一、集稿制底革新　集稿制如今试验出很多罅漏来了;我们应因宜补苴,以求革新,若是迳直回去起用编辑制,那就同鉴于共和不能弭乱,便要复辟一样了。时间是向前流的,制度是他波上的一叶浮萍,当然不好打后退。集稿制是怎样革新的呢?

A. 集稿部委员　集稿部最明显的缺点是没有一个集中的官器[器官?]以贯通内部底气息而应外界底接洽,结果便是人人负责等于无人负责。现在我们有一个三人委员会司理上述的职务,却无取舍稿件底最末裁判权,所以他们有做集稿部底公仆底义务,而无总编辑居高临下、统辖群僚底权利。

B. 集稿员长期负责　从前集稿员每三人管一期,这一期出了版,这三人底负责算完了。各期集稿员各不相助,所以虽有十八人,其实每期所集的材料只能代表三人底精力。现在将《周刊》分为四栏,十八人各择一栏,每期都负责

集稿底责任。从前的《周刊》是三人集稿，现在的是十八人集稿，六倍从前的精力。

C. 分栏集稿　集稿员依分工底原则，于四栏中各择一栏，一学期中从头到尾，专负收集、选择这一栏的稿件底责任；这样便人有专司，集稿既易于丰富，选材也易于精严。

D. 每周常会　集稿部每周会议一次，讨论选材及其他随时改良底事务。如此集稿部底精神便可望团结，机体也可望灵敏了。

二、内容的扩充　本刊现分言论、新闻、学术、文艺四大栏。言论、新闻当然是《周刊》底两重大部分。学术、文艺从前偶尔登载，却不常有；他们虽难同前两项比肩，但也各有独具的价值，不可轻视，所以我们现在要更加扩充。

A. 言论　《周刊》是清华自治底一大成绩，因他能代表我们自治底真精神——是一种醉心，预祝自治底达于焦点的热诚，即预报自治实现底先声。我们看从前的《周刊》里，冷讥热嘲，怨气冲天，细细推测其来源，无非是不满足于环境，满腔热血，力图改革，又不见实效，于是抑郁而发为愤词疾论而已。这些文字都是从热烈的心窝里流出的，代表一种最可宝贵的、诚恳的进步底精神。清华底自治精神，清华底生气可说尽结晶于《周刊》底几张纸上。目前校中美的恶的原素方在奋长争霸，《周刊》是舆论底正鹄，正需一种危词谠论，监示着这恶芽，不让他发育。所以今后本刊还是以言论为主要部分，而言论还是要保存批评底精神。不过批评须守着这五个条件：

1. 鼓励善良　批评不专是揭短。同学之间，过固然要规，善也要劝。以后有鼓励我校各种良风美德的言论，我们特别欢迎。

2. 注意建设　批评是方法，建设是目的；我们因为要建设，便不得不先批评。所以我们以后特别欢迎有建设计画的批评。

3. 务避愤激　批评是不得已的事；我们对于受批评的人或事，应抱一种爱惜的同情，我们的态度要和平公正。偏重感情，反蔽理性；个人攻击，徒起争端。以后凡是这类的言论，我们一概拒绝。

4. 力矫浮夸　先洞晓事实底真相，解透其所以然，才下断语，这样的断语便有价值。我们以后对于浮夸失实的批评也一概拒绝。

5. 删除琐碎　批评是样兵器，他的锋锐不可轻试。批评若用到寻常琐碎的事上，便成杀鸡用牛刀了。所以我们以后专收容讨论重大切要的问题底言论。

以上五条是应注意改正的。有那样诚恳求进底精神，加以这些改正了的

方法，不愁没有正确醇善的言论。

B. 新闻　新闻分校闻、通信同国内大事记。校闻总务求丰富翔实便是。德州保定顺德各灾区都有我校同学服务，深望同学常将他们的通信交来，以便每期摘要登载。别类的通信，如来自美国者等等都欢迎。

C. 学术　学术的讨论本是《学报》底材料，但是《周刊》向来也没有十分谢绝他们。自从《学报》夭折，各种学会又纷纷蜂起，应该有很多这类的材料堆积着没有机会销行。现在《周刊》大开门户，专辟新栏，他们将来定可替他放一异彩。

D. 文艺　从来最不受欢迎的恐怕是这一栏，一因真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底稀少，二因能鉴赏这种作品者底稀少。惟其真佳品难得，所以选材要宁缺勿滥。惟其真鉴赏文艺者难得，所以文艺更不能不提倡。

本刊革新底计画，已缕述如上。从此我们集稿员愿同全体同学准着这些条件，各尽其最高度的心力，扶着这个出版物向兴旺底境域走去。他若闯进了歧路，也是我们大家领导监察他的人底疏忽。我们不应一味地怨他，气他，甚至忍起心来还想戕害他。我们应抚助他，爱护他，尊敬他；他是我们学校底生命底一部分，我们的喉舌。

二月二十三日　《清华周刊》集稿部、经理部开联合会议，决定二十五日开茶会，请校长与顾问参加，讨论两部进行办法。茶会由先生与沈宗濂、蔡公椿、周兹绪四人筹备。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茶会在清华园工字厅举行，“到会者除本刊职员外，有校长代表郑之蕃先生，及顾问林兆棠、苏石如、郭玉清先生。两部报告经过情形，又稍稍讨论进行方法。校长代表及各顾问也有各教言”。（《本刊记事》，《清华周刊》第210期，1921.3.4）

二月二十六日　《清华周刊》职员会议，确定先生以集稿部主席身份兼书记。分工先生为文艺栏主席，负责采访“美司斯”、“美术社”、“一个组织”、三社团。（据《本刊记事》，《清华周刊》第210期，1921.3.4）

二月二十八日　新诗《美与爱》写定。发表于三月三日《清华周刊》第二一一期。收《红烛》。

在这首诗中，先生很重视运用“幻象”，他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中说到这首诗：“我觉得我的幻象比较地深炽，所以我这幅画比较地逼真一点。”

三月初　为毕业纪念做准备，辛酉级“举定闻多、方来、杨廷宝、董大酉、浦薛凤五君讨论该级级针、级旗及纪念物之样式”。（《清华周刊》第210期，1921.3.4）

三月三日　《敬告落伍的诗家》写定。发表于十一日《清华周刊》第二一一期。

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五四运动中，新文化日益深入人心，但清华却增添了一门美术文，讲古代诗词文章，先生认为这不合潮流，说：

> 我诚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若是定要执迷不悟，你们就刊起《国故》来也可，立起"南社"来也可，就是做起试帖来也无不可，只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顾顾大家底面子。有人在那边鼓着嘴笑我们腐败呢！
>
> 若要知道旧诗怎样做不得，要做诗，定得做新诗，看看下列这几篇文就够了：
>
> 《我为什么要做新诗?》——胡适(《新青年》六卷五号或《尝试集》)
>
> 《谈新诗》——胡适(八年十月《星期评论》五号)
>
> 《新诗底我见》——康白情(《少年中国》一卷九期)

三月四日 《清华周刊》第二一〇期刊登辛酉级放洋准备消息，并云推举先生与方来、杨廷宝、董大酉、浦薛凤负责讨论级针、级旗及纪念物样式。"高四级以出洋期近，业已敦请斯密斯、王力山、马伦、狄玛、梅月涵、麦克洛斯、庄达卿、罗伯森、戴志骞、马约翰诸先生为顾问，以便对于选择职业学校，有所请教，不至举止失措云。今年美国新到之各种学校一览，已经图书主任戴先生之许可，移与高四级，所以便该级同学随时阅览。他级级友愿披阅该项书籍者，亦可往高级所。今夏高四级放洋，闻校中已购定船票百〇六张，船为'中国号'，驶行期则为八月十二号。每年高四级出洋时，均立一种纪念品，今年高四亦拟照办，费用定为三百元，惟该级以直鲁灾情重大，需用赈款，已决定提出十分之九捐给灾区，十分之一则立一纪念物以纪念该级之毕业，及本年这旱灾云。高四级已举定闻多、方来、杨廷宝、董大酉、浦薛凤五君，讨论该级级针、级旗，及纪念物之样式。高四级已定于毕业时，发行级书，以作纪念，现已议定由该级中英文书房二人筹备其事。高四级已举定顾德铭、董大酉、时昭涵、吴泽霖、王世圻五君预备船上事宜。高四级讌请教职员事及请同学事，由该级职员办理，至于级日会序则由陈念宗、吴泽霖、董大酉三君筹备。"(《校闻》，《清华周刊》第 210 期，1921.3.4)

三月十一日 晚，辛酉级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先生等人设计的级旗及级针式样，通过级书内容办法及并用款数目，招待诸顾问。(《级会·级事》，《清华周刊》第 212 期，1921.3.18)

三月十二日 晚，出席《清华周刊》集稿部会议，时，《清华周刊》集稿部已拟定于十周年纪念日出版《十周年纪念增刊号》，"但以事繁，人数不够分配，现定请十人帮忙，故于上星期六假工字厅开茶话会，兼请经理部，每人出洋三毛，作茶费之用。"

(《杂类》,《清华周刊》第 212 期,1921.3.18) 所请十人为浦薛凤、吴景超、孙瑞璜、方来、沈有乾、王绳祖、潘光亶、梅贻宝、陈石孚、姚崧龄。(《本刊记事》,《清华周刊》第 213 期,1921.3.25) 会上,推举先生与周兹绪、潘光旦、吴景超、浦薛凤五人为《十周年纪念增刊》集稿委员会委员(总集稿人),以浦为主席。(据《本刊记事》,《清华周刊》第 213 期,1921.3.25)

三月十五日　是日至二十二日,即将毕业的辛酉级同学进行体育考试。据体育教授马约翰报告,"高四级'活泼试验'及格者已有五十人。'体力试验'之分数,凡已受试者均超过所规定之三百分,时君昭涵获九百三十余分,为该级体力分数之最多者。"(《体育部》,《清华周刊》第 213 期,1921.3.25) 体育考试是清华学生出国前必须通过的项目,凡不及格者不能放洋。五月十六日,又举行了补考,结果仍有八有未及格。考试项目,据梁实秋《清华八年》说有田、径、爬绳、游泳等项。陆地上的百码跑、四百码跑、铁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等,平时还可以练习,游泳则不易地过关。先生的体育成绩很差,游泳更糟,考试时是临时突击,才勉强通过。

三月十八日　晚,辛酉级宴请本级毕业顾问。《清华周刊》报道云:"上星期五晚六时半,高四级假工字厅设宴,请该级顾问及金、何两先生。到者金校长及其夫人,何林一先生,司美女士及夫人,罗伯林先生及夫人,狄玛先生及夫人,马龙先生及夫人,马克洛斯先生及夫人,戴志骞先生,梅月涵先生等十六人。马约翰先生与夫人因事未能到。首由级长熊祖同君致开会词,表述开会宗旨为欢迎顾问及金、何二先生。自后该级同学关于出洋后择科选校种种,可向各顾问请教。席间宾主杂坐,谈笑唱乐,讌毕,入工字厅茶话。末由级长致谢而散,时已十时矣。"又云:"何林一先生请高四同学茶话,每次十余人。今夏高四赴美,盖由何先生护送云。"(《各级纪事》,《清华周刊》第 213 期,1921.3.25)

三月十九日　出席《清华周刊》集稿部会议。先生因工作头绪繁多,还任学校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国剧委员负责人,故辞《清华周刊》集稿委员会委员。"(《本刊记事》,《清华周刊》第 213 期,1921.3.25) 但仍任集稿员。

三月三十一日　丄社"举行周年纪念会,是日该社社友曾旅行至万牲园,开茶会,讨论该社进行方法,并欢迎新社友方重君"。(《丄社》,《清华周刊》第 215 期,1921.4.8) 至毕业,丄社成员只增加了梅贻宝、方重两人,共八人。

一年来,丄社活动很多,成为清华同学中重要的社团之一,《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介绍丄社一年来活动情况:"这是一个小小的、互助的团体,起初只有四人,后来加到六人、七人,以至八人。何以名'丄'呢?是古文'上'字,所以表明上进底意思。'丄'又是中国数码底'六',采此名时,社友正有六人。他的寿命如今已满

周岁了。这一周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一、知识的互助时期(一九二〇年三月至六月)。起初有四个人，感于智识饥荒，想用互助的方法研究一点课外的学问。他们开了一两次会，觉得人数太少，便又加了二人，共为六人。他们是刘聪强、孔繁祁、潘光旦、吴泽霖、闻亦传同闻一多。他们每星期开一次会，每人轮流当主席及书记。每会阅二小时，半为读书报告，半为问题讨论。三个月中共有读书报告十六编，可分为历史、美学、文学、农艺、哲学、经济、娼妓七类。问题讨论有称谓、服饰、取消姓氏、中国目录法索隐制及校内公益各问题。二、过渡时期(一九二〇年六月至九月)。第一期底成绩虽历历可考，却是到了末叶，精神很涣散。有两个人居然起了离社底念头，可是都立刻打消了。暑假里大家感受离索底反响，渐渐觉悟纯粹的知识上的互助不足餍塞他们的需求；他们都觉得精神的饥荒了。这时用通信方法讨论了几个问题，如本社进行底改良、隔词法、伦理主义和基督教等等。又有一个山西陆军底调查。三、精神的互助时期(一九二〇年九月至今)。这期内增社友二人为梅贻宝与方重。读书报告现在变做常识报告，又加了一个人近状报告。到现在，常识报告、问题讨论都停止了，开会时专报告或磋商个人的状况或计划。这期里有三件事表明社友精神的修养和互助底进步。(一) 宗教观念底发达。社员中本有四人是基督教徒；一人因感受唯物思想底影响，中途退出，在这期内又归依了。又一社员本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研究底结果，却指出美育可以辅进宗教，不能代替，他现在也受洗礼了。其余的人素持反对态度，现都打破成见，用心研究了。(二) 改良社会底实行。校内所演的电影片子，他们怀疑了好久，后来曾用一个月底功夫去研究，把所得结果和改良意见，登在《清华周刊》里；一方面又提议到学校实行改良。结果是：一、减少次数，二、改换较良的片子，三、引用别种俱乐。他们虽达到这几种目的，然所受的反对，实为前此所未有[①]。他们讨论过几次改良校风底问题，都没有结果。在校中各种会社服务里，这期里他们多为之首领，提倡不遗余力。(三) 灾区服务底踊跃。八人中有三人到山东平原一带，三人到直隶唐县一带。”

工社有时也谈论些国家政局的事。方重记得有一次工社开会，先生在会上大骂桂系军阀，具体说了些什么则记不起来。(据访问方重记录，1986.8.27)

在这之前，先生还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吴泽霖回忆：“关于信基督教事，我们几个知己朋友态度几乎是一致的。我们都读过圣经，对上帝如何创造宇宙、创造人的故事，我们都不信，认为是迷信。但对宇宙万物能构成一个有条不紊的巨大体系，

① 《清华周刊》第208期刊登了李迪俊《电影与工社》、涤镜《电影存废问题》、丁济祥《对于电影问题之不平鸣》、介父《工字解诂》，都与工社持激烈的反对观点，介父之文中还有嘲弄文字。

都感到万分惊异，带有不可知论的态度。至于基督教的善恶、道德观、与人为善、服务社会、平等待人……等等思想，我们都认为人人都应信奉而且加以扩散。我们都在海淀的一个中国教堂里正式受过洗礼，在我们看来，洗礼等于宣誓，表示对这些教义深信不疑而且愿意身体力行。但我们并不相信教堂里那些迷信性质的那些仪式，同时我们认为基督教义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结合中国情况而进行宣传，无须由外国传教师来包办一切。'入教应在中国教堂由中国牧师施洗礼'是原话，我们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在海淀的教堂里受了洗礼，后来几乎都没有到那里去做礼拜。以上那些想法，后来当然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彼此间也就不再谈及了。"（吴泽霖给编者的信，1987.7.13）

时，清华学校师生中有不少基督教信徒，学校还成立了全国青年会的支会，归北京青年会学生部直接联系。关于清华园中的基督教活动，潘光旦回忆说："每年，或隔一两年，看情况，青年会又必主办一次所谓'布志大会'或'奋兴大会'，请北美青年会派来中国的有名的'布道家'主讲，连讲两三天；大会终结前，必孰劝听众填写所谓'决志书'，表示皈依的志愿。这些开讲人物的讲法各有巧妙不同，但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是'辩才无碍'，声容并茂，富有上面所说的'演说家'的煽动力；第二是从整个的'中国问题'讲起，把确乎是漆黑一团与危险万状的中国局势说得更加漆黑，更加危险，然后逐步转进到绝无仅有的一线曙光与一颗救星，那就是基督教了。他们从山穷水尽一直说到柳暗花明，却真有一套本领；一次大会之后，总有不少的同学在'决志书'上签了名，接着'受洗礼'、'吃圣餐'，成为基督徒，少数还在海淀的教堂里当上了'执事'。但据我观察，这种靠一时的'奋兴'而'决志'皈依的同学绝大部分没有坚持他们的信仰，一旦诞登太平洋彼岸，接触到美国社会生活与教义大相刺谬的种种实际，多数无形地放弃了；个别的为了求一个心安理得，还写过文章，婉转说明所以不得不放弃的理由，更有进一步劝说毕业后准备到中国来传教的美国同学大可不必负起这样一个'使命'。当然，这班同学当初的所以进教，思想上也是很复杂的。他们的宏愿是出洋，信了教，有了个信徒的名义，对这宏愿的完成，无疑地是个便利。有到这种出发点的人对信仰当然也不可能太认真，更不说坚持了。通过青年会的关系，一九二一年，清华园还一度被提供作为'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的会场。平时一般同学对青年会的活动不大置可否，这次，在一九二一年爱国运动之后，却有了鲜明的分化。基督教徒与一般青年会会员对这件事当然是支持的；一般同学则在地边看热闹，其中有些要把宿舍让出来的，大概也不会太满意；另有少数同学是反对的，他们得风气之先，已经认识到这一类的活动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方面，他们似乎还贴过一些标语，把这种认识率直地表达出

来;而在支持的一面则曾在口头上为之辩护,我自己当时是辩护人之一。实际上,青年会本身的存在也一直有同学反对,不过从没有具体化;只是在有一段时期里,少数同学成立过'孔教会',像是对青年会唱对台戏。"(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96至97页)

潘光旦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学生王康,在闲谈中曾问潘光旦为什么接受基督教洗礼。潘光旦说:"情况各有不同,都不外从'实用主义'出发,最主要的是搞教会工作的人都是校内的特权人物,他们的好恶往往可以影响学生的命运,不能得罪他们;如果关系搞得好,眼前是可以增加练习英文的机会,将来出国去可能还会得到什么照顾!有的人喜欢音乐,吹吹唱唱也不过是图个奸玩吧了。还有些同学则是遇到'团契'活动或圣诞节日,那些外国人总要拉些学生做客,白去吃点东西,得点'礼物',又'增进'了师生感情,何乐而不为!当然上帝也有作用,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在遇到什么突然惊呀的事情,中国人的传统是喊一声'妈呀!''天啦!'在清华就会叫'主呵!''我的上帝!'"。潘光旦还引提到孔子的"敬神如神在",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大致就是'清华人'的宗教观吧。(王康《闻一多传》,第35至36页)

四月一日 《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一四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这是一篇对清华学生轻视国文倾向的素描,表现了先生对这种风气的不满:

> 先生:"今天要考了。"满堂大哄,有的骂,有的笑,强狠的开门要走,和平的讲这学堂从来不兴月考。好容易经先生敷衍了半天,才慢慢地坐定了。先生把题目刚写完了,屋后一个声音叫道:"咳,混账吗!出这些题哪做得完?"……
>
> 从"去张"运动以来,天天喊改良中文,到今天中文课堂底情形便是这样。难道考月考也是教员的错吗?中文所以不能改良,学校怕麻烦,教员不自爱,当然要负一份责任,恐怕罪魁祸首还是这一般负自治的盛名的学生吧!在英文课堂讲诚实、讲人格,到中文课堂便诵骗欺诈、放僻嚣张,丑态恶声,比戏院、茶馆、赌博场还不如。才吃过一餐饭,便把那骗洋人的假具扯破了,露出中国人的真像来了。这样还讲改良、讲自治,不要愧杀人吗?
>
> 现在人人正忙着预备十周年纪念会:成绩展览、演戏、刊杂志,五花八门,辉煌灿烂,可惜都是骗人的呵。
>
> 把这中文课堂底跟同类的丑态展览出去,才是真清华呢!

清华重英文、轻国文的现象已非一日,一位这年秋季入校刚刚上过不到两个星期的新同学对此十分吃惊。他说:"我第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那种严肃的态度,实令人肃然起敬。孰知到了下午上国文课的时候,就变了卦,种种的怪声,几和舞台

内一般。我心里就很奇怪的，但还以为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原故，下次恐怕未必这样。孰知两星期来没有一天不是这样。这是令我很失望的，长此以往，国文还想有什么进步！"这位同学认为这种现象一定有原因，除了教员方面外，学生方面也存在轻视国文的观念。他认为："他们的心理，是以为国文算不了什么，由此就有种种无意识的举动，发生起来。我敢说上国文课的时候，能专心听讲的人，只不过二三人而已。其余读英文的读英文，谈话的谈话，捣乱的捣乱，这都是轻视国文的一种表现！"（楚：《中等科国文课的纷乱》，《清华周刊》第227期，1921.1.25）

清华学校是所留美预备学校，课程安排完全为适应赴美留学而设置。开办之初，本无国文一课，国文课程是一九一三年周贻春出任校长后才开设的。有人介绍这段经过时说：周贻春认为清华学校"虽确是一个游美预备学校，然而学生毕业后留美，留美几年回国，还是一个中国人。既是一个中国人，自然要帮中国办事，既是在中国办事，离不得和一般中国人有书信的来往，或中国文化学术上的关系，所以周先生特要在清华添设国文一科，以使清华学生在中国读书的时候，于注重西文之外，同时能拿国文弄好，庶几留美回国时，不至对于本国文字，如对一未曾学习过的外国文一样，张开口不会讲，拿起笔不会作，这个法子，是周先生的'眼光远大'、'思想充足'所致。倘若没有周先生，我真不知道清华办到如今，有所谓国文一门没有啦！但是周先生仅仅拿国文一科，列在课程中间，对于他并没有何等的注重。因为任那个时候，虽然每两星期作文一次，每两星期作札记一篇，每月有月考，年终有大考，由教员评判甲乙，记出分数，或超，或上，或中，或下，以及未等、不列等，然而对于毕业的成绩，毫无关系，只要西文及了格，那管你国文下等或末等啊！学堂拿这种法子对待国文，而学生也就不得不'趋向大势'，'顺水推舟'，对于国文'视若赘疣'。这是已往的事实，真正使人有不满意的地方。自从严鹤龄先生代理校长①，知道从前学校对付国文的那种法子不好，于是决计拿国文来'大加整顿'，一面修改国文内部的课程，除掉那些干枯无味的东西，添加许多对于学生现时有趣，将来有用的功课。一面又恐怕学生仍然如从前一样的'视国文若赘疠'。于是拿计分数的法子改良，和西文部一样，并且在高等科毕业，总要二十四个积点。自从这个样子一来，我们学校对于国文，真是自无变而为有，自有'而视为赘疣'，变为'大加整顿'、'实行注重'，确实讲得进步有'一日千里之概'了。然而实行注重国文，到如今已经有半年了，我只看见过注重国文的名称，没有看见过注重国文的实在。"（旁观

① 一九二〇年春，北洋政府外交部委派罗忠诒继任校长，但遭清华学生抵制，故罗未到位即请辞。清华董事会遂推选其主席严鹤龄为代理校长。八月，金邦正接任校长，其前均由严鹤龄主持清华学校工作。

《我为国文教员鸣不平》,《清华周刊》第 208 期,1921.1.21) 清华学生对国文的轻视,在校外也人所共知。一九二二年二月,马约翰教授上体育前,还向同学们说:现在清华国文堂秩序纷乱的情形,已然蜚声校外,无人不知,宜加注意。有人说:"国文堂的事情,竟劳体育教授说话,可见这件事体是非常重大。"(秋《国文堂秩序纷乱的真因》,《清华周刊》第 237 期,1922.2.24) 可见,严鹤龄对国文课的"整理",并没有对清华学生扭转轻视国文方面起多少作用。

四月十五日 《清华周刊》报道辛酉级出国准备,云"高四级《级书》所用照片,已于两礼拜前由北京谭星波相馆代照。该《级书》定于毕业礼时出版。(《校内新闻·青年会》,《清华周刊》第 216 期,1921.4.15)

此后,又陆续报道出国制装:"上海恒康西衣庄经高四级同学多人之招,于是礼拜派二人来校,包做西衣。闻同学中订作者甚多。惟彼等住三四日后即行返沪,所订衣件须五月中旬方能作竣。"报道要求增加治装费:"高四级前因近年物价腾贵,往洋时,所发治装费二百五十元恐不敷用,因呈请董事会酌予加增,已由董事会批驳在。惟该级毕业期迫,诸种衣装物具,亟宜预备,而需款浩大,据核实计算,须中金四百三十元左右,方能稍称完备,校中所以,既仅及其数之半,该级同学又非尽豪富,不易自供,乃于前周议决向董事会作第二次之请增治装费,想董事会素审学生出洋需款之实在情形,当能允其所请也。"报道学科选择:"高四级同学将来赴美所习学科,及所入学校,校中限于四月底择定填缴,王文显先生为辅导该级同学的选择起见,特于前星期对该级演讲选科当注意之点,及美国学校优劣的情形。先生主张于未得学士以前以入小大学为合宜云。再有留美回国学生林君者,在美年久,熟悉各地情形,现应高四级之请,将于本星期二来校与该级同学作短时间之谈话。"(《校内新闻·各级纪事》,《清华周刊》第 218 期,1921.4.29) 报道与教职员团聚计划:"本级拟于毕业前请校中教职员一次,以资团聚,日期大约在六月三号左右。"报道眼目检查:"上星期六校中请北京名医何威先生来本校视察高四级学生有无目疾,其结果计有目疾者十三人,余均无恙。"(《新闻·级会纪事》,《清华周刊》第 219 期,1921.5.13)

四月十六日 上午十一时,美术社请俄国画家黎克雷(Lee Kney)演讲。《清华周刊》报道云:"黎氏在东亚已有六年,所作中国日本暹罗各处底风景水彩画皆有三色复印,流传各处,本校也藏有一套,曾陈列于图书馆。原画油彩水彩曾于本年三月经北京万国美术研究会展览一次,本校同学前往参观者甚多。黎氏是日所讲的艺术底精义又皆至理名言,听者莫不钦仰至极。"(《校内新闻》,《清华周刊》第 217 期,1921.4.22)

四月二十八日 《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出版。预定数达千份以上。辛酉级同学承担了此书许多工作,吴泽霖负责图画,罗隆基负责发行。后来担任清华

大学校长的梅贻琦负责印刷。(《校内新闻·各级纪事》,《清华周刊》第218期,1921.4.29)先生从筹备到编辑,也尽了很大气力,是该号主要负责人之一。先生本打算作一首反映清华生活和景物的长诗登在纪念号上,但没有做成。

四月二十九日　《恢复伦理演讲》、《公共机关底威信》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一八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恢复伦理演讲》批评学校把坚持多年的伦理演讲变成纯粹的学术演讲,"是学校的一大错误"。伦理演讲是清华同学课外活动的一个特色,中等科一般每周请本校教员演讲,多为讲述"中外名人事略",如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戈登、曾国藩。高等科则多请名人演讲,既有长期的、系统的讲座,如一九一六年美国明尼梭达大学教授麦克罗讲代议政治发达史,一九一九年美国柏令斯登大学历史及政治系主任谭雷讲天文学,一九二〇年梁启超讲国学小史,还有临时的演说。演讲的内容很多,伦理道德的标准也不一致,学生听过可以自由理解,这多少也算作是思想教育,先生有几篇文章便是听了伦理演讲后,受到启发写出来的。在本文中先生认为:

> 我们学校风气的堕落,思想的鄙陋,几乎到了无以复加之点。其原因固甚复杂,我以为取消伦理演讲,也是一端。伦理演讲虽没有积极地提高"道德音调"之力,可是确有"杜渐防微"、禁恶于未萌底一种消极的功用,至少也能指示给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使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真确纯粹的是非。(我们作事纵然不能一一行规蹈矩,只要出了轨道的时候,自己知道出了轨道,也是好的。)所以伦理演讲的功用便是劝善。学校有章程,犯章便记过、开除,这是惩恶。有惩恶而无劝善,是什么教育?
>
> ……
>
> 发达精神的生活,以调制过度的物质生活底流弊,只有三种方法:1. 伦理,2. 宗教,3. 艺术。而这三者之中,数伦理为下乘。现在我姑且"卑之无甚高论",只要小心地使用这最下乘的方法,也就聊胜于无。不料我们连最下乘的也得不着,并且一方面还有那万恶的电影百方地诲淫诲盗。长此以往,那只好让我们慢慢变成禽兽了罢!

《公共机关底威信》呼吁同学们要爱护学生会同《清华周刊》,说:"公共机关是公众的产物。爱'德谟克拉西'的,便当爱公共机关。爱他,便不得不监视他,使遵于正轨;也不得不尊敬他,以保持其威信。他若走出了轨道,人人有纠正惩罚之权;他若没有出轨,而有人侮辱他,这加侮辱者,人人便当认为公敌。"此言似针对校内有人"糟蹋"学生会与周刊而发。

四月三十日　是日至五月二日,清华学校举行建校十周年纪念。是日举行纪

念大会，外交总长颜惠庆到会致词，另有毕业生俱乐会、英文剧演出等。五月一日招待来宾，举行大礼堂落成典礼，和成绩展览、童子军操演、体育成绩展览、音乐会等。成绩展览中有美术展览，地点在旧礼堂北半部，负责人为史达女士。晚，演出中文戏剧，剧本为陈大悲编写的《良心》。五月三日，继续举行成绩展览。（《十周年纪念纪事》，《清华周刊》第219期，1921.5.13）

五月四日 辛酉级毕业生赴美所学专科及拟入学校均于是日前确定，先生在表上填写了美术科。杨廷宝回忆："快毕业的时候，我们的美术教师司达女士希望我们两个都在学习专业的志愿书上填写美术，我因考虑到家庭生活问题，决定填上建筑学，而闻一多当时即决定学美术。但到美后不久又改学戏剧[①]，并邀我到纽约，劝我改学舞台布景。"（杨廷宝致黄廷复信，1980.7.17，未刊，黄廷复存）六日，《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载《高四留美肄业学科表》，云先生拟入芝加哥美术学院。

五月十二日 先生与吴景超谈起暑假中的打算，吴景超曾用诗句记述了自己的话：

> 人生最完满最快乐的生活，
> 只是诚心悦意地加入社会去活动，
> 使我所居的社会，因为有我，
> 可以向真善美的仙乡，再进一步。
>
> ——五月十二日对一多说（《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1921.6）

五月十三日 《痛心的话》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一九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上星期，有三位高等科学生因旷课日久，被学校令其退学。实际上"察其内幕罪实不止此，盖此三人曾涉迹花丛，后经调查属实，遂刻不见留于校也"。《清华周刊》报道此事时特做案语，云："本校学生向来守身如玉，从不沾染北京打牌、吸烟。逛窑诸恶习，而本校因以此自豪于京中各校。今也不然'手握多张如撑团扇'者打五百者也。闭门潜处吐雾吞云者，吸雪茄者也；去岁之醋海生波跳楼寻死，今年之旅馆为家，流连忘反，逛窑子者也。凡诸在全体同学中，仅每百分之二三，固属最少数，然有此少数即足以败坏清华之名誉而有余，吾人不可不注意也。此次所惩三人，罪有应得，诚不足惜。最可惜者，清华学校洁白名誉上受此污点，不知何日方能洗净了。"（《校内新闻》，《清华周刊》第218期，1921.4.29）先生之文，就是为此而作。

---

① 先生留美三年均学美术，虽曾参与戏剧活动，但未改学戏剧，此处显系记忆之误。

文中认为“学校最近开除了三个人‘大快人心’的事”是件好事，但“学校素来于积极训善的事毫不注意，一旦学生犯了规矩，就要开除。‘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办事人怎样对得起这几个学生的家庭？怎能问得过自己的良心？”

五月十九日　晚，清华学校教职员华员公会请先生等高四级全体同学茶叙，内容为各游戏，晚十时方尽欢而散。（《各级记事》，《清华周刊》第221期，1921.5.27）

五月二十日　诗《爱的风波》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二〇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这可能是先生所作的第一首十四行诗（后来先生称这种诗体为“商籁体”），但认为这“试验是个失败，恐怕一半因为我的力量不够，一半因为我的诗里的意思较为复杂”。（《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也许是这个原因，这首诗收入《红烛》时做了较大的改动，并改名为《风波》。

同日　晚，辛酉级开会讨论毕业纪念日筹备事。《清华周刊》报道云：“该日下午会序已议定为述级史、别辞、演说、读级诗、唱级歌等等。晚间会序为音乐、电影、冷饮等等。晚餐时，并在礼堂前草地宴请全校同学，以志欢别。现已由级日筹备委员吴泽霖、董大酉、陈念宗三君分项积极筹备矣。该级以拟赠校中纪念物之用款，捐诸华北灾区，已志前刊，闻现拟别制一金牌，镌纪念捐款之原由于上，留于校中为大礼堂饰以斑点品，赠牌式亦将于毕业纪念日举行。”又云：“高四级同学以在校日久，所知校中情形为较熟悉，况现离校在即，尤不能不对校务这进行改良有一诚挚之批评或建议，以为临别赠言，故该级会日前全体通过‘毕业前应与校中提出改良清华各方面种种之意见’之建议案，以为校中谋幸福计。并当场举出沈有乾等十二人为委员，计画此事。”关于增加出国治装费事，亦报道云：“高四级请求外交部、董事会增加治装费一节，迭志前刊，兹据校长处转来外交部通行云：凡清华学生官费出洋，当每名改给治装费三百六十元，此后永为定例等语，似此，则增费一事，高四已庆成功，将来毕业各级，悉得援例，出洋治装费用，当不至十分困难矣。此固外部及各董事体贴学生这至意，而该级前代理级长吴泽霖君之办事认真，亦可钦也。”（《各级记事》，《清华周刊》第221期，1921.5.27）

五月二十八日　《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写定。后发表于六月出版之《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这学年，《清华周刊》共刊登了十七首新诗，有先生的六首，本文即对“其余十首将逐一论之”。[①] 这十首诗为《一回奇异的感觉》（周念诚）、《给玳姨娜》（浦薛凤）、

① 先生漏掉一首，即逖生（浦薛凤）的《帆舟底出发》，载《清华周刊》第208期。

《圆黄的月》(涤甦译,原作"Moon's So Round and Yellow" By Mathias Barr)、《忆旧游》(吴景超)、《出俱乐会场的悲哀》(吴景超)、《雪》(化炅)、《慈母》(滔天)、《冬天》(滔天)、《月食》(王造时)、《游圆明园》(李相钰)。评论之前,先生首先指明:"诗的真价值,在内的原素,不在外的原素。'言之无物'、'无病而呻'的诗固不应作,便是寻常琐屑的物,感冒风寒的病,也没有入诗的价值。下面的批评首重幻象、情感,次及声与色的原素。"但是,除了这些,先生还有一些很有见解的思想。如在谈到诗的形式时认为:"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他的美了。"谈到创作动因时说:"诗人胸中底感触,虽到发酵底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膨胀,自己爆裂了,流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魂的作品。诗人总要抱着这句话做金科玉律:'可以不作就不作。'""诗家须有一种哲学,那便是他赐给人类的福音"。先生还主张新诗可以取材于旧诗:"我并不是说作新诗不应取材于旧诗,其实没有进旧诗库里去见过世面的人决不配谈诗。旧诗里可取材的多得很,只要我们会选择。例如那锣鼓式的音节决定学不得。乐府、词、曲的音节比较地还可以借用,诗的音节决不可借。"谈到"女性"时,先生说:"女性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所以他要用最高贵的言语赞颂雪的美,便不得不讲女性。……若是没有女人,一大半的诗——一大半最宝贵的诗,不会产生了。"这些论述,在先生自己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

是月 清华学生与教职员发生冲突,日后先生曾对王康谈起过此事。王康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五月,学生自治会通过了一个'用投票法取缔劣等教职员'的决议。校长为此暴跳如雷,因为这要影响他自己和那份靠裙带关系引来的人员;还有一些平常在校作威作福、骄横狂妄而又不学无术的美国教员,也着慌起来。这个决议显然是要出他们的"洋相"了。他们串通美国控制的董事会,公然要求学校压制学生,认为这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闻一多同他的几位好友都参预了这个活动,以后谈起都很有风趣:'这决议当然不可能实行,学生会怎能有那么大的权力?这只是在不正常情况下才会发生的插曲,不过是解解气而已,也表明经过五四运动的中国学生不是那么好随便摆布的。'一时双方僵持了一阵,大家觉得反正给了那些不正派的中外文人一点颜色看了,事过境迁,也就算了。"(王康《闻一多》,第53页)

六月三日 为吴景超的诗《出俱乐会场的悲哀》所作的《附识》,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二二期。全文如下:

> 景超以为我们的俱乐场中底种种游戏,总不外性欲杀欲两个半被文化征服的原始冲动底发泄。这种冲动是破坏文化的,所以我们不应给他们发泄机会。可是现在校中使用这种游戏底风气很盛,少数能置身于物质世界之上的

人还不致受他的影响，但多数的“弄潮儿”恐怕难免惨遭不测，葬身鱼腹之险。我读这首诗，想叫那充满性欲杀欲底表现的电影片，全校的人把他当饭吃，我便“不寒而慄”呢！不知景超曾否为他们祈祷过：

“天可怜那弄潮儿们，
少叫他们遭几场危险！”

自从上社关于电影的讨论在校中引起轩然大波后，一些人非难先生等人，说他们是“‘假君子’、‘新圣人’、‘清教徒’。我们这些人在感到孤立之余，有的泄气了、动摇了、不再吭声了。一多却完全不同。他非但毫不气馁，反而鼓动我们正式组织起来继续干”。（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62至163页）先生的《附识》就是这种不屈性格的表现。

同日　《清华周刊》刊登学校关于“高四级特别泅水时间”，“为每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时至十一时，届时只许该级同学练习”。清华规定学生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每日下午四时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此间图书馆、自修室、课堂、寝室一律上锁。

同日　《清华周刊》每年暑假前都出一次增刊，但这年“校长以今年已出十周年纪念号为辞，谓本期不得过六十页”。周刊集稿部开会，认为不妥，于是在本月一日派经理沈宗濂和交涉员张忠绂找校长，未遇。二日复去，校长未允。晚开会商量办法。是日先生与“集稿员全体至校长家，微雨，未遇。下午又见校长”。（子缨《本期增刊交涉始末记》，《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1921.6）

六月八日　六日，《清华周刊》集稿部将第七次增刊的全稿阅毕送校长，校长认为《清华男女同校运动之新趋势》、《斋务长问题》、《清华兵操的末日》三篇不能登。集稿部开紧急会议，认为有些问题过去周刊上曾讨论过，可以发表。是日，先生同姚永励、张忠绂、吴文藻、陈华寅五人赴校长住所力争，后互有妥协，增刊经费遂以解决。（据子缨《本期增刊交涉始末记》，《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1921.6）

同日　清华全校学生召开大会，讨论抗议“六三惨案”办法。

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一次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将大批财力投入战争，以致教育费也大量挪用，公立院校经费因此被长期拖欠，教职员生活无法保障。为此，北大、高师、女高师、法专、农专、医专、工专、美术等八所国立高等学校教职员，于是年三月十四日宣布停止职务，四月八日又举行罢课。随之，其他学校教职员亦加此行列，并得到全国各界联合会等团体的通电支持。四月十二日，八校学生两千余人手执“读书运动”旗帜，赴国务院、总统府请愿，要求发放教育经费，声援八校教职员罢课。迫于压力，总统徐世昌下令财政、交通、教育三部制订筹拨经费办法。四月三十日，国务会议通过三项办法。五月三日，各校教职员向校长提出政府履行此三

条保障之方法，并声明此项保障方法办妥后，即可立即恢复职务，开始上课。但是，时越两旬，内阁总理靳云鹏对筹款办法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甚至于五月十九日操纵国务院宣布前订办法一概无效。这一行径激起教职员们的极大愤怒，于是二十二日宣布第二次辞职。六月二日上午，北京二十九校学生代表赴国务院请愿，靳云鹏拒绝接见，双方僵持至午，代表们不仅茶水无着，且遭不堪入耳之讥讪。六月三日拂晓四时许，坚守在国务院前的学生代表经四次交涉方得入内，却遭到一连卫兵荷枪实弹的看守。消息传出后，各校紧急协商，决定举行大规模请愿。上午十时，北京中小学以上男女二十二校学生六百余人，手执"教育破产"、"请政府履行国务会议议决三条"等标语，冒雨齐集新华门东门外，要求总理接见。下午，二十二所公立学校的校长与八校教职员代表，及学生共千余人，再至新华门请愿。教育部次长马邻翼出面，对代表要见靳云鹏的要求，只允代转，不能负责。代表们不满马的应付态度，遂欲拥入。时，早有准备的军警，荷枪持刀，见人就打。法专校长王家驹腰背腹部受枪柄重击；医专代理校长张焕文头部遭创，血流满身；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席、北大教授马叙伦头部及左腰亦重伤，全身是血；北大教职员代表沈士远教授额部受刺刀刺破，一脸鲜血。军警不识教部次长马邻翼，也遭痛殴。（据《国务院军威下之教职员学生》，《晨报》，1921.6.4）惨案中，受重伤者除王家驹、张焕文、马叙伦、沈士远外，还有高师教授黄人望、张贻惠、女高师教授汤璪真、医专教授毛咸、工专教授许绳祖，及职员和学生刘兴炎、何玉书、封挺楷、王本仪、陈激、梁惠珍、刘因民、赵林书等多人。（据《挨打后教职员学生之文告》，《晨报》，1921.6.5）至于受轻伤者，则不计其数，这便是震动全国的"六三惨案"。

北京各校索薪期间，有美国退还庚款为经济后盾的清华学校均未介入。三月十四日八校教职员宣布停止职务后，清华学生会早曾集会多次，筹商援助办法，但多数以为通电上书只是纸上谈兵，代表请愿亦为与虎谋皮，俱非根本解决妙策，故始终未有具体行动，致使北京市学生联合会批评清华学生不该置身事外。

六三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学联宣布罢课声援，部立私立学校相继起而声援，且对清华学校寂然不动多加责难。清华学生会评议部认为时机已迫，万难坐视，遂于六月八日通过《清华学校明日罢课》案，决定执行市学联的决议。当晚，此案提交全体学生大会讨论，"经三小时的争辩，多数以为：一，罢课系自杀政策，以杀止杀，万难有济。二，现今政府非罢课所能警醒，万不得已，罢课一事也只能作同情的表示。故大会将评议部的议案修改为清华学生应该罢课，惟须与北京部立私立各校取一致行动"。（《清华罢课风潮始末记》，《民国日报》1921.7.5）先生此时亦取此种态度。

六月十日　俄文专修馆等学校罢课消息传来，是否与全市学联采取一致行动

举行罢课已迫不及待。是日清华全校学生再开大会，以二九二票对一一九票通过“同情罢课案”。次日，清华学校当局则宣布大考按原定十三日如期举行，不参加大考者取消学籍。

六月十三日　是日为全校期末大考日，但学生无人进入考场。为此，清华教职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晚，校长金邦正将会议结果报告董事会，董事会遂做出决议：“本期大考改于十八日举行，不赴大考学生即认为自请退学”。

晚，清华学生会评议部、干事部主席接到金邦正转达之董事会决议后，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大会议决：一，无论学校用何种胁迫，清华学生对于罢课案坚持到底（赞成票四二四票，反对者二票）。二，罢课终止时，全体要求学校实行补考（赞成者四四〇票，反对者一票）。旋，学生会派代表向董事会说明：“第一案表明清华学生牺牲的决心，第二案是供清华罢课并非逃考的证明。”但董事会未肯改口。

后来，学校又改大考于二十二日举行。

六月二十日　辛酉级召开级会，讨论熊祖同、浦薛凤、薛祖康等提出之“高四级单独大考案”。经激烈争辩，表决结果“单独大考案”以三十六票对二十七票通过。赞成者认为这是辛酉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全级成员理应遵守。反对者则认为全校学生六百余人，赞成单独大考者仅三十六人，属极少数，理应服从全校多数学生通过的决议。先生与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等坚持罢考，并表示：“案虽通过，但行动仍属个人自由，不愿大考者，自可拒绝参加”。（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第 73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10 月出版）

六月二十一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通过《各校于暑假起首日宣布罢课终止案》。暑假于二十六日开始，先生等要求学校于二十六日再举行大考，以便参加考试，但校方拒绝。先生等亦不妥协。

六月二十二日　清华学校举行大考。非毕业各班一律罢考。毕业的辛酉级有三分之二走入考场，而先生等二十九人拒绝参加，被取消学籍。

对这一过程，亲历其事的吴泽霖回忆说：辛酉级曾召开两次级会，第一次通过“高四服从多数”，第二次通过“在未正式宣布罢课终止以前，高四级不单独大考；未大考以前，不毕业出洋”。“我级多数级友，包括一多和我在内，都认为这一运动与五四运动性质不同。但我们清华学生现属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理应参加这一运动。我们赞成进城参加游行、进行街头宣传、散发传单等等行动，实际上我们的确也参加了。但起初我们并不赞成举行总罢课。不过时间一拖，城内多数学校的教师都坚持罢课，学生联合会也通过了总罢课的决议，从而我们级友们的态度也变了，觉得我们理应与北京学生们行动一致。辛酉级是毕业班级，部分教师给我们做

了不少劝导工作,但我们仍决定同其他班级一致行动,参加了总罢课。"(吴泽霖给编者的信,1986.5.15)

吴泽霖在《老友一多二三事》中还回忆到:"到考试的第一天,我们全级分化了。三分之二的级友没有顶住压力,屈服了,走进了考场。他们的理由是,首先,最初学联前来征询清华态度时,我们学生会就表示不赞成并明确表示了保留意见。其次,考试涉及毕业问题,毕业考试并不是上课,并不等于破坏罢课。而我们属于少数的二十几人则认为,既然参加了罢课,就不应该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半途退出集体行动。参加毕业考试意味破坏罢课、分化学运、出卖清华学生会的荣誉,也是对学生联合会的背叛,抛弃了正义。于是,一多与我们二十几人在发表了意见、拒绝了考试之后,默默接受了学校的处分。我们黯然离校,与多年同窗挥泪而别,各奔前程。我们这些人回家后当然备受家长的最严厉的斥责。留学在望,功败垂成,咸深感痛惜。"(《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66至167页)

吴泽霖还回忆到:"当然在收拾行李挥泪告别时,思想上也不免产生过矛盾,觉得在清华白耽了七八年,留学在望,机会就这样白白送掉了!回家后何以对父母亲友!但一看到那些参加考试的人望到我们就远避的窘态,我们又深感自豪,认为真理是在我们一边,出洋机会可丢失,为正义不低头,这就是你祖父和我以及其余二十几人当时的心声。"(吴泽霖给编者的信,1986.5.15)

浦薛凤参加了考试,但先生则能谅解他。浦在《忆清华级友闻一多》中说:"一多与(罗)隆基、(何)浩若辈,素喜反抗权威,自然甘愿留级。予则认为随便罢课而留级,殊无意义,因而主张考试。因此之故,同一寝室之一多与予,连日相对苦笑,默默无语。但既然各行其是,彼此自然能谅解,临别握手,互道珍重。"(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7)

关于清华学校此次罢考事件,北京《晨报》曾有系统报道,文云:

六三教潮发生以后,同时引起了教育上许多枝枝节节的问题,在这些枝节问题里面,最足以引起社会注意的,莫过于此次清华学校的罢课风潮。当清华罢课风潮热烈的时候,报纸上对于此事少所记载,故旁观者于个中真相尚不明瞭,近两日来社会上始知清华学生因罢课援助六三学潮的缘故,得下列结果:(一)全体学生,自请退学,惟准予于本年九月十二日起,来与复校考试,考试及格者准其复校,惟各班须留级一年。(二)高等四年级一部分已单独赴考,其余二十九人已自请退学,牺牲本年毕业留美机会。这种结果传播以后,社会各方面发生许多误会,有说教职员学生各趋极端的,有说教职员借事报复的,有说学生意图逃考的。现在为免除社会上种种误会起见,谨将事之始末,叙述于后。

（一）事前之慎重。自三月十四日北京教职员宣布停止职务以后，清华学生会曾屡次开会筹商援助国立八校的办法，惟几经讨论，都以通电上书纸上谈兵，代表请愿与虎谋皮，俱非根本解决教潮的妙策，故始终寂然不动。到了六三事件发生以后，北京部立私立学校相继起而援应，清华方面代表来校，日必数起，责难函牍，络绎不绝，清华学生会评议部亦承认为时机已迫，万难坐视，遂于六月八日通过《清华学校明日罢课》一案。当晚提交大会讨论经三小时的争辩，多数以为（一）罢课系自杀政策，以杀止杀，万难有济。（二）现今政府非罢课所能警醒，万不得已，罢课一事也只能作同情的表示。故大会将评议部的议案修改为清华学生应该罢课，惟须与北京部立私立各校取一致行动。九日俄文专修馆等学校罢课讯息传来，罢课时机逼进一步，清华学生遂于十日以二九二票对一一九票的表决，通过同情罢课案。

（二）罢课期中的经过。罢课以后，多数学生，以为事已至此，当图积极进行，其着手办法，（一）组织部立私立各校联合会，以作国立八校联合会的后援。（二）组织募集教育基金委员会，以求教育根本解决。（三）组织宣传政治革新会，以求中国政治根本之刷新，乃当学生以全副精力筹谋对外的时候，校中暗潮忽然发生，卒至于教潮无丝毫补益，而自身受无谓牺牲，诚为可惜。原来该校有几个引起暗潮的远因。（一）六三事件发生以后，学生方面曾致函校内教职员，要求作一同情的表示，信去以后久无动静。故十一日晚罢课案，事先也未征求教职员的同意，事后派人接洽则教职员已啧有烦言。（二）六三事件发生以前，学生正从事清华内部的改革，对于更换教员一节，主持极坚，此亦引起误会之一点。（三）清华原定十三日大考，十一日通过罢课议案，事实上不免逃[考]嫌疑，加以当时学生有主张罢课期中，必不大考者尤足供人口实。

其实罢课期内必不大考一案，正反两面，颇多争执，而闻然不避逃考之嫌通过此案者，实亦别具苦衷。十一号系清华温书最后一日，各项功课，实际上已算完结，所差不过形式上的考试而已。清华记分法，平日分数作为百分之七十，大考占百分之三十，上期大考又占三十分之半，在成绩上说来，百分中已去八十五，优劣等级，不待大考早已决定。若十一号罢课，十三号复行大考，宁非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况且形式的大考，教潮稍有转机，不难补行。此罢课期内必不大考一案，所以必须坚持也。以上几个远因，很足以引起此次的暗潮。到了十三号，本校教职员开了一次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尚无结果，外间风声，只知态度严厉四字。到了十三[日]晚，校长将教职员结果报告董事会后，即有董事会第一次的决议，"本期大考改于十八日举行，不赴大考学生即认为自请退学"。此议案由金校长非正式的通知学生会

评干主席，学生即于是晚开全体大会，议决下列二案。（一）无论学校用何种胁迫，清华学生对于罢课案坚持到底，赞成四二四票，反对者二票。（二）罢课终止时，全体要求学校实行补考，赞成者四四〇票，反对者一票。二案通过以后，学生会即派代表向董事会接洽，并将二案赞成反对的票数报告董事会，同时说明，第一案表明清华学生牺牲的决心，第二案足供清华罢课并非逃考的证明。当时董事会以为同情罢课，良心上固不能认为学生完全错误，但在职言职，董事会亦只知维持校章。最后的结果，董事会对于自请退学案加以复议。在这种压力紧迫的时代，高四居领袖地位，留美机会，近在日前，利害关系，自更密切，其态度当然为全校所注目。高四学生自己召集了两次级会，第一次通过"高四服从多数"，第二次通过"在未正式宣布罢课终止以前，高四级不单独大考，未大考以前，不毕业不出洋，词严义正，态度坚强，全堂学生气概为之一壮。不幸有始无终，翻覆变幻，卒至级团破裂，友谊中绝，此一恨事也。

自十四[日]以后，经几次教职员的会议，校长与董事会往返商榷，至十七号又议决两道校令。（一）本校大考事。经本校教职员议决定于十八号举行，如不赴考，即以自行告退论。（二）本学期不赴考者，准其于本年九月十二日起，来与复校考试，考试及格者，准其复校依次升级，惟各班须一律留级一年。两道校令未公布以前，报章上忽有政府提出五条办法收束教潮的记载，同学趋向忽然一变，以为教潮必有转机，校中又如此压迫，何不就此收束，从事大考，一方面洗刷逃考的嫌疑，一方面再图考后的运动，况北京教职员，劝告罢课的宣言同时发出，清华罢课虽然中止，其对于六三教潮表示同情的初志的当为社会所谅察，由是学生会终止罢课的议案，连续提出，全体大会，日必三四次，所讨论的无非是收束罢课问题。然罢课终不能如期收束者，厥有下列数因。

（一）罢课既谨慎发之于前，当郑重将之于后，以争教育始者，当以争教育终，五条办法是否确实，教职员对于此五条是否满意，此在收束罢课以前当确应有把握者也。（二）学生罢课，应自发自收，决不能因学校的压力，借题下台。（三）罢课时既与部立私立各校一致行动，收束时，自不能单独径行。对于第一层，学生会于十九日派代表二人往教育部探询消息，其结果五条中马次长认只有两条已经实行，其余均系报纸谣传，政府否认有此办法。同时教职员亦认政府虚与委蛇，毫无收束学潮的诚意。消息宣布后，同学的态度又由收束的而转移到坚持方面去了。加以第三项部立私立各校一致行动，则收束罢课，尤非旦夕所办到。事到如此，教职员方面既步步迫人，董事方面又着着不让，大考期转瞬就到，退学条件马上实行，利害关头，必非口头上的坚持到底四字可以真算确的态度，故评议部在十九号议决举行全

校无记名投票一次，表决下列事件：（一）罢课期内大考不大考，（二）服从多数不服从多数。投票的结果如下：

不考，服从多数，二九八票。

考，服从多数，七十一票。

不考，不服从多数，三票。

考，不服从多数，四〇票。

废票，二十五票。

这次投票，因为要知道同学方面真确的态度，故事先既没有演说讨论，事后开票也非常的慎重，开票的时候，由评干两部各派代表二人以资监督，开票的结果，由监票人签名作证。投票以后，学生会又派人到董事会报告投票的结果，同时告诉他们说，明日大考学生中最少有四十余人应考，但这不是学生团体破裂的现象，良莠不齐，在哪一个组织里也是如此。学生会并要求学校暂不公布迫令学生大考的条告，如于预定大考终止期内清华不能停止罢课，清华学生甘愿自请多留一年。这请求有两层意思：（一）牺牲是学生自动的，不希望学校拿留级当作一种刑罚，当作一种恐吓学生的手段。（二）少数破坏团体的学生，学校应置之不理，不给他们以大考或毕业的机会，因为这种学生毕业出洋以后，亦不过为虎添翼而已。

董事会刁主席对于少数不服从多数一层极不满意，并说中国现今最宜提倡的精神，既为（一）同情心，（二）少数服从多数。不过对于学生会无记名投票的结果，也有下列的怀疑：（一）此种投票，恐系一二领袖鼓吹的结果，（二）此种投票，恐系少年学生一时感情的作用。根据这两层怀疑，他主张举行第二次投票以资对证，其办法（一）负责任的具名投票，（二）由校长执行，（三）票的内容只有校长董事外交总长可阅看，至于总数可以报告学生。第二次投票在十九日晚举行，据校长所宣布的结果列下：

不考，服从，三二九票。

考，服从，八十八票。

不考，不服从，二票。

考，不服从，三十三票。

废票，四票。

（注意，不考的四一九票，单独大考的三十三票）

投票的结果，当晚由校长用电话通知董事会，董事会对于迫令大考的校令，又作第二次复议，结果到了二十一日，发出下列二校令：（一）关于本校期大考事宜，经本校全体教职员议决，定于本月二十二日开始大考，至二十八日考完，届时诸生

务须赴考，如不赴考，即以自行告退论。（二）查学期考试日期，并声明如届时不赴考者，即自行告退论，各在案，惟念诸生秉父兄之命，远道求学，数年成绩弃于一旦，殊为可惜。兹格外予诸生以特别时机会，如本学期届时不赴考者，准其于本年九月十二日起，来与复校考试，考试及格者，准其复校，依次升级肄业。惟各班须一律留校多学一年，俟大学一年级学完考试毕业后，方能遣派赴美。这两道校令不过字句间与十八日校令稍有不同，重要办法，则丝毫没有变更。同时评议部也于二十一日晚开会，议决（一）对于二十二日大考的校令置之不理，（二）组织强有力纠察股，维持同学间的秩序。

从二十号到二十二号这两日里，酝酿出来了一件最大的变故，就是高四级的分裂。当高四级几次宣言明示态度的时候，本诸至诚坚持牺牲者，固然有人，而高调独唱，希冀挽救的人也不少。到了二十号，事机已迫，面目毕露，前日提出"不单独大考，不大考不出洋"的人，现在居然提出"高四级单独大考"的议案来，而且以三十六票对二十七票的多数通过以级为单位，坚持以三十六票为一级的多数。反对方面，则以全校为单位，坚持三十六票为全校的极少数。两不相让，各树一帜，八年友谊遂终趋决绝矣。二十二号为实行大考的日期，单独大考者犹冀一度的调停，故上午均未赴考。调停办法，即根据二十一号部立私立联合会所通过的"各校于暑假起首日，宣布罢课终止"一案，要求学校于二十六日暑假后，补行大考，二十二改至二十六，所差不过四日，预料校长可以通融，殊不料竟为教职员会议所拒绝，热心毕业出洋者，乃迫而出于个人单独大考之一途。是日下午一时，赴考的有五十余人，其余不考的学生团聚科学馆特为赴考人欢呼致贺，照相机排列成阵，学生会新闻科的访员，奔走道途。到了三时半，第一次功课考完，赴考人深藏不敢出，考生求校长担任保险，校长电董事设法弹压，闹得风声鹤唳。其实学生不过好奇心胜，欲观颜色罢了，那里有丝毫恶意。到了二十八号，光明正大的考试敷衍了事地过去了；现在几十位毕业出洋的学生，同着几百个退学留级的学生，已分道归家，而无中生有的暗潮，也从此告一段落。（《清华学生罢课风尘之始末——全体学生自退学，补考者留班一年》，《晨报》，1921.7.3、5—7）

六月底 返浠水老家。

在浠水老家，有诗《回顾》。收《红烛》。开头部分表现了先生当时的心境：

九年底清华底生活，
回头一看——
是秋色里一片沙漠，
却露着一颗萤火，

越望越光明，
四周是迷茫莫测的凄凉黑暗。
这是红惨绿娇的暮春时节：
如今到了荷池——
寂寞底重量正压着水
连面皮也皱不动——
一片死静！
忽在里静灵退了，
镜子碎了，
个个都喘气了。
看！太阳底笑焰——一道金光，
滤过树缝，洒在我额上；
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
我是全宇宙底王！

七月四日　《古瓦集·序》在浠水老家"二月庐"写定。全文云：

闲空里翻阅旧作的诗古文辞，从前那种忘飧废寝、荡肝伐肺底情形，历历如同隔日的事，因念他们实能代表当时的一番精力，便随时择着录了下来。现在写完了，把古文辞十五首、骈文三首做上卷，诗三十八首做下卷，总名曰《古瓦集》。因为我这几件零星古董不配比汤盘孔鼎，不过是汉瓦、秦砖罢了。砖瓦虽没有盘鼎那样尊贵，可也算得一种古董，抛掉了怪可惜的，保存起来，到一则可以供摩挲，二则也是一个纪念品。

骈文同赋作得最早，无非是东扯西拉，生吞活剥，没有什么价值。古文都是一九一七年秋到一九一八年夏应课底作品。《陶渊明抚松待琴图记》同《清华园工字厅后荷花池》都有两首，其中各有一首是替人作的。两首祭文产生底时代跟这些古文差不多。这几篇文章都是一番钻研揣摩底结果。于今姚选黎选的两部《类纂》里红的圈，黄的绿的点，仿佛珊瑚、翡翠、琥珀排在纸上似的——便是当时底成绩。

诗中《项羽》同《拟李陵与苏武诗》跟骈文同时。从《夜泊汉口将发遇同学王君》到《入都留题二月庐》十三首，名《二月集》，是一九一八年暑假在家里作的。《齿痛》、《夜坐风雨雷电交至凛然赋此》、《上海寄驷弟》同《朝雾》四首是一九一九年夏在上海作的；从《昆山午发》到《维摩寺》八首是同年游虞山底作品；加上同年在家里作的《清封恭人南母裴恭人五十寿诗》，名曰《恋恋集》。这时

已经作了白话散文，文言诗却还舍不得丢掉。除上述各诗外，都是在校里的产品，其中《清华园秋日》、《提灯会》、《清华体育馆》、《清华图书馆》同《渡飞矶》底诞生时期，还在《恋恋集》之前，做古文之后。一九二〇年春作了一首应课的白话诗，赵瑞侯先生评曰："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不必趋赴潮流。"这时已经做了很多白话诗，第二次月课勉强用文言译了《点兵行》，是敷衍面子的，序子里且有"亦以昭文言之罪之"一句话。《项羽》是初学诗底"破题儿第一遭"，《点兵行》是殿尾的一首文言诗。

一九二一年，七，四　一多识于二月庐

《古瓦集》收先生在清华学校求学时期创作的古文、古诗词赋，全书分上、下两卷，前者收古文十六篇，后者收古诗词赋三十三篇，加书前之《序》，共五十篇。这些作品部分曾经发表，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未发表的文言文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三乐也论》、《助战平议》、《〈史记·曹相国世家〉书后》、《读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读熊希龄论联邦政制书》、《感言》、《辛亥纪事》、《陶渊明抚松待琴图记》(二首)、《清华园工字厅后荷花池》(二首)、《清华园中秋赏桂记》；未发表的古体诗有：《夜泊汉口将发遇同学王君》、《晚步湖上》、《为陈甥画扇》、《夜雨》、《初起》、《漫书》、《芦褐行》、《答浦瑞堂》(三首)、《感事》、《戊午秋日惩志，七十七韵》、《入都，留题二月庐》(二首录一)、《抵都寄驷弟》、《清华园秋日》、《齿痛》、《夜坐，风雨雷电交至，凛然赋此》、《上海寄驷弟》、《朝雾》、《登昭明读书台》、《望山前昆承二湖，作图》、《清封恭人南母裴恭人五十寿诗》(五首录二)。

《古瓦集》一度流落于世，被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购得，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指导的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长范宁教授曾见全貌，并抄录若干。其后，《古瓦集》因图书馆搬迁，错置失查。多年来，先生遗属多次呼吁寻找，直至一九九七年冬，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恩和教授协助下，从未编目之图书中重新发现。一九九九年十月先生百年诞辰前夕，该集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限量一千册)，书前附有闻立雕的《写在前面》。北京大学费正刚教授的《〈古瓦集〉读后》，作为跋文置于书后，文中认为：从《古瓦集》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清华学校作为当时新兴学校的语文教育情况，以及当时青年学生对这种教育的反映和他们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由此也使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群众基础和它为什么会具有那样强烈的冲击力有了更为具体的生动的理解"。

八月十日　《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写定。后发表于九月二十五日《清华周刊》第二二三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先生长期从事《清华周刊》编辑工作，对这个传递学校新闻、发表同学意见的园地十分关心，认为它的作用应是“一种直接地催促学校底进步的活的创造的作用”，它的内容应当“代表同学以监督学生会对付学校当局”、“帮助学生会以接洽学校当局辅导同学”、“附丽学校当局以管辖同学及学生会”等，若“一味地随波逐流，以博同学底欢心”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便会使它失去存在的价值。因此，它的任务是辅助同学“成为自动的、有个性的国民，不应逼迫他们俯首贴耳地做威权的奴隶”。然而，《周刊》由学生会产生，经费受学校控制、供稿与销售则靠同学们，这便造成了它无法独立的现实。先生设想它采用“不取固定的态度”、“自定绝对地独立的态度”，却又叹息“恐怕做不到”。最后，文中说：“《周刊》底地位竟没有方法训释，所以他的态度主张也没有方法拣定。但是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周刊》底机体便一天不能健全。《周刊》长为半身不遂的机关，学校底改良便永缺一个宝贵的工具。”

八月十五日　诗《夜来之客》写定。后发表于九月二十五日《清华周刊》第二二三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收入《红烛》时有改动，并改题为《幻中之邂逅》。

时，清华学校对罢课同学之处分，遭到社会舆论强烈批评，七月下旬，北京国立八校校长亦致函清华董事会，从事斡旋。其函云：“此次北京教潮迁延数月，幸经调人疏解，得各方面之赞助，可告结束。惟贵校学生，因援助八校而罢课，因罢课而受处分，在北京国立八校，及公私立中小学校学生颇抱不安。对于调人，曾郑重声明‘此次清华罢课，实为援助八校而起，暑假后若清华风潮不幸扩大，至万不得已时，同人亦必采罢课手段，以援助之’云云。近年国内多事，教育界重影响，已属不幸，若艰难辛苦，调停解决之教潮，秋后再生波折，恐亦必非贵董事校长之所乐闻。同人等历尽艰辛，杞忧心切，用特函请董事、校长，切实维持，免生枝节，匪为贵校之幸，抑亦北京教育界之幸也。事关大局，惟贵校谅之。”（《国立八校校长致清华学校董事会校长函》，《晨报》，1921.7.28）

是月　受到自动退学处分的清华学生家长据理力争，要求恢复学生学籍。十二日，学生家长三十余人，以清华事件处置失当，联名上呈外交部，要求撤销议决原案，以维教育而慰众望，并推举沈承烈、罗忠懋、萨君陆三人为代表面谒外交部总长，请求主持公道。呈文云：“清华学生前因国立八校濒于破产，嗣又发生六三惨剧，迫于义愤，起而援助，以罢课之名义，促当局之觉悟。惟其时适在温书期内，虽居罢课之名，实际上于学业并无损失。讵该校金校长不予谅解，迫令各该生赶期应考。该生等以温书期中之罢课，已属有名无实，而再照常应考，未免近于滑稽。又惟恐学生所抱之苦衷，不能见谅于校长，曾推举代表恳切声明，乞展期至六月二十六日（即本学期终了之日）。事先复推举代表晋谒总长，当蒙面谕，表示同情乃人类

之本能，惟望于最短期内从事收束。仰见贵总长循循善诱，维持教育之苦心。不图金校长不明事理，滥用职权，对于董事会饰词耸听，妄加学生等以罢课罢考之名，遂有议决将请示展期之全体补考学生一律认为自请退学，又为成全各该生学业起见，允于秋季复学试验及格后，须留级一年。此种办法，君陆等认为不得事理之平，曾一再函达金校长及董事会，声明理由，请其谅解。不料该校校长一意孤行，偏执成见，君陆等为公为私，实难安于缄默，彼既不得与书，不得不将实在情形，为总长详细陈述之。学生以罢课手段援助八校，君陆等本不谓然。秕本诸爱国爱华之心，又仰总长早日收拾罢课之意，预选呈明二十六日终止罢课实行补考，该生等之办法，虽不免小有错误，第迹其用心，亦无不可谅之处，该校如准据校章，施以相当之处分，不但与校章不符，抑且与情理不合。该校校长，自谓此种办法乃惩戒方法之一，而其所持之理由，则谓学生一再罢课，此次若不严惩，必无以警将来。殊不知学校惩戒学生，必须根据校章，否则必须世界各国教育界有此通例。乃该校校章，既无明文规定，世界各国教育界，亦无此不规则之办法。即谓学生一再罢课，应行严重惩戒，然何以不于民国八九年罢课收束以后加以警告，平时教导无方，临时贸然施以过当之惩罚，何异不教而诛，此惩戒之说之不可能也。该校长又谓此事与实行新计划不无关连。如果属实，以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则而言，止适用于新生，不能强使按照旧章入学之学生一律遵守。即让一步言，如系改变学章，应使该已考未考各生一律实行。乃对于已考者则资遣出洋，未考者强留级，是明以冠冕堂皇之大学计划，而为惩戒爱国爱群学生之办法，准情斟理殊不可解。此实行新计划之说不可能也。该校长且谓实行此种办法，与学生有益无损，勿论与惩戒之说，自相矛盾，即使有益，何以不便应考者，利益均沾，以此为惩治戒不应考之学生，于理不能，以为奖励不应考之学生，当必更无是事。君陆等识见浅陋，不知该校长是否自出心裁，抑根据何国最新发明之教育原理，而有此不伦不类，与不能自圆其说之办法，此真君陆等所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况学生罢课，为期不过数日，今即认为留级退学，万一不幸时日稍长，又将何以处之。该校长以为学生事先声明愿意牺牲一切，其实所谓愿意牺牲一切者，不过一时义愤之词，充极其量，亦止于受学校正当之处分而已。该校长竟欲藉此施行过当之处分，殊不为不合，总之清华学生，以罢课之手段援助八校，固属于幼稚，而学校办法，尤觉不当，兹事虽微，影响实大。就学生方面言，受退学之恶名，终身蒙不洁之誉，入设备不完之大学，荒废青年宝贵之光阴。就家庭方面言，子弟延长学业，今既增加一年之担负，将来迟延回国，复减少一年之收入。就学校方面而言，处分失当，校章既等于弁髦，预算临时变更，经济更多损失。就国家教育而言，北京教潮今已解决，不幸以清华事件牵动全局，更为可惜。况清华学

校，有中美关系，不明事理之徒，造作种种谣言，若不早日平息，一般国民有所误会，未必不引起国际间之恶感。君陆等瞻前顾后，再四思维，以为此种处置，实为有损无益，故特将事之始末，略陈左右。贵总长素以爱护青年为怀抱，维持教育为职志，伏乞主持公道，撤销已议决处理失当之原案，俾清华事件，早日平息，北京教育不生风波，则受赐者不惟君陆等而已也。"(《望外交部能善处清华事件——学生监护人已上公呈》，《晨报》，1921.8.16—17)

外交部参事刁作谦代表外交总长接见学生家长时，态度蛮横，十八日《晨报》报道此事时用了《清华学生监护人大失望——刁作谦代表外交部公认不讲理》的标题。为此，学生家长连续召开会议，商量解决办法。

又，清华风潮也引起美国政府关注。八月十三日，驻美公使施肇基致电北京政府，谓美政府派员来使馆询问清华学生最近之情况，请求如何答复。清华学校董事中的美国董事，亦认为对先生等的处理，在经济上对美国很不合算，不同意学校对他们的处分。于是清华当局允许拒考同学签具悔过书后即可次年放洋。但先生坚持无过可悔。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八月，"为了挽回学校当局的面子，教务处给我们各人发了一个通知，嘱只要缴上一份悔过书，九月即可回校补习一年，第二年再毕业出国。于是我们就分头接触，征询意见。一多坚持不能写悔过书，一切回校再谈，经过磋商，谁都没有写悔过书。后来学校又作了让步。既然不愿个人悔过，可以写一张集体悔过书。我们坚持无过可悔，集体悔过书也不能写，一多就是这样坚决主张的。"(《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167 页)

九月十二日　清华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因典礼由校长金邦正主持，很多同学拒不参加。其原因，吴景超说："六月十一日，清华学生以同情于北京六三教潮，议决罢课。金邦正极不赞成这种举动，便与董事会议决办法，凡届期不直大考的，一律留级一年。学生因为无辜受了这种留级的惩罚，所以对于金邦正，便丝毫没有师生的感情了。九月十一[二]日行开学礼，多数学生都不出席。此事给金邦正精神上以极大的打击。十月十三日，他便离开，参与太平洋会议了。""金邦正赴美以后，学生会曾上书，请他一去不返"。(吴景超《清华的历史》，清华周刊社编《清华生活》，1923 年 4 月 28 日出版，第 5 页)　其后，清华学生会更是去函让金邦正"不必作卷土重来之梦想"，迫使其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不得不提出辞职。(据吴大钧：《学生大事记》，《清华周刊第八次增刊》，1922.6)

时，先生已返校，开始被迫留级一年的生活。按惯例，清华科毕业生至少可直接插入美国各大学二年级，学校不好对辛酉级留级之二十九人单独编级，就称他们为"大二"。清华有大二级者，仅此一届。

回校后，大二级采取抓阄办法重新分配宿舍，先生幸运分到了二四八号单间。这为他日后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学年，先生再次当选为《清华周刊》集稿部集稿员。先生堂兄闻亦传亦当选。当选的集稿员还有周兹绪、姚永励、陈念宗、赵宗晋、陈钦仁、沈铭书、李岭秋、陈华寅、张忠绂、吴文藻、胡毅、李迪俊、周先庚、董凤鸣、杨世恩、陈崇民。另，沈宗濂、蔡公椿、铁明、吴去非、张继忠当选为经理。又，举姚永励为集稿部委员会主席兼书记，周兹绪、闻亦传为委员，分别负责对外接洽、管理部所。（《清华周刊》，《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4.28）

是月下旬　清华学生会“评议部通过加添交际、新闻二科。新闻科举罗隆基、闻一多为正副主任，交际科举高镜莹、萨本栋为正副主任”。（《会社新闻》，《清华周刊》第224期，1921.10.1）

十月一日　诗《志愿》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二四期，署名“风叶”。收《红烛》时稍有改动。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者为原诗。

十月二十一日　《节译阿诺底〈纳克培小会堂〉Rugby Chapel by Matthew Arnold》发表于《清华学生周刊》第一期[①]，署名“风叶”。全文云：

我们读 Tom Brown's School Days 都知道他们的校长 Thomas Arnold 是如何地起人景仰，因回顾我们清华学生近来的境遇，又如何到至此呢！如今“时日曷丧”之声，可以稍衰了。但那顺天应民的真命天子，还不知在那里呢！Thomas Arnold 死后十五年，他的后子 Maltthew 作此诗以追念其父。其大意可包括在这几行里——

“十五年来，
我们这一向在你的庇阴下——
仿佛在一口大橡底枝叶下——
休息的，受了骄阳。
同冷雨、赤科、孤悽，
没有遮盖，缺欠了你的蔽阴。”

可怜！我们清华学生那一天不去骄阳冷雨之下！我们为密阴的大橡做梦到如今，只怕还免不了“一场喜欢一场空”吧？我读阿诺底诗再唤起近来校中糜烂的现状，泪珠儿几乎滚了下来呢。还有人说学生野心，干预校政。唉——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① 《清华学生周刊》只出过两期，便停刊了。

原作太长不能全录，如今取的是殿尾的两节。这并不是最好的部分。我摘取了他，是前有用意的。孔子说："兴于诗。"我们读阿诺之作，怎好没有一点感触呢？在我个人，不得"大椽"，誓不甘休；什么蒲柳散材，尚不在眼里，何况那些荆棘败类那配来污我"水木清华"的灵境呢？

看！在世界的巉岩里
走着人类的队伍，
一条软弱飘荡的线。
他们是到那里的？——一个上帝
帅着他们，给他们鹄的。——
啊！但是路这样长！
他们在漠野里多年了！
酷渴磨厄他们，巉岩
四起，威吓他们；
朋党分裂他们，他们的
队伍拿破裂、溃散来要挟。
啊！使，使他们团结着！
不然，组织那军队的
无量敌，没有一个到得了；
五[吾?]们将孤身徘徊；永远
在岩石上不生效力地撞碰，
一个；地死在荒里。
然后，当你的神昏气诅
之族处救底时候，
你，如同天使，出现了，
神圣的精诚，晶光四射。
希壹底烽火，你出现了！
你的心里没有倦怠，
你的口里没有软弱，
你的眉上没有疫困。
你站在我们的先锋里！
遇着你的声音，想慌与绝壹道走。
你在队中巡逻，唤回迟情，

振刷疲表，鼓励勇敢。
秩序，胆量重新来回了；
眼睛又燃亮了，祷祈
跟随着你的脚步走。
你填满我们行里的缺罅，
振起散漫的阵线，
整顿延续我们的行步，
前进于广漠之涯，前进于上帝之都。

十月三十一日 参加清华学校男女同校期成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前，先生已被推选为该委员会委员，是日分工，负责文书工作。五四运动后，清华学校曾起议过男女同校问题，此时复有力倡者。是日午后五时，清华男女同校期成委员会，“在高等科二五号开第一次会，通过《简章》”，决定会员分“通常与责任两种，通常会员现已有百人，责任会员亦有六十余人”。又，“举出时昭沅（即时昭瀛）、罗隆基为总务委员，潘光旦、闻一多为文书委员，刘昭禹、蔡公椿为会计委员，陈石孚、翟桓为出版委员。该委员会复举陈石孚为主席，时昭沅为副主席”。（《清华男女同校期成委员会纪事》，《清华周刊》第225期，1921.11.11）

《清华男女同校期成会简章》共六条，目的为“使清华男女同校于最近期间实现”。会员中的中坚分子称责任会员，“责任会员须在实现清华男女同校上切实作事，并缴纳定数的会费。责任会员及通常会员皆有到委员会及在委员会中发言之权，但惟责任会员有表决权”。（《清华周刊》第225期，1921.11.11）

次月中旬，该会致函北京高师自治会及北京女界联合会，中云：“男女同校风行全国，其为当今要图勿庸赘言。乃敝校当局，于此问题目下绝少计议。要之原则昭昭，终难漠视，特实现之期，迟速有差耳。同人等迫瞻大局，自惭落伍，爰鸠同志，组织团体，以谋清华男女同校之迅速实现。”是即该会成立的原因。

十一月五日 参加在工字厅召开的辛酉级级会。辛酉级级会为一九二一级部分同学所组织，时任会长时昭涵，“会员几乎都未单独大考”，“现该级会友入该会者甚众”。（《清华周刊》第225期，1921.11.11）

十一月上旬 当选大二级委员会委员，是日大二级开会选举该级委员会委员，“选定时昭泽、钱宗堡、罗隆基、闻一多、何浩若、吴泽霖、沈宗濂等七人，时昭泽为委员长”。（《清华周刊》第225期，1921.11.11） 该七人均为暑前参加罢考斗争的中坚分子。

由于清华学生举行罢考，使一九二一年《清华年报》未能编成。时，学校决定续

办《清华年报》，并指定职员，图画一项，学生方面由先生负责，教员方面由司达尔女士负责。（《校闻》，《清华周刊》第225期，1921.11.11）

十一月十九日　《恢复和平》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二六期。该文主旨批评某些同学对学生会苛意地批评，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秩序。但是，却把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了"俄罗斯的赤色在中国的影响"。文云：

在一个颠倒错乱的畸形的社会之中，一切的事变，几乎都要用颠倒错乱的方法去应付；这样积久而铸成习惯，畸形的观念沉到人们底脑筋底下去着土生根了，他们便迳直认权为经，安变如常了。这种现象是新旧过渡程中底一个大礁石。溯其来因可分两端：

一、社会现状底反响。"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司空见惯"印象深刻，于是见了公共机关，不问青红皂白，便一概地痛心嫉首，如对蛇蝎一般。客观地对象，本没有丝毫变更，我们偏看出千形百态光怪陆离来了，其实都是我们的主观的幻象。在心理学理illusion底一种原因是trequency。如今我们看着一切的公共机关都是一种黑幕底illusion，便是从前看多了公共机关底黑幕底结果。

二、新思潮底遗毒。几千年底缰锁，一朝打破，蠢动泛驾底原始的冲动，如同被压而未熄的薪火一般，忽遭新思想底干风一吹，不觉燎原大烧起来。可怜的时代底牺牲者，他们的神精竟被波尔希维克的赤帜鳖得发狂了。一个著名的美国画家讲：假若一个发怒的神灵要用一种特别地酷暴的刑具惩罚人类，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将全世界底绿色都变成赤色更可怕些的。在这样一个赤色的世界之中，人类不久定都变成疯子了。俄罗斯底赤色在中国的影响，大概同这差不多。青年们竟以为解放便抹杀一切法律主权同习惯，以为社会的平等便包括知识的平等呢。这不是疯癫是什么？

若要挽回这种狂澜，没有别的方法，全在我们善于驱使理智节制感情。换言之，我们的头脑都太热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虑，便不致有这种毛病。

出虎进狼，以暴易暴。好好一棵橘树，渡过了淮水，便度[变?]成枳树。其实这也不过是人类底最长久的历史中一个片段里底现象，正如人生七八十年中一两天底疾病罢了。那理便可以判决凡是执事的都是奸恶，更那里可以迁怒嫁怨，囫囵地宣布一切行政机关底死刑呢？一方面我们既相信公共事业是要人做的，又相信公共事业是有人能做配做的，但是一方面又因一时的失望便要不分玉石捣乱一切。长照这样闹下去，只恐怕终久闹得天翻地覆才完事呢！

时局蜩螗，学生不得不抛了书本来倡一种运动；校事弛废，学生又不得不

偷着间暇去倡一种运动。这并不是说学生总是比当轴高明些，应该起而代庖。乃是外界既不幸有了这些麻烦生厌的畸形的状况，我们也只得耐着性儿破一个例，帮助大家把不正的扭正了，非常的复常了；为的是要这样，我们才好安心乐业做我们应做的事。所以我们没有恢复原状底机会则已，若有了，那肯不捉住这机会做去的呢！

况且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社会的幸福建于秩序与和平的基础上。所以他的秩序将破则维持、既破则恢复才是我们的天职。爱和平重秩序，是我们中国民族底天性。我不愿我们青年一味地眩于西方文化的新奇，便将全身做了他的牺牲。

和平秩序之不见于清华久矣。如今他似乎又隐约地在我们目前盘旋，我们千万要拉住了欢迎回来。所以我们的太烘热的脑筋要尽力地冷下来，我们要尽力地想像以置身于太平景象之中，用慈祥赤裸的心相待。我们要快把那不受缰锁的安那其的，Anarchical 浮躁蠢野的"赤"气摆脱，三薰三沐降心屏息地整顿大局。万一不幸又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妨再破一个例出来趋应责任的诏命。但是我们总要记着这是一个例外万不得已的事！在不需要这种举动时，最好不要枉费精神。

我们学校与当局一向取对敌的态度，一言一动，辄藏机心。如今我们若认为这种态度是用不着的呢，便不妨抛掉了他。还是和衷共济赤诚相待的，舒服得多，痛快得多。我们对于我们自主的机关学生会，一向都没有信用，没有敬心。我们知道要使清华振起一点新气象来，非藉学生会为工具不可。假若我们认为他不满意，便急起用正大光明的方法图谋改良。假若看不出要改良的地方，便需信他，敬他，护他，爱他。不要随随便便就大书特书地，说他庸懦，说他专横，忤辱他的人格。在法律中公共机关称为"法人"Arti ciial Person，寻常我们若随便出条骂人，被骂人必拉我们上斋务处去要我们赔偿名誉。须知学生会是个"法人"，他的名誉也是不好随意毁败的，他的人格也是不好随意忤辱的。

同学之间若得相亲相爱还是这样为好。我们常常猜疑某某为政客，某某为流氓，某某为军阀，其实都是我们主观的判断。我们若大家平心静气存点恕道，这些名词根本地都消灭了。其实我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难道我们好别人那样坏吗？中国人最讲究家族主义。我们若能将对待家人底一种和爱的心境来施及于学校，假定校中人个个都是我们的家人，那就好了。

如今校中各方面（学校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捣乱也捣够了。乱极思治，

人同此心。大家何必不即早回头呢！诸君！我们的梦做得久了；黎明来了，我们醒罢！

十一月二十日　晚七时半，清华文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历时二时余，通过三组进行：诗组、小说组、戏剧组。选举职员结果：干事梁治华（实秋），书记闻一多，会计张忠绂。诗组领袖是闻一多，小说组领袖是翟桓，戏剧组领袖是李迪俊”。（《清华周刊》第228期，1921.12.2）

清华文学社的前身是上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一九二三级的梁实秋、顾毓琇、翟桓、张忠绂、李迪俊、吴文藻、齐学启等七人成立的“小说研究社”，宗旨为“介绍欧美名家小说，以谋中国小说之改进”。（《校闻》，《清华周刊》第203期，1920.12.17）清华建校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他们编辑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作法》，反应很不错，“校内已销去二百份之谱，校外回信已来者，销数约在百五十份之上，其余各大学因寄有特使券去，销数较多”，“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佩文斋会友书社，上海泰东、亚东二书局均已承认代销”。（《校内新闻》，《清华周刊》第218期，1921.4.29）

这时，梁实秋等认识了先生，先生“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梁实秋《清华八年》，《秋室杂忆》，第40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出版）《清华周刊》报道云“本校同学十余人，近发起一个研究文学的新组织，该会暂定名曰‘文学社’，宗旨就是研究文学。进行方针，大约有两种，一种是读书报告，一种请人演讲。本校年来各种学会产生甚多，惟独少纯粹研究文学的组织，不无余憾。此次该社产生，深可庆幸。”清华文学最初成员十四人，为闻一多、时昭瀛、陈华寅、谢文炳、李迪俊、翟桓、吴景超、梁治华、顾毓琇、王绳祖、张忠绂、杨世恩、董凤鸣、史国刚。（《校闻》，《清华周刊》第227期，1921.11.25）不到一个月，胡毅、盛斯民、吴文藻等人也加入文学社。

先生在清华文学社中被看作是老大哥。梁实秋《清华八年》：“闻一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年纪比我们大两岁，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比我们不只大两岁，我们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他长于图画，而且国文根柢也很坚实，作诗仿韩昌黎，硬语盘空，雄浑恣肆，而且感情丰富，正直无私。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秋室杂忆》，第40页）

在《谈闻一多》中，梁实秋又进一步说：“他最后留级的那一年，他不用上课，所有的时间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一多独占高等科楼上单人房一间，满屋堆的是中西文学的书，喜欢文学的同学们每天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的批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励，我想受到鼓励最多的我应该算是一个。”（同上，第8至9页）

先生与梁实秋的友谊便是这时建立起来的。次年六月，先生致顾毓琇信中写到："我于偶然留校的一年中得观三四年来日夜祷祝之文学社之成立，更于此社中得与诗人梁实秋缔交，真已喜出望外。……十年之清华生活无此乐也。我之留级，得非塞翁失马之比哉？"(《闻一多书信选集》，第35页)

十一月二十五日 清华文学社召开第一次常会，《清华周刊》报道云：这次常会"讨论'诗是什么'的问题，先由谢文炳报告，后由大家讨论，反复辩难，极有兴趣。"又云："现该社正预备请人演讲，第一次大概是请辜鸿铭先生或周作人先生，届时必有一番盛况。"(《校闻》，《清华周刊》第228期，1921.12.2) 时，胡毅加入清华文学社。

十一月二十六日 时，清华组织"学生法庭"，模仿法庭审判案件。是日"学生法庭"审判两案，分别采用中国和美国现行审判制度，先生均参加法庭工作。

这是清华学生提倡自治、学习西方审判制度的一次演练，开庭前的宣传也颇有趣味。"晚七时半，举行全校俱乐。先自行车(THBA)灯火游行，每车上悬灯四，上插一大灯，有'拥护法庭'、'无法庭无自治'、'打破专制的审判'、'自治者，不治于人也'等语。"接着，开始模拟法庭，"审判的案件有二，一为抽大烟案，一为盗钱案，均辩驳有致。第一案采用中国现行法庭审判法，第二案采用美国法庭的陪审制。两案终结后，征求同学对于清华设立学生法庭的意见。"第一案开庭前，有军乐助兴，两案之间，亦再有军乐。末了，放映电影，极一时之盛。

第一案为抽大烟案，"学生蔡戒烟在学校附近某寺私吸鸦片，被学生吴泽霖侦知，在法庭举发"。此案采用中国现行法庭审判法，有审判长、推事官、书记官、司法警察、检察官、被告律师、被告、证人。先生和高镜莹、黄卓繁、王化成四人担任推事官。

《清华周刊》报道：

> 法庭组织：本案采用审判制，即中国法庭现行制度。每庭设庭长一人，推事二人，一切审问判决事项，概由庭长、推事实行之。
>
> 案情：学生蔡戒烟在学校附近某寺私吸鸦片，被学生吴泽霖侦知，在法庭举发。
>
> 登场人
>
> 审判长：翟桓
>
> 推事官：高镜莹、黄卓繁、闻一多、王化成
>
> 书记官：李迪俊、陈华寅
>
> 司法警察：张继忠、杨杰
>
> 检察官：沈宗濂

被告律师：何浩若

被告：（蔡戒烟）黄荫普

证人：举发人吴泽霖、驴夫（王狗儿）顾德铭、和尚（法海）张峻、被告同房胡敦元、医生刘纯聪

第二案为盗钱案。采用美国司法界现行的陪审制。案情为“魏毓贤于十一月二十日遗失日币十元，认系胡毅窃取，在法庭向胡毅提出诉讼”。“开庭时一切审问事件，由审判官、检察官、律师执行，而最后判断则由陪审官十二人一致公决”。先生和时昭沄、梅贻宝、高镜莹、王化成、闻亦传、高荫堂、李迪俊、陈华寅、吴泽霖、黄荫普、沈宗濂担任陪审员。《清华周刊》报道：

法庭组织：本案采用陪制（Jury system），即美国司法界现行制度。开庭时一切审问事件由审判官。检察官、律师执行，而最后判断，则由陪审官十二人一致公决之。

案情：魏毓贤于十一月二十日遗失日币十元，认系胡毅窃取，在法庭向胡毅提起诉讼。

登场人

审判长：蔡公椿

陪察[审]员：时昭瀛、梅贻宝、高镜莹、闻一多、王化成、闻亦传、高荫堂、李迪俊、陈华寅、吴泽霖、黄荫普、沈宗濂

书记官：陈石孚、史国刚

司法警察：张继忠、杨杰

检察官：梁治华

被告律师：罗隆基

被告：胡毅

证人：举发人魏毓贤、举发人同房黄卓繁、食堂证人冀朝鼎、寄物证人沈麟玉、厨房徐永瑛、陈念宗、被告人女友陈肇彰（《校闻》，《清华周刊》第228期，1921.12.2）

是月　本学年《清华年刊》开始编辑，先生与时昭泽、钱宗堡、沈宗濂、吴泽霖、何浩若、罗隆基为年刊委员。先生还担任美术编辑。年刊中共设十三个栏目，除体育栏图案为杨廷宝作外，其余整页插图均出自先生之手。又扉页校训图、书后广告也为先生画，二十九个装饰花边先生画了二十二个。

年刊上有先生毕业像，旁有简短英文小传，未知何人所作，其文云：

Being an artist, “One Two”, of “Widow”, knows the secret of beauty,

which knowledge is not without visible proof. As he is a poet and reformer at once, his favorite reforms are often more poetic than practical. Whenever he receives an allowance, he may be persuaded to suspend his rule of fasting.

意为:"闻多,湖北浠水。艺术家,外号'混土'(一二)或'活陀'(寡妇),熟谙美之秘密,此种知识并不缺乏可见表征。他身兼诗人和改革家,因此他喜爱的改革往往诗意多,实用性少。一旦他获得资助,人们就能说服他中止执行斋戒的规定。"

为了反映辛酉级二十九人留级一年的生活,他们又单独编印了一小型级刊,亦为英文,先生仍为编辑之一。

十二月二日 清华文学社召开第二次常会。《清华周刊》报道云:这次常会"讨论的题目是'诗的音节问题',由闻一多报告研究的结果,闻君对于一般无音韵之新诗及美国新兴之自由诗加以严重之抨击。报告后略有辩难"。又云:"该社已延请之周作人先生因病不能来,辜鸿铭先生不在北京,但已另请别位名人演讲,必有以餍同学之望"。"再该社本公开的态度,欢迎社外同学旁听。"(《校闻》,《清华周刊》第 229 期,1921.12.9) 时,盛斯民、吴文藻加入清华文学社。清华文学社会所设在高等科七十六号,会所管理为胡毅。

先生在这次会上所做的《诗的音节问题》

此报告手稿仍存,为英文提纲,标题为"A Study of Rhythm in Poetry",下附有用较小字体写的汉译题名,为《诗底音节的研究》。由于目前一般将 Rhythm 译为"节奏",所以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翻译时,将题改为《诗歌节奏的研究》,收入《闻一多论新诗》。这是先生最早的一篇关于新诗创作理论的文章提纲,全文如下:

Ⅰ. 定义

A. "节奏"一词的来历

B. 节奏的两个含意

1. 拍子

2. 韵律

Ⅱ. 生理基础

A. 脉膊跳动

B. 紧张和松弛

C. 声波和光波

Ⅲ. 证据

A. 日常生活经验

B. 原始人

C. 儿童
D. 疯人
Ⅳ. 特性
A. 节奏的组成因素
1. 时间
2. 重音
B. 节奏的美学基础
1. 一致——关于“清一色”的理论
2. 变化——关于多种趣味的理论
Ⅴ. 作用
A. 实用性的
1. 个人的
a. 联结记忆
b. 引起注意
c. 节约精力
2. 社会的
a. 协同作用
b. 情感的一致
B. 美学的
1. 整体的重要性
2. 一致中的变化
3. 注意力的悬置
4. 结构的框架
Ⅵ. 自然界的节奏
Ⅶ. 各种艺术中的节奏
A. 渊源
1. 适应自然
2. 摹仿自然
B. 分类
1. 音乐的节奏
2. 舞蹈的节奏
3. 诗歌的节奏

4. 造型艺术的节奏

Ⅷ. 诗歌的节奏

A. 有关诗歌节奏的争论

1. 争论的双方：

a. 反对的一方

b. 赞成的一方

2. 争论是如何发生的？

3. 仅仅是理论上的冲突。

B. 诗歌节奏的分类

1. 内部的

a. 韵律

2. 外部的

b. 韵脚

c. 诗节

3. 总的效果

C. 诗歌节奏的作用

1. 作为美的一种手段

a. 一致中的变化

b. 完整感

(1) 完整

(2) 永恒

c. 克服困难所得的喜悦

2. 作为表达情感的手段

a. 各种人的情感的自由表达

(1) 儿童的

(2) 野蛮人的

(3) 疯人的

b. 他们的表达情感的方式

(1) 身体的摇摆动作

(2) 有节奏的发声

c. 文明的效果

(1) 舞蹈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

(2) 唱歌强调旋律与和声。

(3) 用修辞方式,而不用韵律方式来朗诵诗行。

d. 但自然的本能仍然存在

(1) 情感对节奏的作用:

(a) 情感产生节奏。

(b) 情感破坏节奏。

(2) 节奏对情感的作用:

(a) 节奏传达情感。

(b) 节奏激发情感。

(c) 节奏缓和情感。

3. 作为凭借想象加以理想化的一种手段

a. 诗的节奏促进想象的飞驰。

(1) 刺耳的、不和谐的散文不利于达到这一目的。

b. 诗的节奏提供一种产生特别崇高的想象力的工具。

(2) 散文在试图运用一种特别崇高的浮想联翩的风格时,往往会失败。其结果则成为:

(a) 荒诞。

(b) 笨拙。

c. 诗的节奏用以下方式改变粗糙的现实:

(1) 使现实和谐、美化。

(2) 表现现实的普遍意义。

(a) 歌德的论证。

D. 诗歌节奏的特性

1. 三种成分:

a. 音量

b. 重音

c. 字或音节

2. 与音乐节奏相比较

3. 与散文节奏相比较

E. 韵

1. 韵的功能

a. 旋律

b. 组成部分的布局

c. 与短语的关系

d. 预期效果的满足

e. 恢复想象力的活动

2. 韵的分类

a. 按用韵的位置分：

(1) 脚韵

(2) 头韵

(3) 中韵，或内韵

b. 按韵的性质分：

(1) 完全的或同一的韵

(2) 阳韵

(3) 阴韵

F. 诗节

1. 意义——一般公认诗节为诗歌韵律的最大单位。

2. 诗节以下列因素为基础：

a. 修辞句

b. 旋律句

Ⅸ. 自由诗

A. 妄图打破规律

1. 在排字形式上对诗节的影响

2. 文字游戏

3. 在抛弃节奏方面的失败

B. 目的性不明确

C. 令人遗憾的后果

1. 平庸

2. 粗糙

3. 柔弱无力

Ⅹ. 中国诗歌中的节奏

十二月九日 晚八至十时，清华文学社召开第三次常会，讨论题目为“为艺术而艺术呢？还是为人生？”《清华周刊》报道云：“由闻一多、吴景超、谢文炳三君报告，大家讨论，互相辩难约二小时之久，虽无结果，然颇觉痛快淋漓。”又云：“该社无

论全体常会或分组常会，俱是公开，同学有暇可按时前往旁听。”（《校闻》，《清华周刊》第230期，1921.12.16）徐永瑛、李孝泌两同学，旁听这次讨论。

这时期，清华文学社活动频繁。十日，诗组讨论“英国诗之历史的发展”；十二日，戏剧组讨论“近代西洋戏曲之发展”；十四日，小说组讨论“小说发达史”。（据《清华周刊》第229期，1921.12.9）

十二月十六日　晚，清华文学社召开第四次常会。“讨论题目为‘文学与人生’，翟桓、王绳祖、张忠绂、顾毓琇报告，大家讨论。在讨论此题之先，并由顾毓琇报告‘海外文坛消息’，他的题目是《汉姆生（K · Hamsun）之生平及作品》”。（《校闻》，《清华周刊》第231期，1921.12.23）是晚常会，与政治学研究社之演讲冲突，为避免此后与他会开会时间冲突，决定每星期日晚七时半为开会预备时间。

同日　为了给《清华年刊》配照片，学校各社团分别合影。是日，先生与清华文学社社友在体育馆前摄影。大二级同学亦分别有个人像。近日内，先生还与美术社、工社、学生会评议部、级会委员、年刊编辑、年刊图画部、基督教青年会等社团合影。

十二月十七日　“文学社诗组讨论‘英国诗人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敦’”。十九日，戏曲组讨论；二十一日，小说组讨论。（《清华日历》，《清华周刊》第230期，1921.12.16）

十二月二十三日　晚，清华文学社召开第五次常会。“讨论‘文学可以职业化么？’，报告者有陈怀因、梁治华、董凤鸣、杨世恩、史国刚。全体意见多不赞成职业化，惟对于‘除学文学以外，是否当另选一种职业，以敷衍假生活’问题，颇有争论”。（《校闻》，《清华周刊》第232期，1921.12.30）

十二月二十四日　清华文学社诗组讨论“斯宾塞尔、莎士比亚、密尔敦的诗”。二十七日，戏曲组讨论“近代西洋戏曲发展史”。二十八日，小说组讨论“斯康底那维亚”与“德国英国之小说史略”。（据《清华周刊》第231期，1921.12.23）

十二月三十日　清华文学社开第六次常会，讨论“文学与文人”。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参加清华文学社诗组讨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斯科特的诗。（《清华周刊》第232期，1921.12.30）

一九二二年　二十四岁

二月四日，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日军撤出山东，胶济铁路由中国以5 340.614万金马克赎回。

二月，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九国签订“九国公约”。

四月二十八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六月，奉军战败撤回关外，宣布东三省“自治”，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

十一月一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实施新学制，改学制模仿美国学制，将中小学学制改为六、三、三制。

一月二日　诗《十一年一月二日作》写定，收《红烛》。此诗似与婚姻有关。

此前，还有《失败》、《贡臣》、《游戏之祸》、《花儿开过了》四首，均收《红烛》。

一月六日　晚，清华文学社“在教员休息室茶叙，作本学期最末次的聚会”。又选举“下学期的职员，定为干事翟桓、书记闻一多、会计张忠绂、会所管理杨世恩。下学期进行方针，趋重于创作，并定鼓励出产作品之方法”。（《校闻》，《清华周刊》第234期，1922.1.13）

是年寒假　回浠水老家。冬假时间较短，先生从未在寒假中归乡，此次是遵父母之命回里完婚。

早在先生考取清华学校之时，黄冈县潞口镇的高承烈（敬伯）先生便认定先生有出息，愿以其女高孝贞嫁与先生。闻、高两家有亲戚关系，高孝贞的母亲与先生的母亲是堂姐妹。这种亲上加亲在那时很普遍，所以随后两家便定了亲。但先生对此门亲事未放在心上，果然成婚，有突然之感。高家为官宦之家，高孝贞生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六（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祖父在西北地区做过道台一类的官，父高承烈曾任绥远盐务局局长、广东饶平县知事等职[①]。

为了说服先生应允这门婚事，家人做了许多工作。先生之侄闻立勋回忆：“一

① 以上情况，是祖母高真（原名高孝贞）在1983年3月27日对编者讲的。当时，还说她的家也是个大家族，世派为“仁是能承孝，后代必发强”。此外还讲了很多，可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

叔提了三条件：一不祭祖，二不对长辈行跪拜礼，三不闹新房。家里答应说，你不祭祖我们祭，可以行鞠躬礼，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家里分别对大家做工作，让人闹得别过火。结婚的头天晚上，一叔把我们都叫到他房里去，盘着腿谈，在床上横七竖八地睡了一晚上。"（闻立勋回忆一多叔录音，1980.2，张同霞整理）

闻振知《忆堂兄一多二三事》也有记述："结婚要说这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了，可堂兄却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家里人为他结婚可忙坏了，而他成天把心事用在读书上去了。记得结婚那天，堂屋门前张灯结彩，四方名人不断前来恭贺新婚，吹打弹唱十分热闹，家里人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天，他可闲了，清早一起床，就抱着几本书跑出去了，家里的人几次找他理发，洗澡换衣服，他看书看迷了，问起家人要他理发换衣服干什么？竟然连自己马上要做新郎都忘了。家里人怕他又跑到外面看书，一再吩咐他好好在家招待客人，他哪里记在心上，一个人又偷偷钻进了书房，埋头读着他的书。傍晚时分，花轿到了，喜炮不断鸣放，喇叭一个劲地吹，恭喜喝彩声不停，新娘子下轿了，找新郎拜堂，不见拜堂的人影，家里人又气又急，找到书房才把他找出来。"（《故乡人民的怀念》，第33页）

一月二十日　吴景超写下《朋友》一诗，记述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位朋友，其中有先生。该诗如下：

朋友们啊！不要看书了！
我们都来聚在一起，
围着桌儿，
拿着杯儿，
就这般谈谈笑笑，
送那沉沉的长夜归去罢！

我们仰首而谈，
我们抵足而谈，
我们相视而笑的谈，
也不知谈过多少问题了。
甜蜜蜜的谈风，
渐渐吹到我们的"友史"上去。

我想起光旦：
　我初见他时，

不知他叫什么名字。
一天，我候他到信箱去拿信，
就乘机在信箱前面，
认清了他的姓名。

我又想起昭瀛：
想到那一在晚上，
我发次聚在一起，不知谈些什么。
但是他那无碍的辩能，
照眼的瞳人，
从此就深深印进我的脑经。

一多：我们认得最晚了。
你还记得，
我们那天饭后出校步行，
论这人又论那人，
月旦评作了我们的缔交证？

然而这都是比较的新交啊！
我不禁想起我的老友：
想起琨华，想起大堃，
想起我那扬州病榻上的周念诚！

唉！不想了！
可恨欢乐的丝头，
只抽出缕缕的愁丝，
织成烦闷一片！

十一，一，二十日。

（吴景超《朋友》，《清华周刊》第238期，1922.3.3）

二月六日 寒假结束，清华学校开学。时，先生尚未返校，仍被推举继续担任《清华周刊》集稿员。此时集稿员还有沈宗濂、顾毓琇、罗隆基、黄荫普、陈念宗、翟桓、梁实秋、杨光弼、余日宣、戴志骞、梁朝威、贺麟、闻齐、史国刚、吴大钧、冀朝鼎、

胡竟铭、何鸿烈、徐敦璋、骆启荣。（据《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所载集稿部职员表）

二月十七日　《清华周刊》报道大二级学生将与各年级合组一委员会，辅助课程委员会制定大二课程。一九二一年，清华成立课程委员会，负责制定各年级所学课程，但同情罢考后出现的大二级实属偶然，不在课程计划之内，故课程委员会虽开会次数，却均无结果。“盖各委员对于将来大二课程，意见不同。有主张实科课程，须与文科一并提高，以便学实科学生，将来到美后，亦可入大学三年级者；有主张令学实科学生，在清华时，多学各种外国文、西晚等科，到美后仅令其能入大学一二年级者。刻尚相持未定，故对于将来大二课程，尚无正式建设。”（《特载》，《清华周刊》第 236 期，1922.2.17）

三月十日，《清华周刊》刊登编制课程的王芳荃先生《关于本学年授课表所以不尽完善的一点解释》，认为课程出现紊乱，原因多端，其一是大二留级，影响全校授课。此文有助于了解先生在清华最后一年之学业，故录如下：

凡事发生，必有原因，本学年授课时间表不尽完善，亦有种种原因。

按本校尚未采用预定时间表制度，故编制时间表，有四大事项，最为紧要。即（一）课程表，（二）科目注册，（三）课程分配，（四）编制时间。编制人编制时间表时，完全受此四大事项之支配，今请将本学年编制时间表时，此四大事项之大概情形，依次说明，以便读者对于时间表不尽完善之种种原因，易于寻求。

（一）课程表　因大二课程影响所及，使已定之高等科三级及大一一级之课程表（中等科俱是必修科故不连述），仅能作学校部分的课程表。换言之，即课程表因大二课程影响所及，完成之期，实觉太晚。查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学校将大二课程排就付印时，现有之法学通论财政学等，均未在内，而此项科目之决定，直距开学无几时矣。

（二）科目注册　本学年大二科目注册，多半在去年八月初上缴教务处，而迟者竟有至八月二十九日，方始缴进者，且开学后，学校循向例组织委员会，让学生将选定科目，重新更改，如此，则已编成之时间表，当然不适用于此种学生，编制者为求时间表亦能适用于此种学生起见，将已成之表，重新更动，惟因此项更动，与其他未改选科之学生时间表有连带关系，牵一发而全身动，编制人安排此项更动之艰难，从可想见。

（三）课程分配　此项请读者注意，即课程分配一日不出，时间表一日不能开始编制。本学年课程分配，在去年八月十二左右发给教务处，因彼时教员尚未聘定者颇多，故分配俱用佛山市，待开学时教员聘定后，有愿□照担任者，

有愿改易一二科者，如是，则假设分配又须更改。

（四）编制时间　教务处编制时间表，向由李仲华君担任，据李君自称，每年编制此项时间表，至少须费二月之久，此次系由荃与胡鲁声君担任其事，编制者于八月十二左右接到课程分配后，即着手编制，因此事本系繁杂，更兼本学年关于课程及目科（闻案：原文如此，应作"科目"）注册事项，俱呈畸零状态，则繁杂之处，自当较昔尤甚。故虽学校暑假期内，办公时间，仅限上午，而荃等编制时间，则增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四时，晚间七时至十时，如此编制，继续至两星期余之久，于是大学部及高中两科时间表，乃克成功。第此编成之表，其中课程分配，系照八月十二左右发出者，科目注册，系照首次缴进者，待开学时，受课程分配及科目注册更改之影响，则已成之表，又须更改，如此情形，使编制者无所依据，无所适从，则此事之劳且不易成功，又岂仅编制人方能知耶。

其他如泰西文化学，本在日间，因演讲须三组合并，故改在晚间。史学本亦在日间，因哲学三学生改习史学，致已定时间，不能适用，故亦改在晚间。高级音乐为各选科，欲求一均无冲突之时间，自惟晚间，以及本学年大学部学生，选自然科学多至三项者，其实验时间，均应使无冲突等等，皆为编制者所意不及料，所深感困难者也。

忆荃初到校时，即主张本校当采用预定时间表制度，因学校方面，有种种困难，学生方面有种种特别情形，迄未实行，荃曾在日美各住三年，彼处学校，均采用预定时间表制度，此项制度，以学生教员愈多，则愈晚编制，至本校之编制法，实赂罕见，即在往年，编制人亦当感其法太繁，费时太久。其故盖由于（一）学生选科，范畴太广，（二）选科门类与教员人数比较，似教员尚嫌不敷。至于学生多寡一层，关系尚微，例如本学年编制时间表时，困难之处，均在大学部及高三之时间表，而高一二两级及中学全部之时间表，仅费三日，即已成功，此非明证欤。

荃亦为编制本学年授课时间表之一人，今不惮烦，而作此篇，非由好辩，亦非委过，实亦本学年对于时间表不完善之评责，累有所闻，深恐再事缄默，更增误会，故特书数语，以资解释，盖此事如匠工制器然，匠工固有巧拙之别，第一不尽完善之，料而责匠工作必尽完善之，工殆亦颇，吾侪在学校办事，处处顾全学生利益，苟且了事，实不屑为。教务处，在此寒假期内，曾将泰西文化学两班设法移至日间，大二英文卒以五六人之科目冲突，无法移改，荃尚忆数日前，有人谓体育时间，排在饭后，实非卫生之道，殊不知全校体育共有四十课，而每星

期七小时，星期六四小时计算，仅有三十九时，体育馆即同一时间，不能两课并上，则除下午一至二及四至五外，尚能以何法位置体育时间耶。事非经过不知难，愿共识斯言是幸。

（王芳荃《关于本学年授课表所以不尽完善的一点解释》（《言论》，《清华周刊》第239期，1922.3.10）

二月十八日　清华文学社召开本学期第一次常会。这次常会原定上星期举行，因闻一多等多数社友尚未返校，故延期一星期。《清华周刊》报道云："所有社员创作，均于开会时传观，互相批评，颇有兴趣。该社本学期计划，注重于创作方面，同时须作关于文学之论文一篇，将学期终缴齐。"又云："常会现改每两星期一次，开会时有海外文坛消息报告及文学家之介绍，由社员分别轮流担任。"（《校闻》，《清华周刊》第237期，1922.2.24）

二月二十四日　任大二级毕业戏剧演出中文剧筹备委员，《清华周刊》报道云：大二级"毕业时拟排演中英文戏剧各一，并已组织委员会，力事筹备。中文剧委员罗隆基（主席）、闻一多、廖芸皋；英文剧委员沈宗濂（主席）、萨本栋、钱宗堡"。（《清华周刊》第237期，1922.2.24）又，出国西装已于寒假中由上海送到，住在新大楼的大二级，纷纷着装亮相，有人戏称"艳妆初试，娇羞向人"。

三月三日　清华文学社召开常会。"以时间与他会冲突，到会者稍形稀少"。会上"通过以后每次开会将由各组分别负责介绍新近国内创作。"《清华周刊》还报道说："该社迩来都竭力创作，诗组、小说组作品已不少，戏剧组社员亦正在积极进行中。"（《校闻》，《清华周刊》第239期，1922.3.10）

三月八日　作诗《蜜月著〈律诗底研究〉稿脱赋感》。未发表。诗云：

春绾香闺镇彩霓，
东莱贷笔漫灾梨—
杖摇藜火兼燃梦，
管秃龙须半扫眉。
手假研诗方剖旧，
眼光烛道故疑西。
洛阳异代疏泉出，
谁订"黄初二月"疑！

这里所说的《律诗底研究》，全文七章二十一节，与《诗底音节的研究》似为姊妹篇，有人称此文"可能是五四运动以后，较早用新的方法，系统研究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的长篇著作"。先生后来虽又几经修改，但始终未肯发表它，只有几位朋友读过。

原文共五十九页，参考书目二十种：《古诗源》、《文选》、《文心雕龙》、《十八家诗钞》、《瓯北诗话》、《然镫记闻》、《律诗定体》、《声调谱》、《谈龙录》、《国学小史》(梁启超)、《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诗学簪闻》、《漫堂诗话》、《策学备簪》、《唐诗鼓吹》、《释名》、《不林诗话》、《昌黎全集》、《六一诗话》。兹录目录如下：

第一章　定义
第二章　溯源
　第一节　律诗底章底组织
　第二节　律诗底句底组织
　第三节　五律底平仄
　第四节　七律底进化
第三章　组织
　第一节　队仗
　第二节　章底边帧
　第三节　章底局势
第四章　音节
　第一节　逗
　第二节　平仄
　第三节　韵
第五章　作用
　第一节　短练底作用
　第二节　紧凑底作用
　第三节　整齐底作用
　第四节　精严底作用
第六章　辨质
　第一节　中诗独有的体制
　第二节　均齐
　第三节　浑括
　第四节　蕴藉
　第五节　圆满
　第六节　兼有底作用
　第七节　律诗底作用
第七章　排律

三月十四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时，先生与妻子同在武汉。妻子是婚后回娘家，先生则是陪往，并决定十六日动身返京。这是行前的一封信，特别说此次婚姻实一大牺牲，作为补偿，家里应让妻子入学校读书：

> 我媳妇定住半月即归。届时务请五舅来接。千万千万。此关系伊的学业，即伊的终身之事。请两位大人勿循俗套必住二十八天，致误伊光阴。我之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请也。如非然者，则两大人但知爱俗套而不知爱子也。我妇自己亦情愿早归求学，如此志向，为大人者似亦不当不加以鼓励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回到学校，先生不愿谈自己的婚事，而拼命地写诗。梁实秋《谈闻一多》："婚后一个多月，一多立即返回清华园里过他的诗人的生活。一多对他的婚姻不愿多谈，但是朋友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般经验。……一多作诗的时候拼命的作诗，治学的时候拼命的治学，时间根本不够用，好像没有余暇再管其他的事，包括恋爱的生活在内。他有一位已婚的朋友移情别恋，家庭时起勃谿，他就劝说他道：'你何必如此呢？你爱她，你是爱她的美貌，你为什么不把她当做一幅画像一座雕像那样去看待她呢？'可见他自己是全神贯注在艺术里，把人生也当做艺术去处理。"（第 13 至 14 页）

三月十七日　清华文学社请"梁任公先生演讲《中国韵文里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听者极形踊跃，后到者则立而听焉"。（《清华周刊》第 241 期，1922.3.24）时，先生正在返回北京的路上，错过了聆听梁启超这次演讲的机会。

三月二十八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说开始编订诗集《红烛》，还说正在作长诗《李白之死》：

> 到校后，做诗、抄诗、阅同学所作诗，又同他们讲诗，忙得个不亦乐乎，所以也没有功夫写信给你。我的《红烛》（我的诗集）已满四五十首，计到暑假当可得六十首。同学多劝我付印问世者，我亦甚有此意。现拟于出洋之前将全稿托梁君治华编订，托时君昭瀛经理印刷。我于此道亦稍有把握，不致太落人后。我愿你亦多用功，我定能助你。相传李太白醉而见月于水中，因入水捉月，遂溺死。此事虽不甚可靠，然确为作诗好材料。我现在正作此诗名曰《李白之死》。脱稿后，即寄来一读。

四月四日　诗《进贡者》、《死》、《深夜底泪》发表于《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编《红烛》时，先生把《进贡者》改为《贡臣》，并对它与《死》都稍有改动。

《死》与《深夜底泪》似乎都与婚姻有关。

四月十三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是月十一日，外交部有所谓"取消留级"部令的通告，是专为清华去年参加同情罢考同学所受处分的批示，其中对罢考同学施以威压手段，捏造罪名，污辱人格，末尾云"留级办法，暂缓执行"。先生等对此部令，十分气愤，信中说：

> 取消留级部令已下。内容想八哥已有信详述，兹不复赘。该令于大二（即廿九人）全未顾及。幸而全未顾及大二，因为令中措词污辱学生人格已至极端，未及大二，则大二之人格当不污也。从前我在家时，大二曾有人要求早出洋及津贴等权利，未成。今此令出后，如大二坚持前请，或可稍得小补。但部令说我们"罢课避考"，说我们"事后深知改悔"，叫我们"务希自爱，以励前修"。试问如去年罢课一事，全校都未受影响，只我廿九人作真正的牺牲；我们"求仁得仁"，何"悔"之有？我们这样的人，是不知自爱吗？他又说"予以自新"，"以观后效"。试问我们自始至终光明正大，有何"自新"之必要？有何"后效"之必观？所以我们都以为这种部令"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我们若受他的好处，那便无形承认部令。此种行为，良心之不许也。且从去年不肯赴考，已经光明磊落到现在，何必贪此小利，而贻"功亏一篑"之讥哉？且早出洋实无利益，尤为我个人之不愿；津贴亦甚有限。贪此小惠而遗玷终身，君子不为也。所以我现在决定仍旧做我因罢课自愿受罚而多留一年之学生，并不因别人卖人格底机会，占一丝毫便宜，得一丝毫好处。

参加同情罢考的壬戌级（即一九二二级）同学也曾受到留级一年的处分，闻亦传亦是其中之一。闻亦传等八人曾拒写悔过书，但是外交部竟强迫他们服从多数，而潘光旦愿牺牲出洋，坚持公理，先生为此十分感动，在信中说：

> 八哥等八人不愿写悔过书自甘多留一年，此本可嘉之举，而万恶的外部竟强迫彼等服从多数，决不通融，以陷彼等于险难之域（完全牺牲出洋机会或屈伏于部令下，承认已经悔过）。此为有血性者之所共愤者也。现在我愿抵死力争，甘冒不韪，以触当局之羞恼而致罚于我。更有一可痛心之事，则此八人前已申明无论如何决不卖人格以早出洋。今多数人见威压过甚，仍将出洋，置前言于不顾。独光旦君则愿力争，不得，则完全牺牲出洋。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圣哉！圣哉！我的朋友光旦！我虽为局外人，但若不尽我最高度之力量以为公理战，我有负我所信奉之上帝及基督，我有负教我"当仁不让"之孔子，我尤负以身作则的我的朋友光旦！

实际上，后来潘光旦也如期放洋了。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一九二

二级，就是我所属的一级，则根本没有履行缓期出洋的处分。原来一到当年春天，出洋期近，全级六十多人，除了八个人以外，集体签具了'悔过书'，不肯'悔过'的八人，包括我在内，被革除了'级籍'。但这八个人事实上也没有履行处分，学校为了避免为他们寻找工作或留校进修的麻烦，也就把他们一起送走了事。"(《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04页)

同日　又有致闻家骥、闻家驌、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内容也是关于"取消留级"部令之事。

四月十四日　先生和罗隆基、吴泽霖、高镜莹四人共同具名的《取消留级部令之研究》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四四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这是先生等人在全校面前对此部令的批驳，文中还录有先生等人此前不久写的同名义之《取消留级部令之研究》，阐述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现在对于此次取消留级的部令，稍微有点意见，愿同诸君商榷之。我们身为大二级友，对于这个问题所讲的话，本难发生效力，就是本日敝级已经通过不早放洋，不承受"三条件"(即便给我们，我们也不要)等议案，我们的地位，仍是不便讲话。不过我们看见部令时，我们的良心便吩咐我们非讲不可。从前当局曾经屡次说过，对于这件事的办法，总要"双方过得去"。如今根据这个部令看来，他们过去了，我们可太过不去！兹将何以过不去的四端，分别述之：

(一) 污辱人格。去年我们罢课以后，坚持不考，实为良心上的主张，而部令偏说"当时尚非主动"，试问当时三度表决，几次宣言，到底是谁的主动？这次罢课风潮，一部分人或者认为手续上稍有疏忽。这种疏忽，就是有可侮之处，也不会牵涉到主张上来。而部令说"事后深知改悔"，试问对于这种正大光明的同情主张，诸君果然"深知改悔"吗？他说"予以自新"，诸君果有"自新"之必要吗？他说"以观后效"，诸君的"后效"果然要"观"吗？其令人尤难堪者，则校令中之"诸生务须束身自爱，以励前修，无负外交部培植之至意"数语。试问当日同情罢课时，我们果然是卑污苟贱，不知自爱的学生吗？我们果然"有负外交部培植之至意"吗？

(二) 捏造罪名。罢课一事，师出有名，全国皆知。事前三次投票，手续何等郑重？事后追求补考，心迹显属光明。而部令乃说"罢课避考"。试问"避考"二字果能抹杀当时罢课的初衷吗？

(三) 滑头手段。这次取消留级之要求，同学方面是请其将原案完全推翻，并非暂缓执行。外部果然已认留级办法为不妥当，就该爽爽快快将该案取

消。而部令乃三次申明"暂缓执行",显属别有用意。试问将来学校经费发生问题时,留级一案是否仍能发生效力?试问将来学生无论何种举动当局认为不满意者,留级一案是否又能发生效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种地方,低级诸君当特别注意!

(四)威压政策。取消留级运动发生之后,许多人实居反对地位,但因抱定多留一年之坚心,不愿出头破坏他人的成功,无非欲逐其各行其是之目的。今观部令"一体遵照"一语,又据王代理校长之谈话,留校一事,完全绝望,则不服从部令,只有退学一途。试问决定多留一年之诸君,是甘心自行退学呢,还是屈服于威压政策之下呢?

附:清华学校通告第三十四号:

查本校前以应否取消留级办法陈请外交部批示,本月十一日奉指令开:"据呈'留级办法,应否取消,亟待解决,以便进行'等情到部,当经发交董事会核议具复,兹据复称'该校学生会一再呈请取消留级办法,并声明悔过,情词恳切,似可予以自新,拟请将留级办法暂缓执行'等语前来。查上年诸生等罢课避考,显违校章,于管理原则上,本难稍事通融,第念诸生当时尚非主动,事后深知改悔,酌理衡情,不无可恕,应准将留级办法暂缓执行,以观后效,合行令仰该主任,转饬诸生一体遵照此令"等因奉此,特遵令将留级办法,暂缓执行,嗣后诸生务须束身自爱以励前修,毋负外交部培植之至意为要。此告。

四月二十一日 先生等十人赴安徽灾区服务。时逢第一次直奉大战开战前夕,双方兵力布置于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先生等行至马厂受阻,返归。虽未到达灾区,却亲眼看到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景象。胡竟铭《第三批前往灾区服务中途折回的记略》记载了此行的过程:"第三批赴灾区的,共有十个人,就是闻一多、胡毅、吴景超、潘光旦、潘光迥、吴士栋、刘绍禹、黄翼、赵锡龄和我。我们要去的地方为安徽;我们的任务为替代第一批在该地服务的同学回校。我们预备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到那里,所以定了二十一日由校起程。二十一日早晨,我们的行李等件,都已预备完好,并且黄、胡二君,已经进了城。……三点半钟,我们才由校起身。那时刘君、赵君和潘光旦君,都已先后单人进城,我们压车的就有五个人。……大车到了西直门,我们就换乘人力车赴旅馆,差不多六点钟我们才到金台馆。我们在京奉车站得了津浦车不通的消息,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站长说,不过唐官屯底下的铁道毁了一段,现在已经去修理了,两三天一定会通车的;就不然,我们拿着华洋义赈会的旗帜(蓝地白十字),由水路或由火车,亦都可以过去。所以我们仍定次日去天津。二十二日下午,我们搭车到天津,赵君回校。晚上才到,有章元善先生

家的仆人来迎。章先生也在华洋义赈会里做事，他介绍我们住在他家里。当晚在津站探问得的消息很坏，因为站长劝我们不必去，他说，火车不通的地点在马厂与沧州之间，那里是两军的防线，前两天火车因路毁出轨，压死了一个火夫，路局要去将尸首运回，尚还不行。就是该站奉军军事站长，他也说他们可以护送我们一直到他们的防线的边界，可是直军那边如何待我们，是很难知道的。我们讨论了好久，后因时候不早了，遂展到次早继续讨论。二十三日早餐的时候，我们决定有一步的希望，我们做到一步，到马厂能找到大车或船只，我们就冒险去走一走。于是饭后一齐到车站，搭十点多钟开往马厂的火车南下。我们一路都是走在奉军防线里头，我们看了好多事情：一，从天津到马厂，沿途各站均有军队驻守，并且都有一个军事站长。军事站长，全站都归他指挥，所有火车，开放扣留事情，统听他的命令。二，他们兵士的服装都极其整齐，人人都像预备出发似的，与平常军队大不相同。三，我们车子在路中一个站，遇着孙烈臣的专车北上，[①]他大概是去视军回来的了。四，他们的旗号是红的，二白横条。五，在杨柳青站上，停放着有几架飞机。六，沿途各站，除车队外，普通百姓很少。我们在天津并未预备食物当午饭，及后到了一点钟的时候，竟不能买一样东西充饥。最后在陈官屯站上，才找到一个叫卖的人，买了几个冷烧饼，还有煤油味，但是也管不着这许多了。火车到了马厂，我同潘君光迥下车打听消息。我们第一个惊异就是，满站堆着马草，一眼荒无人烟，惟有那些武装的军人。这车上的旅客，在唐官屯以前，都下尽了，这儿就是我们两个下来。我们询问的结果，就是无论如何走不过去——旱路或水路。因为两军各处都设卡阻止行人，不顾华洋义赈会的，站长只说：'不必去'、'危险'、'不值得'，别的都隐忍不说。所以我们只好跟随原车回来。回天津的车子，旅客很多，都是由马厂一带逃避战争的。到了天津，我们随即搭京奉车到北京，因为一路让等兵车，所以夜一时才到。在北京住一夜，第二天就回来了。"(《清华周刊》第 246 期，1922.5.5) 文中还记述了他们出校门时，找不到拉行李的人力车，因为所有车辆都被拉去运军械。又说他们行前即接到灾区发来的电报，让他们停止出发，但大家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上路。

五月七日　致闻家驷信。信中说到出洋及诗评：

> 我到现在总觉得不愿意走。一嫂[②]读书事我现在看得到[倒]稍淡散了。我不愿走，是因我自己的事。我前已告诉你我想将我的《红烛》付印了。但是后来我想想很不好，因为从前我太没有预备。什么杂志报章上从得未见过我

① 曾为东三省保安副司令兼吉林保安司令。4 月 29 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后，以孙烈臣为副司令。

② 一嫂，即先生夫人高孝贞。先生在家族中大排行第十一，弟弟妹妹称其一哥，称高孝贞为一嫂。

的名字，忽然出这一本诗，不见得有许多人注意。我现在又在起手作一本书名《新诗丛论》。这本书上半本讲我对于艺术同新诗的意见，下半本批评《尝试集》、《女神》、《冬夜》、《草儿》(《冬夜》是俞平伯底诗，《草儿》是康白情底诗，都已出版)及其他诗人底作品。《冬夜》底批评现在已作完，但这只一章，全书共有十章。我很相信我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三人之上，郭沫若(《女神》底作者)则颇视为劲敌。一般朋友也这样讲。但虽然有这种情形，我还是觉得能先有一本著作出去，把我的主张给人家知道了，然后拿诗出来更要好多了。况且我相信我在美学同诗底理论上，懂的并不比别人少；若要作点文章，也不致全无价值。还到原题上去，我不愿走，正因想在中国把这本书作完，并且把《红烛》也料理出版。我若能不出洋，我还想在清华住着利用这图书馆。但这样就发生困难了。住在学校内，弄一个相当的事，又要有时候作自己的事，颇不容易——迳直是不可能。无论如何，这都是过去的话。现在我还是出洋。若书在那边做得成更好，不成也没有法子。我不能不走，倒是因为在清华不好弄事，并不怕家里的反对。

又说到对婚姻的失望：

家里一般俗见，早不在我的心里，更不在我眼里。驷弟！家庭是怎样地妨碍个人底发展啊！细肝，细心，细鼻，细眼，讨厌极了！试问早出洋底虚名好些呢？还是当一个著作家——实实在在的著作家好些呢？俗人真该万死！驷弟！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指发！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谁管得了这些？驷弟！我将什么也不要了！宋诗人林和清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萤为子，以上帝为父母，以人类为弟兄罢！家庭是一把铁练[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经[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本来我立刻就可以回来了，但一因我要作书，不能回来，二因我现在，老实讲，一点也不挂念家里，所以也不想回来。驷弟！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我的思想太衰飒了吗？"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现在还不知道几时才回得了。我高兴几时回，我再写信告诉你。哎呀！我真怕再进那家庭之黑窟！我本要一嫂早回家读书，她没有回去，并且也不写信告诉我。我已写信告诉她既是地方不安静，回去不了，那又有什么要紧呢？但她到现在还没有信来。仗打完了，火车通了，信还没有来，这是什么道理？她若还在省，你去告诉她，我还愿意跟她作个很

好的朋友，她若还是这样糊涂，我连朋友也不要了！我是没有道理讲的，我这样想了，便要这样讲，讲了，便要这样做。

五月十二日　《美国化的清华》与诗《春之首章》、《春之末章》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四七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两首诗收入《红烛》时，有较大的修改。

《美国化的清华》是先生在清华读书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先生对这所学习和生活了十年的学校的感想。文中对一般美国教授认为清华学生"太不懂美国，太没受着美国文化底好处"的抱怨，愤愤不平，有受侮之感，说：

我这意见讲出来，恐怕有点骇人，也有点得罪人。但是这种思想在我脑经[筋]酝酿了好久。到现在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以对他讲。

我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或者清华不能代表美国，清华里的美国人[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不过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又拿我那十年的经验的招牌来讲话），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我现在没工夫仔细将清华的精神分析出来，以同所谓美国化者对照，我只好举其荦荦大者数端。

（一）经济。除了经济，美国文化还有什么？我们看近来清华要学这个的该有多少？再看别的不学这个的，谁不是以"吃饭"作标准去挑他们的学业？再看从美国回来当买办、经理的该有多少？再听一般人的论调，总是这个有什么"用"？那个有什么"用"？他们除了衣食住的"用"外，还知道什么？他们的思想在哪里？他们的主义在哪里？他们对于新思潮的贡献在哪里？他们的人格理想在哪里？他们的精神生活又在哪里？

（二）实验。很好！清华学生真有干练敏捷之才！"五四"运动证明了，童子军证明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证明了，几次的灾区服务证明了。但是也只是 efficient 而已啊！

（三）平庸（mediocrity）。清华学生不比别人好，何尝比别人坏呢？很整齐，很灵敏，很干净，很有礼貌，——很过得去。多数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不逛胡同，——很有规矩。表面上看来清华学生真令人喜欢，但是也只是令人喜欢，不能[引]起人的敬爱，因为他们没有惊人之长。

（四）肤浅。清华学生真浮浅极了！哪里谈得上学问？哪里谈得上知识？一个个见了人，笑笑弥弥的，真是 A very good fellow，但是真有什么诚意待人吗？外观讲得真好，形势极其整齐，正同这几间大洋楼——礼堂、图书馆……——一种风味。随便在哪，面子总不能不顾。讲新也新的不彻底，讲旧也旧得不澈透。浅啊！浅极了！真是些小孩子们啦！

（五）虚荣。人说我们"急公好义"，我们捐吧，把饭钱都捐了吧，反正菜不够吃。总是要添的。人说我们能自治，学生会、法庭都干起来吧；回头会也没有人到，费也没有人交，什么也都忘掉了。运动啊，演说啊，演戏啊，一切的啊，都是出风头的好工具。

"Our Tsing Hua's pride does still abide, and ever more shall stay!"

（六）浮躁。这更不用讲了。这本来是少年的气象，男儿好身手的本色！不独举动浮躁，行动也浮躁，语言也浮躁。mob spirit!!

（七）奢华。谁说清华学生不浪费？厨房、售品所不用讲，每星期还非看电影不可。贵胄公子，这一点安逸不能不讲。清华底生活看着寻常，其实比一般中等社会人都高，在平时还不觉得，到出洋时，真不差似中了状元，三、四、五、六百块，阔给你瞧瞧！

以上所述的这些，哪样不是美国人底特色？没有出洋时已经这样了，出洋回来以后，也不过戴上几个硕士、博士、经理、工程师底头衔而已，那时这些特色只有变本加厉的。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底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

"Oh! raise up. return to us again, and give us manners, virtue, freedom, power。"

先生的愤愤，实际上代表了一些清华同学的看法。梁实秋在《集稿余谈》中说："一多君在上期周刊里作的《美国化的清华》，实在是我许久想作而没有作的一个题目。'美国的教化是铸造天字第一号的机器！'我愿大家——尤其是今年赴美的同学——特别注意，若是眼珠不致变绿，头发不致变黄，最好仍是打定主意做一个'东方的人'，别做一架'美国机器'！但是我看到今年赴美学经济的人数之多，不免使我的愿望的热诚低落。"（《清华周刊》第 248 期，1922.5.19）

在此前后，有诗《青春》、《宇宙》、《国手》、《香篆》、《春寒》、《钟声》、《爱之神——题画》、《谢罪之后》、《忏悔》、《黄鸟》、《艺术底忠臣》、《初夏一夜底印象》、《诗债》等，均收入《红烛》。

五月十六日　梁实秋作《送一多游美》，该诗发表在次月《清华周刊第八次增刊》，序云："一多是文学社的社友、清华现在唯一之诗人，有集曰《红烛》。今且游美，全社有失依之感。习俗之序赠的滥调，文学社社友本不优为；而别离情绪盘萦脑际不去者累日，遂迸而成此。既成篇，诗之工拙弗计也！"原诗如下：

牡丹谢了，早谢了，
留下无数鸡爪子似的种子，
缀在绿肥的枝顶上。
荷钱还稀得很呢，
三三两两的在池边聚着，
也不知喁喁的商量些什么？
唉！什么是饯送的馈礼呢？
又谁是饯送的主人呢？
*　　*
东方的魂哟！
雍容温厚的东方的魂哟！
不在檀香炉上袅袅的香烟里了，
虔祷的人们膜拜着些什么啊？

东方的魂哟！
通灵洁彻的东方的魂哟！
不在幽篁的疏影里了，
虔祷的人们供奉着些什么啊？

遗弃的髑髅啊！
优美的尸身啊！

东方的魂哟！
终于像断了线的纸鸢，
漂到迢迢遥遥的云阶上了吗？
唉！诗人早一把掣着线端，
立在云端，欢喜的降着了。
从云缝里露着的景象：

跳舞的髑髅，游行的尸身，
早密丛丛的填满了人间。
诗人的心也就震荡了！
“拿去——这是你的灵魂！”
只这一句话能完成诗人。
我的朋友！
看渊潭久了，渊潭也要看你！
嗅香花久了，香花也要嗅你！
天上人间的诗人啊！且记取：
“拿去——这是你的灵魂！”
只这一句话能完成诗人。
*　　*
朋友啊！
海洋里的薰风，
将把“红烛”的光焰更扇亮些罢？
你就乘着熊熊燃着的“红烛”，
昂然驶进西方海岸的湾港罢！

我感到恐怖的黑暗，
便灭了我手里的纱灯；
但是，到海底探珠的人们啊！
往黑暗里去求光明的朋友啊！
燃着你们的灯光罢！
在魔鬼怀里炬火要缩成爝火，
爝火要变成磷火了！

纱灯的周围，有数不清的灯蛾；
但是闪烁的炬火也要驱走恶魔了！
朋友啊！燃着你的灯罢！
在烛影摇红里，我替你祝福了！
*　　*
牵裳的风啊！

击鞭丝的柳枝啊！
挽不住离人去了！……

朋友啊！
谢了的牡丹，
钱大的荷盖，……
在这冷清的黄昏，
只这些是馈礼了！
但在失了魂的人们里，
谁又是饯客的主人呢？

五月十八日　清华文学社召开常会，讨论俱乐会及介绍新会友等事，并定二十一日晚召开俱乐会，并欢送今年出洋的会员，互谈至十时余始散。（《校闻》，《清华周刊》第 249 期，1922.5.26）

五月十九日　《清华周刊》第二四八期刊登《一九二一毕业大二级赴美留学学科学校一览表》。大二留级者二十九人全部放洋，他们是：赵连芳、钱宗堡、费培杰、何浩若、霍启芳、许复七、高镜莹、顾德铭、萨本栋、邹维渭、黄卓繁、董大酉、闻一多、时昭涵、时昭泽、罗隆基、王朝梅、廖芸皋、孟宪民、孙超烜、孙增庆、陈之长、陈崇武、陈念宗、沈仁培、沈宗濂、沈有乾、吴泽霖、王昌林。①

此前，由于清华准备改办成大学，有人建议将先生等人留在国内当办大学的试验品。但校长曹云祥认为条件不成熟，所以签发了毕业证让他们出国。（据访问许复七记录，1986.8.25）

五月二十一日　晚，清华文学社开召送旧迎新会，欢送先生、时昭瀛、陈华寅三人离校，欢迎饶孟侃、万卓恒、郭协邦、马杰、程瀛元、高瀚、梁思永七人入社。顾毓琇回忆说："晚上，在一所陈设得很精致的房屋里，有一二十人聚在一起开一个叫什么送旧迎新的俱乐部大会"，先生在会上说："我个人对于母校的依依不舍，尤其是对于本会的依依不舍，那是不用说。"又说："我们肉体虽然分离，精神还是在一起。"在场的人"都觉得末了这几句话，很情真，很悲壮"。（顾一樵《怀故友闻一多先生》，上海《文艺复兴》第 3 卷第 5 期，1947.7.1）这晚的情况，《清华周刊》报道云："当时倾谈畅叙，不知电灯之将灭云。下学期职员已经选出：干事梁治华，书记吴景超，会计吴

① 《清华周刊第八次增刊》云又有黄子卿、蔡承新、王际真、刘锡晋四人。刘真主编之《留学教育》则无邹维渭、沈仁培，有黄子卿、王际真。

文藻，会所管理张忠绂。诗组主席梁治华，小说组主席张忠绂，戏剧组主席王绳祖。”又云：“梁任公在该社所演讲的《中国韵文所表现的情感》业已讲完，闻再校改几遍，将编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校闻》，《清华周刊第八次增刊》，1922，6）

是夜，先生返回寝室路上，见到顾毓琇。顾这时似乎有些伤感，他在《离别》中写到：“夜深人静，一个少年在幽暗的树荫底下走着，有两个黑影渐渐跟着少年走去。快赶上了，离他不过几步了，疲倦了的少年正回转身来，恰好遇见。他觉得很喜欢，很悲伤，说道：‘想不到碰见你们！’他转眼看着那将要分别的朋友，故意问道：‘你明天不是一早就要离校吗？’那个朋友点了点头，少年也恨无话可说。他们都倦了。他们要各自回寝室睡觉去。那一位同学是就要分路的。少年同那位离校的朋友还可以一路多走一阵。走到十字路口，那位同学要转弯了。少年知道他们还不至分别得这样早，心里觉得有一种安慰的愉快。但是看见他同他轻轻地握手，低低地言别，就想到一会儿也免不了经过这种残酷的拆散朋友的刑罚。那位离校的朋友回转身来了。少年正打算同他一步一步慢慢走回去。朋友走近面前，忽然伸出手来。少年莫明其妙，只觉得他也是犯罪的人了。‘再见——我这边走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宣告罪状，使得犯人更莫明其妙了。夜更深了。黑暗的路上，少年独自走回他的寝室去。”（转引自顾一樵《怀故友闻一多先生》，上海《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7.7.1）先生是很重感情的，后来看到这文章，很感动。

离校前，先生送给梁实秋两幅画。梁在《谈闻一多》中说：“一多在离开清华之前，特为我画一幅‘荷花池畔’，画的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那是清华园里唯一的风景区，也是清华园里的诗人们平夙徘徊啸傲之所在，是用水彩画的，画出了一片萧瑟的景色。前此他又为我画了一幅‘梦笔生花图’，是一幅图案画的性质，一根毛笔生出无数缤纷的花朵，颇见奇思。”（第15页）

五月二十二日 先生一行十二人离京赴汉口。（据《清华周刊》第248期，1922.5.19）离校时，留下的通信地址为“湖北黄州下巴河王永春转”。闻亦传、闻齐的通信地址均为“湖北下巴河镇立成号转”。（《通信住址一览》，《清华周刊第八次增刊》，1922.6）

本来，由于对家里包办的婚姻不满，先生曾打算从北京直接去上海出洋，但这时还是决定回一次家。

先生在清华学校整整生活了十年，因为学制八年，先生前后又各留级一年。能在清华待十年的人极少，当时进入中等科一年级，读到八年毕业的人并不多，许多中途便离去，另一些则是中间插班，能在清华读五六年就算长了。清华学校对学生的甄别十分严格，至先生毕业这年，全校共毕业五百五十五人，因功课不及格、品行

不端正、因病退学或死亡者，共四百五十六人，即毕业者仅比退学者多九十九人。以咨送或插班的学生籍贯而言，先生籍隶的湖北，毕业三十四人，退学三十人。余者中，湖南毕业二十八人，退学二十八人；江西毕业二十八人，退学三十五人；陕西毕业一人，退学八人；新疆退学五人，竟无人毕业。故吴景超说："只有湖南、甘肃二省，退学总数，等于毕业总数；直隶、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吉林、奉天九省，毕业总数多于退学总数，其余的省分，都是得不偿失。"（《清华的历史》，清华周刊社编《清华生活》，1923.4.28）

清华学校为先生支出的教育经费，也有案可寻。一九二三年初，黎元洪、冯国璋向清华学校提出请求他们的子弟自费免考入学，被学校拒绝，批示云"是以冯氏子弟入校一节，即时免考插班，更无先例可援"。（清华学校档案，尤字第1051号，清华学校文案处藏，转引自《黎冯子弟与自费生》，《清华周刊》第270期"社论"，1923.2.23）当时，学校为了计算冯国璋子弟应承担之自费数目做有统计，结果是每年需一千零五十四元。按此数，先生在校十年，所用教育费应是一万零五百余元。

五月二十五日　顾毓琇作《离别》，述其与先生惜别之情，交与《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发表。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上海《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五期重载时，顾又加了序："我比一多晚两年入学，同学相处，有七年之久，但彼此真正缔交，却在一多离校之后。一多在校时，我们曾组织清华文学社。一多是新诗人，有诗集《红烛》。我那时新旧诗一概不做，所以很少有机会多谈。民国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文学社举行了欢送大会以后，我写了一篇'短篇'，题为《离别》，在《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发表。一多将出洋前，回到湖北，看见了这篇短文，便写了一封长信，托实秋转给我。从此我们便订了交，做了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先生对清华文学社的朋友们影响较大，以致这年年底徐志摩来文学社讲演《艺术与人生》，大家听了都有所保留意见。梁锡华《徐志摩新传》说："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书内详述此事，认为那次演讲完全失败，原因在于讲者把一篇通俗性文章，装上个'牛津方式'以英文宣读。……因为志摩否定中国，高举西洋，而那班听者是颇受闻一多这位老大哥影响的清华文学社同人，他们对讲者的话，是不会无条件接受的。"（第53至5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10月修订再版）

五月二十六日　诗《初夏一夜底印象》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四九期。收《红烛》。标题下云"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战争时"。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五月初，奉军败退。这时先生刚刚赴安徽灾区在马厂受阻折回。诗，就是在这种感性的体会中写成的。

六月十九日　致梁实秋信。未寄。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说思念友人，

作诗《红荷之魂》：

昨晨盆莲饮雨初放，因折数花，供之案头，复听侄辈诵周茂叔《爱莲说》，便不由得不联想及于二千里外之诗人。此时纵犹惮烦不肯作一纸寒暄语以慰远怀，独不欲借此以钩来一二首久久渴念之《荷花池畔》之新作乎？别来数旬，响者"三三两两的在池边聚着"的荷钱，如今当蔚成"莲叶何田田"矣！田田的莲叶寝假而蔚成"花开十丈藕如船"矣！实秋，吾读足下作品，真能摄取"红荷"二字之神，故号你为"红荷之神"可也。宋人评王右丞曰："秋水芙蓉，倚风自笑"，你真当之矣。红荷之神呀！愿你佑诸荷钱之速长也。

又说在续《李白之死》、缮《红烛》、续《风叶丛谈》(更名《松尘谈玄阁笔记》)、校订增广《律诗底研究》、作《义山诗目题要》，"暇时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又言及陆游者甚多：

放翁真"诗人"也。彼盖时时退居第二人地位以观赏其自身之人格，故其作品中个性独显。他人歌讴宇宙，彼则歌讴"诗人"——他自己——，其所道及之宇宙，不过为他自己之背景耳。盖在彼，无诗人，亦无世界也。故其诗中画意甚多而且真切(放翁固亦能画者)；在此画中，彼自身恒为其主要部分。观其诗句可知也。——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枯柳坡头风雨急，凭谁画我荷锄归？"
"身在范宽图画里，小楼西角剩凭阑。"
"小市跨驴寒日里，任教人作画图传！"
"何妨乞与丹青本，一棹横冲翠霭归？"

如此等等，不数枚计。他诗人每每忘却自我，或记之亦不如放翁之坚牢；放翁在诗中自称"先生"、"老夫"、"老子"，"使君"，"丈人"之处极多，而迳称"放翁"处尤多——盖处处不能忘却一个"我"也。愚以为"惟我独尊"是诗人普通态度，而放翁尤甚。诗人非襟怀开旷，操守正大，自信不移者，不能勉强作此狂语。苟能如此，则便称"惟我独尊"，又何愧哉？他人或不自知为诗人，放翁知之独悉，信之独坚。吾佩放翁之诗，吾尤佩放翁之人——诗人！放翁不云乎？——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骨不换，固不能为诗也。老杜之称太白曰——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吾见世人之无诗骨而"妄学诗"者多矣。

六月二十二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附《红荷之魂》，说："此归家后第一试也。我近主张新诗中用旧典，于此作中可见一斑。"《红荷之魂》发表于九月十一日《清华周刊》第二五〇期，收《红烛》。

信中又附一函，是看了《离别》后，写给其作者的，因为猜不到作者究竟是谁，托梁实秋代转。这封信曾于顾毓琇《怀故友闻一多先生》中刊出，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犯人"：

你冤枉了，我不知怎样就误罚了你，我懊悔不完！我不知我已冤了多少同你一样的人；我也不知自己被别人这样冤了多少次！唉！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还有人一壁讲别人滥刑，一壁自己也正在滥刑吗？什么魔鬼诱我在"我个人对于母校的依依不舍……"一语后又画蛇添足，添了一句什么"没有关系"的自欺欺人底话呢？但是又是什么魔鬼诱了你在那披肝沥腑，可歌可泣的短札后又添了这样自欺欺人底一段呢？——

"他看完了这封信，也不必调查他朋友的姓名。他把信收好，更不必写什么回信。……"

朋友啊！昨晚我弟弟到家，我首先便问他要增刊，到夜深才看到你的大作。我看完首页便知是同我有关的，我喜极了，看完了第二页，更喜出望外，便向与我同看的妹妹及细君讲："我要写封信去"。谁知看到篇末，竟不准我写信呢？这时，我竟是宣告了死刑的犯人了！朋友！那篇末一节文字比起"再见——我这边走了！"一语，究竟如何？朋友！你受的是一等无期徒刑，我呢？——恐怕是死刑罢？唉！我既不能作小说，若不许写信，我这冤屈不将永无雪白之日么？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可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实秋君谈及此二君之公开之热诚，辄为感叹不已。我生平自拟公开之热诚恐不肯多让郭田，只是勇气不够罢了。文学社中同社有数人我极想同他们订交，以鼓舞促进他们的文学的兴趣，并以为自己观摩砥砺之资。终于我的勇气底马力不足以鼓我上前向他们启齿。至今我尚抱为至憾。朋友，我诚不知你是谁，但我决定我这信若请实秋转呈，必定万无一失。你是毅夫吗？你是一樵吗？总之两位都是我素所景仰的；我从前只是自惭形秽，所以不敢冒昧罢了。总之，朋友，你可有这样勇气用你的真姓名赐

我一封回信吗？（这事当然现在不成问题，因为不日我就要启程）[①]

你说我有学问，我真不敢当。只是我自信颇能好学。你祝我成功，我倒知道应该益加勉励。

信写完了，我要还到那天晚上会中发言底起首两句话——便是对于母校的依依不舍同对于文学社的依依不舍。这两句话确是出于真情。我愿你与同社诸公努力为母校为本社效劳；我用我的至诚祝你们的成功！

我于偶然留校的一年中得观三四年来日夜祷祝之文学社之成立，更于此社中得与诗人梁实秋缔交，真已喜出望外，今既离校复得一知己如足下者，更喜出望外之外矣！唉！十年之清华生活无此乐也。我之留级，得非塞翁失马之比哉？顺祝　暑安！

误人自误的罪犯，

你的最忠诚的朋友

七月三日　自是日起，辛酉级留级者开始在上海博物馆路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到、体检，并定于十六日乘提督公司麦金雷总统号放洋。（据《清华学生赴美消息》，《申报》，1922.7.3）本来，辛酉级留级同学可以与一九二二级毕业生一同赴美，但他们坚持单独启程，表示自己仍是辛酉级学生。离校后，他们还单独编辑了一本纪念小册子。

七月十二日　赴上海南京路留美同学会，参加欢送清华同学茶话会。会上朱成举致词，李耀邦演说，沈有乾代表先生等答词。（据《留美同学会欢送清华同学》，《申报》，1922.7.13）

七月十六日　乘 Key Stone State 号海轮离沪赴美。行前，曾有放弃留学的念头。梁实秋《闻一多在珂泉》："对于到国外去，闻一多并不怎样热心。那时候，他是以诗人和艺术家自居的，而且他崇拜的是唯美主义。他觉得美国的物质文明尽管发达，那里的生活未必能适合他的要求。对于本国的文学艺术他一向有极浓厚的兴趣。他对我说过，他根本不想到美国去，不过既有这么一个机会，走一趟也好。"（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9期，1947.9.14）

清华学生每年放洋，学校均派人护送，这次担任大二级赴美护送员的是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先生，并于寒假后确定。（据《校闻》，《清华周刊》第238期，1922.3.3）

七月十八日　到神户。

七月二十日　到横滨。因轮船在此加煤，需停留五十小时，先生遂两次登岸乘

① 括号内的文字据该信原样补充。

电车至东京观光。对日本的感想，在抵美后致朋友信中说："就自然美而论，日本的山同树真好极了。像我们清华园里小山上那种伞形的松树，日本遍处都是。有这样一株树，随便凑上一点什么东西——人也可以，车子也可以，房子也可以——就是一幅幽绝的图画。日本真是一个 picturesque 的小国。虽然伊的规模很小——一切的东西都像小孩的玩具一般。——但正要这样，才更像一幅图画呢。讲人为美，日本的装束(要在日本地方底背景里看)，日本的建筑，日本的美术还要好些。"

第一天到东京，见有和平博览会和美术展览，因时间不够，仅走马看花看了一下。在东京用餐时，遇见帝国大学英文系二年级学生井上思外雄，偶尔谈起来了，感觉很不错。

第二天，为了观看展览，再次赴东京。但东京基督教青年会派来陪同他的松本，却偏要带着去看三越吴服店。三越吴服店实际上是家大型百货公司，是日本的著名企业。东京的三越吴服店为一西洋式大楼，也是东京人引以骄傲之处。但看过三越后，时间又不够了。回到横滨时，意外见到从东京特意来拜访的井上思外雄。先生说："第二天他特来横滨到船上来找我，那知道我诘朝已上东京去了。等我回来，他碰见我，便要看我的诗，但又不懂华文。后来他要我寄几首给他，他拿去请中国朋友帮他翻译了，登在杂志上。"井上思外雄见到先生似乎很兴奋，滔滔不绝背起西洋诗歌，直到船要开了，才勉强说"再见"。(《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1922.7.29)

七月二十九日　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桓、梁实秋信。刊于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周刊》第二五一期。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上诉说旅途的生活：

> 我在这海上飘浮的六国饭店里笼着，物质的供奉奢华极了(这个公司底船比"中国"、"南京"等号底船价贵多了，因为他的设备更讲究)。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压力之下。我初以为渡海的生涯定是很沉寂，幽雅，寥阔的；我在未上船以前，时时想着在汉口某客栈看见的一幅八仙渡海底画，又时时想着郭沫若君底这节诗——
>
> 无边天海呀！
> 一个水银的浮沤！
> 上有星汉湛波，
> 下有融晶泛流，
>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 遥遥地，遥遥地，
> 在一支象牙舟上翘首。

但是既上船后，大失所望。城市生活不但是陆地的，水上也有城市生活。我在烦闷时，我愈加渴念我在清华的朋友。这里竟连一个能与谈话的人都找不着。他们不但不能同你讲话，并且闹得你起坐不宁。走到这里是"麻雀"，走到那里又是"五百"；散步他拦着你的道路，静坐他扰乱你的思想。我的诗兴被他们戕害到几底于零；到了日本海峡及神户之布引泷等胜地，我竟没有半句诗底赞叹歌讴。不是到了胜地一定得作诗，但是胜地若不能引起诗兴，商店工厂还能吗？不独作诗底兴趣没有，连作文底兴味也没有。

又说计划中的《海槎笔谈》未能作完，却替船上印行的一种日报"画了一张旅客底 caricature"。还说读了《创造》创刊号上的一篇描写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受到凌辱的小说《最初之课》，"你们试想我起一种什么感想？同种的日本人尚且如此，异种的美国人该当怎样呢？"

信写毕，又在空处加上数语，《闻一多书信选集》未收，其中有："归国后，我定要在日本学一两年美术，日本画"，"《女神》多半是在日本作的，作者所描写的日本并不真确。他描写了雄阔的东岛，但东岛并不雄阔。东岛是秀丽的，应该用实秋的笔来描写。"

旅途中，先生作了几首新诗，一首名《孤雁》，收《红烛》，并以此名为海外篇的篇名。这是先生出国后作的第一首诗，诗中把自己此作"不幸的失群的孤客"，"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又有《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感赋》，从题目看也应是这时写的。刊于次年三月十六日《清华周刊》第二七三期所附文艺增刊第五期。收《红烛》时，改题为《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

八月一日 抵美国西北端华盛顿州港口城市西雅图。海上共行十七天。登岸后，到移民局办事处查验护照，再至海关领取行李，还要接受医生检查身体。这些办理完了，才乘车入住青年会公寓，并领取当月津贴八十美金。离开西雅图前，先生与诸同学在静会公寓门前合了一张影。这张照片，是一九二一级被迫留级同学的唯一合影。分手后，先生乘车南下至旧金山。再转车东行，穿过落基山脉与许多峡谷、原始森林。沿途景色很壮观，先生领略了美国大自然的风光。

八月七日 抵芝加哥。到站迎接的清华校友有十余人。时，芝加哥有中国留学生达二百余人，其中清华学校毕业生就有二三十人。初到芝加哥，先生住在德莱克塞尔街五七四七号。

芝加哥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位于伊利诺斯州的北部，密歇根湖的南端。十九世纪中叶成为美国铁路的中心，随之带来了工业的巨大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它已成

为美国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中心。

芝加哥的文学活动相当发达，被称为“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此时正至巅峰时期，它的主要作家德莱塞、安德森、马斯特斯、桑德堡，在作品中如实描绘当时美国的城市生活，谴责美国社会一味追求工业化和物质享受而丧失了传统的乡村美德。所有这些，对先生日后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

八月九日　致闻家骏转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说与钱宗堡、罗隆基暂时同居，“房租三人共每月四十五元美金，每日在饭馆吃两餐饭，每餐约须三四角美金，刚吃完了不过一两点钟就饿了”。

八月十四日　致吴景超、翟桓、顾毓琇、梁实秋信。刊于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周刊》第二五一期。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对芝加哥的印象：

> 支加哥乃美国第二大城，我只讲一件事，你们就知道这里工厂之多。米西根街一带房屋皆着黑色，工厂吐出之煤烟熏之使然也。我们在那里去一回，领子就变黑了。这里对于我最 imposing 的两个地方是美术学院里的美术馆同支加哥电影园。美术馆之壮丽辉煌，你们自然能够臆想得到。戏园决非在清华看看 Fairbanks、Mary Pickford 和 Pearl White 的人所能梦见的。我们从前攻击的诲淫诲盗的长片，在这里见不着。这里最好的片子都是一次演完的。并且最大的戏园里每次的会序中电影不过是一小部分。那里最好的还是音乐同跳舞。美国人审美的程度是比我们高多了。

又表示对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的精神状态很不满意：

> 我要再告诉你这里中国学生团体生活的情形。这里的学生政治恶于清华。派别既多，各不相容，四分八裂，不可收拾。有一人讲得很对：处处都可以看见一个小中国，分裂的中国。清华同学会内容大概也差不多，处处都呈一种悲观的现象。我观察这里的中国学生，真颓唐极了。大概多数人是嬉嬉笑笑，带着女伴逛逛而已，其余捉不到女伴，就谈论品评，聊以解嘲而已。高一点的若谈到正当的 serious 的事，也都愁眉叹气，一筹莫展。总而言之，他们没有一点振作的精神。本月十九日是支加哥清华同学底 reunion，到时我再仔细观察观察。

信中还说到浦薛凤的一件新闻，说“你们可以想到美国留学生底生活是怎样地 romantic”，[①]又说：“我到支加哥才一个星期，我已厌恶这种生活了！……你们在清华底享乐之中，不要忘了那半球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

---

① 此句据原信补充。

八月十六日 致闻家驷转父母亲信[①]。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诉说志在文学而又不欲放弃美术之苦恼：

近来生活犹常，看书、作笔记而已。现已作就陆游、韩愈两家的研究，蝇头细字，累纸盈寸矣。惜有时欲求参考书不可得，真恨事也。我现在所从事之著作乃以为将来归国教授之用，惟每念及此，辄为心忧。我在此习者，美术也，将或以美术知名于侪辈。归国后孰肯延我教授文学哉？求文学教员者又孰肯延留学西洋者教中文哉？我既不肯在美弃美术而习文学，又决意归国必教文学，于是遂成莫决之问题焉。

又对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非常反感：

在国时从不知思家之真滋味，出国始觉得也。而在美国为尤甚，因美国只知白种人也，有颜色之人（彼称黄、黑、红种人为杂色人），蛮夷也，狗彘也。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然吾见在此之留学生皆蕞蕞者啜醨之徒，吾以一介之士又其奈彼何！[②]

八月二十七日 有英文信致“亲爱的朋友们”。日本学者铃木义昭教授翻译如下：

我现在有很好的机会练习打字，很想写写英文试试看，而且又恐提笔写中文就会不由得想家，所以就用英文写了。

到芝加哥后，由于搬家、参观，还有其他的许多事情而忙得不可开交。都已三周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给诸兄写信，其间，多次想要提笔，可是……后来，一直在看杂志，寻找最新版的书籍，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与人交谈、向人学习。因为想要了解这个国家文学界的最新动向，应该引起注意的倾向等等。下面把了解到的结果概括一下吧。但还是希望不要看作是最后的定论或完全可信为妥。

文学中所谓的“新文学运动”，对于我们来说，能够明白它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偶然的事件，就很好了。众所周知，正因为它是世界规模发生的事情，所以英语圈内也很流行。

我们从太平洋彼岸的邻国那里就像模仿政治上再生的观念那样，模仿了

① 此信落款日期作“十月十六日”，但据信中内容，似为八月事，《闻一多书信选集》作八月，今从之。

② 此段《闻一多书信选集》据抄件，今据原信影印件校改。

文学再生的观念。

对于美国文学来说，现在实际上是个划时代的时期。此时的文学既是辉煌时代的宠儿，又是当今伟大的歌手。神秘的面纱已揭开，诗歌作为第一幕登上舞台。某位作家（诗人）曾对公众宣称："今天，任何阶层的男女，任何性格的男女都吟诗、谈诗，他们在咏自己的人生。诗人们也在谈论和欣赏自己的创作。"出版行业十分欢迎"新"诗人，宛如对大家发出了派对的邀请书。"新"诗派的主要成员有：罗伯特·弗罗斯特·李、里古拉斯·瑞切尔、埃米斯·罗艾尔、马斯特斯·爱德华·李、萨德堡·卡尔、莎朗·特斯蒂尔、哈里威特·孟禄等，其他成员在此就不一一举列了。

了解到了我们文学的叛徒，胡适博士的"八不主义"全部都不是他的独创，这多么意味深长啊。让我们摘一部分伟大的女诗人埃米斯·罗艾尔女士所代表的"新"诗派——意象派中的教条吧。

1. 使用日常口语。

2. 创造崭新的节律——表达崭新的心情。

3. 主题的选择，完全尊崇自由。

4. 表现一种概念……

5. 诗风硬朗、明确，避免暧昧、不确切的表达。

以上几条不是可以嗅到胡适博士的"八不主义"教条的味道吗？

那么想给你们介绍一下意象派。也就是说为了能够追上他们的步伐，我们的"新诗"所处于的只是从一时的狂热状态中跳出来的初级时期。我们至少和罗艾尔女士他们是盟友。正是如此，才会出现教条的六条中就引用了别人的伟大而"陈腐"的四条，成为其热心的拥护者。剩下两条即：

6. 最重要的是相信，诗歌的精华来自我们的集中。

我们的"白话诗"过于空洞、过于轻薄、过于贫瘠了，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树立意象派诗歌的个性，用深沉而温暖的色彩去润饰她。在此摘录罗艾尔女士的《风与银》以说明我的观点。

（诗《风与银》略）

另外摘录萨德堡氏的《雾》来看一下。

（诗《雾》略）

把这两篇诗作与我们杂志中的作品做个比较。

《雾》的作者萨德堡氏，是当今美国诗人中思想和创作态度最有创意的。他曾当过理发店的清洁工，简易剧场的后台工作人员，制砖工厂的司机，餐馆

的洗碗工，割麦人等等。在经历过这些之后摘取了工业国家——美国——的伟大诗人的桂冠。他现在也住在芝加哥，其公开的诗集取名为《芝加哥诗集》。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把他称作英雄、代言人，甚至赞美为“我们的神”。如果我说前不久出席了这位伟大诗人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后援会的话，你们也一定想知道些什么吧。可以想象我在这位伟大的人物面前所受到的鼓舞和激励。

今后打算不断地给你们寄美国最有名的女诗人孟禄编辑的杂志《诗的杂志》的复印件。关于这个杂志的名声可以引用一些评论。“排在英语圈诗人中最高的地位”。“恐怕孟禄女士在美国比其他人在诗歌上的贡献都要大”。“此杂志的诞生意味着美国文坛文艺复兴的诞生”。《诗的杂志》与《新青年》给予我们的作用相同，不，应该是更多地为美国新文学运动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如其再这么介绍孟禄女士，倒不如看看她的作品为佳。

（诗《爱之歌》、《山之歌》略）

另一方面，作为评论家的孟禄名声还要胜诗人一筹。

在此不能不提的还有以神童之称享誉美国的诗人希尔特·康玲格女士，她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显示出来惊人的细腻、成熟艺术家的精密等才能。

（诗《水》略）

有些事情不得不提出其诚实性，即，在我们诗的世界里环境的健全性。由《新诗人》引起的最明显的争论，也就是根据他们的艺术所引起的变化而已。所谓诗是由西部开拓及工业建造而孕育的说法所产生的生命的共鸣。美国人的生活，正由窒息、压抑的状态向户外、吉普赛式的自由状态发展。正因如此，就必然产生了简洁、直截、强有力的东西。其精神是真实的、自然粗糙的。这些就称作“新”诗了。但是，在我们中国又怎样呢？事实是诗里有过度的工业化问题。但是，这也是必须加以比较的吧。我们的诗人揭示出了煤烟、铁锈等这些鄙俗的东西。而另一方面美国还很年轻，他们如同天真烂漫的孩子似的，道出了率直、简洁、粗糙的一面。可是，难道对那些文雅年长的绅士所表示的谢辞，语言老师却用三岁孩子的口吻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就允许了吗？对于语言老师来说，用孩子的想法来考虑问题并说出来，总有什么理由吧。我不反对使用明快、直截、严肃的语言，可是却不可模仿孩子。伟大的美国诗人创作出可令他们国家引以为傲的杰作，受国人的欢迎，他们试图为自己的国家复兴文艺。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呼吁着新艺术要更简明、更现代、更时新。可是作为追求个性的艺术家却屡次遭非难，批评家不断地对个性化艺术发牢骚。如果是强调真艺术，便是国家的艺术，这一规则是没有例外的。我们能将“文

言文”这一老朽的东西用“白话文”代替。可是其代价是失去了自身的生气勃勃的个性。再来看看我们的作品吧。可以看出文章中外语的术语、外语的表现、外语的主题、外国的思想引进的混乱。我对自己脱身这罪责深感自责。但是，就尊严来看，没有比郭沫若更有罪了。他不过是巧沙的用中文表达了西方的思想而已。他不过是一个技巧高明的歌德的模仿者而已，至今为止，我都被蒙蔽，给了他过高的评价。

我还要不断地给你们写信的，今天就此搁笔了。在日常读书中留下了很多印象，给你们写信是惟一的表达方式。正如所知，因为周围没有可以一起谈论诗歌的人。即使偶尔诗性大发，说出的也好像只是嘲弄。因此，谁能给我写点信，真是感激不尽了。

在新学期开始之际，祝愿我们的文学会具有蒸蒸日上的劲头，一年里成果累累，事业顺畅。也祝愿大家在新学年里，完成大事，给文学会增光。我非常想知道我们的新计划。尤其想读到各位的近作。（铃木义昭《闻一多给清华文学会友人们的一封英文信》，陆耀东主编《2004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第379至38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九月一日　致梁实秋、吴景超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抄录四首诗：《火柴》、《玄思》、《我是一个流囚》、《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感赋》。信中特言：“拙作请勿登《周刊》”[①]。但梁实秋仍将它们登载出来。《火柴》刊于次年一月十三日《清华周刊》第二六七期所附文艺增刊第三期。《玄思》刊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华周刊》第二六四期所附文艺增刊第二期。《我是一个流囚》刊于次年二月十五日《清华周刊》第二六九期所附文艺增刊第四期。均收《红烛》。

《我是一个流囚》的写作动因，在信中有特别说明：

我要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在海外研究文学的清华同学底消息。我知道两个人：一为卢默生，一为张鑫海。卢本学商业，因情感生活底不得志乃改学文学。现在成绩甚优，所作英文诗甚为外人夸奖。但是可惜艺术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什么是他的问题呢？他是有妇之夫，且为有子之父了。这个婚姻之不满意自不待言。但他若处于中国社会，此本不成问题。不幸他所处者乃恋爱自由之美国社会。在这种环境里不是恋人的也都薰染成恋人了。我想卢君于其从前之婚姻，只不过经历一种形式的礼仪，并不曾有情感的生活；他所有的情感都积蓄着，以为到这边来作一火山式的爆裂底预备。火

① 此据该信原件，《闻一多书信选集》无此句。

山果然爆裂了！他的精神受不起那种震动便失了作用了！诗人作了情感底牺牲了！他疯了！天啊！天啊！你怎么这样糟蹋你的骄子？但是天并没有完全糟蹋他。他的神经虽失了作用，他的理智还强健如故。他的功课还做得好极了，好得无以复加了。不过他常常一两个月不同人讲话，不剃头，做些古怪的态状罢了！

……

朋友们！你们听了卢君底故事，不要替我担忧也要蹈他的前辙吗？《我是一个流囚》是卢君之事所暗示的；卢君之事实即我之事。但是我可以告慰你们我现在并不十分衰飒；我对于艺术的信心深固，我相信艺术可以救我；我对于宗教的信心还没有减替，我相信宗教可以救我。

九月十日 下午二时，参加留美西部清华学会在西北大学哈利士厅召开之事务讨论会，到会三十余人。会议由孙浩煊任主席，杨光泩任记录。会议程序为会议主席报告、会计报告账目、选举审查账目员、会长报告。继讨论数案，包括清华改为大学之计划、毕业生捐助母校事项、国内成立中国支部、清华同学会与清华学校之关系、改组《清华周刊》后应称《清华周刊及毕业生消息》、毕业生在学校董事会中之代表权等。会议决议以四月三十日为同学会周年纪念日，并选举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学年西部清华同学会新职员。结果，孟继懋当选主席，张女士当选副主席，先生当选记录书记，钱宗堡当选通信书记，王世圻当选会计。晚七时半，西部清华同学会在伊温司敦之北岸饭店举行亲睦会，与会五十三人中有十三位女宾。（据《留美通信·西部清华同学会事务讨论会记录》，《清华周刊》第257期，1922.11.3）

这次留美清华同学会西部年会的情况，罗隆基在致《清华周刊》编辑部信中介绍说："在报告他事以先，有一事足为诸君告慰，足为清华前途欣幸者，厥为在美清华生对母校热情渐次增加。即以本年年会而论，聚餐会外，另有议事会一次，延长三四小时之久，议案十余件，夜间聚餐席上，又将未了案件，从事讨论。吾辈姑不论其议决案件，有多大价值，将来实行，有多少效力，然一番爱恋母校之诚意，维持母校之精神，则实未可抹煞。此后同学会会员，果真能团结一气，行见官僚董事制，不推自倒，饭桶教职员，不赶自去，大学问题、基金问题、校长问题、教员问题，我辈终有提刀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日矣。欲同学会与母校之结合，则周刊实为总关键。此道一通，消息灵便，资料敏捷，则前途顺利，更不可胜言。则此时之周刊改组，居然大功告成。容不当为我辈贺，为周刊贺，为清华贺耶？周刊改组之动机，发自何人，起自何时，过去进行之往迹奚似，姑不具述。不佞与一多君自受托以后，则固未尝顷刻忘情于此。"

信中所说与先生受托之事，即为改组《清华周刊》征求留美同学的意见事。罗隆基信在中说：此计划“在年会时曾正式致函主席，请其正式提出此案。适逢同学会之长报告书中亦有改组周刊计划，双管齐下，竟得一气呵成。”又说“新计划出于程其保、闻一多、余泽兰三君之手”，“赵学海君于该委员会讨论时，亦曾傍参末议。吾辈讨论时，多偏重留美同学会方面之组织，以为中国同学会及在校同学，其对周刊之责任、义务及权利，诸君可自为谋，此邦人不应多事越俎也。”（《留美通信》，《清华周刊》第256期，1922.10.28）

罗隆基信中附有先生与程其保、余泽兰起草之《留美同学对于周刊改组计划》，原稿为英文，由清华在美教员庄泽宣先生译成中文。这是先生抵美后最早参与的起草的文件，全文如下：

一、经济

甲　强迫校内及离校同学定报。

美国同学每年每人美金一元，在月费内扣除。

国内同学办法自议。

校内同学办法自议。

乙　学校应补助经费。

丙　用费应受学校中会计监察。

每年应有预算。

每半年应有报告。

二、编辑　编辑部应有左列人数

校内十五人由学生推举，校长选派美国五人，三人由东美选出，二人西美选出。

国内若干人，由国内同学定之。

总编辑由校内编辑举之。

三、经理

校内经理若干人由校内同学推举，校长选派。

留美经理一人由东西美分会长，总会长选派。

该经理职务：

甲，收费。

乙，更改住地。

丙，代收广告。

总经理由校内经理举之。

《计划》有《附录》,为"新闻栏编稿规则":

一、每期编稿由三人负责,即在该期新闻栏下注。

○○○

负责编稿人○○○

○○○

二、编稿时间为星期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一时必须交稿与□□□

三、每期新闻稿约稿纸三十张左右。

四、新闻栏暂分下列各目:

(甲)学校办事机关新闻(校长处、教务处、斋务处等)

(乙)学校其他各处新闻(图书馆、售品所、银行等)

(丙)教职员新闻(美员公会、华员公会等)

(丁)学生各级新闻

(戊)学生各会社新闻

(己)旧同学新闻

(庚)国内大事记

(辛)特载

(《留美同学对于周刊改组计划》,《清华周刊》第256期,1922.10.28)

同日 诗《寄怀实秋》写定。后发表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清华周刊》第二六〇期所附文艺增刊第一期。收《红烛》时有所增加。《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所收为原作。诗中有:"在黑暗的严城里,/恐怖方施行他底高压政策。/诗人底尸肉,/在那里仓皇着,/仿佛一只丧家之犬呢。"这正是先生当时的自我描述。梁实秋收到这诗后,于十月十九日亦写了诗《答一多》,诗云:

烛火都要熄了,
又何有于流萤呢?

自从我底开路的神灯,
退出了我的眼界,
便在我想像的宫里大放光明,
照得各个黑角都亮了,
像一座莹彻的水晶宫!

我是人间逼迫走的逃囚，
我把荷花池做了逋薮；
那里准我姿情的唱了，
却只是我听着自己的歌声——
无归宿的孤声啊！

我无力抗拒人间的拘捕，
借了 Cupid 底小弩；
怎奈那持满待发的箭啊，
又雕着罪人底名字，
反将宣示了我的藏处！

朋友啊！
愿你闲敲几朵灯花，
愿你漫折几枝笔花，
缀在我底神鬼府襟上，
做了辟邪底箓吧！

我更要跨上亘天的彩虹——
像一条绝壁飞去的神龙，
飞到海洋的彼岸——
扇着诗人底火啊，
坐看着你的烛影摇红！

但是烛火都要熄了！
又何有于流萤呢？（《清华周刊》第 260 期，1922.11.25）

九月十七日　是日，清华一九二二级毕业生到美后，由旧金山抵芝加哥。闻亦传即同批到达，他在旧金山便给先生拍一电报，是日先生到车站迎接，次日送闻亦传赴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

九月十八日　作诗《晚秋》、《笑》。后均发表于次年二月十五日《清华周刊》第二六九期所附文艺增刊第四期，并将《晚秋》改名为《秋之末日》。《红烛》收《秋之末日》时有增加。《笑》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九月十九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云：

阴雨终朝，清愁如织；忽忆放翁"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之句，即起焚香，冀以"雅"化此闷雨。不料雨听无声，香焚不燃，未免大扫兴会也。灵感久渴，昨晚忽于枕上有得，难穷落月之思，倘荷骊珠之报？近复细读昌黎，得笔记累楮盈寸，以为异日归国躬耕砚田之资本耳。

信中附《寄怀实秋》、《晚秋》、《笑》。末又云："其余一首《游园杂记》未完，改日再抄。"[①]但此后未见此诗。

是月中旬 时，先生因美术学院附近住宿费颇高，搬到远离学校的第五十七街第一三二三号，每天早八时出门，下午四时方归寓所，来往乘火车行四十余里，很不方便，好在离火车站很近。与先生同住的有钱宗堡、刘聪强，共住两间，每月租金各出二十二美元。不过房子较讲究，房东也合得来。

九月二十二日 致孔繁祁、方重信。原信无存，仅知有一句："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见《致吴景超》，1922.9.24，《闻一多书信选集》，第61页）

九月二十三日 辛酉级级友王朝梅被汽车压死，先生闻讯极为震惊。次日致吴景超信中说：

昨接沈有乾从 Stanford 寄来中国报纸——旧金山出版的——一片，中载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有中国学生王某因汽车失事毙命，其友孟某受重伤。我们即疑为王朝梅与孟宪民，当即电询监督处。今早得回电称毙命者果为王朝梅，但未提及孟宪民，只言常叙受轻伤。景超！方来底噩耗你是早知道了的。你不要以为是这些消息使我想家。想家比较地还是小事，这两件死底消息令我想到更大的问题——生与死底意义——宇宙底大谜题！景超！我这几天神经错乱，如有所失；他们说我要疯。但是不能因这些大问题以致疯的人，可也真太麻木不仁了啊！

九月二十四日 致吴景超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首抄录了诗《晴朝》、《太阳吟》。前者发表于次年一月十三日《清华周刊》第二六七期所附文艺增刊第三期。后者发表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华周刊》第二六〇期所附文艺增刊第一期。收《红烛》时，《晴朝》有增加。

《太阳吟》是一首强烈的爱国思乡曲，曾打动过许多人的心：

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
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还乡梦，

① 此句据该信原件补充。

又加他十二个时辰的九曲回肠！

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
烘干了小草尖头底露水，
可也烘得干游子底冷泪盈眶？

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
省得我受这一天天底缓刑，
就把五年当一天跑完，又与你何妨？

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太阳啊，楼角新升的太阳！
不是刚从我们东方来的吗？
我的家乡此刻可都依然无恙？

太阳啊，我家乡来的太阳！
北京城里的官柳裹上一身秋了罢？
唉！我也樵悴得同深秋一样！

太阳啊，奔波不息的太阳！
你也好像无家可归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样地不堪设想！

太阳啊，自强不息的太阳！
大宇宙许就是你的家乡罢？
可能指示我我底家乡底方向？

太阳啊，这不像我的山川，太阳！
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惨色，

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

太阳啊，生命之火底太阳！
但谁不知你是球东半底情热，
谁不知又同时是球西半底智光？

太阳啊，也是我家乡底太阳！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
就认你为家乡也就得失相偿！

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
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
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信中说："让你先看完最近的两首拙作，好知道我最近的心境。'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这是我前日写信告诉繁祁、方重的；你明年此日便知道这句话的真理。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又说到新诗用韵问题："现在我极喜用韵。本来中国韵极宽，用韵不是难事，并不足以妨害词意。既是这样，能多用韵的时候，我们何必不用呢？用韵能帮助音节，完成艺术；不用，正同藏金于室而自甘冻饿，不亦愚乎？《太阳吟》十二节，自首至尾皆为一韵，我并不觉吃力。"还说现实总把自己从诗境拉到尘境："虽然在《太阳吟》底末三节我似乎得了一种慰藉，但钱宗堡讲得对：'That is only poetry and nothing more.'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我看诗的时候可以认定上帝——全人类之父，无论我到何处，总与我同在。但我坐在饭馆里，坐在电车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新的形色，新的声音，新的臭味，总在刺激我的感觉，使之仓皇无措，突兀不安。感觉与心灵是一样地真实。人是肉体与灵魂两者合并而成的。"

九月二十五日　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学。芝加哥美术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美术学校之一，为建于一八六六年的芝加哥美术馆的组成部分之一。芝加哥美术馆的藏品多达三十万件以上，包括欧美和东方的雕刻、绘画、版画、素描、装饰艺术品，以及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艺术品。处面临密歇根南大街正门两侧的青铜狮子塑像，是芝加哥城的标志。现存先生在美国的唯一照片，就是青铜狮子像为背景拍下的。对于这所学校，先生很是满意。

九月二十九日　致梁实秋、吴景超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说到对清华同仁欲办一月刊的意见：

实则我的志愿远大的很。景超所陈三条理由（一、与文学社以刺激，二、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三、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我以为比较地还甚微琐。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请申其说。我们皆知我们对于文学的意见颇有独立价值；若有专一之出版物以发表之，则易受群众之注意——收效速而且普遍。例如我之《评冬夜》因与一般之意见多所出入，遂感依归无所之苦。《小说月报》与《诗》必不欢迎也；《创造》颇有希望，但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之眼光终有分别，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吾人若自有机关以供发表，则困难解决矣。吾冀实秋之新著《草儿评论》定有同情之感。又吾人之创作亦有特别色彩。寄人篱下，朝秦暮楚，则此种色彩定归堙没。色彩即作者个性之表现，此而不存，作品之值价何在？再者批评的论文与创作并列则有 concentration，concentration 者事半功倍之途也。余对于中国文学抱有使命，故急欲借杂志以实行之。

信中还有对湖畔诗人的评论，虽然极简，但值得重视：

近复读《湖畔》，觉甚有价值，修人、雪峰、漠华三君皆有佳作也。《徬徨》、《在江边小坐》、《隐痛》、《归家》皆与冰心同调；《草儿》、《冬夜》，即《女神》中亦不可得此也。盖《女神》虽现天才，然其 technique 之粗篾篾以加矣。更有一层，湖畔诗人，犹之冰心，有平庸之作，而无恶劣之品。《冬夜》底《八毛钱一筐》，《草儿》底《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皆不可见于湖畔；即《女神》底《三个泛神论者》亦无有也。或有人要批评雪峰底《三只狗》。但《三只狗》不过有点 futuristic，还不失为诗也，从未来派者的眼光看来，许还是第一等的作品呢。四位中汪静之稍差。必要首首诗限定一句，那真是个傻子。我不能讲的太仔细了，我现在没有功夫。将来定另作批评寄上。我提议诗组可以此作一次讨论底题材。

信末附新作及复加修改的诗，共八首：《幻中之邂逅》、《春之首章》、《春之末章》、《红烛》、《深夜底泪》、《美与爱》、《游戏之祸》、《春寒》。并解释说："《美与爱》、《幻中之邂逅》，形式修整，又为一种。《红烛》、《深夜之泪》，适与相反，又为一种。《春之首末》两章，纯粹描写景物，又为一种。"对于后两首，先生又说："此二首本来长短不称，《首章》五节，《末章》十一节，现在将他们平均布置一下，割长补短，使之形式上恰成两朵姊妹花，何如？"①

① 此句据原信补充。

十月八日 结识了一位"有支那热的太太"浦西夫人(Mrs. Bush)。次日致父母信报告此事:

> 昨结识一位浦西夫人。伊有中国画幅古瓷多种而不识其年代,特约男午餐,借代为移译。此妇人甚有学问,认识此处美术文学界有名人甚多。伊已与男两封介绍信,一致美国最有名诗人山得北先生,又一致《诗》(美国有名杂志)总编辑并著名批评家孟禄女士。此后可以与此邦第一流文人游,此极可贵之机会也。

信中所说"山得北",即今译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生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为美国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民俗学者。他曾写过惠特曼式的自由体诗《烟与钢》,歌颂工人,是深受下层劳动人民喜爱的诗人。"孟禄"即今译门罗(Harriet Monroe),生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是美国《诗歌》杂志创办人、主编。《诗歌》问世于一九一二年,时正值被美国文学史称之为"芝加哥文艺复兴"时期。它代表了诗歌写作中的新形式主义倾向,也论述过印象主义、意象主义和自由诗问题,是美国一家享有崇高声望的刊物。门罗对当时诗歌革命的重要意义有一定认识,对现代诗歌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先生这一时期的创作,受过他们的影响。

十月九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云:"离家三月,尚未接家中只字,试思远游万里之人将何以为情乎!"又说:"美术学院开课两星期矣,男之成绩颇佳,屡蒙教员之奖许。美国人于此道诚不足畏也。"还说:"每日早入学,晚回寓,尚有时间研究文学。"

十月十日 致吴景超、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自己和朋友们"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时说:"我们相信自己的作品虽不配代表我们的神圣的主张,但我们借此可以表明我们信仰这主张之坚深,能使我们大胆地专心地实行它。"信中还表示了对胡适在批评界表现的不满。又回答吴景超所问读诗的方法问题。

> 景超问我读诗底方法,我不知你是指研究还是指鉴赏。若指研究,单摘佳篇佳句是不够的,恶篇恶句一样地要紧。还有诗人底性格哲学,也是要从诗中抽出来的。但最要紧的,是要会 generalize——看完一个人底诗——一首诗也同然——要试试能否 locate his rank, classify his kind and determine his value;若不能,便须再细心研究,至能为此而止。譬如我读完昌黎,我的三个答案是:一,他应占的位置比已占的许要高一点;二,他不是抒情的乃是叙事的天才(他虽没有作过正式的 Epics);三,他是一个新派别底开山老祖。要求这种答案非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不可。还有历史也有研究的价值,那便是诗人的传记了。

先生有一篇摘录的《答吴景超书》,内容即论诗,可与此相参考。其云:

我以前说诗有四大原素:幻象、感情、音节、绘藻。随园老人所谓"其言动心"是情感,"其色夺目"是绘藻,"其味适口"是幻象,"其音悦耳"是音节。味是神味,是神韵,不是个性之浸透。何以神味是幻象呢?就神字的字面上就可以探得出,不过更有较有系统的分析。幻象分所动的同能动的两种。能动的幻象是明确的经过了再现、分析、综合三种阶级而成的有意识的作用。所动的幻象是经过上述几种阶级不明了的无意识的作用,中国的艺术多属此种。画家底"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即所谓兴到神来随意挥洒者,便是成于这种幻象。这种现象,比能动虽不秩序不整齐不完全,但因有一种感兴,这中间自具一种妙趣,不可言状。其特征即在荒唐无稽,远于真实之中,自有不可捉摸之神韵,浪漫派的艺术便属此类。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所谓"兴趣"同王渔洋所谓神韵便是所动幻象底别词。所谓"空音、相色、水影、镜象"者,非幻象而何?(《闻一多书信选集》,第 139 页)

十月十五日　致闻家驷、闻家驹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说:"我的功课做得可算得意","我进此专门学校后,益发对于自己的美术底天才有把握了,只要给我相当的时间,我定能对于此途有点成就"。又说,自己的兴趣仍在文学方面:

美术一途当然没有穷境,不要说三年学不完,便是三十年也是不够的。但我现在对于文学的趣味还是深于美术。我巴不得立刻回到中国来进行我的中国文学底研究。我学美术是为帮助文学起见的。现在我每日上午八点钟出门,九点钟上课至十二点止(三个钟头共为一课),下午一点钟起至四点止,然后回寓所来。多半的时候回到寓所来便没有事了,我即从事研究文学,或写写信。我研究文学现在没有一定的规则或计划,随着兴会与精力走去罢了。大体上讲来,我很满意于我现在的理智的生活。至于情感的生活是完全讲不上的。远在异国,故乡万里,一纸之书,经月不到,更有何生趣可言?

还说到《红烛》出版的问题,"我决定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故必需早早做个名声出去以为预备"。

十月二十七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很喜欢结克生(又译洁阁森)公园:"芝加哥结克生公园底秋也还可人。熊掌大的橡叶满地铺着。亲人的松鼠在上面翻来翻去找橡子吃。有一天他竟爬到我身上从左肩爬到右肩,张皇

了足有半晌，才跳下去。这也别是一种风致不同于清华的。昨日下午同钱君复游，步行溪港间，藉草而坐，真有'对此茫茫，百感交集'之概。'万里悲秋常作客'，这里的悲不堪言状了！"

信中附诗《秋深了》、《忆菊》。

《忆菊》完成于是日，发表于次年一月十三日《清华周刊》第二六七期所附文艺增刊第三期。收《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收《红烛》时有改动。该诗从菊的摆设、姿态、模样，一直写到它的环境、颜色、大小，是藉菊花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炽热的爱。下面仅录其末几段：

啊！自然美底总收成啊！
我的祖国底秋之杰作啊！
东方底花，骚人逸士底花呀！
那东方底诗魂陶元亮
不是你的灵魂底化身吗？
那登高作赋的重九
不又是你诞生底吉辰吗？

你不像这里的热欲的蔷薇，
那微贱的紫萝兰更比不上你。
你是有历史，有风俗的花。
四千年华胄底名花呀！
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

啊！诗人底花呀！我想起你，
我的心也开成顷刻之花，
灿烂的如同你的一样；
我想起你同我的家乡，
我们的庄严灿烂的祖国，
我的希望之花又开得同你一样！

习习的秋风啊！吹着！吹着！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请将我的字吹成一簇鲜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
然后又统统吹散，吹得落英缤纷，
渺漫了高天，铺遍了大地。

秋风啊！习习的秋风啊！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该信中还附有给清华文学社社友一函。

十月二十八日　致闻家骝转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三年之后，我决即归国"，"我急欲归国更有一理由，则研究文学是也。恐怕我对于文学的兴味比美术还深。我在文学中已得的成就比美术亦大。此一层别人恐不深悉，但我确有把握。"又谈到在美国的生活"似乎有点寒酸"，因为要省下钱买书和出版《红烛》。

十月三十日　致吴景超、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红烛》编辑情况：

《红烛》即日钞录寄上……，纸张字体我想都照《女神》的样子。全集大概分为四小集：《雨夜之什》共二十三首为第一集，《宇宙之什》共二十首为第二集，《孤雁之什》（出国以后之作品，现有十四首）为第三集，《李白之死》为第四集。《忠告》、《心底悲号》、《伤心》、《画稿》、《同[谢]文炳话别》、《沉沉的夜》、《不知足的叫化子》、《别离的海》、《心与爱》、《爱之狂》十首都拟删去。《红烛》作为序诗。

又说诗兴颇浓，约每周有一首诗作：

我到美以后，成绩也出我冀料之外，近来的诗兴尤其浓厚，大概平均起来，一个礼拜也有一首。作《忆菊》后又有新作三首。秋来洁阁森公园甚可人意，上星期六、星期日我在那里整个地留连了两天。新作的三首诗都是在那时产生的。现在我心里又有了一个大计划，这便是一首大诗，拟名《黄底Symphony》。在这里我想写一篇秋景，纯粹的写景，——换言之，我要用文字画一张画。

所说三首近作，其中有《秋色》，副标题即"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收《红烛》。

十一月一日　先生的《〈冬夜〉评论》，与梁实秋《〈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作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在国内出版。

梁实秋《谈闻一多》中记述了该书出版过程："对于新诗，他最佩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他不能赞同的是胡适之先生以及俞平伯那一套诗的理论。据他看，白话

诗必须先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问题。他在临离开清华的时候写过一篇长文《〈冬夜〉评论》,是专批评俞平伯的诗集《冬夜》的,但也是他对新诗的看法之明白的申述,这一篇文章的底稿交由吴景超抄写了一遍迳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不料投稿如石沉大海,不但未见披露,而且原稿亦屡经函索而不退回。幸亏留有底稿。我索兴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当时与《冬夜》同样的有名,二稿合刊为《〈冬夜〉〈草儿〉评论》,由我私人出资,交琉璃厂公记印书局排印,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于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一多的这一篇《〈冬夜〉评论》可以说是他的学生时代的最有代表性的论文。"(第 9 页)

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说此书印刷费有百余元,是他父亲供给的。

先生很重视这篇文章,次月家信中说:"我们的意见差不多都包括在此。"

次月二十二日,吴景超发表《读〈冬夜〉〈草儿〉评论》,说:"《〈冬夜〉〈草儿〉评论》的功用就在能指示给大众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现在诗坛中的坏现象,虽不能归咎于康、俞二君,但他们在诗坛中留下恶影响,是显然的事实。闻、梁二君于诗集中,独先评《草儿》、《冬夜》,便是'擒贼先擒王'的手段。他们把首领的劣点,一一宣布出来,然后那些随在后面的,自然知道换路了。我不必特来褒奖此书,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他那廓清新诗坛中积弊的力量,是不小的。这本书多得一个读者,诗坛中的光明,便越近一步。"(《清华周刊》第 264 期所附文艺增刊第 2 期)

郭沫若当时在日本看到该书后,极力称赞,曾写信给梁实秋,说:"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转引自《致闻家骅闻家驷转父母亲信》,1922.12.27)

十一月六日 致闻家骅转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是日美国同学卡普其来接自己去他家,"他的母亲待我好极了。伊说伊的儿子出门时曾遇着一位太太待他好极了。伊要还债。所以今日见我,要用那位太太待他儿子的方法待我,使我远在万里之外,如在家中一样。这时我向伊说了一句很漂亮的话,我说,我的母亲不久也要还债了。今天伊办了很好的中饭给我吃。下午又留我过夜,我因道远了要早回寓。伊又办了很多的点心迫着我吃。我从未遇着一个外国人待我这样亲热的。这便使我想起我自己的母亲了,想起我自己的家了"。但又说"讲来讲去我不喜欢美国。美国的学生没有中国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处的学生底善于思想,勤于思想。他们在我眼里都是年轻的老腐败。美国的工人没有中国工人勤苦,他们得钱多,做事少。别人以为美国好极了,其实美国好本好,坏处也不少"。

是月上旬 约在这时,有致清华文学社社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对清华文学社拟办之月刊,先生建议用"文坛"两字作刊名。又说:"除梁君治华处所有

拙作多首，任编辑员择登外，现有《女神》评论一篇，不日脱稿即当寄上。”此文即《女神之地方色彩》。后，月刊计划打消，先生又欲作一篇专讲《女神》之优点的评论，一起投《创造》。

是月中旬　拜访了芝加哥大学法文副教授温特(Mr. Winter)。六日家信中说：“下礼拜我又要拜访一位教员，这位先生要知道中国东西，清华同学张君景钺便介绍我与他谈话”，“我在这里，人家都认为我是有中国学问的人，所以若有外国人要知道中国古时的东西，他们就介绍我去了”。二十六日致梁实秋信中谈到拜访的情况：

> 我近来认识了一位 Mr. Winter，是芝加哥大学的法文副教授。这人真有趣极了。他是一个有“中国热”的美国人。只讲一个故事，就足以看出他的性格了。他有一个中国的大铁磬。他讲常常睡不着觉，便抱它到床边，打着它听它的音乐。他是独身者，他见了女人要钟情于他的，他便从此不理伊了。我想他定是少年时失恋以至如此；因为我问他要诗看，他说他少年时很浪漫的，有一天他将作品都毁了，从此以后，再不作诗了。但他是最喜欢诗的。他所译的 Baudelaire 现在都在我这里。我同他过从甚密。他叫我跟他合同翻译我的作品。他又有意邀我翻译中国旧诗。我每次去访他，我们谈到夜深一两点钟，我告辞了，我走到隔壁一间房里去拿外套，我们在那间房里又谈开了，我们到门口来了，我们又谈开了，我们开着门了，我们在门限上又谈开了，我走到楼梯边了，我们又谈开了；我没有法子，讲了“我实在要回去睡觉了！”我们才道了“good night”，分散了。最要紧的，他讲他在美国呆不住了，要到中国来。……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他没有学过画，他却画了一幅老子的像。我初次访他，他拿着灯，引我看这幅油画，叫我猜这是谁。我毫不犹疑地说：“是老子？”“果然是老子！”他回道。他又 copy 了几幅丈长的印度的佛像画，这些都挂在他的房子里。他房子里除几件家伙外，都是中国、印度或日本的东西。他焚着有各种的香，中国香，印度香，日本香。

这以后几天，先生同张景钺联名给清华校长曹云祥写信，推荐温特到清华教法文。次年，温特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一九二五年接到清华聘书。先生与温特教授一直保持着友谊。温特回忆当年在美国，“闻一多给我讲中国诗，我给他介绍英国诗的格律”，“我们讨论过中国诗的特点以及他如何译成外文，这方面谈的话非常多。”那时，两人还常常一起去美术馆，认为中国的画“能画出人的精神”。（刘烜访问温特教授记录，1979.4，转引自《闻一多评传》，第 63 至 64 页）先生牺牲后，一部分骨灰带回北京，当高孝贞和孩子们去解放区时，这骨灰几次辗转便存放在温特家里。北京解

放时，温特教授把骨灰送还家属。

是月中下旬 约这期间，有致梁实秋信，仅存前半函。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对梁诗《幸而》的修改细节。

十二月一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佛来琪唤醒了我的色彩的感觉。我现在正作一首长诗，名《秋林》——一篇色彩的研究。"《秋林》收入《红烛》时，干脆改名为《色彩》。色彩触动了先生的灵感，后来构思《园内》，各节都有主要的代表色。

晚，会见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Eunice Tietjens)。次日家信：

> 昨晚会着一位美国有名女诗人海德夫人。我将我的诗译了几首给她看，她颇称赞。她劝我多译几首给她送到这里一个著名杂志(《诗》)请他们登载。我的朋友们笑我还没有上中国诗台，倒先上了美国诗台。我不知国内的人将怎样承受我的将要出版的《红烛》，或者他们还不能鉴赏他。但我那儿管得了这些事呢？海德夫人到过中国，当过《诗》底编辑，著了两本诗集，在此邦文学界颇有声望。她的丈夫海德先生是一个戏曲家、医学家，我也会见了。他们当然在学问界是最上流的人物。在美国只有这些人我还不讨厌。

四日致吴景超信也谈到这事：

> 前晚遇见这里一位女诗人 Eunice Tietjens，伊要看我的诗，我译了好几首去，其中伊最赏识的也就是你赏识的《玄思》。伊教我再多译几首，同伊斟酌了字句，伊当送给 Harriet Monroe，请伊选登《Poetry》。钱宗堡笑我没有上中国诗坛，先上外国诗坛了。Eunice Tietjens 曾作过《诗》底编辑，现在是顾问编辑了。伊到过中国，游中国时所作的诗《Profiles from China》(清华图书馆有的)颇著名。伊的丈夫是个戏曲家，我也会见了。

十二月二日 致闻家骏、闻家驷转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请继续寄《小说月报》及《诗》，"因现方从事于文学批评，须时时参阅"。又请托闻亦有打听上海亚东或泰东图书局印行新诗办法。

十二月四日 晚，《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付邮。后分为《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女神之地方色彩》发表。

《女神之时代精神》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创造周报》第四号。收《闻一多全集》。这是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赞扬。文章开首写到："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文章从五个方面评述了《女神》的时代特点，并

且特别强调指出"革新者"的责任：

> 别处的青年虽一样地富有眼泪，污浊，情炎，羞辱，恐怕他们自己觉得并不十分真切。只有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革新者又觉得意志总敌不住冲动，则抖擞起来，又跌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太溺爱生活了，爱他的甜处，也爱他的辣处。他们决不肯脱逃，也不肯降服。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

《女神之地方色彩》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创造周报》第五号。收《闻一多全集》。这篇文章是对《女神》的批评，认为它"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并分析说这与"作者是在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的环境里写作有关。该文不仅是对郭沫若的批评，而是对新诗界存在的某种倾向的指责。篇首即指出："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的创造中国新诗底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文中有些评论十分精辟，尤其是表现出可贵的爱国思想，至今仍被人们重视。如：

> 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

又如：

> 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

又如：

> 《女神》底作者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

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另是一个问题,是理智上爱国之文化底问题。

同日 致吴景超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谈到生死问题,说自己"是个生命之肯定者","还是有宗教的人":

来信谈及生死问题,这正是我近来思想之域里一阵大风云。我近觉身体日衰,发落不止,饮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时时觉死神伸出削瘦的手爪在我的喉咙上比画,不知那一天就要卡死我了。我又不会宣节我的工作与休息,我完全是我的冲动的奴隶。我不知道疲惫时就当休息。景超,这种畏死的滋味你们都没有尝过罢?啊!死有何足畏呢?不过我同你一样是个生命之肯定者。我要享乐,我要创造。创造将要开始,享乐还没有尝到滋味就要我抛弃了生命到那不可知的死乡去,我怎甘心呢?昨日同黄钰生、张景钺、钱宗堡也谈到生命问题。黄是个 cynic,张、钱是 skeptics,我不知我到底是个什么?你们看到我给文炳的信吗?我失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我还是个生命之肯定者,我的神秘性 mysticism 还存在,所以我还是有宗教的人。

十二月二十日 芝加哥美术学院放寒假。先生"情思大变",始作《红豆》,五昼夜作五十首。

十二月二十五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红烛》寄出,请梁"作第二次的序"。又说:

连于五昼夜作《红豆》五十首。现经删削,并旧作一首,共存四十二首为《红豆之什》。此与《孤雁之什》为去国后之作品。以量言,成绩不能谓为不佳。《忆菊》,《秋色》,《剑匣》具有最浓缛的作风,义山、济慈的影响都在这里,但替我闯祸的,恐怕也便是他们。这边已经有人诅之为堆砌了。

又说到《红烛》的装帧与设计:

因为经济的关系,所以我从前想加插画的奢望,也成泡影了。封面上我也打算不用图画。这却不全因经济的关系。我画《红烛》的封面,更改得不计其次了,到如今还没有一张满意的。一样颜色的图案又要简单又要好看,这真不是容易的事(这可奇怪了,我正式学了画,反觉得画画难了——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怪的)。我觉得假若封面的纸张结实,字样排得均匀,比一张不中不西的画,印得模模糊糊的,美观多了。……还有一层理由:我画出的图案定免不了

是西洋式；我正不愿我的书带了太厚的洋味儿。……书内纸张照《雪朝》、《未来之花园》的样子。封面的纸张也应厚如《雪朝》的；颜色不论，只要深不要浅，要暗不要鲜就行了。书内排印格式另详附样。

又谈到国内新诗的评价：

承你寄来的各种诗集杂志都收到了。《创造》里除郭、田两人外无人才。《未来之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与《繁星》并肩。我并不看轻它。《记忆》、《海鸥》、《杂诗》(五三页)、《故乡》是上等的作品，《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品。"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同叶圣陶所赏的"这一个树叶拍着那一个的声响"可谓两个声响的绝唱！只冰心才有这种句子。实秋！我们不应忽视不与我们同调的作品。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可，以情感为骨髓亦无不可；以冲淡为风格也可，以浓丽为风格亦无不可。徐玉诺是个诗人。《蕙底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的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实秋！便是我也要骂他诲淫。与其作有情感的这样的诗，不如作没情感的《未来之花园》。但我并不是骂他诲淫，我骂他只诲淫而无诗。淫不是不可诲的，淫不是必待诲而后有的。作诗是作诗，没有诗而只淫，自然是批评家所不许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因看到梁来信中所说郭沫若对《〈冬夜〉〈草儿〉评论》的赞语，非常高兴：

我们所料得的反对同我们所料得的同情都实现了。我们应该满意了。郭沫若来函之消息使我喜若发狂。我们素日赞扬此人不遗余力，于今竟证实了他确是与我们同调者。《密勒氏评论》不是征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吗？昨见田汉曾得一票，使我惊喜，中国人还没有忘记文学。我立即剪下了一张票格替郭君投了一票，本想付邮，后查出信到中国时选举该截止了，所以没有寄去。本来我们文学界的人不必同军阀、政客、财主去比长较短，因为这是没有比较的。但那一个动作足以见我对于此人的敬佩了。

次日家信亦云：

今早得梁实秋信称郭沫若君曾自日本来函与我们的《冬夜草儿评论》表同情。来函有云："……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你们记得我在国时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如今果然证明他是与我们同调者。我得此消息后惊喜欲狂。又有东南大学底一位胡梦华君也有来函表示同情。但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

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闻家骏、闻家驷转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报告成绩："除美术史一科外并无大考，只以平日成绩定等级耳。我上月成绩又进，七门功课已得六超等矣。"又对弟弟闻家驷说到治学：

驷弟成绩甚佳，殊可喜。课外有暇当多阅杂志，以得普通知识。阅杂志原不是做学问之目的，亦非做学问之本身，但驷弟目下所需者是一普通知识之根柢。根柢既成，思想通澈，然后谈得到做专门的学问。此非文科独然，实科亦莫不然。我嘱驷弟多写信来质疑问难。我虽远隔重洋，书信往来，节序已迁，但研究学问，真理不改，时间不足以囿之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 致吴景超信。未发表。信中云：

久盼不到的《文艺增刊》，今天从姚崧龄处看到了。景超你自己觉着这本创刊号怎样，满意吗还是不满意？我老实讲，我想你们应该弄得出一本更好的玩意儿来。至少第一期不应就这样"鳖脚"。但我回头想想这就是清华底limit了，也便是文学社底limit了。文学社取消了出版计划，倒也好。从前听说我们想出一本短篇小说底汇刊，进行了没有？我看这倒也办得。我很希望早早看见这本书出版。我现在对于小说底兴趣日渐增加。我想在最近将来定有出品送来给你们看。

景超！（昨日写毕至此今日已易一年矣）又是一年过去了。我自从到美以后，做了些什么事？我的事做的不能说少。但是你知道这边的人是怎样看我么？他们眼里的一多是个大大堕落的，江河日下的一多。我何必定要他们知道我。不错，我的宗教观念改了，但是我的理想没有改。但是批评我的人自己比我更不配讲宗教。他们批评我为的是另一件事。我现在不必告诉你，候我的小说作完了你便知道了（Nothing romantic，mind you）。

《红烛》收到没有？请你同实秋斟酌为我删削。《李白之死》后之注请统统删去。我现在觉得把那些东西都注出来似乎小气得很。

是月 长女闻立瑛生。因为是女孩，家里很久才把消息告诉先生。先生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次年二月十日家信说：

孝贞分娩，家中也无信来，只到上回，父亲才在信纸角上缀了几个小字说我女名某，这就完了。大约要是生了一个男孩，便是打电报来也值得罢？我老实讲，我得一女，正如我愿，我很得意。我将来要将我的女儿教育出来给大家

做个榜样。我从前要雇乳母以免分孝贞读书之时，现在不以为然。孝贞当尽心鞠育她，同时也要用心读书。我的希望与快乐将来就在此女身上。

先生认为女子并不比男子弱，是月二日家信中还对两个妹妹和妻子说："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底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一九二三年　二十五岁

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发表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丁文江遂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君劢的〈人生观〉》，科玄论争由此开始。

十月，曹锟贿选，当选大总统。

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一月五日　致闻亦有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寄来美金三十元拟作《红烛》印费。《红烛》底稿已寄与北京梁君实秋请代经理付印（在上海），候交涉办妥后，梁君当有信到兄处，并告书局向兄处取此款。余数已请梁君与书局说妥出版后再付。但下月弟或仍有二十元寄兄处。”又云：“此美术学校最满我意处，乃日间上课，课毕即无事，故晚间返寓，犹得研究文学也。”

同日　又有致闻家骝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红烛》印费所缺之数请设法付清。

一月十四日　致闻家骝、闻家驷转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再次陈述了欲早日归国的念头，尤对在美受到之种族歧视感到无比愤慨：

> 此间学校，每季为一学期，故一年得四学期，除暑假，则三学期。三学期乃正式期限，但有愿于暑假中继续修业者亦可能也。故若能连续三暑假，则可减省一年之光阴也。美院本三年毕业，我想连读两暑假，则两年之间已读完两年又两学期之功课。再读一学期，即两年又三个月，而三年之功课均毕矣。由此计算，后年年底（民国十三年）我当能归国。日前闻一教员云，在此校肄业两年，根底工夫已足矣，此后自己作功夫可也。故我若欲早归，后年秋天亦可归来。但特来美一次，住个两年半，亦不算久，我当有此忍耐性以支持到底也。想家中得知我留美期限又由三年减至二年半，亦足惊喜矣。然而局外人或因别人求学四五或六年而我两年半即归，遂责我向学之心不切。噫！此岂可为俗人道哉！我未曾专门攻文学，而吾之文学成绩殊不多后人也。今在此学美术，吾之把握亦同然。吾敢信我真有美术之天才，学与不学无大关系也，且学岂必在课堂乎？且美利加非

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

又说《红烛》出版，"于文学方面可以告一小段落"，打算"本学期时间，将必多用于美术上"。

一月二十一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因为看完郭沫若的《未央》，觉得"说出了我局部的悲哀，没有说出我全部的悲哀。我读毕了那篇小说，起立徘徊于室中，复又站在书架前呆视了半晌。我有无限的苦痛、无穷的悲哀没处发泄，我只好写信给你了。"先生所说的悲哀指家庭包办的婚姻。又说："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底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要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

二月二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现在要赶完《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一篇批评郭译（见《创造》第三期）及研究莪默的论文。"又说要"用一个别号曰'屠龙居士'"，"我以后一切著作——创作与批评——拟都署此别号"。还说为梁实秋诗集《荷花池畔》所作的《序》已寄上，"我在此文中未提到你的艺术之优点，一为避嫌疑，二为在西方一种诗集初出版，从未有如中国人这样小气，带上一篇喝彩式的文以教训读众，我想西方人这一点很好"。

二月三日　《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写定。发表于是年五月《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收《闻一多全集》。这是一篇评论郭沫若译诗的文章。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刊登郭沫若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内容包括传略、作品读后感及译诗一〇一首。郭不解波斯文，译文是据斐芝吉乐的英文译本再译的。先生"读到郭译的莪默，如闻空谷之足音，故乐于与译者进而为更缜密的研究"。全文共三章，一郭译订误，二郭译总评，三怎样读莪默。

二月十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学业及回国欲从事文学教学的志向：

人体写生从来只得上等，这回得了超等了。所以现在的分数是青一色的超了。我来此半年多，所学的实在不少，但是越学得多，越觉得那些东西不值得一学。我很惭愧我不能画我们本国的画，反而乞怜于不如己的邻人。我知

道西洋画在中国一定可以值钱，但是论道理我不应拿新奇的东西冒了美术的名字来骗国人的钱。因此我将来回国当文学教员之志乃益坚。

同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诗在各种艺术中所占位置很高”，“在中国几乎无处没有诗”。又说：“我现在着实怀疑我为什么要学西洋画，西洋画实没有中国画高。我整天思维不能解决。那一天解决了我定马上回家。”

二月十四日 有致清华文学社信。今佚。次日致梁实秋信：“昨致文学社一函由朱湘君转交。”

二月十五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近收到“沫若寄来一本《创造》，上有附语，言正当毕业试验，所以没有工夫写长信”。又说希望作一个艺术的宣道者：

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我日渐觉得我不应当作一个西方的画家，无论我有多少的天才！我现在学西方的绘画是为将来作一个美术批评家。我若有所创作，定不在纯粹的西画里。但是我最希望的是作一个艺术的宣道者，不是艺术的创作者。实秋！你不是打算在美国只住二三年吗？我希望你也早早回国帮我作点实在的事业。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

同日 晚，应浦西太太之邀，去芝加哥美术馆与美国著名女诗人爱米·罗艾尔(Amy Lowell)共进晚餐。罗艾尔在席上还朗诵了新创作的诗。罗艾尔生于一八七四年，是美国意象派诗人的领袖，先生称其为“在此邦是首屈一指的女诗人”。她曾写过两卷本《济慈传》，她的诗中有种活力、热忱和有意识的技巧感，这对先生的诗风极有影响。罗艾尔还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曾与阿斯秋琪合译过一本中国诗，题作《松花笺》，这也是先生敬重她的原因之一。罗艾尔逝于一九二五年，先生曾写了《美国著名女诗人罗艾尔逝世》。

同日 梁实秋在《清华周刊》第二六九期发表《评一多的诗六首》。这是第一篇专论先生新诗研究的文章，所评介的《太阳吟》、《寄怀实秋》、《玄思》、《忆菊》、《火柴》、《晴朗》，都是经梁实秋之手发表于《清华周刊》。该文称先生“不愧是我们东方诗人的本色”，认为先生的新诗取材“广博雅”，有浓重的“‘旧诗’的气味”，和丰富奇特的想象。说到先生新诗的“韵脚”与“诗意”的和谐统一时，说：“《太阳吟》共十二节，每节首尾两行都有韵脚，声调非常和谐，并不觉得呆板堆砌。这种成功的作品，并不足为以韵脚有无定诗之高下的评论家做张本，而实在可以证明韵脚可以供成熟的作家的调度，且丝毫不妨害诗意的自然。《忆菊》共五十八行，字句的灿烂冲雅恐怕是新诗中罕见之作哩。”

二月十八日　作诗《长城下之哀歌》。后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大江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同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上星期又缺了两天半的课(为的是作诗),要在这几天内补起来。我所作的诗名《长城下之哀歌》。这是我悲恸已逝的东方文化的热泪之结晶。诗长数千言,乃系一诗人碰死于长城之前的歌词。结果我并不满意,候下星期修改后,再寄上乞正。"

信中还谈到《红烛》出版,云："我的几个哥哥都写信来催我将《红烛》出版,他们都叫我不要管经济,他们可以负责。这样我才决意寄回了。我同时又已寄美金五十元回了,所以印费一层可以不必累你了。"又催梁实秋快把《荷花池畔》寄到上海,款项不够,先生可想办法。"《荷花池畔》底序我早寄回了,现在想已收到"。

三月六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感谢你的劝勉抚慰的信。感谢毅夫(翟桓)同一切的新知故好底宠爱。我将为劝勉我者,抚慰我者,宠爱我者,重视我者,惋惜我者……努力作个不堕落的诗人。若果生活是黑暗,黑暗中还有些'……我者'存在,那末生活中还是有光明的,生活还是值得努力的。"

又说到长诗《园内》:

> 景超嘱作描写清华生活的诗。我开始作了一首《园内》,旷了两天课;诗还没有作完,课可不能再旷了。《园内》的大纲我写在下面:
>
> 第一章　园内之昨日
>
> 第二章　园内之今日
>
> 一、晨曦
>
> 二、夕阳
>
> 三、凉夜
>
> 四、深更
>
> 第三章　园内之明日
>
> 这是一个 gigantic attempt。两个多月没有作诗,两个多月的力气都卖出来了,恐怕还预支了两个月底力气。我先通知你,请你向总编辑先生疏通疏通,把《增刊》底最前的十页纸留给我,如何?我还要印大字,十页也许不够呢!现在不过约略地讲罢了。换言之,这首诗可作这期增刊的题辞。此刻作完《夕阳》了,已写了七页白纸。我先将每章之序曲合并抄来,给你看看。

三月八日　致闻家骕、闻家驷转合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时,湖北地区军阀混战,溃兵四处抢掠,先生信中云："凶年兵燹,频乘洊臻,乡民将何以为生啊!不知人心是怨天呢,还是怨人?天灾诚无法可救,至于人祸,若在欧美,这辈封狐长

蛇，早被砍作百块了！美国底革命如此，法国底革命如此，俄国底革命亦如此。”又说：“我近来人事甚好，功课也作得有兴，但是诗兴总比画兴浓些。”

三月十六日 长诗《园内》写定。后发表于四月二十八日《清华生活》（清华校建十二周年纪念号）。收《闻一多诗集》。这首诗是先生所作最长的诗，共314行，曾自认为“恐怕是新诗中第一首长诗”。（《致闻家驷》，1923.5.25）诗发表后，先生收到不少朋友来信赞扬，先生五月二十九日致梁实秋信中谈到写这首诗时的心情，说“作《园内》时的我，只有悲哀，绝望，孤寂，无聊，所以《园内》表面上虽似堂皇，其中正含有无限的冷泪”。这恐怕是朋友们没想到的。

三月十七日 致吴景超、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园内》的创作激情与构思意图：

> 《园内》的大功告成了。然而为成为败，我自己实在毫无把握。这是我初次作这类“清庙明堂”式的玩艺儿。两年前我同浦薛凤等办十周年纪念增刊，我已拟作这样一首诗，竟没有作成。不料这回离了清华，倒作成了。两年前要写写不出的情绪如今都吐尽了，痛快极了！痛快极了！这首诗的局势你们可以看出是一首律诗的放大。第三四节晨曦夕阳为一联，第五六节凉夜深更为一联；再加上前后的四节共为八节，正合律诗的八句。中间四节实是园内生活之正体。晨曦的背景是荷花池，夕阳的是体育馆，凉夜的是大礼堂，深更的是高等科大楼。每景有一主要的颜色，晨曦是黄，夕阳是赤，凉夜是蓝，深更是黑。我觉得布局 design 是文艺之要素，而在长诗中尤为必需。因为若是拿许多不相关属的短诗堆积起来，便算长诗，那长诗真没存在的价值。有了布局，长篇便成一个多部分之总体 a composite whole，也可视为一个单位。宇宙底一切的美，——事理的美，情绪的美，艺术的美，都在其各部分间和睦之关系，而不单在其每一部分底充实。诗中之布局正为求此和睦之关系而设也。
>
> 至于诗中的故典同喻词中，也可看出我的复古的倾向日甚一日了。末章的 appeal 恐怕同学们读了，要瞋目咋舌，退避三舍罢？但是这种论调他们便在美国也是终久要听到的。倒不如早早地听惯了的好，省得后来大惊小怪，不知所措。

先生也很喜爱《园内》，二十二日致梁实秋信说：“这里的朋友们若昭瀛、逖生（浦薛凤）、隆基、泽霖及同居的两位都极力称赞。说句陈俗的俏皮话，我真拨动了他们的心弦了吗？”

三月二十日 致闻家骝、闻家驷转合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今接实秋来函称诗稿将寄与泰东承印，版权归他们，可以得到一点稿费，也到底不知多少。成仿吾（《创造》底编辑）并允代为帮忙。”又说：“《冬夜草儿评论》除了结识了郭

沫若及创造社一般人才外，可说是个失败。我埋伏了许久，从来在校外的杂志上姓名没有见过一回，忽然就要独立的印出单行本来，这实在是有点离奇，也太大胆一点。但是幸而我的把握当真拿稳了，书印出来，虽不受普通一般人底欢迎，然而鉴赏我们的人倒真是我们眼里的人。”这里所说的人，自然是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了。时，郁达夫还曾到清华园拜访过梁实秋。

三月二十二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批评梁实秋与吴景超负气辞《清华周刊》文艺编辑事，说：“我们是以诗友始，但是还要以心友终的啊！”但又认为梁、吴此举是“直觉的情操的，不是功利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艺术观：“‘文学’二字在我的观念里是个信仰，是个 vision，是个理想——非仅仅发泄我的情绪的一个工具。The Muse 是有生机，有意识，有感觉的活神。……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已失，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我要替人们 consciously 尽点力。我的诗若能有所补益于人类，那是我的无心的动作（因为我主张的是纯艺术的艺术），但是相信了纯艺术主义不是叫我们作个 egoist（这是纯艺术主义引人误会而生厌避之根由），你前次不是讲到介绍薛雷[①]吗？那我们就学薛雷增高我们的 human sympathy罢！”信里还要梁实秋告诉自己杨世恩、胡毅、朱湘等文学社社友近来的文学活动。

三月二十五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亦说到艺术与人生的关系：

> 你信中提到沫若所讲关于艺术与人生之关系的话，很有见地。但我们主张纯艺术主义者的论点原与他这句话也不发生冲突。但是说他已将这纠葛的问题解决了，我又不信。我还是拘守我的老主张。你又问精神肉体互相关属，是何理由。其实这很明白，肉体是方法，精神是目的。达到一种目的必须一种方法，但方法的价值是在其能用以达到目的的。若无目的，还要方法何用呢？若没有字，笔也没有价值存在了。字写完了，笔可以抛掉。字到底比笔要紧些。精神是字，肉体是写字的笔。

又谈到对国内几位新诗人及其作品的看法：

> 《蕙的风》实秋曾寄我一本。这本诗不是诗。描写恋爱是合法的，只看艺术手腕如何。有了实秋的艺术，才有《创造》第四期中载的那样令人沉醉的情诗。汪静之本不配作诗，他偏要妄动手，所以弄出那样粗劣的玩艺儿来了。胡梦华的批评我也看见了，讲得有道理。文学研究会的徐玉诺出了一本《未来的花园》，见过否？实秋不喜他，我却说他颇有些佳点。徐君是个有个性的作家，

① 今译雪莱。

我说他是文学研究会里的第一个诗人。

还说近来只作了两首诗,即《园内》、《长城下之哀歌》,"风格有些变更",说"将乘此多作些爱国思乡的诗",认为此类诗"价值甚高":

> 自圣诞节后我只作了两首诗,一是《园内》,你可在今年的《清华周刊》底纪念号见到,还有一首名《长城下之哀歌》,现在修改,拟送《创造》发表。这两首都是极长的诗。《园内》恐怕是新诗中第一首长诗。我近来的作风有些变更,从前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如《春之首章》、《春之末章》等诗便是。现在则渐趋雄浑,沉劲,有些像沫若。你将来读《园内》时,便可见出。其实我的性格是界乎此二人之间。《忆菊》一诗可以作例。前半形容各种菊花,是秀丽,后半赞叹,是沉雄。现在春又来了,我的诗料又来了。我将乘此多作些爱国思乡的诗。这种作品若出于至性至情,价值甚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

信中还说在美国的同级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通信团体,彼此"互相通信,报告消息,讨论问题",成员有吴泽霖、罗隆基、钱宗堡、浦薛凤、沈有乾、何浩若等。

三月三十日 致翟桓、顾毓琇、吴景超、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这封信是恭祝四友横渡太平洋之喜,或是预吊四友闯入十八层地狱之哀的"。又说对绘画的"兴趣也在膨胀",但回到寓所"又想继续我那唐代六大诗人底研究或看看哲学书","有时又觉得诗做得无味了,我又要在小说戏剧上跃跃欲试了"。

四月八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我近数年来,不知何来如许愁苦?纵不思乡,岂无他愁?大而宇宙生命之谜、国家社会之忧,小而一己之身世,何莫非日夜啮吾心脏以逼我入于死之门者哉!曩者童稚,不知哭泣,近则动辄'冷泪盈眶',吾亦不知其何自来也。"可见当时心情极其沉重。又说:"近方作《昌黎诗论》,唐代六大诗人之研究一也。义山研究迄未脱稿,已牵延两年之久矣,今决于暑假中成之。"

四月十五日 郭沫若在上海给先生写信,对先生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中批评表示感谢。

此信刊于是年五月一日出版之《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信云:"一多:你写给我的第二信我早收到了。因为当时试事正忙,所以未即作复。你的这篇文章,我见你信时,早就想读,想早收些教益。我于四月二日返沪时,你这篇文章已交到印刷所去了,直至今晨才送校稿来,我便亲自替你校对。我一面校对,一面对于你的感谢之念便油然而生。你所指摘的错误,处处都是我的弱点,我自己也是不十分相信的地方,有些地方更完全是我错了。你说 Fitzgerald 的英译前后修改了四遍,望我至少当有再译三译。你这恳笃的劝诱我是十分尊重的。我于改译时务要遵循你

的意见加以更正。我在此深表诚挚的谢意于你和你的友人钱君[①]。此次在沪得与实秋相晤，足慰生平。他往南京时，我和仿吾往北站去送行竟至迟了刻，我们只得空空望送了一回。你的《首阳山下的饿人》作成了么？沫若，四月十五日。"

四月二十二日　致家人信，仅存后半函。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现在则正春温矣，树木将将发芽。春序复回，良时佳节，又是思乡之大好机会。旅人对此，徒唤奈何耳！"

五月一日　诗评《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发表于《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收《闻一多全集》。

同时刊登的还有成仿吾于三月五日写的说明，与郭沫若四月十五日给先生信。成仿吾说明云："实秋把一多这篇文章寄给我时叫我先寄给沫若一看，但是我想沫若此刻正忙，寄去也未必能仔细看，再过些时，他就要回到上海来，用不着寄去。我想此刻就由我在这里写几句话。本来这些译诗是我催他寄了来的。他寄来时，他说很忙，要我给他校对一下，那时候因为《创造》第三期已经迟了不少的日子，要快点拿去排印，我只把译稿与原诗对看了一次。并且从头看起来，大抵不错，所以以后我只把英文念一遍，再把译诗念一遍，只就这两遍批评，好就继读下，不好便给他加以修改。这些译诗是这样弄出来的。一多指出这许多误译出来，倒使我惶愧无地了。本来诗是最容易误解的东西，稍不注意，就会差到与原诗相反。何况又是重译。沫若既不解波斯文，所靠的又只有一种皮装小本（沫若是最喜考据的人，这回并不是他畏难，实是他案头没有参考本），这样匆促弄出，就希望他完全，实是不可能的事。侥倖据一多所说，只是解释原义的疏误，我想沫若听了，也还要引为荣幸的。不过关于一多所举的各条，我也有点感想，不妨在此地说说……"

诗《李白之死》亦发表于《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收《红烛》。朱湘说："《李白之死》离《失彼乐土》等史诗虽然还很远，但在国内也不能不算是空前的'破题儿第一遭'了。"（《寄孙大雨》，1923.8.21，《朱湘书信集》，第205页，天津人生与文学社1936年3月出版）

《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与《李白之死》受到清华文学社社友的称赞，该社在一年总结中说："闻君底《玄思》大得美国诗人狄琴丝（E. Tietjieus）底赞赏，翰墨因缘，笔之以志盛。闻君在《创造季刊》上发表的《李白之死》，为国中空前之作，同号中的《莪默伽亚谟之绝句》，批评郭译处也极其中肯。"（《一年来会社经过》，《清华周刊》第285

① 钱君指钱宗堡。先生《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一文末有附识，云："我的朋友钱君宗堡替我搜罗了许多参考书，又供给了一些意见，照规矩（虽然钱君自己大起反对）还是应该申明致谢的。"

期所附文艺增刊第9期,1923.6)

五月四日 《清华周刊》刊登罗隆基来信,信中说到美国中部中国留美同学会将利用暑假在麦城召开年会,清华同学出力甚多,先生已表示出席并协助筹备。罗隆基信中说:"本年中部中国留美学生年会将在麦城举行。该会之董事已经举出,九人中清华同学占去五人。此外,年会主席为陈克恢、中部学生会会长为赵学海君,均系清华同学。又本年该年会会序,已推定罗隆基君负责分派及管理。罗君拟邀集中部方面之清华同学若干人,先事尽力预备。而允许一定赴会并愿原力赞助者,已有闻一多、时昭沅(即时昭瀛)、钱宗堡、刘聪强、陈石孚、浦薛凤诸君。此外,罗君函约者尚有多人。预料将来年会清华同学之到会者必多,且对该会必有一种贡献也。"(《留美同学新闻》,《清华周刊》第280期,1923.5.4)

五月六日 晚,在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召开国耻纪念会。先生到会,"处处看到些留学生们总看不进眼,他们的思想实浅陋得可笑"。(《致闻家驷》,1923.5.7)

五月七日 致闻家驷转合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前不久此地有个山东的学生,姓孙的,因功课作不好,丧气投湖自尽。遗书即谓明知自杀之非,但自观脑经[筋]薄弱,学无所成,将来定无益于社会,不若死之为愈也。此事闻之者孰不酸心!然我诚希望在此中国学生多有如孙君若是之血性者,中国庶有望也。"

孙君之死,引起先生感慨。十五日致梁实秋信中又说:"前不久此地有位孙君因学不得志,投湖自尽。这位烈士知生之无益,有死之决心,而果然死了。要死就死,我佩服,我佩服,我佩服,我要讲无数千万个'佩服'。实秋,你也该讲佩服。"

五月十三日 致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是日为美国之母亲节(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子女皆有礼物奉赠母亲,且各于衣襟攒上一鲜花,以示孝思。母在者花色红,母亡者花色白"。房东主妇笑容可掬,请先生看其三个女儿送来的红花与贺帖。先生看后"寸心怦动",不禁思念亲人,特用红笔在粉纸上写了此信,并"爰录孟东野《游子吟》以表孺怀",祝母亲"万福金安"、"寿比南山"。

五月十五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前半部为一周前所写,因一月未收到梁的来信,说"异国的羁人可真有些受不了"。又说:"近来诗被画征服了,诗神屡次振作思图中兴,然而毫无效力。"后半部为收到梁信后所写。对《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停刊感到失望,说:"前天晚上我还想着邀集已来美及将来美的文学社社员捐一笔款,作为母校文学奖金,奖赠一年中最佳之一篇诗、小说与戏剧之作者(作品限定在《周刊》上发表的)。如今这个噩耗传来,我的感觉仿佛是世界底末日到了似的。"又说:"这一星期中思想颇有变更,然而目下还在酝酿之中,不久有了结果,当另函报告。上书之'思想'就是人生观底意思,所谓'变更'者,也可以讲

得清楚一点，便是新希望之发见。”这可能与不久后在暑假中成立的“大江学会”有关。时，先生正在修改《长城下之哀歌》，说：“此为～elegy，与 Lycidas，Adonais 同调。我对于此作的野心与希望极大，拟于暑假更以全付精力完成之。”

时，迁入新居。地址为：芝加哥布莱克斯通街 5601 号。

五月二十九日　收到清华文学社社友四封信，不由“狂喜”。来信皆赞《园内》。

同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认为梁欲办的刊物取名《文艺汇刊》“太 prosaic，不能引人注意”。对该刊的内容，认为“选择还可以严一点”。说到梁的近作《尾生之死》，称其“恰到好处，但汐流上潮底景况，正是利用 description 的机会，若是我，我定大大描写一番，像《李白之死》中描写月光一样”。

时，先生不想久居芝加哥，本想到波士顿，接到梁实秋信，又打算陪他上科罗拉多（梁是年赴美，拟入科罗拉多大学）“住个一年半载”，因为“这一年生活苦极了，除了同一位同班的洋姑娘偶尔谈谈初浅的文学知识以外，竟没有人共谈了”。

梁实秋曾为《红烛》作序，阐发了先生等人对文艺的看法，先生在此信中说：“在《红烛》序里宣布我们的信条，我看现在可以不必。恐怕开衅以后，地势悬隔，不利行军，反以示弱。若是可能，请劳驾收回序稿，或修改或取消均可。千万，千万！”后来《红烛》出版，未收梁序。

是月　钱宗堡因肺病住院，先生一人独居四层楼上小房，窗外是林立的烟囱和过往的火车、电车、汽车，十分嘈杂。

六月一日　饶孟侃在《清华周刊》第二八四期发表《评一多的〈园内〉》，这是继梁实秋《评一多的诗六首》后的又一篇评论先生新诗创作的专文。该文认为《园内》是清华园的“第一篇成功的长诗”，是对清华生活的一个诗的总结。文中说：“诺大一个山青[清]水秀、木长枝茂的清华园，应是产生艺术的泽园，应是培养精神生活的丛薮。荷花池畔，独木桥边，虽不少诗人的吟咏，然都不过是断片的、记载的小品，谁都没有胆量把这一座花园锦簇、雄丽幽雅的清华园和盘托出，作一个艺术的传播。我读了一多的《园内》以后，敢大胆的说是十二年来园内缕缕的诗丝的大成了。它们不是暴发的蒲柳，倏忽便青翠浓葱，尽情放叶，倏忽便枯槁憔悴，风鸣悲秋；它们是空谷的幽兰，未及时犹如野花闲卉，一放则幽香满谷”。文中还说：“一多曾经说过，‘文艺有如一座金矿；旧有的文艺是已采出的矿质，只因不善锻炼，致令金质减色；采新文艺的同志固当努力采取新矿质，然旧有的矿金却不能一概抛弃。我们为什么不改良锻炼的方法，驾轻车而就熟路呢？’他本着这层意旨，所以就试将格律的模形，用作《园内》的布局。换过来说：‘《园内》是一首变形、放大的律诗。’”

六月九日　芝加哥美术学院注册干事致函华盛顿特区中国教育代表团赵团

长，报告先生的学习情况。信上说："我很高兴地寄上闻多先生的成绩副本，他自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的艺术院"，"闻多先生是一年级学生，如他攻读完毕三年的绘画课程，将可于一九二五年六月毕业。他是班上的优秀成员之一，在这一年中他成绩一向优良。"信中开列成绩单，有生物速写、静物素描、雕刻字、艺术概况、透视画法、设计、构图、研究等，得二十二个优，五个良十。（据英文原件，闻名译）

先生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的教师有雷塞小姐、博纳德小姐、菲浦先生、莫尔斯先生等。

六月十四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美校今日毕课，本年成绩已开展览会，其中我颇有作品。"七月二十日家信中亦说："本年在美术学院因各门成绩均佳，遂得最优等名誉奖。"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先生主要画素描。梁实秋说："他后来带了两大卷炭画素描给我看，都是大幅的人体写生，石膏像做模特儿的。在线条上，在浓淡阴影上，我觉得表现都很不错，至少我觉得有活力。"（《谈闻一多》，第26页）

给闻家驷的信中还谈到治学方法，是对弟弟的诱导，也是先生自己的体会：

> 札记以后当停作。因以此时间读书，获益更多也。札记之用乃在：（一）养成批评精神，（二）练成作文。据我看来，你近来写信及札记中，文词畅达，间亦有美丽之词句。如此，则作文之练习并非你的亟务。至于所谓批评精神者，无非就是"学而不思则罔"的"思"之意耳。据我又看来，你已经会"思"了。于今你的缺点乃差近于"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甚少，仅就管窥蠡测之智识"思来思去"，则纵能洋洋大篇，议论批导，恐终于万言不值一杯水耳。例如本次札记所谈老子哲学，固见思力，但此种问题，我尚望之却步，况吾弟之初学，岂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种见解存之脑中可也，笔之于书则不值得。故目下为弟之计当保存现有之批评精神以多读书史，所谓"学"与"思"并进也。至于"述而不作"，孔圣犹然，吾辈则第当"思"而不"述"耳。
>
> 前函又言读书甚慢，此非好习惯，当求打破。凡读文学书，如小说、诗词等，不妨细读，反复吟咏，再四绎绎，以深领其文词之美。若读哲史或科学，则当速读，但观大意，不求甚解，即把捉其想思而不斤斤于字句之穿凿也。此办法本并行不悖，但弟所切需者速读耳。

同日 吴泽霖、罗隆基自威斯康辛到芝加哥，先生与其见面畅谈。旋，与两人及刘聪强、何浩若、浦薛凤等乘火车到附近市镇疗养院探望病中的钱宗堡，并在市镇旅馆过夜。

六月十五日　先生获得芝加哥学术学院特殊表扬。(据芝加哥学术学院注册干事致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苏珊·F·利明斯的信,1923.9.18,闻名译)

是月底　暑假。遂入暑期学校。假期中有信致朱湘,原件无存。朱湘八月二十一日致孙大雨信中说:"他在暑假中寄我一信,内附写了他的《长城下之哀歌》的三分之一,这里面优美的片断不少。……他现在正作着一首咏伯夷叔齐的史诗,定名为《首阳山下之饿莩》。他并已定了作一首歌咏长卿与文君事的史诗。"(《朱湘书信集》,第205至206页)

七月二十日　致家人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开列对《园内》的多处修改,请闻家驷誊录后寄创造社。

美国学校有咨派优秀学生到巴黎、罗马学习的规定。先生获得美术学院最优等名誉奖,原以为可以咨送赴欧,这时才知此例仅限于美国人。先生受此歧视,倍觉屈辱,更加剧了内心的愤慨和反感,信中说:"今此等名誉奖乃不值钱的臭东西,送给我我还不要呢!然于此更见美人排外观念之深,寄居是邦者,真何以堪此?"

是月　芝加哥清华同学会成立"改良清华委员会",(据《清华周刊》第292期,1923.11.2)先生是积极参加者之一。

八月十七日　清华学校癸亥级毕业生放洋,中有方重、孔繁祁、全增嘏、吴文藻、吴景超、梁实秋、梁思成、翟桓、谢文炳、顾毓琇等,皆先生之友。梁实秋登船时,创造社几位友人到浦东码头送行,并言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准备离开上海,欲将《创造》编辑事托与先生与梁二人代办。梁未允,但同意加入创造社。梁到美,将此事告诉先生,先生亦以为然。九月二十四日致闻家驷信中说:"我意此时我辈不宜加入何派以自示褊狭也。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

八月二十一日　芝加哥清华同学开重聚会,(据《清华周刊》第294期,1923.11.16)先生参加。会上讨论了清华改良诸事。

八月二十五日　诗《别后》发表于大连《盛京时报》。收《红烛》。

是月下旬　闻亦传自波士顿抵芝加哥,将入芝加哥大学,暂与先生同居一处。

九月一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对留学生中盲目崇拜西方甚为不满。信中说:"我自来美后,见我国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欧西,致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之为欧美人者,至其求学,每止于学校教育,离校则不能进步咫尽,以此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我家兄弟在家塾时辄皆留心中文,今后相袭,遂成家风,此实最可宝贵。吾等前受父兄之赐,今后对于子侄亦当负同等责任,使此风永继不灭焉。"

九月三日　与浦薛凤同行赴美国中西部的麦迪逊市。麦迪逊市是威斯康星州

的首府,简称"麦城",威斯康星大学系统的旗帜性学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就设在这里,清华学校一九二一级的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蔡承新、王际真,一九二二级的高崇熙、周振声、沈铭书、张锡禄、刘行骥,一九二三级的萨本铁、黄子卿、谢奋程、安绍瀛、谭广德、孙成屿、王世富、李迪俊等,都在这所成立于一八四八年的学校留学。(据李迪俊《威斯康辛大学消息》,《清华周刊》第296期,1923.11.30)

同日,梁实秋抵科罗拉多。旋,给先生一信。先生原欲去波士顿继续求学,遂决定转入科罗拉多大学。

九月四日 每年一度的美国中部中国留美同学会年会(亦称留美中国学生夏令营)在麦迪逊市召开,十一日闭会。参加这次年会的有一百七十余人,清华同学占了大半,其中有罗隆基、吴泽霖、闻亦传、吴景超、时昭瀛、梅贻宝、孔繁祁等。吴景超是这年抵美后,从西雅图直接来这里的,到达时年会已开了三天。他说:"序不外名人演讲、讨论、报告、演说辩论比赛、运动泅水比赛、俱乐跳舞、宴会等等。此会的最大好处,便是能聚多数中国学生于一堂。"关于年会情况,他说:"此次年会主席,是赵君学海,年会讨论的主要题目,是学生对于改造中国所负的责任,结果通过议案四十余条,详细情形,将来当见诸报端"。(吴景超《西雅图—麦城—明城》,《清华周刊》第290期,1923年10月19日)

李迪俊在致清华同学的信中,也说到了这次年会。其云:"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本夏假威斯康辛大学开第十四次年会。主其事者,十之九属清华学生,与会者百七十余人,清华学生居泰半,上自一九一五级,下至一九二三级,无不有人参加。数年阔别,一堂重聚,把手话旧,乐也何如!"(李迪俊《威斯康辛大学消息》,《清华周刊》第296期,1923.11.30)

九月六日 诗《艺术的忠臣》发表于《盛京时报》。收《红烛》。

九月九日 乘中部中国同学会年会之机,美国中部清华同学亦召开重聚会。下午一时开会,主席孟继懋,先生为书记。参加这次会的有清华同学七十余人,讨论议案多件,时间长达五小时。讨论议案多由芝加哥同学提出,主要内容关于学校部分者有:对董事会改组、鼓吹组织清华基金调查委员会、改革专科生考试制度、取消清华招收自费生办法、校中中美职员教员应同薪同待遇、教材应选择关于中国的材料、《清华一览》的改良等;关于清华同学会部分者有:组织及选举、对年报的意见、对清华驻美监督处意见、《清华周刊》改革问题。此外,还有修改同学会章程、奖学金、建筑同学院等问题。(据《清华大改革案之本文》,《清华周刊》第292期,1923.11.2;第293期,1923.11.9)后,罗隆基将各种意见归纳,写成《清华大改革案》。

晚七时,清华同学举行俱乐会。"会序第二部分为年宴,于晚间七时半举行于

曼迪生著名之爬克旅馆。到会男女几及百人。会前，依各级级色所制之纸帽，至是一律戴上。有作椎形者，有做棱形者，有作古冠式者，有作喽啰式者……红红绿绿，形形色色，令人目眩。"（李迪俊《威斯康辛大学消息》，《清华周刊》第296期，1923.11.30）

在麦迪逊城期间，先生与部分志同道合的清华同学成立了性质接近于政治的"大江学会"。次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麦迪逊城的罗隆基复信致清华学校施滉同学，信中简要介绍了该会的组织及主张：

"大江"的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宗旨下"自强不息的精神"、"诚恳忠实的态度"、"积极协作的方法"，这就表明我们对内的性质了。"谋国家的改造"，这就表明我们对外的性质了。

要是上面的答复太空，我更提出两个反面的条件，以解释"大江"的性质。

A. "大江"非社交式的盟社"Fraternity"。社交式的盟社是不讲主张的，我们是崇奉一定的主张的。社交式的盟社是要升平日互相提携的，我们是要改造中一同奋斗的。简言之，前者主共安乐，后者主共患难。社交式的盟社的得失姑不论，若大江学会有以"互相提携"、"彼此引援"为目的者，天厌之！天厌之！

B. "大江"非政党。我们不反对政党，并且承认政党为政治生活上应有的活动。但政党有政党的范围，政党有政党的手段。政党的范围，是限于政治，"大江"决不限于政治的活动。政党改造的手段是要争立法院的多数，掌行政部的全权，我们的手段，决不限于此。今日的"大江"必非政党的性质。

九月十二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现拟往科泉与实秋同居。科泉离此城一日之旅行。……科泉有美术学校或不及芝校，然与实秋同居讨论文学，酬喝之乐，当远胜于拘守芝城也。"

九月十八日　芝加哥美术学院注册干事致函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苏珊·F·利明斯小姐，介绍先生在校学习情况。信中说："闻多先生让我写信给您，介绍他去年在艺术学院就读的情况。闻先生自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入校至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这一学年中每日参加学习。以下是他学习的课程表及成绩的记录的副本：生物速写，良＋；静物素描，优，表扬；设计，优；雕刻字，良＋；研究，优；透视画法，优；艺术史，优，表扬。您不难看出闻多先生在一切课程均获优秀成绩。在六月十五日，他还获得特殊的校方表扬，以奖励他的全面优秀成绩。他令人信服地完成了三年基础艺术课程的头一年课程。我很高兴地向您推荐他，他是一名具有才干的勤奋学生。"（据英文原件，闻名译）

是月中旬　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该校建于一八六一年，地址在温泉，故其地简称"珂泉"。"科罗拉多"为西班牙语"红色的"之意，因土壤呈红色而得名。其为

美国独立一百周年时建州，所以又有“百年州”之称。

先生来此经过，梁实秋《谈闻一多》记述到：“十二年九月三日我到了美国科罗拉多温泉（简称珂泉），这里有一个大学，规模很小，只有几百个学生，但是属于哈佛大学所承认的西部七个小大学之一。最引人入胜的是此地的风景。地当落矶山脉派克斯峰之麓，气候凉爽，景特宜人。我找好了住处之后立刻寄了一封信给一多，内附十二张珂泉风景片，我在上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我的原意只是想逗逗他，因为我知道他在芝加哥极不痛快，我拿珂泉的风景炫耀一下。万万想不到，他接到我的信后，也不复信，也不和任何人商量，一声不响的提着一个小皮箱子，悄悄的乘火车到珂泉来了！他就是这样冲动的一个人。”（第 28 页）

初，先生与梁实秋住在斯普林斯瓦萨奇街北 720 号。房东米契尔是报馆的夜班排字工人，夫妇很厚道，有三个女儿。同住的还有两位女房客，每天大家一起用餐。先生住一小间，梁实秋住一大间。

住妥后，两人去学校注册。梁实秋入英语系四年级，先生因临时请求入学，只作为艺术系的特别生。

关于珂泉的民风，梁实秋在十一月十日的信中说：“珂泉民风敦厚质朴，对待中国学生备极欢迎。居民类皆和蔼可亲，虽不相识而道旁巷口常举手为礼，据从东部移来同学谓此乃鲜有之事。”信中还写到住宿离开学校较远：“学校及住家区域离城市颇远，故无尘嚣之乱耳，对于矿夫最为适宜。”（梁治华《珂乐拉度大学情形》，《清华周刊》第 299 期，1923.12.21）

是月　先生的第一部诗集《红烛》经郭沫若介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诗集由《序诗》（一首）、《李白篇》（三首）、《雨夜篇》（二十一首）、《青春篇》（十七首）、《孤雁篇》（十九首）、《红豆篇》（四十二首）组成，共一百零三首。前四篇为国内作成，后二篇是到美国后创作的，发表时有所改动。《红烛》封面为白底红字，用蓝条框边。《红烛》排印错误较多，先生曾抱怨说：“排印错误之多，自有新诗以来莫如此甚，如此印书，不如不印。初出头之作家宜不在书贾眼里，人间乃势利如此，夫复何言！”（《致闻家驷转闻家骅及合家信》，1923.11）

《清华周刊》在介绍诗集时说：“《红烛》，闻一多君创作集，泰东书局出版，价四角。闻君的新诗在中国新文坛上所占的地位，已早有定评。此集出版后，外间销行甚畅，清华同学不可不人物一编。”（《清华著作介绍》，《清华周刊》第 293 期，1923.11.9）实际上，《红烛》问世时很少有人注意，直到一年后才引起文坛评论。

最早进行评论的是朱湘，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他以“天用”笔名在《时事新

报·文学》第一一四期上发表《桌话四·〈红烛〉》、《桌话五·〈小溪〉》。这两篇短文，从四个方面谈了对《红烛》总的印象：其一，认为“《红烛》最惹人注目的是它的色彩的运用”，“诗中有画”，不过尚未取得“全整的成功”，希望先生向“画家而兼诗人”的王国维学习，写出“如画的，而又神韵悠然”的诗篇来。其二，批评先生关于“想象”与“音节”的理论，认为先生说“想象丰富了，音乐自然会跟着来”的“念头”是错误的，《红烛》“自身缺乏音韵”，便是这一“念头”错误的“确证”。其三，认为先生“受了拜伦的影响很大”，而他并不喜欢拜伦，他“想象中的对象是英国浪漫复活期的大诗人柯拉斯特、雪莱、济慈”。其四，认为《红烛》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李白之死》，尽管在音韵上比郭沫若的《密桑索罗之夜歌》略输一筹，但艺术成就“不下似国内任何新诗人”。

十一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为法在《时事新报·学灯》连载的九千余字《评〈红烛〉》论文，是当时评论《红烛》诗集最长、最全面的诗评。文章从“词采”、“音节”、“想象”、“情感”等方面入手，评析了《红烛》与传统诗歌的关系，突出了先生对于现实生活中“富有时代性的词句”的采撷，以及对于“外洋诗”的吸收和借鉴，并首次提出先生新诗创作走的是“中西艺术”相结合的道路，突破了“丑的字句”（富有时代性的词句）不能入诗的偏见，以及先生是“东方诗人”的研究框架。这两位评论者，当时分别属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最大的文学流派。

九月二十四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对珂泉的印象和来这里后的心情：

> 我现已在珂泉，离芝城远如北京至长沙，车行首日早十时起，次日午后二时至。珂泉为此邦名胜之区，有曼图山、裴客峰、神仙园等胜景。夏日为避暑之地，气候全年皆如春日。地势既高，空气绝佳，故又为养疴之所，盖如我国北之香山，南之庐山也。
>
> 珂泉有大学，美术学院附属焉。此美术学院规模极小，逊芝院远矣。我之来此，固因不奈于芝城生活。在此休养一年，拟再行东往波斯顿。清华同学在此者，实秋而外，有盛斯民、王国华、赵敏恒、陈肇彰四君。我现与实秋同居，每月房饭费五十元，房饭较芝城佳甚矣。在芝城时系在饭馆用膳，此处不作兴如此，乃与房东共食也。房东老夫妇甚惠谨，待遇我辈颇厚。
>
> 总之此来，于美术所获或较歉，然于文学之创作，能与实秋相砥砺、相酬唱，成绩必佳也。且此处胜地佳景，得与自然相亲，其所启发者亦必多。又在芝城镇日呼吸煤烟，涕唾皆黑，在此庶得呼吸空气，澡浴阳光，其于摄生裨益亦不浅。

是年秋　胞弟闻家驷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语。闻家驷选择学习法语，

是听从了先生的建议。闻家驷在《忆一多兄》中说:"我上中学,开始学的是英语,为什么后来又改学法语呢?这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决定的:'我们家里大家都学英语,你就学法语好了。'于是我就改学法语了。至于我学法语而又选定法国文学这门专业,那更是和他本人爱好文学的倾向分不开的。"(《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74页)

十月二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来珂泉将两星期矣。此间若论习画殊不及芝加哥,故拟于此年多读书——西洋美术史及美术之原理。"又云"如今习画越久,兴趣越深,而野心亦越大。我欲在美术上大努其力了。"又云:"《红烛》计已出版,稿费已取来否?家中疑实秋,殊是笑话。前次印《冬夜草儿评论》,实秋曾用洋百元,其后出售书费亦未收到手。对于此事,我未费一钱,自思颇有些不好意思。好在印行彼书,并非我的主张,全属实秋之意也。我之印行《红烛》岂在金钱?家中竟从中生事,我甚不满意。设或被实秋知破,岂不大失面子?总之应得之金钱,我并不贱视,家中之不能不汲汲于金钱,我亦能谅解。惟目下我辈藉文字作生涯者,有比金钱更重要者在,不能不留也。"①

十月三日 诗《孤雁》发表于《盛京时报》,四日续完。收《红烛》。

十月四日 诗《秋深了》发表于《盛京时报》。收《红烛》。

十月六日 诗《色彩》发表于《盛京时报》。收《红烛》。

十月九日 诗《晴朝》发表于《盛京时报》。收《红烛》。

十月十日 先生与清华同学聚会庆祝民国国庆日。梁实秋说"国庆日同人等举行聚餐典礼,虽无牌楼火把之盛,而一块面包,一杯咖啡,亦足以畅叙乡情。"(梁治华《珂乐拉度大学情形》,《清华周刊》第299期,1923.12.21)

十一月五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与梁实秋等"暇时谈论文学,谈毕辄得一种新计划,然后即着手进行,时相督责,以'自强不息'②相儆。"又说:"明年三月为英诗人拜伦百年祭辰,我等已函邀郭沫若,使《创造》为拜伦出一纪念号。我与实秋正从事翻译,忙甚。"郭沫若收到信,于是月十六日复信梁实秋,云:"拜伦专号准出(在二卷三号或四号),我在外还可约些朋友,稿齐请即寄来。我现在异常忙碌,年谱手中无书,恐难编出,请你们供给我些材料吧。达夫已北上,在北大法大两校任课,仿吾不日返湘,沪上只能留我一人了,周报事太忙了,望你们救我。"(转引自梁实秋《看云集》,台湾皇冠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十一月十日 科罗拉多大学清华同学会成立。时,有成员九人,除先生外,梁

① 《闻一多书信选集》未录此句,今据原件补充。

② "自强不息"为清华学校校训。

实秋、陈肇彰、王国华、谢奋程、麦健曾、盛斯民、赵敏恒都是当年入校的，另外还有一位曾在清华肄业的曹与平(曹权君)。同学会干事为陈肇彰，书记为梁实秋。大家决定每月举行一次俱乐会，以资联络，并每月与《清华周刊》通讯一次，作为笔谈。(据梁治华《珂乐拉度大学情形》，《清华周刊》第299期，1923.12.21) 当时，该校还有两位中国留学生，他们一起成立了中国同学会。其后，因清华文学社社友陆续赴美，遂成立了清华文学社美国支部，由先生担任干事。(据《新闻·各会社》，《清华周刊》第303期，1924.3.1)

在科罗拉多大学，他们每天上午十时要穿着长袍顶方冠，到学校教堂做礼拜。(梁实秋《悼王国华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

十一月三十日　致闻家骥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今年由芝加哥迁珂泉，得于学理方面加以较精细之研究。明夏拟往纽约，专事实习。"又嘱立忠、立勋两侄勿放松算术，说自己"因不曾习三角与立体几何"，"故不能得学位，攻美术者固不在乎学位，然我若于数学稍有根柢，取一学士头衔，易易如拾草芥耳。盖以弟目下之成绩，其他学科皆绰绰有余裕，独于数学则绝不敢问津，此亦憾事也。以前清资格论之，我将终身为一童生而已"。

先生不谙数学，却于文学方面获益匪浅。梁实秋《谈闻一多》："对于英诗，尤其近代诗，他获得了系统的概念及入门的知识，因为他除了上艺术系的课之外还分出一半时间和我一同选修'丁尼生与伯朗宁'及'现代英美诗'两门课。教这两门课的是一位Daeler副教授，这位先生无藉藉名，亦非能说善道之辈，但是他懂得诗，他喜爱诗，我们从他学到不少有关诗的基本常识。我们一同上课，一同准备，一同研讨。这对于一多在求学上是一大转捩点，因为从此他对于文学的兴趣愈益加浓，对于图画则益发冷淡了。……在英诗班上，一多得到很多启示。例如丁尼孙的细腻写法the ornate method和伯朗宁之偏重丑陋the grotesque的手法，以及现代诗人霍斯曼之简练整洁的形式，吉伯林之雄壮铿锵的节奏，都对他的诗作发生很大的影响。"(第29至33页)

是月　致闻家驷转闻家骕及合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几月未接家书，负气说："留学苦非过来人孰知之？作中国人之苦非留学者孰知之？留学累月不得家书之苦惟我知之！"又请家人注意收集国内对《红烛》的评论。

十二月三日　《泰果尔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文学副刊《学灯》。收《闻一多全集》。泰戈尔是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以诗集《偈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在国际文坛声誉很高，国内胡适、徐志摩等也对他推崇备至。但是，先生这篇文章却对泰戈尔提出批评，认为他的"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哲学"，"而哲理本

不宜入诗”，哲理诗也“难于成为上等的文艺”。同时，还指出“泰果尔底文艺底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而且“因为受了西方文化底陶染，他的思想已经不是标类[准?]的印度思想了”。文中，还提出了诗的形式问题：

> 在艺术方面泰果尔更不足引人入胜。他是个诗人，而不是个艺术家。他的诗是没有形式的。我讲这一句话恐怕又要触犯许多人底忌讳。但是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怎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固定的形式不当存在；但是那和形式的本身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打破一个固定的形式，目的是要得到许多变异的形式罢了。泰果尔的诗不但没有形式，而且可说是没有廓线。因为这样，所以单调成了它的特性。我们试读他的全部的诗集，从头到尾，都仿佛不成形体，没有色彩的amoeba式的东西。我们还要记好这是些抒情的诗。别种的诗若是可以离形体而独立，抒情诗是万万不能的。

十二月十日 致闻家驷、闻家骕转合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已搬入科罗拉多大学海格门宿舍31号。

海格门宿舍是一所用红石建成的楼房，破败不堪，像一座旧堡垒。不过房租便宜，每月七元。因为宿舍没有伙食，只得与梁实秋一起起火做饭。买了只电气炉子，自己炒鸡蛋、炒白菜、炒肉丝，“虽不能完全成味，然猪油酱油调配起来，离家乡味亦不甚远”。“初次试验成功，竟拍案大叫‘在异国得每日食此，真南面王不易也！’”

梁实秋《谈闻一多》亦云：“一多在珂泉的生活是愉快的，只是穷苦一些。每月公费八十元，足敷生活所需，其是他的开销较大，除了买颜料帆布之外还喜购买诗集，而且还经常有一项意外开销，便是遗失。有时所谓遗失只是忘了放在什么地方。因此不免有时捉襟见肘。他虽住在外国，但仍不能忘怀中国生活的情趣，在宿舍里用火酒炉煮水沏茶是常事。不喝茶还能成为中国人？有时候乘兴煮鸡蛋数枚，范围逐渐扩大，有一回竟煮起水饺。这引起了管理人的不满，但是水饺煮熟之后送给他一碗尝尝，他吃得眉开眼笑，什么也没再说。一多曾经打翻过一只火酒炉，慌张中烧焦了他的一绺头发。”（第41页）

是年冬 朱湘因旷课逾章，被清华学校开除。此事详情，朱湘写信告诉先生。不久，朱湘在致顾毓琇信中说到此事。信中说：“我离校的详情曾有一信告诉了一多，望你向他函索，恕我不另函了。我离校的原故简单说一句，是向失望宣战。这种失望是各方面的。失望时所作的事在回忆炉中更成了以后失望的燃料。这种精神上的失望越陷越深。回头幸有离校这事降临，使我生活上起了一种变化。不然，我一定要疯了。”（《朱湘遗书》，《清华周刊》第41卷第3、4期合刊，1934.4.16）

一九二四年　二十六岁

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实现。

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

九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十月，直军冯玉祥倒戈，推翻曹锟贿选政府。

十一月四日，冯玉祥修正对清室优待条件，永远废除皇帝的专号。当天，溥仪迁出故宫。

一月八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来此半年，精神上较在芝加哥实为平妥。然可怪者则虽与实秋同居而文学之创作反甚少。在功课上成绩颇佳，甚为教员重视。"

学校的两位美术教师，都很欣赏先生，梁实秋《闻一多在珂泉》："珂罗拉多大学有美术系，一多是这系里唯一的中国人。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姊妹两个都是老处女，一个教画，一个教理论。……一多的天才和性格都使他立刻得到了利明斯女士的赏识。我记得利明斯有一次对我说：'密斯脱闻，真是少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先不论，他这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你看他脸上的纹路，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一多在这里开始画，不再画素描，却画油彩了。"（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9期，1947.9.14）

梁实秋《谈闻一多》亦有类似的描述，并说先生也认为白种人的脸像原板初刻。"艺术系是由 Leamings 姊妹二人主持的，妹妹教画，姊姊教美术史。我也旁听美术史一课，和一多一同上课，课本用的是《阿坡罗》。两位老小姐（均在六十岁左右）对于一多极为赏识，认为是她们的生徒中从未曾有的最有希望者之一。她们特别欣赏一多的嘴，认为那是她们从未见过的'Sensuous mouth'——'引起美感的嘴'。说起人的相貌，一多对我讲过一段有趣的话，他说他虽然热爱祖国，但不能不承认白种人的脸像是原板初刻，脸上的五官清清楚楚，条理分明，我们黄种人的脸像是翻版的次数太多，失之于漫漶。如今美国的美术教授也欣赏起我们的版本！"（第30页）

先生与这两位美术教师有友好的往来。梁实秋《谈闻一多》:"有一天两位老小姐请我们到她们家里吃饭,显然的是她们不善烹调,满屋子油烟弥漫,忙作一团,可是没有看到丰盛的菜肴,不过她们的殷勤盛意实在太可感了。我和一多在赴宴之前商量送点小小的礼物,我从箱子里找出一块前清官服袍褂上的'补子',配上一个金色斑烂的框子,有海波浪,有白鸟,有旭日,居然像是一幅美丽的刺绣画!她们本来是爱慕中国的,看见这东西高兴极了,不知挂在什么地方好。又有一次她们开着一辆彼时女人专用的那种不用驾驶盘而用两根柄杆操纵的汽车带我们去游仙园(The Garden of Gods),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奇景,平地突起一个个红岩石的奇峰,诡怪不可名状,我国桂林有类似景象不过规模小得多了。"(第 30 至 31 页)

三月二十八日 英文诗《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发表于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报纸《珂罗拉多大学之虎》。同期还发表了梁实秋的《一个支那人的回答》。

这两首诗,都是对一些挑衅者的回击。梁实秋《谈闻一多》:"学校里有学生主办的周报一种,有一次上面刊出了一首诗,不知是何人的手笔,显然的是一个美国学生,题目是 The Sphinx。内容是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部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一些什么事。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显着神秘,这是实情。可能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有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写得并不怎么好,可是没有侮辱的意味,顶多是挑衅。一多和我都觉得义不容辞应该接受此一挑衅,于是我们分别各作一诗答之。一多写的一首分量比较重,他历数我们中国足以睥睨一世的历代宝藏,我们祖宗的丰功伟绩。……两首诗同时在下一期刊物上发表了,引起全校师生的注意,尤其是一多那首功力雄厚词藻丰赡,不能不使美国小子们叹服。"(第 40 至 41 页)

先生的英文原诗后刊于梁实秋的《闻一多在珂泉》。(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 9 期,1947.9.14) 其译文如下:

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
我脸如狮身人面像,
你说,它使你困惑,
你希望我唇齿清楚,
你要我回答。

不过,要是我的话对你是个谜,又怎么办呢?
你不愿坐下来,
同我干一杯茶,

缓慢地、斯文地、不断地啜饮；
你不愿在平静清洁、满满的茶杯的颤动的水汽上
任你神思飘逸，
你如此忙碌急躁
不愿发现我的旨意。

甚至我的话对你也是个谜，
因此我宁可保持沉默。

但你向我招呼，
我喜欢你孩子般的声音，
天真而羞答答地。
我们做朋友吧，
但我仍愿保持沉默。

我将沉默地送你
最好的礼物，
送你一只玉制的茶杯
透明而稀薄，
碧绿如竹林中的朦胧光线，
我将送你一件锦袍，
绣满奇异豪华的彩图，
菱形的彩色块，
蝙蝠和彩蝶，
有金色长须、道貌岸然的龙，
用梦幻般闪亮丝线织成；
我将赠你花束，
有桃花、梅花、梨花；
我将赠你绸面精装，
充斥着奇怪方块字的典籍。

沉默地，敬畏地，

我将赠你最好的礼物。
以我的礼物为伴，
你将了解我，
你将了解狡狯，
恶行，
或仅仅智慧。

但我的话可能对你是个谜，
因此我宁可保持沉默。[①]

是年春 梁实秋等三位中国留学生驾车去丹佛南京楼吃广东菜，归途在拐弯处与另一辆美国人驾驶的汽车相撞。警察局歧视黄种人，不由分说将驾车的中国留学生收监，后梁实秋交付了一百七十美元，才将人放出。

先生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梁实秋的纪实小说《公理》："回到珂泉，鲁和[②]觉得心里闷得难过，便走到他的朋友 W 君的寓所。W 君正在画一幅油画，穿着一件涂满油污的布袍，桌上一尊珐琅的宝鼎里面正焚着浓馥的檀香。鲁和把在丹佛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听完了的时候，将手里握着的长杆画笔用力向桌上一敲，笔杆折了两截。'是可忍孰不可忍！……'鲁和将断了的笔杆从地上拾了起来，说：'我去了，你好好的画罢，只消我们不忘我们的使命……'W 君目送着鲁和缓缓的出了房门，一声也不响。"（《大江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25.7.15）

是年春 约在这前后，利明斯教授告诉先生，说纽约就要举行一年一度的画展，选择很严格，劝先生参加。先生与梁实秋商量，梁极力怂恿。于是，先生埋头一个月，锁起房门，吃饭也是一个人抽空溜出去，如中疯魔一般拼命的画。大致画完了，才让人去品评，有一幅人物，画的是一个美国的侦探，非常有神。还少一张风景画，梁实秋建议开汽车送先生到山上去写生，不料却险些丧命。

梁实秋《闻一多在珂泉》："一清早，我赁到一辆车，带着画具食品，兴高采烈的上山了。这是我学会开车后的第三天，第一次上山，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见的。先到了仙园，高大的红石笋矗立着，那风景不是秀丽，也不是雄伟，是诡怪。我们向着曼尼图公园驶去，越走越高，忽然走错了路，走进了一条死路，尽头处是巉岩的绝崖，路是土路，有很深的辙，只好向后退。两旁是幽深的山涧，我退车的时候手有些发

① 这首诗是袁可嘉先生专为本书译的。许芥昱在《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一书中，也有节译，因不完整，故未收入。

② 鲁和，即小说中主人公，似"怒火"谐音。

抖。聒的一声，车出了辙，斜叉着往山涧里溜下去了，只听得耳边风忽忽的响，我已经无法控制，一多大叫。忽然咯喳一声车停了，原来是车被两棵松树给夹住了。我们往下看，乱石飞泉，令人心悸。车无法脱险，因为坡太陡。于是我们爬上山，老远看见一缕炊烟，跑过去一看果然有人，但是他说西班牙语，戴着宽边大帽。腰上挂一圈绳。勉强作手势达意之后，这西班牙人随着我们去查看，他笑了。他解下腰间的绳子一端系在车上，一端系在山上一棵大树上。我上车开足马力，向上走一尺，他和一多就掣着绳子拉一尺，一尺一尺的车子上了大路。西班牙人和我们点点头就走了。但是我再不敢放胆开车，一多的画兴也没有了，我们无精打彩的回去了。"这次没有画成风景画，只好在附近画了。学校附近有座教堂，就以它为背景。"正值雪后，一多就临窗画了一幅雪景，他新学了印象派的画法，用碎点，用各种颜色代替阴影。这一幅画很精彩"。后来共画十几幅，都配了框，装箱，寄往纽约。在这时候，先生给梁实秋画了一张像，他立意要画出他的个性，也要表示自己手底腕力，"他不用传统的画法，他用粗壮的笔调大勾大抹，嘴角撇得像个瓢的，表示愤世嫉俗的意味，头发是葱绿色，像公鸡尾巴似的竖立着，这不知是表示什么。这幅像使他很快意"。不久，"纽约的回信来了，只有美国侦探那幅画像得了一颗银星，算是'荣誉的提名'，其他均未入选"。"这打击对于一多是很严重的，以我所知，一多本不想作画家，但抛弃绘画的决心是自此始"。(《益世报·星期小品》第9期，1947.9.14)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大约就是这前后写的。后编入《死水》。朱自清在《诗与幽默》中称它是"新诗里纯粹的幽默的例子"。该诗创作背景。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记述到："一多的房间经常是乱糟糟的，床铺从来没有清理过，那件作画时穿着的披衣除了油彩斑烂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渍痕。最令人谅讶的是他的书桌，有一次我讥笑他的书桌的凌乱，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第二天他给我一首诗看。"这首诗写到：

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
忽然间书桌上怨声腾沸：
墨盒吟呻道："我渴得要死！"
字典喊雨水渍湿了他的背；

信笺忙叫道弯痛了他的腰；
钢笔说烟灰闭塞了他的嘴，
毛笔讲火柴烧秃了他的须，
铅笔抱怨牙刷压了他的腿；

香炉咕喽着“这些野蛮的书
早晚定规要把你挤倒了!”
大钢表叹息快睡锈了骨头;
“风来了! 风来了!”稿纸都叫了;

笔洗说他分明是盛水的,
怎么吃得惯臭辣的雪茄灰;
桌子怨一年洗不上两回澡,
墨水壶说“我两天给你洗一回”。

“什么主人? 谁是我们的主人?”
一切的静物都同声骂道,
“生活若果是这般的狼狈,
倒还不如没有生活的好!”

主人咬着烟斗迷迷的笑,
“一切的众生应该各安其位。
我何曾有意的糟蹋你们,
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

梁实秋说:“这首诗很有谐趣,他写此诗的动机不仅是为他的邋遢解嘲,诗的末行还吐露一切事自己做不得主宰只好任其自然之意。我不知道他写此诗时是否想起了波斯诗人欧谟的《鲁拜集》中之那些会说话的酒罐子,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古波斯诗人的那种潇洒神秘的享乐主义。”(《谈闻一多》,第 41 至 44 页)

五月 科罗拉多大学举办学生成绩展览,先生作品颇得称赞。次月十四日家信:“前月举行成绩展览会,以我之作品为最佳,颇得此地报纸之赞美,题意可译为‘中国青年的美术家占展览会中重要部分云云’。”

六月上旬 先生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但未得学位。十四日家信:“学校大考已毕。此校今年中国人得学士学位者六人。我亦得毕业证书,习美术者不以学位论也。”

毕业典礼上,先生受到刺激。梁实秋《谈闻一多》:“珂泉大学行毕业礼时,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的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这一年我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有六个,美国女生没有一个愿意和我们成双作对的排在一起,结果是学校

当局苦心安排让我们六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人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端。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①]，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诗人的感受是特别灵敏的，他受不得一点委屈。零星的刺激终有一天会使他爆发起来。"（第 48 页）

这样的事情已有过数次。清华毕业的陈长桐，曾在科罗拉多大学银行系读书，"他有一次到理发馆理发，老板歧视黄种人，竟不肯为他理发。R. C（陈长桐）一气之下，延请律师，告了理发馆一状，结果法院判决理发馆败诉，从此再也不敢藉故刁难了。那次所付律师费竟达美金八十元之多，超过留学生一月的官费"。（王慎名《一九一九级 R. C 校友的琐事》，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 80 期）梁实秋也听过先生讲述这件事，《谈闻一多》："一多到了珂泉之后就和我谈起过有关陈长桐在珂泉遭遇过的故事，说的时候还脸红脖子粗的悲愤激动。陈长桐到珂泉的一家理发馆去理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踱了过来告诉他：'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到法院告了一状，结果是官司赢了，那理发匠于道歉之余很诚恳的说：'下回你要理发请通知一声，我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千万请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黄人进入店中理发，许多白人就裹足不前了。像这样的小事，随时到处都有。"（第 47 至 48 页）

二十年后，先生还是不能忘掉这些耻辱，他对人说："现在美国变得怎样了，我不清楚，那时候就是这样！我，总算知趣，闭门读书画画，轻易不出去，宁可吃点冷面包，宁可头发留得长一点，少受点冤枉气也好呵！"（王康《闻一多传》，第 68 页）

在科罗拉多大学，曾有传闻说孙中山先生病逝，先生听了很激动，立即发电询问。梁实秋《谈闻一多》："一多对于孙中山先生极为敬仰。我们在珂泉时就有一天看见报载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语焉不详，一多大为激动，红头涨脸的反复的说：'这个人如何可以死！这个人如何可以死！'他钦佩他怀有救国大志，不屈不挠，而为人清廉。我们发电纽约查询，结果知道原来是误传。"（第 60 页）此后不久，先生特意写了长诗《南海之神》，即孙中山先生颂，诗中充满了对这位伟人的推崇。

六月十四日　致闻家骕转合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近来深感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将尽自己所能，为国家政治之改良作些努力。这是先生早期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变化。信中说：

为侄辈之教育起见，我亦当早日回国，惟观目下情形，恐难如愿。美术之为

① 此处梁实秋记忆有误，闻一多在家信中曾说于该校毕业。

学，其功难就而无穷，惟有宽以岁月以俟效耳。我辈定一身计划，能为个人利益设想之机会不多，家庭问题也、国家问题也，皆不可脱卸之责任。若徒为家庭谋利益，即日归国谋得一饭碗，月得一二百金之入款，且得督率子侄为学做人，亦责任中事。惟国家糜巨万以造就人才，冀其能有所供献也。今粗得学问之毛，即中途而废，问之良心，殊不安也。近者且屡思研究美术，诚足提高一国之文化，为功至大，然此实事之远而久者。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也。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性质已近于政治的，今又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今夏同人将在芝加哥、波士顿两处开年会，即为讨论此事也。

又嘱弟侄应关心国事，端正品行：

我辈得良好机会受高深教育者当益有责任心。我辈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当多担一分责任。诸侄暑假归家时，驷弟当教其读报纸，且将社会种种不平等情形，政治现状如何腐败，用浅近语言告之。在品行方面，家长犹当严责。如说谎、自私等恶习当严禁其滋长。

七月二十三日 是日，中国农历大暑节气。特作诗《大暑》。后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京报副刊》第一〇六期。收《闻一多诗集》。诗中表现了对故乡的怀念。

是年暑假 决定去纽约，与梁实秋互有赠别。梁实秋《谈闻一多》："珂泉一年很快的结束了，我到哈佛大学去继续念书，一多要到纽约，临别不胜依依。一多送了我他所最心爱的霍斯曼诗集两册及叶芝诗集一册，我送给他一具珐琅香炉，是北平老杨天利精制的，上面的狮子黄铜纽特别细致，附带着一大包檀香木和檀香屑。一多最喜欢'焚香默坐'的境界，认为那是东方人特有的一种妙趣，所以特别欣赏陆放翁的两句诗：'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他自己也有一只黄铜小香炉，大概是东安市场买的，他也有檀香木，但是他没有檀木屑。焚香一定要有檀木屑，否则烟不浓而易熄。一多就携带着我这只香炉到纽约'白日飞升'去了。"（第45至46页）

先生与梁实秋先同行到芝加哥，参加清华留学生的夏令会。罗隆基、何浩若、时昭瀛、吴景超等人均齐集此地。

会中酝酿成立"鼓吹国家主义为革命之基础"的团体"大江会"。梁实秋《谈闻一多》："我和一多离开珂泉东去，是搭伴同行的，途经芝加哥，停留了约两星期，这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清华毕业留美的学生，一九二一级二二级二三级这三级因为饱受了五四运动的震荡，同时在清华园相处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感情特别融

洽，交往也比较频繁一些。一多和我在珂泉一年，对于散处美国各地的同学们经常保持接触，例如在威斯康辛的罗隆基、何浩若，明尼苏塔的时昭瀛、吴景超，经常鱼雁往还，除了私人问讯之外也讨论世界国家大势，大家意气相投，觉得有见面详细研讨甚而至于组织起来的必要，所以约定在暑假中有芝加哥之会。芝加哥大学附近有一条街叫 Drexel Street，在街的尽头有一家小旅馆 Drexel Hotel，房子很陈旧，设备很简陋，规模很狭小，但是租金很便宜。我们从各处来的朋友约十余人就下榻在这个地方。因为根本没有别的房客，所以好像是由我们包下来的一样。连日大家交换意见，归纳下来有几项共同的看法：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一多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他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在国内面对着那种腐败痛苦的情形他看不下去，到了国外又亲身尝到那种被人轻蔑的待遇他受不了，所以他对于这一集会感到极大的兴趣。会谈有了结论之后，就进一步讨论到组织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名称，你一言我一语喧嚷了好几天，最后勉强同意使用'大江'二字，定名为'大江会'，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大江会的成立典礼就在这家旅馆的客厅举行。我从国内带来一幅定制的绸质的大国旗，长有一丈，当然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这一回可派上了用场，悬在正中央，壮观无比。典礼的一个项目是宣誓，誓词是：'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大江的国家主义'，所以表示异于普通的狭隘的军国主义。哲学家罗素那一年正好在美国讲学，道出威斯康辛，我们的几个朋友就去访问他，他是主张泯除国界的大同主义者，反对激烈的爱国主义，但是他听取了我们的陈述和观点之后，沉吟一阵，终于承认在中国的现况之下只能有推行国家主义之一途，否则无以自存。罗素的论断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们就是宣过誓的国家主义者了。大江会不是政党，更不是革命党，亦不是利害结合的帮会集团，所以并没有坚固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会员增加到三五十人，《大江季刊》（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出了两期，等到大部分人回国之后各自谋生去也，团体也就涣散了。但是一多是这一组织的中坚分子，他的热诚维持得也最长久。"（第 47 至 51 页）

潘光旦《谈留美生活》中也谈到大江会，说它的成立是为了与清华学校一九二〇级邱椿、刘师舜组织的"大神州社"唱对台戏。"他们也讲国家主义，我们看不惯，就成立一个大江学会。大江学会这些人对国民党无好感，对共产主义则怕，政治立

场是改良主义的，也提国家主义，想搞一点势力"。"大江学会是清华人，出版《大江季刊》(梁实秋写的封面)，大江宣言也搞了一大堆，文章是罗隆基的手笔。回国后，我们看到国民党刚兴起，还有点朝气，觉得何必多此一举"。(《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97页)

先生赞成"大江的国家主义"，其出发点是爱国精神。二十年后，他在五四纪念会上谈到这段经历，说：

> 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为民族主义，我以为这是反动的。……其实现在看起来，那是相同的。……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因为这种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并且我父亲是一个秀才，从小我就受诗云子曰的影响。(《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3册，第536页)

也许就是在这次会上，先生对已经改学优生学的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转引自顾一樵《怀念故友闻一多先生》，《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

离开芝加哥，先生赴纽约，梁实秋则由科罗拉多大学某教授推荐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九月初 转学进入纽约艺术学院。时，住在瑞弗赛德路国际学舍。这是所专为各国留学生提供食宿的公寓，故又称"万国公寓"，房屋与设备皆为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寓内有饭馆、洗衣店、理发店、裁缝店、杂货店等，俨如一小社会。此建筑刚刚落成，一切器具都崭新，房租每星期六元，这在纽约算很便宜了。

先生住在九层楼上，生活有些改变。梁实秋《谈闻一多》："一多到了纽约之后，生活方式大变。他住在江滨大道的国际学舍里，那是在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一座十几层的大楼，许多中国男女学生都住在这里，每人一小间房屋，租金低廉，环境还算是清静，除了日夜不停的一阵阵高轨火车呼啸而过震耳欲聋的声音以外。一多在一所纽约艺术学院注册，还是继续学画，但是事实上他这一年没有好好的上课，先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索兴不去上学了。从这时候起他蓄了长发，作艺术家状，日久颈后发痒，则约友辈互相用剪刀修整之。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嘉铸)、赵太侔(赵畸)、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入夜则相偕到附近一家广东馆子偷偷的喝五加皮吃馄饨。他们过的是波希米亚的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并不闲，他忙的不可开交。"(第52页)

九月十六日　朱湘的诗集《夏天》编定，是日作《自序》，中说："《春》中有几处是照闻君一多的指正改正的。"

九月二十三日　致闻家驷、闻家骕转合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新交朋友张嘉铸(字禹九)：

> 公寓中清华同学亦达十余人，然人多品杂，堪与为伍者亦寥寥耳。新交中有张君嘉铸者，亦曾在清华肄业二年，后由自费来美。张君之文学美术鉴赏力甚高，敦敦好学，思想亦超凡俗，有乃兄张嘉森(君劢)之风。银行家张嘉璈亦系嘉铸之兄，张氏可谓当今之望族也。嘉铸之嗜好在文学、美术，然非专攻文学、美术者。察其意颇欲以搜罗人才、鼓励文化为事业，如梁新会及乃兄君劢先生之行事者。故其于在美之好学之士中交游甚众，而于好文学、美术者，以其性之所尤近，则尤之致意焉。当今为趋势骛利者之世界，习文学、美术者辄为众所轻视，余能得如张君其人者而友之，宁非幸哉！

这时又认识了清华津贴半费留美的余上沅。余长先生两岁，五四运动中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会议，其后经陈独秀介绍与胡适相识，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求学。一九二二年毕业后任清华助教，次年与梁实秋、顾毓琇同船赴美，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余又是湖北沙市人，与先生有同乡之谊，故三人相识甚欢。随之，又认识了北京大学毕业生赵太侔，赵亦在美习戏剧。

时，还认识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戏剧的熊佛西，并与熊合编了一个独幕剧。熊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便参加戏剧活动，一九二一年曾与茅盾、欧阳予倩等组织民众剧社，编辑过《戏剧》杂志。先生对祖国命运的关切给熊留下深刻印象，他记得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文艺复兴》第2卷第1期，1946.8.1)

先生与诸新友兴趣相投，切磋戏剧艺术，于中秋节后曾排演了洪深所编的《牛郎织女》，接着又筹备编演《杨贵妃》。

十月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纽约的作业太多，真不能读书"。其实是先生"戏兴很高"，"自从来此，两次演戏，忙得我头昏脑乱，没有好好的画过一次画"。时，先生与学习戏剧的熊佛西、张嘉铸、余上沅、赵太侔正在准备第三次演出，剧为余上沅编写的《杨贵妃》，由先生等人译成英文，眼下正赶着排练。至于化装布景也是先生分内的事。信中说：

> 近来忙的不可开交。上星期整个没上课，这星期恐怕又要照办。这样忙法但是戏仍旧还无头绪。眼看排演日期马上就到了，五幕戏只练了一幕。化

装布景的图案虽是画得了，但还没有动手制造。三十余件的古装都是要小姐们的玉手亲缝。其奈小姐们的架子大何！Costume plates 本拟请一个姓杨的（在中国英美烟公司画广告的）画，后来他神气起来了，说一笔也不能改。我就比他更神气，要求当局人把他开除了。如今 art department 的事只我一人包揽。办事的辣手，证例还多得多。

排剧期间，作英文诗一首，附于信末，说"前数星期作了一首英文诗，我可以抄给你看看。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此诗曾由许芥昱译出，题为《相遇已成过去》：

欢悦的双睛，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然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
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
更不敢祈求叫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

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们重逢，
你的风姿更丰盈，而我则依然憔悴。
我将毫无愧色的爽快陈说，
"我们的缘很短，但也有过一回。"
"我们一度相逢，来自西东，
我全身的血液，精神，如潮汹涌，
但只那一度相逢，旋即分道。"
留下我的心永在长夜里怔忡。（许芥昱著、卓以玉译《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第 74 至 76 页，香港波文书局 1982 年 9 月初版）

梁实秋《谈闻一多》中说："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了什么邂逅，他为

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第 56 页）

十二月　约是月，五幕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又名《此恨丝绵绵》或《长恨歌》）在纽约国际学舍礼堂公演，国际学舍赞助人约翰·洛克菲勒及家属都前来观看。演出大获成功，先生等倍受鼓舞，决心开展"国剧运动"。

此间情形，余上沅《一个半破的梦——致张嘉铸君书》记述道："我们得了太侔和一多，又得了佛西。大概也在中秋罢，我们便开始忙着演戏。戏内的'织女'，马上又选作'贵妃'。一出《杨贵妃》，几乎占去了我们大半的生活。在台上，在地窖里，没有半天不看见一多、太侔和你我的踪迹。……我们也有时为演戏而吵嘴，直到大家高呼'开窗子'、'天气不错'，方才罢休。然而，乐亦在其中矣！《杨贵妃》公演完了，成绩超过了我们的预料。我们发狂了，三更时分，又喝了一个半醉。第二天收拾好舞台，第三天太侔和我变成了辛额，你和一多变成了叶芝，彼此告语，决定回国。'国剧运动！'这是我们回国的口号。禹九，记住，这是我们四个人在我厨房里围着灶烤火时所定的口号。从此以后，我们天天计画，计画书写过几十次。我们有了《傀儡》杂志；有了'北京艺术剧院'；有了演员训练学校；有了戏剧图书馆、戏剧博物馆；也有了选送留学戏剧艺术的资助金；有了邀约戈登克雷、来因哈特、盖迪斯们的请柬；有了'宝藏'内的戏目。我们所有的，都是顶好的，……在那时，在纽约，的确是越谈越高兴，越看越有希望，越想越应该。'国剧运动！''回国去发起国剧运动！'这该天天满街跑了。纽约的东边，纽约的西边，犹太人的区域，意大利人的区域，我们都得去。辗转托人介绍去调查各种剧院的内容，去访问他们的办法，去求教他们的经理。上颜料店去，上电器公司去，上玻璃店去，上布店去，上衣庄店去，上五金店去，上照相馆去，上演员聚餐的饭馆去，上胶铺去，上石灰铺去，上假金珠店去，上化装用品店去，上承做布景厂去，上画店去，上书店去，……这样整整跑了两个月，这种跑法，坐车惯了的人必以为苦，可是我也满不在乎。"（《晨报·剧刊》第 15 号，1926.9.16）

在剧中扮演唐明皇的黄仁霖回忆说："在国际学舍住宿时期，有一次所有外国团体都应邀表演各该国家代表性的节目，我们决定表演的是《长恨歌》。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所写的一出戏剧，由余上沅编写，后来，他也成为一位著名的戏剧编写家。我们要在这次表演中特别出色，胜过其它各国，所以，预演了好几次，并装置舞台布景，制作了很多服装。这出戏是叙述唐明皇的一个悲剧，由我饰演唐明皇这一角色。他宠爱的王妃，杨贵妃已经死了，他到各处访求方法，以期重温旧梦。即使只能见一面，亦属甘心。有一天，有一位方士求见，他具有神秘的魔术似的力量。

方士告诉他，已经找到他的贵妃，她是月球里的嫦娥。明皇告诉他，他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与贵妃晤面。方士答应帮助他，但每一年内，只有一个晚上，那月宫才能开放，那是八月十五日夜晚。最后，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并已到了那一个夜晚，明皇靠着方士的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庄严地升到银河，然后进入月宫。在大门口，有贵妃的侍从迎接到月宫里去，就在那里他和他已失去的爱妃，重获团圆。他们有一次简短的聚会，并唱了一会儿歌。突然间，明皇应该回去的时刻到了，方士必须强行把明皇拉回地球，这是悲剧的终局。《长恨歌》受到听众的欢迎，布景壮丽，服装华美(对白用英语)。在表演的那一晚，洛克菲勒家属们，包括老人约翰自己在内，都到场了。表演之后，我们被邀与洛氏家属会见。"黄仁霖说这次"一切的演出，都比乎意料之外的成功"，"这出戏编写得很好，因为这是少有的几次中的一次，中国社会和中国学生们能够携手合作，为国家争取光荣。"(黄仁霖《我做蒋介石特勤总管40年：黄仁霖回忆录》，第33页，团结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一九二五年　二十七岁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掀起反帝爱国运动。

七月一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

十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统一广东。

十一月，冯玉祥与奉军将领郭松龄联合倒奉。

是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任导师。

一月三日　在纽约的清华学校一九二一级留美级友在中华园饭楼举行新年聚餐会，先生撰文记录此次聚会情形，刊于三月六日出版之《清华周刊》第三三八期。此文刊登时，名为《一九二一级纽约重聚会》。全文云：

>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中华园在纽约读书有一种好处，便是你若好玩而且会玩，可以玩得你不要读书了。我们一九二一的这几位级友（除了我一人以外）到纽约来，真是可惜了纽约。你看他们一个个都是书虫：张杰民、吴宗如、廖芸皋、张祖荫、黄宪儒、熊祖同、段茂澜、顾德铭、王际真、沈仁培、李运华……都已经在学位上堆学位了。最明显的例是费培杰用功已经用到医院里去了。用功的人也有他们的好处，因为他们无往而不勇敢，无往而不努力，便是宴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再加上几位外来的健将，例如王德郅，汪泰经，尤其是那著名的食量大王时昭涵，那这番的宴会，其痛快淋漓，可想而知了。
>
> 这次聚会，因为与《周刊》读者面熟的滑稽新闻记者李运华先生缺席，没有人作报告，记者便抓着我了。我同 Bob Li 比，"赐也何敢望回？"

一月十日　晚，江滨大道之国际学舍举行聚餐会，由先生主讲美国现代诗。

是月上旬　参与发起"中华戏剧改进社"。成员有余上沅、梁实秋、梁思成、林徽音、顾毓琇、瞿世英、张嘉铸、熊佛西、熊正瑾、赵太侔等。

一月十一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时，大江会正在筹办《大江》杂志，先生说有译拜伦诗《希腊之群岛》，已投《创造》，若能追回，可充《大江》篇

幅。又说:"现拟作一个 series of sketches,描写中国人在此邦受气的故事。体裁用自由诗或如 Henley[①] 的"In Hospital"。这首诗可能就是《洗衣歌》。还提到诗《醒呀》登在一期或二期都没有关系。

《希腊之群岛》后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时事新报》副刊《文艺周刊》第十一期。时,先生主张"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国内共产党人批评爱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以为然。他认为拜伦不仅爱自己的祖国,而且也爱被奴役的希腊,这就是大江会所主张爱国精神,它并不狭隘。全诗如下:

希腊之群岛,希腊之群岛!
　你们那儿莎浮唱过爱情的歌,
那儿萌芽了武术和文教,
　突兴了菲巴,还崛起了德罗!
如今夏日还给你们镀着金光,
　恐怕什么都堕落了,除却太阳?

那茜欧的彩笔,梯欧的歌喉,
　壮士的瑶琴,情人的锦瑟,
给你们赢得了光荣,你们不受,
　如今你们只是死守着缄默;
你们祖宗的英名簸荡在西方,
　只你们听不见,你们一声不响。

高山望着平原,平原望着海!
　我在马拉桑的疆场上闲游,
我一面在梦想,一面在徘徊,
　我梦想着希腊依然享着自由;
因为我脚踏着波斯人的白骨,
　我不相信我像是一个俘虏。

巉崖的额上坐着一位君王,
　巉崖的额下便是沙拉米;

① 英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

千艘的舳舻，横系在下方，
　百译的臣民，都是君王的！
破晓的时分，君王点了卯，
　等到日落，一个也找不着。

那里找他们，又那里去找你，
　我的祖国呀？这寞的海边上，
那慷慨的歌声是听不着了的，
　再也不会鼓荡，那慷慨的胸膛！
但是这神圣的瑶琴，你怎么说，
　难道就让它在我手里堕落？

这总算是难能可贵的事，
　在如今这名节凋丧的残冬？
像我唱着悲歌，脸上还潮着羞耻，
　纵然是株连在奴隶的族中。
因为到这里，教诗人怎么办？
　不过为希腊流泪，为希人红脸。

什么？只会为盛时流几行泪？
　只会红脸？我们的祖宗流过血！
大地呀！请从你胸口里退回，
　退回我们那志士的遗骸！
三百个斯巴达的健儿，还我
　三个，我能教射马披离复活！

怎么还没有回话？都不回话？
　不见得罢？听那众鬼的答声
仿佛遥远的波涛奔泻：
　“只要一个活人抬起头来，一个人，
我们就来，马上就来帮忙！”
　只要活着的人们一声也不响。

罢了！罢了！换一个调子弹弹；
　快斟上一杯沙蜜的美酒
让突厥的蛮夫夸着血战
　我们只要葡萄的赤血能流！
听！这不是贝坎罗的鬼舞巫歌，
　响应的声音偏是那般踊跃！

辟鲁的名舞依然在风行，
　那辟鲁的名阵上那里去找？
为什么同样两种的遗训，
　却把那庄严豪侠的忘掉？
请问佉摩赐给你们的文字[①]，
是赐给一群奴隶的不是？

快斟上一杯沙蜜的美酒！
　再不要想那些伤心的事！
这酒给安勒滋润过歌喉。
　安勒曾在波理的朝里服仕，
波理克雷诚然是个暴君，
那暴君却都是我们的族人。

你可知道那絜爽的霸王，
　是自由的最相絜的朋友！
最忠实又最勇武的保障。
　米尔泰亚底便是那王侯。
如今再有他那条铁练存在，
定好将希腊再捆锁起来。

快斟上一杯沙蜜的美酒！
　苏利的山头和巴辩的海岸，

① 此下格式与前不同，似有一误，仅据原样抄录。

如今还散布着一枝遗胄，
　多里的苗裔还在那里孳衍；
说不定赫拉可里的遗风，
还埋伏在他们的族中。

不要相信法人能给你自由，
　他们那国王是一个奸商：
自己的士卒，自己的刀矛，
　才是自强的唯一希望；
可是突厥的武力，拉丁的贿赂，
便再大的盾甲也抵挡不住。

快将沙蜜的美酒斟满一杯！
　我们的少女又在绿阴中舞唱，
我望见它们那眼中的秋水，
　望见每个娇艳的女郎，我想
那怀里又要哺出一群奴隶，
如是我不禁热泪往脸上洗[淌?]。

放我在苏尼欧的白石岩上，
　那边什么都没有，只海涛和我，
让我对着海涛互相哀唱；
　让我唱完歌就死，像那天鹅：
这奴隶之邦不是我的家！
把沙蜜的酒杯摔破了它！

这前后，先生还译过拜伦的《希龙的幽囚》，但没有发表。（据梁实秋《谈闻一多》，第62页）

一月十八日　余上沅写信给胡适，要求在北京大学开设“戏剧传习所”，以得一地方做戏剧实验，并待时机成熟时，建立“北京艺术剧院”。同时，请胡适等人参加他们新近在美国组织的“中华戏剧改进会”。

这封信从口气上看，是先生、赵太侔、余上沅三人商量过的，由于余上沅在“五四”运动中认识胡适，故由他执笔。此信有助于了解先生在纽约时的一些思

想活动，兹摘录之："在纽约于戏剧艺术具有特别兴趣而又深有研究的有赵畸、闻多二君。赵君系民六北大英文门毕业，来美有年，近年专攻戏剧艺术。闻君系清华民十毕业，来美专习绘画，于文学及戏剧又别有独到之处。我们三个人原来并不十分相熟，因为此地学生会演戏的缘故，才彼此结识。我们演过一次洪深君编的《牛郎织女》，一次我主编的《此恨绵绵》(本《长恨歌》，共五幕)。我们三人分工合作，竭二月之力，竟得成功。我们原来各有计划，想将来回国为戏剧艺术尽力。近来才互相约定，决于今年夏天一同回国，开始筹办'北京艺术剧院'的运动。聚议数次，都因经费无着，垂头丧气而散。这种'徒唤奈何'的情形，大概北京新月社诸先生也不能免。那么，难道大家同声一叹就罢了吗？和一切想做事业的少年们一样，我们也在纸上拟了很完备的计划，但苦于无钱开办，也就变作空文了。我们想去想来，觉得有一件事北大可办、能办而且该办，请先生一面看下去，一面批评。北大有音乐传习所、画法研究会，固然是培养艺术界人才的好办法，但未开设'戏剧传习所'或'研究会'，总不免是一件缺欠。戏剧如何重要，如何可以融会贯通原有之音乐及画法两部，不待我说，先生比我知道的还多。从前所以未办的，大概是无人提倡，无人主持，无经费。如今先生及陈通伯、丁燮林、徐志摩、张鑫海诸先生都能提倡、能主持了，——只有一个经费的困难。经费的困难是有限的，不比另设一个独立的系。固然，学校总得先垫一点款子，然而公演时可以卖票补还的。即或补还不上，学校为戏剧事业在预算上加一项小款总可办到的。经过若干训练之后，生徒即可出台公演，公演有了信用，即便仿照此间戏剧协社等团体办法，发售预约券，每期公演在实验时得有成功的剧本。北大从前不出来办戏剧上的事业，以致陈某闹出偌大的笑话，使戏剧二字又受了累，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如今北大再不出来办，不免有点见义不为了，先生以为然否？世界各国都有剧本，中国似乎独无，这是一件大耻。如今新月社诸先生投袂而起，其精神不可不令人佩服，——然苦无处试验何！我们对戏剧艺术正得了一点门径，想回国随同诸先生做点实验，同建'中国戏剧'，也苦无处工作。假使北大能有一个'戏剧传习所'，大家都好去埋头做工了。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北大肯马上开设'戏剧传习所'，我们能不能在里面服务都是小事，因为我们自己也想单独办一个小传习所。在我们若干计划之中，有一样便是在北京开一个小传习所，但恐不及北大之能号召程度稍高的学生。我们在北京做点工锄口，如能同时在各学校教点戏剧更好，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要积极组织剧团的。近来在美国的戏剧同志，已经组织了一个中华戏剧改进社，社员有林徽音、梁思成、梁实秋、顾一樵、瞿士[世]英、张嘉铸、熊佛西、熊正瑾等十余人，分头用功，希望将来有一些贡献。国

内拟邀请新月社诸先生加入，将来彼此合作，积极训练演员，及舞台上各项专门人才。同时向人募款，依次添置各项器具。一到时机成熟，便大募股本，建筑'北京艺术剧院'。此刻正是这个运动开始时期，非求先生格外帮忙不可。先生方面，也许已得着邀请加入戏剧改进社的信了，如今我再顺便请先生加入，先生虽系前辈，但为戏剧，一定肯答应我们的请求的。论到剧本，那是要大家各自埋头去干的，不过在订正以前，我们在化验室内先演习几次。关于布景、服饰、灯光、表演及各项非文学的方面，我们是愿意负责的。如此大家诚心诚意去干，两年后还不能叫'北京艺术剧院'开门，那只好归之于天了。总结上文，我们敬请先生：(一) 请北大开设'戏剧传习所'；(二) 帮我们的忙，使我们可得一个地方做实验；(三) 加入我们中华戏剧改进社。我们六月初可到北京，那时再来当面请教。"(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二月十三日　余上沅有致宋春舫信，信中诉说自己立志于戏剧实验，并言及与先生等愿献身戏剧事业："我是立定主义终身以戏剧为业务的，同志还有赵畸君(北大毕业，在美有年)、闻多君等。今夏回国的就有我们三个人，并且都决定住北京。或许因为多得几个帮忙的人之后，先生的戏剧事业也可以如愿以偿。赵、闻两君同我曾在纽约排演过两次戏。第二次的《此恨绵绵》(即《杨贵妃》)是我们自编自排的。两次都有很大的成功。"(《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10期，1925.5.1)

三月初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中华戏剧改进社事停顿许久，前由纽约同人讨论进行方法，公决由刊行出版物入手。"信中开列同人共拟的前四期目录，请梁实秋在波士顿与大家再慎为斟酌。目录中，有先生拟作之《塞藏赞》、《奈陀夫人的艺术》、《毕痴来》等。信中还对目录做了说明：

> 纽城同人皆同意于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故于印度则将表彰印度之爱国女诗人奈陀夫人，及恢复印度美术之波士(Nandalal Bose)及太果尔(Abanindranath Tagore)(诗翁之弟)等。于日本则将表彰一恢复旧派日本美术之画家，同时复道及鉴赏日本文化之小泉八云及芬勒楼札，及受过日本美术影响之毕痴来。从一方面看来，我辈不宜恭维日本，然在艺术上恭维日本正所以恭维他的老祖宗——中国。我决意归国后研究中国画，并提倡恢复国画以推尊我国文化。故在第一期内有陈师曾，有拓碑(书法)，有旧剧之欣赏，有瓷器，有李义山之精神分析，又有中国绘画在西方之势力。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第五期或当讨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矣。

先生不主张刊物前数期用名人之稿，欲“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以免人误解要借名人的光。又说：“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故你的‘批评之批评’一文非作不可。用意在将国内文艺批评一笔抹煞而代以正当之观念与标准。上沅又将作五年来之中国新剧，本意亦在示人以下马威也。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哄动一时。……孰舍孰从，请示知。”

关于刊物的内容及动机，先生好像也写信给朱湘谈过。四月，《清华周刊》第三四三期有消息，云：“据《京报》载本校同学朱湘君通信：在美同学闻一多、梁治华、顾一樵诸君，鉴于目前中国地位之危急，非有真正之国家文学，鼓吹民气，发扬民德不可，已定在本国创办一种文艺刊物专为提倡国家主义之用。并请定在美同学杨廷宝、骆启荣数君担任美术，现代文学巨子落华生、冰心女士等担任撰稿。闻闻君将牺牲学位，于本夏返国办理一切云。海外同学热心国家如此，校内同学闻之不当继起奋兴耶？”

时，有长诗《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信中说“可尽《大江》有优先权”。

三月十日　诗《渔阳曲》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三号。收《闻一多诗集》。这是一首运用民歌形式歌颂民间鼓手的诗，全诗十三节，每节十三行，节与节、行与行间既对等匀称，又富有变化，而且构思上很注意戏剧性。是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周刊》第三四九期附《书报介绍副刊》第十七期，发表了署名“天公”的评介，说：“这是我们清华园内大诗人一多君最近发表的一首诗，这诗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他的字句和现在的新诗有点不一样，每节的末几句用‘丁东、丁东……’，听，你可听得懂，在现在的新诗坛上，这样的格调很少见到。（二）这诗的音韵好极了，我们读时，从他的音调上，可以感觉得出这诗情感出来，不像普通新诗那样百谈[读?]而不能上口。（三）字句上很加过一番磨练，如‘朱梦’，‘默跪着双双的桐影’，‘鸬鹚杓子泻着美酒如泉’，‘洋洋的笑声涵落在四筵’等，可以知道作者作这诗是经过一番精刻的想像，不是一时发昏信手写出来的。作者在写这首诗上虽用了不少旧的词句，但却一点不露堆砌，一点也不死板，可见作者是一个曾在中国诗词中下过功夫的脚色，现在有了新灵魂，所以把往日死的词句都用活了，从这点我们也可看出现在一般刚读过平民千字课的新诗人之浅薄和贫乏。”

三月十一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大江》刊头和筹稿问题，说：“封面请[干]脆写两个大字好。此地既没有书家，你就近一挥可也。”后来刊物出版，“大江季刊”刊头即梁实秋之手笔。

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纽约，先生极为震惊。

是月中旬　致梁实秋信[①]。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言及决定回国："归期大概以上沅的归期为转移，至迟不过六月。栖身之所依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亦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又说到新近的诗和文章《南海之神》、《七子之歌》和《新民族的新诗》、《印度女诗人——奈陀夫人》：

> 《南海之神》还没有十分竣功。如今寄来了，请你着实批评一番，然后再继续撰作后数节。昨晚又草成《七子之歌》也是国家主义的呼声。结构具在，只是音节词句上尚欠润色。我现在同学校生活正式脱离关系了。现在的生活，名义上是游手好闲，实际上是仰屋著书。着手撰著的文章有一篇《新民族的新诗》，是从民族主义底观点上论美国的新诗运动。又有一篇《印度女诗人——奈陀夫人》(*Sarajini Naidu*)。奈陀夫人是印度国家主义的健将，在艺术上的成功亦不让太戈尔。Arthur Symons，Edmund Gosse 都称赞过伊。

信中还谈到梁实秋、顾毓琇等组织演出《琵琶记》事。先是，先生等在纽约公演《杨贵妃》后，颇为轰动一时，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启发也准备排练一国剧招待美国友人。于是顾毓琇从明代初年高则诚的《琵琶记》中节选出一段，梁实秋译成英文并改编成话剧，梁实秋、谢文秋、谢冰心、顾毓琇、王国秀、徐宗涑、沈宗濂、曾昭抡、高长庚等各为角色。但是布景与服装发生了困难，便向先生求援。先生因筹备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无法脱身，回信中说："布景也许用不着我亲身来波城。只要把剧本同舞台底尺寸寄来，我便可以画出一套图案，注明用什么材料，怎样的制造。反正舞台上不宜用平面的绘画，例如一个窗子，最好用木头或厚纸制一个能开能合的窗子，不当在墙上画一个窗子底模样，因为这样会引起错误的幻觉。总之，候我把图案制就了，看他的构造是简单或复杂。如果不能不复杂，一定要我来，我是乐于从命的。"不过，赵太侔、余上沅还是赶到波士顿，协助梁实秋等制作布景，并把《杨贵妃》剧中用的一些服装带了去。梁实秋《琵琶记的演出》："杨剧服装大部分是缝制之后由闻一多用水彩画不透明颜料画上图案，在灯光照耀之下华丽无比，其中一部分借给了我们。"赵太侔不是清华同学，先生特致函介绍，梁实秋说："一多特函介绍他给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太侔这个人是真正的'a man of few words'一个不大讲话的人，千万别起误会，以为他心有所愠。"(《秋室杂忆》，第 59 至 60 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6 月 1 日出版)

三月二十二日　下午二时，纽约华侨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这个会是由

---

① 原信无日期，仅署"星期五早"。据信中谈到波士顿演出《琵琶记》事，可推知此信写于中旬，或是 13 日，或为 20 日。

中国留学生筹备的,先生也参加了工作,孙中山先生遗像就是先生画的。有消息报道:"此次孙中山先生噩耗传来,留美中国同学之在纽约者,感中山先生人格之伟大,故不论派别,各捐除成见,同致最后之敬仰于此开国元勋。由学界中三十六人组织筹备处赶办追悼事宜,处长为罗隆基君,清华同学之在内办事者,如潘光旦、张嘉铸、熊祖同、陈石孚、闻一多等,颇为出力。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开追悼大会,会场设于万国学生会所正厅。一切布置,均依国式。桌上置闻一多君所绘中山先生遗像,围以五色国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遗像之前,焚香点烛,复陈鲜花一把,鲜果三碟。桌之左右,各竖长方大纸碑,上书中山遗嘱之原文与译文。四壁悬各团体及私人所赠联□。各国来宾到会者逾千数,幸会所正厅系照新式戏馆建筑,座分上下二层,不致无立足之地。座满之后,即闭大门开会。主席程经远君致开会辞,南浔姚昌复先生主祭,助祭者为余上沅与孙本文二先生。祭礼即毕,遂由中华市政协会总干事桂崇基君报告行状,罗隆基君以国语演说,印度国民党领袖达斯、杜威教授、上海美国律师林百克,亦相继以英语演说。最后则由中国评论社梅其驹君道谢各国来宾而散。"(《清华周刊》第345期,1925.5.1)

清华同学是此次追悼会的主要筹备者,潘光旦《谈留美生活》:"有一次纪念孙中山先生,留学生中有国民党员,有些事情本来应该他们做,但他们笔头不行,就由我们来做了。比如会上要谈总理遗嘱,还有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些都是我翻成英文的。"(《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96页) 先生作的孙中山先生遗像,是幅炭笔画,先生很喜爱这幅画,后来还送了一张此画的照片给梁实秋。

三月二十五日 《大鼓师》发表于《晨报·文学旬刊》第六十五期。收《死水》。

这时期,先生再次兴起著作热。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你终于觉得干戏不是你的本行,不久你仍回到研究诗的岗位上。自此你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你往往从半夜写到天明。为了努力于诗的创作,你时常废寝忘餐。我因为当时和你同住在一起,有首先读你的诗篇的光荣。"(《闻一多纪念文集》,第72页)

三月二十七日 诗《你看(春日寄慰在美的友人)》、《薤露词(为一个苦命的夭折少女而作)》发表于《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九期。后者在是年七月二日重新发表于《京报副刊》时,改为《也许(葬歌)》。二诗均收入《死水》。

三月二十九日 晚,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在美术剧院正式演出《琵琶记》,观众千人左右,有大学教授、文化界人士、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演出十分成功,轰动波士顿。演出前,先生特意从纽约赶来助兴。顾毓琇《怀故友闻一多先生》:"一多同太侔特别从纽约赶来帮忙。布景、服装、化妆,都由一多负责;舞台设计、灯光,则由太侔负

责。我穿的一件龙袍，便是一多用油画画出来的，在灯光下照起来十分漂亮。一个大屏风，有碧海，有红日，有白鹤，亦是一多的大手笔。"(《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 后来，顾毓琇在《百龄自述》中亦说："三月二十九日，在波士顿美术剧院公演《琵琶记》(Fine Arts Thealer)，由我任编导，实秋译成英文。王倩鸿女士致开会词，沈宗濂致欢迎词，郭秉文先生演说。音乐节目后，即开演《琵琶记》，计分四幕及尾声。实秋饰蔡中郎，谢文秋女士饰赵五娘，冰心女士饰宰相之女，余饰宰相，徐宗涑饰邻人张老先生，沈宗濂饰疯子。本剧演出，由闻一多、赵太侔从纽约来相助。一多负责布景，其所绘屏风一大幅，碧海红日，白鹤飞翔，鲜艳夺目。我所穿蟒袍，亦系油彩所绘，在灯光下十分美观。太侔负责灯光，注意新式投射，亦为别开生面。波士顿向为音乐戏剧中心，今得此表演，各报均多好评。我国有国剧运动，此时实在纽约、波士顿开始。"(第24至2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 冰心在《追念闻一多先生》中说："波士顿的留学生演古典剧《琵琶记》，一多先生从纽约来波士顿过春假，因为他是学美术的，大家便请他替演员化妆。"[①](《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08页)

三月三十日　与诸友去看望冰心。冰心《追念闻一多先生》："剧后的第二天，一多先生又同几位同学来看我。那天人多话杂，也忘了都说些什么了。"(《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08页)

是月　致梁实秋、顾毓琇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此时，先生政治热情甚高，尤其热衷于大江会，云："大江前途之发展，有赖于本年中之活动者甚多。本年东部年会中之活动不但可以宣传国家主义，而且可以宣传大江会。大概添加会员，在年会前，很有限。年会中大江政策若能实现，定有同志的愿来参加我们的阵列。然后会员增加了，声势浩大了，大江的根基便算稳固了。"又说到对吸收冰心为大江会员事，说"等年会后再讲，上次我同她谈话，我猜她的意思，颇表示对于大江事业的同情。请一樵有机会多和她谈谈大江"。时，清华学校一九二〇级毕业生邱椿(大年)、刘师舜(琴五)等亦组织有提倡国家主义的"大神州社"，大江会中有人谈起与其合并问题，先生认为"恐不能成事实，因彼等政策太消极，且至如今国家主义的定义还未决定。不过同他们合作总是有益无损的"。

四月二日　朱湘得知先生将要回国很是兴奋，说："一多是英诗的嫡系，英诗是诗神的嫡系；一方面我们虽极盼他所提倡的'文化的国家主义'成功，而与'爱尔兰的文艺'东西辉映，但一方面我也希望他的诗提起国人对于英诗的兴趣，而令荒漠

① 梁实秋《谈闻一多》、《秋室杂忆》均说闻一多未曾到波士顿协助演出。但冰心1986年3月3日给编者复信中云："一多先生在二五年春到波士顿来帮忙《琵琶记》演出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不会有误，是他给我们演员脸上化的装。"又顾毓琇1988年5月14日与编者的谈话中，亦说他清楚地记得闻一多到波士顿协助演出之事。

的中国多出了一个漠中草原来。"(朱湘《〈泪雨〉附识》,《京报副刊》第107号,1925.4.2)

四月上旬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能早归国,实为上策。"

长诗《南海之神(孙中山先生颂)》脱稿。后发表于十一月十五日《大江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收《闻一多诗集》。全诗三章:神之降生、纪元之创造、祈祷。诗中将孙中山誉为"赤县神州"的"圣人",与列宁、甘地、华盛顿"并驾齐驱"。又比作"烘炉中的一条火龙","创造了一个新纪元","转斡了四万万生灵的命运"。诗中还向孙中山表示忏悔,唱出发自内心的赞歌。

先生崇敬孙中山,并不等于完全赞同国民党的政策。在给梁实秋信中说,该诗"刊入《大江》不谦其为国民党捧场?我党原欲独树一帜,不因人热,亦不甘为人作嫁衣裳。然取决之权在足下,我固无成见"。

信中还录四首近作古体诗:《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释疑》、《天涯》、《实秋饰蔡中郎演〈琵琶记〉,戏作柬之》。

四月二十一日 熊佛西在向国内报告中华戏剧改进社消息中说:"闻一多——我找不出较'多才多艺'更好的名词来形容闻先生。因为他的兴趣是广而浓,不但能诗(曾著有《红烛》集,上海泰东出版),而且能画画(他到美国本来是研究画的)。近来不知道他为什么又对于戏剧发生了特别的兴趣。我的朋友中兴趣广的很多,但像闻先生这样好的成绩可寥寥无几!"(熊佛西、王剑三《中华戏剧改进社的新消息》,《晨报附刊》第88号,1925.4.21)

四月二十四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我们定五月四日离纽约,十四号上船。回去后计划详情,菊农谅已报到了。"又说:"此次回国并没有什么差事在那里等着我们,只是跟着一个梦走罢了。我们定规坐三等船,每人省出一百美元,作为到北京后三个月底粮饷。"

梁实秋曾欲寻找国内新诗集,先生遂把身旁的集子都寄了去。

是月 离美前,有致朱湘信,说欲回国开展国剧运动。朱湘遂复信表示赞成,并介绍了国内情况。朱湘信文如下:

一多兄:来书批评拙作,语语中肯,读毕,直欲五体投地。"胆汁色"三字极妙。三诗遵命保留。大作两章已经代投《京副》,就中《大雨》极佳,《渔阳曲》音节美妙,"东"韵之运用可见匠心,此诗无疑的为一音节上的成功。《河图》商务虽允承印,但最好仍是自办,兄意不知以为如何,尚望告知。《河图丛书》想只在计划中:我可以附骥一种,Synge 的戏剧。

艺术杂志既有,人才充足时,艺术大学亦一刻不容缓之事业;目前之中国,其它之艺术不论已,即最普通之绘画,亦复凋萎之至,盖如今较可成立之美术学校仅有

京宁沪三地之四校，而京校今已俘办，尚未恢复，宁校窄隘，此地刘海粟校颇有商业性质，周剑尘校生徒极少，吾兄闻此，得勿疾首蹙额耶？所望者，吾兄与一班游美之青年艺术家联袂返来之时，能在景物清幽之地，或宁或吴，创立一广义的艺术大学，则我国当今就木之艺术尚有一 Rebai 之希望焉。此大学开办后，戏剧自亦在内，届时之盛况可想而知。

兄今夏返国，固弟所亟愿而渴望者，然为兄之精神慰安计，为我国之艺术计，则弟敢言当今国内之学术界中除创造即将复活外。其它恐皆不能使兄满足，与其徒为独木，反不如先偕实秋兄同作一旧大陆之畅游之为愈也。尔时两兄如来，同归者必有数艺术者，如此则大学可成，一鸣惊人矣。管见不识当否，尚望兄等加以仔细之考虑。如其可行，自今起即当募集基金。弟悬想将来有梁思成君建筑校舍，有骆启荣君担任雕刻，有吾兄及杨廷宝君濡写壁画，有余上沅君、赵畸君开办剧院，又有园亭池沼药卉草木以培养实秋兄、沫若兄之诗思，以逗林徽音女史之清歌，而达夫兄，年来之悲苦亦得藉此以稍释，不亦人生之大快乎，弟馨香默祷，能身逢其盛，永在书城中为一蠹鱼，愿亦足矣。（《朱湘遗书三通：与闻一多》，《清华周刊》第 578、579 期合刊，1934.4.16）

五月四日　与余上沅、赵太侔结伴离开纽约西去。十四日在美国西岸登船归国。先生在美留学共三年，按清华规定，清华毕业生可在美留学五年，中断一年内，亦可复学，攻读博士学位者还可延长。另，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外交部为鼓励清华留学生开阔眼界，批准清华留美监督处所拟之《全费生赴欧考察及研究章程》。章程规定：凡清华全费学生，在美国学校毕业，成绩优良，而留美年限不满四个月以上，回国时有志赴欧，可按美国月费给予一个月津贴，并给照例回国川资。对于在美获得博士学位及有六个月以上实习经验的工科学生，只要有大学教授证明认为赴欧留学有益者，还可津贴赴欧洲留学一年。（《欧游佳音》，《清华周刊》第 311 期，1924.4.25）先生提前回国，毅然放弃了这些优厚待遇。

提前回国，也等于放弃学业。日后，有人在闲谈中问他为什么放弃绘画呢，他回答说："在美国，最初学画的头两年，教授们只准画些几何形体，石膏模型，枯燥而烦琐，但我心里却有很多意见想藉画笔表示出来。有一次，我想了很好的一个主题，画好了，高兴得很，便找一位教授看看。没有想到，他把我骂了一顿，说这里的比例不对，那里的透视错了。我失望极了，而我心里却又有那么多的意见，别人不许我在画布上述说，那我只好写诗了。"（赵沨《闻一多先生底回忆》，香港《光明报》新 4 号，1946.10.18）

六月一日　在上海登岸。上岸后身边所剩东西不多，先生把褂子当了，余上沅也将皮大衣送到当铺，几个人才有钱下了一回饭馆。（据访问陈衡粹记录，1989.3.4）王康《闻一多传》亦说："当轮船刚驶进吴淞口，他立即把三年来束缚着他的洋装扔

到海里，以至到了上海不得不到他哥哥家里去借外衣穿。自是以后，就一直穿着长袍布履，有时还套上马褂，冬天则把棉裤脚扎起，穿上一双棉靴，往往令人难以认出，这是位从外国回来，曾经以浪漫情调知名的新诗人。"（第 90 页）携带行李中，不少是现代的英文诗集，如"哈第的《沉郁》、郝斯曼的《简洁》"。（朱湘《闻一多与〈死水〉》，《文艺复兴》第 3 卷第 5 期，1947.7.1）

先生满腔热忱回到祖国，但一下船见到的却是五卅惨案后的景象。余上沅《一个半破的梦——致张嘉铸君书》："我同太侔、一多刚刚跨入国门，便碰上五卅的惨案。六月一日那天，我们亲眼看见地上的碧血。一个个哭丧着脸，恹恹地失去了生气，倒在床上，三个人没有说一句话。在纽约的雄心，此刻已经受过一番挫折。"（《晨报·剧刊》第 15 号，1926.9.23）

在上海，受到洪深、欧阳予倩的热情款待，他们劝先生等留在上海共事，但先生认为北京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多少可以做国剧运动的中心，所以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是月上旬　回到故乡浠水。离别三年，一切都格外亲切。诗《回来了》、《故乡》即描写这时的心情。前者发表于八月十三日《晨报·副刊》第一二四九号，后者发表于八月二十九日同刊第一二六〇号，均收入《闻一多诗集》。

在故乡的生活很愉快，尤其见到满地跑的女儿立瑛，欢喜得不得了。

不久，闻家驷因参加抗议五卅惨案罢课，从上海返归。他拒绝回震旦大学预科读书，得到先生支持。其后，闻家驷自费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一年，其间的一半费用也是由先生资助的。

是月中旬　到北京，与余上沅、陈石孚在西单二龙坑梯子胡同一号租赁了屋子，几个单身人住一个院子，景况相当凄凉。

六月二十七日　诗《醒呀！》发表于北京《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收《闻一多诗集》。

这首诗作于美国，是先生回国后发表的第一首诗，它表现了激烈的爱国情绪。诗后有跋，云：

> 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本已交给留美同人所办一种鼓吹国家主义的杂志名叫《大江》的了。但目下正值帝国主义在沪汉演成这种惨剧，而《大江》出版又还有些日子，我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了，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我想《大江》的编辑必能原谅这番苦衷。

《醒呀！》以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和"众"的口吻，发出呼喊觉醒的吼声，不仅感情激烈，并且有戏剧效果。全诗如下：

（众）天鸡怒号，东方已经白了，
庆云是希望开成五色的花。
醒呀！神勇的大王，醒呀！
你的鼾声真和缓得可怕。

他们说长夜闭熄了你的灵魂，
长夜的风霜是致命的刀。
熟睡的神狮呀，你还不醒来？
醒呀！我们都等候得心焦了！

（汉）我叫五岳的山禽奏乐，
我叫三江的鱼龙舞蹈。
醒呀！神明的元首，醒呀！

（满）我献给你长白的驯鹿，
我献给你黑龙的活水。
醒呀！勇武的单于，醒呀！

（蒙）我有大漠供你的驰骤，
我有西套作你的庖厨。
醒呀！伟大的可汗，醒呀！

（回）我给你筑碧玉的洞宫，
我请你在葱岭上巡狩。
醒呀！神圣的苏丹，醒呀！

（藏）我吩咐喇嘛日夜祷求，
我焚起麝香来欢迎你。
醒呀！庄严的活佛，醒呀！

（众）让这些祷词攻破睡乡的城，
让我们把眼泪来浇醒你。

威严的大王呀，你可怜我们！
我们的灵魂儿如此的战栗！

醒呀！请扯破了梦魔的网罗。
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了。
醒了罢！醒了罢！威武的神狮！
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

由于《醒呀！》的发表，先生结识了编辑《现代评论》文艺稿件的杨振声。杨振声，字金甫，山东蓬莱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参加新潮社，五四运动时因参加火烧赵家楼被北京政府军警关押。一九一九年年底，杨振声与冯友兰同船赴美留学，在美期间担任《新潮》旅美通讯记者。一九二三年，杨振声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遂转入哈佛大学，一九二四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十二月十三日，《现代评论》创刊，文艺编辑自第三卷起由杨振声主持。

七月一日 《美国著名女诗人罗艾尔逝世》发表于《京报·副刊》第一九五号。文中说：罗艾尔女士是映象派[①]的首领，是诗人、批评家、著作家、翻译家，她与人"合作翻译了一本中国诗，名曰《松花笺》(*Fir Flower Tablets*)，其中以李太白的作品为最多。罗艾尔女士对于中国诗有极大的敬仰，她的创作往往模仿中国诗，具有特异的风味"，"她的死是美国文学界的大损失。她死了，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同情者"。

七月四日 《七子之歌》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收《闻一多诗集》。这首诗作于是年三月，先生称它"也是国家主义的呼声"。诗前有序，述该诗创作之动机：

> 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 Alsase-Lorraine[②]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七子之歌》将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

① 今一般称之"意象派"，此"映象派"为原文。
② 即阿尔萨斯、洛林，曾被德国侵占割去。

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离开了母亲怀抱的七个儿子，哭诉着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要求回到母亲的身旁。该诗发表后，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刘湛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总干事）将此诗收入他编的《公民诗歌》，一位署名"吴嚷"的青年读后，十分激动，将此诗转载于《清华周刊》第三十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并写了附识，说："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矣。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陈情》时，固未有如是之感动者也。今录出之聊使读者一沥同情之泪，毋忘七子之哀呼而已。"

《七子之歌》全诗如下：

澳　门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香　港

我好比凤阁阶前守夜的黄豹，
母[①]亲呀，我身分虽微，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嗳着我的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台　湾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②]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① 原诗"母"字排作"如"。
② 原诗"珍"字排作"真"。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威　海　卫

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
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
母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
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
快救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
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广　州　湾

东海和碣州是我的一双管钥，
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
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
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
我要紧紧的拥抱[1]着你的脚髁。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九　龙

我的胞兄香港在诉他的苦痛，
母亲呀，可记得你的幼女九龙？
自从我下嫁给那镇海的魔王，
我何曾有一天不在泪涛汹涌！
母亲，我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
我只怕希望要变作一场空梦。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旅顺，大连

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
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① 原诗“抱”字排作“把”。

两个强邻将我们来回的蹴蹋，
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
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七月十一日　诗《爱国的心》、《洗衣曲》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一期。前者收《闻一多诗集》，后者收《死水》时有修改。

《爱国的心》表达爱国情绪，全诗八行，形式整齐。诗云：

我胸中有一幅旌旆，
没有风时自然摇摆。
我这幅抖颤的心旌，
上面有五样的色彩。

这心脏底海棠叶形，
是中华版图底缩本；
谁能偷去伊的版图？
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洗衣曲》也是首爱国诗的代表作。诗有序："美国华侨十之八九以洗衣为生，外人至有疑支那乃举国洗衣匠者。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爰假洗衣匠口吻作曲以鸣不平。"该诗收入《死水》时，序及全文均有改动，序改为："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道'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吗？'许多人忍受不了这侮辱。然而洗衣的职业确乎含着一点神秘的意义，至少我曾经这样的想过。作洗衣歌。"下面是初次发表的《洗衣曲》：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铜是那样臭，血是这样腥——
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
洗了的东西又不能不脏。
有耐性的人们理他不理？
替他们洗！替他们洗！

我洗得净悲哀底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底黑汗衣，
贪心底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干这种买卖惟独有唐人。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洗衣定规是一件容易事。
洗衣那里比得上造兵船？
洗衣匠们真个是没出息，
流了一身苦汗赚不了钱。
　你们肯干？你们肯干？

年年洗衣三百有六十日，
看不见了家乡又上不了坟。
你们还要笑我是洗衣匠，
你们还要骂我是支那人。
　好狠的心！好狠的心！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先生回国初期发表的这几首诗，引起了国内一些人的注意。一位化名“民治”者写了《三首爱国诗》，评论了《醒呀！》、《七子之歌》、《洗衣曲》。文中说：“新诗的含容大概不外：一、吻香的恋情诗；二、形而上的哲理诗；三、手枪炸弹的革命诗。我们现在所需求的是那一种诗，恋情的？哲理的？革命的？我们种种都要，我敢说，

不过新诗坛以往的成绩，有几多值得我们一读，读起来足以挑动读者内心的情感，有几多值得我们赞好，好来是读者心中所想登而潜隐未能发的呼声。自然，我不敢且不能抹杀有几位我所佩服的诗人与他们一些可诵的作品，然而在这最深刺激的一月里，我读了几首既不是恋情的，亦不是哲理的，亦不是革命的爱国诗之后，我相信新诗坛的生命更新了，新诗坛的前途另辟了，新诗坛发向它祖国的希望之光益强了。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是时代精神，而时代也就是文学作品的背景。闻一多君这三首诗表现了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但是也要有帝国主义者高压之下的中国，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至于诗人呢，他是得天独厚，能首先感着痛苦，首先热起情绪，首先擒得诗意，……把它们高唱出来。这三首诗是我个人所最爱读的。我更深切的愿我们大家——全中国的爱中国的中国人——都来把这几首诗畅读一回，深深印入记忆之膜里。"（《长虹月刊》，第2期）

七月十五日　大江会会刊《大江季刊》创刊，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发行人赵南公。"大江季刊"四字为梁实秋题写。先生在这期上发表了在美国写下的四首诗：《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洗衣曲》（目录上无《爱国的心》，又《洗衣曲》作《浣衣曲》）。

这一期还刊登了大江会会员宣传国家主义的作品，有何浩若的《中国之歧途与末路》、浦薛凤的《理性的国家主义》、沈有乾的《国家心理略说》、梁实秋的《诗人与国家主义》、《公理》（小说）、《文学里的爱国精神》（译文，英国德林克瓦特著）、陈石孚的《土耳其复兴史》、翟桓的《爱尔兰新芬运动与国家主义》、顾毓琇的《荆轲》（剧本）。

本期还登载有《发刊词》，阐明大江的国家主义及创刊之目的，对了解先生思想或有所助，兹录以参考：

> 大江会同人谨于发行本刊之始，正告国人：
>
> 我们是一个绝对信仰国家主义的一个结合，发行本刊的宗旨即在图谋国家主义在我中国之宣传与实施。
>
> 我们所认定要宣传与实施的国家主义乃："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人民谋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华人民谋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我们的详细的意见具见本会宣言，兹不赘述。）
>
>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将一面尽力反对一切的国家主义的障碍，例如侵略的帝国主义以及时髦的和平主义等；一面研究国家主义之实施的计划，例如恢复主权问题，巩固经济独立问题，发挥文化上的国民性问题等。
>
> 但我们所最要提倡的一件事，便是气节。我们所谓的气节即是为主义而

死，为国家而死，为正义而死的那种精神。我们认定，中国近来各方面之腐败，皆由于人民气节之不振。凡是热心爱国的人都该在言行上竭力提倡气节。本刊即是特别的注意此点。

我们发行这本杂志不是为少数人的言论机关，不是为营业的性质，我们本着我们的信仰将我们的一得之见贡献于国人之前。我们的信仰一日不移，我们的努力一日不断，我们的这本杂志的寿命便一日不断。

这是我们的宣传的第一声，这也是我们与读者相见的第一日。邦人君子，幸督教之。

七月二十五日　诗《我是中国人》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三期。收《闻一多诗集》。

是月　与赵太侔、余上沅、孙伏园共同草拟成《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后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二十三日的《晨报·剧刊》第十四、十五号。

大纲体现了先生等人关于建立艺术剧院的初步设想，它与普通的临时筹备的团体不同，与旧式的科班更有极大的差别，它是学习与演出兼顾、学校与剧院结合的一种新型的正规的组织形式，其目的在于振兴中国的戏剧文化事业，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大纲分五个部分，全文如下：

一　组织概略

（一）董事会

（二）院长　本院设院长一人总理本院事务，对外为本院代表。

（三）剧务部，本部设导演主任、艺术主任、文学主任、乐舞主任各一人，互选一人为本部主席。各主任职权如下：

甲　导演主任　派定演员，指导演习，并训练演员；

乙　艺术主任　规画图案，指导人员制造及安设布景，制造服饰，配置光影；

丙　文学主任　整理图书，介绍剧本，编制实录整理故实，并编辑刊物；

丁　乐舞主任　编辑乐谱，教练乐歌，并指挥舞蹈。

（四）事务部，本部设营业主任一人，推行营业计划，并指挥人员，处理营业上各项事务。

（五）评议会　本会由院长及剧务事务两部各主任组织之，其职权为：商决全院设施、聘用各项人员、选定公演剧本、规划营业方针，并编制预算决算。

（六）长期雇员

甲　事务部设文书、庶务、会计各一人；

乙　事务部又设司帐、司票、广告各一人，直隶于营业主任；

丙　剧务部设舞台管理员一人，及电师、储藏、布景各一人；

丁　剧务部又设制景、制装、制具各一人，直隶于艺术主任。

（七）剧团团员　演员及其他剧团团员，暂以六十人为额数，其权利及义务，另行厘定之。

附组织概略图表（从略）

二　剧场建筑

（一）经费的支配

甲　地基一万元；

乙　建筑十万元；

丙　设备四万元；

丁　准备金五万元。

（二）经费的筹集

甲　商股；

乙　政府补助（地基或经费）。

附注：建筑上以发挥本国的建筑艺术，兼采用西方机械的便利为主旨。座位以一千二百为额。舞台及其他场所，均依最新之办法而加以改良，各处布景及器具，均以保存本国之美术为主。

三　营业方法

于新剧外，暂时加办电影等项，以裕收入。

预算（按一年计算）：

（一）预备期内支出项下

1　演习所开办费（详见附表一）　二八〇〇元；

2　剧场租金　一五〇〇〇；

3　舞台临时设备（电器等）　八〇〇〇；

4　电影机　三〇〇〇；

5　影片租费　一〇〇〇〇；

6　音乐队　五〇〇〇；

7　演剧材料　四五〇〇；

8　印刷院报广告及剧券　四〇〇〇；

9　演习所房租（按每月八十元计算）　九六〇元；

10　演习所水电杂费　二〇四〇；

11　剧场电费　三六〇〇；
12　剧场杂费及夫役工资　四〇〇〇；
13　短期雇工　二五〇〇；
14　职员薪金(详见附表二)　一三〇八〇；
15　演员津贴　六〇〇〇；
16　招待费　八〇〇。
共计　八五二八〇元。
(二)预备期内收入项下
1　演剧一百次(以七成收入计算)　四六五〇〇元；
2　演电影二百五十次(五成计算)　四七五〇〇元。
共计　九四〇〇〇元。
收支相抵赢[盈]余　八七二〇元。
附注：随时加演旧剧等项之赢[盈]余不计。
附表一　演习所开办费支出表
1　房租(以八十元一月先付三份计算)　二四〇元；
2　修理　五〇〇；
3　装置电灯电话自来水　三〇〇；
4　家具及零件　一〇〇〇；
5　演剧材料　五〇〇；
6　杂费　二〇〇；
7　招待费　一〇〇；
8　印刷费　一六〇。
共计　二八〇〇元。
附表二　暂定职员薪金表(按月计算)
1　院长一人　一五〇元；
2　主任四人(每人一五〇元)　六〇〇；
3　文书一人　六〇；
4　庶务一人　六〇；
5　会计一人　六〇；
6　舞台管理员一人　六〇；
7　电工一人　二〇；
8　木工一人　二〇；

9　缝工一人　二〇；

10　差役四人(每人一〇元)　四〇。

共计　一〇九〇元。

附注：此系最低人数，于必要时尚须增加。

附表三　剧券价目表

甲　新剧

等　别	座　数	券　价	共　收
前排四座包厢	二十一厢八四	一　元	八四元
后排四座包厢	同八四	八角	六七元
甲等散座	三〇〇	八　角	二四〇元
乙等散座	三〇〇	六　角	一八〇元
丙等散座	二七〇	三角五	九四元

总共一千〇三十八座，应收券价六百六十五元如按七成计算，应收四百六十五元。

乙　电影

等　别	座　数	券　价	共　收
甲等厢座	八四	六　角	五〇元
乙等厢座	八四	五　角	四二元
甲等散座	五七〇	四　角	二二八元
乙等散座	三〇〇	二　角	六〇元

总共一千〇三十八座，应收券价三百八十元，如按五成计算，应收一百九十元。

附注：座数以香厂新明剧场为标准。

四　练习生功课(第一年)

(一) 图案科

1　背景及服饰　六；

2　绘画　五；

3　用器画　二；

4　美术概论　一；

5　手工　五；

6　戏剧概论　一；

7　体育　二；

8　选练　四；

9　公演　十。

共计　三十六单位

（二）表演科

1　声音表情　三；

2　姿态表情　三；

3　化装术　一；

4　表演　十；

5　舞蹈　二；

6　拳术　二；

7　乐歌　二；

8　戏剧概论　一；

9　选课　四；

10　公演　十。

共计　三十八单位

附注：选课分国文、英文、历史、戏剧文学四项，每项二单位。此外有关于思想学术之各种定期演讲，不计单位，但练习生须按期到场。

五　进行步骤

（一）创办时期

甲　期间　艺员演习所成立以前。

乙　事务　开始募款。至收得一万元时，即设立艺员演习所，开始租用新明剧场演电影。

（二）预备时期

甲　期间　演习所成立以后，至剧场建筑完全成之日止，定为一年。

乙　事务　向政府交涉补助。募集商股。继续开办电影。演习所艺员开始在租定剧场内公演。

（三）成立时期

甲　期间　剧场建筑完成，正式营业开始之后。

乙　事务　正式公演，并筹设外埠分院。

八月九日　参加新月社茶话会。十一日致闻家驷信云："我等已正式加入新月社，前日茶叙时遇见社员多人，中有汤尔和、林长民、丁在君（话间谈及舒天）[①]等人。此外则北大及北大外诸名教授大多皆社员也。"

新月社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徐志摩说它最初是一个聚餐会，从聚餐会中产生新月社，大家想集合起力量，自编戏自演剧，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黄子美、蹇季常、张君劢、丁文江、林长民等。他们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八日，为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演出过泰戈尔的戏剧《契玦腊》，主演林徽音、张歆海、徐志摩。后来，徐志摩搬到松树胡同七号，聚会的地点也改在这里。先生回国时，便想得到新月社同人的支持。七月里，徐志摩从欧洲回到北京，即与先生相见，搭桥人似为徐的妻弟张嘉铸。

八月十一日　致闻家驷信。收入《闻一多书信选集》。言及赴新月社午餐，并讨论建立艺术剧院等事：

> 徐志摩约今日午餐，并约有胡适之、陈通伯（即《现代评论》上署名西滢者）、张欣海、张仲述、丁西林、萧友梅、蒲伯英等在座，讨论剧院事。近得消息谓萧友梅（音乐家）与某法国人募得四十万资本，将在北京建筑剧园。故志摩招此会议，商议合作办法也。……新月社已正式通过援助我辈剧院之活动。徐志摩顷自欧洲归来，相见如故，且于戏剧深有兴趣，将来之大帮手也。

时，闻家驷欲来京投考北京大学旁听生，先生支持他不回震旦大学，希望他马上启程来京。

同日　致闻家骢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该信为从新月社返回后所写，谈到会上情形，及可能参加《晨报·副刊》工作，颇为兴奋，云：

> 顷自新月社归来，关于筹划剧院事已有结果。书此报告，以释悬念。□昨日到会者有徐志摩、胡适、张欣海、蒲伯英、邓以蛰、丁燮林、陈通伯以及萧友梅。萧君已筹得可靠款项二十万元，拟办一国民剧场。萧之专门为音乐，正缺艺术人员，故以得遇弟等为至幸。弟等所拟计划与彼等之计划大同小异，故今日双方皆愿合作。照此看来，剧场事业可庆成功矣。……北京《晨报》为国内学术界中最有势力之新闻纸，而《晨报》之《副镌》尤能转移一时之思想。《副

① 丁在君，即丁文江，闻亦齐（舒天）出国前曾协助他做过地质地理学史方面的工作，并为他写《徐霞客年谱》收集过资料。

镌》编辑事本由正张编辑刘勉己兼任。现该报拟另觅人专管《副镌》[①]，已与徐志摩接洽数次。徐已担任北大钟点，徐之友人不愿彼承办《晨副》，故徐有意将《晨副》事让弟办理，据徐云薪水总在二三百之间，大约至少总在百元以上。今日徐问弟"谋到饭碗否?"弟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后谈及《晨副》事，又向弟讲："一多，你来办罢!"弟因徐意当时还在犹夷，不便直接应诺。容稍迟请上沅或太侔向徐再提一提，想不致绝无希望也。刘勉己与弟已有来往，昨日来函约为特约投稿员，稿费每千字在二元以上。刘初次遇弟时，甚表敬意。刘亦属新月社。大约弟担任《副镌》，刘之方面亦不致有异议。

八月十四日 诗《狼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一二五〇号。收《死水》。从格律上及编入《死水》的顺序看，这首诗似写于美国。

八月十七日 译诗《沙漠里的星光》(劳伦斯·霍普 Laurence Hope 作)发表于《晨报·副刊》第一二五二号。收《闻一多诗集》。这首诗作于美国。

九月一日 年初因发生学潮而停办的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决定筹备恢复，筹备委员会主任为教育部专门司司长刘百昭。新月社同人中有人参与其事，先生八月十一日致闻家驷信曾云："今日席间又谈及北京美专事，同人皆谓极宜恢复，并由本社同人主持其事。故已议定上书章行严[②]，由林长民任疏通之责。"

由于这个缘故，先生被聘为美专筹备委员。《晨报》消息《美专筹备员将发表》中云："刘百昭日来正筹备恢复美专，所有筹备委员业经聘定，明后日即可发表。其名单如次：严智开、张仲述、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彭沛民、邓竞存、萧厔泉。筹备主任由刘百昭兼任。"(《晨报》，1925.9.2)

先生出任此职，是徐志摩热心推荐促成。梁实秋《谈闻一多》："当时的艺专校长是刘百昭，刘是章士钊的部下，初接校篆，急需一批新人帮忙，所以经志摩介绍，一拍即合。戏剧系主任本拟聘余上沅，后又因为安置赵太侔，上沅改任教授。他们加入艺专也是不得已，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第 64 至 65 页)

美专前身为北京美术学校，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为我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设中画、西画、图案三系。一九二二年六月改为美术专门学校。一九二五年一月末因学生反对临时政府教育部委派新校长到校，被强行解散。

九月七日 是日出版之《晨报》副刊《星期画报》第一号《闻一多写的徐志摩》中，刊登先生所作的徐志摩素描。该画右侧书有"徐志摩"三字，左下角署名

---

① 《晨报·副镌》原为孙伏园编辑，时孙伏园辞职，任北京《京报·副刊》编辑，故《晨报·副镌》正觅新人接办。

② 即章士钊，时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多"字。

九月十日　经教育部批准，美术专门学校更名为艺术学院。（据《美专改为艺术学院》，《晨报》1925.9.12）先生与严智开、彭沛民、萧友梅、邓以蛰、萧恳、冯曰、余上沅、谢阳、萧俊贤十人被函聘为筹备委员；另有六筹备委员为教育部部派，他们是社会司司长高步瀛、参事秦汾、专门司司长刘百昭、签事徐协贞、视学钱稻孙、签事刘元虁。（据《美专筹备委员共十六人》，《晨报》，1925.9.10）

九月十三日　教育部批准北京艺术学院增设剧曲、音乐二科。《艺术学院之预算》："教育此次改美专为艺术学院，原意只设图案、中国画、外国画三科。嗣以剧曲为陶冶德性之药石，关系风化至巨，音乐与剧曲有密切关系，亦当同时并设，遂决定增此二科。至该院经费，仍照以前美专预算，月支九千元。"（《晨报》，1925.9.14）

增设剧曲、音乐二科，是先生与余上沅多方奔走努力的结果。余上沅十一月十九日给欧阳予倩、洪深、汪仲贤信上说他们商量、筹划、接洽、辩论，结果总算不差，"乘恢复美专的机会，商量教育部添设了音乐、戏剧两系"。（《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13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剧曲科的增设，在中国现代戏剧事业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说："这是我国视为卑鄙不堪之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的第一朝。"

九月十四日　上午十时，赴前京畿道原美专学校，出席北京艺术学院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会上讨论了学校名称、组织大纲、学科设置、处理旧生方法诸事。先生赞成改校名为"艺术专门学校"。同人推先生与刘百昭、余上沅、严智开、彭沛民、萧友梅、萧俊贤共七人为组织大纲起草员。（据《艺术专门学校之筹备》，《晨报》，1925.9.15）

九月十五日　上午九时，参加艺专筹备委员会议，讨论组织大纲及编定预算。（据《艺专第二次筹备会》，《晨报》1925.9.16）

九月十六日　上午十时，先生等艺术专门学校筹备委员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大纲。情形见《艺专第三次筹备会》："刘百昭主席，各筹备员比将所拟之大纲草稿提出，均逐条通过。兹志其概略如下：第一章，名称，'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第二章，宗旨，'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第三章，学制，'五系'。第四章，行政组织，'校长、教务长、事务长、各系主任、教授、讲师、助教、事务员'。第五章，评议会。第六章，校务会议。第七章，教务会议。第八章，事务会议。第九章，委员会。第十章，附则。以上共十章，三十条。通过后，刘百昭即嘱各筹备员切实开列预算，编订课程，以便提出大会讨论。"（《晨报》，1925.9.17）

九月十七日　上午九时，出席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第四次筹备委员会议。到会者十四人，一致通过先生等昨日草拟的组织大纲。又，众人复提出节省开支、教员

上课规则、处置旧生办法等问题。(据《艺专第四次筹备会》,《晨报》,1925.9.18)

九月十九日 诗《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一期,收《死水》。《叫卖歌》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第一二七五号。收《闻一多诗集》。

同日 上午九时,出席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第五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对组织大纲第四条之"本校各系收受四年制之中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录取学生,以其入学试验之成绩定之",修改为"本校各系收受中等学校毕业生,录取学生时,以入学试验定之"。关于预算问题,为节省开支,决定本校专任教授限三十一二人,每人担任十二钟点,每月支二百二十元,所有校中重要职务均由教授兼任,不另支薪。校长薪金由三百元减为二百六十元。事务员以二十人为限。通习各科,均合班教授。全年预算总计十六万余元。关于处理旧生办法,凡持有教育部所发给的前美专修业证书者,可免受入学试验,但须受编级试验。(据《艺专昨开五次筹备会》,《晨报》,1925.9.20)

九月二十二日 诗《末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第一二七七号。收《死水》。

九月二十四日 上午九时,出席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第六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关于预算问题,刘百昭说教育总长章士钊并未提交阁议,意为教职员薪金仍按部章办理,无须削减;又说章士钊主张音乐、戏剧两系徐图进行。筹备委员对此意见不一,邓以蛰力主五科并设,表决时多数赞同。次议校长问题,刘百昭谓教育部派自己兼任校长,而本人非艺术出身,又兼部职,加之预算狭隘,有辞退之意,经徐协贞、萧友梅力劝,旋决定一致函请教育部迅发命令,派刘百昭为校长。(据《艺专第六次筹备会》,《晨报》,1925.9.25)

九月二十八日 北京政府正式任命刘百昭为北京艺术专门美校校长。刘遂约先生等讨论开办经费及人事安排,决定减用助手事务员,十月份教职员薪金扣五折,作为开办费用。(据《艺专校长今日就职》,《晨报》,1925.9.29)

九月二十九日 出席刘百昭就职仪式。刘拟聘先生为教务主任。(据《刘百昭昨就艺专校长》,《晨报》,1925.9.30)

十月一日 徐志摩正式接办《晨报·副刊》,除约赵元任、梁启超、张奚若、金岳霖、傅斯年、罗家伦等帮忙外,还"特请姚茫父、余樾园先生谈中国美术,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诸先生谈西洋艺术,余上沅、赵太侔先生谈戏剧,闻一多先生谈文学,翁文灏、任叔永诸先生专撰科学的论文,萧友梅、赵元任先生谈西洋音乐"。(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第1期,1925.10.1)

十月五日 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名拟去"北京"二字,改称"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以便今后在上海、武汉设立分校。刘百昭正式聘先生为教务长,并约定为考试委员会委员。其余职员为事务长程振基、中国画系主任萧俊贤、剧曲系主任余上沅

(后改赵太侔)、音乐系主任萧友梅、西洋画系主任彭沛民。(据《艺专各项职员聘定》,《晨报》,1925.10.5)

时,图案画系主任空缺,刘百昭约先生至严智开宅,力劝同舟共济。(据《艺专约严智开充任主任》,《晨报》,1925.10.6)

同日　《纳履歌》发表于《晨报·副刊》第一二八四号。收《闻一多诗集》。

十月六日　早,与刘百昭、程振基再至严智开家,严遂允就任图案画系主任。又彭沛民辞西洋画系主任,刘百昭专电上海,聘徐悲鸿充任,"在徐未到校以前,所有西洋画系主任职务,由教务长闻一多兼代"。(《艺专校务之进行》,《晨报》,1925.10.7)

十月七日　为美专旧生开辟教室,以便先行温课。又拟招考戏剧系学生说明书。《艺专收容旧生》:美专旧生已缴学费者,"均要求先行在校温习,以免在外浪费时光。刘百昭、闻一多、程振基会商结果,遂予应允,当即腾出两教室,以便该生等温习功课。……闻一多拟有招考戏剧系说明书及概略,颇属详明,昨已提出"。(《晨报》,1925.10.8)

十月八日　与刘百昭、程振基开会商议聘定教员规程和学生入学规则。《艺专各项规程已拟定》:"艺术专校,昨日报名学生约有六十余人,三日统计,共约三百余人。昨日下午二时,该校校长刘百昭,及事务长程振基、教务长闻一多,特开会议,讨论聘定教员规程,及入学规则。闻聘定教员规程内容,分教授、讲师、助教三种,聘请时应由校长斟酌科目,并审查其社会上之声望。普通科目(英文汉文),每钟三元至四元。教授每周授课十二时至十八时,月薪二百二十元。教员满三年退职,加送薪水两月;满五年中途退职,加送薪水三月。至学则内容,分为九章:一,入学;二,学历;三,必修科与选修科;四,毕业修业年限;五,考试与成绩;六,修学及退学;七,学费及其他各费;八,奖励;九,附则。以上均系草案,闻一二日内即可议定呈部,核准公布。"(《晨报》,1925.10.9)

十月九日　《大江会宣言》开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十四卷第五号,分四期载完。这是先生等人发起之大江会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主要起草者为罗隆基、何浩若,先生亦参加了意见。

宣言定稿于六月一日,共分四章:一即本篇;二中国目前变乱之原因;三大江的国家主义;四大江的宗旨。第一章述帝国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区别,第二章分析中国被列强奴役的诸种因素,第三章阐明大江会信奉的国家主义之真谛,第四章指出大江会的奋斗目标。《清华周刊》刊载时加有编者按,中云:"大江会乃清华留美同学罗隆基、吴景超、闻一多诸人所组织。其目的在本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并反对外国化及教会教育,颇与清华近来校风之趋势相符。兹

接到吴景超君寄来该会宣言共四章，……其所言，颇足以唤醒国人，并指示青年救国运动之方向，爰亟为转载，以饷读者。”

宣言认为“近代国际史，乃帝国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互相冲突之历史，而近三百年来，此项冲突更已达最剧烈最惨酷之程度”。“任何国家，其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任何国家，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中国今日则以缺乏国家思想之故已陷于日暮途穷之境”。宣言论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诸方面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摧残，讲到文化方面时，云：“文化乃国家之精神团结力也，文化摧残则国家灭亡矣，故求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即国家生命之保存及发扬也。”

十月十一日 前美专旧生请求转入戏剧系者甚多，先生“允俟经过教务会议再行答复”。（《美专旧生多改习戏剧》，《晨报》，1925.10.12）

十月十五日 上午十时，出席艺术专门学校考试委员会会议，决定先生与彭沛民负责西洋画系招考工作。（据《艺专昨开考试委员会》，《晨报》，1925.10.16）该系招生考试于二十三日进行，考试内容为六个“不行”的表情。十二月十一日，又续考戏剧系新生。

是月 此时或稍前，被北京民国大学校长聘为教授。（《附录本校十四年度现任教员一览表》，《北京民国大学十周年纪念册》，第10页，1925年11月出版）先生项下“教授功课”栏缺空，“京寓”栏下为“辟才胡同内梯子胡同一号”。同时被聘请到该校的还有赵太侔。时，邓以蛰（叔存）、周炳琳（枚荪）、林和民（以德）、周作仁（濯生）、龚德柏、戴修瓒（君亮）、邱椿（大年）等，均在该校任教。北京民国大学校长雷殷，原名恺泽，号惠南，广西人，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参与促进广西独立，为广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雷殷参与讨袁被通缉，遂改名雷殷，避难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一九二二年出席国会，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并应民国大学校长江天铎之邀，任该校教务长，后任校长。

十一月二日 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教育总长章士钊到会并致词。刘百昭、傅增湘、陈宝泉、马君武、严智开、查良钊、陈延龄等代表各方演说。会后来宾与全校师生合影。（据《艺专昨日举行开学典礼》，《晨报》，1925.11.3）

先生到艺专任职，是一生服务于教育的开始。在艺专，先生教授过美术史。安娥《哭忆闻一多师》：“那天上美术史课的时候，一位年轻的教授穿着长褂子，挟着几本书来了。他一声没有响，坐下来就讲他的书。似乎不是所想象的唯美诗人闻一多，他健康，浓眉，密发，锐亮的眼睛，高鼻子，微黑带赤的面色，讲书的时候，不管学生，声音低而沉静。”（《月刊》第2卷第2期，1946.9.20）

十一月五日　参与发起成立“关税自主促成会”。自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与其订立协议税则后，中国关税便操于列强之手，受其盘剥极重。为修改税则，段祺瑞执政府派员与英、美、法、日、意、比、瑞典、葡、荷、丹、挪威、西班牙等国代表，于上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关税特别会议。北京及全国民众，纷纷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力争关税自主，制定国税，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先生力持此主张，与北京各大学教授马君武、胡敦复、蒋梦麟、朱我农、张贻惠、曹云祥、雷殷、张歆海、查良钊、雷国能、童庄、马寅初、陈翰笙、严智开、顾淑型、周炳琳、顾孟余、高仁山、梁龙、叶企孙、汪懋祖、袁嗣庄、冯农、钱端升、陶孟和、王桐龄、袁同礼、周鲠生、林和民、向哲濬、张杰民、屠孝实、胡仁源、江庸、卫挺生、保君健、张耀翔、马洗凡、陶昌善、董成褰、林玉堂、赵迺抟、杨肇燫、杜作梁、谭熙鸿、杨肇熀、瞿国眷、萧纯锦、徐辅德、朱友渔、马名海，共五十二人，联名发起“关税自主促成会”。（据《关税自主促成会今日开会》，《晨报》，1925.11.6）是日下午三时，关税自主促成会在欧美同学会开会，讨论宣言及进行办法。

同日　主持艺专教务与事务联合会议，讨论学分、开课诸问题。时，“因校外要求投考戏剧系者纷至沓来”，决定九日上午补考一次。（据《艺专经费照旧预算》，《晨报》，1925.11.6）

十一月十五日　《大江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出版。发表先生在美国所作的《七子之歌》、《南海之神》两首诗。均收入《闻一多诗集》。

《南海之神》副标题为《中山先生颂》，是对孙中山先生的赞歌，但大江会对孙中山的某些做法曾持有异议，所以《大江季刊》“编辑余谈”中特作说明：“孙中山先生之死是我国近来一件最不幸的事。中山先生的主张与政策有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所同意的，他的事业之成败，他的手段之优劣，容或有商量之余地，但他的人格之伟大，其革命精神之可佩，则无论何人皆无异辞者也。中山先生噩耗传来，我们在海外旅居，倍觉震惊，我们以为在现今中国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继续中山先生的位置，虽然人人都该立志努力完成中山先生的事业。本期季刊特登闻一多君之《南海之神》长诗一首，该诗除有其自身之价值外，盖亦足略示我们对中山先生之态度。”

这期《大江季刊》除发表有《大江会宣言》，还刊登了潘光旦的《近代种族主义史略》、胡毅的《北美排华略史》、何浩若的《只要此心不死我们终有一日》、顾毓琇的《项羽》（剧本）、瞿世英的《近来美国哲学之趋势》（通信）、梁实秋的《文学里的爱国主义》（译著，续）、吴文藻的《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之分类目录》等。又有《大江会章程》、《大江会细则》和《大江会会员一览表》。章程规定大江会宗旨为：“本大江的

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对“大江的国家主义”定义释作：“乃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细则第二十条规定入会誓词为：“我誓以我的名誉为誓，愿绝对实践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章程、细则，服从多数，为中华民国牺牲一切。此誓。”

据《大江会会员一览表》，时有会员二十九人，除先生外，还有王化成、孔繁祁、何浩若、吴文藻、沈有乾、沈宗濂、吴景超、吴泽霖、沈镇南、胡毅、胡竟铭、徐宗涑、时昭瀛、梁实秋、浦薛凤、陈钦仁、陈华寅、张继忠、黄荫普、翟桓、熊祖同、蔡公椿、潘光旦、刘聪强、薛祖康、魏毓贤、罗隆基、顾毓琇，均为清华学校一九二一级至一九二四级赴美留学生。

十一月十七日 午后，主持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第一次教务会议。“到会者有各系主任，当经议决选科学生章程。按此项章程，系遵照组织而定，与他校旁听学生章程同”，即“凡本校各系如遇有空额时，可收选科生，但须试验其听讲能力。至其征收方法，则分二项：一，理论功课，每年每一小时纳费二元；二，实习功课，每年每小时纳费三元。惟此项学生不得称为本校正科学生，并不得请领津贴且无住寄宿舍之权利”。（《艺专昨开教务会议》，《晨报》，1925.11.18）

十一月十九日 余上沅写信给上海的欧阳予倩、洪深、汪仲贤，信中说到“北京艺术剧院”进行艰难：“我和太侔、一多，撞了无数的木钟，结果依然是有心的无力，有力的无心，……实现之期，也不知在哪一年了！”又说艺专所增添的音乐、戏剧两系，“限于经费，目下仍是一筹莫展。……社会的帮助难有希望，政府的帮助更难有希望，我们真要作楚囚之对泣了！”（《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136页）

是月中旬 罗隆基作为美国华侨商学代表回国报告美民间瀑州会议详情，住在先生家。

十二月一日 诗《秦始皇帝》、《抱怨》发表于《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收《闻一多诗集》。

十二月七日 当选为艺专评议员。（据《艺术旬刊将出版》，《晨报》，1925.12.8）

十二月十三日 晚，与罗隆基代表大江会参加发起筹备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

时，留学生组织之国家主义团体逐渐增多，如留欧者有醒狮社，留美者有大江会、大神州会等，“皆各自研究，各自宣传，尚乏一联合机关。近由欧美陆续回国现在北京者，有醒狮社之李璜，大江会之罗隆基、闻一多，大神州会之邱椿、李光忠、张杰民、钟相青、余上沅等”。是晚，三团体开会“讨论联合办法，当即邀齐国魂社及少年自强社两团体，合组‘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会商结果，决定“二十日下午

一时在北大第三院开成立大会”。(《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将成立》,《晨报》,1925.12.15)

李璜在《学钝室回忆录》中记述先生参加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情形:“我于民十四之秋到北京后,一多时在国立艺专任教职,他是看见《醒狮周报》登出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发起广告,而同着余上沅找上我的门来的。他一见我,说明代表美国同学主张国家主义者所成立的大江会,特来参加联合会后,而慷慨激昂的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样干法?’我答:‘先行团结爱国分子,大家商量着干罢。’他说:‘好!’停一下,他又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我看老兄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罢!’我笑道:‘花脸就让你来唱罢!如何?’”(第134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1日出版)

这天开会的情况,施真在《纪念闻一多先生》一文中也有所记述:“那天晚上的会面,是同在一起开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筹备会,所有到会的分子,有教授、有学生,约四五十人之多,都是各个国家主义团体的代表,如李璜先生是代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常燕生先生是代表醒狮社的,闻一多先生及邱大年、余上沅、罗隆基诸先生是代表大江社和大神州社的,靳宗岳先生是代表新国家杂志的,笔者和姜蕴刚、林德懿诸先生,则是代表国魂社和救国团的。在这一次的筹备会里,就决定在北京成立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之一切步骤和办法,于一个礼拜之后,即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开正式成立大会。”[①](《青年生活》第3期,1946.8.1)

此后,先生与李璜常有往来。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云:“我同邱大年时时去访他,但是他总是在写白话诗或画西画,一见我们进去,赶快遮盖起来。后来,往还熟了,大年爱与他说笑话,见着他把画遮盖上,便大叫道:‘又在画春宫呀!’一多并不常来闲谈,但我每次通知开会,他必如时到来,并喜发表他的意见,且对他所编的《大江季刊》推销甚力。我嘱青年党大学生同志们为之宣传并代销多份,他大为高兴。”(第134页)

先生热衷国家主义,有人不理解,他曾对彭基相说:我“是因在国外受了极大刺激”,所以才鼓吹“中国魂”。(彭基相《巴黎通信》,《时事新报》1927.9.7)

十二月二十日　下午一时,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先生与千余人到会。会场及三院门口搭有五彩牌坊,并出售关于国家主义的各种出版物。主席谢循初宣告开会,清华学校学生铜乐队奏国乐,向国旗行三鞠躬礼。谢循初、李璜、罗隆基、燕树棠等讲演。

---

① 该文所记时间为1926年2月,误。

先生这时对"大江的国家主义"寄以很大希望。施真在《纪念闻一多先生》中说:"闻先生对于这一个运动是很诚挚而热情的,因是给与笔者和当时我们一般从事国家主义运动之学生同志的印象极好极深,一致敬佩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导师,是一个热忱的国家主义者。"(《青年生活》第3期,1946.8.1)

附:《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缘起》

三百年来国际间争斗之历史,已讲明"适者生存"为确切不移之公例。美洲红人已有灭种之势,非洲黑人永陷奴隶之域,而亚洲之中华民族又将随安南缅甸而沉沦于万劫不复之境。

红人黑人曷由败亡,安南缅甸何以复灭,盖彼数民族者,惟具一同种之信念,或竟此信念亦无之。既缺国家思想,又乏团结能力,自相残杀,以招外侮,故终以速败亡覆灭之祸。反之,能御侮图存者,不惟洞察民族之生存,有至当不可移易之理由,亦且深知"国家的人格",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意义。本此原则,团结全民,以与帝国侵略主义相抵抗,于是有十九世纪欧洲弱国对强国之奋争,如德意志、意大利中兴之往事,其特著者也。准此,吾人遂得一公例:"任何民族,其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为强者所歼灭。换言之,任何国家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国家主义非他,即一国人民本过去共生共荣之历史,怀永久自存自救之决心,一国主权不容外人侵占,一国之经济不容外人夺取,一国之文化不容外人干犯,有侵占之、夺取之、干犯之者,必团结全国人民,出死力以抵抗。"吾辈今日之国家主义,即本此原则,对于以武力、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中国者,为不断的奋斗,以谋我中华领土之完全,恢复中华政治之自由发展,中华经济之自由抉择,中华文化之自由演进。八十年来彼帝国主义之侵略我国,已使我河山破碎,脂膏涸竭,乃举目国中,民气消沉如故,是非淆混如故,无舆论,无信守,私利是图,私愤是逞,甚或助卖国求荣之官僚,拥兵殃民之军阀,以为泥中之战斗,举国之人民谁复以中华前途为念者。言念及此,乃益信今日中国国家主义之提倡与实践,刻不容缓矣。我辈国家主义之志愿,在先求促进中国人民之国家观念,而知尊重国民人格,视媚外为奇耻,目卖国为极恶。我辈之志愿,尤在养成中华人民为牺牲气节,咸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国家的荣辱为荣辱。对于拥兵夺地,卖国殃民之军阀官僚,群起而扑灭之,对于以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吾人之强邻,群起而抗拒之,以图建设中华民国真正全民福利的政治。故吾辈国家主义者之口号,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内不妥协,外不亲善;全民革命,全民政治。"虽然国内外之恶势力,方且日滋月长,欲图廓清,以为吾中华民国建设独立自由之基础,实现全民福利之政治,势非我辈绝对信仰国家主义者,同心协力一致奋斗不为功。因此我辈欧美留学界之国家主义各团体,与国内国家

主义各团体，特推诚布公，互相联合，本不屈不挠之意志，为群策群力之合作，以冀成艰难之业。爱国同志，曷兴乎来！（《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晨报》，1925.12.20）

十二月二十七日　报载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办公处设于先生与余上沅之住所，并拟在这里附设“国家主义研究会”及小图书馆。《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筹设图书馆》：“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自本月二十日正式成立以来，积极进行，不遗余力。现内部组织已大体就绪，其办公处暂设于西城二龙坑梯子胡同一号，并附设‘国家主义研究会’。又闻该会分子以醒狮社现已向巴黎先声社索取法德文之各种国家主义书籍，大江会大神州社决向美国方面搜集英美之各种国家主义书籍外，并搜集国内外之各种出版物，陈列该会办公处，以便研究国家主义者之参考，拟于最短期内，促成一国家主义之小图书馆。”（《晨报》，1925.12.27）

是年　在徐志摩寓所松树胡同七号为梁启超画像。时，刘海粟为《晨报副镌》撰稿人，在徐志摩寓所松树胡同七号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见到先生和梁启超、王梦白、姚茫父、胡适等。刘海粟在《忆梁启超先生》中说：一次聚会后，见先生为梁启超画像：“这种聚会，次数很多，有一次我看到当时的青年诗人闻一多在给梁先生画速写像，他的画线条很厚实，奔放中有法度，后来才知道他会刻印，所以下笔不俗。这张像画得很成功，眼睛很传神，圆阔的前额显示出智慧。”（吴其昌《梁启超传·附录》，第17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一九二六年　二十八岁

年初，张作霖、吴佩孚联合攻打冯玉祥。

三月十八日，三一八惨案发生。

四月，冯玉祥战败，退往西北，直系、奉系军阀再度夺取北京政权。张作霖下令逮捕《京报》创办人邵飘萍，二十六日，邵飘萍遭杀害。

六月五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

十月十日，革命军攻克武昌，十一月，攻占九江、南昌。

是年，顾颉刚编辑出版《古史辨》第一册，"古史辨派"由此得名。

是年初　迁居西京畿道三十四号。这里距艺专只隔半条街，西与北闹市口相接。房东是旗人，姓惠。这是所四合院，门上刻有一幅字体很大的楷书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先生住在三间宽敞的北房，一间当会客室，一间为卧室，中间是堂屋。（据闻先艾给编者的信，1988.6.23）时，把妻子和小女都接来，家庭生活差强人意。先生有首诗《瑛儿》（今佚），大约就是这时写女儿的。

搬到这里，先生精心布置装饰了一间别具特色的书房，四壁贴满了黑纸。朱湘《闻一多与〈死水〉》："在北京住房一觅妥了，头一件事，当然，是布置。书斋与客厅，他说，要敷粘上无光的黑纸在四壁。壁楣上，他说，要用汉代的石壁浮雕之内的车马，制成一种图案，绘在金纸上，连骈的敷粘起来。探问了多少的南纸铺，合宜的纸张算是找到了。至于绘制图案，我当场看见的，他提起笔来便成功了。"（《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7.7.1）闻先艾《忆闻一多同志》亦云："他的那间书房，凡是到过的人都记得很清楚，完全用黑纸裱糊，诗人仿武梁祠画像，细笔勾勒了一些人物、车马的图形，在高悬的电灯照耀之下，显得格外神秘、阴森；当然也别具一种艺术风格。"（《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28页）

徐志摩在《晨报·诗镌》第一期的《诗刊弁言》中，也特别介绍了这间屋子的装饰："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

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薇纳丝一类的雕像。他的那个也够尺外高，石色黄澄澄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黑的背景，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看了叫人想起一片倦阳中的荒芜的草原，有几条牛尾几个羊头在草丛中掉动。这是他的客室。那边一间是他做工的屋子，基角上支着画架，壁上挂着几幅油色不曾干的画。屋子极小，但你在屋里觉不出你的身子大；带金圈上的黑公主有些杀伐气，但她不至于吓瘪你的灵性；裸体的女神（她屈着一支腿挽着往下沉的衮衣），免不了几分引诱性，但她决不容许你逾分的妄想。白天有太阳进来，黑壁上也沾着光；晚快黑影进来，屋子里仿佛有梅斐士滔佛利士的踪迹；夜间黑影与灯光交斗，幻出种种不成形的怪象。这是一多手造的阿房，确是一个别有气象的所在，不比我们单知道买花样纸糊墙，买花席子铺地，买洋式木器填屋子的乡蠢。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象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难怪一多家里见天有那些诗人去团聚——我羡慕他！”

先生的家是一般青年诗人聚会的场所。沈从文《谈朗诵诗》中说：“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已有过，成绩如何我不知道。较后的试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晨报社要办个诗刊，当时北京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枬诸先生。为办诗刊，大家齐集在闻先生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但很高兴，而且很认真。结果所得经验是，凡看过的诗，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明白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凡不曾看过的诗，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难望明白它的坏处。闻先生的《死水》、《卖樱桃老头儿》、《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朱湘的《采莲曲》，刘梦苇的《轨道行》，以及徐志摩的许多诗篇，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试验中写成的[①]。这个试验既成就了一个原则，因此当时的作品，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给形式和词藻都留下一点地位。对文学革命言，似显得稍稍有点走回头路。”（《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49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刘梦苇在《中国诗底昨今明》中也说：“新诗经了这几年的摸索，渐渐地到了光明的路上来了。……凡留心诗坛的人，大概都读到了徐志摩、闻一多、于赓虞、蹇先艾、朱湘诸先生底近作罢。他们彼此或者认识或者还是陌生，但他们无形中走上了很近似的路。他们之中，有的我还没有见面，但见过的如闻一多、朱湘诸先生，有一次我们在适存中学教课，大家谈到对于新诗的许多意见，不期而同的地方很多，

① 据梁实秋《谈闻一多》，《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诗写于美国珂泉，不在此时。

闻一多先生说中国诗似乎已经上了正轨，与我有同样的感觉。"(《晨报附刊》第1409号，1925.12.12)

在这里，先生也没有忘记作画。朱湘在《闻一多与〈死水〉》中说："当时，他又预备由屈原、杜甫、陆游的诗歌内，拣选出三个作意来，制成三幅图画。陆游的一幅是绘成了。"(《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7.7.1)

一月四日 余上沅致欧阳予倩信中说到与先生等为艺专戏剧系筹购教学用具等事，云："艺专经费支绌，半年快过去了，设备几乎是一点没有。学生呢，现在只剩下二十名，而其中又有几个没有多大的希望。长此以往，前途真不堪设想。我同一多、太侔商议过好几次：第一，我们非要学校先拿一笔款购买舞台用灯不可；第二，我们须于春季始业招考插班生(我们尤其要收女生，目下只有女生三人，不够得很)。"(《余上沅戏剧论文集》，第137页)

是月中上旬 出席艺专评议会会议。会上，校长刘百昭表示辞职。(据《艺专之校长问题》，《晨报》1926.1.17) 时，政局发生变动，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务院改组，免章士钊教育总长职，以易培基继之(未就)。是年一月十二日，免刘百昭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职，以陈延龄继之。由此，艺专校长亦有发生连带问题之势。

一月十六日 北京国立九校教职员大举索薪。此前政府曾阁议教育经费一百五十万元，但只发五十万元，各校欠薪严重，自去年十月以来，便多次出现索薪活动。在这时期的索薪活动中，先生也曾代表艺专赴教育部，在那里见到鲁迅一面。

晚七时半，艺专同乐会举行第一次例会，会上有器乐合奏、独唱、皮黄、灯谜等，先生表演游戏笔墨。(据《艺专之校长问题》，《晨报》1926.1.17)

一月十八日 出席艺专教职员会议，到者四十余人。刘百昭报告开会宗旨四项，议决与国立各校为欠薪事一致停课等三项。刘百昭因经费竭蹶，再次辞职，杨祖锡、萧俊贤(厚泉)等教授主张挽留。(据《艺专之教职员会议》，《晨报》1926.1.20)

一月二十日 教育部拟聘林风眠为艺专校长，次日又拟派萧俊贤或陈延龄在林风眠未到任前兼代校长。此事引起先生及艺专一些同人异议，认为陈延龄身为教育部专门司司长，有部员干涉教育之嫌。

一月二十一日 晚，出席艺专教职员会议，讨论新校长问题。会上推先生等四人赴教育部质询。(据《艺专代表质问教育当局》，《晨报》1926.1.23)

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四时，先生与萧友梅、程振基、赵太侔四人赴教育部询问艺专校长问题，由教育部次长陈任中接见。先生等问林风眠接任校长是否属实？

又认为:“艺专秩序甚佳,殊无部员代为维持之必要。且教部之不能维持学校秩序,早成事实,此次若有部员到校,更足以引起纠纷。”并云:“万一刘校长辞职,则同人认为继任人选,总以资望较高,对于艺术深有兴味,且与前美专风潮无关系者为宜。”(《艺专代表质问教育当局》,《晨报》1926.1.23) 先生等又旋即询问教育部专门司司长陈延龄。

一月二十三日　致梁实秋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说:“回国后仅仅作了两首诗,到艺专来后,文艺整个放在脑袋后边去了。”又说:“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①]为最密,次之则邓以蛰、赵太侔、杨振声等。”谈到艺专校长问题,说:“我近来懊丧极了。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事业,现在骑虎难下真叫我为难。现在为校长问题学校不免有风潮。刘百昭的一派私人主张挽留他,我与太侔及萧友梅等主张欢迎蔡孑民先生,学校教职员已分为两派。如果蔡来可成事实,我认为他是可以合作的。此外无论何人来,我定要引退的。今于报载我要当校长,这更是笑话。‘富贵于我如浮云!’我只好这样叹一声。”

信中又说到“大江”的事,说“国家主义的同志中有一般人也常到我家里开会”。时,先生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有极大之误解,以为唯国家主义方能救国,而把共产主义视为国家主义之主要障碍与对手,称两者“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因此,“切望同志快回来共同奋斗”。信中云:

> 大江命我做的事我虽自揣能力不够,但仍是不敢辞让。我只望在美同人多帮一点忙,不要使我一人蹈于呼吁无门的境地,那便是《季刊》[②]的幸事。
>
> 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醒狮社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只能鼓吹主义,恐怕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此点李璜等亦颇承认,故努生在京时,彼等极为敬视。在努生未归之先,我希望浩若要快回来。我包管他回来了有极有兴味的事可做。

先生称李璜“乃一书生”,但梁实秋《谈闻一多》则说先生“实则对他颇为敬重,曾对我说起李璜,誉为光风霁月国士无双”。(第 68 页)

---

① “四子”,即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刘梦苇,他们与余上沅、陈石孚仍住在梯子胡同,距先生家极近。又,清华当时亦有“四子”之称,为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孙大雨(子潜)。

② 指《大江季刊》。

同日 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开会讨论日俄出兵东三省问题，并决定发表宣言，表示反对。时，国民军与奉军战起，郭松龄倒戈，与冯玉祥联合反对张作霖。日本暗中支持张作霖，苏联则断绝中东铁路，以阻止张作霖援军南下。日本乘机散布苏联准备调动军队的消息。消息传开，北京掀起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浪潮，先生亦持这种主张，并积极参与活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一多来与我商量召开'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由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发起。我认为反日则共党无所谓，反俄则必来捣乱，应事前秘密妥为筹备。但一多不耐妥慎办法，而便自行在北大第三院与艺专学生会的牌告上，去贴出'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筹备会'等字样。"（第 126 页）

附：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反对日俄出兵宣言》

欧战停了，饿虎似的列强，都掉转眼光，同时要来取偿于地大物博的我国。我国不但早便藩篱尽撤，而且卖国的军阀官僚为争私利，不惜假借外力，引狼入室。自从列强勾结上了这一般国贼，十年来我国的内乱便愈来愈不可收拾了！列强与军阀在背后愈结愈深，则军阀便与军阀愈争愈烈。最近国奉的战争，帝国主义的日俄——可怕的东邻西邻——公然亲自出马加入战争。一个明白的派兵几旅，帮助□□[①]的军阀，把他在危亡中救了出来，一个秘密的调兵，帮助□□[②]的军阀，极力阻害前者的前进。看看暗斗，成为明争，内争加上外争，转瞬间便要见东三省及其西边的地方，随着外蒙南满，显然的非中国所有了。这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几年来，帝国主义的列强，虽说随时在收买军阀，煽动内争，但总是秘密着帮助些金钱与炮火罢了，不像这回日俄两国如此明张旗鼓，目无我国家，目无我国人。一月以来，东三省的警报，雪片似的飞来，不说是日兵如何的活动，便是说俄人如何的凶横。日本既以重兵干涉内争，俄人既以强力侵我路权，已经令人忍无可忍。而这两个赤裸裸的强盗国家，还□次恶言怒语警告北京政府，——前日俄使的照会竟用宣战的口调——这是口口声声言两国亲善，言平等待遇所应当具有的态度吗？爱国同胞们，我们国家的体面何存，我们的国权扫地尽了！但祸还不只此，帝国主义的日俄还在极力煽动，极力各助一方军阀，因此连日中海关的风云又紧急起来，我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又岌岌不可保了。

日俄的野心，不暂时收拾起来，这回北方以至全国的乱祸，不知道要蔓延到几时！我们如果要根本的制止这回的战祸，我们该当表示民意，使日俄有一个戒心，因此我们慎重的提议三点：

---

①② 原文如此。此处当一指奉系军阀，一指冯玉祥之国民军。

一、国民全体起来，要日使芳泽俄使加拉罕电告他的本国政府，速戢野心，不得干涉中国内乱，不得恣意威吓我们，如再不改悔，我们国民不能再忍，便要请强盗的使臣立刻出境。

二、国民全体起来，向亲日俄的军阀官僚，以至为虎作伥的中国共产党人，加以警告，如果还是只知私利，一味丧心，倒行逆施的这样长远做下去，而无悔过的意思，我们国民誓以非常手段来对付。

三、用全体国民的名义通告世界各国，将这回日俄干涉我内争，侵犯我主权的事实详细的说明，使世界各国了然日俄的野心，不要被他口头亲善、口头平等者一手掩尽了天下人耳目。

亲爱的同胞们，这回日俄举动的意义，不是比五卅英人举动的意义轻，这是侵略我者第一次明张旗鼓加入我国的内争，这个旗鼓鲜明，更将引起境内的国际战争。我们同胞将要到这样的情景之下，不愿作走狗，便是成池鱼，不愿作卖国权，也是当亡国民！

爱国同胞们，请注意日俄举动的意义，请速起警告大小诸国贼与东西两强邻。（《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之反对日俄出兵宣言》，《晨报》，1926.1.24）

一月二十七日　艺专学生会举行投票选举校长，选出得票较多者林风眠、蔡元培、萧俊贤、彭沛民和李石曾五人，呈请教育部，请于其中一人委以校长。先生得票二十，不及总数五分之一。

这次艺专风潮，在于政局变动后，“教部去刘（百昭）之意早决，一因章士钊关系，一因现任某司长亦思重长艺专”，“学生累次宣言继任校长须与前美专风潮无关者，即专对某司长而发”，“教职员中颇有主张蔡元培继任校长者”，“谓蔡氏在名流中，为惟一提倡艺术者，以其声望，决可增高艺专之地位，并谋更大之发展”。“此说初甚得全校之赞同，然教部不能容纳”，“故急提出所谓林风眠者，惟林氏不独在国内不知名，据即由欧返国者所言，亦不知有此伟大之艺术家，故均怀疑，且多以林氏如果有艺术深造，则不妨充教授，却不必当校长”。某司长“其计又不得售，愤懑之余，遂再散布谣言，谓前日赴教部者，系假借学生名义，为挽留刘百昭而来，以挑动学生之反感。学生不察，果竟有赴教务长处质问者，并一面对教职员提出警告书，勿复过问校长事，一面商议选举校长。但选举时，多数学生并不参加，只由极少数人包办，有一人至写数十票者，结果中画系三年级学生以选举舞弊，提出抗议，于是又将票焚毁，作为无效”。（《艺专校长更迭之内幕》中引艺专学生某君来函，《晨报》，1926.1.31）

一月二十八日　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出通启，发起反日俄出兵东省大

会，定次日晚七时半，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宴会厅开会，讨论进行办法。（据《国人之反日俄运动》，《晨报》，1926.1.29）

一月二十九日 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在北大二院召开反日俄出兵东省大会筹备会议。先生代表大江社前往参加。到会者有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反共党刊物同志会、北京国家主义青年团、国魂社、铁血救国会、台湾救国同志会、救国杂志社、京津竞学会、夏声社、蜀光社、奋斗社、中国少年自强会北京支部、政治讨论会、醒狮社、工大救国同志会、民国公报社、正声日报社、大神州会、朔风社、秋枫社、信社、少年行健会、全民学会、中原通信社、中华妇女协会、群益社、北京工界维持会、起舞社、临江学会、国民党各团体联合办事处、旅京川南政学联欢社、旅京四川什邡县同乡公会、崇庆旅外联合会、广东开平旅京学会、国是协进会、甲子社、少年爱国社、四川联县青年互助学会、青年改进社等团体。晚八时，王施真主席主持开会，谓“此次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对日俄进兵东省大会，惟一目的，在反对赤白帝国之侵略行为，唤起国人之自觉”。张作霖“借日本之力，自固地盘，引其进兵南满”，“苏俄亦狡焉思逞，乘东路运兵问题，小题大作，借护路为名，出兵北满”，“吾人为谋国家之生存，对于侵略我国之日本苏俄一致反对”。诸团体代表发言后，由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江伟藩、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姜华先后提出三项方案：“一，通电全国，以宣布日俄侵略行为，而唤醒国人；二，警告日俄大使芳泽加拉罕张作霖等军阀；三，发反对日俄出兵东省宣言。”表决时有人反对。方案通过后，遂宣告散会，反对者“复麇集大吵不止”，“大起争端，结果受伤四人”。（据《昨日各团体之反赤白帝国主义出兵大会》，《晨报》，1926.1.30）

会中出现的混乱，先生称为“小打”，给梁实秋、熊佛西信：

> 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溷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夜深，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①]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斲鼻端而已。女士尝于五卅游行时，揭旗冲锋，直捣东郊民巷，故京中传为 Chinese Jeanne'd Arc 焉。

附：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反日俄出兵大会之通电》

> 全国同胞公鉴：东三省自中日役之后，久成为日俄两国之角逐场，三十年

① 即北京大学学生谭慕愚。

来日俄两国，各施其侵略伎俩，略我国土，侵我主权，我国民愤于外侮之日迫，群起为维护主权之运动。十余年来，我国民对于收回东三省主权之事业，苦心积虑，从事运动，已为人所共见。不幸国内甘心媚外之军阀棍徒，不弟不能与国民合作，且每有丧心病狂，勾结敌人，日本则有奉系军阀为之道地，俄国则有共产党徒为之内应，使外人对我国民之努力愈加轻视，愈逞其侵略之野心。自去岁军阀混战开始之后，张作霖因其部下倒戈结果，势力完全失坠，乃不惜倒行逆施，将东三省全部权利，拱手让诸日人，与日人订立亡国亡省之密约，……复罹战尘，此实日人野心侵及军阀甘心媚外之所致，凡属爱国人民，不能不一致反对。至如向以援助弱小民族自命之苏俄，则其野心之大，较之日本亦未少逊，数年以来，对于外蒙新疆迭施侵略，其阴谋已为人所共见，而对于北满固有之权利，尤丝毫不肯放松，把持中东铁路，用以为经济侵略及宣传主义之根据地。最近见奉系势力恢复，其斥援助之军阀已归失败，乃藉口运兵小故突以重兵压我国境，同时其大使加拉罕复以国际上最无礼之言辞向我提出警告，以为恫吓，而我国媚外之党人，复丧心病狂，为苏俄百方辩护，助长其侵略之声势，麻痹我国民之神经。我国民对此无礼举动，尤不能不一致反对。同人等对此双方侵略，激于爱国热诚，义无反顾，用特联合纯洁正大之团体，共同筹议，决将日俄两国侵略我国之事实，及我国甘心卖国之军阀棍徒之罪状，宣布始末，迎先国人。深望国人一致惊觉，共起图善后之策，使日俄野心不得施于我领土之内，则国家幸甚，东省幸甚。反对日俄出兵东省大会。陷电。（《反日俄出兵大会之通电》，《晨报》，1926.2.1）

二月三日　上午十时，先生参与发起的反日俄出兵东省大会复召开筹备会议，决议通过“电告东省民众，主张国民对外”、“电告全国民众，声明东三省问题，非东省民众单独的责任，实为全国民众共同之责任”等四项案件。（据《反日俄出兵东省会昨日决议》，《晨报》，1926.2.4）

二月九日　反日俄出兵东省大会复在北大三院开会，讨论进行办法，“决议于二日内将所印之六万张口号，由宣传股实行贴于东西南北各处。又筹备市民大会，进行事宜，并预备派选代表，分别赴各省宣传日俄之侵略详细情形，俾使举行全国大示威运动”。（《反日俄运动之急进》，《晨报》，1926.2.10）

二月二十四日　与北京艺专事务长共同召集教职员谈话会，“议决为挽救学生学业计，各教职员得于不妨害与九校一致争经费之运动范围内，自动的到校指导学生，并由各班教职员各约各班学生”，“研究补习办法”。（《艺专补救罢课办法》，《晨报》，1926.2.26）

是月 致梁实秋、熊佛西信[①]。收《闻一多书信选集》。

信中云:"一入国内,俗事丛身,九月之久,仅成诗两首。"又云:"近与京中诗人颇有接洽,将或有聚餐会之组织。有人起议发行纯文艺的刊物。惟自忖其奈胆怯何!甚望实秋速返国予我一臂之助。"还说:"《大江》在京行销甚畅。拙作亦竟有人转载,按语谓远胜《红烛》时代之闻一多。""《大江宣言》发表后亦大有影响,友人亲见北大校役抄写,问之则曰'好极!好极!'。又有人粘贴壁间奉为科臬者。民国大学学生课艺中竟有全段剽袭者。凡此消息,幸望实秋遍告同志,俾得闻之额手相庆"。

三月三日 前日,艺专新校长林风眠到校就职。是日午前,先生"具函向林辞职"。(《艺专职员大更动》,《晨报》,1926.3.4)

三月六日 下午一时,出席艺专全体教职员茶话会。会上"教务长闻一多自请辞职,意甚坚决,林氏现拟由自兼"。(《艺专明日非正式开课》,《晨报》,1926.3.7)

同日 晚,先生与李璜、余上沅、邱椿等在华侨俱乐部开会,"讨论反抗苏俄及援助旅俄被虐华侨办法"。与会者还有王会卿、杨国梁、杨若金、林有壬、黄有渊、王施真、谭慕愚、何培植、林德懿、戴庆云、彭昭贤等。会议议决召开"反抗苏俄帝国主义援助旅俄被虐侨胞大会",会后发表了"通启"。(据《京各界反对苏俄虐待侨胞》,《晨报》,1926.3.8)

上月二十二日,《晨报》刊载《旅俄华侨总会会长金石声回国途中遇害》消息,云:金石声"在伊尔库次克国防局一夜即无踪,同解者或愤发成疾,或因刑成残人,华侨代表彭昭贤通电求援"。三月一日,《晨报·副刊》又登出《旅俄华侨归国代表彭昭贤先生来信》。先生愤然不平,曾与李璜等商议声援办法。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一天,有彭昭贤君忽来我之亮果厂寓所拜访,他大概与金石声有亲戚关系,很悲痛的为我诉说俄共虐待我侨胞事,历历如绘,并称:'苏俄为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凭空捏造,硬说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多人,组织一个暗杀团,要谋刺日本驻俄的田中公使,逮捕五十余人,备受毒刑,惨不忍言'云云。彭更告我,他去好多家报馆向记者们陈诉,各报都未登载,真是中国人太无同胞之爱与国家观念,所以他来访我,请我主持公道。……于是第三日即在我寓所的张真如客厅中先开高级一点的座谈会,参加者有袁守和、张真如、邱大年、余上沅、常燕生、闻一多、罗隆基(努生)等多数教授以及国家主义青年团与国魂社主持人夏涛声、林德懿、李朴、谭慕愚等北大学生。座谈中,在彭报告后,守和、一多均发言至为愤慨,于是随即召开

① 此信未有日期,《闻一多书信选集》注文云"约写于3、4月间"。编者据信中其他内容考订,当写于2月间。

反俄援侨大会筹备会于北大第三院，决定公开与共产党大干一下。当时定期于三月十日二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会，并推定李璜、闻一多、常燕生、邱大年、罗隆基为主席团，李璜任主席团主席，请彭昭贤讲演俄共虐待旅俄侨胞之经过。并用白布书一横额'反俄援侨大会'悬于礼堂门前；且于九日即用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名义在《晨报》上登出开会时间地点的广告。"(第 126 至 127 页)

三月十日　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北京国家主义青年团、大江会、大神州会、国魂社、中国少年自强会、醒狮社、反日俄出兵东省大会、旅俄华侨商会联合会、苏俄残害金石声案旅京华侨后援会、华侨公会、三门湾开埠促成会、救国团、民主社、铁血救国团、朔风社、北京工人救国团、工大救国同志会等团体共同发起反俄援侨大会，于是日下午二时，在北京大学第三院举行讲演大会。先生事前为主要筹备者之一，会上又为主席团成员。

施真在《纪念闻一多先生》中回忆说，"反俄援侨大会"的名称还是先生修正确定的，并于会前绘制出一些讽刺画。文云："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一经彭、杨(若金，旅俄华侨后援会会长)诸先生来接洽之后，即发起'反抗苏俄帝国主义，援助旅俄被难同胞大会'，简称为'反俄援侨大会'。这个大会的名称，是经过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之开会决定，还是由闻先生汇集各个大同小异的名称加以修正而获得全场一致之通过的。闻先生并且亲自绘出各种'反俄援侨'的讽刺画，交给我们拿去翻印，印好之后到处张贴。其最大的一幅，系画一个恶魔在阴霾四布的天候里拿着粗长的鞭子毒打裸体跪在地面上求饶的人众，以象征苏俄之毒辣侨胞之惨状。由闻先生所绘的讽刺画所发生的影响，似乎比用文字所发布的标语和传单还要广大而深刻。"(《青年生活》第 3 期，1946.8.1)　十日《晨报》在《今日反俄援侨大会》消息中，也提到这些宣传画，谓："曾准备关于苏俄虐待华侨之写真画图多种，当场张贴。所绘事实，均系旅俄华侨或留俄学生所亲见，经长于写真者和盘托出，惨不忍睹。"

出席是日"反俄援侨大会"有三四百人。首由大会主席、醒狮社北京社长、北大教授李璜报告开会理由，谓此次大会"一为侨胞在俄受俄人虐待，藉以报告真象，俾国人起而为同情之援助；二为揭破苏俄侵略我国之阴谋，俾国人起而谋自卫之道"。旋由旅俄华侨代表王会卿报告华侨在苏联所处境遇，后由彭昭贤讲演苏联国内之情形及对中国之态度。此时，台下人声嘈杂，国家主义派与共产主义派发生争执，并出现了混战。《国家主义者与共产派昨日空前之大血战》报道当时情形："当开会前国家主义团体与共产派双方，均已有用武之觉悟，国家主义团体率有同志八十余人，多为各校教授及青年学生，临时工人志愿参加人有十余人；共产派方面约有六十人，除学生外工人为多。国家主义团体开会前，雇有拳术家五人，充当前锋；共产

派则持三角木棍，并有携凶器者。闻国家主义同志亦有数十人持木棍者。当主席李璜宣告散会时，呼打之声齐起，有类似工人某持小刀向李背后直冲，国家主义同志用桌椅作武器与之对抗，李因得免。旅俄回国学生彭昭贤及旅俄华侨后援会会长杨若金二人，当时亦在国家主义战线之内，后情急突出，被共产派殴伤。杨已入协和医院，伤势甚重，一说已乘危。彭昭贤则迄昨夜一时止，行踪不明。国家主义同志昨夜已用大会名义，向警厅请求寻觅，不达目的不止。共产派方面负重伤者亦有二人，中一人亦有生命之危，闻系被国家主义拳术所攻者。计双方负伤人数共约十人。共产派皆手缠红纱，有俄人二名在场指挥云。当双方血战时，警吏亦赶到，但已不及，当场并未拘捕行凶之人。"(《晨报》，1926.3.11) 混战之时，先生在主席台上，被人引入后门走出，未被伤及。

附：《反俄援侨大会宣言》

数十年来，惨遭欧美日本各列强百般侵害的国家，如像我们中国这样，一旦醒觉，正在极力抵抗的时候，忽然有一邻国向我们表示好感，口称援助，如像苏俄那样，我们中国当然是欢迎极了！所以在前年北京政府承认苏俄的时候，我们国民简直一致赞成，并且再三催迫政府。

那知事与愿违，大失所望，苏俄之亲善，只是口头亲善；苏俄不但不援助水深火热的中国，而反在我国内实行侵略我领土，在彼国内极力蹂躏我侨胞。这一年来，苏俄给我们国家及国民的苦痛，如外蒙之侵占、侨胞之被拘、以纸卢布遗害我商民、以枪械助长我内乱，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已经忍不住了！而最近东省事件，苏俄竟明目张胆将他屡次宣称交还的中东路权完全强占了去！我们正在不胜愤恨的时候，而旅俄百般被虐的侨胞，如喻森，如桂丹华诸人，或在俄久居黑狱已成残废，或历受俄人酷刑已成疯迷，万里颠连，已匐匍行抵国门。我们目击心伤实在忍无可忍！我们对彼口言援助行尽侵略，口言人道行实强盗，口言打倒帝国主义而行实帝国主义的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实在不能不再加以严重的反抗了！况且我们的侨胞在俄境内尚有三百万之多，而苦苛税受拘禁，财产既被没收，出境不发护照，求生不得，欲去不能的侨胞，我们对之，安能不极尽能力加以援助！我们如果去坐视他们一一如金石声之失踪，如喻森、桂丹华之受刑，我们未免太无心肝了！

因此我们各团体本良心之驱策，团结起来发起这个大会，我们这个大会的目的是：

一、宣布苏俄阴谋及虐待旅俄侨胞罪状，使国人了然彼之行为实与英日帝国一点没有差别，免得再相信苏俄那种口头亲善，口头援助！

二、团结国民起来一致反抗这种骗子，如严厉催促北京政府抗议，警告俄公使

及俄政府，使彼骗子知道中国人不是可以老远欺骗的，而知所恐惧。

三、实力援助旅俄被虐侨胞，总要使他们能够脱离苦海的便早早脱离；不能的，也可以暂时安全的在俄生活着。

我们对此三项，尽力去做！我们不怕阻碍！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生，誓与这般旅俄被虐侨胞安全以生！我们要死，誓与这般旅俄被虐侨胞同难而死！

我们的宣言如此！（《今日反俄援侨大会》，《晨报》，1926.3.10）

三月十一日　反俄援侨大会因与共产派矛盾，复开会讨论进行办法，议决"通电全国宣布俄人率领党徒捣乱大会之真象"、"警告加拉罕"、"赴外部催办金石声案"等具体事项多种。（《血战后之反俄援侨大会》，《晨报》，1926.3.12）

三月十六日　先生准备参加十八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但由于李璜劝阻作罢。

本月十二日，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驻守天津的冯玉祥之国民军部，为国民军击退。十四日，国民军公布大沽口事件真相，并提出此事件应由日本负责之四点理由。天津七十余团体联合通电谴责日本，北京各界民众三十余万人亦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十五日，天津四万市民紧急集会，要求段祺瑞政府对日发出严重抗议，广东国民政府也发表《对时局宣言》。十六日，日、英、美等八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激起全国民众极大愤慨。

先生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此种侵略行径亦无比愤怒，准备参加二日后之天安门群众集会，但这时却接到李璜的劝阻通知，遂去询问。李璜《学钝室回忆录》："惨案（即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二日，我得同志报告，言国民党的左派调动天津及长辛店的工人来京甚多，将发动首都革命。我忽然警觉到，反俄援侨大会刚与共产党大打一场，共产党必指目于国家主义派的领导人物。如果在大混乱中加以暗害，死了还报不出帐来。因此我立命同志学生前往通知一多、大年、燕生及彭昭贤，日内有左派发动大示威游行，我等日前开大会在主席台上的人不要前往。一多得着通知，立即到亮果厂来向我质问，说：'才打了一回架，我们并未打败，你就怕在群众运动中露面了吗！我要去参加，以免学生们说我们怕事。'我见一多来势汹汹，其勇气可佳；我便从容的向他解释到：'一多，你知道共党已调动京外工人数百来京，要发动首都革命么？他们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又曾来约我们去参加共同领导否？你要去，这不是唱花脸，而是为共产党跑龙套，如果在乱军之中受了伤，送了命，报不出帐，我对朋友，是应有道义的责任的啊！'一多想了一下，立即释然，说道：'遵命遵命！但我们也应该发动一次大示威，以张国家主义派的声势。'"（第 134 至 135 页）

三月十七日 晚，先生代表大江会，与国魂社、国家主义青年团、大神州社、少年自强会、朔风社等三十余团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反对八国通牒事项，并决定次日上午九时在北大第三院操场集合国家主义派人员，向政府示威，以监视政府不得承认八国通牒。（据《昨日各团体集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晨报》，1926.3.18）

三月十八日 “三一八”惨案发生。是日，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孙文主义学会等五十余团体二百余人赴外交部、国务院陈述意见。当他们离开国务院不及两小时，在天安门前参加完国民大会的民众亦来到国务院门前。这时军警开枪镇压，刘和珍、李家珍、杨德群、郭杰红、江禹烈等惨遭杀害。艺专学生姚宗贤亦身亡，谭祖尧等受伤。先生愤恨不已，后写下《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诗）和《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

三月二十一日 为抗议“三一八”惨案，北京各团体暂时捐除成见，举行联席会议。发起者有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中国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国民反辛丑条约国侵略大会等不同派别的团体。

次日下午三时，上述团体与国民党两北京市党部[①]、爱国运动大同盟、雪耻大会、北京孙文主义学会、旅法华侨总工会、民治主义同志会、外交学会等，共二百余团体及六十余校代表三百余人，在北大第三院第一教室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大家对“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一致表示愤怒，但在成立组织讨论执行委员人数及分股问题时，又发生了争执与分裂。旋，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的南花园市党部另行开会。

三月二十二日 熊佛西用三年功夫写成的剧本《长城之神》，从美国（纽约）寄回，发表在《晨报·副刊》第一三六七号上。短序云：“太侔、上沅、一多：你们亲切的鼓励与剧艺的努力，成就了这篇《长城之神》。现在我恭敬的将她献给你们。”

先生对这剧本的写作多次表示过关心和鼓励，是年一月二十三日给梁实秋信中曾说：“熊佛西之《长城之神》脱稿后愿得先睹为快。”四月十五日又在给梁实秋、熊佛西信中说：“佛西之作自有进步，但太注意于舞台机巧，行文尚欠沉著intensity。吾虽不敢苟同于实秋，以戏剧为文学之附庸，然不以文学之手段与精神写戏剧，未见其能感人深心也。佛西如不罪我卤直，则请为进一言曰：‘佛西之病在轻浮，轻浮故有情操而无真情 sentiment 与 emotion 之分也。’情操而流为感伤或假情，sentimentality 则不可救药矣。佛西乎，岌岌乎殆哉！至于剧本中修词用典之谬误尚其次者，然亦轻浮之结果也。”这是先生对朋友作品的坦率批评。

---

① 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均在北京设立了党部，一在翠花胡同，一在南花园。

三月二十五日　诗《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发表于《国魂周刊》第十期。收《闻一多诗集》。诗中赞扬"三一八"勇士的无畏精神。

三月二十七日　诗《天安门》发表于《晨报·副刊》第一三七〇号。

这首诗借用一位洋车夫的口吻，控诉"三一八"惨案，写法与过去有很大不同，用了不少方言土语，在当时的诗创作中还属少见。饶孟侃在《新诗话：(一) 土白入诗》中极力赞扬，认为：该诗"是土白诗又更进一层做到了音节完善的境界"，"除了倒数第二句稍为弱一点，通体上差不多是一气呵成的，而且用北京土白来写北京洋车夫的口吻，尤其是恰当这首诗的身份。这首诗的音节，在节拍上虽没有绝对的方式可寻，但是大致可以说是由四个拍子(或音尺)组合成的；在韵脚上也很仔细，凡是一句的末了要是用'的''了''儿'等等虚字押韵的，它上面的一个字也必定同时协着韵。……这种韵在外国诗里也有名，叫 Feminine Rhyme 复韵。"(《晨报·诗镌》第八号，1926.5.20)

同日　徐志摩第一次到先生家。他在《诗刊弁言》中说："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①]徐志摩这次来，是为了商量《晨报》出版诗刊的事。起初，先生与几位诗友都有创办一个纯文艺刊物的想法，大家推先生与蹇先艾去同徐志摩商量，打算借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一角。徐志摩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此事经过，蹇先艾在《〈晨报诗刊〉的始终》中谈到："有一次在他[②]的屋里，又遇到了闻一多、朱湘和饶孟侃。这几位诗人常常来梦苇的小屋聚会，互相传阅和朗诵他们的新作，间或也讨论一些新诗上的问题，他们正在探寻新诗的形式与格律的道路。……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常去的那几位诗人也在座，正在翻阅梦苇手抄的他近两年的作品《孤鸿集》，还有两位新客人——于赓虞和朱大枬。梦苇虽然有病，谈诗的情绪仍然很高，他用沙哑的声音对我们说：'一九二二年，朱自清、刘延陵、叶绍钧几位办过一个《诗刊》，可惜到第二年就夭折了！真可惜。我们这几个朋友凑拢来办一个《诗刊》好不好？'大家不约而同地点头赞成。只是有两个问题难于解决：一个是印刷费无着；一个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当权，办刊物要'呈报'备案。段祺瑞一向视新文学运动为'洪水猛兽'，报上去，肯定会石沉大海。因此，大家又皱起眉头来。记不清楚是哪一位提出的：'我看，不如借哪家报纸副刊的篇幅出一个周刊，这个比较简单，只要副刊的编辑同意就行了。'当时，徐志摩和孙伏园分别主编

① 徐志摩《诗刊弁言》写于3月30日，据推算，"上星期六"当是27日。
② 指刘梦苇。

北京《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但是《京报》出的周刊相当多,看来是插不进去了。商量的结果决定找徐志摩想办法,徐也是诗人,周刊就由他来编,我们大家供给诗稿。当场公推闻一多和我去同徐志摩联系。一多与徐一向很熟;我的叔父和徐的父亲是朋友,徐到北京《晨报》社以前,住在石虎胡同松坡图书馆,我就认识了他;我又是一个经常向《晨报副刊》投稿的人。我们去联系,徐志摩没有作任何考虑,很爽快地答应了。"(《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辑)

四月一日 《晨报·诗镌》创刊。这是先生与朋友们共同办起的一个专门研究新诗的周刊,由于经济等条件限制,便借用了《晨报》的副刊。副刊主编徐志摩也参加了主要编辑工作。《诗镌》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二个专门发表诗与诗评的专刊。

《诗镌》"刊头图案即是一多的手笔",(梁实秋《谈闻一多》,第68页)画的是一匹双翼飞马,前蹄跃起,后蹄蹬在初升的圆月上。

《诗镌》的主要撰稿人除先生外,有徐志摩、朱湘、饶孟侃、杨世恩、杨振声、刘梦苇、蹇先艾、于赓虞、孙大雨等。编辑则是大家轮流负责。

《诗镌》的创刊,表明先生等人要发起一场改良新诗的运动。徐志摩在创刊词《诗镌弁言》中说:"我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观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灵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他们构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观见,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

先生在《诗镌》创刊号上发表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收《闻一多全集》。他认为爱国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 爱国运动能够和文学复兴互为因果……我们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何尝不是同时发轫的?他们原来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在表现上,两种运动一向是分道扬镳的。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没有携手,所以爱国运动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也就有限了。……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互收效益,分开来定要两败俱伤。所以《诗刊》的诞生刚刚在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我却希望大家要当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文中还特别提倡为爱国而死的献身精神:

> 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刺激来得强,反动也来得强,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

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因此我们就将《诗刊》开幕的一日最虔诚的献给这次死难的志士们了！

《晨报·诗镌》创刊号上，先生还发表了诗《欺负着了》。收《闻一多诗集》。诗中用北京土话，通过一位在“三一八”惨案中失去两个儿子的母亲之口，控诉了惨案的社会元凶。

创刊号为“三一八”专号，还刊有徐志摩的《诗刊弁言》、《梅雪争春》，饶孟侃的《天安门》，杨世恩的《回来啦》，蹇先艾的《回去》，于赓虞的《不要闪开你明媒的双眼》，刘梦苇的《寄语死者》、《写给玛丽亚》，朱湘的《新诗评：〈尝试集〉》。

四月八日　《〈诗与历史〉附识》、诗《比较》发表于《晨报·诗镌》第二号。

《〈诗与历史〉附识》收《闻一多全集》时改作《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诗与历史》是邓以蛰在病中花了三个通夜写成的一篇新诗评论，先生称它“刊心刻骨”、“诘屈聱牙”。邓以蛰本不想发表，但先生“几次恳求的结果”，“文章终于发表在《诗刊》上了”。先生称“既替《诗刊》拉了这篇稿子，就有替《诗刊》的读者介绍这篇稿子的义务”。《附识》说：

作者这篇文有两层主要的意思：（一）怀疑学术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研究历史的时论。（二）诊断文艺界的卖弄风骚、专尚情操、言之无物的险症。他的结论是历史与诗应该携手；历史身上要注射些感情的血液进去，否则历史家便是发墓的偷儿，历史便是出土的僵尸；至于诗这东西，不当专门以油头粉面、娇声媚态去逢迎人，她也应该有点骨格，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便是作者所谓“境遇”。

诗《比较》收《闻一多诗集》。诗中将两种不同的家庭生活进行了比较，表现出先生对自己想象中理想家庭生活的向往。

四月九日　应徐志摩、杨振声、赵太侔、邓叔存邀宴，先生与林风眠夫妇、陈源、俞平伯、余上沅、张歆海、陶孟和、冯友兰、凌叔华、张奚若、丁巽甫、陆小曼、王代之等，日本学者小畑熏良亦参加。（《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73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5月出版）

四月十五日　诗《死水》、《黄昏》发表于《晨报·诗镌》第三号。均收诗集《死水》。

《死水》为先生代表作，下面是初次发表者：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一诗排在本期首位。它的格式极为整齐，每行均为九字，每段韵脚不同，诗句用两个字或三个字构成音尺，收尾处均为双音词，读起来十分和谐，被诗坛公认为先生所提倡的格律诗的代表作。蹇先艾《〈晨报诗刊〉的始终》中说：先生“亲自向我们朗诵过《死水》，的确悦耳动听，富有音乐气息。对外界有无影响，我不知道，不过《晨报诗刊》同人却偏爱这首诗”。（《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辑）

《死水》除了格律诗的艺术风格外，更体现了先生心中的“火”。他后来在给臧克家信中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

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致臧克家》,1943.11.25,《闻一多书信选集》,第316页)

《死水》在文坛引起一定反响,苏雪林在《论闻一多的诗》中评论《死水》时说:"这首诗假如真咏死水,还有什么意义,顶好我们借徐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稿一段话来解释。徐氏于痛论中国现代病症之后,又说了个譬喻道:'这情形就比是本来是一个海湾和大海是相通的,但后来因为沙地的涨起,这一湾水渐渐的隔离它所从来的海,而变成了湖。这湖原先也承受得着几股山水的来源,但后来又经过陵谷的变迁,这部分的来源也断绝了,结果这湖又干成一只小潭,乃至一小潭的止水,长满了青苔与萍梗,钝迟迟的眼看得见就可以完全干涸了去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受教育的士民阶级的相仿情形。现在所谓知识阶级亦无非是这潭死水里比较泥草松动些风来还多少吹得绉的一洼臭水,别瞧它矜矜自喜,可怜它能有多少前程?还能有多少生命?'又说:'水因为不流所以滋生了水草,这水草的涨性又帮助浸干这有限的水。同样的,我们的活力因为断绝了来源,所以发生了种种本原性的病症,这些病又回过来侵蚀本原,帮助消尽这点仅存的活力。'但徐氏将死水比作中国的知识阶级,闻氏则以死水象征现代腐败颓废的全中国。"(《现代》第4卷第3期,1934.1.1)

《死水》的写作时间,一说在国外,一说是回国以后。不过先生当时所居的西京畿道原名沟头,有长沟,沟内常积有死水。张嘉铸看了《死水》,建议把末段删掉,但先生不肯,认为这么一来这诗就真的成唯美的了。(据访问闻家驷记录,1986.10.7)

同日　致梁实秋、熊佛西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晨报·诗镌》,云:

> 《诗刊》谅已见到。北京之为诗者多矣!而余独有取此数子者,皆以其注意形式,渐纳诗于艺术之轨。余之所谓形式者,form也,而形式之最要部分为音节。《诗刊》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

四月二十二日　《晨报·诗镌》第四号出刊。首篇饶孟侃的《新诗与音节》,为《诗镌》首次登载的关于新诗理论的文章。文中特别介绍了先生的创作特点,尤其强调说《大鼓师》、《渔阳曲》、《死水》中都有拍子。

同期有《朱湘启事》,说他有一本《新诗评》,收有《闻君一多所作诗的攻错》。时,朱湘与先生发生矛盾,原因据说是《诗镌》第三号将朱湘最为得意的《采莲曲》排在第三篇,位于饶孟侃《拷衣曲》之后,引起朱湘不满。又有人说是由于两人对徐志摩看法不一而引起的。

四月二十七日　致梁实秋信。未入集,仅见于梁实秋的《谈闻一多》。信中谈

及与朱湘关系的恶化，云：

> 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偏要打倒饶、杨等人的上帝。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为同疯狗一般，就算他是 Spenser（因为 Shakespeare 是他不屑于做的，他所服膺的是斯宾塞），社会上也不应容留他。他的诗，在他未和我宣战的时候，我就讲了，在本质上是 sweet sentimentality，在技术上是 dull acrobatics，充其量也不过做到 Tennyson，甚至 Longfellow 一流的 kitchen poet，因为这类的作品只有 housewives 才能鉴赏。这个人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至于他的为人，一言难尽！

徐霞村在《我所认识的朱湘》一文中也提到朱湘与《诗镌》脱离关系的原因："《诗镌》刚出几期，朱湘便退出编委，告诉我他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徐志摩，声明自己与《诗镌》脱离关系。我一问原由，才知道是因为朱湘不满于徐志摩的不严肃的编辑态度，不容忍于徐志摩利用编选权力，搞文人间的互相标榜吹捧的油滑的市侩作风。"（《新文学史料》1986 年第 1 期）

四月二十九日　诗《春光》发表于《晨报·诗镌》第五号。收《死水》。先生很偏爱这首短诗，四十年代选编《现代诗钞》时，选入自己九首诗，《春光》即为其一。

五月六日　诗《鸟语——送友人南归》发表于《晨报·诗镌》第六号。收《闻一多诗集》。

同期还刊登了鹤西（程侃声）的处女作《城上》，先生很欣赏。蹇先艾《秋日怀鹤西》："诗的内容是他登上了永定门西的城楼，俯视北京的原野，从而遥想起故乡的景物，一别三年，不胜感慨，最后写到了他对母亲的想念。……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清新、自然，可以朗诵，闻一多和徐志摩都很欣赏。"（《新文学史料》1985 年第 2 期）

五月十日　朱湘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五号上发表《评闻君一多的诗》，似即上月二十二日《晨报·诗镌》中《朱湘启事》所提到的《闻君一多所作诗的攻错》。文中就他所看到的先生《屠龙集》、《红烛》删节修改本以及后来做的一些诗，进行了批评。说："闻君是被视为老大哥的。然而老大哥是老大哥，诗是诗，完全不能彼此发生影响。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更得要小心，因为一不在意，便易流入标榜的毛病。所以我在没有批评闻君的诗以前，先为自己立下一个标准，就是：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朱湘批评先生的"第一种短处是用韵不讲究"，即"不对"、"不妥"、"不顺"，"不对便是说韵用错了，不妥便是说韵用得寒伧，不顺便是说韵用得牵强"。又说"作者用字的时候也有四个毛病"，即"太文"、"太累"、"太晦"、"太怪"，"这是他的第二种短处"。同时，朱湘亦承认先生的诗也有长处，但说："他自有一条

独创的路走着，虽然他的路是一条小径而且并不长。”

该文中提到的某些诗及诗句，后来未见发表，先生遗稿中亦未有保存，如《谢罪以后》存“只切莫让刀子在石头上磨。……有个代价么?”之句。《瑛儿》中存“趁婴儿还离不开襁褓，——趁乳燕儿的翅膀未强”。《闺中》中存“墙头还洒着淅沥的余滴，夕阳浸在泥洼中的积潦里”和“瘖哑的自鸣钟负墙而立”。其中《伯夷》存句较多，除有一句为“像极了妈妈临终的那一夜，父亲说我们弟兄里你最像妈妈”，还有一大段：

兄弟啊，你该记得那林子里厢，
除了叶缝里闪着星星的绿光，
别的东西几乎都辨不大分明，
只是一股烂树腐肉的霉气熏人，
还同鼾兽吟虫织成的一片虚响；
我们却认得一条花蛇缠在树上，
缠得像颗彩结，缠在那里睡觉，
剥了皮的死柏树十丈来高，
槎桠上挂着一面团团的蛛网，
蟭螟，蚊蚋，蛱蝶，蜻蜓黏死在上，
一只蜘蛛王守在中央，螃蟹般大。

五月十三日　《诗的格律》发表于《晨报·诗镌》第七号。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先生酝酿已久的新诗理论的探讨文章，反映了先生对新诗创作应遵循一定格律的思想。这种理论对当时以及后来的诗创作产生过影响。文章说：

> 假定“游戏本能说”能够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起源，我们尽可以拿下棋来比作诗；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格律在这里是 form 的意思。“格律”两个字最近含着了一点坏的意思，但是直译 form 为形体或格式也不妥当。并且我们若是想起 form 和节奏是一种东西，便觉得 form 译作格律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了）假如你拿起棋子来乱摆布一气，完全不依据下棋的规矩进行，看你能不能得到什么趣味？游戏的趣味是要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致胜。做诗的趣味也是一样的。假如诗可以不要格律，做诗岂不比下棋、打球、打麻将还容易些吗？难怪这年头儿的新诗“比雨后的春笋还多些”。我知道这些话准有人不愿意听。但是 Bliss Perry 教授的话来得更古板。他说“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缚束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要戴别个诗人的脚镣”。

这一段话传出来，我又断定许多人会跳起来，喊着“就算它是诗，我不做了行不行？”老实说，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这种人就不作诗也可以，反正他不打算来戴脚镣，他的诗也就做不到怎样高明的地方去。杜工部有一句经验语很值得我们揣摩的，“老去渐于诗律细”。

诗国里的革命家喊道“皈返自然”！他们以为有了这四个字，便师出有名了[①]。其实他们要知道自然界的格律，虽然有些像蛛丝马迹，但是依然可以找得出来。不过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这样讲来，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王尔德说得很对。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最好拿造型艺术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常常称赞美的山水，讲它可以入画。的确中国人认为美的山水，是以像不像中国的山水画做标准的。欧洲文艺复兴以前所认为女性的美，从当时的绘画里可以证明，同现代女性美的观念完全不合；但是现代的观念又[②]同希腊的雕像所表现的女性美相符了。这是因为希腊雕像的出土，促成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描写美人，都拿希腊的雕像做蓝本，因此便改造了欧洲人的女性美的观念。我在赵瓯北的一首诗里发现了同类的见解。

“绝似盆池聚碧孱，嵌空石笋满江湾。

化工也爱翻新样，反把真山学假山。”

这径直是讲自然在模仿艺术了。自然界当然不是绝对没有美的。自然界里面也可以发现出美来，不过那是偶然的事。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了。（注意，我并不反对用土白作诗，我并且相信土白是我们新诗的领域里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壤，理由等将来再仔细的讨论。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只是土白可以“做”诗；这“做”字便说明了土白须要一番锻炼选择的工作，然后才能成诗）诗的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莎士比亚的诗剧里往往遇见情绪紧张到万分的时候，便用韵语来描写。歌德作《浮士德》也曾采用同类的手段，在他致席勒的信里并且提到了这一层。韩昌黎“得窄韵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

① 此句《闻一多全集》未录，兹据《晨报·诗镌》原文补。

② “又”字在《闻一多全集》中作“不”，似误，今改。

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又有一种打着浪漫主义的旗帜来向格律下攻击令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只要告诉他们一件事实。如果他们要像现在这样的讲什么浪漫主义，就等于承认他们没有创造文艺的诚意。因为，照他们的成绩看来，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文艺的本身，他们的目的只在披露他们自己的原形。顾影自怜的青年们一个个都以为自身的人格是再美没有的，只要把这个赤裸裸的和盘托出，便是艺术的大成功了。你没有听见他们天天唱道"自我的表现"吗？他们确乎只认识了文艺的原料，没有认识那将原料变成文艺所必需的工具。他们用了文字作表现的工具，不过是偶然的事，他们最称心的工作是把所谓"自我"披露出来，是让世界知道"我"也是一个多才多艺，善病工愁的少年；并且在文艺的镜子里照见自己那倜傥的风姿，还带着几滴多情的眼泪，啊！啊！那是多么有趣的事！多么浪漫！不错，他们所谓浪漫主义，正浪漫在这点上，和文艺的派别绝不发生关系。这种人的目的既不在文艺，当然要他们遵从诗的格律来做诗，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有了格律的范围，他们的诗就根本写不出来了，那岂不失了他们那"风流自赏"的本旨吗？所以严格一点讲起来，这一种伪浪漫派的作品，当它作把戏看可以，当它作西洋镜看也可以，但是万不能当它作诗看。格律不格律，因此就谈不上了。让他们来反对格律，也就没有辩驳的价值了。

上面已经讲了格律就是 form。试问取消了 form，还有没有艺术？上面又讲到格律就是节奏。讲到这一层更可以明了格律的重要；因为世上只有节奏比较简单的散文，决不能有没有节奏的诗。本来诗一向就没有脱离过格律或节奏。这是没有人怀疑过的天经地义。如今却什么天经地义也得有证明，能成立？是不是？但是为什么闹到这种地步呢——人人都相信诗可以废除格律？也许是"安拉基"精神，也许是好时髦的心理，也许是偷懒的心理，也许是藏拙的心理，也许是……那我可不知道了。

接着，先生提出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

前面已经稍稍讲了诗为什么不当废除格律。现在可以将格律的原质分析一下了。从表面上看来，格律可以从两方面讲：（一）属于视觉方面的，（二）属于听觉方面的。这两类其实又当分开来讲，因为它们是息息相关的。譬如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但是没有格式，也就没有节的匀称，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

关于格式、音尺、平仄、韵脚等问题，本刊上已经有饶孟侃先生论新诗的音

节的两篇文章讨论得很精细了。不过他所讨论的是从听觉方面着眼的。至于视觉方面的两个问题，他却没有提到。当然视觉方面的问题比较占次要的位置。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尤其不当忽略视觉一层，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原来文学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既然占了空间，却又不能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具体的印象——这本是欧洲文字的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所以新诗采用了西文诗分行写的办法，的确是很有关系的一件事。姑无论开端的人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我们都应该感谢他。因为这一来，我们才觉悟了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一来，诗的实力上又添了一支生力军，诗的声势更加浩大了。所以如果有人要问新诗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应该回答他：增加了一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

近来似乎有不少的人对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表示怀疑，以为这是复古的象征。做古人的真倒霉，尤其做中华民国的古人！你想这事怪不怪？做孔子的如今不但“圣人”、“夫子”的徽号闹掉了，连他自己的名号也都给褫夺了，如今只有人叫他作“老二”；但是耶稣依然是耶稣基督，苏格拉提依然是苏格拉提。你做诗摹仿十四行体是可以的，但是你得十二分的小心，不要把它做得像律诗了。我真不知道律诗为什么这样可恶，这样卑贱！何况用语体文写诗写到同律诗一样，是不是可能的？并且现在把节做到匀称了，句做到均齐了，这就算是律诗吗？

诚然，律诗也是具有建筑美的一种格式；但是同新诗里的建筑美的可能性比起来，可差得多了。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这是律诗与新诗不同的第一点。做律诗，无论你的题材是什么？意境是什么？你非得把它挤进这一种规定的格式里去不可，仿佛不拘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非得穿一种样式的衣服不可。但是新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例如《采莲曲》的格式决不能用来写《昭君出塞》，《铁道行》的格式决不能用来写《最后的坚决》，《三月十八日》的格式决不能用来写《寻找》。在这几首诗里面，谁能指出一首内容与格式，或精神与形体不调和的诗来，我倒愿意听听他的理由。试问这种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在那印板式的律诗里找得出来吗？在那乱杂无章、参差不齐、信手拈来的自由诗里找得出来吗？

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

这是它们不同的第二点。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是它们不同的第三点。有了这三个不同之点，我们应该知道新诗的这种格式是复古还是创新，是进化还是退化。

现在有一种格式：四行成一节，每句的字数都是一样多。这种格式似乎用得很普遍。尤其是那字数整齐的句子，看起来好像刀子切的一般，在看惯了参差不齐的自由诗的人，特别觉得有点稀奇。他们觉得把句子切得那样整齐，该是多么麻烦的工作。他们又想到做诗要是那样的麻烦，诗人的灵感不完全毁坏了吗？灵感毁了，还那里去找诗呢？不错，灵感毁了，诗也毁了。但是字句锻炼的整齐，实在不是一件难事；灵感决不致因为这个就会受了损失。我曾经问过现在常用整齐的句法的几个作者，他们都这样讲；他们都承认若是他们的那一首诗没有做好，只应该归罪于他们还没有把这种格式用熟；这种格式的本身不负丝毫的责任。我们最好举两个例来对照着看一看，一个例是句法不整齐的，一个是整齐的，看整齐与凌乱的句法和音节的美丑有关系没有——

"我愿透着寂静的朦胧，薄淡的浮纱，
细听着淅淅的细雨寂寂的在簷上，激打
遥对着远远吹来的空虚中的嘘叹的声音，
意识着一片一片的坠下的轻轻的白色的落花。"

"说到这儿，门外忽然风响，
老人的脸上也改了模样；
孩子们惊望着他的脸色，
他也惊望着炭火的红光。"

到底那一个音节好些——是句法整齐的，还是不整齐？更彻底的讲来，句法整齐不但于音节没有妨碍，而且可以促成音节的调和。这话讲出来，又有人不肯承认了。我们就拿前面的证例分析一遍，看整齐的句法同调和的音节是不是一件事。

孩子们|惊望着|他的|脸色
他也|惊望着|炭火的|红光

这里每行都可以分成四个音尺，每行有两个"三字尺"（三个字构成的音尺之简称，以后仿此）和两个"二字尺"，音尺排列的次序是不规则的，但是每行必须还他两个"三字尺"两个"二字尺"的总数。这样写来，音节一定铿锵，同时字数也就整齐了。所以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

调和音节，字句必定整齐。（但是反过来讲，字数整齐了，音节不一定就会调和，那是因为只有字数的整齐，没有顾到音尺的整齐——这种的整齐是死气板脸的硬嵌上去的一个整齐的框子，不是充实的内容产生出来的天然的整齐的轮廓）

这样讲来，字数整齐的关系可大了，因为从这一点表面上的形式，可以证明诗的内在的精神——节奏的存在与否。如果读者还以为前面的证例不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我的《死水》。

这首诗从第一行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起，以后每一行都是用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的，所以每行的字数也是一样多。结果，我觉得这首诗是我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因为近来有许多朋友怀疑到《死水》这一类麻将牌式的格式，所以我今天就顺便把它说明一下。我希望读者注意，新诗的音节，从前面所分析的看来，确乎已经有了一种具体的方式可寻。这种音节的方式发现以后，我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这一个大波的荡动是进步还是退化，不久也就自然有了定论。

五月二十日 《诗镌》提倡的讲求新诗格律，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是日出版的《诗镌》第八号上，刊登天心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信中说"近来诗风，显然是大大的变了。从前长短不齐的句子，高低不平的格式渐渐不见了。渐渐代以整齐的句子，划一的格式了。从前认为无需有的韵脚，现在又渐渐地恢复了。许多人说，这是新诗入了正轨后必然的现象。"不过，信中也说到了一些担心："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恐怕还有一个很不良的背景吧。你只看近来的诗，有许多形式是比较完满了，音节比较和谐了，可是内容呢，空了，精神呢，呆了！从前的新鲜，活泼，天真，都完了，春冰似的溶消了！这个病源若不速行医治，我敢说，新诗的死期将至了！"（天心《随便谈谈译诗与做诗》）

五月二十七日 《诗人的横蛮》发表于《晨报·诗镌》第九号。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对朱湘近来态度的批评，话讲得很不客气，却流露出先生与朱湘关系恶化的原因：

依孔子的见解，诗的灵魂是要"温柔敦厚"的。但是在这年头儿，这四个字千万说不得，说出了，便证明你是个弱者。……我们的诗人早起听见鸟儿叫几声，或是上万牲园逛了一逛，或是接到一封情书了……你知道——或许他也知

道这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件，够不上为它们就得把安居乐业的人类都给惊动了。但是他一时兴会来了，会把这消息用长短不齐的句子分行写了出来，硬要编辑先生们给它看过几遍，然后又耗费了手民的筋力给它排印了，然后又占据了上千上万的读者的光阴给它读完了，最末还要叫世界，不管三七二十一，承认他是一个天才。你看这是不是横蛮？并且他凭空加了世界这些担负，要是那一方面——编辑，手民或读者——对他大意了一点，他便又要大发雷庭[霆]，骂这世界盲目，冷酷，残忍，蹂躏天才，……这种行为不是横蛮是什么？再如果你好心好意对他这作品下一点批评，说他好，那固然算你没有瞎眼睛，你要敢是说了他半个坏字，那你可触动了太岁，他能咒到你全家都死尽了。试问这不是横蛮是什么？

是月　次女闻立燕生。一九二八年夏夭折。

六月三日　《英译的李太白》发表于《晨报·诗镌》第十号。收《闻一多全集》时被编者改作《英译李太白诗》。

小畑薰良是位日本学者，约一九二五年十月到北京。他生长在日本乡下一下旧式门风家庭，父亲极喜汉学，故自幼喜爱中国文化，上小学前就读了《三字经》，以后还在家里或跟村里的和尚学过《孝经》、《忠经》及《东周列国志》、《三国志》、《汉楚军谈》、《吴越军谈》等。小畑薰良曾赴美国留学，在威士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结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一九二二年，他将日本版的李白诗集译成英文，一九二三年由伦敦·多伦多 Dent & Sons 出版。当时，小畑薰良是日本第一份具有学术价值刊物《改造》杂志的主笔，他到北京的目的是收集中国新文学代表作，然后译成日文，为《改造》出版一期中国专号。此举被认为是中日新文学的第一次合作，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小畑薰良在美国时结识了杨振声，给凌叔华带来不小国际名声的小说《酒后》，就是通过杨振声向凌叔华索得交给小畑薰良的。（据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台湾《联合报》，1987.5.6—7）先生乘小畑薰良此次来华之机，对他翻译的英文《李白诗集》做以评论。

在《英译的李太白》中，先生称小畑薰良“是第四个人用自由体译中国诗”者，他的成就比西方几位先行者都高，“而且我们应注意译者是从第一种外国文字译到第二种外国文字，打了这几个折扣，再通盘计算起来，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小畑薰良先生的毅力和手腕”。同时，先生对小畑薰良的翻译也做了坦率的批评，认为译诗“最要注重鉴别真伪，因为集中有不少‘赝鼎’”，“至少好坏要分一分”，要有一种选诗的标准。译诗时，要注意“诗意的美，完全是靠‘句法’表现出来”，因为有些诗“岂只不能用英文译，你就用中国的语体文来试试”，也会“把原诗闹得一团糟”。先生

觉得小畑薰良的毛病"恐怕根本就在太用心写英文了,死气板脸的把英文写得和英美人写的一样,到头读者也只看见英文,看不见别的了"。

先生的评论在引用史实上有商榷之处,朱自清读后写下《关于李太白》一文,予以讨论(刊于六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第一四〇八号),这大约是朱自清与先生最早的文字之交。

小畑薰良也记录过他与先生的一面之交,他《北京闲话》中写到:"我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刊行的周刊杂志《现代评论》看见在哥伦比亚大学交往最亲密,两年前还巴黎碰见过的Y君(即杨振声)的名字,赶紧向该社寄了一封信,过几天Y君就在北京饭店的我的屋子里,现出他的伟硕的身躯了。据说是昨天才从武昌来到北京的。他又说还有一位哥伦比亚时代的友人T君(即先生)现在艺术专门学校,亦赶紧替我请他来了。不过多久,昔时老伙计中的一位河南中州大学的F君亦上京都来了。由他们的介绍,我在北京在学界操觚界里找到了不少的新旧朋友。"(《现代评论》第4卷第86期,1926.7.31) 小畑薰良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日本《改造》杂志"中国特号",经彭浩徐译成中文,取名《北京闲话》。

六月十日 《晨报·诗镌》第十一号出刊。这是《诗镌》最后一号,原拟暑假中将版面借给另一副刊《剧刊》,但《剧刊》结束后,《诗镌》并未继续出刊。

《诗镌》一共只出了十一期,前后七十天,但在新诗的长远繁荣与发展上看,起了积极的作用。朱自清在《唱新诗等等》中说:"至于现在的新诗,初期大部分出于词曲,《尝试集》是最显著的例子,以后的作者,则似乎受西洋影响的多。所谓西洋影响,内容方面是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形式方面是自由诗体。这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幸不久就已用完,重新换上风花雪月、伤春悲秋那些老调,只剩自由诗体存留着。直到去年,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刊行《诗镌》,才正式反对这自由诗体,而代之以格律体。"(《语丝》第154期,1927.11.1) 后来,朱自清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把十年来的诗坛分作三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而格律诗派的代表便是以《诗镌》为标志的。朱自清说:"北京《晨报·诗镌》出世,这是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氏主办的。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应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实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

期的风气。”

在《诗镌》同人中，先生的影响最显著。朱自清在一九三六年写成的《新诗的进步》中，认为格律诗派里“徐志摩、闻一多两位先生是代表”。（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2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而苏雪林则于一九三四年便在《论闻一多的诗》中称：“徐志摩与闻一多为《诗刊》派的一双柱石。徐名高于闻，但实际上徐受闻之影响不少。……徐天才较高，气魄较大，而疵病亦较多，如长江大河挟泥沙而并下，闻则如逼阳之城，虽小而坚不可破。他们都是好朋友，作品之进步得于切磋者至大，我们若戏谓徐为韩愈，闻便是孟郊了。”（《现代》第4卷第3期）徐志摩本人也承认他受先生影响至深，他在《猛虎集·自序》中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徐志摩选集》，第301至3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正因如此，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还说：“《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徐（志摩）氏说他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死水》前还有《红烛》，讲究用比喻，又喜欢用别的新诗人用不到的中国典故，最为繁丽，真教人有艺术至上之感。《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镂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不失其为情诗。另一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诗镌》的终刊，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人对格律诗运动持观望态度，也有人认为诗的“音韵”和“形式”是无所谓的。朱自清在《新诗（上）》中说：“《诗镌》确是一枝突起的异军，给我们诗坛不少的颜色，可惜只出了十一期便中止。它的影响可并不大，虽然现在还存留在一小部分人之中；这或因主张本难普遍，或因时日太短。总之，事实上，暂时的热闹决不曾振起那一般的中衰之势。我想《诗镌》同人在这一点上必也感着寂寞的。有些悲观的人或者将以为这是新诗的回光返照，新诗的末日大概不久就会到临了。我还不能这样想，我所以极愿意试探一探新诗的运命，在这危疑震撼的时候。”（《一般》第2卷2月号，1927.2.5）

六月十七日 《晨报·剧刊》创刊。该刊由张嘉铸提议办起，主要编辑为余上沅，先生与赵太侔曾参与组稿。创办《剧刊》本是想为建立小剧院做准备，这正是先生回国的初衷。徐志摩《剧刊始业》交代了这一点："我们有几个朋友，对于戏剧的技术(不说艺术)，多少可以说是在行。……我们想合起来做一点事。这回不光是'写'两个剧本，或是'做'一两次戏就算完事；我们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内办起一个'小剧院'——记住，一个剧院。这是第一部工作；然后再从小剧院作起点，我们想集合我们大部分可能的精力与能耐从事戏剧的艺术。"办剧刊的主旨在于"宣传"、"讨论"、"批评与介绍"、"研究"。在该刊上撰稿的人除先生外，有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陈西滢、邓以蛰、杨振声、梁实秋、冯友兰、熊佛西、叶公超、杨声初、俞宗杰、顾颉刚、恒诗峰、马楷等。

六月二十四日 《戏剧的歧途》发表于《晨报·剧刊》第二号，署名"夕夕"。收《闻一多全集》。

文章认为西方的易卜生、萧伯纳、王尔德、哈夫曼、高斯俄绥等人的戏剧传入中国，都是注重于介绍思想，而不是介绍艺术。所以"近代戏剧在中国，是一位不速之客，戏剧是沾了思想的光，侥幸混进中国来的"。但是戏剧"除了改造社会，也还有一种更纯洁的——艺术的价值"，然而"戏剧家提起笔来，一不小心，就有许多不相干的成分粘在他笔尖上了——什么道德问题，哲学问题，社会问题……都要粘上来了。问题粘的愈多，纯形的艺术愈少"。先生说"我们该反对的不是戏里含着什么问题"，"我们要的是戏，不拘是那一种戏"，"因为注重思想，便只看得见能够包藏思想的戏剧文学，而看不见戏剧的其余的部分。结果，到于今，不三不四的剧本，还数得上几个，至于表演同布景的成绩，便几等于零了。这样做下去，戏剧能够发达吗?"

六月二十八日 徐志摩为散文集《落叶》写定《自序》，文中云："末了我谢谢我的朋友一多，因为他在百忙中替我制了这书面的图案。"(《晨报·副刊》，1926.7.3)

七月二日 小畑薰良作《答闻一多先生》，经徐志摩翻译，发表于八月七日《晨报·副刊》第一四二七号。下面为《答闻一多先生》一文的节录：

> 闻一多先生新近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的《李太白》英译本的文章。在我所见到的几十篇书评之中，这是独一的，因为写的人不仅是个中国人，并且他自己是一个诗人，也是我相当熟的朋友。再说，这篇文章提出很多中肯的问题及确切的指正，除了中国人是看不到的。我写这篇答复第一是为闻君写了这篇有学识的，周到的，优容的文章，我应分表示深挚的感谢。第二因为闻君文中指出有好几点是一般翻译家都应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少

数人尝试译中国诗的曾经感受的难处。

现行所谓李太白全集是王琦在一七五九年编定的，共收有一千首诗。我的选本只有一百二十四首。评书的人当然要问为什么我刚正选定那几首诗。我在我原书的序文里说过，这选数的大部分是我在涉猎中国文学时期内随时随兴译成积起来的。我唯一的领导是我当时的意兴，我也跟着它走，有时歇了下来就为逢着了文字上的阻难。这样一个选法当然不免漏掉很多好诗以及重要的诗，为什么呢，就为我当时没有翻，或是不能翻。

话虽这样说，在这书付印的时候，我也确曾尽我的力量使这本子在体裁上与形式上足以尽量的代表太白的诗。我也想法子拿他自己的作品来反映他的生平以及他所经历的时代。为此，有几首诗，例如寄内诸作，不问诗的本身价值如何，也给选上了。因为在那几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他生平人情方面的一斑；还有那首像悼他的日本朋友的选入也为要表示诗人自己以及他那时代吴越一家的气概。另外有几首是李白同时代人做了送他的，也为同一理由我给选入了。

关于某几首诗真伪性的考订，闻君文中有详细的讨论，这问题在研究汉学的人固然有趣而且重要，但就我出书的旨趣说，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那书的意思是介绍一个在中国最有名的古诗人给欧西的文坛，选译的诗也是在中国一般人认为是他的作品的，因此我在诗人的小传中也收集了好些传话的逸事。

谁都没有我自己觉得我的译文的不到家与种种缺憾的地方。关于这一层，我十分感谢闻君好意的优容的态度，我尤其佩服他的细心，他在我那集子里最长的一首译诗（也是李白集中是最长的一首）的两行遗漏都给我找出来了。

闻君说李白有知名的诗谁都没法子翻成恰到好处的英文。这话是对的。本来从一种文字翻成另一种文字，其间的困难就不知有多少。那还是就两种文字是相近的说。至于文字的差别远如中文与英文。那时翻译的难处简直是没法想的了。单说通常名词与词句就够困难。因为彼此没有确切相符的句格或思想格式。严格的说，英文的 Woman，德文的 tran，法文的 femme，都还不是永远可以对换的，因为每个名词的背后都含着独有的国民性的或是民族性的特性，这一家有的，那一家不一定有。在英文里面就没有恰当的字可以替代中文里妻或是妾，侠客或是丈夫。我们竟可以说 home 译家字，hat 译冠字，shoe 译袜字，都是不对的。尤其是一逢到成语的表情，直译简直是不可能。

……

翻译人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中国文的文法不清楚，时间与数量的辨别既是没有，人身代名词又用得绝少。结果往往同是一节书，而有几种不同的解法。再说呢，他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将某一段书在他心中所引起的心影转译成另一种语言，他看到那儿就是那儿。关于这点我得承认在译“赠汪伦”那首诗我是太随便了，我在译文里平白地给添上“your friends”，这在原诗意思里许隐含着，但在字面上绝无根据，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李白走的那天送别的决不止汪伦一人，我可以想见一个乡村中的先生同着一群朋友在河岸上“踏歌”着来送诗人的行。

……

综起来说，就是重复我原书序里的话，我在译文中尽有地方作添补字句的意译。我也有地方略去不重要（甚至重要）的字句。很多专门名词我丢开不译，或从意择。这种情形在崇拜李白的人看来很是大不敬的亵渎了他的艺术。我并不来在这类翻译方法上替自己作辩护。我只要对好叫闻君以及别人感着兴味的说明我的原委，给他们再下批评时一点子参考就是。

闻一多君说翻译是煞风景的事业是不错的。我听说甜味的橘过了江就会变种成苦的枳。我也明知道中国诗是一种娇柔的鲜花，一经移杆，便不免变性。但变不一定是变坏，莎士比亚说的“海变”，这变的结果是变成某一种“富丽而奇异的东西”。翻译在文学上有时是一种有效果的异种播植。再说，且不论译文全身艺术上的价值，单就使某种民族对另一种民族的文化发生兴趣这点子实在的功用，也是不该忽视的。

近年来欧美注意中国文学的事实是一个使人乐观的现象：韦雷君以罗威尔女士的译本极受欢迎不说，就我这部书印得比他们的迟，也已经到了第二版的印行。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兴味终究不仅集中在他的商场与土地上。他们也何尝不急急想发现中国文学的宝藏，这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法接近。翻评这事业，不论怎样细小或不准确，总还是他们寻得一个灵性的中华的起点，这里的财富许比他们老祖宗们所梦想的藏金地方更来得神奇呢。我恳切的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们，有学问的乃至爱文学的，都会注意到这部分的工作，这事业的成功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的利益。

《晨报·副刊》在刊登小畑薰良这封信前，译者徐志摩做有《附记》。其文云：

在本副刊的某期刊上，闻一多先生曾经印过他的小畑薰良先生英译李太白的评文。小畑先生看了说有应得答复的地方，我就请他写，但他为公事忙直

延至七月初才写起，碰巧我又回南了；他的大文在我的尘封的书案上竟酣睡了这一个整月。我现在把这翻了出来，对不起小畑先生，我没有用心翻他这篇翻译极有启示的文章。我们都得感谢小畑先生，不为别的，就为他爱中国文学的一点真心。说也惭愧，我们自家的诗人还得劳邻居先生和手笔来翻译给别家看！我们得感谢小畑先生.因为他这次在北京住了几个月，虽则他有他的外交性质的公干，他大部份光阴是化在结交中国朋友上面的。他是一个"好朋友"；他会喝酒，会闹，会笑，我们接近他的都觉不出他是一个日本人或是外国人；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一点也没有分别。这也许是他浸润于中国文学工夫够深了的缘故，要不然他那能这样的随便，这样的好兴趣，这样的"落拓"。有了他我们觉得中国与日本可亲的程度加深了一层，不幸的外交上与政治上的障碍似乎至少退远了一步。他是懂得我们的；我们从不曾见他穿上黑光光的大礼服，戴上黑光光的大礼帽，那是我们最怕见的。现在听说小畑先生快回国了，这消息很使我们感着惆怅，但我们没法留住他；我们只盼望这穷极无聊的北京社会的实际，不曾些微减谈他从文学上对中国民族的敬意与爱心。小畑先生应得知道，假如他这半年来吃着我们的满汉全席以及四五十年的阵[闻案：疑是陈]花雕，这不是我们礼貌不周，我们实在是——没法想！我们盼望他再有机会回来。他的中国朋友永远会记着他的。

七月十五日　邓以蛰为《戏剧与道德的进化》一文致先生与赵太侔、余上沅的信刊于《晨报·剧刊》第五号，中云："你们给我拟的题——《杨小楼》——我都搁下了。"

是月下旬　携眷返浠水。梁实秋《谈闻一多》："我在七月里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多已经忍不住北京八校欠薪以及艺专风潮迭起的压迫而携眷返里了。"（第 72 页）其实还有一原因，即时冯玉祥国民军已退出北京，奉系军阀控制局势，北京文人少有言论自由，纷纷南下。不久，赵太侔、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饶孟侃等亦先后到了上海。

在浠水老家，作诗《夜歌》。收《死水》。闻家驷说这首写坟里鬼影的诗，有重大的社会背景，因为农村落后，生下孩子常养不活，坟地常有哭声，人说是产妇的阴魂，《夜歌》实际上是写农村的文化落后。（据访问闻家驷记录，1986.10.7）

八月十四日　与杨振声、余上沅、丁西林、陈西滢及刚刚回国的梁实秋等，至北海参加徐志摩、陆小曼订婚宴。杨振声在这次宴会上首次与梁实秋见面。（季培刚《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第 43 至 44 页，黄河出版社 2007 年 8 月出版）

八月　在浠水住了些天，便只身到上海，住在潘光旦家中。时，潘方于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任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

九月十六日 与赵太侔、余上沅、孙伏园于上年七月共同草拟的《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始刊于《晨报·剧刊》第十四号，十五号续完。文前有余上沅所作引语《一件古董》，叙述几位朋友关于建筑一座小剧院的梦想："去年我和太侔、一多回国之后，便邀着伏园，共同订了一个《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当时我们的希望很大，剧场建筑和设备，就开了二十万元，以致见了的人个个咋舌。我们正在设法缩小数目的时候，艺专已经成立，我们的精力遂集中于戏剧系了。可是，在建筑剧院的努力上，我们还是没有懈怠。一年以来的时局，是大家知道的，所以虽经奔走，也没有满意的结果。然而我们总没有失望，因为，假使演员方面有了相当的成绩，建筑剧院并不是十分的难事，那怕这个剧院不能像我们从前所希望的那么大。'建筑一座小剧院'，是我们和许多朋友们惟一的甜梦。去实现这个甜梦，那要靠中国戏剧社等团体以及一般热心戏剧的人努力了。只要大家能够百折不回，谁说建筑一座小剧院永远是个梦呢？"

九月二十三日 余上沅《一个半破的梦——致张嘉铸君书》刊登于《晨报·剧刊》第十五号(最后一号)。文中诉说了他与先生以及赵太侔、张嘉铸的结识，在美国的戏剧活动，回国后发起国剧运动的经历和坎坷，并且承认面对社会现实这一努力是失败了。文中说："社会，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屹立不动的社会，它何曾给我们半点同情？《剧刊》的本身我承认并未失败，可是我们第一个希望，社会的觉醒，这是失败了的。社会既不要戏剧，你如何去强勉它？社会要戏剧，目下的情形不容它要，你更如何去强勉它？我们应该有一个觉悟，我们应该承认从前走的路不是最好的一条路。"这种感受，先生也是有的。同样的信，余上沅给先生、徐志摩、赵太侔、熊佛西各有一封。

是月 受聘为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该校原为国立自治学院，一九二五年十月四日改政治大学，校长张嘉森(君劢)为先生好友张嘉铸的哥哥，也是国家主义有力鼓吹者。校中教授有瞿世英、陈石孚、吴国桢、潘光旦等，均系先生清华时同学。

十一月十六日 诗《往常》发表于国立政治大学学生刊物《政治家》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三号。这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陈建军发现的一首佚诗，并认为是"为长女闻立瑛而写"。全诗如下：

往常听见咳嗽的声音，
听见那里打了一个喷嚏，
我知道谁是你的仇人，

我知道风霜又欺服了你。
往常我日夜受着虚惊！
我灵魂边上设满了烽堠；
只要你远远的哭一声，
我可以马上加鞭来营救。
往常你偶尔也笑一声，
像残灯里吐出一丝红焰。
你笑一回我便吃一回惊！
知道这笑还支持得几天？
往常你突然叹息一声。……
四岁的孩子为什么叹息？
我当时抽了一个寒噤，
再不敢问那一叹的意义。

是年冬　长女闻立瑛夭折，时不满五岁。这年离开北京时，她就生着病，路上颠沛，医药无着。先生到家又忙着寻找工作，离开浠水后，孩子病情加重，常喊“爸爸、爸爸”。先生刚有工作，不便请假，只好寄张照片回来，孩子看着照片又哭起来。立瑛很聪明，“人手刀足”识字课本都能念完，只是身体弱些。先生非常喜爱立瑛，回家先要抱她一会儿。每当先生拿下礼帽时，她便知道爸爸要出门了，就喊起来，先生总是悄悄把礼帽先拿出屋，再慢慢溜出去。孩子早夭了，妻子大病一场，先生的父母怕先生分心，没告诉他，还是妻子写信讲了情况。先生得信，十分悲痛，立即赶回浠水，没进家门就先打听立瑛的墓地。后来看到她用过的东西和读过的书本，还很小心地把它包起来，在上面写上：“这是立瑛的。”不久，又写了诗《忘掉她》。

（据刘烜《闻一多评传》，第131至1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

一九二七年　二十九岁

一月一日，国民政府定都武汉。

二月十九日，英国交还汉口、九江租界。

三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国共合作失败。

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

八月十九日，“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并入南京国民政府。

一月　在浠水老家。有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

大札到时，时局不靖，政大内部亦起恐慌，遂迟作答。归家后，家人忙于办年，亦未免习俗移人，终日碌碌。今夜为内子授诗，课毕稍暇，因拂笺急书数语奉上，以释悬念。迟迟，谅不我罪也。政大当局下年或有更动。万一大局不变，君劭仍在彼方，弟自亦无问题。否则恐须另谋生路。这年头儿我辈真当效参军痛哭也。别后诗思淤塞，倍于昔时。数月来仅得诗一首，且不佳。惟于中国文学史，则颇有述作。意者将来遂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乎？

二月　春节后，离浠水到武昌，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艺术股股长，并兼总政治部英文秘书。章伯钧《哀悼闻一多先生》：“民国十六年中国大革命时代，闻先生曾因朋友的介绍，由北京到武汉，应邓演达先生之邀约，参加总政治部工作，约在是年二三月间(?)。闻先生到部任艺术股股长，并亲自绘制反军阀的壁画一大幅。后来因为闻先生颇不惯于军中政治生活，受任一月即行告退。我与闻先生交游仅此一度。”(《人民英烈》，第196至197页)

这段经历，先生不愿对人提及，连朋友亦知者甚少。不久，仍回上海吴淞政治大学。

四月　北伐军入上海后，下令封闭国家主义派之据点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先

生再度赋闲，栖身潘光旦家中。

时，潘光旦等朋友在《时事新报》任副刊编辑，先生作些诗文，以酬朋友之约。

五月九日　与饶孟侃合译的诗《我要回海上去》(John Mansfield[①] 作)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全诗如下：

我要回海上去，再回到荒凉的天涯海角，
我要求的是一只楼船，一颗星儿作她的向导，
还有龙骨破着浪，风声唱着歌，白帆在风里摇，
海面上一阵灰色的雾，一个灰色的破晓。

我要回海上去，因为那一阵潮水的呼声，
是狂暴的呼声，嘹亮的呼声，你没有法子否认，
我要求的是一个刮风的天儿，还飞着些白云，
再加上海水翻着浪花儿，海鸥也在叫您。

我要回海上去，再过那飘泊的生涯才好！
走上海鸥的道，鲸鱼的道，那里的风像把快刀；
我要的是做完了活，大伙儿谈着天儿说着笑，
临了，来一场甜蜜的梦，一宿安稳的觉。

五月二十日　诗《心跳》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收《死水》时有个别字改动。抗战期间先生在昆明选诗时，将诗题改作《静夜》。该诗表现了先生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修改前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这神秘的静夜，这浑圆的和平，
我喉咙里颤动着感谢的歌声。
但是歌声马上又变成了诅咒，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最好让这口里塞满了沙泥，

① 曼斯菲尔德，英国诗人。

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
最好是让这头颅给田鼠掘洞，
让这一团血肉也去喂着尸虫，
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一本诗，
静夜里一片钟摆摇来的闲适，
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
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
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
各种的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贿，
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
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
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五月二十一日 诗《贡献》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全诗如下：

红灯下我陪你们醉酒，
沙发上我敬给你们两支香烟，
我陪着你们坐车子，走路，吃饭，
仿佛一天天我也有我的贡献。

给你们让着路，点着头，
你们打扮好了，我替你们惊羡，
你们跟来了，我抛下一只铜板——
不要误会了这就是我的贡献。

有时悲哀抓着了我的心，
我能为人类的苦痛捏一把汗，
我能哭得像婴孩，在一刹那间——
这刹那间才是我最伟大的贡献！

五月三十日 诗《荒村》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收《死水》。

这是有感于五月十九日《新闻报》上一条消息而写下的，诗前摘录该消息中的一段话作引言："……临淮关梁园镇间一百八十里之距离，已完全断绝人烟。汽车道两旁之村庄，所有居民，逃避一空。农民之家具木器，均以绳相连，沉于附近水塘

稻田中，以避火焚。门窗俱无，中以棺材或石堵塞。一至夜间，则灯火全无。鸡犬豕等觅食野间，亦无人看守。而间有玫瑰芍药犹墙隅自开。新出稻秧，翠蔼宜人。草木无知，其斯之谓欤?"五月十九日，正值直鲁联军张宗昌部集中于蚌埠、临淮，欲与南京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李宗仁部大战之前夕，《荒村》即写了战前乡村荒颓的场面，语中暗伏谴责军阀混战。

是月　痰中出血丝，遂接受朋友劝说，与潘光旦游杭州以宽心。在杭州购有扇、杖、石。其情形见署名"慎"所作之《纪诗人西湖养病》：

有一位诗人，姑隐其姓氏，当今文坛知名之士也。前几天，饭后咳嗽，居然呕出一口痰来，而痰里隐隐约约的有类似血丝的附带的东西，并且这种东西竟有七八条之多，诗人大恐，马上做出一首诗来："这景象是多么古怪多么惨[①]！这到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吟声未罢，打了一个寒战，揽镜自照，脸色发白，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友朋闻说，争来问询，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曷不食鱼肝油乎?""曷妨试试自来血乎?"有某君者，爱才心切，力劝赴杭一游，以为消遣，谆谆劝驾，声泪俱下，诗人不得已，遂成行焉。

诗人到杭，寓湖滨旅馆，诗兴大发，饮食俱进。不数日，病有起色，吐痰渐成清一色，不复有红色之点缀。然病体犹虚，每餐只能啖饭五六碗[口?]耳。

有一天，天气清和，诗人摇摆而出，曰："咦！我要到湖边走走。"诗人蓬其首，垢其面，宽衣博带，行动生风。俯仰之间，口占一首："啊！水这样的绿，山这样的青！这样的一个诗人生这样的病！"似乎短一点，然而诗人倦了，额际有一股热气冉冉上升，两颗汗珠徐徐下流。诗人长太息曰："我要买一把扇子。"

行行重行行，到了一家扇庄，柜台上聚着许多大腹贾，选购纨扇，叫嚣不已。诗人曰："此俗人也，不可与同群。"不顾而去。又到了一家，有赤背者一，立于肆首，诗人疾驰而过，愤甚。

最后，到了一家小扇庄，肆主乃一妙龄女郎也，诗人莞尔而笑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游目四视，乐不可支。忙里偷闲，选购扇子一把，价绝昂，较普通之价加倍，而诗人购扇，固不在扇，更不在扇之价也。

翌日，挈友游湖，至龙井，见有售司提克[②]者，诗人曰："此物甚雅，可入诗。"遂购一柄。又有售顽石者，诗人曰："此物甚雅，可入诗。"遂购一块。于是一杖一石一

① 此即《荒村》中之句。
② 即手杖。

诗人，日暮而返。

以手探囊，羞涩殊甚。急搭四等车返沪，囊中尚余大洋一角，铜币十余枚。诗人病已霍然愈矣。（《时事新报》，1927.6.10）

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先生心情沉重，与潘光旦交换看法。王康在《闻一多传》中记述有潘光旦后来的回忆，大意说：按照生物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当是优胜劣败，可社会学反映的却往往不是这样，那些优秀的先进的勇敢的健壮的人，按优生学观点应得到鼓励与繁殖，却常在社会变革中遭到不幸。潘光旦认为眼前大批仁人志士被屠杀，就是"反淘汰"。先生则认为"反淘汰"的认识是错误和危险的，反问道：难道说人人都谨小慎微、明哲保身，才合乎"适者生存"的原则吗？先生还说潘光旦"总是跳不出那优生学的圈套，你想保护你所谓的优秀者，究其实是宽容了世故庸人和胆小鬼！"（第117至11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出版）

返沪后，同人起议筹办新月书店，先生虽为其中一员，但并不积极。时，梁实秋、余上沅、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刘英士等友人都在一起，他们对先生的印象是"总是栖栖皇皇不可终日"。（梁实秋《谈闻一多》，第78页）

时，闲居无事，操刀为友人治印，曾为梁实秋刻闲章，文曰"谈言微中"。又为潘光旦刻藏书章，为阴文"抱残守阙斋藏"。还为余上沅、刘英士等人治印。

六月十八日　诗《罪过》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收《死水》。这首诗用白话写成，与《天安门》、《飞毛腿》排在一起，大约写于"三一八"惨案前。

六月二十三日　诗《一个观念》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收《死水》。先生偏爱这首诗，抗战时期选编《现代诗钞》，收入自己的九首旧作，其中将《一个观念》与《发现》合列作《诗二首》。

这是一首爱国主题十分显明的诗，朱自清在一九四三年写成的诗论《爱国诗》中，特别介绍了这首诗，说："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且先看他的《一个观念》：……这里国家的观念或者意念是近代的；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这个国家意念是抽象的，作者将它形象化了。第一将它化作'你'，成了一个对面听话的。'五千多年的记忆'，这是中国的历史。'抱得紧你'就是'爱你'。怎样爱中国呢？中国'那样美丽'，'美丽'得象'谎'似的。它是'亲密的'，又是'神秘'的，怎样去爱呢？它'倔强的质问'为什么不爱它，又'缥缈的'呼喊人去爱它。我们该爱它，浪花是该爱海的；难爱也得爱，节奏是'不该抱怨歌'的。它'绚缦'得可爱，却又'横暴'得可怕；爱它，怕它，只得降

了它。降了它为的爱，爱就得抱紧它。但是怎样'抱得紧'呢？作者徬徨自问；我们也都该徬徨自问的。陆放翁的《示儿》诗以'九州同'和'王师北定中原'两项具体的事件或理想为骨干。所谓'同'，指社稷，也指民族。'九州'便是二者的形象化。顾亭林说'匹夫'，也够具体的。但'一个观念'超越了社稷和民族，也统括了社稷和民族，是一个完整的意念，完整的理想；而且不但'提示'了，简直'代表'着，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这种抽象的国家意念，不必讳言是外来的，有了这种国家意念才有近代的国家。诗里形象化的手法也是外来的，却象征着表现着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可是理想上虽然完美，事实上不免破烂；所以作者徬徨自问，怎样爱它呢？"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57至358页）

六月二十五日　诗《发现》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署名"屠龙"。收《死水》。

这也是一首爱国情绪十分热烈的诗作，一九四四年先生将它与《一个观念》合题作《诗二首》编入自选的《现代诗钞》。诗云：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我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你在我心里！[①]

七月一日　新月书店在上海华龙路正式开张，总发行所初在望平街，次年迁至四马路中市九十五号，编辑所设在麦赛尔蒂罗路一五九号。董事长为五月底自美国刚刚回国的胡适，经理兼编辑主任为余上沅，先生与徐志摩、梁实秋、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胡适、余上沅等十一人为董事（罗隆基于一九二八年夏回国后加入，邵洵美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亦加入）。书店股本约两千元，为了节制资本，大股百元，小股五十元，先生亦认了一大股。

① 此句在《现代诗钞》中改"你"为破折号。

新月书店实际上是个同人合办的书店，它最早出版的一批书，多数为一般朋友们著译的。

开张之前，先生特为开幕纪念册绘制封面，“画着一个女人骑在新月上看书，虽然只是弯弯曲曲的几笔线条，而诗趣横生”。（严家迈《新月书店参观记》，《时事新报》1927.7.2）

七月十四日 《诗经的性欲观》开始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署名“一多”。至二十一续完。

这是先生最早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撰写的学术论文，力图还原《诗经》的本来面目。其中主要观点与传统的经学家大不相同，所以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重视，以致《全集》中亦未收入该文。但是先生研究古代文化，其认识与本文有相当联系。

文中认为《齐诗·东方未明》中的“折柳樊圃”与性欲有关，《谷风》中所讲到捕鱼的“笱”，也是隐喻女阴，许是与“媾”、“觏”有联系。又说《诗经》中常出现“风”和“雨”，也是性欲的冲动，后来引申为“风流”、“风骚”之风，也含有性的意味。《野有死麕》、《桑中》、《载驱》等，都暗示着性交。《小星》、《大车》、《葛生》也都是情诗，类似的例子文中举出许多。先生说：“前人总喜欢用史事来解《诗经》，往往牵强附会，不值一笑”。其实“象征性交的诗”，“是出于诗人的潜意识”。“我的主意是要证明《诗经》的时代虽然出了几个圣人(?)，却还不是什么黄金时代”，“《诗经》时代的生活，还没有脱尽原始的蜕壳，现在我还要肯定的说一句，真正《诗经》时代的人只知道杀、淫”。又说“不管十五国风里那大多数的诗，是淫诗，还是刺淫的诗，即便退一百步来讲，承认都是刺淫的诗，也得有淫，然后才可刺”。所以认清了“《诗经》是一部淫诗，我们才能看到春秋时代的真面目。可是等看到了真面目的时候，你也不必怕，不必大惊小怪。原始时代本来就是那一回事”。

七月十五日 诗《收回》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署名“屠龙”。收《死水》。诗的第一段云：

那一天只要命运肯放我们走！
不要怕；虽然得走过一个黑洞，
你大胆的走；让我掇着你的手；
也不用问那里来的一阵阴风。

七月二十日 上午十时，南京市土地局在市政府礼堂举行成立典礼，局长桂崇基宣誓就职。桂崇基与先生相识于美国纽约，曾一起参加过纽约华侨联合举办的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桂初任局长，聘先生来南京任职。梁实秋《谈闻一多》：“暑中

经友人介绍，到南京土地局任职，所任究系何职，他从来没对我讲起过，无论如何那总是人地不宜的一个职务。所幸他供职的期间很短。”（第 78 页）

七月二十六日　诗《什么梦》（修正稿）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收《死水》。

八月初　约这时，与南京东南大学接洽，希望到该校任教。经与该校商谈，初定以外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聘请先生。

时，该校文学院院长是第三届庚子赔款留美生梅光迪，说起来也是清华校友，但他在美国哈佛任教未归，先生接洽的是曾在新文化运动中主编《时事新报·学灯》、时为该校哲学系教授的宗白华，并很自负地说要做西洋文学系的主任。（据访问冯友兰记录，1988.6.16）

是月中旬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决定将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江苏境内四所公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以东南大学为校址，先生亦一同被聘入该校。

第四中山大学为国民政府所建立的最高学府，为严格教员资历，所属十个学院均规定只暂聘副教授，教授则有待在世界学术界取得声望者方得聘任。时外国文学系已聘定的副教授有先生、张欣海、张士一、陈源、蒯淑平、陈登恪、汤用彤，该系课程设置“分拉丁英法德意及其他各门，意在对于西方文化作整个之研究，打破偏重英美之旧习，以为融会中西文化之先导。此外又加梵藏蒙回日各门，俾得研究东亚诸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之关系，为东亚各民族结合之准备。各系教务人材，极一时之选”。（《第四中大两学院之教务人员》，《申报》1927.8.22）先生所任为文学院外文系副教授。该校所聘副教授还有姜立夫、熊庆来、叶企荪、吴有训、桂质廷、严济慈、张景钺、竺可桢、李四光、雷海宗、宗白华、钱端升等，文学院聘请的专任教员除先生外，还有楼光来、崔萍村、姚仲实、王晓明、王伯沆、陆志鸿、何王桂馨、赵伯颜、陈登恪。（《第四中山大学校务会议当然委员及专任教员名单》，东南大学档案馆藏）

八月二十五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对离开南京土地局，说：“老桂（桂崇基）撤差，我的官运当然也告一段落了。”又说：“第四中大虽然接洽好了，可是开学没有希望。”时，杨振声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又想去广州，信中云：“昨天写信给杨金甫想上广东，实秋讲我到处云游，索性游远一点，不知能如愿否。”又讲到篆刻：“说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近来摹印，稍有进步，应酬也渐渐麻烦起来了。”

时，先生心情不佳，治印聊以自慰，信中附印模五方，其一刻着“壮不如人”，旁

书:“转瞬而立之年,画则一败涂地,诗亦不成家数,静言思之,此生休矣! 因作此印以志恨。”

是月 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由新月书店出版。先生为其绘制封面,以浓重的夜色为底,零乱散布着凝目、侧耳、正鼻及纤细的手指、长腿、懒足等,以启示本书是从各个角度反映光怪陆离的巴黎都市生活。

是月 徐志摩、沈性仁合译的爱尔兰作家詹姆士·司蒂芬的小说《玛丽·玛丽》由新月书店出版。封面为先生绘制。

是月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①]。前次托饶孟侃将自己放在上海的一些东西,转刘英士带来南京,然而带来的却是不急用的东西,先生不高兴,因为他正急要几本英文诗,所以信中拜托饶孟侃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转赵叔愚带来。信中还说:“朋友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做人也是如此,有享权利的时候,也有尽义务的时候。”时,先生刚刚两次病后,身体极坏,又在失业中,花不起来往的十几块钱,所以不能亲往上海。

九月一日 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开学。二十七日上课。先生受聘为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至此,方有一比较稳定的栖身之处,并在学校附近的单牌楼三号(过家花园)里租了房子,准备将家眷接来。单牌楼为第四中山大学西侧面临四牌楼街的一个小巷,与学校仅隔一南苍巷,距鼓楼甚近。单牌楼西为进香河,有船可通鸡鸣寺。

旋,介绍大夏大学教授方重来校任教。(据访问方重记录,1986.8.27)

九月十日 诗《口供》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一期。收《死水》,列为第一首,似可作为序或自白。诗云: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

① 该信未具日期,《闻一多书信选集》称写于秋季,然信中有“失业”等语,似在9月之前。这里暂系8月。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九月十七日　诗《你莫怨我》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二期。收《死水》。

九月二十一日　长子闻立鹤生于浠水。

是月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说"关于诗选要同小叶商量许多问题"。小叶，即叶公超，名崇智，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时，先生与他合作选编翻译注释《近代英美诗选》。叶公超的中学、大学均在国外就读，所以中文不如西文，先生曾戏称他为"二毛子"。梁实秋《悼叶公超先生》："本来他不擅中文，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闻一多先生曾戏谑的呼他为'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的精通洋文而不懂国故。公超虽不以为忤，但是我冷眼观察，他却受了刺激，于英国文学之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变了一副面目，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转引自秦贤次编《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第7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是月　徐志摩的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由新月书店出版。先生对其诗提出过若干修改建议，徐志摩在该书《自序》中说："我也感激闻一多先生，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徐又在《猛虎集·自序》中说："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

是月　余上沅选编的戏剧论文集《国剧运动》由新月书店出版，序中说："这本书的编成，承徐志摩、闻一多、张禹九三先生的帮助。"时，余上沅的太太陈衡粹也为新月出版的图书作封面绘画，先生曾给她热情指导。（据访问陈衡粹记录，1989.3.4）

是月　潘光旦探讨女性心理变态的论著《小青之分析》[①]出版，扉页插图为先生绘制。该书《叙言》中云"篇首插图为闻一多先生手笔"，即先生所作的插图《对镜》；一九二九年八月再版时未收，《再版附言》："闻一多先生代作之对镜一图，以印刷模糊，传真不易，兹割爱舍去。"这幅插图原稿，后辗转到先生的学生孙作云处，孙珍藏多年又转赠画家潘洁兹先生，得以保存至今。

十月八日　译诗《樱花》（译郝斯曼诗）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五期。全诗三段十二行，仍用格律：

---

① 后来再版时改名为《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

最可爱的如今是樱花，
鲜花沿着枝桠上悬挂，
它站在林野的大路上，
给复活节穿着白衣裳。

算来我的七十个春秋，
二十个已经不得回头，
七十个春减去二十个，
可不只剩下五十给我？

既然看看开花的世界，
五十个春说不上多来，
我得到林子里去望望，
那白雪悬在樱花树上。

十月十九日 译诗《希腊之群岛》(译拜伦诗)，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十一期。

十月二十九日 译诗《像拜风的麦浪》(译 Sara Teasdale 诗)，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八期。

十月三十一日 出席第四中山大学筹备会议第四十次会议，主席胡刚复。会上，胡刚复提议特别生退费及中三院公债偿还问题、组织校徽校色校章校歌委员会两案。其中校徽校色校章委员会，议决推定先生与周子竞、李毅士、吕凤子、刘福泰为委员，由周子竞召集。(《第四中山大学筹备会议第四十次会议记录》，东南大学档案馆藏)

是月 原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学生刘开渠到南京觅职，住在先生家里。刘开渠《雕塑艺术生活漫忆》：十月"我到了南京，去找闻一多先生，他正在南京大学[①]教学。他听了我的叙述后，很同情，不仅留我住下，而且介绍我到文学院当助教，但未成功"。(《刘开渠美术论文集》，第 265 页，山东美术出版社 1984 年 8 月出版) 刘开渠觉得不能老吃住在先生家，便去找张奚若先生，经张介绍到大学院油印组做些刻蜡板之类的工作。刘开渠曾在北京艺专西洋画系从先生学油画，参加过"三一八"运动。是年三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次月被害，同时被害的还有北京艺专学生谭祖尧，谭的尸体即是刘开渠、李琬玉、丁月秋等艺专同学所掩埋。这年夏天，刘毕业到上

① 误，当为南京第四中山大学，1928 年 2 月一度改称国立江苏大学，5 月改为国立中央大学。

海，未找到工作遂来南京。

是月　秋郎（梁实秋）的小品文集《骂人的艺术》出版，先生为该书绘制了封面。

十一月五日　译诗《礼拜四》（Edna st－Vincent millay[①] 作）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九期。全诗如下：

即使我礼拜三爱你，
　你管它做什么？
礼拜四我并不爱你，
　却一点也不错。

我真不懂，你何为还
　找着我来纠缠。
礼拜三我爱你——对——
　可是那与我又何干？

是月上旬　父亲与家眷来南京。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夫人携长公子立鹤——生四十日——来到南京"，"先生尊翁此时也来南京同住。"（《闻朱年谱》，第24页）母亲也来了，不过两位老人因过不惯城市生活，没多久就返回故里了。

家眷搬来后不久，先生见到刚自美国学成回国的浦薛凤。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嗣即游览南京，无意中在中央大学附近，途遇一多，相见甚欢，蒙坚邀至其家中午饭长谈。甫行数步，有其友走过当即介绍，知是罗志希（家伦）君。是午，承闻大嫂（高孝贞女士）亲自烹饪，菜肴丰富。"（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7）

十一月十六日　第四中山大学发布第十八号布告，内容为选举校务委员会出席代表名单，文学院投票选举先生为代表。（《第四中山大学选举校务委员会出席代表名单》，东南大学档案馆藏）

是月　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举行教授会议选举教授代表，以参加本校最高立法机关校务会议，体现教授治校的精神。结果先生与汤用彤、蔡无忌、竺可桢、吴有训、沈履、张景钺、宗白华等三十六人当选。（据《四中大校务会议委员选举结果》，《时事新报》，1927.12.5）

十二月三日　诗《"你指着太阳起誓"》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十二期。收《死水》。后先生在抗战中编选《现代诗钞》，收入自己的九首诗中，这首排在

①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蕾，美国诗人，二三十年代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女诗人中最杰出者。

最前面。该诗为十四行诗体例。

十二月四日 致饶孟侃信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书报春秋》第二十九期。仅一句话:“李金发君交来一文,请转交《文艺周刊》编辑发表。拜托拜托!”

时,李金发诗集《为幸福而歌》出版,谢曼有书评刊于十一月六日《书报春秋》第二十六期。旋,王帷唯作《看谢曼评〈为幸福而歌〉之后》进行反批评。李金发将王帷唯文转与先生,并致信云:“一多仁兄先生:虽说您在本京,但我因地方不熟,莫由拜望;何时有暇,请至敝处闲谈。兹有学生王君做小文一篇,欲在你的《文艺周刊》上登载,因为还觉得有趣,特代介绍一下。天寒风厉,诗兴何如?即请。弟李金发。”先生对李金发并无成见,便将其信与王帷唯文一齐转寄饶孟侃。但《书报春秋》编辑因王、谢各执一端,故未即刊登。直到谢曼再作《再说〈为幸福而歌〉》时,两篇文章才同时发表,并附上李金发致先生的信,及先生致饶孟侃的信。

十二月三十一日 译诗《春斋兰》(译郝斯曼诗)发表于《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十六期。全诗如下:

春来了,走出来逛逛,
　　绕着那丛芜的陂陀,
你瞧,那洼地的近旁,
　　荆榛底下,一朵一朵,
　　不是莲馨花是什么?

还有那迎风花,你看,
　　和阵阵的春风游戏,
再有就是那春斋兰,
　　他是没有几天待的,
　　许要死在复活节里。

既然在游春的时候,
　　莲馨你还看得见他,
你看得见迎风依旧,
　　和春风自在的玩耍,
　　看不见的只水仙花。

那么把筐子带着罢,

快冲进春光的世界，
从山上采，采到山下，
把水仙花都带回来——
水仙花死得那样快！

原诗有尾注："春斋兰(Lent Lily)便是 Daffodil，或译作水仙花。"

是月　"世界室主人"(张君劢)的《苏俄评论》出版。封面为先生设计绘制。(据《新月》创刊号广告)

《苏俄评论》要目有：《俄国革命前之思想变迁》、《十一月革命》、《红军》、《俄宪之虚伪》、《无产专政中之专政》、《新生计政策之前因后果》、《苏俄之财政币制》、《俄国之东方政策》、《托劳孽几口中之吾国革命》、《俄共产党之内讧》、《俄共产党处置新反对派之经过》、《俄政治前途之危机》。

是年冬　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学生陈梦家拜访先生。陈梦家，原名漫哉，是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的新生。他对新诗和戏剧都有浓厚兴趣，故听了先生的"英美诗"课后，就到单牌楼附近的先生寓所来求教。陈梦家在《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中说："大约是一九二七年[①]的冬天，我在南京单牌楼他的寓所里第一次会到他，他的身材宽阔而不很高，穿着深色的长袍，扎了裤脚，穿着一双北京的黑缎老头乐棉鞋。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厚厚的口唇，衬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他给人的印象是浓重而又和蔼的。"(《文汇报》，1956.11.17)　先生看了陈梦家的习作，觉得此人有些才华，有意加以提携。

与陈梦家同时考入第四中山大学的方玮德，也于此时暗下跟先生学习写诗和评诗，以至数年后先生才偶然知道他还是自己的学生。方玮德是安徽桐城人，先生曾说他有"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这在"大家正为着摹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尤为可贵。(《悼玮德》)

先生这时器重的另一个学生费鉴照，是随东南大学并入第四中山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费鉴照不仅跟先生学作诗，还学新诗评论。他评论过不少英美诗人，几乎没有一篇不请先生指教过。

是年　为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绘制封面。该书收入梁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所写成的九篇论文，反映了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先生根据这种倾向，把封面设计成布满整齐排列并占满全页的印章，印章上刻出阴文朱文的"浪漫"与"古典"，以使其适应并突出了书中的内容。

① 原文作 1928 年，似误。

一九二八年　三十岁

一月六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颁布《关于重订新条约之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由此开始。

二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上海创刊。五月，迁南京。

六月四日，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

六月九日，“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第一任院长。

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一月　第二部诗集《死水》由上海新月书店印行。收《红烛》以后所作诗二十八首，为：《口供》、《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什么梦?》、《大鼓师》、《狼狈》、《你莫怨我》、《你看》、《也许》、《忘掉她》、《泪雨》、《末日》、《死水》、《春光》、《黄昏》、《我要回来》、《夜歌》、《心跳》、《一个观念》、《发现》、《祈祷》、《一句话》、《荒村》、《罪过》、《天安门》、《飞毛腿》、《洗衣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新月书店在为《死水》所做的广告介绍中说：“王尔德说：艺术是一位善妒的太太，你得用全副精神去服侍她。召集国内最能用全副精神来服侍这位太太的要算闻一多先生了，《死水》如果和一般的作品不同，我们敢在胆的讲一句，只因为这是艺术。闻先生的诗是认真做的，他的诗也应该认真去读，非这样读，不能发现《死水》里的宝藏。研究新诗的人不要忘了这里有一个最好的范本。”（《新月》创刊号，1928.3.10）

《死水》与《红烛》相比，进步是明显的。苏雪林在《论闻一多的诗》中说：“这五年的短时期技艺显着了惊人的进步：譬如说《红烛》注重色彩，《死水》则极其淡远；《红烛》尚有锤炼的痕迹，《死水》则到了炉火纯青之候；《红烛》大部分为自由诗，《死水》则都是严密结构的体制；《红烛》十九可以懂，《死水》则几乎全部难懂了。”她认为“《死水》的淡并不是淡而无味的淡，《红烛》的色现在表面，《死水》却收敛到里面去了”，并用苏东坡评韩柳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评语来比喻《死

水》。同时，她还说："《死水》字句都极矜炼，然而不教你看出他的用力处，这是艺术不易企及的最高的境界"，所以《死水》是"一部标准的诗歌"。（《现代》第4卷第3期，1934.1.1）

在现代文学史上，《死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李广田在《闻一多选集·序》中说："诗集《死水》的出版，在当时的文艺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对现实的态度，这种抗议的态度使他的诗有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的诗的形式。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已经有了将近十年的历史，十年之内，新诗由萌芽而壮大，脱离了旧形式的束缚，自然要求新形式的建立，而到了闻先生，可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时期。"

《死水》最突出的还在于它的思想与形式的结合，它比《红烛》更接近生活，更接近现实，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亦更鲜明、强烈。

《死水》装帧是先生亲自设计的。封面和封底都用了无光的黑纸，只在封页右上方做了一个长方形的金框，内中横排着"死水"两个铅印的字，框外下方是作者姓名。整个封面只用了金黄与浓黑两色，显得宁静、庄重和高贵。衬页则用线描画出在飞矢中顽强前进的成排骑士，手持长矛盾牌，战马亦身着铠甲。这种封面与环衬的强烈的动与静对比，表现了诗集的基调。

二月中旬　担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文哲学院本科生指导员。该院指导员还有汪旭初、王伯沆、何兆清、陈登恪、宗白华。（据《任定各院指导员》，上海《民国日报》，1928.2.19）

是月　致左明信。后发表于《萍》第一卷第二期，题作《关于做诗》。收《闻一多全集》。信中谈到作诗问题云：

> 承询各问题条答如左：
>
> 一，韵脚不易安好，乃因少读少做耳。
>
> 二，词不达意，乃因少读书的原故。
>
> 三，标点不成问题，有的作家甚至废弃标点，故不必为此操心。
>
> 四，太明显，确乎是大毛病。根本原因是态度太主观。譬如划船姑娘固然可以引起你的爱怜，但是也未始不可引起一般人的爱怜。你若把你和她两人的关系说得太琐碎，太写实了，读者便觉得那是你们两人的私事，与第三者无关。你要引起读者的同情，必须注意文学的普遍性，然后读者便觉得那种经验在他自身也有发生的可能，他便不但表同情于姑娘，并且同情于你。然后读者与作者契合为一，——那便是文学的大成功了。我自己做诗，往往不成于初得某种感触之时，而成于感触已过，历时数日，甚或数月之后，到这时琐碎的枝节

往往已经遗忘了，记得的只是最根本最主要的情绪的轮廓。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响的轮廓，表现在文字上，其结果虽往往失之于空疏，然而刻露的毛病决不会有了。空疏的作品读者看了不发生印象，刻露的作品，往往叫读者发生坏印象。所以与其刻露，不如空疏。英诗人华茨渥司作诗，也用这种方法。

三月十日 《新月》月刊在上海创刊，编辑署名为：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实际上，先生住在南京，不可能过问很多编辑事务，但由于朋友们的信任，先生的编辑名义一直延续到第二卷第一号。

《新月》与《晨报·诗镌》相仿，也是一个同人刊物，参加者有胡适、余上沅、刘英士、梁实秋、潘光旦等，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些人。

《新月》版型为方的，蓝面贴黄签，签上书古宋体刊名，面上浮贴一张白纸条，上印要目，很是别致。方的版型是仿英国十九世纪末著名文艺季刊 Yellow Book 的形式，先生很喜欢这种版式。译诗《白朗宁夫人的情诗》(一)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一号。共十首。收《闻一多全集》。

这时期，先生译了不少外国诗，也是一种格律的试验。朱自清在《译诗》一文中说："新文学大部分是外国的影响，新诗自然也如此。这时代翻译的作用便很大。……北平《晨报·诗刊》出现以后，一般创作转向格律诗。所谓格律，指的是新的格律，而创造这种新的格律，得从参考并试验外国诗的格律下手。译诗正是试验外国格律的一条大路，于是就努力的尽量的保存原作的格律甚至韵脚。这里得特别提出闻一多先生翻译的白朗宁夫人的商籁二三十首。他尽量保存原诗的格律，有时不免牺牲了意义的明白。但这个试验是值得的；现在商籁体(即十四行)可算是成立了，闻先生是有他的贡献的。"(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72至373页) 在《诗的形式》一文中，朱自清还说：闻一多"也试验种种外国诗体，成绩也很好。后来又翻译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几十首，发表在《新月》杂志上；他给这种形式以'商籁体'的新译名。他是第一个使人注意'商籁'的人。"(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97页)

是月 与叶公超合译的《近代英美诗选》完成。《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刊有广告，云该书分英美两册。文中还介绍云："中国的新诗是从那里演化出来的？一般诗人的背景都受过些甚么影响？能答复这个问题的人，自然知道现在中国的新诗和英美诗——尤其是和近代英美诗的密切关系。这两本诗选的目的，是在介绍近代英美诗中最能引起我们的兴趣的作品，一百多家诗人不同的个性都包括在里面，还附有各诗人的传略和精当的短评。凡是有字典不能解释的字和成语都附有

详尽的注释，这选本不但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一个人唯一的向导，而且是大学近代文学课程里一部必不可少的教科书。闻一多先生在新诗坛里的地位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叶公超先生又是中国唯一能写英文诗的诗人。他们两位把这精选拿出来贡献给大家，不是文艺界的幸福是什么？”

四月十日　诗《答辩》、译诗《幽舍的麋鹿》（哈代作）、译诗《白朗宁夫人的情诗》（第十一至二十一首）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二号。前两首收《闻一多诗集》。其诗如下：

十一

既然爱是宝贵的，我就沾爱的光。
这样苍白的双腮足膝这样的抖颤，
仿佛是当不起那颗心儿的重担，——
这吹箫乞食的身世，束上了行装，
打算翻山越岭，如今却几乎吹不上
一只凄凉的歌儿来响应那啼鹃——
爱呀，这身世虽则是一筹莫展，
你为什么要躲避它？你何必懊丧？
不用讲，我本是配不上你的身分，
爱，我太不值，我不是你的俦匹！
可也不尽然，正因我爱你，我的痴情
便救了我，许还活着爱你到底，……
可又不成，——真教我闹不清，我分明
要给你祝福，却又当面拒绝了你。

十二

老实说，我所自夸的这一般爱，
从我胸中升到额上，就仿佛是，
给我戴上了一颗绯红的宝石，
人人都瞧得见，认识它的珍环——
老实说这爱不是我自己的私财。
我那会晓得爱是怎么一回事，
除非你给我立个榜样，给我指示，
像头回我们的目光交互的飞来，
马上爱就唤醒了爱，分明得很，

这爱是不好算作我自己家当；
因为你的灵魂带住了我的灵魂，
便往你那尊前的宝座上一放，
从此我爱，完全是叨着你恩，
完全因为你，你唯一的情郎！

十三

你定要我把我赠你的这段爱，
制成语言，寻出相当的字句，
给端出来，像在狂风里擎着火炬，
让它往我们的脸上射着光彩？
我把它往你脚下一摔。我不能差
我的手把我这心灵那样端出去，
离我自己那样远；我不能用言语
给你证明我这深藏的爱。你明白：
我是不动心的，凭你怎样央求，
我还把生命的衣裳狠心撕破，
生怕这心给碰一下，泄露了隐忧——
你既白了这种真相，你就让我，
让我用我们那女儿们的不开口
来证实我这女儿的爱，可不可？

十四

既然要爱我，别的就都不要管，
你就专为爱我而爱我。不要讲；
“我爱她，是为着那一笑——那一望——
那谈吐里的一种温存——那一段
玲珑的思想，恰合我的脾胃，还
在某一天博得了我满心的欢畅。”
不要这样！讲，因为，爱呀，这些花样，
作与改变，或者从你眼光里看，
忽然变了。爱是怎样的成功，
便怎样失败——也不要为你那慈悲
擦干了我这泪颊而爱我，懂不懂？

一个人，只要长久得到你的抚慰，
就许忘记哭了，因此又失你的爱宠。
可是为爱而爱我，你便能爱我万岁！

十五

不要骂我对你挂起沉沉的脸；
我们是各奔着各人的路程，
一种的日光照不上，我们的眉鬓。
我好似晶珠里锁着的蜜蜂一般，
不能你为我起什么惊猜的眷念；
因为悲哀既把锁进恋爱的神圣，
叫我张开翅膀往外飞，那怎么成？
从使我多方的挣扎，也还是枉然。
你知道望着你，望着你，望到
恋爱和恋爱的结局，仿佛一个人
踞坐在高处，俯瞰着江河的滔滔，
江河以外，又浮着大海的阴沉——
我望你时，我听见记忆外层的寂寥，
也明白记忆温柔，和泯灭的寒凛。

十六

但是，正因你能那样的征服我，
正因你那般豪迈，好似一位帝王，
你便能把你的绣褥不顾我的恐惶，
一甩，给裹在我身上，叫我的心和
你的心贴得更紧，从此遇着离索，
我的心便永不会怔忡。征服是一桩
高尚而彻底的事爱，无论是向上
的感化，或往下的摧残与压迫！
像一个负创的败卒，辗转在地下，
被敌人扶起，便把手里的宝剑
移交给他，——我毕竟也和你这冤家
讲了和爱，你再请我走上你跟前，
你一句话，就恢复了我的身价。

爱，扩大你的爱来抬高我的体面！

十七

上帝排在那往古来今里的徽弦，
我的诗人，你都能弹；你一挥手，
便奏出夐绝的乐曲，在尘嚣上飘浮，
在尘嚣外飘浮。好比药石一般，
你的音乐吐了出去，能给人衰
攻砭的毒秽，解除着苦痛和烦忧。
爱呀，上帝派给了你这种职守，
派我给你伺候。你打算打算
最好是用什么方法来使用我？——
一点点希望来给你欢唱也许
一段缠绵的记忆，给参进你的歌？
一树浓荫，给遮你唱——是棕榈，
还是松楸？要不就是座坟墓，
给你唱完睡下？听凭你选去。

十八

爱呀，我没有拿头发奉送过谁，
除了这回，默默的把这一卷卷
左手里牵得顶长的，叫你来拿。
我知道青春去了，我的发再不会
跟着脚步跳踉又不好好女儿辈，
再向那番榴树底，或蔷薇花下，
去种新发。你瞧，这松的一把，
早在悲哀里学会了一种憨态，——
头那么一歪，垂了下来；我只好
让它垂，垂在脸上，把泪痕遮起。
这东西我想逃不脱死神的剪刀，
其实是归爱得的。爱现在我给你，……
这儿有我母亲临终的一吻，你瞧，
除则隔了多年却依然是纯洁的。

十九

灵魂的市廛也自有它的货物；
我在那市上拿头发换着头发。
这一卷，从我诗人的头上摘下，
收进我心里，这些髂戴的舳舻
还要宝贵；即便是诗品大当初
悬拟，的九神，额前都斜拖着一把
黝紫的卷发，也不过是这样罢！
爱，想我，你那桂冠的影子还停驻
在这发上，我轻轻的吻上一嘴，
让一缕呼吸那影子给缠牢，
（我把礼物往没有障碍的地方堆）
然后这发在我心上你可记好，
也和在你头上一样，永远总会
热烘烘的除非人死了，心冷掉。

二十

爱呀，我的爱，我回想一年以前，
那时人间早有你，我独坐在
这雪地里，却听不见你的大咳
冲破寂寞，你的脚印我也没瞧见，
我只一节节的数着生命的连环，
那料得到还有你那一拳要打来，
把连环给打掉？我想起那时，爱
我便尝到了生命的奇妙！你看，
真是奇妙居然觉不出你的举动，
你的言谈会来震动我的朝夕，——
也不曾从你看着长成的那一本
白花里拈出一瓣关于你的消息。
那些人们，和我一样，也够愚蠢，
猜不透他们自己看不见的上帝。

二十一

请你再讲一回，还要再讲一回，

讲你爱我。虽则那重叠的空音
正如你说明，好似杜鹃的歌声；
可是记取全盛的青春从不会
来到山上，郊中，林间或谷里，除非
杜鹃的音乐也随着春来临。
爱，我在那黑暗里曾经倾听，
听到一种迟疑的缥缈的呼听，
于是在迟疑的苦闷里，我喊道，
“既爱我，就再讲一遍！”怕什么
四季的花太闹？天上的星太多
说，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说——
重椀的说，像急着撞银钟；只记好
还要用那灵魂默默的爱我。

《新月》刊登此诗的同时，还刊登出徐志摩的一篇《白朗宁夫人的情诗》，说：“白夫人留给我们那四十四首十四行诗。在这四十四首情诗里白夫人的天才凝成了最透明的纯晶，这文学史上是第一次一个好彻透的供承她对一个男子的爱情。”“这四十四首情诗现在已经闻一多先生用语体文译出，这是一件可纪念的工作。因为‘商籁体’（一多译）那诗格是抒情诗体例中最美最庄严，最严密亦最有弹性的一格”。“一多这次试验也不是轻率的，他那耐心先就不易，至少有好几首是朗然可诵的。当初槐衰德与石垒伯爵既然能把这原种从意大利移植到英国，后来果然开结成异样的花果，我们现在，在解放与建设我们文字的大运动中，为什么就没有希望再把它从英国移植到我们这边来？开端都是至微细的，什么事都得人们一半凭纯粹的耐心去做。为要一来宣传白夫人的情诗，二来引起我们文学界对于新诗体的注意，我自告奋勇在一多已经锻炼的译作的后面加上这一篇多少不免蛇足的散文”。

是月　约这前后，有致饶孟侃信[①]。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译诗：“昨天又试了两首商籁体，是一个题目，两种写法。我也不知道那一种妥当，故此请你代为批评。这东西确乎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我才高兴做它。”此信用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用笺”。

五月十日　诗《回来》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三号。收《闻一多诗集》。这是一

① 此信未署日期，《闻一多书信选集》注：“此信写于三四月间。”信中有“《新月》第三期如何应付？”，故知写于第2号出版前后，暂系于此。

首商籁体十四行诗，写回到家中不见妻子时的“凄惶”，叹息到这是“孤臣孽子的绝望”。

五月二十五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向《新月》推荐陈梦家的三幕剧本《金丝笼》及独幕剧本《药》。（该两剧本分别刊于《新月》第1卷第5号和第6号）又说方重、梁鋆立已允撰稿。并主张“下次还得有篇把诗才好，久没有好诗，恐怕失了《新月》的特色”。先生的意思，《新月》应办成一种文艺性质的刊物。

信中还谈到自己作杜甫传记的进行情况：“现在再讲我的一万字为什么交不上。原来心太起大了，题目选坏了，收集的材料不够，因此写不下。这题目讲起来你许记得——就是你看过的杜甫的传。现在已完的有六七千字，还不够全篇十分之一。一次登不完，不成问题，但只就这六七千字里，还有许多不妥的地方。因此我要求赦我一次，从容点写，等六期再交卷。”

五月二十六日　《先拉飞主义》写定。后发表于六月十日《新月》第一卷第四号。收《闻一多全集》。

“先拉飞”是英国罗瑟蒂、韩德、米雷等七人于一八四〇年发起成立的一个兄弟会，他们中间有的是画家，有的是雕刻家，有的是诗人，是一个艺术家的小团体。他们出版刊物《胚胎》，人称“先拉飞派”。“先拉飞”这一名词，原是侨居意大利的一群法国画家最早使用的，其目的为的是要在绘画中恢复中世纪的“拉飞儿”以前的朴质作风。“先拉飞派”则主张扫除拉飞儿以后的种种秀丽、纤弱的习气，恢复早期作家的简洁、真诚和笃实，并且要矫正当时那物质的潮流和怀疑的思想，他们要在绘画里表现出中世纪的“惊异、虔诚和懔栗”等宗教情调。他们掀起的先拉飞运动的寿命并不长，这团体不久也渐渐松散瓦解了，各人走各人的蹊径。但先拉飞运动在英国艺术上，却印了一个深深的戳记，尤其是在装饰艺术上有较深的影响。先生在《先拉飞主义》中介绍了这一运动的过程，介绍了其重要人物罗瑟蒂等人的活动，特别叙述了先拉飞派画与先拉飞派诗之间的关系。文中说先拉飞主义之所以引起自己的注意，是因为“美术和文学，从来没有在同一个时期里，发生过那样密切的关系”，“那样有意的用文学来作画，用颜料来吟诗”。先生站在绘画的角度分析了先拉飞派的画与诗关系的七种因素，说：“总结一句，先拉飞派的诗和画，的确是有它们的特点，‘先拉飞主义’，无论在诗或画方面，似乎是一条新路。问题只是艺术的园地里到底有开辟新畦畛的必要与可能没有？勉强造成的花样，对于艺术的根本价值，是有益还是有损？”末了，认为先拉飞派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张冠李戴，是末流的滥觞；猛然看去，是新奇，是变化，仔细想想，实在是艺术的自杀政策”。

是月　梁实秋的《文学的纪律》出版，封面为先生设计。

六月十日 译诗《情愿》(郝斯曼作)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四号。收《闻一多诗集》。全诗两段八行:

是酒,是爱,是战争,只
　　要能永远使人沉醉,
我情愿天亮就醒来,
　　我情愿到天黑就睡。

无奈人又有时清醒,
　　一阵阵的胡思乱想,
每逢他思想的时候,
　　便把双手锁在心上。

七月 武汉大学筹备成立,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代理校长职务。是月,刘树杞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隔壁过家花园先生家,恳请先生就任文学院院长,并拜托先生约请留美回国同学来校任教。先生起初有些犹豫,不愿离开较为安定的环境,但终被桑梓之情所动。

八月十日 《杜甫》(传记)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六号。收《闻一多全集》。这是一篇只完成了一半的传记散文,试图给杜甫做一画像,它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尝试之一,但此后没有接着写下去,而是着手去做杜甫的年谱会笺。

是月上旬 只身从南京到武昌,就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的前身为一八九三年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一九〇二年改名方言学堂。一九一三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在方言学堂基础上建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后相继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国民政府公布《大学院组织法》后,武昌中山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校,合并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成为当时中国五大中央级国立中山大学之一。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校址在原方言学堂的武昌东厂口。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改大学院为教育部,大学区制先后取消,一九二九年七月教育部明令停止试验。先生到武昌时,大学区制即将取消,人们已称第二中山大学为国立武汉大学。

在武昌,起先住磨石街,后搬至黄土上坡三十一号锦园,是一所漂亮的外国传教士的花园。

八月十八日 致顾颉刚电,邀其担任国文系教授,月薪至少三百元。时,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接电后认为"势不可允"。(《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196页,台北联

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7 年 5 月出版）

九月十日　译诗《"从十二方的风穴里"》（译郝斯曼诗）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七号。收《闻一多诗集》。

同日　下午一时，先生与梁明致、胡其炳、方博泉等十一人组成的武汉大学学生入学审查委员会，开始评阅上海考生的试卷。（据《武汉大学在沪招考之新生揭晓》，《汉口中山日报》，1928.9.12）

九月十三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一次临时校务会议，与刘树杞、皮宗石、王星拱、梁明致共商增设本科、举行编级试验、聘请教授、编制预算、筹备开学诸事项。（据《武汉大学昨开校务会议》，《汉口中山日报》，1928.9.14）

九月十七日　次子闻立雕生于南京。

九月二十一日　《汉口中山日报》在《武汉大学新聘各委员及教授》消息中，报道昨日武汉大学正式聘请教授二十八人，除先生外，还有杨树达、燕树棠、谢文炳、邓以蛰、陈登恪等。先生就任文学院院长。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因均只有一年级学生一班，故未设系主任。

九月二十六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三次临时校务会议，讨论合并各校的毕业生诸问题。（据《武大对前中大生请求随班毕业案之议决》，《汉口中山日报》，1928.9.27）

九月三十日　武汉大学举行预科生甄别考试，国文、英文两科试题为先生负责拟定。（据《武汉大学定期举行编级试验》，《汉口中山日报》，1928.9.16；《武汉大学甄别试验展期》，《汉口中山日报》，1928.9.19）

是月　致饶孟侃信[①]。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向新月书店推荐武汉大学讲师李儒勉（江西人，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夫人周慧专女士著述数种。

十月二日　武汉大学依大学组织大纲，举行第一次正式校务会议。先生为文学院院长，是规定的校务会议成员。其他成员还有代理校长刘树杞、社会科学院院长皮宗石、理工学院院长王星拱和梁明致、陈鼎铭、张镜澄、胡其炳、胡庆生。会议报告四项，议决三项。次日，武汉大学印信正式启用。（据《武汉大学启用印信》，《汉口中山日报》，1928.10.4）

十月十日　《新月》第一卷第八号预告下期将刊登先生的短篇小说《履历片》。《编辑余话》云："闻一多先生一篇短篇小说《履历片》——闻先生的处女作——及好几篇别的稿件，都因为寄来的太晚，要等下期才能发表。"这是迄今所知先生所作的唯一的一篇小说，但不知何故，后来并未刊出，亦未见在他处发表。

---

① 此信未署日期，《闻一多书信选集》系于 10 月。但文中有收到《新月》第 1 卷第 7 号等语，该号出版于 9 月 10 日。故暂系此信于 9 月。

十月十九日 湖北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决定举办全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聘请艺术大家为审查及评判委员，决议聘请闻一多为审查及评判委员长，许太谷、唐粹庵、曾一橹、张肇铭、管雪忱、胡荫之、马振鹏、蒋兰圃为委员”。（《湖北第一届美术展览会推定主任》，《汉口中山日报》，1928.10.20）

十月三十一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六次校务会议，决议成立图书委员会，以皮宗石为委员长，先生与王星拱、梁明致、胡庆生、周鉄山、陈源、燕树棠、曾昭安为委员。（据《武汉大学组织图书委员会》，《汉口中山日报》，1928.11.1）

同日 武汉大学正式开始授课。先生这学年讲授文学院共同选修课“西洋美术史”、外文系选修课“现代英美诗”。（据《本科一年级课程表》，《武汉大学周刊》创刊号，1928.12.3）

十一月二日 出席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审查兼评判会议，讨论审查评判标准及办法等。（据《美术展览会明日开审查兼评判会议》，《汉口中山日报》，1928.11.1）

十一月十四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八次校务会议，讨论组织群育委员会等案，推定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胡庆生等八人为委员。（据《武汉大学组织群育出版两委员会》，《汉口中山日报》，1928.11.15）

十一月十五日 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在武昌水陆街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开幕，先生出席。出席者还有省政府主席张知本、武汉政治分会秘书长翁敬棠及各方面负责人但焘、胡宗铎、陶钧、田桐、程汝怀、李石樵、石幼平、聂光等。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亦写来贺信，并赠款购买奖品。这次展览会是湖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美术作品检阅，展出作品以中小学校及美专学生作品为主，也有名家绘画参展。举办这次美展的目的，“在提倡艺术教育和纯粹艺术，以期社会艺术化”。（《全省美展第一届评判会之批评》，《汉口中山日报》，1928.12.2）

十一月二十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九次校务会议，决定补行开学典礼仪式（武汉大学因校舍未能腾出，所以先行上课，未举行开学典礼），推定先生与曾昭安等人主持筹备。（据《武汉大学补行开学典礼日期已定》，《汉口中山日报》，1928.11.22）

同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召开常委会，讨论武汉大学勘定新校址问题，批准划武昌城东门外洪山至落驾山一带为武大新校址。

落驾山，又称罗家山，先生建议改为谐音的“珞珈山”，使地名染上了一种诗样的意境。方重《回忆武大》：“讲到‘珞珈山’这个名称，……若要追溯此名之由来，在我的回忆之中则首先要提到诗人闻一多。原来就是他，……忽而灵机一动把原有的不登大雅的旧时代祖传地名代之以富有风味的‘珞珈’二字。当初他题这个名称曾和我以及其他几位旧友谈论过。我们都一致赞同，认为这也是诗人的灵感之一。

因而珞珈山之名就此沿用至今。"(《武汉大学校友通讯》创刊号,1983 年 10 月)

武汉大学校徽亦为先生设计,现在仍被采用为该校的印章徽记。

十二月二十四日　《武汉大学周刊》第四期刊登本校各委员会委员名单,先生除任群育委员会主席和入学审查委员会主席外,还担任图书、出版、训育各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武汉大学周刊》第五期刊登《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题名录》,先生以文学院院长出任评议员。评议会成员还有代理校长刘树杞、教育部代表周览(鲠生)、武汉政治分会代表翁敬棠以及各学院院长和教授代表皮宗石、王星拱、陈登恪、燕树棠、曾昭安。

一九二九年　三十一岁

三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六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规定训政期限为六年。

三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下达讨桂令，蒋桂战争爆发。

一月五日　武汉大学补行开学典礼。刘树杞致开会词，提出武大应具备五个特点：特别注重党义，注重质而不注重量，学术向深邃处研究，追求更伟大的建筑更新鲜的外表，课程及造出来的人才是实用的。会上武大筹备委员曾昭安、武汉政治分会代表翁敬棠、教育部代表王世杰、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表张难先等亦有发言。（据《国立武汉大学昨举行开学典礼》，《汉口中山日报》，1929.1.6）

一月十三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十五次校务会议，讨论并入武大的师范生毕业考试等问题，决定组织考试委员会，先生为委员之一。（据《武汉大学明日举行师范班毕业考试》，《汉口中山日报》，1929.1.14）

一月十九日　梁启超先生在北平病逝。其子梁思成与先生过从甚密，在清华时曾共同组织过社团。梁启超亦在清华学校有多次讲演，还亲临先生发起的“美司斯”成立大会。故徐志摩欲以《新月》第二卷第一号为纪念梁启超专号时，特向先生征稿。徐二十三日致胡适信中云：“一多处亦已去函征文。”（《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07页）

一月二十一日　武汉大学全体教职员发表《对汉口水案通电》。是月十七日，日本军队的炮车在汉口碾死车夫水杏林，激起武汉三镇民众愤怒，各界纷纷发表抗议。先生对“水案”亦持激烈态度。

二月二十六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二十三次校务会议，决定组织课程委员会，推定先生为委员长，皮宗石、王星拱等为委员。（据《武汉大学第23次校务会议记事录》，《武汉大学周刊》第11期，1929.3.4）

三月四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一次评议会议。讨论增设学院学系、经费、预算、修正组织大纲、修正教员聘任规则、教职员待遇规则等案。（据《武汉大学第1次评议会议事录》，《武汉大学周刊》第12期，1929.3.11）

三月七日　先生请彭基相给在美国留学的朱湘去信，约他来武汉大学任教。

朱湘于一九二六年赴美，在异国遇到不愉快的对待，心情抑郁，欲提前回国，又怕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先生知道，即请彭基相去信。四月十五日，朱湘复彭基相信，说："刚才接到三月七日信。天下最难的是朋友，不管下半年你同一多怎样，我决定回国。与其受异种人的闲气，倒不如受本种人的。得到友谊作后盾，在国内就是受点闲气，也吞得下去。先寄一封信给了一多，以后再寄与子离。"（《朱湘书信集》，第18页）四月十七日，朱湘给妻子信中也说："我如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彭先生刚巧有一封信也是这天到，说闻先生要我去武昌武汉大学作教授，每月三百块以上的薪水。……要是闻先生下半年还在武昌，我这下年暑假，早则阳历六月底，晚则八月初，一定回家。"（《朱湘书信二集》，第137至13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二十九日朱湘在给妻子信中又说："从前我多次想回国倒底不曾回成，是因为仇人太多，怕谋不了生。如今[与]闻先生他们感情又好了。多朋友帮忙，想必不会找不到事。这次闻先生还在武汉大学是顶好，万一不在，他们也总能够替我设法。将来他运气再好，我仍旧能当大学教授。"（《朱湘书信二集》，第141页）先生前因《晨报·诗镌》事与朱湘一度交恶，此刻芥蒂消除，但朱湘与徐志摩关系仍很紧张。五月二日朱湘给罗念生信中说："我将来看着时机到了，一定要怂恿一多与徐志摩脱离关系。我自己更是一直反对徐志摩到底。"（《朱湘书信二集》，第277页）

三月十三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二十五次校务会议，讨论事项中有"本校学生徐朝元等呈请增设音乐课程案"，"决议请闻一多先生酌办"。（《武汉大学第25次校务会议记事录》，《武汉大学周刊》第13期，1929.3.18）

三月二十六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二十七次校务会议，讨论事项中有"总理奉安委员会总干事孔祥熙函转总理奉安赙赠物品及纪念树木办法请查照案"，"议决请闻一多先生筹划"。（《武汉大学第27次校务会议记事录》，《武汉大学周刊》第16期，1929.4.8）

四月十日　《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出版，扉页刊登潘光旦著《中国之家庭问题》再版广告，书名下特别注明"闻一多作封面"。

四月三十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三十二次校务会议。讨论事项中有关于孙中山奉安典礼应办数事，又议决请先生与胡庆生两人办理石碑之事。（据《武大校务会议》，《武汉中山日报》，1929.5.4）

五月二十二日　武汉大学新校长王世杰到校，全校开会欢迎。王世杰曾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副教授，一度与先生同事。

五月二十八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三十六次校务会议，讨论"武汉奉安委员会为奉安典礼各界届时应各备祭文一份并推主祭一人案"时，"议决祭文请闻院长拟

就”。(据《国立武汉大学第36次校务会议记事录》,《武汉大学周刊》第24期,1929.6.3)

六月一日 武汉各界纪念孙中山奉安典礼在武昌首义公园隆重举行。时,南京中山陵落成,孙中山灵椁自北平西山碧云寺迁至中山陵安葬,全国各地同时举行奉安典礼。武汉大学的祭文为先生撰写,刊于十日《武汉大学周刊》第二十五期。全文如下:

> 乌乎!神州陆沉,受制异族,民权不伸,民生弥瘥,厝火积薪,危机潜伏,众人熙熙,酣梦方熟。繄维总理,先觉先知,四十年前,独抱忧危,结纳同志,密展宏规,光复故物,金瓯不亏。国体共和,首崇让德,成功不居,退然拱默,咄哉叛夫,大盗移国,爰构厉阶,祸延南北。公谋建设,主义昭宣,建国方略,宪法五权,亿兆服膺,全体动员,催公北上,耆定坤乾。胡天不仁,沉疴遽染,扁鹊华佗,莫救斯险,壮志甫伸,荣光俄俨,戴德垓埏,铭勋琬琰。煌煌遗教,奉作宝书,和平统一,实践非虚,迁都金陵,力行其余,国民会议,苛约废除。遏密八音,倏焉三载,奉安钟山,兆域爽垲,坟对孝陵,徽扬寰海,举哀陈词,上诉真宰。滔滔江汉,载缵武功,辛亥首义,遐尔夷同,学府既建,棫朴芃芃,敢献乐章,被之丝桐。尚飨。
>
> (《国立武汉大学纪念总理奉安典礼之联语及祭文》,《武汉大学周刊》第25期,1929.6.10)

七月五日 顾颉刚草复先生信。顾颉刚在是日日记中写到“写闻一多信,未毕”。(《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300页) 是年二月中旬,顾颉刚离广州赴北平,五月接受燕京大学聘书,先生闻知后再邀其来武汉大学。顾未接受邀请,遂有此信。此信未写完,故未寄出,现存底稿云:

一多先生:回苏后晤吴维清兄,悉先生们极盼我到武昌,盛意胜感刻。兹敬将我不能来的苦衷及对于武大的希望具述于下:我是一个只能研究史学的人,在这个范围以内我有无穷的前程,我当仁不让;在这个范围以外,我一无才干,又无一野心,这也不是故意谦虚。不幸为了‘饥驱’到了厦门,又到了广州,三年中给另人一天一天的抬高,终日为教书办事忙碌,使得三年前预定的计划一点也不能照做。牛岁一天比一天长大,学业一天比一天退步,这是何等的悲愤呵!所以立下决心,春间逃出广州,到了北平。因为燕京大学的生活较为安定,既可不办事,教书也只有三小时,所以便受了他们的聘。从下半年起,我在燕大服务了。但是,有一件事长顿在我的心头,使得我甚踌躇的。便是中山大学中的语言历史研究所将因我的不去而倒闭了。本来这个研究所是傅孟真兄办的,后来他办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机关就遞嬗到我的身上。我本无办事的才干,但以责任心太强,既当了主任就得用了全力干去,所以一年以来居然有些成绩。《研究所周刊》已出至八十册,《民俗周刊》已出至七十期,丛书已出至三十种,档案已搜……(《顾颉刚全集》

第40册，第363至364页，中华书局2010年12月出版）

八月　游国恩被聘为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教授楚辞研究。游国恩到校后，曾建议先生也进行楚辞研究。

九月十六日　武汉大学开学。二十三日举行开学典礼，二十四日上课。这学年先生讲授“英诗初步”。（据《武汉大学一览》，1930年度）

约在这前后，先生请这年四月来校任教的朱东润开设文学批评史课程。朱东润《自传》：“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是闻一多教授，他看到中文系的教师实在复杂，总想来一些变动。……‘东润先生’，闻一多说：‘是不是可以到中文系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课？’……我是读过森斯伯里的英国文学批评史的，但是那时中国只出过陈中凡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筚路蓝缕，陈先生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是究竟只尽了启蒙的责任，无法应用到大学的讲坛。因此我和一多说：‘能不能给我一年的时间作一些准备工作？’‘可以可以’，一多说：‘好在今年下半年还不开课，可以推到明年的秋天。’这就是我的那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由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1辑，第49至5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

九月二十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四次临时校务会议，决定聘朱湘为文学院教授。（据《武汉大学第四次临时校务会议记录》，《武汉大学周刊》第28期，1929.9.23）聘朱湘为教授，是先生提议的，并为朱湘安排了作文、修辞、英国文学史略等课程。但朱湘没有来武大，被安徽大学邀任外文系主任。次年九月二十七日朱湘给罗皑岚信中说：“安大学生把我拉了回来，还要我办外国语文学系，不让我去武汉，虽然×××同××[①]来向我重申前议。”（《朱湘书信集》，第144页）

这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国桢，也曾以清华学校同窗身份，请先生推荐他在武汉大学兼做教授，被先生拒绝。闻立勋回忆：“一叔是武大文学院长时，吴国桢是武汉市长。吴当市长，只是官僚，很想兼一个教授的职务，找一叔帮忙。……按说吴是老同学，又是武汉市长，两人搞好关系，多少有点好处，而一叔毫不通融。一九二一年因闹学潮，妥协的同学中有一个就是吴国桢。我看过一叔的《辛酉日记》，写了一首宝塔诗，记了当时的经过，里面还讽刺吴，称吴为小老头（吴的别号）。当时闹学潮时，他就是对立面。”（闻立勋回忆一多叔录音，1980.2，张同霞整理）

是年秋　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遵照大学院令，重订本校董事会简章，改委员制为校长制，先生被聘为校董。（据《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一览》，1934年度）时，该校

① 当一是先生，一是陈源（西滢）。据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考证，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名单仅有陈源、方重两人，但方重一九三一年二月才到校，故推测可能是陈源。

主席校董为蒋兰圃,校长为唐义精。

十月四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四十八次校务会议。讨论国庆纪念仪式、刊行定期刊物及武大丛书等十一项议案,推定先生与陈源两人规划文学院季刊。(据《武汉大学第48次校务会议记录》,《武汉大学周刊》第30期,1929.10.7)

十月十一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四十九次校务会议,讨论关于军事训练实施办法等案。(据《武汉大学第49次校务会议记录》,《武汉大学周刊》第31期,1929.10.14) 自汉口"水案"事件后,武汉民众反日情绪高涨,加之此前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之"济南惨案"、六月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日急。为应付局势,武汉大学决定增加军事训练,先生积极赞成。

十月二十五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五十一次校务会议,讨论图书委员会内设置中文图书审查委员会等案,议决先生担任中文图书审查委员会委员长,李笠、任凯南、谭戒甫、周贞亮为委员。(据《武汉大学第51次校务会议记录》,《武汉大学周刊》第33期,1929.10.28)

是月 三子闻立鸿生,次年夏夭。

十一月十日 论文《庄子》、译诗《山花》(郝斯曼作,与饶孟侃合译)发表于《新月》第二卷第九号。前者收入《闻一多全集》,后者收入《闻一多诗集》。

《庄子》全文分作五章,叙述庄子行踪和文学成就,称:"《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又说:"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无论《庄子》的花叶已经够美茂的了;即令他没有发展到花叶,只是他那简单的几颗仁子,给投在文学的园地上,便是莫大的贡献,无量的功德。"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评论到:"一多先生不仅在《庄子》的校释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题名就叫《庄子》的论文,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的礼赞。他实在是在那儿诚心诚意地赞美庄子,不仅陶醉于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还同情于他的思想。……这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你看他那陶醉于庄子的'乐不可支'的神情!他在迷恋着'超人',迷恋着'高古'、'神圣'、'古铜古玉'、'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便在刻意于此),甚至于迷恋于庄子的'道','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的是'有大智慧的'人,意在言外地憧憬着要'像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

译诗《山花》,诗前有一段附言,云:"郝士曼写完他的第一部诗集时,准备告一

段落(他的第二部——即最末一部集子是二十六年以后才出世的)。因此在诗集后,缀上这一首跋尾式的诗,表明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的估价。他这谦虚的态度适足以显着他的伟大。原诗没有题目,这里用的,是译者擅自加上的。"这首译诗,似乎可以看出先生自己的影子,故录如下:

我割下了几束山花,
我把它带进了市场,
悄悄的又给带回家;
论颜色本不算漂亮。

因此我就到处种播,
让同调的人去寻求,
当那花下埋着的我
是一具无名的尸首。

有的种子喂了野鸟,
有的让风霜给摧残,
但总有几朵会碰巧
开起来像稀星一般。

年年野外总有得开,
春来了,不幸的人们
也不愁没有得花戴,
虽则我早已是古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　出席武汉大学第五十六次校务会议,讨论审查文哲季刊规则等案。(据《武汉大学第56次校务会议常会记录》,《武汉大学周刊》第38期,1929.12.1)《文哲季刊》即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刊物,先生参与筹备,编辑主任为陈源。

是年　为武汉大学教授陈登恪转圜。林斯德回忆:"一九二九年武大教授陈登恪适逢失恋痛苦时,遭到盗窃。被盗衣箱中有一份参加国家主义派组织的文件,本来是张废纸,破案后被政府发现,顿成'反动派'的证据,事态极为严重。先生一面设法向省政府解说,一面关心陈愤恨轻生,特派费鉴照助教陪他渡江受审。不久问题得到解决,总算免除了不幸事故发生。"(林斯德给编者的信,1986.7.14)陈登恪,早年曾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并加入中国青年党。

一九三〇年　三十二岁

五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爆发“中原大战”。

九月九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人于北平组建国民政府。

十一月四日，阎锡山、冯玉祥宣布下野，北平国民政府垮台。

四月十日　沈从文在《新月》第三卷第二号发表《论闻一多的〈死水〉》，认为先生的诗集《死水》“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文中说《死水》“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纯粹处，那摆脱《草莽集》（朱湘的诗集）为词所支配的气息，而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死水》不是‘热闹’的诗，那是当然的，过去不能使读者的心动摇，未来也将这样存在。然而这是近年来一本标准诗歌！在体裁方面，在文字方面，《死水》的影响，不是读者，当是作者。由于《死水》风格所暗示，现代国内作者向那风格努力的，已经很多了。在将来，某一时节，诗歌的兴味，有所转向，使读者，以诗为‘人生与自然的另一解释’文字，使诗效率在‘给读者学成安详的领会人生’，使诗的真价在‘由于诗所启示于人的智慧与性灵’，则《死水》当成为一本更不能使人忘记的诗！”先生很重视这篇批评，十二月十日致朱湘、饶孟侃信中说：“那篇批评给了我不少的奋兴”，“他所说的我的短处都说中了，所以我相信他所提到的长处，也不是胡说。”（《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24页）

是月　《杜少陵年谱会笺》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载完。收《闻一多全集》时题作《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关于杜甫研究，手稿中有《说杜丛钞》，引历代学者论述杜甫之段落，以期做系统研究的准备。《说杜丛钞》引书有顾炎武《日知录》、王士祯《带经堂诗话》、程大中《旧事考遗》、曾廷枚《香墅漫钞》、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薛雪《一瓢诗话》、吴雪发《说诗管蒯》、吴骞《拜经楼诗话》、孙志祖《读书脞录》、梁玉绳《瞥记》《庭立记闻》、赵翼《瓯北诗话》、李调元《雨余新拾》《续拾》《补拾》、洪颐煊《读书丛录》、宋翔凤《过庭录》、蒋超伯《过斋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朱亦栋《群书札记》、胡鸣玉《订伪杂录》、尚秉和《历代社会状况史》等。

六月上旬　辞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武大起了学潮,攻击先生。先生就贴了一张布告,说对于自己的职位,如'鹓雏之视腐鼠',并声明辞职离校。后来学校挽留,到底没有留住。"(《闻朱年谱》,第 26 页)

据当时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师的谭戒甫回忆,说这年春天学校筹办《文哲季刊》,中文系教授刘华瑞写了篇有关江汉文化的文章,内容却只写太极拳一类东西,先生看后不赞成刊登,于是引起刘的不满。刘遂怂恿从他习武功的学生张贴标语,攻击先生。先生愤极,立即写信辞职。事情发生后,学校议论纷纷。文学院教授陈源出面,在昙华林袁昌英教授家开会,主张挽留先生,开除为首学生,但内则并不是这么回事,唯陈登恪教授敢于直言,话中颇含揭穿黑幕的意思。校长王世杰亦曾出面挽留,但先生去志已坚。(据《武大最初两事回忆录》,未刊,武汉大学档案室藏)

先生之侄闻立勋回忆,说学生主要是反对谭戒甫教"庄子",实际上有人想当文学院院长,搞了些卑鄙手段。先生一气之下写信辞职,说自己本不打算回来,是学校极力邀约下才走马上任,回来原准备干一年,学校又要自己长期干下去,等等,信写得很刺激。总之,先生是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闻立勋回忆一多叔录音,1980.2,张同霞整理)

王世杰校长在事后的一次报告中,专门谈到此次风潮及先生辞职的影响。报告说:"关于文学院风潮的事,前几天文学院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院课程改进会,那个会成立之后,即向学校提出书面,要求学校辞退闻院长;同时,并对闻院长本人提出书面要他辞职。不但如此,课程改进会并在本校揭示处出了一二次揭帖,主张闻先生离职。本来,按照中央的规定,学生的任何团体是要避免干涉学校行政的。就令文学院同学觉得这种规定不能遵守,也应认清这种直接的行动,是不利于文学院前途或全校前途的行动。尤其是在这个学年将告终结的时候,因为许多在校的教员,下学期愿意留校与否,正在这个时候决定,许多本校拟聘而未聘就的教员,下学年究竟愿来与否,也正在这个时候决定。这种直接行动,可使在校的全体教员感觉着教员的身份没有保障,不免愤慨或灰心;可使本校拟聘而未聘定的教员,感觉本校学风的恶劣,不愿接受本校聘约,至于对闻先生,在道理上讲,你们当然不应有此侮辱。所以这几天,教务长,各院院长及我个人均感到一种前此未有的困难。今天特在此处报告,希望文学院同学及其他同学了解这回事影响的严重,并都觉悟到爱护学校不是教职员一方面的努力所能生效的,而是教职员和学生共同的责任。"(原载《上周纪念周王校长报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 62 期,1930 年 6 月 8 日,转引自唐达晖《闻一多在武汉大学事迹的几点考辨》,中国闻一多研究会、闻一多基金会编《闻一多研究丛刊》第 2 集,第 360 至 361 页,武汉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出版)六月十六日武汉大学校务会议,在讨

论《文学院学生通函揭帖排斥文学院院长案》时，亦议决给这次风潮的两个为首学生严厉处分。会议通过的决议为："查此事关涉本校纪律至巨，曾经议决查明真相再行处置。兹根据本会议查察结果，应将鼓动滋事学生冯名元、汪守宗两生按照本校学则第十七条开除学籍，并令其即日离校。"（《第八十一次校务会议常会记录》，《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63期，1930.6.17，转引同前，第361页）

先生辞职还有着深层原因，即传统国学与新文学两种学派的矛盾。由于历史原因，传统国学在武汉大学文科占有极大优势，尚在一九二五年武昌师范大学改为武昌大学时，校长石瑛新聘的郁达夫就因对某些旧派不满，到校九个月便提出辞职。而石瑛欲聘请郭沫若为文科学长，亦遭到旧派的抵制，以致其任校长仅一年也辞职离去。武汉大学成立后，情况虽有变化，但重古轻今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先生离开武汉大学后，陈源接任文学院长，音韵、训诂学家刘赜不久担任中文系主任，这可视作派系关系的调整和平衡。（参见唐达晖《闻一多在武汉大学事迹的几点考辨》，中国闻一多研究会、闻一多基金会编《闻一多研究丛刊》第2集，第363至365页）

辞职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唐义精（字粹庵）欲聘先生在该校任教，先生婉言谢绝，但校董的名义至少保持至一九三四年。

在上海，遇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振声，格外欢欣。

时，"教育部对于全国国立大学计画，陆续进行。山东原有山东大学，筹备设立，日久未成事实。青岛亦有一青岛大学，办理未见发达，教部计画青岛地方，宜设立一国立大学，故曾于行政院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出设立一国立青岛大学，将山东大学取消，青岛大学所有校产，移交国立青岛大学应用，业经议决照办。"为此，教育部已"聘请何思源、王近信、赵畸（赵太侔）、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谱、蔡元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已分函聘请，并咨山东省政府查照。"（《青岛大学筹备员发表》，《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2卷第20期，1929.6.24）杨振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南京政府教育部指派，负责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并内定为校长。六月中旬，杨到青岛，旋赴上海延揽教员。杨振声一见先生，便请先生去青岛大学主持中文系工作，并请编辑《新月》并在吴淞中国公学、真如暨南大学兼课的梁实秋去主持外文系。初，先生有些犹豫，杨力言青岛胜地，景物宜人，恰梁实秋正准备回北平省亲。于是，先生与梁相偕乘船去青岛，一睹究竟。

在青岛的情形，梁实秋《谈闻一多》记述到："船到青岛，住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信步街道，整洁宽敞，尚有若干市招全是日本气味。我们到了一家吴服店，各自选购一件和服，宽袍大袖，饶有古意，一多还买了一件浑身花蝴蝶的，归遗细君。我们雇了两部马车，观光全市，看了海滨公园、汇泉浴场、炮台湾、湛山、第一公园、总

督府，到处都是红瓦的楼房点缀在葱笼的绿树中间，而且三面临海，形势天成。我们不禁感叹，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真是令人赏玩不尽，德国人在此地的建设也实在是坚实可观，中间虽然经过日本人的窃踞，规模犹存，以后我们纵然要糟蹋，怕一时也糟蹋不完。这一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那两个车夫，山东大汉，彬彬有礼，……车在坡头行走，山上居民接水的橡皮管横亘路上，四顾无人，马车压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车夫停车，下车，把水管高高举起，把马车赶过去，再把水管放下来，一路上如是折腾者有三数次，车夫不以为烦。……青岛的天气冬暖夏凉，风光旖旎，而人情尤为淳厚，我们立刻就认定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所以我们访金甫之后，就一言而决，决定在青岛大学任教。"（第 81 至 82 页）

游青岛之后，杨振声设宴款待先生与梁实秋。先生就是在宴席上答应接受青岛大学聘书的。

七月二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在南京召开，秘书长为胡适。会议决定改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为编译委员会，聘胡适为委员长、张准为副委员长。胡适遂提出编译委员会委员名单十三人，先生为其一。

七月十四日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议决提请聘任委员会聘请先生为中国文学系专任教授，月薪拟定为三百二十元。（据《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次月十八日《清华大学校刊》第一九六号之《新聘教师初志》中报道此事。但北平局势在阎锡山控制中，属南京系统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难有作为，已于五月辞职。先生大约考虑到清华校局不稳，同时梁实秋也决定就任青岛大学教职，故放弃回清华执教的机会。

八月初　携眷至青岛。《国立青岛大学一览·职教员录》先生名下云"十九年八月到校"。九月，《山东教育行政周报》载："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自到任以来，积极筹备开学事宜，修理房舍、招考新生、聘请教授、购置图书仪器。刻各寄宿舍大礼堂、教室饭厅、沐浴室已修理完竣，今年补习班升入正科者，及新招学生共一百五十人，多已到校，二次在青、济两处续招新生，投考者约百余人，尚未榜示，新聘各科教授，多系国内名流，闻教务长为中委张道藩氏，总务长陈启超，中国文学系主任闻一多，外国语文系主任梁实秋，教育系主任沈履，数学系主任黄任初，化学系主任汤汉鼎，物理系主任胡敦复，生物系主任潘光旦，暨讲师、助教二十余位，多已到校。新购西文书籍，价值四万余元，中文书籍一万余元，中外杂志报章，多至百余种，理化仪器，新自沪购到者，价值一万元。刻校内布告，定于本月二十日行开学典礼。闻杨校长已函请监察院长、本校筹备委员蔡元培氏来校致词，届时必有一番盛况。"（《国立青岛大学开学有期》，《山东教育行政周报》第 99 期，1930.9.20）

初到青岛，住学校对门大学路一幢小楼。梁实秋说他住在光线很暗的一层，但先生的学生王先进说："闻先生刚到青大时，住在龙江路七号的一座小楼上。那时，他在中文系楼上上课，经常从大学路的校门走进来，穿着长衫，提着皮包，目不斜视，大有正人君子之风度"，"有时，晚上出去看电影回来，路过龙江路七号时，看到闻先生的二楼房间还亮着灯"。（刘桓、金辉《闻一多在青岛史实考略》，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39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臧克家也说："当时，我经常拿着诗作，到闻先生的楼上去请教。闻先生当时不是住在楼下。他的书房里，四壁都是书，有特色的，只是那把椅子，它是用一棵大树的树根雕刻而成，别有一种古色古香的风味。"（同前）

时青岛大学在青岛、济南、北平三处招考一年级新生，先生参加阅卷工作。

不久，迁至汇泉浴场不远的面临文登路的一栋小房，出门即是沙滩，涨潮时海水离门口不到二丈。夜听潮水一进一退，常不能寐，心潮起伏，不禁想起英国诗人安诺德的《多汶海滩》一诗。梁实秋这时住在鱼山路，先生到学校必经其处，常约其同行。青岛多山路，出门时常携带一根手杖，家中又备了好几根，梁实秋说先生"很欣赏策杖而行的那种悠然的态度"。（《谈闻一多》，第84页）

八月八日　中午，胡适乘船至青岛，宿福山路新一号宋春舫宅。因饮食泻肚，诊断可能是盲肠炎，医生不准起床见客。胡适日记云："以后实秋、一多、金甫、太侔君来，皆不能起来见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75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胡适此次抵青岛，是为参加中华文化基金会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会议，并与先生、梁实秋商量编译委员会事。

八月十三日　与梁实秋、赵太侔探望病中的胡适。胡适日记："实秋、一多、太侔来。我请他们先拟一个欧洲名著一百种的目，略用'哈佛丛书'为标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757页）

八月十五日　胡适与任鸿隽、张子高商谈编译委员会人选，决定请先生和梁实秋参加。胡适日记："晚上（任）叔永与（张）子高来，细谈编译委员会的事，把人选大致决定了。拟分二组：甲组丁在君、赵元任、陈寅恪、傅孟真、陈通伯、闻一多、梁实秋；乙组王季梁、胡经甫、胡步曾、竺藕舫、丁西林、姜立夫。"（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759页）

八月十六日　胡适访青岛大学，与先生等人相见。胡适日记："上午到青岛大学，看杨金甫、蔡先生，见着太侔、实秋、杨允中、胡刚复、一多等。"（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第760页）中午，胡适乘船赴上海。

九月十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召开第二十九次执行、财政委员会联席

会，根据胡适、张子高提名，议决聘任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丁西林、姜立夫、胡先骕、王琎、胡经甫、竺可桢为编译委员会委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报告》第2页，1931年12月刊行）编译委员会工作分历史部、世界名著部、科学教本部三部。先生参加世界名著部工作，其职责为"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及"审查收受之书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编译委员会简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报告》第51页，1930年12月刊行）

九月二十一日　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学。校长杨振声宣誓就职。先生被正式聘为该校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时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教育学系三系，聘请教授有梁实秋（兼图书馆馆长、外文系主任）、赵太侔、杜光埙、谭葆慎，讲师有黄粹泊、王士璠等。（据《青岛大学一览·职教员录》，1931年度）

青岛大学位于万年山麓，以原德国的万年兵营为校址，只有五六座构造坚固的楼房作校舍，其中一幢青岛市政府保安队占用。

青岛大学名为"国立"，但由于它接收了原省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的校产，而且实际上南京政府的势力亦未能全部控制山东境内，所以办学经费仍由省里负担一部分。这便为青岛大学日后的动荡不安，埋下了引线。

这学年，先生在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唐诗"、"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课程"内容注重各时代之社会背景及作家生活，以期阐明我国历代文艺思潮及其艺术所以形成演变之因"。唐诗课则"依时次为先后，取唐代之主要诗作，参以时代背景及作家生活，详加疏解，以期说明唐诗之特标的风格，并其间所呈现之唐代文化"。（《青岛大学一览·文学院学程纲要》，1931年度）名著选读是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先生在讲义里选有阮大铖的一首诗，诗中有"始知夜来身，宿此千峰上"的句子。又给学生讲龚自珍的"惟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据臧克家《海——回忆一多先生》，《怀人集》第11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

同时，又给外文系学生开设英诗课。

这时，臧克家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经先生同意，转入中文系。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一九三〇年暑假，重新考入这所大学，成为正式学生[①]。这场考试，数学得了零分。国文，出了两道题目，一个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个是《杂感》，任作一题，我两题都作了。当我到注册科报到的时候，清华大学毕业的一

① 臧克家此前是该校预科学生。

位姓庄的职员，看到我的名字，笑着瞪了我一眼，报喜似的对我说：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我原入的梁实秋先生作主任的英文系，因为记忆力差，吃不消，想转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先生。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不少和我抱同样目的前去的同学，全被拒绝了，我有点胆怯的立在他身旁，当他听到我自报姓名时，他仰起脸向我注视了一眼，用高兴的声调把三个字送入我的耳中：'你来吧！'从此，我成为闻一多先生手下的一名中文系的弟子。从此，我成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一名诗的学徒。"(《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九月二十四日 徐志摩在上海筹办《诗刊》，写信给梁实秋，云："《诗刊》广告①，想已瞥及，一[多]兄与秋郎②不可不挥毫以长声势，不拘短长，定期出席。"(蒋复璁、梁实秋编《徐志摩全集》第1辑，第90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

十月十九日 胡适邀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全体委员在欧美同学会聚会，先生与梁实秋出席之。会上，胡适出示关于世界名著翻译计划和历史教材拟译书目，决定分组进行。

会议期间，先生与梁实秋曾去燕京大学看望一年前结婚的吴文藻、冰心。冰心《追念闻一多先生》："他们一进门来，挥着扇子，满口嚷热。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室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忽然笑说：'我们出去一会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看别的朋友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那时我们还不惯于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茶烟待客'风俗'。"(《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08至209页)

十月二十七日 与杨振声、赵太侔晤来访之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张书学、李勇慧《王献唐先生年谱长编》未刊稿) 王献唐为著名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一九二九年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倾心山东地方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时为收集图书事往青岛大学。

十一月七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谈到朱湘，说："子沅

① 《诗刊》广告登于《新月》第3卷第2期。

② 秋郎即梁实秋，以其1925年春在美国纽约演出英文古装剧《琵琶记》时饰蔡中郎而得名。

故态复萌，令人担忧。这人将来要闹到如何结局？至于他对你的行为，你当然可以原谅。这人实在可怜，朋友既没有办法，只希望上帝援救他。但是，子离，你在他身边一天，还是你的责任。他需要精神的调息，抚慰。你不当拒绝他这一点，虽则是他曾经那样的恼过你。”谈到学术研究时，说：“故纸堆终竟是把那点灵火闷熄了……关于乘舆和服饰，我正想整理一番。”

是月底　徐志摩为《诗刊》组稿事，写信给梁实秋，请其代为催促先生帮忙。信云：“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刊》始业，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到，刊即不发，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以策之，况本非驽，特懒惫耳，稍一振蹶，行见长空万里也。”（蒋复璁、梁实秋编《徐志摩全集》第1辑，第95至96页）先生的诗《奇迹》，便是在这种催促下写成的。

是月　青岛大学爆发全校性罢课。原因是开学后，学校发现有些学生用假文凭报考，便宣布褫夺这些学生的学籍。这引起许多人不满，认为既然能考取，就证明够得上入学资格，不必用文凭来卡学生。先生则站在学校当局的立场上。

十二月四日　出席青岛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议决：一、全体同学即行上课，在未恢复上课之前，任何要求不予置议；二、宣布学生自治会不合法，其议决案无效。

十二月五日　青岛大学当局组织护校团，由赞成昨日校务会议的学生组成。护校团在教学楼下为上课事与罢课纠察队发生争执，教务长张道藩打电话调来警察保安队包围校舍。（据梁实秋《悼张道藩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13卷第1期，1968.7）学校当局布告开除学生六十多名（第一期全校学生共一二六名），罢课遂失败。在这次事件中，先生虽站在学校当局的立场上，但导致罢课失败的主要因素，是教务长张道藩的那个电话，然而一年后张却将责任全数推在先生身上。

十二月十日　致朱湘、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提到近来诗坛又热闹起来的事，很是兴奋，说：

> 足二三年，未曾写出一个字来，今天算破了例。这消息自然得先报告你们。听我先谈谈，不忙看诗，因为那勉强算得一首长诗。《新月》三卷二号中沈从文的评《死水》，看见没有？那篇批评给了我不少的奋兴。陈梦家、方玮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梦家是我的发现，不成问题。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便拿《新月》最近发表的几篇讲，我的门徒恐怕已经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着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人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据吗？这一欢喜，这一急，可了不

得！花了四天工夫，旷了两堂课，结果是这一首玩意儿。本意是一首商籁，却闹成这样松懈的一件东西。也算不得“无韵诗”，那更是谈何容易。毕竟我是高兴、得意，因为我已证明了这点灵机虽荒了许久没有运用，但还没有生锈。写完了这首，不用说，还想写。说不定第二个“叫春”的时期快到了。你们该为我庆贺。……

仿佛又热闹起来了。梦家、玮德合著的《悔与回》已由诗刊社出版了。大约等我这篇寄到，正式的诗刊就可以付印。从文写过评《死水》后，又写完一篇评《草莽集》，马上就要见于《新月》。上海的刘宇准备编一本《一九三〇年诗选》，你们大概已经知道。自从老《诗刊》歇业后，三四年来，几曾见过本年十二月这样热闹的一个月份？子离的诗集何妨也乘此赶快送去印？爽兴把这当儿凑成一个新诗的纪念月，好不好？我们可以让书店限期一月中一准印出来，好在那集子分量不甚多。可是子离这样懒，真叫人急坏了。赶快罢！赶快罢！告诉我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封面，我爽兴再破一回戒给你画一张。这时机太好了，我真喜得手忙脚乱，不知怎么办！

俗语说“时运来了，城墙挡不住”。今年新年，是该新诗坛过一个丰富的年。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①]，方玮德的姑母，能做诗，有东西，有东西，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做诗的，一天天的多起来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先生所说的“破了例”的“长诗”，即“花了四天工夫，旷了两堂课”写成的《奇迹》。该诗后发表于次年一月二十日上海《诗刊》创刊号，收《闻一多诗集》。徐志摩知道这首诗，也非常兴奋，是月十九日给梁实秋信中说：“十多日来，无日不盼青岛来的青鸟，今早从南京归来，居然盼到了。喜悦之至，非立即写信道谢不可。《诗刊》印得成了！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捻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但《奇迹》何以尚未到来？明天再不到，我急得想发电去叫你们‘电汇’的了！……一多《奇迹》既演一次，必有源源而来者，我们联合起来祝贺他，你尤其负责任督著他，千万别让那精灵小鬼——灵感——给胡跑溜了！”（蒋复璁、梁实秋编《徐志摩全集》第1辑，第100至101页）

梁实秋与徐志摩认识不同，他认为先生的《奇迹》事出有因。《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

① 方令孺，安徽桐城人，1923年赴美留学，曾就读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

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这不仅是他三年来的唯一的诗作，也可说是他最后的一篇。"（第 87 页）所谓"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大概是先生与中文系讲师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在青岛大学，先生仅写过这一首诗。虽不再写诗，却还朗诵诗。梁实秋《谈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有一次他在礼堂朗诵他的新诗。他捧着那一本《死水》，选了六七首诗，我记得其中有两首最受欢迎，《罪过》与《天安门》。他先说明诗的写作经过，随后以他那不十分纯熟的国语用沉着的低音诵读。诗人朗诵自己的诗都是出之以流畅自然，不应该张牙舞爪的喊得力竭声嘶。一多的诵诗是很好的一次示范。他试想以几个字组成为一音步，每一行含着固定数目的音步，希望能建立一种有规律的诗的节奏与形式。……两首诗都是以北平土话写成的，至少是一多所能吸收的北平土话，读起来颇有抑扬顿挫之致，而且诗又是写实的，都是出之于穷苦人的口吻，非常亲切。我记得平素不能欣赏白话诗的朋友，那天听了他的诗歌朗诵都一致表示极感兴味。"（第 91 至 96 页）

除了诗，先生还注意到散文。好像是为了给学生做示范，先生写了一篇《青岛》，被收入一九三六年上海大众书局出版的《古今名文八百篇》第一集。《闻一多全集》未收。这是迄今所知先生唯一的抒情散文，这散文也像诗的境界一样，同时还表现着先生的某些生活情怀：

> 海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奇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进湾，先看见小青岛，就是先前浮沉在巨浪中的青点，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青岛。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谁信这个现成的海市蜃楼，一百年前还是个荒岛？
>
> 当春天，街市上和山野间密集的树叶，遮蔽着岛上所有的住屋，向着大海碧绿的波浪，岛上起伏的青梢也是一片海浪，浪下有似海底下神人所住的仙宫。但是在榆树丛荫，还埋着十多年前德国人坚伟的炮台，深长的甬道里你还可以看见那些地下室，那些被毁的大炮机，和墙壁上血涂的手迹。——欧战时这儿剩有五百德国兵丁和日本争夺我们的小岛，德国人败了，日本的太阳旗曾经一时招展全市，但不久又归还了我们。在青岛，有的是一片绿林下的仙宫和海水泱泱的高歌，不许人想到地下还藏着十多间可怕的暗窟，如今全毁了。

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儿可以坐憩，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沿海岸处有许多伸长的山角，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在沙滩上飞转，溅起白浪花，又退回去，不厌倦的呼啸。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岩石上，听那巨浪撞击着岩石激起一两丈高的水花。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站桥，去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

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成篱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软风一吹来就憩了。四月中旬，奇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十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首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蹊。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踯躅在山坡下的"山踯躅"、丁香、红端木，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毯；往山后深林里走去，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

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人像小鱼一般，曝露在日光下，怀抱中是薰人的咸风。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篷，人全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街路上满是烂醉的外国水手，一路上胡唱。

但是等秋风吹起，满岛又回复了它的沉默，少有行人走，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木牛的叫声，人说木牛躲在海角下，谁都不知道在那儿。

先生很重感情，学生作业中只要有"情"，总可以得到好分数。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海》。翟鹤仙同学得了八十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争着抢着要他作文簿看。他写一个穷孩子，爸爸因为谋生，几年前出海到外地去了。孩子思念爸爸，时常到海边去看归来的船。"（《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3 期）先生显然被这"情"打动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致陈梦家信。后以《论〈悔与回〉》为题，发表于上海《新月》第三卷第五、六号合刊[①]。收《闻一多全集》。

《悔与回》是陈梦家、方玮德合著的一本诗集，先生在信中说它的出版"自然是本年诗坛最可纪念的一件事。我曾经给志摩写信说：我在捏着把汗夸奖你们——

① 《新月》月刊创刊不久，即出现脱期。第 3 卷第 5、6 号合刊出版日期写明为 1930 年 7、8 月，实际上出版日期为 1931 年 2 月，所以此文写作时间与发表日期出现倒置。凡此类情况，不再逐一说明。

我的两个学生;因为我知道自己决写不出那样惊心动魄的诗来,即使有了你们那哀艳凄馨的材料。"接下,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有几处小地方,却有商酌的余地。(一)不用标点,不敢赞同。诗不能没有节奏。标点的用处,不但界划句读,并且能标明节奏(在中国文字里尤其如此),要标点的理由如此,不要它的理由,我却想不出。(二)"生殖器的暴动"一类的句子,不是表现怨毒、愤嫉时必需的字句。你可以换上一套字样,而表现力能比这增加十倍。不信,拿志摩的《罪与罚》再读读看。玮德的文字比梦家来得更明彻,是他的长处,但明彻则可,赤裸却要不得。这理由又极明显。赤裸了便无暗示之可言,而诗的文字都能丢掉暗示性呢?我并非绅士派,"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我也有顾不到体面的时候,但碰到"梅毒""生殖器"一类的字句,我却不敢下手。(三)长篇的"无韵体"式的诗,每行字数似应多点,才称得住。(四)句子似应稍整齐点,不必呆板的限定字数,但各行相差也不应太远,因为那样才显得有分量些。以上两点是我个人的见解,或许是偏见。我是受过绘画的训练的,诗的外表的形式,我总忘不记。既是直觉的意见,所以说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来,也没有人能驳倒我。(五)我认为长篇的结构,应拿玮德他们府上那一派的古文[①]来做模范。谋篇布局应该合乎一种法度,转折处尤其要紧——索性腐败一气——要有悬崖勒马的神气与力量。再翻开《古文辞类纂》来体帖一回,你定可以发现其间艺术的精妙。照你们这两首看来,再往下写三十行五十行,未尝不可,或少写十行二十行,恐怕也无大关系。艺术的 finality 在那里?

先生看到《悔与回》时的心情,是很兴奋的。经方令孺的提醒,想起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与方玮德的往来,于是立即从方令孺处要了一张方玮德的照片,与陈梦家的照片一起置于案头。

是年　为日本人无理殴打一中国学生而愤怒。梅亭《我所见的闻教授》:"闻教授是一个正义不屈的人,我曾记得我那位大哥给我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在闻教授才去青岛大学执教的那一年,有一个学生,在海滩上玩耍,不知什么原因和傲慢的日本小孩发生了冲突,结果被日本人打得半死还被送到了警察局。那名义上是中国人实际上专门媚外的警察局长,在向日本人笑着道了歉以后,不顾社会人士的愤怒与要求,竟把那个学生押了起来,然后又用电话警告了校长'对学生放纵'。这件事被正在上西洋文学史的闻教授知道了,愤怒使他的脸色马上变得怕

① 方玮德是安徽桐城人,该地在清代出过古文学派,世称桐城派,其领袖人物方苞即方玮德的祖上。

人,抛下了书本,他大声的说:'中国,中国,难到[道]你已亡了国吗?!'他主张积极的去交涉,可是学校里有一位主张所谓'国家至上'的教授来劝他不必为这小事而伤了友邦与当局的和气。闻教授以厌恶的不屑理会的态度回答了他。本来学生们已经沉不住气了,闻教授的这种行动鼓励了他们,于是学校沸腾起来了,当局一看形势不好,就把那个学生放了。"(延安《解放日报》,1946.7.25)

一九三一年　三十三岁

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是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

一月五日　胡适在北平写信给梁实秋，说徐志摩昨日来北平，赞成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又说“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信末祝先生和梁实秋、杨振声、赵太侔、宋春舫[①]“诸友新年大吉”。（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95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5月出版）

一月十五日　王献唐在济南接先生函。上年十月二十七日，杨振声托王献唐为学校购书，先生该函即寻问请其代定翰文斋书籍价目。十七日，王献唐快函复先生，告之翰文斋书价。二十六日，王献唐复接先生函，二十八日亦复之。（张书学、李勇慧《王献唐先生年谱长编》未刊稿）

一月二十日　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创刊号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继朱自清等创办《诗》、先生等创办《晨报·诗镌》以后的第三个专门发表诗作的刊物。《诗刊》的撰稿人，多为先生的同仁、朋友。

诗《奇迹》发表于上海《诗刊》创刊号，收《闻一多诗集》。徐志摩在《诗刊·序》中说“我们要说的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指的即此诗。

胡适是在二十四日自上海至青岛的船上看到《诗刊》第一期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读《陈梦家的诗集》，这里面有许多好诗，小诗有很好的，长诗如《都市的颂歌》也算是很成功之作。”“读昨日新出的《诗刊》第一号，其中也有绝可喜的诗。一多有一首《奇迹》，很用气力，成绩也很好。志摩有一篇四百行的长诗——《爱的灵感》——是近年的第一长诗，也是他的一篇杰作。”“新诗到此时可算是成立了。

---

① 宋春舫于国立青岛大学筹备时期，出任图书馆馆长。学校正式成立后，其离开学校，主持万国疗养院。

我读了这几位新作者的诗，心里十分高兴，祝福他们的成功无限！他们此时的成绩已超过我十四年前的最大期望了。我辟此荒地，自己不能努力种植，自己很惭愧。这几年来，一班新诗人努力种植，遂成灿烂的园地，我这个当年垦荒者来这里徘徊玩赏，看他们的收获就如同我自己收获丰盈一样，心里直高兴出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42页）

《奇迹》发表后，先生又以笔名"沙蕾"写下新诗《凭藉》，但未发表，交梁实秋保存。多年后，梁实秋公开此诗时特做说明："我再在这里发表一首一多从未刊布的诗。这首情诗写得并不好，有些英国形而上的味道，只是有一个平凡的 Conceit（意为比喻）而已。但是这首诗是他在青岛时一阵情感激动下写出来的。他不肯署真名，要我转寄给《诗刊》发表。我告诉他笔迹是瞒不了人的。他于是也不坚持发表，原稿留在我处。"（梁实秋《看云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年8月初版）该诗全文为：

"你凭藉什么来和我相爱？"
假使一旦你这样提出质问来，
我将答得很从容——我是不慌张的，
"凭着妒忌，至大无伦的妒忌！"
真的，你喝茶时，我会仇视那杯子，
每次你说到那片云彩多美，每次，
你不知道我的心便在那里恶骂：
"怎么？难道我还不如它？"

一月二十五日 中午十二时，胡适抵青岛，先生与杨振声、梁实秋、杜光埙、唐家珍（医生）到码头迎接，送至万国疗养院下榻后，即至顺兴楼午餐。晚，先生与杨振声、梁实秋及邓仲纯、秦素美、方令孺、陈季超、周钟麒、蒋右沧、谭声传等，复在顺兴楼举行欢迎胡适晚餐。胡适说："我同一多从不曾深谈过，今天是第一次和他深谈，深爱其人。"（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43页）胡适来青岛，除与先生、梁实秋商议翻译莎士比亚著作事，并应邀在青岛大学做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讲演。

一月二十六日 下午，先生与梁实秋访胡适。他们谈到《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事时，胡适说"他们都很热心"，商谈结果"大致是决定用散文，但不妨用韵文试译几种，如'Tempesi'（《暴风雨》）之类。我提议邀几个人试译几百首英国诗，他们也赞成。"（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43至44页）

一月二十七日 中午，先生等请胡适在顺兴楼吃饭。时，先生酒兴正浓，拉胡适入座豁拳，吓得他直挂免战牌。梁实秋《谈闻一多》中回忆到："此地虽无文化，无妨饮食征逐。杨金甫、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加上一多和我，戏

称'酒中八仙',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不是顺兴楼,就是厚德福,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金甫、季超最善拇战,我们曾自谓'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的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一多笑呵呵的说:'不要忘记,山东本是出拳匪的地方!'"(第97页) 胡适这天在日记里所说"我的戒酒戒指到了青岛才有大用处,居然可以一点不喝",指的就是这件事。"酒中八仙",原只有七人,是杨振声倡议周末聚饮,"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于是猜拳行令、觥筹交错,乐此而不疲者凡两年。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勉强她。"(梁实秋《方令孺其人》,《梁实秋怀人丛录》,第22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下午四时,胡适在青岛大学演讲,题目为"文化史上的山东",内容为"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区别,强调"齐学"的重要性。听者六百余人,挤满了礼堂。

晚餐前,胡适与先生及杨振声、梁实秋谈,欲请他们到北京大学任教。胡适日记:"晚上先在金甫家,与实秋、一多、金甫谈。金甫肯回北京大学,并约闻、梁二君同去。所踌躇者,青岛大学不易丢手。我明天到济南,当与何思源兄一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45页)

当晚,胡适离青岛赴济南,先生与杨振声、梁实秋、周钟麒、杜光埙、方令孺、秦素美、蒋右沧等至火车站送行。

二月十三日　先生与梁实秋写信给胡适。原信已佚。信中附有梁实秋草拟的翻译莎士比亚著作之计划,这当是先生与梁实秋共同商定的。

二月十九日　夜,致陈梦家信。后以《谈商籁体》为题,发表于上海《新月》第三卷第五、六号合刊。收《闻一多全集》。时,陈梦家作了一首商籁体(即十四行诗)的《太湖之夜》,先生读后说"印象不大深,恐怕这初次的尝试,还不能算成功",因为"这体裁是不容易做"的。先生谈到这种体裁的创作要点时说:

> 十四行与韵脚的布置,是必需的,但非最重要的条件。关于商籁体裁早想写篇文章谈谈,老是忙,身边又没有这类的书,所以没法动手。大略的讲,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非遵守不可,那便是在第八行的末尾,定规要一个停顿。最严格的商籁体,应以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八行中又以每四行为一小段,六行中或以每三行为一小段,或以前四行为一小段,末二行为一小段。总计全篇的四小段,(我讲的依然是商籁体,不是八股!)第一段起,第二承,第三转,第四合。讲到这里,你自然明白为什么第八行尾上的标点应是"。"或与它相类的标点。"承"是连着"起"来的,但"转"却不能连着"承"走,否则转不过来了。大概

"起""承"容易办,"转""合"最难,一篇的精神往往得靠一转一合。总之,一首理想的商籁体,应该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最忌的是一条直线。……音节和格律的问题,始终没有人好好的讨论过。我又想提起这用字的问题来,又怕还是一场自讨没趣。总之这些话,深的人嫌它太浅,浅的人又嫌它太深,叫人不晓得如何开口。

二月二十五日 作《现代英国诗人序》。《现代英国诗人》是费鉴照撰写的一本论文集。三年前,先生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讲授"现代英美诗"时,费鉴照便选修了这门课,并萌发了写《现代英国诗人》一书的念头。先生也极力怂恿费鉴照,鼓励他陆续撰写论文。该书中九篇论文,每篇脱稿后,先生都认真看过。先生说:"其间的见解,有与我符合的,有使我惊喜而惭愧,因为是我没有悟到的。总之,全是我所赞同的。""对于英国文学的兴趣早被线装书劫去了,哈代是什么一套腔调,梅奈尔是一种什么丰姿,几乎没留下一些印象","因为要作序,这才从朋友处找到一两种现代诗的选本,涉猎了几晚,(那几晚的享受不用提了!)结果是恢复了谈现代诗的兴趣"。在《序》中,先生用评论哈代、白理基斯、郝思曼、梅奈尔、夏芝、梅士斐、白鲁克、德拉迈尔、奈陀夫人等诗人的方法,介绍了《现代英国诗人》一书,这也表现了先生对这几位在文学史上站稳了位置的诗人的看法。文中说:

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这样我们便叫作适应时代精神。墙头的一层砖和墙脚的一层,论质料,不见得有什么区别,然而碰巧砌在顶上的便有了资格瞧不起那垫底的。何等的无耻!如果再说正因垫底的砖是平平稳稳的砌着的,我们便偏不那样,要竖着,要侧着,甚至要歪着砌,那自然是更可笑了。所谓艺术的宫殿现在确乎是有一种怪现象:竖着,侧着,歪着的砖处处都是。这建筑物的前途,你去揣想罢!

认清了这一点,我览到现代的英国诗人才值得一谈,而作者拣出本书所包括的这几家来讨论,更足见不是没有标准的。这里所论到的八家:哈代、白理基斯、郝思曼、梅奈尔、夏芝、梅士斐、白鲁克、德拉迈尔,没有一个不是跟着传统的步伐走的。梅士斐的态度,在八人中,可说最合乎现代的意义,不料他用来表现这态度的工具,却回到了十四世纪的乔塞。讲守旧,不能比这更守旧了。然而除了莎翁,英国诗人中能像 Dauber Widow of the Bye Street 的作者那样训释人生的,数得上几个?

不但梅士斐如此,只要你撇开偏见,自然看得出这八家与传统的英国诗差异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多;那差异实在不比八人间相互的差异大,也不比前人中例如华茨渥斯与柯立基间的差异大。大概诗人与诗人之间不拘现代与

古代，只有个性与个性的差别，而个性的差别又是有限度的，所以除了这有限的差别以外，古代与现代的作品之间，不会还有！——也实在没有过分的悬殊。

差异当然比从同打眼些。抓到打眼的一方面，恣意的发挥，仿佛其余一面完全不存在似的，这是谈断代文学的通病。这样谈文学，谈任何时代都不行，而在目前时代谈现代文学，这样谈法，尤其不妥。所以虽知道现代英国诗与古代不同的地方不少，我仍不愿在那一方多讲话。如果矫枉过正也是在讨论文学上有时不可免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今天用这方法来介绍本书，想来必是鉴照所容许的。

若是人还不明白，还要问到底为什么要扼重那袒护传统的从同性？不断的改革，不断的求新，岂不更可贵？那么我就只好说这道理非英国问人不可。在诗上，正如在许多事业上都能出人头地的英国人，许是天赋给了他们一种特殊的智慧，对那暴躁、轻佻，或因丧心病狂而失掉智慧的人们谈这一套，从那里谈起！

关于正在那里为祖国争独立自由的奈陀夫人，我们应该体贴并尊重她自己的意见，把她请到附录里去。为的是好和英国诗人分开，使她不致有被诬为英伦的臣仆的嫌疑，虽则她所用的是她的敌人的文字。夏芝又当别论，爱尔兰与印度的情形，究竟不同。

同日　胡适复先生、梁实秋信。主要谈及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计划。全信云：

一多、实秋两兄：

二月十三日的信收到之后，公超来这里，读了此信，他大体都赞成。我因为志摩就要来了，故等他来了再复你们的信，志摩昨天到了[①]，也看了我根据你们的计划略略修改的计划，他也赞成。

现在寄上我修改的计划，大致与实秋所拟全同，止有(六)是我改的，(九)、(十)二条是我拟加的。

(六)条似较原拟办法容易一点。

(九)条是实秋在青岛的提议。

(十)条是预备收受外来的好稿。

以上诸条，请你们审查决定见告。

通伯来信，说他不敢任翻译，只能替你们任校对。我现在把这计划抄送给

① 徐志摩是应胡适邀请，从上海来北平，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后来又兼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

他，看他回信如何。

信后又云：

关于今年暑假开年会的问题，我们都主张在北京，不甚主张青岛。

拟翻译莎翁全集办法。

（一）拟请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君组织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

（二）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剧。校阅需时略相等。）

（三）译稿须完全由委员会负责。本剧译成之后，即将译稿交其他四人详加校阅，纠正内容之错误，并润色其文字。每人校阅一剧，不得过三月。

（四）于每年暑假期内择地开会一次，交换意见，并讨论一切翻译上之问题。

（五）关于翻译之文体，不便详加规定，但大体宜采用有节奏之散文。所注意者则翻译不可为 Para Phrase，文中难译之处，须有详细注释。

（六）为统一译名计，每人译书时，宜将书中地名人名之译音，依原文字母分抄译名表，以便汇交一人负责整理统一。

（七）关于经费一项，拟定总数为〇〇元，用途有三项：

1. 稿费　暂定每剧报酬〇〇元，包括一人的翻译，四人校阅之报酬。合计共〇〇元。

2. 书籍　约〇〇元。

3. 杂费　包括稿纸、年会旅费、委员会费用等项，约〇〇元。

（八）预支稿费，每月每人不得过〇〇元。如半年内不能译完一剧，以后即不能预支。

（九）译书之时，译者可随时用原本作详细中文注释，将来即可另出一部详注的莎翁戏剧读本。此项读本之报酬与出版办法另定之。

（十）委员会以外，若有人翻译莎翁戏剧，愿交与委员会审查者，委员会得接受审查。如有良好译本可由委员会收受校阅出版，并酌定报酬办法。

（附记）全集应如何分配，可于第一次年会决定。现为进行便利计，先每人认定一种，立即试译。现假定每人认译一种如下：

徐志摩　Romeo and Juliet

叶公超　Merchant of Venice

陈通伯　As You Like It

闻一多　Hamlet

梁实秋　Macbeth

（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963至96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

三月二十五日　下午三时，出席青岛大学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还有梁实秋、赵太侔、汤腾汉、皮品高等。讨论内容有本学年购买图书经费及分配方法，决定购买图书需由本委员会审查决定后，方能进行。（据青岛大学《图书馆增刊》第2号，1931.5.11）

三月三十日　致曹葆华信发表于《清华大学校刊》第二七八号。曹葆华，四川乐山人，时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一九三〇年，他出版了诗集《寄诗魂》，遂赠先生。先生信中即对其诗提出看法。信云：

葆华兄：

承不弃，以诗集见寄，并辱重下问，惶赧无地，然不取不以实告，诚以流俗阿谀，甚无谓也。大抵尊作规抚西诗处少，像沫若处多。十四行诗，沫若所无，故皆圆重凝浑，皆可爱。鄙见尊集中以此体为最佳，高明以为然否？子沅所论各点，多大致赞同，其论足下思想处，尤中肯，兹不备论。然子沅有一缺点，即词句太典雅，最易流为Mannerism，此不可不知。闲尝论作新诗，须肯说俗话，敢说俗话，从俗处入手，始能"清新"也。足下于英诗人中，不知爱读何人？鄙意Browning最足医滑熟之病。现代作者Hardy亦有好处。而美国Robest Frost最足当清新二字，为我辈造diction最良之模范。妄肆瞽说，尚乞宥之！

一多敬白

四月八日　费鉴照在武汉大学写定《现代英国诗人·自序》，文中介绍撰写过程中受到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他说："我在中央大学十七年度学期结束的时候写了论德拉迈尔一篇论文交给一多师，他看了我批评德拉迈尔的一首诗SILVER以后，他说我的意见正与他的相同，他要我拿它写成中文送给《新月》，并且嘱我替《新月》再写几篇现代英国诗人。他愿意拿他的书籍借给我，倘使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愿意帮助我。我受了他的鼓励与帮助，在暑假里鼓着勇气写成四篇，先后送给《新月》发表。暑假后我离开了南京到武昌任事，差不多一年没有写。后来我趁着兴致来的时候，又写成五篇。先后共成十篇，其中两篇——郝思曼与哈代——没有发表过。这十篇里除了台维斯一篇以外，其余的九篇都收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写这九篇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闻一多先生替我修改文字和给我许多提示，时昭瀛先生替我改过文字和给我关于写法的提示，梁实秋先生也替我改正几处。一多师

差不多每篇都看过,他为了我破戒写序,他对我的尽力最多。在付印的时候,又承凌叔华先生替我写封面。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诚恳的谢意!"《现代英国诗人》是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印行,扉页印着:"献给我的老师闻一多先生"。

四月十四日 下午四时,出席青岛大学图书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出席者还有杨振声、梁实秋、黄际遇(任初)、汤腾汉、赵太侔、皮品高。决议"审查检出旧存无价值之书籍免于陈列"。(青岛大学《图书馆增刊》第2号,1931.5.11)

四月二十二日 罗隆基给胡适信中谈到彭基相在《新月》第三卷第五、六号合刊上发表的《文化精神》(意大利现代哲学家真提耳(Giavanni Gentile)所著《教育改造》中一节)受到先生等人的反对。信上说:"彭基相稿是志摩所介绍的。彭基相为何如人,我素昧生平。月刊出版后,一多、实秋及先生都同声反对,我始知此人一点底细。原稿,志摩说已经看过,且力言可登,从前《新月》又曾屡次发表过彭的文章,于是我就将原稿发刊。编辑人不看过稿子,将文章发表,自是荒谬。这里,志摩亦连累人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61页,中华书局1979年5月出版)

四月二十七日 邵冠华写定《评闻一多的〈死水〉》,刊于次月十日《现代文学评论》第一卷第二期。文章认为先生的"诗是认真做的,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显然地比较他的《红烛》进步得多,深沉的表现渐渐的使他走上圆熟的道路"。但也批评到:"闻一多的诗的缺点也有,简括地说,可分二类:A. 呆旧的字太多。B. 诗行太整齐。""第一个缺点的形成大概由于闻先生读了中国的古的诗词太多,太仔细;因之,在无形中闻先生把它们装在他自己的新篇里,而阻碍读者得着新的感想","第二个缺点的形成是由于闻先生过分的重视'音韵'。闻先生是'有韵诗'的提创者之一人,所以特别注意'音韵'。为了特别注意'音韵'的关系,文字上,无形中整齐些,渐渐的趋于'太整齐'的缺点。至于闻先生的'太整齐'的诗行,读过《死水》的人总知道的了。我的意见是诗行的整齐并不会给诗的本身一种坏的影响。整齐也罢,不整齐也罢,只要能自然的写成就好。这一点,似乎闻先生自己也讲过,可惜他已无形的踏上呆的脚铐!"在论述先生的诗歌与外国诗的联系时,邵冠华认为《末日》中的诗句里,"有郝士曼的音节的和谐,同时含着哈代的灰色的情调和深刻的意境"。

四月二十八日 下午四时,出席青岛大学图书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查各系欲购图书书目。(据青岛大学《图书馆增刊》第2号,1931.5.11)

五月十四日 出席青岛大学第十七次校务会议,决议先生与黄际遇、梁实秋负责起草出版委员会组织案。(据《青岛大学周刊》第3期,1931.5.18)

五月十九日 晚,杨振声在顺兴楼宴请到访之顾颉刚。先生与梁实秋、赵太

侔、黄际遇、黄淬泊、邓仲纯、方令孺等十一人作陪。晚九时席散后，先生与方令孺往顾颉刚下榻处略谈。(《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529页)

五月二十日　罗隆基给胡适信，抱怨先生不给《新月》投稿。信中说："月刊内容，的确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进的。一班旧朋友，除先生的文章照样寄来外，都不肯代《新月》做稿。志摩、实秋、一多、英士、公超、上沅、子离、西滢、叔华、从文这一般人都没有稿来。一多、实秋前次来上海，都答应马上寄稿来，如今又毫无音信。编辑人有什么办法？旧人对《新月》内容不甚满意，这责任的确应大家负担，先生意如何？"(《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68页)

同日，罗隆基在给徐志摩信中，亦云："月刊内容非大家负责不可。半年来，一多、实秋、英士、子离、上沅、公超、西滢、叔华等先生都没有稿来，你的稿亦可说太少。《新月》内容的退步，大家都要负责任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70页)

先生对《新月》投稿渐少，是因为对它有些看法，认为它文学艺术的成分少了，政治讨论的成分多了。臧克家在《我的先生闻一多》中写到："谈到《新月》创刊的情形和他个人的主张，他说，《新月》到后来的一些倾向，是和他的初衷距离很远的。"(《人民英烈》，第139页)《新月》创刊以来颇为坎坷，因连续刊登维护人权的文章，受到国民党当局多次指责。随着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先后离沪，光华大学教授罗隆基接手编辑工作，继续刊登有关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批评现状，当局曾查禁《新月》，并逮捕罗隆基，使该刊更为艰难。

五月二十一日　出席青岛大学第十八次校务会议。推定先生和黄淬泊、丁伯骏共同起草组织古物采集委员会案。(据《青岛大学周刊》第4期，1931.5.25)他们起草的《古物征集委员会规则》于二十八日经第十九次校务会议通过，六月一日公布于《青岛大学周刊》第六期。

六月二十一日　胡适给梁实秋信，说到翻译莎士比亚著作事，询及先生是否动手了。信云："昨天与公超谈，他说你告诉他转问翻译莎翁的事，并问何时聚会商量。我本想邀各位早点开会，但我知道志摩为母丧奔走，公超为结婚事忙，都没有动手译书。公超说你也没有动手。一多怎样？如大家都没有试译，似不如等大家暑假中有点成绩时再定期开会。你们以为如何？请一问一多兄。"(引自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978页)

实际上，当时先生等都没按照原计划进行，陈通伯不肯参加，徐志摩年底身亡，先生与叶公超志不在此，只有梁实秋历时多年，一人独自译成莎士比亚著作三十七种。

六月二十六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召开第七次年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聘定闻一多、徐志摩等五君为委员，担任翻译及审查。现拟先行实地试译，

以期决定体裁问题。预计五年至十年，可以全部完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报告》，第24页）

六月三十日 徐志摩致赵家璧信中说曾约先生与杨振声、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但先生等未去。信云：“此来后北大方面又起恐慌，因为原定杨今甫来长文学院，青岛梁、闻诸先生都可以同来，那这边自不愁人手缺少。不想结果青岛一个人都不能来……”（转引自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第89页，上海书店1981年11月影印本）

七月中旬 与梁实秋同赴济南参加山东省留学生考试委员会会议。

会后游大明湖、历下亭。在青岛，也曾游过崂山。梁实秋《谈闻一多》：“青岛附近的名胜只有崂山，可是崂山好像没有什么古迹，尽管群峰削仞乱石穿空，却没有什么古人留下的流风遗韵的痕迹。我和一多、金甫、太侔曾数度往游，在靛缸湾的瀑布前面流连忘返，一多说风景虽美，不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可见他浪迹于山水之间尚不能忘情于人事。我指点山上的岩石，像斧劈皴一般，卓荦峣峥，我说那就是千千万万年前大自然亲手创造的作品，还算不得是‘古迹’么？一多不以为然。后来我们到济南参加山东省留学生考试委员会，事毕游大明湖，一多在历下亭看到‘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依稀想见杜少陵李北海的游踪，这才欣然色喜，虽然其实济南风景当推佛峪为较胜。”（第97至98页）

除游览风景外，先生还很喜欢交友，常到赵孝陆先生家做客。赵先生名录绩，以字行，山东安邱人，清末进士。他爱收藏字画，家中有不少古籍，很受先生敬仰。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先生在给赵先生的侄儿赵俪生信中，还说：“八年前旅居青岛时，曾得谒见令伯父孝翁先生，追陪履杖，古貌高风，暖然似春，私心仰慕不已，顷闻遽归道山，曷胜震悼。”（《闻一多书信选集》，第313页）

先生为着研究学术，也常与书贾打交道，却也上过当。梁实秋《谈闻一多》中云：“青岛虽然是一个摩登都市，究竟是个海陬小邑，这里没有南京的夫子庙，更没有北平的琉璃厂，一多形容之为‘没有文化’。有一书贾来兜售旧书，颇多善本，宋刊监本麻沙无不具备，自言出于长沙王氏，一多问他莫非是‘复壁藏书’以身殉书之王某，彼连声称诺，一多大喜，相与盘桓数日。后来听人说起，其中多是赝品。一多闻之嗒然。”（第97页）

是年暑假 因高孝贞即将分娩，送家眷回武昌[①]。归来后，因文登路住所紧靠海水浴场，晚上涛声过大，影响睡眠，遂搬至学校宿舍。梁实秋说那是“孤零零的一

① 梁实秋《谈闻一多》云：“十九年一多送眷回乡”，但文前又说先生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便趁暑假的时候送眷回到湖北”。据后文，先生当是1931年暑假送家眷归里。

座楼，在学校的东北方，面对着一座小小的坟山，夏夜草长，有鬼火出没。楼上有一个套房，内外两间，由一多住，楼下的套房由黄际遇（任初）住。”（梁实秋《谈闻一多》，第84至85页）这是一幢红瓦黄墙、古朴典雅的独立二层小楼，建筑面积为三六五平方米，占地面积一八二平方米，砖石混合结构，有木制的挑檐，勒角和门窗的券顶镶嵌有花岗石，是德国侵占青岛期间所修建的俾斯麦兵营的辅助用房。（杨洪勋《闻一多故居》，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16辑，第296至297页，青岛出版社2006年5月第2版）

与先生同居在这幢楼的黄际遇是潮州人，数学教授，由河南省教育厅长卸任后来此任理学院院长。黄虽长先生十几岁，两人却可以谈得来。

八月　徐志摩的诗集《猛虎集》出版，先生为其绘制了封面。封面很简练，在黄底上横画出粗墨痕，极似一张平铺的虎皮。

九月七日　青岛大学开学。这学年，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唐诗”、“英诗入门”。

由于家眷送走了，没有了家累，先生得以全副精力进行中国文学的研究。首先进行的还是唐诗研究。梁实秋《谈闻一多》：“一多在武汉时既已对杜诗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的计划，他说要理解杜诗需要理解整个的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草写唐代诗人列传，积稿不少，但未完成。他的主旨是想借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意。”（第85页）

梁实秋所说的先生“开始草写唐代诗人列传”，估计即现存手稿中的《全唐诗人小传》。该稿共九册约六十余万字，收集有唐代四〇六位诗人的材料，其中部分已编成传记，其余多为分门别类摘录的原始资料。

先生做《全唐诗人小传》，本是为了深入研究杜甫而做的必要准备。这方面的工作铺开后，涉及面极广，研究对象也变成整个唐诗了。唐诗研究除《闻一多全集》所收七篇外，现存大量手稿，如疏证方面的有《唐诗笺证》、《唐诗校读法举例》、《全唐诗辩证》、《全唐诗校勘记》等；表谱方面的有《唐文学年表》、《唐诗人生卒考》（附进士登第年龄考）、《新旧唐书人名引得》、《初唐四杰合谱》等；史料收集方面的有《唐诗大系》、《全唐诗补传》、《全唐诗续补》、《全唐诗汇补》；札记方面的有《唐风楼攟录》、《璞堂杂记》、《唐诗要略》、《诗的唐朝》等。

在手稿中保存有一份草拟的《拟思唐宝聚著目录》，它反映了先生研究唐诗的计划和步骤。兹将目录抄出参考：《唐代文学年表》、《唐两京城坊考续补》、《唐代遗书目录标注》、《唐人九种名著叙论》、《全唐诗人补传》、《全唐诗校刊记》、《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略》、《说杜丛抄》、《全唐诗续补》、《全唐诗人生卒年

考》、《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嘉州交游事辑》、《唐文别裁集》。

以上诸项工作，进展情况不一，有些仅仅在青岛开了个头。臧克家在《我的先生闻一多》中回忆到："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上，写得密密行行，看了叫人吃惊。关于杜甫的一大本，连他的朋友也持笔划列成了目录，题名《杜甫交游录》。还有一个抄本，是唐诗摘句，至今还记得上面的一个句子：'蝇鼻落灯花。'"（《人民英烈》，第137页）

《诗经》研究，也在这时铺开了。梁实秋《谈闻一多》："他开始研究《诗经》。有一天他到图书馆找我，我当时兼任图书馆长，他和我商量研究《诗经》的方法，并且索阅莎士比亚的版本以为参考，我就把刚买到的佛奈斯新集注本二十册给他看，他浩然长叹，认为我们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美，但是研究的方法实在是落后了。他决心要把《诗经》这一部最古的文学作品彻底整理一下，他从此埋头苦干，真到了忘寝废食的地步，我有时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他的研究的初步成绩便是后来发表的《匡斋尺牍》。在《诗经》研究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解释《诗经》。他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俱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清儒解诗，王引之的贡献很大，他是得力于他的音韵训诂的知识之渊博，但是一多则更进一步，于音韵训诂之外再运用西洋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例如《匡斋尺牍》所解释的《芣苢》和《狼跋》两首，确有新的发明，指示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有人不满于他的大量使用佛洛伊德的分析方法，以为他过于重视性的象征，平心而论，他相当重视佛洛伊德的学说，但并未使用这一个学说来解释所有的诗篇。"（第85至86页）

讲授英诗入门的情形，臧克家在《闻一多先生诗创作的艺术特色》中回忆到："记得他在讲雪莱的《云雀》歌时，将云雀越飞越高，歌声也越强，诗句所用的音节也越来越长的情况，用充满诗情的腔调吟诵了出来。他喜欢勃朗宁、柯普林。他也给我们讲过盖不勒尔·绿斯蒂的《Sister hell》（题目记不太准了）。一节四行，第五行在括号内。"（《诗刊》，1979年4月号）在《我的先生闻一多》中，臧克家也说："记得有一次在英诗的课堂上，他说：'如果我们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谈诗，而不是在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我讲你们听：坐在草地上，无妨吸着烟，喝着茶，也无妨同样吸一口鸦片……'他诗人的气质很浓厚，两腮瘦削，头发凌乱，戴一副黑边眼镜，讲起书来，时常间顿地拖着'哦哦'的声音。"（《人民英烈》，第137页）当时，先生正在讲英国六大浪

漫诗人之一柯律治的《忽必烈汗》，据说这首名作是在夜间的梦中作出来的。

这学年，青岛大学文学院新聘讲师有赵少侯、游国恩、杨筠如、梁启勋、沈从文、费鉴照，兼任讲师有孙承谟、苏保志、孙方锡、张金梁、刘崇玑，教员有谭纫就。（据《青岛大学一览·职教员录》，1931年度）

又，先生的姑表亲戚林斯德自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毕业，亦由先生介绍来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林斯德的父亲为先生启蒙老师之一，一九二八年林斯德失学，先生曾介绍他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并鼓励他投考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林斯德来青岛大学后，先生建议他编纂《全唐诗文引得今编》，林斯德遂着手这一工作。

九月十四日　王献唐赴青岛大学访先生与杨振声，均未遇。（张书学、李勇慧《王献唐先生年谱长编》未刊稿）

是月　陈梦家选编的《新月诗选》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该书共选先生与徐志摩、饶孟侃、孙大雨、朱湘、邵洵美、方令孺、林徽音、陈梦家、方玮德、梁镇、卞之琳、俞大纲、沈祖牟、沈从文、杨世恩、朱大枬、刘梦苇十八人的诗作八十首。其中选入先生的诗为：《死水》、《“你指着太阳起誓”》、《夜歌》、《也许》、《一个观念》、《奇迹》，共六首，数量在全书中居第二位。次序排在徐志摩之后，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评介先生时说：“影响于近时新诗形式的，当推闻一多和饶孟侃他们的贡献最多。中国文字是以单音组成的单字，但单字的音调可以别为平仄（或抑扬），所以字句的长度和排列常常是一首诗的节奏的基础。主张以字音节的谐和，句的均齐，和节的匀称，为诗的节奏所必须注意而与内容同样不容轻忽的。使听觉与视觉全能感应艺术的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使意义音节（Rhythm）色调（Tone）成为美完的谐和的表现，而为对于建设新诗格律（Form）唯一的贡献，是他们最不容抹杀的努力。”又说：“苦炼是闻一多写诗的精神，他的诗是不断的锻炼不断的雕琢后成就的结晶。《死水》一首代表他的作风。《也许》、《夜歌》同是技巧内容溶成一体的完美。《“你指着太阳起誓”》是他最好一首诗，有如一团熔金的烈火。”当时，《中国新书月报》在介绍这部诗选时，也认为先生的《死水》和《奇迹》，“不论在风格方面，艺术方面都可以说是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了”。（莲时《读〈新月诗选〉》，《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12期，1931.12）

十月一日　青岛大学学生成立反日救国会。“九一八”事变后，青岛《民报》因刊载事变消息，遭日本浪人纵火烧毁，连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亦未能幸免。这更加激起青岛民众的愤慨，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反抗日本暴行。先生对学生成立反日救国会，是积极支持的。

十月五日　四子闻立鹏生于武昌。

十月七日 出席青岛大学第三十一次校务会议。决议酌量增加军事训练时间、组织青岛大学青年义勇军、从学生学宿费中拨款作为援助义勇军的费用。(据《青岛大学周刊》第24期,1931.10.12)

十月十七日 出席青岛大学中国文学系同学会组织的欢迎新同学会。(据《青岛大学周刊》第26期,1931.10.26)

十月二十六日 青岛大学中文系第四班班会成立,聘先生与杨振声等为指导员。(据《青岛大学周刊》第29期,1931.11.16)

十一月十六日 青岛大学学生要求南下请愿,学校当局发布布告,劝阻南下。时,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学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为敦促政府表态,发动赴南京请愿活动。先生这时不赞成学生此举。

青岛政治环境十分复杂。一八九七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强占青岛,日本又利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取代德国,侵占青岛。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便是"收回青岛"。一九二二年年底,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时期,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克复济南,五月三日,日军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枪杀交涉署全部职员,制造了"五三惨案"。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但日本势力仍处处可见。

先生到青岛的那年,有人参考青岛后说:国民革命后,青岛"以前各种事业,大概可以继续进行,惟当时曾与日人签立协定,颇受牵制。以言海运,商轮皆系日船。以言陆运,公共汽车亦日人所有。以言金融,吾国有银行七家,德国一家,日本虽仅正金、朝鲜二家,而金融之权,操之于彼,所发钞票,颇为流行。至与市民经济有关系者,则为青岛之当典,二十家之中,国人仅有一家,余皆日人所有也。以言商业,青市有商店三千余家,日店占四百,而百货均来自日本,大商铺亦多属日本所经营。目下日人以组合之力,收买蔬菜鱼虾,垄断市场,致市民皆受菜贵之影响。以言工业,青市有工厂七十余,外人居半数,而日人独占三十二。工厂之工商界人士较大者为纱厂,而七厂之中,日占其六,以言警权,日本有警察驻青,日人犯罪,须引渡日警审判。以言研究,则如化验室、检验所,观象台等,尚有日人潜居其内,一则为继续研究,一则含监督之意。其他日人所研究机构,正复多多。是故青岛收归国有,名目而已,实则主权仍操诸日人之手,收回云乎哉。"(包伯度《青岛参观小记》,《社会月刊》第2卷第5期,1930.11)

不啻如此,"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在青岛的日本还和中国人发生了激烈冲突。报载:八月"十八日晚,青岛市辽宁路日本鱼店门前,有华人孟吉瑞与该店庖

役华人刘某正在闲谈之际，该店经理日人志磨证彰突出而驱逐，激起口角，该日人脱下木屐，猛扑孟吉瑞面部。街上行人围观殊怀不平。志磨乘机电约青岛日本浪人所组织之国粹会打手数十名，各携凶器，赶来殴击华人。一时混乱，几酿大变。幸我官厅立时弹压，民众早知奸计，卒得排解而散。兹事起端虽微，而日人蓄谋则甚久。故日本全国报纸一致夸大反宣传，竟谓为华人预定之计划。"(《青岛日人暴行事件》，原载《北平晨报》1931年8月25日，转引自《新闻周报》第8卷第34期，1931.8.31) 而八月二十日，大阪《每日新闻》刊登的《三千中国群众袭击青岛邦人》中则声称："十八夜九时顷，青岛市之大日本国粹会青岛本部被三千中国人袭击，大冲突后，竟呈流血惨状。日本人家屋被破坏者六七十户，受伤者六十人，其中重伤者二十五名，生命危笃者二名。国粹会与中国人间，两三日前，即有不稳定之形势，故因琐事，便生冲突。是夜中国人数次包围辽宁路之国粹会本部，群众高喊，惊震天地，致惹起青岛空前之大惨事。"同日出版的大阪《朝日新闻》亦在《中国暴民袭击青岛国粹会本部》消息中凭空臆测说："此次事件发生经过，以数名中国人与日本人口角为暗号，立有数百名携帮凶器之暴徒，包围攻击国粹会本部。群众之暴行，有相当统制，既未掠夺，亦未惨杀。解散后，亦未遗留任何证据物件，同时中国官厅又禁止拍发新闻电。就此类事实观之，则此次暴动可认为与官厅有充分联络之计划的动作。"但是，事实已判明，"当夜观众是否有三千人之多，及群众是否有意图袭击日本人之事，及日本人家屋曾否被捣，日人负伤者是否有六十人之多，事料具在。""当时，青岛市政府为了免于被责袒护，请德国名医卫士英检验双方伤者。"据卫大夫诊验结果，则华人受伤共十人，重者七人，轻者三人。伤状均为利刃所砍，且在背部，可知华人受伤，皆因躲避不及所致。又据其诊验日人伤痕，则皆为皮肤受伤，极为轻微。可见日人为携带凶器之故，猛力砍人，致擦伤皮肤。"于是，青岛市政府向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而日本亦提出反抗议。谁都看得到，"自今夏日本军部决定对华采取扰乱及强硬政策以来，先之以万宝山之霸占，继之以朝鲜之虐杀。万宝山事件动机，日本决非为数百鲜人生度，而妄动军警。乃欲乘此机会，搅挑动华鲜恶感，使华农愤而杀害鲜人，日本便可借题大做，以贯彻其鲸吞满蒙之宿望。"(《青岛日人暴行事件》，原载《北平晨报》1931年8月25日，转引自《新闻周报》第8卷第34期，1931.8.31)

上述复杂形势，是先生主张持重的原因之一。

十一月十九日　徐志摩乘飞机自南京飞北平，在济南白马山附近飞机触山，机毁人亡。先生等闻讯，即请沈从文去济南打探究竟。沈从文给赵家璧信云："记得徐先生在山东遇难，得北京电告时，我正在杨金甫(振声)先生家中，和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诸先生谈天，电文中只说'志摩乘飞机于济南时遭遇难，(张)奚若、(张)

慰慈、龙荪(金岳霖)、(梁)思成等,拟乘×车于×日早可到济南,于齐鲁大学朱经农先生处会齐',使大家都十分惊愕,对电文措词不易理解。我当时表示拟乘晚车去济南看看,必可明白事情经过。大家同意,当晚八点左右上胶济路车,次日一早即到达。"(转引自陈从周《记徐志摩》,《书带集》,第140页,花城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

对徐志摩的突然逝去,先生是十分震惊的。但日后追悼徐志摩时,未见先生写一篇哀文,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解。臧克家曾问先生:"你是公认的他的好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先生说:"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人民英烈》,第139页)

其实,事情也并不完全这样。先生胞弟闻家驷说:"徐志摩罹机祸逝后,闻一多很痛苦。痛苦到了极点,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不能说闻一多未写文章悼念,就是对徐志摩的早逝无动于衷。闻一多很钦佩徐志摩,每当做事没有办法时,常说'志摩来了就有办法了'。但彼此的气质,风格不一样。徐志摩达到的,闻一多则达不到,闻一多达到的,徐志摩则达不到,这决不是隔膜。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并不美满,闻一多为徐志摩惋惜,但没有冷漠他。在那个时代,出现这类的婚恋并不稀奇。闻一多很欣赏徐志摩的诗,为徐志摩的诗集《志摩的诗》设计封面,题写书名。书名'志摩的诗'四个字写得特别认真。闻一多曾多次谈到徐志摩的《盖上几张油纸》,说这首诗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写得很好。"(商金林1988年2月13日访问闻家驷记录,转引自商金林《闻一多研究述评》,第92至93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

十一月二十五日 出席青岛大学第三十四次校务会议,批准李云东、华方等十三名东北籍同学离校投军的请求,并保留他们的学籍。(据《青岛大学周刊》第31期,1931.11.30)

十一月三十日 青岛大学反日救国会召开大会。会上校长杨振声认为青岛环境特殊,同学们的爱国活动不应超出学校范围。梁实秋也认为公理终究会战胜强权,中国应听候国联的调查和仲裁。同学们群起反驳,决议南下请愿。次日,一百七十九名同学登上火车赴济南,于次月四日抵南京。

先生反对学生南下,主张开除为首的同学。梁实秋《谈闻一多》记述此段情形时写道:"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公开侵略,我军节节后退,全国愤怒,学界当然更为激昂。我们这一代人在五四时代都多多少少参加过爱国运动,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当然是明瞭的。但是当前的形势和五四时代不同,所以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赴京请愿,秩序纷乱,我们就期期以为不可。这一浪潮终于蔓延到了青岛,学生们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政府当局无法制止,造成乱糟糟的局势。北方学生一批一批涌向南京,在南京也造成了纷乱的气氛,我们冷静观察认

为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无法说服学生不这样做。学生团体中显然有所谓左倾分子在把持操纵，同时学校里新添了几个学系，其中教员也颇有几位思想不很平正的人物在从中煽惑。在校务会议中，我们决议开除为首的学生若干名，一多慷慨陈词，认为这是'挥泪斩马谡'，不得不尔。"（第 98 至 99 页）

十二月二十日　陈梦家给胡适信，中云："今日在静安寺公祭志摩，吊客尚不少。"又云："《诗刊》决由一多先生主编，弟若在青岛，当为襄助。"（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是年九月初，徐志摩编完《诗刊》第三期，即将编辑工作移交陈梦家、邵洵美负责。徐志摩失事后，《诗刊》无人主编，陈梦家欲以先生主持此刊，但先生后来并未接手。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下午三时，出席青岛大学第三十九次校务会议。决议考试日期及监考人选，定明年一月十四日考唐诗，十五日考名著选读，十六日考英诗入门，监考人均为先生。（据《青岛大学周刊》第 36 期，1932.1.4）

一九三二年　三十四岁

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

三月九日，日本关东军策划的伪满洲国建立，以溥仪为执政。国民政府立即宣言否认东北伪政府。

五月五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

二月二十一日　王献唐赴青岛大学访先生与赵太侔、黄淬泊，遂同至顺兴楼午餐。饭后诸人及赵孝陆至青岛港政局检看代购之古剑一柄、铜佛一座、镜子三面、古泉四串等古物。事毕，同至赵孝陆宅，赵出视其所藏书籍字画，欢谈至五时半。（张书学、李勇慧《王献唐先生年谱长编》未刊稿）

二月二十二日　青岛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刘天予自上海归来，向学校报告"一·二八"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战况。是年一月二十三日，日本派大批军舰集结上海，二十八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上海天通庵车站，并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驻淞沪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二十九日，日军舰炮击南京下关，国民党政府仓惶迁往洛阳。时，全国民众抗战热情激昂，先生听罢刘天予的介绍，很是振奋。会后师生捐款慰劳前线将士，先生捐款二十元。（据《青岛大学周刊》第46期，1932.3.14）

二月二十四日　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来青岛大学视察，先生陪同谈话、参观。（据《青岛大学周刊》第44期，1932.2.29）

三月三十日　出席青岛大学第四十三次校务会议，被推定为招生考试委员会委员。（据《青岛大学周刊》第49期，1932.4.4）

是月底　陈梦家参加过上海抗战后，来到青岛大学做先生的助教。次月二十五日陈梦家给胡适信中说："我于二月末到南翔投军，三月底回南京即转来青岛，现在青岛大学文学院做些小事。""关于《诗刊》的事现在没有决定续编还是暂停，孙大雨先生颇主暂停，一多先生现在努力开掘唐代文化，未有意见。"（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先生对陈梦家十分器重，梁实秋《谈闻一多》中说："他的从前的学生陈梦家

也是他所器重的。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人颇为相得。有一天他们踱到第一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他蓬首垢面，敞着胸怀，这时节就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了过来缓缓的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一多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认为陈梦家是过于名士派了。有一次一多写了一短简给他，称之为'梦家吾弟'，梦家回称他为'一多吾兄'，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第 96 页）

对青岛大学的学生，先生最喜爱的是臧克家。臧克家的诗《洋车夫》、《失眠》，就是先生拿去发表的，成为臧克家正式发表诗作的开头。《老哥哥》、《贩鱼郎》、《象粒砂》等诗，先生也都认真看过。（据臧克家《海——回忆一多先生》，《怀人集》，第 114 页）一九三一年暑假，臧克家从故乡把《神女》寄给先生，先生看后寄回去，在一些句子上划了红的双圈。（据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人民英烈》，第 139 页）

臧克家回忆追随先生创作新诗的往事时还说："闻先生给我们讲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英诗。他治学十分严谨，诗人气质很浓。我是认识了闻先生后才读他的诗的。一读就入了迷。他的《死水》，我几乎全能背诵，我用它滋养了自己，也用它折服了许多顽固的心。从这本诗里，我认识了它的作者——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的诗人和隔着大洋对未来的中华寄予无穷热望的一颗心。"又说："我常常捧着自己值得一看的诗去向闻先生求教。从他的办公室渐渐地走到他家里，而且越走越勤了。他告诉我这篇诗的好处、缺点，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个字下得太嫩等。他会在好的句子上划个双圈。他手高眼也高，要他划个圈实在不容易呵。在和闻先生交谈时，有时他的助手陈梦家也在坐。我永远忘不了梦家对我的帮助，和他谈诗的结果，我更知道了怎样去展开想象的翅膀。我和他对人生的看法虽相反，但他耀眼的才华，美丽的诗句，也着实打动了我的心。人称我们为'闻门二家'。闻先生对我写诗用劲鼓励。把我写的《难民》等拿到《新月》月刊上发表，可以说是我的诗作在有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开始。"（臧克家《祖国万岁母校千秋》，《光明日报》，2001.9.28）

先生对青年人是不遗余力提携的。曹未风在《辜勒律己与闻一多》中写到："闻氏在青岛的书斋里，桌子上放了两张像片，他时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下不胜得意之至。……闻氏后来回到清华任教时，他还是不懈的注意提拔新诗里的后辈人材。曹葆华同孙毓棠都是他的经常的座上客。卞之琳、李广田诸人也跟着他时常在一起。所以徐志摩死后，……《新月》、《诗刊》所主张的那一种新

诗运动，却实在仍然由闻氏继续了下去。”（《文汇报》，1947.4.10）

是年春 夫人携诸子来青岛。时，方令孺讲授《昭明文选》，遇到问题经常向先生请教，先生也教她一些写诗的方法，于是引起某些好事者的流言。先生得知，便与林斯德商量，认为把妻子接来，流言便可不辟自灭。（据林斯德给编者的信，1986.7.14）

家眷到青岛后，先生搬至大学路一座红楼内。先生住楼上，房租七十元；游国恩住楼下，房租六十元，两人得以“早晚谈论《楚辞》、《诗经》”。（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27页）

四月八日 出席青岛大学出版委员会会议，通过图书馆提出之林斯德编纂的《全唐诗文引得今编》付印案。该书编纂过程中，得到先生的多次指导与帮助。

五月五日 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在南京教育部请领教育经费，未得，是日“以中央批准之预算迄今一文未发，虽地方协款按时拨给，但开支颇巨，杯水车薪，实难维持”，电呈国民政府教育部辞职，遂至北平。（据《青大校长杨振声辞职》，《山东民国日报》，1932.5.7）先生甚为此事焦急。

五月七日 青岛大学举行全校体育运动会，先生担任运动会副会长，并赠银盾一只作为奖品，后授与四百米接力赛第一名数学系。（据《青岛大学周刊》第52至54期，1932.5.2—9）

五月十一日 上午，出席青岛大学校务联席会议，讨论杨振声辞职问题，一致议决：一、分别致电教育部及杨振声，恳切慰留；二、推理学院院长黄际遇为临时主席，负责暂代校务；三、派先生与杜光埙为代表赴北平劝驾。会后，先生即乘胶济路火车赴济南，十二日晚转乘平浦路二〇二次火车赴北平。（据《青大代表赴平挽留杨校长》，《山东民国日报》，1932.5.13）抵北平后，先生遂往米粮库一号力劝杨振声返青岛维持校务。

同日 与丁淮汾等至山东省立图书馆晤王献唐。（张书学、李勇慧《王献唐先生年谱长编》未刊稿）

五月二十六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电谓青岛大学教务经费已与财政部接洽中。同日，先生等由北平发电，云“杨校长因校费有着，有打消辞意，定日内由平赴济，与何厅长（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长何思源）商洽一切，即返校主持校务”。（《青大校长杨振声打消辞意》，《青岛民报》，1932.5.27）

六月四日 先生与杨振声回到青岛。旋即参加校务会议，杨振声报告赴南京请领经费及辞职经过，表示在中央经费未解决前，辞意仍未打消。（据《青大校长杨振声仍未打消辞意》，《青岛民报》，1932.6.11）

六月九日　致吴伯箫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我们这青岛，凡属于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关于这一点，我也未尝没有同感。"

六月十六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流露出对校务的灰心，云：

> 前次信来，正值我上北平挽留校长去了，等我回来，校中反对我的空气紧张起来，他们造谣言说我上北平是逃走的。现在办学校的事，提起来真令人寒心。我现在只求能在这里教书混碗饭吃，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金甫现在已回来，我已向他表示，并得同意，候太侔回来再商量。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我把陈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教，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几乎不能安身。情形如是，一言难尽。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我们现在最要紧是蓄积几个钱，据说四川可以省钱，你能不带家眷单身去最好。至于信上说功课毕后想出来走一趟，我认为无此必要。大概你是想在浙江、四川之外，选择一个比较适意的地方。这未免太理想了。我们今日恐怕只是有事无事的问题，不是好事坏事的问题。我这次遭这种攻击，未尝不想摆脱青岛到北京，但是北京现无事给我，若有也未必胜似现在。所以我劝你不要想在北平、上海、南京一类大都市谋生，愈大的地方愈不能容我们了。何况你跑一趟又要花钱，太不合算。我以数年来的经验劝告你，除努力学问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撙钱。何尝不想老友聚在一起？在北平时与公超、上沅屡次谈及，大家都是一筹莫展，垂头丧气。实秋尤其关心于你，但是在这里我两人几乎是自顾不暇了。实秋的系主任与图书馆长也非辞不可，没想到新月派之害人一至于此！大家虽都是懒于写信，但仍希望听到你的消息。
>
> 大风潮又来了，正写信时，学生提出五项要求给校长限三日答复。其中一项是图书馆买书应不限任何派别，各种书都买。这又是为新月派而发的，因为从前已有过新月派包办图书馆的烦言。

信中所说的"大风潮"，是指青岛大学学生要求修改学则的事。青岛大学学生自治会于上月二十五日成立，是日致函校长杨振声，提出其议决五条。主要为：请求免收宿费以减轻学生负担；取消学校当局四月四日颁布的《青岛大学学则》中第四十三条，即"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图书馆购买书籍应不分派别。（据《青大学生自治会请求学校免收宿费并请求取消新修正学则第四十三条及充实图书馆》，《青岛民报》，1932.6.18）该信还要求"务请于三日内赐

复”。杨振声接信后，允本学期内答复，学生不满，提出速开校务会议讨论。杨振声未允，学生又分头敦请先生等，亦未有效。遂开全体学生大会，议决罢课，并组织非常学生自治会，散发通电宣言。（据《青大学生徒起罢课潮》，《青岛民报》，1932.6.23）

六月二十二日 青岛大学学生为反对学分淘汰制，宣布罢课，理由为：一、学校经费问题；二、修改学则；三、反对新月派把持校务。

下午，出席青岛大学校务会议，决议二十三日照常举行考试，如学生不参加考试，则再照校章办理。（据《青大罢课，因考试发生问题》，南京《中央日报》，1932.6.24）

六月二十三日 出席青岛大学校务会议。因昨日学生拒绝考试，会议决议开除钟朗华、曹高龄等九同学，并布告提前放假，补考于九月十二日开学后进行。学生闻讯，于下午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把愤怒泄于先生，谓之“把持教务不良教授”，并以非常学生自治会名义通知先生，请“急速离校，以免陷误青大前途于不可收拾”。（《青大学生罢课后校方布告提前放假》，《青岛民报》，1932.6.24）

六月二十四日 晨，青岛大学布告开除九学生，学生召集会议并至杨振声住宅请愿，要求解决学校经费、恢复原学则、辞退先生，并收回开除学生之成命。

下午三时，先生出席校务会议。同时，学生非常自治会亦召开记者招待会，由代表钟朗华报告罢课经过及全体学生之主张，其第四项主张即“校方须容纳撤换文学院长闻一多之要求”，并谓此四项要求不达目的不能复课。（据《青大学潮益趋尖锐化》，《青岛民报》，1932.6.25）面对此种形势，先生向校方提出辞职。杨振声亦为罢课事电教育部，再次提出辞职。

六月二十五日 出席青岛大学校务会议。议决修改学则第四十三条为：“学生全年所修学程有二分之一或三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学生全年所修学程有三分之一或两种不及格者，留级一年，但不得留级两次。半年学程以每两种作一种记。”对开除之九学生改为令其休学一年，同时同意先生辞职。学生方面认为修改之学则仍与前相似、休学之举亦不可取、宿费问题未答复，于是仍坚持罢课。（据《青大学潮尚难解决》，《青岛民报》，1932.6.26）

这次学潮，矛头首先对着先生。反对先生的理由可见青岛大学非常学生自治会印发之《驱闻宣言》。其文云：“我们这次由一简单的改革要求运动，演成扩大的罢课与驱逐恶劣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对象和事实，已经于养电公告社会，现在为驱逐恶劣首要闻一多这件事，再得向社会宣言。我们此回运动的意义，具体化的说是反抗教育的恶化，这个恶化大部分是属于法西斯蒂化的。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的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不幸他狼心还不自已，必欲夺取教育的崇高地位，以为扩展实力的

根据。他上年在新兴武汉大学潜窃了文学院院长的地位，武汉大学的同学比我们聪明，等他居职不久，就把他赶走了。前年又来夤缘占据了我们学校文学院院长的地盘，狼子用心，欲继续在青大发挥其势力，援引了好多私人（如果私人是有学识的，我们绝不反对）及其徒子徒孙，并连某某左右其手包围杨振声校长；为欲完成其野心，他很机智的采取了法西斯蒂的道路，不信我们举出一些事实来左证：一、前年敝校曾经演过一幕悲剧，就是断送三十余青年学业前途的一回事。这悲剧的背境，那时候一般以为张道藩为中坚，据某君（悲剧中的人物）于昨年在上海晤张氏谈起往事，才知道完全是闻一多的主张。他是暴力的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对于青年毫无同情，用军警数百人把三十几个青年学生赶走了！天乎！痛乎！二、昨年敝校为抗日救国事赴京请愿，他操纵校务会议，百般阻挠我们。我们为爱国热的驱使，硬着劲儿到了南京，他在学校肆力的大倡其暴力主张，在校务会议席上提请开除抗会执委十余人，很大胆的提倡这样压抑爱国运动的主张，幸经某某拼命反对，变为记过了事，第二场悲剧没有展开。呵，天乎！三、他为了要建树法西斯蒂的理想于学校制度，他首先从事变更学则，重要者如新学则第四十三条之残酷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勒令其退学'，他的理由是提高学生程度，其实完全是藉该项学则作为刻制异己学生之工具的，文学院好些同学试卷记分不公允就是例证。四、此回事件，他又提议开除非常会工作人员九人，校务会议操纵不了（因为有好些教授渐知他的万恶），公然强迫校长于未经校会通过就宣布施行，经昨天全体同学赴校长家大请愿，该布告又马上收回。第三场悲剧还莫有展开。凡此种种都充分能证明他是个准法西斯蒂主义者，其他如他的不通与不学无术的事实，因篇幅关系，不便详提。现在为了学校前途打算，为整个的教育打算，我们已决心驱逐他走，并渴望我们的神圣教育界，不要再上当！"（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学潮继续发展，二十六日全体学生大会议决请求恢复旧学制、取消宿费、收回对九学生处分之决定，并谓不达目的就全体请求休学一年。下午，学生代表要求会见杨振声，杨拒绝，学生请秘书长将议决转交校长，限次日午前正式答复。学校亦采取强硬措施，于二十七日中午布告准二〇一名学生休学一年。时，该校正式学生二三〇余人，加已令九人休学，几乎所剩无几。于是，是晚学生再开大会，否认学校一切无理处置，否认杨振声为校长，驱逐教务长赵太侔、图书馆馆长梁实秋。

时，青岛大学校内贴出许多标语，其中有针对先生的。梁实秋《谈闻一多》：风潮益形扩大，演变成为反对校长，终于金甫去职。在整个风潮里，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有一个学生日后回忆说："记得当时偶尔走经青岛大学旁的山石边

时，便看见过一条刺目的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不学无术’四个字可以加在一多身上，真是不可思议”。“我和一多从冷静的教室前面走过，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新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一多平素上课说话时之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一多看了也只好苦笑。思想前进的青年们的伎俩尚不止此，在黑板上还画了一个乌龟一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一多很严肃的问我：‘哪一个是我？’我告诉他：‘任你选择。’”（第 99 至 100 页）

当时，学生们还包围了先生的住宅，“青岛市政府派来四名兵士护卫”。（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 27 页）

六月二十九日 先生与赵太侔、梁实秋及学校诸重要职员同日相继离校。杨振声亦赴南京辞职。青岛大学顿成无政府状态，一切事宜无形停顿。（据《青岛学潮解决无期》，《青岛民报》，1932.6.30）

同日，青岛大学非常学生会印发《青岛大学全体学生否认杨振声校长并驱逐赵畸梁实秋宣言》。文中云杨振声“滥用私人（如闻一多之子弟费鉴照等学识浅薄，讲解错误，独复高据坛席，屡黜不去）”，“不顾数百同学之苦衷，惟信闻一多、梁实秋、赵畸等之潜计”，“遽以闻、梁少数人之意见，非法开除学生九人”，“遽令全体同学一致休学，开全国大学之创例，陷青大前途于绝境，置数百青年于死地”。（同前）

七月中旬 闲居无聊，与陈梦家同赴泰山游览。陈梦家《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不知道为了什么，青岛大学闹风潮赶他。我们遂乘火车去作泰山之游，因雨留住灵岩寺三日[①]，谈笑终日而不及学校之事。在泰安车站分手，我回南边，他手托在泰安庙前买到的一盆花回去青岛。”（《文汇报》，1956.11.17）

七月十九日 青岛大学甄别委员会聘先生为委员。但先生辞职之志已决，未应聘。是月三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散青岛大学，旋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不久，只身赴北平。时，各地大学风潮不断，北平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均有学潮。旋，杨振声亦离开青岛至北平，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中学国文教科书》，其校长职务由赵太侔充任。梁实秋则于一九三四年离开青岛，任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

八月 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学校本拟聘先生任系主任，但先生经过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两次经验，不肯应允。他在给臧克家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转引自臧克家《我的先生闻

① 泰安 18 日有大雨，据此知先生游泰山于此月中旬。

一多》,《人民英烈》,第 139 页)

这年度清华中文系教员共十三人,教授有朱自清(兼系主任)、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讲师有黄节,专任讲师有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有许维遹,助教有安文倬、余冠英。

刚到清华,由于缺少住宅,住在达园,和也是这时回清华任工学院院长的挚友顾毓琇相邻,面对一池碧水荷花。达园原是袁世凯时期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的私人花园,风景甚是优美。

九月七日　清华大学开学,十四日正式上课。

这学期,先生担任四年级"文学专家研究"课程,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每周两小时,"在讲授王维诗外,并取孟浩然、綦毋潜、王昌龄、崔国辅、储光羲、裴迪、祖咏、常建等十数家代表作品比较研究之,以期说明盛唐时期一般的作风"。

又讲授"先秦汉魏六朝诗",每周三小时,主要内容为"诗经及楚辞中之《九歌》"。

同时,还与刘文典、俞平伯、刘盼遂、许维遹、浦江清共同讲授"大一国文",每周三小时,"欲使学者窥见各时代模范作品之大要,并时时督之练习作文,以启发其思想,磨炼其技术"。(以上均据《清华大学一览·学程》,1932 年度)

九月八日　在城里见到朱自清。时,朱自清刚自欧洲休假观光回国,九月三日抵北平。朱自清日记云:"入城访客,遇闻一多君。"这是先生与朱自清同事论学的开始,朱自清打算次日访先生。(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9 卷,第 161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9 月出版)一九三〇年七月,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议决朱自清担任代理中文系主任,但朱一直推辞未就。在欧洲和回到北平后,朱自清数次提出辞职,未被接受。二十日,朱正式就任代理中文系主任之职。

十月十四日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召开迎新会。会上朱自清讲在伦敦所见之读诗会,俞平伯讲歌诗与诵诗的区别,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学生"周孝若谓闻一多言诗与乐无多关系"。(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9 卷,第 166 页)

时,王力刚自法国回国,对先生的最初印象是性格刚直。王力在《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中说:"闻先生的性格和朱先生的性格大不相同:朱先生温和,闻先生刚直。朱先生是散文家,闻先生是诗人。到了清华以后,闻先生开始进行学术研究。他反对当时清华大学所谓的'通材教育'(文科学生低年级要读理科课程),主张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他告诉我们,要在教授会上力争,把中文系办成学系研究中心。"(《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171 页)

十一月二日　昨日,两位一年级学生向朱自清建议为中文系一年生十人专开

一班国文,朱自清觉得"此事有理而不易办",遂表示只能下学期再办。是日上午,朱自清与文学院长冯友兰商议一年级分班事,未得一定办法。朱自清日记云:"一多来谈谓愿教小班,此事待商。"(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71页)

十二日三日 朱自清日记云:"上午一多将课程修正案签注交来,甚有佳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71页)

十二月十四日 三女闻名生于北京。

十二月二十三日 讲新诗问题。《朱自清日记》:"昨一多讲新诗问题,大旨如次。1. 诗的倡优起源说。作者以娱悦其上,读者乃灵魂的纵淫,注重音乐此其要因,所谓歌也,音乐虽为诗所需,但不需太多。古诗中有思挣扎出倡优境界者,如所谓'劝百讽一'是也。至三百篇全然言志,不能以倡优论,杜甫、孟郊亦能言志,且有教训与人。2. 新诗仍不脱倡优行径,注重肉感,惟今已无帝王,亦无士夫,无所用之,应注重理智(Intellect),诗须有严肃的目的。文本载道,以能言志为佳;诗本言志,以能载道为佳也。理智与理不同,亦高级情感(High Emotion),须含蓄。如做不到,宁有教训,不可放纵。又谓吟唱诗要不得。又主张诗有功用,重乐观。3. 诗异于散文者,在语的音节。诗当如话剧,须以模印理论(Typographical Theory)解之。此节闻君未详。4. 诵之诗价值在歌之诗上。"(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78页)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与朱自清谈诗的模印理论。《朱自清日记》:"忆日前一多来谈,所谓模印理论者利用纸上空间(Space),由作者规定诗之读法,如剧之由导演主持也。后公超[①]来谈,谓此说近已过去,因作者不易为人解,近年来诗家惟重隐喻(Metaphor)。……公超又谓与一多谈及模印理论彼甚保守(Conservative),但其讲演时已用此说,可谓勇于求新者矣。"(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78至179页)

① 叶公超,时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

一九三三年　三十五岁

一月一日，日本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奋起抵抗，长城抗战开始。

二月二十三日，日军进攻热河，三月进犯长城一线。五月下旬，二十九军被迫放弃长城各口。

五月三十一日，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日军撤归长城一线，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南地区，划冀东为非武装区，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华北门户自此洞开。

九月，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旋失败。

一月五日　出席清华大学教授会议，讨论日军前天攻陷山海关后，华北出现的严重局势，并策划学校安全诸问题。

一月二十五日　下午，朱自清来访。朱自清日记云："下午访一多，商借与渠房事；渠欲来清华，但须商郭遐周。"（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88页）借房究为何因，未详。

是月　顾毓琇自印传记文学集《我的父亲》，先生为该书绘制了封面。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重印时，因不易传真改为素面。

二月十三日　寒假结束。新学期先生在"文学家研究"中讲"杜甫"，每周两小时，主要"讲授杜甫作品并随时说明其生活及时代之背景"。

又在"先秦汉魏六朝诗"中"讲授自汉至隋之主要诗篇，以期说明我国唐代以前诗风递变之大势"，每周三小时。（据《清华大学一览·学程》，1932年度）

三月九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大学在后工字厅召开之教授会临时会议。

上月二十一日，日军与汉奸张景惠、张海鹏组成日伪联军进攻热河。三月三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至滦东，至使承德沦陷，华北局势危急。清华大学燕树棠、萧蘧、萨本栋、叶企荪、冯友兰五教授联名致函教授会书记吴景超，要求召开教授会临时会议，认为对"热河失守事件有对政府表示意见之必要"。

先生向来不多参加教授会，这次却早早的到了[①]。会上，发言者十分踊跃，先生极力主张蒋介石"自责"。《朱自清日记》："下午开教授会，讨论热河事，有激烈、和平两派。所谓激烈者，指责备蒋中正而言。燕树棠则主张自责，闻一多和之；余殊觉可以不必。今日会场热空气甚多，为从来所仅见，解纷者为张奚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4页）

会上，一致推举张奚若、冯友兰、燕树棠、萧蘧、浦薛凤组成致国民政府电文起草委员会。是日深夜一时许，电文撰毕，立即发出，费用由各教授薪金中扣出一元开销。先生对此电文是积极赞成的。

附：《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

南京国民政府钧鉴：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昔沈阳之失，尚可诿为猝不及备，锦州之退，或可藉口大计未决。今热河必守，早为定计，行政院宋代院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代委员长，且曾躬往誓师，何以全省天险俱未设防，前敌指挥并不统一，后方运输一无筹划，统兵长官弃城先遁，以致敌兵长驱，境若无人。外交有利之局不复可用，前敌忠勇之士空作牺牲，人民输将之物，委以资敌。今前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虽已明令查办，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代委员长虽已由监察院弹劾，但此次失败关系重大，中央地方均应负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敷衍了事。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负全国军事之责，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长亲往视察，不及早补救，似应予以严重警戒，以整纲纪，而明责任。钧府诸公总揽全局，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设想者。书生愚直，罔识忌讳，心所谓危，不敢不言。伏乞鉴察。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叩。青。（《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三月十日 《败》写定。发表于是年《清华大学年刊》。

本届清华大学毕业生毕业前夕，照例编辑纪念刊物，编辑吴组缃向先生约稿，先生写了该文作为赠言。文中说：

毕业后十二年，又回到母校，碰到第五级同学将毕业，印行年刊，要我几句话作纪念。这话应该有的是可说说的。真的，话太多，不知从何处说起，所以屡次抵赖，想索性不说了，正因这缘故。

要当兵，先去报名入伍，检验合格，及格了，才算一名入伍兵。（因为体格不合，以及其他的关系，求当兵而当不上的多着呢！）三个五个月不定，大早上

① 据这次会议签到名单，先生为第二位。

操，下半天上讲堂，以后是野外实习，实弹射击。兵丁入伍以后，营盘里住下一年半载，晓得步法阵势射击等等，但是还算不得一个兵。要离开营盘，守壕冲锋，把死人踩在脚下，自己容许也挂了采，这人才渐渐像一个兵了。什么时候才真正完成当兵的意义？打了败仗，带着遍体的鳞伤回来，剩下一丝气息，甚至连最后的这一点也没有，那也许更好。一个兵最大的出息，最光明的前途，是败，败得精光。

朋友们，现在我欢送你们这支生力军去应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再遇到你们，要看见你们为着争一个理想的赢来的那遍体的鳞伤。去了！我祝福你们——败！

可讲的话虽多，但精义已包括在这里了。恭维的话，吉利的话，是臭绅士的虚伪，我鄙弃，想你们也厌恶。

时，正是中国军队在长城一带艰苦抗战之时。

三月十七日　下午二时，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图书馆楼下一四六室举行萧涤非毕业初试。先生与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吴宓、叶石孙、叶公超为考试委员。（据《清华大学研究院举行毕业初试、论文考试呈报教育部组织考试委员会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朱自清日记云："下午研究院考试，委员均到，萧答案至令人失望，结局殊纠纷，久之始定为中等。众意一、萧知识大抵转贩而来，二、其答案多模棱闪避之辞，记诵亦太劣，三、无想像力，不能持论。一多谓对此间中国文学系学生治学方法极不满，杨遇夫亦以为然。余甚愧恧，因余见亦尔也。"（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7页）六月十二日萧涤非论文考试时，先生不知为何拒绝参加。

三月二十一日　朱自清访陈寅恪，谈到先生。朱自清日记云："访陈寅恪，寅恪畅论前日开会事，谓二叶及闻主张与主任教授相反，其逻辑推论（Logical Consequences）有二：1. 主任教员学问易满足，2. 主任教员与学生勾结。又谓彼颇疑二叶及闻有野心，来耍手段（Play Politcs），因举韩湘文毁公超之说及闻一多青岛事为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8页）

三月三十日　出席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会议，商定一年级国文办法及新课程案。决议将先生讲授的杜诗课列入国学要籍课程。（据《清华大学校刊》第496号，1933.4.3）

是月　《岑嘉州系年考证》三易稿竟。后发表于六月《清华学报》第七卷第二期。收《闻一多全集》。文中有"附识"，述本文撰写原因与过程：

嘉州诗见存者三百六十首，其中可确指为某年或某数年间作者，依余所

考，殆十有七八。兹篇初稿，本已分年隶属，釐订粗备。旋以每定一诗，疏通篇恉，参验时事，引绪既繁，卷帙大涨，虑其厖糅，不便省览，乃仅留其时地有证，可据诗以证事者，余悉汰之。盖兹篇意在研究作者之生活，当以事为经，以诗为纬，亦即不得不详于事而略于诗也。读者慎勿以为嘉州篇咏之有年可稽者，胥盖于是。至于编年诗谱，不容偏废，谁曰不然？别造专篇，俟在来日。

嘉州旧无年谱。撰此考垂成，或告以《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二期有《岑参年谱》，取而读之，则近时赖君义辉之所作也。以校拙撰，同者不及一二，异者何啻八九。诚以余为此考，年经月纬，枝叶扶疏，亦既自病其事甚寡而词甚费矣，故今也于其所以异于赖君者，雅不欲一一申辩，以重滋其芜蔓。其或赖君洞瞩未周，而事有关系甚巨，又非剖析不足以明真相者，则于附注中稍稍指陈之，但求有当于征实，不务抑彼以张我也。虽然，吾得读赖君此作，如入空谷，而足音跫然，忽在我前，斯亦可喜也矣。若夫荜路蓝缕，先我著鞭，伟哉赖君，吾有愧色焉。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三易稿竟，一多谨识，时距嘉州没后实一千一百六十三载也。

是年春 约这时，搬至新建成的清华大学西院教职员宿舍四十六号。住在这里的还有余瑞璜、雷海宗、陈寅恪、赵忠尧、蔡方荫、周先庚、陶葆楷、周培源、庄前鼎、顾毓琇、吴有训等人。西院是当时清华园内最好的教授住房，除宽敞的正房外，还有后院、行李房，屋顶均采用了防雨、防热的有效措施，房租三十九元。

四月九日 校警班长关春山病故，先生捐款二元慰问其家属。（据《清华大学校刊》第500号，1933.5.1）

四月十日 晚，朱自清来访。朱自清日记云："晚访一多，与商功课事，谈甚畅。"（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12页）

四月十四日 朱自清一早来访。朱自清日记云："早访一多，为有两学生常在先秦汉魏六朝诗班缺课事。"（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12页）

四月二十四日 晚，观孙毓棠、万家宝（曹禺）排演之话剧《高尔斯华绥之罪》。演出后与观看者交流感想，朱自清日记云："闻一多评戏有眼光，余不能赞一词，愧愧。"（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13页）

五月八日 《岑嘉州交游事辑》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第八期（文史专号）。摘录文献中与岑参有关者王崟、王纮等六十六人史料，以姓氏笔画排列。有按语，多为考证性质。

五月十六日 下午参加清华中文系系会，商定命题及选文分配办法。

五月二十二日 下午七时半，清华大学在后工字厅召开教授会临时会议，先生出席。朱自清日记云："晚开教授会，议决本年度不与考之毕业生办法，并选举毕业

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及评议员;又试投票,本校应迁至长沙、洛阳、苏州、南通四处中之何处,未开票。"(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26页) 会上,还选举了下年度教授会书记,先生与刘崇鋐、浦薛凤、钱端升四人被提名。首轮先生以十票,与刘崇鋐同获候补当选者。最后投票,刘崇鋐当选。(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迁校之事,是因九一八后北平时局不稳,热河事件后形势更加动荡同。是年四月,学校评议会曾决议,学校如迁徙,首取长沙,次取苏州,末取洛阳。此时,又增加了南通。

五月二十三日　清华大学设立各种常设委员会,先生被聘为出版委员会委员。(据《清华大学校刊》第521号,1933.9.25) 这是先生回到清华大学后最初担任的社会工作。

六月四日　致舒新城信,今藏中华书局,未入集。信中回答散文《青岛》中的两个问题,并纠正出版时的一处失误。全信如下:

新城先生左右:

大札敬悉,承询两节,敬答复下:

一,"软风一吹来就憩了",憩乃熄字之误。

二,"怪木牛"是德国人在海上所置一种警笛,有雾时便叫,声如牛鸣,土人把它神秘化了,呼为木牛。

专此敬颂

撰安

弟　闻一多

六月四日

六月十五日　与朱自清谈初唐文学。《朱自清日记》:"一多下午来谈其对于初唐文学见解:(1) 时辑类书(如艺文、北堂等)之风甚盛(一多疑欧阳询及虞世南辑此两种类书,乃建成、元吉与太宗两派之竞争),而注家亦盛,如李善、章怀太子、颜师古等,故学术实盛于文学,而注家影响,实较类书为大。(2)《初学记》有事对,较初期类书更进步,对后人颇有所助。(3) 声律仍沿南朝之旧,似无新贡献。(4) 宫体仍盛。(5) 太宗之提倡文学,影响未必即佳,或受虞世南影响。(虞长四十岁,太宗书法亦从之——欧阳询则习碑与虞不同。)如无太宗,陈、张华或早出。又陈蜀人,张岭南人,皆文化不多及处,乃能脱藩篱也。所论均极有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33页)

六月二十八日　管理教职员浴室的校工王德厚十六日逝世,校工金玉等请求募捐。是日先生捐款二元慰问其家属。(据《清华大学校刊》第512号,1933.7.17) 此次

募捐,共集资一百六十九元四角整。

是年夏 朱湘来访。先生和顾毓琇招待朱湘住在达园。顾毓琇回忆:"一九三二年,我与一多同时回到清华大学。当时学校正在扩建,没有房子,不让接家眷,我们俩人都住在清华西门外的达园,是隔壁的两间。后来我们又一起搬到西院,但达园的房子还保留下来作我们的客房。朱湘来后,我与一多商量,觉得让他和我们家人吃饭不方便,就请他住在达园我的房子,饭钱由我来付。一次,我去看朱湘,他拿着一篇文章和我一起走到一多家。一多看了朱湘的文章,却不许他发表,说除非自己死了,因为那文章写的太好了,说了一多作学问的许多事。一多向来不愿听恭维话,自然不同意朱湘发表它。朱湘本来不爱讲话,文章要还给他,他非撕了不可。我出来圆场,说由我来保存这篇文章。抗战时,我征调到武昌教育部,教育部被炸,我从一堆书中翻出这篇文章,随身带到重庆。一多死后,我才拿出来让人发表。"(访问顾毓琇记录,1988.5.11)

朱湘的这篇文章,即《闻一多与〈死水〉》。文中说到先生此时进行的学术研究情况,中云:

> 杜甫,在唐代的文学中,是他的兴趣的中心点。不过,这六年以来,由杜甫而推广到全个唐代的诗,全个唐代的文,唐代文化的整体。唐代文学的来源,去脉,就我在谈话中所听到的,他在这一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的议论。
>
> 关于杜诗,他有三部著作:《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略》、《杜学考》。
>
> 差不多杜甫的每一首诗,他都给考定了著作的年月。这个,对于杜诗的新认识,是如何的重要,不用说了。
>
>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一诗之下,他有这么一段案语:"案:前此十余年间,七律极勘,唯'张氏隐后'、'城西陂泛舟'、'赠田九判官梁丘',寥寥三数篇耳。自今而后,此体忽多。综计,至德二载春,逮乾元元年夏居'谏省',所作,七律几居其半。盖是时,岑参、贾至、王维,并为二省僚友,诸公皆长此体,同人唱和,播为风尚;杜公因亦受其影响耳。"读古人书,要这么来读,才能说是读书。
>
> 在作着的又有《王右丞年谱》、《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嘉州集笺疏》。
>
> 将近告成,或是正在作着的,有:《唐代文学年表》、《初唐大事表》(分政治、四裔、宗教、学术、文学、艺术六栏)、《唐语》、《全唐诗人补传》、《唐诗人生卒年考》、《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拾遗》、《唐诗统笺》、《全唐诗选》、《见存唐人著述目录》、《唐代遗书撰人考》、《唐两京城坊考续补》、《长安风俗志》、《唐器物著录

考》、《唐代研究用书举要》、《全唐文选》、《唐人小说疏证》等等。至于汉、魏、六朝方面，也在进行着。

《唐语》一书，我摘举两条："窣。案：《说文》：'窣，从地中卒出'，此非其义。《说文》有踤字，触也；《一切经音义》(五)引《字书》，'揳，揩也'；窣盖踤或揳之通假字。《文选·长笛赋》注引《苍颉篇》，'拏：捽也，引也。'"

"校。唐人谓病小愈曰校——见王焘《外台秘要》。张籍：'三患眼'，'三年患眼今年校'(此据任渊《后山诗注》引；《全唐诗》，与下免字误倒)。"

《全唐诗选》里抄录有许多被前人所忽略了的佳作。

枚乘：《七发》内描写海潮的"纯驰浩蜺，前后络绎"两句，他校勘为"纯虵，浩蜺，前后络绎"。

《诗经》内《秦风·蒹葭》一诗的"道阻且右"一句，下面是他的案语："案：右，古文作又，与久字形近；疑久之讹。'道阻且久'，犹首章'道阻且长'也。"同诗内"宛在水中央"的"宛"字，他，在案语中，由九部古书之内，征引了十三个字例，证明是"藏"字的意思。

他说他已经是乐而忘返了——这么的乐而忘返，当然是值得；不过，我总替新诗十分的可惜。希望他不要忘记了自诺之言，将来要创作一篇兼用韵文与散文的唐代史诗！(《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7.7.1)

是年夏　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林庚的诗集《夜》绘制封面。林庚回忆说："一九三三年夏日，一多先生为我的诗集《夜》画了这个封面。原画比这个约大一倍，'夜'字的底子是绿色，其余为黑白二色。我一直把它珍藏着，可惜抗日战争期间不幸遗失。一多先生到了三三年虽然已不再写新诗，但对于新诗的热情依然还在，这幅画便是当时的明证。"(林庚为《夜》封面所写的说明，1983.1，载古平、刘烜主编《闻一多画传》，北京大学画刊社1986年6月出版)

七月二日　致游国恩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弟下年讲授楚辞，故近来颇致力于此书。间有弋获，而疑难处尤多。屡欲修书奉质，苦于无着手处。今得悉大驾即将北来，曷胜欣忭！惟盼将大著中有关《楚辞》之手稿尽量携带，藉便拜诵，他无所需也。兄来平后，当然下榻敝处，有种种方便，亦不待言。何日命驾，计当何日抵平，乞一一详示，弟当进城奉迎也。"又云："丁晏《易林释文》一册(南菁书院丛书之一种)遍寻未获，不审是否遗在兄处？便中希一检寻。"

七月二十六日　致游国恩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久候不来，亦无消息，望眼欲穿矣。……比来日读骚经数行，咀嚼揣摩，务使字字得解而后止，忽有所悟。自喜发千古以来未发之覆。恨不得行家如吾兄者，相与拍案叫绝也。"

是月 卞之琳受臧克家之委托，到先生家，催促先生为臧克家第一本诗集《烙印》作序。卞之琳始与先生谈论新诗。

卞之琳回忆："我于北京大学毕业前的五月初，印了一本自己的诗集《三秋草》，在青岛大学的臧克家见了就托我在北平照样印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说闻先生已经答应写一篇序言。我和李广田（可能还有邓广铭）就为他奔走，买了纸交北京大学印刷所付印。我亲自为他仿《死水》初版设计封面，同样用黑底，只是换了《死水》的金纸书名签，改用红纸书名签。我亲自就近跑印刷监印监钉。为了催索闻先生序文，我多次跑清华西院找闻先生。我的印象中这是我和闻先生相识的开始，也是我聆听他谈诗艺最多的时际。"（卞之琳给编者的信，1986.4.26）

卞之琳在《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中，回忆他与先生的交谈："话，我都记不清了，只感到对我大有教益。尽管他出语有时显得偏激，胸襟却是十分宽博。例如，他早年写过不少爱情诗，却也面夸过我在年轻人中间就不写这类诗。又如，就外来影响说，他自己写诗，主要受过英国十九世纪诗、特别是浪漫派诗的一些影响，但是他也能欣赏我受过法国象征派诗一些影响的一部分不同的格调。又如，他自己讲究格律，但是他也完全不排斥我同时试写过的自由体。他自己治学谨严，写诗到《死水》阶段，用画法作比，可以说笔力遒劲，线条硬朗，但是，又举例说，他会就我一首日后自己废弃的松散的自由诗，不自觉的加了括弧里的一短行，为我指出好像晕色法的添一层意味的道理。"（《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13页）先生所加的括弧里的一短行，即对卞之琳《三秋草》中一诗的修改，原句为"听浅湖的芦苇/告诉你旧事"，先生用括弧分别在两行的后边加了"也白头了"、"近事吧"。

是月 为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作序。收《闻一多全集》。序中说到做诗的态度：

> 拿《生活》一诗讲，据许多朋友说，并不算克家的好诗，但我却始终极重视它，而克家自己也是这样的。……我现在不妨明说，《生活》确乎不是这集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却有令人不敢褒视的价值，而这价值也便是这全部诗集的价值。克家在《生活》里说："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这不啻给他的全集下了一道案语，因为克家的诗正是这样——不是"混着好玩"，而是"生活"，其实只要你带着笑脸，存点好玩的意思来写诗，不愁没有人给你叫好。所以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做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在序中，先生还以臧克家比作孟郊，并阐发关于什么是“好诗”问题：

我再从历史中举一个例。如作“新乐府”的白居易，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 energy)的一种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实际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他如果哭，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除了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必然的差别不算，我拿孟郊来比克家，再适当不过了。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这一层是我要对另一种人讲的!)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才是。因为这样，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煞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

八月二十一日　致游国恩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云：“病中再读大著，渊博精审，突过古人，是诚不愧为后来居上矣。近偶读朱一栋《群书札记》，中有论楚辞十余条，精当处似欲与朱丰芑、俞荫甫辈方驾。朱氏《十三经札记》刻在《续经解》中。其人必非俭腹者比，故所论咸有可观。大著似未采及此书，不知贵校有此书否？如一时不易觅得，弟可代为录出寄上也。”信末附录了朱一栋书论《楚辞》各条目录，供游国恩检索。

时，游国恩自青岛赴北平，途中路梗折回，先生甚为惋惜，以为失去一次讨论学术的机会。

九月四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因懒回信而得罪了的朋友，不止你一人，计有实秋、(刘)英士，此外还有你不甚熟的三四人。这事叫我非常难过。但心里的难过仍不能改变手的懒，这怎么办？”

先生回到清华大学，心境一直不大好。尽管校中有许多旧日的同学、朋友，但先生除与少数人外，不愿有较多的来往。学生们也感到先生的脾气很大，却不知什么原因。

吴组缃也回忆说：“闻先生的文人气质很浓，他是新诗人，却讲古代文学，所以

总觉得同学不满意。那时,清华同学与老师年龄相差不太多,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因此认为自己不比老师差。再说当时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古代文学,朱自清讲中国新文学研究,有很多人反对。同学们中间确实有人存有闻先生是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想法。一次课上先生讲训诂,认为'振'、'娠'互通,赖天缦同学认为先生讲的没有根据,先生很生气,发了脾气,说:'你说该怎么讲?'我在一边笑了,先生说:'你笑什么?'我说:'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人家讲了你又发脾气。'课上不下去,闻先生也一周没来上课。后来,先生到教室,见没有人,又去宿舍让我们上课去。"(访问吴组缃记录,1986.12.31)

九月七日 致游国恩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天问》中"南北顺楠"一句之训诂后,云:"近读《诗》、《骚》,好标新义,然自惟学识肤浅,时时惧其说之邻于妄,不敢自信,质之高明,倘有以教我乎。"

九月十三日 清华大学开学。这学期,先生除继续担任一年级国文课程外,又开设了"诗经"、"楚辞"、"杜诗"三门课。

先生研究杜甫,是借助了西方的治学方法。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中说:"你以西洋治学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杜甫和李白,兼及唐宋两代的文化,当时朋友们都引以为异:为什么像你这样一位才情纵横奔放的诗人不写诗而来研究中国的死文学?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感应,于是,在一个秋夜我便跑到清华园一间四壁满堆着古书的屋子里和你聊天,问你为什么不写诗,你莞尔笑曰:'我已发现我在创作方面无天才。诗,只好留给那些有天才的人们去写。过去,我觉得我搞的玩艺儿太多,太杂,结果毫无成就,今后我愿意集中精力来研究中国文学。''你为什么先从杜甫李白入手呢?——是否你对于他们特别喜爱?'我又问。你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也许是的,不过主要的原因还不在此。中国的文学浩如烟海,要在研究上有点成绩,必须学西洋人治学的方法,先挑选一两个作家来研究,或选定一个时代来研究。'"(《文艺复兴》第2卷第1期,1946.8.1)

楚辞课当时只有孙作云、王文婉两人选修,教室是在嵌有"清华学堂"四字匾额的旧大楼一〇五号,室大而人少,师生相对仅三人。但先生讲得十分认真,半年只讲了一篇《天问》。孙作云《忆一多师》中说:"闻先生在这一年是颇有点负气的,所以他在这一年里拼命地预备功课,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讲解。因为教室人少,讲书如同座谈,所以我们几乎每一句解释必问出处,闻先生总是聚精会神地给我们讲,有时干脆就把他的笔记交给我们抄。闻先生向来就未把学问当作自己的私产,他把自己的心得告诉学生,把未发表的笔记或讲义借给学生们抄,那是司空见惯的事,从这些点滴的小事中,足以表现闻先生的伟大!就这样,半年的功夫读完了一篇

《天问》。"(《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15页)

先生研究《诗经》,有著述多种。他曾称自己"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致臧克家》,1943.11.25,《闻一多书信选集》,第317页)《诗经》研究即带有这种"文学史家"的特色。《闻一多全集》中收有一篇写作年代不详的《风诗类钞》,其《序例提纲》如下:

关于编次

三种旧的读法

1　经学的

2　历史的

3　文学的

三种读法的批评

本书的读法——社会学的

略依社会组织的纲目将《国风》重新编次

三大类目　1. 婚姻,2. 家庭,3. 社会。小类目另见详表

可当社会史料文化史料读

对于文学的欣赏只有帮助无损害

原书依照国别的编次甚有用,今亦尽量保存

各诗题下注明国别及全书总号码,如《关雎》(周一)、《竹竿》(卫五九),另附《国风》通检

关于写定

今本毛诗错误不少

有可据三家诗订正者

有可据旧本订正者

有可据叶韵订正者

有可据上下文义订正者

今悉加改正、夹注,今本原文于下另附校勘记,详论改正的理由及依据

经文用假借字者则注正字于下

三家异文之胜于毛者,以三家为正字,毛为借字

关于笺注(目的、经济与效果)

三种诗体读法各异

1　歌体　数章词名复叠只换韵字,则用横贯读法取各章所换之字,合并解释

2　诗体　用直贯读法,自上而下,依次解释,以一章为一段落

3　综合体
缩短时间距离——用语体文将《诗经》移至读者的时代，
用下列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
考古学　关于名物尽量用图画代解说
民俗学
语言学
声韵　摹声字标者以声见义(声训)，训正字不理借字
文字　肖[象?]形字举出古体，以形见义(形训)
意义　直探本源
注意古歌诗体特有的技巧
象征廋语　symbolism
谐声廋语　puns
其他
以串讲通全篇大义

同日　季羡林在日记中写到："晚饭后，同曹葆华在校内闲遛，忽然谈到我想写篇文章，骂闻一多，他便鼓励我多写这种文章，他在他办的《诗与批评》上特辟一栏给我，把近代诗人都开一下刀。"(季羡林《清华园日记》，第157页，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九月二十一日　出席清华大学中文系会议，与刘文典、杨树达、朱自清、许维遹等共同商议"国学要籍"及一年级国文的授课办法。(据《清华大学校刊》第522号，1933.9.28)

九月二十八日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改选。推举先生负责出版、朱自清负责学术，其余职员均为学生担任，总务许世瑛、文书张效良、会计王文婉、庶务陈昌年、体育董同龢。(据《中国文学会启事》，《清华大学校刊》第523号，1933.10.2)

九月二十九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先生说到自己内心的痛苦，以及被逼得"向内发展"(指学术研究)。信中说：

> 近来最怕写信，尤其怕给老朋友写信。一个人在苦痛中最好让他独自闷着。一看见亲人，他不免就伤痛起来流着泪。我之不愿给你写信，一面是怕钩引起数年来痛苦的记忆，一面又觉得不应将可厌的感伤的话在朋友面前唠叨，致引起朋友的不快。总括的讲，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

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信中还说到“向内发展的工作”，即：

一、《毛诗字典》 将《诗经》拆散，编成一部字典，注明每字的古音古义古形体，说明其造字的来由，在某句中作何解，及其 parts of speech（古形体便是甲骨文，钟鼎文，小篆等形体）（这项工作已进行了一年，全部完成的期限当在五年以上）。

二、《楚辞校议》 希望成为最翔实的《楚辞》注，已成三分之二。二年后可完工。

三、《全唐诗校勘记》 校正原书的误字。

四、《全唐诗补编》 收罗《全唐诗》所未收的唐诗。现已得诗一百余首，残句不计其数。

五、《全唐诗人小传订补》 《全唐诗作家小传》最潦草。拟订其讹误，补其缺略。

六、《全唐诗人生卒年考》附《考证》。

七、《杜诗新注》。

八、《杜甫》（传记）。

这些工作，先生说：“三至八进行迄今已三年。至于何时完工，却说不定。近来身体极坏。一个人在失眠与胃痛夹攻之中，实在说不定还能活多久。以上的工作规模那样大，也许永无成功的希望。”

同日 朱湘来访，但未讲一句话，吃了一顿饭，未等先生下课回来就走了。不久，朱湘离开北平，到天津南开大学，仍未找到合适职业，只得南下去杭州。

是月 是年度，先生开始在北京大学兼课。

十月十三日 应顾毓琇夫妇邀宴，同席有顾颉刚、吴宓、郑振铎、梁宗岱、朱自清夫妇、郭绍虞等。（《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9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5月出版）

十月十六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朱湘的生活态度，颇有看法，说：

前天接到一张明信片，署“杭州里西湖惠中旅馆朱寄”，反面只有一句话“我来了杭州——靠作文支持这几个月的唯一的地方”。他在北平时，屡次到我这里，言谈及态度的失常，已经够明显的了。现在似乎连文章都写不通了，看上面这一句话便知道。我想他靠作文支持生活，恐怕也不能长久罢！前途

不堪设想。坏的是并非我们不想救不能救，而是他不受救。所谓救并非借几十元钱的问题。若是如此，问题便简单了。譬如你若替他出点主意，教他如何如何生活，教他完全相信你，他若能依从，或许生活能渐渐上轨道。但你一跟他谈这一套，他不是一声不响，便是胡扯，骗你一顿。这有什么办法！你若有更好的办法，还是不必借钱给他。他二嫂似乎在杭州，所以他真需要的不是钱。

时，饶孟侃到河南开封，在河南大学任教，并开始注意金石。所以先生信中又说：

你现在注意金石，这诚然是一件正经事。但我劝你注重研究，勿但鉴赏而已。研究的方法，可先买一部《金石萃编》看看（有影印本比原本好）。河南有新出土的唐碑务必请觅一张拓片寄给我。这类东西一到北京就贵了，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没有下手工作。但我信如果能得到这类的材料，我必能利用，充分的利用他。

同日 《清华大学校刊》刊登校内师生诸次捐款明细表，先生为救济东北难民捐款一〇八元八角，为慰劳本校附近驻军捐款二元，为慰劳热河战事受伤将士捐款五元。

十月二十六日 《清华大学校刊》刊登一九三二年度本校教职员捐助成府小学经费明细表，先生捐款十元。

十一月二日 致游国恩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拜托游国恩在青岛大学购买林斯德所编的《全唐诗文引得合编》，又言及诸书中有关《楚辞》之史料。

是月 致游国恩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楚辞》史料，说："清代大师札记宜多涉猎，以其披沙拣金，往往见宝也。"又云："近读易实父《经义莛撞》，内论《毛诗》数条，精悍绝伦，虽王氏父子未可多读。信乎才人能事，无施不可。"

十二月 出任《清华学报》编辑。这是先生回清华任教后，首次担任该刊编辑工作，此后至殉难，一直身任斯职。此时该刊编辑部共二十七人，主任为吴景超。

是年 臧克家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这部书是自费出版的，先生资助了二十元。臧克家回忆说："一九三三年我自费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时，闻先生不仅资助了二十块大洋，还为诗集写序。"（臧克家《祖国万岁母校千秋》，《光明日报》，2001.9.28）

一九三四年　三十六岁

二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宋任会长，陈立夫等任总干事。
三月一日，溥仪在长春称帝，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年号“康德”。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

一月十一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对朱湘之死，深为不安。朱湘在北平时，先生曾与河南大学饶孟侃联系，欲为朱湘觅一教职，但未成功。十月初，朱湘离开北平，六日到天津看望南开大学的柳无忌，时南开大学已开学，教职已满，无法安插。朱湘郁郁南下，暂宿杭州。旋去上海。十二月五日，朱湘乘吉和轮自上海去南京，在大通附近跳水而亡。先生得知，动了感情。后赵家璧为悼念朱湘，写信请先生撰文，先生复信中有一句说：“子沅的末路实在太惨，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不比死去更要痛苦呢？”（转引自上海《青年界》第5卷第2号卷首扉页压题题字）许多年后，闻一多到了昆明，其时朱湘之子小沅“到处流浪，一多曾叫他到昆明投考西南联大，可是小沅到达时，一多已被刺”。（罗念生《忆诗人朱湘》，《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由于朱湘之死，先生立刻想到要救救唐亮。唐亮，字仲明，清华学校一九二六年毕业生，曾赴法国学习美术，回国后亦无生活着落。先生在给饶孟侃的这封信中说：

> 子沅死的消息当然早知道了罢？前回你问我要不要寄钱给他，我劝你不要寄。当然寄了给他，不见就救了他的命，但我总觉得不安，仿佛我给你建的那议应负点责任似的。理智的说法，诚然这不是事实。但朋友死了，而且死的那样惨，总不免令人动感情。子沅已经死了，不必谈了。现在又有一个朋友待救，虽然情形不像子沅那样严重，但已经够可怜的了——这人便是唐亮。去年暑假中他有封信来，告诉我他归国了，并托我找事，我一因找事无办法，二因近来懒于写信的恶习，竟没有回信给他。事已隔了半年，满以为现在他已有了办法。谁知今天李效泌（来了一位客人只说是姓李，记不起他的名字，是同学而且是唐亮的好友是无疑的。翻翻同学录，大概是李效泌）来谈起，才知道仍是

失业而且穷到连从家到上海的费都没有。北平现在又在筹备艺专(从前的艺专,改为艺术学院,停办了,现在又改专再开办),严智开当筹备主任,大概就是将来的校长。此人是我从前在艺专时的同事。我同李效泌商量,叫唐亮马上带作品来平,先开一个展览会,然后我再设法介绍给严智开谋个教书的位置(这人笨到连展览会都不知如何开,回国后在上海没有一点举动)。但李效泌目下大概也很穷,无法替他筹这笔路费。……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失业的朋友连生路还没找到,看着可是不能不救。由吴江到北平,至少得四十元的旅费,我已经向李效泌答应下了筹这笔款,但实在这款并无着落。因唐亮为谋事起见,不能不火速北来,所以我先将这月的生活费抽出来,寄了四十元给他,同时我想向你通挪四五十元,以度过这一个月。等两个月后我的经济缓过气来再还你。如果你能力来得及,由你自己的名义再补助一二十元,以备他来平后的零用,那便更好。他来后可住在我家,食宿是无问题了,但零用费也是不能缺少的。在北平的朋友都窘,根本我也没有几个通有无的朋友,没有办法,不得不求救于你!朋友们死的死,穷的穷,我自己这几年也够倒霉了。几时你来北平,我要和你抱头痛哭一场。

时,先生虽月薪三百四十元,但家庭开销较大,而且每月需给岳母家寄三十元,给自己父亲寄四十元。这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一译格林罗布大学)研究院学习法国文学的闻家驷学成回国,先生又寄去二百元作路费,所以开支紧张。尽管这样,先生还是寄了四十元给唐亮,让他速来北平。

二月初 由先生与叶公超、林徽音等十人联名发起,由清华大学与欧美同学会联合主办的"唐亮西洋画展",在市内南河沿欧美同学会揭幕。朱自清于二日参观时说"今日来名人甚多",其中有饶孟侃、章晓初、李健吾、余姗等。(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79页)

先生特为画展写了说明书,题作《论形体——介绍唐仲明先生的画》。后刊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文汇报》。此文介绍了唐亮绘画的成功所在并强调它的意义。文云:

仲明先生在绘画上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内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形体的表现。要明白这一点的意义的重大,得远远的从头说来。

绘画,严格的讲来,是一种荒唐的企图,一个矛盾的理想。无论在中国,或西洋,绘画最初的目标是创造形体——有体积的形。然而它的工具却是绝对限于平面的。在平面上求立体,本是一条死路。浮雕的运用,在古代比近代来得多,那大概是画家在打不开难关时,用来餍足他对于形体的欲望的一种方

法。在中国，“画”字的意义本是“刻画”，而古代的画见于刻石者又那么多，这显然告诉我们，中国人当初在那抓不住形体的烦闷中，也是借浮雕来解嘲。这现象是与西方没有分别的。常常有人说中国画发源于书法，与西洋画发源于雕刻的性质根本不同。其实何尝有那样一回事。画的目标，无分中西，最初都是追求立体的形，与雕刻同一动机。中国画与书法发生因缘，是较晚的一种畸形的发展。大概等到画家不甘心在浮雕中追偿他的缺欠，而非寻出他自家独立的工具不可的时候，绘画这才进入完全自觉的时期。在绘画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分手，也正是这时的事。西方人认为目的既在创造有体积的形，画便不能也不应摆脱它与雕刻的关系（他的理由很干脆），于是他用种种手段在画布上“塑”他的形。中国人说，不管你如何努力，你所得到的永远不过是形的幻觉。你既不能想像一个没有轮廓的形体，而轮廓的观念是必须寄于线条的，那么，你不如老老实实利用线条来影射形体的存在。他说，你那形的幻觉无论怎样奇妙，离着真实的形，毕竟远得很。但我这影射的形，不受拘挛，不受污损，不牵就，才是真实的形。他甚至于承认线条本不存在于形体中，而只是人们观察形体时的一种错觉，但是他说，将错就错也许能达到真正不错的目的。这样一来，玄学家的中国人便不知不觉把他们的画和他们的书法归尽一种型类内去了。

这两种追求形体的手段，前者可以说是正面的，后者是侧面的。换言之，西方人对于问题是取接受的态度，中国人是取回避的态度。接受是勇气，回避是智慧。但是回避的最大的流弊是“数典忘祖”。当初本为着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形体而回避那不能不受亏损的幻觉的形体，这样悬的诚是高不可攀。但悬的愈高，危险便愈大。一不小心，把形体忘记了，绘画便成为一种平面的线条的驰骋。线条本身诚然具有伟大的表现力，中国画在这上面的成绩也委实令人惊奇。但是以绘画论，未免离题太远了！谁知道中国画的成功不也便是它的失败呢？

认清了西洋画最主要的特性，也是绘画自身最基本的意义，而同时这一点又恰好足以弥补中国画在原则上最令人怀疑的一个罅隙——认清了这一点，我们便知道仲明先生的作品的价值。仲明先生的成就不仅在形体上，正如西洋画的内容也不限于形体的表现一端，但形体是绘画中的第一义，而且再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那么，要谈仲明先生的成功，自当从这一点谈起，可惜的只是这一次的篇幅，不许我们继续谈到其余的种种方面罢了。

唐亮曾为先生画过一幅《闻一多先生的书桌》。顾毓琇在《怀故友闻一多先生》

中说:"仲明住在我家,但作画常在一多那里。他对西洋画造诣很高,我还记得他的《园丁》。《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是一张最难得的杰作,我希望文艺界的朋友会永远珍视这友谊的结合。"(上海《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7.7.1)

先生还有一篇谈画的文章,题作《匡斋谈艺》。"匡斋",是先生住在清华大学西院的书斋之名,语出《汉书·匡衡传》中"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之句。以此为室名,用意就在扩大研究对象的联系面,能够收到引人入胜、触类旁通的效果,像匡衡的说诗能使人解颐一样。《匡斋谈艺》作于是年十一月之前。该文后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北平《文学杂志》第三卷第四期,文末有朱自清作的附记,云:"本篇最近才在遗稿里找出来,来不及加入《全集》,只好将来编作补遗罢。"《匡斋谈艺》共三章,第二章即《论形体》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引宋迪论山水画之言,比之达·芬奇作画前看大理石以求构图。值得重视的是该文第一章,谈到画与雕刻的关系:

> 彝器铭文画字从"周"声,周与昼声近,所以就字音说,画本也可读如"昼",就字义说,"画",也就是古"雕"字。这现象告诉我们:画字的本义是刻画,那便是说,在古人观念中,画与雕刻恐怕没有多大区别。就工具说,刀发明应比笔早,因此产生雕刻的机会也应比产生绘画的机会较先来到。当然刀也可以仅仅用来在一个面积上刻画一些线条,藉以模拟一个对象的形状,因此刀的作用也就等于笔。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那形成某种对象的轮廓的线条已经完成之后,原始艺术家未尝不想进一步,削削挖挖,使它成为浮雕,或更进一步,使它成为圆雕。他之所以没有那样做,只是受了材料、时间,或别种限制而已。在这种情形下,画实际是未完成的雕刻。未完成的状态久而久之成为定型,画的形式这才完成。然而画的意义仍旧是一种变质的雕刻,因为那由线条构成的形的轮廓,本身依然没有意义,它是作为实物的立体形的象征而存在的。

二月七日 为创办《学文》杂志,与叶公超访朱自清。朱自清日记云:"晚,一多、公超来,约加入办杂志事,应之。"(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80页)

二月十三日 中午,赴余上沅招宴,商量创办《学文》月刊。谈到刊名时,先生提议《畸零》。胡适日记:"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闻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324页)

二月二十五日 午,至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宴约,到者有杨振声、周作人、沈从文、俞平伯、郑振铎、叶公超、陈登科、卞之琳、巴金等人。(据张菊香编《周

作人年谱》第31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三月一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谈到正与叶公超筹备的刊物已定名为《学文》，取“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意，而且“态度上较谦虚”。又称饶孟侃的近作诗《懒》“好得厉害，公超、梦家均大为赞服，鄙见亦同”。

三月三日　唐亮画展在清华大学举行，先生亲自出面接洽诸方购买唐亮的画。此后，唐亮在清华园接连作讲演，十三日讲《艺术欣赏》，十九日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二十日讲《十九世纪的法兰西艺术》。画展和演讲都很成功，这与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唐亮在清华园，住在顾毓琇家，但却常在先生家里作画。他画过一幅《园丁》，还画了一幅《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据顾毓琇《怀故友闻一多先生》，《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7.7.1）《闻一多画传》中收有一幅唐亮的油画《闻一多的书斋》，也是这时作的。

三月四日　与叶公超一起为《学文》创办事联名请客。胡适亦应邀参加。（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338页）

三月十七日　应大公报社之请，去丰泽园赴宴，见郑振铎、周作人、杨振声、沈从文、巴金、余上沅、叶公超等。（据陈福康编《郑振铎年谱》第20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

三月二十四日　《类书与诗——唐诗杂论之一》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图书评论”副刊。一九四五年又经修改，发表于八月出版的《国文月刊》第三十七期。收《闻一多全集》。

这篇不长的评论，指出唐初五十年的诗实际是六朝文学的尾。文中对当时编纂的类书做以分析后，认为唐王朝在百忙中调房玄龄、魏征、岑文本、许敬宗等第一流人才编纂类书，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使文学被学术化了。但是，唐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结果，虞世南、李百药等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的远。先生认为唐太宗是重实际的事业的人，他对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这若说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唐初四杰便不得不大声疾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四月十六日　朱湘致先生信。载《清华周刊》第十一卷第三、四期合刊。全信云：

一多兄：来书批评拙作，语语中肯，读毕，直欲五体投地。“胆汁色”三字极妙。三诗遵命保留。大作两章已经代投《京副》，就中《大雨》极佳，《渔阳曲》音节美妙，

"东"韵之运用可见匠心,此诗无疑的为一音节上的成功。《河图》商务虽允承印,但最好仍是自办,兄意不知以为如何,尚望告知。《河图丛书》想只在计划中:我可以附骥一种,Synge 的戏剧。艺术杂志既有,人才充足时,艺术大学亦一刻不容缓之事业;目前之中国,其他之艺术不论已,即最普通之绘画,亦复凋萎之至,盖如今较可成立之美术学校仅有京宁沪三地之四校,而京校今已俘办,尚未恢复,宁校窄隘,此地刘海粟校颇有商业性质,周剑尘校生徒极少,吾兄闻此,得勿疾首蹙额耶?所望者,吾兄与一班游美之青年艺术家联袂返来之时,能在景物清幽之地,或宁或吴,创立一广义的艺术大学,则我国当今就木之艺术尚有一 Rebai 之希望焉。此大学开办后,戏剧自亦在内,届时之盛况可想而知。兄今夏返国,固弟所亟愿而渴望者,然为兄之精神慰安计,为我国之艺术计,则弟敢言当今国内之学术界中除创造即将复活外。其他恐皆不能使兄满足,与其徒为独木,反不如先偕实秋兄同作一旧大陆之畅游之为愈也。尔时两兄如来,同归者必有数艺术者,如此则大学可成,一鸣惊人矣。管见不识当否,尚望兄等加以仔细之考量。如其可行,自今起即当募集基金。弟悬想将来有梁思成君建筑校舍,有骆启荣君担任雕刻,有吾兄及杨廷宝君濡写壁画,有余上沅君赵畸君开办剧院,又有园亭池沼药卉草木以培养实秋兄沫若兄之诗思,以逗林徽音女史之清歌,而达夫兄,年来之悲苦亦得藉此以稍释,不亦人生之大快乎,弟馨香默祷,能身逢其盛,永在书城中为一蠹鱼,愿亦足矣。

四月二十四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谈到《学文》编辑情况,云:

> 《学文》毕竟付印了,原拟五月一日出版,现恐须稍迟数日。诗栏一部分寄上一阅,想你必等得发急了。本期我辈朋友中,唯你我两人有稿。实秋因正式文章来不及写,寄来短短一篇翻译,上沅一文洋洋数千言,废话居多,皆不曾登载,公超则因文虽做完,自觉不满意,故亦未出台。结果我自己非卖力气不可。写了一篇关于《诗经》的文章,不满意也得拿出手。我预想公超放洋后,不寒而栗矣!

五月一日 《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出版。编辑署名叶公超,而实际上是叶公超与先生两人合编。该刊撰稿人多数为旧日故友,也有些是朋友介绍来的,计有:饶孟侃的诗《懒》、孙洵侯的诗《太湖》、林徽音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和小说《九十九度中》、孙毓棠的诗《野狗》、陈梦家的诗《往日》、杨振声的小说《一封信》、季羡林的散文《年》、李健吾的译文《萨郎空与种族》、卞之琳的译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

关于《学文》的创办,叶公超回忆到:"当初一起办《新月》的一伙朋友,如胡适、徐志摩、饶孟侃、闻一多等人,由于《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因种种的原因已各停办,

彼此都觉得非常可惜。一九三三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在《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有的说，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所谓能力，主要是指财力而言。不过，大家对办杂志这事的兴趣仍然很浓，并不因为缺乏财力而气馁。讨论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由大家凑钱，视将来凑到的钱多少作决定，能出多少期就出多少期。当时一起办《新月》的一群朋友，都还很年轻，写作和办杂志，谈不上有任何政治作用。但是，《学文》的创刊，可以说是继《新月》之后，代表了我们对文艺的主张和希望。"（叶公超《我与〈学文〉》，台湾《联合报·副刊》，1977.10.16）

先生在《学文》创刊号上发表了《匡斋尺牍》。收《闻一多全集》。该篇讲《诗经》中《芣苢》一诗。

"芣苢"即车前草，草本植物，多籽，可入药，每到秋季，道边处处可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先生从训诂入手，认为"芣苢"的本意是"胚胎"，因有"宜子的功用"，而成为"性本能的演出"。"结子的欲望，在原始女性，是强烈得非常，强到恐怕不是我们能想像的程度"。"这篇《芣苢》不尤其是母性本能的最赤裸最响亮的呼声吗？正如它的表现方法是在原始状态中，《芣苢》诗中所表现的意识也是极原始的，不，或许是生理上的盲目的冲动"。文中还借用社会学观点，认为"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蕃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着的，如果她不能证实这功能，就得被她的侪类贱视，被她的男人诅咒以致驱逐，而尤其令人胆颤的是据说还得遭神——祖宗的谴责"，所以"采芣苢的风俗所含的意义是何等严重与神圣"。先生强调说："知道了芣苢是种什么植物，知道它有过什么功用，那功用又是怎样来的，还知道由那功用所反映的一种如何真实的、严肃的意义——有了这种种知识，你这才算真懂了《芣苢》，你现在也有了充分的资格读这首诗了。"

先生在文中描绘出诗一样的画面："请你再把诗读一遍，抓紧那节奏，然后合上眼睛，揣摩那是一个夏天，芣苢都结子了，满山谷是采芣苢的妇女，满山谷响着歌声。这边人群中有一个新嫁的少妇，正撚那希望的玑珠出神，羞涩忽然潮上她的腭辅，一个巧笑，急忙的把它揣在怀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机械似的替她摘，替她往怀里装，她的喉咙只随着大家的歌声哼着歌声——一片不知名的欣慰，没遮拦的狂欢。不过，那边山坳里，你瞧，还有一个伛偻的背影。她许是一个中年的硗确的女性。她在寻求一粒真实的新生的种子，一个祯祥，她在给她的命运寻求救星，因为她急于要取得母的资格以稳固她的妻的地位。在那每一掇一捋之间，她用尽了全副的腕力和精诚，她的歌声也便在那'掇'、'捋'两字上，用力的响应着两个顿挫，仿佛这样便可以帮助她摘来一颗真正的灵验的种子。但是疑虑马上又警告她那都是

枉然的。她不是又记起了已往连年失望的经验了吗？悲哀和恐怖又回来了——失望的悲哀和失依的恐怖。动作，声音，一齐都凝住了。泪珠在她的眼里。‘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她听见山前那群少妇的歌声，像那回在梦中听到的天乐一般，美丽而辽远。”这些描写，很自然地展现了初民的生活和感情，也还原了《诗经》的本来面目。

《芣苢》是《诗经》中的普通一首，全诗三段十二句，除重复的字句外，只变化有六个字，先生说：“一首诗全篇都明白，只剩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紧要的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这态度在原则上总是不错的。”这正是先生治学之道的一个重要经验。

先生这类学术观点，多在课堂上讲过。许多同学都记得先生讲课时的那种声调和姿态，感到一种如醉如痴的意境。

五月十日　致饶孟侃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收到饶孟侃为《学文》寄来的诗稿《和谐》，十分高兴，说：“如果你能担保三期准有稿来，这回定将两首一并登出（还是登在开篇，请你领袖群伦）。老友中只你不叫我们失望，不但按期有稿，而且篇篇精彩。今天正当出门上课，接到你的诗，边走边看，一个人笑得嘴不能合缝。”

五月十四日　《清华大学校刊》第五七六号刊登《清华戏曲研究社为赈济黄灾公演收支帐目表》，载先生捐特座票二张，计四元，经戚长诚、赵泽同之手送交华洋义赈会，专作赈济黄灾之用。

五月十六日　下午二时，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在图书馆楼下一六二室举行姚薇元毕业初试。考试范围为“晋南北朝隋唐史等门”。先生与蒋廷黻、刘崇鋐、陈寅恪、钱稻孙、孔云卿、噶邦福、雷海宗、杨树达、萧公权为考试委员。（据《清华大学研究院举行毕业初试、论文考试呈报教育部组织考试委员会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五月十九日　中文系学生大会，要求先生改变功课。朱自清日记云：“早董同和、刘述真、许世瑛、陶光来谈，系中同学开大会，要求三事：1. 坚决挽留刘盼遂，2. 闻、浦须换功课，3. ‘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取消。定商于蒋再说。此事殊为难。”（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92页）

五月二十五日　下午二时，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图书馆楼下一六二室举行霍世休毕业初试。考试范围为中古思想史（汉至唐）、小说、唐诗、元曲等。先生与朱自清、吴宓、雷海宗、张申府、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为考试委员。（据《清华大学研究院举行毕业初试、论文考试呈报教育部组织考试委员会的来

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五月三十一日　下午,朱自清来访,商定下年课程。(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95页)

六月一日　《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出版。刊有:饶孟侃的诗《和谐》、何其芳的诗《初夏》、孙毓棠的诗《我回来了》、林徽音的诗《忆》、陈梦家的诗《往日》、废名的小说《桥》、白薇的小说《哨子河的夜》、莲生的小品《断思》、徐芳的独幕剧《李莉莉》、吴世昌的论文《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梁实秋的译作《莎士比亚论金钱》、叶公超的论文《从印象到评价》等。

六月九日　朱自清访郑振铎,郑振铎"谓一多论《诗经》为伪书",朱自清云"于一多文,实未寓目也"。(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98页)

六月十八日　朱自清来访,谈到《学文》杂志事。朱自清日记云:"上午赴一多年,适公超亦在,谈学文事,觉得他们有见地。饭于一多处,烙饼甚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99至300页)

六月二十一日　上午十时,出席清华大学在后工字厅召开的教授会临时会议。会上主要审查毕业生成绩,批准研究院费孝通等人毕业。(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时,李嘉言自清华大学国文系毕业。李嘉言1930年考入清华,是清华文学会主要成员。李嘉言之子李之禹说:李嘉言在校期间"跟着闻先生学会了'考据'之学,学会了查类书的研究方法,学会了运用音转这个法宝考证文字。这对他一生长于考据,进行学术研究帮助甚巨。他的毕业论文《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就是用的这些方法而且是在闻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并由闻先生推荐到郑振铎先生主办的《文学》杂志二卷六期上发表的。"(李之禹《李嘉言与闻一多先生》,未刊稿)

六月二十九日　与朱自清、俞平伯商一年级国文课计划。朱自清日记云:"下午与一多、平伯商一年级国文事,意与余同。"(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03页)

七月一日　《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出版。刊有:方令孺的诗《月夜在鸡鸣寺》、臧克家的诗《元宵》、陈江帆的诗《柏钟》、包乾天的诗《春》、陈梦家的诗《往日》(续)、胡适的小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君蔷的独幕剧《鬼哭》、中书君的论文《论不隔》、闻家驷的论文《波德莱尔——几种颜色不同的爱》、曹葆华的译文《诗的法典》。

先生在该期《学文》上发表了《匡斋尺牍》续。收《闻一多全集》。该篇讲《诗经》中《狼跋》一诗。

先生的《匡斋尺牍》未发表完,此前刊载的仅是一至十段。而第十一至十四段

为讲《兔罝》，手稿保存在梁实秋手中，后载入其著之《谈闻一多》书后附录。

是月 钱穆在《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三期发表了《楚辞地名考》。先生读后有眉批数处，如在其文第十章《屈原卒在怀王入秦以前说》中"今既谓屈原放居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沣诸名，皆在江北，则顷襄王迁之江南一节，事绝无根"一句旁，批书"史不言放江南"六字。（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本刊，库存号73920—部3）先生有些意见，后来撰入《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有些则提供给孙作云，助其作《九歌山鬼考》。

八月一日 《学文》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出版。时，叶公超即将出国，这期《学文》由先生、余上沅、吴世昌三人编辑。本期刊有胡适的《一篇新体的墓碑》、卢寿楠的诗《早》《秋风》《杨柳结》、余坤珊的诗《秋叶》、刘振典的诗《假使》、陈梦家的译诗《白雷客诗一章》、殷炎的小说《墙》、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陈铨的译剧《父亲的誓言》、唐兰的论文《老子时代新考》、李健吾的论文《布法与白居谢》、闻家驷的论文《波特莱尔与女人》、赵萝蕤的译文《诗的名称与性质》、余上沅的论文《高莪德》。《学文》出版此期后，便停刊了。

《学文》停刊的原因，叶公超回忆说："《学文》出刊到第三期的时候，大家凑的钱已经用光了，所以后来勉强办完第四期，就再也无力继续出刊了。"（叶公超《我与〈学文〉》，台湾《联合报·副刊》，1977.10.16）

叶公超离开北平时，曾将一份到准备在英国讲演的题目草稿交给先生，请先生转给胡适。（据《叶公超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96页，中华书局1979年5月出版）

《一篇新体的墓碑》是胡适撰文、钱玄同书丹的《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用白话文写成。碑文述傅作义将军率领其部，在怀柔与日军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的英雄事迹。这是去年塘沽协定商议期间的一场恶战，敌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团、川原旅团遭到我五十九军阻击，始终无法前进。此役我亡官兵三百六十七人，曾就地掩埋。后又寻得遗骸二百零三具，公葬于绥远城北大青山下。胡适之碑文即为大青山公墓所撰写。《学文》不仅全文刊载，并排于首位，还附有碑文照片。

对于《学文》的评论，叶公超说："有人说《新月》最大的成就是诗"，其实"《学文》对诗的重视也不亚于《新月》。诗的篇幅多不说，每期将诗排在最前面，诗之后再有理论、小说、戏剧和散文，已成为《学文》特色之一"。（叶公超《我与〈学文〉》，台湾《联合报·副刊》，1977.10.16）

九月十五日 朱自清、金群善来访。朱自清日记云："金群善下午来访，他很健

谈，后同去拜访闻一多，就有关讲话艺术进行了讨论，我们全感到中国人的讲话艺术中语音单调。但闻认为过去的官话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讲话风格，这种风格不同于西方人，而且也不自然。”（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18至319页）

九月十七日　清华大学开学。这年度，先生增设了“唐诗”与“乐府研究”两门课。唐诗课“分唐诗为两大时期，取其间主要诗作，参以时代背景及作家生活，依次讲授，以期说明唐诗之特标的风格，并其间所浮映之唐代文化”。乐府研究课则讲授“汉魏乐府，晋时犹被之管弦，与六朝以五言诗为乐府者不同。顾汉魏乐府有本事、有声音，晋宋时合乐，往往改易字句以就管弦，故本事有因而失解，声音有因而舛乱者。本学程在钩求史事，证据古音，以资研究。”

同时，与俞平伯、刘文典共授“国学要籍”，“本学程列国学要籍九种，学者得任选其三。其中论孟庄荀，儒行道德，乃华夏文化之根柢。韩非名法刻深，实融会儒道而见于行者者。《史记》综述古代文物，成一家之言，学者当资以知人论世。凡此诸书，或以立意为宗，或以记事为职，而其辞华考实，亦复沾溉无穷。至《诗经》、《楚辞》、《文选》、《杜诗》，固皆篇之准，翰墨之林也。本学程重在使学者诵习之，俾得涵咏其恉趣焉”。（以上均据《清华大学一览·学程》，1934年度）

先生授课，给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年暑假，有位同学写了篇《教授印象记》，介绍先生时写到：“闻先生上课时，随身带有一对儿法宝——那就是一个二尺长、一尺多宽的大簿子，那里面装满了闻先生几年来的心血——《诗经》与《楚辞》的notes。……闻先生讲《诗经》、《楚辞》是决和那些腐儒不一样的。《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烂地鲜明了。哈哈！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结果真是‘倍儿棒’哪。二千多年前的东西不是？且别听了就会脑袋痛，闻先生会告诉你那里是metaphor，那里是similes，怎么新鲜的名词，一用就用上了么，你说妙不妙？不至于再奇怪了吧？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得切实告诉你：闻先生的新见解都是由最可靠的训诂学推求得来的，证据极端充足，并不是和现在新曲解派一样的一味的胡猜。讲了半天闻先生的学问，你不认识他的面貌不也是白说。喂，我再给你说罢：中等身材，削瘦的面儿，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在眼镜里闪烁的炯炯有光的眼睛——唉，不要忘了，还有一头整年不梳的长发——那个么，就是表示胸襟沉深的闻先生的尊容了。”（《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8、9期合刊）

诗经课上，曾布置过这样一种别开生面的作业。这年秋天入学的王瑶在《念闻一多先生》中回忆到：“我上诗经课的时候，他讲需要编一部《诗经字典》，并要求班上的学生各在《诗经》中选一个字，然后把所有各篇中有这个字的句子都集中起来，

按照句法结构把它分为几类，然后再从声和形的两方面来求义，并注意古代廋辞的用法和含义。他强调开始最好只看正文，不看旧注；如无法着手，也可先看看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这是他布置的必须完成的作业。可以看出，他是在训练学生运用训诂学的基本功。"(《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135页)

但是，先生此时仍有些负气。赵俪生回忆："我常请先生参加一个什么座谈会，他总问：'还有谁？'某次我答：'还有陈铨先生。'他立即厉声说：'我不去！'……课上在缴论文以前，先交材料，大都是卡片，几十张的，几百张的。郑季翘交上三张卡片，先生愣住了，问：'Mr. 郑，你哪里抄来的？'郑如实答：'《中国古代神话 ABC》。'先生立刻大怒，掷片于地，曰：'我告诉你，我的课是 X、Y、Z！'"(赵俪生给编者的信，1986.11.13) 赵俪生，山东安丘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但早在青岛读中学时，就在伯父家见过先生。赵俪生在《混着血丝的记忆》中说："我初次得瞻仰他的丰采，则是在读了《死水》之后的两年，在我族伯的客厅里。我的族伯是清末的一名进士，也是乡中最大的地主。民国以后，便以收藏家的令名蜚声于岛上了。那时同他老人家往还的，差不多都是名流学者，我每次去给他请安的时候，都会遇到几位的。""有一天，我又邂逅了一位厚发清癯，鼻上架有银丝眼镜的中年人，我的族伯事后介绍说，那是青岛大学的教授浠水闻一多先生。那次我并没有能够同他交谈，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中，只有'怡然敬父执'的份儿，而没有'问客来何方'的份儿的。"(上海《文艺复兴》第2卷第4期，1946.11.1)

暑假后 是年度，继续在北京大学兼课，担任二、三、四年级文学组课程，讲授《诗经》，每周两学时。《课程纲要》云："拟综合古来之校勘、训诂、序说，参以近人新解，在可能范围内略加论断。"(《国立北京大学廿三年度各系课程指导书》，商金林提供)

在北大兼课期间，曾鼓励一同学翻译惠特曼的《草叶集》。荒芜《惠特曼与闻一多》："算来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那时闻先生在北大讲授《诗经》。有一次，下课之后，去问他一个问题。他解答完了，随手翻开我带在手边的一本《草叶集》。看着看着，他笑了起来。'写得多好啊！'他赞叹着说，'应该把它译出来'。他说的是《夜里，在海滩上》这一首。惠特曼的一些长诗，老实说，我不大喜欢，原因是我不太懂。但是闻先生指出的这首短诗，以及其他的一些短诗，我是喜欢的，所以随读就随译了一些。原来是想送给闻先生润色的，但放在箱子里，一放就是两年。"(《文汇报》，1956.12.12)

到北京大学兼课，是胡适、梁实秋邀约的。每次进城，午饭和休息都在余上沅、陈衡粹夫妇家。时，余上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也在北京大学兼课，其家在北海大石作陟山门街六号，距北大很近，且是独院，很方便。

九月二十二日　中午，去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宴请，见郑振铎、周作人、杨振声、俞平伯、朱自清、梁实秋、余上沅、沈从文等。（据陈福康编《郑振铎年谱》，第219页）

九月二十五日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致函先生，继续聘请先生为出版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还有吴景超（主席）、袁复礼、冯友兰、顾毓琇、萧公权、浦薛凤、萨本栋、李继侗。（据《清华大学聘请各常设委员会的聘函和复函》，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是月　《天问·释天》发表于《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收《闻一多全集》。有序，谈撰述原因：

> 昔王逸作《天问后序》，自诩其注此篇"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然今试执逸注以读《天问》，虽谓为无一事可晓，不过也。踵逸而起，注者相望。彼此逸注，补苴谬正，亦既多矣，然而不可晓者犹十有四五焉。呜乎！注书之难，有若是哉？余窃不自揣，欲斟酌众长，兼附己意，作一总结帐之企图。兹先取篇中问天事者四十四句释之，颜之曰《天问·释天》。疏略之讥，自知不免，并世方家，幸垂正焉。
>
> 《天问》文例，泰半合四句为一问，或增至八句，或十二句，要皆以四进；其二句各问一事者，必二事同类，亦以四句为一单元也。王逸不察，割裂全篇，概以二句为一段落。（所谓"章决句断"者乃如此，宜其事事不可晓也。）既以每二句为一段落，散注文于其间，则读者披卷之顷，目光所触，第一印象，已受错误之暗示。成见一入，永为锢蔽，故虽有特识之士，心知逸说之非而欲别树新解，亦但知于二句以内求之，其视上下注文，夹行细字，则一若天堑之不可飞越者焉。此其于问意终不能通，不亦宜哉？大都王逸以后诸家之说有违于事实，滞于义理者，咸坐此弊。爰揭出之，以谂学者。此惑既祛，乃可与读《天问》。

《天问·释天》共释《天问》中十一行四十四句。文中多有新义，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序》中曾特别指出该篇，倍加赞赏，云："再举《天问·释天》里面解释'顾菟'的一条吧。'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问的月亮的情形。向来的人都把顾和菟分开来，认为顾是顾望，而菟就是兔子。到了清代的毛奇龄，认为顾菟不能分开，是月中的兔名，算是进了一步。直到闻一多先生，才又举出了十一项证据来，证明顾菟就是蟾蜍的别名。蟾蜍一名居蟅，与顾菟实一音之转。同一转语则为科斗为活东，与蟾蜍实为一体。《汉少室神道阙》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科斗后期之形，故知顾菟亦即科斗。闻先生举了十一例以证成其说，虽然他还在浩叹'既无术以起屈子于九泉之下以为吾质，则吾虽辩，其终不免徒劳呼？

噫!'但我敢于相信,他的发现实在是确凿不易的,并不是'徒劳'。"

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多有所得。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中说:闻一多"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拿定主意,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与我谈起当代文人,我们都同意,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北平《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10)

是月 是年度,先生开始在燕京大学兼课。

是年秋 胞弟闻家驷经梁实秋介绍任北京大学讲师。后来,先生又通过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赵太侔,推荐闻家驷到该校兼任讲师。

十月十七日 章晓初访朱自清,对先生给一同学奖学金考试试卷十四分不满。朱自清日记云:"章晓初来访,谈及奖学金考试事宜。他认为,学生试卷交给不同的老师很不公平。譬如,罗奉朝只得十四分,这个学生从本校毕业后,已当两年助教,他自己也不相信他的中文只有这点水平。我很同情他,他的试卷是闻一多看的。"(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24页)

十月二十日 赴丰泽园,应《大公报》"文艺副刊"召宴,见沈从文、杨振声、李健吾、余上沅、梁实秋等。(据张菊香编《周作人年谱》,第328页)

十月二十二日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致函先生,聘请先生担任本年度新生指导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委员还有郑之蕃、朱自清、吴宓、陈福田、冯友兰、吴景超、萨本栋、张子高、熊庆来、顾毓琇等教授。(据《清华大学聘请各常设委员会的聘函和复函》,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十月二十六日 叶公超致胡适信,信中说"我离开北平的时候曾托一多转给你一张讲演题目的草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96页)时,叶公超在清华工作满五年,按规定有一年的带薪休期,于是决定到欧美访问,并计划在英国发表讲演。叶草拟了几个讲演题目,请先生交给胡适,再转给驻英公使郭其泰。

十一月一日 《清华大学校刊》第六〇九号刊登《本校教职员捐助成府小学经费明细表》,上载先生捐款十二元。

十一月五日 《清华副刊》刊登《新同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内云先生担任新同学指导委员会指导员。

十一月十九日 《清华大学校刊》刊登《二十三年度常设委员会一览》,内云先生担任出版委员会委员。又,担任《清华学报》编辑。

是月 由西院迁入新南院七十二号。新南院是清华大学专为教授建造的一片高标准西式宿舍,共有三十套,预算经费二十万元,六家工厂参加投标。五月四日

开标，决定由著名建筑师沈理源开办的天津华信工程司设计，亦由沈理源监理工程的天津协顺木厂施工。十月二十九日清华正式接收，是月一日租户开始迁入。（《清华大学校刊》，第608号，1934.10.23）住在这里的有潘光旦、陈岱孙、孔繁霱、俞平伯、王力、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张印堂、洪绂、萧公权、施嘉炀等。

七十二号是新南院三套最大的住宅之一，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先生的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许多研究在这里进行，疲劳时到门前大阳台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一下金鱼。

孩子们对新南院七十二号的生活印象也很深刻。闻立雕回忆说："记得当年在北平的时候，有一个冬季里的一天，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一夜之间房顶上、树枝上，四周的矮柏围墙上，草坪上，到处都像是厚厚地铺了一层洁白色的鹅毛绒毯，非常漂亮。父亲被这神奇的美景感染得雅兴大发，忽然想起要堆雪人，把我们呼唤出来和他一起干。当时我和哥哥只有八九岁，一听说要堆雪人，非常高兴，但我们从来没有堆过雪人，不知道怎么个做法，只是跟在父亲后头瞎忙活。记得先是滚雪球，当雪球越滚越大，大到比我们略高时，就用手或其他工具把它拍实，接下去父亲就开始起他那极富想象力的艺术创作了。父亲是这样的人，任何事不做则已，要做就特别认真、一丝不苟。堆雪人虽然只不过是领着我们在雪地里玩，可他也非常投入、全神贯注、精益求精。他是个专门学过美术的艺术家，因而堆雪人在他手上也就像雕刻家雕制塑像一样，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这里拍拍，那里打打，反复精雕细琢，修了又修，改了又改。大约半天的工夫，一个憨态可掬的白雪王子就显现在我们面前了。这时，虽然我们的鞋和手套都湿了，脸蛋冻得通红，可是看着父亲的这个得意作品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喊又叫。这一天，草坪上格外热闹，连妈妈和弟弟妹妹也不时出来参观、助兴！以后几天，我们一起床就伸直脑袋隔着玻璃窗看这个白雪王子，有时还要溜出去和它亲热亲热。"（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91至92页，新华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当时，先生长子立鹤、次子立雕都在清华园内的成志小学读书。立鹤性格内向、好学，立雕则生性活泼、爱动，喜欢体育，放学后总是与邻居的同龄孩子四处玩耍。这个邻居家后院挖了一个沙坑，栽了一个跳高架，看见邻居家的孩子天天在沙坑上练习跳远、跳高，还练撑竿跳，十分羡慕，便忍不住向母亲提出要求也挖个沙坑，栽个跳高架。这件事并不简单，要占地，要请劳力来挖，还要从别处运来沙子，

请木工师傅做跳高架。但几经恳求后，居然如愿以偿。清华园工字厅背后有个荷花池，冬天结冰后是理想的天然冰场，课余或休息日常有大人、孩子滑冰。闻立雕说："这种场合我自然不甘局外，非常渴望也能有一双冰鞋。不久父母亲就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我和哥哥一人定做了一双溜冰鞋，我们俩也能愉快地滑行于冰场人群之中了。"闻立雕还说："有一天我在那位同龄同学家，看见他的家长和一个鞋匠商谈给他订做足球鞋的事，那位鞋匠正在忙着给他画鞋样。我看了非常眼馋，心里一阵一阵发痒，最后鼓起勇气，把那位鞋匠领回我家，要母亲给我也做一双。父母亲对我先斩后奏的做法很不高兴，批评我不该事先不经大人同意就擅自把师傅请来。不过，批评之后还是给我和哥哥一人做了一双。"（同前，第 93 至 95 页）

新南院离成志小学有十几分钟的路程，这段路对孩子来说不算远也不算近。先生便为立鹤、立雕买了自行车。"那时候我和哥哥个子都还很小，大人的车骑不了。当时商店里有一种适合少年骑的车，不太高，后面有两个小保险轮，学车的人骑上去不会倒，以后，时间久了，学会掌握重心了，把两个小轮子拆掉就能自如地骑着走了。父亲就给我们买了这种车，结果我和哥哥没摔一跤就学会骑车了。"这在当年的清华园，他们是头一份。当他们骑着既是交通工具又是体育器械的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在清华园里来回穿梭，惬意之余真是从心里感谢父亲啊！"（同前，第 95 页）

十二月十九日　向朱自清推荐《去扎纳多之路》。朱自清日记云："访闻和俞，闻向我介绍《去扎纳多之路》一书。此书追本溯源，探查科尔里奇'卡布拉汉'一诗的线索，颇有我研究陶潜的那股劲头。"（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9 卷，第 334 页）

是年冬　建议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张清常用两周金文写《诗经》。

张清常回忆说："一九三四年冬，我刚进入清华大学做中文系研究生，到新南院拜见闻一多老师。闻一多先生听我说打算研究古代汉语，便启发我说：哈佛燕京即将出版《诗经引得》，这对你很有帮助。另外，有个问题可供你们搞语言的人考虑。今日所见《诗经》的本子，汉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齐鲁韩毛四家各本是后代抄本转木刻本，文字都已去古甚远，不是《诗经》时代的面貌。如果你利用古文字学的知识，把《诗经》用两周金文写下来，换句话说，也就是使《诗经》恢复西周东周当时的文字面貌，这对于你研究《诗经》，研究上古汉语，会有很大帮助的。"（张清常给编者的信，1988.8.10）

一九三五年　三十七岁

一月，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由此引起“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大论战。

七月六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认其提出之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取缔反日团体和反日协定。世称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为“何梅协定”。

同月，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放映，影片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受到极大欢迎，被到处传唱。

九月，日本策划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十月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长征。

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实施“币制改革”，统一全国币制。

十二月九日，一二·九运动爆发。

一月十九日　《清华大学校刊》第六三一号刊登《函送捐助烈性毒品戒除》，先生捐款一元。

是月　《清华学报》编辑部人员变动，编辑增加至35人，先生仍任编辑。

二月二十七日　应赵紫宸与其女赵萝蕤邀宴，东大地赵宅晚餐。至同席有顾颉刚、吴宓、叶公超、陈梦家、张东荪、吴世昌、容庚等。（《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164页）

二月二十八日　下午三时，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图书馆楼下一六二室举行霍世休毕业论文考试。论文题目为《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先生与陈寅恪、冯友兰、雷海宗、朱自清、俞平伯、胡适、郭绍虞为考试委员。（据《清华大学研究院举行毕业初试、论文考试呈报教育部组织考试委员会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是月　林语堂等编辑之上海《人间世》自是月第二十二期发起“征求五十年来百部佳作”评选活动，将从十六类图书中评选出五十部著作。这十六类为：① 辞

书、类书、参考书；② 哲学、思想；③ 国学、经解；④ 文字学、语言学、文法；⑤ 历史、地理；⑥ 社会科学；⑦ 自然科学；⑧ 教育心理；⑨ 文学史、文评、诗话、词话；⑩ 散文、随笔、日记；⑪ 诗词；⑫ 小说；⑬ 戏剧；⑭ 传记；⑮ 儿童文学；⑯ 总集、别集。十月，评论告一阶段，根据各方推荐，共提出候选书目二一九种。诗词类共提出九种，前六种郑珍的《巢经巢诗集》、金和的《秋噩吟馆诗草》、廉南湖的《南湖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集》、黄遵宪的《人境庐诗抄》、朱祖谋的《彊邨语业》均为古诗词，新诗仅三种，首位为徐志摩的《猛虎集》，先生的《死水》次之，再次为郭沫若《沫若诗集》。（《五十年来百部佳作特辑》，《人间世》第38期，1935.10.20）后，该刊停刊，评选未有最后结果。

三月十九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大学在科学馆三楼召开的教授会临时会议。会上一致决定对秘书长沈履为学生所误会表示同情，并推举吴有训、朱自清等五人慰问沈履。（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时，清华学生十人被军警逮捕，十四日学生集会，有人谓此事件为学校当局告发所至，又谓冯友兰年前被北平当局传讯亦为沈履报告引起。十五日沈履辞职，并要求校长组织调查。教授会临时会议即为此事召开。

四月三日 《读骚杂记》发表于梁实秋编辑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第五期。该文阐述了先生对屈原之死的某些看法，认为《史记》系屈原死于顷襄王时期的记载欠确，觉得"王懋竑说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似乎可信"。文中指出，单纯订正史实的错误，其意义并不大，但"因这件史实的修正，而我们对于屈原的人格的认识也得加以修正，才是关系重大。怀王丧身辱国，屈原既没有见着，则其自杀的基因确是个人的遭遇不幸所酿成的，说他是受了宗社倾危的刺激而沉江的，便毫无根据了。"文章又进一步说：

> 历来解释屈原自杀的动机者，可分三说。班固《离骚·序》曰："忿怼不容，沉江而死"，这可称为泄忿说。《渔父》的作者曰"宁赴常沅而葬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可称为洁身说。东汉以来，一般的意见渐渐注重屈原的忠的方面，直到近人王树楠提出尸谏二字，可算这派意见的极峰了。这可称为忧国说。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
>
> 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例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你若认定《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读不懂《离骚》。你若能平心静气的把《离骚》读懂了，又感觉《离骚》不像是这位屈原

作的。你是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热诚欺骗了。

四月二十九日　晚，先生导演的话剧《隧道》在清华大学演出。时，清华大学举办二十四周年校庆纪念，所演出的话剧有《南归》、《第五号病室》、《隧道》，其中以《隧道》最优，"尽量地处处迫着演员去表情"。（王了一《谈本校二十四周年纪念游艺会的话剧》，《清华副刊》第43卷第1期，1935.5.15）这是先生回清华园后首次导演的话剧，由清华文艺社演出。

五月十一日　为方玮德送丧。北平晨报承印部编印之《玮德纪念专刊》记载到："五月十日入殓，十一日下午二时用马车载灵到法源寺暂厝，是日风雨如晦，状至凄惨。送丧者孙大雨、吴宓、闻一多、巫宝三、孙毓棠、章靳以、孙洵侯、卢寿丹、潘家麟、郝昭宓、林庚、曹葆华、瞿冰森、琦德、珂德、宪初、六姑（即方玮德的姑姑方令孺）、佛同、梦家（陈梦家）等二十余人。"（龚明德《方玮德史实补订二则·闻一多参加送丧仪式》，《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10.8）

方玮德，一九〇八年生，安徽桐城人，一九二八年就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追随先生学习新诗创作，为"新月诗派"后起之秀。一九三三年任教于厦门集美学校，一九三四年返回南京，时因肺病逝世于北平，年仅二十七岁，著有《玮德诗集》、《玮德诗文集》等。先生很器重方玮德的诗才，对其逝世十分痛心。

五月十五日　访朱自清。朱自清日记："闻一多来访，他推荐林庚，谢绝之。我们谈及《楚辞》，他有些新的见解。他认为最初的对于美人的追求，可能属于宗教性质，或多或少是与宋玉的诗有关。闻引屈原著名的故事，认为可与屈原的情况相比较。"（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61页）

五月二十一日　出席清华文艺社聚会。在会上先生谈孟郊。《清华文艺社末次会记事》："席间邀来闻一多先生谈话，又因闻先生前为文艺社导演《隧道》，大为成功，借此机会申谢。闻先生在清华时为清华文学社之主要社员，今又身临此文艺社，乃大谈感慨。后又谈论孟郊，认为孟郊之诗，其思想、方法皆为最'现代的'，为孟郊大作义务宣传。"（《清华副刊》第43卷第3期，1935.6.5）

六月十一日　《悼玮德》发表于《北平晨报》"学园"副刊第八二一号（"玮德纪念专刊"）。文章称方玮德有"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说：

> 玮德死了，我今天不以私交的情谊来哀悼他，在某种较广大的意义上，他的死更是我们的损失，更令我痛惜而深思。
>
> 国家的躯体残毁到这样，国家的灵魂又在悠久的文化的末路中喘息着。一个孱弱如玮德的文人恐怕是担不起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责任的，而这责任也

不见得是从事文化的人们最适宜的任务。但是为绵续那残喘中的灵魂的工作设想，玮德无疑的是合格的一员。我初次见玮德的时候，便想起唐人的两句诗："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玮德的标格，我无以名之，最好借用一个时髦的话语来称它为"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时贤所提出的"本位文化"这名词，我不知道能否用到物质建设上，但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可惜在目前这西化的狂热中，大家正为着摹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而忙得不可开交，文艺作家似乎还没有对这问题深切的注意过。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为素养的限制一时也无从解决它。因为我所指的不是掇拾一两个旧诗词的语句来妆点门面便可了事的。事情没有那样简单。我甚至于可以说这事与诗词一类的东西无大关系。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我们既不能老持着 Pearl Buck 在小说里写我们的农村生活，或一二准 Pearl Buck 在戏剧里写我们的学校生活，那么，这比小说戏剧还要主观，还要严重的诗，更不能不要道地的本国人，并且彻底的了解，真诚的爱慕"本位文化"的人来写它了。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我这主张也许有人要说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了，我承认我对新诗的主张是旧到和张之洞一般。惟其如此，我才能爱玮德的标格，才极其重视他的前途。我并不是说玮德这样的年青人，在所谓"中学"者上有了如何精深的造诣，但他对这方面的态度是正确的，而向这方面努力的意向决是一天天在加强。

文中还提到方玮德所进行的明史研究，说与他一起作诗的几位朋友，如徐大纲、孙毓棠、陈梦家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了研究"中国本位文化"的方向，"我期待着早晚新诗定要展开一个新局面，玮德和他这几位朋友便是这局面的开拓者"。

同日 朱自清宴请陈铨、赵家璧，并请先生与张荫麟、顾毓琇作陪。（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65页）

六月十三日 上午九时，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在图书馆外语系办公室举行田德望论文考试。考试题目为《The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etaphors of Militon and Dante》。先生与温德、邓以蛰、王力山、毕莲、陈福田、吴可读、吴宓、钱稻孙、石坦安、华兰德、杨宗翰、莫千里为考试委员。（据《清华大学研究院举行毕业初试、论文考试呈报教育部组织考试委员会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

室藏）

下午二时，先生又参加了该部在原地举行的赵萝蕤毕业初试，考试委员还有王力山、陈寅恪、毕莲、陈福田、吴可读、吴宓、温德、钱稻孙、石坦安、华兰德、杨宗翰、莫千里。（同前）

六月二十日　下午三时，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图书馆楼下一六二室举行崔殿魁毕业论文考试。先生与刘文典、冯友兰、孔云卿、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俞平伯、浦江清、罗庸、郭绍虞为考试委员。（据《清华大学研究院举行毕业初试、论文考试呈报教育部组织考试委员会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十八日　刘撷英约先生、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午餐。（据《梅贻琦日记》原件，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是月　朱自清着手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诗集》，要找新月版《志摩的诗》，还是先生从自己书房中找了一本给他。

是月　《〈诗·新台〉"鸿"字说》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三期。收《闻一多全集》。这篇训诂方面的考据文章，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有一篇《诗新台'鸿'字说》，解释《诗经·邶风·新台》篇里面'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那个'鸿'字。两千多年来读这诗的谁都马虎过去了，以为是鸿鹄的鸿，但经一多先生从正面反面侧面来证明，才知道这儿的'鸿'是指蟾蜍即虾蟆。古人曾叫虾蟆或蟾蜍为'苦蛩'（见《广雅·释鱼》和《名医别录》），苦蛩就是鸿的切音了，苦蛩为鸿亦犹窟窿为孔，喉咙为亢。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种草名叫屈龙的，别名也叫着鸿。《淮南子·坠形篇》'海闾生屈龙'，高诱注云：'屈龙，游龙，鸿也。'这确是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解成虾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能畅通。全诗是说本来是求年青的爱侣却得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也就如本来是想打鱼却打到了虾蟆的那样。假如是鸿鹄的鸿，那是很美好的鸟，向来不含恶义，而且也不会落在鱼网子里，那实在是讲不通的。然而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

八月十一日　朱自清写定《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将十年来的诗坛分作自由、格律、象征三派，认为先生、徐志摩是格律派代表，其阵地即《晨报·诗镌》。十三日，朱自清编成《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选五十九家诗，其中先生的有三十首[①]，数量仅次于何植（三十二首），但何植的诗多为短诗和"杂句"，故实列名第一者应该是先生。

九月九日　在一次宴会上指责周作仁虚伪。朱自清日记："赴杨之宴会。闻一

① 朱自清在先生名下注明选入二十九首，实少计算一首。

多指责周作人之虚伪态度。他认为周急于出名,却又假装对社会漠不关心。闻称之为'京派流氓'"。(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80至381页)

九月十五日 《卷耳》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

文章说,《卷耳》所写的是一件事,即"某南国夫人途中即事之作。夫人一行翻过一座山头,人马都乏了,照例要停下车去歇歇","夫人下车来,看见道旁遍地的卷耳,顺时采了一点,终于因为心绪不佳,把筐子扔在一旁,就地坐下了"。这诗就是"如此平实"。可是毛、郑解释的一团糟,朱子则称是怀远子。到了杨慎竟说其原旨是"后妃思文王之行役"。由此,先生感叹道:"《诗经》里果然有如杨慎所觉察的那样多是唐诗,对于《诗经》的读者诚然是个福音,但是对于文学史家,你细想想,不是一个大难题吗?"先生还说自己"读《诗经》的动机也未尝不是要在那里边多懂点诗",但"我一壁想多多恢复《诗经》中的诗,使它名实相副,一壁又常常担心把诗经解得太像我们的诗了。一个人会不会有时让自己过度的热心,将《诗经》以外,《诗经》以后的诗给我私运进《诗经》里去了,连自己还不知道呢?"先生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怎样读《诗经》的问题,而这问题的提出,正是"从读卷耳开始的"。

九月十八日 清华大学开学。时中文系教授有先生和朱自清(兼系主任)、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俞平伯、杨树达、刘文典、王力,专任讲师有浦江清,讲师有赵万里、唐兰,教员有许维遹、余冠英,助教有李嘉言,助理有张健夫。

这学期,先生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出版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主席为冯友兰,委员还有吴景超、朱自清、浦薛凤、陈桢、袁复礼、顾毓琇、萧公权、吴有训。

这学期,先生讲授唐诗,"本学程分唐诗为两大时期,取其间主要诗作,参以时代背景及作家生活,依次讲授,以期说明唐诗之特标的风格,并其间所浮映之唐代文化。"又,与杨树达合授"国学要籍"课中的"诗经"、"楚辞";此外,还指导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目的在研究我国古代神话之起源及其演变"。(《清华大学一览·研究院学程部》,1935年度)

先生讲《诗经》,不像封建道德的卫道士那样专意附会许多政治含意,而是尽力还原《诗经》反映的初民生活与感情,所以学生们听来毫无枯燥之感。王瑶《念闻一多先生》:"他的许多用低沉的声音娓娓道来的解说,过了半个世纪仍然记忆犹新。譬如他讲《诗经》中的风诗是爱情诗,就从'風'字的古义讲起,说'風'字从虫,'虫'就是《书经·仲虺之诰》中的'虺'字的原字,即蛇;然后又叙述《论衡》和《新序》中记载的孙叔敖见两头蛇的故事,习俗认为不祥,见之者死,其实就是蛇在交尾,这是'虺'字的原义。《颜氏家训·勉学篇》引《庄子》佚文就说'蜮(虺)二首',它本来就是指异性相接,所以《左传》上说'风马牛不相及',意思是说马牛不同类,故不能

'风';后世训'风'为'远',实误。由此发展下来的词汇,如风流、风韵、风情、风月、风骚等,皆与异性相慕之情有关。他援引了许多的史实以及后来的演变,妙语迭出,十分生动。"(《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 132 页)

这学期的楚辞课,先生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征得学校同意,把课安排在傍晚进行,别有一种情趣。冯夷(赵俪生)在《混着血丝的记忆》中回忆到:"记得是初夏的黄昏,马樱花正在盛开,那桃花色绒线穗儿似的小花朵,正在放出轻淡的香味。七点钟,电灯已经来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同学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立即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同学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 gentleman(即"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光下更浓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① 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上海《文艺复兴》第 2 卷第 4 期,1946.11.1)

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班上,先生布置的作业也很特别,实际上是治学方法的传授与训练。王瑶《念闻一多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班上,他要求学生各选定一个古代神话故事的题目,从类书中先把有关材料摘录出来,再复查原书,将材料按时代先后排序,分析其繁简情况及有无矛盾现象,然后再考察它的来源和流变过程,写出一个报告。有时学生在作业中过于草率或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他的批评是很严厉的。"(《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 135 至 136 页)

外语系的赵俪生同学也选修了中国古代神话课。他回忆当年的治学经历时说:"我的第二个文化(文献)老师,就要算闻一多先生了。""我对清华当时开的那些课都不感兴趣,只对闻先生课愿意的。当时他开四门课(《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神话》),作为外系学生,即使到二三年级,也没有资格全部选修,只挑了《神话》一课选修,其余旁听。旁听不缴作业,不计分数。选修就要缴作业了,记得

① 此语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闻先生给的题目是《远古帝王感生传说的分析》，就是指那些'履巨人迹'、'见北斗枢星'、'有黑龙卧其上'等等。我平生第一次学会查类书、翻丛书，就是围绕着做这篇 paper 开始的，这就正式踏上文献学的边沿了。对《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以及《玉函山房辑佚书》等，开始翻查也感到过烦躁，久之尝出滋味，即根据一根线头可以找到很多花花绿绿的线头，心里很喜欢干这个事。对一件事的底蕴，像破案一样，追踪寻访，从类书中找到线索，还要缘着这条线索深入到一部部原书中去，总不能查完本题就一扔不管了吧，一般习惯是借查甲案的机会，不知不觉地牵连到乙案、丙案上来，当时年轻，精力充沛，对有兴趣的问题难舍难分，手里攒着一大把问题——'一锅下吧'。这一'下'就三个月、半年过去了。我开始感觉到这比翻译一篇或一部小说，更饶兴味，份量更重一些。"（《赵俪生文集》第 5 卷，第 22 页，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4 月出版）

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还说：先生"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又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来，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他比所有的训诂家都高明之处，是他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就一下子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者旁听他的课，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内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着"。"当时，闻先生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些问题还注意不多，单纯从神话搞神话，使用训诂武器，特别是音转这个法宝，搞出许多串联来，如说尧是'鳌'、象就是大鼻子的象之类。而我们学生主要是要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他喜欢查类书，我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我们也跟着熟悉一些谶纬。闻当时动用'经解'不很多，所以我们学生在《十三经》上受影响不大。"（同前，第 112 页）

赵俪生曾用笔名"冯夷"发表过一些文章，先生不知道这个情况，以至某次讲到对"冯夷"的考据时引出一段笑话。赵俪生在《混着血丝的记忆》写到：有一天，先生在"神话"班上讲："我今天要讲讲冯夷。冯夷是什么呢？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水神的名字，其实这说法还不彻底。冯夷就是'羿射封豕长蛇'的'封豕'，一作'封豨'——也就是：一条大猪！一条大猪！"当时，"同学们轰堂大笑了，有几位跟我特别熟的还拿铅笔头儿描住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这颇使闻先生为之不解，他几乎要怀疑同学们在'起他的哄'了，直到事后有位向他一语道破，他才一笑置之。"赵俪生写这件事，是想说明先生在考据方面的功夫。他接着写到：虽然先生"有时考据得不免有几分大胆的地方，我们也还是热切地听他底讲，记录他的笔记，因为他到

底能够从荒谬的传统见解中剔罗出许多较之牵强处为数更多的确切的新见。例如他从古代神话中找出许多有关古代礼俗的宝贵的材料(如关于社、郊祀、高禖、祓除不祥等等),是颇能使我们折服的。"赵俪生还写到:"我们尤其爱戴这位老师的,倒是他的全人格。只要你跟他上过一堂,你便会看出他多么热情,多么坦直。"(上海《文艺复兴》第2卷第4期,1946.11.1)

在课上,先生曾表示应该请逃亡在日本的郭沫若回来讲学。张春风《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回忆:"平时讲书时,他总好称道郭沫若先生,在他研究毛诗、楚辞及古代神话中,他多次引用郭先生研究金文的所得,他佩服郭先生的卓识有胆量,能创造。当时郭先生正在日本作逃逋,但闻先生就曾多次表示'为了学术研究,清华大学应礼聘郭先生来讲学!'"(《宇宙风》第147、148期合刊,1947.3.1)

这学年,除仍在北京大学兼课外,又在燕京大学兼课,因得与陆侃如"时时晤及,惟仓促间未尝深谈"。(《致游国恩》,《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45页)先生对陆侃如早已注意,一九二三年九月,知陆有《屈原评传》出版,即让弟弟寄一册到美国。

九月二十二日　午,应《大公报》"文艺副刊"招宴,至丰泽园聚会,到者有杨振声、俞平伯、朱自清、梁实秋、余上沅、郑振铎、沈从文、周作人等。(据张菊香《周作人年谱》,第327页)

九月二十六日　是日《清华大学校刊》公布《二十四年度常设委员会一览》,先生继续担任出版委员会委员、《清华学报》编辑。

是年秋　与余上沅夫妇、吴景超夫妇、梁实秋、顾毓琇、庄前鼎、蔡方荫、杨宗翰等同游大同,参观了云冈石窟。此行为顾毓琇安排,平绥路局局长沈昌特拨出专车迎送。(据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3页)时,平绥路通车不久,北平至包头成为旅游热线。

十月二日　朱自清在日记中写到:"读一多佳作。"(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84页)时,朱自清编辑之《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即将由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佳作"可能指的就是先生的新诗。

十月十四日　向朱自清表示书评应具有某些优点。朱自清日记云:"访一多和平伯。一多不同意在日志中作简短提示,他认为文学应较社会科学学术性更强。依一多之见,书评必须具有某些优点。"(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86页)此事因何而生,不详。

十月二十日　赴《大公报》"文艺副刊"宴约,到者有沈从文、杨振声、周作人、李健吾、余上沅、梁实秋等。(据张菊香《周作人年谱》,第328页)

是月　《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收《闻一多全集》。文章共九章:一、候人诗释义;二、候人诗与高唐赋;三、释阪;四、虹与美

人;五、曹卫与楚;六、高唐与高阳;七、高唐神女与涂山氏;八、云梦与桑林;九、结论。该文引起日本汉学研究权威杂志的重视,称:"闻一多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是一篇采用近代方法对《诗经》中的《曹风·候人》与《高唐赋》进行巧妙分析的论文,假若要分析古代典籍的话,那么注疏就应当是科学的解释,而闻氏之文正是作为'新的注疏'的方向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武田《今年度的中国文化》,日本《中国文学月报》第10号,1935.12.31)

是月 朱自清在《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发表《李贺年谱》,文中在唐贞元二十二年条下引《新唐书·李益传》一条史料,以证李益与李贺齐名。先生读罢甚疑,当即指出。朱自清立刻重新考证,并于次年一月《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发表《李贺年谱补记》,对先生所指表示感谢,云:"嗣承闻一多先生见示,益与贺齐名之说可疑。……益以代宗大历四年进士擢第,年二十二;至贞元二十年五十七岁,成名已久。时贺年才十五;《益传》乃称益名与贺埒,似非信史云云。按闻先生所考益生卒甚确,……此条多蒙闻先生指教,谨致谢。"

这时,先生于唐诗研究已倾注了许多功力,朱自清说:"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2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十二月二日 朱自清日记:"闻等联名写信给我,敦促将尚未搬走之图书在近日内搬走。彼意斯可便利余等在新地点之工作。俞(平伯)和陈(寅恪)表示反对。经与闻磋商,他取消该建议。"(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92页)

十二月九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日本继占领我东三省后,又侵占热河及察北、冀北大片土地,并觊觎华北。上月,日本策动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强迫国民政府承认"华北政权特殊化"。改地方政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国家民族危亡日益紧迫之际,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游行,抗议华北伪自治运动,却遭到军警的镇压。清华学生入城时,城门已紧闭,只得在朔风中站立一天。

次日,清华大学各院院长及教务长叶企荪、冯友兰、吴景超、陈岱孙、顾毓琇五教授联名发布告同学书,称"我们处于师长的地位,不忍见诸位同学作无代价的牺牲","国事至此,国人无不痛心,但今日如想解除国难,须培养力量,并非发泄情感所能奏效","罢课是消极的,对于解除国难毫无补益,反与人以藉口干涉的机会","我们现在愿以诚恳的态度,请诸位同学在此时期内加倍努力于事业。至于被捕诸

学生，各校当局自应负责保障，诸同学可勿挂念”等。这是清华多数教授的态度，先生亦持此主张。

十二月十六日　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学生被捕数十人，受伤者二百余人。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领土十分愤慨，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非常理解。但是，他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抱有幻想，所以不赞成罢课。黄秋耘在《闻师与屈原》中说：先生“偶而也谈论到当时正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闻师对‘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深表同情的，不过，我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闻师认为，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十分可贵的，但是采取示威游行这种方式的行动却未必有什么效果。我当时少年气盛，不免跟他辩论几句，他也并不因此而怪责我。他是极力主张抗战的，但有时又不免带点忧心忡忡的情绪”。（《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282 页）

先生在清华读书的侄儿闻立恕、外甥陈文鉴及在辅仁大学读书的侄儿闻立勋都参加了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当先生得知游行示威同学遭军警殴打、逮捕时，十分着急，四处打电话询问他们的情况，事后批评指责他们不该参加这样的活动。先生的侄子闻立志（后改名黎智）说，先生一气之下，还曾“把我大哥狠狠地打了一耳光”。（《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闻一多〉电视连续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谈话》，《黎智纪念集》，第 513 页，武汉出版社 2004 年 9 月出版）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抗日救国会募集救亡捐款，共得一百四十二元，先生捐助十元，是认捐者中款额最多者之一。（据《清华大学校刊》第 712 号，1936.1.16）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次日，清华学生自发组成的抗日爱国团体，在“一二九”运动中起着领导清华学生运动的作用。

是年　《楚辞斟补》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五卷第一号。文前云：“兹篇目的端在校正今本（即毛刊洪氏《补注》本）《楚辞》及王逸《章句》之舛误夺乱。惟在先秦两汉之书，所谓误字者皆形之误。其或字义扞隔，骤视之莫得其解，而实可以声音通假之法解决之者，此则似误而实非误，故不属本篇范围。凡已经前人及时贤举正者，苟遇有新证，可资补充，则具载其说而以己意附焉。不则慨弗征引。”

一九三六年　三十八岁

五月五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

五月三十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

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下令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史称“七君子事件”。

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一月十五日　下午入城，参加一茶会，到者有朱自清、凌叔华、梁宗岱、朱孟实、常凤缘，还有一位外籍的贝尔(Bell)先生。（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399页）

一月二十九日　四女闻翘生于北平。

是月　《离骚解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补记》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收《闻一多全集》。

《离骚解诂》共释二十条。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同名之《离骚解诂》一书是依手稿整理而成，书后有季镇淮所作《后记》，云：“诠释《离骚》词义，一九三六年曾有《离骚解诂》之作，共二十条考证，未及全篇。今存手稿有扉页篆书《离骚糜义》一稿，前半二句一行，后半四句一行，逐行加注，删改增补较多，似为注释《离骚》全篇初稿。据此作二稿，分句作注，有删改，亦有增补。手稿只有前八段，后五段乃《糜义》清稿，非手写，四句一行，注亦联写。据此又有增补。今统一前八段与后五段格式，全以四句为一行，共九十三行。注文按句分段移写，以便阅读。……”全书征引王逸《楚辞章句》、王远《楚辞评注》、如淳《汉书注》、吴景旭《历代诗话》、张铣《六臣注文选》、戴震《屈原赋注》、陆善径《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引》、姚鼐《古文辞类纂》、洪兴祖《楚辞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篇》等四十六家。

上海古籍版《离骚解诂》，录入先生对《离骚》某些段的理解，如：

一、“恐美人之迟春”后，先生云：“以上一段总冒，首叙身世之贵，次述品貌之美，末陈搴芳求女之愿，为全篇主脉提纲。”

二、“伤灵脩之数化”后，先生云：“以上一段以行旅为喻，点出忠而见疑之意，摄起下文。”

三、“长顑颔亦何伤”后，先生云：“以上一段言饮食异于众人。”

四、“虽九死其犹未悔”后，先生云：“以上一段言服饰异于众人。”

五、“固前圣之所厚”后，先生云：“以上一段言虽见嫉于群邪，而能清白自守。”

六、“夫何焱独而不余听”后，先生云：“以上一段言将游四荒，女媭劝阻。”

七、“溘埃风余上征”后，先生云：“以上一段言陈词重华，果得中正，遂决然乘风上征，离世远举。”

二月十九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大学在科学馆召开的教授会临时会议。会上教务长潘光旦报告学生救国会向学校要求延期及免去本学年度第一学期学期考试经过，并报告系主任会议决定，请教授会做以讨论。张子高提议考试如期举行，全体通过。这时，学生涌进会场，会议中断。学生离去后，冯友兰提议，多人附议，提出“同人等向学校辞去教授职务并自即日起停止授课”，全体通过。同时，推举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萧公权、萧蘧、潘光旦、张奚若七教授组成辞职宣言委员会。（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清华大学除个别教授外，绝大部分教授均在辞职宣言上签名，先生亦在签名之列。《清华大学教授昨晚提出总辞职》述其经过云：“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前曾请该校免除本届学期考试，该校曾开系主任会议，决定复课三星期后，于二月二十四日起再行补考，并取消春假，缩短暑期，以顾全学生学业。兹因考期将届，救国会复以全体学生名义，请求免考。本星期一该校复开系主任会议，决定将此问题提出教授会。昨日下午四时教授会在该校科学馆三楼开会，有学生多人，在楼下呼喊口号，要求免考，并推代表请见教务长潘光旦。潘氏即劝学生退去，学生不听。是时教授会正在讨论，学生代表等屡次要求入会场，均经潘氏劝止。教授会旋议决，本届学期考试，如期举行，并请潘氏以此议案通知学生代表。学生等当即蜂拥上楼，旋有数人闯入会场，经教授会临时主席张奚若氏，令其退出，但学生等仍时出时入。各教授见此情形，深愧德望未孚，决定全体引咎辞职。”（《北平晨报》，1936.2.20）

先生签名的辞职宣言全文云：“同人等于本日下午开教授会，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学生在外高呼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屡次冲入。同人等在此情形下，既感行使职权之不可能，又愧平日教导之无力，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人，除向校长辞职外，谨此宣言。”（《清华大学校刊》第721号，1936.2.20）

学生此举，原是由于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误课太多。但为了避免师生间的

对立,学生开会决定参加二十九日举行的补考。

二月二十五日 下午五时,出席清华大学在后工字厅召开的教授会临时会议。时,清华教授总辞职后,报载有某教授从中鼓动风潮。孙国华、史久荣、陈之迈、叶企荪、张奚若五教授提议开教授会,并请校长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真相。会上众人认为大可不必,遂由张奚若等撤回提议。(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二月二十九日 清华大学举行补考日。清晨,四百多军警闯入学校,将学生宿舍包围,并从晚七时开始搜捕进步同学。同学分散到各教授家中躲避。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记得黄诚和姚依林等躲到冯友兰教授家,韦毓梅、韦君宜、王作民等女同学,躲到朱自清教授家,还有些同学躲到闻一多教授家。"(《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12期,1985.10) 先生不同意同学们的斗争方法,但当同学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仍毅然起来极力保护。

三月十七日 致游国恩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喜告见敦煌旧钞《楚辞音》:

> 敦煌旧抄骞公《楚辞音》残卷,内有郭景纯《楚辞注》数则,并洪氏未引之释文一则,诚希世宝笈也。近托人从巴黎觅得之影片已寄到,拟为写一较详尽之跋文。属草方始,奋兴至极。本拟跋成后,寄呈尊览,不意手札亦到,欣慰何似!弟与《楚辞》结不解缘矣,亦与兄结不解缘矣。

又云对《九歌·山鬼》有新解,大意已告孙作云,"令广搜证佐,制为专文,将由《清华学报》刊布"。

三月十八日 作《敦煌旧抄〈楚辞音〉残卷跋》(附校勘记)。发表于是月北平图书馆编辑之《图书季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及四月二日《大公报·图书副刊》。收《闻一多全集》。文首叙述《楚辞音》残卷发现的经过与学术价值,云:

> 敦煌旧抄《楚辞音》残卷,不避隋唐讳,存者八十四行,起"驷玉虬以乘鹥兮",迄"杂瑶象以为车",凡释《离骚》经文一百八十八,注文九十六,希世瑰宝也。卷藏巴黎图书馆。王重民先生近校书巴黎,始发之丛残中,并据卷中"兹"字下"骞案"云云,定为隋释道骞撰《楚辞音》,又以"瑆"下云"郭本止作程",谓即郭璞《楚辞注》之孑遗,其说皆灼然有据,无可易者。夫自汉王逸以下逮宋之洪朱,约及千载,为《楚辞》学者,代有名家,而郭注骞音之名,尤赫然在人耳目。顾其书自唐中叶以还,似已荡然靡存,而史志所庐,空有其目,譬如丰碑载途,徒足令人欷歔凭吊耳。孰谓骞音残卷,一旦发现,而郭注鳞爪,复在其中,是非旦暮之遇乎?自殷虚之役以来,数十年间,惊人之事多矣。即以重民先生近所

剔发于巴黎者言，此尺幅断轴，亦毫末之于马体而已。然而于《楚辞》之学已不啻启一新纪元。重民先生之功为不朽矣！比因友人叶公超先生邮书巴黎，代请副本。重民先生乃虑移写失真，饷以影片。欢庆感激，夫复何言？既拜领嘉贶，寻绎终朝，惊喜稍定，乃记其一得之见如次。尚幸重民先生有以教之。……至于所注音读二百八十余事，自为讨治隋唐古音之正确资料。事涉专门，力有未逮，故缺而弗论。

三月二十四日　参加清华同学在生物馆一三三号教室举行的"北平各大学南迁问题"辩论会。

时，华北局势十分危急，日军步步紧逼，政府毫无坚决抵抗之意，平津时刻有陷入敌手的可能，两地许多学校纷纷酝酿南迁，清华大学拟在长沙原湘雅大学校址设立分校，但同学们大多认为南迁即逃跑，主张在北方坚持抗日。辩论会正面主辩人持南迁主张，其理由是：第一，南迁是为了保存民族的文化，到安全地区去，培养我们的实力；第二，当此中日两国外交协调之际，学校留在北平，不断发生学生运动，非常有碍外交进行；第三，华北已经为日本所控制，与其将来为日本所接收，不如早日自动南迁；第四，学生运动不能担负救亡责任，如果北平一旦被占，无数青年反被敌人所用；第五，现在中日两国军器悬殊，我们无力作战；第六，学生的本分在读书，救国应先充实自己，只有南迁，才能安全地读书。反面主辩人申述了反对南迁的意见，理由是：第一，要保存文化，要培养实力，只有从加强民族解放运动着手才有可能；第二，在敌人疯狂地向我们发动侵略的现在，和它进行外交谈判，简直是与虎谋皮；第三，敌人还没有打来，就忙着南迁，这是无耻的逃亡政策；第四，学生运动有民众做后盾，是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如果北平万一被占领，一切爱国的青年都可以组织起来从事抵抗敌人侵略的战斗活动，只有逃亡者才甘心被敌人利用；第五，中日两国如果发生战争，胜负不完全决定于军器，而主要在于中国内部是否能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团结一致，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第六，我们坚决反对学生的本分就是读书的论调，因为救亡绝不能闭门造车，只有从理论与实践双方面进行学习才能得到。而且如果国家将亡，就是迁到南方也是不能安心读书。辩论历经一个半小时，主持人宣布由担任评判员的教授计分，但一些学生们说不要算分数了，由大家表决。结果，大多数同学反对南迁，主持人宣布反面获胜。会后，先生走出会场，对前来担任评判员的潘光旦说："现在的青年，比我们年轻时候是不大相同啦！"（王康《闻一多传》，第 162 至 165 页）

四月三日　致游国恩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日前，游国恩寄来《九歌》研究撰稿一份，欲托先生转交《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先生复信云：

关于《九歌》诸点，高见甚是，无任钦佩。彭咸水死之说，弟仍怀疑。拙稿中有考辩一通，颇详尽。迟日当录出呈政。清华学生孙君晓撰《九歌山鬼考》一篇，大意谓山鬼即巫山神女，列证甚多，大致可信。尊著已举宋赋证山鬼为人神相悦矣。孙君虽较尊见更进一层，然终不出尊见范围。《大公报》"文副"近时刊登率多创作，尊著性质是否相融，恐成问题，且主编者近已改萧乾（其人在上海），从文亦未必能作主也。近撰《敦煌旧钞楚辞音残卷跋》，载《大公报·图书副刊》，谅已见及。惟其中颇有手民之误，兹经核正，一并邮上，仍乞指正为盼。其原卷六纸，已付抄胥，不日写毕，再行寄上。

五月三日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请先生与朱自清、陈铨（外文系教授）演讲，（据《清华大学校刊》第743号）内容未详。

五月十八日 《北平晨报》副刊"红绿"刊登署名"野萍"的文章《〈死水〉的作者闻一多教授》。这是一位同学为先生做的一幅文字画像，说先生不修边幅，"总是乱蓬蓬的头发，文人气质的脸，常是穿着一身深色长衫，蓝大褂或青色大褂，并且全是布衣，薄底布鞋，深色袜子，一见准不敢认为是鼎鼎大名的诗人、学者、闻先生，更不相信是三十七岁的青年年龄"。

在介绍先生的授课情形与内容时，说："闻先生在清华的拿手功课有'诗经'、'楚辞'、'离骚'、'唐诗'等几门功课，这些功课之中，最称为棒的是用新的方法解千古来误解的《诗经》，解来头头是道，处处有证据，条条是理。从来解诗经的都说《诗经》是哀而不怨、乐而不淫的诗章，但是经闻先生解经的证明，《诗经》中不但有伤雅之作，并且有许多简直就是淫诗。最重要的几处，例《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怒如调饥'句；《陈风·衡门》：'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句；再有《曹风·侯人》：'婉兮孌兮，季女斯饥'句等，何以连称'饥'？'饥'岂食饭之食？读经之传统观念均不敢稍涉淫秽，其实这三处'饥'字，都是指男女交合之意。《陈风·株林》：'朝食于株'，何必于'株'说'朝食'？盖亦指'交合'。古人称'食色性也'，以'食'作淫欲之情解亦极尽情。《汉书·外戚传》：'房与宫对食'，注谓：'宫人自相为夫妇即名对食'，多么凿实的证据！闻先生更举《楚辞》相互参证，更为使人相信。常听见别的自命经学家的卫道先生说：'闻一多讲《诗经》是《水浒传》的讲法，江湖派！'我记得曾有一位老先生如此说。实在说来，那位先生的目光太近视了，终年啃着一本《毛诗传疏》，摒弃理性，这又何说？"

先生讲《诗经》，重视文化人类学的眼光与方法，强调《诗经》中的本来面目，在所谓"正统"学者看来，未免有些离经叛道，却受到学生的欢迎。其中有些观点，先生在《诗经的性欲观》以及不久以后发表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多有阐明。

后来又写了《说鱼》，进行深入的讨论。

六月十七日　致王重民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此前，王重民读了先生寄给他的《敦煌旧抄〈楚辞音〉残卷跋》手稿，认为文中"鶟鸠"一条可以商榷，便写信与先生探讨。先生复信说："拙撰跋文，妄逞臆说，鶟鸠一条，尤为疏谬。过承奖饰，惶愧无地。副刊所披，颇多手民之误，顷已遵命缮写一通，径寄刘先生矣。补记一则，仍另纸录呈尊览，倘蒙附入，尤为荣幸。敦煌遗物，价值之大，固不待言，更得硕学如先生者整理之，真不朽之盛事也。大著单本，盼能早日出版，俾得先睹为快。"

所说"补记"，未入集，仅见王重民所编之《敦煌古籍叙录》。全文云：

> 比得重民先生来书，称鶟鸠一条当出于江邃《文释》，其书马国翰有辑本，此可补马辑之遗，案重民先生之说最是。余前以"文释"为"释文"之倒，肊测无据，合急更正。惟《文选·思玄赋》注引服虔曰：鶟鸠一名"鸠"，伯劳顺阴阳气而生，贼害之鸟也。王逸以为春鸟，谬矣。与骞公所引《文释》语正同，然则《文释》此条又全袭服虔矣。《选》注"伯劳"上脱"今谓之"三字，"阴"下又衍"阳"字，致文义扞格，可据此以订正之，又"答"字卷作"畣"。余前谓相承以"畣"为古"答"字，"畣"实"畣"之讹，今案《秦诅楚文》"鞫鞫栈舆"，"鞫"字作"畣"，是古有"畣"字也，至《诅楚文》之"鞫"，以此卷证之，明即"鞫"字，旧释为"鞠"，非是。（六月十七日又识）（第282页，中华书局1979年9月新1版）

七月三十日　下午三时，至图书馆楼下一六二号，担任中文系研究生刘恩格毕业初试委员。九月十七日，又任该生毕业论文考试委员，论文题为《曲江集考证》。（据《清华大学研究院举行毕业初试、论文考试呈报教育部组织考试委员会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是年暑假　赴河南安阳看甲骨发掘。时，先生研究上古文学，涉及古代文字，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写了几篇契文疏证。

看罢安阳殷墟，又去洛阳。洛阳是杜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先生研究杜甫多年，早就有亲往考察的愿望。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就说："很想到河南游游，尤其想看洛阳——杜甫三十岁前后所住的地方。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我不知杜甫传如何写。"（《致饶孟侃》，《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35页）在洛阳，少不了游龙门等古迹。

此时，应在洛阳某航校工作的一位清华毕业生邀请，参观了这所航校。先生的印象是这里的国民党军队还是准备抗战的。昭琛（即王瑶的字）《忆闻一多师》："他回到北平对学生说：'当然，中国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同学们的运动是无可责备的，但是我这次路经洛阳的时候，才觉得在那里政府是有一点准备的，和在北平所见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对政府完全失望。'"（《文汇报》，1946.8.25）

时，陈梦家自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常到比邻的清华园看望先生。陈已由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并留在燕大执教。

九月七日 出席中国文学系会议，决定："1. 本系学程分为二组，自本年度二年级起，学生须分组练习。""2. 本年度三、四年级仍运用旧章，但略有改动。"（《清华大学校刊》第770期，1936.9.10）

九月十六日 清华大学开学。这学年先生讲授唐诗，并与俞平伯、杨树达、刘文典合授国学要籍。同时，还指导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习诗经、楚辞、唐诗。（据《清华大学一览》，1936年度）

孙作云考取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先生是他的指导教师。

是年度，先生聘书注明月薪为三百八十元。

是时，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严智开离职，赵太侔接任校长后，特请先生来校兼课。先生离开艺专已整整十年，这次回来主要讲授英文。郭良夫《怀念我的老师》中回忆到："一九三六年，我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雕塑。这一年的九月，学校请来了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先生给我们讲授英文。闻先生到艺专来兼课，每周两次，上课的时间都在下午，上完课他就回清华去了。闻先生讲授的课文内容，大多是关于造型艺术理论的文章，记得有一篇是罗丹谈论雕塑艺术的。这样，闻先生不仅教给了我英文，而且启发了我对艺术理论和美术史的兴趣。"（《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87页）

郭良夫在给季镇淮的信中还说："艺专当局按照学生程度分为甲组英文与乙组英文，统由先生担任。先生嗣以工作繁忙，乃自约赵萝蕤女士代授乙组英文课。先生每周自清华来校一次，为甲组学生讲授两小时。课文内容系先生参酌艺专所分科性质而选录者，多为讲述造型艺术理论的文章。"（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31页）

是月 大约在这前后，有次进城，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等车返校，见到因参加一二·九运动曾被当局逮捕的张申府，对其被清华解聘流露出同情。张申府《呜呼，一多先生》中回忆说："有一次的情景，更始终使我不能忘怀。民国二十五年我因领导华北救国运动被捕入狱。事解后依然回校讲学。不久暑假，本尚有一年聘约未满，而且照章本应享受出国休假的待遇。然而一纸书来，我被解聘了。在我尚未及搬出学校的时候，一夕在城内回校的汽车站上，遇到一多先生。黯然相对，愀然地对我说，'我感着无话可说'。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那时他那种'脉脉含情'的情形，我是始终不能忘的。"（《人民英烈》，第175页）

一九四五年，张申府任《图书季刊》主编，向先生约稿。先生将《诗经通义》（周南）送去，刊于该刊新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

十月二日　担任中文系研究生张恒寿毕业初试委员，后又任该生毕业论文考试委员。张恒寿毕业论文题目为《庄子之研究》。（据《清华大学研究院举行毕业初试、论文考试呈报教育部组织考试委员会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十月四日　顾颉刚应涿州县长杨佩南之邀，约请先生、刘崇鋐、容庚、聂崇岐、侯仁之、张玮瑛、张西堂等及清华学生二十余人，同至涿州旅游。在涿州，上午参观了城内东北隅的辽代建筑云居寺塔、智度寺塔，下午参观了张飞庙、乾隆行宫等后，返回北平。（《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426、539页）

十月十日　与顾颉刚、刘崇鋐等赴张家口旅游。晨七时在西直门站上车，车上与顾颉刚谈，下午一时抵张家口。（《顾颉刚日记》第3卷，第541页）张家口是座军事要塞，著名胜迹有上下堡、大境门、朝阳亭、朝阳洞等。次日，顾颉刚游宣化，先生是否同行未知。

十月十三日　日人牟田口率军驻入清华园，先生与清华师生极为愤怒，但美国驻华使馆未加阻拦。

十月十五日　担任中文系研究生许世瑛毕业初试委员。后又任该生毕业论文考试委员，论文题目为《校勘学之研究》。（据《清华大学研究院举行毕业初试、论文考试呈报教育部组织考试委员会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十月十九日　清华大学职员章晓初先生四月三十日病逝。是日《清华大学校刊》第七八一号刊载《代收章晓初先生赙金清单》，先生名下记十元。

十月二十四日　鲁迅先生十九日在上海病逝。是日，清华大学文学会开会追悼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先生不避所谓"新月派"之嫌，出席追悼会并发言。朱自清日记云："闻一多以鲁迅比韩愈，韩氏当时经解被歪曲，故文体改革实属必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42页）赵俪生《鲁迅追悼会记》记录着当时的情形："朱先生说鲁迅先生近几年来的著作看得不多，不便发什么议论，于是就只说了几点印象。最后朱先生提到一点，那就是《狂人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救救孩子'，这句话在鲁迅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终生实行着的一句实话。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帮忙青年人，所以在死后青年人也特别地哀悼他。闻先生说：鲁迅先生死了，除了满怀的悲痛之外，我们还须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来观察他。我们试想一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中支配我们最久最深刻，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使我们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的，是谁呢？是韩愈。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到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作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作坏事，他们的态度可说是文人的态度而不是诗人的态度，这也就是诗人与文人的不同点。闻先生在讲演中插入了一个故事。他说：我跟鲁迅

先生从未会见过，不过记得有一次，是许世英组阁的时候，我们教育界到财政部去索薪，当时我也去了，谈话中间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话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欢说话的，所以一句也没有说，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人也不说话，不但不说话，并且睡觉。事后问起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迅。"(《清华副刊》第45卷，第1期)

同日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改选，先生仍负责出版，朱自清依旧负责学术，学生中孙作云总务、孔祥瑛文书、高松兆会计。(据《清华大学校刊》第785号，1936.10.29)

是月 《楚辞斠补》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四期。这是与一九三五年发表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五卷第一号上者的名同，文不同的文章，当是前者之续。

这期学报，还发表了孙作云同学《九歌山鬼考》，文中数处征引先生手稿《毛诗词类》、《九歌解诂》中的文字。文末"附白"云："本文立意乃受闻一多先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之启发。属草时，又屡就正于先生。先生为之组织材料，时赐新意，又蒙以所著关于《诗经》、《楚辞》之手稿数种借用。脱稿后，先生于文字上复多所润色。倘此文有一得之长，皆先生之赐也。谨此致谢。"后来，孙作云又在《忆一多师》中记述到："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我在大学第三年级，在我连续地听了两年他的楚辞课以后，特别在我读了他的震撼一时的大著《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以后，我也不禁有所触发，我于是乎告诉闻先生说：九歌的山鬼也是高唐神女，山就是巫山，鬼就是神女，《九歌·山鬼篇》就是楚国宫廷祭祀其先妣或高禖的乐章。闻先生听了这个意见之后，高兴得什么似地，连忙怂恿我要把这意见写出。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九歌山鬼考》的由来。……挟着我的'处女作'，怀着惊喜交并的心情，到新南院南头七十二号之后，他看了一看，一面点头，一面又叹气，说：'这个意见很好，那个意见也不错，只是文章啊！'若不胜其悲愁似的，语不尽词。他于是乎就动手改，而且还叫赵秀亭先生(当时给闻先生司厨兼做书记)抄[①]，后来还蒙闻先生介绍，发表在《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四期里。"(《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15至116页)

十一月三日 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于中午十二时在大礼堂前举行降半旗礼，全校师生齐集，并庄严宣誓："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大批日军演习之余入北平市游行示威。此等非法军事行动，辱国丧权，忍无可忍。我清华全体师生，愿以至诚，促成全民族大团结，保卫国土，维护主权。此誓。"(《全校师生宣誓保国》，《清华副刊》第45卷第2期，1936.11.9)

是日，为平津日本军队举行大演习之第九日，按日军计划是日将有七个以上的

① 此处孙作云记忆有误，协助先生誊抄手稿者名戚焕章，赵秀亭系厨师。

军和坦克通过北平市到八宝山集中检阅，这是庚子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激起全城民众极大愤慨。

十一月九日　为反对日军与蒙古族德王五日进犯绥远，为支援傅作义部队在绥远抵抗日军，绥远旅居北平同胞绝食一日，集资慰问绥远前线将士。先生亦与清华同学一起绝食，以捐助同学组织的战地服务队。（据王康《闻一多传》，第172页）

赵俪生在《混着血丝的记忆》中亦说："当时北平的大学生正在两年中连贯地发动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三·三一'、'六·一三'、'一二·一二'五次请愿示威的游行，此外还有一次到保定高碑店被打回去的'扩大宣传'和到绥东的'战地服务'。闻先生曾几次为这些事情慷慨捐钱，并曾为绥东战士绝食一日，这是我确实知道的。"文中还说："在赞助文艺活动方面，他曾为当时我们组织的国防文艺社和后来由国防文艺社改组扩大而成的清华文学会帮忙不少，曾出席过鲁迅先生追悼会，而且还登坛致词，后来还替我们介绍了许多文学前辈梁实秋、沈从文、朱光潜诸先生到会讲演。在这方面，闻先生较之那些托辞'我们要唱昆曲'因而'没有时间'参加'你们的会'的教授和最初也'签名'，也'发动'，也'题字'，也'领衔'，然而一旦人家对他的半月刊社发给津贴之后，便一切都'婉辞谢绝'的名流，是有着截然的区别的。"（上海《文艺复兴》第2卷第4期，1946.11.1）

十一月二十三日　清华大学教务处第三十三号《通告》，公布中文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导师及受指导之学生名单。先生指导学生七人：孙德宣、陈国良、高景芝、王瑶、王守惠、孔祥瑛、蒋南翔。《通告》要求"各生务于即日分谒本人导师以资请益是要"。（《清华大学校刊》第792号，1936.11.26）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与冯友兰、杨树达、朱自清、俞平伯、雷海宗、刘崇鋐、陈达、孔繁霱、邓以蛰、潘光旦、沈有鼎、杨治业等十四教授为修建万斯同祠墓各捐款一元。（据《清华大学校刊》第795号，1936.12.3）万斯同，字季野，人称石园先生，历史学家，由明入清，以布衣身份参加《明史》修纂，拒受清朝册封，著有《历代史表》等。

十一月二十九日　《清华大学校刊》第七九三号刊登《二十四年度清华教职员捐款详数》表，先生名下列出十二元。

十二月十五日　下午四时，至工字厅出席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联合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迫其抗日。消息传来，清华大学陈福田、萧蘧、陈达、潘光旦、萧公权、刘崇鋐、汪一彪、孔繁霱八教授请求召开教授会议。会上议决四项："一、以教授会名义致电中央政府；二、以教授会名义发布宣言；三、组织七人委员会，起草电报及宣言，委员会由朱自清、冯

芝生、闻一多、张奚若、吴正之、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织之(当由主席指定朱自清为该委员会召集人);四、教授委员会拟就电报宣言后即由该委员会用教授会名义直接对外发表。"(《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这时,先生认为大敌当前,内部不宜出现动乱,以免给日军侵略造成可乘之机,故对张、杨持谴责态度。先生参与起草的《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颇足说明先生当时之认识,兹录以参考:

>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12.16)

在课堂上,先生也发了一些议论。张春风《闻一多先生二三事》:"那正是西安事变的后几天,一向沉默的老诗人却开口了。他上我们的'毛诗'课,他打破了历来讲堂上不胡扯瞎谈的板正态度,而暴怒如雷的走上一院二号教室的讲台。他放下了讲义,便横眉怒目的扫视全堂一遍,接着像大雷雨似的向我们问:'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他扫视过全堂,怒目直射,一如一个受冤屈者当着损害他的人怒声控诉一样,接着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再退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他严厉责问着台下的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顿了好久,方才接下去:'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宇宙风》第147、148期合刊,1947.3.1)

刘钢在《略论闻一多先生》中亦云:"甚至一二·九的风暴,也未能在诗人的心上激起应有的波纹,西安事变发生了,严重的局面,逼人而来,闻先生才逼得发声

了。可是他不责备张杨，也不责备专心内战、媚敌祸国的集团，他责备北平的学生，说是由于他们的救亡活动，引起了西安事变，以致领袖陷于险境，国家也陷于险境。"(《新华日报》，1946.8.20)

先生和许多人一样，没有料到西安事变后来会和平解决，此事给他的印象极深，多年后提起这一事件，对共产党还赞不绝口。王康《闻一多传》记载先生后来说过的话："这个事件的结局，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无论从古今中外那一个时代的政治斗争来说，蒋介石'双十二'夜里不死于兵变，也一定要被判死刑。结果竟然是安然无恙回返南京，依然当他的委员长！这种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事情，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像这样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呵！那时尽管我是不问政治的，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总不能不关心它的结局呵，这事情给我的印象是太深刻了！"(第174页)

十二月十六日　下午八时半，清华大学在后工字厅召开教授会临时会议，先生早早到会，第一个在签名簿上签名。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清华教授担心影响前线将士军心，由赵访熊、金岳霖、李谟炽、吴有训、彭光钦、任之恭、陈之迈七教授申请召开教授会，讨论致电绥远将士鼓励抗战问题。会上议题围绕"本校教授会对绥远抗战将士应如何表示鼓励"，议决："一、以教授会名义分电太原阎(锡山)主任、绥远傅(作义)主席；二、电稿由昨日本会所举之七人委员会起草，并请陈之迈先生参加起草。"先生参与起草的电文如下：

> 太原阎主任、绥远傅主席钧鉴，并转前线各军师旅团长暨全体将士公鉴：绥北战事，我军连捷，曷胜庆幸。西安变乱，举国已一致声讨，想不久即可救平，务望本原定御侮计划继续进行，国家幸甚。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叩。铣。

十八日，阎锡山自太原复电清华大学教授会，云："铣电诵悉，西安事变断不至影响绥战，山守土有责，自当督饬前方将士继续御侮，冀纾远系。特复。阎锡山。篠。机。"(以上均据《教授会会议记录》及所存原件，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一九三七年　三十九岁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七月十六日，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开幕。十七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七月二十八日，北平陷落。八月一日，天津陷落。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

八月二十一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史称“平型关大捷”。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次年八月，国民政府驻汉口各行政机关全部迁移重庆。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扶持王克敏等人在北京组建临时政府。

一月三日　到熊佛西、朱君允家吃午饭。在座有胡适、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赵太侔、顾毓琇等朋友。时罗隆基受宋哲元之约，主办《北平晨报》。（据《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20页，中华书局1985年1月出版）

约在这前后，一次梁实秋、罗隆基到清华大学看望先生，先生对罗隆基舞文弄墨很不以为然。梁实秋《谈闻一多》：“我是二十三年夏离开青岛到北京大学来教书的。清华远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见面次数不多。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陆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怒然心伤的，罗努生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于安内攘外之义多所敷陈。一多此际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骛，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罗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

'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情绪很不愉快。我提起这一件事，是为说明在抗战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第 103 至 104 页）

一月十三日　访朱自清，谈及《语言与文学》发刊的事情。（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 145 页）

一月二十四日　约朱自清至平安剧院观看话剧《进取》。（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9 卷，第 452 页）

是月　《诗经新义》（二南）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收《闻一多全集》。释字词：好，覃，诞，汙，夭夭，肃肃，干、翰，游，楚，枚，麟，角，素丝，纰、沱、差池、柅，缝，摽，今，堑、溉、介，谓，抱，命，汜、沚，处、嬴、鼠，唐棣、帷裳、常棣、维常，共二十三节。

同刊同期还发表有王力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注中有引先生见解数处，文末"附言"云："本文写成后，承闻一多、朱佩弦两先生为阅一过，各有所是正，谨此志谢。"

同刊同期又有中文系学生彭丽天的《乐府诗集古辞校正》，文中亦引先生释意数处，文末"附言"云："本篇写成，得闻先生指正极多，谨此致谢。"

初，《清华学报》设编辑多人，上年曾增至四十四人。自十二卷起，编辑调整，仅存六人，以朱自清为主任，先生与冯友兰、陈铨、雷海宗、潘光旦、萧公权为编辑。

是月　在艺专课堂上谈到学生从军问题。时，日寇谋我益深，多有倡议学生从军者，先生对艺专同学说："有人倡议学生从军抗日，但是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士兵的价值，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才对。"（郭良夫《因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学林漫录》第 11 集，第 7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 8 月出版）

二月十七日　清华大学注册部第四〇五号《通告》，准先生"所授唐诗一学程自即日起改为星期三晚七时至九时，及星期五第五时仍在原教室上课"。（《清华大学校刊》第 814 号，1937.2.18）

是月　日人寺内声称决心将清华园改为永久的大兵营。先生与清华师生怒目以视。美国驻华大使馆亦表示抗议，日本驻华使馆诡称不再侵占清华园。

是年春　中文系研究生张清常在联欢会上演奏了他创作的曲子《杨柳春风》，先生听后有两点建议。张清常回忆："闻先生说：我有两点意见。首先，搞文艺创作，民族风格是重要的。这是作者能否成功，作品能否流传的关键之一。其次，你们年轻人在春天里抒写欢乐的情怀是令人高兴的，但不要忘记还有严冬，还有劲松。写一篇《杨柳春风》固然不简单，写一篇《严冬劲松》可就更难了。文艺创作是

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张清常给编者的信，1988.8.10）

四月六日 为彭丽天诗集《晨夜诗庋》作跋。该诗集于本月出版，先生为发行人。诗集分上、下两篇，上篇收诗十九首，下篇收一首童话诗《一个旧传的故事》和一篇诗剧《庞琪》。先生《跋》中说“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又说“这是我对新诗最后一次插嘴的义务”。全文如下：

> 这是一个人六年中的成绩，其间也并未以全副精力费在这上面，但这里有独到的风格，有种种崭新的尝试。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这里有着的几条蹊径，似乎都未经人涉足。正因旁人不走，道上许太嫌冷落，所以这本书的出世，才需要我来凑凑热闹，说得郑重点，便是作个介绍。然而奇怪为什么作介绍的乃是一个对走任何道都无兴趣的人呢？说来却是一段因缘。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总算是因为我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不料把他（还有不少别的人）邀到了那里之后，我自己却抽身逃了。我之变节，虽有我的理由，但想起这些朋友们，总不免感着一种负心的惭愧。现在丽天愿意将已往的收获印出以告一段落，便为替自己赎罪计，我也不能不趁此说几句话。也许这是我对新诗最后一次插嘴的义务罢！

四月十五日 出席清华大学二十六周年纪念会，胡适在会上讲《中国近代考证学的来历》。

五月六日 向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建议邀请郭沫若来校任教。朱自清日记：“冯告以闻君意见。为商谈聘任郭沫若事，尚未做决定。闻直接向冯提出此请求，令余惊异。然尚不知是否为正式请求。”（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66页）

五月七日 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报告安阳[①]之行的观感。报告中，先生对学校不重视中文系表示不满。朱自清日记云：“中国文学会开会，闻一多做安阳旅行印象之发言。他从我系不受重视，经费又少说起。他发言后，我说我系经费较他系还多些，但闻坚持认为我系应该发展，我告诉他其他一些系近年来也无发展。”（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66页）

五月十三日 《语言与文学》编辑委员会在先生家开会。不知什么原因，谈到一年级课程设置问题。朱自清在日记中写到：“会后，一多表示反对一年级的课程设置，甚至争论说中文系学生不必上外文课。”（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67页）

五月十六日 孙毓棠在《大公报·文艺》第三三六期“诗歌特刊”上发表《我怎

① 原文作南阳，似误。

样写〈宝马〉》，讲述这首长诗的创作过程。内是说到写作动因时说："这首诗写成虽然仅仅用了十几天工夫，然而蓄意远在三年以前。三年前有一天接到闻一多先生的信，叫我偷闲写篇叙事诗试试看。后来见面，一多先生劝我拿走李陵的故事做底，但我总组织不起来，我自己选定了这李广利的故事，……写完后自知依然是失败，虽是幼稚畸形的流产，但我仍该感谢一多先生当年的鼓励。"

五月三十日　先生因即将提出休假申请，故向朱自清提交拟聘研究助理计划。朱自清日记云："了一（王力）与一多提交拟聘研究助理之计划。此一难题也。"（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69页）

是月　《释朱》发表于燕京大学国文学会编印之《文学年报》第三期。收《闻一多全集》。这是一篇考证文章，共分五节：一、何谓"赤心"；二、汉魏人及许君用"赤心"之义；三、朱有刺义；四、朱为何木；五、朱木与朱色。

六月十四日　上午十时，至工字厅，出席清华大学教授会议，审查毕业生成绩。时研究院应毕业二十七人，但合格者仅四人，主席提请教授会注意。（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次日，本届毕业生在工字厅举行毕业典礼。

六月十九日　清华大学第一二八次评议会议议决，批准先生于一九三七年度在国内休假研究一年。（据《清华大学教师休假出国研究计划休假教师名单及来往函件》，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按照清华大学规定，服务时间满五年之教授，可有一年休假，或出国研究考察，或在国内研究。是年休假教授除先生和叶企荪、俞平伯外，均出国研究，先生则决定留在学校着手编纂《诗经字典》的工作，并已与朱自清商定，聘请中文系本年毕业生毕铎担任此项工作的助理。（据朱自清致梅贻琦、冯友兰信，1937.6.22，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二十八日　朱自清访先生，遇梁宗岱，先生劝梁宗岱停止人身攻击。（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72页）

是月底　臧克家自青岛来北平，到清华园探望先生。先生对他谈到自己的工作和陈梦家的学术研究。臧克家在《我的老师闻一多》中记述到："六月底的一天，我到清华园去看闻先生。他住着一方楼[①]，一个小庭院，四边草色青青，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唔！'他把笔一扔，站了起来，有点惊喜的样子。他把一支烟送给我，还是红锡包。'你看我现在又在搞这一套了。'还是那样的大本子，大本子抄的不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我在弄诗经、楚辞、史前史，牵连到的一些神话，我也很有兴趣'。

① 此处记忆有误，先生住的是平房，不是楼房。

'写过诗吗?''完全成了门外汉,朋友们的东西,你们,[卞]之琳,还常读一读'。'想看梦家吗? 他离这儿不远',说着就要去抓电话机。'不,闻先生,有病人在医院里,再一天来,还想约闻先生一同到街去摄一张影。''好的,那么你随便什么时候来吧。''你知道梦家成了重要的考古学家了吗?'忽然,他大有意味的笑着说,'各地发掘的古董,多半邀请他去鉴别呢'。'他很有才气,一转向,就可以得到成功'。'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来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磨得又尖锐又精炼了。'"(《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 140 页)

先生对陈梦家钻研考古很是赞赏,曾在梁实秋面前称赞他。梁实秋《谈闻一多》:"他的学生陈梦家已由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颇有发明,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多甚为激赏,曾屡次对我说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要算一个成功的例子。我想他们师生二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必定甚大。"(第 103 页)

是月 由先生主编、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出版的《语言与文学》创刊。

《释省徂(契文疏证之一)》发表于《语言与文学》创刊号。收《闻一多全集》。文章谓:诸家对卜辞中"省"、"徂"二字之义训,"虽皆导源于省视,然亦有去本义略远者,诸家未之深究,故其说此字,多未得其环中。"先生则"就诸辞中出省徂二字而文义复稍完具者五十余例,比类观之,定其义训,证诸彝器经传,有确信而无可疑者三事焉,述之如次",即"一曰省,巡视也","二曰省,田猎也","三曰徂,征伐也"。并进一步论述说:

> 一字含有三义,正为古者三事总为一事之证。上世地旷人稀,林菁邃密,封豕长蛇,出没无常,故民罕远行,行必结徒侣,备器械,且行且猎,既以自卫,兼利其皮肉角齿之属,以为衣食日用之资也。后世人君出游,省视四方,谓之巡狩,明行不空行,有行必有狩矣。游猎所届,或侵入邻境,猎弋之事,即同于劫掠(山林所有,皆民生所资,故不容异族捕取),于是争端即肇,战事生焉。故游田与战争,亦不分二事。典籍所载,司马之职,掌兵事,亦掌田事,禡祷之祭,为田祭,亦为兵祭,并其明验。后世儒者,不明其故,辄曲为之说,惟《易·明夷》"明夷于南狩",王注曰"狩者征伐之类",斯为一语破的。

在《语言与文学》创刊号上还有孙作云的《九歌非民歌说》。孙文在征引《九歌》之文时,排序首列《东皇太一》,次为《东君》,《河伯》置于第六。对此,孙注云:"今本《九歌》次第《东君》在《河伯》前,从闻师一多改订,移置于此。"孙作云文不赞成东汉王逸在《九歌序》中称《九歌》出于民歌和有思君忧国之意的解释,也不赞成胡适、陆侃如、游国恩、容肇祖强调《九歌》是民歌的见解,而"以为《九歌》是楚国国家祭祀的乐章,与平民无关"。孙的这一学术意见,曾与先生做过商榷。

是月　《释为释豕》发表于《考古》第六期。收《闻一多全集》。这也是卜辞研究的成果之一。

是年暑假　开始为编纂诗经字典做准备。

胞弟闻家驷在北平辅仁大学觅得正式教职，利用假期回武昌接眷属。先生的夫人高孝贞也带着立鹤、立雕与闻家驷同行回武昌探亲。

七月七日　日军借口一士兵失踪，炮轰我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

先生听到枪声，起初以为是军事演习。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不过是中日间的局部冲突，不久就会经过调解而平息。

约在这之前，有信致林斯德。信中有"清华教书五年有一年休假，不想出国讲学，拟回湖北老家读书。届时道经上海，我们可以见面了"，"局势莫测，许多藏书无法处置，将来只好不了了之"等语。（据林斯德给编者的信，1986.7.14）

七月八日　《文学月刊》助理常风从城里来，向先生约稿。先生答应第六期（十月号）一定给文章，题目是《唐朝的宫体诗》。（常风《一个知识阶级的心理演变》，天津《大公报》，1945.12.16）《文学月刊》是年五月创刊，因卢沟桥事变停刊。

七月十四日　出席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教务长潘光旦在工字厅召集之教授谈话会。会上，沈履报告连日来谒见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等所取消息，大致日军决意吞并华北，大战即在目前，二十九军决志牺牲。

七月十五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述及应付紧张局势的措施，又说准备动身南下和一周来不平静的生活：

> 现在计划是有了，要走，三天内一定动身，再过四五天就可到家。……写到此处，又有人来电话报告，消息确乎和缓了，为"家"设想，倒也罢，虽然为"国"设想，恐非幸事。……反正时局在一个月内必见分晓，如果太平，一个月内我们必回来，否则发生大战，大家和天倒，一切都谈不到了。……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小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只好满处找人打听消息，结果你一嘴，我一嘴，好消息和坏消息抵消了，等于没有打听。够了，我的牢骚发完了，只盼望平汉一通车，你们就上车，叫我好早些卸下做母亲的责任。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比女人的心还要软。

同日，彭丽天、孙作云相继来访，谈的都是关于离开北平的事。

是日，为应不测，清华大学提前发薪。

七月十六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妻子离去后的孤独感："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

七月十九日 带着立鹏、闻名、闻翻和女佣赵妈(厨师赵秀亭的妻子)，一起由津浦铁路南下(时京汉路已不通车了)，经南京再抵武汉。

这些天，时局极为紧张。十一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宣布香月清司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十五日，日本政府增调陆军十五万人来华。十六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四十万军队，扩大侵华战争，致使北平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十八日深夜二时许，突然枪声大作，令人惊恐。于是先生匆匆决定离平返鄂，却未想到竟是永别古都。行时仓促，家中细软包括妻子陪嫁首饰全扔在清华园，仅带了两部书：《三代吉金文存》和《殷虚书契前编》。

在正阳门火车站，碰见送姐姐回东北的张春风同学，先生说："昨天我都没有走的意思，今天我才突然有个必须走的念头。"(张春风《闻一多先生二三事》，《宇宙风》第147、148期合刊，1947.3.1) 又见到了臧克家。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回忆到："七月十九号我离开了北平，在车站上碰到了一多先生，他带着家眷和一点随身的东西。'闻先生那些书籍呢？''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了什么？'他很感慨，我很难过。在天津换车，人向车上挤，像沉在水里争着一个把手。我从窗子里爬了进去。闻先生凭了一个红帽子的帮忙，全家安然登车，他一下给了那个人五元一张的钞票。"(《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141页)

在天津火车站，先生买了份报纸，上面刊登着蒋介石在庐山邀请著名教授和社会名人商讨国事的谈话情况。先生感到这些谈话离现实距离太远，但仍受到些安慰，相信会出现全国抗战的局面。时，潘光旦、罗隆基、梁实秋、浦薛凤等先生的朋友，都出席了庐山会议。

是月 《释  》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三期。收《闻一多全集》。这是一篇考释古文字的文章。该字是古铜器上的铭识之字，宋代有人释作"子孙"，近人罗振玉释为"子黾"，郭沫若释为"天黾"，孙海波释为"大黾"。先生引弟龟鼎、鼒父丙鼎、黾父辛卣、豦父甲斝、奎鼎、秦汧阳刻石、邵黛钟、临虞高宫镫、秦公殷等彝器刻石文字相较，从文字形状、声韵入手，考证出该字当作奄、窻。结论处云："虽然，谓

竄奄二字通用则可，谓竄即奄字则不可。金文竄字从穴，而义复为函盖，以意逆之，当为庵之别构，经典作奄，则庵之省。《说文》无庵字，许君盖以奄为庵，故训覆，引申为大，为久。至奄字本作𡍮，从大从鼋，大即人，乃国族名，省变为奄，又加邑作鄎，《说文·邑部》'鄎，周公所诛鄎国，在鲁'是矣。郭氏知𡍮为氏族，此其特识突过前人，至读为'天鼋'二字，则尚无确证。孙氏读为'大黿'，古国族未见有称大黿者，引谷名为证，亦近牵合，故亦不敢苟同。"文末又有补铭文四十九字，因文成不及录入，附记于后。

本文发表后，先生因南迁而暂时中止古文字研究，致使其他文字疏证未能发表。《全集》中所收《释龢》、《释余》、《释羔》、《释桑(附释嫽释曒)》、《释噩》、《释不》、《大丰敦考释》、《禺邗王壺跋》等，多为编纂者据手稿整理录入。

八月九日　在武汉致赵秀亭信。赵秀亭为先生家司厨，为人忠厚干练，其妻李氏人称赵妈，已随先生南下。时，赵秀亭留在清华园看守房屋，先生信中嘱其将一些季节性衣物寄武汉。十四日，日军进驻清华园之人增至三千，并将校外住宅区强行占去，虽经美国驻华使馆数度交涉，均无效。赵秀亭无奈，只得离开清华园，回燕京大学东门外的喜羊胡同五号自己的家，先生书籍、财物损失殆尽。

是月　相继南下的师生，不断有人到武昌磨石街新二十五号先生家中探望。赵俪生回忆："八月，我和王逊一同在武昌去见先生，当时先生住在有很窄、很长天井的院里，正面有二层小楼，先生就在小楼上接待我们。后来发了警报，我们匆匆告辞，先生还固执地送下楼，送到门口。"(赵俪生给编者的信，1986.11.13)

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王达仁来看望时，先生关心地问他"民先"队员是否都出来了。王达津回忆："大概是那年九、十月间吧，我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一个已无家可归的学生。我的哥哥也从北平逃出，他带着我曾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去看望闻先生。他是清华毕业生，一二·九运动时候曾担任过清华学生会主席，所以和闻先生相熟，在逃出来之后特别去探望他。我们一进闻先生住的磨石街的书厅里，就看到先生坐在那里，高兴地让我们坐下。书厅稍为阴暗，但我注意先生，他已经是面庞较清瘦，鬚鬚有须了。我已不记得都谈了些什么，可是我记得先生曾问民先的同学都跑出来了没有？"(《闻一多先生与楚辞》，《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就是这次，王达仁对王达津说，先生曾积极支持他们去慰问抗日的吉鸿昌部队。(据访问王达津记录，1986.10.7)

卞之琳也来探望过，说"只见他还是埋在古书堆里"。(卞之琳《完成与开端》，《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13页)

是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长沙临

时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杨振声、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顾毓琇任筹备委员，三校校长任常委，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任秘书主任。

九月十日 致孙作云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

> 舍侄已到家，得悉你的情形。今由中国银行汇来国币三十元，共六十一元五角。请你将我的书籍搬到你寓中暂存，其中一部分请由邮局寄下。校中金甲文书在我处者甚多，万一遗失，殊觉可惜，请你也搬来，开一目录，交朱佩弦先生。此类如钱敷用，亦可尽量寄来。但书目及邮局挂号凭单，邮费帐目等，务须一一交朱先生保存。我前于南归时，只携来《三代吉金文存》及《殷虚书契前编》二种。家居无事，已着手编金文分类目录，获益不少。

信中开列的请寄到武昌的书籍目录为：各种子书、周礼正义、全上古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说文义证、说文通训定声、毛诗传笺通释、王忠悫遗书、古逸丛书、汉书补注、小学汇函、方言笺疏、山海经笺证。

是年秋 在武汉为侄女闻立珠做主婚人。黄秋耘回忆："在风声鹤唳的警报声中，我参加过一次'奇异的婚礼'。那是一天傍晚，在武昌一家大酒楼上举行的。新郎陈文鉴君是闻一多先生的外甥，新娘闻立珠女士是闻一多先生的侄女，主婚人就是闻一多先生。婚礼刚刚开始，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就响起来了。电灯熄灭了，参加婚礼的客人正想躲避到防空洞里去，闻一多先生却以主婚人的身份在黑暗中高声宣布：婚礼乃人生的大事，不能因为小日本骚扰一下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他继续致辞，婚礼也继续举行下去。幸而过了不多久就解除了警报。电灯复明，大家依次入席。"（《风雨年华》，第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是年秋 在武汉，与家里人议论形势，认为抗战还得靠蒋介石。先生的侄子黎智（闻立志）回忆说：抗战初期，先生"从北平回到武汉我们家里，那时我们年龄都很小，我祖父、伯父、叔父他们大人常常一起谈话，忧虑国事。我记得有一次，听他对几个伯父、叔父们讲，抗战啦，还得靠蒋委员长，第一蒋委员长势力比较大，第二他是正统。他那时对共产党并没有什么认识……他把抗击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了，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闻一多〉电视连续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谈话》，《黎智纪念集》，第512至513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十月二日 晨，朱自清抵汉口当天便渡江到武昌磨石街探望先生。先生请朱自清及王先生至华东饭店晚餐。（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88页）

十月十三日 朱自清接先生信，信中推荐燕京大学陈梦家来清华大学中文系

任教。（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90页）

十月十五日　朱自清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请求先生展缓休假。信中云："闻一多先生原定国内休假，现因教授南下者不多，拟请其展缓休假一年，来临大任课。如蒙同意，请即函知闻先生。……其通信处为：武昌磨石街新二十五号。"又云："中国文学系助教毕铎，原定帮助闻先生于休假期中进行诗经字典工作。现拟请闻先生延缓休假，拟即去信请其不必南来。"梅贻琦办事慎重，批示中特写明"应函闻先生"，似有先征得先生同意之意。朱自清信中还谈及聘请陈梦家事，云："临时大学尚缺文字学教员一人，拟由清华聘陈梦家先生为教员，薪额一百二十元，担任此类功课。陈君系东南大学卒业，在燕大国学研究院研究二年，并曾在该校任教一年。其所发表关于古文字学及古史之论文，分见于本校及燕大学报，甚为前辈所重。聘请陈君，不独可应临时大学文字学教员之需要，并可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此言当亦是先生之意见。（《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后，清华大学聘请陈梦家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员，时间从十月一日算起。

十月二十日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致先生快信，请先生推迟休假一年。信云："一多先生大鉴：敬启者：本校现在长沙加入临时大学合组授课，已定于十一月一日正式上课。查先生原定本年度国内休假，从事研究，唯现以此间中国文学系教授南来者不多，拟请台从展延休假一年，前来临大任课，以利教务，敬希察允。尊驾何日莅湘，并乞赐示，至为跂盼。专此，敬颂　教祺。"（《教师申请休假出国或在国内研究的来往函件》，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先生接到信后，立即放弃休假动身赴长沙。

十月二十二日　晚十一时半，到长沙。朱自清亲到火车站迎接。时，因来长沙教师不多，拟停止开设汉语语音课，先生反对之。朱自清日记云："一多拍电报给我，要求今晚有人去火车站接他，我亲往迎接。我们谈及课程，尽管向他陈述了困难，他还是不同意不开汉语语音课。"（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92页）

是夜，住处安顿好，即给妻子写信。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九月份薪金可发七成"。

十月二十四日　朱自清就清华运出的图书是否在汉口拆包事，征求先生意见，先生表示反对。（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93页）

十月二十五日　下午，与朱自清至下麻园岭访冯友兰、陈岱孙。由朱自清作东，在青年会晚餐。（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93页）

十月二十六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在长沙的生活和对家人的思念：

出门快一星期了，尚未接家信，这是什么道理？若不是小小妹病使我担心，有没有信倒无关系。明信片上我已经写好了住址，只要填上几句话就行了。何以忙到这样？鹤、雕两人就忘记我了吗？到这里来，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享福。早上起来，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几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加上这样一日三餐是在大食堂里吃的，所以开饭时间一过了，就没有吃的。先来的人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小厨房，吃得当然好点，但现在人数已满，我来迟了，加入不了。至于茶水更不必提了。公共的地方预备了几瓶开水，一壶粗茶，渴了就对一点灌一杯，但常常不是没有开水就是没有茶。自己未尝不想买一个茶壶和热水瓶，但买来了也没有用，因为并没有人给你送开水来。再过一星期（十一月三日）还到衡山上去。到那里情形或者好一点，因为那边人数少些，一切当然容易弄得有秩序点。但是也难说。我述了这种情形并非诉苦，因为来到这里，饭量并未减少，并且这样度着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听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还自己洗手巾、袜子，我也在照办。讲到袜子，那双旧的，你为什么不给我补补再放进箱子里？我自己洗袜子是会的，补却不会。

十月二十七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说："小小妹未取名，可名叫'湘'，以纪念我这次离开，特别想念她。"后，小小妹取名单字"翻"。

十月二十八日　结识孙望先生。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先生在长沙，由朱自清先生介绍，与孙望先生晤谈研究唐诗问题。时先生正从事《唐诗人登第年代考》和《唐诗人生卒年代考》的著作。"（《闻朱年谱》，第33页）

十月二十九日　为孙望写《张旭年考》一则。未入集。时，日寇肆虐，沪战中攻陷我大场之翌日。

十一月一日　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此后西南联合大学以这天为校庆纪念日。因长沙校舍不敷，临大文学院决定设于南岳，所以上课较迟。

同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有"薪水本可以领到七成，合得实数二百八十元。但九十两月扣救国公债四十元，所以只能得二百四十元"。

十一月二日　早，有信给立鹤、立雕两儿。收《闻一多书信选集》。问及身体和学习，又说："昨天这里有过一次警报，但敌机并未来"，"我明天搬到衡山上去，衡山又名南岳"，"离长沙一百余里，汽车行三四小时，那边决无空袭的危险"。

同日　下午，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问及家中情况如何，说："家中一切的事，不管大小，或是你们心里想的事，都可以告诉我，愈详细愈好。"先生离家

时，幼女正在患病，先生放心不下，特别叮嘱买些补养品如鱼肝油等。

十一月三日　雨中乘车赴南岳，同行者有柳无忌、朱自清、陈梦家、叶公超、罗皑岚、金岳霖、冯友兰、罗廷光、吴俊升、周先庚和英籍教授燕卜荪等。（据柳无忌《南岳日记》，《柳无忌散文选》，第89页）

先生这次在长沙只住了十天。后来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际戡笔录）中回忆这段情况时说：

> 说到联大的历史和演变，我们应追溯到长沙临时大学的一段生活。最初，师生们陆续由北平跑出，到长沙聚齐，住在圣经学校里，大家的情绪只是兴奋而已。记得教授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大家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有时一个同事新从北方来到，大家更是兴奋的听他的逃难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最后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那时我们甚至今天还不大知道明天要做甚么事。因为学校虽然天天在筹备开学，我们自己多数人心里却怀着另外一个幻想。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自然我们自己也不是例外。于是我们有的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理便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联大八年》，第3页）

在南岳，长沙临时大学租用了衡山角下属于长沙圣经学校的房子作为文学院校舍。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描写到："这座校舍正在南岳衡山的脚下，背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之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在这里，教师同住在一座楼上。楼在山坡上，每次到饭厅吃饭，要上下爬二三十[百]级台阶。大家都展开了工作。汤用彤先生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空气非常浓厚。"（第99页，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这里风景十分优美，住所高居小山坡上，下望溪谷，仰视丛林密布的群山，仿佛是抗战炮火中的世外桃源。

先生在南岳开始研究《周易》，后来在昆明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住的时候，汤用彤也常来和先生一起讨论《周易》里的问题。（据朱自清《闻一多全集·

编后记》）

十一月八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南岳的生活，自然比过去艰苦多了：

> 原来希望到南岳来，饮食可以好点，谁知道比长沙还不如。还是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茶。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记得在家时，你常说我到长沙吃好的，你不知道比起我来，你们在家里的人是天天过年！不过还有一线希望。现在是包饭，将来打算换个厨子，由我们自己管账，或者要好点。今天和孙国华（清华同事，住北院）上街，共吃了廿个饺子，一盘炒鸡蛋，一碗豆腐汤，总算开了荤。至于住的地方，是在衡山上的一所洋房子，但这房子是外国人夏天避暑住的，冬天则从无人住过。前晚起风，我通夜未睡着。有的房间，窗子吹掉了，阳台上的栏杆吹歪了。湖南一年四季下雨（所以湖南出雨伞），而这山上的雨尤多。我们到这里快一个星期了，今天才看见太阳。总之，我们这里并不享福。

同日 又给立鹤、立雕、立鹏、闻名四个孩子写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南岳住的房子和该处的景色：

>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曾经蒋委员长住过，但这房子并不好，冬天尤其不好。这窗子外面有两扇窗门，是木板做的，刮起风来，劈劈拍拍打的响声很大，打一下，楼板就震动一下，天花板的泥土随着往下掉一块。假使夜间你们住在这样一间的房子，而且房里是点着煤油灯，你们怕不怕？这就是现在我所住的房子。但是这里风景却好极了。最有趣的是前天下大雨，我们站在阳台上，望着望着一朵云彩在我们对面，越来越近，一会儿从我们身边飘过去，钻进窗子到屋子里去了。中国古时，管五座大山叫五岳，中岳嵩山在河南，东岳泰山在山东，北岳恒山在山西，西岳华山在陕西，南岳衡山在湖南，就是我现在所住的这地方。古人说游山若游遍五岳，便足以自豪。我从前游过泰山，现在又住在衡山上，五岳中总算游了两岳。

十一月九日 与朱自清、吴达元、杨业治游南台寺、福严寺，登临绝顶，在魔囚台远眺。又攀试心石、祝融峰，晚在上林寺休息。次日参观藏经殿，午在福严寺用餐。（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496页）

十一月十六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我这里一切都好，饮食近也改良了。自公超来，天天也有热茶喝，因他有一个洋油炉子。"

十一月十八日 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正式开课。先生讲授"诗经"、"楚

辞”两门功课，各课均为四学分。（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第一次上课，先生做的是安定人心的谈话，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闻一多师原是清华中文系的教授，这时开‘诗经’和‘楚辞’两门课程。我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这时是第一次听闻先生讲课。那时抗战初起，人心浮动，很多同学都直接参加抗战去了，有的来了几天又走了，留下来的也很不安心。记得闻一多师第一堂课就做了一次安定人心的谈话。他说，看来这次抗战，不是短期间可以获胜的，救国要有分工，直接参加抗战，固然很需要，学习本领，积蓄力量，为将来的抗战和建国献身也很必要。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和志趣，迅速决定去留。留下来就要安心学习，不安心学习是不好的。他的话虽简短，但很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275 页）

这时共到教授十九人，柳无忌在日记中有一首古诗，即记这些人，甚有风趣：

冯阑雅趣竟如何（冯友兰）
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
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
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

鼎沈洛水是耶非（沈有鼎）
秉璧犹能完璧归（郑秉璧）
养仕三千江上浦（浦江清）
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

从容先着祖生鞭（容肇祖）
未达元希扫虏烟（吴达元）
晓梦醒来身在楚（孙晓梦）
皑岚依旧听鸣泉（罗皑岚）

久旱苍生望岳霖（金岳霖）
谁能济世与寿民（刘寿民）
汉家重见王业治（杨业治）
堂前燕子亦卜苏（燕卜荪）

（上绝冯友兰作）

卜得先甲与先庚(周先庚)
大家有喜报俊升(吴俊升)
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廷光)
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我们的宿舍)

(《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茹吹弦诵情弥切》第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

十一月二十四日 日机轰炸长沙的消息传到南岳,先生与同事都为之不安,暗祷朋友平安,亦盼南岳无恙。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国民政府迁重庆,我就想到武昌不是很安全的地方,省寓或要迁回乡去。如果他们都搬,你当然也搬。不过目下我想还不要紧,回乡过年,或是一个办法。我胃病有好久未发,这两天又差一点,恐系坐得太夜的缘故。"时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武汉局势不稳,先生为家眷的安全担心。

十二月一日 先生到长沙后,曾与冯友兰、朱自清商议出版《清华学报》事。是日,清华大学在下麻园岭本校办公处召开南迁后第七次校务会议,专门讨论此事,结果议决:"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三先生提议继续出版《清华学报》一案,应稍缓再行讨论。"(《校务会议记录与部分提案材料》,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时,战事方起,校务纷繁,除教学外,其余均暂时停顿。

十二月十一日 给长子立鹤写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述及家庭生活情形,可知先生一家在动荡局势下之一斑:

> 汝母四日及汝三日所写之信,今已收到。我在此间有许久未见报纸,故武汉情形,完全不知。近数日来始稍得消息,闻武汉人心颇恐慌,政府并且劝令人民搬下乡去。似此情形,则汝等自宜早些回乡为妙。伯伯、三伯叫你们回去,必因你们人口甚多,而且都是妇孺,万一时局更紧张起来,定难照顾。至于他们两房不但人少,而且差不多都是大人,所以比较不要紧。十月份薪水条子,昨日才寄到。但我又已经将图章交给叶(公超)先生,托他在长沙去领去了。我曾托叶先生代寄一百元回来,如果他能领得现款,想不久你们定可收到。这次仍旧是寄给三伯代收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已经刻了图章。这一百元中应给外祖母二十元,还细叔二十元,算起来所余并不多,汝可告汝母减省点用,因为这次发了薪水,下次不知道又要等到何时才能发下。近来我军战事不利,我们人民真正的难关快要来到,我们都应该准备吃苦才对。你同你母亲都不愿回乡,这是不对的。你们回乡,不但生命可以安全,使我放心,并且可以省些用度。

我看，一等钱寄到，你们便应回去。目前不妨把东西陆续收拾起来。学校定明年一月三十一日起，放寒假一星期，届时我回来看你们，再请假一星期，在家中多住几天。雕儿功课太坏，我很担心。或者回乡去有祖父监督着，还可以多做点功课。总之回乡以后，你们不至有什么不方便，一切的事，你们可向祖父说，祖父自然会有安顿。至于我在这里生活现在很好，饮食及一切都改良了，现在我并不吃苦，你们可以放心。下回发薪水，我就寄到乡下去，外祖母的钱，我直接寄到他们家里去。他们的门牌我忘记了，下次你写信来，务必告诉我。汝母脚痛，至今未愈，我很忧虑，应找医生吃点药，千万不可大意。脚冻了，则最好天天用热水洗一次，棉鞋还要大些厚些，便自然会好。乡下空气较好，房屋较大，易得阳光，你们回乡身体应该好些。这也是我要你们回去的一种理由。你渐渐能懂事了，并能写信，我很快乐。从此你更应用心读书写字，并带领弟妹们用功。如此，你便真是我的好儿子。下次叫雕写信来，看他有进步否。

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沦陷。武汉吃紧。日机空袭长沙日见频繁。约在这前后，长沙临时大学当局又计划再次搬迁，地点经数次寻觅，确定为昆明。但许多同学对这种远离抗战前线的搬迁决定，持有异议。中国共产党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同志，特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反对西迁，但西迁的大局已定。

十二月十五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清华职员张健夫回武昌，托他带回书箱一只，望带回乡下妥为保存，内有金文甲骨文书各一部，均甚贵重，又有一部分手稿，更无价值可言。"

又谈到对孩子的教育："鹤儿来函云彼等如何念我，读之令我心酸。惟此次之信又较前进步，不但词能达意，且甚有曲折，又使我转悲为喜也。回乡后，务令鹤、雕等严格做功课。雕儿玩心大，且脾气乖张，但决非废材，务当遇事劝导，不可怒骂。对朋儿名女，亦当如此。我不在家，教育儿女之责任便在你身上，千万不可大意也。"

十二月十八日　因南来的教师陆续增多，教授宿舍由两人一室改为四人一室，先生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共居。钱穆《师友杂忆》："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亦四人合一室。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 182 页，岳麓书社 1986 年 7 月出版）新居在山下，为小楼，《吴宓日记》亦有记载："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大风雨。是日上午 10－12 偕诸教授移居山下之楼上宿舍。原为中央研究院占用、今半移住往广西。四人一室。宓与沈有鼎、钱穆、闻一多同室。四木床，草荐。二长桌，四煤油小灯。叠箱为置物

处。私厨暂停,与中央研究院同人在楼下一室,另一所房屋。共食。至此宿舍之楼下,即图书馆及教室。宓以楼下厕所至污秽,故每日或间日。仍冒雨登山,至原宿舍旁,山边小亭内之厕所。今日,原宿舍已有军官居住,布置一切。"(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6册,第274页,三联书店1998年3月出版)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问妻子孩子是否已返乡到家,并请父母亲对立鹤、立雕两儿功课严格督责。

是月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讲到在南岳授课,云:"这次所开两门功课,听讲的人数甚多,似乎是此间最大的班,我讲得也很起劲。可惜大局不定,学生不能真正安心听受耳。"

时,常有学生来请教。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我选习了闻一多先生讲授的'诗经'和'楚辞'。我因受他的博而精的讲课所吸引、所感动,曾几次攀登到教学楼后面的山坡上,到教授们居住的小楼去向他质疑问难。他的善于引导和启发的谈话,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更使我敬仰和尊重。"(《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53页)

在南岳,先生曾表示要给家在沦陷区的施忠谊同学经济资助。赵仲邑说:施忠谊是个有着壮志凌云的青年,"他曾有一首歌颂南岳的七律,有两句云'拟通西使他年路,欲摘南天此夜星',在清华中文系读书成绩优异。不幸他浙江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他的哥哥写信告诉他说,全家已逃到山中,以后他读书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希望他继续努力学习,'勿悲,勿馁!'有同学把情况向闻先生反映,希望老师们资助。闻先生说:'我一个帮助他就行了'。"施忠谊考虑到先生子女多,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家庭经济情况也很紧张,便毅然休学北上,参加八路军打游击去了。(《闻一多先生轶闻》,《随笔》第8集,第5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一九三八年　四十岁

一月一日，行政院改组令在汉口发表，陈立夫任教育部长。

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十月迁重庆。

一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由英国商人出资在上海租界创刊。

二月十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在上海出版。

三月二十三日，台儿庄大战开始，四月上旬结束。

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五月四日，文协会报《抗战文艺》创刊。

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七月二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

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扶持梁鸿志等人于南京组建维新政府。

五月一日，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

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

七月四日，国民政府明令规定每年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

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武汉开幕，十五日闭幕。

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

十月十日，天津《益世报》迁昆出版，总编辑罗隆基。该报于次年十一月迁往重庆。

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二十七日，武汉三镇失陷，武汉会战结束。

十一月二十日，长沙大火。

十二月一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发表《编者的话》，在文艺界引起“与抗战无关论”论战。

同日，滇缅公路通车，全长九五八公里。

十二月十九日，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等自昆明飞河内。二十九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的“艳电”。

一月二日 临时大学文学院决定迁回长沙。是日，先生请准假，与同事三人乘蒋梦麟的私人汽车先行到长沙，多数教授则一周后返长沙。

先生这次在南岳的时间很短，却是抗战初期的变动阶段，感受和印象都与往时有很大不同，这些可见于他后来所作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

> 因为长沙圣经学校校舍的限制，我们文学院是指定在南岳上课的。在这里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属于圣经学校的。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们脚下是南岳镇，后面往山里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胜。
>
> 在南岳的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时物价还没有开始跳涨，只是在微微的波动着罢了。记得大前门纸烟涨到两毛钱一包的时候，大家曾考虑到戒烟的办法。南岳是个偏僻地方，报纸要两三天以后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们，我们也就渐渐不大注意世界了，于是在有规则性的上课与逛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来。半辈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暂时的扰动，只能使它表面上起点变化，机会一来，它还是要恢复常态的。
>
> 讲到同学们，我的印象是常有变动，仿佛随时走掉的并不比新来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线参加实际战争去的。但留下的对于功课多数还是很专心的。
>
> 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刚毅的领导，对于这样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甚么话可说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谈到国共问题，大家都以为西安事变虽然业已过去，抗战却并不能把国共双方根本的矛盾彻底解决，只是把它暂时压下去了，这个矛盾将来是可能又现出来的。然则应该如何永久彻底解决这问题呢？这位先生认为英明神圣的领袖，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高智慧，时机来了，他一定会向左靠拢一点，整个国家民族也就会跟着他这样做，那时左右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现在想想，中国的"真命天子"的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当时没有反问这位先生一句："如果领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渊里冲，整个国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样做呢？"
>
> 但这在当时究竟是辽远的事情，当时大家争执得颇为热烈的倒是应否实施战时教育的问题。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

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坏。结果是两派人各行其是，愿意参加战争的上了前线，不愿意的依然留在学校里读书。这一来，学校里的教育便变得更单纯的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与抗战脱节的教育。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并不是全体学生都主张战时教育，而全体教授都主张平时教育，前面说过，教授们也曾经等待过征调，只因征调没有消息，他们才回头来安心教书的。有些人还到南京或武昌去向政府投效过，结果自然都败兴而返。至于在学校里，他们最多的人并不积极反对参加点配合抗战的课程，但一则教育部没有明确的指示，二则学校教育一向与现实生活脱节，要他们炮声一响马上就把教育与现实配合起来，又叫他们如何下手呢？（《联大八年》，第3至4页）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也有一段记述了先生在南岳的生活："有一次在饭厅吃饭，菜太咸，有人说，太咸也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菜。闻一多先生随口用汉儒解经的套子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他还作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这是为了嘲戏哲学系的人而作的。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一副眼罩。郑昕喜欢喝酒。前二句是指他俩人说的。当时吴宓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我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是指此而言。第四句是说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蓍草。我们住的那座楼旁边有棵腊梅。那时腊梅正开，站在楼上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同我又说起吴宓的那一句'红袖'诗，他随口说出了一句诗：'每饭不忘红袖句'，我随口应了一句：'凭栏唯见腊梅花'。"（第100至101页）

离开南岳时，与罗皑岚告别。罗皑岚亦为清华学校毕业生，与朱湘同班，时为南开大学教授，因祖籍湖南，未随校迁滇。分手时，先生手书朱湘诗句，赠与这位被朱湘领上文学道路的学友。罗皑岚《忆朱湘》："记得卢沟桥事变后，长沙临时大学迁滇前夕，与闻一多在南岳分手时，他抄录了《猫诰》中一段诗，赠我作纪念，并深有感慨地说：'朱湘可惜死早了，如今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来鼓舞我们救亡的勇气呵！'"（《二罗一柳忆朱湘》，第23至24页，三联书店1985年4月出版）

一月三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临大全校现又有迁云南昆明之议，并拟自购汽车十辆以供运输之用。男恐西迁之后路途遥远一时不能回家，故决定立即回家一看"，"因不知由汉至巴间之交通情形，故何日到家现尚难卜也。"

同日　晚，动身赴武汉。抵武汉后，见到了刚从长沙临时大学征调到汉口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次长的老友顾毓琇。顾到武昌磨石街先生寓宅，邀先生出山到正

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先生拒绝了。顾毓琇回忆："抗战开始不久，我从长沙临时大学被征调到汉口教育部。那时为了抗战需要，正在筹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作为最高当局的咨询机构。它的工作主要是采纳时贤对战时教育的意见，摘取报章杂志对此问题的主张，加以研究，并将结果交由教育部设法实行。我曾邀一多出来帮忙，他不肯，说今生不愿作官，也不愿离开清华。他说各人志趣不同，却赞成我出来，还说大家都为了抗战，在哪里都一样。"（访问顾毓琇记录，1988.5.11）

当时与先生住在一起的闻立勋回忆："顾毓琇来找他，他不愿意去。后来，又找他到扬子江饭店，是汉口当时第一流的饭店，请了好多清华老同学吃饭、洗澡，谈了一个晚上。一叔回来说：我被包围了一晚上，还是没答应。"（据闻立勋回忆一多叔录音，1980.2，张同霞整理）

此时，一家官方出版社请先生为某书写篇序言，先寄了一笔款子，先生赶紧退了回去。

是月上旬　到浠水老家，住了十多天。

在老家，因不愿到战时教育委员会任职，与妻子意见不合。妻子觉得就任此职可留在武汉，便于照顾全家。但先生想法不同，离家时心情不快。

是月中下旬　由浠水至武汉。有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此次不就教育部事，恐又与你的意见[不合]，我们男人的事业心重，往往如此，你得原谅。"

约此时，与郭沫若初次见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设法离开寄居的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斗争。是年一月中旬，郭沫若到武汉，曾住在戈甲营，先生亲去拜访过，是顾毓琇介绍的。（据闻立勋回忆一多叔录音，1980.2；访问顾毓琇记录，1988.5.11）郭沫若《悼闻一多》："我们相见，平生却只有两回，一回是在抗战初期的汉口，一回是在去年七月我赴苏联时所路过的昆明。"（《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186页）

一月二十六日　致顾毓琇信。原载顾毓琇《怀故友闻一多先生》。信中述及不能应邀的原因。全信为：

> 一樵兄：承嘱之事，盛意可感。惟是弟之所知，仅国学中某一部分，兹事体大，万难胜任。且累年所蓄著述之志，恨不得早日实现。近甫得机会，恐稍纵即逝，将使半生勤劳，一无所成，亦可惜也。老友中惟我辈数人，不甘自弃，时以事业相砥砺，弟个人得兄之鼓励尤多，每用自庆。但我辈作事，亦不必聚在一处，苟各自努力，认清方向，迈进不已，要当殊途同归也。平时渴望朋好中人登台，一旦实现，复嫌帮忙人太少，自不免令兄失望。然上述弟于此事力不

胜任一层，亦是实话，然则直谓我辈中无人材可耳。思念至此，不胜浩叹。今晚仍决赴湘，以后若有其他适当机会，再图效力。惟学校亦是一地盘，仍望兄时时留意，使之充实，庶得与兄方相呼应乎。书此敬候大安。弟多上，一月廿六日。

一月二十九日　抵长沙，知同人已有数批出发赴滇。

一月三十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学生将由公路步行入滇，教职员均取道香港、海防去，校中津贴六十余元，但有多人将此款捐助寒苦学生作津贴，此事系公超发起，我将来恐亦不得不捐出，如此则路费须自己担负矣。"

二月一日　致闻家骥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拟加入步行赴滇旅行团："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职员方面有杨金甫、黄子坚（钰生）、曾昭抡等五六人加入，弟亦拟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校中本拟发给教员路费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则一切费用皆由校备，不知路费是否照发，若仍照发，则此款可以干落矣。"

二月十一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校中迁滇路线有三种，自己本拟步行入滇，又考虑身体状况，拟改乘汽车经桂林至龙州，入安南，再乘火车入云南。"此线用费较多，然除校中津贴六十五元外，自担者想至多不过四五十元耳。借此得一游桂省山水，亦殊不恶也"。

二月十五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这次离家时的情形，心情很不愉快：

> 此次出门来，本不同平常，你们一切都时时在我挂念之中，因此盼望家信之切，自亦与平常不同。然而除三哥为立恕的事，来过两封信外，离家将近一月，未接家中一字。这是什么缘故？出门以前，曾经跟你说过许多话，你难道还没有了解我的苦衷吗？出这样的远门，谁情愿，尤其在这种时候？一个男人在外边奔走，千辛万苦，不外是名与利。名也许是我个人的事，但名是我已经有了的，并且在家里反正有书可读，所以在家里并不妨害我得名。这回出来唯一目的，当然为的是利。讲到利，却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为你我，和你我的儿女。何况所谓利，也并不是什么分外的利，只是求将来得一温饱，和儿女的教育费而已。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还不了解我，那也太不近人情了！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连以前打算离校，或已经离校了的，现在也回来一齐去了。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能做不愿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

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诉去？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第二天他们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个个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我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本来还想嘱咐赵妈几句，索性也不说了。我到母亲那里去的时候，不记得说了些什么话，我难过极了。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母亲这大年纪，披着衣裳坐在床边，父亲和驷弟半夜三更送我出大门，那时你不知道是在睡觉呢还是生气。现在这样久了，自己没有一封信来，也没有叫鹤、雕随便画几个字来。我也常想到，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但是出门的人盼望家信，你能说是过分吗？到昆明须四十余日，那么这四十余日中是无法接到你的信的。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二月十六日 致父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决意步行入滇："前函云乘汽车经桂林赴滇，今因费用过巨之故，仍改偕学生步行。其路程计由长沙至常德一百九十三公里，乘民船；由常德至芷江三百六十一公里，步行；由芷江至晃县六十五公里，汽车；由晃县至贵阳三百九十公里，汽车；由贵阳至永宁一百九十公里，步行；由永宁至平彝二百三十二公里，汽车；由平彝至昆明二百三十七公里，步行。全程约须四十余日。参加者学生将近三百人，教授有黄子坚、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及男等五人，助教五人。学生由张主席[①]派一师长率领，编成若干队，教员则为辅导团，携有医生护士各一人，无线电收音机一架，图书若干箱，伙夫十余人，张主席赠行军用具如水壶、干粮袋、草鞋、裹腿等数百份，猪五只，教厅长朱经农赠猪二只，定十九日启程，此行可称壮举矣。"

二月十九日 有信给次子立雕。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我在家时曾嘱你特别要多写信来，难道我一出门，你们就把我忘记了吗？但我并没有忘记你们，尤其是你们读书的事。你尤其要用心，也不要和小弟大妹吵闹，一切要听爹爹说话。乡里暂时平安，一切我都放心，所不放心的，就是怕你们不用心读书。"

同日 先生与步行入滇的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韭菜园经中山路至湘江边。道路两旁高悬着国旗，全城充满了抗战气氛。旅行团采取军事组织，学生全穿军服，背雨伞，大致情形如《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今午抵省》中所介绍："该

① 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团以军事管理为原则，上设团本部，团长由湖南省张主席指派黄师长师岳[①]充任，参谋长由该校主任军事教官毛鸿[②]充任，并设辅导委员会，委员五人：即黄氏（钰生），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生物系教授李继侗，文学院教授闻一多，及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大队长二人，由该校军事教官邹镇华、卓超分任。此外由学生十二人长期在团本部服务，其中负责日记者三人，摄影者三人，无线电者三人，图案管理者三人。每大队下分三中队，每中队分三小队，共十八小队。自中队长以下，皆由学生自任。计每大队有一百四十人，两队共约二百八十人，连教授等在内，全团共三百二十余人。学生中除长川在团本部服务者外，每周又由每大队轮流派遣九人，襄同管理全团伙食，九人负责本队杂务。"（《云南日报》，1938.4.28）

行前，有同学担心先生身体是否经得住长途跋涉，但先生态度很坚决。刘兆吉《由几件小事认识闻一多先生》："有人问他：'闻先生，你大可照学校的规定坐车、乘船经广州、香港、越南，舒舒服服的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再者，你这大年纪，吃得消么？'闻先生面孔很清瘦，额上又刻着几条深长的皱纹，再配上乱蓬蓬的头发，显得很苍老。大家都以为他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后来我才知道那年他刚满四十岁。闻先生很严肃的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话似乎还没说完，摇摇头算了。由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我们知道他内心里是感慨万端的。"（《大公报》，1951.7.16）

二月二十日　下午六时，随旅行团师生乘五条民船离长沙。

二月二十一日　中午，船过临沚口，登岸午餐。

二月二十二日　船经广阔的沙滩而至门板洲，中午抵甘溪港。由于前面有段水太浅无法行船，临时改变路线，驶向东南的益阳。傍晚，经资水抵青水潭。

---

① 黄师岳，字矗霄，安徽桐城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和陆军大学第十二期。曾在东北军任排、连、营、团、旅长。东北易帜后，任第十七旅旅长。旋，第十七旅改为第一一七师，其任师长。后调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处长。1936年1月授衔中将。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解体，其调湖南，职务为高级参议。护送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安抵昆明后，其任第五战区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在桐（城）怀（宁）以东、长江以南地区打游击，与新四军张云逸部防区相邻。曾以各种方式供给张云逸军需补给，皖南事变后，又派人护送张云逸家属转移至淮南新四军根据地。1948年任东北"剿总"参议、国防部派驻东北"剿总"部员，10月派为第九兵团司令部联络官，11月在沈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50年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时任广西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云逸知道后，将调其至广西工作，任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5年10月1日，因"脑溢血"和"高血压"并发症逝世于广西南宁。（据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677至678页；黄师岳之孙黄超给编者的信，2010.6.13）

② 原文作"毛洪"，误。

二月二十三日 三更造饭。饭后启程，天落起了雨，江上薄雾升腾。一小时后船抵益阳。有同学自益阳登岸开始步行。

二月二十四日 抵常德。先生等在这里等候自益阳步行的同学。

二月二十六日 致父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报告启程以后的情形，云：

> 十九日上船，实际二十日晚始启棹。二十四日抵常德。现定二十七日实行徒步往沅陵，大约须九天始能达到。截至目下止，只是乘船，途上并不辛苦。此后步行，不知如何。惟男前在南岳游山经验，一日行八十里，尚不觉疲乏。此次行程，初行规定每日五十里，以后每星期递加十里，至八十里止，是不出男能力之限度也。常德为湖南第二大城市(长沙第一)，目下因驻兵及难民关系，人口陡增，尤见热闹。同人寓县立中学，校长杨筠如君系男在青岛时同事，故到此颇蒙款待。艺专现设沅陵，到时又可找太侔兄矣。乡间想仍能安堵，惟家中老幼不知清吉否。离家愈远，系念愈切，人情盖皆如此也。

二月二十七日 旅行团注射第二次伤寒预防针，团员多起反应。遂改变计划，次日雇船去桃源。

二月二十八日 上午九时，船在空袭警报中驶离常德，下午一时抵童黄州。马伯煌《徒步三千流亡万里》记述先生在船上开始留胡子："在常德又雇民船溯沅江而上至辰溪。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同曾昭抡、闻一多、许维遹及医生等坐在一只船里。大家把行李铺在船板上，上盖芦篷，我们就吃在船上，睡在船上。因为是逆水行舟，水急滩险，只靠风帆无济于事，船老大雇用纤夫拉纤，纤夫腰缠竹索，背缚背板，在崖岸上伏地而行，口唱棹歌。……闻一多先生挨在曾先生的旁边，黑须连腮。我们问他，胡子也该剃剃了，他幽默地笑了笑，原来他从这时起，开始留了长胡须。"(《茹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33至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晚抵桃源县，宿县女子中学。

三月一日 晨，开始步行。天飘下雨滴。行三十里至桃花源，见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写之"秦人古洞"。时值初春，尚未有"落英缤纷"景色。途中见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村中小孩，又见被捆绑而过的壮丁。

又行三十里，至郑家驿。

三月二日 昨夜大雨，天亮时仍未停。旅行团在雨中出发，如在米南宫的水墨画中，山谷间起雾。行二十五里至杨溪桥，休息后又过将军山，见路旁有台，正演花鼓戏，似无抗战已起的感觉。下午四时抵毛家溪。是日行六十里。

三月三日 仍有雨。过太平铺，渡溪水入沅陵县境。沿途杉林茶山渐盛，所见

男女老幼都用布包着头。经上林乡铺、三渡水、黄土铺，宿张山冲。张山冲仅有七八户人家，极荒凉，加上阴雨、地湿、人挤，宿营甚苦。是日行六十里。

三月四日　黎明出发，过官庄，顺湘滇公路傍山而行，至马家坪山谷始展大。又经界亭驿、梅子潭、荔枝溪、马鞍铺、狮子铺、楠木铺、芙蓉关、木马溪、五里山，至黄公坪投宿。此行渐入深山，峰回路转，路旁有煤矿、银矿、铁矿，杉林极多，村女装束古旧，但很美观，不过时见因缺碘而长大脖子的人。是日行八十五里，人皆辛苦疲劳。

过官庄时，听说有土匪，几百条枪已渡过辰水向这边赶来。过马家坪后，与中央军校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一千多名学生相遇。

是夜，传来消息说土匪快迫近了，大家一阵恐惧。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中云："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可怕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而出来愿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久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因此当第二天那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一夜。"（《烽火》第20期，1938.10）先生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说："我们沿途并没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说的，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紧张戒备，然而也是一场虚惊而已。"

三月五日　翻山越岭，至马底驿渡溪水，公路成单行道。经文昌坪、牛栏坪，见满地菜花。顺公路上青山，形势凶险。由青山岗曲折而下，至白屋坪，下午四时抵凉水井。是日行六十里。

过文昌坪时人家多闭户，从小路方向传来枪声。在凉水井，正街已为中央军校所占用，旅行团只得宿山边小村。因行李车到得迟，怕惊动土匪，禁用手电，黑路走细田埂三里多，来回扛行李。

三月六日　昨夜狂风暴雨，清晨未止。冒雨出发，风雨中行二十里到沅陵县，宿辰阳驿。

同日　致父母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报告数日行程：

> 三月一日自桃源县舍舟步行，至今日凡六日，始达沅陵（旧辰州府）。第一至第三日各行六十里，第四日行八十五里，第五日行六十里，第六日行二十余里，第四日最疲乏，路途亦最远，故颇感辛苦，此后则渐成习惯，不觉其难矣。如此继续步行六日之经验，以男等体力，在平时实不堪想象，然而竟能完成，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至途中饮食起居，尤多此生从未尝过之滋味，每日六时起床（实则无床可起），时天未甚亮，草草盥漱，即进早餐，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时晚餐时间前，终日无饭吃，仅中途约正

午前后打尖一次而已。所谓打尖者，行军者在中途作大休息，用干粮、饮水是也。至投宿经验，尤为别致，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在沅陵或可休息三日，从此更西往芷江或有汽车可坐，然亦无十分把握。

三月七日 暴风雨后又下起雪来，还夹着冰雹。旅行团受阻滞于沅陵。

时，北平艺专已迁到沅陵对岸老鸦溪，先生渡江访艺专校长、老友赵太侔，并见到昔日的学生郭良夫等。一九四三年，郭良夫至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先生专业时，先生对他说要读懂古书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于是郭良夫选择了语言文字专业。（郭良夫《因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学林漫录》第11集，第6页）

时，沈从文也在沅陵，特设宴为先生等洗尘，并安排住在其兄刚盖起来的瓦房里。沈从文回忆说："一多和旅行团到沅陵，天下起大雪，无法行进。我那时正回家，就设宴款待他们，老友相会在穷乡僻壤，自有一番热闹。我请一多吃狗肉，他高兴的了不得，直呼'好吃！好吃！'一条毯子围住双腿，大家以酒暖身。我哥哥刚刚起了新房，还没油漆，当地人叫它'芸庐'，我安排一多他们在芸庐住了五天。"（访问沈从文记录，1986.4.23）

三月十日 旅行途中，爱好作诗的向长清与刘兆吉同学，商量到昆明后成立一个诗社，并拟请先生担任导师。是日，他们与先生长谈。刘兆吉《闻一多朱自清指导的南湖诗社始末》："由于我承担了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采集民间歌谣的任务，常常与向长清一起写、一起讨论作诗、评论古今诗人的诗。有一天，向长清提出到达昆明后，约些爱写诗的同学组织诗社，出版诗刊，我完全同意。他知道指导我采风的闻一多先生是知名诗人，并早已读过他的诗集《红烛》和《死水》。我俩商量成立诗社要请闻先生当导师。当晚，大概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沅陵落了雪，天气很冷，我俩在晚饭之后，拜访了闻一多先生。我们坐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闻先生用被子盖着膝盖。当我们说明了来意，向长清提出到达昆明后请他指导我们组织诗社，接着就畅谈起有关诗的问题。闻先生坦率的发表了他的意见，我还能回忆当时谈话的情况。闻先生很谦虚，首先说这些年他'改行'了，教古书（指《诗经》、《楚辞》），不作新诗了。又说明他对新诗并未'绝缘'，有时还读读青年人写的诗，比他的旧作《红烛》、《死水》还好。我想闻先生是说的真心话。"（刘兆吉给编者的专文，1988.7.21）

三月十一日 致父母亲信。[①] 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近因天雪汽车难行，留沅将及一周。现雪已解，定明日乘汽车至晃县，当日可到，过此则恐全须

① 原信日期为"十二日"，似误。因十二日晨已启程，离沅陵。

步行矣。”

在沅陵，曾乘舟游酉水。

三月十二日　晨五时，趁第二次大雪未降临前，乘公路局汽车匆匆离开沅陵。路上积雪未融，车在雪路上行驶，上坡时常打滑。二小时后抵辰溪，这是一座背山面水的古城，城内还保存有倾颓残废的楼台亭阁。休息片刻渡沅水，自花塘坪至榆树湾二百余里间多有山谷。下午三时抵芷江，傍晚到达晃县，渡潕水（即沅水），一切入黔车辆均须在此登记。

途中有汽车抛锚，又逢大雪，旅行团又阻于晃县。

这时，何善周同学因感冒发起高烧，先生坚持让团里派人护送到贵阳。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三月上旬，旅行团到达湘西阮陵。这里是山区，气温本来比长沙、常德要低，更加几日来阴雨连绵，山风吹来，寒意更峭。我们到达的第二天，细雨竟变成了雪粒，气温骤然下降的更低。我们睡在土地上，只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阴冷潮湿，我开始感冒发烧。大队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之后继续西行，我的烧还没有退。于是，我每天只好躺在装满行李的车顶上，让卡车拖着我半睡半醒地前进。及至到了湖南的边境晃县，我的病重了，发烧达到了四十度，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傍晚时候模模糊糊地听见人声嘈杂，我意识到大队已经到了。这时，猝然觉得一只冰冷的手掌放在我的额上，凉气一激，我微微睁开了眼睛，灯影里看见，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正看着我，慈祥中带着焦急的神情，原来是闻先生！他的手抚在我的前额上久久没有拿开。我完全清醒过来，两行眼泪流到了我的耳边。……在闻先生的极力建议下，团里派了内科主任袁医师，买票乘车护送我到贵阳去，经过治疗，半个月后才痊愈。”（《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254 页）

三月十三日　在晃县，候抛锚的汽车。时县治已毁，新治移至龙溪口。城跨江上，有贵州街为贵州省飞地。城中禹王宫正放映电影《荒江女侠》，内供巫神多尊，还有皇帝万岁的牌位。旅行团有人游旧城凤林寺，寺内小学校仍读四书五经。

三月十四日　仍在晃县。

三月十五日　当地“集墟”（赶集）日。龙溪口狭小的街上挤满了人和货摊，街中侗族人甚多。晚七时，旅行团在潕水滩上举行营火晚会，月光下，先生讲述桃花源地名的原始意义。

三月十六日　仍在晃县，旅行团有人参观附近汞矿，也有人入山访侗家村落。

三月十七日　细雨中由当地保安队护送离开晃县，经酒店塘、蒋家湾、大鱼塘至鲇鱼铺。鲇鱼铺为湘、黔两省交界处，过此地即入贵州省境。沿公路经南宁堡、九狮乡、杉木坳，下午四时抵玉屏县。是日行六十八里。

在玉屏县，宿县衙门内，并受到县里人欢迎。联欢会上曾昭抡向小学生演讲。这里盛产石竹，有箫及竹杖，旅行团几乎每人都购了竹杖，先生亦买了一捆箫、笛、手杖等，其中一把拂尘至今尚存。贵州广种鸦片，玉屏市上可见鸦片铺。

玉屏县长刘周彝为迎接旅行团，特发布告。作为史料，兹录以参考："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昆明，各大学生徒步前往，今日（十六日）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统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民众或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复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备至，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此布。"（转引自蔡孝敏《湘黔滇旅行团杂忆》，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78期）

三月十八日 沿傍潕水的公路曲折而行，山坡斜度较大，经岑分乡、分远镇至一碗水，均上坡。下坡经羊坪镇、五里牌，抵青溪县。青溪为贵州八十一县中最小的一个县，在潕水西岸，为黔东的交通重要孔道。这里连女子也抽大烟，烟害极深。是日行五十里。

三月十九日 青溪去镇远有两路，先生走大道有一百四十里，比小道多五十里。公路盘山而行。夜宿三穗。

三月二十日 天气晴朗，登盘山。盘山跨三穗、镇远之间，为黔东险要，公路盘折甚险。在岭上，先生遇到从小道走来的吴征镒等，仍一起经两路口至镇远县。夜宿府城县立第一女子小学。镇远为军事必争之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有苗民起义，一九二四年又有旱灾瘟病，死人无数，人口由七千户降为三百户。

三月二十一日 留镇远一日。有同学访城西南涌溪苗民，参观二十四保大土寨，全寨属青苗，仅十四户。

三月二十二日 晨，别镇远。过文德关由小路盘山而上，经独木坪、白杨坪，山势更高。出镇雄关，公路蜿蜒。路经鹅翅膀，见鹅翅膀工程，居高而望，千山均在视野中。渡旱桥经刘家庄、甘溪，至施秉县。是日行八十里。

三月二十三日 晨八时离施秉，二十里至干地坪，公路环绕山腰经烂桥下坡，至飞云崖。飞云崖为黔东名胜，有拱桥横跨溪上，桥东石坊上镌有清代雍正年间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所写"黔南第一胜景"题额。过此拾级而上，即飞云洞，似洞非洞，内甚宽敞，顶上石乳倒垂，形象百态。洞顶有一石碑，上刻："千载白云飞不去，至今留与洞为名。云飞云住洞常在，洞古洞今云自生。怪石峨峨原有相，清泉冷冷却无更。桃花不近泾流水，恐惹渔人多此行。"崖前有月潭寺、清风亭、观瀑台、清心殿、皇经楼等建筑。过飞云崖，至小东坡，两旁绿阴深密，鸟鸣声声。下午四时抵黄平县。

旅行途中，先生为祖国的河山壮丽所激动，沿途作了不少速写[①]，有人物、风景、建筑等，现仅存三十六幅，前三幅画皆题《飞云崖》。

三月二十四日　经马场街、金凤山，至重安。途经湘黔公路至高点观音山，海拔一千五百多公尺。重安为大镇，面对重安江，江上有铁索桥，宽丈余，上铺木板，为行人骡马的交通要道。这里居住的有青苗、仡兜、西苗、木老、倮倮、侗等少数民族。

是日速写有：《马场街》、《金凤山》、《重安江练子桥》、《练子桥上水碾》。

三月二十五日　过重安江，四十里至云溪洞（又名大风洞）。此为黔东名胜之一，洞深里许，洞底积水没胫，黑暗崎岖，需持火把匍匐而进，至洞底重见天日，出了一洞又是一洞，迂回曲折，绕山坡而回到原地。又十里到炉山县城。

是日速写有：《大风洞》、《大风洞上韦陀菩萨》、《重安前十里》。

三月二十六日　在炉山休息一日。下午，县政府为旅行团举行汉苗联欢会，仡兜族长等十二人跳舞吹芦笙，同学们唱歌，李继侗、徐行敏（医生）跳了华尔兹，黄钰生舞起手杖，曾昭抡则被灌得大醉。傍晚始散。

是日速写有：《炉山市肆》、《炉山张家客栈窗口》。

三月二十七日　天高气爽。经五里桥、洛邦、兴隆街至羊老镇。镇前的鱼梁河是重安江支流。又经鸡场、甘粑哨新街，为湘黔、黔桂两公路的会合处。下午三时抵马场坪。全日行七十里。

是日速写有：《新街》、《石板冲》。

三月二十八日　昨夜大雨，清晨出发，道路泥泞。经大关、小河口、猫猫营，满山青色，桃花盛开。三十里至黄丝，为较大的乡镇。西行经沙坪到贵定。贵定濒清水江上游，南有云雾山，是苗岭主峰，为乌、沅、盘三江分水脊。是日行七十里。

是日速写有：《小河口》。

三月二十九日　离贵定，西南行二十里，见牟珠洞。牟珠洞居两山之间，亦一大名胜，洞外有观音殿，两旁列十八罗汉，洞内有高二丈径二尺的高大石笋，诚为大观。石笋底部有裂痕，相传吴三桂欲锯下而触怒神灵，天空忽然雷响，方不敢再动手。洞顶有一穴，光可从中射入。洞底颇深，有水如匹练而出。旅行团由该处寺庙小和尚持火把引导参观。出牟珠洞，经瓮城桥、安家牌坊、新文，至沿山堡公路向下折，有青山洞，再西行经龙从堂、麻芝铺，抵龙里。是日行七十五里。

---

① 1938年4月30日先生致夫人高孝贞信中说一路上"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1940年5月26日致赵俪生信则称"沿途曾作风景写生百余帧"，准确数字待考。

是日速写有:《牟珠洞》。

三月三十日 大雾中离龙里,上观音山,经凉水井、倪儿关。倪儿关附近有石油矿,但未开采。下倪儿关,经黄泥哨、龙洞堡、图云关,阴雨中入贵阳城。过城内大什字,宿大西门外三元宫。

三月三十一日 晚,前任清华学校校长,时为贵州省政府建设厅长的周贻春(寄梅),设宴为旅行团诸先生接风洗尘。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亦曾设宴款待旅行团全体师生。

旅行团到贵阳,无形中起了种宣传作用。当时,贵阳与抗战前方的气氛不大一样,缺乏战争紧迫感,旅行团的到达,激动了这里民众的爱国热忱。旅行团师生越往西南走,似乎地位越高,人们对大学教授、学生放弃乘车,徒步入滇的举动,深受感动。

四月一日 游贵阳黔灵山、甲秀楼。作速写:《贵阳一角》、《黔灵山脚》、《黔灵山东峰》、《甲秀楼》。

晚,先生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老友吴泽霖设宴款待旅行团诸先生。吴泽霖于一九二七年自美回国后,一直在上海任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该校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迁到贵阳。

四月二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十七日自晃县出发,步行三十日抵贵阳。贵州境内遍地皆山,故此半月中较为劳苦,加之天时多雨,地方贫脊,旅行益形困难。本地谚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盖得其实矣。"又云:"据悉昆明校舍不敷,文法二院决设蒙自,以意揣之,昆明新房屋造成后,文法二院恐仍当迁回。蒙自距昆明铁道一日路程,地近安南,此行本如投荒,今则愈投愈远矣。"

四月四日 雨中离贵阳,沿旧有驿道改建成的黔滇公路行进。经香炉桥、头桥、二桥、三桥,在马王庙见乡民多有眼疾。再过狗场、五九乡,抵清镇。一路平坦,溪山交错,风景甚佳。是日行五十六里。

是日速写有:《清镇县东山寺》。

四月五日 晨,离清镇,沿公路向西南。在南郊青龙山下有中山公园,内有纪念塔,上刻"陆军第四军五十九师剿匪阵亡将士纪念塔",这是国民党中央军追剿红军所受到惩罚的物证。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曾自清镇六十里的地方经过,旅行团在贵州境内,见到不少红军留下的布告和标语,先生也听到了不少有关红军的事迹。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我们一路所经,大部地方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红军长征,一九三五年初经过这些地方,离这时不过三年,有

些红军的布告、标语，在沿途还清晰可见。沿途的人民，对于我们这些洋学生，感到很新奇，也有戒心。但当看到我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特别是吃饭时有些剩菜剩饭，都送与附近穷人吃，也就敢于和我们接近，说真心话了。我们特别爱听他们说红军长征的故事。他们说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不拉夫，不抓壮丁，秋毫无犯，很多青年自动参军；他们说红军怎样开仓济贫，助民劳动等等。……闻先生和我们一样，也很爱听这些故事，经常看到他在休息时，和老乡谈家常，听老乡诉说红军长征的往事。而且往往他是谈话的主要一方，我们围坐在旁边听。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地主坟茔的碑亭下休息，他又和农民谈起红军的故事来。那个农民说，他见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穿着和红军战士一样的军装，说话非常和气，一点架子都没有。毛主席还到过他家里呢！那个农民的儿子新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非常气愤，说早知如此，叫儿子参加红军多好呀！闻先生听完农民的谈话后，很有风趣地指着旁边的石碑说，这座碑是为墓中人歌功颂德的，碑上还有'万古流芳'四个字的题额，但这些谀墓文字，我们都看够了，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刚才听到的谈话，却是另一种形式的碑，就是所谓'口碑'。"（《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79页）

经西成桥，在鸭笼坝午饭，二分钱一碗白米饭，茶和菜均免费，有豌豆苗煮豆腐，农家风味颇浓。过下云关，下午四时至平坝县。时逢场期，异常热闹，街上见青苗、黑苗部族包头有别。有同学遇到几位保甲长，了解到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形。是日行五十六里。

是日速写有：《西成桥》、《前距平坝六公里》。

四月六日　离平坝西南行，经五里屯、二堡、沙子哨，两旁有许多农妇在田中耕作。到天龙镇，见石屋毗连的百户富庶乡村，西邻石板房已属安顺县境。再经五台山、大水桥、带子街、麟山镇，这一带乡镇栉比，鸡犬相闻。公路右侧有粮仓洞，相传为南蛮王孟获屯粮之所。再西行经娄家庄、凉水井、头关、东关，下午四时抵安顺县。安顺商业繁盛，石板街平坦清洁，是旅行团所经过的地方中仅次于常德的城镇。是日行八十五里。

在安顺，有省立初中、县立女中和私立女中等校。中学生欢迎旅行团时，刘兆吉同学特意向他们介绍了先生，并让他们读读《红烛》、《死水》，后来先生严肃地批评了刘兆吉。刘兆吉《由几件小事认识闻一多先生》："安顺中学的学生，听说闻一多先生也徒步到达安顺，便成群结队的来瞻仰这位文学家。我随便同他们谈：'你们这样敬仰闻先生，你们读过他的著作么？闻先生是中国有名的诗人，读过他《红烛》、《死水》一类新诗么？没有读过的可以找来读读。'学生们刚走了，闻先生很严肃的对我说：'你多话了，《红烛》、《死水》那样的诗过时了，我自己也不满意，所以这

几年来,没再写诗。国难期间,没有活力,没有革命气息的作品,不要介绍给青年人。'"(《大公报》,1951.7.16)

是日速写有:《三铺》。

四月七日 游华严洞和文庙。华严洞在安顺南门外五里的崇仁里村头,洞前有韦陀殿、关圣殿、魁星楼等,前人题咏、碑刻也不少,洞中供佛像,还有形形色色的石乳、石笋、石钟,古怪离奇。文庙位于城区东北角,始建于明洪武初年,保存尚完好。

是日速写有:《安顺县华严洞小学》、《安顺县文庙》。

四月八日 晨八时半离安顺,城中店铺都未开门。一路平坦,经上头坡、么铺、大山哨而抵镇宁。是日行六十二里。

四月九日 出发前游火牛洞。火牛洞在镇宁东门外二里许,昨日有同学前去参观,归来大加宣传,引起旅行团师生极大兴趣,几乎倾巢去游览。火牛洞深仅六七丈,但钟乳硕大异常,由狭小只能容身的新凿小门入内后,迂回百余步即入大室。室中有高大石柱多根,后边为一大石壁。以烛照之,奇妙无比。绕壁至其后,过一深潭,达另一大厅,作歌时四壁共振,宛若大合唱。先生兴致顿起,唱起《乌万尼他》和《圣塔露西亚》两首英文歌。

离镇宁,经双明洞,洞不太深,两端有出口,光线由前后射入,故称"双明"。出洞由小道上公路,经安庄坡而近黄果树的二里处即闻水声滔滔的一股瀑布奔流而下,高二十多米,宽三十余米,水量巨大不可多见。抵黄果树,村后即著名的大瀑布,巨声如雷,如万马奔腾,高四十米,宽二十米,瀑布倾入水潭,溅起水珠如匹练,上反射出美丽的虹光。西行过大坡顶,可望关索岭,再行即著名的红岩,上有石碑为赭红色,所刻之字古怪离奇,传说是殷高宗伐鬼方纪功之刻。下坡过坝陵桥,夜宿大觉寺。是日行九十里。

是日速写有:《双明洞》。

四月十日 晨,启程。经观音洞抵永宁。行五十里,不见人烟。宿永宁时,看到八日报载台儿庄大捷消息,兴奋异常。

四月十一日 阴,山间多雾。经新铺至盘江,时已中午。因江上铁索桥于上月已断,只能乘小划子渡江。江面宽不过四十米,但中流湍急,航行极险。旅行团所乘的小划子,仅可容五六人,其形头尖尾截,桨长,柄为铲形,前后各有一人划船。乘客蹲坐其中,两手紧紧扶舷,不得起立乱动。小划先慢行沿岸上溯,近桥时猛然一转,船便顺流而下,势如飞鸟。将到岸,又拨转船身上溯。到中流时,最险也最有趣,胆小者多不敢抬头。不知是谁,在划子将离岸时,拍了一张先生低头紧握船舷

的照片，成为难得的纪念。

到对岸，行至哈马庄，原计划在这里宿营，但山顶仅二三十户人家，水米无着，临时改变安排，于暮色中又走了十八里到安南县。由于是临时变动，食宿均无法妥善安排，铺盖炊具又滞留盘江东岸，大家只好挤在县政府大堂中坐了一夜。有同学发起牢骚，先生等为了平息怨言，也同样没吃没睡。参加旅行的季镇淮在《闻一多先生年谱》中写到："到了安南，天已经黑了。安南是个小县，二百多人的食宿问题没法解决，同学们就跑到县政府大堂，跟学校负责人黄子坚先生吵闹，因为晚上县长请旅行团里的先生们吃饭。闻先生这时也在，看见同学们像饥民一样地要'暴动'，就在人丛里说：'我今年已是四十岁的人，我跟你们一样，……谁要是有意弄得这样，……谁还要活吗！'学生立刻安静下来，一个啧着说：'文学的……'但是没说下去，底下也就没有谁再开口了。这一夜，先生等都没有吃没有睡，陪着学生们在县府大堂上冷坐。"（《闻朱年谱》，第35至36页）

吴征镒在《长征日记》中也记述了这事："到了小城街上，卖炒米糖泡开水的小贩被抢购一空，后来的只好枵腹就寝。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本日行九十五里），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辅导团诸公曾、李、闻诸先生也陪坐了，并替两位黄团长挨了骂。半夜里，有人同黄子坚先生侄公子口头冲突，几乎动武，县太爷披衣起来拉架。"（西南联大除夕社编《联大八年》，第15页，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

四月十二日　因昨夜未休息好，旅行团决定在安南休息一天。晚上，为庆祝台儿庄胜利，师生们举行了游行大会，把这个小小的县城都惊动了。

是日速写有：《安南县公廨后园》。

四月十三日　仍在安南。

是日速写有：《安南县东门外》、《安南县魁星楼》[①]。

四月十四日　天色晴朗，离安南西行。约五里，公路蛇行而下，成二十四个"之"字形，即贵州公路的险境之一"二十四拐"。山间草木葱翠，风中带有自然的芬芳。又经沙子岭，见支路南龙路岭上有纪念亭，为建造此路而殉身的二百四十余路工而筑。下坡渡小盘江，再上江西坡，见许多患大肚子病的乡民。又经芭蕉关，翻越大水沟岭，至普安县。是日行一百里。

四月十五日　又休息一天。

是日速写有：《普安县文庙》。

---

① "安南县魁星楼"速写落款为15日，疑误，暂系于此。

四月十六日 离普安西行。至九峰山，山峦高耸，树木繁茂。经三板桥、鹦鹉山、旧普安，直达盘县。有中小学生来欢迎。盘县人称小安顺，黔滇公路由此通过，商业集中于北门外中山路，街道也还整洁，两边遮阳大伞毗连，别有风趣。这是旅行团在贵州境内的最后一个县城。

四月十七日 仍在盘县。

是日速写有：《盘县近郊》、《盘县女子中学》。

四月十八日 春风中离盘县西行，经刘官屯、大山哨、两头河、大壕铺，见一片绿色草地，旁边水池掩映山色。再经黄狼坡，抵黔滇两省交界的亦资孔。是日行九十六里。亦资孔为盘县西区的大镇，人民生活清苦，多食包谷。在这里，旅行团师生听说云南的平彝县派保安队迎接入境，不由精神为之一振。

四月十九日 天气晴朗，自亦资孔西行，公路平坦，无大山坡。经平彝厅至胜境关，入关后见圣行宫，旁有高大石牌坊，上镌"滇南胜境"四字，算是进入了云南省界。下胜境关，山土皆赤色，一路杜鹃花、山茶花红白相映，气象与贵州迥然不同。下午二时抵平彝县。是日行六十五里。在平彝，见乡人多患大脖子病，概因缺碘所致。县中除汉族人外，还有彝族，彝族有黑、白、刚彝之分。

四月二十日 在平彝休整一日。适逢街期，入滇后知这里不叫赶场，而叫赶街。中午县长古某招待旅行团师生，下午有人游青溪洞。

四月二十一日 六时起身，明月尚悬空中，旅行团悄然离平彝。出西门，经多罗铺、草塘湾、棠梨湾，由小道至公路，抵金泉镇。金泉镇原称白水，两年前始改今名。此程路极平衍，两旁多果树松林。是日行六十五里。

是日速写有：《白水镇灰云楼》。

四月二十二日 天晴。出金泉，过沙冲，两旁平地多，却少有开垦。行四十五里抵沾益。在沾益曾见破庙中有题壁民谣歌颂红军。刘兆吉《由几件小事认识闻一多先生》："'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枪敲穷人；庄主仰仗蒋司令，穷人只盼老红军。'这是我从云南沾益境内一座破庙的墙壁上抄下来的，闻一多先生看了之后，很兴奋的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红军受人民的爱戴，由此可知。'关于这类的歌谣，我在沿途也采了十多首，闻先生和我都很珍贵这些材料。"（《大公报》，1951.7.16）

在沾益用饭时，地保敲锣，嘱店家勿哄抬物价。饭后继续行进，经新桥、大坡寺，下午四时抵曲靖县。一路地势开阔，阡陌纵横，麦子已黄，油菜蚕豆将熟，为常德以来所仅见。是日行七十五里。曲靖为滇东重镇，县城周六里，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城墙坚固，楼阁巍巍，城内古迹不少。在曲靖，大家吃到好久没有吃到的牛奶、荷包蛋、炸油条。

四月二十三日　在曲靖休整一日。

是日速写有:《曲靖北门外牌坊》。另幅无题识。

四月二十四日　昨夜大风雨,气温骤降。出曲靖小西门,经张家庄、桂家屯、面甸、大海哨,抵马龙。县城内人们用街道作打谷场,所用连枷、扬掀、杈子、木磙、石磙等与北方农村相同,人说这是明代沐英守云南时流传下来的,亦有人说为吴三桂的北方将士带入。是日行七十里。

旅行团在马龙受县长张嘉谷的热情接待。《云南日报》报道云:"国立临大学生旅行团,于本月二十四日,由曲靖行抵马龙,张县长嘉谷闻讯,即派警教两局先事准备住宿地点,午后一时,该团黄团长北团员三百余人全体到达马龙,当即分组考察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等事,是晚七时,该团各组代表三十余人到县府晤张县长访问地方各种重要问题,经张县长详明解答,各代表颇为满意。各团员精神均极强健,刻已于二十五日由马起程前赴易隆,计日内当可抵省云。"(《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今午抵省,全团三百人由黄师岳领导,已抵省师生准备热烈欢迎》,《云南日报》,1938.4.28)

四月二十五日　离马龙,沿公路行,经何家村、河边抵易隆。易隆镇上有方便客店,四分钱即可投宿一夜。是日行九十二里。

四月二十六日　离易隆,经古城、小新街、果子园、小河口、老猴街、白龙桥、大场哨,沿路麦穗相望,绿阴深幽。过五十八公里路碑,便展现一片大盆地。过杨林时见已快干涸的杨林海,原是大湖,雨季时可成汪洋。过杨林海即为杨林镇。这里市况尚盛,有小昆明之称。是日行七十里。

四月二十七日　出杨林北门,经小哨、长坡,忽然下起大雨。雨住方行,下午三时抵大板桥镇。大板桥为昆明东乡大镇,镇上有一里多长的石板街道。是日行六十里。

此时,先生胡须已长,与李继侗相约抗战不胜利不剃须。吴征镒《长征日记》:"闻、李二老均已胡须留得很长,为共摄一影,二老相约抗战胜利后再剃掉。"(《联大八年》,第16页)

四月二十八日　晨离大板桥,行四十四里至距昆明八里处的私家墓地贤园,有人送来茶点,并云走海路的师生业已先期到达昆明。

午后,旅行团整装出发,这是湘黔滇长途旅行的最后一段路程,所以师生们精神特别饱满。一小时行至昆明城下,由东门入城。在拓东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其他负责人来欢迎,几位教授夫人还献了花篮,有人用一首爱尔兰著名民歌的曲调现编上词,向三千里风尘仆仆的师生祝贺。队伍沿着宽阔的石板街道,经滇越铁路车站大门,踏上了槐荫满街的金碧路。过"金马"、"碧鸡"

牌坊，入正义路，过建有护国首义将领唐继尧纪念碑的近日楼公园，春城的市容和景色给大家留下最初的美好印象。旅行团军容整齐地在圆通寺集中，听梅贻琦致欢迎词。时，天下起了小雨。全体旅行团师生合影留念。

这次湘黔滇长途跋涉，全部行程三千三百余里，除乘船乘车外，徒步两千六百余里，经过三省会、二十七县、数百村镇。这六十八天的旅行，是先生在抗战初期所上的生动一课，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说：

> 武汉情势日渐危急，长沙的轰炸日益加剧，学校决定西迁了。一部分男同学组织了步行团，打算从湖南经贵州走到云南。那一次参加步行团的教授除我之外，还有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等先生。我们沿途并没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传说的，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紧张戒备，然而也是一场虚惊而已。
>
> 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什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等。
>
> 在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希望到昆明后，有一个能给大家安心读书的环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谈，甚至也不大想政治问题。有时跟辅导团团长为了食宿闹点别扭，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说来，都是很融洽的。

辅导团团长黄钰生也曾回忆到："我们那时候是高高兴兴地唱歌，步行时唱，晚上也唱。我们一路上唱着《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还唱聂耳的歌。我们吃得很好，睡得不可能好，有时牛舔我们的脖子，就在牛厩的旁边睡了。"（美国学者易社强访问黄钰生录音记录，1980.3.23，云南师范大学党史资料征集组存）

先生在旅行途中指导同学采集民歌，刘兆吉同学采集了两千多首，后来选编成《西南采风录》，先生和黄钰生、朱自清都为这本书写了序。

云南各界，非常重视湘黔滇旅行团的到来。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的当天，《云南日报》发表长篇消息《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今午抵省，全团三百人由黄师岳领导，已抵省师生准备热烈欢迎》。内云："联合大学为谋学生实地认识各种社会情状起见，特乘此次迁滇之便，组织一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步行来滇，已志本报。顷悉该团已于昨日抵板桥，今午即可到省，三千里长征，圆满达到目的。联大已来师生准备热烈欢迎，届时必有一番盛况。该团辅导委员会主席黄子坚（教育学院教授）已于日前先行来，向校方报告并接洽一切。昨日复转板桥迎迓。记者昨晤

黄氏于该校，据谈该旅行团之组织及经过情形如下：该团以军事管理为原则，上设团本部，团长由湖南省张主席指派黄师长师岳充任，参谋长由该校主任军事教官毛洪[鸿]充任，并设辅导委员会，委员五人，即黄氏、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生物系教授李继桐、文学院教授闻一多，及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大队长二人，由该校军事教官邹镇华、卓超分任。此外由学生十二人长期在团本部服务，其中负责日记者三人，摄影者三人，无线电者三人，图案管理者三人。每大队下分三中队，每中队分三小队，共十八小队，自中队长以下，皆由学生自任，计每大队有一百四十人，两队共约二百八十人，连教授等在内，全团共三百二十余人。学生中除长川在团本部服务者外，每周又由每大队轮流派遣九人，襄同管理全团伙食，九人负责本队杂务。该团以养成军队式宿营之习惯及着重学术研究为目的，每晚均由团长或参谋长规定次日行进之路程及宿营地点，复由辅导委员会指示沿途堪注意之事物。晨六时起身，六时半用早膳，七时出发，每日至少行进三十公里，以赶站关系，在黔省境内，有日行五十公里者。该团于二月二十日自长沙出发，每二人合携被褥仅三件，连同伙食器具、无线电收音机等必需品，装成二卡车，随队同行。其余尚有行李二车，交由公路转运。由长沙至益阳，全队均乘船，沿公路西行，益阳至沅陵乘车，在沅陵为天雪所阻，曾勾留一周。自此以后，全程步行，于三月三十日抵筑，四月四日又复登程，沿途除购粮住宿，间感困难外，均备受地方当局照拂，堪称便利。今能平安抵省，殊可庆幸。黄氏继谓，此次步行来滇，用费至国币二万元之多，较之乘车船反不经济，但沿途之收获，则决非车船旅行所能得，如生物、地质系诸同学采积标本颇多，文学、教育等院同学于民谣民俗方面亦有收获。而最难得者，此多数青年，能亲感我国之地大物博，亟待解决之问题极多，有以猛省云。(《云南日报》，1938.4.28)

次日，《云南日报》又发表特写《联大旅行团长征抵省印象记，英勇精神赛军队，热情流露动人心》，报到湘黔滇旅行团进入昆明情况："三千里的奔波，阳光和风尘，使每一个尊严的教授和高贵的学生都化了装了：他们的脸孔是一样的焦黑，服装是一样的变化，眷属和胡髭都长长了，而且还黏附着一些尘芥。每一个学生的身上，都人斜挂着一柄油纸伞，及水壶、干粮袋之类的家伙，粗布袜的外面套着草鞋，有些甚至是赤足套上草鞋。他们四个一列的前进着，英勇的色彩，坚决的气魄，胜利的笑影，荡漾在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容上，态度是从容的，步伐是整齐的。充满在他们行伍之间的是战士的情调，是征人的作风！在陌生的人的心目中，很会怀疑他们是远道从戎的兵士，或者新由台儿庄战胜归来的弟兄。他们到了拓东路联大校门了，等候在那里欢迎他们的男女同学和校委教授们，热烈地欢呼，热烈地拍掌，热烈地握手，十分欢欣地献给他们一蓝鲜艳的香花，并且撑起上书'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的布标,走在他们的前首,十分愉快地进城。由拓东路而金碧路,而正义路,而华山南路和西路,而青云街,而圆通街,一直到爬上圆通山顶。他们吸引了无数观众,他们的英勇,他们的毅力,博得了满城观众的赞歌和夸奖,不由地使联想起'一二·九'以来的北方学生英勇斗争的悲壮场面!在圆通山的四方亭面前,校委梅贻琦博士恳切地用言语慰劳他们,鼓励他们,嗓子虽则低低的,但态度却是那么的恳挚,一字一句,都使听众感动,开怀。随着梅氏演讲的,是教育厅特派前往慰劳的徐茂先先生。徐先生除表示欢迎他们来滇外,还庆祝他们长征之成功,言词娓娓,八分标准国语,夹带着二分道地的弥渡音。雨虽然落下来了,但全团学生却依然尖耳倾听。徐先生讲完之后,领导学生长征的黄团长也高声大气地讲了一番话,表扬学生的毅力,推却自己的首功,并把《西游记》来比拟他们此次的长征,譬喻恰当,出语诙谐,一阵欢笑声,禁不住由学生行列中腾响起来。话讲完了,雨也歇了,太阳也依旧冲破了乌云的包围而照着大地。这时,一位老教授高兴极了,手之舞之地领导群众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到全体师生共摄一影后,队列才宣布解散了。在接引殿中,在茶铺里,拥满风尘,仆仆的教授和学生。亲戚跟旧故,爱人和同窗,'久违久违','你好你好',一片异地的欢笑声,交响在风和日暖的氛里。在群众的欢笑中,陌生的记者乘便去会见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先生。他说起他们曾经游过'桃花洞',也曾经在贵州和苗民开会联欢,又说到沿途的所见所闻,结论是:所经各省的治安宁靖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接着记者承梅校委的介绍,和领导全团长征的黄师岳先生会面,黄先生曾经任过某师师长,但由他的态度看起来,除开精神特别饱满外,丝毫没有普通一般大军官的习气,所穿的衣裤草靴全和学生一样。一见记者,便满面春风。首先来一个和蔼可亲的握手礼。接着应记者的要求,发表入滇境的感观。他说:'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固是难免的,但在这种辛苦中所得的快乐,真是一般养尊处优者所梦想不到的。因为这次深入民间,各地不同的生活情况,尤其是苗民的特殊生活,我们都见到了。一路上有诸般优美的风景,关于这一类情况,我打算过天详细地写出来。我们一入滇黔交界的胜境关,令人最高兴的是气候优良,地形清秀,风景幽美,土地肥沃,就中尤以罂粟烟花业已完全绝迹。这真是最令人高兴的事。后来到达昆明市,又见市街整洁,市面繁荣,和国内各通都大邑不相上下。由此已足证明滇政进步之一斑。'……黄谈到这里,团长饥肠辘辘,极待饱餐,记者遂握别而返。装满着一脑子良好印象的记者,转回报社的途中,心里浮涌着这么的一个愿望!'英勇的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英勇的三千里长征者!希望你们发扬这种英勇的传统精神,准备打回老家去!'"(《云南日报》,1938.4.29)

四月二十九日　下午，清华大学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建校二十七周年校庆，到者千余人。纪念会由基督教云南青年会总干事、清华校友金龙章主持并致词，马约翰教授带领大家唱党歌，云南大学校长、原清华大学算学系系主任熊庆来代表云南同学致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报告年来学校之变迁，说北平清华园已成为日军兵马之场，科学馆、化学馆、生物馆均被占去。又说将来的工作，要促进研究事业，如航空工程研究、电讯研究、社会调查研究、农业研究、金属研究等。关于经费，梅贻琦说，北大、南开的经费只发平常的六成，而清华经费仍然按十成发给，每个学校拨出四成归西南联大使用，二成留为己用。最后，由赵元任领导一群男女同学和小女孩唱清华大学校歌。合影后，云南清华同学会以火腿面包、牛肉面包、香蕉糖果招待。（据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会上，先生见到了熊庆来夫人，她还特别问起先生的妻子高孝贞。熊庆来是去年受龙云邀请，来云南大学任校长的。

四月三十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里说到旅行的情况和对家人的惦念，充满了乐观情绪：

> 我们自从二月二十日从长沙出发，四月二十八日到昆明，总共在途中六十八天，除沿途休息及因天气阻滞外，实际步行了四十多天。全团师生及伙夫共三百余人，中途因病或职务关系退出团体，先行搭车到昆明者四十余人，我不在其中。教授五人中有二人中途退出，黄子坚因职务关系先到昆明，途中并时时坐车，袁希渊（复礼）则因走不动，也坐了许多次的车，始终步行者只李继侗、曾昭抡和我三人而已。我们到了昆明后，自然人人惊讶并表示钦佩。杨今甫在长沙时曾对人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这次我到昆明，见到今甫，就对他说“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途中许多人因些小毛病常常找医生，吃药，我也一次没有。现在我可以很高兴的告诉你，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是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更不必说了。途中苦虽苦，但并不像当初所想象的那样苦。第一，沿途东西便宜，每人每天四毛钱的伙食，能吃得很好。打地铺睡觉，走累了之后也一样睡着，臭虫、草[虼]蚤、虱实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么事，若过了六十里，有时八九十里，有时甚至多到一百里，那就不免叫苦了，但是也居然走到了。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

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画集印出后，我一定先给你们寄回几本。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见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

文法两院五月三日开始上课，理工两院或许在两星期后，因为房屋尚未修理好。我在昆明顶多还有三天耽搁。从这里到蒙自，快车一日可到，但不能带行李。我因有行李，须坐慢车，在途中一个地方名壁虱寨住一夜，次日始能达到。所以五日后可以再有信回。

旅行团到的第二天，正碰着清华二十七周年纪念，到会者将近千人，令人忧喜交集。据梅校长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得二、三、四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听说三、四两月不成问题，迟早是要补足的。

你这封信里未详说家中种种情形，不知是否在那三封信里已经说过？我最挂念的是鹤、雕二人读书的情形，来信务须详细说明。两儿写信都有进步，我很喜欢。鹤喜作诗，将来能像他父亲，这更叫做父亲的说不出的快乐。小弟、大妹读书如何？小小妹没有病痛吗？雕的耳朵好了否？这些我最关心的事，为何信上都不提？你自己的身体当然我也时时在念。路上做梦总是和你吵嘴，不知道这梦要做到何年何月为止！

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熊迪之（庆来）去年到这里做云南大学校长，你是知道的。昨天碰见熊太太，她特别问起你。许多清华园里的人，见我便问大妹。鹤、雕两人应记得毛应斗先生，他这回是同我们步行来的。这人极好，我也极喜欢他。

今天报载我们又打了胜仗，收复了郑城。武汉击落敌机廿一架，尤令人奋兴。这样下去，我们回北平的日子或许真不远了。告诉赵妈不要着急，一切都耐烦些。她若写信给大司夫，叫她提一笔说我问过他。

你目下经济情形如何？每月平均要开支多少，手中还剩多少？日子固然不会过得太好，但也不必太苦。我只要你们知道苦楚，但目下尚不必过于刻苦，以致影响到小儿们身体的发育。大舅在何处，他家情况如何，盼告我。

是月底　旅行团全体师生在海棠春聚宴，醉者几乎一半。

五月二日　下午，湘黔滇旅行团全体师生在大观楼唐继尧铜像下举行酬谢黄师岳团长游艺茶话会。先生讲途中趣事。杨式德日记：在大观楼游艺茶点时，“闻

一多先生把途中的趣事选了七件作成七绝，其中如倪副官玉体演捉放(凶绝)，许骏斋凝视诸葛泪(憨绝)，曾叔伟白吃五碗酒，又唱松花江两绝都很有趣。他说路上以曾叔伟(昭抡)先生风流韵事最多，害得曾先生十分不好意思起来。"(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94页)

五月三日　乘滇越铁路米轨小火车赴蒙自，晚宿开远。四月二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称，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改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十九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在昆明召开首次会议，议决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以文、法两学院校舍不敷暂设于边城蒙自。时，文、法两学院师生已相继赴蒙自。

五月四日　至壁虱寨(今称"碧色寨")，换乘汽车，行半小时抵蒙自县城。蒙自是古老的边疆军事重镇，元代即已设县。

在蒙自，住希腊人已废弃的歌胪士洋行临南湖小楼的二层二号。时浦薛凤住一号、邱椿住四号、郑天挺住五号，住在这里的还有朱自清、王化成、陈寅恪、沈乃正、余肇池、刘文典、樊际昌、陈岱孙、陈序经、李卓敏、丁佶等教授。虽两人合住一间，但毫无怨言。

此时，联大文、法学院已开课。这学期，先生仍开诗经、楚辞两课，每课四学分。(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五月五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介绍到蒙自的情况：

> 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在先总以为蒙自地方甚大，到此大失所望。数十年前，蒙自本是云南省内第一个繁荣的城市。但当法国人修滇越铁路的时候，愚蠢的蒙自人不知为何誓死反对他通过。于是铁路绕道由壁虱寨经过，于是蒙自的商务都被开远与昆明占去，而自己渐渐变为一个死城了。到如今，这里没有一家饭馆，没有澡堂，文具店里没有浆糊与拍纸簿，广货店里没有帐子。这都是我到此后急于需要的东西，而发现他都没有。然而有些现象又非常奇怪。这里有的是大洋楼，例如法国海关、法国医院、歌胪士洋行等等，都是关着门没有人住的高楼大厦，现在都以每年三两元的租金租给联合大学作校舍了。自从蒙自觉悟当初反对铁路通过之失策，于是中国自己筑了一条轻便铁道，从壁虱寨经过蒙自与个旧，以至石屏，名曰壁个石铁路(我们从壁虱寨换车来到蒙自，便是这条铁路)。但是蒙自觉悟太晚了，他的繁荣仍旧无法挽回。直到今天，三百多学生，几十个教职员，因国难关系，逃到这里来讲

学，总算给蒙自一阵意外的热闹，可惜这局面是暂时的，而且对于蒙自的补益也有限。总之，蒙自地方很小，生活很简单。因为有些东西本地人用不着，我们却不能不用的，这些东西都是外来的，价钱特别贵，所以我们初到此需要一笔颇大的"开办费"。但这些东西办够了，以后恐怕就有钱无处用了，归根的讲，我们住蒙自还是比住昆明省。

同日 致父母亲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孩子读书事，尤其强调要重视根柢之学：

鹤、雕两儿来函云现方从大人读书，甚感兴趣，雕儿写信较前尤有进步，殊可喜也。男意目前既不能学算术，则专心致力中文，亦是一策。惟欲求中文打下切实根底，则非读旧书不可。在平时同事中如孔云卿、刘寿民二君皆令其少君读《四书》，殊有见地。男意鹤、雕亦当仿效。曾见坊间有白话注解本，可购来参考，以助彼等之了解。纵使书中义理不能真实领会，但能背诵经文，将来亦可终身受用不已。驷弟方致力国学，经史理宜并治，倘能同时读《四书》，遇有新解时，亦不妨对两儿随时加以指示，如此两儿受益，诚不待言，对驷弟或亦可增加读经之兴趣也。

五月七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时，武汉危急，鄂省震动，民众纷纷外迁避难，先生父母下之大家族亦有迁往松滋之议。信中先生云："迁松滋我甚赞成，细叔[①]主张早走尤其是对的，人多，在松滋当然不便，到了那里，仍然要疏散。"

同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述及为其在西南联大谋求教职事："蒋梦麟近来蒙自小住，公超已将聘弟事详细谈过，现决由联大聘请，将来三校分开时再由北大续聘。资格为教授或副教授尚未定，月薪大约三百四十元。梦麟一星期内回昆明，即将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请求通过。此事今番应无问题，俟议案正式通过后，再行函告。"

闻家驷原已受聘于北平辅仁大学，因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克北上，闲居于浠水。经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主任叶公超推荐，是年十月十一日被聘为该系法文副教授，旋晋升教授，讲授法国文学。抗战胜利复员，闻家驷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

同日 致闻家骥、闻家骢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中云："时局变化，家中人口众多，急宜疏散"，"如驷弟事成，我家到松滋后，弟与驷弟两房可由松滋转道重庆贵阳来滇"，"弟等两房分出后，则家中人口较少，可减少拥挤也。至生活问题，弟与

① 即闻家驷。

驷弟一日发薪，即当量力接济一日，不必发愁，望禀明双亲放心，一般观察对抗战前途乐观，故暂时忍此痛苦，不久即可重见天日”。

五月八日　在蒙自的清华大学师生举行建校二十七周年校庆纪念会。校长梅贻琦发言中要求同学们保持清华精神，继续学业。接着由女生献旗，上书“寿与国同”四字，下书：“经兹国难，寄迹滇南；西山苍苍，永怀靡已。”继之浦薛凤教授与王、杨二同学发言。后由涂文先生领众人呼口号。晚七时半，全体师生茶会，有游艺助兴。（据《清华师生在蒙自开会纪念母校新生》，《云南日报》，1938.5.13）

五月十日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议决，“成立本校蒙自部分文、法商两院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推定樊际昌、赵迺抟、陈序经、陈筧谷、陈总、叶公超、朱自清、姚从吾、闻一多为该会委员。樊际昌为召集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是月上旬　给立鹤、立雕两儿写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孩子的关怀：

> 今天上课回来，看见桌上一封家信，已经喜欢得很。拆开一看，文字比从前更通顺，字迹也整齐，我更高兴。再加上信中带来消息，说北平的书寄来了一部分，尤其令我喜出望外。今天非多吃一碗饭不可！你们的信稿究竟有人改过没有？像这样进步下去，如何是好！你们真应感谢祖父，应当加意服侍祖父和祖母。你们年纪一天大一天，应该能够服侍。写信可以代替作文，以后要每星期来一次信。如果太忙，可以由你们二人和你母亲轮流写。信中少说空话，多报消息。家中或乡间任何琐事，都是写信的资料。这样写法，我每次接到你们一封信，不就等于回家一次吗？上次写信给祖父，请教你们读《四书》，不知已实行否。在这未上学校的期间，务必把中文底子打好。我自己教中文，我希望我的儿子在中文上总要比一般强一点。

是月下旬　蒙自分校清华政治学会请最近由北平抵蒙自的历史系教授刘崇鋐报告“北平现况”，诉说北平人民在敌伪压迫下之生活情形。（《铁蹄下的北平——刘崇鋐先生在临大报告》，《云南日报》，1938.5.26）七月十日，新从天津抵达蒙自的南开大学教授傅恩龄也报告了日寇在天津的暴行。（蓓君《暴日铁蹄下的平津——傅恩龄昨在联大报告》，《云南日报》，1938.7.11—12）

五月二十六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催促家人早日来云南，说：

> 这几天战事消息不好，武汉不免受影响。乡里情形如何？颇令人担心。万一有移动的必要，你们母子一窠实是家中之大累，想至此，只悔当初未能下

决心带你们出来。日来正为此事踌躇，同事们也都劝我接你们来，所苦者只有两事不易解决：一、我自己不能分身，而家中又无人送你们。二、你们全来，盘费太大。今天接到（陈）文鉴来信，其意甚愿来滇复学，万一决定来，你们可以同他一路走，我只须到香港或海防来接你们，既可省点路费，又不多费时间，岂不甚好。至于你们的路费，我计算起来，少则五百元，多则六百，数目实在可观，然而为求安全起见，又有什么办法呢。并且鹤、雕在家不能入学校，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家固可学点中文，然而算术究竟是最要紧的，他们多耽搁一年光阴，就给我们多加一年的担负，从远处着想，这事实在非同小可。战事非短时可以结束，学校在昆明已有较长久的打算，筹好了三十万建新校舍，内中并有教员住宅。本来俟校舍完成后（约一年半），我是想接你们来的，现在乘文鉴来滇之便，你们若能早来，实在最好，因为路费早晚是要花的，而鹤、雕的学业又可以少耽误。好在我手头还有四百五十元存款，再从朋友处通挪一点，可以凑足这笔路费。同时四月份薪金不久总可以发下，可作到后生活费之用。学校经费情形并不算坏，已详前函，你们来后，我与你们吃点苦，断炊是不至于的。现在同事们的家眷南来者日多一日（最近新到一批，有朱佩弦、孙晓梦、王化成、冯芝生、袁希渊诸太太），学校决不能让这些人饿死在这里。再者昆明地方生活程度不高，蒙自尤可简省，气候之佳，自不待言。此间雇人不甚容易，所以赵妈同来顶好，许多太太想由北方带用人来而不可得，赵妈能来，倒是我们的幸事。我想你们不必犹疑，只要得到文鉴同意，就可马上准备。办护照是一件麻烦事，应早上省照像，请护照事，可请十哥在外交部托一熟人，或可稍快点。路费我立刻用航空信汇至武昌，款到即可买车[票]南下，恐时局变化，路又不通也。为节省计，我想我就到海防来接，我住天然旅店，你们到后，可来电告我。

信中还列出七项途中注意事项，十分周到。并说："途中自然相当麻烦，但若拿出我步行三千里路的精神来，也就不算一回事了。"

同信还附有一封给张秉新的信，张去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时在香港华侨中学任教。先生请张在自己家眷途经香港时，给予照应。该信中还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素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后妻子未经香港，该信未交张秉新。

五月二十七日 致父母亲信。告闻家驷事进展情况，并勉陈文鉴、闻立恕来西南联大复学。全信如下：

时局变化不测，家中殊可顾虑，就人力所能设法者，惟有尽量减少家中人口，庶以后行动较为灵活。关于接眷来滇种种，具见另函，此不赘述。顷公超来谈，校中下年须聘日俄法文教员各一人，法文以驷弟为最适宜，杨今甫主张找梁宗岱回来，宗岱南开旧人，南开处处减省，似不欲积极请其回校，以增加担负（因教授薪金由原校付），而蒋梦麟则对宗岱甚不满，梁与胡适之感情甚恶，梅贻琦无所谓，故就常委意见分析之，驷弟颇有望也。此公超所言，然公超办事热心有余而毅力不足，尚须看最后决定如何也。鉴甥[①]复学自属正当，恕侄[②]近况如何，颇以为念。前既未随校前来，今虽欲来，恐路费不易解决也。校中下年拟招新生五百人，一切进行均甚积极，后方空气宁静，故得如此耳。

五月二十八日　致顾毓琇信。信云："汉皋别后，瞬将半载。尚忆当时与兄谈及临大迁移事，曾主张徒步入滇。不谓当时所坐而言者，今竟能立而行之也。此次经验颇为丰富，他日再与故人聚首，定可再作竟夕谈矣。兹有恳者清华国文系同学刘君寿嵩，本年行将毕业。刘君成绩甚优，兼能创作，为人尤谨厚沉着。部中倘有相当位置，务希留意，予以安置（如部中无机会，亦请设法转荐，至祷至祷）。无任感戴之至，便中仍盼示复为幸。"（据该信原件）

是月　约在这时，向长清、刘兆吉等同学在湘黔滇旅行途中商筹的诗社成立了，因蒙自有风景优美的南湖，诗社就取名为"南湖诗社"。先生与朱自清欣然应请，担任了诗社的导师。

刘兆吉《闻一多朱自清指导的南湖诗社始末》记述到："文法学院迁到蒙自。一天，我和向长清商量如何实现旅途中提出的成立诗社的计划。我们一起拜访了闻一多先生，同时想到朱自清教授也在蒙自分校，因而也请他为指导教师。两位教授欣然同意。我俩立即分头邀请同学加入诗社。因为在南岳时，曾多次出壁报，对于爱好写诗的人，已经心中有数，很快就组织了二十多人的诗社，并同意命名为南湖诗社。因为诗刊没有经费，同学们多来自沦陷区，经济困难，出刊形式只好因陋就简，采用壁报的形式。投稿人把诗写在稿纸上，然后交给向长清或我。也没有明确谁是主编，就由我们两人，有时也请别的同学略加修改编排一下，贴在整张牛皮纸上，有时贴在旧报纸上，然后张贴在校舍的墙上。……诗刊共出四期，形式虽然很简陋，但从内容分析，的确有许多好诗，有些诗篇达到了发表的水平。我们选了一部分给闻、朱两位指导教师过目，他俩也称赞是好诗。每次诗刊贴出都有许多同

① 即陈文鉴，时准备回清华复学，路上可护送先生家眷。
② 即闻立恕，后因故未回清华复学。

学、也有老师围观，'诗人'们也受到鼓励，暗暗自喜。为了商量出刊、审稿的小型会，或三五人的碰头会是经常开的。有指导教师参加的诗社全体社员座谈会，只开过两次。在我模糊的印象里，似乎谈及新诗的前途、动向问题，也谈到新旧诗对比问题，对新旧诗问题有过争论。……绝大部分诗社成员的意见，连闻、朱两位指导教师在内，都主张南湖诗社以研究新诗、写新诗为主要方向。可惜，仅开过两次的社员大会的会议内容都淡忘了。发言内容是很丰富的，两位指导教师都作了较长时间的指导性发言。还记得没有邀请而主动来参加会议的知名逻辑学教授沈有鼎先生，也作了很好的发言，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这也是对诗社的支持。"(刘兆吉给编者的专文，1988.7.21)

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最早的一个文艺团体，诗社在蒙自开了两次座谈会，有一次先生和朱自清也参加了。赵瑞蕻回忆说，那天先生"随意聊天似的，谈些关于诗歌创作、欣赏和研究的问题，很引起我们的兴趣，受到真正亲挚的教益。闻先生说话风趣得很，几次说自己落伍了，此调久不弹了，但有时还看看新诗，似有点儿瘾，你们比我当年写的'高明'。而朱先生较严肃，说话慢慢的。他说新诗前途是光明的，不过古诗外国诗都用用心学。"(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怀念穆旦》，《离乱弦歌忆旧游》第14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

南湖诗社存在的虽然很短暂，但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文学组织。它的成员有向长清、刘兆吉、查良铮(穆旦)、赵瑞蕻、刘绶松、周定一、刘重德、李敬亭、林振舒(林蒲)、陈三苏、陈士林、高亚伟、周贞一。蒙自分校结束后，文学院搬至昆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学社。

六月十三日 致父亲信。部分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时，合家迁滋事已罢，母亲允先往沙洋，而父亲则因家中人口较众，行动不易，不愿离开故土。先生从闻家驷来信得知，十分忧虑，云：

> 若全家皆走，而大人一人在家，纵托安全，男等心中亦无宁息矣。仍望再作考虑，改变前意，以免男等于罪戾。……鹤等前次未随男来滇，致今日为一大系累，使大人分心，男自认无识，死罪死罪。然事已至此，无可如何，万一彼等无人护送，全家复决定迁移，仍祈在可能范围内附属任何部分，暂避至一较安全地带。一俟男功课结束，即当归来接至云南，决不至久为系累也。男本不敢存此非望，故在另函中未提及此层，然倘蒙大人主张，并诸兄弟念及半世骨肉之情，使男室家免于离散或死亡，则感恩戴德，没齿不忘矣。掬泪陈词，倘有语涉质直，然决无丝毫意气存其间，诸兄弟见此，幸勿误会也。

同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时松滋不能去，而广州又于六日遭

日机轰炸，粤汉铁路行车危险，家眷原定赴云南之路线无法实现。先生焦急万分，又拟了三种办法。信中还说：

> 这回是我错了，没有带你们出来。我只有惭愧，太对不住你们。……无论如何暑假中我定亲自回来接你们，什么危险也管不着。这边也有朋友们的家眷还在战区内的，如安徽、江苏、山东、河南都有，依然能汇款，能通信，也并无生命危险，所以万一你们暂时走不动，也不要害怕，我一生未做过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得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三哥信上说湘滇公路连护送人路费需五百元，现在我再汇三百元来，给你们凑成六百元。这钱你们能来就作路费，不能来就留下过日子。

六月十五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因游国恩将赴昆明，请兄长派人护送妻子孩子到长沙，再与游国恩一同赴滇。又云请内兄高孝慈送妻子至贵阳，自己亲去迎接。

六月二十二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仍是为家眷来云南的事，说："目下因黄河决口[①]关系，武汉形势应稍松点，但鄂东想必仍然紧张。你若未到省，当早些来，若已到，倒不妨在省上住些时，如果等天气稍凉来，也免路上吃苦。……总之我的意思是愿意你们来，但不希望你们即刻就来，一则因为另请人送花盘费，二则天气热恐路上生病，三则等到暑假，我来接，免得耽误功课。我的意见如此，你可与家中斟酌时局情形加以决定。"

六月二十七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今日校中得到确实消息，军事当局令联大文法学院让出校舍，因柳州航空学校需用此地，这来我们又要搬家。搬到什么地方，现尚未定，大概在昆明附近。……总之蒙自是非离开不可的。"又说到近日的生活："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原故，烟也未尝不能戒。"

是月　为清华大学外语系同学金石学家容庚的长女容琬题词："一条大路通云南，去时容易转时难。去时阳鹊未下蛋，转时阳鹊叫满山。贵州安顺民歌。容琬女史属书。闻一多。廿七年六月。"题词所录的是湘黔滇途中在贵州安顺县采集的一首民歌。（《西南联大师生致容琬诗文册》，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编印《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对日抗战七十五周年专场》，2012年秋季拍卖会第2876号）

---

① 是年6月9日，国民党新八师在花园口决开黄河河堤，以阻止日寇前进。

七月一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时，收到妻子上月二十四日来信，说三四日内即可动身到武昌。先生闻知稍稍放心，说："武汉局势暂时似不要紧，近日敌机仿佛也不大到武汉来，你们暂时在武昌住下再说，万一空袭来得厉害，就往咸宁[①]去躲一躲，请大舅[②]在武昌我家暂住，以便照料。""将来走时，仍请大舅送至长沙，到贵阳可找我的同班聂君照料。"

七月五日 朱自清来访，共商大一国文安排，"决定课本由八人轮流教授，作文三班以文言，七班以白话"。十七日下午又开会研究大一国文事，议决四项："一、新生甄别考试分为两级。二、甄别考试成绩优良之学生将免修大一国文，而代之以历代文选及历代诗选。三、其余学生将分为两组课本及五组习作，教员每人教一组作文，课本由八名教员轮流教授。四、教员经常讨论教学中之问题。"（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539、541页）

七月七日 出席蒙自分校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大会。分校主任樊际昌主持并致词，冯友兰发表演讲，强调抗战意义与必胜信心。会后，分校师生举行献金，共献金二千三百一十二元一角二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第201至202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七月八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因妻子即将上路，怕她钱不够用，汇了五十元给贵阳聂鸿逵，让妻子到贵阳时去取。聂鸿逵，字安陶，清华学校辛酉级级友，与先生同窗，时在贵阳工作。又催闻家驷赶快来昆明，"公超假中要回北平看家，驷弟须在公超动身以前来才好"。

七月十四日 先生向朱自清建议下学期中文系教授每人只开一门课。朱自清觉得这种想法有些"不顾其他各系"，遂在日记中写到："他对系内和校内工作的态度，使我深感不快。"（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540页）

七月二十三日 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课程结束。该院在蒙自仅仅三个月，在时局的动荡中，这里可说是相当的安宁，留下来的学生用功读书，赶到这儿的教师认真教书，为西南边城的文化开发作出了贡献。

先生埋头读书，常足不出户，郑天挺戏赠先生一雅号，云"何妨一下楼主人"。郑天挺给王云信中云："一九三八年联大迁滇，因昆明校舍不敷，文法两院暂设蒙自东门外原法国银行及原法国领事馆旧址。校舍仍嫌不够，于是又租了歌胪士洋行。歌胪士是希腊人，原开有旅馆和洋行。临街是洋行，这时已歇业，后为旅馆，上下两

① 妻子高孝贞的嫂嫂张氏的娘家，在咸宁。
② 即高孝贞的哥哥高孝慈。

层，亦已歇业。联大租旅馆为宿舍。楼上住教师，楼下住男同学。女同学住东门内周家一座三层楼内。当时教师多数住原领事馆内，住歌胪士洋行楼上者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孙、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和我十几个人。两人住一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1981.3.28，转引自王云《访蒙自随笔二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先生的这个雅号，后来被传到了昆明。那是一次由先生主讲的学术讲演会中，罗庸主持致词，介绍了这雅号的来历，一时成为联大的美谈。

其实，先生时刻关心着抗战的局势，并对持败北主义观点的人深为不满。日后先生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回忆说：

> 蒙自又是一个世外桃源。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
>
> 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联大八年》，第6页)

时，先生每日三餐与浦薛凤、陈寅恪、刘文典、周先庚、赵凤喈同桌，终日见面。浦薛凤在《忆清华级友闻一多》一文中，说先生此时便常批评时政，崇尚民主："在蒙自一学期，一多固埋首研思，但正值抗战，自必谈及时事，总觉其理想太高，不切实际，而且过分崇尚所谓民主自由。予尝告以民主自由不可一蹴而几，而且民主自由，有其得失长短，亦易发生流弊，尤其是遭遇内忧外患，即英、美先进国家亦必集权适应。伊大不以为然，往往批评时政激昂慷慨，一若深恶痛绝。……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曾高谈自由民主，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台湾《传纪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7)

七月二十五日　西南联大文学院举行大考。这时候，先生已赶往昆明，在陈梦家的帮助下，租到了福寿巷姚宅楼上的几间房子，为迎接家眷来昆明做好准备。

七月二十八日　致妻子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为妻子脱离险境而稍安：

> 武汉轰炸两次，心里着急，不知你们离开武汉否，接到你们初到长沙的电

报才放心，后来见报长沙也被轰炸，又急了好几天，直到前天二次电报来了，才知道全体动身，更是感天谢地。现在只希望路上不致多耽搁，孩子们不生病。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昆明的房子又贵又难找，我来了不满一星期，幸亏陈梦家帮忙，把房子找好了，现在只要慢慢布置，包你来了满意，房东答应借家具，所以钱也不会花得很多。照规矩算起来，今天可以到贵阳。如果在贵阳多休息几天，这信你便可以收到。

八月七日 下午一时，云南省教育厅与西南联大合办之云南中学师范教员暑期讲习讨论会举行开幕式，出席者有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云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等，及全省各地来昆参加讨论会的一百五六十位教师。先生担任这次暑期讲习会导师，与罗常培、汪懋祖、朱自清、魏建功、闻在宥、罗志英共同负责语文组国文科教材教法讨论。（据《全省中学师范教员暑讲会行开会式，龚主委以次各委员均出席，报到到会员达一百五六十人》，《云南日报》，1938.8.8）

举办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是教育部为提倡学术研究、促进中学教师进修对各省教育厅提出的要求，云南省于一九三七年暑假曾举办过一次。此时，西南联大迁昆，为暑讲会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西南联大非常重视这一工作，暑讲会聘定的语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组九科五十位讲师中，西南联大派出者便有陈福田、叶公超、吴宓、赵绍熊、刘崇鋐、雷海宗、钱穆、王信忠、张印堂、邱椿、戴修瓒、秦瓒、张佛泉、江泽涵、杨武之、华罗庚、赵访熊、刘晋年、陈省身、郑华炽、吴大猷、赵忠尧、周培源、霍秉权、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张景钺等三十五人，其中语文组国文科讲师为先生与罗常培、朱自清、魏建功。（同前）云南省政府也非常重视这次暑讲会，教育厅指令各中等学校必须参加，后有六十九所省立、县立中学、师范学校、主要私立中学及各职业学校派出的一百五十五位学员。

暑讲会于八月八日开讲，先生讲授情况尚缺乏记载，但应该是讲课后方赶往贵阳的，否则不会让高真和孩子们在贵阳等候。

八月中旬 先生由昆明抵贵阳。行前约定夫人携子女随闻家驷一家来贵阳，先生利用暑假前往迎接。夫人等一行约于七月中旬乘火车离武汉，抵长沙后旋改乘长途汽车沿湘黔路赴贵阳。此行正是先生徒步入滇时所走路线。沿途多高山峻

岭，车辆又差，皆十分陈旧之木炭车，不仅常抛锚，且爬坡极困难，必须边爬边以三角木在轮下支垫，往往只闻发动机怒吼声如雷贯耳，却不见车行几步。乘此等车在山高沟深之险路上盘旋，令人步步胆战心惊。时，湘西匪患极严重，闻家驷一家所乘之车，途中曾遇地方警察与匪群枪战，亦受惊不小。

夫人一行抵贵阳后，受到清华学校辛酉级级友聂鸿逵的热情照顾，初住龙泉街一六八号聂宅，后迁入旅馆。

是月　这个月，贵州省举办暑假中等学校教员讲习会，教育厅长张志韩为主任委员，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泽霖为委员之一。吴写信请先生担任暑期讲习会国文讲师，先生正欲往贵阳接家眷，遂欣然应允。

在贵州省暑期讲习会上，先生讲过《诗经》。林辰在《诗人学者战士——敬悼闻一多先生》中回忆这时的情形："民国二十七年，那年夏天，在贵州省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里，闻先生担任我们国文教学组的讲师。乍看到他时，我不免暗暗惊异：这飘着美髯，穿着古铜色长袍和平底布鞋，神态安详潇洒的中年人，就是当年风行一时的《死水》的作者么？我分明地记得，他第一次是给我们讲《诗经》里的《蒹葭》，很有许多新意，可惜现在不记得了。暑讲会不过短短的一月，我只听过他几个钟头的讲课，并没有直接和他谈过一句话。"（重庆《新华日报》，1946.7.24）

在贵阳白沙井二十号吴泽霖宅中，与吴谈到图腾研究，并劝他回清华大学任教。吴泽霖回忆："在贵阳时，他告诉我，他对图腾很想研究，并愿意同我继续讨论。同时，他告诉我昆明有许多老校友，清华社会学系教师不多，光旦兼联大教务长，陈达兼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工作都很忙。他劝我回清华，在联大教书，他说他回去后同光旦谈，再由光旦同我联系。后来果然光旦来信邀我回清华，并告诉我云南也有少数民族，可以从事调查研究。当时我在大夏要指导研究生，不便离开，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光旦的邀请。"（吴泽霖给编者的信，1987.2.6）

先生还曾去探望过一起办过《晨报·诗镌》的蹇先艾，不巧他回遵义探亲，未能相见，却与蹇的房东（也是位老诗人）谈得非常融洽，还一起游了黔灵山。（据蹇先艾《忆闻一多同志》，《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30页）

先生这次在贵阳因讲课，特别是长子立鹤患病，住了近一个月方返回昆明。

是月底　携眷和闻家驷全家抵昆明，住小西门内福寿巷三号。该处为昆明名医姚静轩所建，故门首正上方嵌有镶边黑石，上刻"静庐"二字。姚家自清朝乾隆末年以来世代为医，姚静轩还在武庙下街（今武成路）开有"福元堂"药铺。时，姚静轩已逝，静庐由其长子姚志沣居住。姚志沣的亲戚徐嘉瑞与陈梦家相熟，经陈、徐介绍，姚志沣将院内几间房子以极低价格租给先生。（姚仲华《姚府轶事》，山东画报出版

社编《老照片》第51辑，2007年2月出版）先生在家信中，也说到姚家借了些家具供他使用。静庐房子相当不错，院子约三十平方米，正南为三间正室，东西各有两间厢房，均为两层木构楼房，宽敞豁亮。院中有一石凿大鱼缸，西侧有很大的一所跨院，跨院北墙尤为别致，用砖砌成了镂花。墙边开有后门，通着一条小巷，门外就是一口水井。先生与闻家驷共租了七间房，月租六十元，相当中下职员一个月的薪水。先生家人口多，除了夫妇和五个孩子，还有保姆赵妈，一共八口人，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闻家驷一家住楼上另一厢房。房东姚志沣不时来与先生交谈，两家相处和睦，子女也在同校就学，关系甚好。（韦英《不朽精神育后人》，《人民政协报》，1996.7.25；王康《闻一多传》，第202页）姚志沣的儿子姚余庆，比立鹤小一岁，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立鹤本来不会下象棋，是姚余庆教会他的。他们常在八仙桌上玩棋，高兴起来就乱跑跳。一次，他们模仿跳降落伞，每人撑开一把油纸伞，爬到高处往下跳，不仅摔得皮破肉青，连伞面都鼓得朝上了，用云南话讲叫“倒鸡棕”。后来，西南联大成立附属小学，闻立鹤和姚余庆都于附小成立当年考入，后又都考入联大附中，两人的友谊延续了终生。（姚曼华《怀念余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51期，第92页，2012年4月印行）

静庐的生活很是安定，只是房东老太太常虐待丫环荷花，先生在楼上每每听到荷花的惨叫声，忍无可忍，急奔楼下劝阻。回到楼上时，嘴里还连声谴责“太不像话！太不像话！”闻立雕亦回忆说：“我们住在昆明小西门内一座楼上，楼下一个丫环被房东打得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叫声，听得人心如刀绞。父亲实在忍不下去，几步跨下楼去劝阻。回来后仍气呼呼地连饭也吃不下去。”（韦英《不朽精神育后人》，《人民政协报》，1996.7.25）

九月二十一日　昆明首次发出空袭警报。敌机自广西邕宁向西飞来，虽未飞抵昆明上空，但一时人心大为紧张。

九月二十八日　日机首次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租用为教职员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等处被炸。先生也因在中弹处附近，头部负伤。

是日九时许，敌机侵入昆明市上空。第一次警报响起后，先生立刻让三个孩子躲到一张结实厚重的桌子下面，桌上铺满棉被。此时，最担心的是在西门外实验小学上学的立鹤、立雕，警报发出后，先生让赵妈出城去接他们。不久，紧急警报汽笛响了，赵妈与立鹤均未回来，先生不放心，自己又匆匆出城寻找。行至半路遇见赵妈，知立鹤、立雕已随老师疏散，遂拟返回城内，但城门已关，准出不准进，只好再往郊外疏散。行至一木材场墙下，敌机九架迎面飞来，连续投弹。烟尘过后，赵妈发现先生头部血流如注。此时，救护队已出动并为先生做了临时紧急包扎。先生夫

人与闻家驷听到炸弹爆炸声，而先生父子与赵妈均未回来，万分着急，警报一解除立即奔往巷口观望。不久，见先生头缠绷带仰卧在一辆人力车上急速而过，衣襟遍染血渍，赵妈紧随车后，始知先生在空袭中负伤。闻家驷立即随车前往医院。经检查，系墙头落下之砖块所砸伤，伤情不重，缝了几针即回家休养。校方得知先生负伤，即派人前来慰问，陈梦家等友好闻讯后也纷纷前来探望。

对于这次轰炸，《云南日报》报道云："昨晨八时三十分接情报，敌机九架，有袭滇模样，八时四十分，据报敌机已进入我境东部，当发出空袭警报，嗣据报敌机行进至距昆明市一百五十公里处，立即发出紧急警报。九时十四分，此项敌机九架，窜入市空，在西门外昆华师范学校投弹三枚，毁屋顶部，死伤四人。苗圃投弹三枚，死伤我平民三十余人。潘家湾运动场左近投弹一枚，死伤数人。我高射炮密集射击，我空军跟踪尾追，敌机狼狈向昆明市东南方向逸去。十时三十五分，据报敌机只有六架出境，其余三架，根据我空军通□，一架经击坏螺旋桨，并据呈贡报告，得见该敌机中，有一架机尾出烟，谅以堕落，刻正在搜查中。本部当适时放出解除警报。再据宜良报告，敌机一架，被我击中燃烧堕落，在狗街东南，其余二架，负伤逃逸，正清查中。"又云："昨日午前八时四十分，敌机九架，侵入市空，炸毁民房等处，经市府警局调查结果，大西门外胜因寺前，被四弹，昆华师校被弹八，校内死亡八人，伤二人，建厅苗圃被八弹，长耳街被二弹，苗圃附近死亡三十三人，伤十一人，潘家湾死亡十一人，负伤三人，风翥街死亡八人，负伤七人，庆丰街机枪扫射负伤三人，其计死亡六十人，负伤二十六人，大西门城墙垛口震两个，拓东路八十二号住户山墙一堵。"（《敌机冒险犯滇，被我铁鹰击落三架》，《云南日报》，1938.9.29）

西南联大在这次轰炸中受到损失，学校租用的昆华师范学校中弹 14 枚，校舍变成废墟，弹坑直径两公尺以上，深度半公尺左右，集训总队长刘琨身亡，四位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同学受伤（醉秋《一笔屠杀的血账》，《云南日报》，1938.9.29）。这天，我空军奋起迎击，击落敌九六式重型轰炸机三架，俘虏跳伞敌飞行员池岛希索。（《"九·二八"惨杀案刽子手池岛被俘》，《云南日报》，1938.10.1）

十月六日　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九次会议决议，"成立'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并请冯友兰为该会主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 16 页）六月二十四日，教育部曾训令各级学校应将所编校歌呈送，以备查核。十月三日，再次训令限一个月内将校歌校训呈报。西南联大为此专门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

十月十一日　先生胞弟闻家驷受聘为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十月三十日 出席西南联大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会议，讨论罗庸写的歌词与曲谱。结果接受歌词，未接受曲谱。歌词取《满江红》词牌形式，为：

万里长征，
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
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
弦诵在山城。
情弥切！

千秋耻，
终当雪，
中兴业，
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
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倭虏，
复神京，
还燕碣。

关于校歌曲谱，朱自清提议请清华大学毕业生、时在广西宜山任浙江大学讲师的张清常担任创作。张清常不负信任，于十二月完成曲谱。

十一月二十四日 西南联大本年度第一学期开始注册。

这前后，一年前已考取清华大学的刘功高同学，因战乱动荡，迟迟到校。注册组初欲拒绝注册，先生恰来注册组办事，经力争始得让刘功高办理入学手续。刘功高回忆这经过说："一九三八年抗战的烽火燃烧到武汉。在敌机的轰炸中，我在武汉报考清华大学。考后，回到家乡新堤。那时秩序已混乱，我随家人好不容易才逃难到宜昌。在无意中，见宜昌中学的榜文上有我的名字。原来是清华大学因武汉

正在大轰炸中而改到宜昌发榜。发榜至今已快一年，红榜已变成白榜。于是我马上赴重庆教育部办理去昆明的手续。到校后才办入校手续，有关人员因为我来得太迟而有难色，我恳切地说：'此地我无亲友，无安身处，必须马上入校。'正在交涉时走来一位身着蓝布大褂，目光炯炯，飘忽若仙的长者。他问了我的情况，我述说如何历尽艰险，从湖北来到昆明。长者听了怒而拍案，对那人说：'一个年青的女学生，千辛万苦来到昆明，那有不收之理，你不收，我收了。'在长者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办好了入校手续。之后，从他人口中知道长者就是闻一多先生，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幸运地做了闻先生的学生，四年来一直受到闻先生无微不至的教育和关怀，他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刘功高给编者的信，1988.3.24）

同日　先生等向西南联大常委会呈送所拟定的校训"刚健笃实"四字。三十日，第九十五次校常委会议决以"刚毅坚卓"四字为校训。

是月　参加抗日话剧《祖国》的舞台设计与制作。十月上旬，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发起为在前线与日寇鏖战的滇军子弟征募棉衣运动，省政府议决募集棉衣20万件，昆明民众纷纷响应，西南联大一些同学和教师决定排演四幕话剧《祖国》，以演出收入作为捐款。《祖国》是西南联大到昆明后上演的第一部话剧，它诞生在反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斗争中，其主题鲜明地体现了歌颂抗战精神、反对妥协投降这一时代需要。该剧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年轻教授陈铨根据法国剧本《古城的怒吼》改编而成，剧情描写在日军占领下的某个城市里，一位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与个人恩怨，与他的学生和工人们一起向日军和汉奸作坚决的斗争，最后为祖国壮烈牺牲。这是一出鼓舞民气的话剧，先生积极参与了许多工作，出了不少主意。

在排练中，剧组中的联大学生（其中有民先队员和中共地下党员）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决定把临时性的剧组发展成一个长期性的有组织的社团，起名为"联大剧团"。年底，他们在租借作为西南联大校舍的昆华农校大楼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者有六十余人，先生和陈铨以及在剧中担任指导、角色的孙毓棠、凤子等，也到会了。先生在会上还作了发言，张定华《昆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联大剧团"》中记述先生讲话："成立话剧团，开展戏剧活动，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想到前方在抗战，同胞们在敌人的铁蹄下受苦难，你们能来后方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剧团成员要演戏，但不能荒疏学业，一定要认真读书。"（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5辑，1985年出版）凤子在《永生的未死的》一文中，也记述了先生这时的活动："联大剧团成立了，果然闻先生分出一部分时间，参加指导工作。不论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包围着他。舞台设计，以及服装他都不吝惜他的意见。……当他在舞台幕后检查工作的时候，那份精神是青年

人所不及的，他热烈地辩论着，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他很少放弃他说话的权利。"（《人世间》，1947年第5期）

十二月一日 西南联合大学开学上课。先生这年度给中国文学系文学组二年级讲"楚辞"，给语言组三年级讲"尔雅"，均为四学分。（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此外，还开大一国文课程。

"楚辞"课，这学期仅讲了一篇《天问》。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在'楚辞'班上，他先讲《天问》，手里拿着四易稿的《天问疏证》，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字也不含糊，详征博引，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学期完了没考试，令学生就《离骚》作一篇报告。"（《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64页）

大一国文讲的是"诗经"，地点在学校借用作为教室的昆华农校主楼。昆华农校位于大西门外，楼顶四角飞檐翘起的三层主楼刚刚建好，是当时昆明最醒目的现代化建筑，一九三八年度的大一国文课程就在这里开设。在这里，先生讲授过《诗经·采薇》（据许渊冲《闻一多与陈梦家》，《诗书人生》第3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杨振宁亦在这时听先生的课。当时的经济系学生戴今生也在这时听过课，他回忆："闻先生那时刚四十岁，给我们开大一国文。他穿长衫，留着不长的胡子，显得很特别。他讲课慢慢吞吞，有股派头。记得'诗经'课上，他先介绍《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讲解了几首诗，其中《东山》一首，特别强调随周公东征后回家战士的心情，使同学们感觉到仿佛就是抗战胜利归来的将士。"（访问戴今生记录，1986.12.30）

同日 致孙作云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孙作云是听到先生在日机轰炸中受伤后特来信询问的。先生回信中还说到了湘黔滇旅行及眼下的学术研究工作：

> 居然得到你的信，南来以后未有如今日更高兴的！受伤是确实的，但是轻，一星期后即恢复，承你和在平诸友关心，感激之至。想不到关于我的消息，你知道了那么多，而且都正确，我的内心生活，想来你也最能了解，四千里的徒步旅行算什么？一个人只要有理想，有勇气，任何艰苦的事都易如反掌。在学生中没有比你更能了解我的，做学问如此，其他一切莫不皆然。唐先生是我最心折的学者，你从他治三礼，一定获益不少。希望你能常常追随他，近闻唐先生将迁居，你能否随他搬动？内人及鹤、雕诸儿常常念及你，他们是今年秋天来此的。今年定开"楚辞"、"尔雅"二课，本年内决将楚辞旧稿整理完毕，校勘部分已缮毕。《离骚》、《九歌》、《天问》、《卜居》、《渔父》、《远游》、《九辩》，签注部分较繁重，现只完成《天问》中夏史数十条，如果你在这里当然可以帮我不少的忙。昨天发现浇是始作甲胄的人，因而楚辞中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吕

览·勿躬篇》曰"大挠作甲子","大挠"即"浇","甲子"衍"子"字,下文"黔如作虏首","虏"即"櫓",字一作"櫓",作"楯",盾也,甲盾同类,故连举。我的书如有法打听,请费神打听一下,但拿出来恐不容易,王守惠、孙德宣、邓懿诸君亦时时在念,望以近状见告,以慰边思。

十二月七日　请朱自清至新雅饭店晚餐。(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562页)

十二月十六日　与浦江清赴朱自清家,共同选定特别阅读室展出的书目。(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564页)

十二月三十一日　会见茅盾。茅盾是应盛世才邀请,由香港去新疆,二十八日途经昆明的。他听人讲西南联大教授与文协昆明分会的地方人士联系不够,觉得这样不利于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于是约见了先生和朱自清、吴晗等。

这次谈话的情况,茅盾在回忆录《从东南海滨到西北高原》中说:"我就由顾颉刚陪着拜访了朱自清;佩弦兄又派人去请冰心、闻一多和吴晗,冰心不在家,而我与吴晗是初次见面。这些教授先打听老朋友的消息,尤其关心原来在广州、武汉的一些朋友的行踪和安全。接着就谈起抗战文艺运动中的问题。我作了介绍,发现他们并非不了解情况,相反,他们很注意这些问题,只是自己没有参加进去,取了旁观的态度。我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我说,抗战以来我走过不少地方,所到之处都发现这个问题。当地文化界的力量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他们欢迎外来的文化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往往合作之后却发生矛盾,甚至闹得很紧张。据我观察,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我总认为我们这些'外来户'应该多担点责任。吴晗说,沈先生的意见很对,昆明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就很少与当地的文化界联络,因此社会上也有些风言风语,不过,责任还在我们。朱自清说,我们这些人在书斋里呆惯了,不适应那种热闹场面,有人就说我们摆教授架子,其实本地的刊物约我写文章,我就从不推托。我笑道,佩弦兄误会了,参加抗战文化活动并不是要我们去学'华威先生',而是要有个统一的组织,使大家的步调能一致。至于我们这些人的本事,也就是写写文章,对抗战中的各种现象和各种问题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各位的口才都在兄弟之上,还可以向民众作些讲演。顾颉刚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闻一多说,我们应该先与云南大学的同行加强联络,譬如组织个大学教授联谊会之类,能经常谈谈心,沟通思想。我说,这是个好办法,云南大学的楚图南过去我不认识,这次见面,觉得人很热情,他又是文协云南分会的负责人,你们何不约他交换交换意见,把云南文化界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有了统一的组织,再分工合作,即使有不同意见照样可以保留。这几天我接触了昆明文化界各方面的人士,觉

得云南的抗战文艺工作方兴未艾，有很大的潜力，如能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那就如虎添翼了！我们又议论了汪精卫投敌后的国内政治形势，认为汪的投敌当汉奸，从反面说，也是一件好事，好比挖掉了抗战躯体上的一个毒瘤，也许能促使蒋介石坚定抗战的决心。在我要告辞时，他们提出请我到西南联大作一次讲演，内容就是我向他们介绍的关于抗战文艺的现状。我推辞不了，只好说，那就开个座谈会在小范围内讲讲罢，请不要对外张扬。”（《新文学史料》，1984 年第 2 期）



闻一多年谱长编

【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闻一多年谱长编

下卷

闻黎明 侯菊坤◎编著
闻立雕◎审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闻一多年谱长编

增订版

下卷

闻黎明 侯菊坤◎编著
闻立雕◎审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按年谱长编体例编写，客观、完整和系统地记录闻一多先生各个时期的生平历史。全书由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组成。谱前主要记录家世渊源，正谱包括家庭生活、求学经历、社会政治活动、文艺创作理论、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思想发展、个人情操、友朋交谊等，谱后记录闻一多殉难后，国内外的反响和查处过程以及各界人士的追悼、纪念活动等。本书以原始或直接资料为基本史料，广泛收集宣言、函电、演讲记录、听课笔记、时事答问、报刊报道、档案文献、友朋学生的回忆和日记等相关信息，并参考走访记录和信访复函等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年谱长编：全2卷／闻黎明，侯菊坤编著．
—增订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ISBN 978-7-313-08647-1

Ⅰ．①闻… Ⅱ．①闻… ②侯… Ⅲ．①闻一多(1899～1946)—年谱 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5996号

闻一多年谱长编(下卷)
——增订本

编　　著：闻黎明　侯菊坤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960 mm　1/16　　总 印 张：65.75　　插页：12
总 字 数：1190千字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08647-1/K
总定价(全2卷)：3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61453770

一九三九年　四十一岁

一月一日，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同日，政论性刊物《今日评论》在昆明创刊，主编是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

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公布《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五月实施"精神总动员运动"。

五月十五日，《中央日报》昆明版创刊。

八月二十三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九月九日，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在重庆开幕，会上决议成立宪政期成会，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由此开始。

十月十日，我军湘北大捷，是为第一次长沙会战。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民主同盟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

一月四日　茅盾应邀出席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的座谈会。会上朱自清致词，茅盾作了"文艺问题的两面看法"（即光明与黑暗两面）的讲演。先生当亦到会。

一月十三日　与朱自清商谈大一学生课外读物。朱自清日记："下午在闻家商谈大一学生课外读物事，定书名如下：《鲁迅全集》、《从文选集》、《茅盾选集》、《巴金选集》、《志摩选集》、《日出》、《塞上行》、《欧游杂记》、《蒋百里文》、《汉代学术史略》、《胡适文选》、《人生五大问题》、《诗与真》一集、《人物评述续编》。"（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二月十八日　四幕话剧《祖国》以为前方将士募集鞋袜义演名义，在光华街云瑞中学礼堂首次公演。演出前，先生早早来到剧场，带领同学安置布景、道具。

先生为该剧排练和演出做了许多工作，得到大家的高度赞扬。陈铨在《联大剧团筹演祖国的经过》中说："谈到导演，我们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中国艺术界的老

将闻一多先生。闻先生自从《死水》出版,开创中国诗坛的新方向以后,一直到现在都埋头在作考据的工作。这一次居然肯答应出来帮忙。舞台面的设计,完全是闻先生一人的手笔,解决了导演第一步的困难。以后几次重要的排演,闻先生都现身参加,贡献许多最可贵的意见。假如这一次公演,能够有相当的成功,那么闻先生是我们第一个功臣。"(昆明《益世报》"联大剧团公演祖国专辑",1939.2.18) 联大话剧团也说:"闻一多先生自动的答应担任舞台设计,虽然闻先生是那么忙,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晚上我们排□的时候他总是亲自莅场指示一切的,这次的舞台面是那么完美,合理,全是闻先生的力量,因为闻先生不仅是个诗人,还是一个画家。"(联大话剧团《敬谢赞助本团的人们》,昆明《益世报》"联大剧团公演祖国专辑",1939.2.18)

先生设计的布景和灯光,给观众的印象尤为深刻。一位记者说:"舞台上最使人悦目的是那几幅好布景,这应该谢谢闻一多先生精心设计所陈列的家具和各种装饰,精致大方,配色亦极和谐。依记者说:这在昆明半年来的话剧表演中,是比较最使人感觉满意的。"(南江《联大剧团"祖国"美满出演,全剧精彩百出,观众情绪紧张》,昆明《益世报》,1939.2.19) 一位观众也称《祖国》的布景是"诗人的布景",说:"闻诗人设计的布景、电光,使每个观众满意,特别在色彩上,例如第一幕和第四幕,是同一地点,但是为了二幕是不同的场合,一是忠勇的场合用了黄色灯光,一是悲惨的结果,用蓝色,同时两种不同的色彩,也分别了日夜。"(心丁《致联大剧团一封公开信——观〈祖国〉演出后》,《云南日报》,1939.2.20) 朱自清在本月二十日日记中,也写到"舞台设计佳"。(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2页)

《祖国》演出原定二十二日结束,但每晚不到七时,所有的座票就全部售尽,以至有些观众要求站着看。为了满足观众愿望,联大剧团发出启事,决定续演三天。启事云:"敬启者,敝团为前线将士募集鞋袜公演《祖国》以来,多蒙各界赞助,今又蒙来函纷请续演。敝团盛情难却,决再加演三日,至本月二十五日止,票价照旧,深望爱国士女届时参加,共襄义举,俾福利前方将士,至为公感。"(《西南联大剧团续演祖国启事》,昆明《益世报》,1939.2.22)

《祖国》演出获得很大成功。重庆、上海等地也都登载了《祖国》演出的消息和剧照。

二月二十五日 《祖国》连续演出八天,胜利结束。结束后剧组人员曾举行聚餐庆贺成功,先生很是兴奋,"举杯邀大家共祝抗战早日胜利,并说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他就要剃去自己的飘然长髯"。(张定华《昆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联大剧团"》,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5辑,1985年出版)

二月二十六日 《宣传与艺术》发表于昆明《益世报》"星期评论"专栏。文中认

为目前的抗战宣传不得法，主张宣传工作要讲技巧，不能只是标语口号。这是先生到昆明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亦是先生在抗战初期发表的唯一一篇文艺评论，特录如下：

在抗战第二期开始时，蒋委员长曾以“政治重于军事”的方针昭示国人。政治所包甚广，但唤起并组织民众以期达到真正的全面抗战当然是其中最主要部分。最近开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议，委员长又提出精神动员的方案。举凡领袖所侧重各点，在理论上其重要性无庸申述，问题只在如何实施。实施的步骤当然首重宣传，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宣传不得法，起码是枉费精力，甚至徒然引起一些不需要的副作用。或者更严重的反作用。宣传之不可无技巧，犹之乎作战之不可无器械，器械出于科学，技巧基于艺术。

回顾抗战以来我们宣传的工作实在难令人满意。我们所有的宣传似乎大部分还不离口号标语，文字的宣传固然是放大的口号标语，即音乐图书戏剧各部门亦何莫非变相的口号标语？大致说来，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似乎只顾宣泄自己的感情，而不知道如何将它传达给别人，所以结果只有宣（或竟是喧）而无传，于是多数的宣传品便成为大家压惊壮胆的咒语符箓，数量尽管多，内容却不必追究了。总之，我们的宣传品徒有形式而缺乏内容，其原因则在做宣传工作的人热情有余，技巧不足。

首先在宣传工具的选择上，太重视文字，就是错误，须知文字根本是一种叙事与说理的工具，在感动的功能上，它须经过一段较迂缓的过程，因此它的效用便远不如音乐图书戏剧来得迅速而直捷。对于识字阶级，文字宣传的力量已经有限，何况我们绝大多数的民众是文盲，文字对他们，根本无效呢？既然我们宣传主要的对象是一般，尤其是农村的民众，而大部分宣传品的影响恰恰是达不到他们，这是何等严重的矛盾！便就现今已有的文字宣传而论，我们似乎将宣传的意义看得太窄点。符箓式的标语，对于知识稍高的人们，不久已是一种侮辱吗？关于抗战理论的文字，不已经成为“抗战八股”吗？报纸上的新闻，不是常常被认为“宣传”，意思说是假的吗？这些工作我们做得不少了，虽则其效果有多少毕竟是疑问。也许正如间谍工作是收入消息，这种宣传工作是放出消息，也许这是战时不可少，甚至极重要的工作，但这不是我所谓宣传。我所谓宣传，在文字方面，是态度光明而诚恳的文艺作品，在形式上它甚至可以与抗战无大关系，但实际能激发我们敌忾同仇的情绪，它的手段不是说服而是感动，是燃烧，——它必须是一件艺术作品。这类的文字，就我

个人所知道的而论，除了几篇委实可歌可泣的报告文学（战地通讯）之外，似乎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东西了。但是我们胜任的作家应当不少，他们都藏到那里去了？

不过真正能读懂一篇文艺作品的人究竟太少，在我们特殊情形之下，文字宣传究不如那"不落言诠"的音乐图书戏剧等来得有效。

在情绪传播的迅速上，音乐是再好没有的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正大可有为。过去在这方面的成绩总算比较令人满意，但仍欠普及，欠深入。最近我看过一个戏团的公演，在最末一幕终了时，几个游击队正在和敌人苦撑，青天白日旗忽然从山后飘扬起来，随着一阵救亡歌曲的声音，援军到了，幕下了，幕后歌声仍然不断，并且愈加激荡了，想必舞台上全体人员都加入了。这时我满以为台下全体观众也会响应起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多么伟大！全堂六七百人一齐怒吼起来，那点经验的教育作用，不要胜过千百篇痛哭流涕或激昂慷慨的论说或演讲吗？

然而幕下了，台下一阵喧哗，散戏了。我急得直跺脚。这是我们音乐宣传不够普及与深入的一个实例。

讲到图书，也许最令人伤心。办了一二十年艺术教育，到如今没有几个人能够画出一个人体，不带上许多解剖学的错误。

大师们追着这派那派西洋潮流效颦，却有始终不会使木炭在张白纸上老老实实研究过一个人体的。结果徒弟们相习成风，在漫画木刻里勉强描个似是而非的人模样，加上一个标题，就算是画了。就抗战以后我曾到过的武汉、长沙、贵阳、昆明四个都市讲，我就从未见过一幅像样的宣传画。特别在长沙，你走过一条街，往两旁墙壁上一望，不啻是做着一场噩梦。在武昌街上我倒发现过一幅在人体上还站得住的宣传画，但那作意真别扭得可以。我亲耳听见一群乡下人聚在画前发议论，原来把画中的意义整个弄反了。

同类的情形若发生在戏剧里，结果可就严重了。听说某处开伤兵慰劳会，演了一出话剧，伤兵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把演员打了。平情而论，抗战以来，戏剧真够努力的了。可惜的是愈努力愈感觉"剧本荒"。把仅有的剧本，一堆堆的口号，勉强搬上台，导演者十九又不能尽其责。在这剧作家与导演家两头不得力的苦境之中，真辜负了不少的好演员。

要晓得上述各种工作，除了那与间谍工作异曲同工的文字宣传是由政府主持的，其他则差不多全是人民自动的工作。在此情形之下，人力不能集中与夫财力不济，往往使工作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是应该原谅的。说政府知道了

宣传的重要，但何以对宣传工作进行的方法这样大意，而把最有效的部分丢着不管呢？诚然像这次抗战在我们历史上是第一次，所谓发动整个民族力量的全面抗战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对这种抗战的技术我们完全不娴习，但是现成的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借镜呢？难道我们真依然是八股脑筋，只知道舞文弄墨的宣传才是宣传，而别的全不认识吗？我要问后方工作究竟是否至少与前方工作同样重要？若然，这样松懈，这样低劣的宣传就可了事吗？时机迫切了，不赶紧想办法，还谈什么最后胜利？其实这点工作，只要政府真正推行起来，并不甚难。把一切胜任的人才动员起来（现在有的是在西洋受过很好训练的艺术专门人才闲着没有事做），组织起来，发一笔在整个国家预算中微乎其微的款子，就中一部分可以用来购置一点新式设备（如制版、印刷设备、舞台的灯光设备等等），再斟酌各部门的需要，无妨向国外聘请些专家来作顾问导师。在军事上可以"楚材晋用"，在文化上何尝不可如此？这般大规模的干起来，才配得上称宣传，不，以前狭义的"宣传"二字还不能包括上述的计划。这是在"精神动员"工作中增加"精神食粮"的大量生产计划。

这不只是抗战工作，同时也是建国工作。在筑铁路、设工厂的物质建国时，我们别忘了也要精神建国。让我们在抗战的宣传工作里，奠定建国大业中艺术生活、精神生活的基础。

二月二十八日　寒假结束。新学期里先生讲授"离骚"。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寒假后，开始讲'离骚'。他仍着重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证，对于诗人屈原其人类似当代名伶的看法也提出来了，但未详细论述。这时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上似同意一种'疑古'的观点，即初读《离骚》的人，如果不看王逸的旧注，就很难懂得屈原是怎样一种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64页）

三月五日　作《西南采风录·序》。收《闻一多全集》。

《西南采风录》是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长沙至昆明长途旅行中，在大量采集民间歌谣基础上，编成的一部诗歌集，收入情歌、童谣、抗战歌谣、采茶歌、民怨、杂类六类民歌共七百七十一首。先生是湘黔滇旅行团的导师之一，所以刘兆吉请先生写序。先生在序中既介绍了该书的材料收集和编撰经过，也表现出他自己的抗战决心：

正在去年这时候，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惊佩。现在这些

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惭愧对这部分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未尽力，但事后却对它发生了极大兴趣。一年以来，总想下番功夫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但因种种关系，终未实行。这回书将出版，答应刘君作序，本拟将个人对这材料的意见先详尽的写出来，作为整理工作的开端，结果又一再因事耽延，不能实现。这实在不但对不起刘君，也辜负了这宝贵材料。然而我读过这些歌谣，曾发生一个极大感想，在当前这时期，却不能不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个地面上混下去了。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至于胜利，那是多么泄气的事，胜利到了手，不是搏斗的愉快也得终止，"快刀"又得"生黄锈"了吗？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脸斯文人"！

《西南采风录》迟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还有朱自清、黄钰生所作的序。刘兆吉在"弁言"中写到："我要谢谢几位师长和好友：黄子坚、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许骏斋（维遹）五位师长，除了多方指导外，或赐序文，或题书面。"

三月十二日　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刊载署名"昔心"的《昆明的几位作家》，文中介绍到先生时说："去年三月，西南联大步行团来滇，闻亦多先生，便是旅行团的指导人，他同一群青年人，越山过岭，走了三千多里。他每天总是要走几十公里，从没有过倦容。这种精神，实在是令人敬佩的。闻亦多先生是诗人，又是艺术家，他现在西南联大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并且领导学生演话剧。最近轰动了昆明市的《祖国》公演，演戏的是联大的学生，而内部的指导，便是闻亦多先生，所以处处都博得观众的好评。记者于《祖国》公演时，便中会见了闻先生，他说：来昆

明，很少做诗，上课之余，间或为《益世报》写点星期论文，大多是艺术方面的文章。闻先生真是一位忠实于艺术的人，这次联大剧团，公演了一个星期，他每天在会场指导至夜静三更时，始离开会场。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位长须老人，他和一群青年人，始终在一块活跃，在一块热烈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为提高民众抗战的意识，为前方将士募捐，在抗战的后方确实是最切要。不久闻亦多先生，将同西南联大剧团还要下乡演剧，他还要利用戏剧的力量，使民众明了敌人的残暴，敌人的野心，这是乡村中最需要的。”

三月十四日　《璞堂杂记》发表于迁至昆明的《益世报》副刊“读书”第一一三期。收《闻一多全集》时名为《璞堂杂识》。这是对《周易》和金文中若干文字的考释与训诂。

三月二十七日　先生倡议之庞熏琹西洋画展览会开幕，地点在原为日本领事馆的罗念生家。（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7页）

三月三十日　黄钰生、梁宗岱、吴宓、皮名举来访。《吴宓日记》云诸人于午饭后“同入城，访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于小西门内福寿巷三号寓宅，久谈”。梁宗岱“述其经行各省之所闻见，及其仗义行侠之事”，“谓当局用人不公，误国甚大，拟撰《反求诸己》文若干篇，以畅言之”。（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7册，第14页，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

四月二十九日　清华大学借云南大学礼堂，举行建校二十八周年纪念大会，到者七百余人。校长梅贻琦因公在河内，所以由潘光旦代表校长致辞。云南大学校长、前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也讲了话。大家一致希望明年校庆能在清华园内举行。

五月四日　朱自清日记云：“参加国民宣誓仪式后作中国文学史报告，并谈了中文系助教人选问题。樊谓一多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让杨遇夫回来。杨颇保守，而我们保留几个空额也是明智之举。我不想固执已见，但对一多的做法颇感不快。他应事先与我商议。下午访一多，在杨的问题上同意他的意见。然后，我坦率地要求他若有什么主张，首先应与我商量，他对我表示抱歉并赞赏我的意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2至23页）先生有时自做主张，容易引起朱自清的不快，十九日，朱与罗常培、杨振声商谈大一国文事时，也说到这件事，甚至说自己的学术地位“低得可怜”。（同前，第25页）

五月二十八日　朱自清来访。朱自清日记：“访闻一多。他谈了古代诗与史的两种传统理论。”（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6页）

六月一日　作《歌与诗》。发表于十五日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第十六

期。收《闻一多全集》。题下注云:"这是计划中的一部《中国上古文学史讲稿》的一章。"这时,先生正在试图解决中国上古时代是否像西方那样,也有一部史诗的问题。本文即探讨之一。文章分三节。第一节述歌的起源,云:

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有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那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这样界乎音乐与语言之间的一声"啊~~~~"便是歌的起源。不错,"歌"就是"啊",二者皆从可陪声,古音大概是没有分别的。……严格的讲,只有带这类感叹虚字的句子,及由同样句子组成的篇章,才合乎最原始的歌的性质,因为,按句法发展的程序说,带感叹字的句子,应当是由那感叹字滋长出来的。……实字之增加是歌者对于情绪的自觉之表现。感叹字是情绪的发泄,实字是情绪的形容、分析与解释。前者是冲动的,后者是理智的。由冲动的发泄情绪,到理智的形容、分析、解释情绪,歌者是由主观转入了客观的地位。……感叹字确乎是歌的核心与原动力,而感叹字本身则是情绪的发泄,那么歌的本质是抒情的,也就是必然的结论了。

第二节述诗的功能和诗与歌的区别:

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诗之产生本在有文字以前,当时专凭记忆口耳相传。诗之有韵及整齐的句法,不都是为着便于记诵吗?……文字产生以后,则用文字记载以代记忆,故记忆之记又孳乳为记载之记。……一切记载既皆谓之志,而韵文产生又必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语)的了。……"歌"的本质是抒情的,现在我们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诗与歌根本不同之点,这来就完全明白了。再进一步的揭露二者之间的对垒性,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在散文产生之后,它与那三种仅在体裁上有有韵与无韵之分,在散文未产生之前,连这点分别也没有。……诗即史。当然史官也就是"诗人"。

第三节述诗与歌的合流:

社会日趋复杂,为配合新的环境,人们在许多使用文字的途径上,不得不舍弃以往那"繁于文采"的诗的形式而力求经济,于是散文应运而生。史的记载不见得是首先放弃那旧日的奢侈铺习的,但它终于放弃了。大概就在这时,

志诗二字的用途才分家。一方面有旧式的韵文史，一方面又有新兴的散文史，名称随形式的蕃衍而分化，习惯便派定韵文史为"诗"，散文史为"志"了。此后，二字混用通用的现象不是没有，但那只算得暂时的权变，和意外的出轨。……韵文并非式微，它是迁移到另一地带去了。他与歌有一段宿诺。在记事的课题上，他打头就不感真实兴趣。所以时时盼着散文的来到，以便卸下这分责任，去与歌合作，现在正好如愿以偿了。……诗与歌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结果乃是"三百篇"的诞生。一部最脍炙人口的《国风》与《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

《歌与诗》"大体上是凭着一两字的训诂，试测了一次'三百篇'以前诗歌发展的大势"，先生说："'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最后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知道诗当初即是史，那恼人的问题'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也许就有解决的希望。"

在剪贴发表后的《歌与诗》时，先生又附上了"排比句法"、"韵"、"连环句法"、"系数"等类的史料多条，可能打算进一步补充。

六月十四日　上午，决定先生与朱自清、罗庸、魏建功四人担任云南省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讲师。（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1页）

是年，云南省教育厅继续开办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并根据全省实际需要，将教育部规定的三组训练科目增加为国文公民、史地、数理化、英文四组，规定全省各公私立中等学校每校至少选送三人受训。西南联大对这次暑讲会给予大力支持，先生再次担任暑讲会讲师。七月三日，在教育厅召集的联席会议上，决定暑讲会的时间从上年的四个星期延长至六个星期，每个星期组织一次精神讲话，三次学术演讲，两次时事讲话。此外，分组讨论每周三次，分组演讲每周三次，分组分科演讲每周六次，体育每周四次，个别讨论每周二次。同时，推定的各组召集人，其中朱自清为国文组召集人，江泽涵、黄子卿为数理化组召集人，叶公超为英语组召集人。（《教厅举办二十八年度中学教师暑讲讨论会，科目分国文史地理化英文四组，聘专家讲学内设教务事务二部》，《云南日报》，1939.6.21；《教厅举办中等教师暑讲会昨开联席会，各组讲师已聘定，报到学校三十八校九十九人》，《云南日报》，1939.7.4）这次暑讲会于七月十七日开学，至二十九日，报到学员共一百五十四人，约占全省中等学校教师总数的七分之二。（《暑讲会昨开讲，龚厅长出席精神训话》，《云南日报》，1939.7.18；《暑期教师讲习会昨举行开会礼》，昆明《益世报》，1939.7.30）

下午，出席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会议，听张清常、马约翰、沈有鼎三人各自所谱之校歌曲谱演唱。三十日再开会，确定用张清常之谱，并向常委会呈报。七月十一

日，常委会通过，并备文向教育部呈报。

六月十五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请求休假研究：

月涵先生校长钧鉴：迳启者：二十六年在平时，一多适届休假期间，曾依国内研究条例呈请休假一年，并由系中专聘助理员一人襄助研究。比蒙评议会全案通过，准予施行。适值故都沦陷，学校迁湘上课，时系中教师颇感缺乏，遂承主任朱佩弦先生命暂缓休假回校授课，计又两年于兹矣。顷者奉到校中通知国内休假研究办法下学年度行将恢复，用特呈请依照上述二十六年所拟研究计划重予核准，俾便施行。惟是前次所定研究题目系编纂《诗经字典》，兹因书籍缺乏关系，该项工作不易进行，爰将研究题目改为"中国上古文学史"，缘本系新定课程中本有"中国上古文学史"一门，虽早经指定由一多担任，而迄今未能开班，诚以此类新创课目，内容较为复杂，即收集材料已非咄嗟可办，遑论整理。此次倘得休假一年，以全副精力从事准备，则不特久缺之课程得以早日开班，即一多个人年来在此方面研究所得，亦可藉以告一段落，俾早日勒成专书，以供献于社会，公私两便，幸何如之。至助理员之薪金，在前次计划中原定为四十元，以目前生活程度衡之，自不免过薄，此次倘能依照大学毕业生待遇标准，酌予提高，尤所企祷。以上所请各节，统希裁夺，不胜待命之至。肃此。敬候钧安。闻一多，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教师申请休假出国或在国内研究的来往函件》，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十七日，清华大学迁昆明后第三次评议会会议议决："闻一多教授拟具计划请求在国内休假研究案。通过。并由校供给研究助理一人，月薪五十元至八十元。"（《评议会会议记录与部分提案》，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十七日 清华大学召开迁昆明后第二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议决续聘先生与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据《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与部分材料》，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初 有信致曹禺，今佚。信中有句话说："现在应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还说演出《原野》就是要斗争要反抗，表示自己要为该剧做舞台美术设计。（据田本相《曹禺传》，第25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又一力作，它描写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农民所处的万分痛苦、想反抗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全剧围绕有杀父夺地之恨的仇虎，要复仇的强烈冲突心理，深刻地反映了伦理道德、封建迷信观念对人性的摧残和吞噬。《原野》首次演出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当时未曾引起轰动，一九三八年春，已迁至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准备公演该剧时，当局还下令禁演。但是，先

生很看重《原野》，与凤子、吴铁翼（国立艺专校长）联名电请曹禺来昆亲导《原野》，承办单位为昆明国防剧社。

此事经过，时任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第二科科长，主管宣传的李济五回忆："有一天，凤子和孙毓棠到《民国日报》社来找我说：'你主持的国防剧社底子厚，有经费、有人力，为了很好地开展话剧活动，为抗日多做一些宣传工作，我们可以请万家宝（曹禺）来昆导演几场话剧。'我很惊讶地问凤子：'当真吗？你们确有把握把万先生请来吗？'凤子说：'怎么没有把握？我们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如果你同意，只要以我和闻一多、吴铁翼（国立艺专校长）三人的名义写信给他，他就会来的。'我听后大为高兴，回答她说：'那就太好了，但这件事我个人不能决定，必须请示上面再告诉你们。'于是我立刻向龙秉灵（龙云的表弟，时任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长，国防剧社属其所辖）作了汇报。龙秉灵本来对话剧没有多大兴趣，但曹禺是闻名已久的剧作家，他听了我的汇报便马上答应，至于经费问题，以后再说。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凤子，先由她和闻一多、吴铁翼联名打电报给曹禺，同时由国防剧社正式发出邀请电报，并汇去了从重庆到昆明的飞机票款。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初的事。"（《忆国防剧社》，《春城戏剧》1986年第1期；访问李济五记录，1987.11.8）

十日，曹禺复电接受邀请。十三日，曹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自重庆抵昆明，宿西南大旅社。

七月十四日　龙秉灵设宴为曹禺洗尘，先生与凤子、孙毓棠、李济五等人作陪。随后商定演出剧目两种，一为《原野》，一为老舍、宋之的等集体创作的多幕抗日话剧《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

七月十六日　曹禺搬至华山南路的南京旅社，距凤子、孙毓棠住的青云街洋枧巷四号很近。大家常在凤子家中商量有关演出的问题，决定《原野》由曹禺亲导，孙毓棠任舞台监督，先生和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雷圭元分任舞台设计和服装设计。演员方面，凤子饰金子，李文伟饰焦大星，汪雨饰仇虎，樊筠饰焦大妈，孙毓棠饰常五爷，黄实饰白傻子。

先生为了《原野》演出，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他全神贯注昼夜不停地思考琢磨。在家里，他找了几个装美孚石油桶的木箱，放倒当作舞台，又用硬纸壳制作了各种样式各种颜色的布景、人物的模型，在"舞台"上摆来摆去，调上调下，时而以某几种颜色或样式相配，时而又另选几种颜色或样式相配，时而伏在近处仔细端详，时而又退到几尺以外评头品足，不时还回头征求夫人孩子的意见，如此这般斟酌比较，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才选定一个最佳方案。

李济五也回忆说："闻一多先生是分工负责舞台美术设计的，雷圭元先生是负

责服装设计的，但他们两位并不分彼此，随时密切合作，雷先生住在左哨街，闻一多经常去雷的住所研究服装设计的问题。他们在研究《原野》剧中人物的服装时，反复琢磨仇虎的性格特征，决定仇虎穿的衣服应该是黑缎红里的短袍。金子的服装，应该是大袖口镶黑边的粉红色姊妹装。决定以后，还带着几个联大剧社的同学到商店选购衣料，陪着演员到服装店量尺寸，按规定缝制。在舞台美术设计上，闻一多先生有一天到孙毓棠家里同曹禺、凤子在一起研究《原野》的布景和道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设计焦大妈家里的桌椅，曹禺说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和剧中人物的性格后，闻一多思索了许久……，用手比划着说，焦大妈堂屋里的桌子必须给人以massi eness(即沉甸甸的意思)的感觉，曹禺表示完全同意。《原野》每一幕的舞台设置他都与曹禺共同研究，绘出平面图后，先制成模型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经过多次修改，才正式投入制作。舞台布景是他根据剧情先绘成小样，然后才正式绘制。我原来只知道闻一多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在曹禺来昆后在孙毓棠家中同他商量演出事宜时，他拿出一大叠写生画给我们看，画的都是联大从长沙迁昆途经湘西沅陵、辰溪等地时的风景，这时我才了解到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写生画家。在筹备演出《原野》时，他在绘制布景上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美术才能，而且显示出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制作布景的地点是在三转弯的岑公祠内空地上。有一天下午我前往看望，闻先生正在撩起长袍，蹲在地上生炉子熬胶水，面前铺着一大张布，旁边摆着绘油画用的各色颜料。我看了很不过意，劝他休息，我替他熬胶。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动手绘布景。就这样，每绘一张布景，就要花一两天的功夫。《黑字二十八》的布景有的是他自己设计并亲手绘制的，有的是他指导艺专的同学制作。"(《春城剧戏》，1986年第1期：访问李济五记录，1987.11.8)

剧中担任主角"金子"的凤子，在《哭闻一多先生》一文中回忆到："为了《原野》的演出，闻先生自告奋勇担任服装设计。'金子'着的一件紧身红棉袄，还是他自己去跑估衣铺买了来的。仇虎的那件大褂，他坚持要黑缎面子，红缎里。我们只知道他是位学者，是位诗人，却不知道他也是位画家。对于着色，对于情调的把握，他有高人一等的鉴别力。《原野》舞台上的一部分的成就，我们忘不了在那些日子里闻先生赐予的协助。"(《人民英烈》，第169页)

小华(何孝达)在《闻一多先生的画像》中亦说："仇虎在森林中的那一幕，他用了许多黑色的长条的木板在台的后半，一排排大小错综地排列起来，叫人提了小红灯笼，穿来穿去，在台下看起来就显得这片森林多么幽黑深远。"(《自由文丛》之二，第16页)

排练中，先生对剧情曾提出过一些建议。余冠英在《谈〈原野〉》中认为"金子同

意杀大星是不近情的”，说先生也赞成他的看法。“闻一多先生主张将剧情略为修改，为花、焦两家造出一段仇隙来，使焦阎王爱上金子的母亲（互恋单恋均可），使金子的父亲因此而死于焦手，焦阎王必欲得金子为儿妇因此得一解释，焦大妈之痛恶金子也增加了理由。不过这件事金子丝毫不知，焦大妈知之而不详，但仇虎却尽知底细。仇虎告诉了金子（或再由常五证实一下），使金子对焦家生了得分之念，于是同意仇虎杀大星而不复顾惜。这样一改可解决许多问题，委实是可取的办法。”

余冠英还认为“第三幕（即最后一幕）亦颇成问题。作者使仇虎的精神发生剧变，以至在林中屡见幻象，事前的准备不够。换句话说，仇虎这种变态没有充分理由解释”。关于此点，余亦说：“闻先生对此解决的办法是改小黑子为金子所生，而事实上是仇虎的种子，但只有金子心里明白。小黑子的死为仇虎一手安排，金子不与闻。在孩子死后金子才伤心地说出真象，于是仇虎悔恨发狂。”余认为，“这样较为可通，不过仍欠深刻，且时间上亦难安排（倘剧情如此，仇虎与金子别离后的时间便该很短了），尚未为圆满的办法。”（《今日评论》第2卷第13期，1939.9.17）先生对《原野》剧情的修改意见，朱自清在《〈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一文中曾有记述，余冠英之文，则对先生的意见做了进一步介绍。

同日　下午六时，赴云南服务社，参加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国防剧社举行的欢迎曹禺茶会，出席者为昆明市剧界名流以及新闻界等十余人。茶会由龙秉灵任主席，先生与楚图南、陈豫源在会上发言。（《昨国防剧社欢迎曹禺》，昆明《益世报》，1939.7.17）

七月二十一日　致在成都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李小缘信。未入集。信云：

> 小缘吾兄左右：奉到七月十七日手札并拙稿副本，顷以校阅一过。第四页两“渔猎”，请将原稿代为改正，余悉仍旧此本。五年前旧稿，南来后略加补充，久储箧衍，今承贵校学报代为发表问世，曷胜感纫。长沙古物之发现，为近来考古界一大事，又经锡永先生整理，其价值之大更不待言。《闻见记》想不日即可颁到，弟治楚辞多年，凡楚国文物尤宿所留意，将来得读此书，定能获益不浅也。谨预拜赐并讫代向锡永先生致其钦仰之忱。敝校（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朱佩弦本年休假，系务由弟暂代，将其全力于研究所。贵所章程及工作计划倘蒙惠赐一份，用资借镜，无任铭感，弟不日即当迁回昆明，赐示仍寄昆明敝校可也。端此敬覆藉颂着祺。弟一多拜上。七月廿一日。（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七月二十五日　文协昆明分会主办的暑期讲习班开课，为期两个月。楚图南、

冯素陶、彭惠、施蛰存、朱自清、徐炳昶、顾颉刚、张天虚、徐嘉瑞、杨东明、穆木天、马子华、曹禺先后讲演。先生也曾主讲过一次。

七月二十八日 张清常完成有五个乐章的《敬献西南联合大学》，将歌词和曲谱主旋律用简谱油印出来，寄给先生，首页上写："谨呈佩弦、一多师恳乞赐正。"（据影印原件，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八月十六日 曹禺第一次亲导的《原野》在昆明新滇大戏院正式公演。先生特为演出撰写了《说明书》。（据访问吴征镒记录，1986.7.25）《说明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剧"蕴蓄着莽苍浑厚的诗情，原始人爱欲仇恨与生命中有一种单纯真挚的如泰山如洪流所撼不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当今萎靡的中国人恐怕是最需要的吧！"（转引自李乔《看了〈原野〉以后》，《云南日报》，1939.8.23）

《原野》起初演出了九天，虽时正逢连日大雨，但仍天天满座。《黑字二十八》演了五天时，应各界要求，又再演《原野》五天，直到九月十七日方结束。两剧共演三十一场，全城轰动。朱自清在《〈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中说："这两个戏先后在新滇大戏院演出，每晚满座，看这两个戏差不多成了昆明社会的时尚，不去看好像短了些什么似的。……这两个戏的演出确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的一件大事。"（昆明《今日评论》第2卷第12期，1939.9.10）

演出期间，先生陪曹禺游西山，逛华亭寺，在温泉洗澡，回来拍了一大堆照片。

演出结束后，除去各种开销，尚有剩余，每人分了一些。先生也分得四百元。（据访问李济五记录，1987.11.8）

九月一日 德国法西斯军队大规模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先生对国际局势的变化极为关注，天天急着看报。

九月四日 朱自清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信中，说到先生休假研究，推荐刘云樵为其助理。信中云："闻一多先生本年度休假研究，评议会许其聘用助理一人。闻先生兹推荐刘云樵君为助理。刘君系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生，曾在南洋群岛任教。查其资历，尚属相合，月薪拟定为六十元整，从九月份起薪。此事曾向芝生先生面商，应承同意，谨再缮函奉达。"（《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日，梅贻琦批示："照办"。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先生休假研究期间，刘云樵并未担任助理工作。

是年度，先生聘书注明月薪仍为四百元。

九月上旬 开始休假，为期一年。一九三九年度，清华大学恢复教授休假在国内研究之办法，首批安排先生、赵凤喈、王力、张印堂、冯景兰五教授休假研究。

（据《清华校友通讯》第6卷第10、11、12期合刊，1940.12）

是月上旬　时，昆明城中常有日机骚扰，为避轰炸，先生将家搬到滇池南端的晋宁县。搬家路上，所乘汽车司机大烟瘾发作，将车翻到了路边沟里，所幸没有伤人，全家惊吓一场。

在晋宁，住北门街苏子阳家。苏宅有前后两重院子，先生家住在前院的二楼，推窗便是街道。晋宁远离尘嚣，干扰较少，先生终日埋头古籍丛中，致力于上古文学史研究，所获甚丰。有时，先生的兴致上来了，还把子女们召到一起听他讲唐诗。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个个背得出《春江花月夜》、《长恨歌》、《琵琶行》、《兵车行》、《卖炭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多首唐诗，这都是当时先生悉心哺育的结果。

先生一家在晋宁约住了一年，随着物价的上涨，经济上日觉困窘，生活水平不得不一降再降。为了节约，家中食用的面粉都靠买来小麦自磨自筛，先生亦挽起袖子、长衫，参加推磨筛面。同样，为了节约，先生把吸纸烟也改为吸用旱烟叶子自制的卷烟。

十月九日　致李嘉言信。未入集。信云：

嘉言吾弟：两函并悉。来晋后穷一月之力，将《离骚》旧稿录成清本，尊著《贾谱》未及披读，故前函未即奉复，尚乞谅之。今悉足下亦已撰成《杂论离骚》一文，与世所至，不约而同，亦云巧矣。尊稿缮清后，望即邮下，俾得先睹为快。多曩据《九叹》"伊伯庸之末裔"一语，疑伯庸为房子远祖，今检《楚世家》熊渠长子康世本作庸，为楚先祖之始王者，疑伯庸即此人，特苦无他证□，据提孟陬庚寅乃颛顼历法之"历元"（历法纪数之开端），故为生辰之最吉者，屈子自矜其生辰之异，至与其尊荣之世系相提并论，以为美谈，此殆即我国星命说之滥觞（星命说之理论似始见于《论衡·命义篇》及抱朴子《辩问篇·引至钤》）。关于此点，拙稿中论之颇详。《楚世家》楚先祖吴回以庚寅□受命为祝融一事，极可注意，不知尊稿所论与此有关否。见佩弦先生时，乞代问暑讲会是否有报酬，如有，是否已发下，并如何领取，至感之。骏斋兄近作何事，有何发明。近读《吕览》时有疑精密，稍迟专柬奉质。顺候撰安。多，十月九日。

信中所说之《贾谱》，即《贾岛年谱》。李嘉言研究贾岛多年，该谱已是第三稿，完成后请先生审阅。

同日　李小缘有信致先生，欲聘先生至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专任研究员兼国文教授。信云："一多我兄惠鉴：九月初旬，在滇偕〔潘〕光旦兄诣府晋褐，乃幸运不佳，实逢我兄前一日疏散下乡。既而再访光旦兄，亦已下乡，何运气之不佳乃尔，岂吾人能见与否亦有前定之缘耶？一笑。此次专诚拜谒，意欲约吾兄来蓉，

共同在一处作研究工作，不识我兄愿闻否也。名义为敝所专任研究员兼国文教授，授课每周五钟至六钟，余为研究。研究无限制，而重在指导学生研究。薪金每月三百元整，实付无折，此为敝校最高之额数，所中现在仅有弟与商锡永（即商承祚）二人，既无政治活动，又无互相倾轧之病，纯粹研究性质，不识尊意以为如何？请开示研究计划，并请开列研究需要书籍，以便购置或添配可也（愿意屈就，请惠我数行，无任感祷）。近在蓉见梁思成兄，得知我兄自长沙拜别后今已为美髯公，据光旦兄所谈益佩。我兄近日之煦煦（？），不轰笃实敦厚以珍学也。蓉中生活较为廉，而蓉又为川中文化中心，沿汉江嘉陵江流域，不乏汉唐遗物，关心中国文化者足迹已寄西南，岂可独舍蜀而不游乎。佛西兄亦在蓉中家。接信后锲示覆为感，专此敬恳，顺颂撰祺。廿八年十月九日。”后附：“研究员：国文教授，翻译文学，新文艺”，当是请先生担任之课程。（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十月十日 《诗与散文》创刊。该刊是杨绍廷、吴敏、刘光武、张桢柄、杨其庄、廖靖华、龙显球几个青年人办起的一个小型文艺月刊。先生对该刊给予热情的支持，后又为它题写了刊头。杨绍廷在《忆闻一多先生二三事》说：“《诗与散文》创刊后，我们开了一次座谈会，与会的先生们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闻先生还即席挥毫，亲笔为我们题写了刊头。”（《春城晚报》，1986.7.26）该刊第二期至第五期，即使用先生题写的刊头。杨绍廷后来还进一步说：“我认识闻一多先生是在一九四〇年八月。那时我与几位艺术师范的学友在昆明创办《诗与散文》文艺刊物。第一期出版后，我们邀请了十几位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开了一次茶会，请他们给予指导和帮助。出席茶会的闻一多先生在我们请求下，为《诗与散文》题书了署名刊头。从第二期起我们改用了刊物封面设计，启用了闻先生书写的刊头。”（杨绍廷《永久的怀念》，《群言》1996年第7期）

十月十六日 复李小缘信。未入集。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事。信云：

> 小缘吾兄左右：奉大礼知台旌勇，一度莅滇，适弟已于前一日疏散下乡，多年阔别，竟悭一面之缘，帐甚之。狠蒙过爱，相约加入责所工作，本当承命前来，奈弟家口过多，弱妻稚子，事事皆须弟亲身将护，若举家迁蜀，无论山川修阻、途中困难甚多，即川资一项，在此时期亦非咄嗟可办。实则来蓉之举，于弟个人有百利无一弊，弟年来研究兴趣颇浓，所涉方面亦复广，联大图书馆之贫乏，吾兄谅已深知。蓉城为西南唯一之文化都会，加之风闻贵校迁出时图书全携出，复有固定经费添置新书，为工作方便计，弟未有不愿前来之理。至蜀中胜境，渴慕已久，藉此一偿夙愿又其余事也。叨在末知区区之衷心必蒙鉴宥，

端此敬颂著祺不一。弟闻一多拜。九[十月]月十六日。(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十一月二十九日,李小缘致先生信,说先生的待遇为特种研究讲座,薪金可提高到三百三十元。信云:"一多吾兄史席:十月十六日惠覆于十八日收到,已有考虑屈就之意,无任翘盼之至。至于川资一项,敝校向无先例,惟以兄台个人特别研究关系,故一再与校中当局榷商,故一方将薪金提高为三百卅元,此为特种研究讲座;一方并以台端到校之日早一月,付薪或可藉以解决川资之一部分问题。敝校图书馆藏书仍多存南京,仅到蓉十分之一耳,而敝所藏书曾运存至婺源,惟敝所到蓉后仍继续收集,以谋实用,兄台如有何介绍,自当遵办不误也。敝所内容以及兄台研究工作,前函已言及之,无庸赘述。惟愿兄台首肯,自当早日寄上聘约,倘能于下学期开学始到,校方尤方所感盼。叨在知己,故特直率陈之,如有冒昧之处,容后再谢。草草不恭,专此敬覆顺颂著祺不宣。弟李制小缘谨上。廿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十月三十一日　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职员,按月薪的百分之五,作为本年度前方将士的寒衣捐。先生积极响应。

十一月　作《夏商世系考》。今存手稿封面有篆书题写的"夏商世系考一卷"七字。该文内容仅为《夏后名号传疑录》一章,分为五节:一、初五世当为三世辩;二、冥即季,一曰王矢考;三、王亥一作王冰,非形误辩;四、夏初六世当为三世辩;五、夏商二系之对照。从手稿材料范围看,先生对夏朝的世系发生过怀疑,如小标题中有:太康即启、启即契、相(土)即相、冥(季)即芒(和)、亥(冰)即槐(芬)、亘即降、孔甲即上甲、泄即乙、扃廑即丙、皋即报丁、敬即示壬、癸发惠即示癸、履癸即大乙、杼即少康、相即中康,等等。所记均为史料,未及论述。

十二月二日　李小缘再致先生信,力劝先生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教。信云:"一多我兄道鉴:十一月卅日曾上航函一通,寄晋宁县北门街苏宅,料早入览,久未奉覆为念。转瞬本学期完结,下学期即将开始,我兄是否能来,祈早示覆。如能来,拟开何课,祈开示,以便学生选择,如不能来,祈示知,以便早日另筹办法也。临颖神驰,不胜依依,敬希惠示为祷。民国廿八年十二月贰日。"信后,又写到:"大意谓薪可增至三百卅元,如此可多出三百六十元,再加早一月取薪,则可有七百元上下以为旅费。此信如你困难在旅费,则有此办法。如有其它困难祈告知,弟能尽力解决之处,无不尽力代为解决。"(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与朱自清谈组织神话研究事。朱自清日记:"一多邀晚餐。

彼甚强调《易林》诗的价值，作有《易林选》，邀余作序。彼并倡议组织神话研究，拟与史学系共同完成。"（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70页）

十二月二十八日 致李小缘信。未入集。说到不能离开西南联大的原因。信云：

> 小缘吾兄左右：月初接奉手教，藉悉一切。弟不能离开此间之困难，实不祇一端，前函偶尔述及旅费事，特举其最现实最具体之一例耳，乃承吾兄过爱，再度相邀，并商得贵校当局同意提高待遇种种办法，尤令弟惭愧莫遑。比奉手教，本拟即赴昆明向敝校当局商酌并探询旅行种种手续，适舍间女仆（自北平携来者）病重，乡间医药复不便，以故不敢离，诚恐内子事忙，万一看护不周或致不救也。迨至上周女仆病退，弟始克赴昆明一行，结果种种方面皆与愿违。第一，弟在校本年适在休假期中，敝校章程规定休假期后必需在校中服务一年，此次曾托故与当局商量请求变通办理，未蒙应允。弟以在此八九年之久，于感情上实不便过分坚执也。至旅行方面，则公路因军运关系，客车久已停止通行。近来川滇交通除飞机外，公务人员则间有乘专车者。此二者在事实上财力上几皆为不可能，如系弟个人只身来蓉城无困难，然弟不能只身前来，家庭方面牵挂极多，则前函已言之甚详。总之在学术方面弟实极愿前来，徒以人事上困难太多，虽屡承兄及贵校当局设法解决，亦枉费心力，高情厚谊，私衷感谢，匪言可喻。贵校方面仍祈吾兄转达此意，不胜大愿之至。此敬复藉颂教祺。弟一多再拜。十二月廿八日。（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次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小缘致先生信。云："一多我兄道鉴：十二月廿八日惠书敬悉，我兄虽一时不克来敝校研究，休假后一年或可来敝校屈就，当为志以记之，姑先预约于此可乎？民国卅年四五月间当再函邀可也。兄台于国文一门交游甚广，知交必多，倘蒙鼎力推毂，请先以学历经验薪金著述数事示知后，仍希先容为感。敝校出版《金陵学报》，为弟拙编，已出七卷。自抗战以来停刊两载，今谋恢复，又苦无稿，欲广为征求，又赧颜无报，难于启齿。久仰我兄论著丰富，考证精详，倘蒙见惠鸿文，增光篇幅，学报幸甚，弟亦幸甚，当尽先付样，以单行本二十册奉贻，不识高明其许我乎？尽闻滇省警报甚多，晋宁一处尚平安否？念念。专此敬恳，草之不恭，顺颂著祺。廿九年一月廿二日。"（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这件事在中文系引起一些影响，朱自清日记云："余冠英告一多将接受四川某研究之职务。此事甚麻烦，但据我所知一多已打消此念头。"（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

第10卷，第72页）

是月　作《易林琼枝》。收《闻一多全集》。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称："这是文学史讲稿的一部分，从《易林》这部书里，发现'诗'似的东西，是一个新的发现。"（《闻朱年谱》，第39页）该文所摘材料，均是诗一样的句子。如：《蒙之兑》中的"冬生不华，老女无家，霜冷蓬室，更为枯株"。《家人之颐》中"东山辞家，处妇思夫。伊威盈室，长股羸户。叹我君子，役日未已"。全篇内容，分作季节、鸟虫、耕作、行旅、情恋、鳏寡等十三类，表明了先生用崭新的眼光和方法处理旧有史料的能力。

在晋宁，与县卫生院院长王子翰时有往来。先生一家，住在县卫生院斜对门，家中常有病人烦王子翰治疗，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熟起来。此时，晋宁还住有前任昆明市市长陆亚夫、前河口督办郭玉峦等，他们与县长赵书翰都爱附庸风雅，曾请王子翰出面代约先生吃饭、写字。先生说："我是研究文学的，我研究的东西他们不懂，我也不愿意同这些官吏绅士来往。"在晋宁一年，先生始终没与这些人打过交道。（据王子翰给编者的信，1987.12.18）

一九四〇年　四十二岁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二月二十日在《解放》杂志上刊载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三月三十日，日本扶持汪精卫于南京组建国民政府。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并入南京国民政府。

四月一日，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教授编辑的《战国策》杂志创刊。

六月十四日，德军占领巴黎，二十二日，法国向德国投降。

七月十八日，英国与日本签订封闭滇缅公路协定，规定三个月内禁止武器等通过缅甸输送。

七月二十六日，美国务院宣布废止美日友好商务通航条约，日本黩武政策遭到打击。

八月二十日，彭德怀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

九月六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

九月七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

十一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改组为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

十二月，国民党军队取得昆仑关大捷，日军退出南宁。

一月九日　作《姜嫄履大人迹考》。发表于是年三月五日昆明《中央日报》"文学"副刊第七十二期。收《闻一多全集》。

一月十三日　朱自清日记云："今天上午许先生给我看一多的信。一多推荐刘先生为陶先生的候补者，并提及蔡因先生的情况，说刘先生可能是他的竞争者。但我怀疑是否如此。不过，我提把他的推荐信交给罗（常培），免得李文英不接受这个职位的空缺。我请许先生转告一多，我们已把李先生定为第一候选人。如果罗等无其他人选，刘先生将定为第二候选人。"（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76页）文中许先生、刘先生为何人，均待考。

一月十七日　为纪念清华大学建校四十周年，建议编辑一本文集。朱自清日记云："陈先生来访，谓闻建议，准备出一文集来纪念清华大学四十周年校庆。"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77页）

二月十八日　《璞堂杂说》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读书"副刊第十七期。

是月底　复李嘉言信。是月十四日，李嘉言致先生信，并附有其新作论文《〈诗经〉"彤管"为红兰说》。文中认为"管可读如兰"中的"彤管"即"红兰"，理由是"管古读管兰"，"泽兰、管兰同义而异字"，并引郭璞"兰蓀连文"、"与管蓀并举"之说，证明"管"即"兰"，复以陈子昂等人诗为旁证，说明"兰草"亦有"红色"。先生复信，即对李信之答复，肯定"云兰草泽兰可通称，此点甚重要"。信中认为兰茅亦可通称，并抄录自己《离骚正义》手稿之大段，引证"管菅同声，管茅同名，彤琼同色"，说《说文》"琼，赤玉"，而"郭正读蔓为琼"，证蔓茅为美草，亦证"彤管"为"红茅"。（转引自李之禹《李嘉言与闻一多先生》，未刊稿）

三月十日　《诗与散文》第六期出版，换掉了先生题写的刊头。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杨绍廷说：我们采用了闻一多题写的刊头后，"竟引起了一些关心刊物的作者的异议。他们认为'闻先生是新月派诗人，用他的题字为刊头，与目前的形势和刊物的宗旨不相适应，可能会带来其它影响'。为此我们从第五期起就把题字撤换了。"（杨绍廷《永久的怀念》，《群言》1996年第7期）杨绍廷所说的"一些关心刊物的作者"，指的是楚图南。他曾回忆说："当时有人以为闻先生是不问政治的，是新月派，觉得让闻先生为我们的刊物题写刊头不合适，楚图南先生就是这样的看法，好像换掉闻先生写的刊头也是他提出来的。闻先生知道了很有意见，说：我对年轻人这样支持，而你们却这样待我。直到一九四五年诗人节聚会，我谈起这件事，并说明当时的情况，闻先生说：你们做得对，现在我就要写稿子给你们。"（访问杨绍廷记录，1986.7.31）对于此事，杨绍廷还做有进一步补充："1944年后我与闻先生的交往多了，但我总没有勇气请闻先生写稿。1945年6月《诗与散文》准备出版一期"诗人节特刊"，很想请闻先生写稿。可是由于过去我们请闻先生题的刊头，只用了几期就被换下来了，后来又没有向闻先生说明情况，心里总是有些内疚，再去请闻先生写稿，又怕遭到拒绝，感到很为难。我把想法向楚图南先生说了，得到他的鼓励，我才鼓起勇气登门向闻先生约稿。当我说明出特刊的打算后，闻先生爽快地答应如期给我稿件。"（《永久的怀念》，《群言》1996年第7期）

三月三十一日　复李小缘信。未入集。答应寄上学术论文一篇。信云：

> 小缘吾兄左右：一月底奉到手书，承嘱为贵校学报撰稿，比因事繁，未暇起草，牵延两月，至本月初曾制成一文，稿已录清，即待付邮，忽发生新意，文须改作，又苦于参考书籍不足，竟尔中辍，遂改用今题。中间又因找昆明友人代查材料，函件往返颇费时日，现已勉强脱稿，奉呈斧正。久稽报今，疏懒之愆，

仍希曲宥，无任大愿之至。端此敬颂撰祺。弟多再拜。三月卅一日。（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是月 作《释圜》。发表于是年《金陵学报》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收《闻一多全集》。此文即三月三十一日复李小缘信中所说之论文。七月十六日，李小缘收到该文后，即复函表示感谢。信云："一多我兄文几：前承惠赐大著《说圜》一文，十分心感。此文早经誊录，拟送呈校，校阅后仍祈赐还尊稿原底存所。以备末校时作'孤本对正'，誊稿拟寄沪渎，不再寄回。学报本期集稿多日，而所缺甚多，故迟迟数月未能寄出付印，十分抱歉。《长沙古物闻见记》[商承祚著]付梓一年有余，未及出版，今幸刻印已告竣事，特另用快包奉呈一部，敬希指正为感。'图录'一部分现正接洽沪上印刷所，如接洽当即可付印。近况若何。港越路断，敝所书籍印刷皆感不便，所受影响甚大，滇中生活近已至若何程度？暑假期间将出外旅行否？专此敬颂著祺。弟小缘拜上。廿九年七月十六日。"（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这是一篇从文字训诂议论上古文化的文章。文中认为"圜"为先民用于捕象之专字，云：

> 圜从口从繇，……□象栏形，繇则手牵象而以言语教谕之，制字之意，与殊方土俗捕象之法悉合，然则圜之本义为象圜明矣。盖依字形所示，圜之中心意义，本指既捕后教习驯扰之事，扩大言之，凡诱致生象之事，及其所用之媒并栏穽之属诸边缘意，亦俱谓之圜也。考吾国上古北方本尝产象，以卜辞金文为字，及文献中殷人服象，象为舜耕诸传说证之，象盖尝一度为吾先民之重要牲畜，故捕象之事，有其专字。

先生还从文字与舜服象等传说，描述了"狩猎时代之文化"：

> 陈为舜后，其国境于《禹贡》称豫州，《说文》："豫，象之大者。"由上观之，舜曰虞舜者，虞即虞人之虞，掌鸟兽之官也。……关于舜益之各种传说，其所反映狩猎时代之文化，固甚彰者。更观乎舜象关系之密（惟象耕之说不足信），则其时北方产象之多可知。夫森林为象类蕃息之必要条件，原始森林之普遍存在，亦正狩猎时代之生活环境也。观卜辞中贞捕象之辞，才寥寥数见。……知殷商时象已渐次南徙，盖其时去舜益已远，山林既启，农事日兴，社会景象已迥不侔也。

文末，又从圜字之音，考其引申之义，结论云："要而言之，神女之以淫行诱人者谓之瑶姬，草有服之媚于人，传为瑶姬所化者谓之菟草，男女相诱之歌辞谓之谣，并今人呼妓女曰嫕子，皆圜义之引申也。"

五月二十二日　清华大学召开迁昆明后第七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议决续聘先生与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据《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五月二十六日　致赵俪生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时，赵俪生在山西夏县的山西新军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任指导员，直接投身抗战，在晋西北和晋南各地转战了两年半。他到西安出差时，听说先生在昆明空袭中负伤，赶紧来信慰问，信中还报告了些游击区的生活花絮。先生复信叙及旧人情况后，也讲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 多自离平后，初居武汉数月，及学校迁湘复课，即往长沙。学校迁昆明时，有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旅行团徒步西来，多亦随行，在途中两月，虽备极辛苦，然亦有想象不到之趣味。现行年四十，已鬗鬗有须，即途中成绩也。空袭受伤，乃至昆明后事，来函云云，谅系传闻失实。平时对于舞台设计，极感兴趣，前者陈铨先生导演《祖国》，曹禺自导《原野》，均系由多设计。早年本习绘画，十余年来此调久不弹，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寻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抗战后，尤其在涉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写生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仍系回复故我耳。校中休假办法，去岁又经恢复，多年限已届，遂即请求休假，迁居距昆明四十公里之晋宁县城。到此闲居将近一年，除略事整理诗经、楚辞、乐府、神话诸旧稿外，又从《易经》中寻出不少的古代社会材料。下年将加开"上古文学史"一课，故对于诗歌舞蹈戏剧诸部门之起源及发展，亦正在整理研究中。

先生在信中还特别问到从长沙临时大学赴陕晋一带工作的施忠谊同学。在蒙自时，先生曾收到施忠谊的来信，以后便音信杳然，先生"颇深系念"，请赵俪生"若知施君消息，务望见告，否则亦请设法向熟人打听"。此可见先生对投身前线抗战的学生，十分关心。赵俪生也打听到了施忠谊的消息，说是他在延安整风中怎么样了，因此不敢把这件事给先生说。（据赵俪生给编者的信，1986.11.13）

六月八日　清华大学召开一九三九年度第一次教授会议。会上选举下届教授会议评议员及教授会议书记，提名中两项均有先生，但未当选。（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同日，清华大学召开第三十次校务会议，议决"二十九年度起恢复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校务会议记录与部分提案材料》，清华大学档案室藏）。八月十六日，梅贻琦致函朱自清，聘请其为中国文学部主任，但正式开办时，则因先生出任清华中文

系主任,故由先生担任此职。

六月十三日 由于物价高涨,先生休假研究费用不足,曾申请补助。是日,清华大学第三十一次校务会议议决"中国文学系休假教授闻一多续请增加研究补助费二百五十元。议决照准"。(《校务会议记录与部分提案材料》,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二十九日 致许维遹信。时,先生休假研究即将结束,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获准休假一年,同人拟推先生代理朱自清职务,许维遹来信征求意见,先生力辞。信云:

> 手教敬悉,弟素性疏略,近数年来较前尤甚,已不堪任事,系主任一职决不敢接受,恐将来贻误,悔之无及也。生性率直,决非故为谦让,对兄尤不必如此。平日对系事好随意发言,亦不无千虑一得之处,但贡献意见是一事,办事能力另是一事,能说话者不必能做事,此固古今通例也。了一兄何日返昆?不知有消息否?弟意了一为人圆通、练达,于此事最宜。凡事弟能为力者定当以旁竭诚襄助,望转达佩弦兄为荷。日来此间亦谣言甚炽,苦无正确消息。有言联大方针计议迁徙者,不知确否,望探询见示为荷。(《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一日 因朱自清休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函请先生代理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职务。(据《聘请文法理工四学院院长暨各学系主任和各种特种研究所所长的来往函件》,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六日 致朱自清信。再申不愿接受代理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之理由,并荐王力任此职务。信云:

> 前者骏斋兄来函云,兄休假期中,校方有意属弟代理系务,并述兄与江清兄意,均盼弟担任。比即函复骏斋,备述所以不敢应允之理由,并请转达兄与江清,函中又曾提及了一兄为人圆通练达,代理系务,最为适宜。乃日昨校方聘函,仍正式颁到,知前函所陈,未蒙兄等垂察,此次自系承兄推荐,今仍拟请兄解铃,聘函一通,兹并附上,亦烦代为缴还,并向梅、冯二公谨致谢意。所以如此坚决者,理由实甚简单,平生顽直之性,见事往往失之偏宕,不能体谅对方立场。见事偏宕,虽千虑一得,不无独到之处,然不能体谅对方,结果必归失败。若此者,充其量不过清议之材,只堪备当事者之咨询,不堪自试也。曩者屡试屡败,此兄之所熟知者,此其一。又素性脱略,生活习惯漫无纪律,读书时心力所注,辄一切皆忘,以此任事,疏失尤多,此亦曩日之经验,然积习已深,恐此生无法移易也,此其二。学校平日待我不薄,今以此见托,以责任心言,本无可推诿,无奈力不从心,勉强应允,亦他日偾事,悔之无及者。弟素不好虚伪,

今兹所陈，实系最后决定，千祈代达前途，并乞鉴其苦衷，宥其顽固，幸甚幸甚。……留美考试命题事想与代理系务有连带关系，题纸今一并缴还，兄离滇日尚早，此事恐仍须偏劳也。

由于先生坚辞不就，朱自清又专函梅贻琦，仍属意于先生。信云："昨接闻一多先生来信，辞代理系务，并辞留美考试命题阅卷事，业经面陈。兹将闻先生原函二件，又退回聘函二件奉上。系务事经与芝生院长筹商，拟由芝生院长再去一函劝驾。留美考试命题、阅卷事，清已去函说明此与代理系务并无关系，请其不必固辞。"梅贻琦十日批云："再函闻先生请担任命题阅卷事。今夏因佩弦兄休假，不得不请尊处主持，并将来阅卷（约共百余本）偿须另约一二位襄助，亦请钧示。"（以上均据《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在晋宁，曾有信给艺专学生郭良夫，谈到古代器物上的纹样。郭良夫《因闻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云："一九四〇年，先生在云南晋宁，利用休假之便研究诗歌、舞蹈、戏剧等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这时我给先生写信请益，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谈到古代器物上的纹样问题。他说一般所谓几何花纹，实为绳纹。汲水的器物本用绳络以便提携，后来制为陶器，已不需结缀绳络，人们仍要求绳络的纹样以为装饰，这是由于实用的意义虽不复存在，而审美的心理尚不可免。可知艺术的产生始于社会生活有了余裕。先生论证绳纹，不仅有出土文物为证，而且有古代载籍为据。他举出《论语·阳货》'予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为例证，说：'系匏瓜，盖谓络缀之以为樽。'又举出《庄子·逍遥游》为例：'今子有五石之匏，何不虑（络）以为樽？'司马彪注：'虑犹结缀也。'成玄英疏：'虑者，绳络之也。'先生说，考察艺术的起源及发展历史，读书与考古二者不可偏废，比较起来，读懂古书尤为重要。可是在信中他又错误地谈到用唯物史观来解释艺术的起源不免失之偏颇。"（郭良夫《因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学林漫录》第11集，第4至5页）

七月二十日　梅贻琦致函先生，请先生于八月内将休假研究报告呈送学校。（据《教师申请休假出国或在国内研究的来往函件》，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是月　先生曾送立鹤、立雕两子至昆明投考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考毕，先生回晋宁，二子则暂住闻家驷处，等候发榜。后立鹤录取，立雕未录取。立鹤为与弟弟在一起，亦未入学。

八月十二日　国立戏剧学校在昆明举行招生考试，先生与陈豫源、方于被该校聘为考试委员会委员。（《戏剧学校在昆招生》，昆明《朝报》，1940.7.29）

八月二十三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未发表。为聘何善周为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助理事，信中云："日前趋谒，不遇为怅！关于中国文学系新聘研究

助理何君善周事，芝生先生想已面呈一切。何君已于前数日开始工作，务希将其聘书及早发下为荷。月薪数额已与芝生兄拟定百元，如能从八月起薪最好，否则即请从八月半起算如何？统希卓裁为祷。"梅贻琦当日批示："冯先生阅。何君资历如何？"二十六日又批云："照聘何君为中文系研究助理，一百元，自八月起。"（以上均摘自《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八月二十四日 陈寅恪在香港九龙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云其滞留香港的原因，并请其向先生及潘光旦、冯友兰、雷海宗四人"乞代致意"。（据《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是月 搬回昆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住房，便住在胞弟闻家驷的家里，即小东门城脚下华山东路节孝巷十三号。这条小街的巷口有家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耳科医生私人诊所，先生带常犯中耳炎的立雕前去医治，这位大夫说除了装一个人工假耳膜外没有别的办法，说出的开刀价格竟是天价。先生很失望，立雕的中耳炎虽未治愈，但这件事则体现了父亲对儿女的爱心。

九月九日 西南联合大学开学。这学年，给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文学组四年级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一)"(即上古文学史)，四学分。上学期，还给文学组三年级、语言组四年级、师范学院国文系三年级讲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诗经)，均为二学分。（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这年度，朱自清获准休假研究一年，其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之职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代理；而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则经同人力劝，先生方允代理。（据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2期，1947.4.25）

九月二十五日 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与西南联合大学戏剧研究社，为募集清寒学生救济金，联合演出田汉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五幕话剧《阿Q正传》，由中文系助教郑婴任导演，龚自知、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查良钊、陈铨、孙毓棠、吴晓铃等人为顾问。先生刚自晋宁归来，也被聘为顾问。时任后台装置组成员的萧荻在《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中说："闻先生对我们的舞台设计模型，热心地提出修改意见。在看了我们第一次化妆连排之后，还向我们指出：'《阿Q正传》写的是农村生活，吴妈等都是农村妇女，你们为什么在脸上擦那么多胭脂？'"（《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21页）

九月三十日 日机二十七架自越南起飞，再次狂炸昆明。先生住宅后院防空洞口，也落了一枚炸弹，幸好未炸。冯至《昆明往事》记述这次惊险经过："那时我住在东城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寓所后五华山坡下挖有一座防空洞。我们便跑到闻家，与闻氏兄弟一家躲入防空洞。闻一多，我还是初

次见面。大人和小孩屏息无声，只听着飞机的声音在上边盘旋，最后抛下几枚炸弹，都好像落在防空洞附近。飞机的声音去远了，又经过较长时间，才解除警报。大家走出洞口，只见一颗炸弹正落在洞门前，没有爆炸。"(《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

先生三子闻立鹏对这次遇险有着深刻记忆。他回忆说："后来，又搬到五华山下节孝巷一家有后花园、有防空洞的院子居住。大家以为这样安全会更加有保障，没有想到，竟然就在这里发生了又一幕愈加后怕的事件。一天，警报又响了，一家人照例躲到防空洞里，住在对面的联大教授冯至一家人也来这里，大家情绪已经不那么紧张惊慌。却没有想到真有一颗炸弹丢在花园里的芭蕉树丛中，一声巨响，防空洞的泥土散落下来，火光一闪，炸弹却没有爆炸，大家目瞪口呆，跑出来看，只见一个弹坑，泥土被掀翻到四周，芭蕉叶子都焦了。有人惊叫'定时炸弹'，人群又轰然散开.议论纷纷。找来警察，说可能是定时炸弹，不知道何时炸开，也可能是二十四小时之内。这一夜提心吊胆，比听到紧急警报还要紧张难熬。事后知道这次敌机来了二十七架，对昆明进行了疯狂的轰炸。"(闻立鹏、张同霞《闻一多》，第139至140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十月七日　梅贻琦致函先生，催促先生将休假研究报告尽快呈送。信中云："关于台端上年在国内休假研究应请编具报告一节，业于七月二十日函请于八月内开具送校在案。兹查此项研究报告台端尚未送校，相应函答，即祈开送。如著作尚未结束，亦请开示大略，以便汇报为荷。"(《教师申请休假出国或在国内研究的来往函件》，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十月十六日　《乐府诗笺》开始发表于昆明《国文月刊》第三期。收《闻一多全集》。所笺有：《日出入》、《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翁离》。未刊手稿中有未完成的《乐府叙论》。中云：

> 如果文学中有所谓正统的话，无疑诗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即在两汉也非例外。以产量论，赋在当时诚然居第一位，若论到质，则远不如诗，因之两汉文学的真实价值在诗而不在赋。继承楚辞传统的汉赋，除汉初少数作品外，只是无意义的挥霍文字而已。换言之汉赋只是堕落了的楚辞。反之，汉诗却仅进了一步的三百篇，只要排除了儒生们势利眼的尊经心理，我们当承认三百篇的文艺价值早已被超过了。建安以后不必论，因为那属于另一个文学的纪元，拿它与三百篇并论，根本是不公平的。建安以后，诗中有主名的作家，渐多起来，那表示作诗渐渐成了一部分人的专业。从建安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用一种广义的说法，称之为近代。建安以前，概括的说，是一个无主名的诗人时期，诗在当时也可说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期，与建安以后相对照，我们称之为古代。

就作品说,"古代"的诗大体是歌曲,"近代"的诗才是诗。就产生的方式说,诗是创造的,歌曲可说是长成的。就应用说,诗是供人朗读的,歌曲则是供人唱的和演的(要记得古代的歌和舞不分,有舞便近乎戏剧——即所谓歌舞剧)。

十月二十六日 《乐府诗笺》(续)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四期。收《闻一多全集》。所笺有:《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上邪》、《雉子班》、《圣人出》、《临高台》、《远如期》、《石留》。

是月 为避免再遭日机轰炸,先生一家迁往市区西北郊大普吉镇,与胞弟闻家驷同住在一个大车店的楼上,十几个人住两大间。大车店楼下前面是栈店,后面是豢养牲口的地方,风吹或日晒都会卷来冲天的臭气,碰上雨天,雨点就从瓦缝里滴到室内。另外,这里白天黑夜总是吵吵嚷嚷,赌博吃酒的吃喝,打架咒骂的声音,让人不能好好休息。房子太小,全家都睡在楼板上,每天先生都先起来,等孩子们起来了,他再把被单拉直叠起,然后轻轻扫地。

由于实在拥挤,没多久就搬到离大普吉镇约三里地的陈家营。当时,有人说陈家营有两间房子出租,先生一听就决定搬家,别人说:"也没去看看就搬家啦!"先生心里明白,是房子也绝不会比大普吉的再差。为了省钱,全家衣物等是先生率领子女手提肩扛,多次往返搬走的。

陈家营离城二十里左右。昆明郊区房子,大体都是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中间是天井,四面是正房与东西耳房(也叫厢房)。楼上楼下的正房住人,楼下两侧厢房是厨房、牲口圈,楼梯下三角空间是鸡鸭窝。先生家在陈家营住的也是这样的房子。开始,全家住在二楼两间正房(中间没有隔断)及两间东耳房,虽然比较宽畅,但环境不是很好,空气里总是充满了做饭的油烟味,牛马猪的牲畜味,圈里窝里的粪肥味,以及房东抽大烟的味道。另外,锅碗盆瓢,拉风箱,鸡鸭狗、牛马猪叫的声音,也总是在耳边响着。而牛马在柱子上蹭痒痒引起的震动,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据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153至154页)

房东叫杨李,用拉炭赶脚积下的钱盖起一栋楼房,此后便不大劳动,且有抽鸦片恶习,先生很反感。但此人为人尚好,略识文字,先生与他有时也叙谈一阵。房东长子十五岁时便被拉去作壮丁,随国民党第六十军到蒙自驻防后再无消息,先生听了深表同情。在这里,先生租了二楼两间正房及东厢房、北房,面积不大,八口之家居住仍很拥挤。

住陈家营者还有黄子卿、高崇熙、余冠英三家,先生与他们常有往来,不时议议时局,谈谈见闻。

为减少往返跑路,先生请准将一周课程集中在两天之内,前一日上午步行入

城，下午讲两节课，夜宿师范学院孙毓棠室内，次日上午再讲两节，午后返回。归家时，夫人常带子女在村头迎候。先生远远听到“爸爸！爸爸！”的呼声，脸上立即现出喜悦的微笑，一路行走的风尘劳累，似乎顿时减少了许多。

是时，物价暴涨不已，先生每月薪金不足全家十天半月开支，月月靠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解燃眉之急，生活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为了糊口，家中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几乎分批寄卖一尽，连先生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线装书也忍痛卖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送书的时候还非常怜惜地说，将来回北平还要赎回来。冬天，出于无奈，先生又把身穿的狐皮大衣拿去寄卖，归家后就患了重感冒，在妻子苦苦哀求下才追索回来。为了节省开支，十冬腊月先生率子女到村南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马君阶《记诗人闻一多》中曾写到此事：“你走在冬天的空旷里，带着你高高低低的儿女，你同他们到清浅的河边，掬着冷冽的流水洗脸，让水珠结上你的长胡须。”（《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7.7.1）这时，先生生活虽然拮据，但没有一点埋怨，仍充满乐观精神。他觉得不管怎样，总比前方浴血抗战的士兵好得多，在这民族生死搏斗中，吃点苦也是应该。何况，还能住在这样风光秀丽的春城，还能照旧读书教书，也就够不错的了。他还常说：“这算得了什么？何况战争一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平日里，他也常对孩子们说：“日子苦点，也有好处，知道艰苦，知道抗日战争是怎么走过来的。以后日子好了，回忆起来会是一种幸福！”（王康《闻一多传》，第208、230页）

住在陈家营的时候，立雕因贪玩惹出几次麻烦。闻立雕说：“陈家营是个中等大小的村庄，当时联大教职员在该村和附近一带住的很多，其中有一户江苏扬州人刚好与我们家是邻居，他家小儿子与我年龄、兴趣相当，我把他叫‘小扬州’，我俩常在一起玩耍。陈家营周围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塘和叫不上名字的树木。一次，我们俩来到池塘边，只见那些树上有的结了小果子，有的没有结果子，就爬上去看个究竟，爬了这棵爬那棵。不料回家后没多久，我的脸就肿得像足球一样，两只眼睛只剩下一条缝，父母亲不知是怎么回事，又着急又生气。后来向老乡一打听，原来是我爬到漆树上去引起了漆过敏反应。老乡告诉母亲一个治疗偏方，即将韭菜捣成稀糊涂抹在脸上，涂几次就好了。我的脸本来就肿得像足球一样，再涂上一脸绿韭菜糊，简直就跟阴曹地府里的魔鬼一样，好不吓人！那时恰好华罗庚先生一家搬来和我们同住，而且出进要从我睡觉的房间通过，他们看到我的魔鬼脑袋时的表情，真叫我无限尴尬，恨不得大地马上裂开一条大缝让我钻进去。为了这件事父母亲把我狠狠数落了一通。”

又一次是接连两次丢了毛衣。闻立雕说：“离陈家营大约半里远的地方，有一片平房，那是清华的几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当时我正在念小学六年级，学校就在那

个地区。一天课后,我和'小扬州'等几个小伙伴在那里打篮球,打得身上发热了就把毛衣脱下来扔在篮球架下。打完球我们边走边打打闹闹回家了,竟然把毛衣忘得一干二净。到家后母亲问我毛衣呢?我才恍然想起毛衣还在篮球架下,赶快飞奔到球场去找,然而,球架下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毛衣丢了!那时正是我们家饥寒交迫、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帮家里解决困难,反而把毛衣丢了,这等于在伤口上撒盐巴,父母亲非常生气,我没有话说,只得不吭不响地低着头挨批、挨训。"立雕从小有胃病,母亲怕他着凉,又给他织了一件毛衣,不料又被他弄丢了。闻立雕说:"一九四一年暑假后我和哥哥考入西南联大附中,他初二,我初一。那时我们家还在陈家营,我们俩在学校住宿,一周回一次家,周六下午放学后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当时母亲怕我受冻感冒,特别把别的毛衣拆了,再加上些毛线头,七拼八凑又给我织了一件毛衣。记得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日下午,我和哥哥及几个同学从陈家营返回学校。那时绝大多数联大教职员工经济条件都不宽裕,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往返城里都是步行,我们回学校当然也是靠两条腿。那天途中走热了,我顺手把毛衣脱下来扎在腰间,一路上我们又说又唱,走得很高兴,不知不觉就快进城了,我突然发现毛衣没了。原来走着走着毛衣松脱了,我还不知道。这一下我真是又急又怕,大家赶快往回走,帮助寻找,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找到。这件毛衣是我上次把毛衣丢了后,母亲为了我上中学又昼夜辛苦专门赶织的,现在又丢了,且不说我肯定要受到严厉的批评训斥,也不说是否可能因此受冷、受冻,至少也对不起我亲爱的妈妈啊!"这件事弄了立雕一直不安,不知该如何向父母交代,实在受不了了,把它写进日记。几周过去了,先生夫妇一直没问,后来不知怎么谈到此事,"母亲微微一笑说:'我们早就知道了。'""父母亲怎么会早就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问我,不批评我?"闻立雕猜想可能和他的班主任老师有关,因为日记要交班主任阅看,而那位女班主任是先生的学生,可能是她看了立雕的日记后作了疏通工作。不过,这件事一直没有核实,至今还是个谜。

有一次,陈梦家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到陈家营看望先生,车子放在门外没有上锁。"小扬州"见了就和立雕推了出来,在村子里骑不过瘾,又到马路上骑,后来竟带着立雕进昆明城绕了一大圈,弄得陈梦家几次下楼都找不到车。结果,立雕又被先生批评了一通。还有一次是在秋收季节,立雕和"小扬州"爬到谷堆顶上,一个老乡看见吼了一声,吓得立雕赶忙滑下来,不料一只脚撞在木橛子上,疼得他大喊大叫。先生见了又气又疼,只好把他背上楼。立雕说:"自从有记忆以来,我还从没有感受过父亲抱、父亲背的滋味,这次算是享受到了。"(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163至165页)

十一月十一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信云：

月涵先生校长钧鉴：奉上去年度休假研究报告一通，敬希鉴核是奉。所有业经撰成诸文，除已交由各刊物发表者外（名目见报告书中），清稿俱在缮写中，倘承调阅，容当陆续呈缴不误，专此敬颂道祺。

信中附有《中国上古文学史研究报告》，未发表。报告述休假研究情形，云：

研究旨趣

一、了解文学作品　文艺作品为文学史之最基本、最直接的材料。学者对于文学作品，苟无较深了解，而遽侈谈其渊源流变，何异无的放矢？唯是上古文学，最为难读。乾嘉以来学者凭其校勘训诂诸工具，补苴旧说，发扬幽隐，厥功伟矣，然而古书之不可索解者，犹十有四五。今拟遵清人旧法，佐以晚近新出材料（如敦煌残卷，及殷虚卜辞，商周铜器等），对于先秦两汉诸古籍之奇文滞义，作更进一步的探索，冀于昔贤传注、清儒考订之外，有所补充焉。

二、考察时代背景　文学史为整个文化史中之一环，故研究某时期之文学史，同时必需顾及此期中其他诸文化部门之种种现象。今拟以若干问题为中，就其社会背景，或思想潮流等方面，详加分析，求其相互的关系，庶使文学得成为一种有机体的历史，而非复一串账簿式的记载而已。

研究工作：基于上述二项旨趣，本研究工作可分为下列二项：

（一）专书研究。

（二）专题研究。

研究结果：

（一）专书研究要目

尚书补释（已成虞夏书部分）

周易闲诂（行在本校学报发表）

庄子章句（已成内七篇）

楚辞校补（已交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发表）

离骚叙论

天问疏证

乐府诗笺（已交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办之《国文月刊》发表）

易林琼枝

上古文选校释

（二）专题研究要目

古代教育

商周铜器艺术
史职与史书
史诗的残骸
采诗制度蠡测
古代著述体裁之长成
神仙与先秦思想
舞蹈与戏剧
宴饮与诗

附相关问题论文目录

夏商世系考
姜嫄履大人迹考(载《中央日报》史学周刊)
象舞考原
雷纹解
说繇(已交《金陵学报》发表)
释焚
释戾
释臣

十一月二十日 作《怎样读九歌》。发表于次年一月十六日《国文月刊》第五期。收《闻一多全集》。文末"附记"述撰写原因:

> 前年我在楚辞班上讲《九歌》,曾谈到"兮"字代释的意思,后来陈君士林便本了那意思作了一篇《九歌兮字代释证例》作为成绩报告。陈君于此用力颇勤,但所用以代释的虚字,与我的意见不全相合。最近余冠英先生看到陈君的文稿,甚感兴趣,请付《月刊》发表。我初意只想在陈文中附注些自己的意见,结果话说得太多,觉得不如自己重写一篇,并改题今名。但陈君究竟替我作了初步的工作,给我省力不少,这是当向他致谢的。
>
> 多数陈君意见与我出入的地方,是因为上下文实字意义难以认清,以致影响到兮字的作用不能确定。遇到这种地方,实字的解说,实是先决条件,但为顾到读者的"消化力",我曾竭力避免冗长的引证。如果那实字是个"假借字",在可能范围内,我便仅在那字下用小字注出它的"正字",这里引证便全略了。

《国文月刊》"编辑后记"介绍说:"闻一多先生休假期满,已返联大。本期《怎样读九歌》一文是闻先生特意为本刊写的,所谈问题虽高深,写时却力求通俗,谅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先生在此文前序中强调“兮”字在《九歌》中的作用，说：“《九歌》需要解释的地方太多了，现在只谈一个‘兮’字。为初步的欣赏《九歌》，这样谈谈不但尽可够用，说不定还是最有效的办法。……这里的‘兮’竟可说是一切虚字的总替身。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九歌》的文艺价值所以超越《离骚》，意象之美，固是主要原因，但那‘兮’字也在暗中出过大力，也是不能否认的。”

本文的主体为《九歌兮字代释略说》，将《九歌》中二百五十余“兮”字作了详细的分析，分别释作“之”、“夫”、“而”、“与”、“以”、“然”、“于”、“也”、“其”、“其犹”、“诸”、“皆”、“焉”、“然而”、“乎”、“故”、“矣”、“时”、“哉”等。

关于《九歌》研究，手稿中还有篇未能全部完成的《九歌杂记》，其中有许多新颖的考据与论证。如《河伯》中云：

> 相传河伯名冯夷。冯夷见《纪年》、《庄子·大宗师篇》、《淮南子·原道篇》、《远游》、《水经·河水注》引《括地图》及《广雅·释天》等。一作冰夷，见《海外北经》。一作无夷，见《穆天子传》。又作冯迟，见《文选·七发注》引许本《淮南子》。河神和湘神一样，似乎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又为雨师，与冯夷（屏翳）为水神又为雨师合，不知是一人否。……为人黑，手操蛇或龟，似此雨师即玄冥。而郭注曰：“雨师谓屏翳也。”是郭意屏翳即玄冥。《左传·昭元年》：子产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之汾川。今晋主汾而灭之矣。”案昧即冥，冥子台骀为汾水之神，疑晋地之河神即汾神之分化，故《易林·大过之渐》曰：“台骀昧子，明知地理，障泽宣流，封君河水。”（冰夷即冥子冰，于夏为帝芬汾水之神也。）即以台骀为河神也。然则玄冥与屏翳（冯夷）乃父子，故二人皆兼河神与雨师之职。
>
> 以上证河伯冯夷即屏翳，一号玄冥，以《九歌·河伯》验之，与上举各人传说颇合。……

又如在《东君·云中君》中说：

> 旧本《九歌》的次第，《东君》、《云中君》，二篇当排在一起，理由详见附录一。“东君”、“云中君”的关系，不仅是二者同属天神，天神如日月星辰风雨等甚多，这里简单取日与云相配，是偶然的，还是别有意义的，颇值得注意一下。
>
> 在原始社会里，一切都是实用，宗教亦然。云是雨所从出的，日与云，是草木生长的两个必要条件，在农业社会里应是最被重视的。它们又代表两个相反的自然现象，很便于配成一对，因此这里以东君、云中君二神排列在一起，乃是极合逻辑的一种观念。至于以日月相配，虽有其 Cosmic 意义，但那是属于

纯形式的，思想系统抽象而且近于观念的游戏，无疑的是一种较晚起的说法。月亮感人的力量虽较大，但用到实用，却完全不是太阳的对手，前者是诗的，后者是散文的，原始社会对于诗的欣赏是相当迟钝的。但这里发生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九歌》的文字本身代表着很高的诗境，而在其歌咏的对象之配合中却还埋藏着一个原始的非□的观念，这不是绝大的矛盾吗？这里我们不能不追问东君、云中君二神并祀的来源。

前面已经提过汉高祖时所置祠祝官女巫，"晋巫祀……东君、云中君"，而《九歌》的云中君我们又已经证明确乎是晋地北边秦时云中郡地方的神。东君的来历虽不见记载，但不是东方神话中的羲和则甚明显。因为羲和是女性。……而东君称君，明是男神。很可能，东君是一位客籍的神。云中地近胡，东君、云中君恐怕都是从胡地传入晋国的。《史记·赵世家》索隐引谯周说曰："余尝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是其证。东君、云中君二神并祀，恐怕也是胡俗。印度支那北部的土人，如富贵的白歹，称日神为日爷爷 Pu Nĕn，月神为月奶奶 Năn Bwòn。同样传说亦流传于安南州与东京州边境。

关于《湘君》、《湘夫人》，历来都认为是二位女神，而先生则论证，认为湘君为男神，湘夫人才是女神，并且两人为夫妻：

古书神名称君者皆是男神，《九歌》诸神东君、云中君，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滇池君，《封禅书》的泽（《武帝记》作"峄"）山君、武夷君，并《列仙传·木羽传》称司命为司命君，都是男神。《九歌》诸篇中言君的如

君欣欣兮乐康（东皇太一）

君迴翔兮来下（大司命）

吾与君兮斋速（同上）

君谁须兮云之际（少司命）

也都是对男神而言的。湘君亦称君，亦当为男神。湘君湘夫人一男一女对举与叶君宝夫人（《汉书·郊祀志》臣瓒注）对举正是同例。

王逸说湘君是湘水的神，湘夫人是二女。

《秦博士》、《列女传》皆谓湘君即二女。郑玄谓湘夫人即二女

洪兴祖谓湘君，长女娥皇；湘夫人，次女女英。

今谓湘君男神，湘夫人女神，湘君之妻也。《九歌·湘君》、《湘夫人》二篇当合看，二篇皆对话体，各篇之中皆有湘君与湘夫人之词。特前者女望男之词居多，被望者为湘君，故题曰《湘君》。后者男答女之词居多，被答者为湘夫人，

故题曰《湘夫人》。实则二篇合题《湘君湘夫人》，而以前篇为上篇，后篇为下篇，乃觉妥当。

《九歌杂记》还对《山鬼》、《东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等篇也都阐发了个人的意见。

十二月　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李嘉言完成《贾岛年谱》，后刊登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二期。发表时有附识，云："此文承闻一多先生谨正多处，谨此致谢。"

李嘉言的《贾岛年谱》手稿现保存完好，上有先生修改笔迹多处，文末还有："此《贾岛年谱》定稿本，其中硃笔与墨笔乃闻一多先生所改。一九六五年五月李嘉言记。"（据李嘉言之子李之禹李之汤提供之李嘉言《贾岛年谱》手稿照片）

是年冬　西南联合大学一些进步同学，组织起一个文艺团体"冬青社"，聘先生、冯至、卞之琳（后来又聘了李广田）为导师。

"冬青社"的成员有杜运燮、林抡元、萧荻、王凝、马西林、刘北汜、刘搏禹、萧珊、汪曾祺、张定华、巫宁坤、穆旦、卢静、马尔俄、鲁马等，他们出壁报，出手抄本杂志、出诗刊，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成为西南联大学生中一个很活跃也很有影响的社团。"冬青社"经常组织教授演讲，先生是被邀请的第一位教授。杜运燮回忆："当时林抡元和我作为公开的冬青社负责人，专程前往邀请他，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担任冬青社的导师，就是那一次谈妥的，还是更早时候征求他同意的，现在已记不起来。闻先生那天是专程来联大为冬青社作演讲的，我和林抡元到联大新校舍后门去接他。会场设在联大大校门内靠右边的一间教室。听讲的除冬青社社员外，还有不少其他慕名而来的听众。很可惜，现在已记不起闻先生那次演讲的题目和内容了。"（杜运燮给编者的信，1987.6.10）

陈凝《闻一多传》说先生这次讲的是关于文字的问题："第一次晚会上演讲，说：'我们中国底方块字，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阻碍进步的绊脚石！方块字存在一天，中国底人民文学就一天不能实现。'"（第15页，民享出版社1947年8月出版）

是年　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讲师卞之琳送给先生一本他刚刚出版的《慰劳信集》。这是卞之琳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访问延安与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时（同行者还有何其芳、沙汀）创作的诗集，是年由香港明日社出版。诗集中《〈论持久战〉的著者》、《一位"集团军"总司令》，歌颂了毛泽东、朱德，其余也都描写的是解放区战士、工人、农民、妇女、儿童等。先生读后，给以称赞。卞之琳在《完成与开端》中说："闻先生在一九四〇年读到我刚出版的《慰劳信集》，看来有点出乎他意外，却给了慷慨的嘉许。"（《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13页）

一九四一年　四十三岁

一月，“皖南事变”发生。

三月十九日，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四月十三日，《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日本签字。

五月六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

五月十五日，《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最佳外国报纸。

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七月四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改组为美国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大队，陈纳德任指挥官。次年，改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

七月七日，昆明《当代评论》创刊，是为西南联大教授主编的又一政论刊物。

九月至十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占领长沙后又被迫退出。

十一月五日，新中国剧社在桂林成立，田汉任名誉社长。

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

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案》，建立全面战时统制经济体制。

十二月九日，《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订，根据此协定，中国远征军组建。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香港。

一月十三日　《道教的精神》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人文科学”副刊第二期。二十日第三期续完。收《闻一多全集》。

文章认为已经退化了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一种巫教”。先生称这种巫教为古道教，而东汉以后的道教可称为新道教。《道教的精神》旨在分析“古道教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结论说“百家（对儒而言）本是从一个共同的道分裂出来的，这个未分裂以前的‘道’是什么？莫非就是所谓古道教吧！这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中国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与那儒家所从导源的东方宗教比起来，这宗教实在超卓多了，伟大多了，美丽多了，姑无论它的流裔是如何没出息！”

在手稿中，保存有《道家的精神》写作提纲，内容较已发表者丰富许多，兹录如下：

叙论：

一、材料根据——《庄子》内七篇在道家经典中时代最早，代表道家思想发明发轫的阶段——其余各书，其思想演化的次第如下：《庄子》外杂篇、《管子》(《内业》、《心术》、《白心》)、《吕氏春秋》一部分、《老子》、《韩非子》、《喻老》、《解老》、《淮南子》。

二、研究方法——庄子时代的心理观念等，可于七篇思想所寄托的外壳(神话、传说、成语、术语等)求之——外壳直接记载时代，思想间接反映时代——语言学的方法 philological approach。

三、讨论范围——只论七篇所表现的"前于庄子思想"的几种思想成素(心理概念等)，和庄子思想本身的几个相关的要点——其余庄子思想的全部，及庄子以外的、以后的各种发展，皆不论。

泛论原始思想及其发展——部落社会：

一、原始思想的本质：

(一) 灵魂观念的产生——生的意志是基本的决定条件——生的意识重于生的事实——以"死的否认"为"生的保证"。

1. 肉体不死观——无生死观念——因一心欲生，故不知有死。

2. 灵魂不死观(肉体不死观的修正)——有死观念。

(二) 灵魂的投射作用——灵气遍在主义 Animatism Man aism。

3. 以己身有灵魂拟想大自然会有灵魂——以为超自然的力充满了宇宙。

4. "摩那"……。

5. 原始思想的体系化"(落后人民的)，思想虽属原始，但是颇有逻辑形式，即是有系统"(库上一二九)，"思想的原始形式，即我们所说的原始逻辑，它对于现象不能给与何种说明，仅能清理成一定的秩序"(同上二七〇)，系统的宇宙观。

二、原始思想的发展——氏族部会：

(一) 灵魂观念的行为化。

6. 肉体不死的企图。

7. 企图的修正——肉体的拟灵魂化。

(二) 灵魂与灵魂投射作用的结合——产生宗教——祈求上帝救自己的灵魂。

8. 灵气的拟人化(至上权力的人格神)与被利用。

9. 向神祈求永生(不死生命的完整与绝对)以祭祀为手段——(1) 消极的

防范神的恶意行为——消除畏惧心理(抵抗畏惧心理的药剂)。(2)积极的与神和解,以求得其善意保护——吸引超自然力以造福于人类——以前是控制,现在是祈求——控制表示对方力量小,祈求表示力量大——实则神力量变大还是人力量变大了的反映。

庄子思想的原始背景——内七篇的研究:

一、一般的原始色彩:

10.(一)初民社会应帝王"泰氏其卧徐徐有虞氏不及泰氏,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凿浑沌。

11.(二)神话(《汉志》《庄子》五十二篇今只三十三篇,陆云司马彪孟氏注本即五十二篇本)"言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

12.(三)巫觋式的超人。"在氏族社会中,巫师术士是一般人所需要的,这一切都是原始医学家、催眠术家、气象学家、缺医,而不是简单的骗子"。(库三一八)

二、原始思想的遗痕:

13.(一)灵魂——梦、御风、胡蝶、"登霞"、"真宰"。

14.(二)灵气遍在——"道"。

15.(三)肉体的灵魂化——(全能式的真人)

16.(四)肉体与灵魂投射作用的结合——清洁(胎息)与虚静(斋心)以招致灵气。《人间世》"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室生白吉祥止焉"。

三、原始思想的来源:

17.(一)"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

18.(二)借贷　异族文化——反尧舜姜姓集团　姜戎　戎狄

19.(三)反响

庄子思想本身的原始性——从先文明一跃而至超文明:

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全能"——超死生与无死生——

过度重视心的力量,无视物质世界——感情的,非理智的——然而无上帝——修己以致灵气(道),非求上帝来救自己——灵气(道)与上帝皆人的创造,皆无——前者为 magic,后者为 sorcery,前者较后者尤原始——创造上帝是主观的客观,招致灵气则主观的主观——前者思想过程较复杂,因分别了有知觉与无知觉——有知觉,有感情,才可为交涉的对手——后者简单——同为自欺 make-belreve——不必拐弯太多的复杂过程——积极自欺与消极自

欺——庄较彻底——曰不积极，不足以有效——没有仪式，因仪式是天然带社会性的，故又有组织（教会），并包办政治——曰有效无效，全在主观——如相信有效，即省却过程，亦可——曰生的意志相本是积极的，不积极，即反人性——曰生的意志是绝对的，不消极，即不能绝对——官司永打不完……——一向外发展，一向内发展——向外者大，向内者高——向外者易，愈进愈速，向内而高者难，因吸力掣肘方向的决定条件——环境的许可。

1. 地理环境（经济）得天独厚。

2. 社会环境（贵族）养尊处优——心理的游戏（幻想），道教与平民——乱世的下层阶级。

这份提纲还有"一般中国文化的原始性——农业社会"、"文化与进化"、"德与道"等部分，但均未整理出条目。

一月十八日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为一月四日皖南事变题辞。不久，西南联大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纷纷离校疏散隐蔽，昆明的学生运动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先生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说："等到新校舍筑成，我们搬回昆明。这中间联大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就是在皖南事变时期，同学们在思想上分成了两个堡垒。……听说有一部分同学离开了学校，但是后来又陆续回来了。"（《联大八年》，第6页）

一月二十六日　是日为旧历年三十。近半月来家家户户都在为准备过年而忙碌，先生一家平日日子过得极艰苦，菜碗里十天半月不见半点肉丝肉末，饭桌上不是自制的豆腐乳、咸菜，就是豆腐渣熬白菜再加一个萝卜干。先生喜欢吃点辣椒，但是舍不得油，只得在火炉上烧焦后沾盐。有时能买几块豆腐，一家人皆大欢喜，先生美其名曰"白肉"，连声称赞此物营养价值高，要大家多吃点。肉食吃不起，子女们捕捞来的田螺、田鸡，甚至蚂蚱也都是盘中美餐。一次，余冠英夫人前来介绍，说地里蚂蚱很多，捉来烹炸一下相当好吃。夫人立即让孩子们去捉了一堆回来，没有油就放在锅里干炕，撒上点盐，味道果然不错，先生亦吃得津津有味。平日如此清贫寒伧，过年怎么办，夫人找先生商量，无论如何过年也得做几个好一点的菜吧！先生完全同意，并同夫人精打细算地定了菜谱。先生爱吃家乡饭菜，夫人提出炒个溜黄菜，做些鱼丸子、萝卜丸子，特别是做一顿豆膏（黄豆磨成浆后和上面粉制成的一种面食）吃吃，先生非常高兴，亲自动手推磨磨豆子。在先生与夫人的共同筹划下，这个年过得也还差强人意。

二月十一日　《贾岛》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第十八期。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唐诗杂论》中的一篇。文章认为唐元和、长庆年间，诗坛有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一边是已经成名的孟郊、卢仝、韩愈批判世道人心、批判佛老思想；一边是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旗帜下，用乐府调子泣诉各阶层的小悲剧；同时还有一批未成名青年人为着各自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贾岛即是其中之一。先生对贾岛持着一种批评却又同情的态度，说：

> 老年人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像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越俎代庖的行为是情势所不许的，所以恐怕谁也没想到那头上来。有抱负也好，没有也好，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诗做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果然涸得一"第"，到那时，至少在理论上你才算在社会中"成年"了，才有说话做事的资格。否则万一你的诗做得不及或超过了程式的严限，或诗无问题而时运不济，那你只好做一辈子的诗，为责任做诗以自课，为情绪做诗以自遣。贾岛便是在这古怪制度之下被牺牲，也被玉成了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你若还怪他没有服膺孟郊到底，或加入白居易的集团，那你也可算不识时务了。

贾岛以五律著名，那么为什么贾岛会采用这种体裁呢？先生分析到：

> 孟郊等为便于发议论而做五古，白居易等为讲故事而做乐府，都是为了各自特殊的目的，在当时习惯以外，匠心的采取了各自特殊的工具。贾岛一派则没有那必要。为他们起见，当时最通行的体裁——五律就够了。一则五律与五言八韵的试帖最近，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二则为拈拾点景物来烘托出一种情调，五律也正是一种标准形式。

先生在分析贾岛的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时，认为这与贾岛的身世经历有关，也与当时社会有关。"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于是禅宗与老庄思想开导了他们，他们用休息的方法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休息，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艺态度上可说是第一次被贾岛发现的。这发现的重要性可由它在当时及以后的势力中窥见。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

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先生认为，贾岛几乎被人偶像化了，“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最后，先生论证到：“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剂，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

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日西南联大放寒假。是日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来看望先生等联大教授。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午饭后偕郁文、彬、彤往大普吉、陈家营访问各家，共到汤、殷、娄、汪、戴、俞、陈、高、黄、余、闻十一家。”（据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校史组藏）联大师生及家属在大普吉有一张合影，约即这时摄下的。

不久，数学系华罗庚家住房被日机炸坏，华氏几乎送命，正走投无路，先生热情让出一房与华家隔帘而居，开始了两家老小的患难之交。时先生潜心研究神话，撰写《伏羲考》，华罗庚则钻研《堆垒素数论》。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中回忆到：“为躲避日寇的飞机轰炸，一多先生举家移居在昆明北郊的陈家营。我们一家走投无路，也来到这里。一多先生热情地让给我们一间房子，他们一家则住在连通在一起的另外两间房子里，两家当中用一块布帘隔开，开始了对于两家人都是毕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在这里，我才算真正认识了一多先生。在这里，我亲眼看见这位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饱经苦难忧患、走过了自己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的老知识分子，怎样逐步成长为一位英勇不屈的民主战士。在陈家营闻先生一家八口和我们一家六口隔帘而居期间，我伏首搞数学，他埋头搞‘槃瓠’，[①]先生清贫自甘的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学风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他埋头‘槃瓠’期间，无论春寒料峭，还是夏日炎炎，他总是专心工作，晚上在小油灯下一直干到更深，陶醉在古书的纸香中。当时，一多先生还在走他自称的‘向内发展的路’；‘槃瓠’的结果，是写了一大篇‘伏羲考’，他的欣喜常常溢于言表。实际上，他这样钻进故纸堆中的工作意义何在，当时很少有人理解，然而，我后来看到郭老对一多这段时间研究和从事古代神话传说的再建工作评价甚高，说一多先生是‘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里

① 这里“槃瓠”泛指闻一多当时从事的古代神话传说的再建工作。“槃瓠”本身属于古代神话中关于人类产生的传说这个内容里。——华罗庚原文注

面去革中文的命'、'他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本态度。'一多先生从研究神话故事入手,探求祖先的生活情况,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当时他对'槃瓠'的兴趣,显然在对政治的爱好之上。通过这一段患难之交的共同生活,一多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成为我毕生学习的榜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38至139页)

后来,华罗庚赋诗记述了这段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同前,第136页)

先生研究伏羲,与重庆的常任侠常有联系。常任侠在《永念李公朴闻一多两好友》中说:"一九三九年初我到重庆时,曾任中英庚款协助的考古艺术研究员,作过一些四川民俗艺术考古的工作。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中大所在地,发现了两具汉代石棺,以及随葬的陶俑铜镜等物。我写了一篇考古论文《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刊登在《时事新报》的《学灯》上,我把这寄给了西南联大的旧友考古学者陈梦家教授,陈复转赠闻一多教授,引起他很大的兴趣,驰书研讨,并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写成专论《伏羲考》,驰誉国内外,因此神交已久。"(《北京盟讯》,1986年第7期)

二月二十八日 朱自清接先生信,内容为对健全中国文学系的意见。朱自清日记:"接一多信,对中国文学系的计划有新的意见……信中附来关于贾岛的文章,对诗与时代的关系作了尖锐的透视。"(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00页)

是月 寒假后开学,给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文学组四年级讲授"古代神话",二学分。(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先生讲课很生动,汪曾祺回忆说:"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 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

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第6卷，第30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先生讲课，要求学生“先求不懂”。赵仲邑说：“在西南联大的课室见听闻先生讲课，闻先生对学生不只告诫了一次：‘书要读懂，先求不懂’。不懂有什么好呢？为什么还要‘先求’呢？闻先生的意思显然是：‘书要细心阅读，首先要求发现问题，才能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这话是闻先生自己读书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原则。别看他从西南联大图书馆借到了书，一路走一路看，他读书可够细心。因此他读书发现了不少问题，促使他对问题作深入分析，寻找大量的证据把问题解决。看过闻先生的论文或者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佩服他富于创见和材料的渊博翔实。难怪北大中文系一位同学说：‘像闻先生这样才是真正的教授！’”（赵仲邑《闻一多先生轶闻》，《随笔》第8集，第54页）

当然，先生也有不懂的问题。课上，先生欢迎同学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当场回答的就及时回答，不能当场回答的，常常笑着说：“你可把我考住了，这问题等我想一想，查一查资料再说，行吗？”下一次上课，他就一定带来答案或有关的资料。（王康《闻一多传》，第231页）

四月五日　下午四时，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在西仓坡五号本校办事处，为研究生李赋宁举行毕业初试。考试范围为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古典理论、十七世纪法国戏剧。先生与陈福田、吴宓、陈铨、吴达元、杨业治、李宝棠、温德、莫泮芹、闻家驷、邵循正被聘为李赋宁毕业初试委员会委员。（据《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四月二十七日　下午四时半，清华大学在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到者千余人。龙云、龚益知、白勤士致词，黄钰生代表南开大学、冯友兰代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吴泽霖代表清华校友致词。七时半，全体清华校友在海棠春聚餐，共三十二桌。

为庆祝校庆，清华大学原在北平出版的《清华学报》、《理科报告》、《社会科学季刊》、《工程季刊》四种刊物复刊。先生仍担任《清华学报》编辑。这时编辑共六人，其余为邵循正（主任）、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潘光旦。

校庆中，先生听了王力的演讲，遂派助教何善周做其助手。何替王力抄了四十万字的两部书稿，右手中指都肿了。许维遹看到对先生讲起，先生即将何撤回。王力在《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中，也提到这件事：“我和闻先生共事多年，友谊很深。一九四一年，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我做了一次演讲，闻先生亲自去听讲。为了帮助我做科学研究工作，他派了一位助教做我的研究助手。后来当他知

道那位助教只是给我抄抄稿子，就不高兴了，觉得浪费人材，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把那位助教撤回，叫我'另觅抄胥'。我当时也不高兴。后来我觉得他这样处理是对的，我毫无怨言。"(《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72页)

何善周调回后，先生让他去大普吉清华理科研究所住，那距陈家营只有半里远，可以在先生指导下研究《诗经》。(据何善周给编者的信，1989.5.2)

是月 作《周易义证类纂》。发表于是年十月《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二期(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下册)。收《闻一多全集》。文前有"引言"，说明撰述为："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删汰芜杂，仅得九十。即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幸并世通人匡其不逮云。"该文目录为：

一、有关经济事类：甲，器用；乙，服饰；丙，车驾；丁，田猎；戊，牧畜；己，农业(雨量附)；庚，行旅。

二、有关社会事类：甲，婚姻；乙，家庭；丙，宗族；丁，封建；戊，聘问；己，争讼；庚，刑法；辛，征伐(方国附)；壬，迁邑。

三、有关心灵事类：甲，妖祥；乙，占候；丙，祭祀；丁，乐舞；戊，道德观念。

四、余录。

文中对将《周易》中"介于石"列入刑法类，其考证颇有趣。"'豫。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是个困惑过成千上百读书人的难解之爻，就连从《易经》中取名的蒋介石，也把'介于石'，按《象》辞解释为坚守中正，像石头般的坚定不移。所以他又名'中正'。闻一多则旁征博引，证明这介于石的'石'原来是古代处罚人的'嘉石'。人犯了罪过，被罚站在一块石头上示众，这石头就叫'嘉石'。这爻应解释为：被困辱于向众人示罚的嘉石上，但时间不到一天。所以对占问的人还算是吉利。"(戚文《闻一多和〈易经〉》，蔡尚思主编《十家论易》，第1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今存手稿"引言"中还有被勾去数语，为："母校成立，适届三十周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所旌，亦《易传》之精义。谨献此文，兼申传语，以为吾母校寿！"

《周易义证类纂》是在《周易纂诂》基础上筛选写成的。今存手稿中《周易纂诂》共一百二十页，约五万余字。

五月十日 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助教傅懋勉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论会上作过一次《从绝句的起源说到杜工部的联句》的发言，发言稿事前请先生看过。傅懋勉的文章刊于《国文月刊》第十七期。是日作者"附记"云："本文系懋勉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同仁第五次讲论会讲稿，原稿承罗膺中、罗莘田(常

培)、闻一多、朱自清诸师费神看过一遍,会后本系同仁李嘉言先生又特搜集关于联句之材料数则,另为短文,以助成其说,今特向罗、闻、朱诸师及李先生敬致谢意,并志不忘云尔。"

五月十二日　罗常培因公赴西南联大四川叙永分校,离校期间,其联大中文系主任及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的职务,由先生暂时代理。(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36页)

五月十五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大学系主任以上者加入国民党。是日,梅贻琦与周炳琳、钱端升、查良钊、姚从吾、陈雪屏宴请联大系主任以上职务者,饭后谈及在座者加入国民党事。先生是否出席这个会未见记载,但他这时的态度是不赞成加入任何政治党派的。

五月二十八日　致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公函二封。一封是为许维遹申请晋升为副教授函,中云:"本校章程规定,教师'于所任学程有重要学术贡献者',得聘为副教授。本系讲师许维遹先生,历年研究校勘学并训释先秦、两汉古简,成绩昭著;所著《吕氏春秋集释》一书,已风行于时;其他关于《国语》、《管子》、《韩诗外传》诸古籍亦各有成稿待梓,其间疏通疑滞,创获之多,视前所校《吕览》,殆又过之。许先生任教本校多年,久当迁升,徒因他故,因循未果。兹拟请晋级为副教授,尚希贵会公决为荷。"一封是为陈梦家晋升为副教授函,中云:"本系讲师陈梦家先生,研究甲骨、铜器文字及相关问题成绩卓著,历年所撰论文十余篇,释疑解惑,发明甚多,拟请升任为副教授,以示尊异,而符校章,敬希贵会审议裁夺,是为至荷。"(以上均摘自《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五月二十九日　清华大学召开迁昆明后第十二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议决续聘先生与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改聘许维遹、陈梦家为副教授。(据《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五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为李嘉言由助教改聘教员事。信中云:"查中国文学系助教李嘉言先生,来校服务六载于今,黾勉在公,辛劳弥著,允宜优礼,用酬贤劳。拟请自民国三十年度起改聘李君任中国文学系教员,是否可行,尚乞鉴裁。"(《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十六日　《乐府诗笺》(续)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八期。收《闻一多全集》。所笺有:《薤露》、《蒿里》、《梁甫吟》、《平陵东》、《猛虎行》五篇。

六月二十二日　德军突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苏联军民奋起抵抗,展开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先生住在农村,消息闭塞,进城上课时才得知此事。

六月二十八日　下午四时,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在西仓坡五号

本校办事处举行研究生李赋宁毕业论文考试，先生与莫泮芹、闻家驷、邵循正、吴宓、陈铨、杨业治、李宝棠、温德、冯友兰、潘光旦为考试委员。（据《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 作《九章》。未完成。手稿后经何善周、季镇淮、范宁、闻翻等组成的遗著整理小组整理，定名为《九章解诂》，后与《九歌解诂》合为一书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时有整理组于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所作"附记"，云："本篇手稿只此一稿。扉页自题篆书《九章》，下注'三十年七月陈家营'。后无篇目，今据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本录之加上。原文以同书校之，字句多有增补、改正，其说见于《楚辞校补》者，俱分别注出，以便读者参看。《解诂》所引典籍出处，有两处篇名未能查出，姑缺之以待考。"

《九章》各篇解题，历来各家分歧，先生亦有自己见解。如《惜诵》的"诵"，先生认为当释作"讼"，"惜诵"即"自讼之辞"。又如《怀沙》，通常释为"寓怀长沙"，先生则以为是"怀沙犹襄沙，襄沙赴水以自沉"。对《惜往日》，先生认为"全系法家思想"。

是月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文学院长冯友兰任所长，先生任中国文学部主任。[①] 中国文学部在清华文科研究所中最先开始工作，其主持、计划等全由先生负责。

是月 季镇淮、施子愉考取先生的研究生。

约是月 插秧前不久，先生一家迁至二三里外的谷堆村，住在一新建不久的楼房内。门前有一小溪，赵妈常用筲箕捞些小鱼小虾，和在面里做成饼，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在谷堆村，某夜锣声突起，只见百米远处一栋小楼陷入熊熊大火。先生一家大小披衣下楼，先生还参加了救火。

八月二十二日 作《宫体诗的自赎》。发表于次月八日昆明《当代评论》第一卷第十期。收《闻一多全集》。该文是《唐诗杂论》中的一篇。文中说："宫体诗就是宫庭的，或以宫庭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的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庭为中心的艳情诗。"先生认为这时期没有出过第一流的诗人，甚至没有诗人，但可悲的却出现了代表宫庭内外气氛的消极的宫体诗，并且中途还失掉了一个自新的机会。不过，"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

① 清华大学各研究所于1939年相继恢复与建立，当年8月16日校长梅贻琦函聘冯友兰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兼哲学部主任、朱自清为该所中国文学部主任（据清华大学档案）。但文科研究所一直没有活动，到这时方开始筹备，先生因已代理中文系主任，所以按例被聘为该所中国文学部主任。

暴雨！虫吟听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是什么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先生"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文中还认为骆宾王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是仅次于卢照邻《长安古意》的成功之诗。不过"骆宾王的成功，有不少成分是仗着他那篇幅的"。

八月二十六日　老舍应罗常培约请，自重庆飞抵昆明，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北京大学教师宿舍。老舍在回忆录《八方风雨》中说："更使我高兴的，是遇见那么多的老朋友。杨今甫大哥的背有点驼了，却还是那样风流儒雅。他请不起我吃饭，可是也还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一谈就和我谈几点钟。罗膺中兄也显着老，而且极穷，但是也还给我包饺子，煮俄国菜汤吃。郑毅生（天挺）、陈雪屏、冯友兰、冯至、陈梦家、沈从文、章川岛、段喆人、闻一多、萧涤非、彭啸咸、查良钊、徐旭生（炳昶）、钱端升诸先生都见到，或请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快乐的日子。在城中，我讲演了六次，虽然没有什么好听，听众倒还不少。"（《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八月三十日　上午，与杨振声同去看望二十三日自重庆返昆的梅贻琦（据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校史组藏）。所谈内容不详，似与清华设立文科研究所及中文系人事有关。

是月　长子立鹤、次子立雕拟报考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先生特请季镇淮为他们补习数学。为此，两人入城寄住于联大新校舍茅草房的学生宿舍内。后两人分别考入附中初二与初一，先生甚高兴，送他们入学时，家中特增加了一两个荤菜，并狠心花钱给他们买了两套新的学生装。

九月初　与助教何善周一起到昆明东北郊司家营选择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所址。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九月初的一天，我们二人从陈家营进城，又从城里到龙泉镇来，看好了司家营的房子，和住在镇上的王了一、陈梦家两位先生商定了研究所就设在这里之后，下午三点又赶回城去。"（《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55页）

司家营的房子，是陈梦家找到的，当时陈住在龙泉镇北二里桃园村，冯友兰住在龙头山上寺前院西房。这天中午，先生和何善周在王力家吃的午饭，王力的夫人还特意加了几个菜。（据何善周给编者的信，1989.5.2）

这个地方是司家营十七号，主人叫司荣，做木材生意，买卖虽然不大，但在村子里也是殷实之家。房子刚刚建好，还未全部完工，楼板和墙板也没装栅，是以清华文科研究所出钱购买木板装栅为条件，以月租三百元的价格租给学校。清华文科研究所成立时，因为没有地方，暂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内设置了一个研究室，这

时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九月八日 下午三时,老舍在西南联大做首次讲演,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先生主持会议,并首先致词。吴晓铃《老舍先生在西南联大》(未刊):"第一次是在潘家湾的昆华师范学校,由闻一多先生主持。听讲的人很多,除了系内外的学生们,还有更多的瞻仰丰采或看'稀罕儿'的'外宾'爆满,把讲堂的门窗都挤了个稀巴烂。在一多先生之外,系里的教授们都出席了,站在讲台后面,很像戏曲舞台上元帅升帐的四靠将、四大铠、四龙套和四上手,好不威风,……一多先生在介绍的时候,谈到中国语言文学系培养的对象只是限于'乾嘉遗老'式的和'西风东渐'式的学者,很难出作家,认为大有改进的必要,得走一条崭新的道路。"

当时,老舍与总角之交罗常培,常有唱和,先生则认为当今形势下不该再写旧诗。郑临川《闻一多反对写旧诗》:"第一天由一多师主持,当介绍客人的文学成就时,一多先生以热情的语调赞扬说:'老舍先生是以活的语言创造了活的文学',接着就拿旧诗作反衬,针对当时重庆写旧诗成风的现象提出了严厉而尖锐的批评,说:'在今天抗战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作汉奸!汪精卫、黄秋岳、郑孝胥,哪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1期) 先生这几句话说得很严肃,全场震动,连老舍亦感到有些愕然。会后有人说先生只会写豆腐干式的新诗,根本不懂旧体诗。其实先生是针对时弊的借题发挥。

老舍在昆明期间,先生与同事曾请他聚餐。某次散席甚晚,先生来不及回家,便与冯至同住在靛花巷宿舍。两人谈到深夜,先生对冯至的一篇《对于时代的批判》(刊于《战国策》)很是称赞,那是篇介绍基尔克敦尔的文章。(据访问冯至记录,1986.7.9)

九月十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信中请求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聘任黄匡一、朱兆祥为研究助理;又建议为李嘉言晋级后增加薪额:"李嘉言君在校任教六年,备极辛劳,年来于课余从事研究亦颇著成绩,本年已改聘为教员,惟其薪额仅依定章递增至一百七十元。查李君家累颇重,际兹物价高涨,势难维持,拟请将其薪额酌予提高,以励贤劳。"(《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同日 罗常培辞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及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职务,联大常委会决议其职务由先生代理(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39页),但先生坚辞不就。十八日,联大常委会决定聘杨振声担任此职。至十二月十八日,杨振声亦辞职,两系主任仍由罗常培担任,先生依旧只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九月二十三日 西南联合大学开学,次月六日正式上课。这年度,先生给文学

院中国文学系文学组三、四年级，及师范学院国文系三、四年级讲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楚辞）、“历代诗选”（唐诗）。又给中国文学系语文组三、四年级讲授“历代诗选”（唐诗）。均为四学分。同时还与马芳若（庸）一起开设大一国文。[①]（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此时，朱自清休假结束，但返校后仍请辞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职务，先生正式接任斯职。（据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2期，1947.4.25）

十月初　举家搬到离城八公里的龙泉镇司家营十七号，住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里。

这个院子为昆明地区传统的“一颗印”式民宅，“三间四耳倒八尺”的形式，两层土木结构的小楼，楼下为厨房、食堂，楼上西厢一侧住着先生全家，另一侧留给其他人。二楼正面为研究所的办公室，从大普吉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搬来了许多书籍就排放在这里。每位教授和工作人员都有一张书桌，先生则用着一块宽大的缝纫用的案板。

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四一年暑假后，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东北郊二十里龙泉镇司家营成立，闻一多主持中国文学部工作，并移家到所内。朱自清先生等都在这里居住并进行研究工作，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也常来这里读书研究，一时学术空气甚浓。闻一多在研究所楼上放着一张长方形案板，各种大小手稿分门别类地排满一案板。他精力充沛，研究兴趣最大，范围最广，努力著作，常至深夜不睡。《楚辞校补》、《乐府诗笺》、《庄子内篇校释》、《从人首蛇身到龙与图腾》、《唐诗杂论》等专著和论文，都是在这里写定并发表的。他的书桌手边常摆着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的书如《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认为这是‘经典著作’，指的是他们的文字训诂之学。”（《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65页）

住在司家营的还有李嘉言、何善周。后来，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也先后搬来。在这里，先生相继指导的研究生有季镇淮、施子愉、范宁、傅懋勉，还指导过朱自清的研究生王瑶。

司家营距龙泉镇仅四里余，镇上有南迁来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北平图书馆，冯友兰、王力、陈梦家等也住在附近。这一带远离市区，敌机不来骚扰，环境宁静，一时成为昆明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

研究所最初用的是煤油灯，以后安了电灯，先生用厚纸板和绿绸子精心制作了一个电灯罩。先生虽是学者，却也常从事些力所能及的手工劳作或轻微劳动，而且

① 据何善周1989年5月2日给编者的信，说这年大一国文是先生与他合开的，先生仅讲了一周。

态度认真，要求严格。点煤油灯时，他常常不满意别人擦的灯罩，总要自己动手擦得里外通明透亮，无丝毫污渍手印方才罢手。扫地也是如此，要求很高，他既不准洒水，又不准扬起尘土。别人做不到，他就自己动手，蹲在地上，用扫帚尖轻轻的一下下扫，其效果果然与众不同。先生还是一个装订好手，他写东西用的都是连史纸，字写得工工整整，纸一张张叠得整整齐齐，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脱稿后先生就自己装订成册。装订时非常认真，先用皮纸细心做好纸捻，然后把纸摞齐，加上封面（有一次是用夫人养的蚕吐的黄丝作封面），在拟装订的地方用铅笔轻轻划一道线，仔细量好打眼位置，再以锥子钻眼，穿上纸捻，在背后一道一道绾紧，再用锥子用力砸平整。最后仿线装书的格式，在封面的右边，自上而下划出长方格（有时是贴上去），以楷书或篆体题写书名。至此，装订程序方大功告成。先生干这一类事，既是需要，也视若某种工艺品的制作，左右端详，精益求精，乐在其中。此前，在陈家营，某次他偶见孩子们用砖瓦窑上拿回来的粘胶土做手枪玩，突然兴致上来，亦要了一大块粘膠土，做起了一个烧饭用的木炭炉。制作得非常认真，几至精雕细刻之程度，最后还用竹片细心打光，不料因未掌握重要技术诀窍，一烧竟裂开了几道大缝，多日辛劳毁于一炬，先生甚感惋惜。

十月十七日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在昆明正式成立。时，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大队（即誉之为"飞虎队"）组建，需要翻译人员。为此，重庆方面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交励志社负责此事，故由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任班主任。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更名为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仍由黄仁霖为班主任，黄仁霖在美国即与先生相熟，此刻因常在重庆，所以向蒋梦麟、梅贻琦提出在先生、潘光旦、吴泽霖三人中择一人任副班主任，主持具体班务。西南联大当局考虑到潘光旦是教务长、先生任系主任，便派刚自贵阳大夏大学调来的吴泽霖任斯职。（据吴泽霖给编者的信，1987.2.6）

十月二十四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为聘请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季镇淮兼任半时助教事。中云："关于文科研究所本年应行延聘之助理人员，依原定计划有助教二人、半时助教一人。除助教二人业经聘定外，其半时助教一额拟以本校中国文学系研究院学生季镇淮充之。季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系，成绩卓异；近复投考本校研究院，亦以最优成绩录取。本所研究半时助教一职以季君当之必胜所荷，爰为推荐。倘蒙裁可，仍希将聘书早日发下，以便转致，并分配工作，至为厚幸。"（《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季镇淮，江苏淮安人，战前考取山东大学，因七七事变至长沙临时大学借读，越年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正式学生。

季镇淮家乡在沦陷区，生活无着，先生设身处地为其生计作了安排，推荐他担任半时助教。梅贻琦接到信的当天即批示："送冯院长阅。"三十日又批示："照聘，月薪五十元，校贴二十元，政府米贴生活费照全发。"季镇淮得此条件，十分感激先生。

十一月三日　朱自清自黎院村搬到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后和浦江清、许维遹、何善周四人同住侧楼的一间小屋。这是先生与朱自清朝夕同住的开始。

十一月七日　下午五时，应梅贻琦之约，与梅、冯友兰、黄钰生、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共商联大国文系诸事。七时，与诸同仁及老舍共食炮牛肉，席后老舍、罗常培有清唱。（据梅贻琦日记，未刊，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是月　为了加强清华大学各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校长梅贻琦指示各研究所拟定工作计划。为此，先生上报了亲手拟定的《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计划》。此计划未曾发表过，兹录如下：

本部研究工作拟暂从整理古籍入手，本年度拟整理之书如下：

子部二种：

韩诗外传

管子

一、正文部分，加标点分段校印。

二、注释部分，搜集历来关于校勘文字及训释文义之旧说，加以甄择或驳正，并补充新资料。

三、附录部分，包括引得，参考书目，板本源流考或其他有用之参考材料。

集部二种：

岑参集

贾岛集

一、关于本文部分：

a. 校定篇什之真伪。

b. 依年月重行偏次。

c. 校勘文字。

二、关于附加部分：

a. 带批评性质的叙录。

b. 年谱。

c. 交游考略。

d. 书目。

e. ……

计以上子部工作需加聘助理二人，集部加聘半时助教一人。除以上工作外，上年度所已着手之文学史选读校释工作，本年仍继续进行。（《各学系教师研究工作计划暨经费预算、研究出版刊物补助办法和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该计划中所说的“管子”，即后来整理出来的《管子校释》。当时，司家营地方较小，先生便在紧邻的麦地村桂家祠堂租了房子，进行古籍整理。《管子校释》主要工作由许维遹着手，何善周、刘功高等人后来也参加了进来。大家分工：许维遹整理，先生参校，刘功高抄写誊清。（据范宁给编者的笔述，1988.12）

这部稿子日后带回北京，郭沫若又补充了许多材料，改名《管子集校》。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中，介绍到它的成书过程，说：“《管子集校》为已故许维遹教授所着手纂集，原名《管子校释》。许氏以戴望《管子校正》为基础，而加以扩充。凡在戴望以后诸家校释为许氏所见及者均为抄录，戴望以前者亦间有补遗。原稿共十九册，约四十万字。稿本均经誊录，有三四人手笔。许氏所用方法与戴氏无多殊，胪列诸家校释后，时或以己见评骘增损，亦有诸家未及而己见独到者，均以案语出之。唯于摘取原文标目时，则每依校释而迳加改窜，其不同处以注文明之，其增补处以方格限之，此为特异。稿本三分之一业经闻一多教授参校，即自《牧民》至《幼官图》最初九篇及自《匡乘马》至《轻重己》最后十六篇。闻校于许所遗漏者均亲笔录入，字迹异常工整。闻亦时加案语，对于许说亦每提出不同意见。自《匡乘马》以下十六篇又曾经孙毓棠氏参校，亦时有案语附列。凡经闻氏参校部分，别有正文录本，其文字业经校订，其意殆拟将正文与校释一并印行也。……许氏余所不识，闻氏生前则曾两次见面，并曾有文字往还。二氏同系清华大学教授，二氏之合作，其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其地在昆明。为物质条件所限，二氏所参考之书籍不多，以《管子》板本而言，除光绪五年影刻宋杨忱本外，陆贻典校刘绩补注本、十行无注本、明刻朱东光‘中都四字’本、明刻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均所未见。许所见赵本乃清刻浙江书局本耳。此一物质限制，即清代学者亦未能免。……诸家原书或未刊稿本及民国以来各种述作，许闻二氏亦多未及见，故其征录未能核遍，而其案语亦往往已为前人所道。纂述体例不甚严密，征引旧说漫无时代先后，因之说解之发展无从追寻，而孰为因袭，孰为雷同，亦无从辨别。”

郭沫若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得《管子校释》书稿，即发生极大兴趣。他有感于“《管子》书号称难读，经历年代久远，古写本已不可复见，简篇错乱，文字夺误，不易董理。”“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

出，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及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管子集校·叙录》，科学出版社1956年3月出版) 遂以两年功夫集中补苴罅漏，详加校释，并请先生旧友冯友兰、余冠英、孙毓棠、范宁、马汉麟分别校阅其中一小部分，杨树达(遇夫)亦校阅部分，张德钧、任林圃、戚志芬、王廷芳诸人协助检阅群书，最后由郭沫若总校，定名《管子集校》，于一九五六年三月由科学出版社分上下册出版。其书达一百三十万字以上，比许维遹与先生原稿增加三倍，撰者署名为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可见，《管子集校》是一次集体校释。该书书稿完成后，郭沫若仍嫌美中不足，他在《校毕书后》中说："整理之方，初未详加考虑，颇自悔其孟浪。盖策之上者，应将许、闻原稿照样印行，再别为增补以匡其违失。如此，则责任分明，而体例亦不致淆乱。"

是月　约这个月，先生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举办的学术讲演会上讲《什么是九歌》。讲稿经他人整理，刊登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文艺春秋》第五卷第二期。收《闻一多全集》。文章分十节：一、神话的九歌；二、经典的九歌；三、"东皇太一"、"礼魂"何以是迎送神曲；四、被迎送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五、九神的任务及其地位；六、二章与九章；七、九章的再分类；八、"赵代秦楚之讴"；九、楚九歌与汉郊祀歌的比较；十、巫术与巫音。

先生讲《什么是九歌》，带着诗一般的生动描写，十分引人入胜。徐知免《回忆闻一多先生》："我第一次看到闻先生就是……他在联大新校舍讲《什么是九歌》。他讲'山鬼'是一个美丽的山林女鬼，身上披着碧绿的树叶，骑着豹子，走出林间。我不懂得《九歌》，但听了闻先生用生动奇妙的想象把这篇古文辞讲活了，这些神话人物就像出现在眼前一样。"(《解放日报》，1979.11.22)

先生手稿中，存有《什么是九歌》的提纲草稿，虽未成文，仍有参考价值，兹录如下：

序：

剔除封建思想的旧注，恢复人民艺术的本来面目

求生存的艺术　个人生存(饮食)　种族延续(男女)　为自己生存

忠君思想汉人所加(强奸)　忠君则为主人生存　骗局　旧注不仅是愚而且是坏

作伪　求得真(科学精神)　自与善合

戏剧的起源　从生活中求　宗教生活

说明艺术的功能　艺术便活了　有血有肉
旧日只读文字闪避生活以便欺骗

什么是九歌：
《东皇太一》、《礼魂》是迎送神曲
二篇的独立性
迎送神曲是祭歌的传统形式　被祭的对象只东皇太一
九篇不得为迎神之词
因为他们并非受祭者
而是被请来助祭的
九篇是侑神(太一)的乐章
十一篇当称为楚郊祀歌
二篇当称“吉日”、“成礼”
《国殇》是续加的
礼魂的问题

历史的九歌：
夏九歌——箫韶九成(九韶)赓歌(九歌)
楚九歌——赵代秦楚之讴

宗教的九歌(太一与诸神)：
东皇太一
东君
云中君
湘君湘夫人
大司命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国殇

戏剧的九歌：
巫术与巫音

演出的时地与演出以前
乐与舞
剧本的结构
舞台艺术——布景导具(面具)效果

文学的九歌：
章目
校补
注释

拟定《九歌》剧本

十二月七日　日机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向关岛、香港、马来亚、菲律宾等美、英、荷在东南亚的领地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次日，美、英对日宣战，九日至十日中国对日、德、意宣战。十一日德、意对美宣战，美亦对德、意宣战。连日来，时局成了先生与同仁议论的中心。先生还对孩子们说：现在有美国、英国，还有苏联这么多国家联合作战，小小日本神气不了多久啦，只要反攻一开始，胜利就快啦！学校也可以回到北平去，那时日子会比现在过得好！"

十二月八日　《楚辞校补》"引言"在昆明司家营写定。"引言"反映了先生治学的方法和步骤，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文中说：

>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
> 三项课题本是互相关连的，尤其一与二，二与三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要交卷最好是三项同时交出。但情势迫我提早交卷，而全部完成，事实上又不可能。我只好将这最下层，也最基本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一并提出。这实在是权变的办法，我本心极不愿这样做。可是如果这样来，能保证全部工作及早赶完，藉此可以腾出时间来多做点别的事，那对于自己还是合算的。在一部书上已经花了上十年左右的光阴，再要拖延下去，总会教人腻味的。

文中还说：

我的目的本是想替爱好文艺而关心于我们自己的文艺遗产的朋友们，在读这部书时，解决些困难。为读者便利计，本应根据这里校勘的结果，将全部《楚辞》的白文重印一次，附在书后。但因种种关系我没有能这样做。这是应向读者道歉的。

我梦想哪天我能用写这篇"引言"的文体来重写全书，而不致犯着"词费"的毛病。但当语体文在考证文字中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以前，我只好"未能免俗"了。

最后，我应当感谢两位朋友：游泽承（国恩）和许骏斋（维遹）两先生。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骏斋最热心鼓励我校勘它。没有他们，这部书是不会产生的。陶重华君校阅全稿，给我很多宝贵的意见。朱兆祥、黄匡一、何善周、季镇淮四君替我分担抄写的工作。对以上诸位，我都深深致谢。

十二月十六日 《乐府诗笺》（续）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十一期。收《闻一多全集》。所笺有：《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陌上桑》四篇。

是年 何善周开始选编和注释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是一本供同学们学习用的基本史料，选编中受到了先生的指导。

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一九四一年我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开始选注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时候，他对我说：'选注作品的同时要注意收集文学史的材料。写文学史必须以自己对作品的切实研究入手，不可抄袭他人陈说。基础要广、要厚，但最重要的必须先懂作品。'他叫我拟了一个《诗经》和《楚辞》的参考书目，亲自给我作了补充，在最重要的参考书名上画上三个圈，次要的两个圈或一个圈，并陆续对我讲说了一些参考书的特点。当时，他还给我开列了另一个书目，那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陈望道译的《社会意识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甲骨文研究》，还有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和《舆地丛钞》一类的书。上面开列的五种书我虽然都已阅读过，但作为科学研究的参考书，这是开始。过了几天，闻先生自城里上课回来，拿给我一本英文版的《古代社会》。"（《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60至261页）

一九四二年　四十四岁

一月一日，中、美、英、苏四国领衔，二十六个国家签名之《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发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

一月三日，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

一月十五日，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日军再遭打击。

三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协助英军对日作战。

四月三日，中华剧艺社公演郭沫若五幕历史剧《屈原》。

四月十八日，美国飞机首次轰炸日本。

四月，莫斯科会战以苏军获胜告终。

五月八日，缅北重镇密支那失守，日军占领缅甸。十日，日军占领滇西重镇腾冲。

六月三日，日本进攻中途岛，六日失败。此役为太平洋战争之转捩点。

七月下旬，斯大林格勒会战打响。

十一月十九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开始反攻，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全歼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苏德战场形势扭转。

一月六日　西南联大同学举行"倒孔"游行，参加的人很多，除进步同学外，还有三青团成员。起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局势垂危，陈寅恪教授及大批滞留在香港的要员和文化界人士，因飞机不够无法脱离险境，而社会传言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却用飞机抢运洋狗。此事先在《新民报》上披露，后重庆《大公报》在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中加以批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昆明《朝报》转载《大公报》社评，标题改为突出这一事件的《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消息传到联大，全校舆论大哗。吴晗在一年级《中国通史》把孔祥熙比做南宋亡国时的蟋蟀宰相，《论坛》壁报公开抨击腐败行为，《呐喊》壁报也刊登了《铲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书》等文章，遂由学校三青团员自动发起"倒孔"运动。这是抗战以来全国学生运动的第一声，引起蒋介石的极大震动。不

久，蒋介石派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康泽到昆明，将这次刚刚掀起的波澜压制了下去。

在这次"倒孔"运动中，先生虽然站在旁观的人群中，却对青年们充满了理解和同情。

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四时，出席清华大学一九四一年度第一次教授会议，听取本校经费情况的报告。（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二月十四日 何善周患病，先生亲自护送到医院。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回忆到："这学年，我在西南联大还兼了一班'大一国文'，每周上课须进城两次，上课当天早去晚归。选修我的课的学生近五十人，除备课外，还须批改学生的作文，我都尽可能地挤出时间来做，不致影响正常的研究时间，工作感到有些繁重。到了年底，我病倒了，闻先生亲自为我请来了设在镇上的一家大公司的特约医生，天天吃药打针，一周过去了，热度一直不退。闻先生很担心我的病有什么危险，和医生商谈之后，决定送我去医院。这时敌机仍然时常来城区轰炸，送到城里医院不放心，于是，决定把我送到西山脚下离司家营十里远的一所红十字会医院去。闻先生托房东雇了两个人，绑了一副担架抬着我，闻先生跟在担架后边，亲自送我去医院。这一天天气很冷，西北风呼啸着。我全身连头带脚蒙在被子里，被子衣服都被冷风吹透了。去红十字会医院，由大道需走十四五里，直道较近，却都是田间小路。抬担架的人急于到达医院，有些地方竟连小路也不走，从田里一直穿过去。我听见他们的脚踏碎稻茬的声音；每当跨过田埂的时候，担架便要掀动一下。闻先生没有帽子戴（一个多月以前，有一次进城去，走在北门外的小桥上，一阵风把他戴的一顶旧毡帽吹到河里去了，从此以后便没有帽子戴了），只围着一条旧围巾，紧跟在担架的后边。……到了医院，一切都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第二天，他又嘱托人到医院去看我，带话安慰我说：'联大的课已经交给慎予（李嘉言）代上了，好好安心治病吧！'"（《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255 至 256 页）①

二月二十四日 与朱自清、陶重华、李嘉言至蒜村访余冠英夫妇，余太太以萝卜饼招待之。（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第 154 页）

是月 寒假中，先生请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郑临川来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准备毕业论文。

郑临川在《永恒的纪念》中回忆说："四一年快放寒假，我毕业论文搜集的资料

① 何善周文中云此事为 1941 年年底，然朱自清在 1942 年 2 月 14 日日记中云："上午何先生因肠炎住院，所有的人都为之震动，何的病使人不安和恐惧。"15 日日记又云："朱肇祥君去医院看望善周，他只是患流行性感冒，并不是伤寒。"（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第 152 页）

还很不足，特向先生告急。先生说：'寒假上我家里住一段时间，怎样？'先生的家当时住在昆明郊区几十里外的龙头村，我知道清华、北大的书库都在那里，查资料当然方便，同时还想到先生叫我上他家住，定有鸿宝秘籍相授，既可节省到处翻捡之劳，又能提高工作效率和论文质量，因此欣然应命前往。来到乡下以后，才知道先生的家原来就是书库兼研究所楼房中的一部分，先生的床和书桌，全安放在二楼的书库中。我们几个外来写论文的同学，就在楼下饭厅靠右边的屋角头搭上临时铺位住定。白天，大家都在书库看书，翻捡或抄写资料，有时困倦就下楼去外面四周田坝散散步，等精神复原了再干。可是先生却在他的书桌端坐，很难见他上下走动。每天夜晚，我们几个把楼下白天的饭桌当成书桌，在暗淡的油灯下抄抄写写。深夜我们已灭灯就寝，只见先生的窗户还亮着灯光，大清早我们还未起身，先生窗里的灯光早已亮了。这样，先生晚睡早起的勤奋用功生活，又纠正了我们平时对他的误解，以为先生讲课精彩动人，只是由于头脑特别聪明，现在才知道他在教学和学术上的成功，完全是从踏实用功、孜孜不倦得来的。在乡下住了好几天，先生像平常一样不作具体指导，还是让我自己在书库中乱翻，看看快半个月，收获仍然有限，心头不免焦虑，打算回校另想办法。在一天午饭桌上，我终于向先生提出返校的请示，先生似乎已察觉出我的失望情绪，但还是很平静地对我说：'开学还早，为什么不多住些时再走？'我临时编了个理由，表示非回去不可，先生再没说什么，只在吃午饭时告诉我，叫午休后到他楼上去一趟。我到楼上的时候，先生已坐在书桌旁边等我，桌上满堆着大小厚薄的手抄本，先生叫我坐下，一面指着这些抄本对我说：'这是我多年抄集下来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好些是经过整理的，里面有不少是你需要的东西，你就拿去抄些吧！将来你如果研究唐诗，我可以全部拿给你。'对这意外的厚赐，我非常激动，先生却继续说下去：'为什么不早拿给你，要等到半月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你嫌自己半年来搜集的太少，就该知道老师这些丰富资料是付出了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指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突然变出来的。你能懂得做学问的艰难，才会自己踏实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评，随意否定别人的成绩。'"（《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代序》，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据郑临川赠编者的手订修本）先生最初给郑临川出的论文题目是《唐初四杰合谱》，郑感到不好做，先生便改为《孟襄阳诗系年》。

郑临川尚读大学三年级时，听人说先生考核学生成绩爱听奇谈怪论，于是打算写篇否定屈原存在的读书报告。先生听了他的论点和论据后，说："书倒念了不少，可惜态度和方法还有问题。是的，我一直鼓励同学要独立思考，敢发异论，要经得

住不怕荒谬绝伦的考验，去争取妙绝千古的成就。但是，首先必须端正态度，态度端正才会找到正确的方法。屈原存在的历史事实，你能否定得了么？你想，屈原的诗篇为我们树立了多么崇高的爱国文学传统，鼓舞了几千年来民族的自豪感情和献身精神，使我们今天还能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作自己文化的主人，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奇迹，我们今天的浴血抗战，也正是屈原精神继续存在的活见证。否认屈原的存在，对于抗战会有什么好处呢？要记住，做学问绝不是为了自我表现，是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和进步作出有益的贡献呵！"（同前）

先生指导学生做研究时，很注意循循善诱。赵仲邑说："一位清华文科研究生研究唐诗，整天都夹着一个算盘，一坐下来就'三下五落二'地统计《全唐诗》的格律诗有多少、古体诗有多少。他的统计是希望统计出唐代格律诗占优势，以证明唐代诗赋取士，限作格律诗对唐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他大失所望。统计的结果，《全唐诗》中诗歌的数量，还是古体诗占优势。闻先生对他说，研究还是要从实际材料出发。为什么不可以把论点调过来？唐代虽然政府提倡做格律诗，但结果还是古体诗占优势，其中的道理，不是可以发人深省么？。"（《闻一多先生轶闻》，《随笔》第8集，第55页）

三月八日　与朱自清同访谢文通，商谈诗选事。（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57页）是月四日，经杨振声介绍，朱自清接到英国新闻专员来信，内容为商谈编辑《近代中国诗选》，二人访谢文通，似与此事有关。

三月二十五日　晚，听朱自清《诗的语言》讲演。

是月　《楚辞校补》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收《闻一多全集》。

一九四三年二月出版的《国文杂志》第二卷第一期，曾刊登朱逊的书评《介绍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内云："校勘楚辞的著作，整部的和零星的，古今已有了不少，这是最新的一种。做这类工作，跟文学创作不一样，但凡作者材料丰富，方法精善，思致周密，总是后来居上。这本书正是如此。""这本书的好处在所据的材料丰富，所用的方法精善，推阐的思致又极周密。"

《楚辞校补》底本采用《四部丛刊》洪兴祖《楚辞补注》，引用古今诸家旧校者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辑校》所引诸本、刘师培《楚辞考异》、许维遹《楚辞考异补稿》、刘永济《楚辞通笺》等。书中采用校勘材料颇广，仅《校引书目版本表》就列有六十五家。又采用古今诸家成说之涉及校正文字者有二十八家，即：洪兴祖、朱熹、王夫之、屈复、陈本礼、王念孙、王引之、丁晏、马瑞辰、俞正燮、江有诰、朱骏声、牟廷相、梁章钜、邓廷桢、俞樾、孙诒让、吴汝纶、王闿运、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武延绪、刘盼遂、刘永济、游国恩、陆侃如、郭沫若。并另有驳正者三数家。

《楚辞校补》所论列内容的范围，为："一、今本误，可据别本以谌正之者；二、今本似误而不误，当举证说明者；三、今本用借字，别本用正字，可据别本以发明今本之义者；四、各本皆误，而以文义、语法、韵律诸端推之，可暂改正以待实证者；五、今本之误，已经诸家揭出，而论证未详，尚可补充证例者。"而"诸家说已精确，而论证亦略备，本书作者无可附益者，本书概弗征引。"

郭沫若很看重《楚辞校补》，他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彻底地实践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但他的彻底处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考据，他把考据这种工夫仅是认为手段，而不是认为究极的目的的。请看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上所说的这样的话吧：（略）凡是古书，这三种困难都是具备着的，事实上并不限于《楚辞》，因而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通课题；尤其是第一项，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但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实在还没有产生出过一部好的文化史。专家的研究也是同样。汉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阶段上盘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阶段，只是在第二阶段的影子上跳跃。清儒又回到了第二第三阶段上来，然而也只在这里盘旋，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这是当然的，要想知道'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须要超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才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那便无从客观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不用说是更不能够批判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就像孩儿期中孩儿自身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和意识一样，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停滞也就必然地汇成了封建意识的污潴。要澄清这污潴，今天正是时候了。我们再看一多先生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中叙述着他的苦衷吧。他认为他所拟定的三项课题，最好是同时交卷，然而为情势所迫，他一时不能够全部完成，'只好将最下层，也是最基本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他认为这是'权变的办法'，是他所极不愿做的。然而为了'可以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他终于这样做了。这《引言》是写于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也正是民主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我们看他这急急于想'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的苦心，不可以看出一多先生以后的活动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吗？但我在这儿注意地引用到这段文字的用意倒侧重在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全般的计划，而且在完成计划的各个步骤上的评价他是丝毫也没有陷于自我陶醉的。'校正文字'和

'诠释词义'的工作,这些正是考据家们所兢兢焉乐道的事业,而在他只是基本的准备工作,而且'校正文字'还只是'最下层'。这不明显地表示着,他丝毫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作过分的夸大吗?他的《楚辞校补》在他自己看来既只是第二第三阶段上的作品,我们准据着这同一的自白,也可以知道,他对于他的《周易义证类纂》、《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庄子内篇校释》、《离骚解诂》等,这样一连串的在文字训诂上极有价值的文字,在他自己也不过是视为第二第三阶段的工作吧了。其实这些著作,当代的考据家们,假使能有得一篇,也就尽足以自豪的。事实上他们是一篇也没有,已经就在自豪了,一些旧式的或新式的卫道者,不是根本连字都不认识,便在那儿以仲尼复活、墨翟再生自命吗?闻先生不是这样的糊涂虫,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剖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这年十一月,《楚辞校补》再版,定价四元。

四月八日 与七十一军驻军士兵发生口角,朱自清日记云:"人们谓最近驻扎此地之士兵暴戾,彼等随心所欲,一士兵昨从此屋偷一块肥皂,一多与数名士兵口角,因彼等坚持要我我们室内做饭,一多拒绝之,然彼等仍不退去。"(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64页)

四月二十三日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举行魏犍荪硕士学位考试,考试科目有莎士比亚、文学批评、现代戏剧。先生与陈福田、吴宓、陈铨、陈嘉、吴达元、杨业治、陈定民、温德、朱自清、莫泮芹、赵诏熊、潘家洵为考试委员。(据《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四月二十九日 担任云南省选送留美学生委员会考试委员会阅卷襄助人。时,云南省成立选送留美学生委员会,是日与西南联大商定英语会话考试委员及阅卷襄助人名单,其中先生为国文阅卷襄助人。(据梅贻琦致缪云台信,1942.5.1,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存)

五月六日 在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讲"神话及中国文化"。五日,云南地方干部训练团已为此致函云南大学,并云地点在华山小学,各校学生可自由参加。(云南地方干部训练团《为在华山小学举行演讲由汤蕙荪先生讲垦殖问题、闻一多先生讲神话与古代文化届时贵校学生可自由参加函云南大学》,云南省档案馆存,1016-1-100/20)

抗战期间,云南省政府系统经常举办各种培训活动,也多次邀请西南联大教授讲课、演讲。先生这次即是应邀前往的。在手稿中,有一份题为《神话与古代文化》的提纲,从内容上看,很可能与这次讲课有关。兹录以参考:

导言：

历史教育与民族意识：

感情产生于知识

不知与猜忌　知与同情

知浅与冷淡

民族意识——知有共同来源

知来源愈悉则民族意识愈坚固

民族主义的心理建设——历史教育

过去历史教育的缺点：

过去无历史教育(严格的说法)

以读经法读史——鉴戒　理智的“微言大义”

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启发民族感情——此在过去为副产效用

非事实的认识——从有亦政治的或帝王及其从属的事实

非整个民族的认识

非文化全面的认识

非文艺式的讲述

今后的危机：

过去只读国学书——多少灌输些历史知识

今后国学书只占学问中一少部分

又无文艺性的历史读物——及博物馆等

民族意识有降低危险

希特勒式的侵略主义——拆散内部

根本消灭“汉奸”——历史家的任务

近代史学的新发展：

历史观念的革新

事实的认识

整个民族
全面文化 ＞ 对象

文艺式的讲述——手段

民族情绪的激发——目的

两种新方法——以发现事实

考古学
民俗学
新旧材料融合研究
神话与古代民俗：
神话研究举例：
三个治水人物及其方法
禹　疏导
鲧　壅防
堙塞
共工
堙塞
“倾地”　女娲　堙塞
传说的演变及其背景
“倾地”——纯神话
堙塞——逃避自然
壅防——抵抗自然
疏导——利用自然
倾地传说——一个被遗忘的洪水故事
传说的分析：
开辟后洪水
世界各民族的故事都从洪水说起
皆不如我国倾地传说的巧妙与伟大
宇宙的结构
一间大房屋
“上栋下宇”——上圆下方——天坛
八山为柱
八极
旋转的盖天
“运之以斗”
斗杓后钩星系天四维
斗转天亦转
斗或为车

永不移动的天极——天枢——北辰
极不在中而不在北的困难
天中与地中不对值
难题的解答——洪水故事
共工撞倒西北的柱子——不周山
天维绝地柱折
天倾西北地倾东南
极星在北偏西
地东南低水归于海——水干
争帝说似后起

传说的评价

天文地理历史三个问题
由共工一撞而全盘解决毫不迁就巧妙的神思　非荒唐的幻想与事情脱节
幻术　机关

文学与科学的萌芽

以主观的想象(文学)
解决客观的现象(科学)
以之谓神话
意象的宏伟
空间的大
时间的远
开阔心胸
(下略——编者)

旁听先生讲"楚辞"与"唐诗"课的马逢华回忆说:"在联大教室里面的闻一多,是一个善于表达,才华外露的学者。闻一多讲'楚辞'和'唐诗'的方法,是以社会文化背景,甚至神话传说来入手,把作者和作品底时代、地方和环境洪托出来。在讲解的过程中,他往往还把诗里面涉及的古代服饰、傢俱等等在黑板上画出来,然后才分析词句,品味诗底本身。这些步骤,今日看来,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是莫说四十年前,即在今日,如果没有详细的考证资料,丰富的想像能力,以及绘画艺术的训练,也并不是容易作到的。对我而言,这就像是有一扇久闭的大门,忽然有人为我打开了。我儿时学读唐诗,对于父亲底讲解,不甚了了,要我背诵,我很快就能背的

滚瓜烂熟，得到大人们的称赞，但是自己并不真懂。中学的几位国文教师，陈陈相因，讲解也都了无新意。直到听了闻一多底课，我才见识大开，方始知道原来诗是可以这样来诠释，应该如此去了解的。闻先生讲课，很像是'说书人'讲故事，常常讲得有声有色，有时甚至比手画脚，眉飞色舞，讲到得意处，声音愈来愈高，语句愈来愈快。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他说，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底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闻一多给我们讲述这个掌故时，自己也是脑袋转来转去，声音激越高昂，讲得满脸发红。那位笔锋常带感情的梁任公，当年在清华朗诵箜篌引时，恐怕也未必会比闻一多向我们复述时的情形，更为兴会淋漓。这一阵热烈激昂的表演过后，闻先生把声音压底，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有人批评闻一多讲课太过戏剧化，如演文明戏。但是如果与看朱自清先生讲课之沉闷相比较，就会觉得这种批评未免过于苛求了。"(《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台湾《传记文学》1988年6月号)

选修唐诗课的马识途，对当年先生讲课的情形有着深刻印象。他回忆说："本来选唐诗这门课的学生并不多，大约只有十来个人，但因为是闻先生的课，教室里早已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站在后边，连窗外也站了一些人，旁听的比选课的学生多了几倍。我是选唐诗课的，但来迟了一步，也只好站在后边了。闻一多走进教室，在小课桌后坐下来，把老怀表摸出来放在桌上。时间还不到，他摸出他黑亮的烟斗来点上，吸起烟来。当他又看了一看他那老怀表，也许是怀疑他这个老伙计的可靠性时，上课的钟声响了。他立刻从大书袋里摸出讲稿来，开始讲课。其实他并不照本宣科，往往是不看稿子，越讲越远，越讲越自在，用那充满激情的调子，诗意般的言语，给我们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用生动的形象展示在你的眼前，把你带到古代的社会里去，让你去看看石壕吏怎样夜晚捉人，让你看看新婚的丈夫来不及和妻子告别就被拉上战场。"(《马识途文集》第9卷《风雨人生》下册，第384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五月十三日 与朱自清谈"洪水"研究心得。朱自清日记："听一多讲《洪水故事》，明白，风趣，且系重要问题。余以为盖天说为一大发明。"(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71页)

五月十六日 《乐府诗笺》(续)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十三期，收《闻一多全集》。

所笺有《陇西行》、《艳歌行》、《羽林郎》、《饮马长城窟行》四篇。

六月十日　云南省教育厅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联合举办中学教员暑期讲习班，先生被聘为讲师。（据《中学教员暑讲班聘定名教授多人》，《云南日报》，1942.6.11）次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时，云南省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习班讨论会举行开幕式。该班分教育、数理化、文史地三个组，联大许多教授都应邀，其中"文史组讲师闻一多、张清常、罗庸、唐兰、彭仲铎、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余冠英、萧涤非、王力、罗常培、雷海宗、孙毓棠、郑天挺、吴晗、邵循正、张印堂"。（《中学教员暑讲会下月一日开课》，《云南日报》，1942.7.26）这阵容集中了西南联大的文、史、地三系之精华。类似这种暑假讲习班，几乎每年都有。

六月十八日　清华大学召开迁昆明后第十五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议决续聘先生与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为副教授。（据《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与部分材料》，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二十五日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举行魏建荪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考试，先生与陈福田、吴宓等为考试委员。（据《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二十八日　朱自清日记："看一多《国文选》目录，甚觉无复古倾向。其主张大学生诗赋等习作之必要性，却可商谈。知其甘苦，至关重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81页）

六月二十九日　朱自清日记："必须读一多《楚辞注释》，相信我会从中受到很大启发。"（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81页）

六月三十日　西南联合大学奉教育部令，呈报服务年限满十年教授名单，作为部聘教授候选人。其中清华大学呈报十一人，有先生和王力、雷海宗、噶邦福、赵忠尧、冯景兰、赵凤喈、陶葆楷、张泽熙、刘仙洲、章名涛。（据《国民党教育部举办部聘教授及修假教授出国进修暨推荐合格人选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八月十二日，教育部核示批复，准联大呈荐先生等七十三人为部聘教授。（《教育部关于部聘请教授候选人的复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册，第33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审核"部聘教授"的措施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先生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说："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教授会中讨论到这问题，许多先生，发言非常愤激。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党的情绪。"（《联大八年》，第6页）

是月　为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胡伦积毕业题词："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七月三日　为教育部评选部聘教授，学校组织推选，朱自清、王力均推选了先

生。朱自清日记:“推选国家教授,我选一多与了一(即王力),而了一选一多与我。”(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83页)

七月七日 余冠英至司家营拜访先生、朱自清、许维遹,遂同往余家午餐,饭后同游名胜黑龙潭。朱自清形容当时的景色:“荫影朦胧,幽美如画。坐茶室内,面对高大树对面的清碧潭水,山寸阵阵,更添韵致”。(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84页)

七月十二日 晚,先生在文科所为李嘉言赴西北师范学院饯行。是月四日,黎锦熙给罗常培发来电报,称西北师范学院聘定李嘉言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旅费同时寄出。罗常培遂将电报交给朱自清,转给在司家营的李嘉言。西北师范学院为战后北京师范大学与北平师范学院内迁后合并成立的高校,副教授的待遇为月薪三百元,对李嘉言养老哺幼生计问题,略有所补,故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提出辞职。(据李之禹《李嘉言与闻一多先生》,未刊稿)

李嘉言辞职,事前他怕先生不允,所以没有对先生讲。李嘉言于抗战爆发随校南迁,同先生一道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他供职清华七年,但在讲究资历的这所高等学府升迁颇难,加之他家累较重,只得忍痛离校。欢送会上,先生不无痛心地说:李嘉言在《当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二、十三期上发表的《唐诗分期与李贺》的论文,是司家营的光荣;我是不同意他走的,可生活太苦,非走不可。(据访问范宁记录,1988.6.16)

李嘉言走后,先生感到青年教师太少,准备聘孙作云、刘绶松回母校任教,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李嘉言离开了清华,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去了。对于他的离开,闻先生是很痛惜的。慎予走了之后,清华中文系里,青年教师只剩我一人了。这时,闻先生经常念道孙作云。孙是七七事变前清华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楚辞》的研究上有些创见。闻先生很欣赏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才能,当时曾叫我向国统区不少和我相识的同学发信,查询作云的消息,但始终没有探询出他的下落。我们推断他是没有走出沦陷区。在通信中,我和在西北联合大学任教的刘绶松有了联系。我向闻先生说:‘绶松在西北联大,请他回来不好么?’闻先生当即应允说:‘好哇!我竟然没有想起他来。好!你马上就写信,就说我希望他回来。’绶松最初是愿意回到母校来的,后来却又辞绝了。我写信问他什么原因,当时他并没有明确答复。解放以后,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一九五四年我们在北京见了面,谈起这件事,原来他只是因为当时全家五口的路费没有着落。我说:‘唉!闻先生多么希望你去。你写信明说,闻先生马上会叫学校给你寄路费去的。’闻先生鉴于过去多年精心培养的学生都走散了,所以

他对于在校的研究生和本科中他所中意的学生注意的更多了。当时在校的中国文学研究生有季镇淮、王瑶(昭琛)、范宁和傅懋勉(兹勤)。他们的投考研究院,都是经过严格地考查和挑选的。比如我的同班傅兹勤,在校时就是一个勤奋学习而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毕业后又在西南联大出版的《国文月刊》上发表了关于唐诗研究的论文。闻先生很赞许他的文章并欣赏他的独创才能,对我夸说他好几次。我说:'让他考研究院好么?可以跟闻先生再多学几年。'他说:'好哇!我愿意收他这个学生。'"(《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57至258页)

七月十五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为聘西南联大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刘功高为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事,信云:"中国文学系助教黄君拟辞职投考研究院,所遗助教一职顷已与冯芝生先生商定,拟聘本年度联大毕业生刘功高女士补充,用特专柬奉达,敬希钧裁是幸。"梅贻琦次日即批示:"照办。"八月六日又批:"刘薪一百元,出国文研究部补助费,无庸开报联大。"(《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刘功高回忆:"流光易逝,转眼我已四年级,行将毕业了。有一次,恩师讲唐诗,大家都听得出神,陶醉于诗情画意中,不觉下课铃响了。听见有人说:'好快呀!'忽然,我听见像我父亲的声音在叫我:'功高,你留一下!'我父亲在千里外的恩施,他怎会到这里喊我呢?啊,原来是恩师的声音。于是,我随恩师走出课堂,从南院信步漫谈到北院。最初,恩师问我毕业后作何打算?我说:'想回到家乡湖北去工作。我父亲避难在恩施,暇时好请父亲教我一些古文。'恩师说:'你爱家乡很好!一个爱家乡的人,才会爱他的国家。'又问我:'你父亲是谁?干什么工作?'我说:'我父亲是刘南如,又名凤翔,年轻时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是兴中会、同盟会会员、曾为革命奔走于国内外,历经风险。晚年隐居乡里,注解《四书》、《史记》,人称理学家。我想把父亲满腹经纶学到手。'恩师听后认为我好学上进,值得培养,于是说:'我那里有个缺,很多人在争,我内定给你,暂时不告诉别人。'我听了心喜若狂,大家都知道恩师是知识的宝库、智慧的海洋,在恩师身边一定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我是多么幸福啊!"(刘功高给编者的信,1988.3.24)

七月二十六日　朱自清日记:"读一多《论九歌》,真创作也。"(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88页)

七月二十九日　患了一种叫昆明热的病,欲向学校借车进城看病,被拒绝。朱自清在三十日日记中写到:"一多昨患病,写信托我向梅校长借车进城,但梅校长没有司机。今早他请(陈)雪屏向蒋校长借车,蒋以汽油不足为由加以拒绝。一多下午乘人力车归。"(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89页)

是月 范宁、傅懋勉考取先生的研究生。

是月 西南联大举行中文系招收三年级转学生考试,"国学常识"题是先生所出,王瑶至今保存有当年油印的试题,从中可窥探出先生的某些教学思想和重点,故录以备考:

一、下列十个名词是否都是《易经》的卦名?请将误列的指出来:

蒙　　萃　　既畜　　大过　　谦

济　　盈　　丰　　归妹　　苞

二、下列五篇《尚书》哪几篇是今文?哪几篇是古文?

尧典　　益稷　　张弊　　金縢　　君牙

三、下列十篇《诗经》中哪几篇是"有其义而亡其辞"的"笙诗"?

鹿鸣　　白华　　华黍　　南山有台　　由庚

崇丘　　鹤鸣　　鱼丽　　南亥　　由仪

四、下列五篇《礼记》,哪几篇属于《大戴》?哪几篇属于《小戴》?

深衣　　曾子立事　　内则　　帝系姓　　仲尼燕居

五、下列《春秋》十二公的次序是乱的,试依时代先后用数目字标出来:

隐公　　昭公　　僖公　　宣公

文公　　成公　　哀公　　桓公

襄公　　定公　　庄公　　闵公

六、《史记》一百三十篇是如何分配的,试分别填注出来:

本纪(　　)篇　　书(　　)篇

表(　　)篇　　世家(　　)篇

列传(　　)篇

七、《水经注》是郦道元作的呢?还是他注的?如果是他注的,那末,原作者是谁?

八、杜佑《通典》和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是否一样的?郑樵《通志》和他们有甚么不同?

九、二十五史中,表和志不具备的是那几史?

十、《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诸子六家是那六家?《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是那十家?《荀子·非十二子篇》所"非"的是那十二子?

十一、下列各条那几条是惠施之学?那几条是公孙龙之学?

白马非马　　指不至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难三足　　丁子有尾

今日适越而昔来

十二、下列各条著者和书名有错误吗？请指出来：

陆法言《广韵》　　许慎《说文解字》

张揖《广雅疏证》　　贾谊《新语》

陆贾《新语》　　扬雄《法言》

仲长统《昌论》　　荀悦《申鉴》

王符《潜夫之言》

十三、下列各条学派传承有错误吗？请指出来：

周敦颐是陈抟的弟子　　程颐是欧阳修的弟子

朱熹是李侗的弟子　　徐爱是王守仁的弟子

颜元是李塨的弟子　　曾国藩是倭仁的弟子

十四、下列各篇《楚辞》，那几篇是属于《九歌》的？那几篇是属于《九章》的？

湘君　悲回风　国殇　少司命　橘颂

怀沙　礼魂　惜诵　哀郢　东君

十五、下列各篇乐府，那些篇是汉乐府？那些篇是晋南北朝乐府？

团扇郎　华山畿　蒿里　梁甫吟　欢闻变

上之回　前溪　乌生八九子　乌夜啼　阿子

十六、下列各家，那几个是初唐诗人，那几个是盛唐诗人，那几个是中唐和晚唐诗人？

王昌龄　贾岛　宋之问　李白　杜牧

王绩　王维　元稹　元结　罗隐

十七、下列各家的文学渊源有错误吗？请指出来：

李翱学古文于韩愈　　黄庭坚学诗于黄庶

曾几学诗于韩驹　　李后主学词于冯延巳

曾国藩学古文于姚鼐　　梁启超学诗于黄遵宪

十八、试注明下列各杂剧传奇的作者及其时代：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

绣襦记　还魂记　燕子笺

长生殿　桃花扇　南西厢

十九、注出下列各韵书的部数：

切韵(　　)韵　　广韵(　　)韵
集韵(　　)韵　　五音集韵(　　)韵
平水韵(　　)韵　　韵府群玉(　　)韵
洪武正韵(　　)韵　　中原音韵(　　)韵
中华新韵(　　)韵

二十、注出下列各家所分的古韵部数：

顾炎武(　　)部　　江永(　　)部
戴震(　　)部　　段玉裁(　　)部
江有诰(　　)部　　孔广森(　　)部
王念孙(　　)部　　夏炘(　　)部
黄侃(　　)部

二十一、指出下列各书的著者：

仓颉篇　　急就篇　　训纂篇　　方言　　释名
玉篇　　类篇　　字汇　　经籍纂诂

二十二、注明下列各字在六书中属于那一类？

马　　鼠　　鸡　　犬　　牛
上　　下　　一　　二　　三
江　　河　　日　　月　　星
令　　长　　武　　信　　义

以上题目任答十题，选择性较大。它反映了先生重视广博的知识素养，尤其重视从文字训诂入手研究古代文化，也体现了先生本人的治学准备与治学途径。

先生治学非常重视训诂，也要求学生掌握这一工具。旁听研究生课程的王士菁回忆说：因白天有敌机轰炸，先生给研究生讲授的“楚辞”课，曾改在晚间进行，“教室”即孙毓棠的宿舍。(联大租用昆华师范学校的教师宿舍)“有时电线被敌机炸断，镇淮兄、王瑶兄、范宁兄和我四人即点起蜡烛听讲，闻先生照常授课。‘课余’也经常漫谈。闻先生对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极为赞赏，不断提醒我们在文字训诂方面要多下功夫。”(《怀念》，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第11至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八月二十八日　与朱自清谈中国诗与散文。朱自清日记：“上午与一多谈中国诗和散文的发展，一多据江清(即浦江清)意见谓现在必须注意阐明我国伟大的思想均表现于散文这一观点。”(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94页)

八月二十九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是月十一日，清华大学办事处曾

转来梅贻琦手示，云："下年在联大担任功课者聘为助教，并由联大支薪，其在国文部担任研究工作者聘为研究助理，应由清华支薪，出该部研究补助费项。"二十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文科研究所所长冯友兰，特为此致函梅贻琦，谓助教"若予改为助理，似有轩轾，闻大普吉研究所中亦有助教名义，可否仍与助教聘书"。先生的信，是为了做补充说明。信云：

关于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诸助教情形，有当续呈明，用供参考者。查上年度所中原有助教三人，内中朱兆祥、黄匡一二人系完全担任研究工作者；何善周就职本自研究所成立之前一年始，在该年度内，何君曾在王了一先生及生手下工作各半年，迨研究所成立后，何君除负责照料所中杂务外，并在联大担任大一国文一班，同时在所中即未另分派研究工作。除上述朱、黄、何三君外，上年度另有半时助教季镇淮一人，亦在所中担任少许研究工作；本年度黄匡一君辞职，拟以刘功高君补其遗缺，前已专函呈请，听候钧裁。总计本年度在所中工作者有三人半，其工作性质及分量条列如下：

朱兆祥、刘功高，以上二人全部时间作研究工作；

何善周部分时间管理所中杂务，部分时间研究。何君上年因担任联大国文未予分派研究工作，本年拟不担任国文，故仍须作研究；

季镇淮，本系研究生兼半时助教，本年仍以部分时间担任所中研究工作。

以上朱、何、季三人上年度均系助教或半时助教名义；刘系新聘，且所任工作性质较简单。前与芝生兄商量，前三人仍给以助教聘书，后一人则不妨予以研究助理名义，惟是否有当，仍希卓裁是幸。（《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梅贻琦九月一日批示："照聘。四人皆系研究工作，应由清华支薪。"这样便把问题调和了，既同意了先生与冯友兰给以何善周等三人助教的名义，而开支则由清华大学负担，解决了由联大支出的问题。

九月十日　向朱自清痛斥刘文典。朱自清日记："一多痛骂刘叔雅（即刘文典）先生，口气傲慢。刘是自作自受，尽管闻的责骂对于一个同事来说太过分了。他还说他不愿意再为他人服务，意思是在暗讥我的妥协脾气。"（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97页）

九月十四日　西南联合大学开学，二十一日正式上课。这学年，先生给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文学组四年级讲授"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四学分。上学期还给文学组三、四年级讲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一）"（周易），二学分。本年度，与马芳若继续合开大一国文。（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先生讲授“周易”,是第一次,其方法与讲授“诗经”、“楚辞”一样,也是从文字训诂入手。(据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 42 页)

九月十六日 经先生推荐,西南联大聘彭丽天为文学院中文系教员。

是年秋冬之际 在中法大学法文系“诗的九讲”学术演讲会上,作“诗是什么”演讲,认为一首好诗要价值论与效率论统一,即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据徐知免《回忆闻一多先生》,《解放日报》,1979.11.22)

十月十六日 《乐府诗笺》(续)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十六期。收《闻一多全集》。所笺有《始生》、《枯鱼过河泣》、《豫章行》、《艳歌行》、《咄嗟歌》、《董逃行》、《焦仲卿妻》七篇。

同日 邀请朱自清午餐,令朱“非常快慰”。(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第 204 页)

十月二十日 与朱自清、罗常培、汤用彤、邵循正等商文学史讲座事。朱自清日记:“参加莘田(即罗常培)、锡余(即汤用彤)、心恒(即邵循正)与柳贻征晚餐会。安排十四讲,内容为中国历代诗与文学作品。我讲宋诗之思想。晚饭膳食甚好。餐后我们谈及中国书信的敬语,一多一概称之为‘虚伪’。如往常一样,我受不了他的一概抹杀,用很谦虚的语调与之争论,谓此种虚伪或有必要。他立即带着傲慢的微笑回答说:他并没有说绝对无此必要。对其极端的说法保持沉默,但认为那不正确。”(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第 204 至 205 页)

十月二十五日 冯友兰与海威斯来访。(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第 205 页)

十一月六日 西南联大举办文史讲演,是日起每周举行一次,报载“听众极为踊跃,因该校教室至多能容五六百人,迟到者几无立足之地”。该演讲第一讲为先生,讲题为“伏羲的传说”。朱自清云:“晚间听一多讲演,妙极,非常羡慕他,听众冒雨而来,挤满教室。”(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第 207 页)该讲演其余为汤用彤讲“隋唐佛教的特点”,朱自清讲“宋诗里的思想”,邵循正讲“元代文学与社会”,郑天挺讲“清初文化之调融”,吴宓讲“清末的小说”,冯文潜讲“天才与创造”,罗庸讲“诗的欣赏”,金岳霖讲“小说与哲学”,杨振声讲“书画同源论”,冯至讲“浮士德里的魔”,袁家骅讲“语言与文学”,陶云逵讲“文化变迁中之人格问题”,罗常培讲“语言与文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文史学讲演》,《图书季刊》新 4 卷第 1、2 期合刊,1943 年 6 月)

十一月十五日 作《伏羲考》“引论”和《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伏羲考》第二部分)。发表于次月昆明《人文科学学报》第一卷第二期。收《闻一多

全集》。

《人文科学学报》创刊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出版者为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及一些研究所研究员联合组织的中国人文科学社。该社是一个纯粹学术团体，成员有丁骕、王赣愚、伍启元、费鉴照、巫宝三、贺麟、雷海宗等人。该学报每年出版两期，为纯粹学术刊物。

《伏羲考》是先生神话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篇《引论》考证伏羲与女娲的关系，引用了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和常任侠的《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新报·学灯》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两文中所搜集中外神话资料二十五则，证明伏羲、女娲本来就是夫妻。先生研究中特别注意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在文中说：

> 人类学可供给我们的材料，似乎是无限度的。……但人类学对这问题的贡献，不仅是因那些故事的发现，而使文献中有关二人的传说得了印证，最要紧的还是以前七零八落的传说或传说的痕迹，现在可以连贯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了。从前是兄妹，是夫妇，是人类的创造，是洪水等等隔离的，有时还是矛盾的个别事件，现在则是一个整个兄妹配偶兼洪水遗民型的人类推源故事。从传统观念看来，这件事太新奇，太有趣了。

《伏羲考》中还有《战争与洪水》、《汉苗的种族关系》、《伏羲与葫芦》三章，生前未发表，后来编《全集》时方从手稿中检出来编入。

《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共分四节：人首蛇身神、二龙传说、图腾的演变、龙图腾的优势地位。该文亦旨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源头，其评述至今为学术界所重视：

> 假如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有过图腾主义的社会形式，当时图腾团族必然很多，多到不计其数。我们已说过，现在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他们起初都住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即古代中原的西部，后来也许因受东方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商民族的压迫，一部分向北迁徙的，即后来的匈奴，一部分向南方迁移的，即周初南方荆楚吴越各蛮族，现在的苗族即其一部分的后裔。留在原地的一部分，虽一度被商人征服，政治势力暂时衰落，但其文化势力不但始终屹然未动，并且做了我国四千年文化的核心。东方商民族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虽大，但我们的文化究以龙图腾团族（下简称龙族）的诸夏为基础。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

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也许这现象我们并不自觉。但一出国门，假如你有意要强调你的生活的"中国风"，你必多用龙文的图案来点缀你的服饰和室内陈设。那时你简直以一个旧日的帝王自居了。

先生研究神话，有不少认识未来得及撰成专文，现存手稿中有份无标题的提纲草稿，虽然文字较零碎，但反映了他神话研究的某些方法：

科学与神话
我国二者皆不发达
由历史的立场国人已知注意古代科学的萌芽
理智
中庸(平庸)近代学术思想向两头扩张
想象
神话亦渐被注意
抗战中西南原始民族神话之发现
□□□□□□事中所□的西南神话
古史的新资料
关于中国史第一页的一个久悬的公案
顾颉刚累层式的古史说及古史作伪说
夏　　尧舜　　黄帝　　伏羲　　盘古
西南神话中的伏羲女娲与太一(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
从邻族借来的古史
盘古(东南)　　伏羲(西南)
伏羲(对音)
太一(译意)　＞ 单一(统一)第一
1. 封建时代的上帝多元的
　战国至汉武之统一运动
　政治　思想　宗教——一元的，单一的
2. 人的发现——历史观念发达——探原——第一必然为单一元始的
　　(单一的　元始的)皆未曾有必需借用

供□的来源

秦楚开辟西南

中间人

老庄思想

虚构古史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人与物——人的发现

人与人——集团生活的方法

二者皆文化进步的表征

古史累层则有之作伪则非也

关于图腾研究，未刊手稿中有《图腾杂考拟目》，内有“图腾宴”、“阶级沓布(taboo)”、“性(乱伦)沓布”、“鲑蛮与玦”、“蛾蟥与璜”、“鱼龙曼衍”、“忌食鲴鱼”、“鲸鲵”、“同体化”、“支团”等小目，可知先生准备进行的研究项目。

先生研究古代文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朱自清曾说：“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记录，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辞》的神话，也是一样的态度。”又说：“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综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20至122页)

十一月二十三日　西南联大教授浦江清由沪返滇，是日至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与先生相见甚欢。

浦江清在《西行日记》中记述了文科研究所的情形：“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被毁之劫。书桌八，闻、朱、许、何善周(助教)、朱兆祥(助教)、范宁(研究生)、刘功高(助教，女)、另一哲学系研究生。余来，刘功高搬至楼下。卧室则在两厢房。闻及其眷属占其一，朱、许、何占其一，余来乃在室中加一铺。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据云每月包饭费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钱，否则要五百元云。”(《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199页，三联书店1987年6月出版)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先生生日。朱自清日记云：“今日一多生日，食炸酱面，不甚佳，然酒与菜颇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11页)

十二月三日　做“神话与诗”演讲。朱自清日记：“听一多演讲《神话与诗》。他

将诗与先民、儿童及狂人相比，其副题是从诗的生物功能看诗。他认为想象来自魔法。《古诗十九首》感情高尚，而仕子仍以神话对待生活，并对之感到满意。江清在演讲后向一多指出，在神话时期有诗，荷马便是明显的例子。”（朱齐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11至212页）

十二月五日 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借书，因未借到，与罗常培争执。次日朱自清日记：“昨日一多为北大研究所未借到书而与罗争吵，学生以为是骂他们而发怒，为此冯（友兰）特地向学生做了说明。”（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12页）

十二月十七日 在中法大学讲“神话与诗”。浦江清《西行日记》：“是晚至中法大学听闻一多讲《神话与诗》。大意为神话告终而诗出。神话与魔术时代，人觉无所不能，理想之境界皆可达到。至诗人时代则感觉人生之能力有限，而多悲观之思想矣。”（《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204页）

手稿中有《神话与诗》提纲，题下的副标题为《诗的生物功能观》。提纲为：

生存的意志——传种营养避害
控制自然
未能控制更想控制
憧憬集中的思念产生幻觉
游戏与模仿巫术
巫术的分类与举例
生气主义——巫术的上层建筑
神话——巫术的保状与证书
文学与艺术
诗是巫术时代的残余
宗教的诗
科学的追求即诗的生命
死的惶恐

十二月二十一日 应邀参加陈梦家夫妇晚餐。朱自清日记：“参加陈君夫妇晚餐会，餐后长谈，一多谓他劝游集中精力著作较写诗为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14页）

十二月二十五日 赴浦江清邀宴。浦江清《西行日记》云：“中午在金碧路南丰西餐馆请唐立厂（兰）、罗莘田（常培）、闻一多、佩弦（朱自清）、骏斋（维遹）吃饭。酬谢立代余教此半年词选课。每客七十元，有汤一、小吃一、鸡一、猪排一、咖啡、水

果，面包，果酱另加价，牛油售缺。连筵席捐、小费、纸烟，此餐共费五百元。当我初来昆明时南丰西餐不过三四元一客，菜多，使人饱得吃不下。今但微饱耳。是日下午三时许来警报，出北门至郊外。"（《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205页）

是年　重新开始研究《庄子》。朱自清《闻一多全集·编后记》："在文科研究所着住的第二年，他重新开始研究《庄子》，说打算用五年工夫在这部书上。"

先生研究《庄子》，工夫所费甚多，他曾手抄《庄子》一书，并汇集各家注释，又批注上自己的见解。现存手稿中，有一份未最后定稿的研究道家思想的提纲，从中可以看出先生特别指出这一学派在政治上的不合作态度：

道——远离人事，不合实用
主人不需要，准被遗弃
不得不独立。比较富于独立性

不合作——为我（拔一毛为天下不为也）
无为——无所为
倒转话题——以无为本
无为——一切不活动——静
无（无有）——一切不存在——虚
否定一切——（政治、礼教皆在内）
无所为——自由，发展个性——逍遥游
无所有——平等，人的严严[尊严?]——齐物论

忠顺亦被弃（丧家之犬，挥之不去）
反叛亦投降（终南捷径）招之即来　} 皆奴性

艺术为宗教　礼教
艺术宣布独立——为自己——资产阶级向封建革命——民主革命
中国文艺出道家——杨朱为我，不合作
个人主义
过时
进一步为人民，否则停留在个人主义即是反动，革命对象

是年　云南省教育厅举办戏剧教育训练班，范启新担任班主任。训练班邀请李公朴讲战时教育、孙起孟讲文艺概论、李何林讲文艺思想、林志音讲音乐概论、张

清常讲国语、范启新讲戏剧概论。训练班还邀请了先生讲舞台装置，先生因工作不能分身，推荐了孙毓棠来讲这个题目。（据访问范启新记录，1987.11.8）

是年 西南联大一些同学和毕业同学创办五华中学，校长为李希泌。学校开办后，请了不少西南联大学生担任教员，其中有王瑶介绍的季镇淮。季镇淮曾推荐先生和朱自清任教，但李希泌觉得先生有些怪脾气，就只请了朱自清。（李希泌口述、王枫记录整理《我和季镇淮先生的交往》，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第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一九四三年　四十五岁

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新约在华盛顿、重庆签字，不平等条件废除。

一月二十六日，日军进犯滇西边境。

二月九日，美军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此为大规模两栖越岛攻势之起点。

二月十五日，昆明《自由论坛》创刊，社长郭相卿，编辑潘光旦、费孝通等。该刊为昆明民主舆论的一个重要园地。

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

六月二十九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在印度成立。

七月五日，苏德库尔斯克会战打响。八月二十三日，苏军获胜，从此夺得战略主动权，德军被迫转入全面防御。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会上通过促进实施宪政、组织宪政实施协进会等决议，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由此开始。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讨论开辟第二战场、战争目标和战后维和等问题，会后发表《美、英、苏、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十月十日，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反攻。

同日，昆明《正义报》创刊。

十一月一日，昆明《扫荡报》创刊。此为国民党军队系统报纸。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三国首脑召举行开罗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大计。十二月一日，中、美、英发表经斯大林同意的《开罗宣言》。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三国首脑会议。

一月十三日　清华文科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联合设宴，招待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Dodds，饭后讨论甚久。时，牛津大学中国文学讲师 Hugheos 亦在司家营，应邀请参加。（浦江清《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 209 页）

一月十五日 在新诗形式讨论会上谈对诗词格律的意见。朱自清日记:"参加新诗形式讨论会。李广田与邢庆兰作他们研究新诗之报告,甚好。后者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卞(即卞之琳)、冯(似指冯至)与闻君提出他们的意见,闻认为中国的诗词格律对于我们是损失,而非一般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有益。他引用施子愉统计资料的数字说明盛唐时期旧风格的诗数量超过现代的,以此证明他的假设,因为盛唐时期的诗被认为是唐朝四个时期中最好的。我认为此结论草率。"(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19页)

一月十七日 与同仁设宴请冯友兰、陈梦家等朋友。浦江清《西行日记》:"是日,余等宴请冯芝生夫妇、陈梦家夫妇、余冠英夫妇、郭先生。主人为闻一多、朱佩弦、许骏斋、何善周及余五人。借郭家厨子,骏斋为提调。郭厨老李,北平人,烹调甚佳。是晚宾主甚欢。冯先生夫妇将有重庆之行,为设饯也。一席费约千元。"(《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209页)

席中的郭先生,是许维遹的朋友,实业家,对先生的学问人品极为敬仰。他知道先生生活艰难情况后,主动提出愿吸收先生入股,不用出资,只挂个名即可,到时适当分红。先生不愿做生意,婉言谢绝。郭氏又提出愿担负立鹤大学毕业前的全部生活费,先生虽很感激,但觉得自己的孩子由他人供养,殊为不妥,亦予谢绝。

一月十九日 朱自清日记:"浦示余傅懋勉信,傅严厉抨击浦对傅文之批评,而浦系应冠英(即余冠英)之请而评傅文。……一多阅此信后颇激动……倾向于责备傅。但何(似指何善周,先生的助教)自告奋勇要先去与彼交谈,若傅后悔,则一多将让他向浦道歉;如何失败就不必麻烦一多去教训这个顽固的学生。"(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20页)

一月二十四日 与朱自清、浦江清、余冠英、许维遹等同游黑龙潭、金殿。这是两处极有盛名的古迹园林,离司家营不远。此时正是茶花盛开的季节,内一株色浅红者尤大,高二丈许,花大可比芍药。先生等留连茗饮。

二月四日 除夕。下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同仁合做年饭,共除旧岁。浦江清《西行日记》:"下午同人集合包饺子(即角子)。晚饭即吃蒸饺,另菜二碟,佐以酒。又闻家送来鸡肉一碟,萝卜球一碗。此即年夜饭矣。同人兴致尚好。……晚饭后在闻家打牌。同人皆加入,或打四圈,或八圈、十二圈不等。"(《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211至212页)

二月六日 上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徐旭生(炳昶)与先生谈神话研究。浦江清《西行日记》:"陶重华自城中来此,言城中龙灯戏热闹情形,此因废除不

平等条约，与盟国成立新约，故政府特下令庆祝三日。同时世界战局形势好转，胜利在望，民间庆贺旧历年之高兴，远比往年为胜。上午徐旭生来与闻公谈宓牺、颛顼、高阳等史话。时当新正而抗论羲皇上古，亦殊别致。"(《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212页)

二月七日　在家中，与同仁围炉谈诗及其他。浦江清《西行日记》："天阴，寒甚。在闻家围炉谈诗。游泽承(国恩)谈散原诗尤有劲。传观诸人近作，佩公晚霞诗、重华黄果树瀑布诗、泽承律诗数章均佳。……夜间仍寒，围炉谈，自宗教、科学至新旧诗、电影、话剧皆谈，互为辩论。最后想到联合各大学教授成立一中国文学会，仿物理学会之类。佩公言人多派别多，不易为云。"(《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213至214页)

二月八日　先生夫妇与朱自清、浦江清到余冠英家拜年。浦江清《西行日记》："上午阴，下午放晴。与一多夫妇及佩弦散步至散村余冠英家。"(《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214页)

二月十六日　《国文月刊》第十九期刊登西南联大毕业生刘兆吉的《关于孤儿行》。这篇文章本是刘兆吉写信向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先生觉得内容颇有价值，便推荐给《国文月刊》。

刘兆吉回忆说："我曾一度在重庆南开中学教语文，也因为受一多师的影响对文学有兴趣，也爱考证一些古人未解决的问题，有疑难就写信请教一多师。当时他负担重，经济困难，多处兼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对已毕业的学生，而且我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又不是清华学生，而是南开合并联大的教育系学生，但闻师没有一般人的门户之见，有问必答。如我对《乐府·孤儿行》的考证，我本来是请教他的，他竟然加以修改，加了题目，推荐《国文月刊》。"(《刘兆吉给编者的信》，1988.6.28)　刘兆吉是在备课中发现《孤儿行》中"面目多尘"句与全诗语气、押韵、结构不甚协调，推敲出大约漏掉了一个"土"字。自文章登载后，各家多从刘兆吉说。

二月二十二日　西南联合大学寒假后开学。这学期，先生给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文学组三、四年级讲授"乐府诗"，二学分。(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课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二月二十五日　西南联合大学聘请姚殿芳为中国文学系助教。姚殿芳一九四二年于该校毕业，在校读习期间，写过一篇关于李贺研究的读书报告，先生看到很是赏识，留下未还给她。她毕业时，学校没有留校名额，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先生知道姚的父母住在贵阳，主动表示愿意介绍她去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教书，并说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是由清华大学同仁创办的。但姚殿芳未去，留在昆明，这时由罗常培推荐聘为助教。(据访问姚殿芳记录，1986.11.17)

三月二日 作《七十二》"附识"。《七十二》最初是季镇淮写的一篇论文,经先生与何善周加工整理充实,以三人名义发表于是年七月《国文月刊》第二十二期。收《闻一多全集》。

这可说是一次师生合作的集体创作。该文写作过程,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介绍到:"一九四三年的初春,一天,闻先生自城里上课回来,刚走上楼,还没坐下来,就打开他的布书包拿出一篇稿子递给我,说:'镇淮写了一篇文章,谈'七十二'的,很好!很有见解!'我翻着镇淮的稿子,虽只看了一个头儿,觉得问题提的不错。我看完之后,提出我的几条补充意见,闻先生说:'我还有一点意见,好!我来给他补充补充。'他当即中止了他正在写的《庄子内篇校释》,忙了起来。他随时把要补充的意见讲给我听,比平日写他自己的文章时精神更振奋、更紧张,晚上睡得更晚,足足忙了五个昼夜才改写完毕,最后自己又亲手把稿子誊清,我要抄写他也不让。文章誊清之后,却写上了我们三人的名字。当时我再三推辞,说:'文章的架子和主要意见是镇淮的,补充和修改都是先生亲手作的,应该由先生和镇淮共同署名。我只是顺便说了几条意见,算不得什么,不应该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闻先生坚决要由三人署名。我虽然内心惭愧,但也不好过分背拂老师的心意。"(《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56至257页)

先生在"附识"中交待的更为详尽:

> 这可算作一次"集体考据"的实例罢——事情的由来如此。不久以前,镇淮曾谈过一次这文中的大意。最近本刊编者(余)冠英先生交来徐德庵先生的一封信,内中说到,在本刊十六期读到彭啸咸(仲铎)先生的《释三五九》,想起古书中常见的另一数字"七十二",却不知道它的来历如何,无暇考查。我看了信,告诉冠英先生,镇淮谈过这问题,详情不大记得,等碰见他,就请他答复徐先生罢。就在当天晚上,见了镇淮,我正要拿徐先生的信给他看,他已将文章(即本文的初稿)递过来了。事情居然如此凑巧!我回家和善周谈起(他本是对汉代思想极感兴趣的),愈谈愈兴奋,于是我们分途再搜材料。我们的收获更足以坐实这问题意义之重大,和镇淮的解释之正确。我索兴将文章重写了一遍,一方面容纳了新得的材料,一方面在几点上作了些进一步的分析。现在文章完了(牺牲了五日来食眠的乐趣),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见,还是镇淮的,续加的材料中,重要的都是善周的贡献,许多补充的意见也都和他磋商过,我只多说了些闲话,并当了一次抄胥。事前本已告诉过冠英先生镇淮有文章,并约定即在本刊和徐先生的信一同发表。现在文章里加入了我的一分儿,我更乐意这么办。因为徐先生是我久慕的,曾蒙垂询一些问题,至今尚未奉复,

这回的问题既也是徐先生感兴趣的，就正好借《月刊》的篇幅，来专诚请教于徐先生，希望徐先生，和最先在本刊发动形式数字研究的彭先生，以及本刊读者们多多指正。

关于"七十二"这一数字的提出，徐德庵在二月九日致余冠英信中说："弟常以为'七十'一辞，今古亦往往用为表众多之虚数，或言七十，或言七十二，或言七十余，其义则一，此固夫人知之，然所以然之故，则猝难解矣。如能加以考证，明其原委，未始非一快事也。案七十用为虚数，先秦已开其端，至汉而应用益广。今俗语中犹有沿袭先秦言七十者，若七十子，七十二代，七十二钻之类。前者虽在《史记》一书中，《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所举已有不同，然尚可信为实数，至《庄子》刳龟《管子》封于太山之言，则均为虚数无疑。下逮汉人言岁每称七十，亦无不为虚数。如以辞害志，执为真有，则为所误矣。兹就《史记》一书为例，如《项羽本纪》及《李广传》均称七十余战，《刘敬传》称大战七十，《曹参传》称身受七十余创，《儒林传》称仲尼干七十余君，诸如此类，皆非实数也。故窃恒谓此犹今言十二分，十二万分之类，意在表数之多，非其实然也。其语之遗于后世者，如七十二候，似有说矣；然七十二行，七十二沽等语，亦尽虚数。余如世俗常言三十六或百零八，当亦由此语增减得之。"

《七十二》共分五节。第一节引征古籍中的"七十二"十五处，说明这数字的神秘和一度风行。第二节说明"七十二"出自五行思想。第三节论说"七十二"与"七十"的关系。第四节叙述"七十二"与孔子的关系。第五节论述这一数字开始流行的时代，"大致说来，发轫于六国时，至西汉而大盛，'七十二'这数字流行的年历，便是五行思想发展的年历。这个数字之值得注意，正因为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运动态的表征。"

《七十二》的草成到定稿过程，体现了先生对青年人的关怀和培养。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编后记》中说到先生常将自己的手稿借给学生看的事："别人总将自己的稿子当作宝贝，轻易不肯给人看，更不用说借给人。闻先生却满不在乎，谁认识他就可以看他的稿子。有一回西南联大他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借他的《诗经长编》手稿四大本。他并不知道这学生的姓名，但是借给了他。接着放了寒假，稿子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开学了，那学生才还给他，说是带回外县去抄了。他后来谈起这件事，只说稿子没有消息的时候，他很担心，却没有一句话怪那学生。"

张怀瑾同学也借抄过先生的《庄子》校释，他回忆这件事时说："我在西南联合大学四年求学期间，在人生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二年级起便选修了闻一多先生的课，先后选习了《诗经》、《楚辞》、《唐诗》等三门课。四年级的毕业论文，也

是在当时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罗膺中教授和闻一多教授两位《楚辞》专家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除了课堂听讲,我利用节假日不定期的造访闻一多师,海阔天空,当面请教。主要谈学问,也谈社会现实。选修《唐诗》时,一次在闻先生家里,从谈话中得知闻先生正完成了《庄子》内七篇校释。我便当场借了回来,稿本分篇成册,毛笔小楷一大摞,字体工丽,我差不多整整花了三个月业余时间,照样抄录了一份。常叹闻一多师学识渊博、治学谨严,眼光敏锐,思想缜密,从而学会了运用版本、校勘、音韵、训诂等手段校注古籍的方法。"(张怀瑾《一颗图章照丹心》,《穷庐文萃》,第411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还记述了先生与青年学生的几件往事:"当时我的研究计划是选注一部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学习上古文学史时阅读,同时还准备写一部'左传纂注'。闻先生为了我选注好参考资料,把他的几大本《诗经》和《楚辞》的原稿都搬给我,为了节省我抄录《左传》旧注材料的时间,他把一部《皇清经解》和《续经解》也给了我,让我就使用的材料随意剪裁。在教学方面,每篇教材中他有什么新的解释,都事先指给我,给我讲说明白,并交给我一些参考资料,使我通过教学很快地得到提高。闻先生对其他学生也是同样关心的。李慎予当时在清华已经工作八九年了,闻先生还是经常关心着他的研究工作,给他介绍参考资料,对某一个研究项目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慎予正在研究唐诗,闻先生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都提供给他。他曾说:'这些东西当前我没有工夫写出来了,你们用得着就使用吧!'闻先生对学生们的劳动却一向是特别尊重的,他很少叫我们替他抄写东西。我们在研究中偶有一点创获,即令是有关某一问题的几条重要的资料,闻先生知道之后,也喜形于色,两眼闪着慈祥的亮光,说:'很好,很好!我来再给你补充补充。'经过他的增益和加工,面目已经大变了,但是,却仍把创见之功归于我们。"(《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56页)

三月三日 昆明广播电台邀请先生到电台做第一次文哲讲座。(云南省档案馆藏,53-3-54,戴美政提供) 十二日,朱自清访王力,王力对他说"一多的广播讲话很成功"。(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29页)

三月十五日 致清华大学文书组函,云文科研究所研究助理刘功高已辞职离校。二十三日又有致文书组函,报告刘功高已于三月初辞职,本月薪金应即停发。以上两函均未发表。(据《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三月二十二日 昆明各报报道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在昆开始发售。国民政府规定每人都必须阅读,先生读后很是反感,后来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

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6页）

三月二十五日　在“乐府诗选”课上，讲到艺术不该摹仿，最好的诗是无韵诗。（据张源潜日记，未刊）

三月二十九日　朱自清日记：“读一多之《关雎篇》，甚有趣。”（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32页）

是月　为叶兢耕同学书写条幅，为临摹西周恭王《史颂簋》铭文片段。条幅宽约三十厘米，长约七十厘米。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前夕，叶兢耕夫人朱鉴荣将此条幅捐献清华大学图书馆。（韦庆缘《珍贵手迹入藏图书馆》，清华文库网）

闻一多为不少人题写过条幅或对联，少数收藏于各地展览馆，大多流传民间。二〇〇二年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展示的一幅为“莲荪先生有道雅命　余对酒当歌青虹正绕　共评花索句素鲤频传　集宋词　闻一多”。同年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展示的一幅为“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不采芳树枝翻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桂开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争飞奋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　太白古风源出咏怀子昂感遇不及也言　闻一多”。二〇〇四年六月，北京金仕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展示的一幅对联，其文为“自指头衔堪辟暑，一涤冰上是前生”，题款抬头书“澄洋老哥雅正　即希正可”，末署“弟　闻一多”，上盖两印，一为阳文“一多”，一为阴文“匡斋”。这幅对联，当是题于北京清华园。

是年春　鼓励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张清常把《九歌》写成组曲。张清常回忆：“一九四三年春，闻先生住在昆明乡下，进城上课就住在联大师范学院教师集体宿舍，与我为邻居。我认为历史上的张骞出使西域是今天民族音乐舞蹈创作的好题材。闻先生说：要写，首先你就要自己踩着张骞的足迹，从长安出发往西北走一趟。这在目前有许多困难你克服不了。比较现实一些，可以考虑以《九歌》为中心内容，吸取《楚辞》全部精华，利用自己的音乐修养和文学修养，以‘组曲’的形式来创作音乐，而且突破‘组曲’不唱的限制，把《九歌》唱起来。然后寻求精于舞蹈的艺术家合作，反复修改，写成一篇雄浑瑰丽能够传世的作品。”（张清常给编者的信，1988.8.10）

四月十六日　欲与王力、唐兰发起成立中国语言文字学会。朱自清日记：“上午访莘田，闻将成立中国语言文字学会，一多、了一及唐君为发起人。”（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35页）

五月九日　与朱自清商量加入国民党事。朱自清日记：“一多要我与他同去登记参加国民党，我以未受到邀请为理由拒绝之。莘田给他一份入党申请书。”（朱乔森

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40页）王瑶《念朱自清先生》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一九四二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九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都没有加入。"（《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第55页，三联书店1987年7月出版）

对于这件事，当时住在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几位同仁和研究生回忆各有不同。何善周回忆当时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长陈雪屏对先生说：你这二年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讲话就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生活上也会有所帮助。同时，陈还让孙毓棠劝先生加入国民党，但先生都拒绝了，说："他们想封我的口是封不住的。"（《千古英烈万世师表》，《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72页）

范宁回忆："那时闻先生住在司家营，每星期进城上课，住在联大师院教员宿舍，和孙毓棠合住一个房间。我那时也住在司家营文研所，每次上课都和闻先生一起进城，我住在昆华北院研究生宿舍，每星期住一夜，第二天上完课就一起回司家营。有一天，闻先生说他将换个房间，因为他发现同房间的孙毓棠加入了国民党，今后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孙毓棠并告诉先生说，他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骂国民党不会被怀疑。我说这个理由，不能使人相信。后来先生就换了一个房间。"（范宁给编者的信，1988.12）其实，先生因一时找不到房间，也就没有换成。（据访问何善周记录，1986.10.5）

五月十九日　朱自清日记："王瑶告我，一多让他报考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并答允他可能被聘为兼职助教，此事一多从未让我知道。"（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42页）先生动员王瑶报考研究生，是为了加强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术力量。对于此事，王瑶回忆说："我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昆明五华中学教书。一天饭后，闻先生特意约我到文林街一家茶馆喝茶，问我为什么不读研究生。当时，当教员是有政府米贴的，我的米贴是八斗，每月按米价发给钱，工资在那物价飞涨的年代根本不起作用。我对闻先生说了实话：读研究生是当学生，只有贷金，没有米贴，而且贷金数量很少，难以维持生活。先生听了我的话，认为有道理，想了想，说可以让我当半时助教，就是一边当助教，一边读研究生，这样也有米贴。于是，在闻先生的动员下，我下决心重回清华大学。"（访问王瑶记录，1986.10.7）

五月二十五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演出《风雪夜归人》，先生担任舞台设计，《吴祖光名剧〈风雪夜归人〉联大精彩演出》："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为欢送本届毕业同学，昨晚在中法大学礼堂，演名剧《风雪夜归人》。是剧为名剧作家吴祖光氏成功杰作，描写军阀时代某名伶与一富室姨太太为追求自由生活事泄事败的一段悲壮故事，缠绵悱恻，感人极深。该校此次演出，由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常培主持，该校教授

孙毓棠导演，杨振声舞台监督，闻一多舞台设计，沈从文、罗膺中顾问，全系同学参加演出，成绩甚佳，观众无不赞誉云。"(《云南日报》，1943.5.26)

五月三十日　《屈原》发表于昆明《春秋导报》(五日刊)第二期。此文是对一九四一年梁宗岱出版的《屈原》(华胥社丛书)一书的书评。全文如下：

> 将《离骚》以下所有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再加上一篇九辩，排成一个年历的次序，"所有考证家提出过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便依这次序来解释作者——屈原的心灵遭变的过程，和艺术的发展——，这事只有梁先生的识见，魄力和自信心，才想象得到，并完成得了的一本书。考证本是□□的勾当，一发动，似乎就没有完似的，等考证家的问题都论定了，再开始欣赏文艺，那真是"俟河之清，人□几何"？快刀斩乱麻，本来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文学史上的问题固然应当细心研究，旧文学中那种评等式和诗话式的批评不也应该廓□吗？也许旧式的冬烘的批评不廓□，文学史的问题也就更难解决。这样说来，梁先生是间接的在帮助文学史家解决问题，直接的已脊旧文学的批评事业开了一个新纪元。如今关于文学史的好考证文章似乎不在少数，但一位够得上称批评家的人来尝试历史上一部如此伟大的名著，就笔者所知道的，梁先生这本《屈原》要算破开荒了。诚然，我们想象梁先生尝试的是□，谢，李杜等任何一家，而不是这位碰巧在文学史上纠葛最多的屈原，我们对于他的成绩一定更要感觉满意。但是老实说，得了这本《屈原》，我们已经应该感激之不暇了，至少在气味上，这位屈原，比起那位在二十世纪的灯光照明下粉墨登场的屈原，要强得多。

六月九日　主持杨振声演讲会。朱自清日记："今甫(即杨振声)讲山水画，未抓住要点。一多作主席，发表了独断的意见：陶渊明脱离现实，在有些事情上他是错的，陶渊明的爱好者也有错误。这些话皆令我不快，然皆以沉默对之。"(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45页)

六月十六日　西南联大当局举行茶会，欢迎教育部代表刘健群。刘来昆明带了一份"部颁中国文学系课程安排"，打算把大学中文系的教材统一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这事引起先生与联大许多教授的反对。先生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说："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联大八年》，第6页)

六月二十三日　西南联大暑假开始。假期中先生和朱自清曾有信给重庆中央大学的李长之，祝贺他指导的一名毕业生考取了联大研究院。信中说："这是你的成绩，也是我们的安慰。"(李长之《杂忆佩弦先生》，《文讯》第9卷第3期)

六月二十五日　主持唐兰的甲骨文讲座，这是暑期中举办的文史讲座第一讲，

罗常培、陈梦家也来听讲。会前，一位助教把几十张写着甲骨文的纸片，分八组叠钉在黑板上。《张源潜日记》(未刊)："一时半，回校听演讲，教室关着，直到两时才有人来，唐兰、闻一多、陈梦家都到了。开门进去，我坐在前排。C组的国文先生帮着唐兰把数十张写着甲骨文字的纸片钉黑板上，分成八叠。钉毕坐下，等罗常培来，直到两点十分，闻一多才上坛介绍，他从甲骨文的发现说到中国考古事业之不发达，以致文化之落后等等，说了约半小时。他还说，甲骨文是王宪钧(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副教授)的祖父王懿荣发现的，在庚子年(八国联军)，而唐兰适于是年出生，诚应运而生。"

六月二十六日 清华大学召开迁昆明后第十九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议决续聘先生与朱自清、陈寅恪、王力、浦江清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为副教授。(据《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及部分材料》，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三十日 晚，赴云南大学，参加中国文化讲谈会，听沈有鼎讲《大学》。讲毕座谈，先生发言，言辞颇激烈。吴宓在日记中写到："7:30—10:20 云大客厅赴中国文化讲谈会。备茗点。姜寅清主席。沈有鼎讲《大学》。宓最后被邀略发言。而如闻一多自诩用 anthropology(人类学)治中国古籍，觉中国古圣贤之文化实甚 primitive。(原始的)而如《大学》中之格、致、心、物等字，皆原出初民之风俗及习惯，均是日常卑俗之实物近事，故《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周秦诸子如老庄亦同。此中本无些须哲学，后儒神而化之，强解释出一番深奥高尚之义理，乃有所谓中国圣贤之文化。又曰，予治中国古学，然深信其毫无价值。中国今日实际措施，只有纯采西洋之物质科学与机械工程耳。"(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9册，第63至64页，三联书店1999年3月出版)

是月 《茅苡篇》修改后发表于杨振声主编的《世界学生》第二卷第五期。收《闻一多全集》。这是《匡斋尺牍》的一部分。

是年夏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生彭允中想转入文学院中文系，特到麦地村桂家祠堂清华文研所租下的一间屋子找先生申请。先生对他的愿望表示同情，但说明自己未接受联大中文系主任，不能做主，可以代他向文学院长冯友兰转达。(据彭允中《回忆闻一多老师》，昆明师范学院编《教育革命》1978年第2期)

是年上半年 与西南联大同仁组织了一个"十一学会"。这个学会主要为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场合，"十一"两字即是"士"的拆字。最初参加者多为教授、副教授，如潘光旦、杨振声、雷海宗、朱自清、曾昭抡、闻家驷、吴晗、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孙毓棠、沈从文、陈铨等。由于冯至的家敬节堂巷位置比较适中，聚会常在他家举行，每一二周一次。后来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翁同文、丁则良、王乃梁、王佐良、吴征镒、李埏

等亦参加进来，各人主张不一，经常出现争论（据访问冯至记录，1986.7.9；吴征镒《西南联大侧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3至64页）。有次去西山游览，在滇池船上开讨论会。先生曾在一次聚会时报告过关于"士大夫"的问题。（据访问吴征镒记录，1986.7.25）

七月二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时，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助理刘功高因事辞职，该信即为及聘请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本届毕业生叶金根为清华文科研究所助教事。信中又云："惟叶君名义原为助理，在薪额上助理与助教本无不同，但依所中习惯，遇有必要时，助教得兼任功课，助理则否，故助教地位略高于助理。此次叶君毕业成绩为历年所仅见，本所倘予聘请，似宜畀以助教名义，以示优异。"（《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三日　《端节的历史教育》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第三十二期。收《闻一多全集》。这篇文章，是西南联大学生陈家煜代《生活导报》约的稿。

这篇文章的起因，是端午节那天孩子们问起粽子的来历，先生便按照传统说法讲了屈原的故事。"可是，孩子们好奇心的终点，便是自己好奇心的起点"，于是，先生留心注意"端午真正的起源"，发现端午节最主要的两个节目，即竞渡和吃粽子，都与龙有关，"竞渡用的龙舟，粽子投到水里常为蛟龙所窃"。竞渡本是吴越一带的土俗，而吴越人都曾经自认为是龙的儿子，断发文身亦龙的形态。先生得到了这样的结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那就不用讲了。总之，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它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不知道多远呢！"

不过，先生认为把端午与屈原联系在一起，虽然是个"谎"，却很有意义，要不是屈原的死，那仅仅为了求生的时代所产生的端午节，怕是早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先生称："为这意义着想，那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谎中有无限的真！"这，实际上是借屈原的遭遇，提出生死的意义问题。

先生还有一篇学术研究论文《端午考》，生前未发表，遇难后经人整理刊登于一九四七年八月《文学杂志》复刊后第二卷第三期，收《闻一多全集》。这篇《端午考》分五节：一、龙的节日；二、端午与五行；三、彩丝系臂；四、守宫；五、龙舟。从内容上看，好像是《端节的历史教育》的展开，学术论证上更为严谨。其中认为"端午"最初作"端五"，它来源于以龙为图腾的五方之龙，而五月初五的节日也是这一观念的见证。这也是先生神话研究的一个发现。

是月　闻立鹏、闻名考取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先生很高兴，和妻子一起为他俩做进城住校的准备。为了防止他们在入校前的暑假中把心玩野，叮嘱他

们不要中断写日记。先生对孩子常表现出舐犊之情。在立鹤、立雕、立鹏、闻名上联大附中时,先生常在进城讲课时顺便去看看他们。出了校门不远即文林街,把口有家牛肉面小馆,先生总带孩子们在那儿吃一碗牛肉面,自己却舍不得吃。

八月十一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为续聘季镇淮为半时助教等事,信云:"查旧章凡研究院学生兼任半时助教者,其肄业年限得较普通研究生延长一年,共计三年。肄业年限既为三年,则其受聘为半时助教之资格倘无特别原因,仍亦当以三年为限。查中国文学系研究生季镇淮君上学年研究成绩卓越(所成论文之一部分经系中多数同人审复,认为宜付学报发表),所任助教职务亦颇称职,本届未蒙给予半时助教聘书,理应具函呈明,仍希准予补发,无任企祷。又,研究生范宁、傅懋勉二人成绩优良,下学年度仍请继续发给津贴为荷。"梅贻琦十五日批示:"① 照续聘半时助教。待遇如何,会计科查明。② 关于上年研究生成绩及应给奖金者,教务处查明,以凭核发。"十八日,梅又批示:"本年薪金定六十元,米贴四斗,余均照章。"(《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同日 冯友兰对朱自清说解聘刘文典事。朱自清日记:"晚冯(友兰)来,对叔雅被解聘表示不满,谓终不得不依从闻(一多)之主张。"(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55页)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次续聘刘文典,实际上并未给他聘书,并因此引起了一场风波。其因是这年四月一日,刘文典应磨黑大盐商张孟希之请,赴磨黑为张母撰写墓志铭,行前虽与蒋梦麟、罗常培打过招呼,但其所担任之课程仍受影响。又,刘文典平素常吸鸦片(其有二云居士之号,即云土、云腿),昆明物价上涨,刘无力购买,张孟希则允供给充足鸦片及酬资。这些事情在西南联大引起不小的反响。所以,尽管通过续聘,但先生仍持有异议,认为他不足为人师表。刘文典自恃抗战以来南迁边疆,备尝艰苦,于七月二十五日在磨黑写信给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申诉其理由。全信云:

月涵先生校长道鉴:敬启者,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非楮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没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近年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适滇南盐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资倩典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区素号瘴乡,无人肯往任事,请典躬往考察,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者,绝非水土空气中有何毒质,不过虐蚊为祟,现代医学,尽可预防,"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则专门学者敢来,地方富源可以开发矣。典平日持论,亦谓唐宋文人对瘴缺夸张过甚,(王阳明大贤,其瘗旅文一篇,对贵阳修文瘴扣帽子形容太

过),实开发西南之在阻力,深愿辞而避之,故亦遂允其请。初拟在暑假中南游,继因雨季道途难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结伴请兵护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动身之先,适在宋将军席上遇校长与蒋梦麟先生,罗莘田先生当即请赐假,承嘱以功课上事与罗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装,典以诸事既禀命而行,绝不虞有他故,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为祖国学术争光吐气。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以后得昆明友朋信,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典尚不信,因自问并无大过,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耳。不意近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经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数十倍(真有此事耶,米果实贵至万元耶),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它离奇之语,令人百思不解。典此行纵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典常有信致校中同人,均言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之言。良以财力稍舒,可以专心全力教课也(此意似尚未向罗先生提及也)。此半官式信又言,典前致沈刚如先生信中措辞失当,学校执此为典罪状。伏思典与沈君笃交,私人函札中纵有文词失检之处,又何以致据此与兴文字之狱乎。(当时因为债家所逼,急迫之中诚不免有失当之处,然自问尚未至大逆不道也)。学校纵然解聘,似当先期正式通知,何以及此半官式信。此事芝生、莘田二公亦无片纸致典,仅传闻昆明谣言。典一去不返,故正觅替人。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典致沈君私人函札中有何罪过,何竟据以免教授之职。既发聘书,何以又令退还,纵本校辞退,典何以必长住磨黑。种种均不可解。典现正整理著作,预备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极,(此间诸盐商筹款巨万,为典刊印著作,拙作前蒙校中特许列为清华大学整理国学丛书,不知现尚可用此名称否,乞并示知。)今得此书,特抽暇写此信,讬莘田先生转呈。先生有何训示亦可告之莘田先生也。雨季一过,典即返昆明,良晤匪遥,不复多赘。总之典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再者得地质系助教马君杏垣函,知地质系诸先生有意来此研究,此间地主托典致意,愿以全力相助,道中警卫,沿途各处食宿,到普洱后工作,均可效力,并愿捐资补助费用,特以奉闻。忙极不另写信矣。专此寸简,敬请道安不一。弟刘文典再拜。七月二十五日。(刘文典致梅贻琦,1942.7.25,清华大学档案室存)

尽管刘文典解释再三,却迟迟不归,所以先生没有给他安排课程。当时,有人为刘文典说项,先生坚决不允。王力在《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中写到:"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土司[①]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172 页)

在这件事上,梅贻琦一改一向平和态度。他接到刘文典托罗常培转来的信,于九月十一日手书复刘文典,中云:"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其实,刘文典此行,还有一个连他本人亦未想到的背景。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的进步同学接到指示,疏散隐蔽,其中一些人到了磨黑中学教书。该校董事长张孟希是当地大盐商、大土豪,与蒋介石有一定矛盾,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张孟希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允许联大同学在那里活动。另外,张孟希也想附庸风雅,提出请联大同学介绍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来此。联大同学便返昆明邀请了刘文典。刘文典到磨黑,有优厚的报酬,每天除教张孟希一两个字外,没有更多的事,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疏散同学的作用。这内情,外人是一概不知的。(据访问萧荻记录,1986.7.10)

后来,刘文典回到昆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曾到司家营找先生论理。两人都很冲动,在饭桌上吵了起来。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据访问王瑶记录,1986.10.7)。但是,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后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

由于这件事,先生对刘文典产生了很深的成见。王康说:有一次,中文系部分同学组织了一个讨论会,请先生的几位老师参加。先生赴会的路上还和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打招呼,可一到会场门口,听说刘文典也来参加,脸色一变,立刻就往回转,还说"你们知道我讨厌这样的人,话怎么说的到一块儿!"会议主席没有办法,只好说:"闻先生,这样不好!要是彼此都逗起气来把会弄垮了该多糟!再说,今天的会还有'外面的人'参加,影响也不好!"那时,先生已投身民主运动,听说有"外面的人"参加,才嘘了嘘气,进去了。后来,在一次学习会上谈起此事,有人对他说:"给土财主捧场,教书不负责任,甚至还吃鸦片烟,这当然都是坏事,我和你一样坚决反

① 其实张孟希不是土司,而是盐商。

对。不过，这只是这个人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他过去骂过落介石，现在他也不去跑重庆，巴结国民党，还同情民主运动，对这样的人，虽然有问题，能够争取还是尽力的争取。争取了他，也就好争取同他有关的更多的人，他不来是他的事，既然来了就应该欢迎；把他骂一顿很容易，要争取可得花很大力气！"听了为话，先生才承认自己错了。(《闻一多传》，第 309 至 310 页)

八月二十四日　意大利推翻法西斯政府，接着逮捕了墨索里尼。这个消息是闻立鹤最先知道，他经孙毓棠介绍利用暑假在三青团云南省团部电台做临时译电工作，以补家庭生活不足。他从来电中获知此事，即告诉先生，先生大为兴奋。这时，先生对国民党领导抗日仍抱有相当信心。立鹤进城打工那天，先生亲自送他，路上两人边走边谈，既谈到当时的国际国内时事，也谈到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先生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八月二十五日　《孟浩然》发表于《大国民》周刊第三期。收《闻一多全集》。

文章从孙润夫家藏王维画的孟浩然像开头，通俗地介绍了孟浩然生平的几个特点，赞扬他热爱自己的故乡襄阳，叙述他隐居因素中的家乡历史地理背景。说到他的诗，先生认为，"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

是月　《四杰》发表于《世界学生》第二卷第七期。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唐诗杂论》中的一篇。该文不是通常那样介绍唐初文坛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成就和生平，而是采用比较方法，认为"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王杨卢骆的顺序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而按序齿则应该是卢骆王杨，先生注意到前二人与后二人平均有十岁左右的差别。先生强调四杰在性格上的差异、诗的差异，认为"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末了说："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是年暑假　子女们回来常常唱起刚在学校中学来的英文歌，其中有些歌曲如《黑奴曲》等，先生早在美国留学时就相当熟悉这些歌，听着听着就跟着哼唱起来。子女们从来没听过先生唱歌，此时忽然听到先生的歌声，大为高兴，纷纷恳求："爸爸再给我们唱一个。"先生兴致也很高，唱了一曲《黑奴曲》之后，又"嗨嗬唷——，嗨嗬唷——"，唱起了《伏尔加船夫曲》，他那深沉的男低音不但大获孩子们的喝彩，而

且把夫人和女仆赵妈也吸引过来,听得入了神。

九月一日 《庄子内篇校释》发表于重庆《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一部分量重难度大的学术著作,集校补、训诂、注释为一身。先生对《庄子》下了很大气力,仅今存未刊手稿中就有七种《庄子》研究,即:《庄子章句》、《庄子校补》、《庄子义疏》、《庄子疏证》、《庄子校拾》、《庄子札记》、《庄子人名考》。其中前三种都近于成稿,第四种仅疏证了《逍遥游》一篇,后三种则多为零散资料。今存先生使用过的线装本《庄子》上,也有不少眉批旁注。

同日 下午三时,清华大学召开一九四二年度第二次教授会议。先生未出席。会中选举下学年各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被提名者有先生与冯友兰、朱自清、雷海宗、吴宓五人,冯友兰当选。(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九月六日 西南联合大学开学,十三日正式上课。这学年,先生给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文学组三、四年级,及师范学院国文系三年级、初级部三年级讲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诗经);给中文系文学组、语言组三、四年级讲授"历代诗选"(唐诗);给国文系、初级部三年级讲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唐诗)。同时,与赵仲邑共同担任大一国文。以上各课均四学分。(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赵仲邑是位青年教师,按规定要教两个班的"大一国文"。他回忆先生对担任这门课时的指导,说:"一次要讲《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由闻先生先对我们辅导。闻先生知道我们都能对照文串讲,便只是要言不烦地讲了'入行军'的'行'字是视察之意这样的问题,都是似浅非浅很容易讲错的问题。辅导的时间用得很少,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赵仲邑还谈到先生的因材施教,说:"西南联大中文系培养育年教师的方法之一,是每隔二周系领导组织青年教师开一次小型的科学讨论会,由青年教师轮流提出一篇论文。论文报告过后,由大家讨论,系主任和论文指导的老教师都参加。我预早几个月就准备了。开始时拟定一个题目叫《杜诗中的雄浑》,先去征求闻先生的意见。闻先生是研究唐诗的专家,满以为他一定同意。没想到他一听到我提出了这题目,他便皱了皱眉头,说'这题目我不感兴趣'。于是我把题目改为《黄山谷五言诗句法研究》,又去征求闻先生的意见。闻先生说:'嗯,这题目倒有点意思。'的确,象《杜诗中的雄浑》,题目那么大,内容那么抽象,按照我的能力,写这样的论文我的确不能胜任,远比不上《黄山谷五言诗句法研究》题材范围那么确定,内容那么具体,那么容易写。"(赵仲邑《闻一多先生轶闻》,《随笔》第8集,第54至55页)

十月二十七日　在唐诗课讲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西南联大一九四四级经济系学生程耀德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到：

在唐诗课上，闻一多先生讲了一个题目，名叫“鼓手时代”。他讲：我国古代的诗篇都是依着鼓的节奏所写成的。鼓的声音是原始的、单调的、粗犷的、沉重的、男性的、雄壮的、振奋的，以及战斗的。因此，古时的诗篇读起来觉得有劲，使人精神振奋。后来管乐和弦乐发明了，诗的节奏都依照管弦的韵律，于是诗意转成柔和、轻松、高雅了。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健全的人，我们不但要能欣赏“余音绕梁”及“响彻云霄”的、出世的、高雅的、清沁的诗篇，我们并且需要同时欣赏入出的、激动的、争斗的、鼓韵的诗篇。

我们应该读清沁、出世的诗，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扩大意境的修养，而且又是一种无形的、可贵的安慰。现实的世界对我们是太狭窄了，我们在这里处处遇着障碍，生活对人说来是非常残酷的。当我们遇到了不可去除的阻碍、不可避免的厄运时，我们最好去到空旷无边的、自由自在的理想地意境中去修养，以恢复我们身心的健全。

但是，我们又是大地的儿子，我们无论如何离不开大地的怀抱，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正遇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因此，我们更应该多多欣赏鼓声的诗。用这种诗的神韵来激励我们这些迟钝了的、脆弱了的心血，使我们有勇气向这世界的路上迈步向前，破除一切障碍，创造一切自下而上的滋料，在人的世界中光荣地活着。（程耀德《闻一多老师在“唐诗”课上讲“鼓手时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第4期，1999年12月）

这件事的起因是，在西南联大做研究工作的英国人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①]准备选编一部《中国新诗选译》，他不懂中文，特邀请先生合作。由于选诗的关系，先生在朱自清处看到了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大为赞扬，遂在“唐诗”的第一堂课上称田间为“时代的鼓手”。小华（何孝达）《闻一多先生的画像》：闻一多“站在讲台的旁边，穿着深蓝色的旧了的长袍，很宽大。左手拿着毛边纸的本子，上面是他亲自用墨笔抄的一行行的诗，右手轻轻地拍着那本子说：‘有一天，佩弦先生递给我一本诗，说，好几年没有看新诗，你看，新诗已经写得这样进步了。我一看，想，这是诗么？再看，咦，我说，这不是鼓的声音么？’”（《自由文丛》之二，第16页）

陈凝《闻一多传》中亦记述到：“有次他讲唐诗。他用深湛的独特的见解，配合

① 罗伯特·白英于本年8月1日到西南联大，后经英国驻华大使馆介绍，于11月3日，被联大以教授待遇聘任，教“西洋小说”、“现代英诗”。

上清脆爽朗的国语，激动了一百多个青年底心灵。‘仔细研究中国诗歌底历史，我发觉中国古代只有屈原、嵇康、杜甫、白居易这几位诗人才值得佩服，因为他们底诗多少喊出了时代人民底声音；其他知名的诗人，都是统治者底工具和装饰。除了这几人底作品，我同时还发现《诗经》、《楚辞》、《乐府》才是人民底歌曲，里面含有很多人民底血液。南朝的宫体诗和中唐以后的贵族诗都是堕落的，衰退的。要诗歌健康，进步，只有把她从统治者手里解放出来，还给劳动人民。诗歌是鼓，今天的中国是战斗的年代，需要鼓。诗人就是鼓手，艾青与田间已成为中国现阶段底鼓手。’”（第7页）

这月里，西南联大因蓀同学听了先生在唐诗课上讲田间的诗后，满怀激情地写了《鼓的感动》。文中写到：

啊，这是多么亲热的声音啊，我停住了，倾听着——

“啊，
歌唱！
啊，
舞蹈！
啊，
棒子！
啊，
刀子！
啊，
锄头！
啊，
枪！
啊，
人民！”

平静了几个月的血又突然地激动起来，我从人墙中挤进去，把头伸进了教室。一位教授正在继续地朗诵，长须像通了强电流的铁丝一样弹动，眼睛里像在做着“放电现象”的实验……

“我念不好。”教授停下来说。“……我有一个想像，假若这教室里的光从黑色的，暗淡的，慢慢变到灰色，白色，光辉，一直到红色；我底头从银幕上远远地，小的，慢慢地移近，大起来，大得充满了银幕……，教室里的温度渐渐升高，使你们都流出汗来，筋暴起来……”

我想告诉他，我们已经流着汗，已经落到那种境界里去了啊。

黑板上写着两个大字：田间。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呈在大风沙里的岗卫们》[①]里的句子吗？刚才的声音又回到我底耳中。

“当我第一次看见这种诗的时候，这种新奇使我不能习惯——‘这能是诗吗？’后来，我发觉，‘这不是鼓的声音吗？’鼓的声音是庄严的，奋发的，激动的，男性的，勇敢的，……这种诗的韵律，就是鼓的韵律。咚，咚咚；咚，咚咚咚。简捷地停下去，又弹动地响起来；我们沉醉在软弱的弦调太久了，我们需要鼓的音乐！

“鼓的敲击使我们想到战斗。什么是鼓的时代？战争的时代！当两兵相接的时候，敲鼓；当会师的时候，敲鼓；当船和滩相争的时候，也敲鼓！

“咚，咚咚，啊，棒子，啊，人民……

“这堂课，我介绍这时代的诗。他有着不同于旧时代的韵律，你可以看见他活动的，健全的姿态。文学和时代要跑得一般快……

“在古代，中国的诗里，是有鼓的韵律的。自从七言、五言将纤细的管弦之声输入诗歌的血液以后，鼓的声音便慢慢的消失了。……这时代，又让我们听见鼓的声音了。

“而且，以后，到战后建国的时候，我们还须要配合得上马达、飞轮、铁丝、齿轮、电器、机械的巨响，我们底诗便要从这方面努力。我们要使我们的耳朵习惯于他，了解于他。……咚，咚咚，咚，这情调比起纤细的管弦之乐，后者在声韵上当然是进一步的，但前者是原始的，根本的。我们在我们底生活中，总有原始的，根本的部分。”

教授夹着他底手抄本下堂去了。我突然做成了一句诗：

“鼓声呵，
你使一个老人变的这样年青！”

他的确是年青。他将年轻人底诗，细心地抄在一册白宣纸上，研究。这真是一个奇迹。想不到前进的队伍里，又见到这样一个老兵士。

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同学从教室里走出来，仿佛是教授底力量传送到了他底精神里，他对着教授的背影朗诵：“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43.11.16）

十一月一日，西南联大五周年校庆中，“文艺”壁报第三期有篇《听鼓的诗人和擂鼓的诗人》，也记述了这件事。其文云：“《听鼓的诗人和擂鼓的诗人》是记闻一多先生在中文系唐诗班上所讲关于田间的诗的。这位沉默了许久的《死水》作者，突然欣赏起田间来，大家都觉得惊奇。他说：‘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

① 实际上前边所引者为《人民底舞》中的句子。

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我想诸位不要有成见,成见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诸位想想我以前写的是什么诗,要有成见就应该是我。田间实在是这鼓的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这时代的鼓的声音!……'闻先生最近还和新来的英国诗人洛伯·白英教授合作选一本中国的抗战新诗集并翻译成英诗,上面所说到的田间的诗便是选本中的作品之一。"(焯《联大杂写》上,《新华日报》,1943.11.16)

是月 《诗经通义》(召南)发表于《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收《闻一多全集》。这篇文章一九三七年一月曾部分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这次发表的是改定稿。

是月 开始在中法大学[①]兼课,讲授中国文学史。今存先生手稿中,有在该校讲课时的讲授提纲,题签上写着"中国文学史稿"六个字。提纲中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分作四段八大期,这种分期方法反映了先生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认识,特录如下:

第一段 本土文化中心的转成 一千年左右

第一大期 黎明 夏商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二五〇一一一〇〇)约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 从三百篇到十九首 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 五百年的歌唱 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陈灵公卒,《国风》约终于此时)(前一〇九九—五九九) 约五百年

第三大期 思想的奇葩 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元二年(前五九八—八七) 五百一十年

第四大期 一个过渡时期 汉昭帝始元元年至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前八六—后一九五) 二百八十一年

第三段 从曹植到曹雪芹 一千九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 诗的黄金时代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一九六—七五五) 五百五十九年

第六大期 不同型的余势发展 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七五六—一二七六) 五百二十年

第七大期 故事兴趣的醒觉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一二七七—一九一七) 六百四十年

① 中法大学于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迁至昆明,是当时昆明城中四所大学之一。

第四段　未来的展望——大循环

第八大期　伟大的期待　民国七年至……(一九一八—……)

关于先生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分期思想,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曾作了解题性的说明:"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最显著的标识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变为殷周的铜器花纹,以及农业的兴起等。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指的散文时代。第六大期'不同型的余势发展',指的诗中的'更多样性与更参差的情调与观念',以及'散文复兴与诗的散文化'等。第四段的'大循环',指回到大众。第一第二大期是本土文化的东西交流时代,以后是南北交流时代。这中间发展的'二大原则',是上文提到的'外来影响'和'民间影响';而最终的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这就是闻先生计划着创造着的中国文学史的轮廓。假如有机会让他将这个大纲重写一次,他大概还要修正一些,补充一些。但是他将那种机会和生命一起献出了,我们只有从这个简单的轮廓和那些片段,完整的,不完整的,还有他的人,去看出他那部'诗的史'或那首'史的诗'。"

在中法大学兼课只有一年,但与该校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杨明曾试着用民俗学方法写了几千字的《屈原为巫考》,先生给予鼓励。其后,杨明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屈赋新考》书稿,先生特向吴晗谈过它的内容。(据访问杨明记录,1986.7.17) 李光溪同学向先生求教,先生让他多在语言、文字、训诂、校勘、声韵方面下功夫,多听听唐兰、王力、罗常培诸先生开的课。(据李光溪《回忆闻一多先生》,《春城晚报》1986.7.29)

十一月十三日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收《闻一多全集》。

该文是先生在西南联大课堂上讲过田间的诗后,受到许多同学的建议,赶写出来的。动笔时,《生活导报》正在为庆祝周年筹备纪念文章,编辑傅欣特向先生约稿,先生说:我将写一篇你们意想不到的稿子给你们,傅欣和陈尚凡、熊锡元三位编辑猜了半天也没猜出会是什么内容。收到稿子才知道是《时代的鼓手》,毛笔直写,字迹非常清楚,编辑们立刻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在国民党统治的昆明,一位著名教授赞扬解放区的诗人,的确没有想到,文章发表后的确影响很大。(据傅欣给编者的信,1988.1.18) 该文刊出后,果然许多人投来惊异的目光。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那篇《时代的鼓手》,赞颂田间先生的诗,这一篇短小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波动,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少人也认为它是先生思想转变时期的一声呐喊。全文如下:

鼓——这种韵律的乐品,是一切乐器的祖宗,也是一切乐器中之王。音乐不能离韵律而存在,它便也不能离鼓的作用而存在。鼓象征了音乐的生命。

提起鼓，我们便想到了一串形容词：整肃，庄严，雄壮，刚毅和粗暴，急躁，阴郁，深沉……鼓是男性的，原始男性的，它蕴藏着整个原始男性的神秘。它是最原始的乐器，也是最原始的生命情调的喘息。

如其鼓的声律是音乐的生命，鼓的情绪便是生命的音乐。音乐不能离鼓的声律而存在，生命也不能离鼓的情绪而存在。

诗与乐一向是平行发展着的。正如从敲击乐器到管弦乐器是韵律的音乐发展到旋律的音乐，从三四言到五七言也是韵律的诗发展到旋律的诗。音乐也好，诗也好，就声律说，这是进步。可痛惜的是，声律进步的代价是情绪的萎顿。在诗里，一如在音乐里，从此以后以管弦的情绪代替了鼓的情绪，结果都是"靡靡之音"。这感觉的愈趋细致，乃是感情愈趋脆弱的表征，而脆弱感情不也就是生命疲困，甚或衰竭的朕兆吗？二千年来古旧的历史，说来太冗长。单说新诗的历史，打头不是没有一阵朴质而健康的鼓的声律与情绪，接着依然是"靡靡之音"的传统，在舶来品的商标的伪装之下，支配了不少的年月。疲困与衰竭的半音，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变本加厉了的风行着。那是宿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吗？也许。但谁又叫新生与震奋的时代来得那样突然！箫声，琴声（甚至是无弦琴），自然配合不上流血与流汗的工作。于是忙乱中，新派，旧派，人人都设法拖出一面鼓来，你可以想象一片潮湿而发霉的声响，在那壮烈的场面中，显得如何的滑稽！它给你的印象仍然是疲困与衰竭。它不是激励，而是揶揄、侮蔑这战争。

于是，忽然碰到这样的声响，你便不免吃一惊：

"多一颗粮食，
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枪弹！"

听到吗？
这是好话哩！

听到吗？
我们
要赶快鼓励自己底心
到地里去！

要地里

长出麦子；

要地里
长出小米；

拿这东西
　　当作
　　持久战的武器。

（多一些！
　多一些！）

多点粮食
就多点胜利。
（田间：《多一些》）

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熟悉于“弦外之音”……那一套，你的耳朵太细了。

你看，——
他们底
仇恨的
力，
他们底
仇恨的
血，
他们底
仇恨的
歌，
握在
手里。

握在
手里，
要洒出来……
几十个，
很响地
——在一块；
几十个
哒哒地
——在一块；

回旋……
狂蹈……

耸起的
筋骨，
凸出的
皮肉，
挑负着
——种族的
　　疯狂，
　　种族的
　　咆哮！……

（田间：《人民底舞》）

这里便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这是鼋之战中晋解张用他那流着鲜血的手，抢过主帅手中的槌来擂出的鼓声，是弥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挝”，甚至是，如诗人 Robert Lindsey 在《刚果》中，剧作家 Eugene O'Neil 在《琼斯皇帝》中所描写的，那非洲土人的原始鼓，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

这些都不算成功的诗。（据一位懂诗的朋友说，作者还有较成功的诗，可惜我没有见到。）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

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至手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

十一月十五日　修改后的《狼跋篇》发表于重庆《时与潮文艺》第二卷第三期。

十一月二十二日　致西南联大总务处函。云：“本所助教叶金根自十一月一日起因病辞职，相应函达，即希查照是荷。”（《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致臧克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信中说明自己思想转变的决心，又说到对新诗的态度，和正在着手的选诗和译诗工作：

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但没有回信，一半固然是懒，一半也还有些别的理由。你们做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在你所常诅咒的那故纸堆内讨生活的人原不只一种，正如故纸堆中可讨的生活也不限于一种。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你跟我的时候，我的工作才刚开始。（这可说是你的不幸吧！）你知道我是不肯马虎的人。从青年时代起，经过了十几年，到现在，我的“文章”才渐渐上题了，于是你听见说我谈田间，于是不久你在重庆还可以看见我的《文学的历史方向》，在《当代评论》四卷一期里，和其他将要陆续发表的文章在同类的刊物里。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单方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最终的单方能否形成，还要靠环境允许否。（想象四千元一担的米价和八口之家！）但我相信我的步骤没有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这是我要抗辩的第一点。你还口口声声随着别人人云亦云的说《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天呀，这冤从何处诉起！我真看不出我的技巧在那里。假如我真有，我一定和你们一样，今天还在写诗。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我有火，不说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而说我是，这样的颠倒黑白，人们说，你也说，那就让你们说去，我插什么嘴呢？我是不急急求知于人的，你也知道。你原来也只是那些"人"中之一，所以我也不要求知于你，所以我就不回信了。今天总算你那支《流泪的白蜡》感动了我，让我唠叨了这一顿，你究竟明白了没有，我还不敢担保。克家，不要浮嚣，细细的想去吧！

新闻的报道似乎不大准确。不是《抗战诗选》而是作为二千五百年全部文学名著选中一部分的整个《新诗选》。也不仅是"选"而是选与译——一部将在八个月后在英、美同时出版的《中国新诗选译》（译的部分同一位英国朋友合作）。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人文科学学报》第二期有第一篇谈图腾的文章，若找得到，可以看看）。关于《新诗选》部分，希望你能帮我搜集点材料，首先你自己自《烙印》以来的集子能否寄一份给我？若有必要，我用完后，还可以寄还给你。其他求助于你的地方，将来再详细写信来。本星期及下星期内共有三个讲演，都是谈诗的。……

现在想想，如果新闻界有朋友，译诗的消息可以告诉他们，因为将来少不了要向当代作家们请求合作，例如寄赠诗集和供给传略的材料等等，而这些作家们我差不多一个也不认识。日来正在译艾青，已成九首，此刻正在译《他死在第二次》。也许在出书以前，先零星的寄到国外发表一部分，重庆的作家们也烦你替我先容一下，将来我打算发出些表格请他们填填关于我写传略时需要的材料。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唯其曾经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揽取这项工作的热心，唯其现在不再写诗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的头脑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和偏恶。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我想我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这里的朋友们正是这样的鼓励着我，重庆的朋友们想也有同感。

先生编选的《现代诗钞》并未完成，其中有些准备收入的诗还未及收入，已收入者后来亦有看法上的改变。由于环境限制，先生虽然尽力寻找国统区以外的新作品，但大多还是局限在五四以来的旧作品。兹录已选部分之目录如下：郭沫若：

《天狗》、《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夜步十里松原》、《灯台》、《新芽》。冰心女士：《繁星》(六首)、《春水》(三首)。袁水拍：《小诗四首》。汪铭竹：《纪德与蝶》、《法兰西与红睡衣》。夏蕾：《山》、《二月》。杜谷：《江，车队，巷》、《泥土的梦》。艾漠：《生活》。赵令仪：《马上吟——去国草之二》。伍棠棣：《芋田上》。陈迹冬：《猫》、《空街》。丽砂：《昆虫篇》。鲁藜：《野花》。力扬：《短歌》。侯唯动：《血债》、《遗嘱》。王浊清：《我从 CAFÉ 中出来》、《月光》。沈从文：《我喜欢你》。废名：《灯》、《理发店》。戴望舒：《款步》、《夜行者》。玲君：《铃之记忆》、《山居》、《喷水池》。侯汝华：《水手》、《灯与影》。林庚：《秋之色》。史卫斯：《独游》。钱君匋：《路上》。李白凤：《梦》、《小楼》。沈洛：《夜行》。陈雨门：《秋晚》。陈时：《标本》。苏金伞：《雪夜》。罗英辰：《永夜》、《无法投递》。徐迟：《蝶恋花》、《橹》。上官橘：《窗》。陈江帆：《欲曙》。俞铭传：《拍卖行》、《夜不寐》、《以呢帽当雨伞》、《梦去了》、《隐居者》、《郊》、《压路机》。王佐良：《诗》(二首)。穆旦：《诗》(八首)、《出发》、《还原作用》、《幻想的乘客》。罗寄一：《诗》、《五月风》、《月，火车》。杜运燮：《无题》、《滇缅公路》、《民众夜校》。何其芳：《河》、《醉吧》。艾青：《青色的池沼》、《秋》、《太阳》、《生命》、《煤的对话》、《浪》、《老人》、《他死在第二次》(十二首)、《透明的夜》、《聆听》、《马赛》。柳木下：《在最前列》、《贫困》。婴子：《松林》、《营外》。S·M：《哨》、《老兵》、《纤夫》。田间：《自由，向我们来了》、《五个在商议》、《给饲养员》、《多一些》、《冀察晋在向你笑着》、《人民底舞》。韩北屏：《牧——写给舞鹰》、《铁的语言》。鸥外鸥：《和平的础石》。穆芷：《城》。杨周翰：《女面狮(四)》、《山景》。胡明树：《二百立方尺间》、《检讨的镜子》。周为：《冬天》。陈善文：《苦撑着拼》。任钧：《警报》。孙钿：《雨》。失名：《都会的悒郁》、《男人向上的虱子》、《父的感想——给女儿李朗的诗》。何达：《我们开会》、《老鞋匠》、《过昭平》、《风》。沈季平：《山，滚动了》。徐志摩：《月下雷峰影片》、《五老峰》、《残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毒药》、《多谢天！我的心又一次跳荡》、《再别康桥》、《哈代》、《云游》、《火车噙住轨》、《在病中》、《领罪》、《爱的灵感——奉适之》。闻一多：《"你指着太阳起誓"》、《也许——葬歌》、《末日》、《死水》、《春光》、《诗二首》[①]、《飞毛腿》、《奇迹》。饶孟侃：《呼唤》、《招魂——吊亡友杨子惠》、《走》、《无题》、《三月十八——纪念铁狮子胡同大流血》。朱湘：《美丽》、《当铺》、《雨景》、《有忆》。孙大雨：《诀绝》、《回答》、《老话》。邵洵美：《女人》。林徽音：《笑》。陈梦家：《一朵野花》、《雁子》、《潘彼得的梦》、《鸡鸣寺的野路》、《白俄老人》、《西山》、《影》、《雨中过

① 即《一个观念》、《发现》。

二十里铺》、《小庙春景》、《当初》。方玮德：《海上的声音》、《幽子》、《风暴》、《微弱》。朱大枬：《笑》。梁镇：《默示》。

是月 作《诗经通义》(周南)。后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图书季刊》新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收《闻一多全集》。

这也是篇训诂著作，训有《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桃夭》、《兔罝》、《芣苢》、《汉广》、《汝坟》、《麟之趾》九篇。其中有些文字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以《诗经新义》(二南)发表过，这次又重新整理编排发表。该文与十月发表的《诗经通义》(召南)一样，都反映了先生对《诗经》的认识发展。

是月 由励志社主持的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改隶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培训工作亦由励志社转交军委会外事局负责，名称亦改为“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简称“军委会译训班”。军委会译训班的培训分别在重庆、昆明两地进行，在昆明者简称“军委会昆明译训班”。西南联大为支援译员培训，派遣许多教授担任讲师，先生亦应邀担任了该班英汉互译讲师，每次讲课有二十五美元的报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人员增多，仅空军人员就达一万四千余名。作为抗战大后方基地的昆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共设立了三十二处为美军服务的招待所，共三万六千六百七十三张床位。大量美国援华人员来华，需要更多的翻译。为此，联大常委会决定一九四四年应届毕业男生，全部征调为译员，经译训班培训后分配各处服务。对于此种应急措施，先生认为义不容辞，有些同学想不通，他还做了说服工作。

译训班讲课没有统一规定的讲义，教材均由教师自选。先生某次以《共产党宣言》为英汉互译教材，有人报告到重庆。重庆传话调查，让吴泽霖压了下来，事后先生知道，说：“美国人要问起《共产党宣言》，翻译却不知道，那才让人笑话呢！”

十二月一日 《文学的历史方向》发表于昆明《当代评论》第四卷第一期。收《闻一多全集》时改作《文学的历史动向》。《当代评论》在介绍作者时云：“闻一多先生的文学论文，必然是读者所欢迎的。闻先生并将继续就相似问题，陆续为文在本刊发表。”(《本期撰者》)

这是一篇先生自谓“文章”渐渐上了题后的杂文，它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随着各自文化的发展，慢慢互相吸收、融合，总有那么一天它们的个别性消失了，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而四个文化猛进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歌声，尽管歌的性质并非一致。在中国，从《诗经》开始，抒情诗始终是文学的正统的类型，赋、词、曲是它的支流，赠序、碑志则是它的副产品，小说、戏剧亦

以不同方式夹杂些诗。先生说:“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但是自南宋开始,由于印度、欧洲文化的二度输入,中国文学的舞台成了小说和戏剧的时代。这就是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新诗除非“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否则也将与旧诗一样失去了生命。要做到这一点,“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说得更确切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

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强调的是要吸取历史的经验,勇于改变陈规,勇于正视时代给文学带来的变化,以此引申到社会的发展,要敢于否定自己,接受外来的进步影响。先生说:

>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续继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
> 过去记录里有未来的风色。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气,更多的勇气啊!

十二月三日　在中法大学讲《易林》及《封禅仪记》,这是文学史中的一讲,学生们评价说讲得很新颖。(据邹联彩日记,龙美光提供)

是月　在中法大学讲演“诗与批评”。郭良夫回忆说:“秋季开学后的一个晚上,先生在中法大学讲演《诗与批评》,我去听讲了。听讲的人真多,偌大一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这次讲演中有一句话说是‘拉老诗人的鼻子走的方式并不是好的方式’,很可以代表他当时的思想。他认为‘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这正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因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学林漫录》第11集,第5页)这次讲演,后写成同名文章,发表于次年九月一日重庆《火之源丛刊》第二、三集合刊。收《闻一多全集》。

今存手稿中,有《诗与批评》提纲,原题作《怎样读中国诗》。题下,盖有自刻闲章“金汁灌叟”,可见先生很重视它。提纲内容较发表的文章更为广泛,兹录如下:

对诗的两种看法

不负责的宣传　价值论

美的语言　效率论

就诗人说二者都是

就读者说是在欣赏语言中接受宣传，宣传是通过语言的，二者亦是

第二种非宣传的真空的美语言——太高甚至不可能

既不免宣传作用最好是负责的

如果诗人自动负起责来自然很好

但愿负责与配负责是二事

二者兼之古今无几人

于是外力强迫他负责

一般情形是消极检查违碍

积极指导创作则恐与诗的基本性质相抵触

有宣传而无诗　失却宣传的效果等于无宣传

无诗又无宣传两败俱伤

并且检查与指导只能及于当时作品古代遗产则无能为力

除非"焚书"　□□敢作这念头？

其实所谓负责者是个合作事业

各种作品同时存在自会抵消其流弊——价值因混合而见个别只有相对价值，混合而成绝对价值

鼓励自由发展结果必是多样性的发展

多样自会去中和的理想绝对价值不远

但亦只是不远　因混合中成素的比例必不正确　合作事业必要人去组织

文化时时在生病　（盲目）混合的丸散说是百病皆治实只能治小病

大病则须医师案脉处方　斟酌轻重君臣相配　使菜与药合作

为何读诗，要专家指导

理想的读本——选本

理想的批评家——懂诗又懂社会（时代的需要）　何者是有价值的效率或有效率的价值

负责的宣传　期望于诗人是意外不如期望于批评家

以上还是老话

原则是诗教　办法是删诗编诗

历史的大循环　老话重提是历史的方向

从封建时代说起

封建时代是社会专制时代　其中无个人

诗以社会功能而产生而存在　诗教　古代诗(三百篇)　低等效率即能发挥价值　因人的心理组织简单

个人渐从社会的桎梏挣扎出来

遂产生近代诗　从楚辞起　名同曰诗而实质大变　试比诗经与唐诗

只有个人无社会　少数个人复杂　在效率的游戏中完成以个人享乐为目的的价值——完全自私

杜甫始有社会意识白居易始有社会主张　失败因——

积重难返

或个人发展到极度是个人的毁灭,小我与大我,但个人主义流弊太深迟早必否极泰来,加西洋影响　社会借外力大翻身　外力促其急转直下　曰到封建时代　不过是社会的个人或个人的社会　非无个人的社会

文化从个人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诗不能例外

诗需要对社会负责才产生批评

因批评是作家与读众的中间人　有(读众)第二者才有(批评家)第三者　一生二二生三

作家与读众缺一即无批评的必要

中国无批评　有之惟孔子论诗与季札观乐的谈话近之

因春秋时代个人萌芽未忘社会——二者均势时期与未来的二者调和时期最近似故亦有近似的批评　西洋亦在均势中且在努力于调和工作故有更近似的批评

但许多批评仍只是较细,效率论与中国诗话大同小异　非真批评非完整批评与价值效率

中国则并效率论都讲不到,那是因他更无视读众(社会)

因只有效率论,尚有读众在心目中——讨读众的好,虽非为读众的好

讨好是效率论　为好是价值论

批评家一方对诗人负责谈效率中的价值　一方对大众负责谈价值中的效率

效率偏重诗人　价值偏重大众　批评家在中间作桥梁

诗是社会的工具的原料　批评是工具的成品　大众是消费者

成品的制造应以消费者的福利为前提

原料是天生的跟它讲不到什么前提不前提

只要够得上称原料的多多益善

虽则其间重要性有头二三等之别

无论如何变成成品还得发明家与技师

发明家与技师谈何容易

批评家谁是批评家

是衮衮诸公吗　是诸公的走狗吗

是年　作《字与画》。这篇文章原是应《综合》周刊所约而撰写的，它论述字与画源流等问题，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两者同来源于古代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之路。因《综合》仅出版两期便停刊，故此文未来得及刊载。原稿曾保存于凌德铭处，后捐献给南京博物院。全文如下：

原始的象形文字，有时称为绘画文字，有时又称为文字画，这样含混的名词，对于字与画的关系，很容易引起误会，是应当辩明一下的。

一切文字，在最初都是象形的，换言之，都是绘画式的。反之，任何绘画都代表着一件事物，因此也便具有文字的作用。但是，绘画与文字仍然是两件东西，它们的外表虽相似，它们的基本性质却完全两样。一幅图画在作者的本意上，决不会变成一篇文字，除非它已失去原来的目标，而仅在说明某种概念。绘画的本来目的是传达印象，而文字的本来目的则是说明概念。要知道二者的区别，最好是看它们每方面所省略的地方。实际上便是最写实的绘画，对于所模拟的实物，也不能无所省略，文字更不用说了。往往为了经济和有效的双重目的起见，绘画所省略处正是文字所要保留的，反之，文字所省略处也正是绘画所要保留的。以现代澳洲为例，什么是纯粹的绘画，什么是文字性质的绘画，不但土人看来，一望而知，就在我们看来，也不容易混淆。在他们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笔都证明作者的用意是在求对原物的真实和生动，但在他的文字性质的东西里，情形便完全不同。那些线与点只是代表事物概念的符号，而非事物本身的摹绘。

大体说来，绘画式的文字总比纯粹绘画简单些。但照上面所说的看来，绘画式的文字，却不是简化了的绘画。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想，我们现在所见到刻在甲骨上的殷代象形文字，其繁简的程度，大概和更古时期的象形文字差不多。我们不能期望将来还有一批更富绘画意味的甲骨文字被发现。文字打头就只是文字——只是近似绘画的文字，而不是真正的绘画。

但是就中国的情形论，文字最初虽非十足的绘画，后来的发展却和绘画愈走愈近。这种发展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和绘画本身的发展过程完全相合。两个阶段(一)是装饰的，(二)是表现的。

离甲骨文略后而几乎同时的铜器上的文字，往往比甲骨文字来得繁缛而更富于绘画意味，这些我从前以为在性质上代表着我国文字较早的阶段，现在才知道那意见是错的。镌在铜器上的铭辞和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根本是两种性质的东西。卜辞的文字是纯乎实用性质的记录，铭辞的文字则兼有装饰意味的审美功能。装饰自然会趋于繁缛的结构与更浓厚的绘画意味。沿着这个路线发展下来的一个极端的例，便是流行于战国时的一种鸟虫书，那几乎完全是图案，而不是文字了。字体由篆隶变到行楷，字体本身的图案意味逐渐减少，可是它在艺术方面发展的途径不但并未断绝，而且和绘画拉拢得更紧，共同走到了一个更高超的境界了。

以前在装饰的阶段中，字只算得半装饰的艺术，如今在表现的阶段中，它却成为一种纯表现的艺术了。以前作为装饰艺术的字，是以字来模仿画，那时画是字的理想。现在作为表现艺术的字，字却成了画的理想，画反要来模仿字。从艺术方面的发展看，字起初可说是够不上画，结果它却超过了画，而使画够不上它了。

字在艺术方面，究竟是仗了什么，而能有这样一段惊人的发展呢？理由很简单。字自始就不是如同绘画那样一种拘形的东西，所以能不受拘牵的发展到那种超然的境界。从装饰的立场看，字尽可以不如画，但从表现的立场看，字的地位一上手就比画高，所以字在前半段装饰的竞赛中吃亏的地方，正是它在后半段表现的竞赛中占便宜的地方。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文字的本质与绘画不同，所同的只是表现的形式而已。

评论书画者常说起"书画同源"，实际上二者恐怕是异源同流。字与画只是近亲而已。因为相近，所以两方面都喜欢互相拉拢，起初是字拉拢画，后来是画拉拢字。字拉拢画，使字走上艺术的路，而发展成我们这独特的艺术——书法。画拉拢字，使画脱离了画的常轨，而产生了我们这有独特作风的文人画。

一九四四年　四十六岁

二月五日，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成立。

四月十八日，是日起日军分三路进攻河南，继占领郑州、驻马店、洛阳之后，又向湖南进攻，于六月中旬占领长沙、八月上旬占领衡阳。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十五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联合统帅部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九月八日，中国远征军攻克滇西松山。十四日，攻克腾冲，怒江战役取得胜利。

九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以个人为基础的中国民主同盟。

一月十五日　教育部审查并核定通过先生的大学教授资格。其学字第02745号训令公布通过教授资格者共五十九人，除先生外还有张奚若、杨武之、吴泽霖、贺麟、姚从吾、江泽涵、马约翰、赵九章、华罗庚、闻家驷、刘崇鋐、邵循正、陶葆楷、浦江清等。（据《教员资格核定名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一月十八日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吴青所写的短讯《昆明二三事》，中云："昆明物价，为全国第一，教授们生活困难，大都另谋开源之道，闻一多教授订润例作金石。"先生准备挂牌治印，即在这前。今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纪念馆存有先生与沈从文、彭仲铎、唐兰、陈雪屏、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罗庸共十二教授共同发起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知诸教授早有"另谋开源之道"的打算，特录以参考：

文直　颂赞题序　五千元　传状祭文　八千元　寿文　一万元　碑铭墓志　一万元（文均限古文，骈体加倍）

诗直　喜寿颂祝　一千元　哀挽　八百元　题咏　三千元（诗以五律及八韵以内古诗为限，七律及词加倍）

联直　喜寿颂祝　六百元　哀挽　四百元　题咏　一千元（联以十二言以内为限，长联另议）

书直　楹联　四尺六百元　五尺八百元（加长另议）　条幅　四尺四百元　五尺五百元（加长另议）　堂幅　四尺八百元　五尺一千元（加长

另议）　榜书　每字五百元（以一方尺为限，加大直亦加倍）　斗方扇面　每件五百元　寿屏　真隶每条一千五百元　篆每条二千元（每条以八十字为限）　碑铭墓志　一万元

篆刻直　石章每字一百元　牙章每字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收件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王年芳女士代转

时，昆明物价暴涨不已，先生一家生活几乎完全陷入绝境。有些熟悉先生的老朋友想起他当年曾搞过篆刻，建议他从这方面找点出路，先生细心思考后，觉得从事篆刻既可依靠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又不失风雅，欣然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开始挂牌治印。从此，先生在薪金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开始逐渐有所改善。

先生治印始于一九二七年，此后十几年中很少重握铁笔。抵昆之初，一次偶然在地摊上购得几颗旧石，回来给子女们刻了四枚名章，这是至今家中尚保存的先生所刻印章中最早的遗物，以后再也没有刻治过印章了。此时要挂牌治印，借以谋生，先生不免要再练练手，于是给所里同仁试着刻了几枚，结果尚称满意。但云南时兴象牙章，牙章质地硬度远远超过石章，刻起来费时费力，相当辛苦，先生过去没有刻过牙章，现在为了谋生不得不操练这一苦差。先生曾以为象牙遇酸硬度会减弱一些，便把牙章置于醋中浸泡，但泡了一昼夜丝毫没有变软，只好硬碰硬地苦干了。

先生治印，吴晗在文章中曾有所记述，他在《哭闻一多》一文中说："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骨文到金石文，都下过功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一行手艺，他立刻买了一把刻字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象牙章，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了，还含着泪。"（重庆《新华日报》，1946.7.28）

刻印的过程，吴晗在《闻一多的"手工业"》中记述说："他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构思，人的姓名，每一个字的笔划，有繁简，如何安排繁简不同的字，在一个小方块里，得要好好想。其次是写，用铅笔画底子，刻一个惬意的图章，往往要画多少次才挑一个用墨上石。再后便是动刀了。这段最费力，老象牙尤其费事。刻好粗坯子以后剩下便是润饰的工夫。最后，用印泥试样，不惬意再加雕琢。一切都合式了，在印谱上留下几个底子，剪下一个和原章用纸包好，标上名姓和收件处，这件工作才算结束。"（清华周刊社编《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第20页，1947年7月出版）

先生正式挂牌治印时，浦江清特撰了骈文启事。一九八八年春，浦江清之子浦汉昕从旧物中检出一份《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手稿，即浦江清当年为先生治印所写的启事。其文云：

秦钵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皕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馨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　　冯友兰　　朱自清　　潘光旦
蒋梦麟　　杨振声　　罗常培　　陈雪屏
熊庆来　　姜寅清　　唐　兰　　沈从文　　同启。[①]

先生对浦江清此骈文尤为欣赏。浦江清给季镇淮信中说："闻先生对于'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那几句很高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至于闻氏之刻印，因为他对古文字学的研究，加以早年在美国专学艺术，所以线条配合，别出匠心。学问、艺术双方造诣均高，迥不同于俗笔。而当时昆明一般人士也看重文学名家及教授地位，所以请教他的特别多。在钟鼎文面也只有他一人擅长，多数指定他刻钟鼎文。"（转引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46页）

先生治印，不直接收件，一般委托几家文具店代收。青云街、华山西路、正义路几家笔店都有先生治印的启事、润例，镶进玻璃框，挂在显眼的铺面。李埏《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中，说正义路北段马市口下去不远处的一爿王姓笔店，门上就挂有"闻一多治印收件处"的牌子。（《云南日报》，1988.11.30）

治印的润例，据《自由论坛》所刊广告，知最初是石章每字二百元，牙章每字四百元。后来物价涨了，润例也不得不随之涨上去。到九月二十四日，石章每字已四百元，牙章八百元；至十一月十二日，则石章每字六百元，牙章一千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石章每字涨至一千元，牙章两千元。《生活导报》也曾代为刊登广告，代收印件，并不收广告费。先生感谢他们的援助，特为其

① 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引浦江清给他的信，信中亦有这时的启事抄件，文字与此文大体相同。但所说具名推荐者为九教授：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唐兰、陈雪屏、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罗庸。

编辑熊锡元刻了一方名章。

治印之初，来件不多，先生不免着急。但后来顾客多了，先生又嫌治印占用的时间太长了。收费的标准，随着市场物价波动。为了这，长子立鹤曾怒气冲冲的与先生辩论起来，问：收这么高的费，是不是发国难财？先生听了半晌没讲一句话，末了，才沉重地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闻立雕《是闻一多的孩子》，《人物杂志》第1年第8期，1946.9.5）

先生治印，是出于弥补生活的不足。但他对每方印章，都像对待艺术作品一样，认真构思，认真创作。不过，他的匠心并不是所有顾客都能理解的。立雕还记得，有次先生用点刀法刻了一枚印章，字体笔画全用点构成，很特别，自认为在这枚印上花的时间比别的印多，顾客会满意。恰恰相反，那顾客不懂得艺术，要求先生磨掉重刻，不管如何解释都不行。先生只得磨平重刻。

为朋友治印，先生是不收报酬的。他身边的同事、学生，多数有先生赠刻的图章。给范宁刻了一枚，不满意，又刻了一枚。给季镇淮刻了一个名章后，又刻了一方"来之"，是他的字，牛角的。何善周、王瑶的名章，也是先生刻赠的。冯友兰准备卖字时，先生先送去一方，后来又送了一方，一阴一阳，一般大。朱自清也保存着了先生刻的两枚印章，一枚为闲章"一向心宽"，一枚为藏书印"佩弦藏书之鈐"。给雷海宗的一枚，光是构图就描了好几个，尤其是那个"雷"字，修改过数次。这年年底，先生为华罗庚刻了一方名章，并在边款中寄托了情思，云："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一月二十五日　春节。节日里，房东为村子里的公产被保长私侵，借着酒劲在全村聚会时略表不平，结果被保长家里的人打成重伤。先生知道了，忿忿不已，让何善周去看望房东，房东十分感激。（据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69至270页）

一月二十六日　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逝世，先生闻讯十分悲痛。陶云逵是人类学家，一九三九年底留学回国，被聘为联大讲师，后任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该室编辑的《边疆人文》甲、乙两种杂志，在国内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先生研究古代文学，运用社会学、人类学诸方法，其中不少观点与陶云逵磋商过，两人情谊真挚。先生的《说鱼》，便是应陶云逵之约刊登在《边疆人文》上的。

同日　为缓解联大教授困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向先生等联大六十七位教师每人发放贷款二千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向西南联大教师放款名单及金额》，《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史料》第4册，第551页）

是月 《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预告下期目录，有先生一篇《道家思想的起源》，但未见发表。

是年初 指导中文系同学撰写毕业论文。其中彭兰的论文《高适系年考证》，是先生亲自确定的题目。先生对彭兰说：要欣赏诗作和了解诗的真意，需首先了解作家的生平、社会背景及其著述情况。（据访问彭兰记录，1986.11.17）

二月十五日 在西南联大讲《舞与诗》。张源潜《日记》（未刊）："七时，听闻一多讲《舞与诗》。大体分三部分：诗在舞中、诗在舞外、诗中有舞。主张健康的诗，精神锻炼，令人兴奋，当然田间是近代的一个代表。罗常培作'跋'，说他讲的最健康，最合辩证法。"朱自清也听了这次演讲，说"事后到茶室讨论，颇有趣"。（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80页）

二月二十日 《复古的空气》发表于《云南日报》"星期论文"专栏。再刊于三月一日《当代评论》第四卷第十期。收《闻一多全集》。

文章针对《中国之命运》中主张恢复传统的思想，批评"知识和领导分子"的倒退，说"复古"者有四种类型：自卫机能，报复意味的自尊心，自卑感，掩饰缺点。文章说：

> 说复古空气是最近新兴的现象，也不合事实，趋势早已在酝酿，不过最近似乎更表面化了一点。为什么最近才表面化？当然与抗战有关。历史在转向，转向时的心理是不会有平静。转得愈急，波动愈大，所以在抗战期间，一面近代化的呼声最高，一面复古的空气也最浓。
>
> 就一般的人说，心理的波动，不足怪，但少数的知识和领导分子，却应该早已认清历史，拿定主意，游移虽不致改变历史，但是会延缓历史的进展，须知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容浪费。
>
> 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所以能存在到今天，自然有其生存的道理在，这道理并不像你所想的，在能保存古的，而是正相反，在能吸收新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如果是那样的，它就早完了。最初东西夷夏两民族，分明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文化。……
>
> 我得强调的声明，民族主义我们是要的，而且深信是我们复兴的根本。但民族主义不该是文化的闭关主义。我甚至相信正因我们要民族主义，才不应该复古。老实说，民族主义是西洋的产物，我们的所谓"古"里，并没有这东西。谈谈孔学，做做歪诗，结果只有把今天这点民族主义的萌芽整个毁掉完事。其实一个民族的"古"是在他们的血液里，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要

取消它的"古"的成分，并不太容易。难的倒是怎样学习新的，因为在上文我们已经提过，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克服惰性是一件难事啊！

三月一日　《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一篇以史论今的杂文，认为家族主义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应当改变儒家"孝"的家族主义观念，走民族主义的路。文章指出：

> 由明太祖而太平天国，而辛亥革命，以至目前的抗战，我们确乎踏上了民族主义的路。但这条路似乎是扇形的，开端时路面很窄，因此和家族主义的路两不相妨，现在路面愈来愈宽，有侵占家族主义的路面之势，以至将来必有那么一天，逼得家族主义非大大让步不可。家庭是永远不能废的，但家族主义不能存在。家族主义不存在，则孝的观念也要大大改变，因此儒家思想的价值也要大大的减低了。家族主义本身的好坏，我们不谈，它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事实，而我们现在除了民族主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这是到大同主义必经之路），所以我们非请它退让不可。
>
> 有人或许以为讲民族主义，必须讲民族文化，讲民族文化必须以儒家为皈依，因而便不得不替家族主义辩护。这似乎是没有认清历史的发展。而且中国的好东西至少不仅仅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好处也不在其维护家族主义的孝的精神。前人提过"移孝作忠"的话，其实真是孝，就无法移作忠，既已移作忠，就不能再是孝了。倒是"忠孝不能两全"真正一语破的了。

三月八日　在中法大学中国文学史课上讲唐朝文化与北朝"文质"之演进。（据邬联彩日记，龙美光提供）

三月十九日　《说舞》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第六十期。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一篇很精彩的论说文，文中形象地描写了澳洲风行的科罗泼利（Corro-Borry）舞的热烈场面，说它"可以代表各地域各时代任何性质的原始舞，因为它们的目的总不外乎下列这四点：（一）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二）以律动性的本质表现生命，（三）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和（四）以社会性的功能保障生命"。

同日　《庄子外篇校释——骈拇》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第七期。这是一篇训诂文章。

三月二十九日　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以是日为青年节。先生对此大为不满，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说："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联

大八年》,第 7 页)

是年春 为胞弟闻家驷书写一条幅,上录陶渊明《读山海经》中一句:"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下书"驷弟出纸属书陶句,时同客滇南,弥念湖上老宅也。甲申春日一多。"

是年春 出席陈家煜、于诗蘩结婚仪式,并作证婚人。陈家煜于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甄别考试作文《告日本民众书》由先生阅卷,印象不错。陈虽非文学院学生,但因是浦江清的同乡(松江),所以浦江清邀约先生出席此次婚礼,还出纸请先生写了贺幅。贺幅是用钟鼎文录的《诗经·周南·关雎》的前四句,书法极佳,落款处盖"金汁灌叟"自刻印。孙起孟也来参加婚礼,得以与先生相识。

四月九日 西南联大十二位爱好文学的同学何孝达(何达)、沈季平(闻山)、施载宣(萧荻)、康侃、赵宝煦(白鹄)、黄福海(黄海)、周纪荣、赵明洁、段彩楣、施巩秋、王永良、万绳楠到司家营闻一多家中,请先生担任他们准备成立诗社的导师。先生很高兴,和同学们谈了许多,并建议这个诗社应表现出"新"意。于是,联大"新诗社"这天诞生了。

史集[①]《闻一多先生和新诗社》:"闻先生非常认真直率地评讲了大家带来的习作。他非常支持我们组织诗社的愿望,兴奋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对诗的见解。从批判中国传统的所谓'诗教',讲到写诗和做人的道理,谈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更坦诚地谈他对我们诗社的期望。他说:'我们的诗社,应该是"新"的诗社,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你们当然比我懂得更多,在这年头,你们会明白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这就是我们所以把酝酿成立的诗社命名为'新诗社'的由来。后来,我们把闻先生这次讲话的精神,归结成新诗社的四条纲领,那就是:一、我们把诗当作生命,不是玩物;当作工作,不是享受;当作献礼,不是商品。二、我们反对一切颓废的、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三、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虽然在一周之后,我们又在联大南区教学区旁的学生服务处小会堂,开了一个有更多同学参加的新诗社成立大会,但是我们仍然把司家营和闻先生一起的集会作为新诗社成立的纪念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

先生对新诗社的同学要求很严格,针对他们诗作中的某些缺点,严肃地说:"年青人有幼稚病,这没有什么可怕,要勇敢地去发现问题,学会正确地解决问题。"后

① 史集,即新诗社诸同学写此文时的联合笔名。

来又多次强调:“今天的新诗人,必须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这是文艺青年的必由之路。”(同前)

以后,先生常常出席新诗社组织的诗歌创作、朗诵与讨论活动。闻山在《教我学步的人——闻一多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中回忆:“夜晚,在一座小楼上,一群喜爱诗的年青人热哄地聚在一起。各人带来自己最近写的诗,交换看着。闻先生也来了。他是大家的诗的读者,也是临时的批评家。房子太小,人多,又没有凳子,于是拿稻草打成的圆垫子叠起来,靠着墙坐了一排,屏风栏上也坐满了人。闻先生原先被尊敬地安置在床上坐着,但半中间他却挤到了坐草垫子那一排里去。他朗诵了一些诗,也读了我的一首。他读时,我觉着害羞,但又感到幸福的发慌。我只顾听他怎样念,以至他如何说我的诗,竟没有听进耳朵里去。谈诗谈得很激烈。闻先生笑着,听着,不大参加争论。突然地,他问了一句:‘你们以为我到你们中间是干甚么来的?’大家没提防有此一问,还来不及回答,他顿了顿,说:‘你们也许以为我是来教你们,来领着你们走的吧?那样想就错了。我是到你们中间来取暖的!其实,哪里是我领着你们,那是你们推着我走!今天的年青人做了许多不应该由他们来做的事,但是他们做了,而且做得很不坏。他们肩上挑着中年人的担子。这教人看了高兴。也使人想着悲哀。干嘛不让他们好好在学校里念书呢?这正是应该念书的年龄。这说明了,有许多中年人放弃了自己对生活的责任,如果年青人不挑起这担子来,事情就更没有人过问了!’”(《人民日报》,1956.7.14)

新诗社不但组织朗诵会,还出《诗与画》壁报。这个壁报后来分为“新诗”和“阳光美术社”两个部分,后者吸收了虽不写诗但爱绘画的同学参加,这样就团结了更多的人。先生又成了阳光美术社的导师,他鼓励大家多画漫画、宣传画,不要涂抹“闲情逸致”,装点“风雅”,“松荫高士”、“芭蕉仕女”等,在今天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再画这些东西,就是“帮凶”。在绘画技法上,先生要大家“尽量摒弃主观虚构的东西,强调写实”。当他看到同学中“有人画倒毙在马路边的尸体时”,“就加以肯定,说,对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是要用画笔来控诉”。(赵宝煦、闻山《闻一多导师和新诗社、阳光美术社》,《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35页)

四月二十三日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第六十五期。收《闻一多全集》。

该文从宗教入手,分析中西文化风格的互异。说:“要说明中西风俗不同,可以从种种不同的方面着眼,从宗教着眼,无疑是一个比较扼要的看法。”先生认为宗教的本质,最初体现了人类求生的原始思想,“生的意志大概是人类一切思想的根苗。人类生活越接近原始时代,求生意志的强烈,与求生能力的薄弱,愈有形成反比之

势”。在叙述了中西宗教产生的过程之后，先生说：“往往有人说弱者才需要宗教，其实是强者才能创造宗教来扶助弱者，替他们提高生的情绪，加强生的意志”。“宗教本身尽有数不完的缺憾与流弊，产生宗教的动机无疑是健康的”。

先生研究宗教，是带着批判现实的精神。他说：“有人说西洋人的爱国思想，和恋爱哲学，甚至他们的科学精神，都是他们宗教的产物，他们把国家、爱人和科学的真理都‘神化’了，这话并不过分。至少我们可以说，产生他们那种宗教的动力，也就是产生那爱国思想、恋爱哲学和科学精神的动力。”文中批判了中国的儒家哲学，并借以发挥说：“尽管有你那一套美丽名词，还是掩不住那渺小、平庸、怯懦、虚伪，掩不住你的小算盘、你的偷偷摸摸、自私自利，和一切的丑态。你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你古圣先贤的什么哲学只令人作呕，我都看透了！你没有灵魂，没有上帝的国度，你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一群不知什么是爱的天阉（因此也不知什么是恨）。你没有同情，也没有真理观念。然而你有一点鬼聪明，你的蕃殖力很大。因为聪明所以会鼠窃狗偷——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因为蕃殖力大，所以让你的同类成千成万的裹在清一色的破袄里，排成番号，吸完了他们的血，让他们饿死，病死……这是你的风格，你的仁义道德！你拿什么和人家比！”先生说“没有宗教的形式不要紧。只要有产生宗教的那股永不屈服，永远向上追求的精神，换言之，就是那铁的生命意志，有了这个，任凭你向宗教以外任何方向发展都好。怕的是你这点意志，早被瘪死了，因此除了你那庸俗主义的儒家哲学以外，不但宗教没有，旁的东西也没有。更可怕的是宗教到你手里，也变成了庸俗、虚伪，和鼠窃狗偷的工具。怕的是你的生命的前提是败北主义，和你那典型的口号‘没有办法’！于是你只好嘲笑，说俏皮话。”

五月三日 西南联大历史学会在新校舍南区十号教室，举行“五四”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大会主席是李晓同学，先生和张奚若、周炳琳、吴晗、雷海宗、沈有鼎等教授到会。

这次活动，当地报纸报道云：“西南联大为纪念五四，特发动座谈会、演讲会及体育表演。历史学会订于今晚七时假昆北北食堂，举行座谈会，讨论‘五四运动的认识’。除分（一）五四运动之历史追忆，（二）五四运动的内包及外延，（三）我们对五四的认识外，并分详细细目。已请张奚若、潘光旦、周炳琳、吴之椿、王赣愚、曾昭抡、闻一多、雷海宗、刘崇鋐、姚从吾、吴晗、郑天挺、邵循正、蔡维藩、孙毓棠、毛子水等教授出席指导。”（《纪念五四运动，西南联大明日盛会》，昆明《中央日报》，1944.5.3）

会上，周炳琳首先报告了他在“五四”时的经历，接着先生也讲了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张奚若把“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做了比较，吴晗发言说明今天所受思想

与文化上的束缚，雷海宗则认为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这时，先生再次站起来，提出要“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晚会，一九四六年吴晗谈到这年五四纪念的几次大会时，认为它们“建立了近两年来联大民主运动的基础”。

先生的发言，被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张友仁记录整理，冠以《五四历史座谈》为题，交吴晗。收《闻一多全集》。文中讲述了自己在“五四”时的活动，并针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主张恢复传统的儒家思想甚至否定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民主的言论，针锋相对地提出号召，要大家“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

> 方才张先生说五四是思想革命，是正中下怀（记者按：张奚若先生说道：“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则是思想革命。”）但是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张先生说现在精神解放已走入歧途，我认为还是太客气的说法，实在是整个都走回去了！是开倒车了！……我为什么教中国文学系呢？……我的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穿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当时要打倒孔家店，现在更要打倒，不过当时大家讲不出理由来，今天你们可以来请教我，我念过几十年的经书，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因为那是封建社会底下的，封建社会是病态的社会，儒学就是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假秩序的。他们要把整个社会弄得死板不动，所以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读书经验和心得，他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他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

这篇讲演记录，口气比较平和。王康《闻一多传》还有另一种记录，则颇有“火”气：

> 你们都知道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更不会在这样的会上讲话，只是想来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在这样的会上，对于像我这样长期钻在故纸堆里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如果要说几句，也只能是以被审判的资格，讲讲自己的心情。这些年来我是太落伍了，自己的工作脱离了现实。……“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民主，靠“五四”起家的人像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变成反民主的人物了。另一些像我这样的人，说起来，是搞了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自然多少算是做了一点事情，可是没有民主的国家，怎么能保障和奖励学术的研究呢？而且这些研究又究竟有什么用呢？……只

要想一想这几年的生活，看一看政治的腐败所给人民的痛苦，有良心的人应该作何感想？……

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的大事，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去过问政治，就是“不幸”的事情。那么，我要问问：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呢？我不懂历史，我只知道，这还不都是因为没有民主！有人说，青年人幼稚，容易冲动，这有什么不好呢？要不“幼稚”，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幼稚”并不是可耻的，尤其在一个启蒙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生力量。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觉得就是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何况，今天的青年人的思想，也许要比中年人老年人清楚得多，理智得多哩！如今我才明白我们过去究竟干了些什么！过去，我总以为国家大事专门有人去管，无需自己去问，长期脱离了现实。但是，一二十年来和古董打交道，今天也总算得到结论了。现在又有人在叫嚷复古了，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要打倒的孔家店，又死灰复燃了。孔家店就是要我们好好儿当奴才，好好服从老爷们的反动统治。现在不是又有人在嚷嚷“读经尊孔”吗？不是又有人在搞“献九鼎”“应帝王”吗？

现在是民国呵，难道要我们倒退到封建朝代去吗？我要重喊打倒孔家店，我也相信我现在有资格说这句话。你们知道，我酷爱我们祖国的文化，我们的祖先确实创造了不少优秀的东西，正是为了这，我在那故纸堆里钻了很久很久，古董消蚀了我多少生命！我总算摸清了一点底细，其中有些精华，但也有许多糟粕，我总算认识了那些反动糟粕的毒害，而这些货色正是那些人要提倡的东西！同学们，现在大家又提出“五四”要科学、要民主的口号，我们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应外合地来彻底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第 287 至 288 页）

五月四日　“五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这天，西南联大放假一天。上午八时，全校召开国民月会，九时起举行由体育组与训导处合办之五四运动会。当地报纸曾预告云：“计有女子排球赛，联大对附中，上午九时于新校舍举行。男子排球赛，金刚对悠悠，上午十时举行。男子足球赛，金刚对悠悠，下午一时半于昆中北院举行。男子垒球赛，金刚对教职员，下午三时于昆中北院举行。教职员垒球队阵容为：投手马约翰，捕手汤佩松，一垒王厚熙，二垒侯洛荀，三垒王维屏，游山徐锡良，外野简辉波、牟作云、王英杰、邵子博、黄中孚等。金刚垒球队阵容为：投手梁敬章，捕手罗宗明，一垒罗宗兴，二垒赵景伦，三垒欧云鹏，游山马启伟，外野王大纯，伯铃，司徒穗卿，王增健，由其文等。金刚体育会举行五四运动体育表演，计有夺旗

比赛，金队对刚队，时间上午九时，骑象角力，金队对刚队，时间上午十时。拔河比赛，金刚对校警，时间上午十一时，均于新校舍举行。(《纪念五四运动，西南联大明日盛会》，昆明《中央日报》，1944.5.3) 晚，西南联大"文艺"壁报社在新校舍南区十号教室举行回顾五四以来的文艺晚会，总题目为"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先生和罗常培、冯至、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李广田等应邀到会。但这个会却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流产了。

九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联大热烈纪念五四》中说："是日晚，由文艺壁报主办的文艺晚会，特别请了八个教授主讲，预定的有闻一多教授讲'新文艺与文学遗产'、杨振声讲'新文艺前途'、朱自清讲'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冯至讲'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罗常培讲'五四前后新旧文艺的辩争'、李广田讲'五四运动的意义与影响'……这晚会相当热闹，一间小小的教室，在未开会前便挤得水泄不通。后来改到大阅览室举行。不过，在群情欣然下，是不是也有人觉得不耐烦，那是不得而知。总之，当冯至教授讲'新诗歌的收获'的时候，忽地窗子外面黑暗的角落里，突然人声嘈杂起来，接着大骂大叫，并敲打门窗，结果使讲演会简直不可能开下去，弄得许多参加晚会的校内外同学，都怏然散去。究竟这些在黑角落里喊叫的人为了甚么，联大同学大都有'心照'的味道。"

罗常培在《第一个五四文艺晚会的回忆并怀一多佩弦》中也提到这件事："一九四四年的五四，昆明西南联大的同学发起了一个文艺晚会，约请一多、佩弦、今甫(杨振声)、从文、君培(冯至)、广田和我担任讲演。会场是在联大新校舍南区十号——那是我们常常举行学术讲演的一个较大的教室。那天晚上我和一多、佩弦从福照街(余)冠英家里赶到，会场已经挤得满满的，外面还围绕着好几层。另外还有更多的学生跑到北区的广场上要求改到那里开会。可是已经在第十教室占了两点钟座儿的热心听众坚决反对。我和一多百般劝导无效，加上三青团的分子又乘机捣乱，于是这个大家渴望的晚会，竟至没有开成。"(《光明日报》，1950.5.4)

当时，会议的组织者程法伋、张源潜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还有许多是外校的)，为了应付局面，准备把会场改在图书馆。这个临时决定导致外面的人赶到图书馆去占座位，而十号教室内坐定的人却不肯动。为此，组织者又建议分两个会场开，演讲者辛苦些，两边各讲一次。罗常培同意了，但先生认为纪念五四应"是一个团结的会，应该合在一起开"，说着站起来。会场内的人一看，纷纷挤出去向图书馆跑去。当先生到图书馆时，外面也挤满了人，怎么也进不去。这时，冯至已开始讲演，电灯却突然熄灭了，显然有人破坏，会场骚动，主持会的李广田只得宣布改期举行。此刻，先生才发现罗常培没有同来。(张源潜《回忆联大文艺社》，《云南现

代史研究资料》第10辑，第51至55页）

这样的结局来的如此突然，大家毫无思想准备。先生提议大家一起去看看罗常培，于是，和杨振声、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几人往文林街罗家走去。一进门，先生首先检讨自己情绪激动，表示歉意。双方隔阂顿时消除，大家商量这个会一定要重开，一定要开好。（程法伋《闻一多与西南联大五四文艺晚会的流产和重开》，未刊）

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晚的情况："参加文学晚会，但学生为调整宿舍而闹口角，会议根本无法进行。今甫发火，莘田之女站在其父立场上也十分恼怒。一多被她弄得很尴尬。他们共同劝说学生和解，但一多的口气与莘田大不一样。当一多与我们一同去看望莘田并向他道歉时，他对此并不在意。"（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90页）

这次晚会的策划者马识途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原来我们就计划好的，在联大5月3日晚上历史学会召开座谈会后，接着5月4日就由中文系召开一个纪念五四的文艺座谈会。5月4日的晚上，还是在南区十号这个教室里，中文系按时举行座谈会，讨论五四以来的文艺，请了好几位教授讲话。这个会由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主持。闻一多教授也参加了。具体组织工作却是由中文系系会主席齐亮和我们一批进步同学在做。我们没有料到，专门讲文艺的座谈会，也来了这么多的同学，比前一天晚上来的人还要多。当然比前一天晚上来的'狗'也多得多。教室里实在容不下，只好请讲话的人站得高一些，以便站在窗外的同学也可以听得到。但是有的教授讲话声音小，外边的人在叫'大声些'。这时，那些也许早已奉命来捣乱的特务分子，便乘机起哄，大喊大叫，乱糟糟的，大家更听不清楚了。忽然，他们把电线割断，电灯灭了。怎么办呢？我们研究，决不能听任他们破坏，这个会一定要进行下去。可是主持会议的罗常培却说：'算了，今晚上的会结束了。'这一下激怒了闻一多，他主张在黑暗中也要把会开到底。我们商量，是不是拉到图书馆大阅览室里去开，那里地方大，灯又很亮。闻一多表示可以，可是罗常培还是不同意。闻一多这时有点激动，和罗常培吵了两句，罗常培更不高兴，以为有损他这个系主任的尊严，他硬宣布：'散会！'散会后，罗常培气冲冲地走了，闻一多也不高兴地回去了。大家也十分懊恼，开了这么个不成功的座谈会。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会一定要开，有这么多同学来参加，这是好事，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开一个更大的五四文艺座谈会。不过，这个会还是一定要由系主任罗常培来主持，闻一多也一定要请来参加才好。罗常培和闻一多之间有一点意见，怎么办呢？他们两个只要有一个不参加，就不宜开。于是我们第二天分头去做工作。闻一多的工作比较好做。我和齐亮去找他，跟他说明是'他们'（这两个字不用解释，他就明白是指的什么）有意的破坏，决

不能叫他们这么快意，一定要冲破牢笼，一扫联大的沉闷空气，把五四的传统发扬起来，把联大民主的旗帜举起来。他马上表示同意，但是他说：'罗先生生气了，他还愿意来参加吗？他不来参加，我也就不好来参加了。'是这样，罗常培当时思想本来要差一些，何况第二天就有人在散布谣言。罗常培还受到国民党教授的'好意'劝告。再加那天晚上闻一多说了几句扫罗常培面子的话。如果作为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不出来主持，作为只是一个教授的闻一多，当然不好出来主持。后来我大胆地对闻一多说：'要罗先生出来，除非闻先生你亲自上门去请他，同时解释一下昨天晚上的误会。'我没有想到闻一多一下就答应了，而且很天真地说：'马上就去。'我对他说：'最好让我们系会的负责同学先去找罗先生说，且我们还要商量一下怎么个开法。'于是我告辞出来，和齐亮一道去找罗常培，动以师生之情，说中文系开的这个会不过是讨论文学问题，如果开不成，中文系太没面子。我又说闻先生准备登门请教，商量继续开座谈会的办法。罗常培经过我们疏通，特别是听说闻一多要登门请教，更不好不答应。于是我们和闻一多一起去罗常培家里找他。甚至没有经过什么解释，他们二人就说和了。闻一多说，中文系要开一个更大的座谈会，并且多请几位教授来作报告，我们提出我们的想法，罗常培到底同意了。齐亮说：'一切具体的事由同学去办，老师们按时到会主持就行了。'闻一多要罗常培主持，罗常培却推闻一多主持，后来商定由他们二人主持，由他们人发请帖请教授，并由他们二人在民主墙上出通知。"（《马识途文集》第9卷《风雨人生》下册，第397至399页）于是，马识途等同学决定重开的晚会改在新教舍的大广场举行，除了安电灯，还借来煤气灯。会前两天，他们把以罗常培、闻一多二人名义出的通告，用大幅红纸贴出，不特轰动了联大，而且外校也轰动了。

同日　《楚辞校补》获教育部学术审议会颁发的一九四三年度（第三届）学术二等奖。重庆《新华日报》次日作了报道，标题为：《学术审议会昨日续开大会，选拔得奖作品和发明，闻一多朱光潜得二等奖，洪深得三等奖》。这次请奖的著作、发明及音乐作品共二〇三件。其中一等奖六人中，有西南联大两人，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哲学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社会科学类）。获二等奖者共六人，西南联大除先生《楚辞校补》（古代经籍研究类）外，还有朱光潜《诗论》（文学类）。西南联大获三等奖者，有高华年《昆明核桃等村土地语研究》（文学类）、郑天挺《发羌之地与对音》等论文三篇（社会科学类）、罗廷光《教育行政》（社会科学）。另，西南联大在自然科学类获一等奖者有杨钟健《许氏禄丰龙》，获二等奖者有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大气之涡旋运动》，获美术类三等奖者有张清常《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阴法鲁《先汉乐津初探》。（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3卷，第759至762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楚辞校补》获二等奖，有些人曾为此不平，但先生并不在乎，只是偶尔在闲谈时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他们发的那份'奖分'，到我手上的时候，还不够我买抄稿子的纸钱哩！"

二等奖奖金为一万五千元，按昆明《扫荡报》四月二十六日所报道的米价，可购糙米不足三石（上米每石七千元，中米六千八百元，红米糙米五千八百元）。

郭沫若当时为审查者之一，他见到了先生送审的书。他后来回忆说："这书在民国三十二年是得过教育部学术奖金第二等奖的，当时我也叨列为审查者之一人，因此我得以看见一多先生所亲笔校改的送审本，不仅在重要的地方有些删改添补，就连一个符号，一个字的偏旁结构，他都有仔细的改正（我现在手中的是'据著者手校本再校补'本，就是那时照着抄下来的，将来出全集时或许可供参考）。这种周到的负责任的态度，对于我实在是留下了很深刻而铭感。"（郭沫若《闻一多的治学精神》，北平《骆驼文丛》新1卷第1期，1947.8.15）

五月五日 晚六时半，出席昆明文艺界、西南联大国文学会、外国语文学会、中法文史学会等联合举办之第一届五四文艺节纪念晚会。当地报纸预告晚会地点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大草坪，由徐嘉瑞主席，先生与罗庸、尚钺、李何林、李广田、周钢鸣、闻家驷、楚图南、朱自清、常任侠分别演讲，先生的演讲题为《艾青及田间》。（《本市文艺工作者今举行文艺晚会》，《云南日报》，1944.5.5）昆明《扫荡报》报道，是日下午七时，先生应云南大学文史学会邀请，在该校泽清堂讲"庄子的思想背景"。但先生因参加第一届五四文艺节纪念晚会，故演讲移至下周进行。

五月七日 《九歌校释——东皇太一》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第十四期。此文为对《九歌·东皇太一》若干诗句之校释。

五月八日 四日流产的五四文艺晚会于是晚重开，组织者改为联大国文学会，主持人为齐亮等同学，地点改在图书馆前大草坪。大会主席由先生和罗常培共同担任，除了四日晚已邀请的冯至、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李广田教授外，又邀请了卞之琳、孙毓棠、闻家驷教授。到会者三千余人，不仅有联大同学，云大、中法大学和一些中学同学也来参加。这次晚会十分热烈，报载："有什么能够代表联大精神吗？记者认为就是今天这个晚会。你不见，在傍晚的时候，昆北街上，公路两头，就像潮涌般的人都向着新校舍奔去。这时可以用一句俗话形容：'山阴道上，络绎不绝。'真的他们有着远道朝山的行僧一般的虔诚与热望，而这会真也可以比喻做一座香火旺盛的圣地。过去有人说联大像一潭止水，而现在则是止水扬波，汹涌壮

阔。”（本报记者《浪漫的道路——记联大的文艺晚会》，《云南日报》，1944.5.9）

不过，也有人对先生批判文学遗产的态度不以为然。十日，吴宓从报上看到先生演讲后，在日记中写：“报载前日闻一多演辞，竟与我辈‘拥护文学遗产’者挑战，恨吾力薄，只得隐忍。”十一日，又在日记中写：“下午 1—2 时联大上课，见学生壁报，承闻一多等之意，出特刊讨论尊孔、复古问题，不胜痛愤，仍强为隐忍。”（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 9 册，第 258 页，三联书店 1999 年 3 月出版）

这天晚会，罗常培首先致开会词，接着便讲“五四前后文体的辩争”，冯至讲“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朱自清讲“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孙毓棠讲“谈现代中国戏剧”，沈从文讲“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卞之琳讲“新文艺与西洋文学的关系”，闻家驷讲“中国之新诗与法国文学”，李广田讲“新文艺中杂文的收获”，先生讲“新文艺与文学遗产”，杨振声讲“新文艺的前途”。（据《月夜下畅谈新文艺——记西南联大文艺晚会》，昆明《中央日报》，1944.5.10）这年的五四纪念，是联大乃至昆明民主运动重新蓬勃发展起来的标志。五四的大规模集会，在大后方也是头一次。

先生的讲演，经张友仁记录，以《新文艺与文学遗产》为题，于一九四七年交给吴晗。收入《闻一多全集》。文中说：

> 今天晚上在场发言的，建设新文艺的人物有八位教授（记者按：八教授为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杨振声），而我和罗先生（常培）是干破坏的，破坏旧的东西，……月亮出来了（闻先生指着初从云中钻出的满月说），乌云还等在旁边，随时就会给月亮盖住。我们要特别注意……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人阴谋破坏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文学遗产在五四以前是叫做国粹，五四时代叫做死文学，现在是借了文学遗产的幌子来复古，来反对新文艺，现在我就是要来审判它：中国在君主政治底下，“君”是治人的，但不是“君”自己去治，而实际治人的是手下的许多人，治人就是吃人！……中国的政治由封建而帝制，再由帝制而民治……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面有四种家臣：第一种是绝对效忠主子的，是儒家；第二种次之，是法家；第三种更次之，是墨家；而庄子是第四种，是拒小惠而要彻底的拆台的，但是因为有前三种人的支持，所以没有效果，后来，由反抗现实而逃到象牙塔中。辛亥以后，治人吃人的观念并没有打倒。管家人吃人，借了君子的名字。在五四，第四种人出塔了，他们要自己管理自己，管家的无立足余地了，但是他们仍旧可以存在的，不过不再是替

君子管而是替人民管了。可惜第四种人在塔外住不惯，又回到塔里面去了！那么前三种人又活跃了！但他们觉得新主子不如旧主子好，所以才有"献九鼎"啊！新主子一出来首先要打击五四运动，要打击提倡民治精神的祸因。后来他们发现民主是从外国来的，于是义和团精神又出现了，跟外国人绝交。现在谈第四种人，他们拼命搬旧塔的砖瓦来造新塔，就如有人在提倡晚明小品，表面上是新文艺，其实是旧的。新文学同时是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新政治运动，新文学之所以新就是因为它是与思想、政治不分的，假使脱节了就不是新的。文学的新旧不是甚么文言白话之分，因为古文所代表的君主旧意识要不得，所以要提倡新的。第四种人中的道家则劣处较少。新文学是要和政治打通的。至于文学遗产，就是国粹，就是桐城妖孽，就是骸骨，就是山林文学。中国文学当然是中国生的，但不必嚷嚷遗产遗产的，那就是走回头路，回去了！现在感到破坏的工作不能停止，讲到破坏，第一当然仍旧要打倒孔家店，第二要摧毁山林文学。从五四到现在，因为小说是最合乎民主的，所以小说的成绩最好，而成绩最坏的还是诗。这是因为旧文学中最好的是诗，而现在做诗的人渐渐地有意无意地复古了。现在卞先生（之琳）已经不做诗了，这是他的高见，做新诗的人往往被旧诗蒙蔽了渐渐走向象牙塔。

这次演讲，西南联大中文系刘晶雯同学也做了记录，兹录以参考：

今天的讲演者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建设新文艺和介绍西洋文学的；第二，我和罗（常培）先生是既不创作亦不介绍的。但是，负责建设的先生们不要太乐观。刚才罗先生说月亮要出来，现在果然已经出来了。但是，乌云在等着要把它盖上。建设是要的，但破坏也不能少。也许有一天人家不让你写，写了也不准看，我和罗先生就在尽保护之责，当打手。

今天有人提到文学遗产，他们的意思与卞（之琳）先生所说的"传统"不相同。"遗产"是"产"，财能通神，这是利诱；是"遗"，由祖宗遗下来的。中国人有祖先崇拜的观念，所以"遗"是有威胁性的。

"遗产"在五四前叫"国粹"，提倡文学革命者称它作"死文学"、"古典文学"等等。今日提倡"文学遗产"的，实在是要排外和复古。"文学遗产"实在是一宗赃案，我们今天就要来清查这赃案。

我们中国三四千年以来都在君主之下。"君主"就是以君为主，由君治人。但是实际上负治人责任的，是君主手下的管家们。我们几千年来实在都是官治政治。

这官治政治有过两次改变：第一，管家之罢工，发生于封建制度崩溃之

时。从楚狂接舆到庄子，就是。第二，帝政之拆台，辛亥革命和五四就是。

楚狂接舆和庄子们是不合作的，由不合作而不作，不立功而立言，成为文学家。不幸地，他们由反现实而至于逃避现实，走入象牙塔去。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例外的文人。

管家们可以分做四种：一、绝对的奴才，助主子行小惠的儒家。二、罢工后复工，助主子整顿家务的法家。整顿家务是好的，但为主子而整顿，却是要不得的。三、外庄内儒的隐士、名士。先摆臭架子，奇货可居，后作大官，此等人居心叵测。四、彻底拆台，彻底不合作，如庄子辈。此等人后来躲到象牙塔去了。他们的拆台，因为有前三种人在，所以不能发生作用。

辛亥后，君主虽然被打倒，但是管家们却不倒，他们依然要吃油水。因为要吃油水，感觉得有个君主才方便行事，于是有几次的复辟。

五四后，第四种人出塔了。但是那时虽然根本否认君主，但管家们仍出色，仍然可以替"尼"管。所以前面的三种，依然可以立足。第四种人渐渐呆不惯，看不过，于是又入塔了。

第四种人越往塔里钻，则前三种人越发活动自由。结果，人们觉得现在的"民之主"还不如旧时的"君之主"好，于是献九鼎。而第四种人亦觉新塔不如旧塔好，于是以旧塔的砖瓦作新塔。这样，儒家哲学、文学遗产、晚明小品便出来了。在诗的方面，似新实旧的有林□；在散文方面，则有林语堂。

前三种人活动，第一便要先打击五四运动。追源溯流，便恨起外国人来，于是义和团精神又出来了。

我们要知，新文学运动之所以为"新"，它是与政治、社会思想之革新分不开的，不是仅仅文言、白话的问题。旧文学的要不得，在于它代表君主这一套旧的意识，并不是它的艺术价值低。

我们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要出塔。我们要知道，所谓"遗产"，就是什么"国粹"，死文学、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就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文学当然要从旧文学发展而来，不必故意在嚷什么遗产不遗产。要嚷，就是有意要回到五四以前的旧路。

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成绩最好。这是由于新文学要求民主自由，而小说最自由。成绩最不好的是诗，因为过去旧文学中成绩最好的是诗，我们总是会在不知不觉间摹仿旧诗，有意无意地回到旧诗的路上去。如是，便不知不觉又走进旧的象牙塔去了。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破坏。最重要的，是打倒孔家店；再则摧毁象牙塔。这

两种东西是相因而至的，都是要不得的。（刘晶雯给编者的抄件，1988.3.4）

昆明《中央日报》记者在《月夜中畅谈新文艺——记西南联大文艺晚会》报道中，也记录了先生的演讲：

要建设新文学，破坏的工作不能停止。所谓文学遗产，就是五四以前的"国粹"，五四时的"死文学"、"古典文学"或"贵族文学"，都是几千年来君主制度下产生的东西，有人要利用这个新名词来复古，来排外，这是必得清算的。

几千年来的君主制度，君主是治人的，底下有管家，管家可分四种：有逃避现实的，如屈原、杜甫、韩愈、白居易等；有帮助主子严格整顿的法家；有摆架子的外庄内儒家；有彻底拒绝的庄子们。惟因前三种在拥护君主，所以庄子的学说不甚得力。五四以后，庄子派出了象牙塔，想抬出孔子出台，搬旧塔之瓦堆砌新塔，换汤不换药。

今天的文学口与政治合流，遗产是要不得的。我们还得打破象牙之塔，消除一切君主时代的产物，利用遗产而不是保存遗产地建设我们的新文学。（昆明《中央日报》，1944.5.10）

《正义报》记者在《在月光下——记一个三千人的文艺晚会》中亦记叙到：闻一多"带着诗样的音节，从政治背景指出中国社会的特点，又指出老庄一类的文人，并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上的四种人物：第一种是为主人管家的奴才——儒家；第二种是隐而后出的黄老法家；第三种是外庄内儒；第四种是抱有一些新思想，可是怀着投机心理的人。这四种人在历史上有不少的表现，可是，'五四'清算了他们的命运，我们今天不详细地说这些——闻先生特别强调地说：'五四'创造了新文学，现在的问题不单是白话文学的争辩，而是新文学要与政治思想打成一片，才能有左右社会的作用。闻先生沉痛地说明'遗产'之要不得，新文学要加紧的建设，但在现实的面前破坏的工作仍不要放松。同学们尽最大的力量向闻先生致敬，掌声盖过了一切的声音。"（昆明《正义报》，1944.5.10）

《云南日报》记者对这天的晚会也做了报道，对先生的讲话是这样记录的：

闻先生首先说他与罗常培先生是既不创造也不介绍的人，而是在做着破坏的工作，也就是替在创造及介绍的诸位先生把守大门，清除内奸，之后就说到正题上去。"遗产"一词，在五四前叫"国粹"，五四以后叫"死文学"，而现在则叫"文学遗产"。现在就有很多人拿它做复古及排外的工具。其实文学遗产是一件赃案，我今天就是来破坏这个赃案的。我国过去是君主专治，其中文中可以分成四种：（一）做奴才的儒家。（二）走终南捷径的法家。（三）外庄内儒的"隐士"。（四）辞而不干趟进象牙塔去的庄子等。前三者维持君主政治，

因此后一种人便无能为力。五四以后，第四种人出了事，但有些出来后又走回去了。有些则搬一些旧砖头去建造新塔（林语堂等即是）。前三者人一得势，于是打击民主精神，打击五四运动。新文学运动是与新文化新思想运动分不开的，因此今日我们更必需将新文学打入社会中去。所以我说"文学遗产"要不得，嚷嚷"文学遗产"的人是别有用心，现在我们必需彻底破坏，打倒孔家店，摧毁象牙塔。（本报记者《浪漫的道路——记联大的文艺晚会》续，《云南日报》1944.5.10）

会将结束，先生再次站起来发言。尚土《痛忆闻师》："先生第一次走到群众面前是在一九四四年联大国文学会举办的五四文艺晚会上，那天出席讲演的先生很多，所涉及的文艺范围很广，由罗常培先生任主席。将结束时，罗先生说：'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今甫先生，杨先生将到美国讲学。'在杨先生讲后，闻先生第二次上台讲话：'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在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最后先生提高嗓子高呼：'我号召大家第二次打倒孔家店！五四时候做得不彻底。'这是先生开始向民主进军的宣誓词。"（《人物杂志》第2年第9期，1947.9.15）

先生希望今后在联大应有更多的这种座谈会、讨论会，并向大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在月光下——记一个三千人的文艺晚会》，昆明《正义报》，1944.5.10）

对于先生的这种变化，有些人不理解，先生曾对华罗庚作过一次自白。华罗庚《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记得在四四年纪念'五四'的晚会上，一多先生面对反动师生的丑恶表演，十分愤激，他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从此，他开始由一位诗人、学者变为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的战士了。当时我们仍然住在陈家营，一多先生已经搬到昆明西城昆华中学去住了。有一次，我和他谈起他身上的这种变化，他激动起来，对我说：'有人讲我变得偏激了，甚至说我参加民主运动是由于穷疯了。可是，这些年我们不是亲眼看到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生活得这样困苦！我们难道连这点正义感也不该有？我们不主持正义，便是无耻、自私！'他又认真地告诉我：'要不是这些年颠沛流离，我们哪能了解这么多民间疾苦？哪能了解到反动派这样腐败不堪？'"（《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39至140页）

王康记得，先生在一次会议上也谈到过这件事。当时，先生说："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我确实挨过饿，正是因为我挨过饿，才能懂得那些没有挨过饿的先生们所无法懂的事情。正是因为我现在能够稍微吃得饱一点，有点力气，我就要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是不是这就是'偏激'，让那些从来都是吃得很饱很饱的先生们，爱怎么说就

怎么说吧。但是,我只知道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压榨光,自己再不出来说说公正的话,便是可耻的自私!"(王康《闻一多传》,第296至297页)

署名"钟"者曾在《我所知道的闻先生》中记述到先生在一次晚会上说:"个人的生活困难是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的,譬如我,学校里薪水不够养家时,我可以在中学校兼课,也可以替人家刻图章赚钱,个人的生活问题便解决了。可是你要想到大多数人,当大多[数]人民在被压迫,无法生活的时候,就必须,也只能用斗争来争取了。"(《文汇报》,1946.7.31)

五月十六日 《九歌校释》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文林"副刊第一期。这是对《东君》、《云中君》、《湘君》的训诂文章。

同日 在中法大学文史学会第二十次公开讲演做"庄子的思想背景"演讲。(据《学术讲演汇志》,昆明《中央日报》,1944.5.15)

是月 全家从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搬到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初,住在初中部学生宿舍,与何炳棣夫妇相邻。

先生搬到这里,是受聘为该校兼职国文教员,担任高中部三年级第二十七、二十八两班课程。时,日机轰炸已少,先生住在乡下,每周进城上课,往返四十余里,很不方便。恰西南联大历史系教员何炳棣在昆华中学兼课,受教务主任李埏(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兼昆华中学教务主任)委托,为本校聘请教员。何炳棣找到先生,先生畅快答应,条件是要两间房子。李埏向校长徐天祥一说,徐校长立即应允,派李埏向先生面致聘书。(据李埏《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云南日报》,1988.11.30)

先生名为兼课,但校长徐天祥却慷慨地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一石(100斤)平价米,和二十块云南通行的"半开"(两块"半开"合一个银元)。在昆华中学,先生主要讲授诗经、楚辞、史记和作文等。(据访问李埏记录,1987.11.20)

这次到昆华中学任教,何柄棣起了很大作用。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我在联大前后六年,除准备两次留美考试,回沦陷区料理家务之外,在联大真正清闲的岁月无多,平时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而闻先生又久居乡下,所以见到闻先生的机会不多。一九四四春间在联大新校舍遇到闻先生,他问我的近况,我告他为解决住的问题,我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虽只一间,宿舍楼固窗明,条件还可以。他说住在乡下本来是为躲避日机轰炸,来回二十余里往返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我立即把闻先生的意愿告诉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长),他和徐天祥校长喜出望外,立即决定以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楼上全部划为闻先生全家住处。我记得楼转弯处的平台还不算小,可以煮饭烧菜屯放松枝。楼外空旷,住定了后,闻师母开辟了小菜园,颇不乏田园风

趣。”何柄棣还说，为了表示感谢和为他赴美留学，先生请他吃了一次丰盛的晚餐：“由于这段时日里闻先生全家生活比较愉快，也由于我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不久即将出国，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其醇美香浓，使我终身难忘。在我由衷地赞赏之下，闻先生告我：‘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先生与何柄棣交谈时，还说到潘光旦和罗隆基的一段趣闻：“我记不清是这晚饭后还是在另一场合，闻先生曾对我讲过当年清华学堂同班潘光旦和罗隆基的趣事。闻先生原来比他们高一班，因坚持原则反抗校章而自动留级一年，所以与潘和罗同于一九二二年出国留学。未出国前有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甚么，我父亲是翰林！’闻师忙加了一句按语：‘你看他们够多么封建！’他讲完，我听完，同时大笑不止。”（何柄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 182 至 183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7 月出版）

在昆中上课，向同学们提倡关心社会。一次，高中部训育主任王云去听先生讲课，听到先生说：不要看古书，现在形势这样危急，多看看社会吧，我不是不让研究古典，但我有资格说现在不是研究古书的时候。（据访问王云记录，1987.11.23）

是月　约这个月里，先生还担任了北京大学研究生王达津的考试委员。王达津回忆到：“一九四四年我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时候，闻先生是答辩考试委员之一，就曾用楷书写详细评语于我的论文卷面，并加朱印。当时我是以金文、甲骨、《尚书》来论证古代人身代词的用法的，而闻先生却严勉以“应进一步研究典章制度。这一指示，就使我终身难忘。”（王达津《吾将上下而求索——学习一多先生治学精神》，《古典文学研究丛稿》，第 206 页，巴蜀书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

六月四日　《伟大的事实不朽的意义——给教导团诸君致敬》发表于昆明《正义报》“星期论文”专栏。收《闻一多全集》。时，国民党学生教导团第一团经昆明飞印度战场，在昆待机期间，曾请先生和潘光旦等讲演，昆明《民国日报》转载中央社讯云：军政部出国部队昆明集训营主任左叔平昨语中央社记者称，“该团二、三两营学生在昆休息期间，将请马主任崇陆、杜司令聿明，及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等讲演，并参观各处”。（《各界今晨联合欢送教导一团出征远征》，1944.5.30）这篇文章可能就是根据讲演整理而成。文章认为青年知识分子自愿投军报效祖国的壮举，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同时又批评政府当局没有任何表示，“没有同情，没有热，是麻木不仁？还是忘恩负义？”

六月六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两信。一为本系副教授许维遹、陈梦家晋升为教授事：

涵师校长道席：敬启者，本系副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二先生升任现职已届三年，并于教课之余肆力著述，初不以物质生活之清苦、图书设备之简陋稍改其志。许先生除完成其巨著《管子集释》廿四卷、《韩诗外传集释》十卷外，又尝致力于《尚书义证》一种，会通古训，发明辞旨，谊正文字，创获之多，盖自晚清瑞安孙氏以来，罕有其匹。至其《释黍》《飨礼考》二文，于古代礼俗之研究亦能辟一新途径。陈先生于研究金文之余，亦尝兼及《尚书》，而于两周年代及史实之考证，贡献尤伙。"年历学"为治理古文之基础，挽近学者渐加注意，实迩来史学界之一新进步。陈先生本其研究金文之心得，致力斯学，不啻异军突起，凡时贤所不能解决之问题，往往一经陈氏之处理，辄能怡然理顺，豁然贯通。要之，二先生数年来，不但于先秦典籍沉潜日深，且能处处利用新材料与新方法，故其成就乃得如此，一多于二先生之工作，深所钦佩，特征得本系教授同人之同意，拟请师座转呈聘任委员会，自下学年度起升任二先生为正教授，用励贤劳，而崇硕学，如何之处，敬竢卓裁。专此布达，祇颂道祺。

又一函为何善周晋为教员事：

涵师校长道席：敬启者，本系助教何善周，任职已届四年，尚属称职。对于研究工作亦有进步，拟请准予升为教员，以资鼓励。如何之处，敬候钧裁。祇颂道祺。

梅贻琦七月二十八日批示通过。

六月八日 清华大学召开迁昆明后第二十一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议决续聘先生与朱自清、王力、浦江清为中文系教授，改聘许维遹、陈梦家为教授。（据《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及部分材料》，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十四日 晚七时，文协昆明分会及各大学共十五文艺团体，在云南大学至公堂联合举行诗人节晚会。先生和罗庸、游国恩、徐梦麟、尚钺等出席，楚图南、李广田报告新诗成果。常任侠、田汉、冯至、光未然等诗歌朗诵，新中国剧社也有歌唱。（《文协昆明分会举行诗人节晚会，讲演屈原生平及作品》，昆明《观察报》，1944.6.14）

六月中旬 约这时，已经毕业的汪曾祺替比他低一届的杨毓珉写过一篇题为《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的读书报告，先生看了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当时，汪曾祺与杨毓珉都参加了一个剧社，为排一出新戏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就到期末了，杨毓珉因要应付多门课的考试，忙不过来，就请汪曾祺代写了这篇读书报告。先生对这篇读书报告的评语，朱德熙听到的，传到杨毓珉后，杨便找到先生说明实情，先生没有追究，依旧算杨的唐诗学习及格，还给了八十多分。（据汪朗、汪明、汪朝《"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第26、31页）

六月二十五日　《可怕的冷静》发表于《云南日报》"星期论文"专栏。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一篇言词犀利批判现实的杂文，它表现了先生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不满。说抗战已快七年了，可"真正饿殍恰恰就是真正的兵士"，"灾情愈重，发财的愈多，结果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贵的更加富贵"，"呼吁的声音海外比国内更响，于是救济的主要责任落在外人身上，而国内人士，相形之下，便愈能显出他们那'不动心'的沉着而雍容的风度了"。"一部分人为着旁人的剥削，在饥饿中畜牲似的沉默着，另一部分人却在舒适中兴高采烈的粉饰着太平，这现象是叫人不能不寒心的"。先生指出："非常时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审慎，而是勇气"，"民族必需生存，抗战必需胜利，在这最高原则之下，任何平时的轨范都是暂时可以搁置的枝节。火烧上了眉毛，就得抢救。这是一个非常时期！"

文中对青年的热情给予很高评价，认为青年"是撑持这天经地义"的抗战的"最有力的支柱"，"当年激起抗战怒潮的是青年，今天将要完成抗战大业的力量，也正是这蕴藏在青年心灵中的烦躁。这不是浮动，而是活力的脉搏"。当时，昆明的青年纷纷起来抨击危害抗战的黑暗腐败现象，持重者却用"冷静"、"审慎"劝告青年，先生对这种论调很反感，说"这不是冷静的时候，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调能与青年齐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

这篇文章在昆明发生了较大反响，联大教授的一些文章中常提到此文。直至次年五月十一日，《扫荡报》副刊还发表了汪洋的《冷静与麻木——读闻一多〈可怕的冷静〉》。

同日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及拉铁摩尔、范宣德、哈查尔参观西南联合大学。

华莱士二十日飞抵重庆，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访华。《新华日报》社论称"他的言论，他的文章，充满了对法西斯、半法西斯、孤立派和第五纵队的痛恨，洋溢着对战时战后国内国际的广泛的民主主义的热望。"二十四日，华莱士一行在宋子文陪同下飞抵昆明。为了向华莱士表示民主的愿望，王康、王子光、万禄等同学连夜赶制了大幅的英文壁报，这张英文壁报得到了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有些文字还是先生修改和润色的。拉铁摩尔把这张壁报拍摄了下来。王康回忆说：为了让中国人民的声音多少能够向外传播一点，西南联大七个进步壁报临时组成了一个"壁报协会"，决定联合起来出一个英文壁报。"时间很急促，得到消息说华莱士来联大参观，其中只有一天多的时间，同学们自己的力量不够，便去找一些英文较好的老师帮忙，可是有的借口时间太紧，有的干脆拒绝。大家都知道闻先生很忙，最后还是

只好去麻烦他了。他不仅帮助大伙写稿组稿，还亲自拉热心的教师参加这个工作，同学们在秘密的条件下，在学校附近文林街的一间小阁楼上，经过连续二十多个小时的紧张突击，把一张约高二丈宽四丈的英文壁报编成了。大家不顾疲劳，费了很大的劲(因为在土墙上钉这大的壁报没有经验也没有工具)，才把它'钉'在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壁报上端用红纸剪贴的大字标题是：'我们决心与世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战斗！'下端是：'我们要民主！'就在刚张贴好的时候，华莱士和拉铁摩尔一行人来到了。(王康《闻一多传》，第301页)

这张英文壁报产生了应有的影响。七月十一日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四十九号快报，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借欢迎华莱士副总统到昆明的机会，张贴广告，向副总统致敬，批评国民党'法西斯'，鼓励外国对中国的批评，并强调中国需要西方民主。"(中共云南师大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5辑，第7页，1985年8月印行)

华莱士一行在联大和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等处举行了座谈会，其中先生参加了某次座谈。寄思《忆闻一多教授》："华莱士来华，正在旧历端午节到昆明。在昆名流集会招待，我仿佛记得闻先生也在座，席间由端节谈到屈原。华莱士最后笑着说：希望各位先生不要投江。"(《文萃》第40期，1946.7.25) 八月九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致美国务院第一三六六号电报："据中国方面消息，昆明约有十名中国教授，在华莱士副总统六月二十五日访昆明时，同副总统谈话中表示了对重庆政策的不满，而被教育部开除。据说其中有五人是清华大学的，包括张奚若、闻一多、潘光旦和罗隆基。[①] 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博士，已奉命前来重庆述职，对他在此次非法谈话中有所牵连作出解释。"(中共云南师大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5辑，第11页)

同日 先生与高孝贞特请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彭兰来家共度端阳节，并提出愿收这位小同乡为自己的干女儿。

六月二十九日 暑假开始。

约这前后，参加设在北门街唐家花园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该会为华岗、周新民、楚图南、尚钺等人秘密组织，实际上是学习讨论会，对外也用西南学术研究会或西南文献研究室等名称。华岗是中共党员，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到昆明做龙云的联络与统战工作。此前，罗隆基到重庆，向中共提出相互联系问题，中共重庆办事处让罗回昆与华岗联系。这样，华岗开始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逐步开展工作，

① 罗隆基，曾任联大教授，但此时在联大已无教职。

先生便应邀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

楚图南在《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中，谈到他们对先生认识的转变："当时，我们当中一些同志对争取团结像闻一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有些偏见的，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了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于经史楚辞的研究。像他这样的人，能和我们走到一起来吗？就在这时，华岗同志给我们看过周恩来的亲笔信（用华的名'西园'），信的大意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周恩来同志实际上就委婉地批评和规劝了我们之中对闻一多等人不全面的看法，用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教育和提高了我们。正是这样，我们和闻一多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逐渐地了解他。在一定的时机我去看他，向他表明，有一位中共方面的朋友想来看他。闻一多立即热情地表示欢迎，甚至还急不可待地想会见这位朋友。这以后，华岗同志和闻一多之间有过多次开诚布公地促膝长谈。在闻一多长期的徘徊苦闷之后，他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文史哲》，1980年第4期）

尚钺也回忆到他们与先生谈话的情况，并商谈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等事："一多当时住在昆华中学的一个小楼里。第一次，我和楚图南以云南大学教授身份去拜访他。一多说他是卖苦力的，是手工业者，靠刻图章过日子。我们约定以后再谈，并留下话，说以后再来时给他介绍一个朋友。我们把谈话的情况向华岗做了汇报。华岗说，一多很热情，有爱国精神。第二次，我和华岗一起去看望一多，主要是一多与华岗谈，我没怎么说话。一多说他从长沙走到昆明，路中与农民接触，以前对农民不了解，现在感到亲切了。当时我们研究想在昆明文化界组织一个学术会，地址在唐家花园，一多当时就介绍了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楚图南介绍了冯素陶。罗隆基也由华岗介绍了进来，一共有十多人。起初漫谈世界政治形势，搞政治的人发言较多，如曾、罗、华、潘等。后来分题做学术报告，罗隆基讲欧洲民主（美国），一个月后华岗又讲苏联的民主。彼此间似乎针锋相对。第三次由一多做学术报告，题目是'说儒'，他说从字根上讲，'儒'有'而'字，就是软的，就是奴隶。说'儒'就是奴隶，奴隶捧其主子。这个报告比《全集》中那篇尖锐得多。"（访问尚钺记录，1977.10.26）

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是先生政治生活发生巨大转变的重要阶段。吴晗在《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中，记述到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活动："我们一些人秘密组织一个座谈会，成员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两个是共产党员。座谈的目的是学习党的政策和

分析时事，计划斗争。地点有时在一家花园里，有时雇一条船，到滇池漫游。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统一战线政策，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人民日报》，1960.12.1)

即使在这样严肃的聚会上，先生仍表现出一种诗意。李文宜《一多同志成仁周年祭》："记得在昆明西南文化研究会开会，您有次主张在唐公墓旁的竹林中举行，大家席坐在厚积的笋壳上，竹影中筛下零碎的日光，在每人衣襟上摇泄；其先，大家屏息静听某先生对于美国政策之分析，您在一群同志之中，时而背依修竹，闭目遐思，时而正襟危坐，怒目发光。接着讨论国内局势，您是多么坚决的主张人民应当对于反动者来一个干脆的严惩！您对于伪装民主的把戏，多么不耐和愤恨！……还记得又一次，您提议游海口，买一小舟，带了干粮，泛滇池，大家谈笑风生，将平日为工作为生活为政治等一切伤脑筋的枯燥生活和烦杂的万虑为之一洗。"(清华周刊社编《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第34页)

暑假中，在西南文化研究会作过一次中心发言，后以《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为题，发表于次年一月十三日昆明《民主周刊》第一卷第五期。

西南文化研究会下设主要搜集云南护国运动资料的西南文献研究室，地点也在唐家花园。唐家花园的主人是唐继尧的儿子唐筱葑，他特为研究室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西南文献研究室由吴晗主持，工作人员是两位西南联大学生，其中一位是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丁名楠。丁名楠回忆说：这间房子"室内桌椅齐全，窗明几净，还陈列了几架古书。室外花木扶疏，群芳争妍，几株山茶树迎风招展，开花时鲜艳夺目，惹人喜爱，环境确是美极了。""研究室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全靠吴先生张罗，闻一多先生从刻字收入中，也资助过一些。闻先生还为我们刻了一颗'西南文献研究室'的精致图章。"丁名楠还回忆说："我到研究室工作后，发现有人夜间或星期日在研究室开会，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明白吴先生联系的民主人士，常借研究室作为叙会的场所。原因是唐家当时在昆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国民党特务对它有所顾忌，没有敢于轻举妄动，进行捣乱，在那里开会比较安全。因此西南文献研究室对昆明的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活动起了某种掩护的作用。"(丁名楠《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编《吴晗纪念文集》，第117至118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

约此时，先生参加过"民社"，成员有楚图南、吴晗、周新民、寸树声、吴富恒、唐筱葑等。邵循正后来亦加入。民社原准备办个刊物，由吴富恒筹备，但未得当局批

准。(据访问吴富恒记录,1986.12.30)

是月　至昆明、呈贡间跑马山桃园新村建国中学,出席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并与师生合影。建国中学成立于一九四一年,由清华学校一九二二级毕业生、滇越铁路管理局副总工程师、云南大学教授李吟秋与甘济苍、王家璋、胡淑贞、吴融清等创办,西南联大教授萧涤非,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等在该校兼课,先生与吴晗、李公朴曾应邀来校演讲。(据李靖森《回忆父亲李吟秋教授》,《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第137页;李沛阶为闻一多、吴晗与建国中学师生合影照片的说明,1988月10月30日,云南省蒙自县文化馆藏)

是年上半年　应郭沫若之约,答应为《中原》杂志撰稿。张光年《为革命真理而献身》:"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我接到冯乃超同志从重庆来信,谈到他和郭老对一多的近况甚为关注,托我向一多致意问好;还说郭老要我向一多同志约稿,请他为《中原》(郭老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写稿,嘱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我把信拿给一多同志看了。一多笑着说:'这可得好好写。'事隔不久,他便写出了那篇内容精湛、富于创见的名篇《屈原问题》。"(《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

七月一日　致张奚若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这是一封思想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信。

在国统区掀起第二次宪政运动的高潮中,蒋介石曾声称准备实行宪政、结束训政。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洞悉到这不过是蒋介石愚弄人民的又一个骗局,于宪政讲演会上斥责国民党政府是历史上最反动的政府,由此受到围攻。先生的信,即对其斗争精神表示敬佩,并希望他再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同时还说自己正在写《八教授颂》一诗:

> 听说你曾在某处受过一次包围,并曾奋勇的从重围中杀出。可惜我没资格参加那会议的余兴,否则你知道我是会属于那条阵线的。有人替你担心,将因包围的影响而实行"改过自新",我说这是笑话。但我却真怕你会因包围而守住原来地点,而不再发动更猛烈的攻势。如果是那样,也就够叫人着急的了!久已想找你谈谈,老没有机会,话闷在心里,再加上周来滤魔的高温的力量,思想发酵了。整十五年没写诗,今天为你张奚若破戒了,就恕我拿你开刀吧。计划是要和教授阶级算帐,除你外,还有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和闻一多自己等七个冤家,题名曰八教授颂。屈你作陪,并坐首席,有两个用意,(一)春秋责备贤者,(二)这里有贤,也有真不肖,而且是天天要见面的,话过火了,太不好意思,如果有你作伴,人家面子上也好看点。我信得过你的度量与Scense of humor,所以敢于这样冒失。这于你实在无损于高

明，于别人却很有益处（当然最没有益处的是对我自己）。如蒙你同意，我就发表了它，检查不检查，是别人的事。

信中所说的《八教授颂》，只写出了序和《政治学家》。没有写完的原因，张奚若在纪念先生死难二周年所写的《一个报告》中说："一多，顺便再谈一件事，我很可惜你那篇《八教授颂》长诗没有写完，不然，虽然不敢说一定会'与别人有益'，但总可增加青年人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社会革命运动进一步的了解。假如你那篇原来可与《八哀诗》媲美的大作没有写成的原因是和我那天与你谈话有关，那我就真的追悔无及了。为了可能忏悔这一点，我现在想把你那封与这首诗有关的信发表，你大概不至反对吧！"（《北大半月刊》第8期，1948.7.20）

《八教授颂》的序诗《教授颂》和第一章《政治学家》的部分内容，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刊登于平津地区学联编辑的《诗联丛刊》第一期，收《闻一多诗集》。范宁一直保留着一份全诗，是先生长女闻名抄录，又经先生亲自修改过的稿子。此稿曾在家里朗诵过。全诗刊登于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编《北京盟讯》一九八六年第七期。全诗如下：

《序》

新中国的
　学者，
　文人，
　思想家，
一切最可敬佩的二十世纪的经师和人师！
　为你们的固执，
　为你们的愚昧，

　为你们的 Snobbery，[①]
　为你们替"死的拉住活的"挽救了五千年
　文化遗产的丰功伟烈，
请接受我这只海贝，
听！
这里
通过　辽远的未来的历史长廊，

① Snobbery，势利行为。

大海的波涛在赞美你。

（一）政治学家

伊尹
　吕尚
　　管仲
　　诸葛亮
“这些”，你摇摇头说，
“有经纶而缺乏戏剧性的清风亮节。”

你的目光继续在灰尘中搜索，
你发现了《高士传》：
　那边，
　在辽远的那边，
　　汾水北岸，
　　藐姑射之山中，
　偃卧着四个童颜鹤发的老翁，
　忽而又飘浮在商山的白云里了，
　回头却变作一颗客星，
　给洛阳的钦天监吃了一惊，
　（赶尽是光武帝的大腿一夜给人压麻了）
　于是一阵笑声，
　又隐入七里濑的花丛里去了……
于是你也笑了。
这些独往独来的精神，
我知道，
是你最心爱的，
虽然你心里也有点忧虑……
于是你为你自己身上的
　西装裤子的垂直线而苦恼，
然而你终于弃“轩冕”如敝屣了。

你惋惜当天没有唐太宗，

你自己可不屑做魏征。
你明知没有明成祖，
可还要耍一套方孝孺；
　你强占了危险的尖端，
　教你的对手掐一把汗。

你是如何爱你的主角(或配角)啊！
在这历史的最后一出“大轴子”里，
你和他——你的对手，
是谁也少不了谁，
　虽则——
　不，
　正因为
在剧情中，
你们是势不两立的——
你们是相得益彰势不两立。

正如他为爱他自己
而深爱着你，
你也爱你的对手，
为了你真爱你自己。

二千五百年个人英雄主义的幽灵啊！
你带满了一身发散霉味儿的荣誉，
甩着文明杖，
来到这廿世纪四十年代的公园里散步；
你走过的地方，
是一阵阴风；
你的口才——
　那悬河一般倾泻着的通货，
是你的零用钱，
你的零用钱愈花愈有，

你的通货永远无需兑现。

幽灵啊！
今天公园门口
挂上了“游人止步”的牌子，
（它是几时改作私园的！）
现在
你的零用钱，
即便能兑现，
也没地方用了。

请回吧，
可敬爱的幽灵！
你自有你的安乐乡，
　在藐姑射的烟雾中，
　在商山的白云中，
　在七里濑的水声中，
回去吧
这也不算败兴而返！

范宁在《附记》中又做了说明：“这是一多师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亲手改订的，也是先生最后写下的一首诗。原诗昆明某小报似乎发表过其中一部分。诗题《八教授颂》本打算写八首，但只写成一首。先生晚年从事民主运动，写了一些战斗性的散文，几乎没有写诗。这首诗中反映的思想感情，和先生前期诗作大不相同。诗中明显表现了他晚年的政治观点的转变，是一首很值得重视的诗。诗作的标题虽是指某位教授，但是这里写的是有代表性的，应当把作品中的教授看作某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不能只是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人。闻先生写诗时大学教授的政治态度，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追随反动的当权派，做坏事。一是代表进步势力，反对当时黑暗势力。再就是标榜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就是中国的‘高士’和西方的‘绅士’的混血儿，也就是这首诗讽刺的对象。诗中提到‘二千五百年个人英雄主义的幽灵啊！你带满一身发散霉味儿的荣誉。’这里，‘个人英雄主义’和今天的用法，含义略有不同，指的是脱离人民群众，自命清高。先生把这些人和反动派看作‘相得益彰的势不两立’，这在当时‘学者从政’的具体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表现闻先生对个

人英雄主义者的深恶痛绝，虽然他是从这个阵营中走出来的人。由于他要前进，而这些人却不前进，甚至后退，他认为这是'死的拉住活的'，传统阻止革新，因而他反戈一击更有力。他的责备和讽刺流露出一个革命者的激情。因循守旧是没有出路的，回头路是不能走的，在今天改革声中我们重读这首诗，还是很有意义的。"

七月二日 《龙凤》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第二期。收《闻一多全集》。

此前不久，先生收到一家新创办刊物负责人的征稿信，使先生发生兴味的是这刊物的名称叫《龙凤》。先生看了该刊《缘起》，认为"聪明的主编者自己似乎并未了解这两个字中丰富而深邃的含义，无疑的他是被这两个字的奇异的光艳所吸引，他迷惑于那蛇皮的夺目的色采，却没理会蛇齿中埋伏着毒素，他全然不知道在玩弄色采时，自己是在与毒素同谋"。先生说："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但是现在"图腾生物已经不是全体族员的共同祖先，而只是最高统治者一姓的祖先"，所以"龙凤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以至先生"看见'龙凤'二字，怎能不禁怵目惊心"。文末，先生说："非给这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其它不再太贪睡的话。"

七月六日 下午三时，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西仓坡五号本校办事处，举行研究生傅懋勉毕业初试，考试范围为"汉赋研究"。先生担任考试委员，其他委员还有游国恩、邵循正、沈有鼎、朱自清、浦江清、王力、许维遹、陈梦家、彭仲铎。

（据《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七日 抗日战争七周年纪念日。晚，先生出席西南联大壁报协会[①]和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三校学生自治会在云大至公堂联合举行的"时事座谈会"。

对于这天晚上的情况，当地报纸报道："昨天的'七七'在热烈的情绪中渡过去了，全昆明市最后一次的纪念行动就是云大学生自治会、联大壁报协会、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省立英专学生自治会联合举行的'七七'时事座谈会，地点在云大至公堂。同学们到的很多，里里外外最少也有三千多人，教授参加的有熊庆来、闻一多、潘光旦、杨西孟、邵循□、朱驭欧、潘大逵、蔡维藩、伍启元、沈有鼎、鲁冀参、冯景兰、李树青、曾昭抡，此外还有一位过去做过教授的罗隆基。一共是十五位。座谈会开

① 这个协会成立于1944年4月9日，在联大学生自治会未改选之前，该协会实际起着组织学生开展民主活动的作用。

始，首先由四学校联合的主席团某君致开会词，次即由联大王康按照讨论大纲请各教授发言。在未发言之前，又请大家站起来为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致哀三分钟，讨论的大纲是这样的：一，七年的回顾。（一）国际局势的变化，（二）国内局势的变化。二，当前局势，（一）军事的，（二）经济的，（三）文化的，（四）伦理的，（五）政治的。三，前途的展望。（一）国内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二）我们的责任。各位教授顺序发表意见，大体都认为放眼一看国际，觉得前途很可乐观，但是反视我们自己的国内，不容讳言的，缺点实在太多。一切缺点都可以归之于政治上去。因为我们还缺乏真正的民主，因此在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都有漏洞。而影响我们抗建的成功至深且巨，此后我们不应一味乐观，沾沾自喜，但是当然也不要悲观颓唐，我们应该集中在对外求自由，对内求民主的努力上。在各教授发言时，一到精彩的地方，同学无不热烈鼓掌，情绪紧张已极。直到十二时将近，大会才宣告结束。"（《四学府昨联合举行七七时事座谈会，参加教授十余学生三千》，《云南日报》，1944.7.8）

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昆明各大学学生联合举办的第一次政治性的大规模集会。潘光旦说："出席的多至三千余人，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景况的热闹，真是得未曾有。就昆明一地说，竟不妨说是空前的。"（《说学人论政》，《自由之路》，第361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9月出版）

晚八时，会议开始，全场起立向七年来抗战阵亡的将士默哀三分钟。会上讨论的第一个题目是"七年的回顾"，邵循正认为国家对这场战争的政治教育不够。蔡维藩认为美英苏在欧洲的合作的的确确是有诚意的。潘大逵专谈政治，"把话头转到浙江县长的贪污问题"。杨西孟谈经济，说"目下昆明的物价最高，已经一千多倍"。伍启元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经济问题是分配问题"。潘光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种人不是开小差的——前方抗战的兵和后方的农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开小差的。然而我们还不晓得害羞，还要说什么要为将来建国之类的说词。今后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些人东山再起。"陈友松认为"今天所谓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根本上都是教育的问题"。李树青"提出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即现在流行而又普遍的揩油问题"。第二个题是讨论政治，罗隆基发言说："所谓民主宪政，是民主包括宪政，宪政不一定包括民主，所以我们今天最好不要强调宪政，却可以多谈民主。但如果我们要争民主，首先就要争法治，就要像英国那样，任何人不能在法律以上。"（以上据吴地《回顾艰苦的七年——记四校七七晚会》，昆明《正义报》，1944.7.9）

这次晚会上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同时应否有政治的兴趣。罗隆基发言之后，云大校长熊庆来起来说明了三点：一、这次座谈会是学术性的，是寓纪念于学术的讨论，所以才来参加；二、认为中国的积弱

是由于学术不昌明;三、要救中国的积弱,要昌明学术,我辈做师生的人就应当每人守住他的讲求学术的岗位,孜孜矻矻以赴之,而不应当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例如政治商业之类。(据潘光旦《说学人论政》,《自由之路》,第361页)

会议进行中,主持人王康一再写条子请先生发言,先生只说是来听听。但听到熊庆来的这番话,忍不住站了起来。吴地在《回顾艰苦的七年——记四校七七晚会》中报道到:"当讨论程序进入了第三个题目的时候,云大熊校长立刻自动起来以数学家的眼光,与罗先生论变与不变的问题。沉闷了一段时间之后,闻一多先生站起来了,热情而激奋的嗓子,在掌声不断的雷动中,送入了每个青年的耳朵里。闻先生说:'刚才李树青先生的话应该修改,为赤子道长,老人道消;老人道长,赤子道消。我完全赞成潘光旦先生的说法。如果要我们研究,我们首先得要研究吃得饱。'"(昆明《正义报》,1944.7.9)

许湘江在《痛悼闻一多先生》中记述到:"七七纪念会上,闻先生以响朗的声音,富节奏的语调,忽徐忽疾地驳斥反动派侮蔑学生运动的谬论道:'有人说,近来昆明的学生又动起来了,是的,但是为什么?'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只知研究学问,向不与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文汇报》,1946.7.26)

王康在《闻一多传》中,也记述了先生的发言:

> 今天晚会的布告,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纪念抗战七周年的时事报告晚会,我对政治经济问题懂得很少,所以很有兴趣向诸位有研究的先生请教。但是,大家也看得清楚,有人并不喜欢这个会议,不赞成谈论政治。据说,那不是我们教书人的事情。
>
> 我,修养非常不好,说话也就容易得罪人。今晚讲演的先生,我们都是老同事,老朋友,有什么苦衷,大家不难理解,可是既然意见不同,我还是要提出来讨论讨论。
>
> 谈到学术研究,深奥的数学理论,我们许多人虽然不懂,这又那里值得炫耀?又那里值得吓唬别人?今天在座的先生,谁不是曾经埋头做过十年、二十年的研究的?谁不希望能够继续安心地做自己的研究?我若是能好好地读几年书,那真是莫大的幸福!但是,可能吗?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够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

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闹事”，我倒以为闹闹何妨！“五四”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也是学生“闹”起来的。请问有什么害处？现在我们还要闹！有人自己不敢闹，还反对别人闹；自己怕说，别人说了，呵，又怕影响了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前程。真是可耻的自私——那位先生连声申辩：“闻先生，您太误解我了，太误解我了！”他接着说道——没有！云南大学当局是这样的！我们西南联大当局还不是这样的！胆小，怕事，还要逢迎……这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第304至305页）

熊庆来是先生多年老友了，但先生没有顾忌这层关系，放了一炮。事后华罗庚去向熊庆来解释，熊说：“是训导长让我去的，我上了特务的当，我不该去，你见到一多，帮我解释一下。”先生知道后，也说：“当时不得不这样啊。自然，我讲话太嫌锋利了一些。”（转引自华罗庚《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41页）

纪念抗战七周年时，在昆华中学课堂上先生讲了一个“不怕炸”的故事。那是日机轰炸昆明最频繁的年头，城中人心惶惶，但武成路有家牛肉店却挂上显目的“不怕炸”招牌，叫“不怕炸牛肉店”。这饭店很有骨气，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为了表示对这家店铺的敬意，先生特意去喝了碗美味的牛肉汤。（据王明《回忆闻一多先生》，未刊；访问王明记录，1987.11.16）

七月九日　下午三时，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西仓坡五号本校办事处，举行研究生季镇淮毕业初试。考试范围为“魏晋以前的人品观念”。先生与汤用彤、罗常培、冯友兰、雷海宗、朱自清、浦江清、王力、许维遹、陈梦家为考试委员。（据《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同日　晚，参加新诗社诗歌朗诵晚会。到会者二十余人，大家团坐在矮凳上，轮流诵诗。每诵一首诗后便展开批评，先生也发表了关于爱国的责任和文艺的形式问题的若干意见。

王志华《一个诗歌朗诵晚会》记述到：“由一首怀恋母亲和家乡面对都市有点反感的诗展开了辩论。一方面说这样的情调是不谐协，对于母亲的爱和对社会的爱是两回事，科学的分析它，这两样情感不应表现在一首诗里。另一方面都以为由于中国的落后，中国青年对母亲对家庭的怀念常常很重，这种情感也不能厚非，是不必一定和国家民族的爱冲突的。导师[①]说：人生本来有两段，一段是爱母亲，一段

① 即先生。此文前编者按云：“文中所说的‘美髯导师’，是一位我国闻名的老牌诗人，来信说不愿把名字公开。”

是自己独立，去爱自己的家庭和社会，脱离母亲是一个年青人很痛苦然而是必须的过程。中国社会太多苦难了，这是中年人老年人的责任。成年人应该把这社会弄得很好，不用青年人来关心。然而今天成年人没有尽了这责任，却要青年——虽然是在大学生，照常理还应该是爱母亲的——过早地脱离了母亲的怀抱去操心国家的事，这是很残酷的。但是不能责怪青年，这是成年人不好。由一首写明为朗诵而作的诗，因而提出了一个问题：诗是否可分为朗诵诗和非朗诵诗的两种？一部分人说根据语言和文字应是一致的这一原则，所有的诗应该都可以朗诵，目前还有一些人写诗很难懂，但是假如写甚么诗的时候都准备被朗诵的，那么渐渐便要把难懂的字都去掉了，因此提倡朗诵诗还可以改进文字。另一部分人则以为诗除了音之美外，还应有图画之美，有些诗却不必一定都能被朗诵的，而且诗如果只有音乐之美那就编乐谱好了，何必要诗，而且文字无疑的是比语言更持久些更典型些，就是因为能使人更深远地欣赏了解，不是一下子就过去了，诗就是这样。由于这争辩还牵涉到诗的内容和形式，诗的对象，诗和歌的起源和它们的关系，最后还是由我们的导师结论。他说：朗诵诗的对象，是大家，是许多人在一起，这样就能互相认识和团结，单是这一点已经应提倡朗诵诗了，而且朗诵诗尤其应该朗诵给人民大众听，应该是他们的，今天，尤其要强调这一点，所以更该强调朗诵诗。但是渡过了这个难关以后，今天需要热情呼喊需要简单有力的诗句的人民，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的水准将被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将较有好些了优裕些，应该为今日所唾弃的图画美的诗，那时将会兴盛起来。而且为了争取今天那些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总是偏执着'诗应该是玄妙的'，他们看轻朗诵诗），所以为了改变他们，就应该采用他们的方式去说服。故此一直在今天图画美的也不可完全丢掉！"（昆明《扫荡报》"扫荡副刊"第143号，1944.7.19）

七月十日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邀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系主任以上教授开会，讨论《部颁课目表》修订事。吴俊升六月二十四日自渝来昆主持云南省公费留美预备班复试，并视察各高校与北平研究院。吴此行最主要目的，实际是征求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三校对改订高等教育课程标准的意见，为此文法科、理科、工科分别召开了一天会议。是日，文法科会议首先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召开，讨论文史各系课程标准，出席者十余人。（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15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会上，先生批评了一些学校的中文教学内容，并批评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吴宓说："闻一多发言，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独联大翘然特异，已由革新求合时代云云。又盛夸其功，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

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云。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这次会议从下午三时开到晚上九时，其间张奚若“发言最多，痛诋政府”。会后吴俊升宴请与会诸教授，共两桌。吴宓“因闻一多等暴厉之言行，心中深为痛恨，故以酒浇愁，痛饮多杯，又因积劳空腹（未进饭），遂至大醉，为三年来所未有”。次日，吴宓内火未消，至一友人家，“述昨会中闻一多等恶论，共嗟息久之”。（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9册，第290至291页，三联书店1999年3月出版）

七月十八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未发表。为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季镇淮原兼半时助教改为助教等事。信中说：“中国文学系助教朱兆祥拟不续聘，遗缺请以半时助教季镇淮递补。季君研究院毕业，初试已及格，其论文考试预计暑期后可以举行，目前只可用助教名义，一俟正式毕业后，则宜升为教员。如何之处，统希钧裁是幸。”（据《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十九日　西南联合大学召开第三〇五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决：“罗常培先生因事离昆，函请自本月二十日起给假一个月，并请准予离校期所有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暨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职，由闻一多先生暂行代理，应均照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时，罗常培准备赴美国讲学，先生仅允暂时代理其职，不肯延长，常务会遂于九月十三日第三一〇次会议，议决两系主任由北京大学教授罗庸代理。（同上）

七月二十八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为本校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王瑶补为半时助教事。信中云：“前奉一函，关于中国文学系助教进退事，有所陈说。兹因种种关系，略有变动：除助教朱兆祥不再续聘外，半时助教季镇淮因肄业年限已满，即将毕业，其半时助教资格当然停止。兹拟以研究生王瑶递补季镇淮所遗半时助教名额。此与前函所拟办法不同者，系前拟辞一助教，补一助教；今则辞一助教，补一半时助教，而以人数论，实无变动。专此陈请，谅邀道祺。”梅贻琦遂于当日批示：“照办”。（《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是月　《画展》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某期。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篇批评知识分子躲避现实的杂文，在当时发生了重要影响。未久，潘光旦即在《隐遯新解》中说：“不久以前，闻一多先生在《生活导报》上，对于当代的艺人与他们的开不完的画展，说过一些很严厉的责备贤者的话，大意也不外责备他们‘躲避现实’。躲避现实的又何止艺人呢！当代的学人，又有几个不躲避的呢？只晓得埋头在书本实验上的学人和只知道在丹青里讨生活的艺人又有什么分别呢？”

(《自由之路》,第354页)先生在文中还提出了抗战时期要什么样的艺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说:

> 艺术无论在抗战或建国的立场下,都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这点道理并不只你风雅人士们才懂得。但艺术也要看那一种,正如思想和文学一样,它也有封建的与现代的,或复古的与前进的(其实也就是那人道与非人道)之别。你若有良心,有魄力,并且不缺乏那技术,请站出来,学学人家的画家,也去当个随军记者,收拾点电网边和战壕里的"烟云"回来,或就在任何后方,把那"行尸"的行列速写下来,给我们认识认识点现实也好,起码你也该在随便一个题材里多给我们一点现代的感觉。

文中还说到这前不久的一个深夜,在大西门外路遇一美国军官,先生与他攀谈起来,表示对政府消极抗战的不满,说战争"没开始的只是我们"。

是月 《愈战愈强》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某期。收《闻一多全集》。

一天早上,先生看到一张报纸,有篇报道衡阳之役的消息题为《我军愈战愈强》。先生读后"气昏了","气得一顿饭没吃好"。旋,《生活导报》来约稿,先生便写下这篇文章。

是月 费孝通自美国讲学归来。先生见到他,即指出他上年所写的《鸡足朝山记》中流露的思想是消极的。说该书中"留恋在已被社会所遗弃的职业里,忍受着没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中,虽则有时感觉着一些雪后青松的骄傲,但是当我听到孩子饥饿的哭声,当我看见妻子劳作过度的憔悴时,心里好像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要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的句子,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无可奈何的一种想法"。先生还说:"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而且钻进故纸堆,就像你们知道的,听任丑恶去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结果呢?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费孝通《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46页)

八月十八日 下午,参加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举行的座谈会。

暑假中,西南联大与昆华女中部分同学,以云南基督教青年会宣传队名义,慰问滇军系统的暂编第十八师。暂编第十八师驻地与第五军驻地接近,于是顺便慰问了第五军。第五军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一个机械化部队,军长邱清泉出身黄埔军校,曾留学德国,是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于是提出邀请西南联大教授开个座谈会,何孝达便回校请了先生等十一位教授。是日下午五时,先生与冯友兰、陈雪屏、杨西孟、华罗庚、刘崇鋐、邵循正、曾昭抡、马大猷、陆钦墀、吴晗等教授,暨假期服务

队队员，在第五军军部举行座谈。第五军方面参加座谈会的为军长邱清泉、代师长罗思扬、昆明防守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宋文彬、第五军特别党部书记长刘雪松，昆明《扫荡报》社长李诚毅，及军部各处、科长等多人。

座谈会上，邱清泉首先致词，强调"文武合一"的重要意义。继由罗代师长报告讨论大纲，在"目前形势与中国反攻问题"题下，介绍了"军事方面"、"其它方面与军事的配合"两个问题，包括东亚战场、国际路线的打通、中国反攻应采之战略、反攻所需要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影响、建立新军所需要的文化与教育、如何动员民众帮助作战、其它方面的分析与探讨等。

接着，由各教授发言，冯友兰继之发言，提出现在的问题是须使士兵吃得饱，敌我伤亡为一比五，主要是营养问题。曾昭抡认为目前政治尚未上轨道，是否军人对政治亦可有所主张，现在政府对军人待遇最薄，而又难于对政治发言，实应有改善之必要。杨西孟则认为必须征有钱人的子弟入伍，才能使有钱的出钱。陈雪屏也提出应当让文人和武人合在一起，对各种问题都能说说话。大约七时半，先生站起来说：

> 兄弟什么都不懂，只有用文学精神提起大家的情绪。今天各位提出各种问题，如果在英美有一于此，一定会举国哗然，而我们百美俱全，仍然只是一些有心人坐着谈谈。现在好比是房子失火，大家要来抢救。以前我们看一切都可悲观，还希望也许在战略上有点办法。今天在这里听见各位长官的话，才知道战略上也很有问题。我只差要在街上号淘大哭。我们可怜到如此地步仍然在座谈。在英美不是没有坏人，只是他们不敢作坏事，一作坏事，大家群起而攻之。因此也没有什么讨论的，只有干，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干。(《目前局势与中国的反攻问题——第×军高级长官、联大十一教授座谈记录》，《云南日报》，1944.8.19—20)

先生讲过，刘崇鋐、华罗庚、马大猷、邵循正和昆明扫荡报社社长李诚毅及同学代表也相继发了言。吴晗在发言中说："恐怕大多数部队不能得到好的营养，战死的人远不如死于不合理的黑暗情形者之多，如保甲长利用兵役法上下其手，使多少农家子弟破产。师管区为送兵机构，亦不免有少数军官以送兵为生财大道。接兵部队亦有许多长官因生活费用不够，在士兵身上想办法。这许多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军队便无从改善。一切重要的焦点在政治，不在军事。"(《目前局势与中国的反攻问题——第×军高级长官、联大十一教授座谈记录》，《云南日报》，1944.8.19—20)

会后吃饭时，邱清泉见先生和冯友兰均蓄有长须，称二位年高德劭，请入上座。吴晗插话说："错了，德虽劭而年不高。"(吴晗《哭一多》，《新华日报》，1946.7.8) 座谈会

会末由冯友兰作结论，至深夜十一时方在阵雨中散会。

关于这次座谈会，当地数家报纸均有报导，其中《扫荡报》报道如下：

第×军司令部因学生假期服务队，到达该部服务之便，特于前（十八）日下午五时邀请联大教授冯友兰、陈雪屏、闻一多、杨西孟、华罗庚、刘崇鋐、邵循正、曾昭抡、马大猷、陆钦墀、吴晗暨服务队队员，举行座谈会，军部方面出席者有邱军长清泉，第×师罗代师长思扬，昆明防守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宋文彬，第×军特别党部刘书记长雪松，本报社长李诚毅暨邱军军部各处科长等多人。座谈会开始首由邱军长以主人地位致词，继由罗代师长报告讨论大纲，题为"目前形势与中国反攻问题"，嗣各教授暨各长官相继发言，末由冯友兰教授作结论。座谈时间达五小时余，全体精神□彻，情绪热烈，散会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邱军长：邱军长致欢迎略谓：此次诸位同学到敝部文化慰劳，复蒙诸位老师光临指教，实感无上荣幸。中国社会文武合一向不能一致，此次全面抗战，乃有文武合一的趋势。我最高领袖复有文武合一的训示，我们应循此方向努力，作到文武合一，国力方能充分发挥，今天是很好的机会，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各抒高见。

罗思扬：罗代师长思报告讨论大纲：一，军事方面。[（一）] 在东亚战场，敌之兵力分散在东三省、中国本部、缅甸、太平洋四个战区，战场辽阔，不相联系，且以其海空军劣势非特兵力转运困难即交通补给亦发生问题，此其所以欲求打通大陆交通线以图最后挣扎。现盟国在太平洋发动攻势，已迫近日寇本土，缅甸方面盟军反攻亦有进展，密支那克复，腾龙指日可下，中印路线即可打通，敌最近在豫湘各地蠢动复遭阻遏，故敌企图，即将幻灭。（二）国际路线的打通，目前我国国际路线正努力打通者为滇缅路与中印路，此两线为与盟国联络最有可能的路线。此外，尼米兹将军主张在中国海岸登陆，如能实现，将较陆上运输力为更大。惟西北方面，有现成之线，惜目前尚未能利用。（三）中国反攻应采之战略。敌有继德国败亡后，立即投降可能，但亦有在其海空军失败后，在大陆挣扎到底的可能。全面反攻，应自各方面予敌打击，使敌无挣扎喘息余地。（四）反攻所需要的军事力量。敌在大陆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所以我们须作最后的最大的努力。要有充分装备训练的新军××万人，在反攻时在战斗力火器各方面压倒敌人。二，其他方面与军事的配合。（一）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影响。（二）建立新军所需要的文化与教育。（三）如何动员民众帮助作战。（四）其他方面的分析与探讨。因包括范围广泛，希望

雒尽量发挥。罗氏对问题，认为建国必须建人，建人必须从教育着手，教育为建国建军的根本，可使人力发挥最大的效用。

冯友兰：盟国反攻顺利，敌人马上可以崩溃，但崩溃前必作最后挣扎，我们必须作战至最后的准备。太远的问题不必谈，目前急待补救的是军队的营养问题与医药问题。印缅远征军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战斗力增强，反攻胜利是其兵例（案：原文如此）。反攻力量一点一滴均须珍护，士兵显得（案：原文如此）就即多一人，不得求即少一人。

邱军长：以滇西战场为例，我之反攻还需要大量重武器。

罗思扬：由于医药，人才与医院设备的缺乏，前线医疗较多困难，尤其是运输工具缺乏是不能苛责医院人员的，北非作战有汽车三十余万辆，是造成大捷的重要因素，现代战争打的是后方，所以必须多方的配合。目前国军部队长要分心去筹划柴米油盐，照料士兵生活，以求其能吃得饱，过去的缺点，人事没有完全尽到，也是其中之一。

曾昭抡：军人与政治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是军人绝对不得干政，如德国军人之被纳粹利用，一是军人干政，如我国民初，军阀，美国军人选举权问题，讨论很久，已争得一部分，军人既有国民资格，即应享有投票权。

宋文彬：目前兵役问题是国民道德问题，衡阳作战能持久，是由于中国的国民性与中国军队的服从性。

杨西孟：提出两点具体问题。（一）战费的筹措，是财政问题，后方十数省，有百分之十至二十富有者能负担□费，军队开支即可增加十倍。（二）兵役，应征知识分子，特别是富家子弟。

陈雪屏：抗战以来，文人与武人最苦，出力最多，以后应做到文武合一，多多提供意见。

邱军长：内线作战利在各个包围，外线作战利在破围歼灭，其间关系最大的是战斗力。此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为外线作战，进行攻势达顶点后，盟军转为外线，德国成内战，普鲁士的传统战略精神，原为内线作战，但仍不免于失败。是因为战斗力与武器的关将（案：原文如此）。德日武器不如盟国，必然失败。我系来（案：原文如此）可自制重武器，战斗力将大大增加。我如以□□万新军配以重武器，可在反攻中，求决战求胜利，击溃敌之战斗力。至于养□问题，营养卫生等事，我们第×军平时均可设法解决，如找代用品，开眷属工厂等，但行军时即较困难。

闻一多：对目前问题，希望大家用文学精神，把情绪提高，只是自己不做

坏事，不管别人，这种独善其身的态度还是不够的。

刘崇鋐：对当前战局，提出几个问题：（一）豫湘作战形势紧张但能抵住，最后迫敌在湘暂停，原因何在？（二）敌今后动向如何？我有办法阻止否？能否在德失败前阻止日寇？（三）敌最后到大陆作战，对本土断绝能否维持？至于建军问题，如何能充实力量，战后保障国际平等地位？

邱军长：第一个问题，敌军力损失，武器损失，指挥官也需要调整补充，故无力续进。第二，敌今后企图，1，如打通粤汉路，可接广东向海洋补助海上运输。2，如犯湘桂路，到柳州后，或自南面镇南关出犯，并以策应缅甸作战，但这条路困难甚多，如一年后才能打通，盟国胜利之局已定，敌即无能为力。究向何处，敌自己亦不能决定，美国进攻快，敌自保不遑，不敢向大陆蠢动，美国进攻缓，敌或再图一逞，欧战早日解决，英美援军到达，即可击溃敌人。至于大陆战事可以支持多久？中国是世界的一环，盟国以整个力量对付，敌决难支持长久。我陆路打通，战斗力加强，敌即将被迫撤退。

吴晗：营养问题即为民族生命与生存活力着想，亦应注意改善，新兵待遇，基层政治机构，送兵机关，接兵部队均应负责。政府法令如能逐条实行，中国军队对抗战建国都能有大贡献。

华罗庚：要文武合一，人才应充分利用，训练新兵，大学教授也应到军队里参加，效率定能提高，战斗力定能加强。

马大猷：我在《中国之命运》中读到，我们缺乏组织力，一个人好不如十个人好，要多数人好，必需有组织力，大规模事业才能完成，解决国家整个问题，最重要的是组织。

邵循正：我对战局比较乐观，敌占衡阳，是小矶继续东条政策，在太平洋失败中安定国内人心。反攻日本，需要盟国全面配合，美国战略转移意见以先攻菲岛及在中国登陆两派为主，而以后者最有力，美如在我海岸登陆，我即应求配合。至于我国目前问题，是法治问题，要各方上轨道，当不惜严刑峻法。至于建军，我主张应有中心，即完全用知识分子。

李诚毅：衡阳作战能坚持许久的原因，主要是军队的素质与指挥官的决心，这次的□守，是外援部队不能迎头赶上，民众未能充分给予应有的慰劳与崇敬，实远不如沪战初起时民情之高涨，这是值得吾人注意的一桩事。至于将来敌人之动向，在我湖南野战军力存在一天，交通未复以前，敌人实不易谈□其他，倘使延到明年，敌人在我战场即无能为力矣。

同学代表：我们今天做了文武合一的桥梁，很是荣幸，以后希望各位官长

与各位先生多多联系。

邱军长：教授学生应组研究团体向政府贡献意见，学生作实验以改善政治，对国家定多多贡献。

冯友兰：战争胜利已无问题，目前的形势，一，盟国胜利之局已定，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已定，国际发言地位已经提高。关于刘崇鋐先生所提战事问题，我想起了河南名宿胡石青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日本用兵如老太婆点灯"，这个比喻最妙，灯油一面燃，一面蒸发，如上海之战，延长至三月，就是这个问题。最近湘省之战也是如此。衡阳守四十七天，关系太大，可以说简直救了中国，军队作战的要素，是物质和精神，确切的说是组织与兵器，战争有如围棋，今以棋喻这，我方仿佛一片大围棋，但无活眼，有被提可能，但在未被提前，对外也在影响，提出时间大有关系。敌人提必须走很多步，□时气已短，来不及了。欧洲军事解决后，飞机可以集中攻日，海空联合解决日本海军，胜利之势已成，太平洋上美海军对日已为二对一，将来全部调到，日本即毫无办法。至于日本将来移至大陆作战，我认为不可能。战争二要素中，组织的根本是政治，兵器的根本是工业，工业迁移损失必大，日寇在东北与朝鲜工业基础脆弱，将来作战，盟国兵器上是占绝对优势的。衡阳一战，□遭阻遏，局势已大变。印缅国军进占孟拱密支那，盟国已知中国军队装备营养充足，即可制胜，今后反攻，这方面必有改善。至于中美英苏四大强国的关系，今后定可日益密切。民主国家政策即定，即难变更，盟国团结绝无问题。当前战争的结果，盟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决不会拖长，因为战争已无不可知的因素，双方实力对比，已很明显，德日绝难抵住盟国的攻势。其次谈到建军问题，兵役问题所在，不尽是道德，最重要的还有利害与法律，法律应规定有钱有地位有发言能力者的子弟从军，这样有了缺点便有人讲话，征兵的办法最好是平等普遍的抽签，这样，人人对兵役都有直接关系，都有责任感，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特别重大。新军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定将完成反攻与建国的任务。

谈到此，夜已深，这富有意义的座谈会，在阵雨之后宣告结束。(《文武合一的桥梁——记军官与教授座谈会》，昆明《扫荡报》，1944.8.20)

对于此则报道中先生所说的"对目前问题，希望大家用文学精神，把情绪提高，只是自己不做坏事，不管别人，这种独善其身的态度还是不够的"，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则记述为："以前我们看到各方面没办法，还以为军事上有办法。刚才听了各位长官的话，方才知道军事上也毫无办法。……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闻朱年谱》，第48页)

多年后，时任第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吴思珩，对这次座谈会召集原因及经过，亦有回忆。其云：早有一九四四年，西南联大闻一多、潘光旦等教授“平素对青年学生的言论颇为偏激，经常诋毁中央，破坏政府威信。”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感到省政府、省党部（负责人褒承潘）、军队特别党部（书记长楼兆元）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高云裳）等，虽负责党团工作，但对这些人不敢斗争，只有附和。于是，邱清泉问他：“西南联大被共匪渗透，打着民主同盟的招牌，究竟有哪些教授，其思想言论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可否设法去了解他们？”研究结果，让吴思珩与和查良钊接头，由邱清泉出面邀请这几位教授参加座谈会，希望从座谈会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们的态度。“座谈会在卅三年十[八]月间于北较场举行，军方除邱军长、我，还有罗友伦、宋长治（当时为军法处长）共四人，教授有闻一多、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座谈会以邱清泉为主席，讨论题目为反攻问题，当时日军正在攻打衡阳。座谈会中主席简单报告后，杨西孟以经济学专家立场发表很多对当前的财经问题看法。闻一多却不发一言，主席则无论如何要他发言，因为此会主要的目的就要了解他的思想态度。几经敦促后，他终于说道：‘今天谈军事反攻问题，政治、经济各方面当然有关，但应以军事为首要，而在座则以主席为军事权威，在我发表意见之前，容我请教主席几个军事问题。’他随即问了四个很厉害的问题：‘第一，衡阳是不是能守得住？第二，如果守不住，日军是不是继续前进？第三，如果继续前进则往哪一方向，是广西还是贵州？第四，如果往这个方向，则可能打到哪里？’对于这种问题，邱军长首先声明：‘如果以我本身职务的立场，我是一个军长，为了军事的机密性，即使知道了，我也无法答复你，但好在今天是一个学术性的座谈会，我姑且以研究问题的性质来谈谈。’他随即坦率地答复：‘第一，衡阳守不住！’当时衡阳是二〇七师（方先觉）防守，邱军长以日我双方装备实力等着眼，说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日人当然继续前进；第三，根据军事地理分析，继续前进以贵州之可能多于广西；第四，可能打到独山。’这是军长以军事眼光所作极为确切的结论。闻一多听完站起来，终于说：‘今天我们各方面的专家都有，而军事方面只有主席是唯一的权威，现在听了主席的结论之后，我们谈反攻问题还谈什么呢？老实说，今天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已经没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造反！我们唯一还存有一点点希望的只剩下军事，而今连军事都已没有希望，日本人一打，我们就没办法守，那我们还谈什么呢！那么，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全面的造反，全面的革命！’在一个革命的营地里，他叫着要革命、要造反，其思想言论之偏激已可想而知。在座其它人都以惊奇恐慌的神色看他，既然要‘全面造反’了，座谈会也开不下去了。吃中饭的时间，年轻的罗友伦（时为上校团长）拿着一杯酒敬他：

'闻先生,我敬你一杯酒,你刚才说得很对,今天我们青年必须走一条路,你是知名的学者,应该指导我们青年人,究竟我们应该走哪条路,请你告诉我们!'罗逼问他,闻一多一时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不知如何作答。他的目的当然不是走三民主义的路,最后不欢而散。我补述这一段的目的,乃是要使后人了解西南联大当时师生的思想状况。当时西南联大的民主大同盟受了共党的渗透而成为其外围,从这个座谈会中他所发表的言论里,可以了解其激烈的程度,此后我们对西南联大闻一多这批人特别注意。"(《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昆明学潮》,《口述历史》第8期,台湾"中央研究院"1996年出版)

这时先生的喊声越来越大,声音传到了重庆,臧克家在《文化战士——闻一多先生》中说:"两星期以前,碰到了一位联大刚毕业的学生,他向我报告了闻先生的一些消息。他说:'闻先生胡须尺长,而火气很盛,一般同学都很敬重这位"老当益壮"的文化战士(除了别具心肠的少数);有一次当大众演讲,他高声大叫:"砍我的头,我也要说!"那气概太动人了!'"(《云南晚报》"夜莺"副刊,1944.9.7)

八月二十七日　罗常培来访,谈五六小时,内容为西南联合大学本年度下学期的课程安排,并详细讨论个人研究计划等。

是月下旬　昆华中学教务处教学组组长、中共地下党员汪国桢来看望先生。见先生一家住在二楼楼梯旁的小房内,很是拥挤,便找徐天祥校长商量,把坐落在校西南角的卫生室拨出两间给先生住。新居是座两层小楼,屋外有小湖,环境满不错。为了表示谢意,迁居后先生请汪国桢吃饭。(据汪国桢《回忆闻一多先生》,《重庆日报》,1980.7.29)

是月　由于吴晗的介绍,认识了新考入西南联大的洪德铭(季凯)同学。洪是中共党员,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编队时,为第二纵队新三团政治处副主任。皖南事变中被俘,后虽逃脱却失去组织关系。是年春洪到昆明,通过中学同学王念平的关系住进联大学生宿舍。在准备投考联大期间,因听历史课而认识了吴晗,经过几次交谈,洪诉说了他被关入集中营的经历,得到吴晗信任。吴遂介绍与先生。洪德铭在"七七时事座谈会"上,曾见先生驳斥熊庆来的即席发言,为有机会相识于先生而高兴。(据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10月间,吴晗接受洪的推荐,吸收联大同学严振、萧松、王念平等参加西南文献研究室的剪报工作,洪、严等与先生、吴晗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九月一日　致臧克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七月三十日,《新华日报》刊载昆明消息说:"联大教授潘光旦、闻一多等人,有部令解聘说。"臧克家闻知此事,关心地来信打听,并写了诗《擂鼓的诗人——呈一多先生》和一篇文章一起寄来。

先生复信说：

> 暑假快完，未曾休息，最近才摆脱一切，到乡下来小住。城里传来谣言说我又被解聘，你的诗文都送到，你的信也转来了。劳你又一度虚惊，现在可以告慰你的是：并无其事。本系主任要出洋，学校还在拉我出任主任呢，你们那边却在传我解聘，岂不滑稽？但是你在诗文里夸奖我的话，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但也不希望朋友们替我过事渲染。我并不怕撞祸，但出风头的观念我却痛恨！

关于解聘先生的说法颇多，社会上也十分关心。九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特别发表了消息《极力主张民主的闻一多教授因故解聘》，说："联大教授闻一多和其他教授一人，现已因故解聘，联大同学及清华大学校友，现正发起接济闻氏生活费，使他能继续研究写作。"九月十日，《云南晚报》刊登《闻一多教授解聘说不确》，云："目前陪都方面盛传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另一教授，已因故被解聘，记者特走访该校当局，据云并无其事。同时该校本学期开学在即，课程单内列有闻一多教授所授之课程。"二十日，《新华日报》在《昆明点滴》中云："不久前昆渝都传说解聘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联大同学闻讯，很为愤慨，特为此事出了壁报。后来听说教部虽有解聘令，联大当局却没有接受，大家才释然。"

九月二十日，《新华日报》刊载了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于五日写与该报的一封信，说明先生并未被解聘。罗的信上说："顷阅贵报九月四日第二版载有'闻一多教授因故解聘联大学生募款接济'之新闻一则，殊与事实不符。本人于八月二十八日来渝，在临行前之一日，曾在闻教授家畅谈五六小时。关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下半年度课程之编排，以及个人研究之计划，均有详细之讨论。且本人主持联大中国文学系已历五年，从未闻教育部及学校当局有示意解聘教授之举。倘使当局于教授研究及教学成绩外，有类此之命令，本人亦当以去就力争，不能坐视学者尊严之沦丧。闻教授学问品格，海内共仰，西南联大倚畀方殷，贵报所载新闻，显系采访失实。素仰贵报记载正确，主张公道，务请将此函披露，以免淆乱听闻至幸。"

这件事，还引起国民参政员的关心。九月九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口头询问时，周炳琳说："最近报载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被部方解聘，绝无其事，盖'教授思想行动越轨，有法律制裁，教部不致干涉'。"（本报记者立华《参政会席上》，《云南日报》，1944.9.15）

尽管如此，十月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还是刊登了国民党当局不许重庆《新华日报》登载的"免登稿"，题为《慰问闻一多先生》。文云："据传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

被解职了。解职的原因是什么，还不明白，但真正的原因却也可以心照。闻先生近年来忧时之念很深，一股正义的热情，更使人感动。当今的学者以国家民族前途为虑的人虽很多，但能够像闻先生这样正直敢言的却还少见。闻先生主张民主，主张青年打破沉寂，这都是针对现实的正论。虽是一部分顽固者流所不乐闻，但是居然因此不容于时，却也出人意外。可见月黑天低，现在正是夜气浓重的时候。我们不仅为先生的被黜而惋惜，尤其是为社会的正义抱屈。鸡鸣不已，而风雨如晦，青年们真应该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①]!"

在解聘先生之风声盛传的时候，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许师谦去看望先生，两人的对话很令人感动。王一(许师谦)《哭闻一多先生》："一九四四年八月，谣言纷纷，传说联大要解聘几位教授，特务已准备刺杀他们。大家很焦虑，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一个静寂的晚上，我到昆华中学的楼上，找到了他的卧室：摆着两张床，他一只手拿着馒头啃，一只手在磨石章，笑着说：'这是我的副业——靠小手工业过活。'沉默了半天，终于我说明了来意：'我以你的学生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他瞪着眼，半天，泪珠濮濮的掉下来：'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重庆《新华日报》，1946.7.25)

约这个时候或者晚些时候，国民党曾让先生的一个堂兄拉先生去教育部当官。这个堂兄属CC系，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是遭到先生的痛斥。了解这件事的黎智说："蒋介石曾经通过我那个叔父去收买闻一多，让他到教育部去当官，他结果写了封信，把我那个叔父痛骂了一顿。"(《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闻一多〉电视连续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谈话》，《黎智纪念集》，第512至513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同日　《诗与批评》发表于李一痕主编的《火之源丛刊》第二、三集合刊。收《闻一多全集》。

当时人们对"什么是诗"有两种对立的认识，一种认为"诗是不负责的宣传"，另一种则认为"诗是美的语言"。先生把前者称为"诗的价值论者"，把后者称为"诗的效率论者"，说："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对的。因为单独的价值论或是效率论都不是真理。我以为，从批评诗的正确的态度上说，是应该两者兼顾的。"文中还说：

> 负责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了，我们为了诗的光荣存在而辩护，所以不能不要求诗的宣传是负责的，是有利于社会的。……政府派诗人做负责的诗，一个

① 《可怕的冷静》是先生的一篇文章，见是年六月二十五日条。

纪念，叫诗人做诗，一个建筑落成，叫诗人做诗，这样，好些诗是写出来了，但结果，在这种方式下产生出来的作品，只是宣传品而不是诗了，既不是诗，宣传的力量也就小了或甚至没有了，最后，这些东西既不是诗，也不是宣传品，则什么都不是了。

先生认为重要的是对诗进行批评：

我以为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诗我们都要。我们设想我们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方，那末里面可以有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歌德、济慈、莎士比亚；我们可以假想李白是一味大黄吧，陶渊明是一味甘草吧，他们都有用，我们只要适当的配合起来，这个药方是可以治病的。所以，我们与其去管诗人，叫他负责，我们不如好好的找到一个批评家，批评家不单给我们以好诗，而且可以给社会以好诗。……

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的价值了。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成为 Society of Individual，Individual for Society（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

从目前的情形看，一般都只讲求效率了，而忽视了价值，所以我要大声疾呼请大家留心价值。有人以为着重价值就会忽略了效率，就会抹煞了效率。我以为不会。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不要以为效率会被抹煞，只要看看普遍的情形。我们不是还叫读诗叫欣赏诗吗？我们不是还很重视于字句声律这些东西吗？社会价值是重要的，我们要诗成为“负责的宣传”，就非得著重价值不可，因为价值实在是被“忽视”了。

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他的。诗人掘发出了这原料，让批评家把他做成工具，交给社会广大的人群去消化。所以原料是不怕多的，我们什么诗人都要，什么样的诗都要，只要制造工具的人技术高，技术精。……

最后，先生还特别强调：“我们需要懂得人生、懂得诗、懂得什么是效率、什么是价值的批评家为我们制造工具，编制选本。”

这篇文章，是这年夏天在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所做的一次同名演讲，记录者为赵令仪。魏荒弩回忆说：“一九四四年夏，闻一多应冬青文艺社之邀，作公开演讲，题目是《诗与批评》。赵令仪作为一名听众，一面听讲，一面笔记，记录稿简明扼要，异常整洁。然后把稿子交给我，让我拿去发表。当时我们在《枫林文艺》和《诗文

学》已经发稿付排，来不及编入了。适逢重庆李一痕兄向我组稿，便立即把这篇演讲记录稿寄给了他。这就是后来发表在《火之源丛刊》(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二、三合刊上的《诗与批评》。但据我所知，这篇记录并未经闻先生过目。一九四七年朱自清先生主持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并登报公开征求闻先生佚稿，我遂将这篇已经刊出的文章寄给了朱先生。闻一多先生的这次演讲之精义得以流传，应该说，赵令仪功不可没。"

魏荒弩还说，先生将赵令仪的《马上吟》收入《现代诗钞》后又做的批评，只是一种"风趣的调侃"，因为该诗是赵"留在世上为数不多的诗篇中最有名的一首"，但其浪漫笔法"不过是诗人之想为现实服务的一种艺术追求而已，当然还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魏文又说：每逢集会，只要有闻一多出席，赵令仪必去参加。(魏荒弩《感旧二题——并以纪念闻一多先生遇难50周年》，《随笔》1996年第3期)

时，魏荒弩在昆明东方语专任教，与常任侠、葛白晚、包白痕、薛诚之等结为"百合诗社"，自费出版了64开毛边本的《百合文艺丛书》。先生曾"欣然刻了一方阴文篆书的石章相赠，印文为'百合诗社'"。魏怀疑"这颗稀世之印，今后还是否能重见天日"，实际上这颗印章的印模保存在先生的自编印谱中，文为"百合出板社"。

九月五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并代转陈梦家请假一年函，时，陈梦家经费正清联系，受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约请，将前往教授古文字学并主持研究工作。先生曾明确表示不赞成陈此时出国，认为国内的事更紧要。但陈觉得机会难得，执意赴美，先生便不再说什么。(据访问范宁记录，1988.12)　王康回忆说：当闻一多安贫乐道，依然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的时候，也有些人却忙着活动到美国去'进修'，还有人劝他也不妨活动活动，何必如此吃苦。闻一多对这种言词虽然厌恶，但他还是尽力成全了这些人，为之在校内外作好安排，并指出：我们过去享的福太多了，现在吃点苦也是应该的。要是大家都忙着去享福，这学校也就甭开门了，要是大家都跑出去，还抗什么战？"(王康《闻一多传》，第208页)

九月十日　晚，参加东北同学会组织的"九·一八"纪念座谈会。是日《云南晚报》消息《明日九一八纪念》："联大、云大、中法三校东北同学会，订是晚七时借联大昆北食堂举行座谈会，讨论东北现状等。已邀闻一多、张奚若、吴晗、潘大逵、傅恩龄等十余位教授参加。"

先生到会时全场鼓掌，署名"钟"者在《我所知道的闻先生》中说："暑假，渝昆一带曾盛传教育部要解聘闻一多教授，全昆明同学都为这件事感到悲愤担忧，直到'九·一八'纪念晚会上，大家看到闻先生照常穿件旧大褂，带根手杖进来了，才明白这不是事实，大家高兴起来，全场五千余人一齐鼓掌，连续达三分钟之久。"(《文汇

报》,1946.7.31)

这样的座谈会当时举行的很多,先生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和先生相处多年的赵仲邑对这一点很深:"从一九三六年考进清华大学中文系,直至抗战胜利复员,闻一多先生为了争取民主而壮烈牺牲的一九四六年为止,在清华园、湖南南岳、云南蒙自、昆明,听过闻先生许多课,参加过好几十次闻先生的学术报告会,或有闻先生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座谈会以至茶话会、聚餐会等,从没有见闻先生迟到过。这在我的老师、同学或同事当中都是少见的。"(赵仲邑《闻一多先生最讲认真》,《精庐小札》,第20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九月十三日 西南联合大学开学,十八日正式上课。这年度,先生给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文学组三年级讲授"专书选读"(庄子),给语言组三年级讲授"中国语文学专书选读"(尔雅)。同时,继续与赵仲邑合开大一国文。(据《西南联大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同日 下午,西南联合大学召开教授会议。会上梅贻琦报告数事,蒋梦麟报告参加红十字会湘桂视察情形。遂选举本校第七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结果计张奚若、燕树棠、叶企孙、钱端升、潘光旦、闻一多、陈雪屏、刘崇鋐、刘仙洲、陈岱孙、朱自清诸先生当选,冯文潜、李辑祥、杨武之、张景钺诸先生候补当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原则,每年度选举教授代表参加校务会议,共同商定校中大政方针。先生此前曾被提名数次,但这次是首次当选为教授代表。

会上,又选举教授会书记,先生当选。(据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档案室藏)西南联大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教授会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教授会书记相当于教授会的秘书长。从形式上说,学校重大事情,要由教授会讨论决定,教授会书记的职责是开会时担任记录,平时负责教授会与校常务委员会、评议会的联系。这个职务实际工作并不多,主要似乎是资历、荣誉、威望的反映,过去在北平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都是很讲究这一套。

九月十五日 赴梅贻琦便宴。同席者有莫泮芹夫妇、陈梦家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吴宓、吴晗。时,陈梦家将赴美讲学,梅贻琦设宴欢送。(据访问范宁记录,1988.12)

九月十七日 下午一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下简称"文协昆明分会")在民众教育馆大礼堂,召开第四届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响应重庆文协总会关于援助贫病作家募集基金事项,并改选理事、监事。先生虽从未参加过文协昆明分会的活动,但由于受到人们的信任,被推选为理事。本届理事还有楚图南(高

寒)、常任侠、李何林、徐梦麟(嘉瑞)、凌鹤、光未然(张光年)、白澄、吕剑、赵沨、马子华、杨东明、范启新、罗铁鹰、杨亚宁;候补理事有尚钺、李广田、魏荒弩、欧根;监事有包白痕、林慧、冯素陶、张宗海、花新人;候补监事为彭桂蕊、虞慕陶。

次日,昆明各报报道文协昆明分会改选情形,均把先生名字排在第一位,这是几位朋友坚持让记者这样报道的。彭桂蕊回忆:"我曾亲自听到楚图南、徐梦麟、李何林诸位先生不约而同向记者建议道:闻先生我们几个中,不论那个的选票多几票或少几票没关系,但发表时一定要请将闻一多先生的名字写在第一位。"(彭桂蕊给编者的信,1988.5.24)

这次文协昆明分会恢复活动,是与重庆全国文协总会号召开展援助贫病作家的活动密切联系的。七月十五日,《新华日报》刊登文协总会"为援助贫病作家筹募基金缘起",中云:"抗战七年,文艺界同人坚守岗位,为抗建之宣传,勗军民之忠勇,曾未少懈。近三年来,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政府当局虽屡屡垂念,时赐援助,而一时之计,未克转死为生,且粥少僧多,亦难广厦尽庇。苟仍任其自生自灭,则文艺种子渐绝,而民族精神之损失或且大于个人之毁灭。用特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由本会组织委员会妥为保管,专作会员福利设施之用。一元不薄,百万非奢,爱好文艺者必乐为输将!"九月八日,《云南日报》在《援助贫病作家,展开募集运动》报道中登载了重庆全国文协总会致文协昆明分会的信函。中云:"总会此次遵照六届年会决议案,发起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各方无不热烈响应,良深感奋。查抗战以来,作家固守岗位,从事民族解放事业,七载于兹,任劳任怨,唯民族解放是从。年来生活益形艰苦,贫病交迫,几达绝境。若仍不设法自救,则制造供应人民精神食粮之作家,行将无法生存,其影响民族精神之巨,何可言喻。贵分会与本会辱齿相关,呼吸与共,尚望酌量当地情形,展开此项运动,勉力捐募,俾收更大效果。"

老舍于九月六日在重庆北碚写信给昆明的李何林,请他在昆明发动援救贫病作家活动。十三日,老舍的信在李何林主编的《云南晚报》"夜莺"副刊全文刊登,信中说:"昆明本来有文协分会,不知今日还有人负责没有;假若你愿意,可否邀约闻一多、沈从文、罗膺中、游泽丞、章泯、凌鹤、光未然、魏猛克、王了一诸先生谈一谈,有没有把分会重新调整一番的必要。假若你太忙,无暇及此,那么就在便中遇到章泯和凌鹤两先生的时候,告诉他们一声,看他们有工夫出来跑跑没有。假若我不打摆子,我必会给他们写信的。"

在后来开展的文协活动中,与李何林建立了友谊。田本相在《李何林亲历闻一

多遇害始末》说:"何林先生和闻一多最初的接触是在他受老舍之委托,重新调整文协昆明分会和开展对贫病作家的募捐工作期间。先生以为自己一开始就插手分会的重组工作,作为一个外来人,可能阻力很大。闻一多原来就是分会的负责人。为此,何林先生专门去拜访了闻一多先生,想不到闻先生是那么诚恳热情,那么容易接近。他们谈得格外投机,颇有一见如故之感。闻一多先生反而鼓励何林先生大胆工作,他说:'昆明分会太涣散了,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又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工作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你不必有何顾虑,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吧。'闻一多先生以自己的行动支持何林先生的工作。当改选时,他和一些朋友力主推选何林先生为理事和监事,并担任总务部的主任。'"(《中华读书报》,2003.7.2)

九月二十日 当选为文协昆明分会常务理事。《昆文协分会推定常务理事》报道云:"二十日晚,召开首次联席会议,讨论大会付予执行之案件,至深夜始散,并推出常务理监事。常务理事为闻一多、徐梦麟、高寒、常任侠、马子华,并公推徐梦麟为理事长;常务监理为包白痕、花新人云。"(《正义报》,1944.9.25)

同日 《关于儒·道·土匪》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周中专论"栏,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一篇结合现实的杂文,文章首先指出"中国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历史记录"。先生引用了英国学者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中的一句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先生说"假如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这不但没有损害韦氏的原意,而且也许加强了它"。接着先生分析了儒、墨、道三派思想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其"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病"。说:"封建社会的组织本是家庭的扩大,而封建社会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权式的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它的基本原则至多也只是强权第一,公理第二","儒家思想便是以上层阶级的立场所给予那种秩序的理论的根据"。"然而父权下的强制性的秩序,毕竟有几分不自然,不自然的便不免虚伪,虚伪的秩序终久必会露出破绽来,墨家有见于此,想以慈母精神代替严父精神来维持秩序",但是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于是秩序便愈加解体了。秩序解体以后,有的分子根本怀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诅家庭组织的本身,于是独自逃掉了,这种分子便是道家"。先生用一个大家庭的子女都长大成人,互相争论如何维护家庭秩序来作比喻,说其结果儒、墨成了死对头,"道家因根本否认秩序而逃掉","实际是帮助了儒家的成功"。因此,"在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中,道家还能存在,而墨家却绝对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夫中,便一变为游侠,再变为土匪,愈沉愈下了"。这时,

所剩下的儒与道，“更可以合作了”，合作的方案就是互相转换，“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所谓‘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隐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层的境界。在这种合作中，权利来了，他以儒的名分来承受，义务来了，他又以道的资格说，本来我是什么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称他们为偷儿和骗子，能算冤曲吗？”先生在文末说：“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在中国人看来，三者之中，其实土匪最老实，所以也最好防备。从历史上看来，土匪的前身墨家，动机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帜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的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

九月二十一日　开学后第一次讲授“庄子”。听课的人很多。张源潜在日记（未刊）中写到：“‘庄子’有那么多人听也是‘解聘’谣言的功劳。”

“庄子”讲授情形，寄思在《忆一多教授》中回忆到：“我旁听闻先生讲授‘庄子’，这一课程每星期两小时，连接着排在一个下午，旁听的人很多，有同学，有职员，还有年青的哲学教授沈有鼎先生。沈先生是每次必到，旁听的人也一直不衰，济济一堂者大约二百人。”“闻先生讲书，一字一句的考证剖析，都详细谨严，他自己亲手抄写一本《庄子》，把别家的注释和他自己的发现与见解都写在上面。但这种踏实的工夫并不曾使他陷于学究式的烦琐，他屡次提醒思想与时代的关联，要从战国时代底社会、政治情况来理解《庄子》。他认为《庄子》一书，正反映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士’的悲哀。他说：‘庄子所处的时代，士底出路是作官，作官实际上是作统治者的走狗，内而榨取民众，外则争夺别国的土地人民，夺取之后来同样地榨取，你想要洁身自好也不行，非要你帮凶不可。你愈有能力，愈要利用你，但即使作帮凶，也不一定能够自保：人君随时可以杀你，不管你帮得好不好。商鞅就是一个例子，士大夫阶层在这个时代最惨最惨！有思想、有个性、有灵魂的士，只好装傻，这就是所谓‘佯狂’，用装傻来排遣苦闷，用装傻来躲开政治，并且在心理上以藐视政治的清高来自作调适：‘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当时这种有思想、有个性、有灵魂的士，心境其实是很苦的，有时恐怕也不免凄凉之感。闻先生讲到‘相呴以湿’这一句，说他们的精神上或受着窒息与饥渴，彼此间只有如涸辙之鱼：‘相呴以湿’。‘相呴以湿’便是相互用口沫来想解除彼此的口渴。今天中国有思想、有个性的知识分子，自然是走着和当时的士不同的道路，但在横遭迫害与摧残之时，除了从民众的觉醒上看出前途，坚持信心以外，相互的同情与应援也成了重要的安慰与鼓舞：这也有类于‘相呴以湿’啊！然而，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呢？闻先生提出了这一个问题，他自

己回答,那是因为时代所限:不要忘记了那还是贵族统治着奴隶的时候。可是他们还得生活在社会中,尽管他们厌恶这社会。这使他们感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于是,采取了这样的处身之道:处乎才与不才之间,有用与无用之间;于是,为了求得心理上的调适与精神上的平静,发展了对于自然宇宙的虚无,狂放的幻想,转而暗示人生社会的有限事物之渺小与不值得计较;发展了贱视肉体,响往残废的观念,把'六骸'看作精神所寄寓的空壳,认为身体残缺不全的人反倒可以减少世俗的牵连,以保持精神的完整;发展了对于生的淡漠和对于死的赞美,'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到这里生只成了手段,死才是目的,当一个人去吊唁死者,说'而已反其真,我犹为人猗'。我记得闻先生带着极大的感慨来解释这两句:'你死了好啊,我还留着受罪!'甚至更'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闻先生指出这已经不只是同死生,简直是厌生而欲死了。——所有这些构成了庄子思想的要点。对这些思想,闻先生一语破的地说:'这完全是自欺,是逃避','陶醉在幻想中是很美的,但是也很惨,人总是能在生活上、意志上有具体的自由的好。'知识分子的这种悲哀,闻先生以为早在孔子的遭遇中就已开始表现出来,到战国时代又表现在屈原的遭遇中,但在庄子的精神和思想上是取得了另一种表现。闻先生在讲授《人间世》篇之时,指出儒家和道家的分别之一,在于儒家首先要为人君,其次是全身,而道家是首先要全己身,对人君则很淡薄,很少有像是一家人的感觉。道家可能是儒家的积极精神在现实上碰壁之后消极退婴的结果,是一部分儒家或潜在的儒家在特定环境中的演变。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怎样呢?闻先生以为,大致是而且应该是:离庄子较远,接近于而且超过了儒家,今天的国事,不是帝王一家的事,而是全体人民自己的事。闻先生讲庄子,常常引用马叙伦先生的注释,也有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商榷。有一次引用郭沫若先生的解释时,闻先生顺便提起:'有些拘谨的学者,很不以郭先生的见解为然,而且说他胆大与轻率。好,这些学者先生们一次都没有错,因为一句离开前人见解的话也不曾说过,这种过分的谨慎如果是怕说错了影响自己已成的学者之名,那却未免私心太重,这样谨慎了一辈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整理上最后还是没有添加什么。而郭沫若,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说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正,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文萃》第 40 期,1946.7.25)

九月二十四日 昆明文化界人士在李公朴家里举行"文艺的民主问题座谈会"。参加者有楚图南、李公朴、李何林、章泯、尚钺、张光年、吕剑、赵沨、白澄等。先生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张光年到家中征求意见,并把先生的谈话记录下来,后以

《论文艺的民主问题》刊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文汇报》，收《闻一多全集》。文中说：

座谈会上的报告和各位先生的发言，我大体上是同意的。谈到文艺家和民主运动的问题，有人说一个文艺家应该同时是一个中国人，这是对的；就现在的情形看来，恐怕做一个中国人比做一个文艺家更重要。因为现在是抢救的工作，不能太慢了。我甚至还怀疑，就是现在的作家，在写作以外，实际生活的政治程度是不是够高，恐怕还是问题。政治工作较文艺写作更难，正像在前线冲锋肉搏较之在后方的工厂中做苦工更难一样。更进一步地说，如无冲锋经验而描写前面冲锋故事，因体验的不真切，写出的也一定没有力量。——这是一个生活与写作的老问题。

没有民主运动的实践，一定创造不出民主主义的作品。假使在英美的社会，作家自己如果不做民主的战士，由于社会周围充满了民主的空气，作家也许可以用观察来弥补。在中国缺少这种空气，自己不做便体验不着，观察不到。写作的问题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人的火候到了，写出的东西自然是对的。——这样的说法，同时也解答了第二个问题——文艺作品如何反映民主主义内容的问题。

诚如大家所指出的，目前还有许多有知识有成就的文艺家，本身还站在民主运动之外，他们的生活与写作甚至有了反民主的倾向。对于这些人，大家主张，除了加强劝导之外，还要加强理论上的批评。这点我是赞同的。我还主张，应该无情地打击。目前在进步的朋友中间，委曲求全的思想还是很盛行。我以为社会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在大变革的时期，一定需要大牺牲，不能顾忌太多。政治上的委曲求全，我是了解的。但我还是要坚持，在文艺工作上，委曲还是应该有限度。我想，我们理想的本身，就是一首诗，今天应该坚持这种精神，不要要求成功太切。中国人自来是善于委曲求全的，用不着我们再来宣传这种思想。

关于如何创造民主主义新文艺的问题，我想先提出形式问题来谈谈。前些时何其芳先生有信来，说起张恨水的小说在重庆很盛行，他认为这个形式（章回小说的形式）很可利用，并问到我的意见。我所想到的，是最接近我们的这个圈子，智识分子的圈子。——对大众自然应该给予教育，好在他们是一张白纸，没有成见，新形式也许一样可以接受。至于智识分子和学生，问题最多，挑剔相当厉害。所以艺术技巧方面，是要极力提高。旧形式恐怕打不到他们的面前，恐怕还是要用西洋最高的东西，才能打动他们。我看那些容易和民众

接近的地方，问题倒比较简单，比较顺利；我们住在大后方，不可忽略了后方的另一面。这里才是苦海，周围的人难对付；艰巨的工作在这里。

旧形式是一种旧习惯，如果认为非利用旧形式不可，便无异承认习惯是不可改变的。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我所以赞成田间的诗，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他把旧腔调摆脱得最干净。这种极端的感情，也许是近二十年来钻进旧圈子以后的彻底反感，说不定过分了一点，但暂时我还愿意坚持我的意见。

先生对张光年说的何其芳征求利用章回小说形式意见的来信，原函未存，两人何时相识，亦未见记载。何其芳是四川万县人，一九二九年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一九三〇年三月，以笔名"禾止"在《新月》第三卷第一号发表小说《摸秋》。一九三〇年夏报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均被录取，遂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半年后发现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被除名。但北京大学承认其考试成绩，故一九三一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先生参与编辑的《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出版，内刊有何其芳新诗《初夏》。在北大学习期间，何其芳结识李广田、卞之琳、三人于一九三六年出版新诗合集《汉园集》，被誉为"汉园三诗人"。一九三八年，何其芳与卞之琳、沙汀结伴访问延安，后留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文学系教员、系主任，还担任过朱德的私人秘书。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何其芳随中共代表团至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任中共代表团文教组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华日报》副刊等工作。也是这年，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收入何其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发表在延安《草叶》创刊号上的《河》、《醉吧》两首新诗。何其芳给先生的信是在重庆中共代表团时期写的，先生是否复信未见记载，但他曾在西南联大新诗社一次会议上说："何其芳是快乐的，因为他已经生活在人民中间了。"（郭良夫《因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学林漫录》第11集，第9页）

先生参加过多次文艺讨论会，他主张文艺工作者不妨放下笔，直接投身到斗争中去。季风《在一多先生灵前》："我想起在一次文艺问题讨论会上闻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在今天，文艺工作者尽可以放下笔，直接参加到政治生活、政治斗争里去！也只有在实际的斗争与生活里，才能写得出真实的、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在今天，我们有比写文章更急要的事。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文汇报》，1946.7.31）

附：九月二十八日，《云南日报》刊登《"文艺的民主问题"，文学评论社昨邀开座谈会》的报道，记述座谈会上的讨论情况，这对了解先生的该文有所帮助，故录如下："《文学评论》月刊创刊号在昆明出版后，即告停顿。该刊发行人近邀光未然、叶以群出来主编，新一号在组稿中。日前该月刊社邀集了一个'文艺的民主问题'座

谈会，除闻一多先生因病，李广田先生因另有事未克出席外，计到高寒（楚图南）、李何林、李公朴等十余人。首由光未然作一报告，对'民主运动的新时期和文艺运动的新发展'加以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大意说：民主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有许多因素足以保证民主运动可能并且必然走向胜利。但民主运动在全国各地也有着不平衡的发展。而民主运动的发展必然影响到文艺运动的发展，并给它以新的意义。在这历史的新时期当中，文艺作家们对这一问题自应给以热切的注意，并担当起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任务来，从而创造新的民主主义的文艺。高寒先生首先提出文艺作家对民主运动应担当起三件任务，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就是最大的任务之一，并强调建立'民主的文艺批评'。尚钺指出反民主的、不健康的（色情的，对抗战不积极的等等）、复古倾向的文艺作品（或政策），与敌人的文化进攻不谋而合，必须打破这危机。章泯说，政治上民主不够或不民主，文艺是得不到顺利发展的，文艺作家必须作为一个民主的传教人、政治斗争中的清道夫。李何林说，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就是反封建反假民主的文艺运动，必须更加紧学习，并把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并须培养大批文艺干部。赵沨指出敌后与大后方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文艺运动的不平衡，显示出应走的道路。白澄于报告文艺的出版情形之后，强调多做批评工作，无论新旧中外名著或不名著与否，均应以新行正确的眼光，给予新的评论与估计。吕剑说，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应看作新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更高的发展，它必须和民主主义、人民群众结合，强调文艺作家对'民主'的生活、创作实践。李公朴解释了'民主'及其运动的意义……并报告了敌后的文艺活动。座谈完毕由文艺评论社招待便饭。饭后漫谈，决定邀请在座的人，组织一文学评论的评论委员会，密切配合工作。至九时散会。"

九月二十五日　致闻亦博信[①]。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中谈到投身民主运动及家庭生活：

> 前接来函，适因事冗，继以家人卧病，致久稽裁复，罪甚罪甚。月前渝昆两处所传一节，经各方辩明以后，真相业已大白，想早蒙释念矣。今日之事，百孔千疮，似若头绪纷繁，而夷考其实，则一言可以尽之，无真正民主政治是也。惟纵观各国之享有民主者，莫不由其人民努力争来，今日我辈之无思想言论自由，正以我辈能思想能言论者，甘心放弃其权利耳。且真正民主之基础，即在似若无足轻重之每一公民。由每一公民点点滴滴获得之自由，方为真正自由。故享自由若为我辈之权利，则争自由即为我辈之义务。明乎权利义务之不可

① 闻亦博，字普天，先生堂弟，大排行第十七。

须臾离，则居今之世，我辈其知所以自处矣。读来函乃知吾弟亦一有心人，既喜吾道不孤，愿即以上述之义务观念时时共勉之。平生赋性懒散，渝中兄弟亲友处，欠缺音候，然朝夕之暇，步檐伫望，系念实殷，非真淡忘也。此间兄与驷哥两家大小粗托平安，鹤、雕、鹏三儿及名女均在中学，幼女亦已入小学。兄食口较众，前二三年，书籍衣物变卖殆尽，生活殊窘，年来开始兼课，益以治印所得，差可糊口，然著述研究，则几完全停顿矣。

同日 《云南晚报》中《学府风光》云先生的"楚辞"课旁听者甚多："开学之初，旁听之风极盛，今年旁听者最多的课程，是张奚若教授的政治思想史、闻一多教授的楚辞、傅恩霖[龄]教授的日文，以及雷海宗、蔡维藩、吴晗诸教授的历史课程。"

九月二十八日 《云南日报》报道《援助贫病作家，南菁展开募捐》，中说："南菁中学本期已上课五周，每周均有学者名人莅校讲演，已在该校讲演者有罗庸、闻一多、雷海宗诸教授。"

九月二十九日 《云南日报》刊登先生为援助贫病作家治印消息："闻一多为响应此项运动，特愿为人刻章十只，每只二千，全部收入捐助贫病作家。石自备，并送刻边款，以志纪念，收件处在青云街自由论坛社。"（《援助贫病作家，联大同学踊跃募捐，一周内已募获四十五万》，《云南日报》，1944.9.29）

刘克光同学看到先生的启事，主动为先生找顾客，其中一位顾客是昆华中学的同乡，叫张治国。（据刘克光给编者的信，1987.11.13）这枚印章的印模保存在先生的自制印谱中。

是月下旬 一位美国友人来访问先生。同天，一位澳大利亚的著名记者庄士敦（George Johnston）通过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员王佐良介绍，也访问了先生。几天以后，先生对张光年谈到了这两次谈话的内容，说：

前天有两个外国朋友先后来看我，谈到中国民主问题。一位是美国朋友，他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希望中国有第三个力量起来，担负建立新中国的责任。我说第三个力量是有的，目前还在生长发展中。另一位是澳洲朋友，站在澳洲人的地位，比较倾向于英国方面，一方面骂美国人，一方面却更多地同情中国。他问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民主，他的意见，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他说英国目前正一天天地接近苏联，打算向着那个方向走去。他曾和丘吉尔谈话，邱氏也承认了这一点。邱氏的矛盾是印度问题；不过一般的英国人，认为邱氏适合于做战时的领袖，战后建设大概不大合适，他们希望以后对印度问题能有更开明的办法。这位澳洲记者问起我：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否太温和了？战斗性是否还不够强烈？我说我是站在青年人一边的，和老辈人的看法不同；我个人看

来，目前的民主运动的确战斗性不够，也许有些老辈人认为操之过切，反而不好。

这位澳洲记者也写小说的，和我一样，过去也曾学过画，因此他很关心中国文艺界的情形。他听说最近世界上最好的短篇小说是中国的；我问他从那里听来的，我说我们倒有些受宠若惊了。（闻一多谈张光年记《论文艺的民主问题》，《闻一多全集》第3册，第567页）

庄士敦访问先生后，写了一篇《东方的萧伯纳连系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先生对此文很感兴趣，曾给西南联大外文系专任讲师薛诚之看过。（据薛诚之《闻一多和外国诗歌》，《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3期）

与庄士敦谈话的第二天，又有一位美国朋友来看望先生。先生对张光年说：

外国朋友的确很想了解中国。譬如今天来看我的另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我来到中国，为的要看看活着的中国人民，他说现在在美国替中国说话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落了伍的胡适之；一个是国际文艺投机家林语堂；一个是感伤的女人赛珍珠。他们的文章，都不能表现中国的真实。他说他每回读到林语堂的文章，描写中国农民在田里耕作时如何地愉快，以及中国的刺绣、磁器如何地高贵……他就很生气地把这位林博士的著作撕毁了掷到墙角里去。我听到这里，感激地向他伸出手来，我说：你是我所遇到的少有的美国人！（张光年记、闻一多谈《文艺的民主问题》，《闻一多全集》第3册，第568页）

约是月　结识与张光年一同到缅甸开展工作，又一同返回昆明的中共地下党员、音乐家赵沨。赵沨，河南项城人，一九一六年生于开封。他自幼喜爱音乐，一九三五年冬考入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训练班，毕业后留在中央电影摄影场音乐组工作。抗战爆发后，随中央电影摄影场迁往重庆，后兼任中央电影摄影场新闻组代理组长，负责拍摄取《战地简报》、《保卫大武汉》等，还把苏联电影记者卡尔曼的纪录片编成《抗战到底》。在重庆，赵沨先后在内迁重庆的上海两江体育专科学校和精益中学兼任音乐教师，积极参与社会音乐活动，在业余合唱团教唱苏联歌曲和抗日歌曲，投身于群众性的抗日歌咏运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五日，在中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支持下，赵沨协助原延安鲁迅艺术院教务处教育科科长李凌，在重庆成立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十分重要的进步音乐社团“新音乐社”，并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创办了综合性的《新音乐》月刊。《新音乐》前期主编是李凌，后由赵沨接任。《新音乐》受到文化知识界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有人评论说它“实际上成为指导和推动国统区群众歌咏运动的中心”，“在抗战期间，没有一种音乐能象上述的群众歌曲那样，对中国革命起到那样巨大的作用，也没有一种音乐刊物能象《新音乐》月

刊那样，向人民群众提供了如此及时而又丰富的精神食粮。”一九四〇年年底，新音乐社组织重庆业余合唱团首次公演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张光年亲任朗诵，赵沨任《黄河颂》独唱。周恩来观看了这次演出，并当面给赵沨赞许。皖南事变后，赵沨与张光年、李凌离开重庆，经昆明到缅甸开展工作。在仰光，赵沨由经张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赵沨与张光年、李凌等率领战地服务团，历经千险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抵达昆明。在昆明，赵沨经李公朴介绍，到疏散至路南县的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担任为国文、音乐教员，并兼任路南县立中学教师。一九四三年，赵沨随云大附中迁回昆明，继续利用音乐从事进步活动，在昆明无线电厂、中央机械厂合唱团教授歌曲，担任昆明各校合唱团联合组成的昆明合唱团的指挥。（据刘新芝《赵沨与新音乐社》，《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员大会，赵沨与闻一多同时当选为新一届的理事。先生主持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工作时，曾请赵沨担任《民主周刊》主编。

是年秋　云南《民国日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刘浩在张光年陪同下看望先生。

刘浩是中共西南局派到云南参加省工委工作的，张光年每两周和刘浩联系一次。刘浩提出想代表云南省工委向先生表示敬意，请张光年出面联系一下。张光年将情况对先生提出后，先生十分兴奋，对高真说：今天要来个共产党，你加几个菜。一天下午，刘浩、张光年到先生家来，谈了一个下午。刘浩关心地询问先生家的生活，需要哪些帮助，而对先生最关心的问题，如党的方针政策、如何开展抗日宣传、怎样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等，均未涉及，先生不免有些失望。（据访问张光年记录，1988.2.4）

刘浩回忆那天交谈的情形：“我和闻先生很亲切地畅谈了大约两小时，向他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我党的主张，同时讲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对日妥协、准备反共等情况。闻先生很激动地说国民党专制腐败，没有希望，中国的事情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并说，现在有些人还看不清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要大声疾呼，像孙中山讲的唤起民众，反对国民党的一切反动政策。闻先生说他在黑暗中探索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此后不久，我奉调回重庆南方局，曾把闻先生这些情况，向董老作过汇报。”（刘浩给编者的信，1988.8.5）

是年秋　先生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原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发起组成。是年九月十九日,在重庆举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决议取消"政团"二字,以便吸收无党无派的个人入盟。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等先生的朋友都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吴晗亦于上年加入民盟。

民盟昆明支部于一九四三年酝酿成立,当时,参与筹备的罗隆基、潘大逵曾邀请先生参加,受到婉拒,并说如果要加入组织,就加入共产党。(访问潘大逵记录,1986.12.29)但是,此时先生改变了态度。一天的黄昏,吴晗受组织委托,到昆华中学先生家里,与先生作了亲切的长谈,并邀请先生正式加入民盟。先生起初有些犹豫,经过认真考虑后,表示可以加入,并说了一段感人的话:"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引自王康《闻一多传》,第300页)用"救火"形容形势危急和拍案而起,不止在一个地方讲过。赵沨回忆说:"在一个文艺界聚会上,大家谈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搞艺术的人现在搞政治毛等于救火。并且,不是邻家火起了,一听见锣响,丢下□笔推开琴谱提着脸盆干起来了。而应该是:是自家房子起火了,并且烧到自己的眉毛。这时还不赶快救火,还等什么。有人认为,并不一定提着水桶泼水才算救火,意思是说搞文艺艺术的有自己专门的工作,专门的行业。他反驳这种说法:火势如果太大,情形十分危急的时候,还是要参加直接战斗的。在最危急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写个音乐号召别人来救火,你写幅油画来记下火灾的损害,最危急的时候,就应该挑起水桶来。"(赵沨《闻一多先生底回忆》,香港《光明报》新4号,1946.10.18)民盟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成员身份不公开。先生入盟宣誓后,组织上当着他的面把誓词及表格烧掉。先生入盟时的介绍人有两位,一是罗隆基,另一有人说是潘大逵,有人则说是吴晗。

这之前,先生曾读过《联共(布)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吴晗来谈时,先生明确的表示将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循着闻一多的道路前进——记清华闻一多先生殉难三周年纪念晚会》中记述了吴晗在会上讲到的两件鲜为人知的事:"有二件是过去没有提到也是不可能提到的,今天在会上向大家说一说。一件是闻先生生前曾经极用功的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联共(布)党史》[①],另一本是《列宁生平事业简史》。闻先生晚年的进步,是和这两本书分不开的。这一本红皮面莫斯科版的《联共党史》,已经捐赠给'一二·一'图书馆了,希望好好的保存。另一件事是闻先生在应允加入民盟的晚上,曾对吴先生表示说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

① 这本书是吴晗借给先生的。

要请求加入共产党。”(《光明日报》,1949.7.18)

后来,先生还对人谈到加入民盟的认识。凌风《回忆闻一多同志》:“有一次,闻同志在昆明民主周刊社和几位青年朋友谈话,话题是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他说:‘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参加政治活动的。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要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只有参加共产党或民盟。有些人没有勇气参加共产党,因为那种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又有些人还不了解共产党,因为反动派在各方面封锁得太严苛了。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参加民盟,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实践中锻炼,逐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也是很好的。’闻同志凭他真挚诚恳、诲人不倦的态度向大家说,在座的几位青年朋友听了都很感动,其中有些后来加入了民盟。”(《光明日报》,1950.7.15)

柳映光(杨明)《闻一多就是我们的旗子》中记述了先生入盟后的一次谈话:“当闻先生告诉我他参加同盟的时候,我曾经劝阻他,我说:‘您没有加入的必要。’‘什么?没有必要?告诉你,中国人都有必要!’他先是很生气,后来又和缓的说道:‘孙毓棠先生也这样劝我。唉,以前我们讲清高,故意表现□介,其实这才是上当。历代的统治者们有意的提倡这一套,目的就在使大家都不去过问政治,好让他为所欲为。今天我们不能再自己上当了。’‘我的意思是,你站在外面说话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量?团结才有力量,有组织才有影响!我不仅不接受你的劝告,而且,我倒要劝你也参加同盟!’他语气坚决,毫无犹豫。‘我……’‘你?你要不要过问国事?今天,这样。’‘当然要过问!’‘那么你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团体的力量大?只要你承认团体就是力量,你就得参加一个政治团体。’他停了一停又说:‘产生这个民盟的历史原因你想过没有?’‘当然想过,但是我不一定参加它。’‘可见你没有想通,你再想想,像你我这样的人,你参加共产党?’‘不。’‘你参加国民党?’‘当然更不!’‘这就对了。像我们这类人,就一定要参加民盟这是一定的,不能说不一定。’于是,我和我的老师变做同志了。”(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1946.8.2)

先生加入民盟,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流金(程应镠)《人之子——怀念闻一多先生》:“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他加入民盟以后不久吧,我去看他,他兴奋地告诉我说:‘我从“人间”走入“地狱”了。’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的语气变得更严重。他和我讲他过去的日子:‘以前,我在龙头村,每回走进城,上完了课,又走着回去;我的太太总是带了小孩到半路上来接我,回到家,窗子上照着的已是夕阳了,孩子围在身边,我愉快地洗完脚,便开始那简单而可口的晚餐,我的饭量总是很好的,那一天也总过得很快乐。’我听着入神了,忽然他点燃起一支烟,站了起来,有力的眼睛里,发

着光。‘现在，这种生活也要结束了。’”（《文汇报》，1947.3.24）

先生加入民主同盟后，与罗隆基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吴晗《闻一多的道路·序》：“大概是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吧，在朋友家谈天，罗隆基先生笑着指一多先生说：‘一多是善变的，变的快，也变的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多先生也大笑说：‘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史靖《闻一多的道路》，生活书店 1947 年 3 月出版）

先生入盟后，与联大教授姚从吾激辩了一番。尚土《痛忆闻师》：“先生入同盟之后，便马上去找在联大负责党团的姚从吾，劈头便说：‘从吾，我已加入了民盟，我们谈谈。’姚问民盟的经费是不是延安那边供给的，于是二人激辩三小时，弄得不欢而散。”（《人物杂志》第 2 年第 9 期，1947.9.15）

先生对民盟的工作极为热心。吴晗《哭一多》：“热心的情形到这个地步，民盟是没有钱的，请不起人，有文件要印刷时，往往是他自告奋勇写钢板，不管多少张，从头到尾，一笔不苟。昆明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私家也无电话，任何文件要找人签名，跑腿的人一多一定是一个。要开会，分头个别口头通知，他担任了一份，挨家挨户跑，跑得一身大汗，从未抱怨过半句。”（《新华日报》，1946.7.28）在《哭一多父子》中吴晗又说：“宣言、通电的润色人一定是你，在深宵，在清晨，你在执笔沉吟，推敲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朋友们安慰你的过度辛劳，你还在微笑着说：‘谁叫我是国文教员呢！’”（《人民英烈》，第 249 页）

先生还热情地动员他所了解的师友、学生入盟。先生对多年的老友饶孟侃入山念佛很不以为然，想写信劝他关心国事。流金《追念闻一多先生》：“佳士说：‘……你还记得么？他和我们谈饶孟侃，说到他念佛。他告诉我们，说要写一封公开信给他那位念佛的老朋友，说明他自己这几年来关心政治的原因。他还说，念佛与革命，都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念佛看似通脱，实在通脱不了。革命呢，倒真是通脱得了的。’”（《人世间》第 1 卷第 5 期，1947.7.20）

先生曾介绍李何林加入民盟，并推荐他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文艺委员会会主任委员。田本相在《李何林亲历闻一多遇害始末》中说：“其时，在云南地方当局同国民党中央勾心斗角、明争暗夺的情况下，何林先生的工作也得以开展，得以参加报纸副刊和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闻一多先生也给予很多支持。当闻一多先生看到何林先生对于工作高度负责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觉得何林先生不但是一个勇敢的民主战士，而且具有组织能力。他就对何林先生说：‘你在民盟外面干，虽然也可以发挥作用，但进来一起干，可以配合得更好些。’不久，周新民和李文宜，这些民盟中的地下共产党员，也诚恳地找何林先生谈加入民盟的问题，在闻一多和张光年的

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不久，振华先生就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兼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闻一多被选为执委。闻一多原是文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但他推荐何林先生接替他，担任主任委员。可以看出他对何林先生的信赖。"(《中华读书报》，2003.7.2)

先生还与周新民介绍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李曦沐加入民盟。李曦沐当时是历史学会主席，他回忆说：那时"我在昆明时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为搞好与民主同盟的关系，地下党决定我和另外一位民青负责同志许师谦参加民主同盟，闻一多和周新民先生是我们的介绍人。"(李曦沐《伟大的人格，永恒的纪念——闻一多先生殉难50周年祭》，《中国测绘报》，1996.7.12)

对于有些很喜爱的学生，先生则批评他们不该疏远现实政治。汪曾祺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闻一多先生也很喜欢爸爸，尽管两人'政见'不同。在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先生政治态度出现明显转变，逐步成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爸爸当时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先生的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一次，爸爸受一家小报之托，到闻一多先生家中约稿。闲聊之中，闻先生对爸爸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爸爸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爸爸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先生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先生很快写了回信，说爸爸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先生还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先生找到了爸爸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之后才去看望弟弟闻家驷先生。"(汪郎、汪明、汪朝《"高射"过闻一多先生》，《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23至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参加民主同盟前后，先生曾与张光年谈到想去解放区看看。张光年在《为革命真理而献身》中说："我清楚地记得，当一多同志在昆明中学兼课，从东郊迁到昆华中学教职员宿舍一个二楼上暂住时候，我几次去看望他。一天晚上，我到那里，他正倚身枕在被卷上假寐。月光透过宽大的窗户洒遍房间，洒在他的床上，他的美髯笑脸上。他让我坐下，自己仍然半躺着，说：今夜月光这么好，我们不开灯了，就在月光下漫谈如何？我说当然太好了。他让我谈谈时局，谈谈延安窑洞。他突然抬身坐起，满怀热忱地对我说：我想到延安去看看，你能帮助我吗？我说：现在不行，路不通了。他十分严肃认真地说：我要去！想学学怎么做好组织工作。青年们信任我们，可是情况很复杂，咱们办法少，得去延安取点经。我笑着说：从昆明去延安，好家伙！不等你走到，半路上就给抓去了；或者没抓去，等你回来，帽子更红了，

闻一多就不成其为民盟领导人的闻一多，也就不能起闻一多的作用了。还是留以有待吧。一多同志低声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化名去，咱们不告诉任何人，悄悄去，悄悄地回来。我为他孩子般的至诚所感动，但是笑出声了，似乎说了这样的话：正因为你是闻一多，保不了密，去不了延安。他怫然不悦地躺下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顾虑多端！就想想办法，让我去看一眼嘛！我听出来，他已通过其它渠道，提出了同样话题，而回话也是类似的。"(《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

是年秋　国民党学生教导团又有数团经过昆明。先生有个堂弟，叫闻思，也参加了教导团，抵昆后立即找到先生，哭诉在教导团内备遭虐待的惨状及部队内之种种黑暗腐败现象。他告诉先生，部队里的长官们根本不把士兵当人看，动辄拳打脚踢，扇耳光，鞭子抽。一次，一个连长顺手拿起五节长的电筒猛击一士兵的头部，手电筒的玻璃都打碎了，那位士兵被打得血流如注。士兵稍有不满不是惨遭毒打，就是关禁闭，队伍开拔了就丢在地方监狱中一走了之。一路上上级长官层层克扣军饷，吃空名，士兵的伙食连猪狗都不如，一个个营养不良，面无人色。可恶的长官们还要利用士兵为他们搞投机生意，路过宣威时，竟购买了大量火腿，让士兵一人扛一支，代他们扛到昆明卖高价发国难财。先生听了这些前所未闻的黑暗腐败的事情后，无比气愤，连声痛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件事对先生的思想变化，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几天后，先生到联大上课，声泪俱下地讲起这件事。陈凝在《闻一多传》中记述到先生的话："大家都知道的，许多抗战期间不应有的现象，今天都发生了，日渐增加了。我早就悲愤得忍不住了，但是，我想还有比我更适宜于说这种话的人，他们总不会不做声的，所以一向我只把悲愤闷在肚里。可是等到现在，还是没有人说。好，我要说！我为什么不说？是中国人就该说！我底心是一座火山，在找着一个喷口！……我们不能白流血，要保证艰苦抗战的成果，只有大家都拿出力量来！"(第31至32页，民享出版社1947年8月出版)

约这前后，先生在一次课上讲到现实中的《石壕吏》：

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近郊。前几天的一个傍晚。

天色慢慢地暗下来了。几个流里流气的兵痞敲着锣四处吆喝："快来看电影！不要钱！国军请客！……"

善良的老百姓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电影，会不要钱？"国军"老爷会请客？

那几个兵痞又叫起来了："快来看，马上就要开映了，说不要钱就是不要钱么，骗人是狗娘养的！"

三三两两的群众，带着将信将疑的心情，慢慢向营房走去。聚在远处的人看见他们进去了，真的没要钱，陆续跟上来了，人逐渐增多。天，已经完全黑了。一部破电影机开始轧轧地响起来。

突然，匪军把大门关上，场子里漆黑，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准乱动！男的站到东边去（一个反动军官用手电筒向东边照了一下），女的和小孩原地不动！"驻军营长站在小土台上凶恶地吼着，旁边几个军官在得意的狞笑。

这时候、大伙才恍然大情悟，上当了。原来当地驻军就要开拔，临走前想出了这样一个恶毒的"抓壮丁"补充兵员的办法。

大伙嚷起来了，人们向大门挤去，营长拍、拍地放了两枪，大声吼叫："不准动！谁想跑打死谁！"一些携儿带女的妇女都被吓得哭起来，场子里一片哭声！

军官们用电筒从人群里挑出了二十多个年轻小伙子，用武装押走了，这才打开营门，把群众赶走。

枪声、哭声，惊动了四近的村庄，但谁也不能设想发生的会是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人们奔走相告，群众激愤，都涌向军营索人，驻军根本就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还说，再不走开就要开枪啦！

这年头，有枪就有理，老百姓怎敢同拿枪的人硬碰！

有人提议到昆明去告状，又有什么用！只有三、四个花了钱的被放回，花不起钱的就这样当了"壮丁"！

从此，妇啼儿号，村子里再也断不了哀号的声音！（王康《闻一多传》，第265至266页）

是年秋 担任西南联大学生文艺团体"剧艺社"导师。这年五四纪念活动后，施载宣（萧荻）、王松声、何孝达、张源潜、程法伋、游继善、罗长友、温功智等进步同学编辑了《剧艺》壁报。秋季开学后，学校根据五月颁布的《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要求各社团到训导处补办登记手续。王松声等办理手续时，因为准备从事戏剧创作与演出活动，便用"剧艺社"的名称，作为壁报团体进行了登记。在登记表中，填写的负责人为王松声、施载宣，导师为先生。（据李光荣、宣淑君《西南联大剧艺社史事——兼及与新中国剧社的关系》，李建平、张中良主编《抗战文化研究》第1辑，第1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剧艺社是在《剧艺》壁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艺》壁报不定期出版，大概只出了两三期，因为大家兴趣不在戏剧理论研究，而在戏剧演出实践，因此很快就到戏剧编演上来了。先生既是《剧艺》壁报的导师，也是剧艺社的导师。次年秋季闻立鹤考入西南联大后，也成为剧艺社一员。

是年秋　在昆华中学课堂上，先后出了三个发人深省的作文题：《写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病兵》、《号角》。

“病兵”是当时昆明街头时可见到的严重问题，八月十四日《云南晚报》曾发表时评《病兵问题》，中云：“近数月来，过境部队中，常有若干病兵，流落昆市，其中体力尚可支撑者，沿门乞讨为生，而病势沉重者，往往倒毙路旁，无人过问。”这个现象对先生刺激很大，某次他从联大返家，途中被一病兵拉住衣襟讨钱糊口。又一次见到一军官殴打病兵，先生上去阻拦，却遭军官辱骂。先生气愤填膺，在课堂上痛斥军队腐败，让学生围绕病兵问题发表看法。《病兵》作文，先生还请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郭良夫帮助批改过。

赵仲邑也看到过先生批改的昆华中学同学作文，他说：“一个学生的作文卷子，通篇都只说旧社会怎样怎样可恨。闻先生在总批时写道：‘社会诚然可恨，可是自己呢？’”（赵仲邑《闻一多先生轶闻》，《随笔》第8集，第55页）赵仲邑认为，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旧社会要改革，但个人的思想也得改造。

先生次子闻立雕在《不朽精神育后人》的回忆中也说到：“一次一个残暴的军官用皮带猛抽、用穿着美军皮靴的脚狠踢一名孱弱的病兵，父亲正好走到跟前，眼看着那名士兵翻了几下白眼就倒下去了。又愤怒又痛心，血液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冲上去企图扼止那只罪恶的黑手……回到家中怒气仍久久不消。母亲劝他何必生这样大的气，父亲情绪激动地说：‘不是你的儿子你就不管！’”（《不朽精神育后人》，《人民政协报》，1996.7.25）

对于昆华中学学生的进步壁报，先生也给予大力支持。马运达、马汝维等几人办了《闪电报》，先生为它题写了报头。王明、张思信、管有声等办起《战戈》壁报，开展“文艺为什么服务”讨论，先生赞扬壁报办的纯朴、真挚、有生活气息，还鼓励他们“要跨越学校围墙到广大群众中去学习”，文艺要“反映现实的斗争”。先生还为《战戈》题辞：“诗，别再在梦里撰写了，要在现实里发现它，如果它不在呢，放它进去！”（王明《难忘的教诲，深切的怀念》，《云南蒙自政协通讯》第2期，1986.7.16）

是年秋　为昆华中学杨澈同学题写“好古敏求，行己有耻”。杨澈在《纪念闻一多老师》中回忆了1944年先生给他们讲授《离骚》的情景后，说：先生强调人分为统治的人和被统治的人，屈原为被统治的人，喊出了人民的愤怒。这使他第一次懂得了“人”原来是分为两类的，也使他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荒淫无耻，横行霸道，有的人却受尽欺压，生活艰辛。文中还说：有一次，先生讲一篇关于帝王祭泰山的文章，他对皇帝祭天和如此神秘感到不解，并对课文中引用的两句话不明白，就请教于先生，并顺便请先生题字。先生立即用毛笔在他用薄打字纸装订的纪念册上用

钟鼎文篆写了他所提问的那两句话:“好古敏求,行己有耻”。这两句均出自《论语》,意为:喜爱历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追求,并用羞恶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十月一日 中秋节。与冯至一起参加联大新诗社举办的赏月诗歌朗诵会,地点在新校舍北面莲花池附近的英国花园。到会者四五十人,先生就“新诗创作问题”作了发言。(史集《闻一多先生和新诗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十月九日 参加西南联大新诗社成立半周年纪念晚会。到会的有联大、云大、中法等大学十四位教授和昆明文化界人士、大中学生共二百余人。

会上先生宣读了亲笔抄写的,有冯至、楚图南、李广田、尚钺等一百二十三人签名的《给贫病作家的慰问信》。二十二日,昆明《自由论坛》第五期在《诗人们的歌吼》中报道了纪念会盛况,并全文刊载慰问信:

至亲至爱的朋友们:

在这几十天的奔忙中,我们为你们捐到了一些钱,我们敢说:这些钱的用处是非常正当的。我们相信这些钱不特能买回你们的健康,也买回了我们的觉悟,我们知道你们为什么贫,为什么病,你们的生病,正是人们痛苦的结晶啊!

无论你们怎样的受欺侮受迫害,你们的血泪却滋养着我们对强暴的愤恨和对自由的渴望。今天,你们不再是孤立的,你们的语言,将被我们举起,当作进军的旗帜。

人民的呼声是最响亮的,让那些枉死者也站在我们的行列中一齐叫喊吧!当千万声音合成一个声音,那就会把黑暗震塌的,这——就展开了你们的前途和我们的前途!

向你们致最高的敬礼!

宣读后,开始诗朗诵:“第一首是该社社员叶传华君输血后所作的《心脏的粮食》,其次是高寒先生翻译的惠特曼的《大路之歌》和尼古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长诗中的一段。当中加上两段外国诗的朗诵,一是闻家驷教授朗诵法文诗,一是冯至教授朗诵德文诗。最后是社友孙晓桐小姐朗诵《阿拉伯人和他的战马》,光未然先生朗诵了一个战地女演剧队员(即张光年的妹妹张帆)写的长诗《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和闻一多教授朗诵鸥外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讣闻》和《被开垦的处女地》。”

接着,开始发言。发言者有楚图南、吕剑、沈有鼎、李何林。电灯熄了很久,一排排洋烛点起来了,也渐渐矮下去。时间过得很快,不可能让每位都发言,于是请先生来做结论。先生用很简练的语言,把各位发言的意见连贯起来,说:

楚先生告诉我们新诗是有前途的，不过还在成功的过程中。吕剑先生告诉我们诗的成功的主要条件是要和生活接近，尤其与大众生活接近。沈先生的意思不但要和大众生活接近，而且把这种生活当作一种宗教。至于他说的找形式找不出，也许日常语言里就具有了，这意见很新颖，而且可以推引出来，我们何必特殊地去找写诗的材料，材料就在眼前的生活里。李先生的意见正好补充沈先生提到的把生活当作宗教，这是一种特别的主张和信仰。我们要把思想作根据，用宗教般的虔诚去信奉这思想，然后有好诗出来，单靠感情是不够的。谈到生活，我们人人都在生活，但那一种生活才是真正的、健全的？只有多数的、集体的生活才是最健全的、真正的生活。我们少数的读书人生活都是有毛病的，是不够的。生活应该要有思想作根据，对一切问题有深切的了解和认识，然后再确信它，以宗教般的热情去信仰。这样思想和生活打成一片，就有好诗出来了。（昆明《自由论坛》第5期，1944.10.22）

这个纪念会之前，先生还特意为新诗社刻了一枚图章，并有边款。史集《闻一多先生和新诗社》："由于新诗社成立半年来就生气勃勃，团结了大批的青年，闻先生十分高兴。他特地为新诗社刻了一枚社章，并且刻下了如下的边款：'本社才成立半周年，参加的分子，已由联大发展到昆明全市。古人论诗的功能说：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我们正做到了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群字，这是值得庆幸的。三十三年十月半周年之前夕闻一多印并识。'这方社章倾注着闻先生对新诗社（应该说是对中国的新诗）炽热的期望和他的心血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新诗社的活动的确做到了"群"字。先生也介绍了一些校外青年如昆华中学王明、张家兴、董康等同学参加新诗社活动，还曾在一次诵朗会上朗读过董康的习作《生命之歌》。暑假开学前后，临沧县的彭桂蕊到联大师范学院进修，寄了一首短诗向先生请教。先生立即回信，说："来信收到，你既然在进修班，以后见面的机会一定很多。联大同学办了一个新诗社，我也常出席，你如愿参加，我可以告诉他们开会时通知你。大作已拜读，似宜多读名家的作品。"（转引彭桂蕊《回忆闻一多先生在昆明二三事》，《边疆文艺》1980年第8期）

彭桂蕊果然接到何孝达的通知，兴致很高的参加了这天的会。彭桂蕊回忆："参加开会的人多数已到，尚未宣布开会，有人提议为了互相认识起见，希望来一个自我介绍，说一下自己的尊姓大名。大家都同意，也就'照名单请客'，顺座位次序毛遂自荐，但说了五六个后，因声音小，速度快，并未发生效果，谁也听不清。闻先生立即站起来说：'失了效用，重来吧！'他立即做出了示范，握紧了右拳，伸开大拇

指,一字一顿,声音宏亮的介绍了他自己的名字:'闻、一、多!'他说:'要这样才行的!'李何林先生也放大了声音自报,像他们两位这样的声音和方式,当然人人都听清楚了,但多数人的效果,仍不如闻先生那样好。"闻一多朗诵"鸥外鸥的《桂林的山》。在未朗诵前,他也简单致词道:'过去我喜欢田间的诗,近来则对鸥外鸥的诗也颇感兴趣,有机会准备写篇文章介绍他。'他接着又说:向来诵诗大都是用女性的声调,我认为不大有力量;我现在要改变一下方式,用男性的声调来诵诗。这只是一个尝试,可能有的人不会同意。(大意如此)这首诗是用大小不同字体来排印的,闻先生致词后就用男性的声调来朗诵这首诗。这种创新的精神极为难得。"(彭桂蕊给编者的信,1988.5.24)

十月十日 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纪念日。民盟昆明支部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及云南省文化界,联合发起举行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先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

这次大会,《云南日报》前一天便有预告,文云:"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理事会,根据二次大会决议,日前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宪政民主问题,并决议发起举行双十节纪念大会,欢迎各界参加,时间为下午一时半,假绥靖路昆华女中大礼堂举行,讲演有闻一多之《保卫大西南与动员民众》,楚图南之《论言论自由与身体自由》,吴晗之《中苏邦交与国共问题》,伍启元之《改善士兵待遇与加强经济力量》,罗隆基之《改革政治方案》。"(《本市学术界人士,双十节举行纪念会,请名教授讲宪政民主问题,欢迎各方面人士自由参加》,1944.10.9)

四月以来,日军为挽救其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沿平汉、粤汉两线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攻势,以便打通大陆交通线。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数月内失地千里,郑州、洛阳、长沙、衡阳等大小数十座城市先后沦陷,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亦危在旦夕。战局之恶化充分证明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腐败。九月十五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军的进攻,严重地威胁着西南大后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民盟云南支部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默许下,决定在"双十节"这天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动员起来保卫大西南。这次大会规模甚大,到会学生及各界群众约有五千人之多。会前,先生做了深入的发动工作。王康《闻一多传》中记述说,在翠湖湖滨一幢联大教职员宿舍里,先生动员大家尽力多争取些人来参加大会。"他带着商量的口吻,先说明因为现在昆明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筹备工作尽力做得缜密细致,才有把握把会开好。然后很有感触地谈到争取团结人的事情,他说,爱国是

靠自愿,但做任何事情都有个先后么。先走了一步的人,也有责任拉拉走得慢一点的人,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拿我自己来说,过去就很落后,不问政治,不参加群众活动,还不是靠走得快走得早的朋友们,有的拉,有的推,现在才能跟上你们大伙一道来搞民主运动么!如果说咱们算是先走了一步的话,那末咱们就要像别的朋友帮助自己一样去帮助别人。搞民主运动,人越多越好么!走得慢的朋友,对有些事不清楚,有些问题不明白,难免有点怀疑,有点犹豫,在眼前这种局势下,是好理解的呵!你们想想,参加一个会,签上一个名,给特务盯上了,都会招来麻烦,甚至生命危险,怎么能不有所顾虑!这决不是那些奴才们胡说的什么'出风头'的事情,那都是别有用心诬蔑民主运动的话。你们大家看,是不是该这么办?同意的话,就再接着干,有的人找了一次不行,就再找一次,多争取一个人,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扩大一分影响。"(第 314 至 315 页)

大会是在昆华女中操场上举行的,先生与罗隆基、李公朴、楚图南、吴晗五人发表了演讲。大会进行中突然"砰!砰!"两声巨响,随即会场出现了混乱。先生与李公朴沉着镇定,挺身而出,积极维护秩序,在龙云派来的宪兵的协助下,查清了原来是特务放鞭炮进行破坏,会场秩序迅速得到恢复。会后,先生回到家中高兴地对夫人讲,今天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并连声不绝地赞扬李公朴临危不惧,指挥有方,真是个人才!最后,还悄悄告诉夫人:"今天的会议得到了龙云的保护啊!"

该日的情况,柳映光(杨明)在《闻一多就是我们的旗子》有所记述:"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庆,可是庆祝国庆却遭受特务分子的捣乱。那一天,闻先生和他的民主战友们第一次为人民群众认识,反动分子的卑鄙无耻,也第一次为人民大众认清了。那时正是独山失守,桂林吃紧的时候,人心骚动,许多人都准备逃难,闻先生喊了:'不要逃,逃到那里去?没有人抵抗的敌人是逃不过的,站住,我们要站住!组织起来,组织就是力量!'他分析战况时,尤其愤慨的骂道:'这不是撤退,这是溃退啊,溃退啊!'当他的呼喊让听众都感动得要流泪的时候,'炸弹炸弹',特务开始捣乱了;人打做一堆,挤做一团,叫喊哭嚷,还有枪声。闻先生庄严的屹立在升旗台上,动也不动,像一尊铁像。胡子飘拂着,一脸悲愤的表情。"(昆明《民主周刊》第 3 卷第 19 期,1946.8.2)

先生的演讲突出强调了人民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敌人袭来,要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要准备迎击敌人,甚至要准备打游击。这次演讲,后以《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为题,发表于二十二日《真报》评论周刊第十期。收《闻一多全集》。先生说:

诸位!我们抗战了七年多,到今天所得的是什么?眼看见盟国都在反攻,

我们还在溃退，人家在收复失地，我们还在继续失地。虽然如此，我们还不警惕，还不悔过，反而涎着脸皮跟盟友说："谁叫你们早不帮我们，弄到今天这地步！"那意思仿佛是说："现在是轮着你要胜利了，我偏败给你瞧瞧！"这种无赖的流氓意识的表现，究竟是给谁开玩笑！溃退和失地是真不能避免的吗？不是有几十万吃得顶饱，斗志顶旺的大军，被另外几十万喂得也顶好，装备得顶精的大军监视着吗？这监视和被监视的力量，为什么让他们冻结在那里？不拿来保卫国土，抵抗敌人？原来打了七年仗，牺牲了几千万人民的生命，数万万人民的财产，只是陪着你们少数人闹意气的？又是给谁开的玩笑！几个月的工夫，郑州失了，洛阳失了，长沙失了，衡阳失了，现在桂林又危在旦夕，柳州也将不保，整个抗战最后的根据地——大西南受着威胁，如今谁又能保证敌人早晚不进攻贵阳，昆明，甚至重庆？到那时，我们的军队怎样？还是监视的监视，被监视的被监视吗？到那时我们的人民又将怎样？准备乖乖的当顺民吗？还是撒开腿逃？逃又逃到那里去？逃出去了又怎么办？诸位啊！想想，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啊！国家是人人自己的国家，身家性命是人人自己的身家性命，自己的事为什么要让旁人摆布，自己还装聋作哑！谁敢掐住你们的脖子！谁有资格不许你们讲话！用人民的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拿出来为人民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家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叫喊！我们要愤怒！我们的第一个呼声是：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这抗战的最后根据地的大西南！

但是，今天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一方面固然应当向政府及全国呼吁，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认清我们人民自身的责任与力量。对于保卫大西南，老实说，政府的决心是一回事，他的能力又是一回事。郑州、洛阳、长沙、衡阳的往事太叫我们痛心了，保卫国土最后的力量恐怕还在我们人民自己的身上。一切都有靠不住的时候，最可靠的还是我们人民自己。而我们自己的力量，你晓得吗？如果善于发挥，善于利用，是不可想像的强大呀！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以他人民的身份，对于他自己所在的一块国土，都应尽其保卫的责任，也尽有保卫的方法。我们这些在昆明的人无论本省的或外来的，对于我们此刻所在的这块国土——昆明市，在万一他遭受进攻时，自然也应善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尽我们自己的责任。诸位，昆明在抗战中的重要性，不用我讲，保卫昆明即所以保卫云南，保卫云南即所以保卫大西南，保卫大西南即所以保卫中国，不是吗？

在今天的局势下，关于昆明的前途，大概有三种看法，每种看法代表一种

可能性。第一种是敌人不来，第二种是来了被我们打退，第三种是不幸我们败了，退出昆明。第一种，客观上即会有多少可能性，我们也不应该作那打算，果然那样，老实说，那你就太没有出息了！我们应该用奋发的心情准备迎接敌人的进攻，并且立志把他打退，万一不能，也要逼他付出相当代价，再作有计划的，有秩序的荣誉的退却。然后走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给敌人以经常的扰乱与破坏，一方面发动并组织民众，使他成为坚强的自卫力量，以便配合着游击军。等盟国发动反攻时，我们便以地下军的姿态，卷土重来，协同他们作战以至赶走敌人，完成我们的最后胜利。我们得准备前面所说的第二种，甚至干脆的就是第三种可能的局面，我们得准备迎接一个最黑暗的时期，然后从黑暗中，用我们自发的力量创造出光明来！这是一个梦，一个美梦。可是你如果不愿意实现这个梦，另外一个梦便在等着你，那是一个恶梦。恶梦中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这里当顺民，准备受无穷的耻辱。一条是逃，但在还没有逃出昆明城郊时，就被水泄不通的混乱的人群车马群挤死，踏死，辗死，即使逃出了城郊，恐怕走不到十里二十里就被盗匪戮死，打死，要不然十天半月内也要在途中病死饿死。……衡阳和桂林撤退的惨痛故事，我们听够了，但昆明如有撤退的一天，那惨痛的程度，不知道还要几十倍几百倍于衡阳桂林！诸位，你能担保那惨痛的命运不落到你自己头上来吗？恶梦中的两条路，一条是苟全性命来当顺民，那样可以说是一种“不自由的生”，另一条是因不当顺民就当难民，那样又可说是一种“自由的死”。但是，诸位试想为什么必得是：要不死便得不自由，要自由就得死？自由和生难道是宿命的仇敌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由的生！”是呀！到“自由的生”的路就是我方才讲的那个美梦啊！敌人可能给我们选择的是不自由和死，假如我们偏要自由和生，我们便得到了自由和生，这便叫作“置之死地而后生”。

诸位，记住我们人民始终是要抗战到底的，万一敌人进攻，万一少数人为争夺权利闹意气而不肯把实力拿出来抵抗敌人，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不要害怕，不管人家怎样，我们人民自始至终是有决心的，而有决心自然会有办法的。还要记住昆明在国际间“民主堡垒”的美誉，我们从今更要努力发扬民主自由的精神。那一天我们的美梦完成了，我们从黑暗中造出光明来了，到那时中国才真不愧四强之一。强在那里？强在我们人民，强在我们人民呀！今天政府不给人民自由，是他不要人民，等到那一天，我们人民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强起来了，他自然会要我们的。那时我们可以骄傲的对他说：“我们可以不靠你，你是要靠我们的呀！”那便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今天要争民主，我们便当

赶紧组织起来，按照实现那个美梦的目标组织起来，因为这组织工作的本身便是民主，有了这个基础，我们便更有资格，更有力量来争取更普遍的、完整的和永久的民主政治。

大会结束之前，先生宣读了由罗隆基起草，先生润色誊录（最末一段为李公朴抄录）的《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宣言几经修改，特别突出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宣言全文如下：

今年这一个双十节，不但是民国历史上空前的危机，而且是中华民族生命上空前的危机。外则强寇深入，二十余省土地沦于敌手，三亿以上人民变为奴隶；内则政专于一党，权操于一人，人心涣散，举国沸腾。三十三年前祖先苦心缔造的民主国家，到今天，国既不成国家，民更不是主人。瞻顾前途，不寒而栗！

国家所以造成今日局面，绝非偶然。全国人民固应深自愧悔，而专权在位十余年的国民党尤当引咎自责。就拿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来说，抗战初起的时候，全国国民一再呼吁，认为必抗战民族始有生命，必民主抗战始有胜利；认为为民主，对外必实行抗战，为抗战，对内必实行民主。不幸人民八年来的呼吁，竟不曾丝毫影响政局。到了今天，以言军事，敌人无攻不克，我则每战必溃；以言财政，通货是无限制的膨胀，物价则几何数的跃进；以言经济，竭泽而渔，户鲜盖藏，杀鹅取卵，饿殍载道；以言内政，贿赂公行，贪污成风，道德沦亡，法纪废弛；以言外交，对近邻猜疑轻视，对远友评诋谴责。以这样的环境，当这样的难关，若再因循困守，必至国亡种灭。我们外观大势，内察人心，一致认为今日只有内部的彻底改革，方足以应抗战之急，救灭亡之祸。

我们以为今日彻底改革的要图，首先应由专权在位的国民党立即宣布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训政本限定四年。今时间早已超过，诺言仍未履行。民国二十四年及二十五年的时候，政府曾一再宣布召集国民大会结束党治，今则推诿迁延将近十年。民国三十二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又决议抗战结束一年后召集国民大会，结束训政。最近蒋主席又公开昭示国人，正在考虑提前实施宪政。训政果未完成，十年前何以即可实施宪政，训政既可随时宣布结束，宪政又何必推诸明年，更何必待诸战后？八年抗战，牺牲了数千万人民的生命，数万万人民的财产，本应是保全民族生命建立民主政治的代价、而不是为一党一人把持权利的机会。今日的形势既有结束党治，还政于民的需要，而我们国民亦有要求立即实行宪政，实现民主的权利。

其次，今日政府应立即召集国是会议，组成全民政府。国民党既还政于

民，国家必有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使政府得以向其负责。此外如制定宪法，改编军队，整理财政，革新外交等等，必须集全国人民的心思才力，以资应付。至于将来的全民政府既向国是会议负责，即应由国是会议产生。新政府的人选应包括全国各党派之代表及全国无党无派才高望重之人。这样的政府，才能得到国内的团结，才能得到军令政令的统一，才能得到全民的拥护，才能得到盟友的信任，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对新成立的政府，我们认定应立即实现这些政策：甲，绝对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乙，立即释放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丙，立即彻底改善财政及经济政策，停止通货膨胀，且必须用毅然决然的手段，使富有阶级依能力担负战费的责任，以便减轻平民的痛苦。丁，必须彻底提高士兵待遇，调整军事编制，并且普遍平均分配全国军队的装备与供应①。

再其次，我们认定西南的川、桂、滇、黔几省，是今日全国家仅存的托命寄身的根据地，我们必拼全力保持，虽战到一兵一卒，亦必死守不失。第一次欧战的时候，德军已逼近巴黎，福煦将军"他们永远不许过去"的命令，居然转危为安。这次世界大战，苏联以史大林格勒为不可再退的防地，居然转败为胜。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精神决心和勇气以保卫大西南。我们今日应发动西南全民力量，组织群众，武装人民，与敌寇决生死，与国土共存亡。在国家民族生命危在旦夕的今日，凡有与奸伪相勾结，与敌寇谋妥协，为卖国投降的勾当者，我们誓与国人共弃之。总上所言，我们本良心之主张，作救国之呼吁。邦人君子，幸垂教焉。谨此宣言！（该宣言原件，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这次大会由于动员广泛，旗帜鲜明，主持得力，又发表了宣言，在大后方产生不小的影响。会后，又印发了《人民的呼声》（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专册），首刊先生的《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又有楚图南《言论自由与身体自由》、吴晗《中苏邦交与国共问题》、李公朴《改善士兵生活与当前政治问题》、罗隆基《改革政治的方案》。

《人民的呼声》书前有序，题作《为什么刊印这本小册子》。内云："谁亦没有梦想到，中华民国的国民，纪念中华民国的国庆是违法犯禁的事。谁亦没有梦想到，对这样的集会，竟有人用有组织有计划的方法来捣乱破坏，而这种捣乱破坏大会的人，不是外寇，却是中国人。"文中还说："民国愈到危难关头，人民抚今追昔，对双十节这个创造中华民国的节期更感亲切。并且湘桂战事、着着失利，敌寇有进袭昆明

① 这一条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歧视而提的。

的企图。'明年双十节,谁知道我们又在那里?'大家内心都有这样的忧虑,川滇黔桂,这个大西南是中华民国最后托命之所。人民应该起来保卫大西南。人民应该起来商讨挽救国家危亡的大计。这是昆明各界举行双十节纪念大会的主旨。大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会场中突然发生了几次捣乱的风波。事实证明当日来捣乱的人事先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并且有武装。捣乱的伎俩,是放鞭炮,放手枪,成群结队,横冲直撞,以求造成恐怖,闹出惨案。人海中的确起了几次大的波动。听众因奔跑拥挤,受轻伤者颇不乏人。然而捣乱者的卑鄙行为,倒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捣乱者竟不能战胜听众坚持到底的决心。会场秩序后来更镇静,更整齐,更严肃。大会竟得到了圆满的结束。"

先生在双十节的言行,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为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群众集会事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函》中引云南省党部组正二字第八六四号呈文云:"所谓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于昆华女中附小体育场举行讲演。……该会讲演人员为闻一多、楚图南、吴晗、李公朴、罗隆基等。演讲内容,均系反对本党及攻击现政府之荒谬论调。……该等最后并通过宣言,内容多系攻击现政府,极尽狂妄之言词。"(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云南师范学院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3辑,第216页,1980年3月印行)

先生的转变,在西南联大师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常常成为朋友间通信的一部分内容。赵俪生《混着血丝的记忆》中说:"一九四四年双十节以后,我收到挚友昭深君(王瑶)从昆明寄来的一封信,其中以大部的篇幅描述着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近来甚为热情,对国事颇多进步主张,因之甚为当局及联大同仁所忌,但闻先生老当益壮,视教授如敝屣,故亦行之若素也。昆明宪政促进会闻先生推动甚力,双十节召开纪念会时,闻先生朗读宣言,……态度激昂,群众甚为感动,末决议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当场……略有骚动,复归镇静。现闻先生为援助贫病作家,纪念鲁迅,文协,及青年人主办之刊物等,皆帮忙不少,态度之诚挚,为弟十年来所仅见。……在联大上课时,旁听者常满坑满谷,青年人对之甚为钦敬。……'同年同月,复接束衣人君自复旦来信,也同样地道及闻先生说:……在双十节,昆明举行数万人的大集会,……你底那位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的《死水》的作者闻一多老师,不久前高喊田间为时代的擂鼓的诗人,现在,索性抛开书本,高喊民主,做起这数万人呼喊着与愤怒的群众大会的主席啦!当三位主席之一——云大校长说及学问研究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位从旧堡垒里走出来的老诗人立即吼起来:'什么学术,什么研究!抛开它们吧,我们要干,干,干!'"(《文艺复兴》第2卷第4期,1946.11.1)

十月十二日　致臧克家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臧克家曾来信，请先生为他在联大谋一教职，先生回信说："本年联大未添一人，因米贴名额，教部有限制。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此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足重你？你看远大点，勿再叨叨。"又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工作之一，请传观。"所说的"油印物"，臧克家在《闻一多先生的几封信》中尾注："所称油印物，系昆明各界争取民主的宣言，对政府颇多指责，并提出意见数项。其中错字，经闻先生亲笔改正，此项宣言，想系闻先生起草。寄此宣言的信皮上写着联大'高'寄，因恐被扣发不出。"（《文萃》第2卷第19期，1947.2.13）

信中还寄了一幅条幅，是用金文书写的《诗经·小雅·天保》中的两章："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落款书"克家四十初度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闻一多书贺"。此幅可称书法之杰作，尤其是九个"如"字，无一重复，颇具功力。

同日　先生对朱自清说有一商人欲给他月薪一万元之事，朱表示同意。（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16页）此事内情未详。

十月十三日　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致函文协昆明分会转先生并转西南联大中文系、国文学会、新诗社等，对他们在援助贫病作家募捐中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致谢。

原信全文云："文协昆明分会转闻一多诸先生并转西南联大中文系、国文学会、新诗社……诸同学：这次我们发起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得到诸先生和诸同学的热烈响应与实际的援助，我们有大的安慰和深刻的感想。这里我们仅代表坚守岗位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作家群，向诸先生和诸同学致谢！作家的普遍贫病甚至过早的死亡是我们中国的特产——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文化悲剧。因此援助贫病作家不等于'慈善事业'，它是带有一种崇高的文化运动意义的。因为这就是对于促使作家贫病的恶劣环境的一种抗议；因为这就是用社会的大众的力量去保护人类的精华——人类的灵魂技师，推进抗建文化的一种运动；而且这又正是文化工作者'文人相助'的一种团结运动，和以另一种形式争取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民主运动。作家的贫病和过早的死亡，政治的原因多于经济的原因。关于捐款用途，我们除开援助贫病的作家外，其余当用在文艺事业和作家福利设施方面，如提高会刊《抗战文艺》稿费，文艺奖金，以及举办作家宿舍等等。谢谢诸先生和诸同学的热情和实际的援助，我们将在工作上来答谢你们。握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敬启。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渝。"（《联大募款救济作家，文协总会来

信致谢》,昆明《扫荡报》"扫荡副刊"第195号,1944.10.19)

十月十六日 昆明开展的为援助贫病作家的募捐活动十分踊跃。是日《新华日报》在《昆明点滴》中报道:"联大中文学会发起为贫病作家捐款后,并出两壁报以引起同学的注意,其他各壁报也纷纷响应。结果情形十分热烈,捐册多次加印都不够用,募款现已达几十万元,闻有打破百万元的可能。又该校教授闻一多愿意代刻图章十个,每个一千元[①],以为援助贫病作家之用。"

这时,曾昭抡、伍启元、楚图南、李公朴、张光年、赵沨、白澄、常任侠、叶以群等,均由版税或稿费项下捐出一千元。联大国文学会、外文学会、新诗社、神曲社、熔炉社和现实文学、学习、生活、潮汐等壁报及同学,在捐款第一周就募集了四十五万元。

此前,先生向昆华中学学生介绍援助贫病作家意义,动员昆中同学开展募捐活动。时任昆华中学班联会(即学生自治会)主席的王明在《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中回忆说:"一九四四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闻先生叫他的大孩子立鹤通知我到他的家里去",闻先生"向我介绍了重庆张天翼等著名作家贫病交加的情况,并指出作家对抗战建国的重要作用和贡献,希望同学们发起一个募捐贫病作家的运动,表示对作家的崇敬、关心和爱护。我一面表示拥护,一面关心地说:'闻先生不是也很困难吗?'他开朗而诙谐地说:'我贫而不病,有一技之长,还可以用刻刀治印讨生活,并还要用这把刀子赚钱援助贫病作家。'……当时,我是昆中学生自治会(班联会)的主席。第二天,找各班学委研究,统一思想,并得到王云(昆华中学初中部教导主任)老师的积极支持,征得校长徐天祥的同意,决定由学生自治会发起,召开全校性的大会动员,以班为单位在校内校外开展募捐工作。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全校一千多同学和部分教职工,坐在草坪上高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在热烈的气氛中,我代表学生自治会宣布开会后,就请闻一多、楚图南、尚钺三位教授作动员报告。闻先生出现在广场上,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他的飘拂的长髯,闪光的眼镜,炯炯的眸子,破旧的长袍,更加显得神采奕奕,同学们以雷鸣般的掌声表示尊敬和欢迎。闻先生讲话的内容,一是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要靠扛枪的武装战士和拿笔杆的文化战士。二是讲除少数反动文人外,极大多数的作家是爱国的,手脚是干净的,是为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做出贡献的,但他们的遭遇是悲惨的,并详细介绍张天翼等著名作家贫病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悲惨生活。三是动员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热爱进步作家,救济贫病作家,把募捐援助贫病作家

① 关于先生捐刻图章的收费,各种记载有所出入,此处谨据原文。

作为一个爱国运动开展起来。最后表示：他也不甘落后，要用刻图章的刀赚钱援助贫病作家。接着，楚图南和尚钺教授也作了精彩的动员。几位先生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演说，对战友的诚挚感情，以及扣人心弦的语言，格外具有感染力，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最后，由我代表全校同学，表达了我们感受和决心。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有钱捐钱，有物献物，开展募捐工作。由于昆中多系云南同学，亲属和社会关系比较广泛，通过爱国人士、社会贤达也募捐了许多钱。据最后总结，开展募捐的学校，昆中名列第一。特别使人感动的是闻先生夜以继日地雕刻了二十多个图章，以艺术品收费，每个平均约合十元半开，共二百多元。按照当时的生活条件，约可解决两位贫困作家一年的生活。"（《云南丛刊》1986 年第 3 期）为了勉励积极参加这项工作的学生，先生特地为王明等人赠刻了图章。其中沈其名珍藏的一枚，边款刻有"援助贫病作家纪念闻一多赠刻"。这是由于沈所领导的小组，在募捐中名列昆中第一名。由于先生和昆中学生的共同努力，该校共募得三十八万元。后经王云之手上缴。（据访问王云记录，1987.11.23）

十月十九日　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日。下午七时，先生出席西南联合大学"冬青"等五文艺壁报与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在云大至公堂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到会者有徐梦麟、尚钺、楚图南、姜亮夫、李何林、朱自清及各大中学生、职业青年、文化界人士，共四千余人。

开会前几日，大会组织者对是否请先生出席有些犹豫，觉得先生过去属于反对鲁迅的"新月派"，担心先生不愿到会讲话。但他们找先生商量时，先生表示不但要参加，而且要发言。

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当地报纸报道云："昨天是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日，云大学生自治会和联大五文艺壁报，联合主办纪念晚会。下午五点钟左右，云大至公堂里就有很多参加的人，到六点半钟，连外面走廊上也站满了人，有人甚至爬到至公堂的树枝上，整个至公堂都被赶来参加晚会的人挤得满满的了。这中间最多的是联大、云大、中法三大学和各中学的男女学生及文化界、公务员、银行职业等，一共有四五千人。七点钟，晚会开始，首由徐梦麟代表昆明文协分会致辞，继由尚钺、楚图南、姜亮夫、李何林、朱自清、闻一多诸氏演讲，对鲁迅生平、作品及精神等，均有极精到的阐述，尤其对认识鲁迅的战斗精神，特别着重。大家一致指出纪念鲁迅必须学习鲁迅，讲演在热烈的情绪和掌声进行了足足三个半钟头。由联大五文艺壁报朗诵纪念鲁迅的诗，华盖集中《忽然想到》的几节，及田汉改编的《阿 Q 正传》剧本第五幕，非常生动。直到十一点二十五分时，这个晚会才在异常圆满的气氛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散会。"（《鲁迅纪念晚会，四千多人热烈参加，讲演朗诵近五小

时》,《云南日报》,1944.10.20)

会中的情绪十分热烈。至公堂里,除了中间一张演讲人围坐的长桌外,都挤满了人,连走廊上和屋外大树上,也都有人屏息凝听演讲。李何林首先发言,认为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姜亮夫谈到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楚图南举了两个例子说明鲁迅的"老中国人"品质。尚钺用"儿多母苦"概括鲁迅对青年的爱护和关怀。徐梦麟指出鲁迅的战斗思想。朱自清将鲁迅对中国文言的见解作了一番解析。

会上先生的发言在《鲁迅活在青年心里——八周年忌日晚会杂掇》记载到:"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孔圣人!'闻一多先生说这是不对的,'鲁迅大于孔圣人,是中国的圣人是对的,但他却不是中国的孔圣人'。闻先生作了比较:'孔子是□[拉]着时代后退的,鲁迅则是推着时代向前进!'接着他又举出鲁迅先生转移过来的观念:'天灾人祸有人说是为了"天命",鲁先生转移了他,说这是人谋之不臧,这就是鲁迅之所以不同于旧圣人,而是新圣人之点!'"(《云南晚报》,1944.10.20)

先生演讲中说到在北平的"京派"当年如何瞧不起鲁迅,称他为"海派"时,忽然转过身来,向着台正中的鲁迅木炭画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表示道歉,使满场的人大为感动。尚土《痛忆闻师》:"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先生的讲词,他说:'时间愈久,越觉得鲁迅先生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忏悔!'语意沉重,每个字吐得匀慢而清楚,声音里充满了恳挚的热情,略微停顿一下又继续说下去,'日本在政治上是封建的,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然而在文学思潮上始终是进步的,因为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也受欧美帝国主义的欺负,他们也是多介绍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鲁迅先生除介绍这些到中国来之外,还特别注意东欧和北欧作品的翻译,于是奠定了今天中国的文艺道路。然后再看看从英美回来的贡献些什么成绩呢?我真惭愧!……'先生竟能在几千大学生面前这样公开忏悔,二人真是同其伟大,先后辉映!"(《人物杂志》第2年第9期,1947.9.15)

王一(许师谦)《哭闻一多先生》也记述了先生的发言片断:

> 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我们骂错了。鲁迅对,我们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弄到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要和他们来往。(重庆《新华日报》,1946.7.25)

王康《闻一多传》中也有先生这次演讲的记录:

> 有些人死去,尽管闹得十分排场,过了没有几天,就悄悄地随着时间一道

消逝了，很快被人遗忘了。有的人死去，尽管生前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但时间越过的久，形象却越加光辉，他的名声却越来越伟大。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鲁迅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位光辉伟大的人物。因为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

鲁迅生前所处的环境异常危险，他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但是他无所畏惧，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他勇敢、坚决地做他自己认为应做的事，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难怪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恨他！

鲁迅在日本留学，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和洋人，和大官打过不少交道。但他对帝国主义，对买办大亨，对当权人物，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宁可流亡受苦，也不妥协。鲁迅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和他这种高尚的人格是分不开的，学习鲁迅，我想先得学习他这种高尚的人格。

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也是分不开的。

除了这样两种人，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

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现在，不是又有人在说什么闻××在搞政治了，在和搞政治的人来往啦，以为这样就能把人吓住，不敢搞了，不敢来往来了。可是时代不同了，我们有了鲁迅这样的好榜样，还怕什么？纪念鲁迅，我想应该正是这样。（第326至327页）

研究鲁迅多年，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出版了与鲁迅有关的《中国文艺论战》史料集的李何林回忆到：纪念会本来开得很好，轮到姜亮夫教授发言了，就流露出对鲁迅先生的不恭，甚至认为"鲁迅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闻一多先生听后，当即对姜亮夫的发言作出反驳，说"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海派，我们错了。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然后他转过身去，向大会挂的鲁迅像鞠躬敬礼，接着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当鲁迅受难的时候，我们正在享福。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

硬骨头精神，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了。”李何林被先生的发言震撼了，他知道当年像先生这些京派文人学者，把鲁迅称为海派，对鲁迅怀有成见。即使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有些教授依然对鲁迅抱着颇不以为然的态度。姜亮夫的发言不过是一个代表，也是不奇怪的。但先生如此激昂慷慨地给予驳斥，如此沉痛地批评自己，使他感到先生的人格精神。后来，李何林不只一次在课堂上对他的学生说：闻先生的这篇讲演，你们一定好好读。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在文艺界影响很大。郭老后来就说过，闻一多这篇讲演“是把生命拿来做了抵押品的严烈的自我批判”。（田本相《李何林亲历闻一多遇害始末》，《中华读书报》，2003.7.2）

同日　重阳节。赴欧小牧赏菊，家宴，同坐还有楚图南、曹默庵。

欧小牧是与先生、楚图南一起参加昆华中学援助贫病作家募捐动员会时认识的。时，欧小牧住在大西门府甬道周氏通风楼之漏雨轩，因手植菊花盛开，故欲邀请先生与楚图南共度九重佳节。他先到楚图南处说明此意，楚说先生不喜应酬，但仍与他一起赴先生家。欧小牧回忆：“旧历重九日我去约先生来家便饭。先生时因待遇菲薄，不敷家用，兼了昆华中学的课程，就住在校园里。记得先生住在楼上，向东开窗，我们去时，旭日照人，遥望田原无际，觉得很宜于先生居住！‘近日听说先生已乘机飞延安，不料还能见面。’我向先生问起。‘是的，我很想去，可是我一个人走不了，一家八口，由他们饿死么？’先生也笑了。提到请吃饭，先生慨然应允：‘六点钟一定到，五点还有约会。’事前，楚图南先生还怕先生拒绝，其实先生只要来意诚恳，他却豪爽得很。六时，先生准约来了，并换上一件新蓝袍子。”（赵淑兰《我和闻一多先生》，《新华日报》，1946.9.8）[①]欧小牧还回忆到：“重九这天，宾主共四人，其中三人，都是写新诗的；有一人则是专写旧体诗的，便是故友宾川曹默庵，可谓一时雅集了。把酒之际，我曾对闻先生说：‘好久不见先生写诗了？’言下不胜怅怅。楚先生代答云：‘诗人不一定要写诗嘛。’四人为之一笑。闻先生看见我编的《陆放翁年谱》初稿七大本，便说：‘好好，先把长编搞起来。’我由于独学无师，不知治学门径，当时，竟不知‘长编’为何事物？”（《生死情——闻一多先生被刺四十周年祭》，《欧小牧文集》第1卷，第43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十月三十一日　冯友兰请先生与罗常培、朱自清、罗庸午餐，商中文系务事。时罗常培即将赴美讲学，其所担任之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一职，需另行择人。后，罗庸允任斯职。

同日　出席西南联大经济系举办的时事晚会。《联大定今日举行时事晚会》：

① 赵淑兰是欧小牧为写《我和闻一多先生》这篇文章而专起的笔名。

“下月一日为西南联大成立周年校庆，该校经济系一九四五级级会，特定于今日下午六时半，在该校内北食堂，举行盛大时事晚会，邀请周炳琳、陈雪屏、陈岱孙、闻一多、潘光旦、杨西孟、伍启元、金岳霖、燕树棠、王赣愚、费孝通、蔡维藩、雷海宗、吴晗、孙毓棠、崔书琴等十六位名教授，出席指导并演讲。”(《正义报》，1944.10.31)

是月　先生参加联大新诗社为救济贫病作家而发起的募捐活动。

史集《闻一多先生和新诗社》：“中华文艺界抗敌后援协会(老舍先生是艰苦支撑这个民间组织的主将)倡议发起为救济贫病作家的募捐运动，立即得到昆明文艺界的响应，在全国后方各大城市募集到的总数三百多万元捐款中，新诗社募到的捐款就达三十六万元。新诗社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大家的热情奔走外，主要还得到导师闻一多先生和文艺界同志的大力支持。闻先生是八口之家，微薄的教授薪水已难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闻师母又长期体弱多病，这时他已不得不靠公开治印的‘手工业劳动’来弥补生活，他本人也应该被列为应受救济的贫病作家之一。但是，他不顾师生的善意劝阻，坚决要捐出几天刻图章的钱来支援贫病作家。在他的建议和支持下，新诗社的同学选出了部分习作，通过当时在《扫荡报》编副刊的吕剑同志，在《七月诗页》上还为新诗社出了诗专页(究竟出了几期已记不清了，现在只找到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的一期)，并代我们印成一批单张，上面加盖了闻先生‘为响应文协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义卖’的字样，由我们在市内义卖。再通过在朗诵会上的募捐，才募到这三十六万元的捐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

十一月月初　小病。病愈后为薛诚之的诗集《仙人掌》赶写序言。诗集出版时改名为《三盘鼓》[①]。先生的《〈三盘鼓〉序》收《闻一多全集》。《序》的开头部分，实际是借题发挥：

> 诚之最近生过一次相当严重的病，在危险关头，他几乎失掉挣扎的勇气，事后据他说，是医生的药，也是我在他榻前一番鞭策性的谈话，帮他挽回了生机。经过这番折磨，这番锻炼，他的身体是照例的比病前更加健康了。就在这当儿，他准备已久的诗集快出版了，要我说几句话，我想起他生病的经过，便觉得这诗集的问世特别有意义。
>
> 从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危殆，没有甚于今天的，多少人失掉挣扎的勇气也是事实，这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今天诚之这象征搏斗姿态的《仙人掌》，这声言“For the worried many”的诗集的问世，是负起了一种使命的，而且我

① 1987 年，薛诚之在《〈三盘鼓〉序》复印件上，注云：“‘三盘鼓’及‘仙人掌’两个题名都是一多先生拟的，后来以‘仙人掌’的名字及内容刺眼，为了避免检查没收临时改名‘三盘鼓’，但先生的序文早已印好了，所以序文没有改印。”

相信也必能完成它的使命，因为这里有药石，也有鞭策。

文章写毕，曾与薛诚之有过交谈。薛诚之《闻一多烈士永生》："记得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旬的某一天上午，一多先生于小病之后从楼上下来，到我的房里，把为我的诗集赶写的三张序稿交给我。还和我谈了约莫两个钟头的话。涉及的范围很多很广，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衷心感动。他说：'我至今只为三个人的诗集或关于诗论的集子作过序。首先为费鉴照的《现代英国诗人》(新月版)作序；其次为臧克家的《烙印》(开明版)作序；现在为你的《仙人掌》作序，序文中说："这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今天诚之这象征搏斗姿态的《仙人掌》，这声言 For the worried many 的诗集(参看本书后记)的问世，是负起了一种使命的……因为这里有药石，也有鞭策。"实际上也代表我思想的变化，从注意形式及内容到注意思想性及适当的形式。试想想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这种沉重的话我在以前是不会这么下判断的。二十年前，我曾替"温柔敦厚"担心，还怕它会绝迹呢！而现在变了。'他说：'这时代一个特点是诗的题材注意农民、工人、兵士及贫苦的人民，远非徐志摩等人轻飘飘的描写所能及的。试将徐的《乞丐》和臧克家的《洋车夫》对照一下，区别是很大的。你的诗倾向是好的，《小花生米》，《算命瞎子》，《仙人掌》写得动人，《南京路的夏夜》也写得奔放。但《颐和园》，恕我直说，却要不得，不像样，我把它删掉了。为什么发思古之幽情？为什么不把笔锋去讽刺咒骂西太后呢？她的罪恶该多大！还有几首诗含蓄不够，我删了好几段。'"(《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223 至 224 页)

十一月六日　下午三时，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西仓坡五号本校办事处，举行研究生范宁毕业初试。范宁的研究题目为"魏晋小说研究"，考试范围为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中国通史(汉至隋)、中国学术思想史(汉至隋)。先生与汤用彤、游国恩、冯友兰、孙毓棠、朱自清、王力、许维遹、浦江清为考试委员。(据《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同日　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国民月会，教育部代表刘健群报告时事，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讲演，号召青年从军。

时，蒋介石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名，发表告青年书，动员开展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十一日，云南省党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决议组织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龙云任主席，梅贻琦、熊庆来等为委员。联大常委会还专电蒋介石，表示拥护从军运动。接着，联大组织劝征委员会，先生认为青年从军既是抗日需要，又可借以改造国民党军队，所以持支持态度。

十一月十六日　上"尔雅"课，学生却去为罗常培出国送行。先生很生气，问

"要上课不上?"又指着布告上的"罗系主任"几个字,说:写"莘田师不是更亲切吗?为什么把官僚的一套习气搬过来?"[①](张源潜《日记》,未刊)

罗常培行前,联大中文系曾开欢送会。罗在会上说:许多先生都到过外国,自己未曾去过,这次有机会就去一次,偿了心愿,只是不能同大家一起从事爱国活动,很觉遗憾。这话反映了罗常培的矛盾心情,但先生则说:"问题在于爱不爱国,只要爱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可做的事。"在场者都认为先生讲得很对。(据彭允中《回忆闻一多老师》,昆明师范学院编《教育革命》1978年第2期)

十一月二十五日　先生等二十七人,获联大发给之研究补助费一万元。(《西南联大获得研究费教授名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册,第534页)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下午三时,西南联大全校停课,假新校舍北区东饭厅集会,由教授多人向学生做从军讲演。梅贻琦致辞中说:"假使现在不从军,则二十年后将会感觉空虚。"钱端升说:"现代战争是为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头脑与现代化生产的战争。凡此均需现代化头脑现代化技术,此则非知识青年不为功也,故必须知识青年参加。"冯友兰说:"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艰苦的时期,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担当了,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式武器、新式装备可供应之时,知识青年应避免其应尽责任么?"周炳琳说:"同学们在壁报上谈话常有意见,常有呼吁,事实上便也应有热切的表现。"燕树棠亦以美国第一次欧战时青年从军情形勉励同学。

先生亦作了激昂慷慨的讲演。《联大昨举行盛大演讲会,教授勉学生从军》报道:"闻一多教授乃开始其热情演说。闻先生首谓彼之要响应知识从军,要鼓动知识青年参加乃由有'时代的感召'与'□恳的号召',并谓:现在抗战已至最艰苦的阶段,知识青年此时实深应自动放弃不当兵的'特权',而在抗战最后阶段更应肩负起责任。许多人谈民主,若自己本身去焉责任,尽义务,那才真正有资格谈民主,而知识青年军也就是真民主的队伍。"(昆明《扫荡报》,1944.11.30)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亦有记述:"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第349至350页,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

这些讲演很有鼓动性,有的同学听后即去报了名。《联大师生从军,昨竟日热烈发动》称:"自前日下午梅校委贻琦及冯友兰、闻一多等教授讲演后,顿激起同学

① 罗常培,字莘田。

之情绪，故报名登记即行展开。昨日上午九时起，该项报名参加之运动，已在校中造成热切之气氛，同学多纷纷至征集委员会登记，热切从军，至下午五时许止，报名登记之教职员计共有一百八十九人。"（昆明《扫荡报》，1944.12.1）

马千禾（马识途）得知先生这次即兴讲演，立即去找先生。他在《时代的鼓手——闻一多》中有记述："闻一多一时冲动，在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号召：'有血性的青年，从军去！'当场就有一些同学报了名。会后我们才知道了，我赶到他家里去问他：'你怎么到他们这样的会上去讲话呢？你知道有的同学是听了你的话才去报名的吗？'他一下愣了，说：'鼓励青年为改造国民党军队，为取得抗日最后胜利而参军，有什么不好呢？''你以为他们真要把这支青年军用来抗日吗？你以为用这一批知识分子就可以改造好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军队吗？'我反问他。他问：'不用来抗日，用来干什么？''打内战，反共。''他们才开始组织青年军，你怎么就断定他们用来打内战呢？他们那天当众宣布，这支青年军就是为了抗日战争最后反攻而组织的嘛。'他不理解地问。'国民党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这是尽人皆知的。蒋介石说过，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宁可失地千里，生灵涂炭，也不肯把他的老本钱胡宗南的精锐大军拿出来抗日，却紧紧围住陕甘宁边区。你想他愿意把全新美式装备的青年军用来抗日吗？国民党的漂亮言辞我们是听得够多的了，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我冷静地说服他。'但是这是美国给装备的，不抗日美国肯答应吗？'……'美国人何爱于共产党呢？而且装备到了国民党手里，美国也管不着了。'他沉默了，正在思索。我补了一句：'你想国民党、三青团那么积极干的事情会是好事吗？值得你去支持吗？''哦，我没有想到。书生，书生气。'他自己责备自己：'那么怎么办？我在民主墙上发个声明吗？'我又为闻先生的直率而好笑了。我说：'用不着了，我们已经做了补救，进步分子不会去上当的，壁报马上就会出来。'"（《景行集》，第96至9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

是月 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决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会议推选先生与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李公朴、楚图南、吴晗、杨怡士为执行委员。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周新民任组织委员、李公朴任宣传委员、吴晗为青年委员[①]、潘光旦为财务委员、杨怡士为秘书处主任。（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第10页，1981年11月印行）时，民盟云南省支部有盟员四十四人。

十二月二日 日军占领贵州独山，贵州全境面临沦陷危险。消息传来，昆明城

① 亦有人回忆潘大逵也任青年委员。

中人心惶惶，达官贵人纷纷收拾细软，准备再次逃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见面时，交谈的中心议题也是战局与疏散问题。然而，先生这次明确地对妻子儿女们说：这次我们不跑了，我把你们送到安全地带后，要到农村，上山打游击。

十二月五日　下午三时，出席西南联大教授会议，决议对知识青年从军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四项建议。时，不少联大学生认为知识青年从军是抗战需要，但又担心为国民党军队补充兵员，加剧国共两党矛盾。为此，联大教授会议决议建议："一、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二、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三、关于提高知识青年军待遇一节，应对所有作战士兵，普遍提高，过去对于军需经理方面弊端百出，请予彻底改善。四、请统帅部延用优秀后进军官。"（《联大全体教授会议决定实行军训，在校教授学生一律参加》，昆明《正义报》，1944.12.6）

十二月八日　应云南男女青年会同工读书会所请，演讲"士大夫与中国社会"。未刊手稿中有这次讲演的提纲，标题为篆书，题下有双行小字，云："三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云南男女青年会同工读书会讲，十日座谈会讲，十二日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讲。"提纲下列有十三个小题，为："一、中国式的社会。二、近代人民身份与意识中的奴隶形态。三、傈罗的初期奴隶社会。四、殷周奴隶社会初期形态的推测。五、殷周革命的社会背景。六、缓冲阶级之兴起。七、释儒。八、孔子与儒家思想。九、墨家。十、道家。十一、汉代儒家的复兴。十二、从殷末到今天——一部奴隶解放史。十三、新时代与士大夫。"提纲全文较长，仅节录若干如下。第一小题《中国式的社会》中，先生有这样的话："士大夫的中心思想是儒家。百家思想，只是被儒接受，与儒调和的——各种新儒家。儒家的中心人物是孔子。孔子自称继承周公——周的创业者。周公的事业，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奴隶社会，以奴隶为生产工具。士大夫思想，必是代表奴隶生产关系的思想。自□明初发出曙光以来（殷周间），至今历史未大变。今士大夫思想，也还是代表奴隶生产关系的思想。""中国从春秋中叶起，即已开始转向封建社会"，"但奴隶社会的本质，直到今天未变，变的只是外壳。""中国式的封建社会（春秋中叶以下），应称为奴隶社会的尾巴，而且是一条狐狸尾巴，比任何民族奴隶社会的尾巴都大。或准奴隶社会，这名称，至少可以说明某种现象，不以辞害意。"

第二小题《近代人民身份与意识中的奴隶形态》中，有一小节题作《生活科学与生活艺术》，云："中国思想家的智力，并没有用在那可以形成机械学体系的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面，并没有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根本的紧急任务。这个远东大国的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课题，即农业秩序所产生的，及直接和农业秩序有关的，或在

观念上反映着农业秩序的各种课题。”

第六小题《缓冲阶级之兴起》，先生认为是“以奴隶管奴隶”出现了缓冲阶级。“管奴隶的奴隶，初犹未忘种族意识，而又感于主人的恩德。故对双方态度，能不偏不倚。当两方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便起了缓冲作用。只因为立于中间做调人，故他的观点必然是折中主义的。让一方面少吃亏，一方面少占便宜。而不能问真是非，依是非的准则来判断（就事论事、既往不咎）。反正就主子方面说，爱惜奴隶即爱生产工具，让步正是自己的利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就人民说，让步即可减少自己的痛苦。他的态度像是忠于两面。而也忠于自己，因为这样自己的地位便稳固了（只不忠于真理）。所以他最忌上下意见相同，同则矛盾统一。君子和而不同，‘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东方朔）亦忌一面太强，压倒对方，则矛盾亦消灭。故暴君乱民，皆所反对，最好在均势中维持平衡。但□权力是上头大点，而且自己的特权是上头给的，绝对持平不可能。久之，种族意识变了，不免出卖奴隶。但有时亦出卖主人。然而两面都需要他。”

第十二小题《从殷末到今天—— 一部奴隶解放史》，有四小节，是对中国社会的概述。为保存原稿面貌，故以原格式抄录如下：

一、真性奴隶社会前期

奴隶社会的特质是阶级

阶级出于种族差别

农业生产工具进步，利用俘虏，奴隶社会出现

生产奴隶的榨取，使社会繁荣、文化进步

生产奴隶转化为革命的力量

新领主起来

二、真性奴隶社会后期

文化业奴隶乘机起来，充当缓冲阶级

使士与农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温和的榨取政策，保障了人民的剩余劳动力，以从事私有生产

私田与工商业的发达，冲破了封建阶级秩序

生产奴隶获得解放，变为庶民

贵族与缓冲阶级同趋没落

孔子（缓冲阶级的发言人）呼吁复古，无效

三、准奴隶社会发育期

新贵族利用地主与工商业资本家，起来代替了旧贵族

被解放的工商业奴隶，上升为官僚阶级，代替了文化业奴隶的缓冲阶级

新贵族利用官僚的进步技术，对农民的榨取更残暴

但工商业带来的铁的使用，也为农民改良了生产工具

同时无异以走私方式武装了农民

六国灭亡，种族因素使人民身份中的奴隶性，加速并加倍的暴露

农民暴动，因文化业阶层的协助而成功

新贵族的政权倒了

四、准奴隶社会定型期

文化业阶层协助农民，阶层稳定了一个以重农轻商为国策的政权

马上又利用这政权，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国教

这样，他便以把握太上政权的方式篡取了政权

一面又和工商业阶层的官僚结合，对农民施行一种大体上温和的剥削政策，直到如今

五、准奴隶社会解放期

因帝国主义而奴隶身份又显（民族主义），西洋思想的怂恿

海禁开后，从工商阶层中产生了买办阶级

代表地主阶层的士大夫的统治实权转让给帝国主义

奴隶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需经过

有缓冲阶级的奴隶社会，是好的奴隶社会

孔子欲恢复，未成

因历史在急剧的变革中，好的过时的政策，也挡不住时代的巨轮

到汉代，变革过程完成了，要休息

休息必需平衡

缓冲阶级应运而兴，充当平衡的支点

但缓冲阶级是奴隶社会的产物

缓冲阶级的复兴，便天然保障了奴隶社会残余势力的存在

历史便在以缓冲阶级为支点的平衡上，睡着了（从工商业回到农业，毁坏了前期的科学萌芽）

千余年中，偶尔翻一二次身，但始终未醒

周公孔子董仲舒配合着老庄、韩非、邹衍的安眠药 sandman 对于疲劳者是好的

但正因它好，才阻止了历史的发展

为什么要发展？

那好只是“叫受委曲的少受点委曲”的好

我们要委曲完全绝迹于人间

要阶级完全消除，人类一律平等、一律自由

不是做舒服的奴隶，是不做奴隶。（当初非做不可，只好求其舒服点。今天知道舒服只是暂时的，要永久的舒服，便永久不做奴隶；甚至暂时不舒服亦不辞）

第十三小题为《新时代与士大夫》，作为本文的总结：

“自由”“平等”是舶来品

海禁未开前，二千年来，从未认真想起这些观念

有恕厚的奴隶，有狡狯的奴隶、有逃亡的奴隶。（达观、发脾气、撒娇）

只没有反叛的奴隶

有反叛这个主子，投奔那个主子，打倒旧主来拥护新主的

从无不要任何主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

只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西洋人，才有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人的观念

孙中山先生首先接受这观念，便要实现一个没有奴隶的中国（他似乎以为没有奴隶主，便没有奴隶　并以为那大清皇帝便是奴隶主　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换来了一个中华民国）

中山先生是第一个想到一个“没有奴隶的中国”的中国人

他是古代首先想起不杀俘虏，而用他做工，因此创造了中国的奴隶社会的那位圣人以后的唯一圣人。因为中国历史在开始役使奴隶时，转变了一次，直到中山先生不要奴隶，才开始转变第二次。历史通共只变了两次（大时代），前有远古的那位无名圣人，后有孙中山。孔子算得了什么，他只是拉着历史不许变的人，是中山先生的罪人

但是没有皇帝的中国，还没等到中山先生死，便急着三番两次要皇帝

原来，奴隶不因奴隶主的不存在而不存在

做了二三千年奴隶的人，失了主子，是不舒服的

那对假冒缓冲阶级的士大夫，尤其不方便

复辟没有成功（幸亏有云南起义，是谁讨厌它，要取消它的纪念日！）

大概认了帝国主义做主子（次殖民地）。（买办）

但有人喊要打倒它

抗战后，人家放弃了治外法权，并请咱们做四强之一
国外找不到主子，还是在国内找吧
于是便有人献鼎了，也有人愿做“王者师”了
中庸必需两端，缓冲必需制造矛盾
士大夫必需复古，尊孔，讲中国式的民主，是命运注定的
　世界潮流
　理论与榜样
　说破不得
　问题只在怎样实现
　法西斯
　士亦受压
　分化、下沉
　殷秦——士农合作
别的且不说，自己压着人，同时自己又被另一种人压着
要推翻自己身上的重量，最好是让自己身下的人，和自己同时用力来扣
一人的力量，不如两人，不很明白吗
并且受一层的压，如果苦，受两层的压，岂不更苦
你的同情心呢？
起来，还是大家一齐用力吧

十二月九日　昆明《民主周刊》创刊，这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社址在府甬道十四号。该刊首任总编辑为罗隆基，先生以支部宣传委员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编辑委员。该刊是以潘光旦的名字登记的，因为主持新闻审查的金某是潘的学生。（据访问杨明记录，1986.7.17）

同日　流金（程应镠）的《一二·九回忆》刊登于昆明《民主周刊》第一卷第一期。这篇稿件是月初送到先生手中的，时先生正在编辑稿件，程应镠《闻一多先生二三事》：“十二月初，我给《民主周刊》送去一篇纪念一二·九的文章。他指着一堆文稿对我说：‘有些人写文章马马虎虎不严肃。编这个刊物，我只是改错别字，改不通句子。我相信那些写文章的人，只要写完了再看一遍，所有的错误自己都能改正过来。我还不写政治的文章，我知道写不好，现在正在学习，一旦有了把握，就要写了。’”（《上海盟讯》第295期，1986.10.31）

十二月十日　《一个白日梦》发表于昆明《自由论坛》第十一期。收《闻一多全集》。

先生每次到市中心去时，几乎都要从位于翠湖中心十字路口某军事单位门前经过，该单位大门两侧挂有两丈来高的字如斗大的木质标语牌，上书“顶天立地，继往开来”八个字。先生的《一个白日梦》就是由此感发的。文中批判个人主义，批判本位主义，还批判了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说它“简直是因毒菌败坏了一部分细胞而引起的一种恶性发炎的痈疽”。

该文原题《恶性发炎的个人主义》，斥责国民党统治已到了“恶性发炎”的地步。这种文章难以发表，不得已由一位老友代笔改动，其文与先生原意自然有所差别了。刊登时，编辑又用涂换原稿的办法，在已送审盖了图章的另篇稿子夹缝处抄入此文，排版时再临时换了个标题，才得以与读者见面。（据王康《闻一多传》，第319至320页）在先生手稿中，有页自撰杂文目录，上面写的仍是《恶性发炎的个人主义》。此文刊登后，编辑与刊物都受到警告，发行人一再强调不能再登此类文章，否则就得关门。

同日 昆明《扫荡报》“省市鳞爪”报道，昆明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应爱好文艺者要求，自第十九届起增设文艺讲座一科，敦聘先生与楚图南、李何林、李广田、尚钺、章泯分别主讲文艺诸问题。次年一月十八日，《云南日报》在《昆市点滴》中云：“中华职教社所主办之文艺讲座，前三讲已由尚钺、闻一多、楚图南分别担任讲授完毕。”

十二月十二日 应西南联大文史学会邀请，在联大昆北教室讲演“士大夫与中国社会”，这是近几天第三次讲这个题目。

寄思《回忆闻一多教授》中说：“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的冬季，昆明的报纸上出现了关于‘士大夫与中国社会’的论争。有一个晚上，文史学会请闻先生演讲，题目是与儒家有关的。闻先生从考证及社会史上分析儒家的起源和作用，归结到今天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听讲的人在一千以上，一个最大的教室内外都挤得很密。讲完以后，作主席的中文系主任罗庸先生作了结束，并且征求同学二十人，送闻先生回到城外的住所，因为闻先生在演讲中曾提到张良所加于秦始皇的博浪之椎，所以罗先生开玩笑，说所以要送闻先生，也是怕碰见博浪椎，这引得大家都笑了……当闻先生回家去的时候，跟着他走的同学，有五十多人，一路上还在回答同学的问题。我也默默地跟在后面。”（《文萃》第40期，1946.7.25）

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张友仁在日记（未刊）中亦有记述：“晚上，听闻一多先生在联大昆北教室讲《士大夫与中国社会》，是分析儒家对中国社会的功过。听众甚为拥挤，不仅大教室内没有隙地，就连门窗上都爬满了同学。讲演毕，已是深夜，会议主席提议：近来昆明郊外秩序不好，闻先生独自一人返回西郊昆华中学宿舍是

十分危险的，希望与会同学护送闻先生返回寓所。当时就有三十多位同学举手报名参加护送。其中既有联大学生，也有云大和中法大学的学生。我和联大同学赵元亮、王植棠等都参加了护送。一路上同学们围绕着闻先生频频提出问题，先生则谈笑风生地一一作答。当我们走出昆明大西门经过龙翔街口时，有两名荷枪实弹的云南士兵看到我们这一小群队伍行进，就跑步过来阻拦和盘问。当经云南籍同学出面与之交涉，用云南话说：'我们是送老师回家'等等，才得通过。"

十二月十三日　晚七时，出席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联大新校舍北区东食堂举办的第二次时事座谈会。座谈会总题为"一年来国内局势的检讨"。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教育五讲，由张奚若、曾昭抡、伍启元、李树青、吴晗及先生主讲。（《省市鳞爪》，昆明《扫荡报》，1944.12.14）到会者有两千余人。

时，新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五点协议，核心为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周恩来遂与赫尔利至重庆，与国民党商谈联合政府问题。联大座谈会即在这种形势下举行。会上张奚若讲政治，曾昭抡讲军事，伍启元讲经济，李树青讲社会，吴晗讲教育。最后，先生讲"一年来的中国文化"，并对此次座谈会作结论。至十时许散会。（据《联大昨举行时事座谈会》，《云南日报》，1944.12.14；张友仁日记，未刊）

是月中旬　与吴晗一起，邀洪德铭、陈定侯、王念平等座谈，并商谈筹组"民主青年同盟"事。

时，洪德铭等人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同志会"，在串连中认识到只有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宗旨，以团结群众参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为基本任务，以进步青年为吸收对象，组织才能有生命力。他们受十一月上旬成都建立的"民主青年协会"之启发，决定把组织名称冠以"民主青年"四字，并推洪德铭、严振、萧松、朱谷怀等为发起人，洪为召集人。洪德铭回忆："我在与闻一多、吴晗多次接触中，估计他二人和党有联系，觉得不能错过机会，于是把我们建立秘密组织的计划向闻一多、吴晗作了详细介绍，他二人深表赞同。与此同时，经王念平介绍，联大法学院陈定侯、工学院何东昌也被邀请参加筹建工作。组织的名称按闻、吴先生建议，定名为'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十二月中旬一个晚上，闻、吴先生邀请我与陈定侯、王念平等座谈，交换意见。他二人除谈了举行护国起义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和游行计划，要我们做发动工作和希望我们加入民盟外，还着重谈了筹建民青的问题。我们研究后决定不参加民盟，但决定以师生关系接受闻、吴两先生对民青的指导，在民主运动中拥护、支持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同民盟和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并由我向他二人作了说明，他二人都欣然同意了。他二人还告诉我，已将筹建民青的情

况告诉了中共朋友(指华岗),得到了同意。在闻一多、吴晗的指导帮助下,民青的筹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十二月下旬,第一批参加串连的同志增至三十人左右。其中西南联大学生二十多人,云南大学学生五人,东方语专学生二人,职业青年二人。"(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十二月二十五日 云南护国首义二十九周年纪念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制,激起拥护共和的全国民众反对。二十五日,云南都军唐继尧率部通电反袁,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出兵征讨,首揭全国反袁义帜。袁世凯忧忿死去后,北京政府依据国会议决,公布以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国家纪念日。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将云南起义纪念日并入十二月五日肇和兵舰起义纪念日举行庆祝,引起护国将士和云南人民异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云南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建议省政府说明是役与肇和之役各有不朽价值,恳转请中央依据原案,照旧分别举行。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复电照准。所以,是日作为恢复护国纪念的第一个节日,格外隆重。除云南省政府上午九时举行扩大纪念会外,下午一时,昆明各界亦在云南大学会泽院右侧广场召开了盛大纪念会。

这次大会,当地报导曾有预告,云:"本月二十五日为云南护国起义第廿九周年纪念日。护国一役,推翻专制,再造共和,奠定民主政治之基础,意义重大。此间文化界有鉴于此,特订于是日下午一时假云南大学扩大纪念大会,除请白小松、李子猷、马伯菴、唐小蓂、张奚若、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潘大逵、曾昭抡、徐梦麟诸先生莅□指导外,并有多人发表演讲。题目已定者有吴晗先生之《护国纪念之历史意义》,闻一多先生之《护国起义与民生政治》。欢迎各界人士自由参加,内容精彩,届时定有一盛况云。"(《护国纪念游行办法决定,文化界在云大举行扩大庆祝》,云南《民国日报》,1944.12.24)

这次大会对外以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名义,实际是云南民盟发起并负责筹备。在云南民盟提议恢复护国纪念的会上,先生便与其他负责人共同商量了开会地点、发起团体、会议程序等。当时,大家还同意将西南联大新诗社作为发起团体之一,由先生联系。其余发起团体还拟有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男女青年会、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民主周刊社、自由论坛社、评论报社、真报社、文协昆明分会、中苏友协昆明分会等,分别由潘大逵、吴晗、曾昭抡、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楚图南等人联系。为了使这次大会成功,筹备会曾于十二月五日、十九日、二十二日,相继在西南文献研究室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中二十二日下午七时召开的第三次筹备会,出席者有西南联大的程法伋、王念平、齐亮,云南大学的杨维俊、莫翰文、蒋阜南、张纪域、邹宏楷,中法大学的杨明、赵谦、王光闾、金兆瑞、邬联彩,英语专科学校

的刘希武、万若愚，民主周刊社的吴晗、罗隆基，学术界宪政研究会的杨怡士、曾昭抡、潘大逵，中苏文协的苏均持，真报社的陆逸君，评论报社的楼兆揭，昆华工校的郭纯、李春寿、王荪，中法大学附中的杨虎、杨嘉禄、王嘉培，龙渊中学的李永寿、刘景善，及求实中学代表和唐筱葭等。会议由潘大逵主持，决定演讲者为：白小松、马伯菴、李子猷、唐筱葭、吴晗、闻一多。会议还在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起草的九条口号基础上，通过了十三条口号：纪念护国，发扬再造共和精神；立即实行宪政；保障人了身体自由；取消审查制度，开放言论自由；武装民众，保卫大西南；拥护龙主席，保卫大西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消灭法西斯；惩办贪官污吏；发扬护国精神，彻底实行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拥护共和，消灭独裁政治；加强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据《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筹备会第三次会议记录》，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参加筹备会议的王光闾同学回忆筹备情况时说："会上推选吴晗先生起草宣言，闻一多先生加润色。中心内容就是要发扬云南首先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提出国是宣言，大会示威游行时标语口号：实现民主政治、取消专制独裁；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新闻检查，保障言论自由；取消特务组织，保障人身自由。最后还提出了'拥护龙主席，保卫大西南'，争取龙云对民主运动的同情与支持。当讨论大会宣言及标语口号时，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曾昭抡先生的意见是，这次是首次在昆明集会示威游行，口号标语无妨提得缓和策略一些，以免引起当局的反对，以利今后的继续宣传；另一种意见是：这些标语口号都是针对时弊而发的，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就不怕反动派压制"。最后，一致通过了后一种意见。（王光闾《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88至18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文化界纪念大会的情形，次日《正义报》以《护国精神复活了——记文化界纪念会及大游行》为题作了报道。文中说：一点多钟，潘光旦走上主席台，宣布开会，致词中说："今天我们纪念护国，第一因为中央已准恢复纪念，第二因为时局的严重，所以意义特别重大。"护国将领黄斐章在演讲中特别指出了三点重要意义："一、中国历以仁义为基础，护国精神便是仁义的表现。二、共和与专制的分界。三、守法的精神，此值得遗赠后人，后人应学习而发扬光大者也。"唐继尧的儿子唐筱葭谈了感想："一、希望对护国有正确性的历史。二、了解护国精神，护国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运动。三、发扬这一宝贵光荣的传统。"白小松演讲中说："护国首义是求国家民主自由真正之实现，护国精神便是民主精神"，"希望我们正确了解护国的史实和意

义，能这样，国家民族才有前途。”护国起义参加者由云龙在会上“述说了当年五日的情形：跟今天的天气一样的暖和，跟今天的大会情绪一样的兴奋，然而首义虽已发动，元勋们仍战战兢兢，到各界的游行队伍上街时，满街欢声雷动，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后，元勋们的心才安定下来，而能壮胆的去干了。人民不仅安慰了他们，支撑着他们去做，并保证了这一运动的成功。人民的力量是这样伟大不可侮呵！”预定有两位教授发言。吴晗“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护国运动的意义，分析极为详尽”。闻一多在发言结束时说：“由于护国的精神、护国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正确认识了护国的意义，纪念是不会失败的。”

先生在会上演讲题为“护国起义与民主政治”[①]，内容及会场情绪在王康《闻一多传》中有记录：

> 我们是应该惭愧的，应该对护国的先烈们惭愧，应该对在座的护国英雄们惭愧！
>
> 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像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群众回答说：“是的，没有死！”一些参加过护国起义的老先生也笑了：“我们真是老糊涂了！”他回头对老先生们说——你们比我们清醒，你们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袁世凯！护国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因为全国人民都要求民主，就可以得到全国的响应；因为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打倒袁世凯！
>
> 三十年后，我们所要的依然是民主，要打倒独裁！
>
> 现在毕竟和三十年前不同了。我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更强大了，让我们就从昆明开始，继承护国精神，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更大的胜利！（第330页）

会后，举行群众游行，先生和几位教授走在队伍中。当队伍走过闹市准备散去时，先生又被人们拥到一个高处，即席讲了一段话。这段话也见于王康《闻一多传》：

> 我们胜利地纪念了“护国纪念”二十九周年。
>
> 你们看，我们的队伍这么长！
>
> 这是人民的力量。
>
> 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他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
>
> 这是时代的洪流，它要冲垮一切拦在路上的障碍。
>
> 一九四四年就要过去了，我们要更好地迎接一九四五年！

---

① 这是《正义报》云先生准备演讲的题目。《新华日报》1945年1月6日《昆明纪念护国起义那天举行群众大游行》云：“吴晗，闻一多两教授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话题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现实’。”

让那些嫉妒我们，害怕我们的人发抖吧！（第331页）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大会，对社会动员的广度是抗战以来昆明地区鲜有的。尤其是大会通过了《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宣言》，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主张，表现了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完全一致的立场。这个宣言为吴晗起草，先生润色后誊录，全文云：

今天是护国起义的第二十九周年。护国起义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之所以值得我们纪念，是因为它曾在全民族反对独夫政治，反对封建余毒的胜利中，为我们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谁能否认这是一个全中国人民所珍惜、所心爱的日子呢！对于政府这次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之后，居然把它规定为全国人民的纪念日，无疑的我们是竭诚拥戴的。因此，为仰答政府的盛意，特别是今年这个护国纪念日，我们更应该热烈的庆祝一番了。

然而，我们纪念二十九年前的护国起义，不能不更关怀于当前的救国抗战，庆祝昔日护国起义的成功，不能不更焦心于今天救国抗战的胜利。

讲到八年抗战的成效，我们实在不忍心，然而又不能不承认以下的这些事实：纲纪废弛，贪污成风，这是我们的政治；富人的黄金让它冻结在国外，国内不值钱的通货却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让它膨胀，这是我们的财政；朋友得罪完了一个，再得罪一个，这是我们的外交；借党化之名，行奴化之实，这是我们的教育；兴建既没有计划，管理也没有方法，这是我们的交通运输；至于军政，讲起来更令人痛心，平时则征兵全是弊端，训练同于虐待，战时又统率毫无方针，赏罚只凭好恶，怎么能怪他士气消沉，还没有见着敌人就溃退呢！这成什么抗战啊？政治和军事脱了节，财政和军事分了家，外交跟军事为难，教育给军事抽腿，交通运输更没有替军事卖力。这成什么抗战啊！军队不能与人民合作，军队与军队又不能合作，后方不能与前方合作，政府尤其不能与人民合作。

看啊！短短数月的期间内，由洛阳而郑州，而长沙而衡阳，而柳州而桂林——这一连串的军事溃败，和陪伴着军事溃败的物资损失，和人民流离失所与死亡，乃至同样严重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盟邦友人不但失望，而且痛心。看啊！这便是八年来内部腐烂的后果，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危机！

闯了这样大的乱子，造成这样严重的局面，又岂是调动几个行政官吏，分出或裁并几个行政机关所能补救的？要晓得抗战是要动员全体人民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还得要整个中华民族来拯救。保证抗战胜利唯一的方法还是民主政治，而所谓民主政治当然不仅是一些空洞的诺言和漂亮的宣传，或审查

条例、特务组织和集中营等等花样的加紧运用所能了事的。要实施民主政治，就得有具体的方案和明确的步骤。根据上面的原则，我们今天郑重的提出下列三项要求：

一、结束一党训政。化一党的国家为全民的国家，以期实现真正的全民动员。

二、召集人民代表会议。集全国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优秀人才于一堂，群策群力，共赴国难。

三、组织联合政府。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各党派代表人物及全国众望所归的领导人才，负国家民族安危的重任。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与政府一体，军队与人民一体，后方与前方一体，而政治、财政、外交、教育、交通运输自然也与军队一体了——只有这样，人民才是为民族的解放而战，为国家的光荣而战，那就是，人民为人民自己的生存与自由而战——只有这样的全民战争，才能驱除敌寇，收复失地，才能保证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艰难的，它必需全体人民的群策群力才能完成。一个人大权独揽的君主专制政体，或少数人大权独揽的一党专制政体，都不足以担当这样艰巨的责任，何况权力的独占，其势必流于权力的滥用的恶果呢？二十九年前护国起义的先烈们知道国体改变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便受了威胁，所以他们不辞艰险，就在这个城市里振臂一呼，举起了打倒独夫政治，根绝封建余毒的大纛。二十九年后的今天，国家民族的生存实际已经危在旦夕了，我们纪念护国起义，更懔然于当前危机的症结就在少数人大权独揽的一党政治。护国起义的意义，加强了我们对当前局势的认识；护国起义的精神，警醒了我们对当前局势的责任；护国起义的成功，也鼓励了我们对改正当前局势的工作的信心。只要中国人民有了护国先烈的大知与大勇，中华民族的前途便永远是光明的。让我高呼吧：

民主政治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据家藏此宣言手稿照片）

附：一九四五年元月三十日，康泽给教育部长朱家骅信中，云："据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拥护共和起义纪念，昆明文化界假云南大学至公堂开会庆祝，内有反动分子藉名参加，实行反动宣传，参加听讲者约二千人，其中大中学生居多。大会主席为联大教授潘光旦，发言者以联大教授吴晗、闻一多等，措词偏激，攻击本党，煽动学生，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宪政，取消审查制度，开放言论自由，保障身体自由云云。会后游行市街，参加者约千余人。"（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一

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3辑，第216至217页）

十二月二十七日　晚，出席自由论坛社主办的“中国的出路”座谈会。出席者还有张奚若、罗隆基、王赣愚、孙毓棠、冯文潜、潘光旦、王逊、杨西孟、丁则良、李树青、费孝通、沈有鼎、郭相卿、曾昭抡、吴晗等。会上，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相继提出的问题有新中国与旧传统、士大夫与中国社会、中国问题的症结、工业现代化、教育的功用、中共政策与革命、文化革命、经济政策、怎样改良中国的政治、中华民族的缺点等。（《中国的出路》，《自由论坛》第3卷第5期，1945.3.20）

是月　作《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后发表于次年十月郭沫若主编的重庆《中原》第二卷第二期。收《闻一多全集》。关于本文的写作原因，先生说：

> 本年九月间，朱佩弦先生从成都给我一封信，内附孙次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作《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是从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剪下的。信上说，在本年成都的“诗人节”纪念会上，孙先生提出了这问题，立时当地文艺界为之大哗，接着就向他发动围攻，直到最近，孙先生才开始公开抵抗，那便是这篇文章的来由。佩弦先生还说到他自己同情孙先生的意思。后来他回到昆明，我们见着便谈起这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我和他谈到和孙先生类似的意见，他只摇摇头。（十几年是一个太长的时间，我想。）这里让我打一个岔。就在本年暑假中，我接到某官方出版机关的一封信，约我写一本《屈原传》一类的小书，我婉词谢绝了，读者此刻可以明白我当时的苦衷吧！好了，前几天佩弦先生又给我送来孙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在这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的附白中，孙先生转录了李长之兄给他通信里这样一段话：“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本来我看到孙先生第一篇文章时，并没有打算对这问题参加讨论，虽则心里也曾发生过一点疑问：让孙先生这样一个人挨打，道义上是否说得过去呢？如今长之兄既把我的底细揭穿了，而孙先生也那样客气的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这仿佛是硬拖人下水的样子，假如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这来，我的处境便更尴尬了，我当时想，如果再守口如瓶，岂不成了临阵脱逃吗？于是我便决定动笔了。

孙次舟是华西大学教授，其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成都“诗人节纪念会”上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一说，并于九月六、七、八日在成都《中央日报》副刊连载《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十一月十五、十六日，其又在《中央日报》副刊连载《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文末附言云：“闻一多先生亦有此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比”，“且幸吾道不孤，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

甚”。而早在两年前的一九四二年，张道藩在“重订诗人节”问题上，也以先生对屈原的意见为由，反对以屈原的忌日为诗人节，说：“屈原虽是一个大诗人，但闻一多先生等既然列举理由说明他是嬖倖之类的臣妾，而另外几位学者根本怀疑有无其人，只有郭沫若一个劲儿地拿他作自己的模特，显见得屈大夫并不能得到全国一致的支持。而且，这一天是屈原的忌日，有点忌讳”，“建议以杜甫的诞辰为诗歌节”。（张道藩《我对于中国诗歌的意见》，《文艺先锋》创刊号，1942年10月）

先生同情孙次舟，但不打算作为同盟军；对文艺界的朋友，先生认为他们性子太急。先生同意“文学弄臣”的说法，但认为屈原是由家庭奴隶进而变成文化奴隶——“文学侍从之臣”，而孙次舟却是“把事实看倒了头”，“把它看成先有文人，而后变成弄臣。这样一来，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依我们的看法，是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依孙先生的看法，是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变成奴隶，二者之间，何啻天渊之隔！”

先生殉难后，延安《解放日报》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刊登是文，并加了编者按，说：“一多先生这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三十四年发表于《中原》。关于屈原的身份问题，由于成都某大学教授孙先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之说法后，曾引起文化界极大反响，郭沫若先生也曾撰文表示异议。闻先生的说法，一面承认屈原是一‘弄臣’，一面则指出屈原的‘人’的价值，加以推崇。这个问题是社会史上及艺术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尚待专家研究，才能解决。一多先生的说法，自然不是定论。不过从这篇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出一多先生在抗战之后的思想一斑，其向往民主自由的精神尤使人钦佩。读着他这篇巨作，想望其发展前途，我们更感到悲痛与愤怒！”

冬 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同学诸有琼治印。诸有琼在《人生之师闻一多》中说：“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到先生的住所，请他为我刻图章。那是昆华中学的一间楼上的大屋子，先生当书房兼卧室。屋里堆着许多书，临窗的一摞摞的书，有精装的，平装的，还有线装的。古今中外的书都有。几乎每本书都夹着几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小字，可能是注明书中的内容。有的书摊开，有的反扣在案上，偌大的案板只空出可搁两肘的一小块地方。先生看我用好奇的目光在桌面上扫来扫去，就笑着说：‘你别看我的书这么多，好像放得很乱，其实我很清楚，一伸手就可以拿到我所需要的书。你要知道，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查阅许多种书和各种版本，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只要是有关的书都要查到。我从来不躺在床上看书，因为我总是一边看书一边做卡片。做学问必须严肃认真，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是不行的。’”“我拿出两枚象牙章，一方一圆，请先生为我和妹妹刻章。当我刚想说哪枚给我，哪枚给妹妹时，闻先生一眼就看出我想说什么。他说：‘你不要说哪个章刻谁的名字，

哪个章用什么字体，这些都由我来定，等我看了材料再说。'接着又说：'别人找我刻章，七天取，你如果不急用，最好不要催我，等我兴致好的时候刻，就会刻得更好一些。篆刻也是一种艺术，勉强去做是不好的。'过了许多日子，先生告诉我图章刻好了。方章刻了我妹妹的姓和名，圆章只刻了我的名字，仔细一看，果然不同于一般俗笔，两个图章安排得十分得体，字体线条配合别具匠心，堪称艺术珍品。"(《群言》1996年第9期)

是年　作杂文《真的屈原》。后刊于《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此前，重庆独立出版社来函，约先生写本屈原传记。先生感到很突然，婉词谢绝。事后才了解这原是企图在进步文化人士面前树个对立面。这篇文章大约就是对这种企图的回答。文中并没有写历史上的屈原，而是写"当时统治阶级及其走狗们如何痛恨"那些"不合作主义者"，指出统治阶级的态度是"既不被我用，就得毁灭他"。这显然是针对现实说的。

这时，先生研究屈原，尤重于研究屈原的思想，并从屈原出发，研究封建时代文人的思想。今存未刊手稿中有一篇没有定稿的《屈原论》，其中一节题作《封建社会的崩溃与诸子思想》颇能反映先生这时的认识：

> 作为王侯的官吏以服务于公室的士族，为王侯服务，伺候主人，总不如居家自为主人。性格高蹇者多不肯为，宁居家食贫。其与公室失和者更易于急流勇退，对王侯仇视。
>
> 以上各种人对王侯形成一种不合作的阵线，故所谓"为我"者，乃对付王侯的一种口号。其间激烈者为廉士，温和者为隐士，然亦无明确界线。
>
> 小贵族依存性愈大，王侯愈轻之，生杀予夺，惟其所好。小贵族处境愈危，遂有退隐以求全生者，于是有"贵生"之说。
>
> 自全生而至养生，复受外来宗教影响，乃有方士。
>
> 然此辈本社会中坚分子，聪明才智，有技能，有思想，而人格复高尚。此辈愈退，王侯愈求之出。当初所争者，本系面子(人格)，只要王侯接之以礼，东山再起者仍多。
>
> 因为隐退，本人情所难。
>
> 然明主不易遇，且兼并风盛，可择之主愈来愈少，主之权势亦愈大。
>
> 当初为斗气，摆架子而怠工，本是一种手段，以退为进的手段，今则失业者多，手段将穷，或进或退，已至最后关头，当有决定，心理上的决定。
>
> 看穿了"齐物论"，极端的唯心主义：庄周，超生死，退一步跳出圈外，心斋坐忘；慎到，同人已，退一步投降，阿Q。然皆得到心理的胜利，问题解

决了。

士的传统精神——士与武、勇、耻、节。

即封建社会的中心道德观念。

封建崩溃士节必随之消灭：儒家为封建的制度(社会)；墨道为其人格精神的挣扎(个人)。

最后的斗士：理论家，华(角)；实行家，屈原。

对黄金时代的追想永不断绝，并将与时俱进，故《离骚》永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食粮"，它象征一个历史的悲运，任何民族不能逃脱的历史悲运，中国文化秦汉至今无大变，故屈原之死如在昨日。秦汉，士气痺痿时期。

魏晋，一度复活。

王孝伯——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皇甫谧——高士传。

春秋：物质条件的基础，稍加调整控制(封建的秩序)，便成黄金时代；儒家的理想即以此种记忆为基础。

过渡：墨家。

战国：理想主义——道家：隐士、烈士。现实主义：法士尚法内政——法家；辩士尚术外交——纵横家。

秦汉：道法合流是为黄老。

《屈原论》又一节题作《良心的支持(心理建设的手法)》，云：

《离骚》、《九章》、《九辩》以及《远游》、《惜誓》都好像是一篇文章的复制，而所表现的精神也好像是同一的。那里有一个具体而明确的事实，即是在时代的进化的过程中，缅怀着一个古旧的不合时宜的理想，对于过去的繁华发生无限的眷恋的人和这一类的阶层遭受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个人的忧郁扩大为共同的忧郁，由于感情的升华，最后都走上同一的结局。

人类思想的发展，有时似螺旋，有时似曲线，有时却像弧线围成的圆形。在这急遽的变化中，新的局面渐渐完成，旧的思想渐渐淘汰。当个人的重要已被发现，社会制度起了极大变革的时代，新和旧、理想和事实起了冲突。在这漩[旋]涡里面有些原子浮起来了，有些沉下去，甚至流走了。

说《离骚》作者是想浮而浮不起来的原子，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说《九辩》和《远游》的作者(或里面的人物)也是想浮而浮不起来的原子，也是同样的正确。真正的儒家似乎不想浮，道家自以为浮起了，法家浮得起，惟有杂有几种气质的这些人物无法自拔。他们怀着古旧的理想缅怀过去，但世界跟以前不

一样了。“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1]而私怜。”孤独里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把握自己，他们只得“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抶攘”，抱着个人的忧郁，独自叹息。春秋时人类的悲运还在蕴酿中，儒家拿了金色的招牌到处招徕，他们的理想虽骗不了人，倒可以骗骗自己，安慰安慰同一阶层的人们。到了春秋末年新的思想已经成熟了，血淋淋的现实掩住了他们的思想，另一批人也以大刀阔斧的姿态上台了。对于这新的局面，新的人物，他们感到难耐的厌恶。

何世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
却骐骥而不来兮，策驽骀而取路。

《离骚》、《九章》以至《远游》的作者也是一样的感到人们愈变愈古怪。但这些人并不是瞎了，他们也看得见一些事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相信别人，倒相信自己，故虽对时俗感到不满，倒不自甘沉沦——

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

似乎他们生下来便应该救世于水火，掌理政事，那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社会欠了他们的债，他们也欠了社会的债。但这种从儒家得来气质和理想处处碰壁后，于是他们便以为怀才不遇了。于是他们萎约而悲愁，淹留而踌躇。理想被证明是一个幻象。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矛盾愈来愈大，一个耿介的灵魂最后也与《离骚》、《远游》中人物一样。

愿赐不肖之躯而远离兮，放游志乎云中。

去了。随着这些人高高飘扬的是人类进化史悲惨的一页。

《屈原论》中还有段关于“士”的论述，云：

战国时代，土地资本渐渐集中到少数新兴的贵族手里，大多数旧贵族末落了。这些末落的贵族即当时各种形形色色的“士”，是决定那时政治文化形态的最有力的因素。他们的流品很复杂，有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致身卿相的、现实主义的游士；有在深山大谷中“荷担采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隐士或处士。这其间又分两种：一种不问世事，只是“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一种则“高论怨诽”，指责时政。最后还有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成百成千的被豢养着的众士。以上这些流品的类型自然是不固定的，飞黄腾达的游士们有时也从宦途跌落下来，退到山林，变成隐士。隐士们熬不住枯槁时，也会出山，至少也要像齐稷下先生们样，吃着干俸，“不治而议论”。至于“谈天

① 原稿如此。

衍，雕龙奭”一类知识分子与“鸡鸣狗盗之徒”之间，也不见得有十分严格的界。

先生研究屈原，有人说先生本人就与屈原有相通之处。王一《哭闻一多先生》：“每天上‘庄子’课时，几百人挤满了教室等着他，旧的发灰色的蓝布大褂，破布鞋，提着个旧书袋，黝黑的脸，冒着血丝的眼睛上，架着付黑边眼镜，头发有点乱，黑胡子有五寸多长，安静地从校门走过来。一个在剧专读过书的同学，看着他笑了：‘是块好材料，把眼镜一摘，换换衣服，上台就是屈原，化装都不必，从他面部到灵魂深处就是屈原，好材料，好极了。’这时候他最爱做关于屈原的讲演，常说：‘为什么两千年来中国人民这样崇拜屈原，我到现在才懂，原来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为人民写诗，为反抗昏乱的政权、效忠人民而死的。’一个中学生曾问过他：‘什么叫做人民呢？’他回答：‘和人民在一起——就是说自己本身是人民一份子，在他们之内而不在他们之上，要爱人民。’‘怎么爱呢？’‘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新华日报》，1946.7.25）

一九四五年　四十七岁

一月九日，中印公路北线（保山至密支那）举行通车典礼。

一月二十日，中国远征军收复畹町，滇西国土全部收复。

二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什米亚半岛举行雅尔塔会议。

四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

四月十六日，苏军向柏林发动进攻。五月二日，苏军攻克柏林，德军停止抵抗，柏林战役结束。

五月三日，仰光光复，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胜利。

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在柏林举行，欧洲战争结束。

六月二十二日，美军占领日本冲绳岛。

六月二十五日，与会各国代表通过《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之一。

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八月六日，美军向广岛所见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九日，向长崎投掷第二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十月十日，国共双十协定签字。

九月二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向美、中、英、苏等盟国签署并递交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九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在南京举行。

十月二十五日，日本台湾总督签署并向国民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澎湖列岛重入中国版图。

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

一月七日　年前，昆明《正义报》请先生和王赣愚、伍启元、周作仁、周新民、吴晗、崔书琴、孙毓棠、徐茂先、张印堂、曾昭抡、赵迺抟、赵公望、杨西孟、蔡维藩、鲍觉

民十六位大学教授作新岁问答。先生回答了第五问:"过去一年,在国内或国际间,有哪些成功的或失败的教训最值得记取?"该报是日《新岁五问笔谈》(续)中载先生的笔答如下:

我不知道这是否所答非所问。

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原则来说,谁能否认局面糟到这样,完全是"治人"的劳心者的罪,而局面还没有闹到一种更糟的程度(假若你能想象那样一个局面的话),那倒是"治于人"的劳力者的功。所谓劳心者,倒未必有在朝与在野之分,就某种观点说,也许在野者负的责任更大。事情是别人弄糟的,诚然,但也得咱们让他们那样做。你晓得吗?咱们不但纵容了他们,你还包庇了他们,然而咱们有种种方法替你自己卸责——从最愚蠢的到最巧妙的方法,这里不必细数。是羞涩,还是胆小,你是麻木不仁,还是别人神经过敏,是你没有高见,还是本来就是天阉——这毕竟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一句话,问题还是在咱们自己身上,请仔细想想吧!(《正义报·新论衡周刊》第13期)

一月十三日 《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发表于昆明《民主周刊》第一卷第五期。收《闻一多全集》。文章说:"儒家是一个居于矛盾的两极之间的缓冲阶层的后备军,所以他们最忌矛盾的统一,矛盾统一了,没有主奴之分,便没有缓冲阶层存在的余地。""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还是那站在中间,两边玩弄,两边镇压,两边劝谕,做人又做鬼的人吧!"

一月二十日 访朱自清,谈季镇淮论文事。朱认为"此文过于简单,不够系统,不能通过考试",先生同意此意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29页)

是月 联大在西仓坡盖了教职员宿舍,虽然简陋,也算是昆明不错的房子。学校用抽签办法分配,先生抽中了,全家讨论决定搬去。

王敌《闻一多先生和他的家属》有记述:"三十三年,一多先生兼任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住在昆中宿舍里,两间小房,厨房就在走廊上,一家八口,也很够挤的,但门外有大片空地,一多夫人亲自垦荒,种了许多蔬菜。昆明四季如春,那片土地按季节轮流生产,夏天雨水多,菜吃不完还可以送人。当三十四年一月联大西仓坡宿舍完工时,一多先生和孩子们都想搬进去,一多夫人则舍不下那片菜圃,一直推诿着,迟疑着,联大宿舍月收七千元房租,昆中宿舍不取分文,也是一多夫人考虑的一个原因。最后用民主方式表决,多数胜利了,孩子叫来一辆大车,七手八脚,蚂蚁搬家似的,浩浩荡荡,直奔西仓坡而来。同日,吴晗先生也迁入新居,大门相遇,惊喜的问:'决定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搬来了?'一多先生掀髯大笑:'我们用民主方式表决的呵。愿意搬家的人多,当然很快就来了。'吴晗先生也笑道:'这不叫民主,是孩

主，他们都未成年，算不得公民咧。'一多先生随即又得意又惋惜的说：'人多做事的多，一动手，那一点东西就光了。可惜人多手杂，把家中唯一的一只热水瓶砸掉了！'"(《人世间》第1卷第5期，1947.7.20)

先生所得西仓坡住房是一大三小(后又自建一小厨房)，大者不过十二三平方米，放一张双人床，一张先生的书案，就所剩无几了，先生看书写文章、刻图章、会客、睡觉都在这里。墙上挂着先生自制的两片玻璃黏成的印模镜，后来又挂上那张先生颇得意的坐在石头上口衔烟斗的石林旅行照。国民党在东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时，先生又亲手绘制了一张东北战区形势图贴于墙上，每天对照报纸在图上画出各种标志。后墙有一小窗，窗外与宿舍院墙形成一条狭长夹道。先生于百忙之中仍尽量挤时间阅读马列书籍与大量其他进步书报杂志，褥子下，枕头边乃至书案上都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一类的书，因担心特务搜查，先生还让子女们跳进夹道掩藏这些禁书。三间小房中，一间与大屋相通，约五六平方米，仅可供吃饭与孩子做作业用。墙上悬挂"遥看北斗望南岳，常撞大吕应黄钟"对联。其余两间在后院，小如鸽笼，是赵妈和三个小孩子的住房。立鹤、立雕因家中拥挤，均在校住宿。

这院子里，还搬来了一些教授，和先生同排房子的有吴有训、冯友兰、陈达、邱宗岳、杨石先。又吴大猷、潘光旦、陈友松、江泽涵、吴晗、杨业治、徐毓枏、杨周翰、萧涤非、葛邦福也在同院。吴晗则住在先生的对门。诸家中，先生家算是最穷困的。吴晗《哭一多》："在宿舍三十三家中，一多夫人说我们两家最穷。有时早晨菜钱无办法，彼此通融，一千两千来回转。"(《新华日报》，1946.7.28)　吴晗又在《哭一多父子》中说："你有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桌子，还有两把乡下搬来的描金黑漆方椅子，坐上去倒很结实，不会怪叫。此外，还有两张小板凳，两口破箱子，吃饭时一家人刚好一桌，孩子们站着吃。"(《人民英烈》，第250页)

住在这里的潘光旦一家，生活也很窘迫。潘夫人赵瑞云曾自制绣花绸睡衣、头巾、手帕卖给盟军，她请先生画过两幅龙的图案作为绣样，"是用毛笔在毛边纸上画的，画面的布置大体呈三角形。一幅较大的游龙，张牙舞爪，周围有云朵，作在天空中飞行状，形象生动，用于睡衣或头巾。另一幅小一些的龙是黑色实心的图案式"。赵瑞云的胞弟赵世昌，时在清华大学办事处任技师，自制油炸糖松子出售，先生也为他作过一图，刻印在瓶签上。"画面上有一个纵长方形边框，内有一株虬劲的松树，旁有一飞升的古装男童，象征松的儿子。一侧上方有'松子'两个篆字。这幅松子图线条优美，寓意深远，给人深刻的印象。"(潘光旦之女潘乃穆给编者的信，1989.2.18)

住在西仓坡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让立雕永生难忘的事。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读书的立雕，与同班的庄任秋同学住上下铺，两人兴趣相投，关系甚密。庄任秋是泰国华侨，抗战爆发后，其兄回国报效国家，带了庄任秋回国读书。后，其兄因事返回泰国，正好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泰国与中国断交，致使庄任秋与家里失去联系。立雕非常同情这位举目无亲的好朋友，常常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家里给的零用钱，也两人一起花，有时还背着先生把自己的贷金给他，甚至还曾从家里偷点钱来接济他。有一次，立雕看到庄任秋又缴不起伙食费了，便要求父母帮助，非要家里拿钱不可。先生开始有点不高兴，说：你帮助人固然是好事，但也得考虑考虑咱们家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嘛。还说你对朋友那么慷慨，为什么一点也不体谅自己的父亲？立雕听了，竟耍起牛脾气，坚持不给钱就不走。为时，先生看了看时间，说现在还没下班，让立雕陪母亲带上他的领薪图章，赶快到联大财务部门去提前预支下个月的薪金，从中拿出一部分为庄任秋缴了伙食费。（据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 237 至 238 页）

是月　为沈季平同学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书赠条幅，文为“不入虎穴，安得虎子”，旁书：“‘不得(入)虎穴，安得虎子’是昔年班超投笔从戎时的壮语，季平同学今天以知识青年从军应悟到这句话在今天的意义。”

年初　约这时，与昆华中学回族学生马运达、马汝为、杨丽天等人谈话，谈到民族问题。杨丽天在《闻一多深情关怀少数民族纪事——为纪念闻一多遇害 58 周年而作》中说：闻一多老师初次和我们谈话时，诚恳地谈道：“我到昆明后才看到那么多少数民族，给我增长了不少见识。我在北平清华教书时，有的学生就是回族，因此对回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回族是一个聪明、善于经商和善于学习进步的民族。有的人也说回族有‘造反’的性格，我看这是民族压迫的结果，造那些反动势力的反有何不可。我的搞地方史的老师谈过，据他介绍，云南回族中就有过民族英雄杜文秀联合各民族，反对满清反动统治，建立大理政权的 18 年，失败后，云南回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几万、十几万地被害，你们知不知道那些历史事件？”杨丽天说：“我的原籍就是大理，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全家、全村回民被杀光，我祖父孤身一人逃到昆明，经过艰苦的谋生才在昆明成家立业。我们从小就知道杜文秀的起义事业。”先生说：“你看这就是事实，你们还应该深入地看看现在的统治，是不是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接着，先生还谈了当时存在的许多民族迫害、压迫、歧视的事例，教育他们要追求民族平等，要敢于对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势力造反。杨丽天说“这对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是起了很大的启蒙教育作用的”。（《今日民族》2004 年第 7 期）

二月三日　郭沫若致吴晗信，信中说到先生有篇关于屈原的文章：“《中原》是

需有力量之著作，如蒙时惠大稿，甚表欢迎。前闻昆明来友言，一多先生有关于屈原论文将投寄，不知□否？如见面请代问一声。"（《郭沫若关于著书、文稿等事致吴晗的亲笔信》，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十三日，郭沫若再次致信吴晗，说："闻先生文已由友人交来，并已拜读，觉甚新颖。"（《郭沫若关于文稿及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签名事致吴晗的亲笔信》，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同日　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学会在《云南日报》刊登《经募捐援助贫病作家基金总公布》，在新诗社经募三十五万四元项下，云："捐一万一千五百元者，闻一多一人。"西南联大这次经募的捐款还有国文学会二十万余元，外文学会十八万余元，生活壁报十三万六千余元，论衡壁报十一万八千余元，潮汐壁报七万五千余元，神曲社七万元，学习壁报四万九千余元，文摘社一万八千余元，文艺壁报一万五千元，现实壁报一万三千余元，民主壁报一万一千元，熔炉社八百元。此外，温功智同学还单独募集了一万两千余元，裴毓荪同学募集了五千余元，彭允中同学募集了四千余元，王刚同学募集了六百五十元。对于这次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云南省政府也给予很大支持，省政府主席龙云带头捐出二十万元，其子龙纯曾、龙绳武亦各捐一万元。这些捐款，全部交给文协昆明分会，文协昆明分会声明："国文学会开来清册共计一百六十二万一千四百四十元正，除去该会印捐册购买笔墨纸张及信封等共用去三千元外，共交本分会一百六十一万八千四百四十九元正。（除前已交一百五十五万元业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于《扫荡报》公布外，后又续交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元正，已全数交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学会经募捐援助贫病作家基金总公布》，《云南日报》，1945年2月3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启事》，《云南日报》，1945年2月3日）

二月四日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讨论修改去年九月十九日民盟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

二月十二日　除夕。与吴晗一起和民青负责人会谈，不久建立民盟云南省支部与民青的正式组织联系。

约在去年年底或是年年初，民青第一批参加者在护国路某银行楼上举行全体会议，陈定侯主持。洪德铭对民青章程草案作了说明，其内容：第一条组织名称。第二条宗旨：团结民主青年，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第三条性质：为政治性的民主青年的地下组织，接受中国最先进政党的领导，支持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和民盟及其他民主革命党派密切合作。章程草案中还规定了盟员的义务、权利，确定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等等。经过激烈辩论，大多数与会者对基本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对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领导机构，

制订工作计划等做了安排。洪德铭回忆:"这次大会后不久,民盟教授潘大逵和经他介绍参加民青筹建活动的蒋阜南、孙政和(均系云大学生),坚决反对在章程上写入'接受中国最先进政党的领导'和'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的条文,要求把民青明确定为隶属民主同盟的青年组织。潘先生请闻一多、吴晗给我们做工作。一天,闻、吴先生把我和陈定侯找去,谈了潘大逵和蒋阜南等的意见,并把吴自己代拟的民青入盟誓词稿交我们参考研究[①]。我当即以保持青年组织的独立性为理由,表明不能把民青定为民盟隶属组织的态度,对其余意见,答应可提交代表大会讨论。闻一多听后,表示很理解进步青年的思想感情,很有风趣地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你们讨论后按你们的意见办吧!讲民主就得尊重多数人的意见。'由于闻、吴先生的谅解、支持,民青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外部干扰,就被排除了。""春节除夕,吴晗请我们吃饭,闻先生也在座。参加的有洪德铭、严振、王念平、萧松等四人(陈定侯因有事未参加)。当场由洪德铭谈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和民青执委会正式成立后的工作计划,吴、闻两先生均表示同意。吴晗再一次提出要我们几个人参加民盟,由他和闻先生作介绍人,还给我们发了志愿表。我们当场虽未表示拒绝,但一直拖住未办参加民盟的手续,实际上是谢绝了。"不久,民青在滇池船中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修正通过了《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和当前工作计划,选出陈定侯、洪德铭、严振、萧松、何东昌等五人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推陈为主任委员,洪为组织股长,并和陈负责全面工作,严振、萧松、何东昌分任宣传、联络、总务股长。民青执委会成立后,给民盟云南省支部发了第一次通报书,将民青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执委会选举分工情况,书面通知了民盟,还附送了民青章程,正式派洪德铭为民青代表,和民盟建立组织联系。这些书面材料都是送给吴晗、闻一多先生转交的。与此同时,民盟云南省支部也书面通知民青,由闻一多、吴晗作为民盟联系民青的代表(后又增加周新民)。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西南联大复员北上为止,闻一多既是我们敬爱的师长,又是代表民盟联系民青的正式代表,还是新诗社、剧艺社、文艺社这些著名的学生社团的指导教师,在昆明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随后,在民盟配合下,民青与各进步社团合作,参加联大学生自治会改选,结果三青团候选人全部落选,中共党员齐亮、民青负责人陈定侯和进步骨干程法伋当选为常务理事(即正、副主席)。十七个理事中,中共党员一人,民青成员五人,其余十

① 编者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档案中找到了一份誓词油印件,其文云:"余谨以至诚接受中国民主同盟政治主张,并加入民主青年同盟,遵守决议及纪律,努力工作,始终不渝,谨誓。"洪德铭1988年12月6日在此文复印件旁注:"这是按吴晗先生意见拟定的,但经研究,后认为不妥,没有付之实施。"

一人亦为进步学生。从此，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便掌握在中共与民青手中。与此同时，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亦改选，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进步力量。至此，昆明四大学学生自治会真正成为带领同学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机构。洪德铭说："在这次四大学学生自治会改选斗争中，闻一多、吴晗、周新民等都协助民青做了很多工作，闻、吴两先生还利用参加学生社团和答壁报记者问等方式，帮助、支持进步同学参加竞选活动，起了积极作用。"（同前）

同日　给吴晗题字，录的是《论语·微子》中的一语："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同样的字写了两幅，另幅送给了杨明（令光）。杨明回忆说：除夕晚上我去先生家，请他题字。先生已经写好两张，内容完全一样，指着说："你要哪幅？"我觉得后写的一幅好些，便说"要这幅"。先生笑了，说："还是给辰伯（吴晗）吧。"（访问杨明记录，1986.8.8）

二月十五日　阴历正月初三联大"悠悠体育会"组织路南旅行团，先生带着立鹤、立雕随团乘火车同往。同行者还有查良钊、曾昭抡等。在火车上，与同学一起做联句游戏。晚，宿路南中学。

二月十六日　游石林。

二月十七日　游大叠水。晚上，路南县长请先生和查良钊、曾昭抡晚餐。

二月十八日　旅行团游长湖，先生未去。与何善周有番谈话，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这一天，闻先生向我讲了许多话，谈了他的学生时代，谈到对当前一些同学们的印象。他说：现在的学生成熟的多了，他们尤其对国家大事，可以说'天下大事尽在胸臆'。谈话中间，闻先生问我看过《新民主主义论》没有。我说：看过。他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就明白了有最低纲领，还有最高纲领，眼下要争取实现最低纲领，将来还要逐步达到最高纲领，那时，便是世界大同啊！'"（《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64至265页）

二月十九日　游长湖。白天，旅行团举行同乐会，有张坐在石头上，含着烟斗回头的相片，就是这时拍的。吴晗《哭一多》："旅行路南游石林，含着破烟斗，穿一件大棉袍，布鞋，扎脚裤，坐在大石头上歇脚的时候，学生给他拍了一张照①，神情极好，欢喜得很，放大了一张，装到玻璃框里，到他家的人，都欣赏照片里的胡子。"（《新华日报》，1946.7.28）晚，参加彝民同乐会，观看彝民跳月。

① 这张照片并非学生所拍，而是同去旅游之云南大学职员董公勗先生拍摄的。

二月二十日 赴黑龙潭看庙会。这天是大集，人山人海，现有一张照片，拍着先生挤在人群中。

二月二十一日 回到路南。晚，旅行团与路南中学师生举行同乐会，礼堂和走廊过道都站满了人，气氛热烈亲切。会上，校长杨一波介绍了一年前路南民众驱逐县长许良安的斗争经过。那是一九四三年底，许良安任县长不久，便迫害学校的进步教师，扣押了教导主任刘桂五(联大历史系毕业生)和训导主任张孝昌。路中师生动员开明人士和近千群众夺回老师，并收集许良安贪污敲诈的人证物证，发动了驱许运动。省政府视察员在证据面前无话可说，许良安见势不妙于深夜潜逃。事后路南人民立起一块"贪官许良安遗臭碑"，记述驱许经过。先生听了，很受鼓舞，给予极高评价。杨一波在《路南中学驱许运动回忆录——路南的小"五四"运动》(油印稿)中，记述了先生发言道：

> 这是路南的一次小"五四"运动。但就其斗争的性质与范围和所取得成就说，却是超级的。因为斗争很尖锐，参加的群众不仅有路中师生，还有地方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斗争持续几个月的结果，终于赶走了反动贪官，这就大长群众志气，大灭反动贪官威风。这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不朽业绩，为路南这一名胜之区增光的。

先生还谈了某些在路南的感受，说参观石林时看到一群放牛的小孩，问他们为何不读书，小孩回答说没有钱。先生认为这是社会黑暗和存在剥削造成的。(据曹森林给编者的信，1987.3.2) 讲话中，先生提出"向儿童学习"口号。(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闻朱年谱》第52页)

会上，联大同学给路中师生放映了内容进步的幻灯片。

二月二十二日 旅行团步行回昆明，夜宿宜良。

二月二十三日 返至昆明。这次旅行，先生生活在同学中间，互相谈论了许多大家关心的事。经济系同学黄福海(黄海)在翻越一座高山时，问："闻先生，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你看谁会取得胜利？"先生毫不犹豫地反问："共产党会取得胜利，这难道还有疑问吗？"(黄海《宁死不屈的教授、诗人闻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42页)

与社会接近，对先生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某次，先生参加昆明近乡苗族的一个庙会，回来说："我看到农民，多可爱，多纯朴，那决不是诗与画可描绘的，倘若有一个扩音器，我对他们说：'中国，你需要新生命。'"(沈子《怀诗人》，《文汇报》，1986.8.30)

二月二十六日 罗伯特·白英在《中国日记》中记述有先生这样一段话：人类的尊严不允许人们在秘密警察的淫威下苟且偷生，这是最最重要的！雇用秘密警察的是卖国贼——任何卖国贼都无法和他们相比。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气氛。警

察应该公开身份，而不应伪装改扮，携带武器。我们在为自由而战，难道我们能忍心让自由还在萌芽状态时就惨遭毒手吗？（《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53至25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是月下旬　寒假后开学。这学期，先生为中文系文学组增设了“专书选读”（《楚辞》），二学分。（据《西南联大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三月一日　《云南晚报》在《周末晚会介绍路南》消息中预告说：“明晚周末晚会举行‘路南介绍’，由闻一多教授讲‘夷胞生活’，并由男女同学八人表演夷胞歌舞。”

三月十日　先生等二十九教授因物价飞涨联名订定稿酬。《米价在狂涨中，教授联名订定稿酬，千字斗米不马虎》报道说：“联大云大王赣愚、伍启元、朱自清、吴之椿、吴晗、邵循正、邵循恪、周作仁、周新民、胡毅、徐毓淮、孙毓棠、陈友松、陈雪屏、张印堂、崔书琴、贺麟、费孝通、曾昭抡、雷海宗、闻一多、杨西孟、蔡维藩、赵迺抟、郑天挺、郑华炽、潘光旦、鲍觉民、戴世光等二十九教授，以近来物价高涨，论文演讲所得之报酬实值甚微，同时精神与时间过分损失，拟自所节制，特自今日起联合订定润例如下：一、文稿每千字以斗米之值计；二、报纸星期论文每篇以二斗米之价值计；三、每次演讲以二斗米之值计（演讲稿之发表须另依文稿付酬）；四、稿酬先惠，定时取稿演讲报酬亦须先惠，米价以惠酬时昆中米之市价为准。另并拟定公约三条，规定各须认真遵守润例之规定，不可偶因情面，率尔对外让步，致使其他同人难以应付，润例办法将不易维持。各人对遵守共订之润例，应负道义上责任。”（《云南晚报》，1945.3.10）

次日，《云南日报》也刊出这一消息。三十日，曹日昌在《云南日报》刊登评论《谈千字斗米润例——吃的是草，出的是奶》，说：“凡留心文化运动，知道公教人员的艰苦生活的人，对于最近二十几位教授订定的‘千字斗米润例’，没有不同情的！本来，战前的米价，每石不过三元至五元，那时的稿酬也在三五元之间，是‘千字石米’。最近，二十几位教授规定千字斗米，稿酬已减低十倍，要求不算‘奢’，谁还有什么话说呢？”

时，昆明物价糙米每石一万元，上白米则一万四千元一石。次月初，联大常委梅贻琦专程赴重庆，要求教育部改善联大教职员待遇，云联大薪金与重庆相同，而物价则高出一倍。

三月十二日　先生等三百四十二人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二月十一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的雅尔塔会议结束，并发表“克里米亚声明”，决定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大会。十八日，周恩来就中共代表

参加旧金山会议问题致函赫尔利，赫尔利二十日回电，反对中共提出的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应由各党派代表组成之主张，称此会议上承认国民党政府以外的中国武装、政党，将有毁坏中国统一的可能。二十二日，《新华日报》发表郭沫若起草，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等三百余人签名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呼吁"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必须"及早实行民主"，组织包括全国各党派在内的"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挽救"中国的危机"。三月一日，蒋介石则在重庆宪政实施促进会上声称"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于各党派的党派会议"，表示反对建立联合政府。《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就是配合与针对以上形势发表的。该文原题为《昆明文化界对时局的紧急呼吁》，由吴晗起草，先生润色，罗隆基补充而成。前后共有四稿，第三稿为先生钢板刻印，再加修订，时为三月一日，签名者由最初五十九人增至三百四十二人。第四稿特别指出所谓将要召开的国民大会原是十年前一党包办选举时产生的，不能代表人民产生新政府和制定新宪法。兹录第四稿如下：

中国到了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实行团结、实现民主了。以整个的国际局面来说，盟国大军，东西夹击德国，乘胜直驱柏林，欧洲战事，短期即可结束。在太平洋方面，跟着菲律宾的解放，琉璜岛的占领，空前强大的美国海空军，行将掩护空前强大的美国陆军，或直捣日寇本土，或在中国沿海登陆，以清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这一举是决定盟国在远东战场上军事胜利的关键。同时，本年四月二十五日，中美苏英将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依照敦巴顿橡树会议及克里米亚会议建议的方针，树立世界永久和平制度。这一举又是决定同盟国家"和平胜利"的关键。

以上这些重大事件，无疑的是中华民国抗战建国成败的大关键，这些重大事件无疑的将决定中华民族今后生死存亡的命运。

我们眼看着盟国迎接全面胜利，并着手奠定世界永久和平，回顾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国家今日所处的环境，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危机！在短短的一年内，敌军如入无人之境，由郑州而洛阳，而长沙，而衡阳，而桂林，而柳州，而曲江，而赣州，一连串的军事溃败，沦丧好几省国土，损失无量数物资，使万万人民流离失所，颠沛死亡。不止如此，最近日寇又在湘桂积极增兵，并在安南解除法军及安南军武装，夺取全部安南，以为在大陆上临死挣扎的军事布置。日寇此种行为，更使我国托身寄命的西南一隅，若昆明、成都、重庆等重要城市，遭受威胁，而国命的存亡断续，更将不堪设想了！

在这样严重的局面下，政府当局竟没有警惕悔悟的表示。独裁专制，贪污

成风，这依然是中国的政治；富人的黄金让它安全存储国外，政府完全靠苛捐杂税与恶性通货膨胀过日子，这依然是中国的财政；借党化之名，行奴化之实，这依然是中国的教育；诚不足以结友，量不足以容人，这依然是中国的外交。最近所谓革新行政，改进人事，也只是对调几个部长，变更几个官衔，旧瓶还装旧酒，原汤仍熬原药，这不止使国人痛心，并且使盟友失望。

盟国正在迎接胜利与和平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在坐误时机，自毁前途。大家平心问问，造成这样严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每一个愿意尊重事实的人，都知道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国民党内的少数分子要继续维持权位，所以他们不惜抹煞全国民意，拒绝实行民主，对于全国人民一致呼吁的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废除特务制度与集中营等组织、释放政治犯、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并与全国各党派开诚合作共挽危局等等要求，始终不肯接纳。最近国共谈判又宣告破裂，团结一线希望，复被断送。谁能否认我们的政府是在拒绝抗战胜利！

三月一日蒋主席为解释不能团结的原因，发表了一篇演说，允诺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这实际只是蒙蔽国际观听，拖延国内民主的技术。谁都知道，宪法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草案，国民代表是十年前一党包办的选举。试问以这样的代表，通过这样的宪法，再来选举大总统，产生新政府，这样的民主有真实的意义吗？试问这样迂回迁延的方式，能够挽救当前千钧一发的危局吗？其实国人呼吁的各党派会议及联合政府，只是目前团结合作的方案，谓如是而后共商政策政纲，如是而后共负抗建责任，如是而后实施宪政，实行民主。目前的团结合作，并无移交政权于各党派、还政于民之说，而蒋主席必斤斤以此辩白于天下，这倘不是搪塞粉饰之词，那就是固执一党独裁的成见了。

迩来重庆成都各界人士又一致起来发表签名宣言，提出具体主张，呼吁民主团结——用民主的精神实行团结，用团结的国家实现民主，义正辞严，举国同声。我们昆明文化界人士，自知不能推卸国民一分子的责任，不忍坐视国家前途的毁灭，民族生命的沦亡，因此，根据我们共同的信念，坦白提出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以为前趋者之应，以为首倡者之和。我们的主张是：

一、政府应立即邀约全国各在野党如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自推选的代表，而后会同各政党代表共同推定社会上无党无派各界进步人士，共同举行国是会议，决定战时的政治纲领，并重行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筹备召集真能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以通过宪法，实行宪政。

二、国是会议为战时过渡的最高民意机关，由该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以执行战时政治纲领，并共同负担抗战及参预一切国际会议、奠定世界和平的责任。

三、现政府应立即宣布解散特务组织，取消言论出版登记检查制度，释放全国政治犯，切实保障人民身体、思想、言论、出版、演剧、集会、结社、居住、旅行、通信等等自由。

四、彻底改组国家最高统帅部，使统帅部成为超党派的国家机构，以统一全国军事指挥，集中全国军事力量，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争取抗战胜利，并保障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

签名者为：丁力、丁则明、丁修六、文国运、方映天、方庶民、丹娜、王逸、王庚、王瑶、王斑、王逊、王一峰、王永康、王世清、王世钦、王金陵、王金钟、王牧园、王受昌、王朝声、王悸萍、王振远、王振华、王漱园、王菊英、王龙甫、王赣愚、牛车、卞之琳、白予、白澄、白璐、白文、白麦浪、甘娥、仝洛、石岭珉、史舵、光军、光未然、江逸、江枫、江萍、江涛、江篱、江骥、吕剑、艾茜、朱江、朱宁生、朱维藩、沙草、沙鸥、沙之骆、伯韩、辛毅、辛汉文、辛毓庄、沈从文、沈传良、沈宪道、何方、何庄、何鹤、何善周、余翼、余湘、余冠英、余晏清、杜平、杜宣、杜光昭、杜乃祥、杜迈之、宋舒、邱文郁、邱星海、祁仲安、李朋、李扬、李埏、李琼、李公朴、李文宜、李仁荪、李立里、李孔昶、李克兢、李和生、李何林、李永力、李步颜、李承慧、李家治、李广田、李俊昌、李杰民、李润之、李宁军、李兰纳、吴菁、吴晗、吴达元、吴乾元、吴富恒、吴惟诚、吴佩瑾、吴征镒、尚钺、金隄、金若年、周辂、周小光、周禾书、周仲覃、周思明、周新民、周铭功、周基堃、周钢鸣、孟浪、孟平黄、邵翰馨、林路、林慧、林文铮、林石父、林之藩、林乃祥、林成耀、林毓瑞、侯枋、马亚、马大猷、马君玠、马惠英、马鹤鸣、马龙图、洪谦、胡毅、胡绍南、胡国钊、胡庆燕、俞铭传、郎毋光、姚翔、姜寅清、姜震中、范宁、范崇武、凌鹤、凌琯如、奚立德、夏康农、屏山、唐世瑛、唐立镇、康朗、琴妮秀、梁星、梁秀如、梁汉伦、高山、高履平、徐植、徐守廉、冯素陶、陆钦墀、孙倬、孙金秋、孙世瑞、孙玲英、孙昌熙、孙敦乐、孙剑秋、孙晓桐、郝竹英、时怀铭、袁度、袁震、袁之方、袁敏兰、常任侠、纳静波、温寓海、郭瑶华、章名涛、邹铎森、许杰、许立明、许维遹、徐令德、曹春、曹明、曹金、陆群、陆逸君、张客、张威、张炜、张莺、张小楼、张文渊、张立藩、张亚西、张卓然、张志明、张时俊、张世彝、张孝明、张雨峰、张曼筠、张学元、张学文、南方虹、陈琦、陈健、陈廪、陈立人、陈文龙、陈光国、陈定民、陈良直、陈绍花、陈国符、陈新生、陈森泉、陈遵妫、陈学诗、程漠、程力方、程明远、程流金、程漪芸、曾雨峰、曾遂庵、曾昭抡、庄永烈、费孝通、游国恩、傅漓、黄任、黄鉴、黄世晔、黄敏慧、黄碧鸥、黄

曙秋、闻隆、闻一多、闻家驷、楚图南、万稼轩、蔡之俊、蔡超尘、叶思悚、叶露茜、杨明、杨澍、杨光玉、杨亚宁、杨谷香、杨春洲、杨秀芬、杨克强、杨须知、杨素辉、杨绍廷、杨佩珍、杨德洪、杨静慧、杨贤如、杨维书、蒲柳、黎敏、黎茄、汉萍、赵沨、赵光平、赵建中、赵纯一、赵瑞兰、赵嗣卿、熊伟、郑康、郑易里、郑伯华、郑秉璧、郑独步、诸葛明、刘北汜、刘吉耀、刘卓如、刘怀武、刘渔邨、蒋锐、蒋君超、谈苏、潘光旦、晓龙、欧阳德荫、阎振兴、谢明、谢加因、穆芷、薛小宋、薛沈之、萧凡、萧荻、瞿白音、魏蟠、魏承斌、蓝驶明、罗志雄、罗喜闻、罗肇发、罗隆基、颜武伟、苏均持、苏滋禄、苏鸿纲、顾元、顾光中、顾建中、顾默、龚德光、思慕、叶雨、陆儒燊、洪遒、张祯、张溥仁、吴南山、袁玳蒂、田鲁、陈文德、万声、宋小珍、郭萍、陈世忠、何丕承、吴持恭。

为了征集签名，先生跑了许多路。这次，还跑到离昆明二十公里远的呈贡，找住在那儿的沈从文签名，沈从文签名后，还留先生吃了一顿饭。（据访问沈从文记录，1986.4.23）二月二十七日，先生亦请朱自清看了该《主张》之初稿《昆明文化界对时局宣言》，但三月六日朱访先生，表示不欲在此宣言签名。此事引起吴晗不快，以至朱感到吴晗对自己甚冷淡。（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35至336页）

中旬　昆明《民主周刊增刊》出版。这个刊物的出版，是李公朴、张光年等人对罗隆基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有不同看法而另行编辑的，先生也参与了筹备。

上年十二月十六日，罗隆基在《民主周刊》发表《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认为苏联有经济民主而无政治民主，英美有政治民主而无经济民主，力主走第三条道路。为此，民盟云南省支部于一九四五年春天在李公朴家中开过一次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光年在《怀念李公朴同志》中有回忆："会议是围坐在一张可坐十一二人的黑漆大圆桌进行的，名曰学术讨论的座谈会，包括一多、吴晗、图南这些学富五车的教授们却是干脆的，鲜明的，甚至是短兵相接，咄咄逼人的，罗隆基谈笑自若地重申了他的主张，谈笑中不免埋下几根暗刺。轮到我这位'民盟之友'发言了，为了表示一点学术意味，我在这些教授们面前做了一次不高明的'教条主义表演'。我摘引了列宁怎样说，斯大林怎样说，毛泽东怎样说，这些论述似乎正好针对罗隆基式的怪论。这样的旁征博引自然不是好办法，而当时几位朋友听来却有新鲜感。幸好我刚刚读完了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其中某些段落，就是他旅苏期间的耳濡目染，分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今天看来，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很不充分的。但我引自该书的有根有据的评述，对反驳罗氏言论是有用的。这本书在圆桌上当场传阅开来。会议的组织者公朴同志，心平气和地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他谈到抗战初期他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的见闻，说明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才会有真民主。两派意见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多数人的观点是一致

的;这些同志看过《新民主主义论》,赞成新民主,赞成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民主,罗氏的主张,从此在盟内外的市场日益缩小了。从这时起,公朴、一多等同志就酝酿在罗隆基掌握的昆明民盟机关刊《民主周刊》之外,另办一个民盟左翼的半月刊《民主增刊》。……王健在《李公朴与北门书屋》一文中,说是增刊的主编是李公朴和闻一多,我记得的是,这个刊物向国民党申请登记时候,主编的名字报的是曾昭抡,曾先生在国民党高层关系多,容易通过。"(《李公朴纪念文集》,第 271 至 272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6 月出版)

《民主周刊增刊》出版时,并没有透露民盟云南省支部内部的这一分歧,而是说:"《民主周刊》出版以来,谬蒙读者推许,但也接到许多读者来函,说《周刊》不够通俗,不够活泼。现在把最近收到的几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周刊》限于篇幅无法全部刊载的,汇集起来,略加编排被辍,试出这一期《增刊》。虽然还不敢说内容怎样通俗,但是算较为生动活泼些了。以后倘得到读者的支持和作家的赞助,继续收到同性质的文章较多时,还打算继续出下去。"(《编后小言》,《民主周刊增刊》第 1 期,1945 年 3 月)

三月二十四日 田汉、安娥夫妇应青年远征军第二〇七师政治部邀请,自贵阳抵昆明。安娥是先生早年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时的学生,先来看望先生。她在《哭忆闻一多师》中说:"我报了名字以后,他似乎记起我来。'啊! 你就是×××吗?那时候你很小,在同学中间似乎特别显得你很小似的。直到现在你那个"小"的影子还留着,不是吗?''现在我老了!'我笑着说。'我的儿子都十几岁了。''那么该叫你甚么太太呢?''我作你学生的时候你怎么叫我,就一直那么叫。''那么好吗? ……也好……不过我该知道你是甚么太太呀?'同去的那位陈先生介绍了田汉的名字,并说了我的笔名以后,闻先生大笑起来,'我总说去看田先生,一直忙乱着没得去,你们还住在××吗?'闻师和陈先生谈边疆问题去了,闻师给我一本他的文字学的原稿给我看,并给我燃了只起码牌纸烟。闻师母和他们的孩子们进来,闻师母身体不健康,孩子们都穿得是起码衣服,不过他们很自若,神经是非常健康的。过了几天又同田汉同去看他。闻师仍然穿他破边的衣服,拖着旧布鞋。他们谈得很好,谈得很久。田汉也把他当'老'先生敬重,其实他胡须虽长,但须发都是墨黑的,不过人们的'闻胡子'和'老先生'的称呼先入为主,因此也呼他为老先生,可是一问起年岁来,他还比田汉小一岁,大家又笑了。于是田汉便再也不承认他的'老'了。我和闻师母谈昆明的生活问题,她很坦然的皱眉头兼苦笑。她说:'闻先生他反正是甚么也不知道,米多少钱一斗,他从来没问过。现在我们最大的靠头,就是中学的那点米。''所以我大学不教倒不要紧,而这个中学教员却不能放松它。'闻师

笑了。可是他自己研究也不知道倒是有多少米？并且这些米可以吃几天，他只听得太太说过：'幸亏这点米，不然可怎么过呀！''那不可以呀！闻先生。'我抗议闻师。'您也该知道呀！这不单是家庭琐事，也是社会问题呀！''该，是该知道。不过有人注意了，我就没注意。反正我原则上我知道是"不够"，教书的人不能吃饱饭就行了。'闻师又笑了，他的语气有点像在大学里讲书。"(《月刊》第2卷第2期，1946.9)

同日　昆明文协与昆明银行业同仁福利会，联合举办文艺讲习班，聘先生及朱自清、闻家驷、田汉、魏猛克、刘思慕等十四人为讲师。每讲有相当于一斗米价钱的酬金。(《文协昆明分会明茶会，商筹办文艺讲习班，讲师已聘定闻一多诸氏担任》，《云南晚报》，1945.3.23)

同日　陈白尘持先生函访朱自清，请其做一次演讲。朱以胃病为由谢绝。(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39页)

三月二十八日　出席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举办的"国是与团结问题"座谈晚会，到会者五千余人。会场情绪热烈，盛极一时。会上，曾昭抡演讲"军队统一问题"，吴晗演讲了"团结问题"，王赣愚演讲"国民大会与政党"。张奚若因事未能出席，他的讲题"国民大会的特质"由曾昭抡讲述。

最后，由先生演讲并做结论，情形见吴晓《联大的民主集会——时事晚会速写》："长胡子的闻一多教授将各教授的演讲加以总结。他因为病愈不久，所以说起话来有点吃力。他本来在这个时候要稍为休养一下的，但，他对于民主团结的热诚，使他把健康丢在脑后，鼓起精神出席这个晚会。他做了总结后，用他那透过眼镜的恳挚目光望着大家。他说，抗战初期，有些人把抗战建国截开两段，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埋头读书，准备做'建国人材'，抗战大可不管。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前一些时候政府不是鼓励学生从军吗？所以，目前的学生，不止应该埋头苦干，更应该抬起头来，挺起胸膛，注视现实，关心民主团结，用大家的力量去促进民主团结的实现。闻教授的声音虽然那末小，但，他这番语重心长的启示，使不少同学低下头来，紧紧的握着自己的手，陷入沉思的境界。"(昆明《民主周刊增刊》第2期)

是月　协助民青审阅《民主通讯》。洪德铭回忆："三月，民青组织得到较快的发展，到月底，盟员增至一百七十人左右。……为了加强对进步青年的时事、政策教育，在闻一多、吴晗、尚钺指导下，民青由严振负责编印命名为《民主通讯》的内部刊物，除载新华社、进步报刊的重要文章，还刊登思想评论，介绍解放区和各地民主运动情况，在进步青年中秘密发行。稿件集中后，都请闻先生和尚钺审查定稿。"(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民主通讯》后来改名为《渝风》，一直受到先生的关怀与支持。

是年春 先生对李公朴产生误会，随即道歉。张光年《怀念李公朴同志》："一九四五年初春，他(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刘健群来昆明，向李公朴劝降。刘头天派人送信给公朴，说明天上午来看他。……第二天上午，刘健群来到北门书屋楼上客厅里。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客人'走后，公朴邀我和他夫人张曼筠，大概还有王吟青(王健)同志，详细介绍谈话的情况。公朴的情绪是好的，甚至有点高兴，觉得'果不出我们所料'。老蒋要他到重庆教育部做官，说是'留在昆明很不安全'。这就很带威胁意味了。公朴说：'这吓不倒什么人。'他觉得自己的应付是得体的，称得上'立场坚定，态度和平'。刘拂然不悦，说是'没法交代'，随他去吧。刘健群诱降之计失败了，便指使联大三青团开展谣言攻势，并在校内外张贴大量标语，硬说'李公朴已被收买，即将赴渝出任要职'。很多人是不信的，但方正不阿的老实人往往容易上当。一天晚上，公朴情词激动地找我谈话，说是当天下午，一多、吴晗、图南等几位战友拍起桌子质问他：'为什么出卖民盟？'这些好朋友不听辩解，'污辱了我的人格！'他说这样下去，今后的工作很难办。说时流下了眼泪。我知道这样的委屈是很难受的，我尽力宽慰了几句。就说：不要紧，事情的经过我是清楚的，明天我找他们谈，相信是能够谈清楚的。第二天，我到西仓坡访一多同志，邀他到对面吴晗同志家一同恳谈。我还走访了对我一向怀有厚爱的图南同志和别的同志。谈话的经过不必细说了。这几位赤诚待人的革命者，几乎都是不等我说完，就深怀歉意地说：'我们错了！我们向公朴检讨！'"(《李公朴纪念文集》，第 274 至 275 页)

是年春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谈到家庭民主。安娥《哭忆闻一多师》："有一回当昆明温丽的春晚，重庆的一些剧友来到昆明，在吃饭的场合中，又会到了闻师。大家都请'老'先生坐上座，而'老'先生说要'民主'，大家随便坐，无分上下。'我们先问问闻先生，在家里同师母民主不？''那我是绝对的民主，并尊重女权。'闻师煞有介事的声明。'不过我内人同我的看法倒不同，比如她给我倒杯茶我接受了，她觉得很平常。可是我要给她倒一杯，她就神情不安的觉得不对劲。我怎样想法子改正她，直到今天还没改过来。'吃饭的时候，闻师掉着他的毛兰布衣袖招呼坐中的女客。'闻先生，不敢当。自己来。''在美国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必须招呼坐在你两边的女客。'闻师笑着说。'你们听呀！谁说"闻胡子"老呀？'田汉喊着。闻师到底是'老'教授，他听了笑了笑，不动声色的说：'这和老不老没有关系呢。'他仍然招呼女客。在这次的宴席上闻师说了一句要言，那便是：'民主运动必须从自己身上先作起，时时刻刻先要检讨自己。'"(《月刊》第 2 卷第 2 号，1946.9)

"民主运动必须从自己身上先作起"，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次，幼女闻翙又哭又闹，经大人一再哄劝亦无效，吵得先生头昏脑涨实在无法工作，一

气之下在她屁股上打了几巴掌。几个大一点的孩子纷纷起而批评先生，说：妹妹小，不懂事，不应该打她。自己搞民主运动，天天讲民主，回到家里怎么就动手打人？打人就不民主！言辞相当尖锐激烈。先生没料想孩子们竟会向自己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但他没有发火，沉思片刻之后说："我错了。我从小父母就是这样管教我的，希望你们将来大了，再不要用这种方法对待你们的孩子。"先生态度诚恳感人，孩子们至今印象仍然很深。

关于家庭民主，先生在许多场合中都讲过。现存手稿中，有篇提纲，题作《封建的精神　从宗法制度认识封建　父权中心的家庭组织的放大》。题的上方，写着"儒家要不要青年？"文中分析家庭发展的形态，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个角度，对封建家庭中子女对父亲的依附关系做了解剖，指出封建精神必然扼杀青年，认为青年的自治必然要摆脱封建的"孝"。其中一段云：

家庭生活的方法与精神，若与子女年龄阶段不相配合，则发生紊乱与悲剧。

社会的发展，如家庭，社会制度与社会本质不能配合，其结果也是紊乱。

一切文明社会已具国家形式者皆已超过第一段进入第二段。

中国的封建时代正代表第二段的典型形态。

到春秋社会本质已渐成年，社会蜕变中呈现不安现象，儒家不知因势利导使制度配合本质，反而加强旧制度，因其违反社会的生理发展，所以贻害无穷。

手稿中还有一份没有标题的提纲，写得虽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不过针对的是"父权"与"君权"。兹录如下：

(1) 以父子关系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则无经济民主，无平等。

亲疏　　尊卑　　贵贱　　富贫

名分(分裂)　　"交别"(墨)　　人与人间划出鸿沟

(2) 以父子关系为人生道德的准则——则无政治民主，无自由。

没让国摆脱家的形态

没让家摆脱父的权势

天君父三位一体成了万能

君(大人)与师(圣人)虽分工而仍合作　适以加强君的权力

又以孝使君父连系更紧亦加强君的威信。

太注重个人修养　而所谓个人只是君父　结果阻止了别人的个人发展(偏重君父的个人因先认定君父的神圣性)　所加于君父的责任愈多，君父的地位愈高

个人的修养太重心灵的能力——唯心

仁　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万物皆备于我　克己复礼为仁(以阶级权利为道德标准)　周书度训"中非礼不慎"

唯心——君父的独断且以己身福利为准的

中庸——仲裁者道德

性相近　性善

因个人独断故要别人服从

下对上的道德(孝悌忠……)，奴隶道德　被动　强迫性　消极　无实践的热心与方法　虚伪　作恶的幌子

(3) 人群既分，再凭君父权力造成权利义务的关系以连合之——封建秩序——在分的基础上求合，矛盾，虚伪。　礼变成面子　义亦是自私的

结果还是分"王纲解纽"

Frarernity

四月初　民青负责人向民盟云南省支部介绍情况，先生等听取介绍。洪德铭回忆会上情形："通过盟员的活动，民青在联大、云大掌握了近三十个进步社团、壁报和大批系会、组会，因此引起了罗隆基、潘大逵的重视，他二人想按照他们的意图控制民青组织。四月初，陈定侯、洪德铭、严振三人应邀向民盟云南省支部当面介绍情况，地点在吴晗家中。民盟参加的有罗隆基、楚图南、吴晗、闻一多、周新民、潘大逵、尚钺等先生。首先由洪德铭汇报了民青成立经过，两个月来工作的情况，当时组织分布情况，及四五月工作计划。接着研讨了今后工作打算，气氛比较融洽。最后罗隆基提出民青应向民盟定期汇报工作，提送成员名单。我当即表示可以定期汇报或书面通报工作情况，但以保守地下组织秘密、防止发生意外为理由，对提供民青盟员名单的要求就婉言拒绝了。潘大逵、罗隆基还对民青名称、宗旨提了不同意见，说'民主青年同盟'最好改为'青年民主同盟'，简称'青盟'，搞成民盟的从属组织。还说民青不要提'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只提为民主主义奋斗就行了。我当即表示民青章程是代表大会通过的，要作重大修改必经过代表大会。陈定侯说最近要开干部会议，总结研究工作，这些问题可在会上讨论。"(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洪德铭还说：是月上旬，民青召开干部会议，职业青年小组负责人杜迈之(亦民盟盟员)、云大民青支部委员蒋阜南要求在章程上写入"接受中国民主同盟领导"，并将民主青年同盟改名为"青年民主同盟"，还建议入盟者只要宣誓拥护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即可。由于多数人反对，决定对此从长计议，现集中力量

筹备五四纪念。其后，杜、蒋、孙政和退出民青，洪德铭将此情告诉先生，先生说："杜迈之真有点固执，太缺乏民主习惯了，你们按你们的意见办吧！修改章程是一个团体的大事，就是应该慎重嘛！"先生还答应给潘大逵、杜迈之作解释，以免影响团结。（同前）

四月四日　晚，西南联大召开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对于国是的主张。该文件付印之前，曾送先生润饰修改。

时，国共和谈失败，赫尔利宣布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同时，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学生寄来两份各自对国是的宣言，引起校内学生广泛讨论。对复旦宣言，"因其内容与一般学生的主张大相径庭，被各壁报攻击得体无完肤"，而对浙江大学宣言，则寄予"广大的同情"。（《学生又在动了》，昆明《民主周刊》第1卷第16期，1945.4.9）浙江大学全体学生发表的对时局宣言，内容共十项：一、确切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通讯等之自由，废除军事秘密以外的一切检查制度。二、确切保障人民身体、集会、结社之自由，停止一切除了对敌人和汉奸以外的特务活动。三、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措施，切实保障人民思想与学术之自由。四、无条件承认各党各派之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公开活动。五、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六、军队国家化，改善士兵生活，使全国各部队获得平等之待遇，以增强反攻力量。七、废除二十六年前所选之国大代表，并从速公开国大代表之选举法，在新选举法中不得有"指定"、"圈定"、"当然"之类规定。八、裁撤并严惩一切腐化官吏，以刷新吏治。九、取缔一切囤积操纵，严惩奸商，开发资源，以挽救财政经济之危机。十、党务费不得在国库中支取。联大学生自治会不失时机召开代表大会，并于会后将对国是之主张提交全校学生讨论辩论。这期间，先生一直与民青负责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洪德铭回忆："这篇国是意见书付印前是送闻一多润饰修改过的。为了争取用全体同学名义发表，曾经过校内同学的充分讨论和激烈斗争，联大学生会负责人和民青负责人曾多次和闻一多、吴晗进行过研究，有关情况在民青《给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第二次通报书》中详细叙述过。"（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这份"执报字00贰号"通报书，第一项即"推动联大发表宣言工作的总结"，是由严振执笔的。

这个宣言约在是月中旬得到全校学生表决通过，但无处承印，《民主周刊》便在第一卷第十八期披露了它的内容，题作《二千五百余优秀青年喊出民主团结的呼声——联大学生发表国是主张》。文中说："在这篇宣言中，它以生动的词句，叙述这抗战八年来国土的损失，政治的……士兵人民的苦痛，经济外交政策的……学术文化的贫困之后，归结出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中国没有民主'。针对着上述的实际情形，二千五百余热爱民主自由的青年，以坚决不可摧的态度，提出对国是的六大

主张。这六大主张，正如全国人民所拥护的一样，是召集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士，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保障人民自由，实施战时教育，改善士兵生活，并立即以断然手段，没收发国难财者的财产与在美冻结的三万万私人美金存款，以充战费。在外交方面，要加强与各盟国合作，目前尤应从速敦睦中苏邦交。……综合了上面的主张，得出了一个有力的结论：'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民主是一切的前提，而联合政府是目前实现真正民主的唯一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解救当前的危局；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由于各印刷厂拒绝承印联大学生宣言，民青执委会决定创办一小型印刷所，得到先生支持。洪德铭回忆："民青工人分部成员主要是印刷厂工人，人力是有条件的，但没有经济条件，我把这个打算向闻一多、吴晗汇报后，他俩极力支持，答应从民盟各位先生那里筹集资金。所差数目，是由闻先生用刻印报酬和他二人的稿酬补足的。"（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四月六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外文系联合举办诗歌晚会，会场挂着一幅大红幕布，中间用金纸剪成一个巨大的"诗"字，两边打着淡红的灯光，全场充满了诗意。先生出席，并讲"抗战以来中国新诗的前途"。

《联大云大今有演讲》："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与外文系合办之文学晚会，第一次诗歌晚会，今（六日）晚七时假联大昆北食堂举行。讲题计有：一、抗战以来中国新诗的前途；二、如何接受中国文学的遗产；三、从历史观点看旧诗；四、如何采用西洋诗的形式；五、法诗最近的趋势；六、境界与感觉的移植；七、从社会、思想、哲学说到新诗的素养；八、民歌；九、前途的预测和我们应有的努力；十、英国诗最近的趋势等问题。分由闻一多、罗膺中、朱自清、浦江清、闻家驷、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杨周翰、王佐良等十人主讲。"（《正义报》，1945.4.6）

四月七日　宋云彬接茅盾、巴金、金兆梓等联名函，内云："拟乘此湘桂文艺作家内徙，同志群集之机会，成立一种机构，为同仁之写作及出版谋便利。"茅盾等邀宋云彬参加，并谓"弟等所邀请共同发起此事者共十一人"，除宋云彬外，还有先生与老舍、洪深、柳无忌、孙伏园、章以新、叶圣陶、郑振铎、吕叔湘、朱自清。（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第89页）

四月九日　参加西南联大新诗社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会上围绕"诗歌与人民性"主题展开讨论。

《联大新诗社庆祝周年纪念》："昨（九）为联大新诗社成立一周年纪念，该社晨间举行诗作展览，收集中外诗集杂名著等四百余种，陈列于联大图书馆期刊阅览

室,供诗歌爱好者自由参观。晚间七时起,假该校南区三号举行诗歌座谈会,题目为'诗歌与人民性',内中包括:一、什么是人民性?二、诗人与人民性。三、从人民性回顾实验中诗歌。四、如何使中国诗歌具有人民性?五、结论——从人民性上展望中国诗歌前途。到会有闻一多、楚图南、李广田、闻家驷、尚钺等教授及新诗爱好者六十余人,对各问题讨论均踊跃发言,情况热烈,情感融洽。至夜十一时始行散会。"(《云南日报》,1945.4.10)

同日　西南联大二十五壁报、社团成立"联大壁报联合会"。先生对该会建立做了一些协助工作。

洪德铭回忆:"西南联大的壁报联合会(简称'报联')是在改组原壁报协会(简称'壁协')基础上成立的。壁协只包括全校各个进步壁报社,不包括各个进步社团,在大型群众活动中,不利于互相配合。因此,民青建议组织社团、壁报联合会,在酝酿过程中,少数社团、壁报社持反对意见,工作遇到困难。我请闻先生做工作,他热情地给予支持,并亲自给几个有影响的,他当指导教师的社团、壁报社做工作,终于使壁报社团联合会得以正式组成。这对于以西南联大为主要阵地,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有计划、有组织地在昆明市开展民主宣传工作和组织联络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壁报联合会成立后,于十四日呈文联大训导处,要求备案。训导处二十四日特发专函给吴晗,称"查该呈文列举之壁报共二十五个,所称筹组联合会及成立经过,本处事前并无所闻,当即将该呈文转请常务委员会鉴核。兹奉常委十九日核示:'本校学生壁报系为使学生练习写作,一切应由训导处督导,无需有联合组织'等语。查'国风'、'新阵地'壁报系由先生负责指导,敬请转饬遵照为祈。专致吴晗先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训导处关于"国风"、"新阵地"壁报事给吴晗的信》,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此函油印,当亦给先生一份。

四月十日　先生、吴晗等五十一人致信慰问郭沫若、顾颉刚。自郭沫若等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书》后,各地人士纷纷响应,蒋介石为之大震,面斥张道藩。三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借口机构重叠,强令解散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消息传来,先生等十分愤慨,立即发函慰问。该函现存草稿两份:一件为先生亲笔修改稿;一件为修订后重新抄写稿,后有签名。兹录签名稿如下:

颉刚、沫若两先生:

报载你们二位所分别领导的辞典年表编纂处、文史杂志社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关,都先后被无故取消了。对这不幸的消息,我们虽然愤慨,却毫不惊异,因为我们知道这事件的发生,是中国反民主势力又一罪恶的政治表演,

它使这荒淫无耻的大后方仅有的几个庄严工作据点，又受到严重打击而停止，这确乎是我们大家的不幸，但这绝不是我们的致命打击，反之，从这一次打击上，我们全国民众倒更可以解除一些错觉的蒙蔽和幻想的羁绊，因而更能坚定今后努力的决心。

抗战八年以来，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在文化教育机关担任工作的。八年如一日，我们的信心和忍耐，并没有动摇，然而还是挽回不了国家的颓势。在抗战过程中，国内的破绽愈来愈大，使胜利和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愈来愈远。但我们仍然在隐忍和宽恕的心情中期待又期待。直到今天，我们仍在隐忍和宽恕的心情中，期待又期待。直到今天，我们的隐忍和宽恕几乎变成了一种罪恶，期待变成了无底的失望。眼前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破产，军事的挫折，以及社会上贪污无耻的公然横行，与夫你们这次所受到的可耻的打击，都是这一事实无可掩饰的说明。

所幸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明白了我们险恶的环境，艰苦的前途，也明白了我们责任的重大！新的挫折，只是提高了我们新的警惕，增加了我们新的勇气。

"雾重庆"的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请两位坚守着我们文化界庄严工作的堡垒，紧握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纛，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请相信我们是你们的声援，如同你们相信广大的民众是你们的后盾一样，你们不是孤立的。

最后，为了你们这次所受到的光荣的迫害，请你们和协助你们工作的诸位朋友，接受我们这点同情与敬意。

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忠实同伴！（《闻一多等昆明文化界人士为国民党取消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组织致郭沫若顾颉刚的声援信定稿》，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签名者为：闻一多、吴晗、萧涤非、陆钦墀、白澄、闻家驷、洪谦、俞铭传、吴征镒、李广田、沈从文、尚钺、林石父、光未然、李公朴、林润青、楚图南、常任侠、姜震中、罗隆基、谢加因、金若年、吕剑、麦浪、杨须知、苏均持、周新民、费孝通、周钢鸣、何家槐、郑伯华、欧阳德荫、袁度、庄永烈、黎敏、羊醉秋、林士诒、蓝驶明、□建初、余湘、杨祺、吴传启、李昌庆、穆芷、郑康、彭桂萼、彭桂蕊、卜兴杜规、吉□宗、杨亚宁、杨秋帆。

四月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以《昆明文化教育界慰问郭沫若先生的信》为题，发表了该信的大部分内容，只是没有关于慰问顾颉刚先生的文字。五月四日，昆明《人民文艺》亦刊登了此信，题为《一封热挚而深切的慰问信》，除刊载上述人名外，

还有周璋、季平、林慧等人名。

四月三十日，郭沫若为感谢先生等昆明文化界人士的慰问，特致函吴晗表示感谢。信云："此次文工被解散，承昆明文化界诸友殷殷慰问，同人等异常感奋。本是预料中事，解散实同解放。唯少数友人因生活忽然脱节，在□三阅月之间，自不免稍受影响耳。同人颇远识之士，正多牺牲生命以争取德先生之胜利，仅仅打破饭碗，殊不足道，受诸君子之鼓励，自当勉力，愿不致成为时代落伍者。乞释□[悬]念。弟仍寓天官府四号，唯赐教如由群益出版社（临江路西来寺二十号）转或较妥当也。文化界诸友请代致谢忱。"（《郭沫若致吴晗信》，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四月十三日　对美国总统罗斯福十二日病逝发表感想。龙江、传启《举世痛悼殒彗星——记八教授悲痛之余的几句话》记述了先生与周新民、刘崇鋐、陈岱孙、刘思慕、吴晗、费孝通等人的感想。先生发言为：

> 这消息使我太惊奇，也太悲痛。早上突然看到号外，连早饭都吃不下去。罗斯福的死对民主国家的损失，太大了。我对国际问题很少研究，不能随便说会有什么影响。但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恐怕是难免的。虽然如此，我还是不折不扣的乐观者。我觉得一般人都太看重了物质的力量，因而过分强调了英美的援助，把国内的力量却忽略了。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是人，精神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罗斯福死了，虽然民主力量受到不少的打击，但也不过使我们奋斗的路曲折一点而已，或者也是更直接了当一点。要紧的是我们自己，一切决定于我们，只要我们自己不懈的努力奋斗，前途仍是光明的，胜利仍是属于我们的。我仍然很乐观。（《正义报》，1945.4.14）

四月二十三日　洪德铭以洪田禾之名（他与先生、吴晗、周新民等联系均用此名或用"田禾"）给吴晗一信，述及筹备印刷《民主通讯》及筹办印刷所事。

信中云："一、关于印刷通讯事已交待清楚，据印刷所负责人说：须将版样，确实字数，报头编排形式等弄妥，他们始能作正式答复，但无论如何，他们愿作是次生意。二、为使以后印刷通讯及各种文件，不发生困难起见，本支部决定购买脚踏印刷机一部，现已由组织股负责人与印刷工人小组办妥。惟须款十六万元，现只筹足十三万元，尚欠三万元。拟请与民盟支部合办。若组织小印刷所，由工人小组经营，以后印刷工作，除纸张油墨须款外，余则当所费无几矣。三、惟脚踏印刷机，大小仅有大机之一半，印刷物版幅如云南晚报者，颇有困难。通讯版样最好改作如《民盟通讯》之小册子，不仅便于携带，亦且便于保持。至于印刷他种文件或宣言等，仍不致发生困难。四、脚踏印刷机即可买到，惟铅字尚不够，工人小组正在负责搜集中，至多在一两周后即可顺利开始印刷工作。上四项敬请备查。"（《洪田禾致

吴晗信》,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先生等立即送去所缺之款,使此小型印刷厂得以尽早创办。洪德铭回忆说:"四月底五月初开始印刷,昆明四大学《五四纪念特刊》和'国是意见书'就是这个秘密印刷厂快速赶印出来的。接着又先后翻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大批文件、内部刊物。"(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四月二十五日 赴大鸿运餐厅,出席杨明、韩国珍结婚仪式,并与罗庸作证婚人。仪式上,先生说今天是世界和平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开幕日),举行婚礼很有纪念意义。随后在结婚证书上盖了自己的名章。(据访问杨明、韩国珍记录,1987.12.16)

四月二十七日 作《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发表于五月十日昆明《民主周刊》第一卷第二十期。收《闻一多全集》。

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文中分析了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互相并存、互相利用的关系,表现出先生运用阶级与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中国社会与现实的思想。文中说:

>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是处于一种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的状态中。封建的主人,地主官僚与殖民国的主人帝国主义,这两个势力之能够同时并存于我们这里,已经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一种奇异的关系,一种相反而又相成,相克而又相生的矛盾关系。在剥削人民的共同目的上,它们利害相同,所以能够互相结合,互相维护。同时分脏不匀又使它们利害冲突而不能不互相龃龉。然而它们却不能决裂。因为,他们知道,假如帝国主义独占了中国,任凭它的武器如何锋利,民族的仇恨会梗塞着它的喉头,使它不能下咽,假如封建势力垄断了中国,那又只有加深它自己的崩溃,以致在人民革命势力之前,加速它自己的灭亡。总之,被压迫被榨取的,究竟是"人",而人是有反抗性的,反抗而团结起来,便是力量,不是民族的力量,便是民主的力量,这些对于帝国主义或封建势力,都是很讨厌的东西。于是他们想好分工合作,让地主官僚出面执行榨取的任务,以缓和民族仇恨。(这是帝国主义借刀杀人!)让帝国主义一手把着枪炮,一手提着钱袋,站在背后保镖,以软化民主势力。(这是地主官僚狗仗人势!)它们是聪明的,因为,虽然它们的欲壑都有着垄断性与排他性,它们却都愿意极力克制这些,彼此互相包容,互相照顾,互相妥协,而相安于一种近乎均势的状态中。果然,愈是这样,它们的寿命愈长,那就是说,惟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的解放才愈难实现。

文章阐述和分析了五四时期的社会矛盾与斗争之后，话题又回到现实，说：

从二十六年前的五四到今天[①]，恰是螺旋式的进展了一周。一切都进步了。……战争本应使一个国家更加坚强，中国却愈战愈腐化，这是什么缘故？原来腐化便是封建势力的同义语，不是战争，而是封建余毒腐化了中国。今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腐化方面，比二十六年前更变本加厉，是公认的事实。时髦的招牌和近代化的技术，并不能掩饰这些事实，反之，都是加深腐化的有力工具和保育毒菌的理想温度。然而封建势力的进步，必然带来人民力量的进步。这可分四方面讲。（一）西南大后方市民阶层的民主运动。这无论在认识上，组织上或进行方法上，比起五四时代都进步多了，详情此地不能讨论。（二）敌后的民主中国，这个民主的大本营，论成绩和实力，远非五四时代的以来所能比拟，是人人都知道的。（三）封建势力内部的醒觉分子。这部分民主势力，现在还在潜伏期中，一旦爆发，它的作用必然很大。这是五四时代几乎完全没有过的一种势力，今天在昆明，它尤其被一般人所忽略。以上三种力量都是自觉的，另有一种不自觉的，但也许比前三者更强大的力量，那便是（四）大后方水深火热中的农民。虽然他们不懂什么是民主，但是谁逼得他们活不下去，他们是懂得的。五四时代，因帝国主义退出，中国民族工业得以暂时繁荣，一般说来，人民的生活是走上坡路的。今天的情形，不用说，和那时正相反。这情形是政治腐化的结果，而政治腐化的责任，正如上文所说，是不能推在抗战身上的。半个民主的中国不也在抗战吗？而且抗得更多，人民却不饿饭。（还不要忘记那本是中国最贫瘠的区域之一。）原来抗战在我们这大后方，是被人利用了，当作少数人吸血的工具利用了。黑幕已经开始揭露，血债早晚是还清的，到那时，你自会认识这股力量是如何的强大。

帝国主义的进步，封建势力的进步，结果都只为人民的进步造了机会，为人民的胜利造了机会。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二十六年前如此，今天也如此。在“五四”的镜子里，我们看出了历史的法则。

是月　先生对李公朴又产生了误会，但立刻和好如初。

冯素陶《怀李闻》：“一多和公朴两位亲密的战友在昆明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那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北门书屋接受其他进步团体的委托，由其所联系的印刷所翻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不想此事被人播弄是非，说北门书屋翻印别人东西，窃取别人版权，自己赚钱又要抢先印自己的书等等。一

① 此句《闻一多全集》作“从二十六年前的五四，到今天不同于二十六年前的五四”。

多信以为真，责备公朴的书店不应有这种书商行为。两人竟然大吵一场。后来我知道此事，觉得两位战友为此事伤了感情很不安，就约了楚图南同志去看一多，对他说明此事的真相，北门书屋是宣传革命，不是如别人恶意诽谤的那样书商赚钱，不要误会。一多想了一下，说：哦！那是我的不对了！一把拉着我和图南同志去找公朴道歉。一多这种坦荡襟怀不但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公朴，两个战友闹架之后互相拥抱的动人情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云南盟讯》，1981 年 7、8 期合刊）

这件事反映了先生的性格，对先生熟悉的潘大逵说："他为人刚强，爱憎分明，见义勇为，不顾私人情面，不计个人安危，但又极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有一次"在民盟省云南委员会开会时，罗隆基与周新民在某一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彼此动了情绪，一多对双方都加以批评，毫不含糊，最后说：'罗隆基和周新民两个人在盟委会里都是不可少的，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潘大逵《我参加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0 辑，第 94 至 95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

五月一日　朱自清致信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的李嘉言，除祝贺其贾岛研究获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评选的第四届学术二等奖外，还提到了先生。说："闻先生现在很忙，作文演讲次数很多，但他一面还照常用功"。（李之禹《李嘉言与闻一多先生》，未刊稿）

五月二日　自由论坛社组织五四纪念座谈会，座谈内容为"自由主义在中国"。这次座谈会记录没有写明发言人姓名，但《自由论坛》由潘光旦主编，很可能邀请先生参加。另，这次座谈很重要，有助于当年知识精英对自由主义及其道路的认识，故可录以参考：

为了纪念"五四"，我们特地邀集了一些朋友来社座谈自由主义的前途。参加的人有当年躬与其事的前辈，有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有一般认为很急进有左派青年朋友。就职业而论，这晚座中人包括有大学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中学教员、银行行员、杂志编辑和大学生。我们并非有意选定自由主义的前途为题，只因为当晚参加的人在认识上有些是出入很大的，总希望话能很平心静气，由平凡的题目引起，后来谈话的范围拉得很广，虽然没有什么结论，但各人都很认真地在思索，讨论。这份记录原文很长，这里只就可以公开的摘要发表。（编者，五、二）

主席：再过两天就是"五四"二十六周年，近年来官方好像看得很不顺眼，进而有人主张把这史事要从书本中，从人们的记忆中删除掉，消灭掉，我们这批人对此还有什么话说呢？一年一度的纪念会到今年似乎特别值得我们追念，穷思。今晚邀集朋友们来社，算是纪念"五四"，就与"五四"有关系的各方面问题讨论，题目且

定为自由主义的前途，从这里起较为方便一些。甲先生是五四当年身历其境的前辈，我们特地请他来参加，请各位多多发言。

乙：近来有人常说自由主义绝无前途，对这话不知诸位先生以为如何？

丙（大学讲师）：所谓自由主义者没有出路的话，我以为这也许是把散漫看成自由，将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的结果。我们应把自由主义看做原则，它有集体的行动，而不是散漫或放纵。

甲：这恐怕是由于没有认识自由主义的原故。多少年来，个人行为上的放纵，私心自用，以及在团体中表现的散漫，无组织，不守法，都把"自由"当作铜饰词，因此有人便把散漫放纵当作自由，其实许多东西，都有两面对立的现象或性质，两方面都言之成理，究竟哪一面是对的，这要靠人善用聪明智慧，去权衡轻重，体察需要再去决定。譬如太保守了，就该急进一点，要是太急了，就得保守一点。中国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中庸的道理，与此相同。这里所谓中，在平常就是适中的意思。古人所谓得其中，就是在圆圈当中，可以循着众多的直径，随时到达边缘或两端。那两端就是代表极端，正如蜘蛛守在网的中心，随时可以跑向网内任何一点，捕食苍蝇一样。后两千年（案：原文如此）把它看着不动的，等着苍蝇来吃，这是大错误。应该把它看做变的，动的。我们权衡轻重，适当时势的要求，再来做适当的处理，依这样的解释，自由和中庸之道相近。

丁（编辑）：延安方面认为在集团之下，个性仍有其充分活动的余地，乃至于较我们所理想的还要大些。他们并不承认是排斥个性或贬抑个人的价值。甲先生以为这话对吗？

甲：这有什么根据？

丁：丙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解似乎很与方面接近，请你说说。

丙：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并不一定与他们同，不过我总以为个人和社会，自由与集体限制，并非对待的意思。如果要得到真自由，必须有道路可循，不能乱走，有体系，不至于无秩序，最容易看出的是权利和义务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只是无限的要享权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定有东西来限制他，二者如何配合得恰到好处，则要靠甲先生所谓的中庸之道。

甲：自由主义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自我认识，就是说一个人要能了解知道他的来历、智慧、长短和补救缺陷的方法，也就是古之度德量力的功夫。第二是自我控制，即对情原个体户的自动控制，而不是外在力的强制。这要靠涵养与磨练的功夫。这两个条件，相互为用，缺一不可。因为不认识自己，便不免妄自尊大，希图非分，不能控制自己，便不免情欲横流，肆无忌惮。这种人根本不配讲自由，不配讲而

偏要讲，则其流弊所及，以个人言，势必至于放纵不羁，以团体言之，势必至于散漫零乱而无秩序。反之，一个人具备这两个条件，在个人方面可以取得比较有分寸有节制的生活，在团体方面，可以取得比较有组织而更协调的秩序。

丙：我想补充一点。自由主义，必须发表他的意见，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都发表出来。然后可以辨别是非。他应该保持人性，不能外加强制，人人有充分表现自己价值的机会，人人的人格都能发展向上。

乙：我以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的基本方式，一个社会要能健全的成立，必需其中的分子有健全的人格，彼此互相依倚，互相谐和，维持社会的平衡。自由主义就是达成此谐和的方法。人与人间彼此有其不同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其彼此共同的地方，要生活，要相安无事，即是最基本相同的地方。自由主义就是如何要顾全到各人之扬言异也要顾到各人之所以同，而维持社会生活的谐和。

戊(中学教员)：甲先生以为经济自由与言论自由有何关系？

甲：自由主义与贸易自由、言论自由有别，但后二者都以个人主义作出发点。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我以为可如此看：在集体之后，如果背后有意识，并且不受成套的支配，或不受武力的控制，在集体下还有自由。不过若成一套，必成主义，便有强制性。

丙：有强制性便不能形成另一套，不能表现别的意见。

甲：这是自由主义条件之一，不过同时并非反对一切力量之谓，必要时要用力来保卫自由主义，如英法革命是，不能不用力，也不能常常用力，永远革命或不革命都是不对的，过去有所谓"北伐万岁"的口号，真是好笑。

戊：苏联与中共成功之后，取消阶级，人人平等，理想社会的实现是否确有可能？

甲：这是两层困难：一、无阶级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治者和被治者永远都有，除非实行无政府主义。二、完全相同亦不可能，除非将反对者杀光，如此便没有办法来得到自己的公平，所以不能不有两个人，一有二人，便有两种意见。(一) 如果经济平等实现之后，可以将治者和被治者不称为阶级。(二) 问题在怎样获得经济平等，绝对平等不可能，因之必有差异，并且在那种社会之下，个人才智，不会完全发展，可能产生多数平庸人，这也不是人类之福。

乙：我想阶级的问题，是永远会存在的，因为人品既有不同，才具既然各有差异，阶级就自然会存在？这阶级我们不要看作是一个可痛恨的罪恶产物，我们想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这阶级的象征，仍然存在，不过一般人反对阶级也许他们的意义是反对所拥有的特权。特权是应该反对的，应该铲除的。为什么有些人凭了资

本，就可以为富不仁呢，为什么有些人凭了武力，就可以杀人如麻呢，为什么很多穷人就活该饿饭呢，就该上前线当炮灰呢，这是不平等的，是该铲除的。左派所要推翻的恐怕就是这种特权，作恶的特权。这点我们也同意。

乙：今日的自由主义与过去大不相同，过去是限于少数人的自由，资本家有钱可以自由竞争，而大多数人限于穷苦没有饭吃，所以也就没有资格讲自由。因为生活随时在威胁中，谈自由岂不等于痴人说梦，划饼充饥，为是不公道的。这是少数人有自由，多数人仍死亡里失去自由。今日的自由主义的涵义已经逐渐扩大，就是在经济上人人起码要有无饥渴的愿虑，生活无忧然后才可发展个人的才具[智]，在文化上努力。

甲："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是否有"李先生"？

丁：自由主义似乎可以包括在德先生之内，甲先生说有分别？

巳(大学生)：在我看来，民主和自由主义是不可分的。或者可以说，自由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没有自由主义，便不会有民主政治，譬如在民主国家，政策的形成，必须经过不受强制的自由讨论，这种讨论又基于一个假定，便是在商讨辩驳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人的优越性，辨别出坏的错的意见。大多数人接受了这种优越的意见，把他作为引导人群，改进社会的指针，这是有益于人类前程的。言论出自自由，都根据这一点而来。又如投票权的实施，也必须以自我选择，不受外力的支配为依据，以秘密警察监视下的希特勒的总投票，违反了自由主义，也没有民主可言，所以又可以说只有民主政治终能保证自由主义。

甲：这是对的，自由与民主是相互为用的，问题在当初想到自由主义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当时只求解放，消极的解放而非积极的解放。只有冲动性，抗力性，只有浪漫主义，否定一切，所以谩骂，打倒孔家店等口号都出来了。其成效并不如左派人士所说之大。如果有人领导继续求解放，必有较大的成功。

丁：当时如果有人领导，继续下去，恐怕也难有结果。

甲：关于这一点，胡适之先生一般人要负责，他们自己当时还不够。

丁：五四解放运动，是否已够？

丙：不够应该继续加油，因为新的残害又来了。

甲：解放后还得有安放(案：原文如此)，自己存控制，因为没有这样做才有新的残害。有些人指出"五四"运动是政治运动，缺乏(案：原文如此)，此意甚对，我在我那篇文章里，说明过去没有赛德两先生联系起来，这是大错误，此外当时分子复杂，缺乏组织，个人见解不成熟，无尺度，后来运动完了，各奔前程，有的则接受社会主义，有的接受国家主义，但是自己没有见解，不知到底对不对。

丁：当时还把英雄主义、主观主义、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联[系]起来。

丙：请问甲先生对当前青年有什么批评？

甲：现在青年通常都很左，我不说这是毛病，青年还不左，什么时候再会左呢？我们这个社会正需要这矫枉的力量，有时我想我们这个太右的社会，以左来矫枉，过正都没有什么打紧，不过我们更需要把健康权变两字，当处置到实际辨别是非量就需要一些冲折权变，毛泽东和斯大林辈以马列主义作根据，在处置实际政治的过程中，对马列主义，加以伸缩性的解释，而大学青年，没有处置过实际问题，接受教条公式，所以比毛泽东辈似乎还进步，这是不用脑筋的结果。

丁：中共过去也患着严重的左倾幼稚病，他们一般党员如此，有些高级干部也如此，年来的整风运动似乎主要是对此而发，这一点倒很少为一般青年深切注意到。

丁：我希望自由主义者能多用脑冷静观察，少喊口号，更多锻炼相当能力。

甲：是的，过去的通病是以口号代表实际工作，接着就是一套一套的教条主义迎接上去，青年只着眼便宜省事地成套地接受，不用头脑去想了，眼也不看了。

庚(银行行员)：近年来青年朋友似乎很少想到跟着战争的结束会有怎么一个新局面到来，对这新局面我们也无准备。

丙：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准备，那批反动势力是准备好了。他们先着一鞭，我们是要吃亏的，近几年来，知识分子对政治关心的程度大增，不知道能够形成一个进步改革的动力否？

甲：很难，本来学校的希望可大，但他们仍有地方逃避，局面再困厄一点，他们就会隐遁高蹈，企业界希望较大，他们没有退路。

丙：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照现在来讲改革力量应不成问题，甲先生的话很对，但我看重庆的修企业界则颇不然，他们对现政权的依附性不小！

戊：这是官僚资本作祟，那般企业家与官僚政权是一对孪生兄弟，怎能希望他们作为改革的动力？

戊：如果自由主义者要从事政治事业，而又与资本家结合真不，将来虽不受他们的牵制，走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覆辙。

甲：不要与资本太大的人结合，应与资本小而有头脑的人联系起来，事实上资本家也有用正当方法得到正当利润的，不能说都是坏蛋，未免太不公平。

丙：企业界是否有这批人？能否产生力量？

甲：然，企业界有一部分可形成真正改革的动力，这点我们不必怀疑。

戊：资本家占社会的少数，好的资本家尤其为数寥寥，如果说打倒他们是不公平

的话，那么让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受苦，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眼见资本家在那儿发财，那不是更不公平？自由主义者应该为少数谋利益吗？……

甲：对！所以老牌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都不合时了，今日青年应该向左走，人人应该接受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英国十九世纪末期以来所实行的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险，和美故总统的新政，都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

至此主席谓："今日美国社会主义的倾向很明显"，"大势所趋，英美应该多多采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苏联多给人民以英美人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放弃过去控制人民自由的办法，二者便可以调和起来，中国青年应在这种趋势之下找出一条路来，把中国弄好。"

戊：过去的运动，缺乏组织，所以没有成功，今后应有组织。

甲：今日自由主义者只有从大组合中求出路，不一定要参加政党，有计划有组织的坚持下去，像西洋人一些，决不会使一种运动像过去一些一哄而散，本来自由主义者，说得好一点，左右逢源，说得不好一点，左右为难，两边夹攻，但是只要站得稳，在大结合之下，打倒口号标语，便可避免此种痛苦。（《自由主义在中国：五四纪念座谈会记录》，《自由论坛》周报第25期，1945.5.4）

同日　晚，出席西南联大新诗社举办的"诗歌朗诵晚会"。这是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和英专四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五四"纪念活动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天，国民党云南省执行委员会通过昆明市政府，向各校下达教字第一二四号密令，称"五四"纪念周活动"皆有不轨言行发生可能"，要各校"务须严密防止学生参加非法活动"。但纪念活动仍按预定计划进行。

这天晚会上，到两千多人。先生首先发言。《记诗歌朗诵晚会》中报道了先生发言的主要内容。先生说：

> 用诗歌朗诵来纪念"五四"是极有意义的。我们为什么要朗诵诗？文学必然有功利性，诗必然是政治的工具，人类无法脱离团体的社会生活，也就离不开政治，而政治乃是诗的灵魂。
>
>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诗发展到现在的经过，更不妨先翻翻我们的革命历史。辛亥革命，是对一姓一家的革命，革命的对象异常简单，要推翻它，取得政权，少数知识分子即可完成这工作，因此当时鼓吹革命的工具，用那时知识分子所熟悉的文言文即行。
>
> 北伐时代，革命的对象是北洋军阀一个集团，工作比以前艰巨，担任革命的工作者，除了知识分子，还须广大的市民和工人群众，对他们鼓吹革命，知识分子的文言文已不适用，而我们的文学家也早就知道这新工具的需要，"五四"

以后就展开了新文艺运动，早就准备了这一阶段的战斗的武器。

如今，不必讳言，我们的革命尚未成功，而且去成功还很远，这一次的革命对象是整个阶级。因为它早已根深蒂固，有更大的势力，担任这一次革命的工作者，应当有广大的农民，非做到农民也参加了革命的地步，革命无法完成。我们要唤醒农民，农民是不识字的，语体文已不适用，因此我们需要通俗的秧歌剧、街头剧、接近土地的音乐、为任何人所了解的朗诵诗。现在，我们正在作这种准备。(《联大通讯》第2期，1945.5.21)

先生讲毕，随即开始诗歌朗诵，登台者有何孝达、刘振邦、何兆斌、李实中、朱自清、胡庆燕、张光年、吕剑、郭良夫、许健冰、金德濂、常任侠等。

先生也朗诵了解放区诗人艾青的《大堰河》。他朗诵富有感情，给人深刻的印象。朱自清在《论朗诵诗》中说："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过这首诗，并没有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周朗诵晚会上听到闻一多先生朗诵这首诗，从他的抑扬顿挫里体会了那深刻的情调，一种对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爱。会场里上千的听众也都体会到这种情调，从当场热烈的掌声以及笔者后来跟在场的人的讨论可以证实，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节目之一。……笔者那时特别注意《大堰河》那一首，想来想去，觉得是闻先生有效的戏剧化了这首诗，他的演剧的才能给这首诗增加了些新东西，它是在他的朗诵里才完整起来的。"(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54至255页)

同日 作《说鱼》后记。全文发表于是年六月昆明《边疆人文》(乙种)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收《闻一多全集》。

先生认为"鱼"是古人运用很普遍的一个隐语，它所代替的是"匹偶"、"情侣"。这个观点，先生曾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阐述过，故在《说鱼》注一中说："作者十年前在一篇题名《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的文章里(《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十年来相关的材料搜集得更多(尤其在近代民歌方面)，对于问题的看法似乎更深入，所牵涉的方面也更广泛，所以现在觉悟有把它作为专题，单独提出，重新讨论一次的必要。"《说鱼》分六节：一、什么是隐语；二、鱼；三、打鱼钓鱼；四、烹鱼吃鱼；五、吃鱼的鸟兽；六、探源。

《说鱼》是先生试图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古代诗歌的论文。它特别强调"隐语"的作用，说它是一种充沛着现实性的艺术：

隐语的作用，不仅是消极的解决困难，而且是积极的增加兴趣，困难愈大，活动愈秘密，兴趣愈浓厚，这里便是隐语的，也便是《易》与《诗》的魔力的泉源。但，如果根本没有隐藏的必要，纯粹的为隐藏而隐藏，那便是兴趣的游戏，魔力

的滥用，结果便成了谜语。谜语是耍把戏的语言，它的魔力是廉价的，因为它不是必需品。

隐语应用的范围，在古人生活中，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广泛。那是因为它有着一种选择作用的社会功能，在外交场中（尤其是青年男女间的社交），它就是智力测验的尺度。国家靠它甄拔贤才，个人靠它选择配偶，甚至就集体的观点说，敌国间还靠它伺探对方的实力。一般说来，隐语的艺术价值，并没超过谜语，然而它的地位却在谜语之上，那正是为了它的这种社会价值。不用讲，我们之所以重视隐语，也就因为它是这样一种充沛着现实性的艺术。

文中，先生还讨论了为什么用"鱼"作隐语的原因，和世界某些民族也有类似的做法：

为什么用鱼来象征配偶呢？这除了它的蕃殖功能，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大家都知道，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这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不必赘述。种族的蕃殖既如此被重视，而鱼是蕃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其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现在浙东婚俗，新妇出轿门时，以铜钱撒地，谓之"鲤鱼撒子"，便是这观念最好的说明。……

最后，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以鱼为象征的观念，不限于中国人，现在的许多野蛮民族都有着同样的观念，而古代埃及、西部亚洲以及希腊等民族亦然。崇拜鱼神的风俗，在西部亚洲，尤其普遍，他们以为鱼和神的生殖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闪族人还以鱼为男性器官的象征，他们常佩的厌胜物，有一种用神鱼作装饰的波伊欧式的（Boeotian）尖底瓶，这神鱼便是他们媒神赫米斯（Hermes）的象征。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我们发现在世界的别处，这生物的意识，特别发达于各野蛮民族和古代民族间，正如在中国，看前面所举各例，汉族中，古代的多于近代的，少数民族的又多于汉族的。这里揭露了在思想上，"文化的人"和"生物的人"的区别。

在课堂上，先生还加以发挥，说《饮马长城窟行》中"鱼书"一词，证明书函刻成鱼形，那是象征爱情。又说京剧《玉堂春》中苏三戴的行枷为双鲤鱼状，中藏诉状，也是暗示爱情的流风余韵。（据王瑶《念闻一多先生》，《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13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五月三日　晚七时，参加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

会”。这个会在新校舍北区东饭厅召开，有三千五百余人出席，气氛十分活跃。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史实的追忆”，《历史是我们的指标——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报道云：主席报告了讨论大纲后，接着说：“我们首先进行第一小节‘史实的追忆’，关于这一节，现在请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闻一多先生为我们讲述。”先生说：

> 今天这会是历史学会主办的，我愿以读史的立场来说几句话。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但是先生们却渐渐地冷落起来了，于是用各种方法来阻止我们，当然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高明如用请看电影的方法①。他们认为有了党派，问题就严重了，于是企图高压制止。有些同学也因此观望不前。当我们读史的时候，我们庆幸有这个党派来捡起这个运动，而当时的人却讨厌什么党派，这个教训是应该特别深深体会的。老辈如果退后几十年，以史家的眼光来认识它，他一定高兴于当时国民党的起来，而绝不会厌恶或害怕。读书的人看事应特别加上智力，今天的情形，一定还有人徘徊犹豫，怕受党派利用，因为某某党也在喊民主，这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向有所谓清高的风气，请诸位特别留意这□，后[经过]二十六年，当你读到今天的历史时，你一定会感到庆幸，今天有某某党派，就像庆幸当时有国民党一样。我们读书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也不被人利用离间的，我们应以读史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掌声）（《联大通讯》第2期，1945.5.21）

会上雷海宗、吴晗、曾昭抡、沈有鼎和同学六十余人发言，先生还有发言，但因版面所限未能刊出。最后，吴晗作结论。

同日 德国宣布投降，欧洲人民狂欢庆祝。消息传到昆明，《正义报》记者吴地分别采访先生和刘崇鋐、杨西孟、邵循正、吴晗、周新民六教授，请就“欧战结束后，对欧洲和平的展望”、“盟国怎样处置德国”、“波兰问题是否会影响盟国的团结”、“美苏代表合作的前途”、“盟国对远东攻势可能加强到啥程度”、“苏联何时在东方参战”、“对日战事哪天能结束”等七个问题进行笔谈。先生的笔谈未入集，其文为：

> 从最近的波兰问题、阿根廷问题等等，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是和平合作的底潮阶段，这对于罗斯福之死，不无一些关系，但战后美国要解决七千万人失业的危机，他战后扩充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必须向外边找市场，因此他必须与

① 白天，国民党当局在三个电影院请客，免费为同学们放映新影片，借此阻止同学参加纪念会。

苏联合作，我们不管目前怎样，不管美国的政府怎样，我们相信美国政府在人民的督促之下，一定会走上与苏联和平合作的路上的。（吴地《欧战结束以后，展望世界大局——记六教授的几点意见》，昆明《正义报》，1945.5.9）

五月四日　下午一时，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在云大操场举行"五四纪念大会"。先生与潘光旦、潘大逵、曾昭抡、吴晗、李树青等教授出席了大会。到会者还有中学生、职业青年、新闻记者及盟国友人，共六千余人。

会上，吴晗、潘大逵讲演。时，天下起雨，有人到树下避雨，会场秩序出现紊乱。先生站出来大声疾呼："是青年的都过来！是继承五四血统的青年都过来！""这雨算得什么雨，雨，为我们洗兵！"最后他呼吁："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间去！"（《让民主回到民间，五四万人大游行》，《联大通讯》第2期，1945.5.21）

吴晗《哭一多父子》亦有记述："正当开始的时候，天不作美，在下雨了，参加的男女青年在移动，找一个荫有，会场在动乱了。你，掀髯作狮子吼，'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上来，走近来，勇敢的人走拢来！'在你的召唤下，群众稳住了，大家都红着脸走近讲台，冒着雨，开成了这个会。"（《人民英烈》，第249页）

会后，举行了万人游行，人们高呼"立即结束国民党独裁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等口号，走过昆明主要街道。这是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出现的第一次群众示威游行，并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诸项主张。先生始终走在队伍当中。当队伍回到会场，先生再次走上讲台，作即席演讲。王康《闻一多传》中记述先生讲道：

"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但是，现在和"五四"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也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求的民主，也不是过去那样的民主了。……

"五四"还要科学，不过，没有民主，也就不可能发展科学。所以，我再三说要民主。这决不是说不要科学！我们的国家太落后，封建迷信太严重，这两年闹的什么"献九鼎"那一套把戏，不就是宣传封建迷信吗？这也是同孔家店的思想有关的，所以"五四"要打倒孔家店。如果我们有了民主，又有了科学，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可以消除反动复古的把戏了。

今天，大会的胜利，证明我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是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也一定会得到更大的胜利！不过也要记住，反对人民的人并没有睡觉，我们不能

麻痹，不能自满。我们要更好地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胜利，争取更大的胜利！（第347至348页）

杜运燮对先生这天的演讲印象深望，他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他具有诗人的表现情感与思想的适当美丽辞句，革命家的热情，演说家所需要的宏亮的好嗓子，而且他对群众心理亦有深切的认识，了解他的听众，所以他的有力的警句便不断地自他那围有山羊胡须的嘴里流出来，群众不断地报以最热烈的掌声。那是非常动人的场面，所有听众莫不以得能参加那感情泛滥的狂潮为光荣。"（《时代的创伤》，《萌芽》第1卷第2期，1946.8.15）

晚上，先生参加了西南联大同学举行的全校大聚餐。《三千人聚餐》："将近三千人的大聚餐，在一般人也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这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毕竟于五月四日在联大实现了。……闻一多、雷海宗、曾昭抡、潘光旦、吴……诸教授也一样地坐在地上，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联大通讯》第2期，1945.5.21）

接着，三十四位同学进行火炬竞走，男女队的第一名都获得了先生所题写着"民主火种"的锦旗。《火炬竞走》："火炬竞走，沿路两侧贴满了人，终点设在图书馆前的司令台。四幅锦旗又在司令台上飘扬——这是多么美的旗帜啊。两幅由闻一多教授题字——'民主火种'——悠悠体育会捐赠的锦旗给男女两队的第一名，马约翰教授题字——'巍巍青年'——学生自治会捐赠的两幅，被两队的第二名取了去。"（《联大通讯》第2期，1945.5.21）

同日 《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发表于《大路周报》创刊号。

"人民的世纪"，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去年访华时说的一句话，已成为大后方流行的一种口号。先生接过这句话，特别强调"人民至上"，以反对所谓"国家至上"。文中说：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比当年更坚强，更结实的"五四"，因为，很简单，今天的局面更严重了。

在说明这一点前，有一个观念得先弄弄明白，那便是多年来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国家至上"，国家究竟是什么？今天不又有人说是"人民的世纪"吗？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

知道国家并不等于人民，知道国家与人民的对立，才好进而比较今天和二

十六年前的中国。

这篇文章，是马识途到先生家取的。取稿子时，马识途说到外边对先生的传言，说有人咒骂他是"疯子"。"他从眼镜镜框的上边望我一眼，说：'这个社会，我要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大路，是会发疯的。'"（《马识途文集》第9卷《风雨人生》下册，第425页）

同日　《五四与中国新文艺》发表于西南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学生自治会联合编辑的《五四特刊》。这是根据二日在联大"诗歌朗诵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中提出：现在是群众的时代，让文艺回到群众里去。全文如下：

从"五四"开始，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开始萌芽，它表示中国社会必然的发展和要求。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开始抬头，新兴阶级需要一个新的政权扶植他们发展，但是欧战之后，国际政治的黑流以及国内军阀的反动使新兴阶级的愿望遭受挫折，这时新兴阶级的代言人——学生、小市民——便起来了，对外他们要求打倒帝国主义，以求本阶级的解放，对内打倒军阀，以求民主政治的发展。不管他的阶级性如何，这个运动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领导阶级的眼光不得不放到群众里去。因此，他们必运用一种新的宣传方式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进而唤醒群众的斗争情绪，这个方式就是白话文，以及用白话文表现的中国的旧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辛亥革命时代的文艺与"五四"时代有什么不同呢？辛亥革命是士大夫领导的，他们的群众是士大夫，因此，表现文艺的形式的还是士大夫所用滥了的古文。"五四"时代则不然，"五四"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虽然并不广泛也不深入，但是，因为它接近群众，因此，在文艺表现的方式，多少有一些群众性。

民族工业的兴起，同时产生了工人阶级，"五四"运动也得到工人的赞助，这是"五四"进步性的一点证明。但是，工人并没有居于领导的地位，这是"五四"民主运动不彻底的地方。因为这样，所以"五四"时代所谓中国的新文艺，还是旧的写实主义。

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而发展，或者说，中国新文艺应该彻底尽到它反映现实的任务。目前我们需要崭新的文艺形式和内容，我们要让文艺回到群众那里去，去为他们服务。目前我们要求"民主"下乡、进工厂，我们的文艺也要这样。因此，在我看来，目前最恰当的文艺形式是朗诵诗和歌剧。此外，我们还需要与其它部门配合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我所说的其它部门大抵指电影、漫画等。

中国新文艺发展的事业与民主事业同样艰巨，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我们相信，只有广大的群众是主人，群众的利益定会战胜少数人的特权的。

先生这篇文章，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十三日，重庆《新华日报》在《昆明十一教授对五四和时局的意见》报道中，摘录了本文最后两段。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又刊载署名"禹"的文章《闻一多先生说："现在是群众的时代，让文艺回到群众里去！"》，不仅征引了部分段落，并评论说："在这里面，不但解决了文艺与当前民主运动的关系，而且深刻的指出了中国新文艺一条开阔的方向，那便是与群众结合，到乡下去。同时，闻一多先生在文章中还分析到'五四'虽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而当时也还是有它不够彻底的地方。今天我们民主运动的任务就更鲜明的规定了，我们必须到群众中间去，文艺也只有从那里得到自己丰富的泉源，才能够产生真正群众需要的作品。"

同日 《五四断想》发表于西南联合大学悠悠体育会编辑的《五四周年纪念特刊》。收《闻一多全集》。

悠悠体育会的前身是"悠悠球队"，成立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一年多来，他们由几十人的团体，发展为拥有三百多会员的联大重要社团之一。该会举办体育运动会、举办赴路南旅行，举办全校性的火炬竞走，先生都给予热情支持。《五四断想》也是应他们要求而赶写出来的，文章巧妙地用该会的名称"悠悠"二字开头，阐述辩证法的革命道理，表现了先生这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这也是一篇很出色的杂文。文中说：

>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
>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
>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
> 新的日日壮健着（量的增长），旧的日日衰老着（量的减耗），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
>
>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停下来拦住去路，说："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他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的演下去，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
> 让曾经新过来的旧的，不要只珍惜自己的过去，多多体念别人的将来，自己腰酸腿痛，拖不动了，就赶紧让。"功成身退"，不正是光荣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也是古训啊！
>
> 其实青年并非永远是革命的，"青年永远是革命的"这定理，只在"老年永远是不肯让路的"这前提下才能成立。

革命也不能永远“尚未成功”。几时旧的知趣了，到时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碍了新的发展，革命便成功了。

旧的悠悠退去，新的悠悠上来，一个跟一个，不慌不忙，那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

但目前，我们还要用“挤”来争取“悠悠”，用革命来争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问题。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只得悠悠的变。若是该变而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训也发挥了变的原理。

先生与青年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把青年看成希望，不免有时也会发生分歧，但胸怀总是宽广的。流金（程应镠）《人之子——怀念闻一多先生》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不久我编着一回小小的副刊，告诉他的时候，他阻止我，劝我不要把生命浪掷，不要信任一个我以为还可信任的人。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在我的朋友面前骂我，我问心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当骂我的话传到我的耳边，我写了一封信托人转给他，信里的语调是强硬的驳复他的‘偏见’。后来，他的话一一的中了，那个我以为还可信任的人骗了我们的劳力，还使我另外一位前辈受到一点没处说的气。但有两个多月我没有去过他那边，他却怀念起来了，要我一个朋友叫我去看他。我去看他了，他十分激动的说：‘昆明的 Strong Man 是很少的，你是，我也是，我要和你谈谈。’”（《文汇报》，1947.3.24）

五月五日　下午六时半，出席文协昆明分会与西南联大文学会、外国语文学会、文艺社、冬青社，及云南大学文史学会、中法大学文史学会七团体联合举办的纪念第一届文艺节晚会。会场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出席者还有徐梦麟、罗庸、闻家驷、李何林、李广田、冯至、卞之琳、朱自清、周钢鸣、楚图南、尚钺、吕剑、常任侠等人。

会上，温功智同学朗诵艾青的诗《索亚》之后，吕剑首先报告“改五四为文艺节的经过和意义”，接着徐梦麟讲“五四运动的经过”，闻家驷讲“艺术与人生”，常任侠讲“五四以来的诗歌问题”，楚图南讲“抗战以来二三文艺问题”，尚钺讲“鲁迅”，周钢鸣讲“报告文学”，李何林讲“新文艺中的文艺批评”，李广田讲“文学的普及与提高”。像往常一样，压轴的仍是先生，他的讲题为“艾青与田间”。《文艺晚会》有报道：“最后，闻一多先生在比较艾青和田间的时候，特别强调他们诗的不同是源与生活。艾青是今天的诗人，田间是明天的诗人。田间，闻先生引了一句胡风的评语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联大通讯》第2期，1945.5.21）

《艾青与田间》的演讲，被人记录下来，于次年六月二十二日发表于《联合晚报》“歌与音乐”副刊第二期。收《闻一多全集》。文章前有记录者的引言：“这是闻一多先生在去年昆明的诗人节[①]纪念会上的讲演，在这讲演之前，两位联大的同学朗诵了艾青的《向太阳》和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给战斗者》，听众都很激动，接下来，闻先生说”：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他念了一首赵令仪的诗，说：）

这诗里是什么山茶花啦，胸脯啦，这一套讽刺战斗，粉刷战斗的东西，这首描写战争的诗，是歪曲战争，是反战，是把战争的情绪变转，缩小。这也正是常任侠先生所说的鸳鸯蝴蝶派。

几乎每个在座的人都是鸳鸯蝴蝶派。我当年选新诗，选上了这一首，我也是鸳鸯蝴蝶派。

艾青当然比这好。他表现人民及战争，用我们知识分子最心爱的，崇拜的东西与装饰，去理想化。如《向太阳》这首诗里面，他用浪漫的幻想，给现实镀上金，但对赤裸裸的现实，他还爱得不够。我们以为好的东西里面，往往也有坏的东西。

如在太阳底下死，是 sentimental 的，是感伤的，我们以为是诗的东西都是那个味儿。

我们的毛病在于眼泪啦，死啦。用心是好的，要把现实装扮出来，引诱我们认识它，爱它，却也因此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这一些，田间就少了，因此我们也就不大能欣赏。

胡风评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他没有那一套泪和死。但我们，这一套还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们能欣赏艾青，不能欣赏田间，因为我们跑不了那么快。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但田间的知识分子气，胡风说抛弃了，我看也没有完全抛弃。如“自由向我们来了”，为什么我们不向自由去呢？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滚向太阳呢？

艾青的《北方》写乞丐，田间的一首诗写新型的女人，因为田间已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我们不能怪我们不欣赏田间：因为我们生在旧社会中。我们只看到乞丐，新型的女人我们没有看到过。

---

① 当是文艺节。

有人谩骂田间，只是他们无知。

关于艾青田间的话很多，时间短，讲到这儿为止。

五月十二日　《自由论坛》周刊刊登先生治印润例："牙章每字二千元，石章每字二千一百元(编者：原文如此，似有误)，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算，润资先惠七日取件。收件处：青云街自由论坛社。"(《闻一多治印》广告，《自由论坛》周刊第26期，1945.5.12)

五月二十一日　民主周刊社等五团体举办欢迎新中国剧社晚会。先生出席并准备演讲，但因宪警阻止而提前散会，未能讲成。《昆明文化界举办晚会，刚刚开始就被禁止》："本月二十一日晚，这里的民主周刊、自由论坛、人民周报、大路等五团体[①]，邀集本市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假座昆华女中举办晚会，欢迎'新中国剧社'，到有观众千多人。原定七点半开会，因为登记手续等等问题，延到八点多才开始。首先是新中国歌咏团先唱《醒一醒吧，大后方!》，继唱《茶馆小调》，歌词通俗，立意鲜明，鼓吹民主，召唤自由，博得如雷的掌声。这个歌唱完后，是《卢沟问答》，刚唱了第一段，就有宪警出来阻止，勒令休会。……观众才很有秩序的散去。据说晚会原定节目非常精彩，除歌咏、舞蹈、电影和新中国剧社的新颖深刻的活报剧《金碧交辉》和《无条件投降》外，还有田汉、闻一多等先生讲演[②]，结果都没有举行。"(《新华日报》，1945.5.30)

这个欢迎会二十七日重新在昆华中学礼堂召开了，七百多座位的会场挤进了一千三四百人。会上楼兆揭代表五周刊致词，江鞏代表新中国剧社致答词。节目有孙慎指挥的合唱，新型舞剧《希特勒之舞》，李实中朗诵吕剑的诗《今日抒情》，活报剧《无条件投降》和《金碧交辉》，新型舞蹈《渔光曲》、《放春牛》、《五里亭》等。最后放映了美国新闻处提供的电影《希特勒的一生》。(据胡钊《醒一醒罢，大后方！——欢迎新中国剧社晚会特写》，《民主周刊》第1卷第24期，1945.6.9)

五月二十六日　晚七时半，先生应文协昆明分会及银行业同人福利会主办的文艺讲习班之邀，担任第十一讲主讲，题为"怎样接受文学遗产"。(据《省市鳞爪》，昆明《扫荡报》，1945.5.26)

五月二十八日　赴西南联大附中，参加初中二年级学生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段成鹏在日记(未刊)中写道："下午三点三刻，二甲二乙联合班会在大礼堂举行诗歌朗诵会。这是一个空前的盛举，差不多全校的老师同学都参加，还有联大的同学。开会首由黎剑光先生致开会词，继由李广田先生讲'谈朗诵诗'。讲完后朗

① 还有评论报社。

② 节目单上称为"小品讲话"。

诵开始，由郭良夫、李实中、光未然、闻一多诸先生朗诵。光未然先生先后朗诵他的《午夜雷声》和《阿细的先鸡》（云南夷族长诗）中的第一、二章。闻一多先生朗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光未然先生朗诵时很活泼，表情很好；闻先生朗诵时态度严肃，声调沉着有力，很感动人。其他如郭先生、李先生以及二甲二乙两位同学的朗诵，也都不错。”

杨振铎在《我所见到的闻一多先生》中，也记述了这次朗诵会，并说：“那天会后，我们很多学生都拿出自己心爱的纪念册请几位诗人题词。闻先生给我们题的是孔子的一句话：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若今也。”（《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61至362页）杨文中又说：“又有一次，我们这个年级举办作文比赛，语文老师请闻先生写一幅字作为奖品。闻先生用篆书写了‘如日之升’四个字，上款是‘书赠联大附中的小朋友’，落款处印着一方鲜艳夺目的‘闻一多’三字的图章。闻先生对于培植青少年的事真是有求必应，郑重其事地精心制作了这样一幅意义深远的艺术珍品。”（同前，第362页）

是月 在联大演讲“妇女解放问题”。经张源潜记录，以原题发表于昆明《大路》周报第五期。收《闻一多全集》。

该文分五个小标题：一、认清楚对象。二、奴隶制度产生的因素有二：一是种族，二是两性。三、女、奴性和妓性。四、真女性应该从母性出发而不从妻性出发。五、我们不反对女子中看又中用，但最要紧的还是中用。文章论述说：“争取妇女解放的对象该是整个社会而不是男性。一切问题都是这不合理的社会所产生，都该去找社会去算帐。”文中还特别强调了延安的妇女：“《延安一月记》的作者告诉我们延安的妇女已不像女性，也就是说延安的妇女是真正解放了，已不再是奴隶了。现在既有具体的，试验成功的榜样供大家学习，为什么还躲在这社会里呻吟而逃避呢？毕竟妇女解放问题被提出了，热烈地展开讨论了，表示妇女解放的条件已成熟，离真正解放的日子也不远了，一旦妇女真正解放，文化也就变成新的，文学艺术各部门都要以新姿态出现了！”

《闻一多全集》该文末，有《大路》周报编者注，云：“本篇是闻先生准备对联大女同学会演讲的原稿，后因演讲会未能举行，便改在五五文艺晚会上和《屈原》[①]一并讲出，今仍原稿。”

现存手稿中有一份《妇女解放问题》演讲提纲：

社会结构

① 此处可能有误，五月五日先生讲的是“艾青与田间”。

安顿好，不愿动，不好的要动，以旁人为对象
房子老修理不好
革命不是破坏
拆开再翻造，拆时要经济，翻开要计划

结构错误在那里？
奴隶
　种族因素
　两性因素
　奴隶制是外婚制的发展——阶级社会
　妇女与主人太切近（婚姻、家庭纽带）
　经济关系，受豢养
　故最难解放，受奴役最久最深
　女性即奴性（中）女性男子
　妓性（西）关系不固定，故较自由
　奴隶文化维持女性的方法——女性文化
　伦理——利用——臣道即妻道
　文学艺术——赏玩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新女性，真女性
　旧女性与生理
　母（先天）妻（后天）——因母故妻，传种
　　旧社会，从奴发展
　母德——慈爱、坚忍、牺牲、勇敢、刚强
　母性——母老虎＝即男性

非奴隶的新社会，无阶级
苏联、美国
改造社会关系，即妇女解放，人民、光辉，Jeanne D'Arc
三千年，螺旋式的演进
认识、想像、聪力、勇气
条件已具故□问题

是月 举行学期考试,先生在打分数时,宽容了两个忙于进步活动的同学。康倪同学回忆说:"一九四五年暑期考试后,同学们到教务处布告栏去看成绩单。当时发现某一门课有两个人不及格,那成绩单的前项考试成绩是八十分和七十分,但在实得成绩栏中却是四十分与五十分了,他们都被扣了分。'扣分数,为什么呢?'我们又很仔细地看看这两人的学号,原来他俩正是我们系里从事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经常不到课堂听讲的人。这时候我们转看另一张成绩单,这两个人的分数也是七十分和八十分,但并没有扣除字样,原来这门课是闻先生的课。我们知道这两人为了工作有时整旬整月离开昆明,闻先生的课他们也上不成呀,为什么闻先生不扣他们的分数呢?"从这里,康倪"认识了两位立场不同的先生,对民主运动所表现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忆闻一多先生》,《人民日报》,1956.7.15)

六月四日 应邀到西南联大附中做"道家的人生观"演讲。段成鹏日记(未刊)中记载到:"下午第三节'人生社'在大礼堂举行第六次公开演讲,这次是请闻一多先生讲'道家的人生观'。大意是说:中国历来的哲学思想,可分为四大派,即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儒家、道家是两个破落户,出身于僧侣,以种种宗教的仪式增加帝王的威严,起初很得宠,后来渐渐被遗弃了。墨家与法家是两个暴发户,出身于工商,帝王知道了他们的长处以后,就立刻重用他们。儒家是忠厚老实的人,被遗弃之后仍忠于帝王,他一面劝帝王怜悯人民,一面又劝人民服从帝王。道家比较强硬些,被遗弃之后就退隐山林,采取不合作主义(即所谓清静无为)。墨家初得宠,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所以处处为人民着想。法家可是坏极了,得宠之后,就帮助帝王作恶,剥削人民。讲到这里,闻先生总结一句说:儒家着重一个'爱'字,从前的教育也偏向'爱'这方面。但这所谓'爱',乃是片面的,'忠孝仁爱'那一套,都是对帝王说的。今后的新教育应是'爱'与'憎'并重的。我们不要做傻子,我们得认清黑暗。"

六月八日 "中外文艺联络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先生与郭沫若、茅盾、老舍、叶圣陶、曹禺、夏衍、曹靖华、冯乃超、李青崖、焦菊隐、李星可、徐迟、袁水拍、叶以群、洪深、戈宝权共十七人任编辑委员。(《中外文艺联络社缘起与简则》,《华声》半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

该社是叶以群创建的,邀茅盾担任社长,具体工作由叶以群、冯乃超负责。它类似文艺通讯社,本身不出版刊物,只是向各报刊发播文艺稿件。先生受邀任编辑,负责介绍云南刊物的稿子。

六月十日 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讨论会。会上周新民讲"两党的政纲政策"。

同日　中午，与张光年、吴晗、白麦浪、杨须知、金若年等在冠生园宴请郭沫若。

时，郭沫若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建院两百周年庆祝活动，昨日晚由重庆飞抵昆明，宿机场。是日上午进城，来到中苏友协昆明分会，恰逢金若年，金即骑车通知先生等相见。对这一意外的相逢，先生十分兴奋。席间，陪同郭沫若的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邵鲁诺夫问先生想从苏联捎点什么，先生说想要一部玛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当时，先生已经有了本彩色精印的英文版玛雅可夫斯基诗集，是罗伯特·白英送给他的，（参见薛诚之《闻一多烈士永生》，《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25页）但先生还想得到一本原版诗集。

时，中共七大与国民党六大相继召开，前者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后者则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由国民党独家筹划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坚持国民党统治。（据《西南文化研究会讨论记录》，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同日　下午两时，昆明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的“文化沙龙”，在威远街三十九号正式开幕。先生和徐梦麟、周新民、曾昭抡、吴晗等均出席。

同日　下午六时，与田汉、安娥、吴晗、金树培、凌鹤、尚钺、常任侠、宋云彬等聚会在王晋笙寓所聚餐。饭后，应田汉之邀，观看四维剧团演出的《江汉渔歌》。（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第101页）

六月十四日　诗人节。《人民的诗人——屈原》发表于昆明《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收《闻一多全集》。文章从屈原是“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身份、《离骚》的“人民的艺术形式”、《离骚》内容“无情的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屈原的“行义”四个方面，论述了屈原是人民的诗人。文中说：“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

这篇文章，原是先生在昆华中学一次青年讲座上的讲演稿（参加讲座的还有田汉、楚图南、尚钺、周新民、张光年、赵沨等），本准备应约交《观察报》，但得知《诗与散文》筹备出屈原纪念特刊，便经汪国桢之手交给该刊，并叮嘱不要稿酬。（据汪国桢《回忆闻一多先生》，《重庆晚报》，1980.8.1；杨绍廷《忆闻一多先生二三事》，《春城晚报》，1986.7.26）

这件事给杨绍廷印象很深，他在《永久的怀念》中写到：“当我说明出特刊的打算后，闻先生爽快地答应如期给我稿件。闻先生写的《人民诗人——屈原》一文，很快便由他的学生送来了，保证了特刊按时出版。后来得知那时闻先生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为我们写稿，就把为《观察报》写的《人民诗人——屈原》由报社抽回给我

们。当时《观察报》的稿酬是丰厚的，而我们却没有稿酬，这是多么热情的支持！闻先生的文章刊在特刊第一篇.在"诗人节"那天，我们邀请了几位写稿的先生，举行了纪念座谈会，闻先生在讲话中曾以自我批评的语气，谈到为我们题写刊头被换下来的事，他说：'当时知道我题的刊头被换很生气，下决心不再为你们刊物写稿，也不看你们的刊物。后来想到几个青年办的小刊物都不要我写的刊头，到底为什么。你们不用我写的刊头，也可以说是对我后来的促进。现在看，你们做得对，今后一定多为你们刊物写稿，多关心你们。'闻先生的讲话，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闻先生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之后闻先生就为刊物组织一些知名作家的稿件，提高了刊物的质量。为了把刊物办得更有生气，闻先生还引导我们参加在威远衡'文艺沙龙'筹建的'昆明出版界联谊会'，使我们广交了朋友，开阔了眼界，加强了与昆明各民主期刊的联系。之后我们在闻先生的指导下，昆明十二家民主期刊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采取了联合行动。"(《群言》1996年第7期)

同日 晚八时，文协昆明分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新中国剧社等十六团体，在云大至公堂联合举办诗人节纪念晚会。出席者千余人。先生到会并演说。

会上，主席徐梦麟首先报告开会意义。接着姜亮夫演讲后，先生作了发言，说："当认识了人民时才能认识屈原，因为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现在我们是认识了。"(《诗人节晚会志》，昆明《扫荡报》，1945.6.16) 田汉介绍屈原生平及作品，称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尚钺、楚图南也有发言。然后开始诗朗诵，有张光年诵《离骚新译》，云大文艺研究社诵《聪明人》、《主子和奴才》，韩北屏诵《一个序曲》(以湘桂大撤退为题材)，李实中诵何其芳的《黎明之前》和《都市》，何孝达诵《给屈原》。然后，新中国剧社演唱《茶馆小调》、《凭良心》。十一时许方散会。

六月十六日 下午，参加西南联大新诗社在五华中学举办之诗歌朗诵会。会上，光未然朗诵其妹张帆的诗作《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先生认为"此乃联大朗诵会中成功之作"。(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51页)

六月十八日 晚，西南联大同学在昆华北院南教室举行高尔基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不知是否此间，先生写了一个条幅，录的是高尔基的一句话："借着最有才能的作家的嘴，文学一致的证明：市侩要求完全的自由，而暴露了自己的'我'的时候，那就是在现代社会之前站起了一个畜生。"(据家藏此条幅照片)

张光年在这次晚会上还朗诵了新作《市侩颂》。这是他当天完成的一首政治讽刺诗，他说类似的诗常是在先生催促下创作的。他在《五月花·后记》中说："一九四五年，昆明民主运动高涨的时候，我写过些政治讽刺诗，在当时的群众集会上朗

诵。……往往在开会的前一天，闻先生写封短信来，或者亲自来到我住的小楼上，笑着督促我：'怎么样？明天的会很重要啊！来一段吧！'"（作家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六月二十三日　清华大学召开迁昆明后第二十四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议决续聘先生与朱自清、王力、浦江清、许维遹、陈梦家为教授。（据《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二十四日　出席西南文化研究会学习讨论会。由潘光旦主讲"英美民主与苏联民主的比较，与中国应有的民主"。参加者有华岗、曾昭抡、尚钺、闻家驷等。

时，在民盟内部，对民主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英美有政治民主无经济民主，苏联则有经济民主无政治民主，希望在中国实行既有政治民主又有经济民主的制度。这次会上，对此问题讨论尤为激烈。先生批评了潘的某些观点，说："潘先生是一个生物学家（科学家），他也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有敷衍的态度，他缺乏主观的改造的认识。"（《西南文化研究会讨论记录》，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约在这前后，先生读到了《整风文献》，并写下一段读书笔记：

> 政治是最尖锐的人生，人生观即政治观——反对政治与不管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动物即是政治动物。
>
> 当社会阶级斗争最尖锐时，就产生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各个人就拿自己的阶级意识支持其政治理论，推广而成为所谓的人生观，所以谈思想而不涉及政治，谈政治而不提到阶级的经济基础，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躲闪问题，而不是真正的在解决问题。（转引自王康《闻一多传》，第390页）

六月二十五日　昆明文艺界人士，在威远街三十九号文化沙龙举行茶会，庆贺茅盾创作二十五周年及五十岁诞辰。茶会由李何林主持，先生和朱自清、闻家驷、田汉、李广田、宋云彬、刘思慕、李公朴、白澄、吕剑、韩北屏、吴晗、楚图南、邵荃麟、马子华、何家槐、魏荒弩、凌鹤、常任侠、范启新、杨东明、赵沨、张光年等出席。会上大家吃寿面，并纷纷题词。当地报纸称，会上"除谈述私人交往及报告茅盾为人和生活，更论评其文艺业绩与严肃博大精神，最后更吃寿面，题赠词，至十一时半始在谈笑声中散"。（《茅盾寿辰，昆文艺作家举行祝寿会》，昆明《扫荡报》，1945.6.26）先生的题词未入集，文为：

> 作为保卫人民、拥护真理的战士，茅盾先生，今天还有谁比你更笃实、更坚定、更持久的呢！（《茅盾五十寿辰作家题词贺信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第231页）

六月二十八日　赵丹、顾而已由渝抵昆。李公朴曾在家里为欢迎赵丹，举办了一次小型座谈会，特地让王健去请先生参加。会上赵丹诉说了在新疆被盛世才关

押中所受的酷刑和惨无人道的迫害，先生听了十分气愤，回家后吃饭时讲给家里人听，边讲边拍着桌子痛斥反动派："无耻！无耻！"

是月 西南联大社会系教授李树青出国，潘光旦设宴饯行，先生作陪。李树青《悼念业师潘光旦先生》："一九四五年六月出国的前夕，潘先生在西仓坡家内设宴饯行，作陪者有罗隆基、费孝通先生和住在近邻的闻一多，以及吴晗教授，……潘先生一再劝我参加民盟组织，到这时我才了解在座诸位都是民盟在昆明的负责人士。"（香港《明报》第19卷第4期，1984.4）

是年夏 在西南联大英籍教授罗伯特·白英家里谈到选诗问题和解放区诗人田间。

在座的张小怿在《诗人·学者·战士——忆闻一多先生》中有回忆："我来到联大英国教授白英(Robert Payne)先生家里，他是一位同情中国民主运动写作勤奋的作家。按照事先的约定，我见到一多先生。那位作家打算编选一部中国当代诗集和一部中国古代诗集，因为不谙汉语，便由一多先生帮助编选。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联大教授卞之琳先生和袁家骅先生。我也参加了翻译工作。……那次谈话的内容没有涉及时局，而只是交换了一些选诗的意见。由于主人在座，为了礼貌起见，我们没有畅所欲言地用汉语交谈。当我听说决定把田间、何其芳、艾青同志的诗选入集子，我很高兴。只是在向主人告辞之前，我才问他，我们编的《诗垦地》丛刊看过没有。他点点头，但不无惋惜地说，只看过一本。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你们喜欢 blank rerse(他在这里用了"自由诗"这个英语词)，我却喜欢用韵的诗。我说，先生不是喜欢田间的诗么？那不是也不用脚韵么？他笑了，说，它有节奏，听起来令人振奋。然后问：现在还继续出么？我告诉他，我们几个穷学生，没有钱，政治环境又不容许我们出期刊，只能出不定期的丛刊，为的是避开国民党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的麻烦，然而终究出不下去。他忽然大声说：'什么审查！开天窗！连房子都给你拆掉！'"（《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46至247页）

张小怿文中说的"中国古代诗集"，也是先生与白英的一个合作项目，计划选择一些古诗译成英文，但这项工作先生没有完成。后来，白英译成后在英美出版，书名为《白驹集》，取自《诗经·小雅》"皎皎白驹"一诗。（据许渊冲《闻一多与陈梦家》，《诗书人生》第36页）

是年上半年 《新诗的前途》发表于重庆《火之源文艺丛刊》第五、六集合刊。此即《闻一多全集》中所收《文学的历史动向》中的后一部分。

七月一日 先生等一百四十六人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

时，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将于七日在重庆召开，先生认为参政会本为咨询

顾问机关，其成员由政府圈定，不能代表民意，所以根本没有召开的必要，目前的关键，是“扩大人民民主运动”，“促成正式民意机关之建立”。该电文今存四稿：一稿为罗隆基起草，先生润色修订；二稿为先生钢板刻印，落款署“六月二十八日”；三稿为先生在油印件上再做修改，并附有签名名单；四稿为根据先生修改稿排印之铅印传单。兹录四稿底稿如下：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诸公公鉴：

际兹抗战八周年纪念日，诸公不避溽暑，甘触虎疫，跄跄济济，集会陪都，将以承旨“拾遗”，希意“补阙”，诸公之事劳则劳矣，然窃恐劳而无功，不徒无功，抑且将开罪于国家民族也。诸公既以所谓国民代表之名义参政，同人等请即以国民之立场，敬献数言，幸垂察焉。

窃以国民参政会之设立，原系出于人民之要求。抗战初起时，人民以为非团结无以贯彻抗战之目的，非民主无以争取抗战之胜利，故人民最初所期望之国民参政会，乃一团结党派之合作机关，实现民主之过渡步骤也。今参政会成立，已届七年，诸公试一为扪心自问，对于上项目的，果成功乎？抑失败乎？虽然，事实俱在，有目共睹，同人不敏，顾略陈梗概。

一、就团结党派而言：第一届参政会成立时，全数参政员二百余名额中，在野各党派每党仅由政府分配代表七名，而当权党竟占全体代表人数十分之八以上，是当权党与在野党派代表人数，在比例上，已大欠公允。然当时在野党派，犹得自行推定其代表，而其余由政府指定之无党派人士中，亦尚多社会上之名流硕彦，以是代表质量虽未达理想标准，而各方意见，仍能有所表现。此后历届之参政员人选，则改由政府圈定，经过此种私意圈定之挑选与淘汰，在野党派中仅存之有限代表，实际已不足提案之法定人数，无怪其在会议场中，除被利用为点缀装饰品外，绝对不能发挥交换政党意见，与增强政党团结之效用也。至最近数届会议中，参政会不但不能主持公道，调解党争，且每每以冒牌民意机关之名，供一党排斥异己之用，卒使重要在野党派之代表，深惧被迫同流合污，裹足不敢列席。于是国内党派之分裂冲突，乃不得不愈演愈烈，而所谓国民参政会者亦已名存实亡矣。

二、就实现民主而言：直至今日，国民参政会之组织，职权，工作，乃至其一切表现，殆无一不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方第二届参政会之进行改组也，一党包办之省参议会已普遍成立，于是政府乃修改参政会组织法，规定大部分参政员由参议会选举。此种革新，表面上一似民选代替官圈，实际则各省候选名单，事先已由政府指定，并电令各省参

议会照单填写，更由国民党地方党部严加监视。以上皆公开之秘密，凡曾为省参议员者，俱可充当人证。此关于国民参政会组织之实况也。

参政会之职权，限于咨询顾问，一切决议，概无法律效力，而最后且尚须经过最高国防委员会之核准。是所谓参政会也者，其作用之渺小，不惟不及清末之谘议局，且不及英国千年前之御前大会议。吾人每见参政会一次会议中，通过案件，动辄达一二百起，此其议事效率，仿佛超过英美国会一年之工作，实则各案之命运，不外四途：一曰送政府采择，二曰送政府斟酌，三曰送政府参考，四曰保留。一切决议，既皆系官样文章，则诸公身为参政员者，究竟所参者何政？究竟有何政可参？恐不过照例举手，甘心作应声虫而已。此关于国民参政会职权之实况也。

至参政会一切提案，事先必经过秘书处之审核，而主席团且有权禁止某种议案提出大会讨论，此尤古今中外民意机关未有之奇闻，而为中国当局蹂躏准民意机关之实例。要之，为官意加民意之糖衣，为党治充民治之伪装，此又关于国民参政会工作表现之实况也。

由上观之，今日中国之国民参政会，直视昔年英国之"牛尾巴巴里门"犹不如，乃不明真象之国际人士，竟有认其为中国"战时巴里门"者，宁非怪事乎？实则今日中国之国民参政会，不过独裁者用以蒙蔽世人观听，粉饰国家门面之一套手法。此种机构，不特已阻碍中国人民民主生活之发育，抑且将繁殖法西斯细菌于无穷。此种机构，中国人民固咸认其早当废止，而号称人民代表之诸公，顾忍坐视其继续存在乎？

最近，政府宣布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姑无论国民对此国民大会，赞成与否，总之，国家在短期内当实行宪政，乃必然之势，而在宪政国家，当依宪法产生真正民意机关，又为必然之事。明乎此，则今日由一党操纵、政府圈定之国民参政会，其无长期存在之余地，而有立即废止之必要，更无疑义。同人等固知我数百参政员中，不乏德高望重之民众领袖，亦知国家一旦举行真正民选，诸公未必不为人民所一致推崇。然则为诸公计，与其充政府圈定之工具，蒙羞忍诟于今日，何如为人民推戴之代表，扬眉吐气于将来？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明达者当知所抉择矣。尚望我参政员诸公顾名思义，毅然决然，对此妨碍民主之国民参政会，拒绝出席，并迅即回返民间，一面扩大人民民主运动，一面促成正式民意机关之建立，与夫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则庶几诸公因历年受人利用，而致遗误国家民主前途之宿愆，犹不失其最后自赎之机会也。亡羊补牢，转祸为福，惟诸公实利图之！（《闻一多卷写钢板油印后

又润色修改的〈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文〉底稿》，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签名者有：丁月秋、于振鹏、王瑶、王健、王世钦、王若明、王若移、王振华、王菊英、方庶民、白澄、白麦浪、田实、田曰灵、甘娥、光未然、朱新宇、伯韩、辛毅、何庄、何丕承、吕剑、杜平、杜宣、杜迈之、汪筏、宋云彬、李文宜、李仁荪、李克兢、李公朴、李何林、李俊昌、李义襄、李实中、李整理、李德家、吴晗、吴乾就、吴征镒、林路、林慧、林文铮、林石父、林乃祥、尚钺、季镇淮、孟心田、孟心坚、金若年、周小光、周振飞、周基堃、周钢鸣、周慧仙、祁仲安、思慕、姜震中、胡钊、胡绍南、洪遒、施沛、南方虹、范宁、侯达虔、孙晓桐、孙镜秋、唐其昌、胡毅、凌鹤、凌瑄如、高履平、夏康农、夏继诚、袁震、时怀铭、郭勇、冯素陶、常任侠、陆钦墀、许杰、许立明、许维遹、梁秀如、费孝通、张客、张莺、张小楼、张时俊、张曼筠、张进修、张学文、张澜庆、徐守廉、徐兰芳、陈健、陈鹏、陈天佑、陈定民、陈丹南、陈仓亚、陈新生、陈祥珍、曾昭抡、程力方、程流金、黄新波、黄慧敏、杨林、杨洛、杨澍、杨须知、杨炳超、杨锦山、杨维书、杨淑慧、杨鸿魁、叶雨、叶露茜、楚图南、章楠、彭淑端、闻一多、闻家驷、赵沨、赵仲邑、赵爱清、谈苏、刘北林、郑伯华、郑独步、潘大逵、潘光旦、钱毅超、龙文池、简竹坡、薛沉之、薛琴芳、谢航、谢加因、瞿白音、萧涤非、罗喜闻、罗隆基、龚德光、游国恩。

同日　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赴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商谈国事。但中国共产党因反对国民党包办将要召开的国民大会，拒绝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

此前，由于赴延安参政员中有民盟主要负责人，先生等民盟云南省支部开会讨论，认为民盟不应替国民党去做说客，曾写信给民盟中央表明此态度。（据民盟云南省支部给民盟中央负责人的信，中国革命博物馆藏）但黄炎培、章伯钧等认为民盟有责任促成团结，未采纳他们的意见。不过，黄等赴延安后只谈了团结问题，没有提出请中共参加参政会事。

七月四日　重庆《新华日报》在《文化短波》中报道："闻一多和楚图南等预备办一个文艺学术综合性的巨型刊物，题名听说已定为《原野》。"

同日　参加刘功高、鲁晓山结婚典礼。先生代表刘功高的家长，作主婚人，并恭恭正正在一块粉色绸布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上签名的还有黄钰生、查良钊、王力、潘大逵、芮沐、瞿同祖、李树青、彭兰等五十余人。

此前，先生曾向刘功高介绍过一个男同学。刘功高回忆："恩师、师母约我晚饭后漫步于松林中，恩师爽朗的笑声在林中荡漾。他赞美一个人，赞美一个年青英俊、才学渊博的朋友。在一个小时的散步中一直在赞美着他，我们一直静静地听着，未发一言。恩师认为我恬静善良，真诚纯洁，可谓君子淑女，天定良缘，而我自

认为不配，不敢高攀，有负恩师之栽培与关怀。但恩师用心良苦，永世不忘。”（刘功高给编者的信，1988.3.24）

七月七日 抗日战争八周年纪念日。白天，先生出席昆明文化界在文化沙龙举办的文艺检讨会。参加者有李公朴、田汉、潘光旦、安娥、夏康农、尚钺等三十余人。讨论题为“八年来各部门文化的检讨”和“如何展开今后文化运动”。大家就抗战以来的文艺工作进行了总结，一致认为：“政治不民主，一切文化都没有前途”，“当前的文化正在被绞杀，我们要把文化从严酷的灾难中救出来，我们要把绞杀文化的黑手击退，文化才有发展的前途。”

同日 晚上，先生出席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三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七七纪念晚会。参加者有曾昭抡、吴晗、潘光旦、罗隆基、伍启元等一千余人。与会者对抗战以来各方面情况做了系统的分析，潘光旦讲了“八年来的教育与文化”，伍启元讲了“八年来的经济”，潘大逵讲了“八年来的政治”，吴晗讲了“所谓国民参政会与国民大会”，曾昭抡讲了“八年来的军事与外交”，罗隆基讲了“联合政府”。先生也发了言，他“对蒋介石七七演说的批评和注释，获得了不少笑声”。（冯克《昆明一盛会》，昆明《民主周刊》第2卷第2期，1945.7.16）会上，大家还谈论到内战有没有扩大的可能、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赴延安会有什么结果等。至十二时方散会。

同日 罗隆基起草、先生润辞的《抗战八周年纪念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宣言》定稿。宣言再次表示反对内战、反对召开国民参政会，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的立场，并要求立即召开三大政团圆桌会议，讨论联合政府问题。此宣言原文未找到印刷品，下面是据手稿整理的宣言全文：

> 抗战已经八周年了，从一方面看来，是最优良的形势，从另一方面看来，是最险恶的形势。日寇的最后失败与无条件投降，已成定局，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经过八年来人民无量数生命财产的牺牲，最后必然得到胜利。这是今天我们可以欣慰的一点。旧金山会议已圆满结束，世界和平宪章已经由出席国家一致签字，世界和平机构有了规模，而世界民主亦有了初基。作为旧金山会议四召集国之一的中国，在将来的世界和平机构中，又将为五个固定常任会员之一。八年前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今天却以头等国家的姿态，在世界和平机构中，与其他先进国家共同担负维持世界和平、奠定世界民主的责任，这是今天我们应当欣慰的又一点。这些的确为今天优良的形势。
>
> 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在八年苦战期中，人民对国家尽了无量数的牺牲，有了无量数的贡献，然而今天中国在政治上还没有民主。国家没有宪政法治，人民也没有自由平等。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忧虑的一点。在八年苦战期中，因负

责当局在经济财政政策上的错误，致令人民牺牲了如许生命财产，结果只养肥了一个既得利益的经济集团。这无疑的将必继帝国侵略主义者的后尘，来压迫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经济生命，并且今天十分之八的人民已成赤贫。抗战胜利的来临眼看要赶不上国内经济崩溃的速度，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忧虑的又一点。人民对外从事民族解放战争的时候，国内当权负责的政党坚持一党专政，坚决拒绝还政于民，以至今天，全国在野的政党还没有合法地位。内部既不能统一团结，因此，打了八年仗，还不曾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相反的，外战的胜利还只是在望，内战的险象已经环生了，反攻还没有开始，新式的武器已经用来自相残杀了。这为我们今天应该忧虑的第三点。这些难道不是今天险恶的形势吗？

在这中国抗战八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街头，今天我们看得见胜利，又看得见崩溃，看得见复兴，又看得见衰落，看得见生长，又看得见毁灭，看得见光明，又看得见黑暗。国际形势如此优良，国内实况如此险恶。今天正为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方向的时候了！我们这些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今天愿大声疾呼，唤醒国人，舍弃险恶的道路，争取优良的道路。因此，在消极方面，我们敬向国人提出以下三项主张：

一、我们反对内战。今天中国人民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寇。人民只有在保卫国家的对外战争上，有当兵纳税的义务，绝对没有在进行内战上服从任何命令的责任。这是再明显也没有的事实。在今天，内战可以分散对外战争的力量，加重对内战争的牺牲，内战可以引起盟友的轻视并加重盟友对日战争的担负。内战，最低限度，可以耽误抗战的结束，延缓胜利的来临。内战，实际为替日寇解围，与盟邦作对，并且逼迫中华民族自杀。一句话，在这全国人民应全体动员、一致对外的时候，国内反而发生内战，这是中国民族的耻辱！因此，对于任何名目，任何形式，任何规模的内战我们都要绝对的予以反对。九一八以来，中国已经因十年之久的内战而搁延了外战，那已往历史上不可追悔的错误，今天，抗战第八周年的今天，湘赣皖闽豫等地又已发动了对内的武力冲突，这以内战继承外战的愚昧举动，若不即时制止，更将是今后历史上不可原谅的罪恶。国家民族的前途，一误岂容再误？对于当前任何名目，任何形式，任何规模的内战，我们坚决而且无条件的反对。

二、我们反对这次在七月七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七年的历史只证明了“参政”徒有其名而“国民参政”更无其实。我们知道，国民参政会是政府圈定指派的机关，绝对不能代表民意。我们知道，十分之八的参政员是

一党党员，参政会为一党包办的，而不为各党派集思广益。因此，国民参政会今天唯一的作用，只为政府伪装国内民主蒙蔽国际观听的工具，它为中国实现真正民主的障碍。我们今天坚决的，而且无条件的反对这种机构的存在。

三、我们反对行将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大会。诚然，国家应该速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行宪政。不过国家的基本大法，既须人民共同遵守，就必须由人民推定的代表共同起草，并须经人民推定的代表共同通过。法律必须为人民共同的意志，而后人民才有遵守这种法律的义务。大家都知道，现有的五五宪草不具备这些条件。至于谈到国民大会，更须名符其实，而真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国民大会，为十年前一党专政时期选举的国民大会，当年一党包办的选举既已剥夺了当年各在野政党参加选举的权利，今天若不改选，则又剥夺了今天几千万成年人民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我们认为这种国民大会实际是一党的代表大会，用这样的国民大会以实现还政于民，不过为当政党用以把持政权的手法，而真正的还政于民，必须从新起草宪法，从新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从新选举国民代表。因此，我们绝对的而且无条件的反对那行将召开的国民大会。

以上只是我们消极的主张。在积极方面，我们以为今天中国既要用和平的民主政治方案谋取团结与统一，政府就必须采用以下这几个步骤。

一、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三大政团代表的圆桌会议。

二、在这圆桌会议上，三大政团代表共同推定国内无党派的代表人士，请其前来共同参加。

三、由这种圆桌会议产生举国一致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联合政府。

四、由联合政府再推定人民代表，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从新起草宪法。

五、由联合政府从新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依据这种新的法律从新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代表。

六、由联合政府召集新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实行还政于民。

此上为一年来在野各党派共同的主张，也为一年来人民共同的要求。我们以为以往政党团结没有成效，有两大原因。第一，国共两党的一切谈判，只为两党间的谈判，不曾公诸国人，不曾让两党以外的政团及人民的代表来参加，以致两党之间没有一个绥和调济的力量，而对于谈判，也便缺乏了一个公

正的评判者。第二，政府几年来始终不认识，因此也就不承认这个已经形成而且正在发展的中国民主同盟，这个代表中国民主运动的新兴的庞大力量。反之它始终采用一种拉拢联络同盟中一两个原有政党单位的手段，以图拆散并打击这个新兴的力量。结果是不能得到中国第三个大政党的合作与协助，政府所欲推行的统一团结方案，也始终得不到效果。在我们看来，倘政府不改变这两个错误的观念，所谓统一与团结，便等于空谈，而徒然证明政府自己在这件事上缺乏诚意而已。

到了今天，到了抗战八周年纪念日的今天，国际及国内的形势已完全转变了。民主的潮流，已非一党之力，更非一人之力可以抵挡。为顺应潮流，以达到国内统一团结的自由起见，我们又以为在举行圆桌会议以前，政府应立即实现下面这几个条件：

一、立即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即立即取消登记检查制度；

二、立即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即立即承认各政党的合法地位；

三、立即保障人民的身体居住行动自由，即立即取消特务制度；

四、立即维持国内的和平秩序，即立即停止各地对内的武力冲突。

这些为民主的先决条件，这些并且是举行党派圆桌会议前的先决条件。团结只能在和平中取得，更只能在一切政党有了法律保障，有了行动及言论集会的自由保障的环境下取得。这些先决条件的实现，正为政府谋取国内统一与团结的诚意之试金石。

我们确实认定，对于中国，今天，国际形势绝对优良，国内形势绝对险恶。我们愿唤醒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冲破这国内的险恶形势，争取国际的优良形势，以便提前结束抗战，从速奠定国家的和平与民主的基础。上面的各项主张，就是我们中国民主同盟今后努力的方向，我们誓将有进无退，直至达到目的为止。谨以昭告国人。（《努生起草闻一多润辞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抗战八周年纪念日宣言草稿》，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同日　作《“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收《闻一多全集》。这是看过新中国剧社的演出后撰写的。

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新中国剧社旅昆首次公演之前，特地举行一次晚会招待昆明文化界人士，闻先生也应邀观看演出。晚会上，新中国剧社演出了他们自己编写的活报剧《金碧辉煌》和《无条件投降》和一些歌曲节目。《金碧辉煌》是讽刺当时那些利用滇缅公路搞走私活动发国难财的亦官亦商的人物；《无条件投降》则是批判英美政府对德国法西斯宽容妥协的错误政策，这些和他们演唱的《茶

馆小调》、《五块钱的钞票》等歌曲，都是紧密结合当时的生活现实的题材。闻先生看了这些节目十分兴奋，立即写了《"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吧》。"（《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321 至 322 页）

先生在本文中写到："新中国剧社，是我所知道的大后方第一个能把握人民现实生活的话剧团体。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但指示了中国戏剧工作的新道路，而更要紧的是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悟，因此也就真能名副其实的象征了'新中国'。""今天我们特别欢迎'新中国'来到昆明，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充满了伪善和臭美的顽固知识分子的城，因为，这是以一个什么学府自夸的城。'新中国'对昆明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抗议。不，得给他们当胸一拳，再找上两个耳光。"

文中还谈到艺术问题，表示对旧艺术并不一概否定，应该具体分析："旧剧本是人民的艺术，至今也还是最忠实于人民的一种艺术形式，惟其如此，所以它有着人民的种种优点，而不可讳言，也有着人民的弱点。这弱点，概括的讲，就是人民的落后性。（被愚弄压榨了几千年的人民，叫他怎么不落后呢！）"（郭良夫《闻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学林漫录》第 11 集，第 4 页）

七月八日 上午九时，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第八期学员举行结业典礼。五月进入该班受训的李海（原名李乐龄），回忆先生在该班教学时的情况说："紧张学习约一个多月，闻先生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只讲了一篇文章，原载于《Readeis Digest》，内容是关于南斯拉夫抗击法西斯的实况，文中很颂扬铁托，称为民族英雄，并抨击了一个卖国南奸。使人难忘的是闻先生居然在快讲完文章时说：'我们抗战八年了，谁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是朱总司令，朱德将军！他就是中国的铁托！'他还隐约地批判了重庆政府嘴上抗战，实际消极退让。他的大胆言论使人们感到很佩服，很新鲜，我很欣赏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的风度和见识，对闻先生有些崇拜。"李海还说："闻先生在课间常插些美国文化介绍，告诉我们对待外国人的应对进退方法。讲到美国的种族主义仍然存在，一些美国人从来瞧不起有色人种。'如果你们碰到看不起中国人的尴尬情况时，可以问他一个字，lynching 是什么？'（lynching 是私刑，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残酷杀害之意）。他还说到在美留学时受歧视遭遇的一些事。"

李海又说："使我毕生难忘的是 1945 年 6 月×日，闻先生在快下课时说：'给你们透露个消息，你们马上就要结业了，很快就会分配到各种岗位上协同美军工作，或到前线，或到训练中心，或到后勤部门，总之会接触很多新鲜的事，得到新的信息和情报，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有机会告诉我一些新事物。为了抛砖引玉起见，我今天给你们先带点情报供你们参阅……'说着，就从他平日上课提来的蓝布口袋里

拿出一叠小册子(七八本)发给大家。因为书少人多,我们坐在后排并未当时拿到而只看到书名,就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好像还有《新民主主义论》。这时班长叫'起立',就下课了。这几本册子我在重庆时已经从《新华日报》上看到过,所以也不太意外,不过班上确有各种反应,最突出的是大个子班长(姓孙?),他拿到一册看都不看就撕掉,也有同学抢着看朱总司令的报告,想知道最新战况。我和李家镐(解放后曾任上海市经委主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拿到一本《论联合政府》,又再读了一遍。当时我的政治觉悟有限,只是赞成民主、反对独裁,反对腐败卖国的蒋、宋、孔、陈,如此而已。不久离开训练班,就各自东西了。"(李海给编者的信,2000.4)

先生不仅读过中共文献,还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王康说这是一种英文袖珍本,是他从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找来给先生的。(《闻一多传》,第389页)

七月十二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为王瑶学习延长一年事。信中云:"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已肄业二年,所应修之学分均已修满,惟论文尚未完毕,拟请延长一年,其所兼之半时助教职务亦拟请予延续。又本系其他教师下学年度拟一律照旧。如何之处,敬希钧裁是幸,肃此祇颂道祺。"梅贻琦批:"照办。"(《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十七日　赴北门街七十一号,出席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年度第四次教授会议。主席为梅贻琦,先生担任书记。现存会议记录即先生所作。会上讨论"历届应征从军或充任译员之学生,凡由本校保送而服务期满者,得适用优待办法,准其按期毕业案"等三项议案。(据《教授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二十二日　参加彭兰、张世英结婚仪式,并与冯文潜作主婚人,证婚人为汤用彤。先生小篆书写"我心则悦"赠之,上款写"若兰世英结婚纪念"。他解释说:这不仅是因为彭兰是单名,不好写,更重要的是若兰者,似兰非兰也,真正的兰花太实,我想虚一点好,专取其幽香清远之意。(据张世英《若兰诗集·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彭兰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张世英是哲学系学生,两人都是武汉人,相识于云林街一茶馆,逐渐产生爱慕之情。当时,彭兰思想属"左",张世英属"中",彭兰与先生关系密切,把张世英的情况告诉先生,先生决定当面了解一下张世英的思想状况。张世英在回忆中写道:"一天,她说,闻先生约我到他家聊天,我知道这是一次'面试'。闻先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接着说:'听说你很有哲学头脑,我很愿意你能常来我家聊聊。现在的形势,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塔。''走出象牙之塔',这是联大同学中早已流传的进步呼声,闻先生似乎是这个呼声的领唱者。我

第一次从闻先生口亲自听到这个呼声，更感到其意义之沉重。临别时，他送了我一本《海上述林》，黑绒面，烫金字。走出他家门，我深深感到，我将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在彭兰的带动下，我经常到闻一多家，聆听他的教诲，不知不觉之间，我的交往圈子扩大到了一些进步人士的边缘，地下党和来自延安的声音，也时有所闻。”（《归途——我的哲学生涯》，第58、6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七月二十五日 西南联合大学与云南大学联合举行招生考试。这年报名者有两千四百多名，录取名额仅三百五十名。当时，长子立鹤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读高中二年级，他为了早些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决定跳班投考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连月来，立鹤夜以继日，补习完高中三年级的功课，但家里人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按当时规定，考不取大学也不许回中学读书，这就意味着失学。但立鹤有信心，参加了是日开始的初试，考题中的作文题为《我所希望的新中国》。

七月二十六日 苏英美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以中英美三国名义，发表促令日本立即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先生听到消息很兴奋。

七月二十七日 重庆《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成立，地址在青云街三十一号，主要发售《新华日报》、《群众》半月刊等。先生知道，即让何善周去买报纸，并为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毛泽东同志的《文艺问题》（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也是从营业分处买到的。（据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62至263页）

七月二十九日 上午十时，出席西南联大召开的欢迎参加青年远征军同学返校大会。

联大同学加入青年远征军后，多数派往印度受训，学习汽车驾驶，并编入青年这征等第二〇七师暂编汽车第一、二团，任务是接受美国援助中国的汽车。其间，他们目睹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很是气愤。《联大点滴》：“联大校方于七月二十九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的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新华日报》，1945.8.9）

先生在会上也讲了话。其内容黄福海同学做了记录，题作《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讲话》。收《闻一多全集》。先生是接着查良钊、冯友兰关于“治标”、“治本”问题的讲话说的。先生说：“治标，不是我们从军的目的，从军的目的就是治本。

假若不抱治本的目的去从军，则我们还配得上做一个知识分子么？”

同学们在军队中受到下层军官的虐待，很是愤愤，先生则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说：

> 我们去从军，受那些连长、排长，那些老粗的虐待，或是过分的恭维，也还是如刀割般苦痛的。我们可以骂他们：“正是你们丢了我们的脸，使我们受外国人的罪！”大家想想，为什么他们这样？想一想吧，这原是我们的责任！抗战以来，感到军队里知识分子太少，都希望赶快让知识青年去从军，借此机会改善军队。但是为什么到今日才晓得要找知识青年？根本我们的打仗就不想要知识青年来打的！本来，战争之发动就是用农民壮丁来干，农民去送死，我们去建国。这说来好听，根本当时的军队就没有组织，没有计划。送死，由他们去，以前卖命由他们去，现在就轮到他们管你们了！当初，苦事让人家干，现在因他们而丢脸，我们是不应该把他们当作敌人来仇恨他们或可怜他们，这是错的！这是整个社会制度表现出来的现象。当初他们入伍的时候，是没有知识就拉过来的，等到入伍后，也从未教一点知识给他们。相反的倒是让他们身体没闲，或者宁愿他们睡死，病死，却千万不要让他们的脑筋清醒，不让他们有知识。

先生还针对同学们中间存在的某些思想，提出知识若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就决无用处：

> 还有一点，以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别人一概不成。这种想法是错的。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想到人民一觉醒，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一班人活不好，吃不好，联大再好，也没有用的。我们是知识分子，应有我们的天职。我们享受好，义务也多，我们要努力。但以为自己努力就成了，就根本错！……因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所以越压迫，越吃苦，报复起来就越厉害！因此我希望诸位无论干那种工作，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学生。这不该看成普通的谦虚，一种做人的手段，因为我们确实不如他们。不但口里说，而且心里也硬是要想：我们是不如他们的。我们的知识是一种脏物，是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得来的。

八月一日　下午三时，赴文林街清华办事处出席西南联大第七届第十一次校务会议。会议决议事项第一项为：“汇集从军同学意见及实际情形，由本校建议蒋委员长请求改善，推选冯友兰、潘光旦、刘崇鋐、张奚若、闻一多、黄钰生、陈雪屏七

教授起草，由冯友兰教授召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十一次会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册，第508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参与起草建议书的陈雪屏，原本与先生关系尚好。先生挂牌治印时，联名推荐的九教授，或是先生的老师，或是多年的朋友与同事，唯有陈雪屏是师范学院成立后才加入西南联大，这说明他们的一定关系。不过，陈雪屏是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部的负责人，与先生政治立场不同，所以有些感受也不一样。某次，先生参加教授会后，与陈雪屏一道离校，边走边谈。陈雪屏说：“学生公开骂我是特务，坏蛋，我真发愁会挨打呀！”先生则说：“讲民主的人是不会动武的，倒是你的那些信徒们在恐吓我，要干掉我呀！’陈雪屏有些尴尬，说：“那么，今天我们俩在一起，保险安全了。”先生对亲近的人说了这件事后，自己已笑得喘不过气来。（王康《闻一多传》，第322页）

同日 《云南日报》在《昆中楚中校长对调》消息中报道昆华中学校长徐天祥与楚雄中学校长李伯远对调。旋，李伯远上任，先生即辞昆华中学之兼职。其原因，吴晗在《哭一多》中说：“昆中换校长，新校长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说，只说要加钟点。一多明白了，不说什么。”（《新华日报》，1946.7.28）

先生在昆华中学的言行，早为当局所不容。李埏在《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中说：学校每星期早晨有一小时“周会”，一次请先生讲时事，大声疾呼学生们要关心时局，说：“同学们不要以小孩子而轻视自己，要以天下为己任，负起国家兴亡之责！”发言中，还斥责台下的军事教官甘当鹰犬。散会后，当局派到学校负责军训的全体教官找校长以集体辞职相要求，徐天祥没有答应，但当局对昆中愈加注意了。寒假时，教育厅便要徐解聘先生，但徐未照办。（《云南日报》，1988.11.30）此时徐天祥离校，先生也不愿再兼课了。

八月二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大学一九四五年度第一次教授会议，选举本年度教授会议书记。先生与伍启元、雷海宗、戴世光四人被提名，戴当选。又选举文学院院长，先生与冯友兰、雷海宗三人被提名，冯当选。（据《教授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八月三日 昆明《观察报》预告：“联大新诗社今晚举办‘诗歌朗诵晚会’，特请闻一多指导。”

八月七日 昆明区联合招生考试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新生初试揭晓名单，准许国文、英文、算学三门总分满一百五十五分者一百三十二人，及满一百四十五分者二十四人，可参加西南联合大学复试。闻立鹤初试中考取第六十六名，十六日，立鹤持初试通过报名单验证，缴国币三百元换复试证。二十日，参加复试。九月七

日，西南联合大学第四十次教务会议正式通过录取昆明区新生一百六十四名，立鹤为第六十三名，考入外国语文学系。（据《教务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先生和全家人一直为立鹤捏着一把汗，这时才欢喜起来。先生把一支美国朋友送的派克钢笔赠给立鹤，以示奖励。

八月十日　日本外务省向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发出乞降照会。昆明人民连夜欢庆。先生这时正利用暑假在司家营的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从事研究，第二天才知道消息。

八月十一日　闻立鹤和王瑶不约而同赶到司家营，向先生报告日本乞降消息。先生立刻到龙泉镇把蓄了八年的长髯剃掉。

昭深（王瑶）《忆闻一多师》："那时间，先生正住在昆明近郊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里，昆明城中群情沸腾，各报竞出号外，到夜里自然地形成了群众游行，爆竹之声不绝，但司家营却要到次日下午三点钟，才能看到报纸。次晨我带了报纸下乡，到时才十二点钟，他听说便喜欢得跳起来，那种热情的样子，实在像一个热情的青年，便马上到镇上小理发馆，把八年来留着的长髯剃除了。过了几天北平研究院院长徐旭生先生等到所里，大家同庆胜利，说起建国的前途来，有人深忧有内战发生，闻先生很肯定地说：'不会的，绝不会的，大家都知道打不得了，还说打呢！'对国事前途寄与了最诚挚恳切的希望与信心。"（《文汇报》，1946.8.25）

先生有一张剃去胡子的照片，就是经济系张友仁同学与历史系裘昌淞同学这时拍下的。张友仁在《"清华北大"共拍闻一多——用美空军胶卷拍下抗战后闻先生首张剃须照》中说："闻一多先生这张剃掉长须后英姿勃勃的照片非常有名，在社会上被广为采用。这张照片是谁拍的？是怎样拍成的？其实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那时，我在经济系学习，裘昌淞同学在历史系学习。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宿舍是土墙茅草顶的，内有八张双人床，共住十六位同学。我和江文焕（江涵）烈士都在下铺，两床紧挨着，裘昌淞住在上铺，在江文焕的上面。我那时常去旁听闻一多先生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我原来想象中的超凡脱俗的诗人，而是雄狮般的斗士。我和裘昌淞几乎一次不落地去听闻一多先生狮吼般的讲演。我曾将他的几次重要的政治性的讲演词记录下来，交给吴晗先生收入《闻一多全集》之中。我参加的一个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聘请闻一多先生担任导师，指导我们的理论学习。""那时，联大的许多同学都靠贷金和打工为生。我虽有政府发放的贷金，但仅够吃饭，有时连吃饭钱都不够。我曾在校内的学生中心和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打工。裘昌淞同学则在校外兼过多种工作。"裘昌淞利用打工的积蓄"买到一架旧的

柯达 120 照相机。我虽然擅长摄影，却买不起照相机，经常借他的使用，那时昆明市场上的正品胶卷很贵，幸好有一种用美国空军航空摄影大幅胶卷裁剪而成的 120 简装胶卷，价格很便宜，只有正装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质量很好，颗粒细致，感光速度很快，我们都买这种胶卷使用。”“一九四五年秋，日军已经投降，一天下午，我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东南角的小门内，看见敬爱的闻一多先生从东南门外进来，我们十分高兴。他的胡子已经剃掉，身穿棕色长袍，颈围浅色围巾，围巾的一头垂在胸前，显得十分精神。抗战初期的一九三八年二月，闻一多先生参加湘黔滇步行团，从长沙和二百多名师生一起历时六十八天于四月二十八日到达昆明，沿途没有剃胡子，到达昆明时已经是一副美髯了。从此，他就将胡子留起来，说一定要等战胜日本鬼子以后才剃掉。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闻先生得知此消息后，立刻到住处司家营附近的龙泉镇将蓄了七年的长胡子剃掉了。我们笑着和闻一多先生说：闻先生我们给你照张相吧！闻先生也很高兴地说：好吧！我们就以东南门内他身后的土墙草顶的厕所为背景，给闻先生拍下了这张没有胡子的历史性的照片。裘昌淞同学手持相机进行取景，我建议采用何种光圈、快门速度和距离。由于是高速底片，又是在有阳光的下午，我现在还记得采用的是 1/100 秒的速度、f11 的光圈、1.5 m 的距离。在原照片的左角，还看得见厕所茅草屋顶的一角，不过在现在流行的这张照片上已经被修除掉了。”“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先生壮烈牺牲后，我多方追寻，才在上海将这张底片找到，送给有关人员了。”（《北京晚报》，2011.4.28）

八月十四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同日，先生等二〇七人联名发表《告国际友人书》。指出现实的问题是要民主、要团结、要彻底的胜利，呼吁国际友人共同支持中国人民建立新的中国。《告国际友人书》全文：

全世界民主阵线上的朋友们！

我们，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们，渴爱自由的中国智识分子们，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工作者们——教师们、大学教授们、科学家们、著作家们、诗人们、文艺作家们、戏剧家们、演员们、音乐家们、画家们、新闻记者们、编辑们、出版家们，以及在各种文化岗位上的工作者们，精神劳动者们……。我们，在为了中国的民主运动而艰苦奋斗的时候，无时不渴望着和你们——国际友人们，紧密地携起手来！

中国人民在这次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流血和受苦，已经八年多了。现在日本虽已投降，但是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的艰巨任务，却正待我们努

力奋斗去完成。在这期间，你们曾以战友的资格，不断地对我们寄与深切的同情。“援助中国”的呼声，曾经响彻了全世界。八年来，每一次从你们的政府或人民那里来的道义的支持或物质的援助，使我们在苦闷之余，感到无限友情的温暖。正是为了这个，我们愿代表我国广大的受难人民，向你们表示最高的谢意和敬意。

今天，中国人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近百年来的深长的苦难，加上十年内战的悲惨经历，再加上八年来日本法西斯强盗的血腥的宰割，和我们自己的顽固的统治者们，最近几年中在前线和大后方所不断造成的严重的错误，这些都像重重的枷锁，套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抗日和争民主的伟大解放事业，表现为你们不能想像地复杂和艰苦！所以，亲爱的友人们！目前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就需要你们比从前更多地给予真切的同情和支持。而更重要地，是需要你们更进一步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的苦痛和要求，从而使你们的同情和援助，不致于浪费和落空。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也是最现实的要求。

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团结呢还是内战？民主呢还是独裁？彻底的胜利还是廉价的和平？朋友们，让我们向你们保证，中国人民坚决地选择了第一条路——团结胜利的道路，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路。但是八年的岁月，无情的事实，在证明了今天我们执政的独裁者和顽固派，他们一切的政令和措施，都是和这条光明之路背道而驰的。这些顽固的自私的统治者，是贪污腐化的大集团。他们在前方丧师辱国，在后方欺压人民，每一个公正的外国记者和旅客们都可以证明，中国人民和自由主义的智识分子们从来得不到任何人权的保障，得不到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剧、画展、旅行、通信的民主自由，教授和作家们时常被捕和失踪，监狱和集中营里，囚禁着无数的智识青年和爱国的政治犯。当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变成战时的暴发户时，广大的中国人民、士兵和智识分子们，却在半饥饿状态和传染病的威胁中受难。而最近，这些反民主的统治者，在国际民主的大洪流中，为了欺骗人民和欺骗盟友，却也像西班牙和阿根廷的独裁者一样，装模做样地，披上了民主的外衣，而其实却正在将那从盟国租借法案中所得到的物资和现代武器，用来摧毁人民的抗日活动，并作为屠杀人民与断送国脉的内战的资本。

但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在历史的千锤百炼中，空前地发展和壮大起来了。人民深信其自身力量的继续发展与壮大，必能亲手解除其自身的苦痛，深信在驱逐日本侵略者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斗争中，必能得到最终的与

完全的胜利。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和进步的智识分子们，对于现存的各党各派及其组织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成见。人民和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至今也都还是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们对于目前党派问题的看法，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凡是民主的党派，其主张与表现有利于人民的，我们便同情他，支持他；凡是反民主的党派，其主张与行为违反人民利益的，我们便厌弃他，反对他。而且我们坚信：任何一个单独的党派，现在或今后都不能包办中国的政治。只有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民力量，共同组织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领导人民走向抗日的胜利和战后的建设。中国各阶层的人民和智识分子们，誓愿为此光辉的目的而奋斗到底。在这里我们诚恳地希望全世界民主阵线上的朋友们，积极地同情和支持我们，最低限度，也不要在中国问题上造成错误，因而迫使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冤枉地付出更多更惨的代价。

亲爱的美国朋友们！你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十分关怀我国的，你们的一部分的战士，还在我国的天空和地面上，和我们并肩作战，这种崇高的友情，是中国人民所永矢不忘的。正因为两国关系的深切，和互相影响的重大，盼望你们能够真切了解中国人民的苦难，如像你们公正的新闻记者们所做的那样，经常地提醒你们的政府（你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不同，是民主的政府，容许人民说话的），使其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公正和现实的观点。一定要使你们的宝贵的援助，成为促进中国民主与胜利的条件，而不要成为妨害中国团结和进步的条件。一切的援助于我们是需要和宝贵的。但是，不使一切的援助如经济与黄金的援助，成为中国官僚与资本家剥削中国人民大众的资本，不使一切军火的援助，成为军事独裁者屠杀人民的工具，却是更需要更宝贵的。我们是坚决反对内战的，而事实上中国内战的炮声已经响了。六月六日，陈诚部长曾公开声称将以盟国租借武器进行内战。到七月间，内战的炮声，果然在陕西淳化、绥南、绥西、苏浙皖解放区等处同时响起来了！在上述地区，国民党军胡宗南、顾祝同等，共计调动军队二十万人以上，所使用的都是美国武器，而且还有美国顾问参加，帮助国民党军策划指挥。表面上，好像只是国共两党军队的冲突，但实际上，这是中国法西斯主义者对民主主义者的战争，也是中国专制主义者反对全国人民的战争。这种屠杀人民的内战，如果不被制止，其结果必然破坏国际和平，延缓人民的世纪的奠定。我们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解放，一定要团结起来反对内战，用全力来制止内战。但是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任务，同时也是美国人民的任务，因为你们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军驻华总司令

魏特迈，他们的政策与行为实际上也是助长国民党军进行内战。他们的政策与行为，绝对违反美国人民的公意。因此你们也就有责任起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并且督促你们的政府，使它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要知道中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而不是属于少数独裁者的，你们的外交政策违反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必然要损害或失去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诚恳希望你们的同情和援助，不要再滑失方向，因之助长了我们内部的纷乱，从而也毁灭了你们这个远东市场。战后的中国，在顺利的建设和繁荣的条件下，无疑地是你们大量工业品的重要市场之一。但是战后中国的顺利的建设和繁荣的前提，是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你们如果把任何希望，寄托于今天这一群贪污腐败而反动的执政者身上，那必将使你们失望。亲爱的美国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了一时的疏忽，而造成永久的遗憾啊！

亲爱的英国朋友们！你们悠久的民主传统，是我们一向所衷心钦慕的。经过这次反纳粹战争的锻炼，我们相信，你们将来定能建立起一个更民主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在此我们谨代表着中国人民，祝贺你们的胜利与成功，并愿更进一步地向你们表示一点意见：我们中英两国邦交的历史，是特别悠久的，过去两国旧时代政治家的作风，我们知道而且相信你们英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正如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我们也不能同意他们一样。因此希望你们今后还要更多的体察中国人民的痛苦与愿望，而经常地提醒你们的政府和被派到远东的官员们，千万不要有意无意地助长了中国法西斯的恶势力，因而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打击了正在生长和壮大中的中国人民的民主力量。亲爱的朋友们！凭着你们不列颠人的□智与远见，我们深信，你们是不会拒绝我们这点恳求的。

亲爱的苏联朋友们！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你们一直就是世界人类解放的曙光与被压迫民族谋取独立自由的灯塔。你们是第一个自动废除对华特权并和我们订立平等条约的国家，二十多年来我们不但在求解放的斗争中得到你们最珍贵的援助，而且从你们最进步的文化中，吸取了于我们最有益的东西。这次你们在反纳粹的战斗中，是牺牲最大而又贡献最多的。我们中国人民和智识分子们，对于你们——英勇而坚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们，尤其怀着最高的敬佩和友爱。我们对于国际的顽固分子和中国的反动分子所不断制造的反苏的阴谋和谰言，一向是深恶而痛绝的。我们坚信，中苏两国人民的互爱互助，是安定远东和平的重要保证。现在你们已经对日宣战，并实际开始了对日作战，正因你们的坚强作战，加速了日本投降，这实在大

有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苏联的朋友们！你们过去曾经给过我们许多鼓励和援助，希望今后更友爱地支持我们的斗争吧！

亲爱的法国朋友们！当你们国家的命运一度地被断送在贝当赖伐尔之流的手中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和智识分子们，曾经表示了最大的关怀和悲愤。因为在同一期间，我们中国的贝当们和赖伐尔们，正打算通过同样的阴谋，把中国人民带向无底的深渊。今天，通过你们的英勇斗争，一个新兴的进步的法兰西，终于在劫火中诞生了。而我们这里种种甘心步贝当和赖伐尔之后尘的反动派，还在继续玩弄着和出卖着中国民族利益，这就是我们对于新兴的法兰西的人民所以怀着这样多的艳羡和敬佩的原因。亲爱的法国朋友们，你们的国家在复兴中，你们正在向四方寻求你们的朋友，当你们的眼光射到中国的时候，你们应该知所选择啊！只有中国人民才是你们最可靠的战友。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们啊，让我们共同携手吧！我们的苦痛，不减于你们所受的苦痛，我们的困难，不减于你们所面临的困难，让我们用彼此的同情和互助，把我们大家带向自由解放的大道吧！我们坚决地主张，大西洋宪章，应该适用于一切殖民地国家，而且相信，如果没有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的与无保留的解放，则人类和平，仍然得不到最后的保证。而且认定，过去列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惯用的错误政策，如像挑拨与分化的政策，政治上经济上与文化上的奴役政策，扶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反动势力的政策，今天如果有谁还要拿出来应用，谁就一定会自食其恶果的。亲爱的苦难中的朋友们，让我们互相勉励互相警惕吧！

全世界民主阵线上的朋友们！我们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们，渴爱自由的中国智识分子们，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工作者们，我们希望今天这个意义重大的文件，能越过重重封锁着我们的特务组织的检查网，很快地达到你们的眼前。至于我们，凡是在这文件上签了名的人，随时都准备迎接法西斯分子的迫害，因为我们是甘心把我们的一切贡献给人民的。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曾经在欧美受过民主教育，我们从先进国家的人民那里，学习了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榜样。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人民一同斗争下去，直到取得了最后的与完全的胜利，直到一个民主的美好的新中国出现的时候！

签名者：丁聪、丁文波、丁月秋、力丁、于振东、王瑶、王健、王天栋、王志诚、王若明、王若移、王兆祺、王念慈、王为一、王菊英、王振华、王朝声、王树根、方庶民、毛清秋、白澄、白麦浪、甘娥、石炎、田鲁、田曰灵、田朝凡、丘学炎、江溯、江爱钟、西铁

卿、光未然、艾秋飚、朱景良、朱新愉、吕剑、辛毅、辛毓庄、祁仲安、何平、何善周、邢庆兰、杜迈之、江鲎、宋云彬、李埏、李小明、李文宜、李公朴、李何林、李克兢、李俊昌、李德家、李鲸石、李赋宁、吴茵、吴韧、吴晗、吴穆、吴壬林、吴敏中、吴富恒、吴乾就、吴征镒、宗扬、宗玮、季镇淮、尚钺、芮霖、孟南、孟超、孟健、孟心坚、岳庄、金震、金若年、林路、林珊、林慧、林士诒、林乃祥、林石父、周化、周小光、周天行、周依维、周新民、周慧仙、周钢鸣、马雍、马国亮、洪遒、姜震中、施沛、俞铭传、姚翔、胡钊、胡毅、胡宗澧、徐平、徐欣、徐兰芳、徐梦麟、凌红岭、高博、袁度、袁绛、袁震、孙慎、孙铮、孙金鉴、孙晓桐、郭勇、郭文芹、冯法祀、冯素陶、许杰、许立明、许秉铎、许维遹、梁秀如、章楠、章泯、章国昌、陆钦墀、曹伯韩、常任侠、陈吾、陈鹄、陈鹏、陈志鹏、陈光国、陈天祜、陈丹南、陈祥珍、陈清林、张客、张莺、张小楼、张工心、张文元、张进修、张时俊、张敬凤、张崇扬、张曼筠、张学文、张庆芬、张澜庆、特伟、彭淑端、彭丽天、农慕之、曾昭抡、费克、费孝通、黄纪孟、黄相荣、黄敏慧、黄叶绿、楚图南、闻隆、闻一多、闻家驷、董祚楷、叶齐祥、叶笃庄、蔡超尘、杨洛、杨澍、杨人鸿、杨素辉、杨须知、杨淑慧、杨芬君、杨锦山、赵沨、赵词清、蒋锐、蒋明德、郑康、郑独步、潘大逵、潘光旦、谈苏、刘思慕、刘桂武、刘渔邨、钱铮、钱玲娟、卢静、钟秋岩、顾德荫、薛沉之、谢加因、蓝驶明、蓝馥心、颜锡嘏、萧凡、萧虚里、瞿白英、韩北屏、罗隆基、苏茵、严恭、严素经、顾文若。(铅印传单,云南师范大学党史征集委员会藏)

八月十五日　出席联大、云大、中法三大学学生自治会举办的"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

会上气氛很严肃,周新民首先讲《苏联参战后的远东局势》,接着刘思慕讲《日本投降后的远东局势趋向》、王赣愚讲《新局势的中国外交》。吴晗《怎样克服内战危机》的演讲中对比了蒋介石与朱德关于接受日伪投降问题两个截然不同的命令。罗隆基在《怎样走向民主团结的道路》中提出军队国家化、财富大众化、政治民主化三项主张。尚钺的讲题是《东北义勇军的活动》。

先生在会上也发了言,他针对王赣愚提出的在英美集团和苏联集团之间应站在"不分"的第三者立场上主持外交的主张,说:

> 到底我们是主张"分"呢还是"不分"呢?最高的原则当然是不分。但是,罗先生告诉过我们说,假如是统一与民主在打内战,我们赞成民主,这当然是有分了。刚才,刘先生提到某陆军上校和某军火商人订立契约,建立军火库,说是准备在五年或十年以后打另外的一个国家。显然地,又有分。
>
> 对于绥靖分子、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反动派,当然是要分,凡是人民都应该站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站在一起,中国人民是不分的。中国人民和美国人

民是不分的，即使和日本人民也是站在一起，也是不分的。人民和人民是不分的。但是，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是要分的！

我曾经警告大家，我们要密切注意着，美国反动派在制造我们的内战，如果不设法避免这种危机，不但有内战还会有外战！

谁在帮助我们内战，在帮助中国反动分子在打内战，我们就要反对谁！不管他们有什么原子弹，我们还是要反对！你美国人敢用原子弹杀中国人民，我们不怕！

现在还有不少美国人在这儿，我们就要向他们表示：

不要得罪中国人民！

得罪中国人民就是得罪世界人民！

得罪了世界人民，并不是好惹的！

刚才，尚先生说，东三省有一句骂人最凶的话："日本人是你爸爸！"我们现在要有一句骂人最凶的话："美国人是你爸爸！"（《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记录》第49至52页，油印本，1945.8.15，王健保存）

会上还举行了热烈的讨论，当问道："我们青年应该怎样准备反对内战？"先生回答：

现在我还没想出具体的办法。不过，我们如果能够表示我们的热情，表示我们的关切，有什么事要我们去做我们就做，那么我们就能阻止内战。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根绝内战！我们要联合政府，只有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它叫我们青年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做，不是联合政府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不做。

当问到"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否是真民主"时，先生回答：

我引用一位最近去过延安的参政员的话，他说："我从重庆到延安大吃一惊，从延安到重庆又大吃一惊；从重庆到延安，变动很大，延安与重庆的差别，就是黑与白的差别。"说这话的人是青年党的，青年党是向来不赞成中共的，而这次他说："延安是白，重庆是黑。"（同上，第55至57页）

会上，刘思慕、罗隆基等还回答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内战，是否会无限制的帮助合法政府？"、"如果真正打起内战来，双方力量的对比如何？"、"假如人家不要联合政府，我们怎么办？"等问题。罗隆基说："如果我们所要求的联合政府没有办法实现，我们只有革命！"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附：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总领事兰登敦致重庆美国驻华大使的八十五号快报报告中云："所谓八月九日淳化事件，即中央政府部队赶走原驻陕西淳化的共产党非

正规部队的事件，激怒了昆明学生及民主同盟的领导，促使他们在十三日散发传单反对内战[①]，并号召关心此事的人们参加'从胜利到和平'的群众示威大会。这次大会，学生与民主同盟的人员都参加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和吴晗批评了美国支持重庆，控诉了美国强化压迫人民的军队，歪曲了美国租借法案对中国援助的事实，指责美国大使是反动派，要求支持民主同盟。然后在大会的鼓动下，未经大会决议，写给我的这份'代电'，便被印出并有选择地散发了。"(《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5辑，第16页)

八月十八日　好友顾毓琇自重庆飞抵昆明，将以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身份于次日飞湖南芷江参加受降签字仪式。在昆明，顾特到西仓坡看望先生与潘光旦，先生赶刻了一方象牙名章相赠。顾毓琇回忆："抗战胜利后，我离开中央大学校长职务，受国民政府派遣，作为陆军总司令的中将参议，前往湖南芷江参加日伪投降签字仪式。我们乘机经昆明再去芷江，在昆明我去联大宿舍看望一多与光旦，光旦在家设晚宴招待我。我们那天谈到深夜，一多告诉我他已加入了民盟，还看过共产党的书。他对我能去首都受降，很是高兴，说这是清华的光荣。为了庆贺，他特为我赶刻了一枚图章，同时还为吴有训刻的一枚。[②]"(访问顾毓琇记录，1988年5月11日)

八月二十二日　西南联合大学召开第三十九次教务会议。先生与赵迺抟、郑华炽、李继侗、汤用彤、陈雪屏等二十八人出席。会上议决一九四五年度第一学期授课时间自九月三日起，以十四周为准。(据《教务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八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飞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先生为毛泽东之行大为感动，又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八月二十九日　为中法大学李希侃同学题写条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子语书应　希侃兄雅属　闻一多　卅四年八月廿九日。"(据该条幅照片)该条幅现由李希侃先生女婿、美国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约翰·易斯雷尔(中文名易社强)收藏。

是月下旬　民盟云南省支部收到曾昭抡十六日自重庆来信，称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定十月一日在渝举行，望速选出云南支部代表。旋，云南支部全体盟员在唐家花园开会，选出先生和李公朴、李文宜、冯素陶、辛志超、楚图南为代表。又，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周新民、潘大逵、吴晗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出席临代会的当然代表。

---

① 即自由论坛社、民主周刊社、大路周刊社、人民周报社、中苏文协昆明分会、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联名的《昆明八文化团体迎接胜利反对内战通电》。

② 吴有训，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945年8月14日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接替卸任的顾毓琇。

不过先生后来没有赴重庆开会。萨空了后来在《继续"忘我以争民主"的精神》中回忆到："大家谈论昆明民盟同人谁应去重庆参加去年十月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问题。我记得当时努生似乎很希望一多和辰伯(吴晗)都去重庆。我新由重庆到昆明，知道重庆的环境实在不容太乐观，所以我认为一多、辰伯过去的言论，触忌当道的地方多而激烈，还是以不去为是。再说昆明也不应不留下足以应变的留守者。于是大家遂同意了一多、辰伯不去重庆出席。"(香港《华商报》，1946.8.25)

时，罗隆基即将调民盟中央总部工作，云南省支部决定由先生以宣传部长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据《云南民盟大事记初稿》，未刊，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编) 其后，决定杜迈之为《民主周刊》主编。再后，孟南、赵沨先后任主编，编辑有林彦群、胡钊等人。

是月 《类书与诗》发表于《国文月刊》第三十七期。该文曾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报》"图书评论"副刊，这次发表的是重新校改过的稿子。

是月 为西南联大训导处训导员吴志青所著《太极正宗》一书题写"磨剑图"三字，但出版时未收入。吴志青，安徽歙县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任张之江主持之中央国术馆教务处副处长、编审处处长等职。在昆明，曾教授太极拳，颇有造诣。

九月三日 《谨防汉奸合法化》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胜利日特刊"。收《闻一多全集》。文章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姑息汉奸并给汉奸披上国民党军队外衣的行为：

> 对外民族抗战阶段中的敌伪，就是对内民主革命阶段中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是无须说明的。而目前的敌伪，早已在所谓"共荣圈"中，变成了一个浑一的共同体，更是鲜明的事实。……惩治汉奸是我们自己的事，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听见任何关于处理汉奸的办法。……到了今天，八年浴血苦斗所争来的黑白，恐怕又要被搅成八年以前黑白不分的混沌状态了。这种现象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硬把汉奸合法化了，只是掩耳盗铃的笨拙的把戏，事实的真相，每个人民心头是雪亮的。并且按照逻辑的推论，人民也会想到：使汉奸合法化的，自己就是汉奸，而对于一切的汉奸，人民的决心是要一网打尽的。因此，我们又深信八年抗战既已使黑白分明，要再混淆它，已经是不可能的。谁要企图这样做，结果只是把自己混进"黑名单"里，自取灭亡之道！

在未刊手稿中，有篇未写明题目的短文，据内容，似是《谨防汉奸合法化》初稿的一个部分，但正式发表时却未见这些文字。其对"曲线救国"的批判更为犀利，并提出目前"更要紧的是，消灭了我们内在的愚昧，使我们了然于应该做什么和怎样

去做”。兹录短文如下：

谁都记得“七七”抗战以前那一段乌烟瘴气的日子，敌人的爪子在我们脖子上卡得愈紧，他嘴上“亲善”的词令却喊得愈甜。同时一部分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国人，暗中引狼入室的勾当干得愈起劲，面上愈是慷慨激昂，乃至痛哭流涕，看去像真是老成持重，忍重负辱，真是为了国家民族，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去跳火坑的（这样作风后来便叫作“曲线救国”！）。那时我们的情绪，对于他们那豺狼的贪残，如果是愤怒，对于那狐狸的狡狯，简直是超过了愤怒。于是我们要“明朗化”，要强盗、尤其是那另一种中国人，撕掉他们的假面具，来和我们明白的干一场。为使敌我的壁垒分明，便于应战，我们但愿凡是假中国人，和抱着委曲勉强做中国人的中国人，索兴摇着狐狸尾巴滚过去，滚到你们的膏药旗下去，好让我们认清你的面目，给你一泡唾沫。混沌的局面忍无可忍，我们终于宣战了。从此果然一天一天，汉奸愈来愈多，一年一年，一个伪组织又一个伪组织，一批伪军又一批伪军。但是，我们着急吗？不，我们更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假中国人和抱着委曲勉强做中国人的中国人，本来就不应该算作我们抗战的本钱，丢掉了，不值得惋惜。反之，肃清了内奸，我们内部更健全，仗应该更好打了。

我们除了外来的阻力，使我们从此可以放手做去，而更要紧的是，消灭了我们内在的愚昧，使我们了然于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谁忽略了这一层意义，便辜负了八年来千万人民的血和数万万人民的汗。

先生还写过一篇《不许胜利变质》，发表于昆明某报。今佚。

同日　下午七时半，新诗社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东饭堂举办“为胜利民主团结诗歌朗诵会”。会场座位排列成英文的“V”字形，象征胜利。先生出席了这个千人大会，并于会前题写了“虎毒不食儿，哀哉人食人”。（据彭桂蕊给编者的信，1988.5.24）会上，张光年、李公朴、郭良夫、萧荻等朗诵了诗，黄药眠、孟超等发表了感想。

《观察报》报道会议情况云：“当人们正在为胜利而狂欢的时候，在联大东会堂却聚集着一千多不曾参加狂欢的听众，亲切的灯光映出了他们认真、兴奋而忧虑的面庞。城里喧天的爆竹、锣鼓、酒杯碰击的音响和纵情的欢叫被隔绝开来了，这儿没有一点喧嚣，大家都宁静地聆听着台上每一个人的声音，因为这声音，正是大家被窒息了八年而吐出来的声音。朗诵的节目顺利地进行着，负有盛名的光未然朗诵过了，连李公朴也朗诵过了，新诗的朋友们也谦逊而勇敢地读出他们自己的作品，每当一个朗诵者上下台的时候，掌声便像一阵暴雨，扫过整个会场。何其芳的《夜歌》被朗诵了三次，这说明了一般知识分子对它的爱好，也说明了他们已经深深

地认清了它所指出的道路。当郭良夫朗诵《给死在战场以外的兵士》的时候，迸发出一阵笑声，然而这是含有眼泪的笑呵！萧荻用云南话朗诵了一首《征兵委员》，大家在鼓掌声中想，假使有老百姓在场该多好呢！朗诵节目中又插进了两个短短的演讲，一是黄药眠报告成都文艺界的情形，一是瘦得像甘地的孟超说他的感想，谁也想不到今天会到这么多人。让我借用一个朗诵者的话结束罢：——天亮了，可是太阳还没出来呢！"（本报特写《天亮了，但太阳还没有出来呢！——记新诗社朗诵会》，《观察报》，1945.9.5）

同日 西南联合大学开学。抗战胜利，大后方各单位纷纷准备复员，交通工具发生严重困难。西南联大当局遵令在昆明继续上课十四周。

这年度，先生给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文学组三四年级、师范学院国文系讲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三)、(九)"(诗经、乐府)；给师范学院专修科讲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诗经)。均四学分。（据《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九月四日 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三校学生自治会与文协昆明分会、中苏文协昆明分会、民主周刊社、自由论坛社、大路周刊社、人民周报社等团体，在联大东会堂联合举办"从胜利到和平"盛大晚会。晚会由先生主持进行。

本月二日，日本天皇与政府及大本营代表，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为庆祝日本正式投降，昆明各界组织了这次大会，再次呼吁实现民主政治，会场气氛十分热烈，由于停电，《观察报》报道当时的情况云："昆明教育文化界昨天在联大开了个'庆祝胜利会'。联大东会堂挤得满满的，门口、窗子上，凡是能立足的地方都站着人，等着开会。天下巧事多，单单联大没有电，不知怎么搞的，汽灯租不着，点燃蜡烛，台上才发出微光，会就开了。李文宜女士讲头一个'和平'，她说：生在这时代真不幸，人类互相残杀，生命特质都被迫害，遗留下的只有枯骨和废墟，这是战争的赐予，这次战争要比上次大战残酷得多，幸而胜利了，法西斯败溃了，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和平与保持什么样的和平。曾昭抡讲'民主'，他说，照现在人们的看法，民主有多少种，其实民主只有一种，这要看如何解释'民主'这两个字。有人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主，黄帝准许盘御史、绅士可以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意见，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还需要皇帝、御史、绅士？请问他们是否代表民意呢？那只不过是代表他自己的利益而已，这是'民主'？又有人说宪法、法制，就是民主，其实不是那么笼统、简单。'宪法'，在袁世凯时也有法，什么什么宪法多得很，可是人民得到什么益处呢？'那只不过一纸呈文，法制不也是一样吗？''团结'由吴晗先生讲，一上台就报告了两件大喜事。(一) 日本已正式投降，(二) 十八

年不见面的两位先生会面了。这次胜利，大家都明白是怎样来的。要不是九万万（案：原文如此）人贡献一切，决没有今天，票子、儿子、谷子，全是农民出的，光荣应归功于人民，人民出了钱，出了自力……当然有权过问'团结问题'，世界的人和中国人民一样迫切的需要团结、生平，所以要求国共会谈公开。冯素陶讲'胜利'时，不幸有人在会场怪叫、起哄、捣乱，闻一多先生说'谁？请你出来，我向你挑战！'也怪，立刻就没声音了。"（本报特写《天亮了，但太阳还没出来呢！——记文化界庆祝胜利大会》，《观察报》，1945.9.5）雨萌在《悼闻一多先生》中说：当时"他手里拿着扩音器，像一个武器，一面讲，一面狠狠地摇动着。他说：'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这两句话使整个会场激动了，狂热的鼓掌不停地继续了好几分钟。"（《人民英烈》，第230页）

当时的情形，武雪在《是对的站出来——痛悼闻一多先生》中写道："大会是闻一多任主席，某某先生演讲时因为声音小，特务分子就乘机活动，会场起了骚动，咳嗽声、口哨声、吼叫声一起来了。某某先生没有法继续讲下去。闻一多在座中愤怒的站上台来沉痛的说：'……是对的站出来，谁不主张这个会的站出来，谁不主张和平民主的站出来！'一阵雷鸣似的掌声后，会场立即静肃了。闻先生继续说：'偷偷摸摸的不算得中国人，不配做中国人，是对的站出来！'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着台下的怒吼：'站出来！是对的站出来！'"（《新华日报》，1946.7.19）

会将结束，由先生宣读了《昆明教育文化界庆祝胜利大会宣言》。这个《宣言》前后共有三稿，初稿题作《昆明教育文化界对于胜利后国是的意见》，为吴晗起草，先生修正；二稿为先生恭录后，又再次润色修订；第三稿为吴晗抄录。《宣言》全文如下：

> 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理号旗舰上，日本的投降代表已经正式签订了降约，最后一个最顽强的法西斯军阀政权，到今天，可算完全屈膝了。这是全世界人民力量的光荣成就，而我们中国人民，首先揭起反法西斯的义旗，历尽艰辛苦难，不屈不挠，苦斗了八年的中国人民，对于这成就的贡献，尤其伟大。
>
> 事实摆在眼前，在中国人中间，八年来谁在抗战？谁在流血流汗？谁贡献了人力？又贡献了物力？票子、谷子、儿子，不全是由人民担负的吗？偏偏是无力的出了最大量的力，无钱的出了最多数的钱，这样熬了八年，才熬出今天的胜利。今天，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承认：一切光荣属于人民。
>
> 人民既赢得了胜利，人民便有权利在胜利的基础上，再为着自己未来的日子，赢得永久的不可摇撼的和平，以建立民主的团结的进步的新中国。因此，在这举世欢腾，庆祝胜利的今天，我们以一部分中国人民的资格，为了保证我

们自己的胜利的果实不致落空，郑重的提出如下的具体意见。

一、为迅速根绝内战危机，我们主张：

甲，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国共两党的谈判，必须随时对全国人民公开，尊重人民的意见，在人民的监督与支持之下，实现团结。

乙，立即实施一切民主改革，迅速召开包括国共两党、民主同盟，及无党无派的公正人士的政治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二、为酬答人民抗战的功绩，我们主张：

甲，立即完全停止征粮征购征借征兵征工等战时措置，以减轻人民负担。

乙，切实保证抗战军人或其遗族的生活。

丙，迅速扶助民营工业，广泛救济沦陷区人民，并调整公务人员的薪俸待遇。

丁，迅速恢复交通，并资助人民还乡，扶植华侨生计。

三、为惩办战争罪犯及破坏抗战的各种不肖分子，我们主张：

甲，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解除敌人武装，惩办战争罪犯，建立民主的日本，以保障远东及世界和平。

乙，通令全国人民依法检举明暗的汉奸、贪官污吏及奸商囤户等，立即逮捕归案。

丙，组织人民法庭，公审上述人犯，分别处刑。

丁，没收上述人犯的财产，作为建国之用。

一切胜利属于人民，一切光荣属于人民。让我们高呼：我们已经有了胜利，我们更要和平！要民主！要团结！（《吴晗闻一多起草的〈昆明教育文化界庆祝胜利大会宣言〉三稿》，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九月八日 下午三时半，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华中学北院北楼教室，召开一九四五年度第一次教授会议。会上校长梅贻琦报告关于本校教职员米代金、复员及善后诸事项。接着选举教授会书记，先生以二十九票当选。又选举本年度教授会议代表，先生以三十七票当选。当选者还有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陈雪屏、郑华炽、冯文潜、燕树棠、汤用彤、吴大猷、朱自清、李辑祥。（《三十四年度第一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会上陈岱孙有提案，先生记录为："向政府建议：于战事结束后六个月（即从明年二月起），各级学校教职员薪给之底薪，应增至合于战前购买力百分之五十之数。战事结束后一年（即明年八月起），增至百分之一百。现行米代金及一切

零星临时津贴,一律废止。上列之百分比,应以各校所在地物价指数为准。本议案交校务会议执行。决议通过。主席指定本会书记会同陈岱孙、伍启元、冯友兰三先生负责起草关于上列议案之电稿。"(《三十四年度第一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此提纲通过后,当日便起草完代电稿。十二日,由先生转交兼代总务处长查良钊。现存原件后有先生的附笔,云:"勉仲兄:代电稿一份请交文书组速办,弟明日午后三时前到总务处校阅一过。顺候日祉。弟一多留上。九月十二日。"该电全文云:

重庆国民政府主席钧鉴、行政院院长勋鉴: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政府与民休息之措施,如缓役、免赋、减租、轻息,已焕发明令,克日施行。但于军政教人员之待遇,虽少有调整,而尚未闻有彻底办法。揆之事理,窃谓不平。慨自抗战以来,物价日高,比之战前,或至万余倍,少亦数千倍,而国家给予军政教人员之薪津,不到战前之百倍。训至真为国家流血流汗之人,或疲弊于前线,或困顿于后方,徒以抗战胜败所关至重,虽饥饿之不支,仍忍痛而不言,枵腹从公,以争胜利。今幸抗战之大功已成,建国之伟业方始,同人等谨建议政府:至迟于战事结束后六个月,即从明年二月起,军政教人员之底薪,应依其机关所在地物价指数,增至等于战前底薪购买力百分之五十之数;战事结束后一年,即自明年八月起,增至等于其百分之一百数。其临时津贴等名目,一律取消,以资划一。此非同人等一部分之私见,实乃全国军政教人员普遍之要求。在失地收复以后,政府收入增加之时,苟有适当之运用,亦为财政所许可,望饬主管机关,妥拟办法,明令施行。值兹复员之际,经纬万端,同人等本不愿于自身待遇问题,首发意见,但观于近来政府在经济方面之措施,窃有不能已于言者。胜利来临,物价下跌,一般民众,方庆昭苏,而财阀奸商,侈言危机,纷请救济,政府饥溺为怀,慨拨公帑,闻已将至一百万万。在政府以为社会救济,乃事理之当然,但按之实际,此等款项徒增财阀奸商之利润。就昆明而论,首蒙救济者,为银行金店,此辈皆以往囤积居奇,操纵金融之人。当国家危急之际,外有强敌当前,内有经济之危机,政府三令五申,平抑物价,然平者自平,涨者自涨,社会恐慌,几陨大业,此特此辈专顾私利,既不知有国家,亦岂知有政府。今物价虽云下跌,然比之战前,犹判若天壤,此辈纵稍多损失,亦适见天网之恢恢,为不义而富者,小惩而大戒。国家受降告捷,茹苦出力者,尚未膺懋赏,而投机祸国者,反先受补助,既违事理之平,亦非国家之福,故敢电陈诸□明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庚。(《西南联

合大学教授会关于军政教人员之薪金致重庆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之代电》草稿，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九月十一日 为孙毓棠治印。时，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西南联大教授访问，学校请先生提出推荐名单，先生推荐了孙毓棠，孙毓棠遂受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牛津大学从事研究。（据访问孙毓棠夫人王务灼记录，1988.3）孙行前请先生刻印留念，先生高兴地答应了，并在印章上刻了长言边款：

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晚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 卅四年九月十一日 一多 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抄自原图章边款，该图章现存孙毓棠夫人王务灼处）

九月十三日 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在昆明《扫荡报》担任主要编辑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先生立即参加被迫害者营救工作。

昆明《扫荡报》为国民党第五军所办，地下党员高天（高紫瑜）趁其延揽编辑之机，出任总编辑，并先后聘请高明旭、吕剑、姚黎民、江广恕、杨人鸿、洪遒、韩北屏等担任编辑。尽管他们很注意斗争方式，仍被国民党军委会视作《新华日报》的昆明版。而吕剑主编的副刊在昆明民主运动中也颇有影响。为此，《扫荡报》编辑成员受到威胁，八月七日，吕剑被迫辞职；九月三日总编辑高天受政治陷害秘密离昆；十二日杨人鸿被拘捕，张兆麟（刘乐扬），吕剑被追踪隐蔽。先生与周新民、萨空了、张光年得到消息，立刻组织营救。

刘乐扬《昆明四记者失踪的前前后后》："周新民同志得到我请曹明送去的短信之后，在一个晚上，邀了闻一多先生悄悄来到《评论报》楼上。他们说高天同志已经在地下党的安排掩护下，走出国境，进入越北。吕剑同志也由周新民、辛志超同志安排，到了路南（其实是建水）。现在又看到我安全无恙，就更加放心了。他们详细询问了半年来在《扫荡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我们四个受害者的情况之后，便商量着如何营救杨人鸿。大家分析情况，一致肯定了抓人的特务必定属于军统，而不是中统，更不是龙云的地方特务机关。……鉴于龙云历来不许国民党中央特务在昆明城内进行干扰，不准中央宪兵进驻城内，我问闻先生和新民同志可否通过龙云力量来进行营救？并且把四个受害者的问题放在一篇文章里来做。闻先生不等我说完，便连声说：'对！对！大家都说军统无法无天，白昼绑架，四个记者同时失踪，我们就用四记者失踪的提法来营救杨人鸿！我们不理军统，只向龙云要人，把他请进来跟我们一致行动。'周新民完全赞成闻先生的意见，并且主张必须强调军统特

务不仅蹂躏人权，也是对龙氏的藐视和破坏，有嫁祸于云南地方政府的恶毒用意。新民同志具体提出'先作上层工作'。我在隐蔽中不知道闻先生他们是怎样奔走的，只在后来听说，昆明文教界人士向龙云递交了一封信并一张名单，要求龙氏保障安全。龙云问何以有此举？闻一多先生向他说明了军统特务非法绑架、四记者同时失踪的梗概，力言此事发生以后，文教界人士人人自危。闻先生强调云南与昆明是在龙氏统治下，军统特务如此横行不法，'此风决不可长！'闻先生最后要求龙云运用他的权威，救出四个记者。后来听说龙云一听之下，勃然大怒，迅即命令他的云南特务系统，四出搜索，并严令军统放人。"（《新闻资料研究》总16辑，第174至175页）

先生与周新民、萨空了、张光年等商量对策，决定以潘光旦领衔，联合昆明文化界人士致函龙云，进行营救。该信由张光年起草，先生订正，萨空了誊录。信云：

志公先生勋鉴：最近中央特务人员又在昆市从事非法活动，文化界人士之被捕与失踪者时有所闻，影响社会治安至巨且深，光旦等谨代表昆明文化界同人专函具报，敬祈迅饬所属严密查究，并防止同样事件发生，以卫人权，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窃查本市《扫荡报》总编辑高崇瑜君，向属无党无派人士，两年来服务该报成绩昭著，乃于上月二十九日当蒋主席与毛泽东先生在渝杯酒联欢，共商国是之际，忽被某方胁迫着其著论反共，高君为顾全大局，未允所请，当晚即以公正态度就团结与民主问题另行撰文有所评述。讵高君于凌晨就寝后，该报社社长李诚毅竟偷天换日，将原稿篡改成一恶劣不堪之反共文字，且署高崇瑜君名字刊出。翌日报纸出版，报社同人连同高君本人均为之愕然失措。高君受此奇辱，蒙此奇冤，虽悲愤交集，然迫于淫威，无所如何，只得悄然出走。高君出走后，特务人员恐高君一旦获得自由，将公开泄露此项阴谋，如是侦骑四出，声言将捕杀无论。是时有《扫荡报》编辑杨人鸿君，乃一诚笃好学之士，对政治问题向无成见，渠与高君相识未久，仅公余谈笑颇相得，特务人员为探索高君行踪，竟不惜以非法手段，于本月十二日晚间将杨君自报馆宿舍擅行绑去，往华山东路华山南路，在马市口《中央日报》发行部门口架入汽车，自后即以黑布蒙其双眼驶赴郊区某旅馆内之特务机关拘讯两日，毫无结果，始于十四日晚间又以黑布蒙目载入汽车，遣之使归。此事经过中尚有一可注意之点，即拘询杨君之特务人员操云南口音，并声言系警备司令部之人员，此其用意欲嫁祸于地方当局，抑又可知。方杨君尚未放归之时，过去曾任《扫荡报》编辑，现在《观察报》供职之王聘君又被株连而失踪。王君系青年诗人，笔名吕剑，现为昆明文协理事，其为人为一纯粹文艺家，对政治素不热心，徒因其前此

与高紫瑜君在《扫荡报》同事相熟，亦竟被特务注意，数日来该特务等屡至《观察报》追索王君，日必数次，意欲加以逮捕。王君因鉴于高君、杨君故事，深为疑惧，两日来未到报社办公，亦未请假，究系自动出走，抑系被人架去，现均无法证明。窃以保障身体自由，政府早有明令，我公平时训诫部属及公开发表谈话，对特务之非法活动亦屡次表示深恶痛绝，悬为厉禁。乃最近尚有此项"中央"特务人员假冒地方军警机关名义非法逮捕与拘讯文化界人士，违犯法纪，扰乱治安，莫此为甚。倘不严行查究，听令彼辈横行无忌，凡我市民必至人人自危。用敢专函具报，并代表我文化界同人恳祈迅饬所属，严密查究并设法驱逐此类特务人员出境，以绝乱源而维人权，不胜翘企谒待之至。祇颂勋安。（《昆明文化界潘光旦等为〈扫荡报〉高紫瑜等人被侮陷绑架事致龙云函稿》，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九月十五日 先生等一千二百三十二人，联名发表《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提出解决国是诸意见。全文如下：

全国各界同胞们！日本投降条约已在九月二日正式签字了！八年来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及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的结束了！多少年来的耻辱与压迫已清算了！和平建设的日子已降临人间。这的确是中华民族一个空前伟大胜利的日子，在这日子里，怎叫人不高兴、狂欢和热烈的庆祝呢！

抗战是一个神圣艰苦的工作，八年来，中国人民茹苦含辛，牺牲一切，在敌人残酷的进攻下，坚持抵抗，用自己的血肉，粉碎了敌人的迷梦，奠下了胜利的基础；更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伸张正义，歼敌强权。现在胜利终于来到了，一片灿烂的曙光已展开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功绩，我们今天应该伸出双手，热烈的迎接这伟大不朽的胜利。这胜利是我们的，这胜利将引导我们到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都这样相信：这新的时代应该是和平的，民主的，团结的，无论在国际国内都是如此；因为和平民主是我们这次对法西斯作战的目的，而团结则是使这次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今后我们要和平建设新中国，民主、团结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就国际方面看，我们相当乐观，由英美苏三大国领袖的历次会商，联合国的几次集会和这次划时代的中苏友好盟约的订结，使世界上主要的强大国家团结起来，摧毁了曾经猖獗过一时的法西斯暴政，并在积极阻止其再生，而使今后世界的和平民主有了强固的保障。说到国内，我们决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中国还存在着许多破害和平、民主、团结的危机，直到今天，敌人的军队，还没有在中国境内完全解除武装，汉奸国贼更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膺

惩，反而正在计划伪装自己，想摇身一变而为“曲线救国”的英雄，藉以保留其法西斯余力，企图再起，扰乱和平。在政治上，民主设施还未见端绪，国共两党关系还没有合理解决，有些专制主义者，还在想打内战。至于由于战争的过重负担以及在战争中由于通货膨胀及发国难财者所造成的经济紊乱，民生凋蔽，更是万分严重。而接受沦陷区、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更多。这许多现象与问题，如不能妥善协商，合理解决，则中国前途实不堪设想。然而，我们也确切相信，只要大家努力，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主，则实现和平、民主、团结，是一定可以做到的。现在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已来重庆与蒋主席会商，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而全国人民的要求，亦正是如此。我们除开对这次谈判明确表示我们的态度，认为国共两党应该竭诚相见，以人民利益为重，采用公开方式，邀请其他民主党派及进步人士参与协商外，我们更应正视现实，供献出一切力量，为这次谈判的圆满解决及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里我们提出我们的主张：

一、根据波茨坦宣言，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其再生，以维护世界和平。

二、严厉惩办战争罪犯及其帮凶汉奸走狗。

三、彻底实施民主改革，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立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并召开政治会议，成立全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根据各地人民意愿，选派各地方官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四、立即组织联合统帅部，解决军队统率问题，使各地真正抗日部队，就目前驻防地区，从速分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失地。

五、切实优待嘉奖抗日军人，抚慰阵亡将士家属，停止征兵，并从速办理复员。

六、立即停止征实征借，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并有效帮助一切有利民生的民营工商业，以奠定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我们认为要解决今天一切问题，真正展开建国工作，决不是空谈高调，口是心非，对付拖延，阴谋欺骗所能为功。必须痛下决心，根据人民意愿，从现实问题着手，寻求解决之道。以上六点实为我们衷心的要求，亦为全国人民的意愿，我们郑重提出，希望全国各界同胞以从事抗战之伟大英勇精神共同努力，促其实现。

签名者有：张光年、章泯、祁仲安、王健、李公朴、黄叶绿、李实中、蓝驶明、潘大逵、陆钦墀、冯素陶、尚钺、罗隆基、夏康农、张曼筠、王振华、李何林、宋云彬、孟超、

杨怡士、白澄、王汉斌、张源潜、潘汝谦、王瑞沅、许铮、谭正儒、洪继凯、何孝达、康倪、周新民、李文宜、彭允中、杨须知、洪道、王念平、詹开龙、沈叔平、杨明、王云、曾昭抡、吴晗、胡钊、曹聚仁、楚图南、季镇淮、何善周、许维遹、王瑶、范宁、潘光旦、费孝通、闻家驷、辛毅、袁震、施载宣、刘美菊、王景山、萧松、李政道等，先生的子女闻立雕、闻立鹏、闻名、闻翻也签了名。

九月十七日 卧病在床。罗伯特·白英来探望，两人谈了许多。

白英在《中国日记》中记录先生说："令人痛心的是这一仗并不是我们打赢的，而是美国人帮我们打赢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以美国的全部财富为后盾的那么几个德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们帮助我们打赢的。美国的财富！历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都认为，财富蕴藏在东西印度和中国的黄金国土里。他们说那里的财源旺盛，黄金遍地，富足的程度是常人所想象不到的。而如今，东西印度资源枯竭，中国也贫困不堪。仗并不是我们打胜的——而是美国人依靠曼哈顿计划[①]的成就而取胜的。虽说中国人也会猛地朝着日本人的胫骨踢上几脚，高傲地挺起胸膛。但是，日本人明白，我们心里也清楚，我们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没有什么功劳，根本不配享受胜利的成果。打一开始战略上就有错误——迁逃到四川从来就是一种冒险行为。现在我们真有点不敢和日本人面对面站在一起，因为我们为这种名不符实的胜利而感到羞愧。这就是我刚才所想到的。不过一切征服不都是徒有其名的吗？因此，这也许并没有多少害处。物质上的破坏是消灭不了任何东西的。不错，日本人被我们打得跪地投降了。可是从来没有那个国家曾经像中国那样被人打得一败涂地。我们从失败中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但愿上帝保佑我们能从这些失败中获得教益。"

说到内战，先生说："这确实丢人，谁也没想到会有这一着，但内战的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商人们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总想保住权势；士兵们想找点事做，军官们也不甘心碌碌无为。哦，那骄矜之态真是不可一世。当然，你说得很对，他们毫无廉耻。当兵本来是光荣的职业——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如果当兵而不乱杀人，那么确实是高尚的。一位美国兵来向我告别，说他即将回国。他说，他对战争厌烦极了——他每见到一个活人，就会下意识地寻思着谋杀他的方式：是在他腹部捅一刀呢，还是用臂弯掐他的脖子，或是采用其他方式把他干掉？他说，他想回美国去，找上一个农庄'那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虽然我从未去过农庄，但我知道那是我唯一可以去的地方'。他还说：'找个姑娘，生上几个孩子，让我永远离开这一

① 指1942年美国政府建立的用以研究、制造第一枚原子弹的计划。

切吧。'杀人比找女朋友容易，扔手榴弹比照料好孩子更是容易得多。现在政府部门需要的是由妇女当家——苍天在上，我们现在需要妇女当政。我们需要有人敢于朝着军人捆耳光，告诉他们，他们干着不体面的勾当，尽管有时他们的这一行也必不可少。军人和刽子手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刽子手是必不可少的，军人当然也同样需要。但当兵的却并不光彩，虽然他们骁勇善战。我们应该向妇女和孩子学习——看看孩子们在死亡面前是怎样吓得退缩，而我们对死亡却无动于衷。"（《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79至282页）

同日　晨，朱自清来访。未遇。朱自清日记："上午访一多，未晤。得闻太太许可，阅一多手稿，资料丰富，很受启发。"（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66页）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编后记》中亦说："三十年我和闻先生全家，还有几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里，一住两年多。我老是说要细读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应。可是我老以为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边，什么时候读都成；不想就这样一直耽搁到我们分别搬回昆明市，到底没有好好的读下去。后来他参加民主运动，事情忙了，家里成天有客，我也不好去借稿子麻烦他。去年有一天，因为文学史上一个问题要参考他的稿子，一清早去看他。那知他已经出去开会去了。我得了闻太太的允许，翻看他的稿子；越看越有意思，不知不觉间将他的大部分的手稿都翻了。闻太太去做她的事，由我一个人在屋里翻了两点多钟，闻先生还没有回，我满意的向闻太太告辞。"

对于先生的手稿，朱自清除了赞赏外，还多次提到书写的工整，熟悉先生的人对这一点也有深刻印象。赵仲邑说："我多次看过闻先生的讲稿、书稿，见他写的毛笔字都整整齐齐，绝少行草，即有行草，也一笔不苟。上课时的板书也是这样。从闻先生的字迹也可想见其为人，态度极其认真！""但我借阅过他出版了的《楚辞校补》单行本，见到书上打了不少符号，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这是闻先生对他出版了的著作仔细校对过的痕迹。"（《闻一多先生最讲认真》，《精庐小札》，第207至20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同日　下午，看望陈寅恪先生。（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67页）陈寅恪二十一日赴加尔各答，此是先生与陈寅恪的最后一次见面。

是月中旬　参加人民周报社、自由论坛社、大路周刊社联合复刊讨论会，出席人还有侯达虔、李承勋、费孝通、吴晗、王康等。

现存《〈人民〉、〈自由〉、〈大路〉为联合复刊讨论会记录》，全文如下："一、《人民》《大路》两周刊决定于最近联合复刊，另与《自由》同人合作。二、联合的动机，系基于过去人事上之谐和及对现实见解相同，而希望能以更有力的姿态出现，以对

当前时局国事有所贡献。三、联合办法：① 由三方面组成联合出版委员会；②《人民》、《大路》仍保持其各自之独立性，但皆得遵守联合出版委员会之意见；③ 联合出版委员会由三方面依实际情形分为编辑及发行两部分，编辑由费孝通先生负责，发行由《人民》、《大路》联合负责。四、经费：《人民》、《大路》各负担四分之一，《自由》负二分之一。五、《人民》、《大路》原有之债务，仍各自负责清还，惟联合版对于两刊原有之未满期定户愿担负一部分清理之责，其担负之比例俟后决定。六、联合刊名《人民大路》[①]。七、发行人仍用《人民》、《大路》二发行人之姓名。八、总编辑具名。九、总编辑对文章之刊选负全责。十、下次集会时间二十九日下午八时半。十一、联合出版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之，《人民》二人，《大路》二人，《自由》三人。《大路》侯达虔、孟超，《自由》吴晗、费孝通、王康，《人民》(缺)。十二、联合办事处设《人民》文艺沙龙，编辑部设费先生处。"(《吴晗闻一多等出席的人民周报社、自由论坛社、大路周刊社为联合复刊讨论会记录》，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就在这时，自由论坛社社长郭相卿被国民党当局威胁利诱，于昆明《中央日报》刊登启事，"正告潘光旦"，称《自由论坛》与民主杂志无关系，并将潘排挤出编委会。为了揭露此阴谋，先生与吴晗、曾昭抡、王赣愚、费孝通、杜才斋、王康、袁方等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开除郭相卿社籍，解散自由论坛社。同时又起草了《自由论坛社社员启事》，文云："同人等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创立自由论坛社，发行《自由论坛》月刊，继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增办《自由论坛》周刊，一切重要社务，由社员大会决定，日常事务则由社员大会所推选之社务委员会全权执行。社员郭相卿以发行人资格被赋予社长名义。历年以来，关于经费之筹措，刊物之编辑，民主运动之倡导与响应，俱由社务委员潘光旦、王赣愚、费孝通等负完全责任。对外捐募款项亦以社务委员之名义行之。不意上月郭相卿突以社长名义在各报刊登荒谬启事，以个人而否认全体社员行动。当经社员大会开会议决，肯定过去一切行为合于全体社员公意，郭相卿违法叛社，罢免其社长名义。并以郭君青年，特予宽容，于启事中仅声明议决案原则，不列郭君姓名，开其自新之路，刊登于九月十七日《中央日报》。次日郭相卿诡人请项，表示悔过，恳求将启事中取消社长一段删去，社务委员以其既知自新，勉允所请。讵料郭相卿君诡张反覆，不顾信义，叛师卖友，变本加厉，又于九月二十日《中央日报》刊登非法启事，反唇相讥。兹特郑重声明，郭相卿两次启事所列事项，完全不合事实，违反社员公意，经社员大会议决，正式公布开除郭相卿君社

① 《人民大路》于11月19日创刊。

籍，依法追究最近以社务委员名义所募集之款项[①]，并自即日起宣布解散自由论坛社。本社前出《自由论坛》月刊至第三卷第五期为止，《周刊》至二十八期为止。此后如有同样名字之刊物出现，概与本社同人无涉。特此声明。”（《吴晗闻一多等签名的自由论坛社为开除郭相卿社籍及解散自由论坛社的社员大会启事底稿》，中国革命博物馆藏）该声明于九月二十七日在《云南日报》第一版广告栏中刊出，署名者为潘光旦、王赣愚、费孝通、闻一多、吴晗、曾昭抡、张荦群、王康、袁方、杜才奇[②]。

为了反击反动派阴谋，旋由民主周刊社出面，联合十余家新闻出版团体，于二十五日成立了昆明出版界联谊会筹备会，先生是发起者之一。

九月二十三日　为揭露国民党当局阴谋陷害《扫荡报》总编辑高紫瑜及报社进步人士，先生、周新民等欲请褚辅成（字慧僧，辛亥革命元老，时任昆明经委会主任）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要求维护人权。褚老表示愿与先生谈谈。

是日，萨空了致先生信。信云：“多兄：新民兄已行[③]，临行嘱弟转告褚慧老为《扫荡》高、杨事极忿，愿与兄一谈，并盼与杨君一晤（慧老下午在绥靖路经委会），其意似盼兄今日下午即去谈谈。再朱可能于明早或明日下午到潘兄处，不知明日能见候否[④]，明早余人可能已皆成行，今日下午四时可以决定，并以□□，敬祈日安！”（《萨空了致闻一多便笺》，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又，曾昭抡赴重庆参加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行前有信给先生，云：“一多兄，附函送上论文一篇，请连昨晚送上之文，一并送交《正义报》吴传启君收。弟等今晨准行。昨日新民交来之件，务请托健飞或光旦，妥慎带渝，至要至要。此颂双安。　弟昭抡上。　九月二十三日清晨。”（《曾昭抡为文稿事致闻一多便函》，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是年秋　辅导康倪同学准备毕业论文。

康倪在《忆闻一多先生》回忆：“一九四五年秋季，我准备写毕业论文，闻先生作我的导师。有一次他叫我到他家里谈，问我打算写什么题目。我说：‘初次写论文，不仅在学习写作，主要的是希望能加深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我很想写关于人民性方面的问题。有三个内容可以考虑，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人民性，一是唐诗中的人民性，一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闻先生这时烧着一斗烟，对我笑笑说：‘你的野心真不小，中国文学史上的人民性太广泛了，怎么集中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意义深

① 为一百零二万元。
② 该声明署名人中的杜才奇，在启事底稿中作杜才斋，两者应为一人。
③ 指赴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事。
④ 《萨空了致闻一多便笺》中之“朱”与《曾昭抡为文稿事致闻一多便函》之“健飞”为一人，即朱健飞。

远,但我们手边的材料不够用,再说你写得再好,也拿不出来(指论文审查)。将来再写,你会写得更完美的。那么,依我看现在最好是写唐诗,不过"人民性"这题目太显露,你看很多文章不是都讲什么思潮之类吗?我们也含蓄一点,就定为"唐诗中的文艺思潮"如何?'我认为已领会了他讲话的全部意义,我站起来,笑一笑什么也没说。先生说:'好!那就回去看有关材料,拟成大纲时再来找我。'这样,我就坐了一个月的大图书馆,去看有关材料,以后捧着三页稿纸的大纲去请教先生。我自以为这大纲写得很完整,因为从唐诗的渊源,写到它的流风所及,至于各个作家的特点,作品的归类,更标志得章节分明。哪想到先生看这大纲时脸色却沉下来,随后把它放在桌子上,回过头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我说:'你,为什么也这样俗气?按这个提纲写下去,能符合我们的原来要求吗?'说着拿起一枝墨笔来,拔开笔帽在砚台上探了两下,眼看着我那些书法整齐的蓝色小字,就都被墨线给穿成条条,最后剩下的只有几个标题号。先生在原稿纸的第一页的'一'字上写了一个'序'字;另起'一'字下面写的是'从天宝之乱谈起';又把原来的'二'改为'唐诗中人民思想之成长',下分甲、乙、丙三项:'(甲)大历'的上边写了'元结、杜甫'两位诗人的名字,'(乙)长庆'下边写了两个小字'理论',上边写出'元、白'两个诗人的姓氏,指出元稹、白居易的理论要注意,'(丙)晚唐'下边又标出'刘驾、聂夷中、曹邺'三位诗人的名字,之后把原稿'三'的内容改为'唐诗中之会社',下列'军旅、妇女、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五个项目;然后又把原稿二、三两页全部屏除,只保留一个'四'字,并在下面写出'结语'两个字,然后长长地抽了一口气,告诉我:'序和结语都不宜过长,天宝之乱是主要一环,而具体地谈人民性应放在"三"上,读全唐诗时要特别注意晚唐。'他把大纲递给我,这时候面色又转为慈和,我听出那声音中带有希望,并且用一种鼓励小孩子般的亲切语调说:'拿去,好好写吧!'我退出来,我感到我迈进自己宿舍的门坎时,我眼睛里仍含有泪。"(《人民日报》,1956.7.15)

十月一日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民盟一届八中全会追认此次大会为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先生原被民盟云南省支部选举为代表,虽未能赴渝,但仍在会上被增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这次大会于十二日结束,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十六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十大主张,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举行国民大会,保障人民自由,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废止特务制度,军民分治等。

同日 先生和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

彤、钱端升共十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对于国是主张。要求“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共商如何成立容纳全国各方开明意见之联合政府，再由此联合政府于最短期内举行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定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根本大法，以产生立宪政府”。

时，昆明各界纷纷表明对国是态度，钱端升认为联大教授亦应表示立场，遂起草一文，请先生等人签名。朱自清日记云：二十九日，“上午钱来访，请我等在对当前政局申述意见之电报上签名，内容谈及蒋（介石）之独裁统治，我同意签名。”（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68页）有人回忆，张奚若为了避免为人口舌，主张只约请名教授签名，故最后仅有十教授签名。该电由交通部电信局发出，发报纸共用了二十四页。台湾“国史馆”今存该电发电纸原件，在“发报人姓名及住址”栏里，盖有“钱端升印”的图章，旁有“一面抄送毛泽东先生，一面签报主席”之批示。（国民政府档案，台湾“国史馆”存，典藏号001-014510-0003）由此可知电文发出后，原发电纸亦由有关当局同时寄出。此电发表，产生相当影响，社会反映说：“十教授中张奚若先生是前参政员，周炳琳、钱端升两先生是老国民党员，也是现任参政员，过去几次参政会中都曾剴切陈言，替人民说话。其他的七位教授，除闻一多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吴之椿先生是国民党员而外，都是以教学为业，精研笃究，卓著声誉的学者。内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或曾是共产党员，年龄也都在四十以上，绝没有年青气盛容易被人利用的分子在内。他们的意见应该可以说纯粹自发的，纯粹基于国家民族立场的，超出党派利害立场的意见，也就是代表了整个人民的意见。”（《十教授致蒋毛电文》，昆明《民主周刊》第2卷第12期，1945.10.17）

此电文曾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为题，刊登于十七日昆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十二期。未入集。全文如下：

重庆国民政府文官处分转蒋介石先生、毛泽东先生大鉴：

日本投降，先生等聚首重庆，国人方庆外患既除，内争可泯，莫不引领企望协商早得结果，统一早成事实，新中国之建设早获开始。顾谈商逾月，外间第传关于地区之分辖有异议，军额之分配有争执，而国人所最关切之民主政治之实施，及代表此政治之议会之召集，转未闻有何协议。诚所传非虚，则谈商纵有结果，亦只是国共两党一时均势之获得而已，既不能满足全国人民殷殷望治之心，亦不足以克服国家目前所遭遇之困难。奚若等内审舆情，外察大势，以为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敢请先生等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共商如何成立容纳全国各方开明意见之联

合政府，再由此联合政府于最短期内举行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定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根本大法，以产生立宪政府。必如此，一切政治纠纷乃可获致圆满之解决，而还政于民之口号乃不至徒托空言。在立宪政府成立以前，国共两党既为今日中国力量最雄厚之两大政党，先生等又为其领袖，故刷新政治，改正方向，先生等实责无旁贷。

今当除旧布新之际，有数事应请特别注意，并立即施行者。

十余年来，我国政权实际上操于介石先生一人之手，介石先生领导抗战矢志不渝，自为国人所钦敬，惟十余年来政治上之种种弱点，如用人之失当，人民利益之被漠视，以及贤者能者之莫能为助，其造因为何？诚宜及时反省！今后我国无论采用何种政制，此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此其一。

十余年来，由于用人之专重服从，而不问其贤能与否，遂致政治道德日趋败坏，行政效率日趋低落。即自日本投降以来，收复区人事之布置，亦在在使人惊讶失望。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庶我国可不致自绝于近代国家之林，而建国工作乃能收效。此其二。

军人干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皆为祸乱之阶，今后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为旧军人或为新军人，隶国民党之军人或隶共产党之军人，皆不应再令主政。此其三。

奸逆叛国，其罪莫逭，政府纵恻隐为怀，不将大小伪官一一加以惩处，而元凶巨慝及直接通敌之辈，绝不可使逃法外。须知过于姑息，便损纪纲，忠奸不分，何以为国。此其四。

以上四者，皆属今日当务之急，亦为国家根本之图，先生等领导国内两大政党，倘刷新政治，改变作风之决心一经表明，目前政治上之纷乱局面，可立归于澄清，而来日宪政之实施，亦可大减其阻力。抑更有进者，民主制度之所以能风靡全世，而战胜反动集团消灭法西斯主义者，乃因其能以全国人民之意志为国家之意志，以全国人民之力量为国家之力量。故真正民主国家，其政府对于个人之价值，与夫个人之人格与自由，莫不特别重视，对于全体人民之智慧，亦莫不衷心信赖。先生等领导大党，责逾寻常，务望正心诚意，循宪政之常轨，以运用其党力，诚能以实际之措施，求人民拥护，藉人心之归向，作施政之指针，则一切纠纷自然消弭矣。夫导国家于富强康乐之域，其道自尊重人民始，而树立宪政轨范心理上之因素，尤为首要。奚若等向以教学为业，目击政治纷乱所加于人民之损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乱间不容发之际，观感所及不容缄默，率直陈词，尚乞察纳。

同日　晚，参加西南联大文艺社成立二周年纪念晚会，并在会上讲诗歌问题。孟超亦讲杂文，李广田讲小说，李何林讲文学理论，田汉讲民族形式问题。黄药眠、尚钺亦到会。（据张源潜日记，未刊）

十月二日　晚，与吴晗至云南大学社会系办公室，并邀张奚若、楚图南、闻家驷、尚钺、费青、向达、吴富恒、费孝通等人及一些青年教师，共同组成《时代评论》周刊编委会。

抗战胜利之后，昆明出现一批小型刊物，但多为打游击形式，出一两期便停刊。先生和吴晗觉得这不是办法，决定办一个刊物，为中间色彩的教授提供一个园地，并将此工作交给云南大学社会系教员王康，主编则请费孝通担任。

办刊物需要钱，先生和吴晗通过某渠道搞来五十万元（实际没用完）。印刷则是由民青地下印刷厂承担，每期稿子是萧松到王康处去取。为了让该刊能够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先生对王康说：这个刊物同学生办的不同，写文章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不能用打游击方式，要采取合法的办法。要登记，但不能等，一边办登记手续，一边准备出报，给他造成既成事实，出了报再说。至于内容，只要不反动都可以登，多让中间的人说话。开始应稍稍稳重些，不然会把老好先生吓跑的。这些人都是难得的人才，要尊重爱护他们，尽量争取团结这几个大学的老好先生。（据访问王康记录，1990.6.16）

夜，为时代评论社赶刻社章，以便从速办理登记。该石章现保存完好，边款上刻："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　闻一多制印　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

吴晗在《闻一多的"手工业"》中特别记述了这枚图章："时代评论社章具有历史的意义。在刻这图章前两星期，我在逼死坡文具店用一千元买到一块旧石，长方形。一边刻有双鱼，他也很喜欢，夸我眼力不错。问愿意刻什么字，是一句诗，还是连名带字刻在一起？我说，随便，你喜欢怎么刻就怎么刻罢！不久，时代评论社成立了。要一个公章，他就自告奋勇，连带也替我捐献出这块石头。十月三日的早晨，在枪声炮声中完成这件艺术品。刻完，兴匆匆的走来说：'今天我做成一件事，很得意，你来瞧瞧。'我看见也很高兴，连说好极了。又问：'你没有听见枪声吗？这样密，这样响，亏你静得下心！'他说：'昨夜晚就有一些声音了，管他呢！我今天高兴做我自己的事情！'"（《吴晗文集》第3卷，第377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

午夜，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按照蒋介石五项命令，调动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驻地五华山和省主席龙云的威远街住所。多年来，蒋介石对龙云在云南暗中支持民主运动、与重庆对抗，早怀不满。乘日本投降之机，蒋将龙云主力部队调往河内受降，致使龙云放松警惕，身边仅留少数警卫部队。第五军与龙云部队交战至五

日，龙云获悉赴河内之卢汉不能返回，而警备司令禄国藩亦被围困，使自己的宪警失去指挥，不得已，被迫离昆明去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之闲职。蒋介石控制云南后，昆明的形势便紧张起来。

龙云下台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暗地支持民主同盟。龙云本人曾秘密加入民盟，并且还让他的长子龙绳武也加入了民盟，先生和楚图南、冯素陶三人，是龙绳武入盟宣誓的监誓人。冯素陶回忆说："龙云未下台前，他的长子龙绳武对民主运动也有一定同情，并曾秘密参加过民盟，虽然参加是秘密的，入盟仪式却颇郑重，在他东门外住宅设宴招待楚图南、冯素陶、闻一多，同时举行入盟宣誓。"（《黎明前后——冯素陶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4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楚图南在《民盟工作的片断回忆》中进一步说："我们商议，对龙绳武这样的旧军队和云南地方实力派涉足很深的人加入民盟①，一定要以他做点工作，对他明白加入民盟不是一件随意的事，一定要给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经商量，龙绳武加入民盟要履行宣誓手续。我记得宣誓的地点是在城郊的龙云住宅的大厅里，我和闻一多、冯素陶是监誓人。"（《中央盟讯》1991年第1期）

此后，不几天，华岗离昆，行前对先生等说形势已发生变化，今后行动要谨慎，注意保存力量。先生与吴晗都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指示，特别记在心上。

十月四日　为欧小牧、周群夫妇治印。欧小牧回忆：十月三日下午，"我恐闻先生绝粮，慢步到他那里看看。先生正危坐治印，见我进来，问：'你可知龙主席在哪里？'我答'可能还在五华山，他是个老军务，打惯仗的，先生不必为之耽忧。倒是我昨天恰巧买了五升米，要不要送点来给你？'先生笑指脚边一堆薯说：'谢谢，谢谢，我还有，我还有……'我久有请先生治印之意，便借此戒严期间，无法授课之际，于次日，将石章二方，送请先生铁笔一挥。先生仅用一天工夫，便将二章治就。一方是我的：'欧阳麟印'（阴文），一方是妻子的：'周群'（阳文）。我的名章上还有边款：'小牧兄弟一多篆'。二章俱为黄色带红彩的寿山石。"（《生死情——闻一多先生被刺四十周年祭》，《欧小牧文集》第1卷，第438至443页）

十月十七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召开迎新同学会。新自美国归来的杨振声在会上谈文学的统一性问题，先生则赞扬苏联。朱自清日记："出席中文系为今甫及一年级新生召开之欢迎会。今甫谈及中文研究及英国人欣赏中国画的问题，他强调文学之统一性。一多首先问英美对苏联的态度。会议主席最后直率地指出今甫谈

① 楚图南文中龙绳武作龙绳祖，今据冯素陶文改。

话方式，表示他局限于象牙塔中，而且他急于知道是否有人饿死，英国人体现了他们压迫殖民地的感情。刚好今甫要去赴宴，故而离去。一多被邀发言，他对主席的不客气表示遗憾，但赞成对志趣相投的听从直言相告。彼谓以此方式将会开下去。总的来说，彼非难英美文化，而无条件地赞美苏联。余四次被邀发言，皆谢绝。"（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70至371页）

时，作大会主席的同学问杨振声："听说美国也有贫民窟，他们的劳动人民究竟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也很想知道。"杨说："我没有理由回答你的问题，我现在还有其他的事。"说罢走出会场。先生这时说："我们主席的发问是对的，那位先生应该正确地去重新认识美国内幕。他是我的老朋友，会后我还要当面去问问他，希望他改进。"（康伣《忆闻一多先生》，《人民日报》，1956.7.15）

王康《闻一多传》也记载了这件事："二十年后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当一位教授大谈美国生活方式之优越时，同学们提了一些疑问，那位教授怒目而去。他很深沉地陷于回忆中。当大家踏着马路上的油加利树影送回家时，他对仍在愤愤然的同学们说：咱们也不能责怪他，他到美国去和我当年的身份不同，处的环境不同，接触面更不同了。他是去'讲学'的，受的贵宾待遇，怎么能见到美国社会的底层？也许现在美国变了，穷人也上了天堂啦！我那时见到的有的同他一样，有的很不一样。他自嘲地说：'我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背诵过林肯那篇有名的宣扬民有、民治、民享的讲演辞，似乎美国人民都很幸福，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呵！当然，应该承认美国科学实业发达，整个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只是贫富悬殊，这大致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制度有问题，不闹革命是解决不了的。'"（第80页）

十月十八日　下午三时，赴清华大学办事处，出席清华大学一九四五年度第二次教授会议。会上校长梅贻琦报告上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情况，报告联大明年四月以后再迁回平津之计划，及清华复员有关事项。报告中还讲到清华发展设想，称文学院将增设语言人类学系，教育部虽未有肯定表示，但或无大问题。（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十月十九日　致闻家驷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很短，云："本日为鲁迅忌辰，同人发起赴陈家花园一聚，藉资纪念，如得暇盼饭后即来兄处一起出发。"时，闻家驷住在文林街民强巷五号，先生凡有活动多约他同往。

同日　晚，参加昆明文化界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的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座谈会。尚土在《痛忆闻师》中回忆："十月十九日为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日，几个文艺团体在云大至公堂举行纪念晚会，出席演讲的有六七位，先生最后做结论，他说：'有人把鲁迅比作现代的孔子，其实孔子哪能比得上鲁迅，鲁迅比孔子不知道伟大

到多少倍！鲁迅的道路是新文艺的道路，也是新中国的道路。’”（《人物杂志》第2年第9期，1947.9.15）

十月二十六日 对西南联大卜兴纯同学谈对时局的看法。并表示愿与尚钺做他的入盟介绍人。（据卜兴纯给编者的信，1987.2.10）

十月二十七日 下午四时，参加梅贻琦召集的联大教授会成员的茶叙。这个会主要是欢迎傅斯年到联大任职。三十日，傅正式就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并为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十月二十九日 西南联大举行八周年校庆纪念周。次日，先生受聘为联大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主席为冯友兰，成员还有雷海宗、姚从吾、罗庸。十一月二十一日，该委员会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加聘冯文潜为委员。

校庆期间，先生担任导师的西南联大剧艺社演出了吴祖光编写的《风雪夜归人》，考入西南联大不久的闻立鹤参加了演出。

十月三十一日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学艺部举办“八年来的联大”检讨会。先生出席并发言。舒君在《民主的堡垒——联大校庆记》中写道：“王赣愚和闻一多两位先生，在讲及‘教授生活’的时候，不约而同的撇开物质生活专讲精神生活。他们不愿为物质生活底低劣而叫苦，却因联大有学术自由与教学自由而感到安慰。在极穷困的日子里坚守着联大的岗位，不愿有所转移。闻一多先生更指出联大教授仅仅是一个民主‘堡垒’，‘堡垒’是保守的，因此还不够，还要冲锋。”（《新华日报》，1945.11.21）

校庆纪念周内，人们特别关心是月十日签订的《国共会谈纪要》，民青编辑的《现实》壁报就接受敌伪投降、解放区政治问题，访问了先生与张奚若、王赣愚等教授，并将其意见刊登在壁报上。《西南联大教授反对内战，揭破武力统一的迷梦》中登载先生的意见为：

> 共产党应该接受被他们包围的敌伪投降。……我们有理由信任共产党解放区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你不能以没有到过解放区来搪塞一切问题。你没有到过美国，难道说美国没有民主么？……西南联大，是国内最自由的学府，应该来试办一次民意测验，反映我们心里的话。我们不屑与反动集团争什么法律正统，孰是孰非，只有取决于人民，反动派却最怕真正自由的民意测验。（《新华日报》，1945.11.25）

是月 协助民青把“双十协定”和有关国内外舆论的材料收集起来，编印成册，在学生和各界民众中广泛散发。（据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是月　张光年离昆明，行前看望先生，并送了一个长烟斗。

张光年是通过李公朴的关系，利用国民党军官吃空额之机，顶着某人之名进了第五军留昆城防司令部电训队，随队辗转到河内，乘美国军舰到渤海湾葫芦岛登陆后，再到北平的。到北平后，张接到先生的信，大意说：昆明传言张光年在葫芦岛上岸后与八路军接火被俘，张说自己就是光未然，才被放了，此事确否望速回信。张马上复信，说没有这回事，请先生放心。（据访问张光年记录，1988.2.4）

十一月一日　上午九时，西南联大举行建校八周年庆祝会，到会者两千余人。会上西南联大常委、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报告迁校计划，决定次年暑假开始复员。

同日　出席西南联大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的座谈会，讨论国内形势和内战危机诸问题。

十一月五日　与闻家驷、曾昭抡、吴晗、潘光旦联合邀请梅贻琦、傅斯年、杨振声吃饭。饭后谈到政局与校局。

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晚六点余，应一多、家驷昆仲及叔伟（曾昭抡）、辰伯饭（吴晗），约于昆南宿舍潘家，他客只孟真（傅斯年）、今甫（杨振声）。饮酒据报有九斤之多。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是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调动八十多万军队进攻解放区事，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十一月十六日　西南联大文艺社编印的《文艺新报》第二期出版。"编辑室启事"云：自是期起设"'文艺信箱'，替读者解答文艺理论、文艺思潮、作品形式、内容及其他问题。并特约闻一多先生、李何林先生、李广田先生为本信箱导师。"（转引自王景山《忆李广田师和西南联大文艺社》，《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但这个信箱仅出过一期该报便由于一二·一惨案发生而停刊，先生未来得及解答读者的问题。

同日　晚七时，在青年会演讲"文学之欣赏"。（据《昆市点滴》，《云南日报》，1945.11.16）

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西南联大举办的第二次"战后之中国"系列演讲中，主讲"战后的文艺道路"。现有史劲（刘克光）同学记录稿，收《闻一多全集》。今存手稿中有这次讲演的提纲，兹录如下：

战后非善后，乃相当长时期的将来

欲知将来必察既往——站在过去的背景下展望将来

根据已然的推测未然

如此的未然才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非个人主观的愿望，

是科学的预见，非掐指一算得来的玄学的幻觉

科学——历史的已然　预见——未来的必然

所谓历史——不违背全人类历史大原则的，有特殊性的中国历史

中国文艺史（本行）

但又非人云亦云的中国文艺史，如此则不必讲

乃新观点——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光照下的中国文艺史

阶级社会中历史必然有两套：（1）人民的　（2）统治者的

现在要讲的是：站在（1）的立场而不抹杀　（2）的事实的“信义”

三大阶段

一、奴隶　有主人的奴隶

二、自由人（解放了的奴隶）　无主人的奴隶

三、主人　（自己的主人）——无奴隶的主人——人（有奴隶的主人——法西斯）

（一）奴隶阶段（奴隶社会）

阶级身份

主——自由发育　自由活动

奴——亏体　缚体　实质的　象征的（身体、言论、思想、信仰）

阶级分工

主——统治技术（治术）军（政刑）

奴——物质生产技术（技术）供主人消费　非物质生产技术（艺术）助主人消遣

艺术的奴隶（历史的遗痕）

师旷　高渐离　李延年

淳于髡　　屈原

宋玉

东方朔　郭舍人

枚皋

司马迁

生理或心理的创伤逼出了艺术　苦泪灌溉的花朵“诗穷而后工”“苦闷的

象征”　金鱼　菊花　盆景——病态的美

更悲的悲剧

天才的奴隶　被赏识　受豢养　免劳动　被迫被诱出卖天下　做了统治的工具　粉饰罪恶　培植毒菌

(1) 技术不自由的劳动　(2) 艺术不自由的劳动

(3) 治术、自由的劳动　(4) 寄生者、自由的不劳动

(2)为(4)服务　消遣的工具　被阉割　消极的罪过(楚辞)自贱　为(3)服务　统治的工具　被强奸　积极的罪过(汉赋)捧人

(二) 自由人阶级(封建社会)

解放了的奴隶——虽被解放而仍是奴隶

自由的愿做奴隶　儒

自由的不愿做奴隶　“此地无银三百两”　道思想的类型

一、接舆——避世　隐居不仕　“不介入”怕惹是非　消极不为人

二、杨朱——不合作　不管你的是非　积极为我

你甭管我，我也不管你，你是你我是我，有你我之别仍即主奴之别

“目中无妓心中有妓”　不做奴隶的奴隶“此地无银三百两”

三 庄周——忘你我，非无你我，“目中有妓心中无妓”

观念世界　主观无你我(主奴)，无损于客观的你我(主奴)之存在。(庄周究非胡蝶)　前者逃人，此是逃己，都是逃亡的奴隶，仍然是奴隶“此地无银三百两”

四、东方朔——“避世金马门”，“大隐隐朝市”　只要主观是主，客观做了奴也无妨　“有银即无银”

五、司马承祯——“终南捷径”　以不做奴隶求得更高级的奴隶

六、等做过奴隶之后，再不做奴隶

七、我不是做奴隶，但是我可怜主人，没有人帮忙

至此道儒更无区别

萌芽于战国　消沉于秦汉　复兴于魏晋……直到今天

太上主人，帝国主义——英日美独占　解放

文艺的类型

三者四以前是真实的个人的解放，观念世界不顶事，必有所寄托，麻醉——(酒、自然、艺术)因其真，故开出艺术的花朵，魏晋最盛

阮籍　消极不为人

陶潜　积极为己似又超然

然阮有人，有反抗性，陶世人，无反抗性。故阮高于陶。阮只逃人，陶乃逃己，更为消极。

阮是无言的反抗，陶无反抗意识。其无言即等于无言的支持，默认、中立、超然，主观的放弃，即客观的放纵。自己自由，统治者亦自由对人民宰割，让你“听鸟说甚”，自然看不见他做甚，岂不自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可惜“斯人”是统治者，不是人民。）而且究竟是真心听鸟，还是对人装聋，“王顾左右而言他”，恐怕是实情，（“为艺术而艺术”的两面）艺术至上主义

以上除忠诚的奴隶外，便是各种不同形态的不忠诚的奴隶

怠工——接舆、杨朱

逃亡、开小差——庄周

装疯——东方朔

罢工要挟——司马承祯

只是没有一个真要做主人的奴隶

历史上奴隶变成主人的都是农民

刘邦　朱元璋（黄巢　李自成　张献忠　洪秀全）（奴隶的主人）

两个原因

无必要——分得余馂（面包渣、肉骨头）　安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自由主义者　被软化　被阉割　无能　自由是欺骗　被欺　自欺

（三）主人阶段，人的阶段（社会主义社会）

从自由人到主“人”，意识的转变甚难，因为似是而非

无必要　故无能

自由被剥夺　真性奴隶才要翻身（不是藏身）　不能安身才要翻身

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非自由人　而是“人”

三种战后观

（1）恢复战前　复原　奴隶瘾　次殖民地

（2）实现战前的理想　自由梦　废除不平等条约

（3）追求新理想　主人欲

（1）白打了　（2）只是消极的排除障碍，不合算　（3）积极的提高了欲望人民的价钱随着通货膨胀了

不悔国战　不怕内战　愈挨打价钱愈高

法西斯逼出了主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自由主义的文艺　白日梦　文艺是自由人的安眠药
梦虽美究非真
何况两面夹攻的被打断(右面要你做奴隶,左面要你做主人)

认清自己的出身　始能[认清]目前身份的本质
爬到中间　随时可被打退　踩在别人身上　自己立足不稳
眼睛向上看　目的地似近　实乃幻觉。不是挤入混进顶层　而是消灭它
如何消灭　向下看　退到人民行列,一同进攻
不是更多的自由——那是逃得更远,藏得更深的意思
　愈远愈深,势便愈孤,虽逃不动和无处藏身者更远

自己不逃　还要防别人逃　已逃的抓回来
不肯回来的　消灭他
学院派的近视
　知道过去的太多(书虫)　做了过去的奴隶　失了展望
　未来的能力
　不敢希望
　示以远景　吓得发抖　骂你傻子疯子×匪
　庸俗　无灵魂
　说知识太多还是客气
　过去是谁的过去——骑在人民脖子上的人的过去
　过去的奴隶——便是那些人的奴隶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自然不必提法西斯的德国和意大利了——其现行的政治与经济机构与战前不同了

一个民主主义者是一个勇敢的往前看的人而不是一个偷偷摸摸向后看的人

先生这次演讲是联大组织的“战后之中国”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此前,先后演讲的有赵迺抟的“战后的复员问题”、陈序经的“战后的中国与南洋”、冯友兰的“战后的中国文化问题”、吴泽霖的“战后的边疆问题”、曾昭抡的“战后的工业建设”、杨西孟的“战后的贫穷问题”、梅贻琦的“战后的大学教育与留学政策”、潘光旦的“战后社会改造的途径”、李书华的“战后的科学研究工作”。

在未刊手稿中,还有一份题作《战后的文化——官僚垄断与知识分子垄断》的

提纲，兹录如下：

不是回复到战前——复员非复原

亦非实现战前所理想的将来

战争改变了历史——加速了历史的演进——今天的理想超过战前的理想

古无前例的战争——对世界亦对中国

通过无例的战争得到无前例的认识——战争促进了文化——加速摧毁旧的，使新的涌现出来

发现了人民　农民战争　民主革命战争

人民不但赢得了胜利，扭转了历史，并且历史一向是人民创造的

由今天的功绩认识了过去的功绩

对今天的功绩应酬答

抗战所依赖过的建国还得依赖

“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过去的错误——“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人”　文化属于劳心者，为了劳心者，出自劳心者

新认识——文化归荣于人民　文化非知识分子的专制品　打破垄断局面

物质基础的创造者

上层文化的直接创造者——知识分子只负润色之责，注入毒素，腐化作用

解除人民痛苦增加生产加强物质基础使知识分子便于发展

解放人民使之直接参加创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先求普及以便提高参加者多自易发现天才

出钱出力出知识

同日　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联合筹备召开反对内战时事晚会，贴出海报，定于二十五日晚在云大至公堂开会，请先生和钱端升、伍启元、杨西孟、费孝通等教授演讲。

晚，昆明学生联合会的五位负责人来西仓坡宿舍，请先生出席二十五日的晚会。先生说自己不准备出席，并与吴晗建议请杨西孟为指导，请伍启元主讲。中共的朋友曾劝告先生与吴晗，为了扩大影响和个人安全，要适当减少公开出面，而在下面多作工作，要注意团结争取大多数，尽可能推动更多的人站出来讲话，这样对斗争更有利。先生完全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同晚，先生还对学联几位负责人谈到自

已经常从青年那儿得到活力。陈凝《闻一多传》：先生说“内战是每个老百姓都坚决反对的，我们谁也不要它！你们过去领导过我，今天我更要追随你们”。同学说：“那里，是我们在追随闻先生。”先生说：“不！我经常从你们[那]得到热情，得到活力，得到支持，甚至于得到我从前所隔绝的智识。我同你们来往后，才开始读鲁迅全集、海上述林、田间艾青和马耶可夫斯基的诗、联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文艺的问题呀！”（第 75 页）

先生没有想到，云南当局于二十四日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决定禁止学生集会，并于二十五日正式发布禁令布告，进而又逼迫云大校方以维修礼堂为名，拒绝出借会场。学生们义愤填膺，有人表示要对着干，先生得知后，极力主张改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以校内集会名义举行，并说如有困难，自己可以帮助疏通。（据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行时事讲演会。到会者六千余人。先生没有到会。

七时，时事晚会开始，即请钱端升演讲“中国政治之认识”，钱以国民党员身份极力强调目前成立联合政府之必要。演讲未毕，校外即闻枪声，军警包围联大。国民党员伍启元接着演讲，他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讲“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当他说到内战扩大中国必失去建立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机会、财政经济将趋于总崩溃时，墙外手枪声、机关枪声四起，子弹嗖嗖从人群头顶掠过，电线被割断。大会点起汽油灯继续进行。费孝通讲“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指出美国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其罪在美国财阀军阀，中美人民应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内战。当潘大逵讲“如何制止内战”前，机关枪、冲锋枪声齐作。潘仍登台强调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尤其指出撤退美苏军队是制止内战的主要条件。为了安全，大会提前结束，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中散会。但外校同学刚出校门又遭阻击，各处出口均被断绝，不得已又折回联大，至十时许，方自农场小路经云大后门入城。为抗议国民党破坏民主集会，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当晚议决联合罢课。

时事晚会进行时，先生正在探望大病初愈的罗伯特·白英。同坐的还有两位年轻人和一位语言学家。当时交谈的情形，白英在《中国日记》中记述：“过了一会儿，闻一多来了，他手中还拿着一小束鲜花，但烛光使那鲜花显得枯萎、凋零。……我们开始没完没了地谈论起政治来。R 讲了一个北京某家人的厨师的故事，那厨师每晚都出去一转，在日本人管辖的铁路线上松开几段铁轨。但第二天清晨，日本人总是又把它们修复了。闻一多说：‘要是中国人能把他们进行破坏的娴熟技巧用以重建家园，那该多好呀。但话又得说回来，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破坏者。世界上

恐怕再也找不到任何民族能像我们这样有力地把敌人弄得垂头丧气，一蹶不振。日本人善于机械操作，但在老于世故、足智多谋方面，和我们相比真可以说是望尘莫及。他们太年轻了，而我们却是饱经忧患的老人。'他对日本人怀有真挚的怜悯之情，把他们比作孩子；但同时，他又对一些日本学者深为景仰。'我希望他们能得到保护——他们中间很多人了解我们，只有他们这个民族才是唯一了解我们的民族。'我问他，这一来又该怎么解释他先前所讲的'日本人年轻，中国人年老'的说法呢？他微笑着答道：'我的孩子比我妻子更理解我。'那些关于贪污腐化和特务横行的卑劣行径的细节，听起来真令人毛骨耸然，但绝不可能全属虚构。'毫无疑问'，闻一多说，'人民应该有权调查政府官员的私人财产。我们了解共产党领导人的私人财产——可能是每人五美元吧。'他从来没有像这样义愤填膺，对教授中的几个为国民党捧场的人尤其感到深恶痛绝。他说，学者的责任便是永远超脱于政治之外。我反驳道：'沉默也许意味着对国家的不忠。'他回答说：'不，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合里，保持沉默就是声张正义，谴责邪恶。'后来他又说：'在现时的情况下，学者们应该超脱政治。当然人民可能会邀请他们在政府部门任职。但我们这些人既然显得那么无能和不称职，那么，他们在台上的至少应该保持清正廉洁。惭愧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没有立下半点功劳，实在不配享受这胜利的成果。我们既有封建思想的残余，也有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这一切都仍旧原封不动，毫无改变。'我又反驳道：'中国人完全有权享受这胜利的成果。''不错，'他答道，'但是没有任何政党，没有任何百万富翁，没有任何当官的有权享受这种胜利成果。农民，是的，农民是受之无愧的，但绝不是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他身体不好，有时候，他谈话时言词那么尖刻，情绪那么激动，真令人为他的健康担忧。但他谈话时从无轻蔑之意，他神态安详，有时低着头，从容地侃侃而谈。在烛光下，在这种时刻，他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雄辩动人。九时许，从学校方面传来一阵枪声，我说：'可能有人在放鞭炮吧。'虽然我敢断定那十有八九是枪声。闻一多说：'你来中国多久了？四年了。你难道分辨不出枪声吗？'接着又响起了几次劈啪声，这时我才完全确信这是枪声。可是这枪声使我感到纳闷，直到诗人说起还有成百个云南兵隐藏在山里时，我才解开了疑团。'他们住在乡下，不敢进城——因为一进城，便会立即被拉去枪毙。最糟糕的是，目前的新政府掌握云南兵的详细情况，还备有他们的照片。不过，要把他们斩尽杀绝，还得花费好几年时间呢。'闻一多说：'我们正在制造土匪，因为我们太缺乏恻隐之心了。'接着他便讲起一个可怕的故事，他曾目睹一百多名云南兵被捆着集体押到北门外处死的惨景。'我对云南地方政府毫无好感，这些人和别的官们一样贪污腐化，但我打心眼里关心这些孩子。枪毙他们是毫无理由的，

他们中有些人是少数民族，他们忠于龙云，因为龙云和他们是同族。但他们的这一片忠心并不是罪过啊。'临走时他又说：'有个学生告诉我，他无意中听到新来的警备司令霍揆彰[①]将军说，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碰到意外事故，那真是他所求之不得的。好吧，就让他们使出最卑劣的伎俩来吧！如果说，他们可以毫无理由地杀害青年，杀害那些对他们毫无危险的青年，仅仅因为青年是国家的财富和力量，那么他们就完全有理由杀害学者们，因为学者们早已被榨干了油水，精力也已经消耗殆尽了。'他说着不禁黯然神伤，但没有丝毫自负的神情。他们离开时，电灯还没有亮。我拿着点了三支蜡烛的烛台给他们照路，一直把他们送到街角。我还记得闻一多那长衫上的熠熠亮光。虽然周围有好几辆黄包车在招揽顾客，他却一一拒绝了。我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回到家中。"（《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97至300页）

十一月二十六日　黎明，先生得知同学罢课消息，想起华岗离昆前的话，不免为学生担心。

是日，昆明《中央日报》刊登消息《西郊匪警，黑夜枪声》，诬蔑昨日时事晚会，更激起公愤。次日，云南当局组织"反罢课委员会"，派出军警殴打街上宣传的学生。为反对暴行，昆明市学联成立"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并召开大会通过《告全国同胞书》。

十一月二十八日　民青执委会主任委员洪德铭找先生和吴晗商谈。时，民青已于六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洪为主任委员。联大民青分两个支部，第一支部由原执委会改组而成，第二支部由马千禾（马识途）、许寿谔（许师谦）等人组成。同时，中共在联大亦成立两个支部，以洪、马为书记，分别领导两个民青支部。洪介绍了宣传小组在街头屡遭特务暴徒殴打的情况及群众对当局极为不满的情绪，并说听说卢汉已回到昆明，因此只要坚持斗争，是可以争取有条件复课的。洪回忆先生和吴晗当晚的态度时说："他二人说，学校已定明日劝学生复课，并答应复课后和学生一道坚持提出各项要求，要民青立即做准备复课的动员、组织工作。"（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午九时，西南联大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召开本年度第二次教授会议。出席八十二人。主席叶企荪，先生以书记身份做记录。

会上叶企荪报告学生罢课情形及校务会议处理之经过，遂议决五项："一、同人站在教育立场，对本月二十五日晚军政当局行为，认为重大污辱，应依校务会议决议原则加强抗议（全体通过）。二、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劝令即日复课，由全体教

① 霍揆彰当时不是云南警备司令，任此职的是关麟征。

授出席。除代理常委叶企荪先生、教务长潘光旦先生外，另推代表三人发言(通过)。三、推举抗议书起草委员八人。抗议书内容由起草委员全权负责(通过)。四、推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三先生代表本会向学生训话。五、推冯友兰、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朱自清、赵凤喈、燕树棠、闻一多八先生为抗议书起草委员(冯友兰先生为召集人)。"(《三十四年度第二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先生参与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文云：

> 近代民主国家，无不以人民之自由为重，而集会言论之自由，尤为重要。无此自由者，应使有之。既有此自由，应保障之，充实之。此固社会进步之常理，经世建国之要道，而为政府与人民所应共晓者也。其在我国，集会言论之自由，载在约法，全国人民，同应享受，大学师生，自无例外，且断非地方军政当局所得擅加限制者。乃本月二十五日晚，方本大学学生，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英语专修学校学生，在本大学举行晚会之时，竟有当地驻军，在本大学四周，施放枪炮，断绝交通。际此抗战已告结束，举国方以进入宪政时期，而地方军政当局，竟有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兹经同人等于本日集会，全体一致决议，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铅印传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同日 下午三时，联大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学生复课。先生也自动站起来说了一番话。朱自清在日记中记述当时情形，说："上午开教授会，选出三名代表劝学生复课。下午三时学生在阅览室集合开会，会场内有许多墙报。开会发言时，学生们又将许多新的标语贴在教师的呼吁书前。讲话者都发出紧急呼吁。会议结束前，罢课委员会贴出通告，谓不久将提出答复。大部分教授离去，少数留下来。一个温姓学生以诗歌似的煽动性语言作了答复，××认为这是挑战，他以激昂的声调回答。听众反应愤怒，他们要继续罢课，我们失败了。一多上讲台，将局面安定一下，他承担了不少义务。"(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77页) 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亦云："学生下午三时开大会，多数教授皆往出席，墙上已贴满标语。教授讲演时用命令口吻，学生已有反对教授会之标语。罢课委员会通过一复信，由学生一人朗诵，用挑战口吻，措辞婉转而激昂，听众鼓掌，继续罢课。……(闻)到讲台前，欲缓和情势，致辞甚长。"[①](《闻朱年谱》，第163页) 王泽(王子光)在日记中亦云："要算

① 朱自清日记系此事于28日，似误。温功智告诉编者，"学生一人"指的就是自己，当时他代表学生发言。温功智还说，先生是站在饭桌上讲话的。先生殉难后，温功智为怀念先生，改名闻功。

张奚若教授说话最合理，钱端升教授太激动了，周炳琳教授有他一向的立场和背景，谈话态度未免有些不公正，被同学质问得无词以对，要不是闻一多教授出场讲几句话，真不知道周先生如何收拾那僵局。"（王泽《一二·一运动记》，昆明《时代评论》第9期，1945.12.28）

民青向中共南方局的汇报稿《"一二一"运功与"民青"》是这样记录这天的会中情形："当天下午，即由罢委会发表一封给教授的公开信，内容主要表明两点，在图书馆前面公布，并在教授来到会前向同学宣读。教授来后，由叶企荪、张奚若、周炳琳、钱端升诸人代表校方讲话，除对同学行动表同情及赞助外，进一步以种种理由，要求同学复课，并由周炳琳代表校方宣布第二天（卅日）上午九时正式复课。并说：同学因故未能复课听便，但不得干涉他人上课。当由罢委会代表答复称：自由未能获取，无法复课。周炳琳说以后保证开会决无同样事情发生。同学代表称：果尔则我等明天游行，如未出事，则立即复课，问周炳琳能否保证。周氏答称：彼所保证者，系指校内集会自由，非指校外而言。至是代表遂以'九一八'为例，而声明不能等候解决，必须以行动贯彻主张，不当奴隶。至此闻一多出来讲演（预定不许他说话），他认为复课是一策略问题，而复课并非是不干，同时表示罢课已获重大成果云云，并指责罢委会代表感情用事，想用感情煽动人，最幼稚亦最可羞愧。语毕，教授即行离开会场，同时罢委会正式宣布继续罢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资料室藏，转引自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34至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此件原题为《昆明学生惨案经过》，作者不详）

十一月三十日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对昆市大中学生罢课发表声明，完全同意学生提出的正当要求。这一转变说明先生已开始支持罢课，其中中共联大地下党总支部负责人袁永熙对先生做了及时的思想工作。

洪德铭亦回忆到，先生得知特务军警继续殴打学生，闯进校园撕毁壁报等事后，深感自己原来的想法太天真，对洪说在会上劝学生复课是错误的。（据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十二月一日　"一二·一"惨案发生。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暴徒数十百人身穿杂色军服，手持木棍扁担，袭击云大、联大，发生殴打同学事件五起。时，有军人扔出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在联大师范学院，暴徒扔出二枚手榴弹，炸死联大同学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又用刺刀刺死联大女生潘琰。是日受伤者有联大同学缪祥烈等二十五人。

面对这残暴的行径，先生愤怒地说：

在帝国主义国家里，镇压人民革命的行为，一般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这次

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暴行，连白色恐怖的资格也不够，简直是黑色恐怖，因为白色在字面的意义上讲还是纯洁的。一二·一的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事前有周密的布置，当时是集体的行为，打上大学门来，向徒手学生掷弹，向毫无抵抗的女生连戳数刀，终必置之死地。事后并造谣诬蔑学生，弄出一个莫须有的什么姜凯田凯来。鲁迅先生说发生三·一八惨案的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黑暗更凶残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前向徒手学生开枪，十二月一日的昆明是大队官兵用手榴弹和刺刀来进攻学校！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闻一多先生在一二·一惨案座谈会上的演词》，转引自李何林《黑色恐怖的昆明》，上海《民主》第45期，1946.8.24）

同日 晚，在第一线指导罢联工作的洪德铭[①]与先生、吴晗碰头。三人一见面就落了泪，洪德铭回忆："惨案当天晚上深夜，我把工作安排好后，到吴晗、闻一多处碰头，三人一见面就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地哽咽起来。接着在一起交换情况，商量工作。闻、吴先生说教授会的工作、民盟的配合、文化教育界的发动，由他二人负责，每天他二人向我介绍情况。民青、罢联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委托他二人办理。我按照党的指示，把我们如何扩大、坚持斗争的部署向他二人作了汇报，他二人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闻先生还说：'大事不先和民青商量，决不随便向外表态。'末了，闻先生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委员会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第二天（二日）罢联关于以上工作的安排、落实，都是按闻先生意见办理的。"（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同日，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宗黄卸代主席职。

十二月二日 上午九时，西南联大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召开本年度第三次教授会议。出席八十五人，主席叶企荪。先生以书记身份作记录。

会上，叶企荪报告"十一月二十九日召集学生训话经过"；报告"校务会议决议：分电教育部及蒋主席宋院长，请派政军大员来昆彻查处理，并推代表三人赴渝接洽"；报告"十二月一日暴徒袭击本校师范学院、工学院、新校舍及附中等处情形"。查良钊"报告学生死伤概况"，袁复礼"报告新校舍受袭击并本人受伤情形"，马大猷"报告工学院受袭击捣毁及本人被殴情形"，高崇熙"报告新校舍受袭击情形"，张清常"报告师范学院受袭击及学生被屠杀情形"。教授们对此次大屠杀莫不愤慨异

① 洪德铭当时是联大民青第一支部主任委员，并为第一、二支部联席会负责人。又，因罢联主委王瑞源是民青第一支部成员，故按中共指示，洪还负责分管罢联工作。同时，洪还是民青与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联络人。

常，会中一致通过五项决议："一、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三先生参加死难学生入殓仪式，代表本会同人致吊，并代表同人向受伤者致慰问。二、请主席向地方军政当局交涉，万一学生坚持抬棺游行，请准予进行。三、建议学校拨校园地以安葬本校死难二同学。四、接受助教二十八人建议书中关于法律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讨。法律委员会委员由周炳琳、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五先生及建议书具名之法律系助教二人充任之。"时，先生等曾建议罢教声援学生，但教授会议决："五、罢教问题延缓讨论。"(《三十四年度第三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下午三时，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四烈士入殓仪式。与遗体告别的各界人士川流不息，气氛悲壮。六时，联大全体同学为死难四烈士举行公祭，由联大代理常委叶企荪主祭，各校师生和各界群众六千余人参加，联大教授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致悼，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代表伊罗伦也参加了仪式。祭坛设图书馆前，坛后旗杆下半旗志哀，坛两边停放着四口棺材，还有四烈士遗像、祭文、挽歌等。先生带着悲愤的心情参加了入殓与公祭。

是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表《对"一二·一"惨案的抗议》。这是连夜起草、赶印的传单，类似这样的印刷品，先生常亲自派自己信任的学生送往印刷厂，或校对草样。范宁回忆："一二·一运动中，我曾两次去《扫荡报》印刷厂，校对两个文件。一次是和季镇淮同去，一次是和历史系一位同学同去。一个文件好像是'民盟云南省支部告昆明父老书'，一个是'一二·一事件真像'。这两次都是拿着闻先生写给某人的字条，通过这个人才进入排字房的。"(范宁给编者的信，1988.12)

晚，联大剧艺社在图书馆前演出王松声同学赶写的反内战小剧《凯旋》，刚考入西南联大不久的闻立鹤参加了演出，先生在台下坐在地上认真观看。王松声回忆说："《凯旋》的主题思想是"反内战"。这个戏，虽然在'一二·一'那几天写成，但素材却积累很久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曾将黄河决堤，企图阻止日军进攻，却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我到过黄泛区，亲眼看见种种苦难惨景，在我脑子里留有深刻印象。罢课后，大家认为要用戏剧形式宣传反对内战，我写了《凯旋》。初稿三四天就写出来了，演了一次，大家反映不错，修改第二稿时，正赶上'一二·一'。那天校门口特务在打人，攻校园，我放下笔，跑出去和大家一起把敌人打退，回来又继续写，心里充满了战斗激情。最后修改定稿是'一二·一'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在联大图书馆的一个小角落里，旁边隔着一块布幕，同学们满怀悲愤地在为死难烈士洗尸体，准备装殓；窗外，则有一些准备上街宣传的同学们在练习刚刚谱写出来的挽歌，'你们的枪口不能再对内啊，弟兄们站过

来啊'，歌声满含悲愤激情，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口气将它写完……第一场演出，闻一多先生也在台下坐在地上看。"（王云、余嘉华访问，余嘉华整理《关于联大剧艺社的一些情况》，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册，第28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十二月三日 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图书馆设四烈士灵堂。中午，先生第一批入灵堂奠祭。先生献上的挽联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写挽联时，立鹏和闻名都在身旁，立鹏为他牵着宣纸，先生边写边向孩子们解释它的含义。在灵堂里，先生对孩子们说：他们死的多么光荣！后来，先生曾与夫人再次前来灵堂祭吊。回家后对夫人说："一个人像这样死，才真是光荣啊！"

田汉《望着云南痛哭》中，说先生还为民主周刊社书写了敬献四烈士的挽联："昆明学生惨案爆发，定期公祭四烈士，民主周刊社由潘光旦先生拟了一首挽联，交闻先生挥毫，只记得下联是'民不畏死，如何勿思'，文既古雅，闻先生又写的是小篆。虽则旁边用小字注出原文，但观众谁去仔细考究？也可知道这位忠勇奋发的民主战士还随时流露学究作风。"（《人民英烈》，第274页）

十二月四日 上午九时，西南联大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召开本年度第四次教授会议。出席八十八人。主席叶企荪。先生以书记担任记录。

在二日教授会议上，先生等就主张罢教声援学生运动，但未能通过。这天会前，先生又作了许多说服，希望得到支持。最后表决，赞成停课者六十一票，赞成罢教者十九票。多数教授仍主张采取法律解决，不愿给当局施加更大压力，但对惨案仍表示愤怒，对同学仍十分同情。会上通过七项决议。为："一、法律委员会委员，除上次会议推定之周炳琳、钱端升、费青、赵凤喈、燕树棠五先生，及助教代表曹树经、闻鸿钧二先生外，再加请蔡枢衡、章剑、李士彤三先生及助教丁则良先生参加工作。二、委托校务会议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并以书面说明此项事件真相。三、电请三常委即日返昆主持校务[①]。四、委托法律委员会搜集有关本次事件之史料。五、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表示抗议。六、由校务会议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七、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及取消非法禁止集会之命令。"（《三十四年度第四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在教授会议上，先生处于少数，但仍泰然。回家后称赞张奚若，说：有些人讲话真让人生气，我想起来讲话，又要作记录，急死人，幸有张先生在会上舌战群儒，

① 时三常委梅贻琦赴北平视察清华园接收及修理情况，傅斯年、张伯苓均在重庆。

痛快淋漓。

朱自清日记记录了会上的情形，云："上午开教授会，第三天罢课进行了六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三项决定，其中第一项是校方宣布停课一周，以表示对死难者之哀悼，二是要学生向受辱的同事表示慰问，三是向负责部门提抗议。会议气氛相当紧张，而且在讨论第一项决议时即有分裂的兆头。然休息十五分钟后，局面的所好转。枚荪（即周炳琳）想出一折衷议案，由杨今甫（即杨振声）与汤锡予（即汤用彤）提出，结果相当不错。""在今天的会上，枚荪、奚若、一多与芝生（即冯友兰）的发言很明确。尤以芝生的讲话非常鲜明，这在平时是很少有的。"（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78至379页）

教授会议通过"停课七天"议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新华日报》社论《中国青年的光荣》，1945.12.9）

附：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主要负责人姚从吾十一日给陈雪屏（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会长）、郑天挺（西南联大总务长）的信。信中说到这几天的情况与教授会议情形："二十五日学生召开时事座谈会，请的人有端升、启元、西孟、一多、费孝通等，并推西孟为指导，启元为主讲。用意有二，其一在表现力量，冀在后方捣乱，牵制驻军北调，完成CP割据东北的阴谋。其二在改变同学的观点，企图继续把持学生会（自大公报质中共一文发表，整个形势实有转变之可能）。二十五日下午（郑）华炽曾参加警备司令部召开的联席会。他回来说，他们主张严厉干涉。我即去找西孟，西孟当晚即未出席。晚九时突闻枪声，华炽即说：'糟了！希望不在联大！'那知道真的就是在联大，次日即罢课了！当时同学与教授都很激愤。我们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二十六日，程陶、高乃欣、张锡芝等来了。决定采用分化方略，只将第二项要求，美国撤兵下加上'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九个字，以瞻全校的反应。分头活动，冀有收获。至二十七日上午，签名赞同者已有九百六十余人。下午开大会讨论，因为组织不严密，被捣乱者破坏了。但中立分子的势力，仍在增加。学校也决议用全体大会的名义，劝告大家上课。更不幸的在这个当儿，李宗黄、关麟征（热心有余，见识太差！）、邱清泉诸公又组织了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支团与党部等主持，以第五军为后盾），与学生撕打。到了十二月一日，竟打入学校（新校舍、师院、工学院、云大），投掷手榴弹，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从一日起，不管事的学生也起来了，助教、教员，联合附中的教员，组织了一个讲师助教联合会，也参加活动。六[四]个棺材停放在图书馆内，一方面进行募捐（刻已达七百余万元，龙夫人捐五十万），一方面铺张祭吊，一方面四出讲演，闹得人心惶惶，秩序紊乱。幸而教授会于四日全体决议，否决罢教，改为停

课七日，算是教授站在政府的方面，学生的气焰，才算稍稍好转了(四日自九时开会，到下午三时始散，出席八十二人，赞成停课者六十一票，赞成罢教者十九票。决议案原文：一、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置表示抗议。二、继续劝导学生上课。三、组织法律委员会，进行惩凶等控告)。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周炳琳)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的支持。端升表现的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这次风潮太离奇了。若能就此而止，保持了三校，则教授会的态度，实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教授会无形中分成两个系统。一是国民党左翼，以枚荪、西孟、自昭(贺麟)为代表。一是CP，以一多为代表(一多不是CP，但他站在最左的一边，公然反对政府，又说是可以指挥学生会)。吴辰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比方，他说：'人被打死了，我们再不行动就不是人！'但是同时就有人说，自己不牺牲，专让青年去牺牲，那才真的不是人呢！)同事中百分之八十，虽不言，辨别是非则至精。一多在开会前到处游说罢教，结果六十一对十九票，他应该恍然大悟了。"(北京大学档案室藏，转引自《一二·一运动》，第411至414页)

十二月五日 罢联开会议决提出罢课目的三类十一条。第一类：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请美政府撤退在华美军。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出版人身等自由。第二类：一、追究一二·一事件真相。二、立即取消十一月二十四日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三、保障同学的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要求中央社改正污蔑联大之荒谬言论(诬指教授学生为匪徒、为共产党)，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道歉。第三类：一、严惩凶手，撤办十二月一日惨案主使人关麟征、李宗黄。二、发给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及受伤同学之医药费。三、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罢联还决议须待第二类四条与第三类三条得到圆满答复，才能考虑复课问题。

先生对罢联的正当要求，是积极支持的，他的一切努力都为着这些条件的实现。

时，联大附中也举行了罢课，在附中学习的几个孩子参加了街头宣传和卖《罢委会通讯》的活动，先生很高兴。孩子们唱起刚刚学会的《布谷鸟》，"布谷声声，田里水漂漂，我们大伙儿从早忙到晚，弯背插秧苗，插秧苗……"这个时期，先生为支持学生的罢课斗争，也是从早忙到晚，晚上回来还要弯背刻图章，挣活命钱。先生听到孩子们唱歌，不无感慨地说："我是从早忙到晚，弯背刻图章，刻图章啊！"

十二月六日 先生等二百九十八人联名发表《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全文云：

夫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身体之自由，载在约法。抗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亦一再表示，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之法令。乃昆明党政军联席会议，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议决公布："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机关核准，一律应予禁止。"似此僭妄非法，剥夺人民身体自由，违反政府法令，已极不合。翌日，昆明四大学学生在联大开时事晚会，反对内战，武装军人即四面包围，鸣机关枪、开迫击炮，投手榴弹，大肆威胁。该会为顾及群众安全，乃提前散会。会后外校学生各自归返，复被军警阻挠，如临大敌。次日并由中央社宣称土匪作乱，混淆听闻，以此激起昆市全体学生公愤，大中学凡三十余校，纷纷罢课。同人等忝列教席，目睹集会言论之自由，横遭摧残，如坐视不语，则是悖理失义，何以为教。然学生之旷时废课，究非长策，故一面抗议非法干涉人民自由，一面劝告学生尽早复课。救敝补偏，维持教育之苦心，当已为各界人士所共鉴。不意十一月三十日，军政当局复唆使大批便衣队及特务人员闯入中法、联大、云大等校，破坏校具，且四出侦索，刀枪并用，伤害学生。次日（十二月一日），又唆使大批武装军人及便衣队涌至联大、云大等校，肆意捣毁，并冲破联大校门，在校舍中开枪掷弹，极尽屠杀之能事。计被杀死教员与学生四人，伤者数十。教授之被殴伤者尚有马大猷、钱钟韩及年届六十之袁复礼诸先生。并且拦路阻打救护人员，不准施救，时有受伤学生已抬至云大附属医院，复被暴徒追往，殴伤医院护士。同人等目击心伤，念是非之未彰，痛正义之不伸，凶暴违法之徒如不除，就国家言，将何以为国，何能建国，就同人等言，将何以为教，何忍为教。故决于即日起，一致罢教，至学生复课日止，以示抗议，并向政府呼吁三事：

一、严惩屠杀无辜教师与学生之党政军负责人；

二、以事实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三、取消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当局所颁布之非法禁令。

呜呼：邦国殄悴，主义云亡，爰作救危之呼，敬祈各界人士见义勇为，庶几教育不至摧残尽尽，建国能有一线希望，则国幸甚，人民幸甚！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昆华女中、昆华中学、昆华商校、天祥中学、南菁中学、黔灵中学、中山中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昆华农校、培文中学、南英中学、云南大学附中、长城中学、建设中学、文正中学、昆华女职、大同中学、市立女中、金江中学、天南中学、衡岳中学、龙渊中学、中法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工校等校教师。（转引自《一二·一运动》，第132至13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签名者：丁维铎、李禹、于舜卿、王鋆、王晓云、王通裕、王志诚、王云珍、王维

振、王兆裕、王文、王玉华、辛念荣、王景鹤、王庆周、王灼如、王康、王金钟、王瑞沅、王树勋、王万熔、文波、尹履江、石珏、田思源、田晓、申净文、申恩荣、朱伯欣、朱亚杰、朱文达、朱公行、朱光亚、朱德熙、任树群、向达、江枫、江爱良、江志云、吕万钟、吕德申、吴企如、吴静山、吴家华、吴彬、吴征镒、吴富恒、吴亦芳、余培忠、何纲、何炳昌、何兆武、何扬、何文达、何玉英、何立忠、何炳元、何昌杰、李爱山、李俊昌、李宗渠、李培玉、李治中、李永嘉、李如金、李懋仁、李达武、沈日叙、沈培江、杜华民、杜精南、巫宁慧、汪志华、汪明辉、林书诚、林书元、杜少侯、林文彪、林培真、易经香、易岫篆、易梦虹、易淑懿、尚钺、周维俊、周家炽、周新民、周宏光、孟庆哲、孟育新、胡笳、胡维青、胡耀宗、胡庆钧、胡小兰、范超瀛、范家骅、紫英、凌德洪、俞铭传、俞和权、段品三、段蕙仙、段佩瑛、姜震中、姜安、马天禄、马承祜、苗华殿、郎实珍、陈尔弼、陈穆、陈家骅、陈玉珍、陈尚文、陈钟远、陈庆局、陈情、陈美觉、陈光远、陈宣剑、陈霁秋、陈秉钧、陈文俊、郭志青、郭崇礼、郭双文、郭芸、唐登岷、唐嗣霖、唐振湘、唐诚光、唐鳌虞、孙本旺、孙阳谷、孙希炽、徐嘉预、孙永明、邬学茂、范淑谨、徐大德、徐利治、徐绍龄、殷焕先、殷汝棠、陆钦墀、袁克勤、袁冬贞、陆凡、郭一民、符开甲、冯宝麟、冯开文、冯式权、冯钟潜、资臣、张希恺、张宗凤、张侠成、张人鹤、张绍桢、张同珍、张培荃、张秉文、张行煜、张厉平、张之毅、张诚浩、张澜庆、张祖美、张璇卿、张尔嵎、张特之、张志光、张振名、梅树、梅淑玉、许少鸿、许杰、许健冰、许渊冲、章育中、章琏玉、高国泰、高其梅、高维汉、高鼎之、莫翰文、黄赏林、黄匡一、黄自强、黄少鹄、黄辉实、黄永泰、温功礼、彭同和、彭国焘、董继高、董申保、董维民、董行安、董苏因、傅乐淑、傅学义、解非、解德容、程力方、程志潜、程应镠、项粹安、万绍祖、万文琛、曾幕蠡、曾宪邦、楚图南、杨东明、杨秀珍、杨明、杨光社、杨德森、杨德新、杨时侃、杨鹏魁、杨秉祺、杨益、费家骅、费孝通、费青、闻一多、叶其汉、叶志青、叶崇基、郑若洋、郑宝芬、郑林生、郑智锦、廖山涛、刘春生、刘家怀、刘宗汉、刘俊融、刘治中、刘振鹤、刘宏周、刘德彰、熊士敏、熊中煜、蔡洁石、傅玉影、邓海油、刘笑娟、刘邦瑞、刘晋年、刘志远、刘审美、刘维芳、刘金钰、刘世泽、刘琳、萧学恺、萧成资、萧前瑛、萧访桂、潘大逵、潘光旦、潘清华、潘鉴元、卢福庠、龙文池、龙秀云、阎生文、阎昌麟、蒋湘漳、蒋仁、钱学熙、钱介福、谢光道、谢松涛、骆大辉、关山月、关德超、缪鸾和、薛宗柳、简思泽、戴今生、戴光纯、戴钟珩、穆广文、聂扬建、罗应荣、罗得光、谭沛祥、谭又新、严志达、严维华、顾文山、顾思良、衡岳。①

① 原件注云："国立西南联大讲师、教员、助教及附校教员联合会已议决自本日起罢教至学生复课日止，另有宣言发表，本宣言之署名者不包含该会会员。"

同日　为学孟同学题字："不自由，勿宁死。"（据家存此题字照片）

十二月九日　《人·兽·鬼》发表于昆明《时代评论》第六期。收《闻一多全集》时改作《兽·人·鬼》。

这是对某些在教授会议上瞻前顾后者的画像。文中说：

剑子手们这次杰作，我们不忍再描述了，其残酷的程度，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兽行，或超兽行。但既已认清了是兽行，似乎也就不必再用人类的道理和它费口舌了。甚至用人类的义愤和它生气，也是多余的。反正我们要记得，人兽是不两立的，而我们也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

胜利的道路自然是曲折的，不过有时也实在曲折得可笑。下面的寓言正代表着目前一部分人所走的道路。

村子附近发现了虎，孩子们凭着一股锐气，和虎搏斗了一场，结果遭牺牲了，于是成人们之间便发生了这样一串纷歧的议论：

——立即发动全村的人手去打虎。

——在打虎的方法没有布置周密时，劝孩子们暂勿离村，以免受害。

——已经劝阻过了，他们不听，死了活该。

——咱们自己赶紧别提打虎了，免得鼓励了孩子们去冒险。

——虎在深山中，你不惹它，它怎么会惹你？

——是呀！虎本无罪，祸是喊打虎的人闯的。

——虎是越打越凶的，谁愿意打谁打好了，反正我是不去的。

议论发展下去是没完的，而且有的离奇到不可想像。当然这里只限于人——善良的人的议论。至于那"为虎作伥"的鬼的想法，就不必去揣测了。但愿世上真没有鬼，然而我真担心，人既是这样的善良，万一有鬼，是多么容易受愚弄啊！

同日　民主周刊社印行林薮撰著的《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书名为先生题写，吴晗作序。

是日，昆明学生万余人在联大大草坪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大会主席报告开会意义，称一二·九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学生运动，一二·一是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会后公祭四烈士。

这天，延安青年亦召开纪念一二·九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说："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它"是中国从三·一八以来最残暴的大惨案"，"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

十二月十日 下午二时，西南联大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召开本年度第五次教授会议。出席八十六人。主席为四日晚方自重庆抵昆的北大校长傅斯年。先生以书记作记录。

时，一二·一惨案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五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昆明学生流血惨案》。七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开会，许德珩、黄炎培等请政府从速调查。蒋介石于七日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称"目前一切问题必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傅斯年初来昆明，曾表示要争取公正解决，实际上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要学生首先复课。教授会仍同情学生，未被傅左右。

会上，傅斯年先报告了"来昆后与各方接洽经过"。接着"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经过"。遂后决议六项："一、用本会名义函朱经农次长，请教育部转达政府：本会认为对于此次惨案应严惩凶犯及主使人，其中有负行政责任者，尤应先行撤职（此项函件请本会前次推定之赴渝三代表面致朱次长，并口头说明内中所谓凶犯及主使人特别指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三人）。二、本会应竭力求上列议案中之办法尽早实现。三、本会应即劝告学生复课（劝告方式由常委会酌定）。四、接受法律委员会所草拟之呈监察院文。五、其余各项呈文授权法律委员会全权办理。六、招待新闻记者之书面说明改用书面分送各报馆。"傅斯年在先生记录第一项中，将括号内文字尽勾去，并批语："括弧中语有人口头说过，并未付诸表决，故删，斯年。"复在该页天头批语："当时并有人说到五六人，亦有人说不必提姓名，故未表决。斯年又记。"（《三十四年度第五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同日，西南联大教授会发表《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的公开声明》。文中未理会傅斯年的批语，直书："查前云南省政府代主席兼党务主任委员李宗黄、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于惨案形成期内，实综揽当地军政大权，对于学生集会，恣意高压，应负激起罢课风潮之责任。"先生等人很重视这个声明，特将它刊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二十期。

同日 郭沫若、茅盾、巴金、胡风、叶圣陶、曹靖华、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陈白尘、吴祖光、梅林、宋云彬、邵荃麟、伍禾、葛琴等有请先生转罢委会一信，表示对昆明学生运动的支持。信云："昆明各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并转　全体教授、教师、同学　诸位代表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反内战，争民主，以致流血牺牲，同人等不胜感佩，特电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同人等愿竭诚共同努力，以期达到制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之目的。"（《郭沫若、茅盾等致闻一多信》，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此前，张君劢从国外归来途径昆明赴重庆，住在西仓坡宿舍潘光旦家中。罢联同学获悉，请先生介绍，交给张一批四烈士血衣照片及惨案实况照片，托转郭沫若等。郭沫若接到后，即与茅盾、巴金等来此函声援。

时，国民党当局迫于各界舆论，已于八日将关麟征"停职议处"，派霍揆彰接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十一日，云南省政府与警备司令部会衔公告，将四日军法审判之惨案"凶手"陈奇达、刘友治枪决。

是月上旬　《时代评论》第六期出版，为纪念四烈士专号。先生看到该期，高兴地赞扬编辑，说这期办得好。（据访问王康记录，1990.6.6）

十二月十四日　下午，梅贻琦约先生谈话，了解先生对惨案处理的意见。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五点约一多来谈一时许。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梅贻琦是十二日深夜方自北平赶回昆明。他十一日途经重庆时，曾与教育部长朱家骅会晤中了解到国民党有解散联大之准备，他当即表示："倘本周末不能安全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毋宁自请停办耳。"（同前）返昆后，梅即与许多教授交谈，并访卢汉和新任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又与傅斯年及奉命来昆处理惨案复课的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商谈，决定次日向学生训话，布告十七日复课。

十二月十五日　西南联大常委会召集学生代表谈话，梅贻琦说明学校规定十七日上课的原由，与到时不复课则有被解散三校的后果。傅斯年、冯友兰、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亦相继发言，认为此举关系学校前途，劝同学尽早复课。

这时，先生亦觉得无限期罢课对学生不利，同时感到教授们对解散三校颇为担忧。

同日　上海《民主》第十期在《昆明〈民主周刊〉社来信》中引杜澄之致郑振铎信，中云先生拒绝为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宗黄治印："前者于昆明风云一时之×主席差人请刻牙章，要求在二时取件。两小时刻成固不成问题，但此公于云南省府改组事中给人印象不佳，一多先生决以违十日取件定例而拒绝。此对某公殊出意外。"

十二月十六日　晚九时，访梅贻琦。梅在日记中记道："饭后九点，光旦偕一多来，一多告学生方面可有转机。甚喜，即走告孟真。"（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此事经过，中共联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袁永熙回忆说："十六日我们开会，大家认为长期罢课已经使一些人开始涣散，应当在适当时候结束罢课。于是决定修改复课条件，因为惩凶一条已由教授会提出诉讼，我们要求当局公布事件真相等，

即可停灵复课。会后我见到闻先生,他见面就问: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还说:罢课不要拖得太久,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又说: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我见闻先生这种态度,便将我们开会的情况告诉他。闻先生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好,这样好!我马上去告诉梅先生,他是我的老师。"(访问袁永熙记录,1988.4.29)

同日 中午十二时,马思聪作品演奏会在南屏大戏院举行,钢琴伴奏为其夫人王慕理。(《马思聪作品演奏会》广告,《云南日报》,1945.12.14) 马思聪是知名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曾受云南音乐研究会邀请,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十八两日,举办了为前方受伤将士征募寒衣之提琴独奏会。(《云南音乐研究会为前方受伤将士征募寒衣主办马思聪提琴独奏会》广告,《云南日报》,1939.11.15) 一九四四年夏,马思聪再次来到昆明,参加了十月十九、二十日文协昆明分会为响应文协总会"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举办的音乐大会。报载那次募捐音乐大会"动员了留昆的全体音乐界名手,共百余人,有马思聪的提琴独奏,马氏夫人王慕理的钢琴独奏,赵沨的独唱,美国声乐家佈莱克斯的独唱,李廷松的琵琶独奏,昆明联合合唱团(共五十个单位)的大合唱等等。阵容之整齐,节目之精彩丰富,在昆明确属空前。"(《文协分会将开音乐大会,为贫病作家募捐》,《云南日报》,1944.10.15)

这次演出,先生带夫人与立鹤、立雕一起聆听。闻立雕回忆:"父亲不善于吹拉弹唱,但是,好的音乐演奏他还是很乐意欣赏的。""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来到了昆明,昆明的文艺界热烈欢迎他,父亲很高兴,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这位小提琴家取得的成就,后来还带母亲与我和哥哥去听马思聪小提琴演奏。那时我虽然不懂演奏好在哪里,但受受熏陶总有好处。"(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181页)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一,阴雨。西南联大学生未能按照学校要求复课。梅贻琦看到此情,下午三时约先生等教授会代表谈话,表示辞职之意。四时,梅离去,教授们立即召开本年度第六次教授会议,出席者八十八人。周炳琳为主席,先生仍以书记为记录。

会上,多数教授受梅贻琦情绪影响,有些悲观者亦提出辞职,先生与傅斯年当面冲突起来。朱自清日记云:"下午起至晚九时开教授会,会上傅与闻发生口角。"(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81页) 时为《罢委会通讯》记者的张祖道,在《张奚若教授和教授辞职》中记录了张奚若十九日的回忆:"星期一那天,梅常委有一个茶话会,我本来不想去,可是梅常委才由北平回来,是老朋友,又是小老弟,应该接风。我跟梅同年,我九月生日,他腊月生日,所以我素来称他做小老弟。加上老友一多、端升二先生又来相劝,于是一同赴会。茶话会上,梅、傅二位常委要引咎辞职,居然

还有些教授主张随同辞职。我就说：'何必呢，我们应该尽力的挽留梅、傅二常委，凡是慰留常委的都请站起来。'于是大家不得不站起来挽留，二位常委也就打消辞意。有人提议将这次茶话会改为教授会议。我知道这些人是计划要学生限期复课，否则就全体辞职的事，我就竭力反对。可是有人又绕着弯子藉口讨论当前局势，在会上重提全体辞职的事。我为了顾全大局，平下一肚子的火气耐心的跟他们说好话，他们不听。我只好又站起来说：'刚才二位常委经全体教授挽留，打消了辞意，现在教授们又要辞职，当然啰，礼尚往来，恐怕得请二位常委出面慰留啰！'梅常委只好站起来说了几句，要大家另外想个办法妥善解决复课问题。话讲得很得体，大家不好意思再喊了。接着讨论复课，还是有不甘心的，提出星期四要复课，否则就全体辞职。又绕到辞职上了。当时有四十多人赞成，我和一多、端升等力争，后来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后来会议决定：只要星期四整天中有一个学生上课，就不辞职。"（未刊，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藏）

王康《闻一多传》也记录先生与傅斯年的这次冲突。先生说："学生愿意读书，教员愿意教书，这本是不成问题的事，现在复课，其实问题也很简单，只要答应学生们的要求，马上就可以上课。傅先生刚才说，只要复了课，一切都包在他身上，可是，学生们说，傅常委来了好些天，打了许多包票，连最低限度的惩凶、赔偿、道歉……的要求，都一件没实现，要是傅常委走了，怎么敢相信他的保证呢？""我们大家不妨想想，现在杀人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人身自由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中央社的造谣诬蔑没有洗清，死的人，血迹未干，伤的人，伤势未好，我们教授会提的抗议也无人理会，学府尊严荡然无存。今天，我们怎能忍心带着学生复课？八年来，我们和学生同甘共苦，今天，在学生遭到打击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怎忍心和学生造成对立？我们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都会觉得这种说法多么可笑。如果政府愿意答应学生的要求，何不早点答应，何必旷日持久，还要往返如此周折？"这时，傅斯年打断了先生的发言，说道："本来，我的话早已说完了，既然闻先生有了不同的意见，我只好再说几句。我从重庆来的时候，许多和联大有关的老朋友，都非常关心学校的前途，这样拖下去，学校或者解散，或者提前分家。这往目前来说，对大家都很不好。一多爱护学生的用心令人钦佩，但是，对于政治问题却不能感情用事。这几天据我了解，事情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今天正有人别有用心，利用学生的鲜血，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在座的同事也犯得着受人利用吗？蒋先生也很关心此事，……"先生听了这话，愤怒驳斥道："你一再提到蒋先生，难道要我们

一起三呼万岁吗？大批军警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杀人，傅先生不以为怪；学生被杀被打，竟称之为别有用心受人利用！按照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学生就是罪有应得，而官方杀人倒是理所当然了。谁无子女？谁无骨肉？非如此倒置，我希望在座的同事们，用良心来评判评判……”（第381至382页）

这次会议决议出三项：“一、本会代表于明日（十八日）上午九时召集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劝导学生复课，并听取其意见（上项代表以各系主任充任之）。二、明日下午三时，请各系分别召集本系全体学生，由本系全体教授出席与学生谈话。三、劝导学生时与说明本星期四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第三项先生原记录为：“本会认为本星期四应行复课”，后经周炳琳改定。（《三十四年度第六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这次会上，先生等还提出反提议，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办不到则教授全体辞职。但当日记录中未写入，后于二十二日第九次会议追认。

先生的激烈态度，令有些朋友不以为然。游国恩说：“闻一多是我的老朋友，彼此的交情很不错，搞旧学问也甚为投契。由于思想的转变，他经常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激烈言论，攻击反动政府，并坦白承认他是走苏联路线，冷酷地讥讽我们的中立态度。而我总是不开口，心中却大不以为然。因此，我们的友谊暗中有了很大的损伤，在形迹上我们逐渐疏远了，甚至连学问也不愿谈了。一二一惨案发生，学生坚持罢课，事态日益扩大，表面上我和其他教授一样，同情学生，捐款慰问，参加追悼会，但实际上却不同学生合作，更不赞成学生无限期罢课。傅斯年奉当时重庆伪教育部命令，到昆明来压制学潮，出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闻一多发言之后，傅斯年公然指摘他为‘布尔什维克’，有意扩大风潮，破坏高等教育，当时许多教授竟都鼓掌。当时我虽没有发言，但也鼓掌赞成。”（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人民日报》，1951.12.11）唐兰也说：“一二一惨案，我差不多是当场的，看见了满地的热血，我所忿恨的却只是特务的乱搞，并且对主持学运的人表示不满，以为‘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闻一多先生对我说：‘这是为的斗争呀！’”（唐兰《我的参加党训班》，《人民日报》，1949.8.29）

不过钱端升则能够理解先生。梅贻琦在二十八日日记中写道：“端升亦认一多十七日在会中之言词已有使校中当局不能忽视者……正之爱清华之切，言词间或不无过甚之词耳。”（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先生本来不问政治，从走出书斋到投身民主运动的转变时间，也很迅速，这与他对“政治”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在一次巡回演讲中，他说：“政治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一种态度，对于政治学教授，这是一种学科，对政治家，这是一种艺术，对于

我，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不懂政治科学，也不善于政治艺术，更不会以政治作为一种事业，一种职业，对于我，只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态度。”第二天，一位教政治学的教授对先生的说法提供了些修正意见。参加这次讲演工作的赵沨说：“我知道，他自己是很欣赏自己的话的，并且，很多朋友都说这样讲是很得体的解释。并且，我知道，他这种说法也确是他心底的真情的话，也许他不会接受那种课堂式的修正意见的。”但是，“第二天，他作第二次演讲的时候，他接受了那修正意见。”赵沨没有想到先生会这样，便问起这件事。先生严肃告诉他：“别人对政治学是专业，我应该接受别人的意见。”（赵沨《闻一多先生底回忆》，香港《光明报》新4号，1946.10.18）

十二月十八日　早上，先生向民青负责人表示，可以争取梅贻琦站在同情学生的一边。洪德铭回忆说：“晨，我去闻先生家，闻先生把昨天教授会的情况详细地告诉我（包括傅斯年的讲话，他的反驳，会上动态等）。他说从梅贻琦回昆后的沉默态度，昨天会上的表现（用宣布休会，实际上挡回了傅斯年要求讨论学生不复课、教授就辞职的提议），及从他和潘光旦访问梅的情况看，梅对学生是同情的，对当局是很不满的。但梅政治上保守，又怕这次学潮受共产党操纵，因此不敢公开表示支持学生，怕表示支持了，学生可能会闹得更加厉害。这是梅的顾虑所在，如果把这顾虑打消了，是可以争取站在学生一边说公道话的。闻先生问我修改复课条件的提案有无把握在代表大会上通过。我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他说，如果修改复课条件的决议有把握通过，他先向梅贻琦交个底，说清这次运动的来龙去脉，相信可以打消梅的顾虑，把梅争取到同情学生一边来。我把闻先生这个意见向党组织汇报后，党组织同意民青正式委托闻先生个别访问梅贻琦，据说作了长达几小时的深谈。”（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为了劝说学生复课，学校安排上午各系主任与学生代表谈话，下午各系教授分别会见各系学生。朱自清日记云：“在我系会见时，一多态度妙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81页）

十二月十九日　下午三时，西南联大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召开本年度第七次教授会议。出席九十二人，梅贻琦为主席。先生以书记作记录。

这次会议，是联大学生自治会决定将复课条件修改消息通报先生后，由先生草拟开会提议，由潘光旦、张印堂、吴晗、萧涤非、沈履、冯友兰、周先庚、傅恩龄、徐毓楠、闻家驷、李继侗、陈友松、陈桢、江泽涵、周作仁、钱端升、王维诚等二十余教授签名而召开的。但会上并未接到学生自治会的正式报告，无法具体了解学生的态度，故仅做出两项决议：“一、由本会公告全体学生，劝告星期四晨一律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勿对上课同学作任何拦阻之举动。在文告内并说明教授会决吁

请政府对此次事变之行政首脑人员从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由本会推代表三人与卢主席、霍总司令洽商，由现地方军政当局发表声明，对合法之自由决予尊重。二、推周炳琳、冯友兰、赵迺抟三先生草拟上项文告，并代表本会与卢主席、霍总司令接洽。"(《三十四年度第七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同日，西南联大教授会发表《告同学书》，表示决心追究肇事责任者，以满足学生惩凶之复课要求。

这天，罗伯特·白英在《中国日记》中记述了先生的一段事："闻一多悲痛不已，他谈论到学生们时显得那么谦逊，使人几乎忘了他本人也是那么可敬。他倚着手杖，站在荒芜的花园里，周围是一片凋零的牵牛花。他谈论起他以前所认识的学生：'他们依然不失为宇宙间最复杂的生灵。我记得二十多年前的学生，人人都身穿绸长衫，手摇扇子，男孩子们也带着玉镯。那时候，他们玩起足球来那么文质彬彬，就像现在电影里所摄的慢镜头动作一样。而现在的学生却长得又高大又壮实，他们已然和过去决裂，但又找不到归宿。由于他们至今还没有摆脱孔夫子教谕的浸染，因此他们还在飘摇不定之中。'这时，正好有一对男女青年手挽手从花园经过，'所幸的是在中国没有谁四代以前的祖先不是农民的，而农民要比你所想像的强有力得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327页)

晚，先生和吴晗、张奚若与同学们一起商量复课事。张祖道《张奚若教授与教授辞职》(未刊)中说，是日"去西仓坡教职员宿舍十三号吴晗教授家，张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好几位同学，把小小房间挤得满满的，正在商量复课的事"。郭良夫在《因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也记载了此事，文中写到："一九四五年'一二一'学生运动为了争民主、反内战，抗议反动派的镇压，罢课完全是正确的。到后来由于过"左"情绪的干扰，有一些人要无限期罢课，这就对革命不利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复课以利继续斗争。但是有些受了过'左'情绪影响的、愤怒的同学，'复课'的话是听不进去的。为了商议劝导同学复说的事，一天晚上，学生会的、罢课委员会的负责同学都挤到吴晗先生那间小小的宿舍来了，先生也来了。大家感到那些同学一时难以说服。先生满脸通红，激动地说：'我宁愿叫他们打死，我也要去劝说他们复课。'"(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学林漫录》第11集，第8页)

与此同时，联大学生自治会商讨修改复课条件，将七条改为五条，主要为：惩凶、取消非法禁令、保障人身自由、《中央日报》更正诬蔑言论、政府负担一切损失费用。次日，罢联开会通过。

十二月二十日　下午三时，西南联大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召开本年度第八次教授会议。出席九十六人。梅贻琦为主席。先生仍以书记作记录。会上，学生自治会送来修改后的复课条件，梅贻琦认为枝节太多，结果仅讨论了迁校复员等问题。（据《三十四年度第八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约是这天或早一两天的晚上，先生以学生身份找梅贻琦长谈。先生认为"这次学潮完全是当局压出来的，是学生的公意公情，在学潮中起作用的是学生中一个叫民青的团体，这个团体的人自己都很熟悉，是一批有作为的学生。现在准备修改复课条件，不再坚持先惩凶手后复课的要求，只要联大云大校方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谴责当局，保证和学生一道要求惩凶手，并力争其他条件实现，学生就可以复课"。（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下午三时，西南联大召开本学年第九次教授会议。梅贻琦为主席。先生未出席，以刘崇鋐代作记录。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机，由于会上收到联大学生自治会对于再次修改复课条件的函件，会中议决第一项即："在十二月十七日会议中，同人等曾有了解，请求政府将李宗黄先予以撤职处分，如不能办到撤职，则教授全体辞职。兹补充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之最大限度'。"（《三十四年度第九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室藏）这正是对先生等于十七日教授会议上提议的肯定，同时也表明教授会再次对当局的不满，洪德铭等民青负责人一致认为"先生确在这里立了大功"。（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十二月二十三日　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召开盟员大会。会上选举先生（50票）与楚图南（95票）、冯素陶（75票）、费孝通（68票）、杜迈之（60票）、潘光旦（59票）、王振华（56票）、杨维俊（47票）、赵沨（44票）、杨一波（22票，外县代表执委）、刘宝晅（14票，外县代表执委）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潘大逵（34票）、杨明（33票）、姜震中（32票）、夏康农（29票）、陆钦墀（28票）为候补执行委员。此外，被提名者还有李德家（20票）、杨宁（15票）、尚钺（11票）、张兆麟（10票）。这次选举非常正规，唱票、记票及监票人为李何林、姜震中、杨宁、陈□鹏、杜迈之、周新民、邓贯一（李何林代）。（据这次会议的选举记录原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藏）旋，举楚图南为主任委员，先生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冯素陶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上三人为常务委员），潘光旦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杜迈之为秘书主任委员（后由赵沨接替），费孝通为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振华为妇女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增设文化工作委员会，原由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未久先生推李何林任之。此次改选后，吴晗出任民主周刊社社长，未久由先生担任。

这次会上，还制定了民盟云南省支部《暂行组织简章》及《组织部工作计划》，规

定组织发展的具体要求,改变只在大学教师和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中发展盟员的做法,决定在大学生和中、小学教师、中下层职员中吸收盟员。

十二月二十六日 罢联宣布自次日起停灵复课。一二·一运动告一段落。时,昆明《中央日报》刊登梅贻琦与云大校长熊庆来对记者谈话,指出惨案真相,保证学校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犯,又李宗黄亦于二十三日调离昆明去重庆,实际上是政府变相满足学生要求撤其职务的复课条件。

先生在这次运动中,得到锻炼。他对旧的教育制度认识更加深刻,对青年的成熟感到欣慰。他曾对一位学生谈起感想,说:"政治越腐败,学生就越进步。"又说:"你总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你们怎么热情,怎么勇敢,你觉得他们没有劲儿,不敢打阵地战,你不知道那时你们是在不懂摧残学生的老实的军阀的统治下?现在的情形和那时是太不相同了。摧残学生的办法是新奇而彻底的,现在的学生已经给他们训练得知道如何斗争,如何争取广大的同情了。他们也有的是热,但他们懂得怎样把它变成力量;他们也不比你们不勇敢,暴虎凭河,死而不悔的人,固然值得佩服,但勇敢而更能讲求效果是更可贵的!"(流金《追念闻一多先生》,《人世间》第1卷第5期,1946.7.20)

同时,先生也看到了青年中不足的一面。王一《哭闻一多先生》说:"十二月底,为了闻先生曾劝同学复课,许多一向崇拜他的人不满意,甚至骂他了。一个冬天的上午,又看到了他,闻太太病在床上,他在刻图章,弯着腰,摘了眼镜。他叹口气,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现在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所怕的不仅是右——还有过左,年青人都性急,恨不得一下子新民主中国就来到——其实,我们知识分子——连我在内——都是如此的。过去我对所有的青年人都相信,现在才知道青年里什么样人都有——不过青年人还是可爱的。错误不要紧,我们谁也没有政治斗争经验,青年是可爱的,可爱的。不幸作了特务的青年,我们也要尽可能的争取他们。'"(《新华日报》,1946.7.25)

先生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洪德铭回忆说:"闻先生是教授会书记,每次会后,他都向我介绍情况,分析动态,提出我们应如何有目的地做教授工作的意见。教授会有几次邀请学生自治会代表参加,闻先生总是告诉我们如何准备发言,要派那几位做代表比较适宜。闻先生在这方面的关心和工作,对我们了解校情、争取校方和教授的同情支持,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罢课期间,先生多次到罢课委员会看望同学。萧刚《学习闻一多先生》:"闻先生和吴晗等教授到联大罢课委员会各工作部门参观,进门时,总是蹑手蹑足地,深

怕扰乱了同学们的工作。看见同学们严肃地在桌上或写,或抄,或画,或装订,或盖章,闻先生看得感动了,只要工作的同学一抬头看他,不管他认识不认识,他总是像一个小学生,像一个同志般地先给同学打招呼。这种热情,这种亲切是令人永志不忘的。"(《新华日报》,1946.7.21)

一次,安娥来看望先生,先生希望田汉放下戏剧工作,投身民主斗争。安娥《哭忆闻一多师》:"闻师对于这次的惨案痛愤得不得了,他用他课堂上讲书的语调说:'这比三一八北洋军阀还野蛮!那个时候还是学生找得去呀!现在竟打到学校里来了!这个世界非改造不可!……打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真是再蠢没有了!血是白流的吗?非向他们要代价不行!''听说联大有解散的消息,有几个教授也要辞掉?''放枪还有自由,解散学校自然也有自由。假若学校里可以随便进来杀人,这个教育还办他干吗?要解雇教授随便他解雇好了。假若这个惨案不得到合理解决,不处分杀人犯,我这个教授根本也就没脸当!'闻师似许多次就要同我谈一件问题似的,今天他很兴奋,于是他开口了。'……我觉得田先生和我们联系还不太够,他可不可以把他一部分戏剧工作暂时放弃,先全力把政治工作上轨道不好吗?政治上了轨道,戏剧不是更容易作吗?''是的,不过戏剧运动也是重要的工作。''我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有更重要的……当然,我也是向你领教,想那个时候当你们已经在动了时候,我还是"死水"。'闻师笑了。一种自惭的笑。'青年给我很大的鼓励。'"(《月刊》第2卷第2号,1946.9)

一二·一运动期间,先生全家都参加了进来。闻立雕在《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中说:"在父亲的率领下,我们全家几乎都投入了战斗。家里除了母亲、保姆和上小学的小妹外,父子五个都战斗在第一线。大哥是联大的学生,一二·一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勇敢地守卫新校舍大门,爬到墙头上向暴徒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小腿被一颗石块打中,回家时一瘸一拐的,母亲看了好不心疼,父亲则连连称赞他勇敢。后来他参加了宣传队,在街头剧《凯旋》中饰演日本军官冈田大佐,戏虽不多,但鬼子的那副凶狠残暴,可憎可恶劲,演得惟妙惟肖。我既当过宣传队员,上街唱过歌,发表过街头演说,也当过附中罢委会联络员。特务、暴徒攻打联大新校舍和附中的那天,我和阿庄(庄任秋)恰好受派去某中学传达'罢联'关于暂停街头宣传,主要在校内活动的决定。我们回到附中,看到学校被袭击的惨状才知道敌人在那一天制造了血腥的暴行。随后我们两人几乎天天随宣传队上街作街头宣传。弟弟和大妹妹则在联大同学带领下满街跑着卖《罢委会通讯》,出去时一书包报纸,回来时往桌子上一倒就数钱。总之,父子几个都在战斗,一家人常常忙得饭都吃不到一起。母亲虽然没在第一线,但她的心时时刻刻牵挂着运动,牵挂着在火热的斗

争中的广大同学和大大小小的亲人。父亲去灵堂祭奠,她也一同去,在门口捐款台前,她也积极捐了款。因此,她虽算不上战斗在一线的成员,但也是与运动分不开的一员。"(第 258 至 259 页)

是月下旬 收到侄儿闻立志(黎智)自重庆来信,十分高兴,认为他走上革命的路完全正确。

闻立志是先生二哥闻家骢之子,一九三七年在恩施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恩施地下党被破坏,其转移至万县。一九四一年到重庆,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工作。旋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绥德地委,曾任吴堡县委宣传部长。一九四五年上半年调回延安,准备第二批南下,后因抗战胜利未成行,遂随周恩来到重庆,公开名义为《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实际仍做青年组工作。十二月四日,昆明学联派程法、王汉斌赴渝汇报一二·一惨案,闻立志便写了封信托他们转交先生。信中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告诉家人情况,向先生问候。先生接信后,立即回信告诉自己地址,说:"我身在南方,心在北方。"并表示有想去解放区看看的愿望。闻立志遂向青年组负责人刘光做了汇报,刘光认为先生留在昆明作用更大。(据访问黎智记录,1988.11.24)

关于此事,闻立志回忆中还补充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从延安又回到重庆南方局,王汉斌从昆明来南方局汇报工作,我托王汉斌带了封信给他。因为我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到延安去以后,家里的情况也不知道,只知道闻一多当时在西南联大,我向他询问家中情况。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谈了一些家事,其中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身在南方,心向北方。'当时我的理解是他可能想到解放区去。另外一个材料可以证明就是闻一多有封信给五伯闻家骏,也就是他的哥哥,我的叔父。五伯的儿子和我一起到延安了,叫闻立训。闻一多信中说,训、志二侄这条道路是对的,我从学理上也作了研究,而且从外国记者的报道分析,我认为他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封信后半部分批评了我的另一个哥哥,他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做学问,而是通过我们家另一个在南京的叔父把他介绍到国民党的一个机关去工作,他就说这个侄儿是被那个叔父给引坏了的。从他的这封信来看,他是有比较的,肯定我们的道路,批评那条道路。"(《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闻一多〉电视连续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谈话》,《黎智纪念集》,第 517 页)

是月 《新诗的前途》发表于《火之源》第五、六期合刊。

是年冬 动员原昆华中学学生董康(方辛)加入民盟。并详细介绍了民盟的政纲。旋,董康(方辛)由先生和冯素陶介绍正式入盟。(据方辛《纪念闻一多老师》,《云南法专》第 16 期,1985.9.10)

是年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为便于在缅甸开展民盟工作，决定筹办“南侨文化供应社”。先生是发起人之一，并介绍原昆华中学董康同学参加这一工作。

当时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组织委员会主任的冯素陶，在昆明具体负责筹备工作，他回忆到：“当时我们商量了一个开展海外工作的方案，目标是缅甸和越南。缅、越华侨中云南人不少，开展工作有比较有利的条件，决定先成立缅甸工作委员会，由在云南做教育工作的缅甸华侨萧岗同志为缅甸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在昆明参加民盟缅甸工作委员会的约有五六人，一多介绍董康随萧岗一道赴缅工作。”（冯素陶给编者的信，1988.2.28）

萧岗亦回忆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几位归国华侨的盟员就着手准备重返缅甸。当时民盟总部受命我们以‘民盟工委’的名义在缅甸成立组织，开展工作。为了建立一个立足点，计划在缅甸仰光创办‘南侨文化供应社’。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吴晗、冯素陶、李文宜、潘光旦、周新民等先生都出面作为发起人，当时有印件。昆明新华书店也给予大力支持。我们一行数人有陈白澄和他的夫人陈学英、杜正平、张学林、董康、陈树华、赵海、王鹏年和我。我们于一九四六年春作为难民遣送离开昆明，在我们动身的前几天，闻一多、楚图南、冯素陶先生在民盟机关所在地府甬道十四号接见我们，记得赵沨也在座。闻一多先生把董康介绍给我。在这次会上，闻先生和其他各位先生向我们谈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并指出昆明的政治环境在日益恶化，盟员要尽量疏散到各地去坚持工作。在海外建立民盟组织很重要，以便广泛团结海外侨胞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萧岗给编者的信，1988.3.14）

约是年　有《鲁家思想与独裁主义》一文，今存手稿。还有篇未完成的《孔子与独裁主义》，文中对孔子思想的剖析反映了先生对封建文化的认识，其文云：

> 鲁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邦国，宗周的文物制度在这里保存得特别多，这里封建文化的水准特别高，所以人们对于封建传统的保守性也特别大。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又生在鲁国，这便决定了他在精神上成为封建灵魂——文武周公的替身，在思想上成为封建文化最顽强的拥护者。但他又只是一个“师儒”——民间的教书匠，而儒本是以替贵族们治丧相礼为生的一种“僧侣”之流，是封建社会中从事精神劳役的一种寄生阶级，因此，他对于支持当时那瓦解中的封建秩序，除了劝人加强个人（尤其指统治阶级）的道德修养外，并无任何实际的有效办法。根本封建道德是一种强权的道德，强权道德就不成其为道德，如果统治者无力，这种道德是吓不倒人的纸老虎，所以孔子和整个儒家在当时并不能阻止封建的崩溃。如果统治者有力，再加上这道德的精神力量，那就能使他“如虎傅翼”了，所以在后世孔子以“万世师表”的资格，实在维护了

二千年君主专制的极权政治。在政治上，一如经济上不能使无者变为有，却使有者变为更有，这势利眼的作风，这不道德的道德，是孔子思想的特质，也是封建文化的特质。

自己承认“述而不作”的孔子，真没有什么独创的思想，他的思想不是因袭以往，便是接受当时的。但在因袭与接受中，尤其在后者，他不能无所抉择。（这就算是他的“以述为作”罢！）他是封建社会中从事精神劳役的一种寄生阶级，因此他必然，也只能在这阶级的立场上来因袭和接受。现在看他因袭了些什么，接受了些什么。

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当从宗法制度来认识，而宗法制度实在是一种家族制度，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国与家不能分离，因而君臣的关系实即父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是生理的，他们的名分是先天的，命定的，所以古称父子为“天属”。

一九四六年　四十八岁

一月五日，国共两党代表团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七日成立由马歇尔、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监督国共停战。

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二月十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校场口惨案”。

五月五日，重庆国民政府迁都南京。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民众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国民党制造“下关惨案”。

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

一月二日　与罗伯特·白英在翠湖公园相遇。白英在《中国日记》中写道：“我在翠湖公园里遇见了闻一多，他正神色肃然地漫步于花草丛中。碧绿的湖里游着金鱼，周围有几处亭台楼阁，还有一些供饮茶歇凉用的竹棚，苍鹰在头顶盘旋。闻一多主办的报纸已被迫停刊，何时复刊又遥遥无期。如果他违反禁令，继续出版这份报纸，那么报纸一问世他就会立即被拘禁起来①。他终日奔波于几家印刷厂之间，身后一直有人跟踪。他说：‘世界上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知道自己被别人盯梢，因为它会使你产生一种极为有害的错觉，误认为自己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我们对此是受之有愧的，就连学生也受之有愧。他们现在还在战斗，但不知为什么，学生们居然想起要采用中国古老的方式来进行斗争——即用戏剧性的方式来斗争，正像人们为无望的事业孤注一掷那样。但实际上，他们的事业并没有失败。他们说，将不惜一切代价，抬着烈士的灵柩走遍全城。成千上万的孩子都赞同这种做法。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中能有那怕是一个好人，或者是少一个坏蛋，情况就会好得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331页）

一月三日　下午三时，赴清华大学办事处，出席清华大学一九四五年度第三次

① 白英所说到政府当局查禁昆明民主报刊之事，发生在不久以后。

教授会议。会上校长梅贻琦报告北平清华园接收保管情形、校园内部情形、迁移与复校问题等。(据《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这些都是先生十分关心的事情。

一月十日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开幕。中国民主同盟新闻处公布民盟代表团顾问名单,先生和潘光旦、陶行知、侯外庐、董谓川、杨卫玉六人为教育文化组顾问。但先生未能赴渝。

联大教授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代表参加政协会议,他同意与会,先生也做了些工作。张曾对记者说:"罗隆基先生在准备提我名时,曾先征求我的意见,起初我坚决拒绝,后来,经过闻一多先生再三劝说,才勉强答应了。"(《张奚若》,《燕京新闻》第13卷第6期,1946.12.13)

一月十三日 与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致马歇尔特使书》,刊于昆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三期。未入集。

上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二十日,马歇尔以特使身份到中国"调停中国内部纠纷"。但二十二日美海军第七舰队便开始运送国民党杜聿明部抵葫芦岛,傅作义部也于二十五日沿平绥路东犯。是年一月七日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热河,内战危机迫在眉睫。《致马歇尔特使书》表示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对华政策声明,呼吁美国帮助制止内战,提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文章系费孝通执笔,全文如下:

马歇尔将军麾下:

十二月十□日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的声明传到中国,把我们多日忧虑的心情一扫而清。民主的美国又一度坚强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对它的信任。当这声明传到之前,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感觉到惶惑,因为自从美军协助我们受降以来,许多措置多少表现了有加强中国内部分裂的嫌疑。我们并不愿贸然怀疑美国有着传统保证的对华友谊,但是中国内战的爆发增加了推行美国支持中国团结政策的困难。假如因技术上的过失而引起中国人民对美国有所误会,那才是一件极不幸的事件。正在这个紧张的关口,杜鲁门总统能发表这一个有历史性的文告,真是令我们不能不衷心感激。接着又接到你被任为特使,迅即来华执行上述的声明的消息,更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希望。你过去的历史已保证你完成这任务的把握,那里还有一个比曾在中国服务过,曾亲眼看见过中国人民耐苦忠厚的性格以及他们过去所受种种黑暗势力所压迫,又曾两次为世界的和平效命疆场运筹帷幄的人,更能担任这相当复杂和有关四万万生灵的严重任务?

我们在欢迎你的时候，心里又充满着惭愧。中国人民怎么不知道引起内战的责任是全部应当由我们自己担负的？又怎么不知道我们的内战会威胁世界和平？我们不但已尽力向武装冲突的双方呼吁和平，停止内战；而且为此，我们相信你也已知道，我们曾牺牲了生命，受到了生命的威胁。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这些努力，在现有的局面中，并没有发生效力。当然，我们并不气馁，我们还是相信一个违反人民意志的内战是决不能持久的。我们依旧要为这目的而继续努力。美国人民在这时能作此严正的声明，实在是给我们为和平为民主而工作的中国人民一个有决定性的援助。我们惭愧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家务整理明白，有劳我们的好友的斡旋；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你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

我们充分了解而且同意你的任务是贤明和正确的。美国人民有权利要求和促进太平洋东岸的同盟邻国实现民主。这一次世界大战的目标就在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人类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世界上任何反民主的国家必然会引起战祸。在现代交通所已缩小了的地球上，一切违反民主的行动，不论发生在任何角里，都会牵引起大规模的毁灭和残杀。为了人类共同的幸福，美国以及其他同盟国绝没有坐视中国内战的理由。这种关切以及有效的制止办法和以往国际干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干涉别国内政以达到本身个别的利益是帝国主义的行为；但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人类共同的幸福，而发生的关切和行为是今后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也是正当的政策。关于这一层，我们可以向你保证，美国绝不会因此引起中国人民的误会，因为我们相信，像其他同盟国一般的相信，你将执行的政策并不是以美国个别利益为出发点的。

惭愧的心理使我们自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民并不能有效的制止这次没有意义的内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民并不能迅速的建设民主的中国？我们相信一定有很多的美国朋友会发生类似的问题，甚而对于中国人民实现民主的热忱和能力发生怀疑。因之，我们想先把这些问题作一答复。在此我们愿意说明中国民主运动所遭遇的困难，这些困难是我们美国朋友所没有机会经验到的。

我们相信你和所有的美国人民一定同意说自由是人性基本的要求。从这信念上，我们才能想像世界的和平秩序，也才能想像人类的光明前途。但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却曾要我们付出极重的代价，这说明了人间的确存在着许多反自由势力。中国人民决不是低估了自由的价值，而是因为反自由的势力在中

国，比之在美国，雄厚得多。让我们在这里对这势力作一分析。

一切的现状有它历史的造因，中国目前的混乱并非例外。在纪元前一世纪的时代，中国已在秦始皇的手上用武力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一个专制君主用了一个有效的官僚机构统治着东亚一片大陆上从事于小农经济的广大人民。二十个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尽管易朝换代，但是极权统治的形式和小农经营的经济基础一直维持着。现代法西斯蒂国家的特色特务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前例。但是为了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君主权力所能直接控制的不过限于官僚机构和育养官僚的士大夫阶级里。一般小农则被分散在小社区里，只享受着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君主的开明或昏庸决定了人民的幸福和灾难。生活的水准降到了不能维持的程度时，农民的暴动给于野心家利用登极的机会，回复到历史的循环里。这传统解除了人民的广大组织，限制了他们争取自由的力量。但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加上普遍于乡村里的手工业给了一般人民小康的生活，养成了朴实耐苦的性格。他们更靠了家族制度和邻里组织得到相当的生活保障。开明的君主，由于交通的阻塞，和传统习惯的限制也很少干涉到小农的基本生活权利。这样维持了二千年变迁不很多的历史。

海禁开放，中国和西洋文化的接触，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一方面现代的交通和武力加强了统治者的控制力量和范围；一方面因传统手工业遇到现代工业的打击而崩溃的结果，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日趋穷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因素造下了中国近三十年来反自由和争自由的冲突。

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传统政治的本色。袁世凯用了总统的名义承袭了满清的统治。他开始训练现代化的军队为他私人服务，更组织特务来箝制一切反对力量。他更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借款，用来维持他统治的机构。在表面上他已经近于完成了武力统一的迷梦，但是集中权力的结果却损害了人民所剩余的自由。他在一片反抗声中结束了洪宪的企图，和他自己的生命。可是他却创立了假借民主的外貌实行独裁的前例。

助长这极权政治的是当时的经济。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的现代民族工业没有发展的机会，它并不能及时代替民间手工业来安定中国的经济基础。乡村里的小农却因手工业的崩溃而遭到了严重打击。农民收入的下落，侵蚀了农业资本，加速了土地的枯涸和荒废。生产事业的凋敝使农村无力维持拥挤的人口。农民放下锄头流浪四处，给统治者雇佣来当兵的机会。这样造下了个人私有的军队。中国经济的窒息，也驱使了上层社会的人士向官

僚机构中去钻营，利用权力来谋取丰富的收入。这又给独占权力的独裁者收买和豢养官僚和特务的机会。可是这也腐化了中国的行政机构。衙门成了收容所，贪污成了风气。私有军队的膨胀和行政机构的腐化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进农村的破产。这样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匮乏和威胁是相联结的；匮乏和威胁牺牲了人民的自由。为了自由的丧失，中国人民曾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避流血来反抗这极权统治，但是在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没有彻底解决的时代，这些斗争并不能收到效果，虽则这不断的反抗可以充分表示了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决心。

从袁世凯的统治到现在，中国政治的本质并没有重大的变化，虽则在名义上又添了很多新的花样。当然，这次抗战我们曾寄以过分的奢望，冀希在反法西斯蒂的战争中，中国能走上民主的道路，使人民能获得以往政治所夺去的人民的自由，但是事实使我们失望。

中国在这八年的长期抗战里，人民的生活已经从穷困到了不可终日的境地。过去几十年来穷困所引起的种种恶果，并没有消灭，而且因穷困的加深更为变本加厉了。在抗战过程中，人民为了成全抗战的努力，容忍政府种种限制人民自由的措置。但是一党专政的政府却利用这容忍，一步步的加强它的极权性。思想，言论，行动，以及生存的自由无一不被夺取。这些事实我们相信你已有充分的情报，若是还不足的话，最近昆明的屠杀学生一事也已足够暴露过去几年来的政治本质了。

日本占领了中国政治富庶之区，把中产阶级所凭藉的财产破坏了。在后方，中国政府一贯的以通货膨胀的政策来筹划战费，使公教人员的收入极度缩减，使正常的工业受到打击，使资本集中到投机性的商业，造成发国难财的特殊阶级。这特殊阶级又因投机商业必需凭藉权力，所以财富和权力得到更密切的联系，统治集团不但是权力的独占者，而且也是财富的独占者。最令人痛心的是军队给养的不足，鼓励了走私和腐化、士兵饿毙而长官发财的现象。在这种政策里，中国贫富的悬殊愈益加深。中产阶级的没落，减弱了争自由争民主的领导力量。这个社会财富的重分配和高度集中，所发生的恶果显然将影响战后中国的安定。

人民是容忍和忍耐的，但是容忍和忍耐是有它们的限度，他们要求政府采取合理的政策，但是在现有的政治组织中人民的言论是不发生作用的，而且在特务和检查制度之下，这种言论根本就很少发表的机会，因此凡是不满于政府又不能容忍缄默的只有采取反抗的形式。我们知道很多美国朋友觉得奇怪，

为什么中国政党必须倚持武力才能存在。这原因就是在当权的政府不容许异见，异见就是叛逆，就是邪说，就得戡平。我相信若是美国民主党执政而以暴力禁止其他政治团体公开活动，恐怕共和党也立刻会武装起来。中国一党专政的结果造成了不是党徒就是叛徒的分野。我们并不袒护在野而有武力的共产党，我们也反对任何政党私有武力，可是造成这局面的原因，不是中国人除了用武不懂政治，而是由于中国在朝党用暴力禁止异见。

中国内战暴露了中国迄今并没有民主的事实。

我们庆幸在内战爆发不久，美国人民能认清这种混乱局面会影响世界和平，而采取有效的劝阻。可是内战是果，并不是因。要消弭内战必需民主，必须使人民参加政治，能不凭藉武力来发表政治主张。我们也庆幸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声明里已指明这症结，而且在莫斯科会议已得到苏联和英国的共同支持。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已经在开幕中，但是我们还愿意供献我们的意见，作你的参考。

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们不敢希望有任何奇迹可以在极短的时期中诞生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我们也不愿低估这个会议的价值，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命运的转机。从这个会议中若不能立下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会议是失败的，这会议的失败必然会引起更凶险的局面，造下国际战争的种子，使这次大战一无收获。

所谓民主的基础，最基本的是保障人权的具体办法，要使中国人民能享受无虞威胁的自由。依我们的分析，以往中国政治不能走向民主是因为军队私有和特务组织的活动。军队私有是一件事实，不论在名义上是否国军或党军。在一党专政之下，合法的军队只有党军，在独裁政治下，所有党军也是最高权力私人的武力。所以解决自私军队不在改换任何名义和符号，而是在取消党治和独裁。党治和独裁既是建立在武力之上，所以要取消党治和独裁势非把军队彻底改组不可。这本是一个难解的症结。我们在美国的善意斡旋中看到一个希望。这希望就在美国能有效地劝阻武力的运用，使政治能离开武力，从事协商，取消党治和独裁。

这里我们要指出的："停战"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办法，军队私有问题不彻底解决，中国政治不会有转机，解决的办法是在从速复员。现在军队里的士兵是征兵制下召集来的，他们战时的服役义务已结束，本来就应当解甲归田。在这时还要维持这样庞大的军队，非但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中国已到了

民穷财尽的关头，不是为了对日战争、争民族的生存，是没有理由要人民负担这样大的维持军队的费用。何况，中国今后要生存必需从事建设，政府最大的支出应当是在生产事业里。军费必须核减到最低的数额。尤其是我们一方面要向别国借款，而一方面却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在维持军队，那是万万说不通的。

已有的军官凡不愿或不能改业的，得改编成维持治安的武力和从事于现代的军事训练，以备应付国际和平机构所需中国担负的责任。所有的军队须脱离党籍，由代表民意的政府加以统率。

为了消灭党治和独裁，更重要的是取消特务组织。军队是公开的武力，特务是秘密的武力。因之特务绝不能容其存在。取消特务的方法是在法律上加以禁绝，经济上加以断绝供给。现有的特务是以国库来维持，所以今后的政府在预算中应当根本不承认这一项目的开支，而且要预防利用其他名目来维持这种民主的敌人。

在消灭了私人或政党的武力之后才能谈得到身体、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才能不致发生像昆明惨案等一类的悲剧。

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指明造成中国现有混乱局面的重要的经济因素。中国人民的生活程度若是不能提高，则政治上的腐化和权力的滥用是永远没有澄清的希望。经济的建设固然是长期的事业，但是目前那种违反人民利益的经济设施应当立刻制止。在这些设施中最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破坏交通，坐视私人企业的崩溃，管制外汇，滥征滥购兵粮和无限制的拉用民工。这种种都是促进财富集中在少数有权力者的手上，促成民生凋敝的手段。在根本上，中国人民应当要求在清理侵略者和发国难财者的办法上去谋国家的收入。换一句话，赔款和征收高度所得税，应当占国家收入的大宗。这事和美国是关联的，因为赔款问题是同盟国共同决定的事，美国可以给我们主持正义。关于征收高度财产税，也和美国有关，因为在战时集中的财富有一大部分已流出中国，聚积在美国银行和其他企业中，我们若得不到美国的合作，是无法清算这一笔不义之财的。

外汇管理政策的流弊已经尽人皆知。在法定汇额中，中国的货币价值不合理的提高，使掌握外汇的权力可以上下其手控制国际贸易，甚至国际往来。只有权力所核准的人，才能用少数的国币购买大宗外汇。这是等于叫人民来

津贴特权阶级的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这种现象若容其继续，则美国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在中国就无法实现。这是世界经济繁荣的障碍。

交通的破坏固然是内战所引起的恶果，但是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另外一种无形的破坏交通，那就是交通的检查制。在现有情形中，凡是没有特权的人是无法获得交通工具的方便。这种检查制又不幸而操在特务手中，成了行动自由的破坏者。

在利用权力来控制经济的过程中，私人的小企业已经受到不断的打击。在胜利声中后方的小工厂大多因为物价的波动而无法维持。中产阶级的消灭使今后经济建设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必然不容易。在这情形下，发国难财的少数特殊阶级将形成独占的局面。这对于一般人民的生活是有害无益的，所以美国今后对华投资所采取的方式应当特别慎重。我们希望你能看重一般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因为这样才可以保证你们的市场和远东以及世界的和平。

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他们在这次战争中因征兵征实征购已经尽了最大的贡献。可是这些还只是法定的担负，法外的担负更是无从估计。利用农民的驯服，腐化了的行政机构不断的向农村吸血。目前农村已是凋敝到了极度。若是这些剥削的行为不停止，在一切经济建设计划没有生效之前，农民已经可以因生活的压迫不能忍受而发生变乱了。

若是经济建设目的在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最重要的对象自然应当是农村经济的改善，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使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利益得到最广大的分配。关于具体的办法，我们在这里不能多述。这里只能提到这原则，希望将来要协助我们建设的美国朋友们能加以注意。

我们不惮繁杂的把造成中国内战的原因，和因政治不上民主轨道而引起的种种痛苦略述如上，现在我们想说一说杜鲁门总统在他声明中所提到的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各党各派参加，以建立民主中国的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政府的改组是消弭内战的必要手段，民主的中国才能保障世界和平。对于这个原则，我们庆幸，各党各派在表面上均已接受。但是利用民主招牌来实行独裁是中国几十年来执政者的惯技。所以若要达到民主中国的目标，我们希望同盟国的朋友们决不应被名义和形式所欺骗，应该注意实质。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国民党至今还是坚持在抗战之前所选举的国民大会。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即使当时确是能代表民意的，到现在因时间的变迁也已失效，何况这次选举是一党专政时代的产物呢？我们相信你对于欧洲类似政治下选举的结果必

有明白的认识。选举的意义是在人民能自由表示意见。在言论没有自由，在政党不能公开活动，在特务监视之下，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民主政治的民意机关是决不能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因之，我们觉得除非我们能以假民主为满足，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改选，而且要在各政党能公开活动，言论、结社、集会得到自由之后，才能选举出这种代议制的民意立法机关。

最后，我们愿意再强调的要求你的注意，就是中国过去的政治中已经发生了名和实的分离。在口头所说的是一套，所作的却又是一套。民主，民主已经喊了三十多年，而三十多年中，我们所遭受的却是和民主相反的政治。名实分离不够，还可以造下种种骗局。譬如新闻的检查是取消了，可是在收复区又订下了许多限制报纸登记的办法，甚至可以以纸张的缺乏为口实，停止供给不属于官方的报馆。即在已经取消审查机关的地方，至少新闻的稿件还须经过党部的检查，方能登出。其他如特务的活动、威胁利诱，使事实上和政府不利的舆论不能有发表的机会。

为了要避免任何政治集团的伪装方法，我们希望新闻的自由必须坚持，而且希望国际的公正记者能利用这自由对公众有确切的报导。国际间舆论的自由交换是给予为民主工作者莫大的援助。民主工作者需要的是事实的公开检讨和批评，因为瞒蔽即是欺骗。

我们冗长的向你提出这备忘录，其中虽则有很多地方并不是你所代表的政府所能为力的地方。中国的问题最后只有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但是杜鲁门总统既然已承认中国内战将威胁世界和平，而维持世界和平是同盟国的共同责任，所以我们愿意在这种备忘录中详细分析造成内战的原因。同时，我们也竭诚的希望，在你被派遣到中国的短短时期内，你能到中国各处跑一次，一面自己观察，一面就上面的分析，自己进一步的找些印证。你最近将要到平津视察，希望你于平津归来后，向西南的几个中心，包括昆明、成都、贵阳在内，也走一遭。我们相信你和一般同盟国的友人，对于中国的关心，并不只是消极性的只要国共不相互放枪即可满意，而是积极性的，要促进中国的民主。要实现中国的真正民主政治，则上述的许多问题必须予以考虑。内战只是症候，不是病源。病源不除，症候是无法好转的。我们盼望国际的友人，为了世界和平，不但要劝阻国共交锋，而且能有效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建设民主的助力。

我们对于你的服务不但感激而且有信心。我们也希望你对于中国人民渴求民主有认识，对于中国人民民主的前途也有信心。敬祝你在历史上留下为

我们后世子孙永志不忘的伟绩。

一月十五日 昆明《中国周报》创刊号出版，刊头是杨明请先生题写的，先生用恭楷写成。这是个战斗性很强的刊物，主编是中共地下党员唐登岷，编辑有杨明、杨维骏、高国泰等人。（据访问唐登岷记录，1986.8.5）

该刊是月二十二日第二期，刊登有先生治印广告，云牙章每字两千元，石章每字一千二百元，过大过小加倍，收件处在府甬道十四号。

一月十九日 《学生报》创刊，这是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办的会刊。学联起初请先生题写刊头，先生认为请张奚若题写更合适，于是转请张奚若写了刊头。

一月二十日 先生与吴晗、李源、胡钊联名发表《释放政治犯再也不能拖延了——兼为羊枣先生的暴死集中营控诉》，刊于昆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二十四期。未入集。全文如下：

本月十日，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宣布释放政治犯。在他说了而没有做的第三天，被捕七月余的名记者羊枣先生（杨潮）竟以"突"患急病死于集中营了。这是上海《时代日报》十三日的消息："《释放政治犯声中，羊枣突患急病死去》：名记者羊枣于昨日在杭州监狱中，突患急病逝世。按羊枣曾任衡阳《大刚报》主笔，福建建瓯研究院院长。后在美新闻处工作时被捕以迄于今。"

羊枣先生早没有死，迟没有死，恰好在蒋主席宣布释放政治犯，而没有立即实行的第三天才死，而且不是患普遍的病死去，而是"突"患"急病"死去，这个"急病"，实不能不令我们为三十余万政治犯的生命安全"急"出"病"来！羊枣先生真的患"急病"死去欤？他的被捕七月，既不见政府公布其罪状或提起公诉，死后又不公布其病状死因，死后就这样用"突患急病"死去，可以草草埋没其死因了吗？我们要追究责任，不能放过刽子手的罪恶，如果羊枣先生可以用"突患急病"而掩饰其死因，那恐怕受尽特务迫害虐待的三十余万政治犯，会在释放之前，通通在集中营"突患急病"死光了！

羊枣先生之在政协会会议期中于集中营"突患急病死去"(?)，告诉了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人民，谁是中国法西斯的祸首，他的死，又一次有力的暴露了国民党一党独裁和特务制度的罪恶。如所周知的，羊枣先生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新闻工作者，初在清华学校肄业，后在交通大学学工程。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他能躲在工厂实验室安心工作吗？在政治环境的低气压下，爱光明爱民主的羊枣先生，终于抛下了他的本行，投身新闻工作，更直接的为中国民主

实现而贡献他的力量了。他的一生，如同每一个爱光明爱民主的中国人一样，遭受了无数残酷的迫害，终于以“急病”死于集中营里。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他在香港《星岛日报》任军事记者，每次撰写“一周国际”，他尖锐的笔锋，曾挑起了多少青年人对法西斯的仇恨，和对于民主光明的热爱，他是受到无数读者的爱戴和拥护的。为了他酷爱光明，在是年六月间，遭到国内法西斯压力的迫害，而与金仲华、邵宗汉、郁风等同时被迫离职。香港《光明报》创刊后，他又参加《光明报》的撰述编辑工作。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他回到国内主持衡阳《大刚报》的编务和笔政，为了坚持他一贯爱光明爱民主的立场，他又因为举办了一次“民意测验”而去职。一九四四年湘桂战起，他应福建省政府之聘，赴永安创办建瓯社会科学研究院担任院长，兼在美新闻处东南分处任高级职员。至去年七月，突被第三战区以莫须有之罪名加以逮捕。他的被捕经过，至今闻之还是令人悲愤发指的。

当他日间在美新闻处办公时，第三战区突派大队武装包围该处，并以机关枪威胁强行逮捕。当时该处处长提出严重抗议无效，提出数条件如不能用刑，每日由处派人探视送食物等，第三战区口头答应后，竟背信弃义囚之集中营，全未履行诺言。此后下落不明，亦未见当局加以公开起诉及宣布罪名。就这样，一生为光明为民主而奋斗的羊枣先生，经过七个多月的禁闭，和饱受了无数痛苦后，就突然以“急病”(?)死于集中营，永远离开我们了。

羊枣先生今年才四十余岁呢，他还年青，苦难的中国还需要他，他还能为争取民主做许多工作的，他不能死去，他不应该死去，但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羊枣先生终于在反动的势力迫害下死去了！他的死，是中国民主事业的莫大损失，是青年们的损失。他的高度的工作能力，他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斗争的韧性，他扶植后进的苦心和爱护青年人的真诚，凡是和他接触过或读过他著作的人，都会永远留下一个不可磨灭底印象的。他的死，控诉了国民党特务制度血腥的罪恶，加强了全中国人民争民主的决心。他的死，暴露了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的“诚意”和可能存在的阴谋。他没有死，他永远生存在爱民主爱自由的人们心里。作为他的同学、朋友和学生的我们，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我们会在悲愤莫名的痛苦下抬起头来，更坚定的擎起你所遗下的民主自由旗帜，继续走完你的旅程。

为了羊枣先生的死，我们不能不向全国人民和政协会诸代表，喊出了我们有力的呼吁和控诉：“释放政治犯再不能拖延了！”

因为羊枣先生之死是死得不明不白的，可能是一种政治阴谋的暴露。他

的死，并不止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目前三十余万备受迫害的政治犯的生命安全问题。为了这样，我们要向政协会议诸代表提出了我们对释放政治犯的具体主张：

一、要求政府调查公布羊枣先生被捕原因、被捕经过，及在集中营患何"急病"死去。并严惩主凶的第三战区负责者，及厚恤杨先生家属。（羊枣先生原名杨廉正，后改名杨潮，湖北人，其妹杨刚系全国知名之女记者，现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他素无积蓄，身后萧条，遗有一妻无子女。）

二、政府释放政治犯的诺言，要立即兑现，不能拖延，或所谓"按次序办理"。并保证不能再用任何阴谋使"政治犯"在集中营突患急病死去。如果确系在集中营患病死去，必须公布其病状及诊断经过，并请社会公正人士会同检验，不能视人命为草菅。

三、政治犯要全部释放，政府再不能玩弄花样，要在野党派提名始逐一予以解放。因为在"不满政府即系异党分子"的情形下，被政府目为政治犯而加以逮捕的，绝大部分为爱民主爱自由的青年，而无任何党派关系的。如果一定要在野党提名始逐名释放，则许多无党无派青年，势将还要继续受到残杀迫害。

四、释放出来的三十余万无辜青年和政治犯，如有残废及患病者，政府应负责抚恤和治疗的费用。

五、政府应明确解释何谓"危害民国之行为"，不能含糊其词，乱加政治犯及无辜青年以大帽子。因为事实告诉我们，政府是惯于使用这套伎俩的。最近四川大学学生李实育案，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六、政府要做到保障人民的自由，就要立即废除在当政十八年中残害无数纯洁青年的集中营和特务制度，此外各地的邮电检查，海陆空的交通检查，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及一切束缚人民自由的法令，应立即一律废除。

七、在蒋主席宣布"除司法与警察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后，宪兵及其他任何军事机关应停止私自逮捕人民的权力（宪兵英文为 Military Police，意为军事警察，仅供维持军队风纪及调整军民争执之用，不能管民事）。且美英等国家之宪兵组织，并不如中国宪兵组织内设有特务机构。

中国人民无辜的血流得太多了，国民党十八年来一党独裁和特务制度，特别在抗战八年间，曾经迫害残杀了数以十万计的纯洁青年。如果目前三十余万的政治犯和无辜青年，不能立即无条件从集中营放出，如果特务制度这些最龌龊的东西，不能从此在中国绝迹，那末非但羊枣先生和无数被迫害的政治

犯，会死不瞑目，全中国爱民主自由的人民，也会不惜以鲜血洗涤这大地底腥羶的。

释放政治犯再不容拖延了！

同日　先生等一百九十余人联名发表《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代电》，刊于昆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二十四期。全文如下：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转各代表公鉴：

诸先生此次在渝集会，协商国是，诚国家民族兴衰隆替之机，团结民主和平奠基之日。诸先生责重任远，固当捐除私见，为人民立言，为子孙造福，群策群力，必其成功。同人等义切救焚，责无旁贷，愿陈数事，用作准绳，诸希明察是幸。

甲：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以前，应切实办到下列各事项：

一、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此项工作由马歇尔将军会同国共双方以外之公正人士监督实行。

二、开放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及其他基本自由，一切报馆及通讯社听任私人或党派自由经营，其曾经政府控制支持者，一律停止其控制及支持。

三、取消一切特务组织，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四、组织联合政府，在宪法实施以前，以联合政府为中华民国之最高统治机关，政府人员应由全国贤能领袖公平分担，任何党派所占员额不得超过全数三分之一，军政财政两部并不得操于一党之手。

乙：下列各事项由联合政府办理：

一、缩编全国军队，并提高其品质，以期达到高度现代化之目的，全国军队之数量，平时以五十师为最高限度。

二、改组并刷新各地方政府之行政机构，其主要人员不得由任何一党包办，并不得由现役军人充任。

三、制定制宪会议之组织及选举法，于联合政府成立后六个月内，办理选举，并召开会议。

签名者为：张奚若、钱端升、朱自清、金岳霖、王赣愚、袁家骅、李继侗、吴之椿、费孝通、潘光旦、汤佩松、费青、胡毅、闻家驷、潘大逵、卞之琳、尚钺、夏康农、李广田、苏鸿纲、姜震中、顾元、王康、陆钦墀、廖宝昀、袁方、徐毓枏、周新民、楚图南、沈嘉瑞、向达、陈定民、杨业治、闻一多、林文铮、徐嘉瑞、胡庆钧、全慰天、陈美觉、冯素陶、俞铭传、张兆麟、孟超、杨一波、赵沨、郑伯华、张默涛、林彦群、许之乔、刘北汜、

张书田、陈遵妫、黄绮、张子毅、李荫远、张东祺、程溯洛、吴晗、李若明、罗应荣、汪子嵩、吕德申、叶方恬、汪志华、金先杰、何善周、李荣、刘锡铭、张璧华、刘禹昌、张国廉、唐敖庆、姚宝汉、邱家农、范宁生、程应鏐、彭兰、马忠、王振华、许维遹、杨明、丁维铎、余冠英、吴谟、尹科云、林慧、李埏、杨天堂、王鏐、陈钟远、胡宗礼、谢广美、陈阅增、王树勋、曾宪邦、吴征镒、董申保、池际尚、陈德明、王瑶、江枫、钦俊德、王通裕、季正怀、张澜庆、金孟肖、张炳嬉、李学应、俞和权、殷汝棠、孙本旺、苗华殿、凌德洪、周家炽、蔡德惠、张行煜、钟景文、杨德森、刘邦瑞、余培忠、吴彬、颜锡嘏、王溶、冯秀明、文波、田方增、刘心务、娄康俊、赵全章、崔士英、徐绍龄、李俊昌、郝锡宏、戴玉贞、赵崇汉、杨鹏魁、王金钟、胡维菁、卢福康、朱绍侯、程力方、龙文池、范宁、赖才澄、陆永俊、许杰、黄为、王志诚、张德成、陈峰、陈志鹏、何陶如、佘世光、龙敏惠、莫翰文、彭丽天、孙瑞谷、迟中陶、杨光社、陈尔谢、陈德祥、阎昌麟、许醒农、仲谷仁、李建武、钱介福、萧前桂、康倪、萧前瑛、王万俊、武子桢、赵宝煦、王筌、向大甘、谭正儒、王乐周、游象乾、张绍桢、高国泰、唐品喻、刘舒心、蓝仲雄、马毓泉、邓汉英、郭沂曾、杨捷、胡向恒、焦瑞身、杨东灿、王晓云、刘源、杨体隽、刘宗汉。

二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亦以《昆明文化界人士百余人要求开放自由组织联合政府》为题，全文刊出该函。

此事似亦由钱端升发起，朱自清日记是月十二日条云："上午端升来询《时宣言》起草要点，所提各点均表示接受，而今甫及汤则表示不同意。"（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85页）此文件发表时，果无杨振声、汤用彤。

一月二十一日 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各界协进会成立。先生未到会，但仍与张奚若、楚图南、尚钺、杨绍廷及民主周刊社、中苏文协昆明分会、文协昆明分会、昆明学生联合会、时代评论社、云南妇女联谊会、妇女旬刊社、昆明文化学会、昆明新报社、联大文艺社等十团体被推为执行委员。该协进会成立之原因及目的，是"鉴于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实由于国外民主力量的要求，和国内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于和平民主的迫切愿望及运动所造成，并且认为在未能实现全国普选，以真正还政于民之前，政治协商会议实为过渡期间代表在野各党派，及社会人士以解决国是的有效适宜机构。但此次会议之成败或其□果之良否，仍有关于会外广大人民和平民主运动的继续努力和加强。故咸认为有联合昆明各界，对该会在开会期间和闭会以后，随时作集体建议并监督实行之必要，遂决定成立'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各界协进会'，与'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共同努力"。（《政协会昆明协进会成立》，昆明《学生报》第2期，1946.1.26）

会上，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各界协进会宣言》。这个宣言早已拟好，先生

曾参与了意见。《宣言》云：

在全世界民主人士的要求及全中国人民的呼吁及督促之下，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重庆开会了。同时，国共两方也已正式下令全面停战，将一切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求得和平解决。对这二十年来政治新局面的展开，全国人民实感到衷心的欢欣。我们人民对国是前途也因此充满了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我们以为此刻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它虽是朝野各党派和少数社会人士的代表会议，但在今天全国还没有实行普选、召开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以还政于民之前，它是最具有代表全国人民解决当前国事的资格，且为过渡到真正民主政治最适当的机构，所以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对此无不寄以殷切的期望，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确实调协各方面的意见与感情，根绝任何内战以导国家于和平团结建国的坦途。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诸位代表，除了少数无党无派的社会代表人士以外，是大多数各有其政治背景的。我们以为今天所协商者既为国是，与会各代表则必须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协商的最高准则，忽视了这点，不但会使急待协商的国是问题无法获得合理解决，且纵令有何协议，那也必将违背全人民的利益而为人民所反对。

我们也知道一个民主新中国的建设是不可一蹴而成的，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不一定能即时协商成功。但我们以为与会的各方面代表真能一切唯全国人民利益是从的捐弃私见，而一心为国家树立和平建国之基努力，我们确信协商定将成功。

今日之事，时机紧迫，我们以为政治协商会的努力，只许成功而不许失败，我们并愿向全国人民指出：和平民主不可倖致。乐观的结果必需用我们人民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本会成立目的端在团结昆明各界人士继续加强我们对和平民主的要求和运动，对政治协商会议群策群力的在开会期间及闭会以后提供我们人民的建议和督促。

现在，我们提出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一、确实保障基本人权。

1. 立即彻底实行蒋主席业经宣布的四项人民自由诺言。

2. 立即取消特务组织。

3. 立即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并撤销一切劳动营集中营及其他变相机构。

二、彻底改组政府。

1. 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此项原则应中央与地方机构一律应用。

2. 任何党派在各政府中所占员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三、军队国家化。

1. 此事应由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全盘具体办法，交联合政府执行，不应由国共两党单独解决。

2. 现有一切武装部队无论属于何党，应公平合理整编。凡已收编伪军一律解散，伪军兵士有过者处罚，校官以上者一律以汉奸罪严格惩处之。

3. 所有军队宪警，应一律脱离党派关系和控制，并彻底废除党化训练。

4. 严格实行军民分治，现役军人不得充任行政官吏。

四、国民代表大会问题。

1. 由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机构，重订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并重订宪法草案。

2. 根据新订选举法重选代表，二十五年所选旧代表应完全无效。（昆明《学生报》第2期，1946.1.26）

同日 先生担任编委的《时代评论》第十三期稿件付交鼎新印刷厂，旋厂方突受当局警告，勒令停止排印，已排好之版亦拆毁。二十三日，先生与吴晗负责的昆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二十四期亦同遭厄运。同时，《学生报》、《中国周报》也被厂方拒印。

这是当局有计划的行动，二十一日晚"某三方面高级人员举行联席会议，当场决定采用釜底抽薪之毒计扼杀各刊物，并定出不露痕迹及不负责任之原则，命令执行人员不留任何文字的证据，并严令各厂商不得洩漏主动机关与执行人员之名称姓名及丝毫真实情形。二十二日，某同业公会理事长被某方派员勒令转命印厂商拒印各刊物，同日，鼎新与崇文两厂负责人经某方传问，并警告'现在是新旧交替的时候，局势混乱，你们切不要卷入漩涡，免得对你们不利'云云。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某方又正式召集各大印刷厂负责人训话，谓今后承印任何刊物须首先查明其有无登记证，并审阅内容是否'反动'，如未登记及内容'反动'者即不得承印"。（《为横遭阴谋破坏敬告各界人士书》，昆明《民主周刊》第2卷第25期，1946.1.30）

一月二十六日 昆明民主周刊社、时代评论社、学生报社、中国周报社联合发表《为横遭阴谋破坏敬告各界人士书》。先生参与了拟定工作。

文中称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重庆开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再次宣布保障"人民之自由"等四项诺言，而昆明却发生了破坏民主自由之事件。"本刊等遭此无理压迫，愤痛莫名，除努力设法解决印刷问题，坚决支持，绝不停刊，并誓死力争言论出版印刷之自由外，特郑重向压迫者提出严重的抗议，并向各界人士发出沉痛的申诉：

一、昆明某数官方此种横暴的举动，既属违反蒋主席宣布之四项诺言，显亦蔑视政治协商会议及国民政府力求和平团结民主合作之至意，其剥夺人民自由，尤为乖谬不法，罪无可逭。我们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及国民政府，迅速查明真象，将主动人员交付法办。二、昆明某数官方不仅侵害本刊等之出版自由，抑且侵害正当商人之正当营业，此风一长，则我商界同胞之正当权益，将备受蹂躏。为此，我们呼吁全体商界人士一致反对此种无理的举动，本刊等愿为后盾。三、此次某数方面所采压迫本刊等之方式，可谓不负责任，极尽卑劣之能事，而其狠辣阴毒较之明令查封公开禁止尤有过之。我们除对此卑鄙而不负责任之阴谋表示抗议及鄙弃外，尤望文化出版界人士群起注意，并给我们以援助。最后，我们严正提出：一、人民基本自由绝对不容侵犯，蒋主席宣布之四项诺言，必须立即实施。二、正当商人之正当权益应有保障，商人正当营业之自由，绝对不容妨害。三、彻底废除官办与统制印刷造纸等工业之自杀政策，解除妨碍文化发展的桎梏。四、废除邮电检查，撤销特务机构，不许扣禁人民及在野党派自办之报章杂志。五、废除出版法及电影戏剧检查，取消收复区报纸杂志图书检查制度。六、全国各报馆、各杂志、各通讯社一致起来，未登记者，拒绝登记，已登记者撤回登记，务必达到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而后已。”（昆明《民主周刊》第2卷第25期，1946.1.30）

同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请辞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职：

涵师校长钧鉴：敬启者，一多迂阔成性，才识疏浅。昔年偶以承乏，接充本校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当时即已声明，只系暂时性质，期学校离滇北返之前为度。今者，抗战胜利，复校在即，举凡系中有关结束现在、擘划将来之诸项事务，关系前途至为重大，用是旦夕忧惶，自维为除罪戾计，理应实践前言，早避贤路，爰特专函呈请辞去现职，迫切陈情，不胜企祷之至。肃此祇颂道祺。学生闻一多。（《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先生请辞此职，也是出于为学校考虑。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有记述：“在三十五年春天，一多与我作了几次很恳切底长谈。那时候他相信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成功。他说他并不打算完全作政治活动。‘不过同你们比起来，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他又说，他已决定回北平以后底研究计划，他打算用唯物史观底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他说，他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材料，知道很多，但是对于唯物史观底研究，还嫌不够，他想找个人合作。关于清华的文学院，他主张将中国文学系与西洋文学系合并为文学系，而将其中关于语言底课程分出来，另设语言系。这一个提议佩弦也很赞成，不过不能实行。因为教育部把各大学管得紧紧

地，甚么事都照着刻板底部章。一多又同我说，他的政治上底关系，必然使学校当局增加困难，因此，他愿意辞去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专任教授。主任一职仍由佩弦担任。佩弦为人，向来是不轻然诺底。我为这个事，又与佩弦长谈了许多次，梅月涵先生又亲自劝驾，才把这个担子又放在佩弦身上。"（北平《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10）此事费了不少周折，直到四月三日，梅贻琦才在先生函上批示："闻一多请辞照准。函朱佩弦先生，请担任中文系主任职务。"

一月二十七日 联大同学郭良夫创作的话剧《潘琰传》（又名《民主使徒》），在昆华女中礼堂演出。先生认真地看了这个剧。三十日演出结束，又应郭良夫之请，用小篆为该剧题写了题签："民主使徒"。

一月二十八日 访朱自清，望其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职。朱自清日记云："一多来访，谓彼已向梅校长正式提出辞职，希望我接替其职务。我推荐王了一，彼不甚同意，认为梅校长和冯可能不会接受了一。我们谈到浦（即浦江清），一多认为他常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建议，而且可能与学生相处不好。我决意不接受此职，但答允帮一多处理本学期的日常事务，因他确实太忙，在政治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88页）三十一日，在清华大学评议会上，冯友兰提出请朱自清担任中文系主任，而朱则提出王力，果然未被冯友兰接受。二月十一日，朱自清接梅贻琦信，内容亦是请其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一月二十九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务长潘光旦信。信云："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督请举行毕业初试。兹拟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闻一多谨上卅五年一月廿九日。计开：一、王瑶论文题：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二、初试范围：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三、考试人员：除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一月三十一日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共通过五项决议：一、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二、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三、和平建国纲领。四、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

政协开会期间，先生代表民盟云南省支部与民青负责人谈话，说民盟准备建议为民青争取两席国大名额。洪德铭回忆："在旧政协开会期间，据说根据罗隆基的建议和民盟的意见，由闻一多向我和许师谦（民青第二支部主任委员，民青第一、二支部联系负责人之一）传话说：民青在民主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民盟准备建议

在将来国大代表名额中替民青争取两个席位(暗示这两个代表可推民青一二支部负责人充任),你们两个参加民盟后可参加负责民盟的青年工作。我与许听后感到很惊讶,当即婉言表示拒绝地说:如果民青负责人当了国大代表,就会受到同学的鄙视唾弃,在今后民主运动中就不能起作用了。闻先生边听边点头,表示同意,从此他就没提这类问题了。"(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是月　找西南联大"除夕社"一负责人谈话。除夕社是西南联大部分学生新成立的一个团体,一月二十一日发出成立宣言。昆明《学生报》消息云:"联大一部分参加一二一运动的同学,因为在工作中,感到个人力量太渺小了,需要集体力量才能发挥工作力量,遂发起组织除夕社,已于本月二十一日正式发出成立宣言,主张以民主作风推进民主运动,且已积极开展工作。"(《除夕社成立》,《学生报》第2期,1946.1.26)除夕社的同学认为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罢联决定"停灵复课"的做法不够民主,对民青和联大学生自治会也有些意见,并不同意间接选举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成员。先生说:我可以提请民青注意克服缺点,多听你们的意见,但你们一定要维护他们的领导。与此同时,先生也批评了民青,"建议提前改选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用全校同学直接普选的方式选出新的理事会,吸收除夕社的同学参加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工作"。(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此后,民青根据先生的建议和群众的意见举行改选,除夕社有五人被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使进步力量的团结得到恢复和巩固。

是月　个旧旅昆同学王明等相约返乡,行前去看望先生,先生鼓励他们回去后要配合昆明的民主运动。王明《在"一二·一"运动影响下》中记述:"离昆前我们曾拜访过老师闻一多先生,谈到个旧矿山破产的情况和返乡的打算。闻先生很关心祖国的工矿业和受苦受难最深的矿工。他说:'都市中知识层的民主运动,已经由昆明的发动而广泛展开了。希望将来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民主运动,也从昆明发起,而充当这运动的先锋者,应该是当今昆明的青年学生。'在闻一多先生的启示和鼓励下,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经同学会研究,布置返乡同学配合昆明的民主运动,回家乡去做些有益的工作。"(《红河州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1期)

王明、樊开祥、彭尔莹等同学返回个旧后,办起了失学青年"文化补习学校",并建议地方文化协进会请旅昆同乡会出面,邀请联大、云大部分教授到个旧帮助修撰县志。先生也受到邀请。杨绍廷《一次修志的夭折》:"个旧旅省同乡会理事会接到地方文化协进会的来函后,召开了会议,由理事长高荫棠主持,经过讨论,决定由理事杨绍廷负责联系,提出邀请名单,由同乡会正式发函邀请。被邀请的教授有西南

联大闻一多(文学)、李继侗(生物)、张印堂(地理)、冯景兰(地质)、李何林[①](文学评论)、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文史)、尚钺(历史)、袁家骅(语言),其他方面的有律师邓太年。邀请发出后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并出席了旅省同乡会的邀请宴会,决定了动身时间。"(《红河州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1期)

杨绍廷还补充说:"一九四六年春,个旧地方文化协进会委托个旧旅省同乡会邀请几位教授帮助修撰县志。同乡会经讨论决定,由我出面,以同乡会名义邀请闻先生主持个旧修志事宜,并请他提名约请几位教授。我到闻先生家向他转达了同乡会的请求,得到他的同意和热情支持,当面就拟出了邀请名单。但是名单中的一半先生我都不熟悉,不知如何去请。闻先生看出我的为难,对我说:'你熟悉的楚图南、尚钺、李何林等教授由你去请,你不熟悉的由我负责一定请到。'后来闻先生亲自出面邀请,使这次活动能如期进行。遗憾的是临去个旧时,闻先生与楚先生因民盟的工作离不开而未能同去。其他几位教授到个旧后,不顾旅途辛苦,立即深入实际,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对个旧的矿业、交通、水利、林业、民族文化等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可惜当时地方负责主修县志的乡绅受到政治压力,不敢出面,致使修县志的愿望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辜负了闻先生给地方的热情支持,是一次难以弥补的损失。"(《永久的怀念》,《群言》1996年第7期)先生邀请参加个旧修志的教授,有张印堂、李继侗、冯景兰、袁家骅等人,为此还在大东门外个旧会馆请过一回客。(据访问杨绍廷记录,1986.8.2)

附: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情报第三十四号:"据报: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共产分子楚图南、尚健庵、李何林、闻一多,民主同盟分子潘大逵、吴晗及昆明妇女联谊会干事、共产分子李某(名不详)[②]等人已于二月四日由昆明搭滇越车经开远、碧色寨、蒙自,到达个旧,表面以修个旧县志为名,在各地以讲演、出壁报、演话剧等方式作各种反宣传,而以个旧为其工作基地。并邀请联大教授张印堂、严蒙华、冯景兰,律师邓太年,个旧旅昆同乡会代表、共产分子杨绍廷(联大学生)[③]等人,准备赴石屏、建水等县视察联大等迁校路线,藉作其他活动云。欧昌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二月二日 春节。节日里次子立雕惹了一场祸。年前圣诞节时,一位美国朋友送给先生全家一些礼物,其中一只动物形状的气球在当时还很罕见。立雕自幼喜欢动脑筋,他根据化学课上学到的知识,想让钠与水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出氢气

① 李何林不是联大教授。
② 即李文宜。
③ 杨绍廷不是联大学生。

把气球充起来。于是，找来一块钠，放入盛有清水的茶壶内，把气球套在壶嘴上。不料，钠块过大，壶盖又被立雕用手紧紧地按住，迅速膨胀的氢气竟引起茶壶爆炸，壶中液体喷了出来。长女闻名在旁边看见哥哥做试验，新奇地把脸凑近壶嘴，结果满脸被灼伤。先生听见爆炸声，赶紧从里屋出来，吃惊不小。这时，先生在清华学校的同窗，时任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的黄子卿正好来拜年，立即建议用醋冲洗闻名的面部。先生并未责备立雕，只是说了一句英语成语"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意为"一知半解是最危险的"。

同日　晚，参加新中国剧社、联大剧艺社联合举办的春节聚餐，到田汉、洪深等多人。大家在景虹街新中国剧社社址的天井和大厅内，按云南习俗就地围坐，下铺松毛，还表演了文艺节目。这天，萧荻、刘美菊还在会上举行了婚礼，先生做主婚人。（据萧荻给编者的信，1986.11）

二月三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信云："中国文学部研究生施子愉请求举行毕业初试。该生研究题目系'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此次考试范围，应为中国通史、哲学史及文学史。兹拟请罗膺中、向觉明、冯芝生、许骏斋、闻一多等九位先生为考试委员，并定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为考试日期。敬希分函聘请，是为至荷。此上梅校长。闻一多谨启。"（《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二月四日　朱自清前来拜年。（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88页）

二月七日　华罗庚自昆明飞重庆，办理赴苏联手续。时，苏联科学院出版了华的《堆垒素数论》，并补邀其赴苏访问。华起初有些犹豫，先生鼓励他，说："我们要学习苏联，要走苏联的道路。你能去苏联学习，对于将来搞好我们中国的科学事业是大有好处的，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华罗庚《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43页）二十五日，华罗庚离开昆明出国，至五月二十五日方返国。

二月十日　重庆"二·一〇"惨案发生。是日，重庆二十余团体联合发起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大广场举行。大会还未开始，即有暴徒强占主席台，夺取扩音器，殴伤郭沫若、李公朴等。消息传到昆明，先生十分气愤，即与楚图南、李何林、洪深、石炎、刘平、范启新、赵沨、郭良夫、夏康农、周士礼、顾德荫、冯法祀、江鞏、严恭、尚钺、金若年、李仁荪等联名致信慰问。未入集。《昆明西安文化教育界慰问较场口受伤人士》刊载先生等人慰问信云：

> 在政治协商会议刚刚开幕，陪都各界热烈举行庆祝大会时，竟有破坏民主的暴徒，捣乱会场。先生等遭无端迫害，同人闻讯之下，亟为愤慨，誓作诸先生后盾，共同为民主中国之实现而努力。谨此慰问，并颂康复。（《新华日报》，

1946.3.4)

二月十一日 西南联合大学在新校舍北区会议室召开第四十三次教务会议，先生出席。会上教务长潘光旦报告本校历年毕业及经部核准人数等，议决凡在联大保有学籍学生于学校北迁后可依照其本人意向，参加北大、清华、南开任何一校。(据《教务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二月十四日 报载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任命李宗黄为该委员会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先生对此十分气愤。民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亦发表谈话，称"这措施不但使被杀青年永不瞑目，而且是完全违背人民愿望，无异奖励杀人凶犯，泯法背理，自毁纪纲的罪行"。(《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对政府纵容昆明一二·一惨案祸首李宗黄的谈话》，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1期，1946.2.26)

二月十五日 下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西仓坡五号本校办事处举行研究生王瑶毕业初试，考试范围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先生与许维遹、朱自清、浦江清、王力、冯友兰、汤用彤、彭仲铎、吴晗为考试委员。(据《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二月十七日 下午两时，昆明政治协商会议促进会、文协昆明分会、中苏文协昆明分会、昆明学生联合会、学生报、中国周报、民主周刊社等十团体，在联大新校舍联合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〇惨案、坚持严惩一二·一惨案祸首大会"。先生担任大会主席。

时，距重庆二·一〇惨案仅一星期，有的人觉得此刻开这样的会有些危险，但先生认为此会非要开好不可。会中，先生首先报告，《昆明各界举行大会，一万余人示威游行》报道到："会开了，是在下午两点钟。主席闻一多起来报告。他认为：政协会五项协议的意义非常重大，他说：'中国近百年来的民主解放运动，到现在可说告了一个段落。'可是，反动派'只看到个人的少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远见，所以他们就要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具体的表现，是重庆二·一〇血案'。对于屠杀四烈士的凶手——李宗黄——不但不加以公正的惩处反而升了官，他很激愤的说：'这件事，和重庆二·一〇血案是一样的意义，象征反动派势力垂死的挣扎。'最后他号召到会的人：'我们要击破这反动势力，我们有击破这反动势力的信心，反动势力的期限决不会长久！'"(《学生报》第5期，1946.2.23)

接着，褚辅成上台演讲，说：如果国民党不能用和平手段完成建国大业，而打几十年仗，弄得老百姓更痛苦，那么，"国民党在将来就要成为革命的对象"！钱端升演讲说："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使国家更进步，小心而谨慎不懈地把握住它，使它成为事实。现在是已经议而决了，我们就要它决而行，而且，要用一切人民的力

量使它行而通。”又说：“我们绝对需要完全无缺的自由，意见的自由最重要，如果没有意见的自由，那就不是民主国家。”对李宗黄升官之事，他气得几乎梗塞了气管，说：“这事，政府也是荒谬。”费孝通演讲道：“政协会的成功是人民力量的表现。这力量表现在一二·一血案，这血案开始了新的方向。”吴晗演讲中特别强调：“唯一的方法要取消特务制度，不然一切保证不发生作用，人民的基本权利毫无保障”，“要取消特务就要改组政府，使成为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同前）

接着，大会宣读了《宣言》，该《宣言》是当日上午先生嘱王康在民主周刊社内赶写的，先生亲自修改定稿。文云：

我们昆明各界一个月来，怀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对政治协商会议抱着无穷的希望。感谢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和盟邦友人的共同努力，这个会议终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的曙光，带来了民主的希望，也为新的民主中国奠定了立宪的基础，开拓了和平建国的道路。我们昆明各界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对于与会代表们的协商态度，首先愿意表示我们衷心的愉快和敬意，并愿全国同胞能一致庆贺和重视这次会议的成功。

我们昆明各界面对重庆较场口上淋漓的鲜血，感到极度的愤慨。我们除了向受伤的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慰问之外，今天，我们更要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一二·一”的屠场上，向全国人民提出我们对凶手们的控告和对执政党的遗憾。

我们深深地体验到中国民主道路的遥远，我们虽然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但这只是民主的开始，而不是民主的获得。因此，我们昆明各界在这协商会议将要功败垂成的时候，谨向与会代表们和当今的政府提出以下的要求：

一、贯彻施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

二、彻底清除官僚党棍及消灭特务制度；

三、严惩并追究一二·一血案凶手及主使者；

四、切实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并不得再发生不幸事件；

五、为表示政府革新之决心，应立刻严惩昆明一二·一惨案之主使者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等；

六、如同对一二·一惨案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一样，中央社对二·一〇血案的报导，完全与事实不符，正遭到重庆人民和记者们的公开驳斥。我们希望中央社能善尽自己的天职，为人民报导真确消息，尊重自己的人格、自己的良心，绝不能再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用莫须有的藉口，污蔑爱国人士的清白，包庇暴徒的罪行，而扰乱人民的视听，然后才够资格自称“公正”。（《昆明万余人

大游行》,《新华日报》1946.2.21)

随后,宣读了昆明学联对政府任用李宗黄的抗议书。在惨案中被炸伤断腿的缪祥烈亦被拥上台做了演讲。此时,有人提议游行,获得全场热烈鼓掌、欢呼通过。下午四时半,游行队伍从联大新校舍出发,先生与洪深、李何林等三十多主席团成员走在队伍前列,从昆北城墙缺口进城,四人一排,高呼"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改组政府","立即实施四项诺言","反对任用杀人犯李宗黄"等口号。队伍经武成路、三牌坊、近日楼、南屏街、绥靖路,夹道群众报以热烈掌声。当一万五千人空着肚子回到云大,先生兴奋地问:"特务那里去了?他们是学乖了?还是泄气了?"(《二·一七昆明大游行特写——民主列车》,昆明《学生报》第5期,1946.2.23)

在云大操场,先生再次登台演讲,"勉励各界继续为民主团结而努力,并领导全体高呼口号"。(《昆明各界大游行》,北平《民主周刊》第4、5期合刊,1946.3.6)王一《哭闻一多先生》记述当时情形:"太阳落了山,天上闪着星星,大队才回到云大操场,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声音在喊了:'大家知道今天的游行有多少人吗?''不知道,'大家齐声回答。'我数过行,有一万多人。'狂呼鼓掌中断了他的话。'重庆的人在较场口开会,特务都捣乱,我们游行,特务倒不敢来了,特务那里去了!''他们跑了,怕了,不敢动了。'大家在怒吼。'为什么他们不敢动——因为我们团结,有组织。''对''对''对',无数的声音在喊。'我们要更团结,更有组织。大家跟我喊几句口号。''庆祝政协成功!''抗议较场口惨案!''反对政府任用凶犯!''昆明青年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新中国万岁,万岁万万岁!'闻先生的声音越喊越大,像雷一样,千万个声音像雷的回音一样,在城墙边吼着。"(《人民英烈》,第308页至309页)

同日 梅贻琦到重庆教育部述职,与朱家骅谈话中言及先生等。梅在日记中写道:"访骝先部长于其私寓",其"颇关心于清华复校设备等问题,而对于张、闻、潘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二月十八日 冯法祀举行画展预展,先生等人出席。《云南日报》二十日报道:"画家冯法祀,于十八日下午□时假新中国剧社举行作品预展,到文化界闻一多、洪深、楚图南、夏康农、李何林、孟超、白澄、赵沨等多人。于参观全部作品后,并即席举行座谈,发表[言]甚为踊跃,对冯氏作品之现实意义及当前绘画之动向问题,多有发挥。按冯氏系名画家徐悲鸿之高足,此次展览作品,包括黔桂路工程及越、桂、湘、黔、滇、缅等战区之风物写生,内容极为生动丰富,已定本月二十二日在文庙街民教馆公开展览云。"

参观后举行座谈会,先生为主持人,并对画展作了坦率的评论。白澄曾将先生

的意见记录整理为《我们的观感——冯法祀先生战地写生画展》，刊于二月二十五日昆明《正义报》“文艺副刊”第二十三期。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白澄又将重新整理的记录，冠以《新美术的路向——画展观后感》之题，署以“闻一多讲，白澄记”，刊于徐悲鸿主编的天津《益世报》“艺术周刊”第二期。这是一篇很重要的发言记录，它反映了先生这时期的艺术观。其文云：

本会给我的首先的印象是自然的景色多，而人物的刻画少。就现在展览的作品看，大都是以大自然为背景的，而人却站在次要的地位。在西洋画上，这不是主要的作风。中国画是以山水为主，而西洋画则以人为主。多年来，这两方面在学院当中都不能满足。在西洋画中，目前究竟走那一条路子，似乎也还没有确定。我在外国时，他们对我说，你们自己的画好多了，何必要来向我们学习？那时在五四时代，我们往往具有民族主义的看法，对于国画十分推崇，其实国画之好，有些也是我们自己在吹嘘。在外国，从没有到外地去写生，是由自然的描摹发展到静物与人物的写真。从自然走到人，尽管画的还是个人，仍是好的倾向。而中国，又由人回到自然，是坏的路子。单从人与人之间去表现社会关系与作者的思想，这才是我们应做的事。如果尽在描写自然，在我看来，是一种浪费，因为这恐怕耽搁了时间去注意人的表现。描写大自然是学院派的作风，也是中国一般美术界的现象。现在，中国的美术所要走的路子，到底是中国的呢？还是西洋的呢？我认为要多多表现人间的现实生活。引申地说，西洋的人物纵然多是个人的，而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新绘画连这一点都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依照我的看法，我们要画人物，不仅要画个人，而且要画群众，要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表现出人在社会上的关系。关于这问题，我现在还不晓得西洋如何解决。因此，我十分喜欢那幅《捉虱》，这是人间生活的写照，在画面上是以人为主体的。至于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上，这涉及到画家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思想与态度问题，而不单是个人的技术问题。

对“艺术为艺术”，先生这时有了新的认识。在未刊手稿中保存有这样一篇零散的随笔：

精神食粮
不生产的有闲阶级
“艺术为艺术”
实际乃是晃子
维护阶级利益的另一手法
“艺术为艺术”的历史意义——革命

××为宗教　礼教

艺术宣布独立——为自己——资产阶级向封建革命——民主革命

中国文艺出于道家——杨朱为我，不合作

个人主义

过时

进一步为人民，否则停留在个人主义即是反动，革命对象。

二月二十二日　致闻家骕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自己近来的生活与思想的转变：

弟个人身体堪称顽健，三男二女亦差托平安，惟孝贞多病，前年曾一度卧病月余，本年复沾滞床褥者三月之久。据医生最近之诊断，系甲状腺（在颈部）关系，影响心脏衰弱，并患贫血。一家琐务几全赖赵妈一人，而彼亦年老力衰，丈夫数年来杳无音信，谅已贫死，故心绪不佳，时亦多病。至于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润格，石章每字一千二百元，牙章每字二千元）。曩岁耽于典籍，专心著述，又误于文人积习，不事生产，羞谈政治，自视清高。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两年以来，书本生活完全抛弃，专心从事政治活动（此政治当然不指做官，而实即革命）。关于此事，重庆报纸时有报导，不知兄处见及否？此处殊不便多谈。总之，昔年做学问，曾废寝忘餐，以全力赴之，今者兴趣转向，亦复如是。近年上课时间甚少（每周只四小时），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民主运动，归家后，即捉刀刻章，入夜，将一日报纸仔细读完，已精疲力竭矣。古人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今之为祸于国家民族者有甚于匈奴。在此辈未肃清以前，谈不到个人，亦谈不到家。

信中特别提到闻家骕妻子的内侄王康和王子光兄弟，称"康生[①]弟兄与弟过从甚密，思想亦极相投。康生文笔与口才尤能出众，二人均已成青年领袖[②]，觉民兄[③]得此双璧，真羡杀人也"。

---

① 康生，王康原名，其弟王子光，原名泽生。

② 王康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系，时在云南大学任教，为昆明《时代评论》杂志发行人，实际负编辑全责。王子光时在联大法律系学习，为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

③ 王觉民，闻家骕的内弟，王康、王子光的父亲。

信中还表示对长房兄弟之行为“最所鄙弃”[①]，这主要是因为其兄弟中的闻亦有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缘故。

二月二十四日　昆明《中央日报》刊登西南联大一百一十〇位教授签名的《对东北问题宣言》。《宣言》认为，“这次大战既导源于东北之横遭侵略，而永久和平亦必以中国完全收复东北为始基”。为此，向政府提出两项要求，第一，“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第二，“政府与苏联均应忠实履行中苏协定，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暂缓撤军一个月，旋又延长一个月，为的是以待国民党运兵接收。随后，雅尔塔密约宣布，内中有国民党政府承认苏军驻扎大连旅顺事，引起人们的民族情绪。其时，苏军从东北搬走机器，工程技术人员张莘夫非正常死亡，于是，国民党在国统区各大城市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游行。先生对此事有所警惕，吴晗回忆说：“研究生考试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搞了个大规模的反苏运动，发表了宣言，西南联合大学有一百多个人签了名。有人也来找一多签名，一多打听了一下，住在他家斜对面的一位签了名的教授，也是当时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从此人的口中，知道主持签名的是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一多就来和我商量，我们就认为这一定是坏事，不但不签名，还想了个法子，通过当时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发表公开声明，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人民日报》，1960.12.1）

吴晗所说的“中间分子”，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向达。当时，先生了解到在讨论宣言修改意见时，冯文潜、汤用彤、向达等教授曾要求在附注中同时说明美国也应撤军，但发表时并无采纳他们的意见，于是对向达说明了情事的要害。向达立即在报上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当时以为宣言系草稿，我口头上对冯（文潜）先生说，宣言原文非重改不可，冯先生也以为然”，“我附注了的意见，就是对于原来的宣言不满意”，要“注明英美对于东北问题的责任”，“为什么宣言发表时只要我的名字，而不要我的意见呢？”（《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第10页，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5月出版）

是月　作《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收《闻一多全集》。文章记述了昆明民主运动的历史和惨案的发生经过，表现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文中末尾说：

“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

① 此句《闻一多书信选集》未收。

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从这一天起，在整整一个月中，作为四烈士灵堂的联大图书馆，几乎每日都挤满了成千成万，扶老携幼的致敬的市民，有的甚至从近郊几十里外赶来朝拜烈士的遗骸。从这天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通过物质的或精神的种种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寄来了人间最深厚的同情和最崇高的敬礼。在这些日子里，昆明成了全国民主运动的心脏，从这里吸收着也输送着愤怒的热血的狂潮。从此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更加热烈的展开，终于在南北各地一连串的血案当中，促成了停止内战、协商团结的新局面。

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战栗的倒下去！

四烈士的血不会是白流的。

这篇文章是为一二·一烈士墓撰写的墓文，文章写完，恰张光年在北平筹备《文化工作》，计划由郭沫若、冯乃超、周扬和先生及张本人作具名主编，来信征求意见并约稿。先生表示同意，并将此文手稿寄去，说稿子要的这样急，来不及写新的，只好寄上旧作。后来《文化工作》创刊号稿子集齐时，北平形势已有变化，杂志出不来了。（据访问张光年记录，1988.2.4）

是月 约洪德铭谈话，动员他参加民盟。洪德铭回忆："二月的某一天，闻先生约我到他家谈话，反复动员我参加民盟，说由他和吴晗作介绍人。我支吾了一下后，就借口告辞了。不久，他又找我去，'将军'似地对我说：'你的中共党籍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就应该参加政党活动，参加民盟，为什么不参加？如果解决了，你可向中共汇报，就说我和吴晗先生要介绍你参加民盟，在里面发挥作用。'在这个情形下，我只好向组织汇报请示，经党组织研究后，同意我参加民盟，要我向闻先生说明，由于要继续民青的秘密工作，只能用田禾这个化名参加，只能作一个单线秘密盟员，不能参加民盟的工作和民盟的组织活动。我按此指示，回复了闻先生，并经他和吴晗介绍参加民盟成为秘密盟员。当闻先生听了我讲的只能作单线秘密盟员的理由后，很严肃而又诚挚地说：'季凯！我们不仅是亲密的师生关系，而且是同生死的同志关系。我动员你参加民盟，完全是为了民主运动的需要。我上次讲的话够彻底的了，我估计你可能已经是中共党员，不过不便说明就是了。其实，你成了中共党员，我是很高兴的，如果我不想在和平民主实现后继续搞学术的话，也是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不过现在还没有作出决定。'这次我和闻先生谈话

时间较长，闻师母几次进房催着吃饭。"（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是月　得到一封家信，说父亲去世了。抗战时期，父亲一直在四川万县避难，当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不顾路途险阻，赶回浠水，最后死在老家。先生听到这消息，悲痛地在床上躺了好半天。

二月至三月间　先生赴昆明长城中学演讲，题目是关于民主教育。

长城中学是西南联大同学在昆明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最早的提出者是刘春生同学。刘春生是吉林省延吉人，他立志光复东北、建设国家，倡议创办一所招收沦陷区子弟的中学。这个倡议得到联大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八省旅昆同乡联合会（习称"北八省同乡会"或"八省同乡会"）的响应和支持，梅贻琦、张奚若、潘光旦等教授也慨然名列发起人。北八省的历史和地理多与长城相关，故学校以"长城"为名，一是表现培养学生"长存邦家之志，为国干城"之志，一也含有纪念联大北八省同乡会支持的用意。长城中学创办于 1944 年，金马山校址是在昆明行医的辽宁同乡张春生先生捐赠，后来云南省曲靖县何非先生也将金马山附近一块地产无偿捐给学校。（方贵龄《忆长城，怀梦华》，《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 30 期，2001 年 10 月印行）

聆听先生这次演讲的凌风在《回忆闻一多同志》写到："记得约在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他在昆明长城中学演讲，讲题是关于民主教育的。在讲辞中他特别提起解放区的情况，根据赵超构《延安一月记》中的记述，说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维持秩序，他对这种情况表示热烈的称赞。他说，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当他演讲完毕，有几个头脑顽固的学生站起来质问，问他怎样知道延安只有四个警察，问他既然不是亲见，如何可以随便相信别人的记述，等等。这种质问是刁钻古怪的，是近于恶意的。闻同志[始]终心平气和地对付这些学生，给他们解答，后来看到他们还是保持深闭固拒的态度，闻同志只好对大家说：'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够可怜的，长时期在黑暗中过活，眼睛看到的是黑漆一团，便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当别人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是有着充满光明的地方的，我们还不肯相信，这不是太可怜吗？'说完，他自己爽朗地笑了，许多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也笑了。在笑声中，那几个顽固的学生显出的很尴尬的样子，再也不敢胡闹下去。"（《光明日报》，1950.7.15）

演讲毕，参观该校织造部，织造部送给他两三双袜子，他高兴地说："拿回去，孩子有新袜子穿，可高兴啦！"

先生对解放区非常向往，曾对孩子说：将来回到北平，把你们都送到张家口去学习。

三月二日 梅贻琦约先生等吃饭，商量联大纪念碑事。但先生未赴约。梅贻琦日记："晚约冯、雷、冯、姚、罗、闻、唐、刘、潘、汤、朱(闻未来)便饭，商写刻纪念碑事。"(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后来确定联大纪念碑文由冯友兰撰文、罗庸书写，碑额由先生题写。

同日 中午十二时，赴南屏戏院出席追悼冼星海音乐会。预告中有请先生讲演一项。(据《今昆音乐界唱悼歌，纪念艺人冼星海》，《云南日报》，1946.3.2)

三月四日 为抗议国民党任用一二一惨案主谋李宗黄为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全校罢课一天。

三月十七日 参加昆明学生联合会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的公葬及游行。

上午，昆明各界民众三万余人汇集于西南联大大草坪。图书馆前停放着四烈士灵柩，到处是挽幛、花圈、黑纱、素花。十一时许，大队分作五批陆续自联大新校舍出发，先生作为治丧委员会常务委员，与学联常务理事及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联大训导长查良钊等组成的殡仪主席团，走在最前列的前导阵中，身后即"一二·一死难烈士殡仪"的大横幅，还有"党国所赐"、"自由民主"等大木牌。人群遵守"不贴标语、不喊口号"的约定，用挽联、路祭、挽歌作为悼念与抗议的方式。"自由之钟"的钟声在庄严悲壮的古城上空回荡。大西门、云南大学、华山西路、武成路、正义路、南屏街、宝善街、金碧路、护国路、绥靖路、青云街等路口都设有路祭，当载着烈士灵柩的灵车通过时，不断响起祭文的诵读声。人过之处，交通停止，每隔五十米不到，就有警察维持秩序，而警察台上则站满了中外记者拍照摄影。直到五时许，队伍才回到联大。

校园东北角是四烈士的墓地，墓道前有两根火炬石柱作为墓门，墓道尽头的石砌高台上，并排着四烈士墓穴。墓后大理石石壁上，刻着先生用小篆写下的"四烈士之墓"五个大字。墓壁上刻着先生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长文。墓地上新扎起一座松柏牌坊，上横书"一二·一四烈士公葬典礼"。

公祭开始，主祭者查良钊，先生与钱端升、尚钺、王赣愚、吴晗等陪祭。一阵爆竹过后，合唱团唱起挽歌，一同学诵读祭文，听者眼中都满含着泪水。三鞠躬毕，默哀，灵柩依次放入墓穴。查良钊向墓穴里铲进一铲石灰，一筐筐石灰倒了进去，挽歌、爆竹、哀乐又响起来。礼成后，查良钊首先致词，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个民主自由、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四烈士虽然死了，而他们未完成的工作，则留给了我们！"接着先生走到墓上，半天说不出话，好久才悲愤地作了致词。右江在《你们死了还有我们》一文中记录先生说：

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

主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我往下看看，今天我们参加陪祭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只有两三位），是害怕吗？还是关着门装不晓得？难道连师生朋友们之情，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这些人上那儿去了？是害怕吗？今天我参加了，不见谁把我怎么样。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第183页，上海镇华出版社1946年11月出版）

接着，与先生一起自始至终参加游行的吴晗也作了致词。他说："墓上有'民主种子'四个字，我觉得这地方应改为'民主圣地'。在历史上中国有圣地，而今天的圣地是民主的圣地。不久有许多朋友要离开这里，将来民主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不忘记在西南的角落上，有一块'民主圣地'！"

这次出殡中，许多祭文、挽联都以诗歌形式出现，这与先生和新诗社的倡导不无关联。李广田说："诗歌方面由于一二·一运动的鼓舞，也空前活跃，以反内战争民主为内容的朗诵诗从教室走向街头，悼词、挽联、祭文都诗歌化了。这种新的形式感动了无数群众，给诗歌开辟了一条新路，闻一多教授便是当时的领导者。"（《重庆文协举行欢迎晚会》，《文汇报》，1946.9.2）

同日　中法大学几位进步青年创办《大众报》创刊号出版，先生为该报题写报头。徐知免《回忆闻一多先生》："昆明学联出版《学生报》，我们有十个老同学集合议定出一份小报响应。他们推我到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去请闻先生题报头。那天晚上，闻先生首先问了报纸情况，还问在什么地方印等等。当时因为特务抢报纸，殴打报童，报贩都不大敢接这类报纸。闻先生问：'你们怎么办？'我说一部分交报童，一部分自己上街卖。闻先生笑了一笑，说：'有勇气，但是要当心啊！'他在灯下题了我们的报头：'大众报'，落款是闻一多。他沉吟了一下，随即又写了一张，无款。然后递给我，说：'写是写了两张，我看你们还是用第二张好，你们斟酌了办吧。'他送我到门口的时候，还是叮咛'要当心啊'！"（《解放日报》，1979.11.22）

《大众报》是中法大学进步青年的喉舌，在昆明民主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这期创刊号为"一二·一殉难四烈士出殡纪念专号"。

三月二十日　联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六九次会议，提荐先生等八十二人为美国援华会特别研究补助金候选人。（《西南联大特别研究补助金候选人提荐名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册，第535页）此事起因，源自为一九四二年美国联合援华会（United China Relief）提出每月拨款一万两千元美金，作为昆明各大学教授之生活补助费，以解决教授们在医疗、子女教育和战时生活等方面的困难。由于这项援助限

定昆明各大学，遂引起中央大学教授的异议，蒋介石亦以接受外援“不光彩”为由，予以拒绝。一九四三年，美国联合援华会改变办法，将援助款总额设为一百万元美金，资助对象仍是昆明，但名称改为研究工作费，并请重庆组织委员会决定分配办法，计划甲种每年两万元，乙种每年一千两千元。教育部讨论时，坚持各地平均分配，并将经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业已转来的五十万元先行分配，数目一律改为一万两千元，名额定为八十二人，人选由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顾问委员会推荐。昆明方面，规定西南联大五十九人，云南大学十五人，北平研究院五人，中央研究院三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六届第一次会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册，第458页）这件事迟迟未能落实，而西南联大何以此时提荐八十二人，原因不明。

三月二十二日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在西仓坡五号本校办事处，举行研究生施子愉毕业初试。初试范围为中国通史、哲学史、文学史。先生与罗庸、游国恩、冯友兰、雷海宗、朱自清、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为考试委员。（据《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三月二十五日 昆明《民主周刊》、《学生报》、《昆明新报》、《时代评论》、《中国周报》、《妇女旬刊》、《生活知识》、《真理周报》、《大众报》、《文艺新报》、《诗与散文》十一期刊联合发表《对当前时局的态度》。

是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等，推翻政协各项决议，坚持国民党一党统治。《对当前时局的态度》为此表明了严正的批评，文中说：“全国人民寄予殷切期待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不但没有自动地表示收敛这种反动阴谋，反而建立了一个反动的领导。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政协会所成立的五五宪草修正原则必须设法修改，各在野党派参加政府人员提经国民党中常会选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于撤销以后须恢复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国民党指导国家政治的最高机构。我们要郑重指出这三项决议是完全违背了政治协商的基本精神，是动摇政协决议，破坏和平、民主、团结的反动阴谋。中国人民在这反动决议下，必将回复到被秕政奴役，被内战牺牲的悲境，世界和平也将因此而遭到严重的威胁。”“我们希望，各在野党派和全国人民，对当前情势必须更提高警觉，加强团结，继续为政协会全部决议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5期，1946.4.6）

三月二十六日 昆明《民主周刊》、《学生报》等十一期刊发表《为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抗议书》。文中向全国人民呼吁：“第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实行四项协定。第二，国民党政府应立刻实践过去一切诺言，立刻取消特务组织，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保证各政党合法而平等的地位。第三，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和包围新四军第五师和东江纵队。第四，这两区域的军事争执完全交由军

调部执行小组处理。第五，国民党政府应立即开放交通，并以粮食医药接济这两支抗日有功的军队。第六，立刻组织民主政府，建立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新中国！”（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5期，1946.4.6）

同日　《云南日报》载先生与徐炳昶、姚从吾、吴晗、贺昌群、汤用彤、雷海宗、姜寅清、浦江清、白寿彝、袁同礼、毛准、王重民、华斯年、向达等人，为救助冯承钧家属发起募捐。（《冯承钧在平逝世，本市教授学者特发起为冯氏家属募补助金》，《云南日报》，1946.3.26）冯承钧，著名史学家，早年留学法国，致力于欧洲汉学研究之介绍，并译有西域南海史地之作三四十种。抗战时因病滞留北平，不幸于本年二月九日在北平病逝。

三月三十日　致闻家骝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说到复员、被选为民盟出席国大代表和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等事，还特别说闻家骝之子闻立训和二哥闻家驷之子闻立志早年赴延安之路，是“完全正确”。信云：

> 联大迁校，暂定五月十日起程，顷已派人往香港调查船只情形，如船只不便，恐须俟雨季过去后（九月间）始能成行，因西南一带，雨季中公路旅行甚感困难也。弟因当选为民主同盟国大代表，大约两星期内须飞南京赴会，会后拟径返北平，眷属则随校北返。目前儿辈已大，再加以驷弟之辅导，沿途照料，想不成问题。迁校之经费，校方当有合理办法，详情现尚未规定。弟个人赴京旅费由同盟担任，则由校方领得之一份自可省下，以补眷属用费之不足。惟在此离昆之数月中，不能再刻图章，此项收入即须完全放弃，损失恐亦不少。志侄已到渝，曾有信来，探询家中住址，并未谈到彼等自身之情况，想系不便谈及也。关于训侄通讯地点与通讯方法，日内当函志侄探询，容有复信后，再行奉告。两侄所走路线，完全正确，关于此事，家中尽可放心。近数年来，弟对此类问题在学理上曾加研讨，并完全赞同。在实际状况方面，亦曾通过英美人士得到报导，结果亦皆满意，故对两侄之行径，实感无上之欣慰。时代在进步中，未可以过去抹杀现在也。

是年春　为酝酿成立中的西南联大学生社团“艺联”题词：“向人民学习”。王景山《闻一多先生的题词》中说：“一九四六年联大复原之前，联大的几个主要文艺社团，想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艺文协会’，这是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事情。……发起单位有新诗社、剧艺社、文艺社、高声唱合唱团、阳光美术会等。我参加了‘艺联’筹备会。当时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艺联’的成立，分头请联大的一些老师们，特别是关心联大文艺活动、担任了联大文艺社团导师的老师们题词，准备装订成册。后来，由于联大复原，‘艺联’没有成立，这些题词就保存在个人手里。我负责找的是

闻一多、闻家驷、李广田三位先生，所以这些先生的题词就保存在我的手里。闻一多先生的题词是'向人民学习'，李广田先生的题词是'不只暴露黑暗，更要歌颂光明'，闻家驷先生的题词是'团结奋斗救中国'。这些先生的题词都是很有意义的。"(《北京大学校刊》第442期，1986.7.5)

是年春 罗铁鹰请先生为《真理周报》写稿，先生答应了，但觉得这类文章应严肃些，还是"慢一点"好。罗铁鹰《忆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一九四六年春天，我由外县回到昆明。为了惦念和得到他的支持、帮助，我到西仓坡联大教师宿舍去拜访他。他那美髯已不在了，他显得年轻了许多岁，但更加消瘦了。我请他为《真理周报》写点稿，他满面笑容地表示一定写，但很忙，须得'慢一点'。一个月后，我又去找他，请他为《真理周报》'赶货'。他微笑地说：'这种货不是随便赶得出来的！我真的太忙，还是慢一点吧！'这时，我的讽刺诗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自感标语口号倾向比较严重，够不上称为诗。我这么说了以后，他的回答是：'管它诗不诗，只要口号喊得响，喊得有力量！'这句话竟然出自曾经很注重诗的艺术性的前辈诗人之口，完全表现了他对诗歌参加战斗的热情鼓励啊！当时，一些民主刊物登的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很是激烈，引起一些争论，有人主张还是注意点以爱护刊物。到底应该如何看呢，我又去拜访了闻一多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坚决地回答：'对敌人斗争，就该凶猛。'"(《云南日报》，1979.7.23)

是年春 由西南联大毕业生创办的昆明天祥中学，从南城脚迁到小坝。迁校后，先生应邀做了一次演讲，并对西南联大毕业生到中学教书大加称赞。时任天祥中学教务主任的许渊冲说："训导主任是程应镠，他和闻一多先生很熟悉，请闻先生到天祥来讲话。闻先生对我们这些联大毕业生心甘情愿在中学教书，大加赞赏，并说教师对学生应该像父兄一样，唯恐学生考试成绩不高。"(许渊冲《天下第一中学》，《逝水年华》第135页，三联书店2008年1月出版) 先生的话，启发许渊冲提出"周考制"办法，即每周星期六上午第一堂课进行考试，国文、英文、数学、史地、理化或生物各考一题，每题限十分钟内。这一对学生巩固知识起了很大作用，是一九四九年前天祥中学能在升学率上一直名列全市前茅的措施之一。

四月三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务长潘光旦信。信云："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毕业论文考试，兹定于本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生论文题目系'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考试委员除本校中国文学系全体教授外，拟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至祈台洽，并恳转知文书科办理通知函件，事务科届时预备茶点等项。至纫公谊。谨颂道安。"(《研究生毕业初试、论文考试聘请考试委员暨报部备案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后，因考试时间

与学校教授会议时间冲突，推迟到十五日举行。

同日　清华大学接受先生辞去中文系主任的请求，朱自清正式就任清华中文系主任。

四月八日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乘飞机自重庆返延安，于山西兴县东南黑茶山触山失事。先生得知后，与李何林、王振华、潘大逵、楚图南、姜震中、尚钺、丁月秋、吴晗、袁震、赵沨、陆钦墀联名电唁。原电以《昆明学术文化工作者痛悼四·八殉难烈士》为题，刊于五月二日《新华日报》。未入集。全文如下：

周恩来先生并转中共代表团及延安中共中央全体诸先生鉴：

若飞、希夷、博古、邓发、黄济生诸民主斗士的死，不止是中国共产党的无可估计的损失，而是全中国人民的最重大的损失。他们的死，是为了保卫政协协议，为了和平，为了团结，为了民主，一句话是为了中国人民。我们，昆明的学术文化工作者，含着眼泪，谨以最哀痛的心情，向你们致唁，劝你们节哀，并请转向死难诸斗士的家属致最诚恳的慰问。我们认为唯一可使死者瞑目的方法，是全中国人民在保卫政协协议的大纛之下，继承死者的努力，排除万难，必其实现。

四月九日　参加西南联大新诗社成立两周年纪念晚会。《联大新诗社诗朗诵晚会》预告："西南联合大学新诗社，本月九日为成立两周年纪念，该社订该晚在联大昆北北食堂，举行'诗朗诵晚会'，有闻一多、李广田、李何林等先生出席，并讲演专题。"(《云南日报》，1946.4.7)

先生与新诗社关系极为密切，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何孝达在新诗社成立四周年时，特写了《新诗社》一诗，表达他对先生的怀念，也表达了先生与新诗社的关系。诗云：

新诗社
成立四周年了
从昆明
万里长征到北平

它的导师是闻一多先生
一直到现在还是
从三十三年四月九日起
新诗社举起一只大旗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闻一多！"

闻一多先生说：
“我们是一把火”
闻一多的名字
　是这把火的舌尖
它在什么地方说话
　火就在什么地方发光

闻一多先生说：
“新诗社不只属于西南联大的
　也不只是属于昆明的”
现在，历史在证实着这些话
北大新诗社
南开新诗社
清华新诗社
中法新诗社
师院新诗社
北洋新诗社
朝阳新诗社
燕大新诗社
——还有许多许多的新诗社
　　都起来了
这把火已烧遍了华北
可是在昆明的老家
　　仍然没有熄灭
它将永远的照耀着
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塚

闻一多先生说：
“我和新诗社是血肉不可分的”
新诗社是闻一多的纪念碑
新诗社是闻一多的铜像
在每一个集会，每一个广场上

怒吼着闻一多的声音：
“五四血统的青年站过来！”

新诗社，继承着闻一多的决心
信仰着
闻一多所信仰的真理
闻一多为了什么而献出自己
新诗社也为了什么而献出自己
闻一多为了什么而永远存在
新诗社也将为什么而永远存在（何达《我们开会》，第206至211页，上海中兴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

这首诗载入何孝达的诗集《我们开会》。该诗集请朱自清选编时，朱自清特把此诗作为压卷者。

四月十二日　下午三时，西南联合大学在清华大学办事处召开一九四五年度第十一次教授会议。主席梅贻琦。先生为书记做记录。

会上梅贻琦报告筹备迁校工作经过情形，报告四月十日校常委会决议：“一、本大学鉴于海陆空交通工具在最近三四个月内之无可设法，应暂缓结束，并应将下学年第一学期提前上课，自六月起至九月中止。在此期内，仍应加紧准备迁移工作。二、本大学下学年第一学期，定六月三日开始上课，至九月七日止，九日至十四日举行学期考试。三、无论平津或昆明方面，将来开课后，在课程上有需要时，三校教师应予调剂。四、仍请迁委会推进迁移工作。”（《三十四年度第十一次教授会议记录》，清华档案室藏）次日，教授会议继续进行，多数人反对下学期仍留昆明，要求按原计划于五月十日开始迁移。

四月十四日　下午一时，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长，在大东门外临江里一七二号龙云公馆（震庄）举行校友话别会。

话别会选在龙云公馆，是先生提议的，其含义大家心领神会。龙云的大儿媳是联大毕业生，担任昆明校友会主席，为了能开成这个会，先生亲自找她交涉，争得同意借到会场。（据访问王康记录，1990.6.6）

参加这次会的有六十余教授和二百余学生。主持是王康。发言中，许多人赞扬联大学术自由精神，先生却尖锐批评联大的教育作风。许师谦（王一）在一篇文章中记述先生的话：我并不满意过去三个学校的教育作风，我认为三校今后应该继承和发挥这几天联大的精神：爱民主、为人民，我们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太坏了，

教我们和人民脱离。做了教授,做了校长,有了地位,有什么了不起?"(王一《哭闻一多先生》,《人民英烈》,第309页)同样的意思也对赵沨说过。赵沨回忆:"我们谈起教育制度来。他对学院教育说了许多不敬的话。他说他自己已身受了毒害,现在却也来帮凶,他认为目前这种大学教育不仅不能给青年们以什么好处,甚至于认为这种刻板式的办法还会毒害了某些才华,尤其学文艺创作,艺术创作,学院教育给他的只有毒害没有好处。"(赵沨《闻一多先生底回忆》,香港《光明报》新4号,1946.10.18)

先生在话别会的发言,有些激动。他说:"前两天一个报纸骂了一个人,于是他的党徒就吵起来,说侮辱了什么。为什么他不能骂,他这些年造多少孽,害了多少人民,我有名有姓,我叫闻一多,我就要骂……"(《人民英烈》,第309至310页)

王康在《闻一多传》中,也摘录了先生的发言:

……联大就要分开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不久就要回到老家去了啦!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我也和大家一样,怀念故乡,怀念清华园。可惜,如今除了那半个中国之外,那儿也不会有安乐土!比如说,这座美丽的花园,多么幽静!这个会场多么欢畅!你们可也知道:丑恶的东西就躲在旁边,要挟威胁,要破坏这个会议,要带军警来检查,要把他们的反动货色硬塞进会场,连这样一点高兴,也不甘心让人享受,连这样一个惜别联欢的会,也违反了什么集会法。现在总算开起来了。但是,这使我不能不想到北平,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恐怕不是什么幸福,也许是更丑恶的灾难!

从前,我们都在北平住过很长的时间,那时候,研究学术的条件很好,日子也过得非常舒服。我们在那里读书,教书,做研究工作,说起来总算多多少少做过一些事情,对大家做过的事情也都很满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工作,当时的生活,好些都很不对头。说实话,我是不满意过去三校的作风的。我希望过去的就让它永远成为过去,三校今后应该继承和发扬这几年来联大的精神:爱民主,爱人民,开创一幅新面貌!

北大、清华、南开,都是有名的大学,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材,这几年三校联合在一起,在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勤学苦读的精神,相信也会出一些人材的。特别是联大成了著名的"民主堡垒",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二·一"运动更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所有这些,我们大家都有深刻的印象。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三个大学都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我们都是在美国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固然也可以学得一些知识和技术,但是经过这八年的检验,可以说,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它教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几乎害了我一辈子!

有些人毕了业，留了洋，干脆不回来了；有的人爬上去了，做了教授，或者当了校长，或者当了大官，有了地位，就显得不同，想的和说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啦！其实，这些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我希望联大的同学再不要学我们的样子。你们这些校友都是走进社会上工作的人了，你们都有责任改革这样的现状，要拿出勇气来，不要重走误人误己的道路了。

别人又以为我在骂人了。是的，对于反动的不公道的不对的事情，为什么不该骂？

前几天有个刊物隐约地骂了蒋介石，于是他的党徒们嚷起来了，说侮辱了什么似的，还有些好心肠的知识分子也跟着说这太过份了，难道说，他这些年造了那么多的孽，害了那么多的人民，骂一下都不行吗？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第401至402页）

冯友兰也记得先生当时说："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帐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帐王八蛋，他就是个混帐王八蛋！"（《三松堂自序》，第356页）

朱自清日记也记录了此事："昨日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词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99页）

先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指名道姓骂蒋介石，在场有许多人都觉得先生太激动了，但了解先生的人却不这么想。流金在《追念闻一多先生》中回忆："有的人总以为他是一个感情极易冲动的人，一说就得情不自已，其实不是。他从不随意说话。他告诉我他不懂政治，所以不写政治的论文。但他执着于一个简单的道理；违反人民利益的，就是坏的。他对于违反人民利益的任何设施，都嫉之如仇。他说：'我们不懂怎么样做于人民有利，但原则是懂的；反之，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我们单凭良心就可以知道。'因为他以为自己不懂政治，所以他开始对于政治加以研究，有一回他读了一本拉斯基的书，他高兴地告诉我：'我们想到的，说不出；他替我们说得那样好！'他有好几回演讲，说到他自己，他说：'我心里想骂人，想了好久，我在朋友面前骂他；×××，王八蛋，大家想想看，他是不是该骂，该骂就骂！'有些人认为他骂得太过火，又有些人认为他是故意如此，耸人听闻，但听他演讲的人，见过他说那骂人的话的表情时，不由得不感到他语气的严肃，真是一种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声音。"（《人世间》第1卷第5期，1947.7.20）

同日　为郭良夫创作的话剧剧本《审判前夕》题签。这个喜剧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审判一二·一惨案假凶手，是联大剧艺社演出的重要剧目之一。曾参加《凯旋》

等剧演出的闻立鹤,此时又参加了《审判前夕》演出。

四月十五日 蒋介石招待政协综合小组成员,希望各在野党派于二十日前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名单,以便进行政府改组与于五月五日如期召开国大。

先生已被民主同盟举为国大代表,但形势变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与三月二十日开幕之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共拒绝参加)公开否定政协诸协议,民盟中央拒绝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二十四日,蒋介石宣布国民大会延期。

同日 下午,主持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毕业论文答辩,王瑶的论文题目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先生很满意,给了八十四分。

四月十七日 昆明《民主周刊》、《时代评论》、《学生报》、《中国周报》、《昆明新报》、《妇女旬刊》、《真理周报》、《大众报》、《生活知识》、《文艺新报》、《诗与散文》十一期刊联合发表《坚决反对撕毁政协决议》。文章指出:"数月来,我们曾几次为我国当前的时局提出意见和呼吁,但我们和全国人民的意见和声音,从没有被政府和执政党所注意所重视。法西斯反动派一直在一意孤行,倒行逆施的破坏团结,阻碍民主,挑动内战,到今天时局的严重,已超过了自停战令颁布和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文中历数了自年初以来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反苏游行、捣毁北平调处执行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等,认为这都是"反对民主,扩大内战,阻止中国走向和平民主统一建设"的阴谋。又云:"由于东北内战的继续扩大,由于国民党蒋总裁公开支持其反动同志扩大东北内战和对政协决议做翻案文章,时局已经由此发展到空前严重的阶段,我们除对国民党出尔反尔的行为再一次提出严重抗议和警告而外,请求全国人民决无犹疑的来阻止国民党反动派正进行的祸国殃民撕毁政协决议的阴谋。并望真正为中国人民之友的友邦,在国民党未完全不折不扣的实践了四项诺言和三大协定而改组了目前的一党政府之前,严重的考虑对中国政府的帮助,特别是财政上的帮助。"(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6期,1946.4.17)

四月二十二日 参加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施子愉毕业论文答辩。其论文题目为《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

研究生考试前,先生与冯友兰有一段尖锐的对话。吴晗在《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中写道:"有一次会议中,大概是清华大学考试研究生的会吧,那时候,一阵反苏高潮刚过去,考试委员来了些人,研究生还没来,大家便闲谈起来。"冯友兰问先生:"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先生回答得很干脆:"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做得对。有头就有尾,当尾巴有什么不好?"(《人民日报》,1960.12.1)

先生的选择，来自于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些亲友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时表示慰问，他们在唉声叹气之余，末了总有“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弄成这个样子”的感觉。先生则很坦然。“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谈，对他的处境很为不平，他非常坦然地把近来的一些感受告诉朋友们：‘纨裤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正直的文人受苦，自古皆然。但是‘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是否甘心做一个奴才，还是决定于自己。人，要活得正直，才能‘留取丹心照汗青’呵。”（王康《闻一多传》，第 282 页）

四月二十四日　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王树勋信。信云：

树勋同学：

政协昆明协进会拟为王秦叶邓等烈士举行一追悼会，但会场问题无法解决，倘由学联主办，当较易于克服此项困难，盼与学联负责人一商是否可行，兹特介绍金若年兄前来面洽，希盼予协助为荷。匆候文安。

王树勋（王刚）当即介绍金若年与昆明市学联主席吴显钺商议。后因内战及昆明形势严峻，追悼会未能举行。（据王刚给编者的信，1988.4.8）

同日　罗常培写信给胡适，说：“民主同盟方面的一多、光旦、昭抡极力拉我入伙。我因甚鄙努生的为人，没有被他们劝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102 至 103 页）

四月三十日　西南联大英籍教授罗伯特·白英去先生家。两人做了长谈。白英在一九四七年由美国出版的《觉醒的中国》中记述：“我去看了闻一多教授。他外表很好，脸晒得红红的，不再布满伤寒病的苍白色了。……他说：‘同学们在这儿干出了惊人的事情。他们走上了艰难的道路，他们愿意承担困难。人们竭力鼓动我离开中国。加尼福里亚大学要我夏天到美国去。嗨，我不想谁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可我不能不留下来。’他谈到对民主同盟的希望。‘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不断促使双方防止所有灾难中发生这一场灾难——内战。我骄傲这儿大学的学生首先看到这危机。没有比这更大的危机，没有一个人能从中取胜，而中国人民将遭殃。’我告诉他我同前北京大学校长、现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的奇异的谈话。‘好吧，他们愿意相信我们是共产党的尾巴，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爱怎么信就怎么信。我呢，我相信我们是人民的尾巴，我们还要把尾巴摇下去呢。’我们穿过文林街，我说我打算很快飞往北京。‘这么说，你的梦想[①]快实现啦？’‘是啊——梦想的一部分。’‘那一部分是什么呢？’‘哦，中国的和平——在一百件事里，和平是最重要的。’他握住我的手。‘我们一定要和平，一定要有和平。别的算不了什么。’他露出牙齿笑着，

① 指白英有去延安访问的计划。后，白英两度到延安，并著有《红色中国之行》等书。1947 年，白英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当代诗集》，篇首印着“为了悼念闻一多”，内中还附有先生的《时代的鼓手》英译文。

说,'我正新写一首诗。我要把这首诗送给你——这是关于中国的一首很有讽刺意味的诗。好多人都在争论中国将要走什么路。'一些农民走过去。'你想他们希望战争吗?关于中国,最好的归纳是还在战争——而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久久目送他顺着小街走去,蓝色的长衫在风中移动着。在中国,对他我比对谁都信任。这位沉静的学者的才华是无限的。一想起我们能够在北京一起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译述工作,再也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了。"(转引自张小怿《诗人·学者·战士》,《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49至250页)

在《觉醒的中国》一书中,白英还记述了对先生的了解:"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三天以前,在昆明的街上,国民党武装党徒以冷酷而难以想象的残暴,杀害了另一位学者,他是我的朋友。我做梦都不敢想,如果我一想起这件事,所有的梦都复盖着他的影子。这以前我还没记述他的死,因为我办不到。他是我在中国认识的最伟大的人物,对工作一丝不苟,极其胜任他的工作,在联大所有教授中最为知名,是一个有着极温和的微笑和极成熟头脑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闻一多,意思是'一人多学',只要肯学,由此及彼,什么都能学到。他早年热望绘画,赴美回国时心中充满色彩,他已写了两本小小的诗集,希望建立起中国新诗的殿堂,并决心以有生之年按照现代批判的观点研究古代中国经典著作。我们常在一起,我都记不起第一次相会是什么时候了。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留着一付金黄色的胡须,正像他解释头发的颜色那样,他解释说,他认为自己是某一部落民族的后裔。他体弱,战时挨饿,担任中国文学部[①]负责人时,还在中学里任各种临时工作,所以他自己的时间一点也没有。当十二月学生被杀害时,他竭力使人们作出公正的判断,他这样做遭来许多忌恨,所以就在那时,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说话有一付好嗓音,有时因为感情激动的抗议而变得低郁起来。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今年三月十七日他领头走在为死难学生举行的葬礼行列前面,走过昆明的街头,在坟前向死者作了极其悲哀的告别。虽然他不断坚持在孔子体系下父亲的地位纯属暴政的主张,他天生是一家之主,而他的孩子们热爱他。他会说:'一定要摧毁家庭——我们一定要效法西方',虽然英语里已经失去了这些话在中国所包含的言外之意,虽然他辨别西方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中最为智慧的一个,他总归比谁都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先驱者。我同他沿着湖边散步,有时,午后或晚上,我会来到他家,看他坐在桌旁,俯着头,在赶刻图章,这样他才能养活孩子们——他讨厌这样浪费时间,尽管刻出的图章有时能卖不少钱,他会说宁可

① 指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

在中学里一星期教十八小时的课，在中学里，他至少可以按中国老传统热心投入工作。一点也不奇怪，事实是，他在联大比谁都厉害地在破坏这些老传统。去年他在云南南部石林之行后，害了一场伤寒；后来我看到他穿着破旧的蓝长袍，拄着手杖，缓步走过校园。学生们会向他跑去，问他古典著作中的释义；他总是特别温和地同他们交谈。他的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大概有四十个学生在窗外听课。他冷冷地瞧不起那些认为没有必要向学生讲政治问题的教授。他公开讲，他相信中国现政府是腐败的，讲时他那清秀而骨骼外露的脸上毫无惧色。有一回我带他去看美国领事，最让人高兴的事是闻在一个美国家庭里作客时那种说不出的愉快。贫困和非议围攻他，但他有一颗坚强的心。有一次他几乎在重压的折磨下垮下去，但他很快恢复过来，而且以后决不显露一点点痕迹。战争开始时他带领学生从北京长途跋涉到西南，我们总以为带他们回去的只有他。我们再也不能指望他了。然而我们没有想到他会像现在这样死法：刚开完会回来，四个匪徒就用美制无声手枪厚颜无耻地枪杀了他。他身中六弹，几乎立即死去。他儿子站立的地方离他不远，看到父亲倒下去，赶过去伏在父亲身上，喊着：'让我替你死，爸！'很快他失去知觉，因为匪徒们用四颗子弹射中了他。他们说父亲的遗体将被火化，骨灰葬在去年十二月死难的学生们近旁。儿子活下来了，虽然还没有脱离危险。他在医院病床上告诉人一件奇怪的事：凶手们向他打枪之前，站在对面说：'我们一定得打你，要不我们活不了，可我们不打死你。往后，你好了，报我们的仇得啦。'"（转引自张小怿《诗人·学者·战士》，《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50至252页）

文中谈到美国大学邀请先生讲学的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亦有记述："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请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想推荐闻一多去，向闻一多一说，他就拒绝了。他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才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路。"（第353页）

其实，先生收到加州大学邀请函后，并未当即拒绝。他同妻子认真商议，又与知心朋友交换意见。他曾想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呼声了解不够，此行可以做些宣传。但又考虑到北平的民主运动很需要人，因而决定不出国。

是月底　先生接连三遍看了一部名为《一曲难忘》的英国影片，见到王瑶时，让他也去看。王瑶在《忆闻一多师》中写道："闻先生平常不大喜欢看电影，今年四月底，在昆明晓东街碰着闻先生从南屏电影院看戏出来，他一见面就说：'这部片子非常好，你可以看看，我已经看过三次了。'我当时有点奇怪，后来看了之后，才知道那片子是叙述一位波兰音乐家的故事，那位音乐家一生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但

对工作的热忱和努力，绝未少懈，后来曲成演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竟以奏曲时精力过于集中致命亡琴前，像这种鞠躬尽瘁地为了工作努力的精神，正是闻先生生平的精神。"（北平《民主周刊》第10期，1946.9.12）

历史系同学蔡显福（蔡海南）也回忆到此事："有一次闻先生介绍我们去看英国影片《一曲难忘》，他说自己深为这部影片所感动，一连看了三遍。这部影片是表现世界著名的波兰爱国音乐家萧邦的，萧邦曾被人誉为'波兰起义的风奏琴'。他的作品集中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的主题以及波兰人民酷爱自由的精神。影片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萧邦对祖国的热爱，他的大无畏精神，都引起闻先生的强烈共鸣。"（蔡海南《从象牙之塔至十字街头——纪念闻一多先生八十诞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48期，2010.10）

是月 为吴晗治印，边款云："三十五年四月制，时与春晗同寓于昆明海子边之西仓坡。"为尚钺治印，边款云："三十五年四月时与健庵兄同客昆明。"为郭良夫治印，边款云："三十五年四月时与良夫吾弟同在昆明。"这时，先生多是为朋友治印，以作为分别留念。

四月至五月 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朱德熙的论文导师（另一导师为唐兰）。在审阅其关于甲骨文论文时，认为他很有见地，遂决定留朱德熙在清华大学任教，并让何善周去找朱来谈谈。（据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58页）朱德熙来找先生，先生让他参加民盟，朱不好说不参加，就加入了，但未参加活动。（据朱德熙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举行的纪念闻一多牺牲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6.7.3）

这时，先生对研究工作还是不能忘情，表示联合政府实现、民主政治得到保证的那一天，将退回书房，重新进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吴晗《哭一多父子》："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的前面，两个小杌子，两杯茶，两支烟，谈了许多事之后，你喟然说：太空虚了，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要好好念书了。天可怜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只要有这一天，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周报》第46期，1946.7.20）

五月二日 与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吴晗、潘大逵、费青、朱驭欧、向达、闻家驷、冯素陶、尚钺、吴富恒、陈定民、许杰、陆钦墀、许维遹、余冠英、姜震中、赵崇汉共二十教授联名发表《致马歇尔将军书》。刊于昆明《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八期。未入集。

时，马歇尔自美国返华。在美期间，其力争国会通过给国民党政府巨额贷款，返华后又协助国民党运送军队去东北。东北内战有延及关内变成全国性内战的趋

势。《致马歇尔将军书》即在此背境下发表。全文云：

马歇尔先生勋右：

正如你所预料，在你离开中国的三十八天内，你所确指的“顽固分子”果然竭尽全力破坏，撕毁了停战协定、五项协议和整军方案。

“顽固分子”顽固到全盘否认了屡次给予的诺言，并企图在宪法中建立法西斯式的总统独裁制，和绝对违反中山先生遗教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他们还把“中统”、“军统”的特务人员在伪装的形式下分布到警察和交通机构中，使万恶的特务制度更强固化合法化了，以便镇慑中国人民，从而保持其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一人独裁一党独裁的所谓“法统”和既得利益。

他们在二中全会中制造了“党意”，在参政会中制造了“民意”之后，随即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想来这四十几天来的真实情形，你一定比被封锁被窒塞的我们知道得更清楚。

对于代表美国人民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你，正如拉法耶将军之于美国人民一样，我们的感激之情是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正因为如此，为了不使你过去的努力被顽固分子的勾当所抵消，你现在的好意不致被顽固分子的阴谋所玷辱，我们愿以中国人民的立场，提出解决当前危机的几个要点，来供你参考。

第一：中国人民绝对反对内战，东北问题是政治问题。唯一符合东北人民利益方案，是遵从他们自己的愿望，彻底实行政协五项决议，承认东北民主联军和人民自治政府。实现这方案的必要的先行步骤是：（一）美军立刻停止为国民党运输军队。（二）美国停止供给国民党军武器配备。（三）在执行小组监视之下，东北立刻停战。

第二：国民党政府必需做到以下几件事：

A. 立刻释放政治犯和惩办“一二·一”、“二·一〇”以来各地暴行的凶手。

B. 对国民党政府中的著名顽固分子予以彻底清除。

C. 公布依据政协协议而修改的国府组织法，确定国府委员的名额，民主党派应保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否决权。

D. 行政院和国府同时改组。

E. 确定国民大会为制宪会议，制宪唯一的依据是根据政协的修宪原则而起草的新宪法。

第三：在前两项未能完全办到之前，更具体地说，在各党派合作的新政府

成立之前，我们希望并要求美国政府不以任何形式的借款贷予国民党政府，因为这样只有帮助国民党政府屠杀更多的中国人民，并延缓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最重要的一点，那便是：国民党军用以进攻和屠杀中国人民一切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都是贵国以援华的名义所供给它的。恕我们坦白地向你表示：只有有效的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才是今天巩固中美友谊的最好机会。

我们确信你和你所代表的美国是决不肯错过这机会的。

这封信发表前，为了把交给马歇尔还被译成英文。潘大逵回忆说："该信由尚钺起草文稿，交朱驭欧译成英文。闻一多还说：中、英所用的词句都很不恰当。"（潘大逵《我参加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9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五月三日 晚，昆明学联与昆明文协在云大至公堂举行"文艺晚会"，总题目是"人民文艺的道路"。报告人有楚图南、李广田、朱自清、李何林、闻家驷、夏康农、孟超。先生做结论。

《五四纪念周在昆明》报道："在五三的晚上，学联与文协在云大至公堂举行'文艺晚会'，总的题目是'人民文艺的道路'。七点多，至公堂已坐满了人。主席楚图南先生报告后，李广田先生讲'从小说说起'，朱自清先生讲'关于夏丏尊先生'。当朱先生讲完之后，李何林先生提议'对这样的一个民主战士的逝世，我们应该起立默哀三分钟'，到会千余听众立即肃立默哀，灯光黯然，对一生受难的民主战士的长逝，大家从心底感到悲悼。李何林先生讲'人民文艺的政治性'，闻家驷先生讲'诗歌朗诵'，夏康农先生讲'鲁迅与人民文艺'，孟超先生讲'中国戏剧的方向'。他们一致指出在今天的文艺要求更接近人民，为人民服务，李广田先生并指出在今天的文艺不仅只是暴露黑暗，也应该指出光明，因为光明已经存在。最后，闻一多先生做结论，特别指出光明就在人民身上，我们要向人民学习。"（昆明《学生报》第15期，1946.5.12）

文骥在《五月的昆明——记昆明文化界的盛会》中也记述到了先生："最后闻一多先生用他简练的语句作结论，他这样爽直地指出：不要怕别人骂我们为小人，'小人'便是人民，我们要和他们——小人更接近，去建立人民的文艺。"（昆明《妇女旬刊》第2卷第2期）

同日 朱自清参加同文学会，认为"学生发表各种批评言论，均为一多所提议者"。（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02页）

五月四日　上午九时，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结业典礼，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同学从即日起分批离昆北上。

典礼后于校园东北角举行联大纪念碑揭幕式。碑额为先生用篆书题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由冯友兰撰写，罗庸书丹。背面刻有八百余从军的联大同学名单。

先生没有参加结业典礼，而是应昆明学联之邀赴云大至公堂出席“五四”纪念会及青年运动检讨会。在会上，与同学们共同讨论青年运动的任务、民主革命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斗争的组织问题等。《青年运动检讨会记录》记述了先生的发言。在谈到“五四的历史背景及其成果”时，先生说：

> 五四运动促进了青年的觉醒，觉醒的结果，是两个任务的被提出，那便是反帝与反封。反帝即民族解放，反封即民主革命，二者实不可分离，因为封[建]势力必需勾结帝国主义来维持它的政权，帝国主义也要封建势力做他的走狗。
>
> 一二·九、一二·一以分别的完成上述两项任务为目标。一二·九的成果是七七抗战，抗战使反帝的任务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剩下的一个任务，反封建，已经由一二·一运动担负起来。一二·一的成果是政治协商会议，虽不太令人满意，但不失为达成反封的任务的一个开端。
>
> 民主革命的意义比民族解放还要深刻。如果没有同时把握住民主革命的意义，民族解放的意义是会被歪曲的，这次用所谓东北问题来掀起反苏风潮，便是实例。一二·一的任务比一二·九更为艰难，因为民族解放的意义容易了解，而民主革命则不然。一二·一时代的青年担负了更高一级的工作。这是由于今天的青年比过去进步的缘故。

当讨论到“青年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作用”时，先生又说：

> 刚才有人提出了知识青年是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
> 他们既有知识这就证明他们起码是中产阶级，因为有钱，才能读书。但他们又是青年，那便是说，他们尚未成年，经济权是操在他们父母手里，而不是在他们自己手里，所以他们虽属于中产阶级，而在财产所有权上，又像是无产者。这种特殊的情形，使得他们的意识平常易接近无产阶级，或广大的工农大众。所以知识青年们成了民主运动的先锋，是因为他们特殊的经济基础的因素，而不是敏感不敏感的问题。明白了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知识青年在今天民主运动中是领导还是先锋”，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
> 知识青年在意识上既是接近于工农大众，而他们的地位又是夹在大地主

官僚买办(压迫者)与工农大众(被压迫者)二者之间,所以当在下的被压迫者起来对在上的压迫者反抗时,他们这些夹在中间的知识青年便被推挤上去,作了被压迫者的先锋。其实,如果在下的不往上挤,他们也可以不动,但今天在下的忍受不住压迫,非往上挤不可,而在上的又死不放松,在这冲突中,夹在两个压力之间的知识青年自然是不免要有些牺牲的,因为压力来了,他们首当其冲。这样看来,今天的知识青年是民主运动的先锋,但是,是一种被动的先锋。换言之,民主运动的真正的原动力是在人民大众中间,知识青年是接受了人民的意志而奋勇的冲上前去与敌人搏斗。在接受人民的意志这一行为上,他们虽是主动的,但如果人民无此意志,他们便根本谈不到接受,所以在实质上,他们仍是被动的。

当讨论到"今后中国青年应该做些什么"时,一个同学说:"我们青年学生的任务,是为了人民大众,争取人民大众的幸福和利益,这也就牵涉到政治上去了。"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说:

在去年五四纪念晚会中我曾提出五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初期,教师与同学是一致。后来,教授的态度渐渐转变,不同情学生,甚至压迫学生,他们的理由是:运动渐渐被政党操纵了。

当时那政党不用说就是国民党。我们知道自从五四运动受国民党的领导,才转化成一股政治力量,这政治力量终于打倒了北洋军阀,完成了国民革命。试问我们今天谈历史,对于当时国民党那一着,是否感到无上的欣慰,认为它来得正是时候呢?相反的,假如国民党不那样做,五四运动在中国政治史上能有今天这样大的意识[义]吗?但是今天我们读历史时所庆幸的,正是当时教授们所诅骂而惋惜的,其实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为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果实,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成果。同时一二·九运动之被人指摘为受党派利用,也正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样。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两度的指摘同样的是愚蠢无知,然而今天的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无知也依然在叫嚣。我说青年运动必须转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那运动才不算白费,而青年运动之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也正是青年运动必然的发展。自从政协会议开会了,一二·一,青年运动实际已开始渐渐过渡到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阶段了。今天昆明的青年运动如果呈露着疲惫状态,要知道那并不是运动的失败,而正是它的成功,因为它已经转入一个新阶段了。相反的,一个运动如果老停滞在运动状态中,那个真是发育不良,真是可

悲的现象。运动不宜也不会老停在运动的状态中，它必需也必然逐渐接受甚至寻求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领导，换言之，参加运动的分子，到了某一时期，必然大部分退下来，另一部分则正式参加到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中，形成为更坚强的政治力量。适应着时代的要求，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今天是存在的，也许不只是一个。问题只在今天的青年是否将响应时代的号召，以比五四与一二·九的青年更坚决的意志，更高度的热诚，投身到他所应投向的政治团体，完成时代所赋予他的使命。我们应认清历史的规律，接受历史的教训，大胆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来诬蔑或恫吓青年的，不是无知便是无耻。这些家伙必将成为未来的历史上的笑柄，正为五四与一二·九时代他们的同类，在过去的历史上一样。(昆明《学生报》第15期，1946.5.12)

尚土在《痛忆闻师》中亦记录了先生发言情形：参加罢毕业典礼后，我飞跑赶往云大，那时已近中午。至公堂听讲的人中同学占了一半，我紧忙找个位置坐下，听先生正这样一字一板地讲："不要害怕政治，统治者施行恐怖手段，目的就是教你怕政治，不管政治，他好为所欲为，大行方便。你若是真的怕了，不管了，便上了他的大当，其实人就是政治动物，用不着怕。中学同学年龄太小，我不赞成你们参加甚么政党；但大学同学，尤其是三、四年级的同学，快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应该赶快决定你究竟参加哪个政党，或是参加国民党，或是参加共产党，中国就这两个大堡垒。我是民盟的，我不卖膏药，不劝你们参加民盟。"(《人物杂志》第2年第9期，1947.9.15)

时，近日楼、青云街、文林街等处先后出现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咒骂民主运动的标语和壁报，对先生等人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们的名字篡改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诬蔑他们是拿卢布的俄国特务，无耻造谣称"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闻一多夫"，并公然扬言悬赏四十万元收买闻一多的头颅。吴晗在《闻一多先生之死》说："昆明市上特别被关照的几种小刊物，《光明周刊》、《正论》、《民主与时代》经常对一多实行人身攻击。有一篇文章劝一多学屈原，跳昆明湖。有一篇文章挖苦一多，以博得听众掌声为满足。甚至下流到说他之所以愤慨，是由于家庭生活的不满。种种侮辱、中伤，一多成为特种人物的箭垛了。"(《文汇报》，1946.7.31)

赵沨在《李闻惨案前后的昆明》也写到：国民党二中全会后，"反动的小报和壁报叫嚣得更厉害了。说：中共派艾思奇来云南策划暴动了，又说：李公朴带来四万万元现金和美女七名来昆活动了。昆明飞机场的特务团受命学习机场防御战。防御武装暴动，海口成立了一个集中营，准备了六百多个床位。有些机关、住户被搜

查了。近日楼壁报更开了无耻的人身攻击，称罗隆基为罗隆斯基，吴晗为吴晗洛无，楚图南为楚现屠夫，闻一多为闻一多夫，甚至于说出闻一多要组织暗杀公司一类无耻的话了。”“快放暑假了，联大决定要迁回北平了。昆明的海德公园——近日楼的壁报宣传战争更尖锐了，联大的壁报叫《民主》，反动派出一个《真民主》铅印的反动小报来对付《学生报》、《时代评论》、《大众报》之类的民主刊物，也怪了些漂亮的名字，叫什么《新中国》、《时代与民主》、《真理》等……。五四，学生们有纪念集会，有个什么‘民主自由大同盟’却说五四是国耻，雇了一百多苦力摇旗呐喊游行全市，准备跟学生的队伍打架。”“学联的壁报贴出去就被撕毁，或者，在壁报上，贴些不要喝冷水、小心苍蝇的标语。近日楼完全是反动派的势力了，但《中央日报》却假惺惺地提出了‘宣传休战’的口号。而民盟的《民主周刊》、《学生报》、《新华日报》的报贩时常被宪兵拘捕，没收报纸，侮辱、殴打。”“人们都预感着：昆明要出事了。”（香港《光明报》新4号，1946.10.18）

同日 下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各自开会、先生许是在这个会上向学校口头提出调整中文系、外文系机构的建议。现存手稿中有建议内容，后经朱自清整理，以《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为题，收入《全集》。其前一部分为先生的原稿，后一部分为朱自清据先生手稿纲要联缀而成。

从文中可知，长期以来，先生深感旧的教学体制存在着“中西对立、语文不分”两个弱点。大学里文、法两学院各系大多数课程都包括中国与西洋两种学问，没有把哲学系分作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个系的。“惟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作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学两系”，这种“畸形现象”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恰好代表着这两种社会的残余意识，至少也犯着那种嫌疑。一方面是些以保存国粹为己任的小型国学专修馆，集合着一群遗老式的先生和遗少式的学生，抱着发散霉味的经史子集，梦想五千年的古国的光荣。一方面则……为高等华人养成所，惟一的任务是替帝国主义（尤其是大英帝国主义）承包文化倾销”。这种情形近年已在转变，但残余习气依然保存得不少。中文、外文两系“各处极端，不易接近，甚至互相水火”，“但这现象并不妨碍两边都有着反动的分子出现”，“极端守旧的国粹派学起时髦来比谁还要肉麻，相反的，假洋鬼子也常常会醉心本位文化到歇斯的里的程度”，这“对于真正沟通融会中西文化的工作，大概不会起什么作用”。关于“文语不分”，中文系“以文学为主，文字学是文学的附庸”。外文系“好像‘译学馆’，专重语言训练，特别是英语训练”。若将“外国文学系改为外国语文学系，除英语外也注重第二外国语，并且有了古典语言（希腊、拉丁）与梵语的科目。中国文学系也分了文学与语言文字二组，语言文字组注重语音、文字、文法以及少

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于是语言由'附庸蔚为大国'。"此外，"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就是语言学的科学化"，"而文学是属于艺术的范畴，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虽也采取科学方法，但文学终非严格的科学"。"语言学与文学并不相近，倒是与历史考古学，尤其社会人类学相近些。所以让语言学独立成系，可以促进它本身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历史考古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发展。""说到了新时代的新要求，战后时代转变了，次殖民地解放了，中国要近代化。我们要继续大革命后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努力，不复古，也不媚外。这是新中国的开端。文学应配合我们的政治经济及一般文化的动向，所谓国情的，自主的接受本国文化与吸收西洋文化。说文学是精粹的语言，等于说文学是修辞学，偏重形式，是错误的。"先生特别强调"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是我们的目标；采用旧的，介绍新的，是我们的手段。要批判的接受，有计划的介绍，要中西兼通"，因此，有必要"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文字组、语言文学组）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

先生这一建议，受到学校师生的重视，朱自清、浦江清、王力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学生中支持者更多。直至一九四九年初，清华代理外语系主任吴达元还"约中文系同人联合外语系同人共同商讨课程，因有人提及中外文系合并问题"，以"实现闻一多、朱自清两先生的主张"。（浦江清《清华日记·西行日记》，第250、253页）只是由于实施困难，梅贻琦又已南下，清华刚被中共接收，这个方案才方暂时搁置起来。

同日　晚，出席文协昆明分会组织的文艺座谈会。《文协分会下午七时开文艺座谈会》预告："今日为抗战胜利后第一届五四纪念节，文协昆明分会订于今晚七时，假福照街市商会开座谈会，该会在昆全体会员均可出席参加，依照座谈会讨论提纲，分别由会员自由发言，俾对今后文艺路向等问题，得出一正确之结论。该会会员闻一多、尚钺、楚图南、李何林、李广田等均将参加座谈，本市一二大报并出纪念专刊。"（《胜利后首届五四节，文协分会下午七时开文艺座谈会》，《云南日报》，1946.5.4）

同日　中苏文协昆明分会以人民艺术社名义主编的《人民艺术》创刊号出版，刊头是先生用篆书题写的。创刊号登载有楚图南的《新时代文艺诸问题答客问》、尚钺的《枪声》（诗）、金若年的译文《谁在那里走？》（苏联：耶·枯帕拉作），及中华文艺协会总会《告全国文艺工作者》等。

五月五日　中午，赴巡津街四十二号，参加清华学校辛酉级毕业二十五周年联欢会，东道主黄宪儒。出席者有在昆级友孟宪民、黄子卿、李继侗、罗隆基、潘光旦等。梅贻琦亦应邀出席。席间，先生"大声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华、留美教育决裂，重新再做学生"。（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08页）

五月六日 学生黄福海(黄海)向先生辞行,先生留他吃晚饭,并谈到深夜。临别,又为他题写了离别赠言:"君子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在署名后面,先生盖上一枚自刻的印章,上为"叛徒"两字,解释说:"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黄海《宁死不屈的教授诗人闻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45页)

先生为友人治印,常刻边款以寄托情怀,曾为一朋友治印时,边款刻有尼采的一句话:"每个诚实的人的足音是响的。"(海燕《悼念人民的诗人——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第44页)

五月七日 吴晗与夫人袁震离昆飞渝。袁震一直患病,急需到上海做手术,吴晗天天去机场买票,一个月也没买到。刚从重庆到昆明的罗隆基知道后,给航空公司经理写信说张学良要学明史,莫德惠推荐吴晗去教,事情很急,需立刻飞重庆,这才买到机票。

这天,先生全家为吴晗夫妇送行。吴晗《一多先生周年祭》:"我向你告别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们到院门口,你看着我居然先走,有点感伤。嘴里说两个月后北平见,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难过,你的笑容是勉强的,最末一句话是要我回清华园时,先看你旧居的竹子。"(《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第24页)

吴晗离昆前后,先生接替了民主周刊社社长职务。

这前后,与即将离昆的闻家驷也有一番长谈。闻家驷《忆一多兄》:"在我离开昆明前一两天的一个下午,一多兄到我家里来看我,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话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平时因为工作忙,除了在公共场合和他见面以外,他很少来看我,而我去看他又往往碰上有人来找他,或者就是他不在家;能够像这一次那样从容不迫地两个人坐下来,大事小事一起聊,在抗战后期昆明那种紧张动乱的岁月里,的确是很难得的。我记得他曾告诉我说,他因为在昆明还有些工作须要处理,不得不把行期往后推迟,同时,他还想顺便回武昌去看看;巴河老家是来不及去了。他又说,抗战虽然胜利了,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回北平后恐怕还不能很快地恢复以前那种教书生活。他又曾嘱咐我,曾昭抡和吴晗要回北平,关于民盟的工作,和他们两位联系就行了……临走时我送他出来,我们又站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好像彼此都还有很多话要说似的,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71页)

先生很思念自己的家乡,还是联大湖北同乡会的积极参加者。他回到家里爱说一口浠水话。他曾对彭兰同学说:"狐死必丘首,乐操南音不忘旧也。我们热爱祖国的思想就是由热爱乡土的思想发展出来的。"(彭兰《风范长存》,《北大学报》1979年第5期)

是月上旬 罗隆基是月三日自重庆抵昆明,候飞机北上。留昆期间,罗宣传

"民盟单一化"主张，即：一、各政团均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民盟不应是再有政团为成员；二、共产党员也同样是有党有派的，也应退出民盟。先生不赞成他的第二项主张，曾与楚图南、冯素陶去找罗隆基辩论，还向民盟中央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态度。（据冯素陶《忆李闻》，《云南盟讯》1981年第7、8期合刊）

五月十五日　下午三时，出席清华大学一九四五年度第五次教授会议。会上校长梅贻琦报告说：联大于下月结束，北迁事将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同办理。说到复员事时，云："空运赴北平事，上月已得交[通]部协助订有办法，惟渝平一段较易，昆渝一段较难。现已商妥每周中航公司赴渝之三次班机均留有三个座位，如有加班机亦设法随时接洽。本校同人可先填表登记，以便与北大、南开共同编配次序。"接着，审查本届研究院及本科毕业生成绩案，通过王瑶研究生毕业。（《教授会会议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五月十六日　清华大学召开迁昆明后第三十二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议决续聘先生与朱自清、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据《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与部分材料》，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时陈梦家在美国，要求续假一年，故未续聘。

五月十七日　清华大学召开第三十六次评议会会议，议题中有复员回北平清华园后的教职员住宅分配问题。议决新南院甲种住宅等八处改住两家，其中有先生原先所住的新南院七十二号。先生为此不满，曾与校方力争，其他教授亦因分配欠妥滋生意见。于是六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七次评议会会议，议决"新南院甲种住宅三所，原定应改由两家居住，如各该住宅原住人员人口众多，得经学校许可后，仍由一家住用"。（以上议决均据《评议会会议记录与部分提案》，清华大学档案室藏）后来，校总务处给先生发出通知，准许七十二号仍由先生一家居住。①

五月十八日　李公朴从重庆回到昆明。旋，先生在一次宴会上见到李公朴，关心地问起较场口血案。李公朴说："血流得很多，满身都是，揩血的手帕，都扭得出血水来。"在座者都为李公朴的精神所感动。

先生等还问起重庆才能知道的一些形势内情。李先生说：东北的时局发展到现在状况，完全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本来苏联是完全遵守中苏协定，只承认国民政府，苏军在东北所缴的一切物资都打上封条，等政府接收。可后来各地反苏游行被发动起来，又发生在长春辱打苏联领事馆副领事，杀害几个苏侨的事，苏联的态度才变了些。谈到长春，本来苏军是等着中央军去接收，因到处发生反苏游行，给

① 先生遇刺后，清华大学即将已分配的新南院七十二号收回，致使高孝贞和子女回到北平后不能在清华园内安身。

苏军很大刺激，苏军才通知政府为了避免误会，他们立即撤退。这时周恩来打电话问国民党在长春周围有没有军队去接收，国民党虽收编了伪军姜海鹏部，但不敢明说，于是中共军队才接收了长春。李公朴还讲了周恩来谈的几件事，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末了，李公朴还透露说，日本投降时，东北人民希望中央军去接收的心情非常迫切，对国军的信任占第一位。可是国民党用接收上海、南京、北平的方法接收了东北二十几个大小城市，人民的信仰立刻改变了，转为中共和民主联军的信誉成为第一位。李公朴还介绍了重庆民主运动发展的情形，使在座者得到许多新闻。（石仁《东北问题的发展》，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11期，1946.5.26）

五月十九日 先生等九十八人、十三团体联合署名的《昆明文化界致美国和平委员会的信》，刊登于是日《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期。

四月一日，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萨柏司等十四人组成的“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发表宣言，建议美国为了保证持久与公正的和平，在外交政策上必须采取的六项原则，即：美苏友谊是国际和谐合作的基础；反对用武器装备转让来进行盟国的内战；用武力对付殖民地解放运动是威胁世界和平的行为；解除德国日本作战资源；与纳粹与法西斯前哨国家断绝关系；实现管制原子能协定。先生等致信表示赞成其主张，原信如下：

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诸位议员先生：

我们，下列签字人和人民团体，一批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的爱好者，知道诸位先生于四月一日组织了“争取和平委员会”并提出美国外交政策六项原则这样的消息以后，感觉到极大的欣慰，特致电表示我们的意见，并申述对于这一高贵的举动足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以及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的愿望。

贵国是安定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然而诸位先生还不免于有上列委员会的组织，可见得和平在贵国内也还受着威胁，有待于努力争取。世界和平不可分割，正犹知甫告结束的反法西斯正义战争不能由一国两国单独担任就可以致胜是一样的道理。中国人民不顾成败利钝，忍受了八年期间全国性的惨重牺牲与摧毁，坚持了强弱极其悬殊的抗日战争。虽然由于我国一党专政的政府，秉承历史上专断、独裁的恶习，不知道善培民主向上的力量，以致于我国很惭愧地不曾发挥其应有的更大的贡献。但是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这一场胜利，曾经尽了它的最高度的神性的忍耐和牺牲，这是贵国无数人民和远识的新闻记者所已经熟悉报导和称赞过的。今天，和平对于中国人民的需要是超于一切的急迫，而和平稳定以及民主建设的工程，在这里却还存在有极强大的困难与阻隘，仍然由于上面所述的敝国现存政府历史的弱点，它的见

识看不到民主和平的大路，而宁愿寻求外力支持它的独裁的统治，只迷信武力与内战是维持政权的办法，这里，我们就无限敬佩你们六项原则中“反对以武器与军备给与盟邦使其进行内战”，这一项原则是代表贵国人民最高的理想与远大的见识了。现在中美两国正在洽商一件贷款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巨大的一笔借款，他可能帮助中国进入建设与繁荣。但是，最可虑地，它也可能造成中国的灾祸。这不只关系着中美两国人民的祸福与友谊，也影响着全世界的和平。这关键的转移是在于贷款的承受者是否为足以有效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民主政府，抑或只是积习难改的一党专政的政府。

贵国伟大的故罗斯福总统曾经殚尽其宝贵的贡献帮助贵国人民与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共同努力赢到了世界现有的成就，贵国远见的政治家华莱士先生也曾确定现代为“人民的世纪”，所以我们两大友邦的人民之间是必然友爱地合作，用不着旧时代的顾忌，而却应当坦白地说出关系两国人民福利的意见。

所以，我们正以无限殷切的关心向诸位人民代表致达和平民主的敬礼，并预祝贵我两国人民和平友爱合作的成功。

签名者：丁月秋、丁莉莉、王云、王道乾、王世钦、王浩兰、王振华、王开楷、王健、王泽民、史刚、光波、朱汝绮、朱安恕、朱效吴、朱恕绮、向明、汪鞏、芮林、李咏、李仁荪、李杰民、李培宜、李坚白、李英、李若菁、李英全、佘世光、何兆麟、何庄、尚钺、金若年、孟超、林慧、林彦群、吴友琪、吴琪、范素云、海云、姜震中、高原、高寒、倪路、徐守廉、徐文贞、徐季因、徐晶、唐旻、柳映光、蔡余文、陈雪君、陈纯英、陈子衡、张葆英、张默涛、张拾名、张琦、张曼筠、黄有梅、庶民、马英、许杰、许允端、孙晓桐、袁毓蕙、章时静、华玲、驶明、梁伦、劳伍、冯拔、冯守一、夏康农、詹开龙、杨默霞、杨贤如、杨锦山、杨淑媛、顾光中、陆钦墀、慰冰、傅学义、邓碧、邓结、黎源、黎茄、闻一多、赵沨、潘汝谦、励吾、费孝通、蒋如荫、刘桂英、萧成贤、关应恬、杨希孟、周玉光、民心、人民艺术社、大路社、大众报社、中国周报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昆明分会、北门出版社、民主周刊社、音乐报社、时代妇女社、昆明音乐界联谊会、新音乐社昆明分社、云风出版社、妇女旬刊社。

二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以《昆明人民团体及文化界人士望美审慎考虑对华贷款》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由美国的国会议员泼贝尔、台拉西等及美国爱好民主自由人士所组成的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前曾提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六项原则，在中国得到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的赞誉。此间文协分会、民主周刊社、人民艺术社等十三个文化团体，名教授尚钺、许杰、夏康农、陆钦墀、闻一多、费孝通、杨希

孟及文化界人士九十八人，特致书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的国会议员，赞成该会提议，并希望美国不要以贷款等方式援助给予中国不民主的政府，而破坏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同日 出席云南圭山区夷族旅省学会主办之夷族音乐舞踊会招待会，并与李广田、汪鞏、孟超、尚钺、费孝通、杨明、楚图南、赵沨、赵宝煦、萧荻、李何林、范启新等担任演出艺术顾问。（《云南圭山区夷族旅省学会主办夷族音乐舞踊会》广告，《云南日报》，1946.5.23）

早在一九四五年暑假，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一些学生在昆明西南中山中学学生毕恒光（圭山彝族人）协助下，组织暑期服务队，到路南农村开展工作。他们看到彝族优美奔放、健康纯洁的歌舞，很受鼓舞。一九四六年春，毕恒光到昆明，希望得到各方资助在昆明举办一次圭山彝族音乐舞踊会。联大学生自治会很支持，先生听到也积极赞成，建议把准备工作做得尽可能充分一些。于是，王松声、梁伦在毕恒光的陪伴下，到路南、陆良、弥勒诸县挑选演员。四月中旬，他们在路南集合，加紧排练了一个月，梁伦亲自指导，使原有歌舞更加精彩。五月十七日，圭山区彝族音乐舞踊团抵昆，借宿于联大师范学院。

这天是第一次招待演出，出席新闻、教育、文化、艺术各界三千余人。演出团带来了二十多个节目，有象征战争的《跳叉》、《跳鳞甲》、《霸王鞭》等，有表现爱情的《阿细跳月》、《阿细先鸡》、《大箫》、《一窝蜂》等，有哀悼战士的《葫芦笙》等，有反映娱乐的《架子锣》、《三串花》、《猴子搬包谷》、《拜堂乐》等，这些都洋溢着彝族人民的生活与感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受到全场观众一致好评。

演出毕即开“顾问会议，闻一多、费孝通、查良钊、楚图南、徐梦麟、尚钺等先生均分别给以宝贵的意见。会后演出顾问团分成编导、音乐、舞踊、朗诵、舞台各小组，分由王松声、赵沨、梁伦、聂运华、徐树元诸先生担任组长，闻、费、查、楚、尚诸先生为编导顾问”。（《全昆艺术界集体编导，夷族音舞会场面辉煌》，昆明《学生报》第17期，1946.5.26）

五月二十三日 《云南日报》刊登《云南圭山区夷族旅省学会主办夷族音乐舞踊会》广告，云“夷族音乐舞踊会”由“云南圭山区夷族旅省学会主办”。演出赞助人有王政、查勉仲、徐述先、徐梦麟、倪中方、张云鹏、陈秀山、曾竹虚、杨竹庵、杨春洲、宁伯晋、刘叔清、龚仲钧。艺术顾问除先生外，还有王季、王天栋、王时颖、李广田、李仁荪、汪鞏、孟超、尚钺、胡均、胡宗洋、梁伦、徐廉、陈蕴仪、陈吾、费孝通、费克、游惠海、杨明、楚图南、赵沨、赵宝煦、驶明、檀良、萧荻、严恭。演出时间自二十四日起每晚六时至八时，地点在省党部礼堂，票价分三千元、一千元、七百元、四百元四种，

预售座券售票处为晓东街维纳斯、金碧路元亨行、福照街进修出版社、华山南路华侨商店、文林街平若书屋、文庙街云南日报。(《云南圭山区夷族旅省学会主办夷族音乐舞蹈会》广告,《云南日报》,1946.5.23) 次日广告,赞助人增加梅贻琦、熊庆来、赵伯诚、庾晋侯;艺术顾问增加李何林、曹孟浪、张友良、郭平凡、范启新。

五月二十四日　圭山区彝族乐舞以圭山彝族旅省学会主办的名义,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礼堂正式公演。先生带全家前往观看。演出极为成功,春城为之轰动。

但,仅演出了两天,省党部便借口共产党利用演出,下令禁演。王松声、侯澄、毕恒光等很着急,请先生出主意。先生建议请云南军政界颇有影响的彝族将领张冲将军出面解决。张冲立即找到下令禁演的省党部书记长宁伯晋力争,说如果停演,人们会认为是国民党禁演而共产党支持演出,这样国民党岂不失去民心。结果,省党部被迫准予继续演出,条件为:撤换负责朗诵报幕的有共产党嫌疑之温功智、不在剧场内出售《学生报》、《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刊物,由省党部书记长出面训一次话。

彝族乐舞继续演出,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时代评论》出版了评论专集,刊登了先生对演出的题词:

> 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的折磨来消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

评论专集上还刊登了费孝通的《让艺术成长在人民里》、赵沨的《漫谈阿西、撒尼的舞、乐》、梁伦的《山城看彝舞》、尚钺的《论保存中国民族艺术与彝胞舞踊》、杨一波的《从圭山区彝胞说到此次乐舞会》、张域的《看!他们的生活——记一个阿细的村庄》、高寒(楚图南)的《劳动民族的健壮的乐歌和舞踊》、徐嘉瑞的《圭山区的彝族歌舞》、史靖的《我怀念那群善良的人》、杨明的《彝舞看后》、吴梁海的《沙尼姑娘》等。它们为彝族民间音乐舞蹈有史以来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给予热情的赞扬。

演出期间,先生还参加了联大文艺社在北门书屋组织的一次文艺问题讨论会,实际上是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先生和李公朴、李广田、楚图南、尚钺、孟超都有发言,由王楫记录整理,刊登在《文艺新报》。(据张源潜《回忆联大文艺社》,《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10辑,第65页)

五月三十日　出席西南联大剧艺社聚会。这是剧艺社在昆明的最后一次聚会,主题是向昆明告别。会上,先生在致词中说:"目前一切为了民主,戏剧自然也要为民主,否则我们确乎没有闲空儿来谈什么戏剧的。"(郭良夫《闻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学林漫录》第11集,第5页)

是月　参与筹备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报《民主报》。时,民盟云南省支部通过

朱家璧可以捐到一笔款子，准备用这笔钱办张报纸，先生说：这个报不办起来我就不走。（访问杨明记录，1986年7月17日）雨萌也回忆："五月间，联大已经开始北迁了。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正在暗淡的灯光下看书，他很热诚地和我谈了很久，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局势，指出了今后民主运动的必须再接再励。我问他甚么时候才到北平去，他说一时还不能走，要在昆明筹办民主报。"（《悼闻一多先生》，《人民英烈》，第231页）

是月 约这时，民主周刊社调整职员，楚图南推荐张子斋任主编。张是中共党员，曾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先生表示同意，并已向张子斋布置了些工作。但潘光旦、罗隆基因张的身份而表示异议。楚图南、冯素陶复推荐唐登岷任主编。唐亦是中共党员，先生有所闻，约唐来家见面，遂确定其为《民主周刊》主编。唐接任后，先生对他完全信任，唐写了些评论请先生审阅，先生也没有提过不同意见。（据访问唐登岷记录，1986.8.5）

时，《民主周刊》处于困难时期，自从鼎新、崇文印刷馆遭当局警告后，该刊只得采取打游击的办法，在手摇机上印刷。后来在缪云台协助下，转到经济委员会印刷厂印刷，办刊的经费亦很紧张，早先有缪云台捐助（实际是龙云支持），后来靠登广告。一二·一运动后，没人敢送广告来，以至稿费也拿不出来。社里的工作人员很精练，除会计外，编辑只有两三人。唐登岷接任主编时，编辑有胡钊。旋，杨明亦参加了部分编辑工作。

是月 西南联大学生社团除夕社开始筹备编辑《联大八年》，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是月 为幼女闻翻题字："对功课太认真了是不好的，因为知识不全在课本里。"（据家藏原件）这前后，还为她在一条手帕上画了幅农夫耕田图。

又为民青负责人之一王念平治一象牙章，边款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一多撮语　与念平弟共勖之。"（王念平《回忆联大生活片断》，《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16册，第117页）

六月二日 华罗庚在青年会报告《苏联归来与苏联科学》。三日，又在公路工程管理局第四区局讲《苏联现状》。五日，还在云大至公堂报告《苏联的大学教育》。他说："在现在的世界上，由于地理上政治上的关系，苏联这个国家，不管你喜欢她或是讨厌她，都是我们值得了解的。"（《中国青年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云大讲"苏联的大学教育"》，昆明《学生报》第19期）先生听后给予热情鼓励，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报告会取得了成功，受到一多先生的夸奖：你对苏联情况介绍得很详细，很好，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很有好处。"（《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43页）不过

先生更关心苏联的政治情况，在华罗庚演讲中基本没有涉及。

时，昆明已处白色恐怖之中，宪兵十三团的来到，更加深了全城紧张的气氛。华罗庚做完报告，曾劝先生："情况这么紧张，大家全走了，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先生从容回答："要斗争就会有人倒下去。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就会站起来！形势愈紧张，我愈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同前，第137页）

这时许多人都好心地劝先生早些复员，但先生觉得工作没能安排完毕，一时走不开。高真（高孝贞，后改名高真）在《一多牺牲前后纪实》中写道："外面早就传说，联大学生一走，反动派就要下手了。前些时候，国民党已把宪兵十三团调到昆明。我忧心忡忡，好几次催一多早点走，他总是说：'事情没有完，怎么好走？得把工作安排好，现在还没有人来接手。'我焦急地说：'人都走了，特务要下毒手，怎么办？'他笑了一下：'他要杀你，到了别处也一样杀。'那时，一些同人趁联大搬迁动乱之际，到国外讲学去了。一多也接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聘请。有的教授敦劝并约同行，一多不想离开多难的祖国，他说：'北方的青年也许还需要我。'"（同前，第379页）

的确，先生身上的责任很重，费孝通在《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中说："应当说，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形势多变，斗争尖锐，书生意气常不免犹豫多虑。每当有重大争论分歧时，多以他马首是瞻。由于他在学术界和文坛上都有很高的声望，在中外享有声誉的学府中居有一定的地位，而又言行一致，无私无畏，作风正派，热情诚恳，他的举止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青年学生和同辈师友的敬重和信任。他在被誉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和整个昆明，起了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对民主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前，第147页）

六月三日　昆明文化界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举行欢送圭山彝族乐舞团联欢会。这次演出圆满结束，同时也督促先生尽快把《九歌》改编成歌舞，连日来加紧赶做改编工作。

六月四日　端午节，亦诗人节。《九歌——古剧翻新》中"迎神（序曲）"、"东君"、"云中君"发表于昆明《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这是《闻一多全集》中《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初稿的一部分。《诗与散文》"编后记"："屈原的九歌共有十一章，因为闻先生还没有全部把它改写完全，所以先给我们三章发表，以纪念这伟大的人民诗人屈原。其余各章以后当可能在本刊发表。据闻先生告知编者，这个剧本是留给音乐家和舞蹈家们去处理的，关于九歌的著作与考证，以后闻先生还有文章另为解释。"

《九歌——古剧翻新》在《诗与散文》发表的经过，杨绍廷是这样记述的："一九

四六年的"诗人节",《诗与散文》社又决定再出版诗人节特刊,约请闻先生写稿。当时闻先生正在撰写古剧翻新的屈原的《九歌》。为了支持特刊的出版,他在百忙中又亲自赶抄了《九歌》其中的三章给我们,以纪念伟大的人民诗人屈原,并答应完稿后,一定全文交《诗与散文》发表。"(《永久的怀念》,《群言》1996 年第 7 期)

先生编写的《九歌》剧本,与赵沨也有些关系。赵沨回忆说:"我老早便计划着把《九歌》写成一个《康塔塔》,一天,我把辑的辞句送给他看,他说:'很好了,但是没有我的好,我计划把《九歌》写成一个歌舞剧,这是我二十年来的研究、计划和愿望。我写个初稿给你看看。'后来约定一个星期交初稿给我,他答应了,这个星期中,他下乡住了三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拿出他一字不苟的原稿给我看,并且跟我谈了两三个钟头。这歌舞居台本,是很有价值的作品,不仅有艺术创作上的价值,还有考证校勘上的价值。他把《九歌》作为一个迎神的歌舞剧,《东皇太一》是迎神的序曲,《东君》是第一场,《云中君》是第二场,《湘君》及《湘夫人》是第三场,《大司命》是第四场,《少司命》是第五场,《河伯》是第六场,《山贵》是第七场,《国殇》是第八场,最后,"成礼兮会散,传芭兮代舞"是送神曲。人物衣饰,花色,道具均有根据。他说:替这歌舞剧台本作些注解的话,将是二十万字的著作。我们谈得很高兴,决定短期内筹备公演,为民盟募集事业费用。正好,第二天搞音乐、舞踊、戏剧的朋友有个聚会,便约定第二天把这台本带到会上商量。而我们都觉得第二天只有一本底稿是不方便的,他说由他负责。这时已夜深十点了。第二天早晨八点大家聚会时,他拿了四本底稿,书写都是规规矩矩的,一字不苟的。我看看他红红的眼,我可以猜得到他昨夜请他全家人动员抄这些底稿时的兴奋和愉快。"(赵沨《闻一多先生底回忆》,香港《光明报》新 4 号,1946.10.18)

同日 清晨,赴楚图南家聚会,并为丁月秋女士题写扇面。楚图南《人民诗人闻一多先生》中说:"诗人节清早,一多和几个朋友们在我的寄寓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当时,一个朋友拿出一柄家藏的泥金的折扇,请一多题字,一多略想了一会,即在扇子上用他最善长的小篆,写了《楚辞》上的两句话:'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其实这是《楚辞》的名句,也正是一多当时的心情!"(《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第 26 页)

中午,杨绍廷设家宴款待先生等。杨回忆:"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诗人节,我在家里设便餐,请为《诗与散文》'诗人节特刊'撰稿的几位先生,其中闻一多先生也在座。饭前,我曾请一多先生为我收藏的一帖王梦楼字画作鉴定,他认为是较好的真迹。交谈中,我曾请先生为我写一帖字,他很乐意的答应了。那时一多先生工作很忙,我想等他空一点再送纸去,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那料才过十多天,我的表

弟王子伯(一多先生昆一中的学生)就受先生的委托,送来一帖宽 25 公分、长 55 公分为我写的楷书,内容是《孙子兵法》中的一小节。接到后我很感动,也很受教育,把它很好的保存了。"(杨绍廷给编者的信,1986.10.23)

杨绍廷还撰文说:"'诗人节'的当天,我们举行了座谈会,前来参加的有闻一多、楚图南、吴晗、赵沨、李何林、孟超、普梅夫等先生。会上交谈了新诗的发展,也交谈了对音乐、美术的一些看法。当时我存有几帖古字画,但不辨真伪,就乘机拿出来,请他们鉴定。这时有的先生就说:'看起来你欢喜书画,为什么不请闻先生和吴先生也为你写一帖?他们两位对书法都很有研究的。'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得到他们的首肯,使我非常高兴。正备纸送去请闻先生写,哪料闻先生已写好一帖孙子兵法中的一则行书请他的学生送来给我了。这帖珍贵的墨宝,我一直小心地保存至今,这是闻先生留给我的珍贵的纪念!"(《永久的怀念》,《群言》1996 年第 7 期)

这次家宴也是一次诗人节的聚会,楚图南、尚钺、金若年、赵沨等还有新中国剧社的几位成员都到了。席上杨绍廷热情为大家做了云南名菜烧象鼻。饭后,大家同游大观楼,并举行纪念第六届诗人节茶会。先生持一拐杖和大家愉快地合影。

对于这次聚会,《云南日报》报道:"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昆明分会,以昨(四)日为诗人节,特集体至大观楼郊游,到闻一多、高寒、夏康农、尚钺、孟超、赵沨等三十余人,除闻一多对屈原研究问题作新颖而深刻之分析外,并于细雨濛濛中□下午二时起至四时三十分,露天讨论文艺诗歌问题,到会人士均极热烈发言,对抗战时期诗歌及今后诗歌工作方向,皆有新意见及新检讨,其中如何克服今日新诗谱曲问题及朗诵诗接近大众问题,讨论尤为热烈。闻一多先生说:今日诗歌的道路与以前相似,从讽刺诗向前走去,像过去的打油诗,回到人民那里。高寒先生的最后结论说:现代诗的内容与形式的不大统一,是因为目前内地诗人的生活现实和社会现实不统一的缘故,如果生活现实和社会现实统一了,那么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会统一起来□成有血有肉的。"(《大观楼细雨濛濛,文协讨论诗歌问题》,《云南日报》,1946.6.5)

金若年也回忆了这次聚会:"那次在滇池畔大观楼举行的'诗人节'纪念活动比较特殊,是由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楚图南、闻一多、赵沨等人组织发起的,显然是一次政治性的集会。参加组织这次活动的有楚图南、闻一多、赵沨、李何林、尚钺、孟超、徐守谦、杨绍廷、胡匀、丁月秋、金若年、蓝鸿翔等,另外还有一些诗人、作家和新中国剧团的成员,共有二十多人。由于事前《诗与散文》的发行人杨绍廷和大家约好,那天中午到他家聚餐,他家就在大观楼附近,餐后可以一起去大观楼开会。这个提议大家都赞成,可是那天闻一多先生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楚老家开个小会,开完会才能去杨家,所以与大家分道扬镳,各走各的。中午,大家不约而同地到齐

了，大家济济一堂，有说有笑，多年来很少有这样的聚会了。”饭后，“大家徒步同游昆明的风景名胜大观楼，因为这是一次政治性的聚会，有人找了一个游人很少去的湖边僻静处，大家都很满意。会前有的提议：这次难得在一起聚会，先请赵沨同志为大家一起拍个合影，做个纪念。拍照后，大家在湖边石栏边席地而坐，有的人坐在石栏杆上。‘诗人节’的座谈会，由民盟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楚图南同志主持，大家联系现实畅所欲言，情绪激动热烈。赵沨同志又为大家拍了一张照。他为大家留下了这两张‘难得和珍贵’的照片，而他自己却并没有留下他的身影。”（金若年《记楚老在昆明的几件事》，张勇、汪宁主编《楚图南纪念文集》，第21页，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晚，出席在云南大学举行的诗人节联欢会。

六月十日 昆明《今日文艺》创刊。这是昆华中学毕业生王明、林华昌、张家兴等人所办的一个文艺刊物，先生不仅为它题写了刊头，并为创刊号撰写了给昆明文艺青年的临别赠言——《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该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重刊于《人民日报》。文中指出昆明是抗战末期民主运动的先锋，这里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各种文艺，把农村和都市联系了起来，其成效必然是伟大的。先生特别希望作为后备军的知识青年继续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全文如下：

> 在抗战期间，昆明是后方，留在此地的本地人，和外面逃来的外省人，不管他们的目的是生产工作，还是逃难，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他们是离着战争很远。在所有的大都市中，昆明无疑是最后的后方。虽然有一个时期，它几乎变成了前方，但那个威胁并没有成为事实。这并不是说在昆明的人没有受到战争的痛苦，恰恰相反，昆明人的苦难比谁都深沉，这是因为除了物质损失以外，在抗战期中，八年来昆明人精神上留下的伤痕最深，因为这里的灾难，与其说是敌人造成的，无宁说是自家人的赐予。抗战是我们自己要求的，为抵抗敌人的侵略而流血流汗，我们甘心情愿，但是眼看自家人分明在给自家人造灾难，那就不能不使我惶惑了。是的，我们惶惑了一个时期，我们苦闷，我们想，最后我们想通了，我们明白了，于是从一个民族的自卫战争中，孕育出一个民主自救的运动来了。民主运动是民族的战争的更高一级的发展。更高的发展是由于更深的体念和更深的觉悟。
>
> 正如在抗战初期，武汉是民族战争的前卫，在抗战末期，昆明是民主运动的先锋。也正如当武汉负起它的民族战争前卫的任务时，文艺曾经是一个最活跃的工作部门，昆明的文艺工作者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历史将会证明它是不容低估的。这不是说这里产生了多少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而是说这里的文

艺工作者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了的一群。他们一面曾将文艺的种子散播在民间，一面又曾将人民的艺术介绍给都市的知识层。通过文艺的桥梁，这里的诗歌音乐和戏剧工作者已经开始把农村和都市联系起来了。正如民主的争取是一件长期艰苦工作，今天昆明的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成效，也许得见之于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但这成效必然是伟大的。

经过胜利复员之后，今后昆明文艺工作队伍必然要有些变化。继起的后备军自然是今天昆明广大的知识青年。希望他们认定此地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开辟了的道路，继续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学习。不要忘记西南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是今天受苦受难最深的中国农民，也是代表最优良的农民品质的中国农民。西南是我们今天最好的工作与学习的园地。昆明的文艺青年不应辜负这块园地；相反的，应该勤劳的垦殖它，把它变成更坚强的民主力量。都市中知识层的民主运动，已经由昆明的发动而广泛的展开了，希望将来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民主运动，也从昆明发轫，而充当这运动的先锋的，应该是今天昆明的文艺青年。

是月上旬　联大师生陆续离昆，先生与夫人也积极准备复员北上事宜。由于路途过远，从陆路走费时多、旅途甚劳累，夫人身体不好难以支持，故决定全家乘飞机往重庆直返北平。夫人与赵妈每日上街摆摊变卖衣物，以减少随身携带之行李，略补旅资之不足。购机票需缴本人照片，照相馆拍照太贵，先生特请赵沨以私人像机为全家人照相。赵沨乘机也给先生拍了看《新华日报》、刻图章的生活照，这些是现今仅存的几张先生最后的遗照。

时，立雕同窗好友庄任秋迁来先生家居住。时，先生全家将要离开昆明，联大附中也有很多同学北上，庄任秋感到格外孤单。立雕很同情庄任秋，向家里提出带庄一起北上。开始，先生没同意，但后来还是接受了。闻立雕回忆说："这时我又想到了阿庄，他在昆明没有家，我一旦走了，其他外省同学也都走了，星期天或寒暑假本地同学都回家了，他一个人在学校里该是多么孤独可怜啊！想到这里，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要求父亲把他也带到北平去！越想脑子越发热，于是，回到家里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了这个要求。一段时间以来我对父亲已经有了比较深的成见，情绪上相当对立，因而讲话时言语简单而唐突，不讲理由，只提要求，态度生硬，大有下最后通牒的架势！我提出这样的要求，父亲可能也感到有些突然，随口答说：'这个不行吧！……'并准备接着向我解释。我很不高兴，强行打断父亲的话说：'你不用解释，你就说行不行。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态度之恶劣、粗暴达到蛮不讲理的地步。父亲被我搞得无可奈何，只好说：'好吧！我不多解释。就告诉你，

不行，我没有力量再多带一个人。'我一听就火了，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我就知道我没资格提这样的要求！'就退回外屋，坐在那里生闷气。""正当我以为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之时，事情却出乎意料地出现了转机。我在外屋坐着生闷气，耳旁好像隐约听到父母亲微弱的交谈声。过了一会儿，母亲从里屋出来走到我面前说：'有话好好说嘛！为什么要和你爸爸怄气？'然后告诉我：'你爸爸答应了！'这个允诺实在太突然了，仅仅几分钟父亲的态度就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我没有欢喜若狂，也没有向父亲道谢，冷冷地'哦！'了一声就去通知阿庄去了。我不知道父母亲究竟是怎样商量的，有关问题他们准备怎样解决，从那以后，父亲也没有再对我说什么，只是在百忙之中，拼命挤时间默默地埋头刻图章。"（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275至276页）

六月十一日 《九歌(古曲翻新)》初稿脱稿。先生用时代评论社的稿纸，誊录了二十五页，封面书"卅五年六月十一日初稿毕"。收入《闻一多全集》时改题为《〈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稿毕，即准备搬上舞台。王松声回忆："闻一多先生是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业师。除了在中文系给我们讲授'楚辞'课之外，他还鼓舞我们，指导我们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在昆明举办了一次'圭山区彝族音乐舞踊会'。那是一次极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举办这个会之前，我带领彝族青年毕恒光到闻先生家里请求指教，在闻先生的鼓舞下，我们才决定举办那次的演出。演出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昆明文艺界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没想到这次活动竟给闻先生多年致力于《九歌》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点启迪。演出会结束不久，六月初，闻先生把赵沨、萧荻、梁伦、郭良夫和我召到他的书斋里，拿出这份手稿向我们说：'大家都说我这些年来对楚辞、九歌有点研究，我这点研究的成果都凝聚在这上头了'，然后他把事前让孩子们复写好的四份抄稿连同这一份手稿发到我们五个人手里，让我们围坐在他的身旁给我们'说戏'。他神采奕奕地给我们讲了他的创作意图，讲了导演的构思，讲了舞美设计，还讲了演出形式。他像一个气魄宏伟的总导演把有关创作演出的一切手段都调动起来了，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具体的分工派了活，让赵沨负责音乐创作，梁伦负责舞蹈编导，郭良夫负责服装舞美设计，萧荻负责排练演出，并让我根据他说的'戏'草拟出一个演出脚本，最后由他审阅定稿，然后运用联大学生中组织演出彝族音乐舞踊会的那批骨干力量，用民盟的名义举行义演。那次会后不久，昆明局势急剧变化，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任务，三校师生陆续向平津复员……一到重庆就听到了李公朴先生被刺的消息，一个星期后我路过成都时，又听到闻先生遇难，悲痛之余，我忽然想起匆匆离昆前闻先生给我们讲《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事，我仿佛记得还有一个草本在我手里，我急忙从车上搬下了行里箱，一

翻，果然找到了，而且竟是闻先生的亲笔手稿。”（王松声《欣慰与遗憾》，1990年1月23日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闻一多《九歌（古曲翻新）》手稿仪式上的说明材料）

《全集》中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只是改编的剧本。在手稿中，有份《九歌古剧悬解》，文后有“附注”，它体现了先生的许多新颖见解，以及改编成舞剧时关于道具、布景、效果的若干想法。这也是对《九歌》考证和研究的心得，颇有学术价值，兹录如下：

《迎神曲》

（一）《高唐赋》所述的“醮诸神，礼太一”的仪式，是在夜间举行的。这赋是否宋玉所作，是另一问题，所记的反正是楚国的故事。汉代祭太一，本是沿袭楚国的旧俗，所以时间也在夜间。《史记·乐书》明白的载着：“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于][①]甘泉，以昏时夜祠，至明而终。”武帝时祠太一的《郊祀歌》也证明了这一点。歌词劈头一章《练时日》（相当于《九歌》的《迎神曲》）曰：“虞（娱）至旦，承灵亿”，又曰：“侠（浹）嘉夜，莅兰芳”，这和《史记》的话完全相合。

我们考察《九歌》中间的九章歌舞曲，除《大司命》外，都直接或间接的表示是以暮夜为背景的。《湘君》“夕弭节兮北渚”，《湘夫人》“与佳人期兮夕张”、“夕济兮西澨”，《少司命》“夕宿兮帝郊”，《河伯》“日将暮兮怅忘归”，《国殇》“天时坠兮威灵怒”，《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星名）……援北斗兮酌桂浆”，又“杳冥冥兮东行”（夜间绕入地底东行），《少司命》“登九天兮抚彗星”，《山鬼》“猿啾啾兮又夜鸣”——这些都是直接表明了暮夜的。此外《云中君》“烂昭昭兮未央”、“与日月兮齐光”和《湘君》“横大江兮扬灵”，都指所谓神光，那也是非在夜间看不见的。这分明是因为祭太一是在夜间举行的，所以娱神的歌舞曲也不得以夜为背景。《太平御览》五七三引王逸《九歌序》曰：“沅湘之间，其俗敬鬼神，好夜鼓舞，以乐诸神。”这与今本《楚辞》不同，不知究竟是谁的话，但说“好夜鼓舞”，是绝对正确的。

（二）光耀是神降临的表征，这里光便叫作“神光”，又叫作“灵”。《汉书·郊祀志》“神光兴于殿旁”，“神光又兴房中，如烛光”；《海内北经》“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郭注“言二女神光所烛及者方百里”。

《东君》

（一）这一章通常列在《少司命》前，那是弄错了的，经笔者考证，应该移到此地来和《云中君》相配（详拙著《楚辞校补》）。东君是日神，云中君是云神，亦

① 原稿如此。

即雨神，日与雨是农事的两个必要的自然条件，所以这两位自然神常在一起。还有，在五常系统中，东君也就是东方的太皞伏羲氏，云中君也就是中央的黄帝轩辕氏。这两位帝不但往往并称（如《海内经》"太皞爰过，黄帝所为"和《庄子·田子方篇》"伏羲黄帝不得友"之类），而且关于他们的传说还常被混淆。最显著的例是：他们连名号都相同，都称有熊氏（伏羲称有熊氏，见《易纬·乾凿度上》注）。这些都说明，在传说中，伏羲和黄帝不易分开，也就是东君和云中君不易分开了。

（二）三代时天子有"朝日"的典礼，便是在日出时，向着东方举行的一种欢迎日出的仪式。东君这位神无疑便是这样产生的。关于朝日，《尚书·尧典》又说到"寅宾出日，平秩东作"的话。"东作"一词，赵岐解为"治农事"，应劭解为"耕"，都是极正确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让一群农民出现，而在下面还要特别强调工作的意义。

（三）顾名思义，与其说东君是日神，毋宁说是日出之神。日出自东方，而东方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易捉摸，于是便创造出日出扶桑的神话，用扶桑来使东方的概念形象化起来。这样，东方与日与木，便分不开了。因而东君，你说他是东方的神也好，日神也好，甚至木神也未尝不可。上面已经说过，东君也就是东方帝太皞，现在东君既同时是木神，那么东方帝自然也可以同时是木帝了。这便是在五行说中，东方何以属木而色青的缘故，而因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在《九歌》中，东君劈头便说"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也不是偶然的。当然，所谓扶桑并不是实质上存在着的一种树木，我们疑心它只是日出时天边的云霞（《山海经》说它"青叶赤华"，这正是早霞的颜色），至于作为自然物的形象，便是一棵大树，作为人为物的形象，便时而是宫室的轩槛（"照吾槛兮扶桑"），时而又是蔽体的衣服（"青云衣兮白霓裳"）——这些都不过是人类的幻想——一种诗意的杜撰罢了。

《云中君》

（一）《左传·昭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这是云中君即黄帝的确证。明白了这一件事实，不但《九歌·云中君》"龙驾兮帝服"一句话有了解答，而且如像下面这些文献中的传说，也都可以涣然冰释了。

1.《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依《楚辞》的说法，丰隆是云师，（《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九章·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丰隆既是黄帝自己，想来丰隆之葬（墓）就在黄帝

之官旁，所以趁着参观黄帝之官的机会顺便就封一封丰隆之葬——在墓上加盖一层新土。

2.《庄子·大宗师篇》："黄帝得之，以登云天。"

3.《庄子·在宥篇》："黄帝……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又："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云将曰：'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鸿蒙曰：'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其草木，祸及虫正(豸)。意(噫)！治人之过也。'"

以上这两个故事的内容相同，实在是一个故事的分化，而云将即黄帝，鸿蒙即广成子。因为黄帝即云神，所以前一个故事中有"自而(指黄帝)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等语。其实前一个故事中所谓"天地之精"，后一个所谓"六气之精"，也还是指云气的基本构成原素。

4.《大戴礼记·五帝德篇》："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

5.《周礼·大司乐》郑注："黄帝曰云门大卷。"《独断》"黄帝[乐]①曰云门"(《周语》韦注、《玉烛宝典》引《乐纬·稽耀嘉》宋均注、《群书治要》引《帝王世纪》并同)。《楚辞·远游》王注："承云即云门，黄帝乐也。"(《淮南子·齐俗篇》许注说同)

6.《古今注》："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焉。"

《汉书·郊祀志上》："置寿宫[于]②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白瓒注："寿宫，奉神之宫也。"我们这里所讲的旗，可以假想是树在寿宫前面的。黄帝的符瑞的黄龙(《史记·天官书》："轩辕黄龙体。")所以降黄帝之神，用黄龙旗。

(二)《吕氏春秋·知接篇》注："桓公……蒙衣袂而绝乎寿宫。"高注："寿宫，寝堂也。"宫中的寝堂叫作寿宫，神庙的寝堂自然也可以叫作寿宫。这里灯光的熄灭，暗示着神与人在寿宫中的会合，因布景的限制，所以改在室外。

(三)《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周书·尝麦篇》："黄州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孔注："即冀州也。"这里说"览冀州

①② 原稿如此。

兮有余”，也是云中君即黄帝的佳证。

《湘君》

（一）在本篇中，最应注意的一点，是湘君和迎接湘君的女子，使用着迥乎不同的交通工具。前者乘舟，后者乘车。舟在歌词中有明文，用不着说明。车则似乎向来未被人注意，因此一般的都把车具误认为舟具。于是舟中人和车中人的身份便混淆不分，而他们对话的意义也就大大的模糊了。笔者发现歌中人物有一种是乘车的，是根据下列各歌句的研究：

驾飞龙兮北征。

飞龙是驾车的龙马。《离骚》：“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又《安世房》中歌：“飞龙秋，游上天。”注：“庄子有秋驾之法者，亦言驾马腾骧，秋秋然也。”都是佐证。

遭吾道兮洞庭。

下篇“洞庭波兮木叶下”，波即陂字（洞庭陂见《中山经》注），正如《禹贡》的“荥波”即荥陂，《楚策》四的“湘波”即湘陂，《说苑·善说篇》的“新波”即新陂一样。陂就是泽（荥陂一名荥泽），是一种水陆参半的低洼的丘陵地带，雨季则水多于陆，旱季则陆多于水。古代的洞庭正是这样的一个地区。《中山经》有“洞庭之山”，《九叹逢纷说》“步余马兮洞庭”，和本篇“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都是指其间的陆地而言的。“遭吾道兮洞庭”，如同《离骚》“遭吾道夫昆仑”的情形一样，都是行回遭转的找着平坦的道儿走，所不同的是，一边为的要避开险阻的岩石，一边为的要避开泥泞的水潦罢了。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这是说的车子过滩时的情形，梁竦《悼骚赋》“骋鸾路[辂]①于弇濑”，便是脱胎于这两句的。浅浅的石濑，分明和今天这一片汪洋的洞庭湖，完全两样。从战国到今天，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从洞庭陂到洞庭湖，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然的面貌必然会随着时间变迁的，不同着我们大惊小怪。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

柏与帛通。《尔雅·释天》：“缥帛缪。”《周礼·司常》：“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礼记·玉藻》：“大帛不绥。”这些帛字，都是指旗而言的。旗是布帛做的，所以叫作帛。金文吴尊作旆，是旗帛的专字。绸训缠，《释天》：“素绵绸杠。”郭注：“以白地锦韬旗之竿”，是说用白地彩色条纹的锦带来包缠旗竿。用作名

① 原稿如此。

词，则缠旗竿的锦带也叫绸，如《大人赋》："靡屈虹以为绸"便是。

《文选·上林赋》："靡鱼须之桡旃。"张揖注："以鱼须为旗柄。"《说文》："旃，旗曲柄也"（旗之有曲柄者），又"桡，曲木也"。据此，则桡旃是以曲木为柄的旗，而单说桡便是用曲木做的旗柄了。旌是缀在旗竿头上的一种鸟羽或旄牛做的蓑子。

古代车子上必插着旗子，这里以薜荔为帏，以蕙为绸，以荪为桡，以兰为旌的旗子，便是插在车上的。怎么见得呢？《大人赋》曰："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以为绸……驾应龙象舆之蝮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蜿蜒委蛇。"《上林赋》曰："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以上两赋中以旌绸或桡旃、珠旗，和车驾并举，显然那都是插在车上的。本篇于"驾飞龙兮北征"二句之下，又说到帏绸桡旌类与旗有关的什物，以《大人》、《上林》二赋与本篇相证，本篇所形容的旗，想必也是插在车上的。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骋骛是使马匹快行，弭节是使之慢行，这两句说湘君所乘的是车子，尤其明显。

（二）歌曰："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参差即箫，《风俗通·音乐篇》："舜作箫，其形参差不齐，像凤翼也。"湘君本来就是舜，箫既是舜作的，那么，这里吹箫的就该是湘君了。在箫史和弄玉的故事中，吹箫的箫史也是男的。《邶风·简兮》："左手秉翟，右手执籥。"籥也就是箫，那秉翟执籥的舞者，又是一个男子。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旁证。

（三）灵即神光。《海内北经》："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郭注："言二女神光所烛及者方百里。"汉《郊祀歌》"扬金光，横泰（大）河"，便是模仿本篇"横大江兮扬灵"一句的。《离骚》："皇剡剡其扬灵兮。""皇剡剡"是光貌，"扬灵"亦即扬光。

六月十三日　朱自清次日将赴成都，特与先生话别。（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08页）这次见面，竟成两人共事十四年的诀别。

六月十五日　昆明《大众报》刊登《昆明十二期刊联名发表对目前局势提出五项意见》，这是以民主周刊社领衔的又一声明。

五项意见的主要内容为：一、国民党应该立刻停止运兵赴东北，停战应该无条件无限期的停下去，一切静待协商解决。二、履行一切协定，应该是国共双方共同的义务，不能只责诸某方面。三、从政治上解决一切问题，连东北接收问题也包括在内。四、由马歇尔的仲裁有损国家独立之原则，中国自身的问题，只能由中国自

身解决。五、全面内战危机的紧迫，是美国片面援助国民党的运输军火甚至替国民党保卫交通的直接结果，美国应遵守魏德迈宣布的美军于今春夏间全部撤退的诺言。

六月十六日 《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四期以“本社”名义刊登《斥挑拨者——并质吴铁城及中央日报》。先生给予支持。

本月五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南京答合众社记者问时，对民盟中央领导人罗隆基进行污蔑，说某次他问罗：你为什么要做共产党的尾巴，罗答：做共产党的尾巴比做国民党尾巴好。七日，昆明《中央日报》根据吴铁城的话刊登出一篇社论，一时昆明有人不无嘲讽地说民盟愿做共产党的尾巴。《民主周刊》主编唐登岷为了批驳吴铁城挑拨民盟与中共的关系，便写出此文。文章写完送给先生看，先生看后完全赞成，说：“一个字也不改。”（访问唐登岷记录，1986.8.5）

这篇文章指出罗隆基谈话的背景，是在国民党军队进入四平街、长春之后，仍不执行谈判诺言，继续军事进攻时，罗回答合众社记者罗根问话时说的。根据罗根报道，罗隆基针对美国为国民党政府运输军队武器军火到东北事，说：“美国若不改变其政策，中国决不会和平”，又说：“马歇尔试图建立和平，他同时又帮助国民党运输供应军队打内战，他们现在并不是在打日本。”还说：“假若美国停止支持政府军队，反动派是不可能继续内战的。在这个问题上，以撤回美国的支持作为威胁，是马歇尔的一张王牌。如果这支持停止，政府就不得不谈判。难道美国要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吗？难道你们让弗朗哥移到中国来吗？”根据上述谈话，《斥挑拨者》称它“正击中了对内作威作福，对外奴颜卑膝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所谓“民盟是中共的尾巴”、罗隆基是“中共义务发言人”，完全是企图挑拨民盟与中共的关系。

同日 昆明民主周刊社与妇女旬刊社、人民艺术社、今日文艺社、学生报社、青年新报社、真理周报社、农村青年社、中国周报社、新音乐社、诗与散文社、大众报社共十二期刊联合致函慰问五月三十一日在辽宁海城起义的国民党六十军一八四师。

一八四师原为滇军一部，随卢汉赴越南受降，又调至东北参加内战，其师长潘朔端在反内战感召下，毅然率部起义。此举在云南反应强烈，许多人将其比作“第二次护国起义”，称一八四师“在松花江畔创造了一个新的‘护国运动’，一个反对专制独裁，坚持民主和平的‘护国运动’”。先生主持之《民主周刊》不仅全文登载了一八四师的《反对内战通电》，并联合其他刊物发出此慰问函。其信如下：

当你们在海城光荣的反内战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云南——你们的家乡，也许你们可以想到，你们的朋友，亲戚，家属，是怎样兴奋的奔走相告，他们不仅为你们的

英勇行为而感动，而且解除了他们担心于你们化为炮灰永远回不了家的忧虑。你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尤其是有了去年十月杜聿明“接收”云南的痛苦经验的云南人民——你们的朋友，亲属和同胞手足，他们是最深切的了解：你们被骗至东北，也就是替以杜聿明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帮凶把他当日“接收”云南的一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套加诸于东北人民，所以如果说你们获得了全国人民敬仰和拥护，那末，首先是我们云南人民的敬仰和拥护。你们不忍以美国武器屠杀自己的同胞，你们拒绝了进行内战、反对民主的乱命，你们又一次继承并发扬了滇军拥护中国民主共和的传统，你们正义而英勇的行为，在你们的家乡，被当做“第二次护国起义”而称颂着，这一光荣，你们是受之无愧的。

然而，你们一同开去充炮灰的滇军，还有大部分是因为你们起义而处境更困难了。他们的命运只有你们才能营救，也正如你们家乡的人民，甚至全中国人民正在等待着你们的营救一样，我们相信，当中国最后的民主和平没有实现以前，你们一定带着你们的光荣，奋斗到底的。

关山数万里，我们内心的激动和感奋，不能尽情表达，向你们遥致慰问，并致崇高的敬礼！（《三迤子弟反对内战，昆明十二期刊联合致函慰问一八四师》，《学生报》第 20 期，1946.6.16）

六月十九日　立雕、立鹏即将先行飞渝。因高孝贞一直有心脏病，为了免去旅行劳累，先生决定全家乘飞机北上。但家里人口多，乘飞机要花很多钱，为此，先生不得不一点点积累。闻立雕说：“过去母亲一向是我们家的‘内阁总理’，父亲只管挣钱不管花钱，这次不同了，他亲自管钱，专门腾出一个小皮箱用来放钱，每凑够一定数量就用细线绳扎成一小摞，放进箱中，再凑够一定数量再用细线绳扎成一小摞，放进箱中。母亲和赵妈每天把家里的锅碗盆瓢、衣帽鞋袜等一切暂时不用的，甚至是必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拿到街上摆地摊出售，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轻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多少增添一点盘缠钱。父母亲就是这样竭尽全力，倾注心血地一笔一笔积累盘缠钱。”闻立雕还回忆说：“事情决定了之后，父母亲就急忙为我们出行作准备。我们两个是首次离家出门，远行千里之外，父母很不放心。父亲平时一向不大管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一天晚上好像同平时大不一样，特别不放心，给已经先到重庆的好朋友写信，托他对我们俩多多关照。同时一遍又一遍地交代注意事项，告诉我们这次出门大人不在身边，万事要当心；要注意冷暖、讲卫生，别乱吃生冷东西，防止生病；有事多向大人请教；钱要节省着用，不要乱花，要收好藏好，防止丢失，防止被盗等等。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光自己贪玩，要多关照弟弟；多写信，免得大人牵挂；到了重庆，能买到票就先飞北平，到了北平暂时住在叔叔家，走不了就

安心在重庆等,他和母亲不久就会来的。那天晚上,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针替我们把钱缝在衬裤上。一边缝,一边嘴里也是不停地做这样那样的交代。她为我缝的虽不是衣,但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的'寸草心'是一样的情,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温暖。父亲后来又想起让母亲给我们带上鱼肝油丸,好补补身体。总之,只要我们还没走,父母亲的叮嘱、交代就没完没了。千叮咛,万叮咛,嘱咐了又嘱咐,让我们享尽了慈父慈母的关爱。"(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276—278页)

六月二十日 晨,立雕、立鹏先行飞渝。闻立雕回忆:"昆明的六月,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大自然好像也充满了温情。二十日一大早,吃罢早点,父母亲率领全家人为我们送行。西仓坡宿舍院子相当深,从我们家到大门口约有二三十米远,这个抢着拿行李,那个抢着提箱子,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大门口。我看见过天上的飞机,但没有接近过飞机,上劳作课时,我用木料制作过飞机,但从来没有乘坐过飞机。前几年我们学校有个高班生考上了航校,在美国受训结业驾着飞机回国,我羡慕极了,心想何年何月我要是也能坐上飞机那该多美啊!这天我终于也能上天了,越想越兴奋,心中简直乐开了花。父亲是很重感情的人,我们俩虽然只是短暂的离别,他却也动了感情,当我们坐上人力车开始上路时,他竟然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眼圈湿了。我回头和大家摆手告别,突然发现父亲的眼圈红润了,泪水似乎在他眼眶里闪闪打转,我那颗乐开了花的心,顿时也有些不好受,赶快扭转了头。车夫提起车把开始小跑起来,我再回头看看,父母亲还伫立在大门口,依依不舍地目送着我们。我们原想很快将会在北平重聚,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的一瞥,这次离别后来竟然是我们和父亲的诀别!"(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278页) 到重庆后,他们住在位于上清寺的清华大学临时招待所。

六月二十四日 下午,赴清华大学办事处,参加王康、禄厚坤订婚仪式。禄是云南地方上层人士禄国藩的女儿,禄国藩早年为护国起义将领,龙云时期曾任警备司令、宪兵司令等要职。由于这种原因,先生与民盟同人对这个订婚仪式十分重视,潘光旦、费孝通做主持人,先生偕夫人与张奚若、李公朴均到场祝贺。事后,外界讹传民主人士与地方人士如何如何。(据访问王康记录,1990.8.21)

六月二十五日 起草《为呼吁和平救灾号召万人签名运动》(代电稿),开印前亲自到崇文印刷厂看校样。(据原崇文印刷厂负责人祁仲安《往事琐忆》,《昆明盟讯》1986年第3期)《为呼吁和平救灾号召万人签名运动》文云:

> 为了呼吁和平救灾,我们于本月二十五日拟就了这个电稿,当日下午开始分访全昆明市各界人士征求签名,限期二十七日下午九时截止。以我们极有

限的人手，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我们征求的结果，居然超过了五千人。经过二十八日一天的整理，现在电报已经发出。但是我们深信今天昆明市内同情我们的呼吁，并愿意将他的姓名公开出来以表示赞助的人，决不止此数，所以电报虽然已经发出，我们仍愿作为一种民意测验，请求大家凡未曾签名的，继续签名，并尽量征求你[自]己亲戚朋友，不分男女老幼，不拘职业地位，参加签名，多多益善。签名单凡在七月三日以前送或回的，我们将汇齐发表。

和平救灾是关系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事，为自己的事而呼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请协助我们胜利的完成这一光荣的运动吧！一个名字代表一声怒吼，多一个名字，多一分力量。起来！全昆明市的人们！如果能把大家的力量汇成海潮一般的怒吼，它是会淹没好战分子的阴谋，和挽回中华民族的浩劫的！（铅印传单，黄秋帆藏）

在正式铅印出来的呼吁书上签名者有三一二一人，其中有：由云龙、马伯安、高荫槐、张天放、刘北汜、白澄、李广田、赵沨、骆驼英、林薮、许铮、梁伦、潘大逵、莫翰文、王念平、杨德新、李公朴、吴征镒、李源、冯素陶、潘光旦、范宁、吴浦月、楚图南、欧根、尚钺、何善周、孟超、费孝通、李何林、史刚、潘汝谦、庄霞、黄秋帆、王振华、杨一波、关山月、金若年、张小楼、李德家、夏康农、杨犁、范启新、温功智、柳映光、方仲伯、史靖、王子光、俞铭传、萧荻、杨默霞、丁月秋、伍大希、唐旻、何孝达、彭兰、张世英、毛承志、傅启泌、罗广斌、庄任秋、季正怀等。先生的夫人高孝贞、儿子闻立鹤，及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李广田的女儿李岫等也签了名。

这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赴南京教育部述职，受到蒋介石召见。席间谈到清华教授。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三时半后雇车赴中研院，候朱部长同往委员长官邸。五时到军校官舍，在外客厅坐数分钟后有他客出，始被让入内室。主席着蓝长衫，颇安闲，谈话约半时，首告以数日前往北平查看校舍情形。问：复校计划何如。答：现正赶修各部，暂定双十节开学。问：师生能赶到否。答：希望大部分届时能到平。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朱乃提及关于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为证。朱又谓曾商量过关于教授长及院系主任人选之更动，总使主要负责者皆为稳健分子。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

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主人点首是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朱因乘机提教员待遇及经费应增高问题。"（据原件，清华大学校史组藏）

六月二十六日 下午，与潘光旦、李公朴、楚图南等在法国商务酒店举行民盟云南省支部第一次招待会。

时，昆明形势发生变化。一是潘朔端在东北率滇军一八四师起义，旋称愿改称民主同盟军第一军，作民盟后盾。二是六月中旬龙绳武的第二十四师不愿奉调出滇，在昆明自行解散。由于上述两事，外界风传民盟破坏大局、勾结地方势力企图暴动。为了以正视听，民盟云南省支部决定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支部负责人第一次公开盟员身份，与各界正式见面。是日招待昆明党政军机关及社会、新闻界人士，出席者有杨杰、张金鸥、杨镜涵、金龙章及警备司令霍揆章的代表，共五十余人。

会上，潘光旦首先报告开会意义，说一是"民盟滇支的负责人借此机会与各界正式见面，其中有些人不久将离昆，也顺便与各界道别"，二是"外间对于民盟传说纷纷，多有不甚了解者，乘这机会向各界说明一切"。接着楚图南以主任委员身份报告民盟的一贯主张与对当前政局的态度，"着重指出民盟的主张为八个大字，即'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不民主不足以谈团结，非和平则无从建国。这是决定中国国运的关键，若民主不能成功，团结统一不能实现，将引中国至分裂混乱之惨剧。内战再起，则将引中国至亡国灭种之境地"。"民主同盟有感于此，因而号召全国人民兴起'自爱爱国，救人救己'的责任感"。李公朴继之报告了民盟的历史，"指出今日中国政党应有的作风，是应该有相互的公开批评，但不是谩骂毁谤的方式；应该提倡政党间的友谊竞赛，但不是武力消灭异己的方式"。

这时先生站了起来，说明自己本是从事学术教育的，之所以参与政治，是因为"认为政治是一种事业，是教学，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或人生的境界。政治是人类群体生活集中的表现，并以群体爱作为基础。只有以群体为对象之爱，才是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先生激昂地说："今天乘此机会，愿意伸出我们的手来与各位合作，我们的手，虽无缚鸡之力，不可能也不愿意来威胁利诱别人，但也决不接受别人的威胁利诱。我们并愿意以这满是粉笔灰、毫无血腥气的手去扭转中国的历史，去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

先生讲毕，杨杰、钱沧硕、方国定都发表了感想，主题都是关于如何挽回垂危的国运。到六时，招待会圆满结束。（据潮《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招待各界茶会记》，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16期，1946.7.1）

先生在会上的发言，给在场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胡笛在《痛悼吾师闻一多先

生》中回忆:"在我平生中对于闻一多先生印象最深而永不能忘记的是:就在他死前的半个月,也是在民盟招待会席上,他和李公朴先生坐在一起,他起来用诗人的口吻,解释着民盟的性质。他离开了坐席,站立起来,两手把握着靠背椅子,沉默了一阵,引证老子的哲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说:如果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共产党是第二大党,那么,民主同盟就是第三大党。有了第一大党,从科学的历史发展眼光看,必然会产生出来第二大党,既然如是,那么,第三大党的产生,也是必然的。他很得意而微微掬着笑容,继续不断地说着:如果有人问:会不会产生'第四'呢?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不会,一定不会。即使有,例如青年党等等,那也只能归并为第三类。会不会互相排斥或不相容呢?那也不会的。因为民主同盟是第三方面的'中间的中坚'。他惟恐来宾席上的人们,不能完全了解这个哲理,又引经据典,解释了半天。最后,他大声急呼地说:'最近在近日楼的墙壁上贴了许多莫须有的标语传单,有意造谣中伤,甚至于诋毁侮蔑民盟,花样翻新,不一而足。现在我们公开与各位见面了,让大家明瞭民主同盟的要求,只有八个大字:和平建国,民主团结。这又有什么可怕呢!'末了,他伸出一张手,降低了声调,极其温和地说:'诸位看一看在我的这一张手上是空无所有,满手都是粉笔灰,教书人的手,自然只有粉笔灰,粉笔灰都是白的颜色,在我这张赤手空拳中,是满手纯洁净白的,有什么可怕呢!我愿意伸出这张洁白的手,期待着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大家都伸出了友爱的双手。在那次招待会上,有中委杨杰,有监察使张维翰,有警备总部政治部杨主任,有女参政员张邦珍,有省委金龙章,有新闻界老前辈钱沧硕、王公弢,有名流学者如华罗庚、张奚若等五十余人。没有一个人不为他感动,也没有一个人不在散会后,异口同声称许他的天才智慧与优异的学术造诣。"(《文萃》第40期,1946.7.25)

先生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就受到过讲演训练,他说话时也有诗一样的激情和条理分明的道理。吴晗在《闻一多全集·跋》中说:"一多是很会说话的,平时娓娓而谈,使人忘倦。晚年思想搞通了,又擅长于说理,尽管对方有成见,固执得像一块石头,他还是沉得住气,慢慢道来,拿出大道理,说得人口服心服。在大集会里,他又会另一套,一登台便作狮子吼,配上他那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眼神,不消几句话,就把气氛转变,群众情绪提高到极度,每一句话都打进人的心坎里去。虽然,在事先并无准备,甚至连讲的纲要内容都没有写下。"

先生的声音,有着很特殊的地方,闻山在《教我学步的人》一文中,说:"我永远忘不了闻先生的声音。我还想为闻先生写一首诗,想寻找一个能够形容闻先生的声音的字眼,但是找不到;因为它是那么的丰富和深沉。有时候,——例如他念唐

诗,或者平时讲话,它就像大提琴低音弦的颤动与和鸣,像夏里亚宾唱《伏尔加船夫曲》时纤夫们自远而近的歌声;有时候,像雄狮的怒吼——当他面向万千群众,痛斥法西斯特务统治,或鼓舞游行示威队伍出发,或者,在他朗诵田间的'她也要杀人'的时候,他头上厚密的长发抖动着,有如猛狮的髦毛;他那由于愤怒而更加宏大的声音,以及这个声音所传达的正气与无可抗拒的真理,使你血液为之沸腾,拳头握紧,喉中感到需要行动的干渴。"(《人民日报》,1956.7.14)

同日 昆明《观察报》复刊,刊头是先生题写的。该报原是龙云三儿子办的,现由大儿子龙绳武接办,为的是保留一些龙云的影响。复刊前龙绳武想改换原刊头,副刊主编范启新请先生握管,先生立刻应允。(据访问范启新记录,1987.11.8)

关于《观察报》的情况,一位外国人曾介绍说:"在龙云建议其子经理《云南日报》被拒绝,而后者又卸任了去越南受降的十九师司令之职后,龙云决定要他的儿子另办一张报。这样,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观察报》就问世了。在它的开创阶段,《观察报》看来是独立且颇自由的。尤其它的社论好似刺入腐败者要害的一把尖刀。读者得到满足了,赞扬阵雨似的落在这张报上。销数之快速增加,直到超过八千份的记录,并无明显的有势力人物的政治或私人接济。李闻暗杀案后,先前龙云的副官长杨立德与一百余云南省警察局人员被控参与谋杀而被捕。龙云的第三子龙绳曾则被认为他们的首领。恐怖统治了昆明。联大十一教授,中有二三个民盟分子,避入美国领事馆。对自由分子的普遍压迫开始了,《观察报》被责为民盟机关报。它的编辑人员都受到了监视。这就迫到这张报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它的编辑方针。前几天,有两个编辑因左倾而被革职。据传这是奉当地党当局的训令从事的。云南省政府警告这张报纸说它的方针在某些方面是反美,反国民党与反政府的,因为他们采用了郭沫若与茅盾的文章。在国民党眼中,郭沫若与茅盾当然是左翼分子。但是读者是较好的评判,这张报纸的销数现在减至三千份。一般讲来,《观察报》仍是昆明最好的一张报纸。"(Helen P. F. Shih,王民译《从昆明报纸看云南》,《国讯》第429期,1947.9.7)

六月二十七日 下午三时许,与潘光旦、楚图南、李公朴、潘大逵、冯素陶、费孝通共同主持民盟云南省支部第二次招待会。会场仍设在商务酒店,出席者为文化、教育、金融、实业界人士禄介卿、李琢奄、徐佩璜、龙云夫人顾映秋、刘淑清、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朱驭欧、倪瑾、孙天霖、王齐兴等八十余人。

潘光旦首先以主席身份报告开会意义,楚图南报告民盟主张,李公朴报告民盟的历史与组织。先生最后报告民盟的性质与作风。

接着来宾发言。朱驭欧(云南大学政治系主任)说民盟至少有两点是可信赖

的，“第一，他们都是文人学者，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第二，他们的文化水准相当的高，我们相信他们对一切政治问题的判断相当正确。有人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其实，凡是讲民主的人谁又免得了被别人戴上帽子”。“今天就是没有任何党派，我们也要起来说话了，还有一分良心的人，就不应沉默”。工业协会主席徐佩璜是清华学堂成立前，于一九〇九年第一批以美国庚款留学的，是清华最早的留学生，他在发言中特别说：“我认为方才闻先生所说的要以教育的、从事政治态度，这是非常好的方法，这才能保持政党的纯洁。”女青年会总干事倪瑾发言中：“在美国罗斯福与杜威竞选的时候，他们提出两个口号：‘有口要说，有手要写’，在我们中国，口被封住，文章又不能发表，这是非常使人痛心的事。”男青年会总干事王齐兴亦说，“过去总是独善其身不问政治，然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你不问政治，也许政治就来问你，我们不能把政治看成不是自己的事。”一位商界贤达说，他看到一些壁报，“总以为民盟的领袖是些青面獠牙的怪物，今天见了面以后看来都是文质彬彬，手无寸铁的书生们，我听了他们的报告才真正认识了他们，他们并不可怕，都非常和平。方才闻先生曾经说过他们愿意伸出他们沾着粉笔灰的手跟社会各界人士紧紧的握起来，我是个商人，我愿意第一个伸出我这污秽的手同他们握，但我并不是要加入同盟，而是我希望我们士农工商各界都伸出自己的手来紧紧的同他们握着”。省参议员孙天霖沉痛地说：“我们云南人，我不敢说话，参议会里议员们常常因为说话而受警告。”“我赞成闻先生所说的以教育手段、以和平的态度来从事政治。我也希望大家伸出手来跟民盟合作，以建立民主康乐的中国。”一位参加邮务工会的青年也“表示愿意伸出他这双工人的手跟他们紧握起来”。最后，潘大逵代表东道主做结论，说：“民主同盟是代表第三方面的政治组织，我们希望大家把同盟看成是中国人民的同盟，大家携手向民主之道路前进！”（均据王青《愿与你们紧紧的握手——民盟支部第二次招待会》，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17期，1946.7.9）

招待会的气氛非常和谐，尤其是先生关于“伸出手来”的发言，效果特别好，给人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十月七日，已经到了香港的赵沨，还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民盟在昆明招待政府负责人，社会贤达新闻记者的茶会上，他以诚恳的态度，高傲的语调报告民盟的立场、态度。最精彩动人的讲词是：‘今天，我们向诸位伸出手来，这是一群书生的手，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的手。这手上没有血腥，他们不打算以威服人，所以也决不受别人的威逼；这手上没有铜臭，他们不打算以利诱人，所以也决不受别人的利诱。这手上有的只是些粉笔灰呵，是像粉笔灰一样的纯洁呵。也许你们看不起这只手，说他太没有力量了。但是，就是这只手无寸铁的手，却正要扭转历史，创造历史！’他说完了，坐下了，那么多激动的眼睛望着这位名教授的

安详，高傲的神色，片刻的沉默之后，才突然爆发出一片掌声来。”（赵沨《闻一多先生底回忆》，香港《光明报》新4号，1946.10.18）

六月二十八日 与潘光旦、楚图南、李公朴共同主持民盟云南支部第三次招待会。由于商务酒店受到当局警告，会址临时改在冠生园，故耽误了些时间，到下午四时才开始。到会者都是新闻界与各期刊的负责人，约三四十人。大家边吃点心边发言，以对话形式开始。会中情形见《一切力量的源泉——人民，——民盟招待会第三日记》：

问：和平的希望还很暗淡，假如八天的停战期满，内战依然继续，民盟是希望国共双方永久停战的，这时将用什么手段去制止？或者用什么力量去制止？或者已有了什么有效的办法足以制止内战？

答：（楚）民盟一贯希望国共双方之任何争执，都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现在还是如此。若协商不能有结果，我们将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向双方呼吁并劝导。全国人民不希望打内战，内战是打不下去的。

问：希望只是希望，假如八天期满，内战又打下去呢？

答：（潘）无论那一方面想发动内战，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想打，也决打不下去。如果各地人民都能发起反内战运动，这就是制止内战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武力，但比武力更有效。（闻）只要我要他不打内战，就打不起来内战，这个“我”，代表每个不是丧心病狂或别有所图的、真正善良的中国人民。每个人坚持这意志，一定会实现胜利的。即使还打，也不能长久。民盟如果说有力量，就正因为他反映而且集中了每个人的内心的意志。

对话到此地，有人问起民盟与救国会的关系。李公朴先生回答这询问后，又说起：“今天中国的局势，单就灾情一项而论，就不得了。内战是万万打不得的。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打的机会也可少些。为人民喉舌的新闻界，在这点上，和民盟是一致的。”接着提到重庆较场口事件，报馆有些人故意歪扭事实。可是有些记者却不怕丢掉职业，坚持在揭露真像的稿子上签名，因而对受伤者的起诉帮忙不少，这种态度极令人敬佩。

有人问起民盟对于国共谈判中的军队驻区问题的看法如何？楚先生答称：根据民盟的政纲，是不同意任何私人军队盘踞一方的。但民盟认为在政治民主化实现后，军队及其他问题都不难解决。

闻先生在回答民盟有些什么报刊的询问时说道：民盟因缺乏经费，直接办的报刊不多，但各地报刊不乏虽非民盟却同情民盟，因此在意见及看法上与民盟一致的。仍希望更广大的言论界对民盟的主张予以支持。

会场的空气此时因提到美国军事援华法案而活跃起来。闻先生说：当前美国在华的措施，是违反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及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对华声明的，也是违反美国人民的意愿的。我们可以发动向美国人民控诉美国政府的运动。从美国内部来看两个政党间的进步分子及下层平民正将有自由工人联合的组织，这组织的发展将大有影响于美国未来的政治。所以我们对于外力的作用，不必过高估计。只有坚信自己的意志，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

楚先生接着说：战后的中国需要复兴，需要建国。任何有利的外来援助均将受欢迎。但若这种援助适足以助长中国的内战及增加中国人民的灾患，中国人民均不欢迎。

问题扯到马歇尔及仲裁权上面。具体提出：一、民盟对马歇尔的态度如何？二、第三者力量能否使和平条件实现？三、如果马歇尔不是和中国人民同一看法，将如何？

主人中的潘、闻等先生答问时，均认为比较马歇尔，民盟是更适合作为第三者来调解国共双方的争执。潘光旦先生坚决的说："民盟与其说是老三，倒毋宁是孱弱的老大，才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排解老二老三，叫他们听话。"闻先生继之说："我不承认武力为真正的力量，人民的意志才是真正的力量。宇宙间只有真理和正义在，有了坚决的信念，便不必为问题之不能马上解决所苦。还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和平的条件不能具备，则以各种方式和努力去促成他。对于马歇尔，则同样尽力，他与我们能有一致的看法。"

当李公朴先生再度邀请大家继续提出问题时，客人们都觉得时间不早，起坐告辞了。（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17期，1946.7.9）

民盟云南省支部的三次招待会都是公开的，却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监视、骚扰，一些与会者还受到压迫。参与招待会组织工作的赵沨说：民盟云南省支部为了说明民盟立场、态度、主张，并且特别强调以公开的态度、和平的手段争取民主政治之实现，决定举办茶会招待昆明政府、党团、社会贤达、文化教育界、新闻界人士。"没有想到，第一天的招待会便有特务偷去了茶会的签到薄，人们追赶他的时候，他越墙泅水而逃，在河对岸以手枪威胁追捕者。第二天茶会后，饭店主人竟接到匿名信，以暗杀威吓，迫令拒绝民盟假座茶会的请求。"李公朴被刺后，"我们才知道：凡是出席民盟招待茶会的人都受了警告。一个发言的富商艾××被特务打了一枪柄，他后来不得不带着保镖上街。杨杰将军说了几句话，听说第二天，便有人送给他一张到重庆的飞机票，劝他暂时离开昆明为妙。云大，几个民盟盟员的教授，听

说要被解聘了。李公朴生前曾去拜访过一位前云大教授李××[①],现在他家里也被特务光顾了。李××要上街,在公共汽车里,那特务还和他纠缠不清。他到了教育厅,特务跟着他,他到厅长室去看厅长王政,那特务还是麻烦了许久才走。事后,王政问李:你是不是民主同盟盟员?如是,我也无法,如不是,我可以替你洗刷,但是不是不能骗我,我们有名单。李××回答他说:也许我今天不是民盟盟员而明天便参加了呢?你们特务开的名单不足不凭,民盟负责人说我是盟员时,我便是了。"(赵沨《李闻惨案前后的昆明》,香港《光明报》新4号,1946.10.18)

六月二十九日 有信给闻立雕闻立鹏两儿。这是现今所存先生最后写的一封信。收《闻一多书信选集》。信上说:

> 知道你们有机会早飞北平。这机会千万不要失掉。如果无内战,以后飞机当然比较容易找,我们便尽早飞北平。如果有内战,我们恐怕短期无法飞来,那么你们孤独的留在重庆,便不是办法。相反的,你们到平后,住在叔叔[②]家,我们倒也可以放心,……大妹小妹都天天吵着要早来,其实我也有愿意早来的心事。你们放心,我是不会放弃早来的机会的。家中都好,妈的身体这几天来也比较健康。我这几天特别忙,一半也是要把应办的事早些办完,以便早些动身。

六月三十日 昆明各界万人签名运动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和平。电文为张天放起草,先生修改润色。印好后,先生亲自征求签名,很快,签名者即达四千余人,云南耆老由云龙、赵鹤青、吴琨、王灿、马伯庵、张止真、李子猷、李云谷、高荫槐等,实业界祁仲安等,都签了名。该电文云:

> 南京蒋主席钧鉴延安毛润之先生勋鉴:抗战告平,咸庆更生,乃人民之喘息未定,而阋墙之祸乱继起,白山黑水,战焰涨天,长江大河,血流满地。农村既饿殍载道,拯救无术,都市复罢工罢教,层出不穷。加之外货充斥,生产停顿,经济危机,尤濒险境。虽停战一再展期,而和平犹未实现,是不仅全国民众所深忧,亦为国际友邦所共虑。是以吁请国共两方,一本爱国爱民之心,开诚相与,一面立即宣布长期停战,一面火速救济灾区。其他如交通之如何恢复,军队之如何整编,生灵之如何救济,与夫政治上民主团结之如何实现,均应以诚意协商解决,万不可使兵戎再见,骨肉相残,坐令民族生机断丧尽净,悬崖勒马,此其时也。迫切陈词,幸垂察焉!(该电文印刷件,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

① 云南大学教授李德家。

② 闻家驷,时已返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

会藏）

当时，类似的活动很多，有的人看到宣言、通电中措词激烈的文字，不免有些为难，就用假名签名。先生讨厌作假，坚持要用真姓名。赵促邑说："有一篇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电，措词激烈，说在这里签名的人，都准备随时牺牲。闻先生叫季镇淮同志拿去请西南联大中文系一位年青教师和他的一位朋友签名。这两位原先都是闻先生的学生。他们看了电文，感到很为难。签名吧，怕担风险；不签吧，又碍于自己老师的情面。于是他们耍了一个花招，签个假名。闻先生一看，大为不满，厉声道："要是怕就不要签，要签就签真名。我们不要假名！"闻先生深知草宣言、发通电，说谎话、签假名，宣言通电就没有力量。他们受闻先生光明磊落的态度和英勇斗争的精神所感动，终于签了真名实性。"（《闻一多先生轶闻》，《随笔》第8集，第52至53页）

同日　昆明《原野》杂志创刊。刊头是先生题写的。这是李广田等人创办的一个文艺刊物，创刊号上有李广田的《日边漫笔》、戈寒的《漫笔民主堡垒》、鸿生的《论是非》、绿蕾的《八年来诗歌运动的脉络》等文。

是月中下旬　《九歌——人民的艺术和人民的讲教》发表于昆明《人民艺术》第三期。今佚。

是月下旬　袁永熙离昆前一天晚上，到西仓坡去看望先生，两人谈了很久。袁永熙回忆："我与闻先生的关系从一二·一以后越来越密切。离昆的前一天晚上，我去辞行，闻先生似乎很有心，谈了自己的出身、家庭、经历，说自己不够成熟，缺乏斗争经验。我心里明白，他是用中共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尽管没对我提过入党要求。那天闻先生还说：中国民主运动的头一炮是我们在昆明放的，现在上海为抗议下关惨案放了第二炮，咱们回北平后一起放第三炮。他还说回北平后暂不住清华，因为那里离城较远，他要住在城里好和大家一起开展民主运动。"（访问袁永熙记录，1988.4.26）

是月下旬　与一位同学谈话中说要清算中国的艺术遗产。王力《我们的老师被暗杀了》："三星期前，我带着几幅画去看他，他还像往日一样地热情、泼辣、坚定。他一身浸满了澎湃巨大的生命力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我们一开始就谈到艺术问题。出我意料，听着他的话，我立刻感到有什么东西就要爆炸。'别的我不懂'，他斩钉断铁地说：'对于中国的艺术遗产，我自信有能力清算它。我们从前错了！以为艺术是在上层，现在历史可证明了艺术并不在上层，而是在下层，生根在人民的土地里。上层的艺术早已枯死了，只有人民的艺术永远充满了活力。这是一个真理！一个智识阶层的艺术家要认识这个真理，得经历一段痛苦的过程。……是的，这是痛苦的。但如果你不想窒死自己，不想断送艺术，你必须走上去……。什

么是艺术的路？——一个人民艺术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该的。我们用不着去寻找。人民的路就是我们的路。他们早给我们开辟好了。……去掉那些傲气，服服贴贴地听人民的话。……'"(《新华日报》,1946.7.26)

是月下旬 洪德铭来家辞行，并劝先生早日离昆北上。先生说："你是了解情况的，两个月来交待工作和组织调整，由于受到局势的影响，进展不很快，我要在昆明多留一个时期，以便安排好各项工作。还有我一家八口人，走的钱和交通都是问题，需要多点时间筹办，不能像你们一样说走就走。"洪德铭说希望先生一家和学生一道走，沿途可以照顾，路费也好解决，先生说："钱的事当然不是大问题，但工作摆在面前，我不能抛开不管。何况我早已答应要迟走几天的，现在楚图南、尚钺诸先生都还在昆明坚持工作，我绝对不能提早走，即使万一发生意外，我也是死而无憾的。"(据洪德铭给编者的信,1989.3.5)

是月下旬 和《今日文艺》编辑林华昌谈诗，说："四烈士殡葬时那八个醒目大字：'你们死了，还有我们！'是口号，也是好诗！"(林华昌《闻一多先生与文艺青年》,昆明《五华文艺》1979年第3期)

是月 为民盟云南省支部各机构刻化图章。楚图南《纪念战友闻一多》："一多对革命工作的积极热情，是不能令人忘怀的。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当时，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和破坏，民盟的各种文件都是用个人化名的私章行文的。一天晚上，当民盟云南支部的组织机构确定后，朋友们便把为这些组织机构化名刻图章的工作委托给一多。第二天的清晨，一多就来到了我家，用颤抖的手，递给我四枚由他自己设计、连夜赶刻出来的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的'田省三印'，代表秘书处的'刘宓'，代表组织部的'祖范之印'[①]和代表宣传部的'杨亦萱印'的石章，我当时望着一多布满血丝的眼睛，接过了四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动。"(《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34页)

由于即将离开昆明，一些朋友希望得到先生刻的一方印章，先生很珍视这种友情，抓紧时间为朋友治印。其中给曹靖华刻的一枚名章，就是这时刻的，但是印章送到曹靖华手里时，先生已经殉难了。曹靖华原在汉中西北联合大学教书，被教育部以在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为名解聘。解聘后，曹靖华到了重庆，进入中苏文化协会工作。他有一枚牙章，是和他有风雨与共患难之交的李何林、王振华夫妇在昆明买了送给他的。送这方印章前，李何林请先生为曹靖华刻成名章。该章刻有四行

① 此误。据杨明回忆，组织部印是"王祖平之印"。编者根据这个线索，在先生自编印谱中找到了该印，它果然与上述几枚印章排在一起。

边款:“三五年夏应　何林振华兄嫂属为　靖华先生制　一多　昆明”。字体为篆体,苍劲典雅。曹靖华说:“当年交通不便,当我收到这枚牙章时,已经在给刻者举行追悼会之后了。睹物怀人,不禁怆然泪下!自从收到这枚牙章之后,三十多年来,所到之处,总把它带在身边,置诸案头。这不仅是为了实用,更重要的,是睹物思人,以烈士精力自励。”(曹靖华《一枚牙章》,《羊城晚报》,1980.2.23) 在先生自编的印谱中,有这方名章的印模。

张怀瑾同学的名章,也是先生在紧张之时刻下的。张怀瑾回忆说:“我一九四二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毕业。西南联合大学宣布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上,我滞留在昆明,游荡了一个月,找不到工作。到了六月初,中国语言文学系师生滞留昆明的人已经不多了,我决定离开昆明,另谋出路,颇觉怅然!于是差不多花一整天时间,走遍了正义路一带的印章社,反复求索,寻得一颗正方形象牙图章。大约是在六月三日下午,我专程前往闻一多先生的西仓坡西南联大教授宿舍,对闻先生说:我准备离开昆明,想请先生给我刻一颗图章,以作纪念。闻先生欣然应允,问我刻什么字体?我说:我很欣赏闻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篆写的碑头,最好刻篆体。六月八日下午,我去将图章取回,欣喜万分,再次去正义路配了一个白牛角的图章盒。我决定六月十五日离昆。十三日下午三时许,我带着那颗图章去闻先生家中辞行,并请闻先生补刻署名边款。闻先生听后呵呵大笑,当即在颇为杂乱的书桌上,拿了一把刻刀,转身斜靠在床头,我们一边谈话,他一边刻,不用半小时,在图章的一侧,一行醒目的边款:‘卅五年六月一日于昆明’便告完成。岂料这次话别,竟成永诀!”(张怀瑾《一颗图章照丹心》,《穹庐文萃》第409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先生治印,留有印模,今存印谱五册,内有西南联大教师冯友兰、朱自清、吴有训、叶公超、雷海宗、余冠英、浦江清、华罗庚、高崇熙、芮沐、吴晗、孙毓棠、许维遹、薛诚之、何善周、李埏等,学生季镇淮、范宁、王瑶、傅懋勉、张滂、王念平、王松声、郭良夫、谭庆双、徐述纶等,云南大学教授尚钺、徐嘉瑞、熊锡元等,民主周刊社同事杜迈之等,还有云南省政府委员、经济界著名人士跃龙电力公司经理与云南纺纱厂厂长金龙章、云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华秀升、崇文印书馆老板祁仲安等,甚至还有云南省保安司令马瑛、滇军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少将师长陇耀等人士。(见闻立鹏、张同霞编《闻一多印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

除了为治印,先生还为朋友题写过一些对联。其中一副为:“自指头衔堪辟暑,一涤冰上是前生。”题款抬头书“澄洋老哥雅正　即希正可”,末署“弟　闻一多”,上盖两印,一为阳文“一多”,一为阴文“匡斋”。一副为“莲荪先生有道雅正。余对酒

当歌青虹正绕,共评花索句素鲤频传。"末书"集宋词　闻一多"。还有一副为"世道日交长浇风薮淳源不采树枝翻栖恶木根所以桃李开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争飞奋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太白古风源出咏怀子昂感遇不及也言。闻一多。"上有"闻一多"、"有山"二印。

是月　与《高原》编辑欧小牧谈办刊物的意见。欧小牧《我和闻一多先生》:"先生遇害前不久,因要请教先生对文艺的意见,又去拜访先生一次。先生谈起昆明刊物太多,已超过市民的需要,内容又欠研究,力量不集中,如近日楼'人民壁报'读者很多,可惜大家不肯用力好好地办一办,就是作家,也大都认为作品写出,责任已了,并不问工人农人看懂了没有。先生以为作风无妨稍轻松,只要无毒就可以。他并说:'死硬派用不着争取,同情我们的也用不着争取,倒是中间阶层,动摇不定的,急需要争取。'"(《新华日报》,1946.9.8)

是月　为驻龙同学题词:"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七月一日　与冯素陶、楚图南、吴征镒、尚钺、徐修、赵沨、李何林、吴富恒、丁维铎、姜震中、张小楼、费孝通、张曼筠、潘光旦、王振华、李公朴、潘大逵共十八人联名电慰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诸人电,刊于昆明《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六期。未入集。

六月二十三日,马叙伦等八人代表上海民众赴南京请愿,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车抵南京下关站,遭特务殴打。先生等闻讯至为悲愤,特致此电慰问。电云:

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诸先生公鉴:

阅报知先生等为反对内战,赴京请愿,被反动派法西斯分子指挥暴徒,辱殴重伤。同人等闻之,至为悲愤。除先电致敬慰问外,并誓为诸先生后盾,力争中国和平及民主政治之实现!尚希为国珍摄,并盼早日康复!(《闻一多先生等电慰马叙伦诸先生,誓为争取民主和平之后盾》,《民主周刊》第3卷第16期,1946.7.1)

昆明文化教育界也为下关惨案发表了抗议,由凌风起草,并请先生修改。先生"认为'狗嘴'、'狂吠'之类的字眼放在词意庄严的文件中不大调合,要加以修改。他说:'我们有我们的身份。'"(凌风《回忆闻一多同志》,《光明日报》,1950.7.15)这份《抗议下关暴行》亦刊于《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六期。

七月五日　与楚图南一起去医院探望刚作完阑尾手术的王振华。王振华说起外界谣言,要先生务必小心。(据访问王振华记录,1986.5.28)

同日　著名讽刺漫画家廖冰兄的《猫国春秋》展览,由广东同乡主办的越秀中学出面,在锡安圣堂展出。该展览由《猫国春秋》、《方生未死篇》、《黉宫灯影录》、

《虎王惩贪记》和连环漫画《鼠贼横行记》五组漫画组成，以大后方群魔乱舞、卖国求荣、贪赃枉法、倒行逆施，和人民大众在水深火热中的呻吟等画面，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猫鼠不分、猫鼠同眠的社会现象。展览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展出时，引起极大轰动。七月初，该展览在成都展出后，来到昆明。正式展出前，先生与楚图南、潘光旦、李公朴等受邀观看了这些作品。当时，先生说了句善意批评的话："你为我们说得太多了。"意思是说作者的笔墨过多地用于知识分子向控诉，却较少为工农大众鸣冤，后来有人认为这句话"非常恰当地指出这位长期生活于知识分子圈内的作者的不足之处"。（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第18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廖冰兄在昆明期间，还有感先生的生活景况，特创作了《教授之餐》，画面为一位教授一家四口围坐餐桌，桌上盘中唯一的"饭"竟是一本正在被撕折着的厚本洋装书，他们端的是空碗，却正在啃着书以充饥。这幅表现大学教授穷得要卖掉心爱的书本才能换得一餐半饱的漫画，由于生动反映了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窘境，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廖冰兄的代表作之一。（参见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第188页）

同日　即将复员的彭兰、张世英夫妇搬到先生家暂住。闲谈中，先生说："你俩的婚姻，是我促成的，算得是文学与哲学的联姻了。世英要多学点文学，若兰[①]其实也有思想，有哲学头脑，要学点外文，我一向主张学中文的要懂外文。我将来等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学问，就可以不问政治了，我也不是个闹政治的人。"（张世英《归途——我的哲学生涯》，第61至62页）先生还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谈话中，先生对季镇淮不弃糟糠加以称赞，说："只有对感情忠实的人，才能尝到感情的滋味，他未来的家庭一定是比较幸福。"（彭兰《风范长存》，《北大学报》1979年第5期）

七月六日　余冠英将离昆北返，是日去探望先生。他在《我和闻一多先生最后的一次见面》中说："我和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七月六日上午。我到他家里时，他正在伏案写字。'你正在写文章？'我问。'是的，没有关系，坐下谈谈，我正要休息。'他说着拿起一枝烟递给我，我点着了烟，坐进他对面的藤椅，道：'我的行期排在本月九号，你怎么样？''我也就要走了，试试看买得着飞机票不？'他说完笑了起来。前几天有人预言他不会买得着飞机票，因为有强有力者不放他离昆明，他自

① 先生觉得彭兰的单名不好叫，就给她起了"若兰"这个名字。

己却不信。关于他的'飞语'一向很多,有些是污蔑中伤,有些是幸灾乐祸。现在我避免和他谈这些,便将话头引到将来楚辞九歌搬上舞台的问题。他刚完成将九歌编成歌舞的工作,有许多新证,前两次已见到他的稿子。从九歌又谈到汉代的诗歌□,扯出好几个问题。谈了约莫有四五十分钟,有别人进屋来,话便扯到一些闲事上去。等到重新剩下我们两人时,他忽然很兴奋地谈起民主同盟招待昆明各界的一次茶会。他重述了几段在会场的谈话,他向来说话算不得流利,但常有警句,充满力量,这一点不在他的文章之下。他告我,那天招待会中曾有人问他内战会不会打起来?他答道:'不会打!因为"我"不许打!"我"是老百姓。老百姓谁同意打内仗?每个老百姓都会喊出"我不许打",谁还敢打!'他说话的调子常常是这样,显然,他自己也欣赏这样的调子。话渐渐转到镌印的事,我说他这门艺术进步很大。他忽然像记起一件久忘的事似的,说'我给你刻的那块太坏,我重刻一块送你。'我笑道:'那自然好,我还想饶一付对子。'他道:'可以,都等到北平办罢。'这时我瞥见那几只煤油箱垒成的书架上堆着十几块待刻的象牙章和石章,想起他的时间已被我费掉不少了,便起身告辞。他还留我再坐坐。我说:'动身前还要来。'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你如先到清华园,请到新南院看看我栽的那些竹子长得怎样了,还有那块草地。'我道:'我得回扬州一趟,怕不会比你先到北平。'这时我又想起那些关系他的安全的谣言,又找补了一句:'你还是早些走罢,越早越好!'他含笑点点头。"(北平《民主周刊》第10期,1946.9.12)

这时,联大同学纷纷复员北上,先生对他们分别时的话,总是鼓励早日到北平。季镇淮复员打算回江苏淮安老家看看,先生叮嘱他不要滞留在家乡。程应镠辞行时,先生也说:"你在江西是住不住的,你没有可以沉默的性格,纵使去中正大学教书,再好的读书环境,也终必苦闷,要向大地方跑的。"(流金《人之子——怀念闻一多先生》续,《文汇报》,1947.3.25)

对康伧则说了另一番话:"你看到我这两年来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内容呢?"说完想了想,用英文重复了一句"崇高的爱",又感慨地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康伧《忆闻一多先生》,《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86页)

七月九日 《民盟的性质与作风》发表于昆明《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七期。收《闻一多全集》。这是根据上月月底民盟云南省支部三次招待会上的发言整理综合而成,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它反映了先生对民主运动的认识,和为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的信心和意志。文中云:

诸位来宾，今天承诸位光临，给我这个机会，以一个政治团体代表人之一的资格向诸位领教。这给予我个人的感觉，除了光荣之外，还有无限的感慨与兴奋。此刻我的心事真是千头万绪，但为了避免浪费诸位的宝贵时间起见，我还是把我的话头尽量限制在少数的几点上谈罢。

首先，我要向诸位说明的，是无党无派在中国民主同盟中的地位。刚才李公朴先生向诸位报告过，今天我们百分之八十的盟员是无党无派，但是他还忘记了同样重要的一点，那便是我们最高的领导人张表方老先生也是一个无党无派。在上最高的领导人，在下绝大多数的群众，都是无党无派，这现象说明着，到了今天无党无派确乎是民主同盟的主要力量。而在将来我们组织的发展中，无党无派盟员的数量一定更加扩大，无限度的扩大，所以，无党无派在我们内部，又不只是今天起着决定作用，而且恐怕永远要起着决定作用。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对内我们是无党无派，而对外我们又是有党有派。无党无派，因为我们昨天不问政治，有党有派，因为我们今天在问着政治。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无派到有党有派，这一转变，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们是因为被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们是因为被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确是觉悟了，知道那种捧是不怀好意的灌米汤，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好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如果我们昨天的超然，是掩饰自身的怯懦、无能和自私自利和美丽的幌子，那便是比自己干着吃人勾当更为卑鄙的卑鄙行为，我们今天更应该忏悔。好了，不管昨天怎样，我们今天总算醒了，我们也不讳言我们为自己今天的觉醒而骄傲。

今天我们再不是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的中立者了，今天我们要站出来，做活动于两极之间的积极的中间人。但是所谓中间人并不是等于无原则的和事佬。我们要明是非、辨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来做两极之间的公断人。我们除了牢不可破的对民主的信念以外，没有任何成见。也不可能有任何成见。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成见呢？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是有党有派中的无党无派，因此我们的党派，在本质上，便带着某种程度的无党无派性。你也可以说，我们是今天各党各派中最富于无党派性的一个党派，或是说，最无党派成见的一个党派。不是说我们昨天还是不问政治的无党派，今天问政治了，才变成有党有派的吗？我们固然"觉今是而昨非，"但也正因我们一向是不问政

治的无党无派，所以今天问起政治来，只有政治的主张，而无党派成见。惟其无党派成见，所以我们愿意不惮烦难的在两极之间做中间人，而不打算排斥任何一个。惟其有政治主张，所以我们不能做无原则性的和事佬，而要在两极之间，做个明是非、辨真伪的公断人。

以上我从无党无派在同盟中的重要性，证明了同盟本质上的中间性。不用说，中间是从两极生出的，两极的存在是中间的存在的先决条件，所以说到同盟的中间性，同时就说明了民主同盟是国共两党的小兄弟。小兄弟年纪轻，不免情急一点，并且"新生之犊不畏虎"，自然也就显得火气大而嘴头硬了。但说嘴头硬便是完全因为年纪轻，那也不尽然。我们实在还有一个更正大的理由使自己有恃而无恐。老实说，我们是一个光杆，既没有武力，又没有政权，而我们偏要说话，嘴头再不硬点，还中什么用呢？而且，还要记得，也正因我们是这样一个光杆，我们才可以硬，值得硬啊。谁都知道，我们民主同盟没有武力，也不要武力，所以谈起政治来，我们的脚跟是比任何人都站得稳些的，脚跟站稳了，自然说话也就响亮了。同时因为只是动口不动手，这手也便可以随时伸出来给你看的。

所以，我们的和平的手段又天然的决定了我们公开的态度。手段必需和平，态度必需公开。这里道理讲起来自然多得很，但我们今天无需在此地讲它。我今天要说明的，倒是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一半也是由于自己的积习。大家知道，我们多数人是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而和平不正是教育的手段，公开不正是教育的态度吗？如果承认暴力和欺骗正是教育的敌人，那么，我们多数人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便证明我们的生活记录上不可能有半点使用过暴力和欺骗的污点，而今后我们的政治活动中，也不可能有那一套。老实说，我们就是抱这样一个傻念头来从事政治的，那便是，用教育的手段和教育态度来改造政治，把整个国家社会变成一个学校。我们相信政治本来就应该照我们这样做，不照我们这样做的政治，本来就不应该存在。我们也相信，不应该存在的政治，只要我们决心不许它存在，它早晚就得消灭。除非我们不管，我们管了，一切就必然服从我们。我们对我们的这一套，因为有了科学的认识，所以有着宗教的信心。

我刚才讲同盟的中间性的时候，曾说到中间是从左右两极生出的，更具体的就左右两极与中间发展的程序说，其实是因先有右，而后有左，既有左右，便自然有了中间。用古代哲学家的话，这正是"一生二，二生三"的发展程序。但是从一发展到三便是终结，从四以下以至无尽数，都不过是一或二或三的重复

和再重复。近来报上常常把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总称为第三方面，而这其间的主干显然是民主同盟。这就说明了，民主同盟是最第三性的第三方面，也可以说是中间的中坚。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凡是真正第三性的党派或个人必与我们合作，不与我们合作的必非真第三性，或者只有在与我们合作的期间，一个党派或个人才配称第三性，一旦停止与我们合作便立刻失却它成它的第三性的资格了。反过来也是很明白的，凡是我们愿与之合作的，也必然真是属于第三性的，否则必是由第一或第二性假冒的第三性。

最后，特别要请诸位注意的是，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第三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承认了第一第二，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中间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承认了左右两极，因为有第一和第二，才可能有第三，有了左右两极，才可能有中间。换言之，我们必需先承认了别人然后才谈到我们自己。我们是待他而后存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是排他的和独占的，我们知道排他和独占就是毁灭我们自己，正如今天任何一个中国的政党，如果是排他和独占的，我们深信，都要归于毁灭一样。因此，我们对于旁人的批评，不管如何严厉，目的总是要成全他，以便与他合作。我们既批评别人，当然也不拒绝别人的批评，但是污蔑毁谤和造谣中伤，我们是不受的。谁要使用这样的手段，谁便犯了排他和独占的嫌疑，而排他和独占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总之，我们的目标是合作，自己与一二两个大党合作，同时也要一与二彼此互相合作。我们民主同盟自身便是一个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共同合作的榜样，我们愿把我们内部合作的精神和经验，贡献给全国的各党各派，乃至无党无派，来共同完成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建设。

我们个人间平时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一则因为大家都忙于职务，难得抽身；二则也因为我们这些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代表人，明珠不能暗投，纵有机会和诸位个别的见面，也不愿谈到政治。今天承诸位光临，得到和诸位见面的机会，感谢之余，就让我们趁此正式的，公开的向诸位伸出我们这只合作的手吧！请诸位认清：这是只“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的手，不可能，也不愿意以威逼人，因此也不受人的威逼，这只“空空如也”穷措大的手，不可能，也不愿意以利诱人，因此也不受人的利诱。你尽可瞧不起它，但是不要怕它，真是，有什么可怕的呢？不信，你闻闻看，这上面可有一丝一毫血腥味儿？这只拿了一辈子粉笔的手，是可以随时张开给你看的。你瞧，这雪白的一把粉笔灰，正是它的象征色。我再说一句，不要怕，这是一只洁白的手啊！然而也不可以太小看了它。更当许许多多这样的手团结起来，它可以团结更多更多的手，无数的拿锄头的手，开马达的手，打算盘的手，拉洋车的手，乃至缝衣煮饭，扫地擦桌子的

手……到那时，你自然会惊讶于这只手的神通，因为它终于扭转了历史，创造了奇迹。

你说这是空想，是梦话吗？不，不，一点也不是。假设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入一个政党不可，而这一个党又是可以按各人自己的意愿，毫不受拘束的来选择的，那么大家不妨想想看，在今天三大政党中，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会选择那一个？让我大胆的说一句吧：中国民主同盟！你说这又是空想，是梦话，如果那个假设真能成立，你的话也许不错，但是那个假设根本就不能成立。我说假设是可以成立的，可以的，因为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今天客观的情势不是在逼迫着每一个中国人，为他自己生存的条件和生存的权利，不得不加入一个团体来奋斗吗？而且这逼迫不是正在一天天的加紧吗？我知道我们自己便是这样逼出来的，而我也相信，照这样下去，是会逼到每一个中国人头上来的。今天逼人者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逼的机构与计划似乎已经布置得十分充分，所以逼已经是定局了。只看这被逼者投奔的去处，是否有能力收容他们并善用他们的力量。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十分明白时代所课与他自己的任务，只是这任务如何完成，一半固然靠我们自身的努力，一半也得靠大家的鼓励和支持，所以我们这只手也是同样向大家伸出的。

七月十日 彭兰、张世英将离滇回武汉，特来先生家辞行。先生对他们说："你俩的婚姻，是我促成的，算得是文学与哲学的联姻了，世英要多学点文学，若兰（闻先生觉得她的单名不好叫，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思想，有哲学头脑，要学点外文，我一向主张学中文的要懂外文。我将来等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党部，就可以不问政治了，我也不是个闹政治的人。"张世英还回忆说："'等到那个时候'这半句话是闻先生特别提高了嗓子说的，我们心领神会，知道他的意思是说，等到国民党垮台，共产党夺得政权之时。闻先生特别叮嘱我们：'回武汉后，要赶快北上'，还带着暗示的眼光问我们：'你们懂吗？'"（《归途——我的哲学生涯》，第61至62页）

七月十一日 时，民盟通过朱家璧可以捐到一笔款子，准备为民盟办个刊物，名称未定。先生说：这个报不办起来我就不走。（访问杨明记录，1986.7.17）

深夜，有人来告知李公朴被暗杀，生命垂危。

这天，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同学乘车离开昆明，复员北上。未行者仅为待机北返的教职员及留守人员。晚，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为联系募捐场所去找南屏电影院经理，顺便看了场电影。九时四十五分散场，两人走到南屏街，特务便尾追而来。李公朴、张曼筠在青云街下车，至学院坡，李即被特务枪击，后被送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民主周刊》报道李公朴被刺经过云："十一日晚七时许，李公朴先生因事，与其夫人张曼筠女士行后外出，八时余应事完毕，同往昆明大戏院观电影，十时余电影毕，在南屏街搭公共汽车回返北门街其寓所，于青云街车[站]下车，李氏与其夫人甫行至青云街以通至大兴街的小巷中，就突闻枪声自后面使来，李夫人尚以为系车胎破裂声，不料即见李氏中弹倒地，呻吟于泥泞中。李夫人情急大呼'捉人呐，枪打人了！'雨潭中行人疏落，未见人来。后闻凶手已被当地岗警捕获，送往三分局，李夫人正单独扶救中，时有云大同学数人经过，见情开始前往协救，以担架立刻送往北门外云大医院救治，时已将近夜十一时。到云大医院，李先生尚神志清明，经医生立刻检查，见伤在腹部，子弹系由腰射入，至右腰穿出，血未外流，伤势异常严重。经注射麻醉针，疼痛未止，此时李先生口吐鲜血满地。医院方面决定立刻施行手术，经过约二十分钟，担架入手术室，开刀检查，腹肠穿通数孔，其中两孔，口径特大，在一方寸以上，形将断绝，在施行手术过程中，又呕吐不止。至午夜一时，手术完毕注射盐水，李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后担架至三十四号病房进行输血，并注射盘尼西林，时已今晨(十二日)二时余，至此情况尚佳，不料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至今晨三时许，李先生即现不支之状，虽经医师不断注射各种救急针水，终于至今晨五时二十分即气绝逝世。逝世时大骂'无耻'，并高呼'我为民主而死！'"(《李公朴先生被刺的经过》，《民主周刊》第3卷第18期，1946.7.14)

先生得知后，不顾正在发着高烧，便要起身去医院。高孝贞担心天黑有危险，极力劝阻。先生虽未出门，但在房里走来走去，心焦如焚，一夜没再上床。

关于当时的情况，经历其事的赵沨在《李闻惨案前后的昆明》中说：那个时候，"天天风传有什么黑名单，名字总是李、闻、楚、潘(光旦)等，次序各有不同。"李公朴被刺前不几天，"接到一封匿名信说：'不要来沪，防遭暗算。'"七月十日，"李公朴的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自称是滇军失业军官，特来投效。李向他们多方解释，民盟反对以武力从事军事斗争，才悻悻而去。这天夜晚，我从李家出来，门前有一位拿着伞，穿着卡机布制服的人便跟着我走到大街，后来，我进了南屏戏院后，才不见他的踪迹。""为了要举行一次独唱会，向南屏借戏院，李公朴先生夫妇替我去交涉，在七点钟时候就出去了。出门的时候，李向他的夫人说：'今天跨出这门，不知还能不能回来。'他们夫妇出去了十五分钟，一个与××团有关系的朋友，气急败坏的跑到李家，一听说已经出去了，她非常着急，只关照李家的人说：'要李先生特别小心！'便又匆匆的去了。九点钟，李公朴夫妇看完了电影从市区回家，看时间还早，便挤上公共汽车，车上人很多，有几个穿黄色卡机布制服的人把李公朴围了起来。车到青云街口，李公朴夫妇下了车，有几个云大同学也下车，那几个穿黄衣服的人

也下车了。车站旁是一个上坡的巷,那巷可以通到圆通街口的学院坡,他们便走进这小巷上去。天刚下过一点小雨,那小巷又是人们挑水经过的地方,地上很滑,李扶着他的夫人上坡……那云大的同学看见有两个人也跟着下去了。枪响了,只一声,人们看见两个人向街的两方分头跑去。"当时,"李夫人还不知道呢,是声音太小了。李倒在地下,说'我中弹了',李夫人才大呼救人。那几个云大的同学闻声起来,正撞见那逃去的凶手,市民们喊杀人了,捉住他,七八个人追赶上去,在警察局门口捉住了那个人,警察便把那人带到局里去了。李家离出事的地方不远,到他家,抬了一个帆布床把伤者送到云大医院。有位女同学流着泪向医生下跪,求他快点动手术,伤者这时神智还清醒,经过手术后,只喊腿发麻,有时吐些血出来。子弹从背后进,腹前出。出口比入口大,肠子被打穿了好几处,大概胃里的血管也受了伤,所以时常吐出鲜血来。肠子缝好了,流向了盘尼西林防止发炎,他好像还平静,一点钟的时候,又吐了血,并且激动地大骂'无耻! 无耻!'又张眼问:'几点钟了?'便继续着说:'我为民主而死!'断气了。天一亮,从各方起来了学生和友人们。房前的签名薄,很快便要换一本新的。很多护士都哭了。一个小军官模样的人,交给痛哭着的李夫人一封信。后来,那送信人走了之后,人们把信拆开。原来是一封告密信,大意说: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住在××街××旅馆,他是李案的主凶,又述说了这人一些别的罪状。错字很多,字也写得很坏,倒真像这类人的手笔。十点钟的样子,来了一位警官,向死者行了礼,便退出了。在院子里,他向医生询问了详细的情形,便向周围的人发牢骚说:这年头,无论出了什么事,警察总有责任,无论谁都知道,警察能管谁呢? 这时,满街都已贴了学联的讣告,瞻仰遗容的人越来越多了。中午,包括四十八人民团体的治丧委员会便成立了。很多人送来了挽联、花圈。"(香港《光明报》新4号,1946.10.18)

七月十二日 一夜未眠,晨五时赶至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李公朴已身亡,先生抚尸痛哭,"一面流泪一面说'这仇是要报的!'""最后愤愤地说:'公朴没有死! 公朴没有死! 公朴永远没有死!'"(《李公朴先生惨遭暗杀》,《学生报》号外,1946.7.12)

从医院出来,即与楚图南、冯素陶等讨论并起草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严重抗议》云:

>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同志,数月前曾以争取和平民主,在重庆较场口被暴徒辱殴重伤。伤愈出院,休养月余,即来昆处理家务。七月十一日晚八时公朴同志,偕夫人张曼筠女士外出,十时许归至大兴街口,突遭暴徒狙击,枪中腹部,伤势严惩,遂于晨五时二十分不治逝世。本民盟支部认为公朴同志之死,不仅是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的巨大损失,亦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

为了这一个英勇的民主战士的死去，全国各界，无论知与不知，自当同声痛哭。不过本民盟支部，认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政府虽于政协会议前一再宣称保障自由，保障人权，而各地惨案依然屡次叠出，此次公朴同志之死，实是昆明四烈士，西安王任李敷仁之死，南通孙天平等之死，同一性质。于此可见，以特务恐怖政策摧残人权，破坏民主和平运动，并不惜以最阴险狠毒之手段杀害民主人士，乃是政府一贯的政策，因此对于这一案件，本支部不得不向政府提出左列抗议：

（一）彻查造成本案之直接负责人用凶手，并予以严厉惩处。

（二）对死者家属优予抚恤。

（三）立即实践四项诺言，取消特务组织，维护人权，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同时，本支部也正式向全国各界呼吁，请对我们上项的抗议，一致予以有力的声援，并本着李先生的精神，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继续奋斗，直至目的达到为止。（《民主周刊》第3卷第18期，1946.7.14）

又商讨拟定了《李公朴先生被刺的经过》，文中义正词严地指出："救国何罪？李先生竟因救国而下狱；庆祝政协何罪？李先生竟因庆祝政协而被殴头破血流！要求民主和平又何罪？李先生竟因要求民主和平而最后遭此毒手！谁是国家民族的罪人，看李先生的遭遇即知！谁是背叛者，看李先生的最后结果即知！这是反动派向人民进攻的证据！这是反动派不要民主和平的证据！李公朴先生被反动派特务暗算了，但全中国要求民主和平的人民是杀不完杀不绝的！人民应该牢记着这笔血债，应该为你们自己的战士索还这笔血债！"（《民主周刊》第3卷第18期，1946.7.14）

时，特务制造谣言，说李公朴是被共产党派来的艾思奇所杀害的。民盟的同志决定发表声明以正视听，但在措词上有不同意见。先生坚决主张点明是国民党杀害的。张子斋在《闻一多颂》中写道："在讨论声明内容时，发生了不同的意见：闻一多主张应当毫不含糊地在声明中明确指出是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并强烈抗议和严厉斥责这种法西斯暴行，要求严惩凶手，与会的多数人赞成。有的人也承认是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主张在措词上写得比较笼统些，温和些，以免过份刺激。闻一多和其他一些同志对此显然不满。……我曾参加了这次讨论，对他在白色恐怖下表现出来的原则坚定性有深刻的印象。"（《思想战线》，1979年第5期）

这天，先生没有片刻休息，与同人们开会、拍电报、派人去印刷厂，将抗议书送至警备司令部、组织李公朴治丧委员会等，很忙碌。另外，又派庄霞（卜兴纯）以民

主周刊社记者名义去找各社会贤达收集对李公朴被刺事件的反映。(据庄霞《忆闻一多先生二三事》,《昆明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此时,社会上已传出第二个暗杀目标即是先生,有个女特务也假充疯子上门威胁。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三番五次到家里来,一手拿着本圣经,一手点点划划说:"闻一多,还不快忏悔,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你命在旦夕了。"闻名对前来探望的记者说,先生被刺前,这个约四十左右身材瘦长的女疯子到家里来了三次。"她一忽说她是基督的布道者,一忽说她是共产党,头一次她一进门,就问我找姓闻的在不在?我答应她姓闻的不在这里。因为费孝通先生前几日就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怪女人,但是她不肯走,随后就让她坐下来。她拿出一本圣经给老大(指闻立鹤)说:上面有'易多'两字,她拿带着的□算了算说:'多是两个夕字,夕是太阳快落山了。'过了几天,她第二次又来,老大骗她闻先生已经走了,她说'真可惜!'交了一封信给老大,信上说到:'我们要信仰集中,力量集中,意志集中,才能有和平,如果听我的话,世界三天就和平。'以后又由邮局寄来一封欠资信,是给费、闻两先生的,大意和前一封信差不多。过了两三天,她第三次又来了,孩子们害怕,就把门关起来,她在门口骂,说闻先生不来见她,又说了一阵'意志集中……'一类的话。后来又到过潘光旦先生家里三次,在十二号去的那次,并拿出一封给潘、闻两先生的信,这封信上有这样的话:'闻一多这老糊涂,他一家都神头神脑,关起门做鬼事,更不敢见人。须知我张柴静(按系怪女人自称的名氏)一宣传其字,是光明磊落,仁爱为怀的共产党,岂像你这些无价值的西装杂种,斯文盗贼,只会做磨下的蛆,我敢说钻死也不成功,你听好老娘行给你看,等你老娘成功,把你这些儒教蠹虫,连书烧掉……谁不知中国两党太□疯组织,不好意思见我又好意思见外国人吗?可见中国被你们这些卖国贼,弄得连生路都没有了。这□唱是人民的喉舌,人民再给你这些臭喉烂舌,只写些搪不掉风,挡不掉的雨的□文,于人民的痛苦一点也解不掉……你若知悔,速将你们的志士约齐,听你老娘教导你们听,只要连合好,三天就可天下为公,你们瞎了鬼眼,新旧约上完全指导你们,都看不见,三字经千字文中庸,任着一本也有明显的和平法,都瞎得那样净。只看见钞票,可口的东西。任你怎样的鬼,在老娘面前逃不掉,你不悔,我断你是夕夕。''我把你这些该死的奴才,李公朴是你们杀的,他既是好人反连保障都没有,就见你这些臭嘴老哇,自身已是漆黑,……岂止死一个李公朴,我不是早告诉你们,有很严重的惨杀在不多的一日要发现……'(按以上是节录原信,错字依旧未改)在十四日那天,这女人在路上碰到老大,又给了一封信,说我知道你们明天(按指十五日,即闻一多同志被刺之日)在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招待记者,如不听我的话,我就在那时结束你的性命!闻先生十五日被暗杀

以后，这女人立刻就出现在闻先生的血迹旁讲演，惨案后一二日，又到我们同院的两家去质问说：'你们这些不是抬丧人吗？'因为这两家曾借了我们帆布床，和帮了一点忙。那天她带了一百个徽章向大家问：'你们要不要？要的给你们，带了保你们没有事。'但一个都没有要，她跟某太太说：'等二十四号听你的答复。'以后就没有再来了。"（李浸《闻太太及闻小姐谈闻一多同志被刺前后》，《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1946.8.2）

七月十三日　为李公朴被刺事件题字："斗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了，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人！"（《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封面压题）

夜，一朋友来告，说云南警备司令霍揆章已奉南京密令，决定首批暗杀名单有四人，逮捕十余人，均为民盟负责人，嘱先生少出门。这个朋友，可能是欧小牧。欧小牧在《我和闻一多先生》中写到："李公朴先生成仁后，闻将继续不利于先生，曾于十三日夜十时，往叩宿舍大门，求见先生，立鹤看见是我，打开门请进去。先生甫就寝，自帐中伸首延坐，夫人坐在对面，我陈述了消息来源之可靠，劝先生小心出入，先生频频称谢。我不再停留，立即退出。"（《新华日报》，1946.9.8）关于消息来源，欧小牧后来补充说："我偶到大东门珠玑街口一家杂货铺里访友，友人对我说：'刚才有个人来买包香烟，看样子象个特务。他夸口说，一两天内就要下手闻一多！'我听罢，匆匆乘车回到西仓坡，要把消息告诉闻先生。此时宿舍铁大门已关，敲了一阵，立鹤披衣出来，看见是我，就把门打开，把我引到先生床前。先生披衣坐起，叫我坐，我不坐，急急对先生转说了这个消息，并再三嘱咐请先生这几天内千万切勿外出，以防意外，先生频频点头，连声说谢谢。"（欧小牧《生死情——闻一多先生被刺四十周年祭》，《欧小牧文集》第1卷，第441页）

是日下午，中苏文协昆明分会被查封，扣留了寄居于此的赵沨。夜，赵沨乘看管不严脱身，先生接他来自己家中暂住避风。赵沨在《回忆闻一多先生殉难前二三事》中说："闻先生命令式地让我住到他家，并且关切地对我说：'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但我知道你这个河南人，就给你煮挂面吧！'当时，楚老、闻一多先生和我天天在民主周刊社碰头，我住在闻一多先生家里的那个晚上，他曾经对我说：'我想晚点儿回北方去，一方面是为了我和你们安排好昆明的工作，另一方面，因为我有一年的休假，我想借此机会，从北平秘密地到解放区去，那怕是去看一看再回来。'这时，我向他叙说了我离开重庆时，周总理对我的训导：'大家都想到解放区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因为那是我们大家的老家嘛！但是，现在国统区革命形势虽然处于低潮，但总有一天国统区的革命高潮也会到来，到那时候，谁来做国统区的工作呢？'我记得闻先生沉默了许久，我考虑了一下，坦率地对他说：'据我知道，在你的学生们中

间,就有地下党的组织,这一点,我深信你早已经觉察到了,青年人都需要你,何况你到了北方,你一定会有机会见到胡公(这是我们当时对周恩来同志的称呼),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向他说啊。'这时闻先生高兴地笑迷着眼睛说:'你这一说我可以放心了。'"(《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87页)

时,中苏文协昆明分会干事金若年也无处安身,先生让他和立鹤挤在一起睡。刚睡下,便听见潘光旦夫人赵三姊喊:"大弟,大弟,我家后窗有人!"金若年与立鹤赶紧出去,但未见人,(据访问金若年记录,1986.7.5)可见空气之紧张。

七月十四日 早晨,潘大逵来先生家,专告特务有黑名单事。未遇,潘又到民主周刊社,方找到先生,对先生说特务已确定首批暗杀四人黑名单上确有先生,并对其他友人叮嘱少开会,勿刺激,须持镇静。先生听了亦以为然。(据访问潘大逵记录,1986.12.29)

这些天,形势日益严峻,家人与朋友都不免为先生担心。但先生仍很沉着。高真《一多牺牲前后纪实》:"李先生被暗杀后,昆明城里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传说黑名单上第二号便是闻一多。许多人都为一多担心。早在去年'一二·一'惨案时,特务就扬言要以四十万元收买一多的人头,近来,这类流言更加猖獗。近日楼、大东门、云大围墙等处还经常出现许多反动壁报,对一多进行攻击诬蔑,叫他'闻一多夫',说他是'共产党的尾巴',说他'组织暗杀公司'等等。不少同志都劝一多不要外出。有的好心朋友,还拿来一套西装,劝他化妆躲避。但他毫无惧色地说:'死,并不可怕。'他怀着满腔悲愤,比往常工作得更紧张。那些天,他从早到晚在外面奔走,就是在回家来吃饭时,也很少说几句话。孩子们也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比平日沉默得多了。李先生被暗杀,使民主力量受到很大的打击,活动遇到了严重困难。民主周刊社这个进步力量活动的据点,也没有人敢去了。周刊社有的青年眼看工作就要被摧垮,不知怎么办好,来找一多。一多十分镇定地说:'我去,不要紧,我去坐着!'后来,据杨明同志说,一多平日一进门,总把手杖挂起来,今天一进去,就拄着手杖坐着,心里当然明白处境的危险,但很镇静。外面心神不定,来看风声的人,一看见他坐在那里,那么沉着,也都镇定下来。别的本来是在外面偷看的人,也进来了。局面才逐渐稳定下来。《民主周刊》本来已经出不成了,有的同志也不想出了。可是,他坚持一定要出,他说:'不能向敌人示弱!难道李先生一死,工作就停顿了?!'印刷厂已经不让印了,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和同志们一起到处借铅字,终于又坚持出了一期。《学生报》也克服了重重困难,及时编出了'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一多亲自写了报头,还写了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人!'……由于学校正在复员,西南联大西仓坡教职员宿舍里一片杂乱,

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收拾东西。拿不了的东西就摆地摊廉价出卖。那些日子，在大西门外，沿马路两边都摆了一溜小地摊。教授家卖东西，是个新鲜事，很吸引了一些人。有些会做生意的小商小贩，索性挑着担子到宿舍里来收买。因此，院子里成天不断闲杂人，出出进进，各式人都有，其中也有不少特务趁机混了进来。常常有人问院里的孩子：'闻一多啥个样子？''闻一多穿那样衣裳？穿西装还是穿中装？''闻一多可有胡子？'有一回，一个歪戴帽子，满脸横肉的人竟挑着挑子一直往屋里闯。连日来，这一连串的刺激，无限的担忧、紧张，使我的心脏病更加厉害了。仿佛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整天压在胸口，透不过气来。一多每天在外面忙碌，他已经完全顾不上我了。我见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加上未痊愈的重感冒，体力已经有些不支了，但还是像一团烈火，熊熊地燃烧着。我忍不住向他恳求道：'你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我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可怎么好啊！'他沉默了一会，慢慢地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室内很静，孩子们都睡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那么有力。……十四日晚饭后，我心里实在憋得难受，便来到潘太太家坐坐。潘太太是一多老同学潘光旦先生的夫人，热情，善于体贴人。她见我的憔悴样子，很着急，又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一多来找我了。他还是老毛病，回家来要是见不到我，就没着没落的，总要把我找到心里才踏实。就是工作时，也总喜欢我在旁边坐着。潘太太一见他，赶忙说道：'瞧瞧你太太，成了什么样子了？明天开会，你不要去了吧！'她说得那么恳切，眼中充满了焦虑。一多告诉过我，明天要召开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的大会，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面目。此刻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沉默着，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早已做好了'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准备。我像预感到了什么似的，一颗心像被抛进了沉沉的深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379 至 383 页）

这时，先生将生死置之度外。先生殉难一周年时，张奚若写了《一多先生死难一周年纪念》，文中说："在你的朋友中，谁能像你将服膺半生的自由思想和道德观念，在一旦觉悟之后，认为只是某一阶级的偏见而并非永恒的真理，弃之惟恐不尽，攻之惟恐不力！谁能像你将'人民'看作国家的真正主人翁、社会的主体，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它，而不把它当作仅仅是供给大人先生们生存需要的一种工具或学者政客们鹦鹉式的口头禅！谁能像你，在这人民解放的历史过程中，勇敢地向解放军的急先锋青年们虚心学习，而不坠入'年长就是道高'的错误观念！谁能像你绝对地鄙视那'明哲保身'哲学而将'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发挥到顶点，为民族增光，为懦夫添耻！假如你没有死，你今日是否还能耐心地守着原有的岗位？假如你要离开原有

的岗位，除过更向前，还有别的方向吗？”（清华周刊社编《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第49页）

是日上午十时，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李公朴被暗杀后之应付方法及其治丧事务等，当即决议：“（一）民盟致电蒋主席请政府对李公朴被刺案严惩凶手，彻底查究本案政治背景并保障人民身体之自由；（二）民盟致电云南省政府请就近严查本案政治背景，并严惩凶手；（三）民盟对李公朴之死难，除在全国各地发起大规模之追悼会外，并举行公葬；（四）电嘱云南省民盟支部负责办理李公朴殓事，并妥为照料死者家属；（五）用民盟中央常会名义致电李公朴家属表示哀悼；（六）推定三十人组织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并推定沈钧儒为主任委员，筹备李公朴公葬及追悼事宜。”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委员为先生与张澜、张君劢、沈钧儒、黄炎培、张东荪、张申府、章伯钧、梁漱溟、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楚图南、费孝通、刘王立明、史良、范朴斋、马哲民、周新民、吴晗、李章达、邱哲、沈志远、周鲸文、杜斌丞、陶行知、邓初民，办公地点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新村对面的沪江女子中学三十一号。（《民盟昨开会决定追悼李公朴，推定张澜等三十人为治丧委员》，《文汇报》，1946.7.15）

七月十五日 一大早，又有朋友来报信，说黑名单的事绝对可靠，请先生千万小心。先生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高真《一多牺牲前后纪实》，《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83页）

当时，中共地下党也派人通知先生注意隐蔽。闻立雕说：“就在这个当口，昆明市学联主席吴显钺受中共地下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的特别指派，前来转达党的意见，要父亲立即转移、隐蔽。父亲与吴显钺常有接触，但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误以为他此刻前来仅仅是出于学生对老师的关心，吴显钺则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也不便亮出自己真实身份，结果父亲仅仅对吴的好意表示了深深的感谢，但是，拒绝隐蔽、转移。他说：‘我们很多人都溃退了，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我要坚持战斗。’郑伯克听了吴的汇报，一时也无可奈何，只好叮嘱云南大学的党支部和在民盟工作的党员多多关注父亲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282页）

是日 昆明《学生报》出版纪念李公朴遇难特刊，刊头“学生报纪念李公朴先生遇难特刊”为先生题写。

同日 昆明学生联合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这时社会上风声鹤唳，谣言四起，大家请求先生不要外出，注意安全。先生认为这个会不能不参加，以只出席不讲话为条件，得到同仁们的同意。为了安全起见，杨明派

弟弟杨昭(杨希孟)去西仓坡宿舍接先生到会场。杨昭在《真的猛士》中回忆道:"我看清联大宿舍周围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才走进闻先生家。先生早就准备好了,穿一身洗得灰白的长衫,见到我,便从书桌前站了起来,提起拐杖说:'咱们走吧。'我先出了门,只见刚刚还是空无一人的对面墙角下,站着一个穿西装、戴礼帽的大汉。西仓坡口上,也出现了一个瘦猴脸、穿美式夹克的家伙,这些阴险狡猾的狗特务!我气愤地转过身来,想劝先生不要去了。可先生早已看见了特务,也早就抱定了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决心。……先生鄙夷地扫了特务一眼,拐杖在地上用力一顿:'走!'说着,便昂着头,大步跨出了家门。我紧紧走在先生身旁,只见那个瘦猴脸的家伙迎面走来,穿西装的大汉向他呶呶嘴,他便转身在我们前面向云大走去。穿西装的大汉在我们后面二十多米跟着。先生坦然地和我谈着话,告诉我下午他还要主持记者招待会,明天还要参加李先生的火葬仪式。在特务的枪口下,先生竟是如此从容、镇定,深深地感染了我。西仓坡是一条狭窄僻静的小巷。走到这里,先生突然轻声地、但却是不容置疑地对我说:'你离我远一点,不要和我并排。'这是敌人最可能开枪的一段路,先生这是不愿让我一个青年和他同遭毒手啊!我怎么能离开先生呢?可我一想,前面那个特务快出西仓坡了,下面就是行人较多的翠湖北路,况且要开枪他还得转身。所以他开枪的可能不大,最有可能的是后边这个特务,我往后一截,既能把他往后压远一些,又能挡住他开枪的视线,倘若他敢超越我扑向先生,我就可以把他抱住,让先生跑进两边的人家。先生见我不再固执,转过身看了我一眼,目光是那么慈祥,我的鼻子陡然一阵发酸,为了革命,为了青年,先生您是多么勇敢无畏啊!果然,穿西服的特务被我压在后面,我们很快走到了翠湖北路,行人时来时往,特务无法下手。走到云大门口,前面的特务便先进去了,可见敌人早有部署,知道了闻先生的动向。"(《云南盟讯》,1981年第7、8期合刊)

走进会场,先生坐在台下前面的凳子上。特务混在人群中。开会了,李夫人张曼筠声泪俱下地报告了李公朴被刺的感受。《张曼筠女士讲李公朴同志对死的观感》记录张曼筠发言:"想不到李先生头一次还站在此地与诸位讲话,现在却永别了。李先生被暗杀的经过,大家已经知道了。不知道的请问问知道的。现在我要讲的,是李先生对于死的观感。死,他死前就准备好了。他生前常说:'我们要参加民主斗争,就必须准备有死的精神,否则就不能坚持下去。'这次他从重庆回来,他说较场口被打,不算一回事,像马寅初这样的老先生,都在重庆准备好了一口棺材,随时准备死,我们壮年人,还怕什么死!他在死前,就知道随时可以死。他出街时和我说:'我今天跨出了这道门,不知道能否跨进来。'所以他早就有这种预感了。他问过我:'假若我死了,你怎么打算?'我虽没有说,但在我心里早已打算好了。我决定踏

着他的血迹继续奋斗。他的精神不死，有这么多青年追随着他，……他常常鼓励我，帮助我，尤其是对妇女工作。他是我的好丈夫，我的好朋友。他虽死，但他的精神没有死，他虽没有了生命，但刽子手却没有了人性！我不能讲了，谢谢各位。”（《张曼筠女士讲李公朴同志对死的观感》，《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1946.8.2）

这次会本来是请张曼筠报告李公朴殉难经过，但她悲痛欲绝讲不下去，会场一时静默无声，报告会主持者有些措手不及。这时，先生走上台，把张曼筠搀了下来，随之即席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只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年青的一代，献出了他们的血，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摇头，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多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

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莫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的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故意挑拨美苏的矛盾，想利用这矛盾来打内战，任你们怎么样挑拨，怎么样离间，美苏不一定打呀！现在四外长会议已经圆满闭幕了。这不是说美苏间已没有矛盾，但是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我们的新闻被封锁着，不知道美苏的开明舆论如何抬头，我们也看不见广大的美国人民的那种新的力量，在日渐增涨。但是，事实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其次，反动派干得太不像样了，在四外长会议上，才不要中国做二十一国和平会议的召集人，这就是做点脸色给你看看，这也就说明美国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人民的忍耐和国际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横干下去的！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

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①]（《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1946.8.2）

先生的演讲赢得热烈掌声。不久前加入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记者丁燕石参加了这次报告会，他回忆说：当时到会者有千人以上，先生讲演毕，过了片刻，“台下群众这才回过神来，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他还说：“这是我记者经历中一次难忘的经验，时隔半个多世纪，迄今回想，犹现眼前。”（丁燕石《闻一多遇刺前后》，台湾《传记文学》2003年11月号）

报告会结束后，陪伴先生到云南大学大门的赵沨目睹了这样一幕：“一群特务在云大大门外向他怒目而视，护送他的高先生向他望了望，他若无其事的提着手杖向前去着。他看看高，便问：‘怕么？’高摇头，他却仰着头哈哈大声笑起来了。”（赵沨《闻一多先生底回忆》，香港《光明报》新4号，1946.10.18）

先生是在一些学生护送下离开云南大学的。回到家里，休息了一会，又与楚图南一起到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先生对记者说：“我们对国民党决不是毫无原则的一贯地反对的，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我们都对国民党怀抱着极大的希望，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遗像，就是我学习试画的。”（赵铭《闻一多先生死难详记》，《人民英烈》，第24页）又有人问到街头有标语说李公朴是被艾思奇派人杀害的，民盟对此有何观感。先生回答：“杀了人还污蔑人，加罪给人甚至说是‘桃色事件’，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闻一多先生被刺经过》传单，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前，闻立鹤来接先生。会后，先生又与楚图南、尚钺等人谈了一会话。为了防止特务行凶将几位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一起暗杀，大家分头走出民主周刊社。先生等到楚图南走出去五六分钟，才与闻立鹤一同出来向西仓坡宿舍走去。

快到家门了，突然暗伏的特务从角落中露出来，开枪向先生射击。先生头部中弹，倒地身亡。闻立鹤奋不顾身扑在父亲身上掩护，被射来的子弹打到一边。

闻立鹤在《爸爸遇刺纪详》中记述：

七月十一日晚，李公朴伯伯于偕李伯母观戏回家的途中，突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次晨因伤重不治，在痛骂特务无耻卑鄙之后，永远离开我们了。

---

① 这次讲演记录，最早以油印传单形式散发。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昆明《学生报》，在《无耻啊！无耻啊！他们在慌啊，在恐慌啊！》标题下，第一次把这次讲演印成铅字。油印传单与铅字件出自同一记录，记录者是受昆明学联委派担任现场记录的云南大学余丹同学。《闻一多全集》中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基本与其相同，仅略有改动。这里选录的是八月二日昆明《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刊登的演讲记录，文字较前两者略有补充，是由《民主周刊》主编唐登岷编辑的。

消息是当夜一点钟以后才传到我家，那时父亲正在病中，得知这消息，大为震怒，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不顾三十八度的高热，拿了手杖就要往云大医院去，妈妈和两个报信的同学急忙拉住他说："太晚了，街上没甚么人，您又病着，出去也许有什么意外，等黎明再去好了。"几个人死死的拉了半天，才作罢，只是再也不能睡着了；这一整夜都有同学来报告消息，楚（图南）先生、潘（光旦）先生、尚（钺）先生也知道这事了，一座昆明城顿时为恐怖笼罩。

次晨五时左右，父亲就赶到医院去，这时，楚先生、尚先生他们都已赶到，迟了，公朴伯伯已在四点钟左右死了。李伯母抚尸痛哭，李伯伯生前好友围在床前，默默的祷告。父亲流着泪，凝视远方，一字一字的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几位同学看见他太激动，把他扶在一个椅子上坐下。父亲哽咽着吩咐几位女同学安慰李伯母，自己和楚先生他们匆匆赶到周刊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即刻拍电报，拟抗议书，派人到印刷厂，将民盟滇支部正式抗议书送达警备总司令部，并筹组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同时学联快报和号外在七点钟左右便出来，全市为之震撼。

接着街上谣言纷纷，风传第二号是闻一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朋友们都劝父亲少出来，以免意外，都说政府已决心蛮干了，可是父亲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还是亲自奔走，终日往返于周刊社和西仓坡之间，商讨公朴先生火葬的事宜。可是外面风声太紧了，谣言遍街，特务已集中西门一带，他才答应晚上不出来。

为防范未然，西仓坡教员宿舍开始门禁，晚六时以后，父亲便不见生客了。

大批特务装成各式各样的人，想混进去，于是门房一次次的通话，一会来说"有个老太婆要见闻先生"，一会又来说"一个戴呢帽的青年要见闻先生"，整个院子弄得风声鹤唳，幸好门禁很严，求见的特务虽然很多，总算给挡住了。

深夜，一个盟员跑来说是一个青年团某人传出消息，南京密令昆明警备部、宪兵十三团等机关，说："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霍揆彰奉令后，召集有关机关开会讨论，有人提议开始捕杀，经该会通过首批暗杀名单四人，又逮捕名单十数人，均为民盟负责人及民主刊物负责人。这位朋友告诉父亲少出来，说完匆匆走了。

母亲的心脏病又发了，我们也很紧张，可是爸爸还是工作。

经过几天的奔走筹备，民盟滇支部决定有两件事要赶快做。

第一，马上招待记者，向各界报告事实真象，揭穿反动派的阴谋；第二，决定十六日午举行李公朴先生火葬，并积极展开募款工作。

十五日一大早，那位前晚来报信的朋友又慌忙跑来，说是他得到的消息绝对正

确,要父亲千万小心,父亲微笑道:"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九点左右父亲差我去楚先生那里送个信,之后又传个信给冯(素陶)先生,所以那天早上到十一点左右我才回来,发现父亲已不在了。十二点,父亲疲倦地回来,见着我,悄悄地说:"我去云大演讲了。"我一怔,马上问道:"怎么不告诉我?"父亲笑了:"怕你嘴不稳告诉妈。"我也笑了:"爸真好!"随即问道:"会上情形怎样?""很好,人到的很多,特务被我痛骂了一顿。""没发生什么事吗?""没有,但是特务真多,是同学把我送回来的。今天下午要招待记者,我稍睡一下,到一点半叫我。"爸睡后,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极不安的预感,独自个往周刊社去了好几次,又到文林街钱局街四处看看才回来。

一点半爸爸自己醒了,楚伯伯也赶到,他们喝了一点茶就准备出发。我很不放心,便护送他们一直到周刊社门口。我问爸爸什么时候散,他叫我四五点时候来接他,我便匆匆的回西仓坡。

回到家里,母亲面无人色的问我爸上那儿去了,当我告诉他就在周刊社时她才稍为放心。她这几天就像失掉了魂的人一样,我一面安慰她,一面注意时间。

三点半,我在家实在等不住了,就向府甬道走去,到周刊门口,知道还没有散,焦急的在街上踱来踱去,看见很多歪戴呢帽的人三三两两散在街上,知道是些特务,但我只疑心他们是来监视所谓"民盟暴动"的,同时不住的想"爸名气这么大,他们一时不敢下手,杀死李先生已使他们下不得台了,那还敢再惹祸呢",也就不去在意,只是自己多加警惕好了。可是随即猛然想起那个特务化身的女疯子给我的恐吓信,又不禁有点发毛。这信我还不曾给爸看,因为他不会在意这个的,这只使他多分心而已。一时各种奇怪的念头都涌进了我的脑子,就越不可能安静下来。五点了,爸和楚先生先后走出来,楚先生匆匆先回去了,我心里松了一半,以为这一天可以平安的度过去,随手买了一份《复兴晚报》,爸便慢慢的伴着我向西仓坡走去。这时府甬道至西仓坡的途中是死一般的静寂,行至离家十多步的样子,忽然枪声大作,爸爸已经倒在地上了,我下意识的急忙扑上去,伏在爸爸身上,想用我的身体遮住爸爸,可是枪弹连珠似的向我们打来,我连忙大喊:"凶手杀人了,救命!"我想喊喊凶手就会逃走,可是四周比死还要静寂,我忽然感到全身无力,由爸爸身上滚下来,一直滚到离他五六尺以外的地方。爸爸满身统是枪眼,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面色苍白,嘴唇微动一下,手杖、鞋子和眼镜统都打掉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也受伤了,并且知道右腿已经断了。我不顾一切的大喊,希望宿舍里有人出来,接着又匍在地下装死,同时注意凶手的样子,几个彪形大汉一排的站在离我们二三十尺远的地方,正在继续向我们射击。两分钟后,他们扬长的去了。我又挣扎着坐起来,胸

口上三个枪眼涌出大股的血来，我努力想爬起来上坡去救护爸爸，可是毫无办法，因为右腿已经断了，左腿也中了一弹，血湿透了我的上衣。再看爸，正愤怒地倒在血泊里，面色已变黑了，爸是好汉，哼都不哼一声。

再过三分钟，大门开了，妈、赵妈、大小妹齐奔出来，看见这个样子都嚎啕痛哭，妈跑过去抱住爸的头，一股鲜血染红了她全身，她昏过去了。两个妹妹呜咽的啜泣，但都不知所措了。阿庄[①]跑出来连忙叫洋车，俞[余]师[②]弄了担架来，于是妈、大小妹、赵妈拉了几个担夫把爸抬上担架，阿庄把我弄上洋车，我们便往云大医院去了。一路上围观的人非常多，可是谁也不敢帮忙，云大同学此时也尚未得到消息，所以感到人手奇乏。

爸爸终竟死了，为了民主，为了正义，却遭反动派害死了，我要向社会控诉，这不公平呵！（清华周刊社编《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第 10 至 12 页）

先生被刺后，听到枪声跑出来的是妻子高孝贞和闻名、闻翻及赵妈、庄任秋，他们见到先生和闻立鹤躺在地上，立刻设法送往医院，当时的情形十分凄惨。高真《一多牺牲前后纪实》：

五点多，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枪声就在近处，我的心顿时像碎了一样，意识到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拼命往大门口奔去，老赵妈、大妹、小妹也都跑出来了。这时，门房面无人色地迎面跑来，说："好像是我们院子里的人……"我心里全明白了。两条腿忽然像棉花一样，支撑不住，我使尽全身的力量，跌跌撞撞冲出了大门。果真，一多父子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泊中，西仓坡上空无一人。我抢上去抱住一多，鲜血立刻染红了我的全身。他面色苍白，大股大股的鲜血还在不断涌流，鲜血中还合着白色的脑浆。他双目紧闭，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我抱着他的头，拼命呼唤他，但他的面色已经逐渐发黑，嘴唇也渐渐变乌了。我又强挣扎着往立鹤那边看去，他满身鲜血，瞪着两只充满仇恨的大眼睛。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眩晕，什么也看不见了。隐约听见大妹、小妹在哭嚎："爸呀！爸呀！大哥！大哥呀！"还有老赵妈的哀哭声："先生啊！大弟啊！"……我失去了知觉。……孩子们的哭声又把我惊醒了，我看见四周已围上了一群人，有宿舍里的人，有路过的人。孩子们和老赵妈，还有暑期里住在我们家的立雕的同学小庄，正在拚命往起抬一多和立鹤。刚抬起一点，忽然人群中有谁叫了一声："又来了！又来了！"人群哗地一下跑散了。一时间，空旷的西仓坡上又只剩下了我们这几个老弱妇幼。我知道，特务还夹杂在人群中，企图拖延

① 庄任秋。时住在先生家，准备与先生一家一起北上。

② 余瑞璜，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这个担架实际是个行军床，据说是住在先生隔壁的陈达教授家里递出来的。

时间，置一多父子于死命。我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挣扎着爬起来，跑回宿舍，借了张行军床。回到一多身旁时，人群又渐渐围拢了。其中有挑夫，我请他帮助把一多抬上了行军床，由大妹和老赵妈跟着，赶忙送往云大医院。随后，小庄也找了辆洋车，把立鹤送去。

一多父子被抬走后，我几乎完全麻木了。年仅九岁的小妹搀着我，从血泊中把爸爸的眼镜、鞋和手杖捡起来，放到了宿舍的大门后边。我们俩互相搀扶，踉踉跄跄走进院子里，锁上屋门，往医院去。出来时，忽然来了两个国民党警察，说什么要调查真相。我当时没有眼泪，也没有恐惧，有的只是仇恨，我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劲，大声说："你们不要问，是国民党杀的，还调查什么？"他们还想缠住我，我没有理他们，拉着小妹走了。

云大医院离西仓坡约有十多分钟的路程，抬着一多的挑夫走得很快，大妹时时得小跑几步才能跟上，老赵妈经受了这么大的刺激，已经双腿发软，拖不动了。过丁字坡时，她简直是爬上去的，她抓住行军床的床沿，连爬带拖，努力想跟上挑夫。就是这样，她们俩还是觉得挑夫走得太慢，恨不得一步能跨进医院。大妹虽然在西仓坡就已经看到爸爸的脸色和嘴唇变乌，呼吸停止了，但心里还是怀着一线希望，她含着泪水，一路不断央求挑夫："快点走吧，快点走吧！"心里默默叫着爸："爸啊！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赵妈边爬边哭，老是重复着一句话："先生啊！您可不能走啊！"一多的鲜血浸透了行军床，从帆布里一滴一滴地渗出来，流到地上，留下了一行斑斑点点的血迹。一路上，不少人惊奇而又恐惧地看着这几个浑身是血的人。到了云大医院门口，刚好从里面迈出来几个青年学生，他们一看这情景，赶忙问道："这是谁？""我爸爸。""你爸爸是谁？""闻一多，被枪打了。"几个学生像突然遭到了沉重的一击，都叫起来："啊，闻先生！"他们急急忙忙把一多送进了急诊室。大妹和老赵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走过来的医生身上，她们紧张地盯着医生的每个动作。但医生翻了一下一多的眼皮，摇了摇头说："不行了。"顿时，像一盆冰水浇透了全身，她们全都木了。大妹呆若木鸡似地站在那里，过了半晌，才发现行军床已被放到了急诊室门外、花圃旁的过道上，鲜血还在一滴一滴地渗透帆布，流到地上，积成了一摊，又流进花圃里。

立鹤躺在洋车上。血，将白色的车垫染红了。他昏昏沉沉，但始终瞪着那对仇恨的大眼睛，这里面燃烧着的怒火，能把那群豺狼烧成灰烬！只有当时见到过这双眼睛的人，才能真正感觉到什么叫仇恨！当爸爸中枪倒下去的时候，他立刻扑到了爸爸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但是，特务们的枪弹把他打翻，滚落在一旁，他眼看着亲爱的爸爸中了那么多枪……血，不断地淌着，他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但

他咬着牙，瞪着眼，断断续续地向跟在车后面的小庄说："要报仇！爸牺牲了，要报仇！……我如果死了，请你好好照顾妈，她有病……我两个妹妹都还小……两个弟弟不在这里……赵妈年纪大了……。"

一多和立鹤被送进医院时，我拉着小妹还在丁字坡上爬。两腿发软，浑身无力，我挣扎着，爬也要爬上去！丁字坡啊，丁字坡！丁字坡上的血迹是那么鲜红，点点滴滴似万箭穿透了我的心！……

我赶到医院时，一多仍停放在花圃旁的过道上，立鹤已被送进一间危重病人的单间。尚钺先生也赶到了，还来了一些同学。大家见我已经不成人样了，没有告诉我一多的噩耗，也不让我在一多跟前停留，急忙把我送进了病房。但我心里十分清楚，一多已经牺牲了。

从一多的身上发现了十多处弹洞，还有几颗子弹和一些弹片钻进肉里，没有穿出来。第一枪打中了头部，一多的左手本能地抱住了后脑，脑浆几乎流光了。他来不及说一句话就牺牲了。立鹤身中五弹，肺部被打穿，有一颗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寸，右腿被打断了，伤势十分严重。

面临着这样巨大的血的刺激，我悲愤交加，心脏病严重发作，完全起不来床了。身边只有十三岁的大妹，九岁的小妹和六十岁的老赵妈。朋友们有的早已离开昆明，民盟的其他负责人都已隐蔽起来，许多人还没有得到消息，只有云大等校暑期留校的一些同学在帮助料理一切。到了夜间，更是冷冷清清。病房中，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映在雪白的墙壁上显得那么惨淡，我躺在床上，感到自己是这样孤苦伶仃，一瞬间，我简直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又想，孩子们都还小，最大的立鹤才十八岁，他受了那么重的伤，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离开了我，他们将怎么生活啊！不，我要活下去，孩子们还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一整夜，安眠药的药力使我昏昏沉沉，可是我所遇到的强烈刺激，又使我不时惊醒，每次醒来，总像掉进了深渊一样，感到这世界是如此窒息、黑暗。（《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86至389页）

当时准备与先生全家一起北上的庄任秋[①]，也亲历了这一事件。他日记中写到：

记得我是一点钟午睡的，醒来已经四点，立鹤告诉我民盟的记者招待会已经开了，也许快开完了，他方才保送伯父开会去了（那时我正睡着），现在因为会正在进

① 庄任秋解放后任中共云南省新平县新区区委干部。1950年4月27日，土匪陈希凯暴动，他为保护征集到的公粮不肯撤退。28日，土匪包围区委，庄任秋惨遭杀害。庄任秋的日记一度保存在他和闻立雕的同学陈听枢处，1949年10月6日陈听枢将日记中的闻一多殉难部分抄录下来，取名《一个星期的日记》，于1982年交给闻立雕。

行，他的责任暂时没有，回头我想跟他一齐接伯父回来（这是我们约好的），因此我们就很快活地歌唱着，有时谈天。

大概五点半（因为我方才看是五点十分），我正在注神地抄着歌谱，没发现立鹤不在了。他告诉我，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接着是他们的执委会，我想大概会议不会立刻停止，老大（即闻立鹤也不会就接伯父去。他的不在，我以为是大便去，我仍一面抄歌一面高唱，那时周围的环境都很安宁，天气爽人。我直唱的高兴，突然"碰！"的一声清脆手枪声，"碰！拍！"于是有如连珠炮和爆竹一般响了十几下，我不觉心里一沉，西仓坡的枪响可能是对付他们的，立刻门房跑来说："这里的人着打倒了两个大人！"完了！教职员宿舍可能被打的只有两家，一是潘家（即潘光旦）一是闻，潘家没两大人，只有闻家了。天！我丢下笔往外一冲，有一个女的先比我到门口，她往外一望，立刻缩回来。我一看到伯父和老大躺在地下，我不假思索地第一个冲出大门外十几步接他们去。那时的情景有些可怜，一老一少孤独地饮弹躺于恬静的街心，我第一眼看见伯父脑袋已经穿了一大洞，脑髓迸散一地，眼镜摔碎在一边，面色死黄，唯有嘴唇还在颤动啊！伯父没希望了，我只好看老大。唉！老大在地上挣扎着起来，我看了心酸极了。他忙喊："庄任秋！快来啊，我受伤了，爸恐怕没希望了！"我抢到他身边了，见胸口一大注血，左腿上也有。我急问："老大，你伤在什么地方？伤重罢？"老大呻吟，可是气壮地说："我胸口中了枪，腿上也有。"旁边已经在啕着伯母和大、小妹的哭声，我心想这是上帝赋予我的神圣责任了，不禁定下心望培文中学[①]门口的同学求救："同学！请帮个忙，同学！"他们都不敢动，我无法，只好扶着老大。那时老大的眼睛已经露出痛苦的眨重[肿]，眼皮有些重[肿]似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职员观众群中冲出洪川诚先生[②]，来帮我扶老大，我建议说："洪老师，你守住老大，我喊车去！"可是车夫不肯拉，尤其是西仓坡的观众突然乱窜逃避，如似特务又来了。西仓坡顿然一空，车夫硬不肯拉，我死死求他，答应他最大的代价，他不拉，我没法，又跑回老大那里。我想死也要把老大抬到云大医院，或者请挑夫帮忙，或者等过往的同学相助，可是老听小妹"妈呀！妈呀！"哭得直叫人心惊胆战，我于是不愿再等，要求洪老师去叫车去，把方才我雇不来的车子死拖来了。我和洪老师把老大抬上车，抬不上，正在无法，有二位先生帮忙着抬上了，大概是联大生。

老大事情弄完了，我回顾伯父，大妹正急得扶伯父不是，走开也不是，只在恸

① 培文中学，在西仓坡宿舍正对面。
② 洪川诚，西南联大附属中学教师。

哭。伯母则张惶失措,我看见邻居陈旭都在旁边,我急叫:"陈旭都!你帮着老妹照料一下伯父!"可是陈旭都惶然缩后了,我再看老大身上血流很多,无法,只好舍此而护送老大上云大医院。洪老师陪我扶着车走,车夫死不肯卖力,路上只是我和洪老师相当费力,上下坡很讨厌。

上云大医院路上,老大很清醒,虽然脸色有些微微发白(脸色还微红),可是没有痛苦的样子,他的神情好像是在回忆方才的事情,安娴沉着,这使我放心不少。街上的人看了多半惊讶地问出了什么事,除了婉言回答以外,我时时注意老大的气色。

他开始讲:"这是逼着我,……"

"我也够勇敢的,救我父亲被打的。……"

"我也可以说是为民主死的罢。……"

我赶紧阻止他说,为了伯伤势严重,一则怕给人听了不好。

他又继续讲:"我可以做我爸的儿子的!……"

"老黑(庄任秋的绰号),你要帮我母东的忙。……"

到云大医院,伯父已经先由挑夫挑到,因为已经不可救,放在外科诊疗室外。我们把老大抬进外科诊疗室,上药、打麻醉针还是强心针不知道。老大有时叫疼,有时忍耐得发汗,当他发现手上的手表时,他要我为他脱下,说:"老黑,送你做永久纪念,为我报仇!"我心里又感动,更理智,虽然心酸,绝不落泪。

我要求把老大放到头等病房,大概没有房子,故抬到二等病房三十八号,伯父则被安放在停尸房。三分局的警察局长带上几位警士来探察病状,那时正是老大上药的时候,我代老大把情形详细报告,态度也很谦虚。他们马虎问问走了。大妹只在诊疗室外悲泣,我只好劝她:"大妹,这不是我们哭的时候,事情要由我们俩负责办,我俩要不理智些,事情就容易办糟了,你少悲哀些,别哭了!"

伯母和大妹、小妹、赵妈住在头等房16号,伯母心脏衰弱,因此打了强心针。

来看的学生越来越多(我断定他们多半是学生,也许有特别的人),大夫不准老大见客,因此我没让他们进去,有问病情的,我都谦虚地详答了。

病房里有位很面熟的女学生,劝告我很多服侍常识,我很感激她。后来才晓得是学联的事务,称杨小姐(即杨秀兰)住师院,曾经服侍过缪祥烈(一二一惨案中被特务打伤锯掉一条腿)同学的。

接着胡旭东、沈康俙和另一位同学来了,我请他们去报告民主同盟负责人,他们很爽快答应而去了。

傅启泌及附中同学也来了。傅启泌帮了很大的忙,打给几个大学[学生]自治会及学联请救,虽然没有什么结果,都尽了他最大力量。

黄昏将尽，伯母担忧伯父尸体没人照顾，我也很急，因为我不能分身，也不易找到愿守尸体的人。好在傅启泌和杨光宇、马荣翔、杨履康、徐德徵答应帮着忙，这种事才解决了。

看的人络绎不绝，胡旭东他们也报告回来，我因为感到有些冷，向他借了一件皮夹克，我怕用得着水笔，也向他借了。老大今晚的情形不太可靠的。

华顺也来了，高谦也来了，使我放心不少，因为今晚我一人恐怕照料不了。

也许九点，莲花池警察长来看了一转，只说明来意就去了。我很客气地说："一切仰仗你家了，请多多帮忙。"

守伯父尸体的还有以前看李公朴先生尸体的三位工人，他们都去了。

时间过得很沉重，很慢。到了半夜，老大的情形相当坏，可是他死不肯睡，一秒也不愿闭住眼，服犀利怕人，和他的眼光接触，实在有些可怕，眼光里含有多量的恨和报仇的决心，这使他不肯睡。他不时说出句把话："我要睡干什么？我要糊涂干什么？""我可以做我爸的儿子！""我也配做中国人！"我在天才黑的时候问一个护士，她人很机灵可亲，我问是否有夜班医师，她说有的，我问知她十一点下班，另有护士代她，我问好夜班何医师的住房。问一位工友得知厕所及烧开水的厨房所在，而且知道夜班倒开水是老唐，白天是老张（不过我称他们二位为大哥，也许要开水不麻烦，煮东西也可以帮忙）。

半夜十一点左右，联大派来三位校警帮着看尸首。接着老大就由才到的外科主任（也许姓范）诊疗。大概八点的时候给老大灌了700CC食盐水，所以现在情况很好。外科主任叫人把氧筒搬来给名大嗅，需要的时候每次十分到一刻钟，停十分左右，如果需要再嗅。老大是伤在肺部，好在他肺扩量大，身体很好，因此可以支持得住。何医师虽然负责夜班，可是这里有个习惯是夜班医师都睡觉的，有事再喊起来。护士只有一位，要[到]处送药打针，因此要很久的时间才来看一次。那位何医师把开闭氧的办法教给我就去睡了。护士则相当时候来打盘尼西林针（防炎针水）、强心针、麻醉针。

到十二点，守伯父尸体的同学扬履康因是膳委，才收到一百多万款，放心不下，因此和马荣翔、徐德徵回去了。傅启泌和杨光宇也来帮着看护老大，因此老大病房里一共有我、华顺、高谦、傅启泌、杨光宇。[①]（庄任秋《一个星期的日记——闻一多教授被

① 文中的胡旭东、沈康俙、傅启泌、杨光宇、马荣翔、杨履康、徐德徵、华顺、高谦，都是闻家兄妹在联大附中的同学。来医院探望和护理的联大附中同学还有邱凤达、林存谟、张文英、杨儒章、郑修文、俞在善等。其中华顺是华罗庚的长女，与闻立鹤同年跳班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张文英为张奚若之女，联大附中1944级学生，当时已考入西南联大。

暗杀后的记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60号，第137至1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这是一次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早在五月间，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即命令稽查处上校处长王子明、中校情报科长单学修等人布置四个特务组收集先生与李公朴、朱家璧、楚图南、艾思奇等五十余人黑材料。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的魏尚武看到过这个黑名单，说："一九四六年的六月，有一天下午本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刘义（湖北孝感人）到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两张纸，打开一看，是用红十行格字纸复写的黑名单。据我回忆到的黑名单有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楚图南、艾思奇、吴晗等三十余人。我问他黑名单从那里拿来的。刘义说：黑名单是总部（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简称）稽查处处长王子民交给我的，要我们帮助调查署名上面的人的职务和住址。"（魏尚武《李（公朴）闻（一多）案点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4辑，第7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六月二十八日，霍揆彰、王子明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并呈上黑名单请蒋介石圈定，旋返昆待命。七月五日，南京国防部给霍发来密电，同意霍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七月六日，霍揆彰在设在翠湖的警备司令部内召开秘密会议，参加者有警务处长李毓祯、稽查处长王子明、交通部运输局稽查组长李家杰、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中统云南站站长王巍、昆明市警察局长龚少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刘寿琬等人。会上，霍揆彰命令王子明负责布置行动科暗杀先生与李公朴、朱家璧、龙纯曾四人，宪兵十三团暗杀二人，市警察局暗杀四人。定三日内暗杀完毕，每杀一人发奖金五十万元，并给参与者加官晋级。八日，王子明布置行动科第三科科长徐绍阶指挥行动组特务二十余人监视先生等人行动。十一日，特务汤世良（即汤时亮）、吴传云、赵凤翔等暗杀李公朴。十二日，另一行动组组长崔镇山召开组员会议，下令三日内刺杀先生，不准留活口。遂即决定秦永和、崔宝山等守候学校门口，跟踪先生；李明山（即李文山）、仲刚潜伏西仓坡；崔镇山、欧阳天化、刘锡林在翠湖边随时准备策应。

十五日，先生出席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家门，便被特务跟踪。先生在云大至公堂演讲时，蔡云祈、尚福海便混在人群中，他们本想动手，但慑于环境，便打电话向王子明请示，王指示说等先生回家再动手。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先生与闻立鹤从民主周刊社出来，走到离家门十余步处，被早已潜伏及跟踪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李明山、崔宝山、刘锡林、何毅等前后夹击，左轮手枪、快慢机（德国造的二十响）一齐射向先生和闻立鹤。李明山还在闻立鹤腿上补了一枪。（据云南省公安厅所藏解放初期审讯特务王子明、单学修、吴传云、崔宝山等人记录及本人交待材料，云南省公

安厅喻芳同志提供）

对于先生遇害前后的情况，李何林曾向给他写传记的田本相做过详细介绍。田本相在《李何林亲历闻一多遇害始末》写道："七月初，振华先生因急性阑尾炎住院，在越南的民盟同志听说后回国探望振华先生，他们就带回这样的消息说：国民党特务准备在昆明进行暗杀了。当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来医院探看振华先生时，振华先生把这些消息转告给他们，何林先生还批评振华先生说：'你总喜欢信这些谣言！'振华先生说：'国民党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知道，很快李公朴就被暗杀了，而这次见面，竟然是振华先生和李公朴先生、闻一多先生的最后诀别！"七月十一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十五日，李何林陪同闻一多出席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亲眼看到闻一多拍案而起，昂然走上讲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次日清晨，突然传来闻一多遇害的噩耗，李何林和王振华都惊呆了。"何林先生一再对振华先生说：'不会的，不会的，是谣言！昨天下午我还和他一起开会。'何林先生赶快跑出去打听，他不愿意落实这消息，但愿它是谣言。事实是无情的，他不能不相信了。他顾不得回家再告知振华先生，立即赶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当他面对着闻李两位先生血淋淋的遗体和病重住院的闻夫人和重伤的闻立鹤时，心痛如焚！心中涌起仇恨的狂涛！后来，他和振华先生回忆当时心中的誓言：'我们要为闻李二烈士报仇！一生要战斗下去，否则对不起他们！'"（《中华读书报》，2003.7.2）

从抗战初期起就任职于中苏文协昆明分会的金若年，和先生一起度过了紧张的那些天。他回忆说：李公朴被刺后，七月十三日中苏文协亦遭搜查，并传说要查封中苏文协和俄语专科学校。在同志们劝说下，自己避居云南大学。"天黑以后，我去西仓坡找闻先生，向他报告这个新的情况。闻先生听了认为这完全可能的，并预感到昆明的局势愈来愈紧，会有一场大的风暴将要到来。他为了我的安全，不同意我当晚赶回云大去，他说要走也得等到明天清晨，没人注意时再回去。他安排我和立鹤睡在一起。"第二天，金若年回到云大，见到时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秘书长的赵沨，方知中苏文协和俄专于十三日晚已被查封，赵沨与另外几人也被特务扣押，直到深夜躲进下水沟后才乘机逃脱。"十四日夜晚，赵沨去闻先生家反映昨晚的遭遇，商量明天举行李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和记者招待会的工作，当晚也就留在闻先生家里住了一个晚上。"十五日，"下午三时，民盟云南支部在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楚图南、闻一多两位先生主持。会前，我和赵沨、林彦群为招待会做些准备工作，赵沨要我上街买些糖果点心作招待之用，我从青云街返回时，感到府甬道一带气氛不对，街上除了停着一辆吉普车和几个不三不

四歪戴着帽子的人之外，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屋门窗紧闭。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赵沨，他也感到这个招待会会出麻烦，他要我去云大通知学生自治会派些纠察队的同学来这里保护一下，看到楚、闻两位先生和一些记者陆续来了之后，我就急忙赶去云大学生自治会找负责人说明情况，他们分头去找同学。可是同学们还没有来得及出发，就听说闻先生和闻立鹤遇害的消息。"（金若年《难忘的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事件亲历记》，《人民政协报》，1996.7.25）

先生殉难后，李曦沐同学复员途经南京，在民盟总部见到抗战时期长期在昆明的民盟中央委员李文宜。李文宜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劝阻闻先生，李公朴死后还让他出来？"李曦沐说："我那时已离开昆明，据我对闻先生的了解，劝怕也劝不住。"后来，北京大学召开纪念闻一多座谈会，李文宜说她在上海见到张奚若，张奚若气愤地说要到纽伦堡法庭控告凶手，而凶手就在牯岭（当时蒋介石正在牯岭）。（李曦沐《伟大的人格，永恒的纪念——闻一多先生殉难50周年祭》，《中国测绘报》，1996.7.12）

谱后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 先生和闻立鹤抬到云南大学医院后，医院因他们不属云南大学而未立即接受。医院有座小亭子，先生遗体放在小亭子外边的院子里，闻立鹤放在小亭子中。这时，尚钺闻讯赶到，立刻质问医院办公室人员，回答说“没人负责”。尚钺说：“怎么没人负责，是要钱吧？我是云大教授，我负完全责任。”这样，办公室人员才拿出钥匙打开停尸房，尚钺与学生一齐把先生遗体抬了进去。（尚钺《一块鸡血石，两个热胸脯》，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79年11月）

先生遇刺的当天，昆明各界人士震惊不已。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夕五点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梅贻琦即派人到先生家照料，并请查良钊赴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人安全。同时，梅又急电教育部，电云：“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子重伤。同人极度恐惶，谨先电闻。”（梅贻琦致教育部电，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旋，为防止昆明民主人士继续被害，美驻昆明领事馆将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冯素陶、尚钺等十一人接往领事馆内暂避。

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出赏缉凶启事。文云：“查近有反动分子，居心叵测，企图扰乱社会治安，先后谋杀李公朴、闻一多案两起，制造事件，图谋不轨。本部责在保持地方治安，为求迅予在案起见，特登报悬赏缉凶。凡能捕获凶犯解部法办者，各奖法币一百万元，凡能闻风报讯因而缉获者，各奖法币五十万元。破案之日，即行发给。此启。”（《警备总部悬赏缉凶》，《云南日报》，1946.7.16）南京《中央日报》刊登此消息时，增加“此外，滇省府亦悬赏五十万元缉凶”等字。（《闻一多被刺殒命，政府重视被刺案，滇警备部已悬赏缉凶》，南京《中央日报》，1946.7.17）

七月十六日 昆明《中央日报》刊登中央社昆明分社消息：“（中央社讯）昆市警

察局息：昨日下午五时三十分，联大教授闻一多偕其子义和，由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外出，北向行进之际，突被一穿青色衣服，一穿灰色衣之暴徒两人，开枪狙击。闻氏父子当即应声倒地，暴徒向钱局街方向逃逸。岗警闻声追捕不获，在肇事地点检获大拉子弹壳一只，盒子枪弹壳三只，当经将受伤之闻氏父子送云大医院救治。闻一多腹部中弹，于送医院途中毙命。其子闻义和共中弹五发，计胸部左右各一，大腿中弹三发，一腿已断，不能言语。市警局龚局长闻讯，即赶到出事地点查勘，暨分别中派干员，出动追缉凶犯，分报省市府及警备总部严缉归案。”又云：“闻义和[立鹤]左胸上部中两弹，右胸上部中一弹，两大腿各中一弹，已不能言语，住一十八号病房。记者于昨夜十二时往视时，正由医院外科主任刘崇智施以氧气，伤势能否好转，极难逆料。义和[立鹤]两妹守护一旁，情况凄惨。又闻一多夫人闻恶耗后，心脏病复发，移住云大医院十六号病房，昨夜神志为清，言语困难。”（《闻一多遇刺殒命，长子闻义和受重伤》，昆明《中央日报》，1946.7.16）

该报还刊登该社记者采写消息：“（本报讯）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闻一多氏，昨日下午五时许，偕其长公子义和[立鹤]，由府甬道十四号返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时，甫抵宿舍门口，突被凶徒用手枪狙击，倒卧于地。闻氏身中数弹，因流血过多，经学生数人抬赴云大医院，于途中逝世，遗体现置云大医院停尸房。其公子义和[立鹤]同时亦中弹重伤。记者闻讯后，急赶往出事地点及云大医院探视，据赵□长明□称：闻义和[立鹤]胸部中三枪，大腿骨已折断，现正输血及打止痛针，伤势颇为危险。闻夫人因闻恶耗，心脏病复发亦入该院治疗。出事后据警局称：附近岗警闻枪声后，立即赶往出事地点，时凶手已逃逸无踪。侦队长周伯先，及警察三分局长杨森荣均前往勘查，并检获大拉八子弹壳一枚，十响子弹壳三枚。现治安当局对此连续发生之不幸事件，极为重视，刻正上紧缉拿凶手。按闻氏为联大文学教授，其公子义和为联大一年级学生，年二十岁。”（《闻一多遇刺殒命，长子闻义和受重伤》，昆明《中央日报》，1946.7.16）

昆明各报均刊登先生被刺消息，其中《正义报》云：“西南联合大学文学系教授闻一多，于昨日下午三时，民盟在府甬道街招待记者，报告李公朴被枪杀经过，会后偕其子闻立鹤步行回寓，至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突遇暴徒两人，喝令闻氏‘站住’，随即开枪射击数响，闻一多头部中一枪，胸部中两枪，登时毙命。闻立鹤胸部中两枪，性命危殆。暴徒行凶后即逃逸。其家人闻枪声赶来，闻氏及其子，横肉卧血泊中，乃急送云大医院救治。其子性命亦极危殆。”（《闻一多昨被狙击殒命，警备总部悬赏缉凶，警局发表闻氏父子被狙击经过》，《正义报》，1946.7.16）

民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发表《为闻一多同志复遭暗杀的紧急申明》，文中严正

指出杀害先生“实乃法西斯反动派决心放弃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当前国是问题”，“以配合正在展开的全面内战，公开向全国人民进行全面进攻的具体表现”。

上午，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往云大医院，探望身负重伤的闻立鹤与因心脏病复发入院的高孝贞。

下午，西南联大聘黄钰生、贺麟、雷海宗、沈履、查良钊五人组成“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该委员会随即召开首次会议，并邀梅贻琦、何善周、范宁列席，并讨论高孝贞所提之举行火葬及在联大新校舍一二·一烈士墓前修建先生衣冠冢与石碑等意见。（据何善周记录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纪念馆藏）

在重庆的闻立雕、闻立鹏得知先生被刺身亡，极为震惊悲痛。闻立雕回忆：“李公朴先生七月十一日被刺逝世的消息，十三日重庆方面才见报，在招待所的先生们中，好像没有引起太大的议论和震动，我和弟弟也没有太在意。十六日清晨，匆匆洗漱完毕，兴致勃勃地下楼去吃早饭，准备饭后去跳伞。可是，我们一来到饭厅就感到与往日大不相同，一双双眼睛都紧盯着我们两人，大家的表情严肃而沉重。我们坐下，刚拿起筷子要吃饭，一位先生声调异样地问：‘你们还不知道吗？’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间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那位先生把一张报纸送到我面前说：‘你们看看吧！’我和弟弟仔细一看，头版头条赫然一串黑字：‘闻一多遭暴徒狙击毙命，公子闻立鹤身负重伤，生死不明’。这消息像颗炸弹命中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炸得粉碎。弟弟顿时抽泣起来，我气愤得欲哭无泪，不知怎么竟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还不如把我哥哥也打死！’”（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295页）

是日，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致函闻一多家属表示慰问。信云：“敬爱的闻一多夫人暨男女公子：当天昏地暗，万物愁惨的此刻，我们抑压着迸烈的热泪，以极悲奋的心绪，向您们慰问，并致最崇高的敬礼！半年前昆明青年为争取人民的自由，反对内战，高举了民主运动的旗帜，向法西斯的势力反抗。闻先生不辞苦辛，更不惧□猡的恐怖，毅然地站立起来，参加了为争取民主的工作！‘一二·一’以后闻先生给出了多少的力量，并给予多少青年学子的同情和鼓舞！我们铭之于心，直到永远！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闻先生激昂的音调，喊出每个青年人的愤怒！闻先生以和李先生为友而光荣，而今日我们除了十二万分的仇恨外，我们也会感到了分外的光荣！闻先生的死是中国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他的肉体停止了斗争，然而他的精神将会活在每个爱好和平的人的心上，与日月共存！最后，我们请您们忍一忍辛酸的泪，并献出了我们诚挚的心，相信闻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历史上。即此谨向您们作最崇高的敬礼。云南大学学生会敬启。卅五年七月十六日。”（家藏信函）

七月十七日　毛泽东、朱德给高孝贞发来唁电。电文为：

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先生家属：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此电唁。

毛泽东　朱德。午筱。

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亦发来唁电。电文为：

闻一多夫人礼鉴：

惊闻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立鹤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捶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纪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此已暴露无余。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洗刷之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无忌，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电唁，尚祈节哀，并祝令郎早日康复。

周恩来　董必武　邓颖超　李维汉　廖承志叩。午筱。

中共代表团又为李、闻惨案发表抗议书：

哲生、铁城、布雷、力子、雪艇、厉生、立夫、岳军并转蒋主席赐鉴：敬启者，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因热心奔走和平民主运动，竟先后在昆明被暗杀致死，闻先生之公子亦伤重垂危，远道闻之，悲愤交集！政府既一面大举进攻鄂豫边、山东、山西及苏皖、苏北各解放区，准备造成全国内战；另一面，纵容、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犹不敢肆意为之。中国号称反法西斯胜利国家，四项诺言，言犹在耳，而特务暴行，接踵而至，遍及全国；殴打未已，暗杀继之，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不知政府当局，何以自解耳！据昆明来信所云：李先生被难之日，即有再杀闻先生之风传，今其言果验，岂属偶然！且李、闻两先生之外，还说重庆有邓初民先生等，上海有沈钧儒、罗隆基先生等，皆为暗杀对象。人心惶惶，举国震怒，政府当局如果从此悔悟，犹惧春秋笔伐，应急起制止，以谋善后。恩来等闻此凶耗，夜不成寐，除对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事件表示严重抗议外，特要求政府立即采取下列措施，并以明令公布全国：

（一）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拿凶手，交法院问罪，并由政协派员陪审。

（二）先葬死者，通令全国追悼，并给死者家属以抚恤。

（三）严格责成各地政府及军警机关，负责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

（四）重申四项诺言，彻底予以实施。

（五）彻查政协会议以后各地所发生之惨案，并应惩办祸首。

（六）取消一切特务机关。

（七）释放一切政治犯。

恩来等认为政府必须实行上列各项最低要求，方足表示政府有重返和平、民主之意，特此奉达，并希于三日内赐复，无任企盼。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抗议闻一多教授的被刺杀》，社论指出：

反动派以卑鄙无耻的手段，在昆明刺杀了和平民主运动的先驱李公朴先生，还未隔几天，在同一地方，全国闻名的教授、诗人，同时也是和平民主运动的先驱者闻一多先生，竟又被反动派所暗杀了！同时遇难者是闻先生父子，而闻先生当时即毙命了！这是怎样穷凶极恶的罪行啊！李公朴先生的被刺，已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到处发出抗议的呼声，反动派竟悍然不顾，公然展开了他们对民主人士大屠杀的阴谋计划，这不啻公然宣布他们与一切民主人士为敌，与人民为敌，必欲把全中国造成血腥的法西斯恐怖而后快！

闻先生父子的被刺，又一次更清楚的证明了反动派决心要破坏全国和平，决心要扩大全国内战的阴谋。闻先生是手无寸铁的书生，有的是民族的自尊心、正义感、见不得反动派出卖国家主权、见不得反动派破坏和平民主、屠杀中国人民，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平、民主，曾不断的发出正义的呼声，但反动派却用暗杀来对付这样手无寸铁的书生，企图这样来堵尽天下人的口，以便遂行其扩大全国内战的阴谋！但是反动派的这种打算完全错了，今天要求独立、和平、民主，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要想用暗杀来堵尽天下人的口，是堵不了的！死去了一个闻一多，继起者将有千千万万的闻一多。它只是证明了一点，就是反动派已经在人民的面前完全孤立，完全自绝于国人，因此他们只有用极卑鄙无耻的政治暗杀手段来维持他们的血腥统治了！

全国人民和全国民主人士，必须警惕反动派的这一血腥恐怖的行动。反动派显然在这一连串的政治暗杀中，包藏极大的祸心和狠毒的阴谋。它们不仅妄想用这种恐怖手段来恐吓民主人士，阻止人民的前进，而且可以预料，它们还会为了嫁祸诬赖，制造出类似去年昆明“一二·一”血案中的“姜凯”事件，作为它们的借口，

来在全国继续扩大他们的这种杀人事业。

闻先生被刺杀了！我们对闻先生的死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号召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民主人士一致起来抗议反动派的无耻罪行，起来反对反动派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中华民族已经处在极端严重的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已经处在血腥的法西斯恐怖之中，只有用全国人民团结的力量才能挽救，而且也一定能够挽救！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杀人犯的统治》，社论指出：

李公朴先生的血迹未干，另一位和平民主战士青年运动的导师和第一流诗人、名教授闻一多先生又惨遭蒋记特务的乱枪射击，惨死在昆明的街头！闻先生的被害，是极端严重的罪恶行为！这一点，连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和宣传部的发言人，都无法加以否认。国民党当局深恐这一罪案必然更加激起全国正义人士的愤怒，因而不得不假惺惺地声明"严缉凶手"，企图掩盖主凶，推卸责任。但是，谁不知道在军警林立的通衢大道，肆无忌惮的行凶，除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以外，还有什样人呢？不管国民党当局怎样狡辩抵赖，决然掩盖不了这一个人人皆知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谋害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杀人犯，正是蒋记法西斯统治集团。这个集团曾经谋害了廖仲恺、邓演达、杨杏、史量才、李兆麟、王任、孙平天等成千成万的民主志士。十九年来的历史，日益证明蒋介石的统治是法西斯杀人犯统治，蒋介石的所谓"军令政令"，就是法西斯杀人犯的军令政令，蒋介石的所谓"国家统一"，就是法西斯杀人犯的国家统一。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坚决反对人民的政治，坚决反对人民的军令政令——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坚决反对人民的民主统一。试问今天如果没有解放区为中国留下一片光明净土，如果让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李、闻两先生被害地方——云南，就是不久前被蒋介石所"统一"去的），那末全中国将成为杀人犯的世界，各界人民及一切有思想有文化的人士，还能有安全生存的地方吗？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被害，相隔不过三天，表示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恐怖行动的步骤，是如何迫促！蒋介石的一只血手，对其所统治区内的和平民主人民，肆行杀害；另一只血手，则向解放区进行疯狂的内战。全国人民应当清楚认识：李、闻两先生的被害，是内战的信号，应当以千百倍的加强全国爱国主义的大团结，来粉碎这个计划！正如中共七七宣言所说，"解放区人民的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的斗争，正在联为一片燎原的怒火！"一小群法西斯分子，在这燎原的怒火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不自量力，想以血腥恐怖，来镇压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适足以表现他们日暮途穷的窘态！不管他们怎样挣扎，中国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是注定了要被人民的燎原怒火所焚毁干净！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必然胜利！

最后我们还想对美国友人说几句话：闻一多先生是在美国受教育的著名的自由主义教授，对于中美文化的交流有光辉的贡献。蒋介石统治集团杀害闻先生，不仅是少数独裁者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而且还是德意式的野蛮法西斯主义，对中美人民的民主主义和中美人民友谊的挑战。对于这个挑战，美国友人亦要一致起来，予以坚决的回答！那就是：要求美国当局立即停止对蒋介石杀人犯政府的任何援助，撤回军事援蒋法案，撤回驻华美海陆空军。

云南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协会发出通电，指出李闻惨案是反动派剿杀全国民主人士的开端，希望美国停止军事援华，以制止法西斯凶焰。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为李闻惨案发表宣言，并发表《告世界学者和文艺作家书》。文协总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重庆分会，文协重庆分会、中共四川省委、新华日报社全体同人、重庆妇女界五十余人，均发来唁电。

是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函慰问闻一多夫人。信云："闻一多夫人青鉴：报载一多先生被害，且波及长公子情形，忿慨万端，莫可名言。卑劣残酷，至于此极，尚复为人世耶？澜除飞函总部切实向政府抗议外，并已专函蒋主席切致责问。同仁等对此事之发生，已万难再事容忍矣。所望夫人勉抑哀思，尽其未死之责，俾世兄辈能承先人遗志，国家有光明之日，一多先生当含笑地下矣。余托潘大逵先生代为致达。尚祈保重。敬候礼祺。张澜拜启。七月十七日。"（家藏信函）

张澜信中所云"已专函蒋主席切致责问"，即次日发出之致蒋介石函，其文为：

南京民盟总部速转国民政府蒋介石勋鉴：

同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两君相继被害，全国惴惴，舆论哗然，莫不是曰此顽固分子反民主、反和平，有计划之阴谋，而此阴谋之待发动者实遍国中。民主同盟自抗战胜利之后，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之主张，始终只为此而努力。政协决议原符斯旨，全国之人，方引之以为庆幸，不料较场口事件以后，情势日非，人心转趋忧虑，主席保障人权之四项诺言，不独未见实现，今且变本加厉，相反而行。即单以民主同盟言，西安李敷仁、王任之被诬杀不及百日，昆明李、闻两君又被暗害，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心，不将使天下之人，以为政府之志，必在不民主不和平，此岂为国人所望于政府者耶？近来一切镇压威胁之措施，已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人心愈丧，隐患潜滋，逼至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时，国家之事，尚可问耶？此不特为民主同盟所寒心，全国同胞所危惧，亦岂为政府及主席之所利？见报知主席对昆明之事，亦表关怀，且以令缉凶。惟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纵指使，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该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

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敢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特务行动，自由如斯，所谓纪律者又安在？是则星星之火，不特可以燎原，势亦可以焚身，则天下人对政府及主席之统制能力，讵敢相赖？夫谋国在诚，驭众在信，使天下人对政府信赖之念，已启动摇，即在专制之时，人心动摇，且难施其统制，民主国家之政府，能如是耶？是以澜甚为政府及主席虑矣，窃思所以致此之由，澜以为不在人而在制度，特务机关之于民主政府，实如水火之不相容，既为全国人民所深恶，亦且为不利于政府及主席，其应废除，不待筮龟，保障人权，是为民主同盟唯一之使命，亦主席亲口之诺言，用是敢以三事相请：

一、请断然决定对全国特务机关及制度，立予彻底废除，民主前途，庶几有望。

二、请对昆明李闻两君之事，及西安李王两君之事，务严令负责机关必获主凶依法惩治，人权保障，庶非空言。

三、请明令全国各地方治安机关，务保证今后不再有类此之事发生，否则无论何人，认真从严彻惩，已丧人心，庶可挽回。

凡此三事，务盼立予施行，以慰群情，以正观听。戇直陈言，惟祈谅察。（龙显昭编《张澜文集》，第 264 至 265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

在成都的朱自清亦于是日致函慰问闻一多夫人。信云："闻太太大鉴：今天见报，一多兄竟遭暴徒暗杀，立鹤也受重伤！深为悲愤！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一多兄的丧事想来已经办了，立鹤的伤势如何？极念。盼望他能够渐渐好起来！您一定极伤心。但还有五个弟妹要靠您教养，盼望您在无可奈何中竭力镇静。您身体也不好，更盼望您注意自己！学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请厚加抚恤。朋友方面，也总该尽力帮忙，对于您的生活和诸侄的教育费，我们都愿尽力帮忙。一多兄的稿子书籍，已经装箱。将来由我负责，设法整理。家中若还存有遗稿，请交何善周先生。如何先生已走，请交叶兢耕先生。我已有信给叶先生了。立雕立鹏想还在重庆，他们一定也极伤心。他俩的行止如何？也极系念。专此，敬请节哀！朱自清，七，十七。"（家藏信函）

朱自清在当天日记中亦记录了听到先生遇刺后的震惊："闻此，异常震惊。自西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第 413 页）

昆明市参议会举行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之一云：自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后，"人心惶惶莫不终日"，"经议决电请军警宪当局上紧缉凶法办，并设法防止此不幸事件之发生，以维持社会而安定人民心绪。"（《市参议会电请当局严缉刺李闻凶犯》，《云南日报》，1946.7.18）

闻立雕、闻立鹏在民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记者李康和《新华日报》记者谢韬帮助下，痛书《谁杀死了我的爸爸?!》，次日重庆《时事新报》、《世界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民主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大公报》同时刊登。后，各地报纸亦多有转载。

闻立雕、闻立鹏在文中说：

今天(十七)早上，我预料可以看到爸爸妈妈了，想不到一翻开报纸，就像一个晴天霹雳似的：爸爸在昆明被暴徒枪杀了！哥哥立鹤也身中五弹重伤了！看到这里，弟弟哭倒在我的身上，我的热泪也涌眶而出……青天白日之下，慈爱的爸爸竟被暴徒杀死了！

爸爸、妈妈、妹妹们原定十三号那天来重庆，和我们一同飞北平的。后来因李公朴伯伯被刺的事情，他忙着在昆明料理丧事，另一方面也因为那天没有班机，所以才没有走成。上月二十号，当我们兄弟二人先由昆明来重庆的时候，他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替我们在重庆找食宿的地方，我们走的时候，他还亲自送我们到门口，一再叮嘱我们小心身体。我们以为爸爸很快会来重庆和我们一道去北平，想不到从此以后竟成永诀，再也看不到慈爱的爸爸了！

爸爸今年只有四十八岁，如果不是被暴徒杀死，他是还能坚强活下去的。

爸爸是一个学艺术的和文学的人，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一向不大过问政治的；留美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山东青岛大学教授、院长等职，在清华任教十多年，近年来在西南联大教书。在抗战后期，因为目睹国内政治的腐败贪污、物价高涨，民不聊生，他才偶然应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邀请，走出书斋，仗义直言，他的演讲很受学生的欢迎，但也遭到某些人的痛恨，在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就有人扬言要以四十万收买爸爸的头颅，但爸爸听了不以为然，可是今天，他们硬是这样做了!?

我们是三兄弟两个妹妹，连妈妈娘姨一共七个人，都靠父亲一点薄薄的薪水维持生活，为了补助家庭收入，爸爸在课余替人刻图章，夜以继日的刻，我们晚上睡了觉，他还弓着背在刻，有时候他刻得眼睛发痛了，躺在床上连眼睛也睁不开，他是经常这样给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家里生活过得相当苦，大哥立鹤在联大念书，我四弟妹在联大附中念书，都靠爸爸一个人供给。妈妈身体很弱，害心脏病，爸爸很疼爱我们，他常常节衣缩食的让我们有进学校的机会。

现在爸爸死了——慈爱的爸爸被暴徒杀死了！哥哥也受重伤了！身体衰弱又害了心脏病的妈妈，她是多么的痛苦和难过，今天中午听马大猷伯伯从昆明来说，

妈妈曾几次晕迷过去，不省人事。

前两天我听到李伯伯被杀害的消息，心里很难过，想不到暴徒的魔手又夺去了我慈爱的爸爸，从此我们兄妹五人变成无父的孤儿了。谁杀害了我慈爱的爸爸？谁毁灭了我温暖的家庭？爸爸生平没有和人结下私仇，为什么有人杀死他？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是永远记在我们的心灵上！写到这里，我的手在颤动，我的泪在汹涌，我写不下去了……

我们含着眼泪，忍着悲痛，要向社会人士和全世界人士控诉，请主持正义，要政府立即缉拿凶手和幕后主持人，替我爸爸报仇……

时，立雕、立鹏已搬至民主中央总部。闻立雕说："得悉父亲殉难，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去，在母亲和家里最悲痛，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刻，我必须立即回到母亲身边去。但是，所里的先生们都劝我们不要回去，说昆明那边会有人照顾和处理的，我们是小孩子，回去也没有什么大用，弄不好我们自己的安全都难保。那我和弟弟怎么办呢？我那时还很年轻，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后来想到父亲是民盟的成员，是为民主而牺牲的，应该去找民盟、找共产党、找自己人，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关心和帮助的。那时民盟中央已经迁到南京去了，但是民盟中央办公地点还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后，果然，他们见到我们就像见到自己家亲人的孩子一样，史良等几位还没有走的民盟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对我们非常关心，让我们马上搬到他们那里去住，指定专人在生活上对我们百般照顾。同时他们感到我们俩在重庆太好了，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帮我们用闻一多儿子的身份多方面展开活动，声讨和抗议反动派杀害父亲的罪行。"（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 295 至 297 页）

下午五时，先生遗体入殓。

国民政府内部也有人反对用暗杀手段对待不同政见者，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是日急电蒋介石，主张严惩凶手。电文云："昆明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当街为人击毙，人心备极警[惊]恐，闻潘光旦等邂入美领事馆。查当此时局困难之时，一[部]分人士发表政治言论，见解虽各有不同，事实自在所难免，但如对李闻二人暗杀行为，不问动机出自何方，皆须彻底严惩，政府有保持治安之责。钧座公忠体国，正在昭示大公，苦心领导，必须迅即公告，对非理暗杀行为严加斥责，并电令昆明军警治安长官限期查获凶手，违则彻惩。所获凶手不问出自何方，必须经公布供词，迅速从严惩办，庶是昭示政府之威信，而慰全国之人心。敬贡愚见，务乞采纳。"（翁文灏致蒋介石电，"国民政府档案"，台湾"国史馆"藏，001－090341－0005）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亦认为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可能适得其反，故主张彻查。其是日密电蒋

介石，内云："昆明李公朴被害尚未破案，继以闻一多教授父子被刺，父死子重伤，各方均极注意。职连日召集各方关系机关人员会报，查究凶害真像，迄现在止，尚未得有力线索。反动[派]可能利用此题材大为煽动，除已饬新任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邓飞黄同志由渝赴任，并指示各地会报及党部团部密切注意防范外，内政部即派高级人员飞昆，代表政府负责督促当局处理，并请陈总长及两调查局密派得力干员飞昆，调查真像。除案情发展电陈，并与立夫同志切取联系外，谨电陈鉴察。"（吴铁城致蒋介石电，"国民政府档案"，台湾"国史馆"藏，001－090341－0005）

七月十八日 周恩来为李闻被暗杀事件，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谈话："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我们非常愤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这两位先生都是民盟的负责人，而这类事件并非是从他们两人身上开始。远的不说，在政协以后，捣乱挑拨的事件不一而足。政协开会时，沧白堂扔石子，开会后，较场口打伤人，李公朴先生就是当时被打伤的一个，捣毁新华日报，在北平、广州和别的地方也有捣毁报馆的事件。暗杀的事件从南通、西安起，现在发展到昆明。这一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因为政府没有明令制止惩办过，而且政府的宣传机关还为之掩饰袒护。尤其是连下关事件，依然没有追究出一个水落石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在内战的前方，还可说两方都有武器，而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后方，有的是宪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的镇压，还要用暗杀的手段来镇压政府党所不满意的人士。这真是无耻卑鄙之至！对于这类暴行如再不停止，再不惩办，再不追究，找出根源，则可以扩大到全国，重庆、成都、广州以至上海、南京都会发生的。陈立夫先生又来上海了，他是来布置统一党政军的行动，镇压民主运动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凶打、绑票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先生的手上，更不论我们共产党人了。我们来谈判就是准备着的。过去在重庆准备了八年，今后再准备八年吧。但这个代价对于他们还是不够的。他们还要向手无寸铁的文学家、新闻记者、工业家、学生、平民索取代价，来维持统治者的独裁。我们不能忍受，我们要控诉。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杨杏佛、史量才的案子不能伸雪。现在不行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如果以陈立夫为首的特务机关说我是冤枉了他，希望他有所声明，并拿出事实来看。我们欢迎他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真心悔过的人握手。我们和多少人握过手，我很难过的说，甚至和手上染有血的人握过手。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国家，我们不惜忍气吞声地这样做。我们日夜祈求停止此种暴行。我为什么在诸位面前控诉？因为诸

位受到的压迫、威胁、恐惧比我们多。诸位是手无寸铁者。希望以诸位的笔、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时，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工作先生的侄子黎智，随中共和谈代表团住在上海周公馆。先生被刺的消息，“是周总理让邓大姐把我找去并告诉我的”。（《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闻一多〉电视连续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谈话》，《黎智纪念集》，第515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昆明李闻惨案后援会向全国同胞发出紧急呼吁，指出“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敢于此时断然杀害李、闻两先生，完全是内战造成的结果”。文中并提出九项紧急呼吁。

张君劢、罗隆基自上海赶赴南京，代表民盟向当局抗议李闻血案暴行，并向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大使陈述对此案意见。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为李闻惨案在南京发表书面谈话，抗议特务暴行，声明特务制度如不取消，民盟绝不参加政府。书面谈话云：“当李公朴暗杀案发生时，社会上或者还有些人不完全相信他是牺牲在当前政治斗争上的，他是被国民党特务杀了的，现在闻一多暗杀案继之，再发生恐怖，任何人也都可以明白了。前一个李公朴先生是民主同盟中执委，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后一个闻一多先生也是民主同盟中执委，兼云南省支部常务委员暨宣传部主任。两个都是站在民主阵线最前面的战士，这不是政治上的暗杀是什么呢？即使问之国民党方面，怕亦无辞自解，如若硬要抵赖、推诿，亦造成笑话而已。当李公朴先生被暗杀发生后，我个人曾说过，只向社会申诉，不向政府抗议的话，现在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继之再发生，我却认为非向政府抗议不可了。我们抗议：政府允许不允许人民在其政治轨道内有其政治活动之自由，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赶净、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如其还有意实施宪政，那么，对于合法的政治活动，为何不予保障，假如保障不了，何必高唱政府威信；如承认还要行宪政，并承认还要负保障之责，那么，就请从眼前的事来负责起，我们要从眼前的事情上考验政府的诚意。一面要看眼前事情上政府负责不负责，一面还要督促快取消这种特务机关，这种对内的特务机关是与宪政不相容的。政府口口声声要各党派参加到政府里来，但同时却拿这一机关监视我们，威胁我们，试问我们怎么能参加呢？我们正告政府当局：这种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断不参加政府。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这是各方朋友所知道的。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

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

民盟政协代表在上海招待各界，呼吁全国人民在李闻血案前擦亮眼睛，奋起挽救危局。

成都大学教授联谊会、文协成都分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参议会、延安清华同学纷纷电唁先生家属。

联大复员过渝教授以快邮代电，致教育部长，要求政府从速追查。函云：“朱部长勋鉴：同人等复员过渝，留滞陪都，方怅行路之艰难，而昆明噩耗频传，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父子又被狙击。闻先生治中国文学成绩卓著，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祈主管当局务缉凶归案，严究主使。政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责任决不能有所规避，对于其所属人员亦不能有所曲护，并祈从速处理，以平公愤，无任企祷。王遵明、王宪钧、江泽涵、吴素萱、邵循恪、李鲸石、周炳琳、周作仁、金岳霖、苟清泉、姚从吾、姚珩、徐仁、陈康、高华年、马大猷、许维遹、张清常、张怀祖、郭沂曾、阴法鲁、冯友兰、冯式权、冯至、汤用彤、费青、傅乐淑、黄子卿、汤佩松、叶企孙、叶楷、刘俊潮、刘钧、蔡枢衡。”①（西南联大过渝教授致朱家骅信，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是日，周炳琳致梅贻琦函，内云：“黑暗势力滋长，一多继李后殒命，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之责任，决不可开个追悼会，拿死人做文章，做了文章便不了了结。先生似可告知霍揆彰责任所归，不许马虎。”（清华大学档案室藏）时，曾任《大公报》记者多年的曾敏之访问周炳琳时，问到对闻一多的看法。周炳琳说：先生“之所以走出书房，接触政治，一句话，是因为国家社会的现状太不成话了。西南联大保有自由的传统，同事们有许多是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样的不满于现实，一样的希望能改变现实。但对闻先生那种赤裸裸无保留的从事民主运动的热诚，对他那种无所私、无所求的爱国真诚，同事们都怀着敬重。不过教育工作者却需要具有宗教的情操，不一定用偏激态度发抒自己的意见。闻先生的做人及思想有一特点：他坦率，他专一。当他研究学问时，他不旁骛。当他投身改革政治运动时，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今天，像这样一个纯真而又不怀私念的人，是少见的。”周炳琳还感慨地说：“本来一个人从事某种运动，必然会与监狱放逐、死亡结缘，但想不到闻先生竟这样快遭受了不幸！”（曾敏之《闻一多画像》，《曾敏之文选》，香港作家出版社1995年出版，此文写于1946年7月）

是日，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致函闻一多夫人表示慰问。信云：

① 这份函件，原稿未署日期，但《新华日报》19日有报道，所以不会晚于18日。

“文林街清华大学办事处梅校长转闻一多夫人：惊闻闻一多兄遇刺，无任痛悼，谨致吊唁。斯年已向政府当局请求严缉凶手，查明案情，尽法惩治。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家藏信函）①

下午五时，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发出举行追悼会告示，鉴于国共关系紧张，学校当局担心引起治葬外因素，故特表示丧葬抚恤等费由学校自行解决，不向外界捐募。告示全文云：

敬启者。本校教授闻一多先生于本月十五日不幸被狙逝世，本会奉本校常务委员会命，负责办理先生丧葬抚恤事宜。兹定于本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在大西门内青云街昆中北院大教室举行追悼会，并自十九日起在上述地点设置挽礼收件处。凡先生生前友好及本校在昆师生，如有挽章祭礼，请于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四时，赐交该处。至于丧葬抚恤等费，已由本校负责筹办，本会不另向外界捐募。谨此奉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谨启

上午九时，先生遗体在云大医院前广场火化。到梅贻琦、沈履、查良钊、黄钰生、雷海宗、贺麟等二百余人。高孝贞因病，被劝阻未能参加祭奠，闻名、闻翻代表家属在场叩祭。报载：先生“遗体由医院后门抬出，其夫人于遗体抬出前带病伏灵痛哭，长子伤重，辗转于床榻，二女在场叩祭，和尚诵经后即由二女公子上前焚香磕头，伏地痛哭。举火后，和沿及二女绕龛三周，且行且哭，至为哀痛。观者咸掩面垂泣，情况颇为凄凉。”又，报纸报道：“闻立鹤脚部中三弹，呼吸困难，现尚有一弹未能取出。因体力不支不能动手术，腿部伤势亦重，据陆医生云如日内不化浓，即可无虞。”（《闻一多遗体昨火化，联大成立丧葬委会，定期在昆北举行追悼会》，《正义报》，1946.7.19）葬启上本来写明正午十二时举行火化，因提前了两个多小时，许多人来到云大医院时，仪式已近结束。

南京《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论《彻究李闻被刺案》。

国防部秘书长颜宵鹏一行，奉令抵昆明，督缉破案。

先生殉难后，西南联大特成立了由教务长黄钰生（子坚）、总务长沈履（茀斋）、训导长查良钊（仲勉）、历史系主任雷海宗（伯伦）、哲学系贺麟（自昭）五人组成的“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该委员会共召开了四次会议。会议由先生的助教何善周记录，兹录各次会议记录原文如下：

第一次会议记录

---

①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馆所藏该信起草原件，知该信为由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亲笔定稿。

开会时间：七月十六日下午六时

地点：梅校长客厅

出席委员：黄子坚先生、雷伯伦先生、沈茀斋先生、查仲勉先生、贺自昭先生

列席者：梅常委、丁主任、胡先生、范宁、何善周

主席：黄子坚先生

记录：何善周

壹：梅常委报告

要点：① 希望各位先生以联大同事立场，商讨丧葬抚恤事宜。② 一方面妥善安葬死者，一方面学校当尽力从优抚恤生者。

贰：根据闻夫人所得之举行火葬与在联大新校舍四烈士墓前建立衣冠冢石碑等意见，首先讨论火化事宜，议决要案如下：

(1) 决定火化骨灰装坛，以便运回故里安葬。购买坛子事，由总务处胡先生与丁主任负责花色，务求雅素。

(2) 十七日下午五时装殓，十八日午十时火化。

(3) 请佛教会办理火化事宜。

(4) 诵经及火化诸仪式，任佛教会僧众办理，唯得预先征询闻夫人意见允否诵经及举行佛教仪式。

(5) 火化地点在云大医院前广场。

(6) 关于火化地点及时间，须通知云南大学及医院，并备文通知警备总部与警察总局。

(7) 火化时间及地点，须分别通知联大在昆教职员，校内各处贴通告并本市各报发布消息。

叁：决定第二次会议时间及地点：明日下午四时在清华会议室讨论衣冠冢事宜。

肆：散会。

第二次会记录

开会时间：七月十七日下午四时

地点：清华办事处会议厅

出席委员：雷伯伦先生、黄子坚先生、贺自昭先生、沈茀斋先生、查仲勉先生

列席者：范宁、赵世昌先生、何善周

主席：黄子坚先生

记录：何善周

议决案件

(1) 以联大师生名义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地点、时间,及仪式程序均预先公布之。

(2) 追悼会日期定于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地址定昆北北教室。

(3) 追悼会筹备事项:

A. 寻找闻先生像后送照像馆放大,此事由联大事务组办理。

B. 撰写祭文,请罗庸先生主稿,并请罗先生于是日报告闻先生从事学术著作之事略。

C. 聘请奏哀乐人员,此事由赵世昌先生负责聘,并准备钢琴、提琴等乐器。

D. 布置礼堂,此事由赵先生、丁先生共同负责。

E. 追悼会由梅常委主祭。读祭文人员由罗庸先生荐举。

F. 由黄子坚先生致哀辞。

散会。

第三次会议记录

开会时间:七月十八日下午一时

地址:清华大学会议厅

出席委员:黄子坚先生、雷伯伦先生、贺自昭先生、沈茀斋先生、查仲勉先生

列席者:何善周

主席:黄子坚先生

记录:何善周

议决事项:

(1) 推选中文系学生在追悼会上致哀辞:议决于朱德熙、马忠二人中由何善周洽商聘请一人担任之。

(2) 自十九日起,在昆北教室设置办事处。办事处分以下四股:

A. 文书股:由何善周总其责,另聘中文系同事或同学四人组织之,负会议记录、来往书札、草拟新闻消息、撰写公告等责任。

B. 挽礼收件股:由范宁总其责,并由范先生聘请八人组织之,负接收挽章祭品、登记礼品名目、书写领帖及保管礼品等责任。

C. 庶务股:由联大事务主任丁先生总其责,另聘六人组织之,负布置礼堂、摆设礼品,及购买、出纳、照料等责任。

D. 招待股:招待事宜由五位委员共同负责,另聘本校教授五人、学生五人担任之。校内同人及眷属与校外来宾由各同人任招待之责,学生来宾则由同学招待。

(3) 追悼会请赞礼一人。议决聘请颜锡嘏先生担任,由何善周接洽聘请。

(4) 定制纸花,凡签名参加追悼会者,均赠纸花一朵,以志哀思。

散会。

第四次会议记录

开会时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

地点:昆北大教室

出席者:黄子坚先生、沈茀斋先生、查仲勉先生、雷伯伦先生、贺自昭先生

列席者:丁兆兴先生、何善周、范宁

主席:黄子坚先生

记录:何善周

议决事项:

(1) 衣冠下葬时请闻名参加,衣服由家庭备办。

(2) 牌坊上面用白纸写字,于二十四日晨贴出,字由马忠写。

(3) 签到处不落雨在院内,落雨在北教室内。凡参加追悼会者均请签名。

(4) 会场摆条凳,由事务股负责办理。

(5) 在北教室预备茶水,由事务股办理。

(6) 租桂花两盆,如租不到时,即行购买,由事务股办理。

(7) 借酒爵一个,檀香由事务股购办。

(8) 追悼会行礼之后,举行衣冠冢葬礼。

(9) 举行葬礼时预备香烛。

(10) 请马文竹先生襄礼。

(11) 仪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教授追悼会仪节:

奏哀乐。

全体肃立。

主祭者就位(梅常委)。

上香。

献爵。

献花。

向遗像致敬(三鞠躬)。

默哀。

恭读祭文。

奠爵。

报告生平事略(罗膺中先生)。

致哀辞(黄子坚先生、马忠先生)。

闻先生家属致谢。

奏哀乐。

礼成。

(12) 书写一份贴出,油印多份备用。

(13) 准备黄布条十五个,书写执事字样。

(14) 招待由训导处请两位,事务组一位,总务处一位。

(15) 执事人员两点钟到场。

(16) 闻先生十八日火化后,骨灰中捡出金属品四块,可能为闻先生遇狙之枪弹熔化的残余,议决由委员会转送清华大学保存。

(17) 通知中央社、云南社及各报馆追悼会时日。

(18) 委员会表示希于追悼会后由闻先生生前友好与中文系师生于最近出特刊,但只限表彰学术方面。

(19) 散会。(《西南联大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记录》,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先生骨灰中的四块金属,是子弹弹片,后一直保存在雷海宗处。雷曾准备交出,但畏于形势演变,犹豫再三,始终未能如愿。

七月十九日　民盟中央为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向盟内发出通告。通告云:"查本同盟中央执委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委李公朴同志,于本月十一日晚,在昆遇害,噩耗传来,正悲愤间,中央执委兼云南省支部常委闻一多同志,又于本月十五日下午在昆被狙殒命,其子义和[立鹤]亦受重伤,于十七日不治逝世(详情见附件一)。此等暗杀案件,显系国民党特务有组织有计划之暴行,不仅表现顽固派手段之卑劣与无耻,并欲利用谈判停顿、内战扩大之时机,造成后方各地之反民主运动,藉以打击民主人士,推翻政协决议,以保持其党治与法统之独裁局面。凡我同志,处此艰危阶段,尤宜坚决奋斗,沉着应战,加强本身组织,发展民众力量,使和平民主得早实现,以慰先烈在天之灵。总部方面,除由政协代表发表谈话提出严重抗议,谒见马歇尔特使暨司徒大使外,并拟定善后办法如下:(一)在上海成立各界治丧委员会,在各地成立各界追悼会筹备会,积极分途进行,其日期由上海决定通知各地同时举行。(二)由各地组织尽力发动各方人士,纷致函电唁慰死者家属,并多作挽词哀章。(三)各地同时募集大量抚慰金,以为李闻二同志丧葬费及家属生活费、子女教育费之用。(四)举行公葬,其地点日期由上海治丧委员会决定。(五)要求政府准派代表二人,参加李闻案之调查,以明真相。上列(一)(二)(三)

项急待各地组织切实执行，俾能一面安慰死者之家属，一面使大众对顽固统治者之罪恶得更清楚之认识。关于进行经过务盼随时函告，其有关悼念死者之文字并希抄示以便汇刊。民总秘书处。七、十九。”

昆明李闻惨案后援会致函美国总统与国会议员，要求美国政府从惨案中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民主的罪行，要求实践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声明，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一切助长反动派暴行的措施。

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郑振铎、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自上海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斥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闻的暴行，请其立即派遣调查团来华。

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开会，议决请政府令饬云南省政府严办暗杀李闻凶手。

是日，吴文藻、谢冰心夫妇致函慰问闻一多夫人。信云：“西南联大梅校长转闻一多夫人：闻耗极恸，请节哀。吴文藻谢冰心。皓。”（家藏信函）

闻立雕、闻立鹏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先后发言控诉反动派迫害先生罪行，指出凶手是国民党特务，决心与先生一样，为民主和平不断奋斗。

上海英文《大陆报》发表社论《政治暗杀》，称：“民盟领袖李公朴与闻一多的惨遭暗杀，使我们想起，只有在日本、德国与意大利，只有在他们的集权主义的统治之下才能容许这类的行为。”

七月二十日 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劢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民盟参加调查惨案真象及审判主凶之要求，再次提出立即取消特务制度之主张。

先生在清华学校的同班好友吴泽霖致函慰问闻一多夫人。信云：“一多嫂礼鉴：阅报悉一多兄遭难，悲愤无已。在暴政横行下，一多兄为真理为民主而牺牲其精神将永生矣。务希节哀顺变，抚育诸弟妹为国努力。尊府善后忝在知已秋后返校时，当与各同人妥为筹划也。专此敬候礼祺！弟吴泽霖敬上。七月二十日。”（家藏信函）

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奉蒋介石手令抵昆明调查李闻案。

前昆明行营中将副官长杨立德在昆明被捕，国民党企图嫁祸于云南地方在野人士。

美国国务院证实先生被暗杀后，昆明美领事馆确对十一位民主同盟人士加以保护。《大公报》刊登旧金山二十日广播消息说：“美联社华盛顿电：美国国务院顷证实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发生后，昆明美领事馆领事确对十一位民主同盟分子加以保护。国务院声称，昆明美领事此种措置因该十一人显然有亦被暗杀之可能。

南京美大使馆已与中国外交部商谈此问题。据称中国当局已派员往昆调查此案，并命该地警备司令部维持法律。一俟安全确有充分保障，该十一位民盟人士即行脱离美领事馆之保护云。"(《昆民盟十一人，美领馆保护中，美国务院证实此事，谓安全有充分保障时即脱离》，《大公报》，1946.7.21)

七月二十一日　昆明《学生报》第二十五期第三版刊登先生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的即席演讲，题为《无耻啊！无耻啊！他们在慌啊，在恐慌啊！》。这个演讲稿即《最后一次的演讲》，记录者为三个月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云南大学外语系一年级同学余丹(时名何丽芳)。余丹说，这次报告会是昆明学联组织的，会前安排她做记录，记录完成后，马上交给昆明学联负责人之一文庄(时名舒守训)。文庄看了，觉得应加一句更带劲的话，于是根据张曼筠讲的李公朴那句"我今天跨出了这道门，不知道能否跨进来"，加了"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这句话，并从先生演讲中抽出"无耻啊！无耻啊！他们在慌啊，在恐慌啊！"作为标题，立刻交《学生报》编辑段家陵(时名段必贵)发排。(访问余丹记录，2010.4.25) 因白色恐怖，《学生报》这一期出版后就停刊了。先生的这次演讲，还被学联将印成了传单。

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发表社论《正告国民政府》。

中国民主同盟为李闻惨案，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罗隆基报告惨案经过。

文协总会为李闻惨案在上海召开临时大会，出席五十余人，叶圣陶主席，郭沫若、洪深、欧阳予倩、田汉、茅盾、冯雪峰、白薇、马彦祥、郑振铎、胡风、熊佛西、许广平相继发言，高度赞扬先生为民主和平而献身的精神。

西南联大过蓉教授与校友在成都祠堂街祥福餐厅举行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吴宓等三十余人参加。联大武汉校友会召开大会，追悼先生，并发来电唁。

邯郸文化教育界假邯中大礼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座谈会，到边区各机关首长、邯市文化教育界人士及青年学生等三百余人。报载消息云："会场布置简单肃穆，清素的花圈，衬着黑框的追悼标语，'为李、闻二先烈复仇！''追悼李、闻二先烈要积极援助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追悼李、闻二先烈，要加紧完成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全场充满悲愤空气，当人们起立垂头向李、闻二先烈致哀时，内心都燃烧着仇恨法西斯的怒火，充满着胜利的信念。主席报告两烈士遇害的经过后，前北平名教授现任边府主席杨秀峰氏开始讲话，他首先说明与李闻二氏被害同时本边区及其它解放区已遭到蒋军进攻，他号召大家行动起来，进行自卫！并以全力援助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并说：'如果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再住下去的话，我们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李氏外甥张则孙同志，在追述李氏生平后，悲愤

地表示首先响应杨主席的号召，给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去信，激励他们继承李氏的遗志奋斗到底。继军区宣传部长任白戈，邯中张校长讲话之后，邯中小同学激动地说：'蒋介石拿美国人的武器，来屠杀解放区的人民和他统治区的民主人士，还派美国造的飞机来吓唬我们，可是我们吓唬不倒的，我们一定能胜利，去年平汉战役，就是证明。'最后大会发出致民主同盟、李、闻二氏家属唁电，并通电号召全国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完成二氏遗志而奋斗到底。"(《人民日报》，1946.7.26)

七月二十二日 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要求六项。抗议书云："哲生、雪艇、铁城、亮畴、力子、立夫、厉生、岳军诸先生并请转陈蒋主席钧鉴：本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李公朴同志，于本月十一日在昆遭暴徒狙击身死，正惊痛间，而本同盟中执委兼云南省支部常委闻一多同志，又于十五日与其子立鹤在昆遭遇同样狙击，闻君当场身死，其子重伤后亦复不治。查此两案其为政治性暗杀，毫无疑问，与上次本同盟所抗议西安秦风日报李敷仁、王任之惨死案事同一律，前案尚未解决，而此两案又连续发生，则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且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如同盟者，则尤可异讶。用是不能不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质问与抗议：(一) 李公朴、闻一多、李敷仁、王任诸君，始终站在本同盟立场从事民主运动，其主张无外于要求民主和平，其行动不出乎作言论号召，在不犯法之范围内，而遭摧残至此，则政府究竟是否准许人民有其合法的政治活动之自由？假如不犯法的政治活动是政府所准许，则政府为何又容许此种非法摧残之事在南北各地继续不断演出？假如政府对于此类非法摧残是不容许的，则本同盟上次抗汉之西安惨案为何至今不查明严办？(二) 政府既以实施宪政号召国人，一再公开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而数月来如秦风报事件，如西安、昆明各惨案，皆显然一致地为向本同盟施以摧残压迫，则政府是否准许各政党之合法存在？对于和平公开之政治结社竟如此摧残，是否不惜驱迫其转为地下活动暴力革命？如或不然，则何以不见对于本同盟予以有效之保障？政府今后是否能负责保障一切和平而公开之政党活动？以上各节请予明白答复，以释群疑。此外关于昆明惨案之善后，本同盟复有下列各项要求：(一) 政府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本同盟所派之人员同赴昆明，进行调查惨案真相。早日公诸社会。(二) 政府对本案正凶及主使者应依法究办，其审判时并应准本同盟推派法律专家列席参加。(三) 政府于惨案发生时应负责任之地方治安长官应即予以撤惩。(四) 政府应对于李闻二君之遗属特力口抚恤并负担其子女教育费用。(五) 政府对于目前因惨案威胁而避入昆明美领事馆之本盟领导人

潘光旦等十一教授以及一般民主人士均应切实负责保护其身体安全及自由。(六)政府立即撤消国民党部及军事机关之调查统计局,以后设置情报机关并应保证不作对内政治斗争之用。再则昆明惨案发生以前,早经传说,有所谓黑名单,李闻二君均居首列,事后果一一如其所说不虚。据说此外列名其间者,尚有本同盟政协代表及各地负责数人,并此提请政府注意为幸。专此函陈,伫候复教,顺颂政祺。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梁漱溟、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同启。"

上海学生和平联合会发表《告各界书》,坚决要求追查李闻惨案主使者,以保障人权。

先生的旧日朋友,时为教育部参事刘英士,代表教育部长朱家骅抵昆慰问高孝贞。

七月二十三日　西南联大、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留汉理事暨诸同学致闻一多夫人信。信云:"闻夫人:从报纸上知道一多师的恶耗,联大和中法大学的同学虽正在迁徙离散之中,但听到这消息的都哭了。许多人想到闻先生的声音笑貌就哭,想到闻先生循循善诱的风度就哭,想到闻先生为人民为正义为国事而呼号的精神就更哭。闻先生太爱人人,因此我们也深爱闻先生。哭过了,恨却更强!这次暗杀,无疑的是那些一向以摧残人权、虐杀人民的职业的特务干的。这次暗杀无疑的只是那些反动分子□首以恐怖手段来迫害民主势力的无耻阴谋的一部分。我们恨,恨这些丧尽天良的禽兽。对于他们我们自然只有报复!我们相信全中国的人民也一定要报复的!我们已经坚决宣誓,为闻先生的凶案,为闻先生的爱和恨而奋斗!我们虽然离昆明愈来愈远了,可是我们的心依然紧紧记着昆明。闻先生不幸死了,这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可是闻先生活在中国人民心里也更深了。我们希望并要求您不要太伤心,立鹤要您照料,立雕、立鹏和无数在闻先生感召之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也要您照料,保重吧,为了爱和恨,都要坚强的活下去。我们祈求您的健康。西南联大、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留汉理事暨二百七十同学合启。七,廿三。汉。"(家藏信函)

七月二十四日　下午三时,西南联大在昆中北院大教室举行先生追悼会,梅贻琦主祭,罗庸报告生平事略,黄钰生、马忠(中文系学生)致哀辞,均只限于表彰学术。家属中仅闻名参加。

与先生同乡、同学、同事,并一起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黄钰生教授,敬献挽联云:"茫茫人海,同乡同学同事同步行三千里,回首当时伤永诀。莽莽神州,论学论品论文论豪气十万丈,横视古今有几人。一多学兄千古。弟黄钰

生敬輓。”（家藏挽联）

七月二十五日 《新教杂志》代表美国加拿大两国六千余新教牧师，致电上海《文汇报》，慰问先生家属，云：“每一个正直的美国人，都为贵国民主领袖的被杀害，深深感到震骇”，“这一巨大的阴谋，不仅是反对中国人民，并且反对全世界人民”。《基督教人》杂志亦以全美圣公会僧俗大众代言人身份，向先生家属表示“深沉的同情”，并对“中国政府排斥民主的这类事实，深感惊骇厌恶”。

七月二十六日 延安各界举行追悼李闻、反内战反特务大会。朱德、林伯渠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法西斯的内战、特务政策。李敷仁、柳湜、刘善本也相继发言。万余到会者共同谴责特务暴行。

大会历时三小时，一致通过《延安各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宣言》。宣言全文云：

我们延安市的人民，今天集会来反对蒋介石军队对于解放区的进攻，和蒋介石特务对于人民的屠杀！蒋介石的军队从停战令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解放区的进攻，最近这种进攻是更加扩大了。蒋介石的军队从六月底开始，大举进攻鄂豫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胶济沿线，七月初大举进攻晋西南解放区，七月中旬又开始大举进攻苏皖解放区的西线、南线和北线。在热河、察哈尔和其它解放区，蒋介石的进攻正在积极准备，战争正在发展为全国的规模。

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从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人民的屠杀。蒋介石在制造了二月的重庆较场口惨案和新华日报惨案，三月的哈尔滨李兆麟惨案和南通惨案，四月的北平中山公园惨案和西安王任惨案，五月的咸阳李敷仁惨案，六月的南京下关惨案和徐州惨案等无数恐怖事件以后，七月中旬又在昆明连续暗杀了民主同盟的领导人物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教授。在解放区，从二月以来，已有几千人被特务暗杀。

我们决心不许蒋介石这样在全国乱打乱杀，无法无天；我们要求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有效地制止内战，制止特务机关的恐怖行为；我们一定要声援鄂豫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南解放区和苏皖解放区，一定要粉碎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我们一定要声援全国人民争和平争民主争生存的运动，一定要粉碎反动派的恐怖政策，为死难的烈士复仇！我们的奋斗是正义的，我们的奋斗必然要得到胜利！我们要求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的民主分子，起来纠正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因为援助蒋介石就是扩大中国的内战和恐怖，就是参与屠杀中国人民，就是违反去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国会议的决定。我们中国人民十分重视中美两大民族的友谊平等合作，愿意为此作一切的努力，但是蒋介石以出卖中国领土、领空、领海、海关、内河和其它主权，来换取美国反动分子的军事干涉，换取美国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这决

不是拥护而是破坏这种友谊平等合作。全解放区的人民行动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全国的人民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制止恐怖！拥护停战令！拥护政协决议！清洗好战分子！清洗法西斯分子！解散特务机关！中美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建立中美两大民族的友谊平等合作！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万岁！延安各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1946.7.30）

七月二十七日　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在花旗银行举行先生追悼会。主祭李继侗，吴晗、王赣愚、周永德发言。最后宣读闻立雕、闻立鹏向全世界公正人士之控诉信，并宣读上海联大校友会通电。到会者三百余人。联大过沪去平学生挽幛上书："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请安眠吧，先生。"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总司令张镇奉令抵昆明，全权处理李闻案。

七月二十八日　重庆各界六千余人隆重追悼李公朴、闻一多。青年馆门前街口两边耸起两座柏枝素坊，门外沿壁沿街挂满挽联。各界送来函电、挽联、花圈共一千二百余件。大会主席张群，主祭周炳琳，吴玉章、张笃伦、胡子昂、鲜特生、许德珩、邓初民、史良、黄次咸、沈起予任主席团及陪祭。祭台横写"民主之魂"，两侧柏枝柱上挽联云："以身以命争取民主，用力用血奠定和平。"鲜特生诵祭文，中有："人民世纪，安容虎狼，誓承遗志，群起反抗，力争民主，戢彼猖狂，前仆后继，何畏死伤。"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报告先生生平，最后说："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自己毫无私图，议论不怕激烈，因此闻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从是非上说，我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而是如何承担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

闻立鹏在会上也做了发言，《新华日报》报道他的发言和会场情绪："最后由死者家属致答词，全场又紧张起来了。闻一多先生第四[三]位公子闻立鹏，一个面色苍白，十四岁的孩子，带着最深的悲痛与愤怒走上祭台了。他是那样镇定，他好像仔细的凝视着每一个人的面孔。好多人一见他出来，又禁不住伤心的痛哭了。他提高着声音，劈头就说：'记得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时，也有如这样多的挽联，这样多的花圈，这样多的人。爸爸那天对我说：他们死得好惨呵！现在，想不到爸爸也死得好惨呵！'他伤心得不能讲下去，台下无数人大声的哭了！'我今天在这里，我感到我并不孤独，因为我还有这样多朋友，我希望你们还要帮助我。'此时台下各角落发出'我一定帮助你'的鼓励声。'现在，我好像听到爸爸在我耳边说，好像他要我向大家致最大的。'台下的哭声更大了。'我爸爸被杀死了，有人造谣说是共产党

杀死的,是什么地方人士杀死的,还有人说是爸爸的朋友杀死的,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痛快地说,是我哥哥把我爸爸杀死的!'群众的愤怒已到了极点。'我爸爸死了半个月了,现在还没有捉住凶手,现在我要求大家援助我,我们要求取消特务组织。''我们要求取消特务组织!''我们要求取消特务组织!'一个巨大的人民的声音,在这黑暗血腥的世界摇撼着、震荡着、奔腾着,发出火花,发出激流,这声音,这力量,将会冲破一切残酷的法西斯血腥的统治,给新中国带来曙光,给中国人民最后胜利以最大保证。"(《重庆市民六千余人,昨举行李闻追悼大会》,《新华日报》1946年7月29日,第2版)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才不过是一个开始——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并出版《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特刊》。追悼特刊第二版刊登先生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的演讲,题为《闻一多先生最后的一次讲演》,即七月二十一日昆明《学生报》第二十五期刊登之《无耻啊! 无耻啊! 他们在慌啊,在恐慌啊!》。

七月二十九日 张家口各界代表千余人,举行追悼李闻陶(行知)、反内战反特务大会。

七月三十日 邢台地区各学校机关团体在北方大学操场召开追悼李闻二烈士大会,会前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典礼。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为公祭撰写了哀辞,其文云:

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被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惨杀了。两烈士的鲜血,灌注到中国人民反美帝反奸贼的猛火堆里,光焰更是万丈高了。两烈士瞑目吧! 你们正义的鲜血,决不会白流的。近百年来,地主买办阶级里产生大汉奸卖国贼,最著名的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之流,把中国卖得差不多,但比之蒋介石那样干脆而彻底的出卖,却是小巫见大巫,反而算不得大奸大贼了。可以相比的只有汪精卫,好一对奸贼群中的难兄难弟! 蒋介石企图掠夺抗日战争的全部果实,永远保持其法西斯独裁,悍然出卖中国的一切,向美帝求援。他把天空也卖了,把海面也卖了,把内河也卖了,把海关也卖了,凡可以卖的都卖了。他还觉得不够,还出卖所谓"最后决定权"。换句话说,就是出卖中国的全部政权,使中国变成美帝的菲律滨,使中国人民变成美帝的黑奴,他自己因此"荣任"美帝的儿皇帝。这个集罪恶之大成的大奸大贼,自以为得计,妄图迫促中共代表团同意他的"荣任",碰了大钉子以后,拿出一张所谓马帅的王牌来吓人。这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标本,如果想在他的头脑里找出一个耻字,那比水底捞月还难,因为耻的影子他也没有,不管他经常大叫特叫"礼义廉耻"。美蒋进行买卖,双方都不掏本钱。美帝出卖的是准备投海的剩余军火,蒋介石出卖的是人民的中国和中国的人民。买卖成交以后,美帝

买得忠孝双全的儿皇帝一个，蒋介石买得大批杀人凶器，用来镇压蒋家统治区的人民，特别是进攻和平民主的解放区，企图捆缚一万万四千万人民做奴隶。谁也知道，不掏本钱的买卖，一定要继续下去，不会自动停止的。那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又一次面临"七七"危机，全国人民不拿出反抗日帝的民族精神来反抗美帝，不拿出膺惩汪精卫的坚强力量来膺惩蒋精卫，那么，八年抗日的鲜血将成空流，千百万殉国英魂将成不血食之鬼。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每一个人民是不是应该救国呢？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全国各阶层人民，担当起挽救危亡的大任。蒋介石至今还不能售其奸计，为所欲为，就是依靠中共、民盟的合力阻止。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是民盟重要负责人，也是人民的重要代表人，他们有完全权利替人民讲话。蒋介石为虎作伥，彻底卖国，他们走出书房，号呼救国，这是该杀的事么？蒋介石发动内战，屠杀军民，他们主张正义，力争和平，这是该杀的事么？蒋介石独夫专政，奴役人民，他们坚持民主，反对独裁，这是该杀的事么？蒋介石断送全国经济命脉，让美帝抓住中国人民的生命，他们拒绝奴化，要求经济建设，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该杀的事么？蒋介石迫诱无辜青年，走入邪路，执行特务贱业，充当法西斯走狗，他们不忍坐视，大声疾呼，指示光明大道，在思想上拯救了无数青年，这是该杀的事么？两烈士所做所为，千不该杀万不该杀，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杀两烈士的蒋介石，千该杀万该杀，也是毫无疑问的了。两烈士呵！你们安心吧！中国人民会替你们报仇雪恨的！蒋介石自毙的时期不远了。他煽毒焰，我们以正义克之，他施鬼蜮，我们以真理破之；他投美帝，我们以广大人民胜之；他最后发动卖国战，寻求万一的活路，我们以救国战制止之。我们民主力量声势蓬勃，沛然有余，蒋介石计穷智竭，挺而走险，只能作绝望的挣扎，谁是最后胜利者，难道还要说明么？两烈士安睡吧！你们是民主战士，你们的名誉将永垂不朽，你们的墓前，人民要树立殉国烈士之碑，永远纪念你们。看吧！你们的遥远处，有一大堆粪土，里面埋着一副臭骨头，粪土堆前一块顽石，上面写着"上海青皮、暗杀队队长、交易所投机商人、特等军阀、头号汉奸卖国贼、特务总头子、民贼独夫、美帝儿皇帝蒋介石埋尸处"。相距不远，另一粪土堆埋着日帝儿皇帝汪精卫。这两堆粪土，永远表示地主买办阶级的罪恶。两烈士安睡吧！你们是永远值得骄傲的！（范文澜《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哀辞》，《人民日报》，1946.8.7）

同日　顾祝同在云南省政府招待社会各界，出席者有省政府主席卢汉、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省党部主任委员邓飞黄、省参议会议长龚自知、省商联会理事长严燮成等。梅贻琦以西南联大常委身份出席了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言，略谓："李闻案是一件很荒唐毒辣的事，本人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而死，现此案已非李闻两先生的问

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案件。我们从这方面着想,希望此案早日解决,在座的许多位先生,当闻案发生后,纷纷慰问,本人负责学校行政,特在此向各位致谢。"(《顾总司令昨午招待各界,李闻案务于短期间破案缉凶》,《正义报》,1946.7.31)

七月三十一日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三十人,联名致电艾奇逊,主张美国政府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

八月一日 罗隆基致函慰问闻一多夫人。信云:"孝贞嫂:三十余年老友一多兄遇难,噩耗到京,悲愤万状。当时即拟亲自来昆,即奠多兄之丧,且为多兄料理家事。但京沪民盟同人均认昆明环境恶劣,阻努之行,政府方面亦不愿担保努在昆之安全,因之努至今未能如愿来昆,长愧,长憾。今民盟已推梁漱溟、周新民二兄前来代表民盟调查多、朴二兄案情,并与嫂及公朴夫人商量两家善后等等。多、朴二兄为中国民主而牺牲,亦为领导民盟工作而牺牲,故多、朴二兄之丧非家庭之私乃民盟之公丧,而二兄之一切善后乃民盟共同之责任也。对多兄今后应举行如何追悼建立如何纪念,对嫂今后家庭应如何妥置,对侄辈今后应如何教养等等,兄嫂有何意见请坦白告知梁、周二君,我辈当依命以行。多兄之死成仁取义,实可无憾,至于如何继续其余志,实现中国之民主,后死之责我辈当有以慰地下之灵也。惟愿吾嫂节哀珍摄为祷,痛悼之情言难达意。敬候礼安。弟努生。八月一日。"(家藏信函)

八月二日 先生的最后一次讲演以《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为题,刊登于《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这一期周刊是唐登岷、杨明冒着生命危险编辑出来,又得到云南日报印刷厂工人吴桐等人帮助,秘密赶印出来的。

八月三日 在重庆的闻立雕、闻立鹏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函,诉说父亲转变过程,要求司徒帮助中国人民促进和平民主。全信云:

司徒雷登大使先生:

听说你是我父亲生前的朋友,因此我们兄弟二人压抑着悲痛的胸怀,写这封信给你,向你报告先父被刺前的一些事实。

关于先父在本月十五日被刺逝世,家兄同时中弹五发,身受重伤的情形,相信你已在报纸上看到了。先父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向来是抱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而从来不过问政治的人。一九四三年秋天,他因为目睹中国战争接连失败,政治日趋黑暗,物价不断高涨,同时他从军的侄儿(在教导团)在经过昆明时向他哭诉军队里的黑暗和腐败,使他深受刺激,他闭深思了一个星期,终于站起来为争取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努力,他加入了民主同盟。

他虽然加入了民主同盟,但由于他的性格和生活的忙碌,他的政治活动,仅限于常常应邀出席学生自治会所举办的时势讲演会和偶然发表一些不满中国政治腐

败的文章。

在去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了屠杀学生惨案以后，他与广大的学生站在一齐，坚决要求严惩主凶，曾使国民党政府对他大表不满：当时某方扬言说，如果他再发表文章或演说，就要悬赏四十万买他的头，他听了就笑了一下，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他要坚持中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过安定而幸福生活的希望，他终于在七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半在昆明被暗杀了，我们的大哥闻立鹤因为要救护他，也同时身中五弹，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医院，我们的母亲因悲伤过度，心脏病复发，也进了医院疗养。

我们兄弟两人事先来到重庆，准备与先父等一同返回北平的，但在目前这已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们兄妹五人，已成无父的孤儿了。我们悲痛和愤恨的情绪，简直不能用文字和言语表示出来。

司徒雷登先生，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专权而黑暗的国家，在今年一月十日，蒋主席虽然宣布了四项诺言，但至今一项也没实现，中国人民目前仍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先父被暗杀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目前我们和全中国的广大人民，已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惩暗杀先父的凶手，和幕后主使人，立即解散不法组织，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等要求，现在我们兄弟二人仅将先父被刺前的事实向先生报告，并恳切希望先生促进中国从和平走向民主的努力，能在全中国人权的共同奋斗下获得成功。

祝你

健康

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十七岁，联大附中四年级学生）

三子闻立鹏（十四岁，联大附中二年级学生）

（《闻一多先生遗雏致司徒雷登大使函》，《文汇报》，1946.8.5）

该信为《新华日报》记者谢韬起草。八月十四日，闻立雕、闻立鹏飞北平前夕，与谢韬、李康摄一合影。后，谢韬为此照片撰写说明云："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其后，先生的儿子闻立雕、闻立鹏经重庆返北京。这张照片是在途经重庆时所照。闻氏二人到重庆后，颇受社会各界和报纸的关注。当时，重庆情况复杂，军警宪特十分猖獗。二人年幼，怕有闪失。我受《新华日报》组织委托，李康受《民主报》委托，于二人在渝期间，时时相伴、给予关照，以保证他们安全返京。这期间，与闻家兄弟相处密切，留此存照。这张照片历经劫难走过了六十二年，能幸存下来作为历史见证，当是十分珍贵。谢韬谨记。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闻立雕说：当时谢韬始终陪伴在他们身旁照料一切，八月初在全国各

主要报刊上刊登的他与弟弟闻立鹏联名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函，也是谢韬起草，以他们的名义发表的。

同日 叶公超致梅贻琦函，内中说："顷闻滇中友人云，一多家属维持费暂由清华负责，且有为其子女筹募教育基金之议。弟与一多交笃，愿在此及沪上帮忙，负责何人，尚乞示□，以便就近接洽。弟意一多为人治学有其超政治超政党之处，主其事者似亦应力求无党派之人，未悉吾公以为然否。（上海银行界如陈光甫、李叔明等予皆熟人，且与一多重名识，对其人颇敬仰）。昆明诸友如佩弦、奚若等有何意见，便中能否一得见示。"（叶公超致梅贻琦信，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八月六日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副秘书长周新民抵达昆明，调查李闻被刺真相。国民党中央党部派秘书张寿贤同行。

八月九日 重庆各界人士暨五十余团体成立"陪都李闻惨案后援会"，并发表宣言，吁请当局彻查血案，切实保障人身自由。同时，筹募李闻遗族生活教育费。

八月十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经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转给蒋介石一封私人密函，内中涉及美国政府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反应与态度。信中特别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和平解决内部问题，如果在中国不能在短期内有真实的进步表现，则将重新审定美国对华政策。

八月十一日 西南联大留渝校友在重庆青年会举行追悼会，通过为先生家属募捐等三项决议。何善周在会上报告高孝贞、闻立鹤住院情况。立雕、立鹏均出席。

八月十二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全体教授，为李、闻被刺致电杜鲁门总统，称"这种出于若干反动分子的残酷行为，刺痛了中美两国思想自由的公民良心，这刻画出中国局势在迅速的恶化，美国也深深的被卷入了"。

香港《华商报》刊登《三个天良发现的特务，揭露暗杀李闻经过》。

八月十四日 闻立雕、闻立鹏离渝赴平前一天，致函感谢重庆各界人士。信中说："在重庆住了将近两个月，很感激你们给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援助，更感谢你们给先父闻一多同李公朴伯伯举行了沉痛而隆重的追悼大会，你们是多么的富有正义感！"文末又说："在我们临行的时候，先父的惨案真相还没有大白，真正的凶手、主谋人，能在那里去拿获?! 这使我们多么的苦痛、失望。"

八月十五日 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省保安总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组织之军事合议审判法庭，举行闻一多被刺案第一次审判，对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第三连连长汤时亮（本名汤世良，实负责暗杀李公朴）、排长李文山（本名李明山，杀害闻一多凶手）进行"公审"。应邀观审者仅二十余人，记者只允许中央社

两人。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被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以其“伤势未好”为由拒绝。嗣后，民众要求公开复审，国民党不得不于二十五日举行第二次公审。

西南联大参加这次公审的是梅贻琦、贺麟、冯文潜、查良钊四人。对于当日的情况，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偕自昭（贺麟）、柳漪（冯文潜）、勉仲（查良钊）往地方观审闻案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二人。汤为警备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湖南衡阳人），李（湖北人）为该连排长，二人似为正凶可无疑，惟皆为特务营官佐，而于出事之日，又皆便衣带枪（偕一军需上士在逃未获者）出营，未久即至云大会场，听到闻之演词遂‘激于义愤下毒手’，此实巧极，不无可更研究者。法官三人为陆军总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及宪兵十三团之代表，讯时系择其预审供词要点特为重讯，并以为观审了然者，于是否有人主使特分别追问，犯人皆称无有，可以见之。十一点半散庭，下午两点再开庭，余则未往，盖已无关紧要矣。”（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对于这次公审，许多人都认为是敷衍。八月二十一日，张奚若接受《联合晚报》记者采访时，就认为政府对此案的处理手段很卑劣。他说：“起初在街头曾发见反共大同盟的标语，说是共产党暗杀的，接着又说是地方势力杀了他们。终于又是落到现役军人头上。这案子的调查破获经过极令人不解。再论及那个凶手说是因为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攻击政府，侮辱军人，激于义愤而杀了他，这完全是瞎说。因为楚图南先生当天并未说话，为什么也被人追得越墙逃脱呢？其为有计划布置的大规模暗杀，是无疑义的。昆明人士一致主张这次暗杀案不能由政府片面的调查破获便算了事，大家拥护民主同盟的主张，要组织特别法庭来审理这案件。”张氏还说：“说是因为凶犯本身是现役军人，所以要由军事机关审讯，不如说是因为要秘密处理这案子，所以这凶手就成了现役军人。”（《张奚若教授称，蒋方处理闻案手段卑劣》，《解放日报》，1946.9.8）

汤为暗杀李公朴之特务之一，李为暗杀先生之特务之一。血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霍揆彰为了逃避责任，先是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名义在各报刊登悬赏缉凶启事，继之采取嫁祸于人伎俩，散布说两案是龙云三儿子干的，并逮捕了龙云的副官长杨立德中将，施以严刑，以便借机搞垮龙云在云南的遗留势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唐纵抵昆前，已获知李、闻二案均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之人，但他抵昆后，霍揆彰一口否认，极力狡辩。七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霍揆彰，霍揆彰才承认两案是部下所为。霍揆彰回到昆明后，令王子明、刘寿琬召集行动科特务开会。会上，刘诡称怕公审时露出马脚，请弟兄中出来两人自首，公审后用他人替换出来，事后连升三级，送国防部任职。王子明亦说：好歹一定要保住霍揆彰，否

则一切都不好办。这时，汤世良、李明山在无法推脱情况下，愿意“自首”。于是，两人编造了一套假口供，并改名为汤时亮、李文山。王子明还抓了两个四川流落到昆明的人，用麻醉药麻醉后，关在西站营房，准备在刑场上替换汤、李。

八月十八日 成都各界在蓉光电影院举行李闻追悼大会。到张澜、邵从恩、李璜、朱自清、罗念生、张志和、马哲民、杨伯恺等两千余人。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主席、民盟中央执行委员范朴斋主祭，民盟主席张澜含泪致词。会后，暴徒袭击张澜，张澜头部被玻璃碎片打伤三处，血流如注。

八月二十二日 民盟中央派往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真相的梁漱溟、周新民离昆返南京。月底，他们向民盟中央提交了《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其全文如下：

一、赴昆明调查之经过

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两件惨案既接连发生，民盟就考虑到派人去昆明调查的事情。但迟至八月三日乃得成行。其所以迟延的主要原因，是在和政府争持调查方式的问题。我们的意思，是要与政府一同去调查，或者说参加它的调查工作。在最初和政府诸位代表谈到此意，他们几位都没有不同意的表示。但认真交涉时，则又不肯同意了。我们坚持我们的要求，期望政府代表向牯岭请示的结果，就耽误许多时间。末后只有接受政府所说的办法：（一）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二）政府予我们以去昆明往返交通的便利；（三）政府予我们到昆明后从事调查的各种便利；（四）为了实行上两项，政府可以派人陪同我们前去。八月三日的起行，大体就是本着这一方式。

在人选上，民盟委派漱溟、新民两人同去，政府方面则派了中央党部张秘书寿贤陪我们。八月三日，从南京乘飞机到重庆，原意可赶上四日重庆去昆明的飞机，但四日的机位竟未能从航空公司取得，迟到六日才飞昆明。从八月六日到廿二日早晨，我们三人同住在昆明的商务酒店。廿二日我们搭机东返，张秘书因病稍迟一步再行，于是就分手了。在同行和同住期间，我们承他帮忙甚多，值得感谢。但可惜在起身前，中央党部吴秘书长铁城给昆明顾总司令、卢主席、霍总司令、唐署长电报上只说予我们以便利，而不说予我们以调查的便利。

从八月六日到二十二日，首尾十六天。在这十六天中，我们要代表民盟慰问李闻两家，并帮助两家解决其今后一切问题。还有云南当地民盟盟务亦待调理。所有这些，在这里都不叙，只叙有关本案调查的事。我们调查工作，自一面说很困难，自另一面说亦很容易。困难的是我们到达昆明之初，当局者便

采取了冷淡我们孤立我们的方策。琐细事实甚多，不必缕。譬如六日到昆，七日各报纸只登出张寿贤来昆字样，而故意不提到我们。顾、卢、霍、唐等屡约时间，屡次改期，直到九日才得见面。同时使地方人士不敢与我们接近。许多朋友都不敢来看我们，我们间接托人约会见面，亦均遭婉辞。我们自亦不好访问人家，致使人家感觉讨嫌了。

这里只举几个小例以见一般：我们所住的商务酒店就布满了特工人员。我们出门访人必然作随从，我们在家会客必然作记录。有一天我就在商务酒店吃早点，恰巧遇着孙福熙君。他原曾为中国旅行社编辑旅行杂志，而商务酒店原是中国旅行社开办的，所以他长期住在里面。餐厅中偶然相值，欢然道故，说几句话，原是极寻常的事。事后孙君告诉我说，特务马上就盘诘他：你与梁某什么关系？你和他谈什么话？孙君赶紧表明彼此无多关系，"不过从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候，梁先生是先生，我是学生而已。"——试问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何人敢来亲近我们呢？

在进行调查时，军政机关既不予以便利，却反而有意陷我们于困难之中。是如此了，何以又说调查起来亦很容易呢？这有两层：第一层，就是俗常说"一手难以掩尽天下耳目"的话了。广大的社会究竟不乏有心人。所以自动来供给我们材料，作种种帮助者还是不少。第一是地方人士，第二是许多青年学生。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与第四，那便是我们盟内同志和美国领事馆的朋友。两大暗杀案，民盟原是"尸主"，我们自己人哪有不留心的呢？尤其像被当作目标而幸未遭难的楚图南先生，被搜查而未及捕进牢中的赵沨先生，和其他诸同人，自身遭遇就是很好的材料。美国朋友虽是局外人，但他们极同情我们的；同时在职务上他们对他国家要作情报。除了现在昆明的罗领事、麦领事而外，美大使馆还特别电调前驻昆明很久的斯领事，从北平专来调查本案。我们到昆明时，斯氏虽离去，罗、麦两位却请我们两度到他馆中便饭长谈，彼此交换调查材料。——试问在这种情形之下，岂是任何一方所能遮掩得了的吗？还有第二层理由留待后面"调查本案后的论断"中去说。以下只将我们招待新闻记者，访问当局，旁听审判，以及我们与当局函件往复等事，叙一叙。

我们原意先访问当局，后招待记者，以示慎重；但结果还是先招待了记者。那天到场的记者相当多（多过我们所发请帖二倍），谈话相当长，秩序亦很好。记者们笔录甚勤，据说其中作了一份三千多字的笔录，当晚交呈顾总司令阅看。我们大致就本案发生后政府如何表示，友邦如何关切，我们向政府如何交涉，及此来所取方式，今后的要求与期待等项分别说明。其中重要处是从我们

的立场态度，说到我们要求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一层。访问当局（顾、卢、霍等）时，我们对他们谈的亦着重此层。其大意约略是这样的：

李闻案，无待申论是政治性暗杀案，国内国际都这样承认的。今被害者是在野的民主同盟方面，则在朝的国民党方面便头一个犯嫌疑。虽如此，我们民主同盟却依然还承认它法律上的地位。即承认政府是政府，接受它的警察及司法机关所行使的职权。但我们希望国民党亦承认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即承认我们在政治上是它的反对派。反对派遭遇这事情，它自己脱不掉嫌疑。此时它如果是光明正大的，应自动地邀我们一同来调查这案情，一同来审判，乃至将来一同宣布其结果。这样，自然国内国外都会相信它，佩服它。纵然结果发见是它中下级之所为，而于当局者的光明固丝毫无损。因此我们提议一同调查，移京审判，实为爱惜政府之意。最要还在组织特别法庭，给各方以参加机会。要知具有政治关系的案件，普通法庭是办不了的。记得重庆较场口事件在法院公审时，法官就当众说这种案子是以政治为背景的，普通法庭没法审判。而抗战前救国会七君子的案子，人虽出来，案并未清，更未曾宣告无罪。说起来至今还是不合法的。所以为了允洽舆情，作有效之处理，组织特别法庭实有必要。否则，以处嫌疑地位的国民党，还要运用它手中的大权，一手包办，则更加重嫌疑，威信尽失。那将不单是国民党的损失，而实在是国家的损失了。

我们这一要求，或说是一期待，自然由民盟中央在南京直接向政府提出。所以对顾、卢各位，不过告知他，不要轻于处理。在第一次访问时，他们亦不作何表示，只说案情在侦查中，还不完全。到十三日顾、卢请我们吃晚饭，陪座有冷欣、张镇等。饭罢，顾邀我至别室小谈，说李案凶犯未获，闻案后日可开审，请参加观审。我问：是后来从曲靖获之人吗？顾答：不是。是两个外省人。我又问：凶犯供他为何行凶呢？顾笑云：且待问他们自己罢。我立刻就明白必是八月五日重庆看见的晚报上那个说辞了。所谓观审，只是远坐旁听而已。然而我们亦决定参加，以观究竟。十三日夜间收到他们请观审的公函，十四即作复，告以我们不同意这种审理，但承邀观审，我们同冯素陶先生三人应邀前往，藉资调查。同时提出闻立鹤为当时在场受伤未死之人，对于行凶者必有印象，请设法担架到庭辨认。晚上十点钟，张秘书接到顾总司令电话约他去见。次早，张告我说，顾公嘱他转告两点：梁、周二位观审已足，冯先生不必参加了；闻立鹤出庭亦可无须，假如法官认为必要时再说好了。

观审时张秘书亦陪同前往，遇参谋长冷欣出出入入，张罗一切，观审毕，步

出法庭，张秘书告我冷参谋长对他说，军法处曾派人去医院看闻立鹤能否出庭。但医院出具证明书，说他伤未好，不能出庭。这可见假如我们不提，则这手续亦许都不做。

观审的人，初时还有二十三四人，午后更少。这都是应邀而来。邀而不来是可以的，没有邀而自来则不行。即如新闻记者，除被指定的中央社两人外，亦一概不准入内。《大公报》派来昆明的高学逵君向我们述说他碰钉情形甚详。所有这些，以及审讯中的一些漏洞，我们另有批评见后。

十五日观审既毕，当下作函送达顾总司令，说我们认为疑窦颇多，难为信谳，请他不要定案。次日又向他函索当时审讯记录，请抄一份给我们。数日无复。十九日他又请我吃饭，饭罢又偕入别室谈话。我问他：十五日上下午的审问，看去似已审完；但当时既不宣判，而且几天来还不见下文，是不是还要再审呢？顾迟迟对答不出，末后低声说：我作不得主。审讯记录虽当庭宣读，而仍不能马上给我们一份，似即在此。

在这以后，二十二日，我们就携带全部调查材料东返了。

二、李闻案发生的背景

李闻案发生后，一般人总要问凶手是谁的问题。即我们这些人，亦难免有此问。可是你一到了昆明，就不这样了。还有，外间亦尝怀疑：如说政治暗杀，为什么要单在昆明，并单杀李、闻呢？可是你一到了昆明，亦就不如此了。这就是因为你远在外方，只听到这孤立的一件事；而你到昆明后，便直接接触那发生本案的背景。这背景，在空间上至少以昆明或云南为范围，在时间上至少要从抗战中的几年说起。

但我们不可能叙说的太多。我们要以本案为中心，而紧紧环绕这一中心来说。那我们来说“民主运动在云南”或“民主同盟在云南”。

民主运动不等于民主同盟，但他们是有联带关系的。过去国内的民主运动，在云南最热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民主同盟的组织，发起于抗战中；在抗战的几个省份内，云南省支部是比较最强大最活泼。为什么如此？大约有两层可说：一层是有好几个大学聚在昆明（其中特别是西南联大），而这几个大学恰又为代表国民党掌握教育大权的二陈派势力所不及。放眼一看，各大学校长，各教育厅长，能出乎他们势力圈的有几？然而轮到西南联大和云南教育厅，他却不行了。于是自由民主的空气，就在这大群先生们学生们中间培养发扬起来。

再一层，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云南较各省为强。抗战前，全国一直

没有统一，而抗战则给予中央申张其力量到各地方的机会。然而在以龙志舟执政的云南这地方，比较根基强固，却势不可侮。于是形成了深刻有力的矛盾。就在这矛盾中间，民主运动和民主同盟得其机会。

民主同盟既在有利条件中长大起来；而民盟政治影响的扩大，亦自必促进这些矛盾的发展。就是从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发展到民主与独裁的矛盾。

明白后一层道理，民主同盟与地方势力彼此间自有些不期而然地配合，乃至不期而然地互相联带的地方，而同遭中央反动派之忌。在这一连串斗争中，我们既曾予反动派以打击，当然反动派决心要打击民盟，亦为伺机已久之事。以下简述其事实之经过，则李闻案的何以发生，不难明白了。

在抗战后半期，越、缅失守后，中央政府在国防名义下将军队大量向云南开入，以军事的控制，推进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控制。云南本是一个贫乏的省份，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大军的驻防，仅是给养的供给已经使人民喘不过气来。再加所谓中央军或中央人员那种比法国人统治越南更为恶劣的殖民作风，更是使云南的各阶层人等都对国民党或中央由失望到厌恶。农民因此而遭受中央军整村烧杀，或不堪驻军扰害而群起反抗者，屡见不鲜，远之如屏边，近之如凤仪，都是例子。

前年（一九四四）双十节，民盟滇支部在昆明假昆华女中礼堂举行纪念会，赴会群众万余人，远超预计之外，会场不能容纳，临时改在该校操场开会。由罗隆基、闻一多、吴晗、楚图南、李公朴诸位讲演，阐发联合政府，争取人民基本自由等主张，会场情绪异常热烈。国民党特务多人在场扰乱，并施放炸弹，捣毁桌椅，经地方治安机关派人维持秩序，乃得继续开会，会议在激昂之歌声中列队散会。民盟在这次纪念会中发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在遭受如此强暴的破坏中，而群众情绪益加激昂，可看出群众对反民主势力之憎恶与民众要求之高涨。其后累曾举行大规模之群众集会与游行，亦累次得国民党特务要捣乱破坏的消息，均没有生出什么事变。这半为群众势不可侮，亦正为地方当局负责维持治安，不予中央反动派机会之故。（去年龙志舟任内，昆明行营且有严令，禁止各种特务任意逮捕搜查人民。）

对日战事停止后，中央以赴越受降为名，将滇省境内最后余留之龙志舟部属第一集团军全数调赴北。滇军于九月离滇入越，十月三日中央的杜聿明部即在昆明围攻省政府。于是酝酿数年的"解决地方政权问题"卒以完成。

龙氏被迫离滇后，中央以李宗黄代省主席，关麟征任全省警备总司令，云南的整个统治都掌握在这两个无法无天的国民党最顽固分子的手里。

李宗黄是云南青年的老冤家，十八年前他就以国民党中央大员的身份，在整顿学风思想的理由下，在昆明枪杀了青年学生梁元彬，激动社会的公愤，全昆明学生的大罢课，和各界人士的抗议，把他哄走了。他这次就任省主席后，曾在公开的集会里演说："十多年前我回云南来，有人贴标语要枪毙我（李杀梁元彬后，昆明学生有枪毙李宗黄之标语），今天我又回到云南来了，看看究竟谁枪毙谁？"这时昆明就有一种恶意的风说："龙志舟在的时候，这批民主分子可以任意活动，鼓动风潮，现在龙被枪决，转眼就要轮到他们了。"

然而反动派得意的时期并不长久，终于自己制造出"一二·一"事件，而遇着有力的反击。关于"一二·一"事件，已有专书出版，此不详述。事情大略是这样的：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学联在大西门外西南联大新校舍举行反内战晚会，由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吴晗诸先生出席演讲。开始不久，校外四周即被当局兵包围，以机关枪、小钢炮向会场放射威胁，情形异常严重。但晚会仍按预订程序在枪炮声中讲毕散会。翌晨《中央日报》登出"昨晚军警在大西门外剿匪"的新闻。学联遂宣布总罢课，要求政府取消非法干涉集会游行的命令，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的自由，惩办派军围击联大的负责人员，停止内战等。当晚李、关在省府召集各校长责令限期迫使学生复课，并指派学生代表参加警备司令部特务组织暨三青团所领导之"昆明各校学生反罢课委员会"。而学联则坚持非得圆满的答复不复课，昆明罢课的大学、中学共计四十一个学校，外县的尚不在内。反动派乃于十二月一日以数百暴徒袭击市区各重要学校，击毙教员学生于再、李鲁连、潘琰、荀极中等四人，炸伤杀伤廖祥烈等十余人，捣毁各校建筑校具无数。于是连许多学校的教师也宣布罢教抗议，国内国外，舆论沸腾。虽经制造一个所谓"共产党姜凯指使放手榴弹"的嫁祸政策，也还是脱不了万目之所视，万夫之所指，而李、关不得不去职，云南省政府不得不改组。费了无数机谋，好容易取得这个多年所想彻底解决的政权，不意又一旦毁于这"异党嚣张"（李宗黄之语）之中。

然而李等于此，决不甘心；而且李、关去职，并不等于地方势力的恢复，或民主势力的抬头。今年三月间，昆明有所谓"××××大同盟"者出现。成立之日，有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及其他国民党重要官员致贺，各报大登广告，征求盟员。四城粘贴壁报，尽量攻击我们民主同盟。他们在壁报上经常造谣说：民盟的闻一多、楚图南是共产党员，说闻一多组织暗杀团，说李公朴携款几万万元到滇谋暴动。这样的宣传，从五月间就开始，并且和三青团的刊物全是一样的说法。这是反动派在云南正面进攻民盟的开始。这个"××××大

同盟”所包含的主要成份本来是些志趣不能全同的帮会组织。论中国帮会在以往反异族暴君的运动上，是曾有其历史光荣的；但是现在一部分帮会分子，竟受国民党特务的操纵迫胁，使其成为进攻民主力量的别动队。后来暗杀李先生被捕获的凶手李成业，就是这个“××××大同盟”的盟员，而担任特务机关工作的。

反动派宣传了几个月，说民主党派要暴动，要勾结地方势力夺取政权。先前说五月间要暴动；五月间没有人暴动；又说七月间要夺取政权。同时也不断传说省政府要改组的话。配合着这些宣传而来的行动，是六月初的突然大搜查。前六十军军长安恩甫[溥]，前宪兵司令禄国藩，现任一八二师参谋长（驻东北）甘艺等家宅及云贵监察使署，皆被云南警备总部派兵搜查，断绝交通，势极严重。这大搜查，与一八四师（前云南军队）师长潘朔端等在东北宣布脱离中央，反对内战似有关联；但当时昆明人则莫测其所由来。同时数家书店亦搜查历数小时之久，皆未查出违法证据。然从此风声鹤唳，人人总感觉惊慌。

此时还夹杂着出了一件事。那就是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奉命远征，调出云南；未及开拔，士兵就已逃散了。该师重要军官数人曾被捕。这自不能算一件小事，颇以增加各方的不安。

接着传来了潘朔端部改称“民主同盟军”，并电民盟中央致敬，愿作后盾的消息。其实彼此素无往来，事前毫不接头。自经民盟发言人正式声明潘部与民盟无任何关系后，在大局上亦就不发生什么影响。但此消息一到昆明，若干民主人与若干青年名列黑名单之说因此却愈炽。后面我们列举许多李闻案发生前的情形，就是在此期间的事，请参看。

民盟滇支部同人，鉴于谣言猛炽，局势险恶，乃不得不向各界公开表明民盟的立场主张及态度。于是有三次招待会之举行，地点在商务酒店，出面者为滇支部负责人潘光旦、闻一多、楚图南、李公朴、冯素陶、费孝通、潘大逵七人。第一次在六月二十六日，招待党政军各机关首长。第二次在二十八日，招待地方社会贤达及文化界、教育界人士。第三次在二十九日，招待新闻界。主要在阐明民盟所持“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主旨。民盟只从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暗杀暴动不是我们所作的事，而是我们所反对的事。经反复说明，颇得各方所了解及好感。然仍遭受特务的搅扰威胁，第一次散会时，来宾签名簿突被警备部之特务抢去，经多人追赶，该特务跳入河中，泅水逃走，被挡获后犹坚不肯将抢去之名册交还。第二次招待会后，商务酒店接有特务化名恐吓信，说如该酒店敢再租会场给乱党李公朴等开会，即将该酒店经理

暗杀云云。因此第三次招待会，只好临时改在冠生园举行。还有在省政府任要职之某CC分子，且亲自劝阻工商界人士勿赴民盟之招待会，说民盟又要发动运动，大家不要去上当。

这里所说的发动运动，大约指当时昆明同志们与滇中各界人士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因为这时（六月二十七八日）正是东北休战即将期满，人人都怕大局破裂。所以草有一通电，致蒋主席及毛泽东先生，征求大家签名。这个通电签名的人，空前之多，方面亦广。从护国元勋、绅耆名流、企业巨子、禅林长老，到青年、学生、妇女、店员、老板都来签名，原非民盟包办。当时国民党的民主派朋友，对这呼吁同具热忱的。可见厌恶内战，祈求和平，人同此心。乃那些别有使命的人，则连这种和平的呼吁都不肯让它从人民口里透出来，甚恐怕同盟在集会中间扩大它。实则招待会除了介绍同盟的历史、主张、立场外，并不涉及其他活动。当时曾有人提出反对国民身份证及援助昆市教师改善待遇保障职业等问题，主席潘光旦先生说：这些意见我们完全同意，最近在我们的刊物上曾发表明确的主张，予以坚决的支持，希望大家都来赞助它；但今天的招待会不拟讨论这些问题。

此后我们滇支部各负责人，皆被特务监视其行动，以迄暗杀发生后犹不已。这些事只有局中人感觉亲切，心内明白，远在外方的人，哪里知道呢？

全国政治空气，原是整个的，任何一角落莫不息息相关。我们讲说昆明，不要忘记东北的战争，尤其不要忽略首都的两党谈判。东北无端地来一个电报（潘朔端改称民主同盟军），就促使昆明特务加紧了他的动作。而六月卅日休战期满，谈判无成，尤为大局关键，各方视线莫不系属于此。一篇可战可和的模棱文告，发表后，又期待着五人会谈（蒋主席指定陈诚、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周、董会谈）。会谈几次，毫无结果，局面全僵。于是蒋主席就上庐山，苏北战事就大作，而昆明的李闻案亦就恰恰发生在其前后了——李案在蒋主席上庐山前，闻案在蒋主席上庐山后。

三、李闻两先生被刺前后的情形

（一）李先生被刺前的情形

1. 自五月起，昆明近日楼（市中心城楼，仿北平前门形式之建筑）常贴各种大张壁报，其中反动者如“时代”、“老百姓”、“真民主”等（有的用“民主自由大同盟”名义，有的不具名）和一些铅印的反动派的刊物，如《光明》《新中国》《正论》等，均不断造谣说李公朴的特务总队长及驻昆参谋主任，携带现款七万万元，美女四名，将与地方势力联合暴动等等。甚至近日楼的卫生标语中亦杂

有“要扑灭李公朴的传染病”之类的标语。这些话无非是特务预先造成杀李的藉口。

2. 昆明在不久之前，成立一新的党政军团合组的特种会报组织，许多特种问题的机密决定多出于此。该组织的重要负责人大都为中统军统分子及李宗黄的心腹(姓名职业姑不宣布)。

3. 六月间盛传特务机关拟定黑名单七十余名，内有数人系注明立即严厉处分者，李先生为第一名，闻先生为第二名。另一黑名单则有三百余名，分三部分：(一) 民盟分子，(二) 学生及文化人，(三) 地方有力者。单上注有各种符号，并有加案语者，如“上列分子可于必要时在当地予以便宜处置”等语句。同时传说南京某机关首长有密令到昆，武官在团长以上，文官在县长以上，对于中共及民盟分子可以密报、密捕、密决。又谓特务已在海口设集中营，一俟国共谈判破裂，即开始逮捕之。

4. 暗杀前数日，警备总部一特务人员告人：彼曾跟踪李公朴到巡津街等处，并四处打听闻一多相貌服色。

5. 前云大教授李××与潘大逵有同学同事之谊，某日往北门书屋访潘(潘与李公朴先生同住该楼上)后，在公共汽车上即被特务追随盘问，不得已引至教育厅长王政办公室始得解围。特务去后，王告李：“你如是民盟盟员，我即无从为力，否则当可替你解释的。”

6. 六月底，民盟云南省支部既鉴于谣言险恶，而举行三次招待会，向昆明各界公开表明立场及态度，很得各方面了解与同情。而特务竟还不断给与扰乱与压迫，如招待会第一次签到簿被特务抢去；租借给招待会作会场的商务酒店被特务警告，以致第三次招待会不得不迁移地点。还有出席招待会的来宾发言者，有的被警告，有的甚至被迫离境。所有这些，已详述于前，此不再赘。

7. 李先生被刺前两星期，有自称“民主自由大同盟”盟员两人，两次访李先生未遇，第三次问其来意，他自称赋闲军人，特来报效。(意谓李先生正在招兵买马)李先生劝其勿受人利用，并谓“我是文人，根本不懂军事，也不愿用武力争取民主”。此两人名片尚存。

8. 嗣后又来一旧日相识之军人，对李先生说：伊在警备部特务组，见有密令三条，第三条说李公朴将于六月二十九日赴黄土坡及马街子演讲，问李确否？李先生答以绝无其事。至李先生被刺后，该军人复来，谓李先生之死是警备部主使，伊可设法调查等语。李家未予理会。

9. 警备部曾一次藉清查户口名义，详看李先生住宅的后门。某日，复有

一身着蓝布长衫之青年站在门侧，约半小时，注视书店（李先生即住楼上）出入之人，并用铅笔有所记载。李先生被刺前三四日，曾发现夜间有携带手枪者两人，等候于书店之对面墙角，迄李先生被刺后，即不再见。

10. 李先生曾接上海不甚熟悉之友人来信一封，劝其勿赴上海，谓“谨防有人暗算”。今日观之，其意乃在使李先生勿遽赴沪，而使昆明暗杀计划得售也。

11. 昆明友人多劝李先生勿于夜间外出，因此被刺前三晚均未外出。七月十一日当晚李先生偕夫人刚出去十余分钟，即有一友人特来相告：从三青团方面得来的消息，昆明特务机关奉到密令，对某某等严加监视，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其第一名即为李先生，切嘱不可外出。不幸竟未相遇。三小时后李先生即遇难。

（二）李先生被刺时的情形

1. 七月十一日晚餐后，李先生偕夫人外出访友，代友人洽借音乐会场所，便中赴大光明电影院观戏，散场时约九时四十分，至南屏街公共汽车站等车，即见有三人均着黄色军便服，站在李先生与其夫人的周围，上车时一人坐在李先生身旁，一人坐在李夫人身旁，另一人坐在李先生对面。车到近日楼上车人极多，此三人仍在车上。行至青云街口李氏夫妇下车，此三人随同下车。李急行至学院坡叉路，其夫人在右边，上坡刚行四五步，即听见后面一声不大的响声。李夫人以为是青云街上的小孩子放爆竹。李夫人本有心脏病，平常听爆竹声即惊慌心跳，这次并未如此，足证其为装有灭音器之特用手枪。声响后，李先生即倒在路旁的泥泞中大呼：“我中枪了！”其夫人走近，方知李先生已遇刺，大呼：“捉人呀！枪杀人了！”其时适有青年学生路过该处，亲见凶手将其手枪递交另一特务，向青云街云南大学方向逃跑，他们即率同市民追捕阻挡，追获后送入警察三分局，其余特务则向大兴街逃去，据讯，此凶手名李成业。

李公朴先生被刺处简图（略）。

2. 李先生被刺后，适有云大同学数人路过，约集市民将李抬至北门外云大医院，其时已将近十一点，经检查及开刀，子弹是从左后腰射入，经右前腹穿出，创口周围发青色，腹穿数孔，口径在一方吋以上，仅连少许未断，血并未流出创口，完全流入腹腔和胃里，从嘴中大口吐出，其伤势与“一二·一”死难者潘琰女士一样，嗣经医生连续注射盐水针、葡萄糖、盘尼西林、止痛针、止吐针，血已止，偶吐一二口瘀血。至三时许，神志仍清楚，自言自语的说：“我早有准备了。”四时以后，犹沉痛的说：“全为民主，全为民主。”并痛骂统治者“卑鄙、无

耻”。时至五时廿分，情况突然恶化，经打强心针一瓶无效，旋即气绝逝世。

3. 李先生被刺地点，西距警察第三分局五十公尺，东距大兴街口警察派出所四十公尺，南距水晶宫街口派出所五十公尺。其距翠湖西路各军事机关，及军官宅第则各数十公尺不等。即距警备总部亦远不过二百公尺。试问敢于在军警林立之地行凶者是谁？

4. 据各方密报：(1) 刺李的特务分为两组，一组为李成业及温某、杨某等，前三天已钉李先生的梢，并在拓东路某处接头，出事的当晚，他们系从大光明跟到青云街，李成业即坐在李先生身旁。另一组亦有数人，住在民生街及拓东路，均乘吉普车尾随公共汽车，开到青云街口，即有二人下车至出事地点附近的廿四号楼房，从窗内看风，并就近指挥。(2) 李成业被捕后，有一小脚老太婆跑到警察三分局对警士说：“他买我的东西，差五十块钞付不清就跑了。”这是特务的布置，希望警察轻轻释放了他，其共犯温某跑脱后，即往航委会汽车修理厂(李在该厂服务)面告李之友人说：“李跟别人打架被捕了，但是不要紧，会放出来的。”

(三) 李先生被刺后的情形

1. 抬李先生到云大医院，途中突有警官跑上来说：“凶手在三分局门口捉住了。”问伤者是谁，李夫人答以“李公朴”，那位警官突然迟疑了半晌，变口说：“也许是枪走了火罢？”当时捕获凶手李成业既为杀人犯，警察应立送法院侦查。乃警备部于当晚二时即以吉普车将该犯接去，并未移送法院侦查。翌晨李夫人往警备部认看凶手竟遭拒绝，经数日后警备部模糊其辞的宣称：李成业身无凶器，证据不足云云。据知内容者传出：李成业于出事之次日已乘飞机离昆矣。但又闻李成业仍在押，却不知是否原来的李成业？

2. 李先生被刺后，当晚即在青云街一带地方发现预先制就之标语及漫画、彩色壁报，纷纷张贴出来，诬李为“桃色事件”而死。次日复以“云南反共大同盟”名义，张贴标语，说李是共产党杀死的，是艾思奇杀死的。至李先生火葬时，又以“中共滇支部”名义用大红纸到处张贴恐吓性的通告，谓“李公朴背叛本党(指中央)，特奉主席毛密命，着即枪毙”。并劝市民勿往云大参观，免遭意外。试问在中央势力控制下的昆明敢于如此明目张胆活动的是谁？总不难想像得之。

3. 李案发生后，民盟云南省支部曾分函警备部及省政府警务处，请予立即缉凶。不但迄今未复，而警备部反以学联所出壁报有攻击警备部之语句，认为是民盟支部指使，来函质问威吓。

4. 李案发生后两日，警备部派人查封昆明市中苏文化协会，搜去公物及工作人员全部私人物件、书籍、衣物、现款等。并欲捕该会办事人金若年君及寄宿该会之民盟盟员赵沨等，幸金、赵警觉走脱。

5. 李夫人于李先生被害后，连接两函，似皆出于参与特务工作者之手。一函谓主谋者为霍揆彰，执行者为吴耀辉、李荣森、李成业、王慧生等。一函则谓杨本礼及孙区队长所为。此两函尚保存，并经美领事馆索去查阅。函内又有"五十万元之酬劳尚未领到"的话，但据闻刺李酬金实共为三百万元，凶手各约可得五十万元。

6. 李夫人于李先生被刺之次日（七月十二日）曾延律师诉请昆明地方法院检查处派员勘验，并依法严缉凶犯。但该院于当日勘验尸体一次外，其后竟无任何表示，似是不敢过问。

7. 李案发生次日，昆明《复兴晚报》广告部曾有警备部派来之人恫吓，嘱勿登载李案之新闻与广告，并至机器房检查字版。又李先生治丧委员会到《朝报》、《观察报》及《云南日报》去登广告，前两家当下收费，应允翌日刊出。《云南日报》先不敢接受，嗣以前两家之广告费收据示之，亦允照登。但次日三报均未登出，经追问时答称："警备部不许刊登。"

8. 李案发生三日后，有警备部上尉监察谢诚被人枪杀之事。此事曾经有人投函重庆《民主报》，在八月六日该报刊出，叙述其内幕及经过颇详，此不转述。谢诚当十四日夜被警备部自己人在黄工坡枪杀未死，经附近保甲送入惠滇医院后死去，该部以霍乱病通知其母，复被其母发觉真相大闹，恰好此时闻案发生，警备部即不复隐讳，而把他与李、闻的被杀配合起来，混淆民众视听，想将自己的罪恶转嫁于他人。

（四）闻先生被刺前的情形

1. 去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该案主使人（前一个警备总司令）扬言，要以四十万元购买闻一多的头颅。今年六月初，某总司令在一个会议上亦曾讲过："闻一多这样的人，下手也不好，不下手也不好。"可见杀闻早经过不少考虑。

2. 昆明反动刊物常常诬闻先生已加入苏联国籍，取名"闻一多夫"。五月四日，昆市的反动壁报，并说到闻一多在昆组织暗杀公司的话。是欲杀闻已预先制造罪状了。

3. 李先生被刺死后，闻先生是第一个往云大医院痛哭者。当时即有人明白告他："特务已决定要杀你了。"此可视刺闻非出于偶然。

4. 闻先生被刺前数日，曾有一装疯的怪女人名张柴静（原系传教者，闻经警备部收买，担任眼线通风报信等工作），常至其家探访窥伺，每次均有特务尾随其后。闻先生不胜其繁，闭门不理，怪女人乃留函辱骂，并声言三天以内让你们父子都死。第三天果如其言。

5. 闻先生被刺的当天早晨，曾有友人来告：南京近密令昆明警备部、宪兵十三团等机关，说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霍揆彰奉令后，召集各有关机关讨论，有人提议开始捕杀，经该会通过首批暗杀名单四人（后删去一人），又逮捕名单十数人，均为民盟负责人及民主刊物负责人。此友劝闻特别戒备，闻夫人亦力劝勿外出，闻先生以坚决的语气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指李先生）？"于是卒亦被杀。

（五）闻先生被刺时的情形

1. 七月十五日下午一时，李先生治丧委员会假云南大学开会，请李夫人张曼筠女士报告李先生遇难经过，到会一千余人。闻先生出席讲演，痛斥反动派特务暴徒的无耻和没有人性，并坚决的说："今天跨出大门，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至二时半散会，同学护送闻先生回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休息了片刻，又出席民盟的记者招待会（在府甬道十四号）。记者招待会约于五时散会，闻先生休息十余分钟，由公子立鹤伴随回寓。父子二人均边走边看报，距联大教职员宿舍仅十步左右，枪声忽密集如鞭炮。闻先生首先中弹倒地，头中三枪，胸部及其他部分亦中多枪，于送医院途中逝世。其公子立鹤亦胸中三枪，腿中二枪，虽可保全性命，腿部将难复元。

2. 据闻立鹤报告：他于出事前，曾出去巡查数次。第一次在午后一时以前，即云大尚未开会的时候，他在文林街公共汽车站已发现戴泥帽，而样子奇怪的人了。嗣后得密报：刺闻先生共有特务多人，追随五时之久，足见刺闻之布置颇为周密。

3. 又据闻立鹤报告：行刺时凶手距彼仅十步至二十步，有两个身着短装的特务迎面而立，而枪弹则从前后四方射击。同时，据附近居民说：凶手不下五人，早在联大教职员宿舍的附近的米仓等处潜伏着，如此，刺闻先生凶手，至少在四人以上，决不只三人也。

4. 当刺闻时，早有人发现民主周刊社的外面已被特务包围，并于出事前十分钟，暗示附近居民暂闭门勿出，故闻被刺倒地后，四周不见一人，不似李公朴被刺后有若干市民追赶凶手。

5. 刺闻凶手既在光天化日之下，连放十数枪，事毕后复从容乘预先停在钱局街西仓坡口的吉普车一辆，经钱局街驶去。按闻之被刺地点东距警备司令部二百公尺，距翠湖北路、翠湖东路各军事机关五十至一百公尺，西北距文林街警察派出所一百公尺，西南距钱局街警察派出所一百公尺，其南造币厂，亦驻大量卫兵。咫尺之间，竟一概置若罔闻。

6. 闻先生被刺后二十几分钟，即有特务前来照像，照完，匆匆而去。

7. 闻先生被刺之日特务在西仓坡附近的部置，如府甬道、文林街口、府甬道西仓坡口、翠湖北路西仓坡口，均停有他们的吉普车。如此，则闻先生万一逃跑，亦难出此天罗地网。

（六）闻先生被刺后的情形

1. 云大教授楚图南先于闻先生数分钟出府甬道十四号，发现有特务跟踪，乃迅即折回昆华师范宿舍。入夜幸经美领事馆来车迎接，掩护出门。楚去后，尚有特务多次来校搅扰，意在寻楚。

2. 云大教授费孝通住宅后面，曾发现城墙掘有通道，而距该处不远之城楼上则驻有中央宪兵队。云大总务长拟饬工人堵塞其通道，竟有人阻止，声言："公家有用。"（似欲夜欲入通道，有所作为。）

3. 民盟负责诸同人暨张奚若先生等，既早感受威胁，迨闻案继李案而来后，形势愈逼愈险，西北门一带（两个大学及民盟负责人住家皆在此区域）特务密布，到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的谣言，实为扩大暴行，尽意捕杀之征兆。当晚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潘大逵、尚钺、赵沨、冯素陶诸同志暨张奚若先生，因有入居美领事馆暂避之事。潘等入领事馆不久，中央宪兵队随亦开来两大卡车，声言保护。领事馆拒绝其入内，则在墙外围守不去。馆内美官兵十余名，亦架置机枪，通夜轮班守卫，其情景足之动人，而又使人有莫明所为之感。其后警备总司令部会同昆明外交特派员公署，派员持函到领馆，请将潘等移交警备部，以便保护，领事馆方面未予同意，仅允将其意转达同人。

4. 出事次晨十六日，张奚若先生住宅门前，仍有特务持枪，徘徊不去。

5. 十八日，潘等以两三日无事，而且警备部表示保障安全，即移出领事馆回家。不料次日警备部又滥捕杨立德等（捕杨之日整天枪炮声不绝，市民惊恐不安，据谓炮兵演习），并连续捕前昆明行营、前滇黔绥靖公署之官佐数十人。乃至地方公正人士亦受到种种威吓。特务在街上捕人事情，时有所闻。昆明某医院院长亲见一市民仰视街壁标语写着"李公朴是共产党杀的"，低声笑语其身旁友人说："谁不知是国民党特务干的！"立时即被两特务拔出枪来捕去。

潘光旦此时住梅贻琦校长家，而梅校长之车夫亦于是日被特务绑架拷问：清华大学办事处埋伏多人，藏有多少军火？且有同人眷属外出者，亦遭遇盘诘。种种情形，仍使人恐怖莫测，潘等不得已，廿日晚复入居美领事馆。

6. 装疯的女人，于闻先生死后，在街上大呼："身佩民主自由大同盟证章可以免死。"并曾赴云大医院亲向闻氏家属说："我是特务，我要谁死，谁即要死！"其行动纵肆殊不可解。

7. 民盟代表刊物之《民主周刊》(出版将近两年)及其他民主刊物十余种，继李、闻两氏之被杀后，即遭全部查禁。

8. 杨立德等多人被捕时，即传出消息云杨等与两暗杀案有关。廿五日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到庐山后，京沪一带报纸更宣传闻案的主使人为龙绳曾)，助其策划布置等为杨立德。且云杨已供认不讳，案情业已大白。此时搜捕龙氏旧属，显有继续扩大之势，各方舆情益为不平。大家都指责，这是最拙劣的嫁祸政策。旋唐纵(奉命调查此案的警备总署长)接着由昆亦抵牯岭，此说忽又沉寂。

9. 据一密报，(1) 刺闻的主犯为郭某，其所佩带的符号为"一四六"。汤时亮、李文山均为假凶手，这次"公审"完全是骗局。警备部早与他们暗中说好条件，即可得一大笔奖金，并不处他们死刑。至不得已时，拿两个散兵游勇或囚犯，代替他们，换换服装，用毒药弄哑，拿出去枪毙。(2) 刺闻赏格为五百万元，每名凶手可给奖五十万元。

四、政府对本案之处理

李闻两案接连发生后，政府对它的处理颇见紧张与认真。第一，是最高当局要亲自处理。例如顾祝同、卢汉、霍揆彰、唐纵等，两次被召上庐山，蒋主席亲加吩咐或询问；而顾、卢等到昆后，亦还要派冷欣、唐纵迭上庐山，请示机宜。第二，是特派大员，而且派许多大员前往昆明查办此案。例如最初由行政院先派了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负责，而蒋主席又特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全权办理；还有宪兵司令张镇，也奉令协同前去。顾总司令除带了参谋长冷欣之外，又拉去庐山夏令营办公厅主任张振国帮忙，所以在云南省主席卢汉、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理应负责之外，重重叠叠，加上这许多大员，去办这一件事，其重视真可概见。

本案从七月十七日两次限期破获后，总算在八月初间捉到现在所宣布的两个凶手——八月三日警备部扣住李文山，五日追获汤时亮。但颇可注意的，参谋总长陈诚八月四日在庐山对新闻记者谈话，就说出"绝非高级知识分子之

所为”，似即隐示出于中下级军人。同时重庆八月五日的晚报上，也透露出来凶手是出于义愤的话。颇使我们疑心，是决定了破案方式，才破案的。不然的话，何以此地刚捉到凶手，而远在庐山重庆那里，便已经那样清楚呢？

以下我们还可以指出若干显然有情弊的地方：

（一）八月十五日举行公审，其实并不算公开。那天虽曾分函各机关团体派员观审，但我们收到来函后，即刻复函说：由梁漱溟、周新民、冯素陶三人应邀前往，而结果冯竟被拒。（由张寿贤秘书传达顾总司令之意，婉言拒绝。）还有《大公报》派来昆明的记者高学逵十四日向冷参谋长请求予以旁听机会，冷答：须待请示决定。十五日早，高再见冷交涉，其时当地中央日报社长钱沧硕亦来同作此请，冷一概不准。因此，那天在场的只有被指定的中央社记者邵、张二人而已。

（二）十五那天开审时，只见审判官与凶犯一问一答，完全不用其他人在旁质证。例如闻先生之子闻立鹤，为行凶时当场受伤未死之人，对于凶手面貌必有印象，我们十四日曾函请设法担架闻立鹤辨认李文山等是否当日行凶之人，而当局竟然不肯。这亦是由张寿贤秘书婉言转达我的。不过，当局又怕我们指摘，所以才由法官到医院向闻立鹤问话录供，并由医院出具证明书，说闻立鹤腿伤未愈，不能出庭，以塞责。又如两凶犯以闻先生演说辱骂政府及军人为激出暴行之藉口，那么就应该把当时在场一同听到演说的人，传来质证，或者把演说后的记录拿来对证。（按：此演说记录在事出后，各处曾有传载，其中只骂特务未骂军人。）但那天都没有做，只听取犯人片面之辞。是不是两方面一问一答，容易排演？而在代演时最怕其他人参加质证，露出破绽呢？

（三）据李文山供词，明明有向连长请假出去的话，却又未说出因何事请假。而汤时亮则供称：十五那天是出去值外勤。不知为何请假的李某，与因公出差的汤某却又一律换着便服，一路同行，总没有分离；此处是不是一个漏洞？在本案判决书上所叙事实部分，则称：被告等一同出去，都是为了负责巡查并维持治安的，因此各怀手枪，协同动作。以维持治安的人，忽然发此破坏治安行为；以前后历时甚久的三个人协同动作，说为一时气愤冲动；类此等处，是不是说得圆？

（四）政府肯于承认杀人是警备司令部中下级军官做的，总算不十分隐讳了。但只将责任归到一二人身上，并假称临时萌动杀机，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出事之前，早已满城风雨，人人知道要出事情，已成公开的秘密。而事出之后，全市报纸相率不敢多所刊载（昆明的新闻记者对我们说，对于李闻案登载最少

的，就是昆明本地报纸），这就充分证明，绝非偶然爆发之事。假如是偶然爆发之事，事前安得有此传说？事后报纸一定是琐琐细细，竞相报导，接连刊载几天以飨读者；而不会是内心有所震慑，相喻无言。这一点说不通，就是显有情弊之最大者。

（五）十五日下午观审完毕，我们马上致函顾总司令，认为疑窦甚多，请不要定案。十六日又去一函，请将当众宣读过，经两犯画过押的审讯记录，抄给我们一份；而官方竟不肯抄给。十九日我会到顾总司令，我问他：十五那天，颇以审讯完毕，但当时不见宣判，这几天来还不见宣判，是不是还要再审呢？顾面有难色，对答不出，只低声说："我做不得主。"后来迟到二十五日乃行宣判。像这种地方（当下不敢以记录抄给人，延迟多日而后宣判），他们若无情弊，便亦不会这样。

（六）汤、李两犯供认行凶不讳之后，便有人对我们讲：这两个人尽管将来判处死刑，亦不会死的，到行刑时，自然另有替死鬼，如同上次"一二·一"案办法一样。我们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亦曾预言且必然如此。果然，二十九日上海《大公报》昆明专电有"二十六日枪决闻案凶犯时，沿途所经，戒备严密，三小时不许行人通过"等语，其不敢与人以共见，是明白的了。

（七）从政府不肯同意我们参加调查工作，不肯给各方面参加审判的机会，乃至行刑时不肯与人以共见，而必要一手包办到底，其心虚胆怯，处处可见，还待多说什么话呢？

五、调查本案后的论断

当我们奉命调查，从南京出发时，我们深感到此行没把握。所以对盟友而谈，对本同盟主席张表方先生写信，都先声明了此意。乃至经过重庆，会见一些朋友后，此感还益深。所以对新闻记者谈话，都表示我们去是不得不去，难望有何成就（见渝、沪各报）。可是我们一到昆明，和盟内朋友初一度的长谈，我心里便有了把握，不再发愁，几日后，我便觉得可以交卷。所以原计划十二三日就走，已托请张秘书订飞机票。后来，因十三日顾总司令邀宴，十五日观审，才延期的。

前后为何这般不同？我们当初自觉没把握，是对下列三问题怕调查不出来：

（一）凶犯到底是谁？

（二）主使人到底是谁？

（三）他们内幕经过怎样的谋划布置？

原是呵，我们一个外来人有什么法子得到这些底细呢？何况政府已显然不予调查的便利，而某些可能有助于我们调查的云南本地朋友，或则离昆，或则不愿回昆。没办法的情形已成，自不免悲观了。后来，忽然心里有了把握，就是恍然大悟，这三个问题原是不必要的。我们有充分材料证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干的，已尽够了。用不着追究其为某人行凶，某人主使——这是无关重要的。将责任归到个人身上，反而放轻了国民党的责任，或其特务机关的责任。那恰是错误了的观念呀！

以下我们就既得材料，试作论断，并阐明此意。

第一，凶手是谁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个机关。从去年十月三日滇局剧变后，一切散兵游勇早经多次缉捕，殆已绝迹。而私人的武器短枪等，亦早施行过检查登记等手续，当时被收者不少；其未经没收者，都登记过，为官厅所许可合法保有的了。再就是吉普车辆，亦全在官方统制之中。试问歹徒活动，凶器来源，既这样不易，而两案发生时，出动的人员枪枝车辆却那样多，还向谁身上推呢？读者再看"李闻案发生的背景"，"李闻两先生被刺前后的情形"，"政府对于本案的处理"三大段所罗列的那些材料，还不够充分证明"凶手是警备总部"这句话么？至于当日动手，是不是汤时亮、李文山一干人，那是无关宏旨的。闻案可能就是汤时亮、李文山；李案可能就是李成业。但据另一秘密报告给我们，说刺闻先生是佩"一四六"符号的郭某，我们亦不否认其可能，不论是哪一个，我们总认定是出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这在警备部，今天不是已自供认不讳了吗？

第二，是谁主使的问题。我们肯定地说，这还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这个机关，分别来说，动手的自是他们的中下级人员；主使的总是他们上级人物。可能是某一个人；但亦可能是那个"特种会报"席上共同决定的。全部事实材料，充分告诉我们是动员了好多人干的（包括事先侦察，事后掩饰等工作），安得无主使？而主使的中心则在警备部；尽管他自己还没有供认，但客观事实不已证明了吗？

第三，他们怎样谋划布置的内幕经过问题。我们答复说，现在调查到的各种事实，不就是他们的谋划布置吗？这亦许还不完全，尤其缺乏"内幕经过"。但我们本来不是幕内人，怎能得知呢？只有待他幕内人献出来（有人曾来接洽，惜无力购得），并肯出面作证才行。然这并非必须的；从现得的外面可见的事实，在法庭上判罪已无不足。

再从前边"政府对本案的处理"种种来说，以及其对于李案的拖赖不破案

来看，国民党何止百口无以自解，他们直悍然不求自解了。国民党依然担当起来，何必再问其他？

我们今天所要作的，绝不在枪毙几个大小特务，为李、闻二先生抵命；乃在证实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政治上的罪恶，而取消特务机关。我们要求移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亦无非要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第三连连排长"之上，进一步揭穿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干的，要他们明白承认而已。现在罪证既有这许多，而国民党却还于避嫌的事（共同调查公开审判之类）不肯作；于嫌疑所在，竟蹈之不惜，赴之不辞。那就是他们已自暗地承认了。明白承认固好，暗地承认还不是一样？

假如国民党说他没有暗地承认，我们便追问他为什么过去有那些不避嫌疑的事？同时请他赶快作几件洗脱嫌疑的事。第一，便是限期破李案并缉获闻案逃犯徐占坤；第二，便是组织特别法庭，为公开之审判。我敢说，当他要洗脱嫌疑时，就是他明白承认时。明承认、暗承认，两面总难逃一面。

我们既认定课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责任，所以便不在个人身上琐细地认真。调查报告内，人名间或隐而不露，一事亦可备两说，就是基于上述理由而写的。希望读者注意。

在我们开头一章"赴昆明调查之经过"内，提及我们调查工作一面很困难，一面亦很容易。所以容易的最大理由，现在可以明白。即在这案情，原非一二私人的事，而是大局政治的事。对方，大而言之，是一个党；小而言之，是一个机关。其动作尽管掩掩藏藏，无奈事情既非一日，规模尤不会小；前后积累，左右汇合，则形迹自显，其势无可逃责。比较要调查一件个人私事，容易的多。只要你认清题目，不复在个人身上呆笨追求，而能眼光四射，照看全局，就行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2辑，1984年5月印行，第270至248页）

《李闻案调查报告书》附有附录两件，一为"李案发生时在场所见"，一为"两案内幕知情人说"，后者为"闻案部分"与"李案部分"。报告书提交民盟中央时，梁漱溟加有按语，云："此附录两件，是我们报告书所根据的材料之举例。前者，为李案发生时在场之某君自述其所见。原文在昆明发表过。后者，为知道内幕之某君暗中写示给我们的。我们收到的秘密投函甚多，其人多不露面，其材料亦不尽可信。唯此件经考察比较后，有许多点印证下来不错。并且此君和前一位先生均愿于必要时出面作证，所以选录于此，以见我们根据之一般。"

后来，梁漱溟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这次赴昆调查的一些情况。其文为：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七月十五日闻一多教授在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又被特务杀害身死。

李是民盟中央行执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副主席。闻也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云南省支部常委暨宣传部主任。民盟中央这两位重要成员连接死于政治谋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很大震动，对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击。

李闻案发生的背景

李闻两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发生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间不是偶然的。这一年一月底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签字墨迹未干，国民党先要修改已共同通过的宪法草案，随后又在东北停战问题、美方最后决定权等问题上，要求中共方面作出让步。六月三十日东北停战期限已满，谈判濒临破裂边沿七月初国民党要求接管苏北政权，遭中共拒绝，于是蒋介石对在此之前所达成的三个协议也拒不签字，并于七月一日发布可战可和的文告，七月十二日更下令开火大打。国内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国民党特务系统不会不清楚，也不会不有所动作，于是他们就对要求民主、要求团结、反对内战的民盟下毒手了。而他们下毒手的地点选在昆明，又与当时云南的特殊情况有关。本来蒋介石借抗战之机，对与他分庭抗礼的许多地方势力，先后一一剪除，唯独云南有些特殊，八年抗战期间省政一直掌握在龙云手中，因此在云南蒋介石的势力的渗透始终受到一定抵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活动也受到一些约束。再加在反蒋这达一点上，龙云与民主力量是一致的，因而西南联大等校师生的民主活动最为活跃，民盟的组织发展也较快，可是在抗战胜利后两个月，一九四五年十月落介石借留在云南最后一部滇军开赴越南受降的时机，攫取了云南省政大权，将龙云"请"到南京去担任军事参议院议长，改由李宗黄为省主席，从此云南完全置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早已被围民党视为眼中钉的民明民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就难逃他们魔掌了。

要求共同调查

暗杀事件发生时，我驻南京民盟总部，担任民盟秘书长，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国共和谈最紧张的时候。

李公朴被杀害的消息于十二日传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许多负责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个人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真凶没捕到，好象无法证实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

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不料四天之后，闻一多又被杀害。

十八日，我又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又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宣读完这个书面谈话之后，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凶狠的行径的愤恨，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七月二十日，民盟参加重庆政协的代表七人（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和我）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交国民党参加政协的代表转蒋介石。抗议书揭露和抗议国民党政府“不准许人民有其合法的政治自由”，“不负责保障一切政党公开合法存在”等，并提出处理昆明惨案的六项要求。除了要撤惩昆明当地“治安长官”，抚恤死者家属，保护进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的潘光旦、费孝通、楚图南等民盟成员和民主人士的安全，还要求国民党派人与民盟所委派的人赴昆明共同调查李闻被谋杀案的真相。

赴昆明调查

国民党做贼心虚，自始至终不肯同意派人与民盟共同进行调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调工作”。

民盟本打算派罗隆基去，后来传言说罗不能去，去将死在昆明。后来决定由我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一同去调查此案。

八月三日我们二人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六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记得他们当中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顾的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等。此外参加“查办”此案的还有已在昆明的云南主席卢汉、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

我们到昆明后立即约见他们，但他们故意拖延，屡次推拖，改动会见日期，使我们无法及时开展工作，至八月九日才见到他们。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因为李闻案是一政治性谋杀案，普通法案是审理不了的。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

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审理的情况下，我们又要求不要急于定案。

八月十三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我们，有冷欣和张镇等作陪。此时顾祝同告我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说十五日"公审"，邀我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

如此"公审"

增加冯素陶"观审"得不到同意，只有我与周新民二人去参加十五日的"公审"。"公审"时到的只有被邀的不过二十余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记者只二人，且均为国民党中央社的。《大公报》派来昆明的记者申请参加，也无理地被拒绝。"公审"时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杀闻一多的两名凶犯，名汤时亮和李文山，据说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名中下级军官。真正的凶手是不是他们？谁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将闻一多被杀时受伤的他的儿子闻立鹤用担架送来法庭，以便辨认凶手和作证。但直到"公审收场后，参谋长冷欣才要张寿贤秘书转告我们说，军法处去医院，院方出具证明，认为闻立鹤"伤势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他，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

"观审"毕，我即致函顾祝同，说明我们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始终不曾给我们。

十九日顾祝同再次宴请。饭罢入另室谈话，我问：十五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对我说：我也还做不得主。

阻挠与封锁

同时，国民党在下面又采取种种办法，阻挠我们调查，对我们进行封锁。

本来早在李闻案发生之前国民党特务即散布谣言，制造打击民主力量的借口，空气已十分紧张。张贴在街头的反动刊物和壁报说，民主党派要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暴动"，夺取被国民党由龙云手中收去的政权，说"李闻加入了共产党"，"闻一多组织了暗杀团"，种种胡言乱语。在这种情况下，六月底民盟

组织不得不多次举行招待会，说明我们的主旨是“和平建国，民主团结”，说明民盟为非暴力革命团体，从来反对暗杀暴动。

待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李闻两位被暗杀后，昆明的空气更加紧张。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进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像这样人人自危的状况，当然使我们不便或无法与许多调查对象接触。我们到昆明后，即住在商务酒店，店里此时早已先住进了许多“客人”，我们的出访，或有人来访，一举一动，当然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孙福熙君。孙是著名作家孙伏园（福元）的兄弟。孙福熙曾为中国旅行社编辑过旅行杂志，而这家商务酒店正是由中国旅行社经营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内。彼此早相识，见面怎能不打招呼？两人互致问候，寒暄几句，也就分手了。谁知竟被特务注意。据孙事后对我说，在我们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问他：你与梁某人是什么关系？你向他说了些什么？孙万没有料到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盘查，赶忙解释说：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是先生，我是学生，只是师生关系，彼此多年不见，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还记得，当时缪云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庆政协会议的社会贤达代表，我本想借此机会彼此见见面。这本是与调查无关的活动，但也未能实现，后来缪云台先生派了某纱厂经理来见我，说“有事”不能来。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

报告调查结果

李闻案的调查在国民党的阻挠下再也不能进去下去，而“公审”是否继续进行又无期，二十二日我们即由昆明飞返南京了。

八月二十五日我在上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我说：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它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象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在这报告中，我还作了三个预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为闻案推不脱，才说是警备司令部军官干的，但是出于“一时气愤”，李案不好再说是特务出于同样原因干的。二、闻案不会再审了，也不会正式宣

判。三、两个凶手在执行死刑时，定有两个替死鬼。

后来此案的了结与这些估计大体不差。

末后我们将调查经过与所得写成《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印发各界，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梁漱溟《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第 222 至 227 页）

八月二十四日　《新华日报》刊登朱自清对新华日报社记者谈话。朱自清认为先生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把闻先生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他在山东大学的时代，这时他的著作如《死水》，在表面上面是阴暗的，但是里面却孕育着希望。闻先生这一时期是中国优秀的新诗人，他爱国，他肯帮助青年；闻先生第二阶段是从民国二十一年到死前两年，这一阶段里，他伏首研究《楚辞》、《诗经》、《易经》等古书，他好像是脱离了现实，实际上他还是在现实中。他依然肯帮助青年，与青年常在一起生恬。第三个阶段是最近两年，闻先生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他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仅仅为了民主，而遭惨死。暴徒们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没有一个人不愤慨！闻先生的思想转变是因为政治上的黑暗与实际生活的逼迫。他教育青年，又为青年所鼓舞！闻先生一生中，有一个一贯的精神，这就是他的爱国精神。"（朱自清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转引自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4 卷，第 462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

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民主同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由二十二日离昆返宁的梁漱溟、周新民报告李闻惨案调查经过与结果，用"吞吞吐吐"四字说明当局态度。民盟认为闻案未了，坚主凶手移至南京审判。但国民党政府对此无动于衷。

香港九龙各界在孔圣堂举行李闻陶追悼大会，出席九百余人。蔡廷锴主席，彭泽民宣诵祭文，萨空了、陈其瑗、丘哲、沈志远等十余人演说。会上通过通电全国，组织纪念三先生基金筹募委员会、发动签名控诉等项临时动议。会场挽联有："执政党暗杀民主领袖可谓卑劣无耻；名学者反抗法西斯真是人民导师。""犯众怒而害贤良，将见独裁授首；今群力以伸正义，务使民主成功。"

顾祝同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称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以何绍周继任。

同日，军事合议审判法庭举行闻一多被刺案第二次公审。次日，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布汤时亮、李文山两人在昆明枪决。该布告云："案据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呈送汤时亮、李文山枪杀闻一多一案，经本部组织军事合议法庭审讯，均供认枪杀闻一多及其子立鹤未遂不讳。查被告等均系现役军人，竟敢于服行任务时，在本市持枪杀人，实属目无法纪。经依刑法第二七一条第

一项、第三十七条第一项，各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渠经呈奉核准在案。兹将该被告汤时亮、李文山二名验明正身，绑赴刑场，除呈报外，合行布告周知。计开：汤时亮二十八岁，男，湖南衡阳人。李文山，三十二岁，男，湖北黄陂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陆军总司令部顾祝同。"(《枪杀闻一多两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伏法》，南京《中央日报》，1946.8.27)

第二天早晨，监斩官宪兵十三团警务团附张拯东用酒把汤、李灌醉，拉至东站外执行枪决。汤、李知道受了骗，但为时已晚。当天，南京《中央日报》刊登《闻案被告判决书》，各大报纸均有转载。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刺杀先生和李公朴的特务，遭到了应有下场。其中熊福广于一九五〇年被镇压，袁炳南、崔宝山、吴传云、兰亚民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被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判死刑，王子民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在成都伏法，蔡云祈一九五八年四月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二十六日执行枪决。赵凤祥亦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在长沙执行枪决。兹录判决资料如下：

(一)《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查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凶犯袁炳南、崔宝山、兰亚民、吴传云于一九四六年勾结匪首霍揆彰，迫害民主运动，匪首督查长袁炳南受霍匪指使，令匪部行动组情报组收集李、闻两先生言论，并暗中予以监视。七月上旬，霍匪令其在三日内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逮捕或暗杀。七月十一日，崔镇山率兰亚民、崔宝山等二人驾驶吉甫车二辆，带有麻醉药哥罗芳等候于青云街口、大兴街口、圆通街、北门街一带。是日下午六时，李先生偕夫人到大光明看戏，由汤时亮、赵凤翔、吴传云跟踪，戏散后，李先生夫妇至南屏街口乘公共汽车时，汤时亮即发枪杀害，因枪机失灵未果，又尾随至青云街。李先生至大兴街时，汤时亮连发二抢，赵凤翔、吴传云各发一抢，李先生应声倒地殒命。事发后，引起全市及全国人民之愤恨，七月十五日学联在云大开追悼会时，闻先生指出反动派之无耻阴谋。会前特务即混入会场及布置埋伏。散会后，闻先生父子行至西仓坡时，特务李明山等开枪，闻先生中弹倒地殒命，其子闻立鹤亦受重伤，造成全国人民均表愤恨之大血案。四九年兰亚民、吴传云到卡佤山进行特务活动，其它均因屠杀人民有功升官他调。云南解放后遂将该四犯逮捕归案，经审讯后，供认上述罪行不讳。查该犯等杀害民主人士，罪大恶极，全国人民无不愤恨，一致要求严惩凶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将该袁炳南、崔宝山、吴传云、兰亚民四犯判处极刑，于十四日下午三时将上列四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袁炳南，化名袁荣焜，四十七岁，湖北黄岗人。崔宝山，三十四岁，河南郎城人。吴传云，化名吴笑采、吴汉民，二十九岁，湖北黄陂人。兰亚民，化名兰鹏，三十三岁，湖北黄陂

人。主任陈赓、副主任周保中。公元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云南省公安厅档案馆藏）

（二）《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凶首，匪帮特务熊福广就擒，供认暗杀系奉霍揆彰命令执行》：新华社重庆十四日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国民党特务凶首熊福广，已被重庆市公安局逮捕归案。该犯供认暗杀李、闻系直接奉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之命令执行。熊匪当时任伪警备司令部特务营长，行凶后曾受到蒋介石匪首奖励，一九四七年被提升为重庆伪警备司令部机动部队指挥官，其后调伪"徐州绥靖公署"任团长，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伤逃脱。去年到四川国民党七十二军任团长。七十二军起义后，熊匪潜来重庆，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未遂被捕。（《人民日报》，1950.3.15）

（三）《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主犯王匪子民在成都伏法》：新华社十九日讯：成都消息：五年前在昆明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主犯、国民党特务分子王子民已在成都市伏法。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匪帮以刽子手霍揆彰任匪"云南省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王匪子民任该匪部"昆明稽查处少将处长"，企图进一步镇压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年四、五月间，王匪提出了包括昆明各大学教授、学生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内的四十余人的黑名单，经由霍匪揆彰交蒋匪介石圈定暗杀或逮捕。同年七月，王匪即亲自部署其下属组成行动小组，于十一、十五两日连续以美制无声手枪暗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一九四七年后，王匪调任匪"湖北省第四区保安副司令"，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湖北省解放后，王匪逃至四川新都，化名潜伏，但终被我川西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捕获归案。成都市人民法庭于本年一月十日召开了三万八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公审大会。会上，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代表张松涛控诉了王匪的万恶罪行。在与会群众的一致要求下，人民法庭当即判处王匪死刑，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已执行枪决。（《人民日报》，1951.3.21）

（四）《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祈在盐城伏法》：据新华社盐城二十六日电，杀害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的反革命分子蔡云祈案，已经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行审判，今天下午在盐城县将蔡犯执行枪决。蔡云祈曾任国民党军队的排、连、营长，少校团附、联络参谋等伪职，是一个万恶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六年他在云南昆明任蒋帮预备第二师谍报组长时，坚决破坏民主运动，和蒋帮谍报队长特务头子陈国华等积极共谋杀害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同年七月，蔡云祈担任国民党特务机关所组织的以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等为目的的行动小组组长。七月十一日下午，蔡云祈指挥特务开枪打死李公朴烈士。同月十五日，蔡云祈又率领特务侦察主持追悼李公朴烈士大会的闻一多的行动，随即布置特务在会场外埋

伏。会后,闻一多行至昆明西苍坡时,被蔡云祈指挥埋伏的特务乱枪打死。(《人民日报》,1958.4.28)

(五)《杀害李公朴的主凶赵凤祥伏法》:新华社长沙二十五日电:杀害李公朴先生的主凶赵凤祥二十四日在长沙市伏法。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间,特务头子、国民党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积极执行蒋介石对李公朴、闻一多等进行所谓"秘密制裁"的阴谋,指使稽查处处长王子明召集特务骨干分子赵凤祥(特务组长)、崔镇三(组长)、蔡云祈(国民党昆明市城防司令部谍报组组长)等开会,秘密布置刺杀李公朴、闻一多。以后,赵凤祥即派特务分子专门监视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行踪。同年七月十一日下午,赵凤祥带领特务分子汤世良、吴博[传]云等,趁李公朴先生外出返家的时候,开枪袭击,第二天李公朴先生因伤重在医院逝世。事后,特务机关发给了这些凶犯大批"奖金",赵凤祥并由上尉被提升为少校。赵犯凤祥是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曾先后担任国民党陆军总部"调查室"和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谍报组组员、组长,国民党湖北省第四区专员公署情报室副主任等职务。一九四九年五月赵犯由湖北沙市潜回湘潭后,伪造历史,长期隐瞒自己的罪恶。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在群众检举和公安机关侦察下终被清查出来。赵犯经湘潭县公安局逮捕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赵犯死刑,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二十四日在长沙市执行枪决。(《人民日报》,1959.3.26)

对于此次判决,《大公报》评论云:"闻一多案前天在昆明判决,这一桩耸动一时的暗杀事件,在法律上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们不拟触到法律问题,只想说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当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刺时,许多人以为是政治暗杀。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民主同盟的人,在作着政治活动,直觉的便以为是政治暗杀。这次判决,案情虽意外简单,但总算水落石出了。李公朴案子怎样,尚不知道;闻一多之被刺,据政府宣判,凶手行凶动机,仅为'出于气愤'。也许有人以为此种动机,可减少今天政治局势的纠纷。但我们认为如此杀人,对中国民主前途,威胁至大。在政治教育上,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也是一件可悲的事。闻一多教授,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拍桌跺脚',发牢骚,骂政府,这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莫说李公朴是他的朋友,闻一多见其被刺身死,悲恸激愤,出于自然;就是平时对政治批评几句,说政府'太腐败',这在民主国家,也是很普通的,彼此应该有雅量听敌党的话。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中国固有道德,也不是不准别人批评的。况闻一多一个文士,手无寸铁,让他发发牢骚有什么关系呢?乃李文山汤时亮竟'气愤'至于杀人。李汤都是现役军人,手持武器,一'气愤'就可以杀人,多么危险!中国人这样没有听话的

雅量，中国社会也就根本无言论的自由了。无言论自由，也就无民主了。在中国社会，像李文山汤时亮这种人，恐怕很多。这是中国政治眞正危险及可悲之处，我们实在不能原谅这个杀人的动机。政府重视闻案，并已予以允当的处置，军法会审，宣判李汤二人死刑，这是无可訾议的，为国家法律，应该如此。但看顾祝同将军的谈话，执法虽严，在精神上似有所不足。顾将军说：'对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之触犯刑章，致受极刑，于执行国家律令之余，不无感慨。'顾将军也是个军人，对军人的'触犯刑章，致受极刑'，有所悯恻，出于自然。但接下去又说：'深盼全国人士，对于艰难缔造之国家，勿轻加毁蔑，对于浴血抗战之军人，给予应有之爱护'，好像是对批评政府的人提出警告，对汤李二凶手则寄与同情，我们实在不同意这种态度。本月十五日昆明公审时汤李二凶手那种态度，也是叫人可怕的。这两个凶手，杀了人，然而好像理直气壮的，拍着胸膛说：'枪毙我，我情愿死。''闻一多是该杀的，我决不后悔。''凡有血性的人，都可以这样做。'汤李二凶手不承认杀人有错，这杀人的政治意义不太可怕了吗？闻案刚判决，昆明又闹打报馆，'揍死记者'的怪剧。报馆记者何罪？中国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一至于此。这种风气，这种意识，怎样可以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我们以为不幸的闻案，其判决应该作为言论自由的教育，应该在政治上扩大有听敌对言论的雅量；如产生相反的效果，对汤李两个人处以极刑，不过执行杀人偿命的法律而已，那就无甚意义了。"（《闻一多案的判决》，天津《大公报》社评，1946.8.27）

八月二十九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闻案感言》，认为此案并未了结。

八月三十日　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宣判事致函政府代表，云闻案宣判，民盟有所保留，不能完全接受。因民盟派梁漱溟、周新民、冯素陶三人观审，竟未获当局完全同意；新闻记者除中央社二人外，其他皆不许参加；审判时只有法官与凶犯一问一答，全无任何人参与证明一切，应有之人证物证全不肯用；死刑执行时必另有掉换。函中对政府一手包办公审提出抗议，要求对李案非移京公审不可。

九月五日　香港《华商报》摘引英国《新政治家》（费边社进步派杂志）、《经济学人周报》评论，世界舆论对李闻惨案反响强烈。

九月十五日　新加坡华侨陈嘉庚等六十余人与四十三团体开会追悼李闻，出席者千人。会场门前悬"民族永生"大匾。祭台挽联为："烈士之血，民主之花。"陈嘉庚挽联云："君等入地登天，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但凭赤手空拳，洒尽人间血泪；我亦痛心疾首，反对独裁，反对贪佞，悉本侨胞公意，只求国跻三强。"

九月二十八日　民盟政协代表为国民党政府拖延解决李闻血案，再次致函政府代表及蒋介石，要求对闻案逃犯限期缉获移京公审。

十月四日 上午九时，上海各界五千余人在天蟾大舞台隆重追悼李公朴闻一多。这次追悼会由中国民主同盟最先发起，八月二十八日筹备工作已分为总务、财务、文书、交际四组进行，分由田汉、洪深、熊佛西、黎澍、卢声广、王绍鏊、徐伯昕、潘梓年、韩明、罗淑章负责，九月十三日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允为发起人之一。二十九日，第六次筹备会产生追悼会主席团成员四十五人，为：吴国桢、宣铁吾、吴先开、潘公展、徐寄庼、周恩来、华岗、李济琛、陈铭枢、谭平山、司徒美堂、黄炎培、郭沫若、胡政之、叶圣陶、田汉、左舜生等。十月二日，又开筹备会，确立追悼会由吴国桢任主席，沈钧儒为主祭，史良、楚图南分别报告李、闻生平。追悼会发起人以宋庆龄、孙科领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各界人士共一百六十七人。

这是继重庆追悼会之后又一次十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洪深担任司仪。会上吴国桢致词，承认李闻被刺是违反法律。史良、楚图南分别报告李公朴、闻一多生平后，潘公展、郭沫若、邓颖超、罗隆基先后发表演说，末由李公朴夫人张曼筠致答辞。郭沫若演说中称李闻之死是近代悲剧诞生的信号，这是光明和黑暗、公正和自私、人民要做主人和做奴隶的斗争，但光明和正义最后必将胜利。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出席，并宣读了周恩来的亲笔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亡！"①

会场挂满挽联挽幛。朱德、毛泽东挽幛："为保卫政协争取和平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宋庆龄挽联："血溅金沙，冗有大名光宇宙。魂招歇浦，愧无巨笔志厉勋。"又，吴国桢挽联："宿望重儒林，何期殒命滇中，颍川李御成虚话。高雯垂艺苑，今日招魂海上，山海闻笛有余哀。"潘公展挽联："求民主竟尔捐躯，可同声一哭。为国事终日相忍，尝默告二公。"

这天，上海《文汇报》还发表了社评《实现四大自由——敬悼闻李二先生》。又刊登了景宋、史良、章乃器、黄炎培等人的悼文悼诗，并刊登了闻名的《我的爸爸》。

这次追悼会，曾电催高孝贞来沪参加。但国民党处处刁难，不给先生遗属飞机票，以致他们无法赶到。

十月六日 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举行公祭。九时半起，胡厥文、章伯钧、黄炎培、周恩来分别代表建国会、第三党、民盟、中国共产党主祭。中国共产党致祭者还有邓颖超、李维汉、齐燕铭、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等。民主促进会、中国妇女联谊

① 这次追悼会前，国民党与民盟、共产党曾订有"互不攻击"的君子协定，故周恩来在悼词中云"有何话可说"。

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国民主社会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国人权保障会、工商协会、民主青年联合会、人民救国会等团体，亦纷纷致祭。

中共代表团祭文中有“一多先生，著名教授，志行清高，学者研究，青年导师，人民领袖”与“为了和平，出而奔走，为了民主，出而奋斗，如此善人，世所罕有”之句。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在上海招待记者，指出：“民盟不满意闻案的结果，尤其不满意李案至今尚未了结，民盟至今仍在督请政府负起责任，火速惩凶。”

十月十日　清华大学在北平举行开学典礼。熊祖同代表辛酉级捐赠一百五十万元，作为钟亭修建费。（梅贻琦日记手稿，清华大学档案室藏）后在工字厅后荷花池东畔小山顶上，建起一亭，命名“闻亭”，以纪念先生。该亭为先生挚友梁思成设计，为民族传统的六角攒尖式。横匾上“闻亭”二字是潘光旦手书。亭内悬挂一大铜钟。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　先生殉难一周年纪念日。下午七时，北京大学新诗社、风雨社、文艺社等二十五团体，及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同学、先生生前友好，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纪念先生晚会。《闻一多教授周年祭》引新华社晋察冀电云：“北平讯。上月十五日为著名民主主义者前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被蒋介石特务刺杀周年忌辰，北大新诗社、风雨社及文艺社等二十五个团体暨闻氏生前友好，于是日下午七时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悲壮纪念晚会，到北大、清华、燕大学生及校外人士外籍记者等一千五百余人。会场高悬闻氏遗像，双目炯炯，正气凛然，表现出其生前与反革命搏斗之无畏精神。开会时由‘沙滩合唱团’低唱‘安眠吧！勇士’一曲，即全场默哀三分钟。继由去年与闻氏被刺曾受重伤之闻氏长公子立鹤，以自身经历报告蒋特行凶时之残暴及闻氏牺牲之壮烈经过，全场为之泣下。报告毕，由新诗社朗诵挽诗，并请许德珩、冯至等教授讲演闻氏生平，肃穆的会场中，到会者均充满清算杀人犯罪行、为闻氏复仇的悲壮情绪，是日日间并展览闻氏生平著作、言论及照片，并陈列去年闻氏被刺时之血衣，瞻仰者七千余人，并当场为闻氏遗族募捐，捐输者甚为踊跃。”（《人民日报》，1947.8.21）

七月十六日　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出席者有张澜、沈钧儒、张东荪、罗隆基、邓初民、章伯钧、黄炎培、史良等及各地支部代表数十人。会上做出十项决议，其中第四项为：“为纪念李公朴、闻一多及民盟其它殉难人员，决定以七月十五日为民盟殉难同志纪念日，并重申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有关案凶犯，负责赔偿损失。”此后，这一天被正式定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殉难先烈纪念日”。

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十九日闭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工人、农民、革命军人、妇女、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新式富农、社会贤达、

开明绅士以及民主同盟盟员、少数民族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团体代表五百四十一人。高真与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彭真、滕代远、杨秀峰、宋劭文、成仿吾、邢肇棠、丁易(民盟盟员)、于力、何其宽(回民)、陈瑾昆、田秀涓(妇女)、蓝公武、石振明(劳动英雄)、徐维廉(国民党统治区代表)、李何林(民盟盟员)、凌必应(工人)、安宅仁、尚钺(民盟盟员)等三十三人,在大会预备会议上被推选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通过许多重要决议案,并选举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了华北统一的民主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委员组成华北人民政府,经详尽讨论通过许多重要决议,董必武等廿七人当选政府委员》,《人民日报》,1948.9.4)

是月 由清华大学"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主持,经朱自清、吴晗等人编辑的《闻一多全集》(四册)由开明书店出版。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先生殉难三周年纪念日。上午九时,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暨北平市支部在北京饭店六楼礼堂联合举行纪念会,隆重纪念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黄竞武、曾伟诸先烈,参加者除民盟盟员外,还有林伯渠、李维汉、李济深、郭沫若、彭泽民、史良、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朱学范、沈雁冰、张奚若、谢邦定、齐燕铭、阎宝航、陈劭先、陈此生、李锡九、欧阳予倩、许德珩、薛愚、钱端升、翦伯赞、叶圣陶、容肇祖、宦乡、臧克家、孙起孟、柯灵、白杨等,共二百余人。闻一多夫人高贞、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也出席了纪念会。大会主席沈钧儒报告六位先烈的生平及殉难经过后,宣布民盟已组织一委员会,负责办理纪念公墓,纪念馆以及筹募家属生活费及子女教养费等事情,以慰先烈,而尽后死者的责任。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五日 先生殉难五周年纪念日。是日上午八时半,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俱乐部举行民盟烈士纪念会和祭灵仪式。参加追悼的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代表、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首都文教界代表、各大学负责人和教授以及烈士生前亲友等二百余人。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亲临祭奠。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沈钧儒首先致词,相继讲话的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民主建国会召集人黄炎培,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郭沫若,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等人。在讲话中,他们对李、闻等烈士为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而表现的英勇斗争精神,表示崇高的敬佩和深切的悼念。对于死难烈士家属表示真挚的慰问。纪念会和祭灵仪式在沈钧儒献祭后结束,接着为闻一多烈士举殡,启灵至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执绋者达百余人,至十二时许方结束。

在骨灰安葬仪式上,潘光旦发表《一多安葬祭告词》,内中写道:"一多:你离开

我们五足年了，今天是你安葬的日子。入土为安。朋友们把你'奉安'，你也真是可以安息了"。"五年前的今日，你遭到了毒手，离开了我们"，"你的实际上是从容的，从容的死，表示你知道死得有个道理。还有比革命而死更有道理的死么？我知道你死得心安理得，唯其理得，所以心安"。"如今五年以后，你更可以安心，革命终于成功。成功的花朵如何灿烂，成功的果实如何丰硕，你是已经知道了的"。"在这花朵果实里，正有你那一分灌溉的工夫"。《祭告词》还说："你'一'于政治，'一'于革命，一往直前，死而后已"，"你的朋友们都应该努力向你这一点学习。你的革命精神永远不朽"。（转引自孙敦恒《潘光旦与闻一多》，《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1999年第7卷第4期）

潘先生的女儿潘乃穆，在《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中，披露了潘光旦悼念先生的两首诗。一首为抒发心情悲愤，鞭挞国民党黑暗统治，怀念先生。诗云："就中薪水激昂最，十年游艺风尘外。交得陇西亦美髯，气夺三军并充沛。正气豪强不两存，历朝忠鲠几孤魂。碧鸡月落凄凉黯，白马涛惊呜咽吞。卅载论交浑似梦，几番饮泣涕无痕。悬知浠水椿萱泪，挟得江湖潋滟奔。"另一首为《四月闻亭》，云："诗人热血已灰寒，化作闻亭一额丹。此日吟魂欣有托，满山花放紫罗兰。"（《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1999年第7卷第4期）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　"全国首届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黄石师范学院召开。这次会议由黄石师范学院与北京大学倡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辽宁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武汉师范学院、南开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清华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发起。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全国第二届闻一多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五月十五日　中国闻一多研究学会（后改名闻一多研究会）在武汉成立，挂靠在武汉大学。此后，该学会举办了一系列全国和国际性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经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和湖北省民政厅批准，闻一多基金会在武汉成立。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由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辑的《闻一多全集》（十二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五年五月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专业委员会（后改名闻一多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发行《闻一多研究动态》（双月刊）。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先生与夫人骨灰合葬。先生夫人逝世后，骨灰一直保存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与先生骨灰合葬是闻夫人生前的愿望。经家属申请，在民盟中央协助和八宝山革命公墓管理处配合下，先生夫人与先生骨灰

全葬。合葬墓由原先生墓改建,高一点七米,青灰石墓碑,正面下方嵌有一九五一年安葬先生骨灰时民盟中央敬撰的生平简介,上方嵌有口衔烟斗的闻一多铜质浮雕,中间刻着先生和高真的姓名,碑的背面镌刻着先生夫人生平简介。参加合葬仪式的除直系亲属外还有先生夫人的干女儿华顺(华罗庚长女)、民盟中央代表金若年等。合葬仪式由闻立雕主持,民盟中央敬献了花篮,闻铭代表全家朗诵了长篇祭诗。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是日至二十四日,"第二届中国古典文学国际研讨会——纪念闻一多先生百周年诞辰"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举行。这是海峡两岸清华大学为纪念先生百年诞辰而联合召开的一次高层次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海峡两岸学者外,还有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学者。会议论文集《新古典新义》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该书主编、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朱晓海教授撰写的序言,代表了台湾学术界对先生的评价,内中写到:

先生乃民国学术史上之佼佼者,具有多方面影响。既是诗人,艺术家,又是学者。身为诗人,篇什表率一方,《红烛》、《死水》乃三十年代诗坛之异数,文学评论者推其意象之凸显,声调之铿锵,同侪恐瞠乎其后。设言其艺术成就,擅长篆刻、绘画,虽不以此为名,然抗战期间学子(包括其哲嗣)为其灵光热情兴发,而献身艺术国度者,所在皆是。若夫先生之学术成就,更无庸赘言。独辟蹊径,会通人类学、神话学及传统训诂考据之法门,新、旧映发,理、事交融,既不出主入奴,亦扫理障字碍,析义之深,见识之弘,迥出时流之上。其《古典新义》、《神话与诗》早已被学界奉为古典研究之圭臬,启活我后学良多。

不仅创作、研究度迈群伦,先生对于正义之承诺、教育之投入,立身清介,情性炽烈,感人尤深,至终以生命为祭。抗战期间,清大所以得于艰厄中,犹克朗现学术光芒,发挥学术尊严、研究自立之精神,致四大导师去席后,清大人文光华岿然依旧,先生及其同事,如朱佩弦、冯芝生、张东荪等,关涉实大。

虽因政治因素,半世纪已降清大分于两岸,然两校拥有共同之学术传统,学子分享相同之学术记忆及寰宇声誉。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适值先生百周年庆,本诸报本崇德之彝则,两岸清大决定继一九九七年王静安先生百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再度携手召开纪念先生百周年诞辰国际研讨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澳门回归。李海鹰谱曲、澳门七岁女学生容韵琳演唱的先生的《七子之歌·澳门》,成为中央电视台迎接澳门回归四十八小时不间断直播中播放的旋律之一。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日本闻一多学会在早稻田大学成立,领衔发起人

为早稻田大学资深教授芦田孝昭及铃木义昭、竹下悦子、门田康宏、山本明等。该学会以“研究闻一多及其生活的那个时代”为中心，以“与国内外学者进行交流”为目的，主要活动为举办学术会、研究会、讲演会，同时发行会报《诗与神话》。学会事务局设在早稻田大学日本语教育研究中心铃木研究室，会员包括二松学舍大学、樱美林大学、神户市外国语大学、京都产业大学、同志社大学、广岛大学、青森大学、立正大学、清和大学、创价大学、文化女子大学、东京大学、明海大学、庆应大学、东京学艺大学、宫城女子学院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家政学院大学、梅光妇女学院大学、日本大学等高校学者。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九日　是日至二十一日，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召开“诗人·学者·爱国者——闻一多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香港、美国、荷兰和德国汉堡、波鸿、莱比锡、海德堡、波恩、慕尼黑、图宾根等大学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德国《施瓦本日报》、《法兰克福特日报》等媒体，为这一首次在欧洲举行的研讨会发表了长篇盛情报道，德国最主要的报纸还对会议期间举行的“闻一多诗歌朗诵会”给予极高评价。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文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在台湾大学校友会馆举行。这次会议，是一九九九年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召开纪念闻一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后在台湾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也是台湾六十年来首次举行的以闻一多为中心的研讨活动。出席这次座谈会者三十余人，既有台湾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化团体的学者，也有正在台北访问的大陆专家。闻一多侄女之子李文健先生，也参加了座谈会。会上，《文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封德屏女士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闻一多长孙闻黎明宣读了父亲闻立雕的贺词：“获悉闻一多纪念座谈会在台北召开，备感欣慰，特代表闻一多家属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全体与会专家学者致以最真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闻一多家属代表闻立雕。”座谈会由佛光人文社会学院陈信元主持，著名作家向明、中研院院士陈永发、政治大学历史系刘维开、秀威资讯科技公司丛书主编蔡登山，分别就闻一多的文学创作、文化贡献、历史地位等问题做了主题发言。著名文史学家秦贤次、成功大学侯美珍、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所长薛化元、《湖北文献》社社长汪大华、国防大学徐瑜等也在会上相继发言。台湾中央社于当天发布座谈会消息，题为《闻一多一百一十冥诞，两岸学者追思》，台湾与大陆多家媒体做了转载。

附录

一、“蒋介石日记”手稿选录

案：二〇〇五年二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公开蒋介石日记手稿，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多位专家前往阅读。以下为黄道炫研究员抄录的蒋介石日记原稿中有关闻一多被刺事件之材料，兹录整理如下。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对西南联大团员训以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之意。言之操急，自知失态。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别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主同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知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其自夸所谓不怕死者，而其怕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　约宴司徒雷登与马歇尔，今日来山也。餐后谈共党问题，马对共周自称其已失信心，而张君劢等于其在京起飞时特属马司为昆明暗杀案向余警告，以为彼等生命已无保障，政府谈判自难继续云。此等投机小肖寡廉鲜耻不足道，惟可证明无识者必无胆，是对人之心理又一发明也。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十时半约司徒来见，与谈三事。（一）对昆明暗杀案拟重申无武力之人民与党派，政府应负责保护其生命与自由。（二）凡无武装之人民只要其合法登记，保障其言论出版之自由，主管机关应予以登记之便利，不得无故延宕。（三）政治协商会议议决案仍属有效，其未议法各案，当继续觅取协议，但必须取法于多数，并应待共党停止攻势后方得实施。

上星期反省录：……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昆明暗杀案之处理。……

注意：昆明李闻被刺案应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研究昆明追究凶手案情，写霍揆章[彰]等各函。晚课后约卢永衡主席聚餐，听取其报告。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与卢永衡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乃别。决召霍揆章[彰]来见，幼稚如此，可叹。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昆明刺案内容既明，彻底究罪时应注意之点：甲，反动派必以此加强其对政府暗杀反对党人之罪恶，更将诬陷为"法息(西)斯"党矣。乙，对霍处置之方针。丙，公布与审判之准备。丁，宣传技术之注意。戊，政府应主动彻究此案。己，凶手之口供及其行刺之动机。庚，被刺者咎由自取乎。辛，使投机与附共者有所警惕。壬，问霍能否自动彻究此案。

晚课后召见霍揆章[彰]，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出其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临睡时已十二时矣。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朝课后约见张镇与霍揆章[彰]，研究昆明刺案后，批阅公文，研究刺案之处理方针。下午为刺案及宋庆龄侮辱本党以及剿匪无甚进步等关系，顿起忧闷。……晚课后约顾卢张霍等晚餐，属其同飞昆明彻底追究刺案也。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朝课后召见墨三指示昆明案处理方针。

上星期反省录：一，天下事之难堪者，莫甚邪正不分、善恶混淆，尤其是世人不究真相反以伪为真，以恶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耻道丧。……

一，为昆明李闻被刺暗[案]，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

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三，云南保安大队等之处置。……四，云南警备司令部之改组与性质之研究。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　马歇尔来谈，彼以昆明暗杀案比内战之消息使美国影响更恶为虑，其意中欲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查也，余婉却之。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调查结果公布后认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彼以为然。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更使共匪在时局上转败为胜，霍之罪孽无穷。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上月反省录 ……九，昆明李闻暗杀案在政治上实予政府以重大之打击，所部无智，徒增苦痛，难矣哉。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　朝课后与冷欣谈昆明案件及所录口供毕。……下午审阅口供，破绽甚多。

上星期反省录：昆明李闻暗杀案处理方针与办法虽定而尚未宣布，此案因平

津道上美军被共匪袭击之重要性已渐减轻。

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六，李公朴案之公布。……

一九四六年八月四日 朝课后指示冷欣对昆明案件处理程序。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甚切，幸得上帝指示，改变前定办法。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 雪耻：昨晚课后指示至柔飞昆面授处理方针毕，独在楼台上赋"白云明月两悠悠"句，心神幽闲，思虑渐消，与夫人并肩散步，采花移树，甚觉自得也。

朝课后派至柔飞昆明指示处理暗杀之方针，必须彻究严惩霍揆章[彰]，方得其平也。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 研究昆明暗杀案之口供与经过实情，甚费心力。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 朝课后指示至柔再飞昆明传达意旨。……。

上星期反省录……八，闻一多案处理方针已最后决定，极费心力也。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 预定：……三，昆明案件之处理。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 晚冷欣由滇携顾墨三对处置闻一多被刺案审判供辞及报告来庐。批阅至深夜，研究至再，未能决定办法。十一时晚睡。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 雪耻：……昆明暗杀案件万目睽睽，中外注视，敌党匪部皆以此为集中攻讦诬蔑之目标，而对霍揆章[彰]之愚拙粗暴可痛可愤，但又不能不为之恕谅，殊令人受意外之打击，可说近年以来无论外交内政如何困苦，未有如本案处置之拮据也。今晨六时前起床，朝课后拟定处置办法，决将二凶犯枪决，而将霍革职交顾总司令看管，待李公朴案破获后再定霍之处治。如此先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

朝课后指示冷欣对昆明案决定要旨及公布方式毕。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 丑刻醒后默念昆明案件，六时后起床。朝课，再召冷欣来见，谆嘱其转告顾总司令注意之事。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美国舆论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尤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一点，更加尖刻，心神顿受刺激。美国受共匪宣传之深，几乎牢不可破矣。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朝课后见冷欣，谈昆明案件未完，……下午校阅学案摘记后重审阅昆明闻一多被刺案之全卷，加以指示要点毕。……阅申报所载昆明闻案公审情形颇详，多与我所要指正者有碍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朝课后面示冷欣补充数点后令即赴滇。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彰]革职看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处置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而李公朴案则犹未解决，只可作为悬案乎。……朝课后阅刺闻案判决公报等文件。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闻一多被刺案已审判公布，告一段落。此为本月内政治上最烦恼之一事，竟有一解决，亦得自慰。

民国卅五年反省录……十一、本年复员工作最无秩序与不守纪律者厥惟各大学之迁还原校之情形。扰乱运输，阻碍交通，不一而足。学生幼稚无知，固无论矣，而其一般教授既不能领导学生管理业务，又不能自治自理，只知争先还乡，索款需用。士品之颓落，学风之败坏，几乎为此少数自由分子中所谓民主同盟之流将礼义廉耻之民族德性扫地殆尽。尤以西南联大中之清华教授闻一多等五六人为最劣。及至八月间昆明闻一多与李公朴被刺以后，于是共匪与民盟又藉此掀起学潮。美国舆论亦皆为之吠声附和，集矢于余一人，且以此为中国法西斯复活之明证。于是马歇尔亦间接提出警告，可耻盍极。最后决将此事公开审判，杀人者抵罪，负责者严惩，乃得告一段落，亦云苦矣。中国之学风与士品之坏可说大半是由美国之政策及其学者怂恿而出。彼等实昧于中国教育与学界之实情，而强以美国所用之民主与自由思想强加于中国，于是共匪与政客乃皆假此民主与自由之名而行其卖国害民，谄外欺上，败坏风气之生涯，无所不至。于是政府对教育与学术陷于轻重两难无法挽救之窘境，其惟在求己与立己而已。

二、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选录

案：台北“国史馆”中的“蒋介石档案”，存有与闻一多相关的电文、函稿、手令、报告多件。兹选择整理如下：

杜聿明致蒋介石电(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

急。渝。委员长蒋，总长何。陔密。查双十节昆明有异党份子闻一多、朱[楚]图南、吴行[晗]、李公朴、罗某等以云南宪政研究会名义拟往云大开会不果，后至绥靖路昆华女附小开会，以参加民众(以学生为多)共万余人，公开演讲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请改组政府，并要求美方装备云南军队，另以各界庆祝大会并发传单，其内容略与上义相同。除饬注意侦察其尔后活动情形外，谨请鉴核。昆□杜聿明，酉元戌。印。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

急。渝。委员长蒋。密。西南联大自印发国是意见传单壁报，近更联合私立

中法大学暨云南省立英文专科学校学生举行五四周，第三日为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晚会，是晚七时在联大新校舍礼堂召开，参加者约千余人，校内外学生各居半数，校内以一、二年级学生较多，校外学生系各中学学生。会场秩序紧张，先后由闻一多、雷海宗、吴晗、曾昭抡等教授作煽动讲演，间有新闻记者、工人代表、少数学生等捏词报告各地青年被压迫情形，极尽煽动能事。建设中学校长周大奎竟将云南省教育厅密令各中等学校防止学生参加五四内容，当场宣传，致激众愤，学生发言者先后计三十余人，均系纱布案、慰劳总会案、黄金案等攻讦政府，直至夜深十一时半始星散会。会末宣传翌日午后一时于云大新操场集会，开五四运动纪念大会，并游行。除已饬令军警严密防范外，谨闻。职何应钦。辰支义颐。叩。

杜聿明致蒋介石电(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

渝侍从室主任钱转呈委座蒋。〇六四九。密。连日昆明大中学生受异党煽动组织五四运动周，自四月三十日起至五月六日，每日均有集会，以联大学生主持，云大、中法、英专及天祥、培文、昆□各中学学生亦有多人参加。计星期一、二、三各晚为科学、诗歌、音乐会，未发生事件。星期四晚讲演会，以学生李晓主持，闻一多、吴晗、曾昭抡、潘光旦等讲演，大义[意]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政府，改青年节而不顾青年有民主自由观念，五四要以大规模行动表示热烈，并宣告五四午后游行，晚火炬竞走，目的在与军警冲突。昨晚在南屏大戏院拟以火药炮竹捣乱，因我预嘱防范严密未成。准备防止游行肇事办法：1. 由官方明令校方劝导；2. 宪警严密警戒；3. 同志中以集会娱乐方式分散学生；4. 青年军一律带往郊外旅行；5. 万一不能禁止游行，亦以避免冲突为主，用宪警以维持保护名义监视之，凡属游行经过街市，劝导市民远离，预料不至于发生突变意外事端。谨先电呈鉴核。职杜聿明。辰支已。叩。印。

邱清泉致唐纵等电(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

重庆军委会侍从室第六组唐组长乃健[①]兄并译转政治部袁副部长及调查徐戴二局长钧鉴。密。情报。(一)暂十九师已于支日起开越，师长龙绳武尚在昆，其防务由独立第二旅接替。(二)共党在昆活动机关，有华山南路观察报社，白马庙天野社，正义路天成冰金店，及新华日报办事处等多处，进出人员大部分为学生教授，并有少数空军人员。(三)昆华女师赵世德系共党重要分子，大肆反动活动，青年团曾请教育厅撤换，未得结果，闻罗隆基为向龙主席力保。(四)昆明《扫荡报》总编辑高紫瑜有共党嫌疑，经该报社长李诚毅迫其发表反共论文后，即为共党绑去无下落，现共党大肆攻击并有破坏该报之威胁宣传。(五)民主同

① 唐纵，字乃健。

盟在昆负责人罗农[隆基](龙主席政治顾问)及李公朴、潘光旦等极为反动,分配各大学演讲,诋毁元首及本党,并极力拉拢学生及教授,其党内有闻一多、曾昭抡、吴伦[晗]、潘大奎[逵]、黄廷仁、雷海宗、费孝通、宋云遴等。(六)龙绳曾即三公子所办之《观察报》,全为反动派把握,其华山南路之发行社及白马庙之印刷所,住有共党重要分子,由龙供应食宿,并为之庇护。以上严密防范为祷。邱清泉叩。秘二真。印。

关麟征致蒋介石电(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即刻到渝。委员长蒋。四九八九(表)。密。昨下午七时昆明联大云大中法□等四大学校少数奸党分子,利用学生生活会名义,开时事讨论晚会,以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为讲员,又以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尚钺、周新民、吴晗、闻一多为导师,在联大操场举行欢迎各界参加。钱端升等讲题为内战问题,对政府及钧座訾妄毁谤。又查钱端升、伍启元均为本党同志,职事前除通知各校当局阻止开会外,并密报派党团工作人员参加操纵会场,于钱等四人讲毕时,要求发言,一上讲台即被呼打,后经工作人员争论,参加者遂即散离,最后约二三百人于归还途中高呼打倒国民政府及第五军等口号。今日联大已煽动罢课,声言响应四川各大学反对内战运动,要求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内战,在华美军撤退,言论自由等项,并勾引裕滇纱厂工人,有掀动罢工□大全昆罢课,并大举联合游行示威举动。除竭尽各种方法严密防范外,如反动情势扩大,实行游行示威,加厉诋毁政府与钧座,应取体积态度对应,恳示遵为祷。职关麟征叩。戍宥亥。印。

朱家骅致蒋介石电(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密呈主席蒋钧座。删电奉悉,朱次长经农今返渝,据称联大云大等校务会议决定十七日复课,卢主席与地方人士亦均作最后坚定恳切之表示,但各校情形复杂,能否如期复课殊当无绝对把握,如果届时学生仍不就范,各校当局希望在执行最后处置办法之前,能有数日缓冲期间,俾各校负责人及多数教授获有表示最后严正态度之机会,并使学生失其立场与同情,以减少政府责任。至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最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整个首要分子名单,已电令各校当局密查具报,除候查明立即呈报外,谨先电陈。朱家骅呈。亥咸。印。

霍揆彰致蒋介石电(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

限即刻到渝。委员长蒋。四九八九(表)。密。机密。筱未联大四校学生共约四千人于联大图书馆操场开会,由闻一多、褚辅成、钱端升三教授主持,并先后发言。(一)反对李宗黄发表新职。(二)拥护政府被刺政协五项决议。(三)立

即释放政治犯。(四)严惩重庆校场口血案凶手刘野樵。(五)取消特务组织。(六)立即严惩关李。(七)应合法解决昆明一二一事件。会毕,于十七时在市区游行,并张贴以上各种标语,散发传单及新华日报。游行后,复于云大开会,决议巧日继续扩大游行宣传,如受干涉即行罢课。此事今晨得息后,即严饬警备部队及治安机关取监视态度,幸无其它事件发生,除详情续呈外,谨电奉闻。职霍揆彰。丑筱酉。印。

霍揆彰致蒋介石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

限即到京。国民政府军务局转呈主席蒋。九一二六(表)。密。午文电计呈。(一)本日街头闹市即有由学联会及云大学生自治会所贴之狂妄荒谬标语及壁报,多为攻击本部,诋毁中央。窥其居心,意在制造事件扩大事态,蓄意作乱。职拟如该等继续不休,继续扩大至破坏治安、妨害公共秩序,决依法戒严,大举肃清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二)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于七月十二日正午召集潘光旦、闻一多、尚钺、费孝通、楚图南、冯素陶、费青、向达等负责人员及学生团《大众报》及其它所谓民主刊物编辑代表共十余人讨论,结果摘要如左。1. 今后以李公朴之死亡努力揭发国民党反动派之阴谋。2. 致函(学联)指示发动全滇各学校学生作声援,并以宣传品散发各地。3. 昆明(民主)期刊等联合行动,责问政府及地方军警当局。4. 依法起诉,为李公朴复仇。5. 全体一致行动游行示威,日期临时决定。似有重演去冬学潮之故技,以损失中央威信,清除中央在滇力量,以达其赤化西南之目的。职惟本钧座意旨,有利国家者,任何牺牲在所不计,对此案责任问题,除已本日发表声明以资大白,若再滋扰甚而暴动时,职拟断然处置。谨闻。职霍揆彰。午元叩。印。

陶镕[①]致蒋介石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密。民盟负责人李公朴被人刺死,后捕获嫌疑犯一人,警备总部正在严缉中,惟奸党阴谋藉此攻击国民党和青年团支团,并煽动学生等情。谨电奉闻。陶镕叩。午。印。

卢汉致蒋介石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

主席蒋。密。据昆明市长转,据警察局长报称,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其子立鹤,于本月删日下午五时余,在后仓坡府甬道地方被暴徒阻击,闻教授伤重立即身故,其子亦受伤甚重,现在云大医院治疗中,凶犯在逃等情到府,除督属加紧缉获凶犯法办外,谨电奉闻。卢汉叩。午铣秘。印。

① 陶镕,时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负责人。

蒋介石致霍揆彰手令(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急。昆明。霍总司令。李公朴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之续出,警备总司令部应负全责也。中正手启。

蒋介石给霍揆彰唐纵手令(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昆明。霍总司令并转唐署长[①]。对李闻案侦查后,望两弟即日同飞九江,密来庐山面报,务希敬日到浔为要。中正手启。午养午。府机牯。

蒋介石给霍揆彰手令(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廿一日电悉,请弟即与唐署长飞浔详报一切为要,至于龙绳武龙绳曾应暂予监视,其非法组织可勒令解散再候处理,惟李闻案凶犯应限期缉获,不得以此违误,至要。中正手启。午漾。机牯。印。

蒋介石给顾祝同手令(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

昆明顾总司令。此案有否眉目,希即派唐纵或冷欣二同志之一人明日乘专机来报告。中正。午卅亥。机牯。

蒋介石给顾祝同手令(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

昆明顾总司令。前属冷、唐二同志中先派一人来报,告电谅达,此案公布以前必须先派专人来庐面呈全案,审核后再定,不可草率发表。如何盼复。中正。

俞济时[②]代蒋介石给顾祝同手令(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急。昆明顾总司令。冷副参谋长谅已到昆,属代电,此案须特别慎重,最好须缓暂缓发表,余容续报,如何盼复。济时叩。未鱼机牯。

蒋介石给顾祝同手令(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

昆明暗杀案件四日内连出二次,霍总司令揆章[璋]身为云南警备总司令,自应负地方治安之责,而且刺杀闻一多之凶犯即为该总司令部之特务连官兵,是该总司令应负更重大之责任。此案经军法审判,凶犯汤时亮与李文山皆供认刺闻不讳,已准照律判处死刑,至霍揆章拟即革职,暂由陆军总司令部看管,务将李公朴案破获彻究以后,再定去处,是否有当,请妥核夺。中正。

顾祝同呈蒋介石报告公文登录(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

(摘要)汤时亮、李文山等杀害闻一多案,前经依法判决,奉钧批照,遵于八月二十六日午前七时,将凶犯汤时亮、李文山等两名验明正身,于本市东站附近执行枪

① 唐纵,时已改任国防部警察总署署长。

② 俞济时,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浙江奉化人,时为国民政府参政处军务局局长。

决，理合检呈该犯尸首照片两份，备文报请鉴核备案。附呈汤时亮、李文山生前照片二张，死后照片三张，拟准备案。①

顾祝同呈蒋介石报告（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

报告：三十五年九月二日陆军总司令部二十一号。查汤时亮李文山等杀害闻一多案，前经依法判决，报奉钧批"照准"等因在卷。遵于八月二十六日签提被告等到庭宣示判决，并由职手令驻昆明宪兵第十三团团长彭景仁为监刑官，饬依法执行具报。去后，旋据彭团长景仁报告称：案奉钧座本（八）月二十六日手令开，枪杀闻一多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两名业奉主席蒋核准执行枪决，兹派该团长为监刑官，仰即遵照执行具报等因，奉此，遵于本（二十六）日午前七时将凶犯汤时亮李文山等两名验明正身，于本市东站附近执行枪决，理合检呈。该犯尸首照片两份，一并备文报请钧座鉴核备案，等情：附汤时亮李文山生前照片二张，死后照片二张，本部布告照片一张，据此，经核无讹，除饬将尸首掩埋外，理合检同原附各件报请鉴核示遵！谨呈国民政府主席蒋。陆军总司令顾祝同。

蒋介石致彭学沛代电（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中央宣传部彭部长勋鉴：据陆军顾总司令九月二日报称，查汤时亮、李文山等杀害闻一多案，前经依法判决，奉批照准等因，遵于八月二十六日午前七时将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两名验明正身，于昆市东站附近执行枪决。该犯生前与死后照片各两份，请核备等情形，除复准备案外，希迅将该汤时亮李文山两犯执行死刑经过及其生前死时之照片转送京沪昆各报同时刊发为要。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宋院长勋鉴。申号电悉，卢主席为李闻案所称各节，市长与处长局长准免职，其它着毋庸议。申养。机昌。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急。南京宋院长。关于昆明李闻案地方处分一节，兹决定警察局长警务处长以各记大过或革职留任示警。已呈至处分卢主席与昆明市长各节，可毋庸议。中正。申梗。机赣。

龙云致蒋介石函（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总裁钧鉴：敬禀者。窃查前云南全省总司令霍揆彰，在任内主使部下先后谋杀李闻两教授，系属白昼杀人，发生于警备部所在之昆明市，事出之后，凶手安全免

① 此件下有附言："梁漱溟等公开宣言，汤李执行死刑时，将以他人代替，故汤李有恃而不恐，本件拟于梁氏所撰李闻报告书（据报载该报告书全文四、五万字，正印刷中）正式发表之，前摘要中宣部转送京沪昆各报，连同汤李生时及死时之照片，同时刊发，藉以打击奸盟之居心造谣。"

去，多误为政府所为，中外震惊，谣言纷乘。该霍揆彰既失错于前，复不明呈钧座一味捏词蒙蔽，并一面嫁祸地方，将中将杨立德等无辜逮捕，非刑迫供，几造成空前冤狱。所幸钧座明察秋毫，洞烛其奸，先后派大员前往明密详察，卒获真相，将该霍揆彰革职看管，听候核办，其参谋长亦予以徒刑处分，自全案公布后，是非大白，远近悦服，咸颂钧座，明鉴万里，执法无私，殊该霍揆彰仍逍遥法外，此次竟公然来京赴会，众目睽睽，咸表惊异。该霍揆彰如此糊涂性成，藐视国家法令，影响政府尊严，用特密呈钧座敢祈有以处之，以维法纪，而正视听。专肃敬请钧安。中央监察委员龙云谨呈。卅六年三月二十日。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陆军总部顾总司令勋鉴。据龙委员云三月二十日报称经革职看管听候查办之前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公然来京出席三中全会，众目睽睽，咸表惊异，请予处置以维法纪百正视听等情，希查明核办具报。中正。(卅六)卯筱。侍宇。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公文登录(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案由)前据龙委员云三月二十日函呈，略称，前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经钧座革职看管、听候查办，此次三中全会，公然来京赴会，众目睽睽，咸表惊异，请予处置以维法纪而正视听等情，经电顾祝同总司令查明核办，兹据电复如上。

(处理意见)查监委霍揆彰，现已奉命革职查办，交由陆军总部看管，顾总司令应通知中央党部，霍亦不应出席三中全会，似应对顾总司令予以申斥，并饬对霍揆彰再严加管束，另酌复龙委员云。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查前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奉令革职查办，尚未定案，该员因病准在长沙原籍疗养，嗣三中全会开会，该员接奉中央党部秘书处通知，竟于疗养期间，离开指定处所，来京出席。自有未合，除饬嗣后不得擅离指定疗养处所，并应将病况及治疗情形，每月汇报备核外，谨复。职顾祝同叩。秘。印。

顾祝同呈蒋介石报告公文登录(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

(内容摘要)奉钧电饬核议前云南省警备总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等，可否从宽发落一案，遵查该王子民等十五名，因昆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被杀案，处置失当，奉钧座手令拘禁，嗣以负责看管之整编第九师奉令开拔离滇，又经签奉钧批解京，交宪兵司令部继续看管，旋据该王子民等，一再报称，以自奉令拘禁以来，历时十一月，深感学验缺乏，致肇前造愆，故于守法期中，悉心研究学术，以求长进。惟值兹大局明朗之际，伏恳恩施格外，准予恢复自由，俾再效命等语。查该王子民等十五

名,对于闻案处置失当,固属处有应得,惟守法已届十一月,既能悉心思过,深知悛悔,且前据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电请原情开释前来,可否准如所请,将该王子民等十五名上并责保暂释以观后效,抑仍继续拘禁之处理,合开列名册,签乞,核示。

(拟办)前据宪兵司令部张司令报告,以羁押该部之前云南省总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等,请予从宽发落等情,当要本案前系陆军总部顾总司令奉令主办,军务局无案可稽,经转电顾总司令核议去后,兹据请示如上。同时另据陈总长转据顾总司令请示如上文。谨注。呈。核。

(批示)缓。已办,七、廿五。

附呈《云南省警总部稽查处暨预二旅奉命调京人员简历册》(编者案:以下按区别、级职、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略历等项记录)

稽查处,少将处长,王子民,三十八,湖北沔阳,军校第七期毕业、高教班第四期毕业、中训团党政班第七期毕业,排连营长、附团长、侦察班队长导员、混成总队长、稽查处处长等职。

稽查处,少校组长,崔镇三,三十,江苏盐城,工教教导队一期毕业、军委会驻滇干训团三期毕业,排连队长、组长等职。

预二旅,上尉组员,蔡云祈,二十八,安徽庐县,军校十五期专科毕业,排连队长、副营长、参谋等职。

稽查处,上尉组员,秦永穌,三十二,陕西华县,宪校体育班二期毕业、防校干训班一期毕业,排连队组长、课员、参谋等职。

稽查处,中尉组员,包玉田,二十五,江苏武进,军校十八期工科毕业,排长、连队附、参谋、组员、等职。

稽查处,中尉组员,刘锡麟,三十,安徽怀远,军校教导队军士营三期毕业,排长、连附、队长、组员等职

稽查处,中尉组员,何毅,三十,山东巨野,军校学员队三期同十四期毕业,排连队长、参谋、组员等职

稽查处,中尉组员,张文尧,二十,云南昆明,五分校重训班一期毕业,助教、副官、组员等职

预二旅,中尉组员,尚福海,三十,河南夏邑,航特旅军官训练班二期毕业,排长、连坩、队长、组员等职

稽查处,少尉组员,王开基,二十五,四川安岳,四川保干班一期,排长、连坩、组员等职

稽查处，少尉组员，赵树林，二十八，河南洛阳，步校射击班三期、驻滇干训团外语班三期，排长、组长、队员组员。

稽查处，少尉组员，崔宝山，二十九，河南郾城，七一军军官队二期毕业，排长、组长、队员、组员。

稽查处，少尉组员，张德明，二十五，江苏南京，机校驻印战车训练班一期毕业，排长、队坿、组员等职。

稽查处，少尉组员，欧阳元化，三十，云南武定，云南宪校一期、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外语班一期，排长、副官、组员等职。

稽查处，少尉组员，仲刚，二十四，河北石家庄，辎校学员队十二期，排长、组员等职。

顾祝同呈蒋介石公文登录(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内容摘要)查云南省警备总部稽查处前处长王子民等十五人，因昆明闻一多被杀案，处置失当，奉钧座手令拘禁，嗣据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电请原情开释，兹又叠据王子民等报告，以拘禁已十四阅月，近政府已明令宣传“民盟”为非法组织，大局明朗，各员等自拘禁以来，痛不可支，伏恳准予恢复自由，俾再将使等情。查该王子民等十五名，对于闻案处置失当，固属咎有应得，惟守法已届十四阅月，既能悉心思过，深知悛悔，可否原情准予一并责保暂释，以观后效之处，乞核示。

(拟办)查本案前系陆军总部顾总司令主办，军务局无案可稽，本年七月十七日，据顾总司令签请准将王子民等十五名，赐予原情保释，经呈奉批“缓”，兹复据请示如上。谨注。呈核。

(批示)缓。已办。十二、十一。

(摘要)查云南省警备总部稽查处前处长王子民等十五人，因昆明闻一多被杀案，处置失当，奉钧座手令拘禁，嗣据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电请原情开释，兹又叠据王子民等报告，以拘禁已十四阅月，近政府已明令宣传“民盟”为非法组织，大局明朗，各员等自拘禁以来，痛不可支，伏恳准予恢复自由，俾再将使等情。查该王子民等十五名，对于闻案处置失当，固属咎有应得，惟守法已届十四阅月，既能悉心思过，深知悛悔，可否原情准予一并责保暂释，以观后次之处，乞核示。(附呈名册一份)。

(拟办)查本案前系陆军总部顾总司令主办，军务局无案可稽，本年七月十七日，据顾总司令签请准将王子民等十五名，赐予原情保释，经呈奉批“缓”，兹复据请示如上。谨注。呈核。

(批示)缓。已办。十二、十一。

三、台北“国史馆”藏《事略稿本》选录

案：台北“国史馆”中的“蒋介石档案”，内有蒋介石近身秘书根据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收发公文等第一手资料编辑而成的《事略稿本》，其中有关闻一多被刺事件的材料，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留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互为补充。故录如下。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公闻昆明于本月十一日及十五日午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殒命案，认为此应特加注意，以免“共党”藉此作诬陷政府之宣传。盖以李闻二人皆为“共党”外围民主同盟中之主要分子也。又此案发生后，在昆之民盟首领潘光旦等八人皆逃至美国驻昆明领事馆，请求保护，公以彼等皆为知识分子，且为大学教授，竟至如此认识不清，为之慨叹不置。

电昆明霍揆彰总司令，令负责查缉李闻案正凶，并严防此种案件之继续发生。原电曰：“李公朴与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之续出，警备总司令部应负全责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 晚，宴马歇尔特使与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席撤，谈共党问题。马歇尔谓：“彼对周恩来已不能置信矣。”又张君劢等为昆明李闻被刺案，心怀疑惧，竟托马、司向公转陈，以彼等生命已无保障，则谈判自难继续云。公对张君劢等之无识无胆，不胜其慨叹也。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朝课后记事，十时半，约见司徒雷登大使，告以政府对于下列三事之方针：（一）对昆明李闻案，政府必切实查究，并重申负责保护人民之生命与自由。（二）合法保障人民言论出版之自由。（三）政治协商会议议决案仍属有效，其未议决各案，当继续觅取协议，但必须取决于多数，并应待共党停止攻势后方得实施。……公自记本星期反省录曰：（一）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庐山呈递国书，马歇尔特使亦联袂抵此，推测彼等心里，对于调解共党事，尚不肯作罢，竟受共党侮辱至此，而毫不为动，其精神固若可佩，惟惜其认识不清，徒劳无益。奈何，奈何！（二）昆明李闻被刺事出意外。……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晚，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共进晚餐，听取卢汉报告，并面嘱其对昆明李公朴闻一多案务设法早日侦破。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下午手拟整饬军纪令稿，继召见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并询李闻被刺案侦查详情，并严令其查缉破案。又召见张镇宪兵司令，指示其与霍揆彰共同研究处理李闻案之要点，以免为反动派所利用也。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朝课后召见张镇司令与霍揆彰总司令，研究李闻被刺案及处理方针。九时，约顾祝同总司令卢汉主席张镇司令霍揆彰总司令等共进晚餐，并嘱彼等明日同飞昆明，以彻查李闻案究竟也。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朝课后，召见顾祝同总司令，指示李闻案件之处理方针，顾氏辞出后，即偕卢汉主席、张镇司令、霍揆彰总司令于今日上午离牯赴浔转飞昆明。……

公自记本星期反省录曰：……(四) 昆明李闻被刺案又引起反动派之诬蔑，本周几全为此事而感受烦闷与忧郁，天下之事难堪者，莫过于邪正不分，善恶混淆，尤以世人不究真相，反以伪为真，以恶为善，卒致邪正倒置，是非莫辨，因之人心反常，廉耻道丧，其为患非至社会兽化，民族沉沦，国亡种灭不止矣。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　华盛顿顾维钧大使陷电陈与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谈对华军援情形，原电称："今日访美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谈及彼上月所拟对华军事援助华。据云，前经交委员会审查，原拟将该案报告众议院，可望记过。惟参议院方面，因我国目前情形，难望通过。彼意与其提而不获通过，不如作罢等语。谨电察核。"

午，马歇尔特使谒谈，彼以昆明李闻被刺案，影响美舆论为虑，请公允许民主同盟之要求，组织三人调查委员会，由政府、民盟及美方各派一人，前往昆明共同调查。公告以此事之处置，为政府应尽之责，自应由政府负责调查，如调查结果公布后，彼等认为尚有怀疑之点，自可允许有关团体参加研究也。马歇尔亦以为然。马氏辞出后，公叹曰，"昆明李闻案发生，兀鹰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困难，而反使共方在宣传上转败为胜，霍揆彰疏于防范，应负其责也。

电昆明顾祝同总司令，询李闻案侦察情形"。原电曰："此案有否眉目，希即派唐纵或冷欣明日乘专机来牯报告。"

附录，顾祝同午世复电称："此案已有眉目，详情由冷欣于冬日飞浔面呈。"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公自记本月反省录曰："……(十二) 昆明李闻被刺案在政治上增加政府甚大之困难。……"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晚课后周至柔，指示其迳飞昆明处理李闻被刺案。

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　研究共党在美国进行之阴谋活动，公谓："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三十余人，竟致函杜鲁门总统，主张断绝对我国民政府之接济，可知第三国际对美宣传之阴谋为何如矣。"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华盛顿顾维钧大使十二日来电，转陈杜鲁门总统十日致公密函一件，说明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现状之态度，谓如中国内部问题之和平

解决办法不即于短期表现真实进步，则其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行审定。公阅后以美国外交政策谬误至此，甚感痛心也。

附杜鲁门总统八月十日来函译文如下："本人自派马歇尔特使驻阁下左右后，对中国局面始终深切关注，现本人不能不作一结论，即马歇尔特使之努力，似未奏效，实深遗憾。本人深信马歇尔特使与阁下商谈中，曾对美国政府之整个态度与政策及有见解之美国舆论，正确奉告。近数月来之中国政情，迅趋恶化，实使美国人民深感忧虑，美国故继续希望中国在阁下领导之下，仍能成为民主强盛之国家，然最近局势之发展，使人不能不认为国共两党中均有极端分子，各顾私利，阻碍中国人民之愿望。本人不敢不竭诚奉告者，一月三十一日政治会议所拟订协定，曾为美国方面所欢迎，而认为远见之举，可使达成统一与民主之中国，但美国对该协定之未采取切实步骤，使其实行，殊感失望。现此点渐为美国对中国前途展望之重要因素，兹以中国内争日炽，尤以新闻刊布自由及智识界发表开明言论等举，日见加强压迫之趋势，故美国舆论之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应予重加检讨者渐见增多。最近昆明发现有声望之教育阶层人士惨被暗杀案件，美国人民未尝无闻，此案责任属谁，姑且勿论，其结果适使美国人民对中国局势益加注视，且信中国对社会问题，不采民主方法，仍欲凭藉武力，利用军队或特务警察，以求解决。吾人对于中国国民期望和平民主之信心，虽已屡近来发生事端所动摇，然尚未泯灭，美国政府仍坚持协助中国，俾能于真正民主政府之下，建立和平与稳定经济。然照此间观感，中国国民之期望，为黩武军人及少数政治反动分子所遏阻，此辈不明现时代之开明趋向，对国家福利之推进，不惜予以阻挠。此种情势，实为美国国民所深厌恶，倘若中国内部之和平解决，不能于短期内表现真实进步，则美国舆论对中国之宽宏慷慨态度，势难继续，且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行审定，本人深望阁下能于最近期内惠予好音，使贵我两国间所相互宣布之目的，易致完成。"

顾维钧电文陈，美总统密函之用意，在望我方此时有所表示，采一切实步骤，原电称："顷电呈美总统密函，计邀钧鉴，经向美方征询此举用意，似重在我方此时有所表示，采一切实步骤，而反应共党方面缺乏庆彰。此在我策略上亦属不可少也。此间美外部发言人告新闻记者，谓美陆战队拟继续驻华，撤退之议未曾考虑，固若此时撤退，华北交通路线仍须保护，徒于国共间增多争执云云，可为佐证。惟如昆明惨案等，应预为防禁，以免授此间左倾分子以口实，而刺激美国舆论，更使美政府感觉应付困难。"

巴黎王世杰部长未寒电陈，对杜鲁门总统来函之意见，公批交陈布雷副秘书长研究。原电称："……惟在目前马歇尔既经发表声明，倘我不采取若干步骤，致使马

歇尔陷于完全失败状况，美国政府必采取若干不利于我之措施与声明，此则可使美国舆论再度逆转，因马歇尔为全美的信任之人望也。苏联尤必利用此形势，采取不利于我之措施，基于此种考虑，认为钧座对于中共问题，至少尚须更作六个月之忍耐。”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　晚课毕，冷欣副参谋长由滇来牯晋谒，携呈顾祝同总司令所呈关于审判闻一多被刺案疑犯之供词及处理报告。公核阅至深夜，并再三研究，尚未作最后之决定也。

是日，美总统杜鲁门以行政命令扩大禁运，制止我国购买美国剩余军火。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　晨间，核定对昆明闻一多案之处置办法，决将汤时亮、李文山二人处决，并将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革职，交顾祝同总司令看管，俟李公朴案侦破后，再决定对霍揆彰之处分。公谓，“如此则闻案先告一段落矣。”朝课后，召见冷欣副参谋长，面示对昆明闻案之决定要旨及公布方式，嘱其赴昆明对顾总司令转达。

公为最近国事之艰难志感曰：“共党猖獗异甚，美国压力续增，今日之处境，艰难极矣，又加以昆明发生李闻被刺案件，为中外所注目，共党及反动派　均以此为集中攻讦之目标。但此案之处置，对霍揆彰之愚拙颟顸，固属可痛可愤，然又不能不加以宥恕，殊令人受意外之打击。近年以来，外交上无论如何困难，未有如此案处置之使人拮据者也。”

谨按：汤时亮原为云南警备总部特务营第三连连长，李文山则为同连排长，杀闻一多始意则以闻公演说，肆意丑诋政府，而对于八年艰苦抗战之军人，侮辱尤甚，汤李一时以血气之勇，遂举枪向面，不意其一击而毙也。原于汤李始意，至可矜念，惟当以偪于共匪之诬构与国际之交谪，乃不得不以极刑处汤李二员，所以示政府之至公，亦所以示政府之委曲求全，有非得已也。夫汤李杀人，死固当罪，惟汤李激于义愤，而非徇其私仇，则其死有不足以咸服其辜者也。公之所以迟迟其欲决而不忍决者，正以此耳。

……函复杜鲁门总统，说明与马歇尔特使共同致力谋取和平之经过。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　丑刻醒后，对昆明闻案之处理，仍不能忘怀也。六时起床，朝课后，再召见冷欣副参谋长，嘱其转告顾祝同总司令对闻案处理应注意各点。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朝课后，召见冷欣副参谋长。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朝课后，召见冷欣副参谋长。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是日，顾祝同总司令在昆明发表闻一多被刺案审

判结果。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朝课毕,审阅昆明闻案判决书及处理经过之报告。公谓,"如此处置,可告一段落矣。然而,经过之艰难困苦,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而李公朴案则犹未能解决也。"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自记本日反省录曰:……(二)美国断绝接济我国之武器,并不允我国备价购买其军火,此为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迫,欲使我对其屈服,而杜鲁门总统十二日来函,又加我以耻辱,美国在国际道义上重添其不可磨灭之污点矣。……(八)闻一多被刺判决结果,业已公布,当告一段落,此为本月内在政治上最感困扰之一事。……

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选录

案:闻一多被刺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为朱家骅,其档案现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兹选录有关闻一多资料,公布如下。

朱家骅致傅斯年电(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密电原文:昆明才盛巷二号傅常委孟真兄亲译。密。并转梅常委月涵与熊校长迪之兄鉴。顷奉主席删电,谕开此次昆明学潮情形复杂,其中主谋及领导分子希速查明具报为要等因,希即日详查报部,转呈为要。朱。亥删。

朱家骅致蒋介石电(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密电原文:速抄,立即送待从室速译拍。朱。卅四,十二,十五夜。

特急。北平军事委员会行营蒋主席钧鉴。密。删电奉悉,朱次长经农今日返渝后,据称联大云大等校务会议定于17日复课,卢主席与地方人士亦均作最后坚定恳切之表示。但各校情形复杂,能否如期复课殊尚无绝对把握。如果届时学生仍不就范,各校当局希望在执行最后处置办法之前,能有数日缓冲期间,俾各校负责人及多数教授获在表示最后严正态度之机会,并使学生失其立场与同情,以减少政府责任。至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整个首要分子名单,已电令各校当局密查具报,除俟查明立即呈报外,谨先电陈。职朱家骅叩。亥咸。

朱家骅致蒋介石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

限即刻到。

牯岭主席蒋钧鉴。密。昆明联大教授闻一多被害,教育界人士殊感焦灼,司徒雷登亦有此种暗示,职极密切注意,并已派钟道赞督学、冯友兰教授赴昆研查,谨先

电陈。职朱家骅叩。午巧里。午袈□。

另以代题寄发。三十五、七、十八。

朱家骅致郑华炽、何衍璇函(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

华炽[①]、衍璿[②]兄大鉴：昨得昆明闻一多教授被刺之讯，深为惊悼，政院特派唐次长乃建兄前往督办。本部亦派钟芷修[③]兄会同冯友兰兄由渝飞昆调查真相，以期水落石出。特奉达，敬希就近鼎力协助处理，曷胜感祷。专此顺颂台祺。弟朱家骅亲签。

朱家骅致钟道赞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

急。昆明教育厅王厅长子兄留转钟督学芷修兄。密。此次昆明事件中央已派唐乃建兄飞昆处理，请兄与之密取联系为盼。朱家骅。午巧里。十八。

朱家骅致唐纵函(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

乃建吾兄勋鉴。兹奉上空密电码一册，乞备用。另函五封请察收，分别转致。至钟芷修兄处，业已另电告知矣，知注并及，敬颂勋祺。弟朱家骅。

朱家骅致教育部总务司人事处函(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

函请李润章[④]先生赴昆调查闻案真相，此致人事处、总务司。朱骝先。七，十九。

发表新闻并预备飞机票与发给旅费。

朱家骅致卢汉、唐纵快函(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极速件。

永衡先生、乃建吾兄勋鉴：此次昆明闻一多教授被刺事件。本部曾派钟督学芷修会同冯友兰教授芝生前往调查并慰问闻氏家属。兹又加派刘参事英士[⑤]兄飞昆。特为介诣。台前敬希惠予延谭并加指导。曷胜公感。专此顺颂勋祺。弟朱家骅。七，二十。

蒋介石复朱家骅电(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教育部朱部长，午巧里代电悉。中正。午养。府交牯印。

蒋介石复朱家骅电(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教育部朱部长，午巧午袈重发电悉。中正。午马。府交牯。

---

① 华炽，郑华炽，西南联大教授、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组织股长。
② 衍璿，何衍璿，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国民党组织负责人。
③ 钟道赞，字芷修，教育部督学。
④ 李润章，不详，应也是教育部官员。又，原件旁有注文，云："李表示不去，此件未办。"
⑤ 即刘英士，时为教育部参事。

朱家骅致梅贻琦转刘英士电(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昆明西南联大梅校长转刘英士兄。密。关于对潘光旦先生等安全之保护。便衣或武装均无不可,希与有关当局妥洽。闻潘等再度要求美领馆保护,自无必要,务盼婉劝阻止为要。朱家骅。午。敬礼。

刘英士致朱家骅函(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发,二十九日到)

骝公勋鉴:今晨发函后,即分访省府朱秘书长、霍警备司令及梅校长。所闻如下:

一、闻夫人系于一多被刺后入医院,并非原在医院。闻大公子生命颇有保全希望。

二、潘光旦等上星期五出美领事馆,但于昨日(星期日)下午经与梅月涵等再四研究之处,重进美领事馆。原因如下:

昨为留学生考试第一日,梅校长坐自备包车赴试场。十时左右,梅因将有汽车送其回寓(西仓坡五号清华办事处),故命包车夫先回。包车夫于归途中遇暴徒数人,持枪逼询清华办事处共住几人,有枪多少等语。潘光旦夫妇均与梅校长同住,故包车夫未敢率直回答。结果包车夫被殴!此事发生后,潘等认为治安当局控制力量不够,故又逃至美领事馆。

三、在此恐怖局面之下,人人感觉自危,莫不深居简出,于是各方情报颇不灵通。截至今日下午一时,梅月涵、沈茀斋二人亦说不出究有几人逃在美领事馆。据推测,人数应较上次为少,因为治安当局不赞成他们造成恶例,而美代领事亦竭力避免干涉中国内政之嫌疑。美方自承领事馆此举并无法律功条约根据,只是尊重人道而已。

四、缪云台等公馆甚大,潘等本与有交情,可往暂住。但昆明局面复杂,潘等认为如往投宿,或置主人于为难境地。昨晚十时,我和子政[①]谈话,忽闻枪声数十。子政认为常事!据说民间枪枝极多,小偷亦带枪行窃,冲锋枪多极,可能还有火箭炮。美军驻滇时,部队中亦有共产党与犯罪出身者,私售火器于匪徒,虚报作战损失。故从枪械与子弹上面,不能指出凶手属于那个集团。

五、治安当局已竭全力缉凶,霍司令说已有"头绪"。据闻已捕数十人,中有过去曾任副官长者,昨日已两人赴京报告!如得最高当局许可,三两日内可将案情公布。可虑的是,真相揭穿以后,引起全面骚动。

六、在如此局面之下,自由主义者竟敢与民盟共产党及土豪勾结,数年来破坏恶

① 王子政,时为云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

果，良可浩叹。可怜的是几位太太吓得昏天黑地，有两位随其丈夫投奔美领事馆。

七、投住美领事馆者共有三种人。一、联大教授；二、云大教授；三、中苏文化协会职员。闻案已由治安当局负起全责，梅校长可以不管。现时学校所最关心者为潘等之安全。今晨梅、沈约定下午分工办法。沈陪我到医院去慰问，梅到美领事馆去研究再度出馆办法。霍称潘等如以保护责任托他，他可完全负责。今晨西仓坡已有卫兵数名。最好的办法是以飞机送走联大教授——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张、费尚未有正式表示，潘则早愿返沪。

英士。七，二十二，下午二时半。

唐纵致朱家骅电（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限即到。教育部朱部长骝先先生。密。已遵与贵部刘参事洽商。即派员往晤潘光旦等，如离领事馆后仍留昆明，则请滇警务处派员保护，如愿离滇，则代设法交涉机票，以安其心。谨复。晚唐纵叩。寝（二十六）午。

唐纵致朱家骅电（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限即刻到。教育部朱部长骝先先生。密。（一）纵于皓（十九）日飞渝，候机于梗（二十三）日抵昆。敬（二十四）日约请党政军警宪与教育界人士约二三十人，除转达中央意旨外，并会商联系协力缉凶破案办法，警备总司令部表示负责破案，现已有相当线索，正侦讯中。（二）自李闻案发生后，民盟方面甚形匿迹，联大追悼闻一多时，民盟竟无一人出席，惟共产党分子仍暗中在联大活动。（三）纵奉召本日飞沪转浔赴庐，不日返京，谨闻。晚唐纵叩。寝（二十六）辰。

朱家骅致蒋介石电（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

限即刻到。

牯岭主席蒋钧鉴。密。昆明闻李案发表后，本部除妥嘱梅贻琦校长等协同办理善后事宜外，并加派督学钟道赞、参事刘英士前往与有关方面洽办一切。现刘英士经商承顾总司令，已偕同民盟主要分子潘光旦、费孝通两教授返京，职并与潘、费接谈，态度尚缓和，言下并有改变生活环境，多从事研究工作之意。谨先陈。职朱家骅叩。未冬里。晚。印。

极机密。立即译拍。朱。八，二。

初版后记

《闻一多年谱长编》经过五度春暑秋寒，终于完成了。面对着八十余万字的书稿，真说不出是喜悦呢，还是感慨。

还是七十年代末，我就设想在季镇淮先生的《闻一多全集·年谱》基础上，作一部新的年谱，却迟迟未能动手。直到一九八五年在武汉举行全国第二届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后，我才选定了年谱长编这一体例，并拟了一份论证。很快，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同意了这个计划，使它列入我的科研项目。于是，我有了充裕的时间，从一九八六年年初以来，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进行这项工作。

鲁迅曾经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言》）胡适也曾说："编年谱时，凡有年代可考的材料，细大都不可捐弃，皆须分年编排。"（《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这些话对我启发极大，这部书之所以在"年谱"后面加"长编"二字，为的就是按照编年体裁，容纳进重要的第一手史料。这样做，既可以从人生历史的演进方面，来表现闻一多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旅途，又可以为人们了解闻一多的思想递进提供出较为清晰的线索。当然，也为研究者省免去查阅翻检所需资料的劳顿。

最初的两年是收集材料，其中甘苦参半，识者皆知。我曾三下昆明，耗时半载，武汉、重庆、贵阳、蒙自、浠水，都是必到之地，北京虽有地利之便，但为了节省时间，也曾在母校北大度过了两个冬天。令人欣慰的是无论到何处，都受到真诚相待，这使我能够查阅了相当数量的报纸杂志和档案文献。我走访信访过许多前辈，凡是他们知道的，都不厌其烦详细介绍。这本书中的新材料和新线索，就是在各方大力协助下发掘出来的。而我，仅仅是做了一些归纳整理的工作。

实事求是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我的工作就是尽力使闻一多的生平记录更加完整。支配闻一多一生执著追求的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导演了他可歌可泣的人生诗篇，无论是早期的社会改良，还是文艺创作、理论探讨、学术研究、政治活动，处处体现出一个真诚的爱国情怀。闻一多不只是作为个人，而且作为一代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缩影，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一个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的闻一多，仿佛时时站在我的面前，给我教育，给我启迪，给我激励。

闻一多的探索与实践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成功的鼓舞，也有失败的徬徨。这除了个人因素外，自然也有环境影响。对于成功人们记得很多，对于挫折则涉及得较少。我对两者都客观记录，不敢回避。他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这样做？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后来又是如何认识的？唯有回答这些问题，才可能完整了解闻一多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才能揭示出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经历的时代是祖国外遭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主义压迫的时代。他所参与的不少文化、学术、政治活动，都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政治史的组成部分。把闻一多置于这个群体，通过那个时代去透视，显然是必须的。因此，以闻一多为经线，适当地记录他所参与的团体、事件、活动等概况，不仅有助于对闻一多的深入研究，而且有助于相关专题的研究。本书篇幅较长，这也是一个原因，以至有人看过初稿，印象是它介于年谱与传记之间。

历来做年谱都讲求精密、精审，胡适曾称这是“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虽倾尽全力，也难达到这个标准。囿于个人有限的水平，失误和疏漏的地方一定不少，敬祈时贤赐教斧正。

我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及云南省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云南省图书馆与档案馆、湖北省及武汉市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感谢许许多多为我提供各类资料和帮助的先生。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托人转交给我三十余封二十年代的信函原件，卞之琳先生借给我几部很关键的英文书籍，袁可嘉先生还专为本书翻译了一首诗，并在外文方面多次指导。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玛丽(Mary G. Mazur)女士、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易社强(John Lsrael)教授，也从大西洋彼岸寄来珍贵材料。范宁、萧荻、耿云志三先生通阅了全部书稿，张光年、杨明、张源潜、康侃、王康、王子光、王健、金若年等先生审阅过部分书稿。我的长辈闻家驷、闻立鹏、闻名、闻翻对这部书的关心和认真，更是不用说了。而全书的审定，是由我父亲闻立雕(韦英)完成的。张光年、耿云志还在百忙中为本书作了序文。德高望重的赵朴初先生，亲自握管题写书名。长者对我的厚爱，实在也是鞭策，我永远牢记在心。

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魄力令人感动，当我读到卢福咸总编辑的回函，酸甜苦辣之情难以言表。一度重创，几经失望的心，才重新振作起来。还是故乡的人亲，故乡的水甜，故乡的月儿明啊！

闻黎明

北京建国门外寓所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初版后记补

本书校样，我们是十月六日收到的。由于初稿完成已逾五载，经过这段“冷处理”，所以有必要对原稿做以少许加工。不过，基本面貌还是保留下来，未做变动。

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王建辉、邹桂芬二先生，他们为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促成了它的付梓。也感谢我的朋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白纪蓉(Heather White)女士，她在百忙中将清样中的部分英文校订了一遍。

闻黎明　侯菊坤

北京安贞桥外寓庐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增订版后记

《闻一多年谱长编》一九九四年七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付梓，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当年，我编这部书，只是尽量想系统收集和整理一下闻一多的基本资料，目的不过是希望能对闻一多研究起些助力作用，起码可以节省些研究者们查找资料与线索的时间。

应该说，我编纂这部书确实下了相当功夫，它出版后也得到了闻一多研究界的认可。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是新版十二卷本《闻一多全集》的整理者，参与主持这项工作的陆耀东教授称它是《闻一多全集》第十三卷，让他的研究生手一册。这事让我感到有些过誉，但让我没想的是，一九九八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校内外四十余专家学者评选向研究生推荐的阅读书目，在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古今中外必读和选读书目各三十部中，它竟忝列选读书目之一。这部书问世前，我的另一部《闻一多传》已出版了两年，并由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译成日文，二〇〇〇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把它作为该社第一部译成外文的学术著作出版。日本闻一多研究者告诉我，这两部书对日本闻一多学会的成立，起了某些促进作用。后来，我在著名历史学家何柄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还看到了这样一段话："目前这部一一〇〇页、八十五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这些赞誉，和它所获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首届科研成果优秀奖、全国第二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说明它在闻一多研究及其相关领域研究上，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任何工作都会留下遗憾，这部书出版时就存在着若干缺陷，而十六年来陆续发现的新材料，也需要补充进去，何况时间流逝，需要这部书的学者早就望洋兴叹，无处购买。为此，我曾两次向湖北人民出版社提出再版建议，可惜均无下闻。二〇〇九年秋冬之交，我赴台湾做了两个月的访问。在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了由他们再版的愿望，甚至提出分为三册，于二〇一一年闻一多殉难六十五周年时推出。说这件事的时候，十二月九日接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冯勤先生来信，说他们正在策划一套现代人物年谱长编系列图书，问我这部书最近有无增订再版计划。我马上回了信，说台湾有出版繁体增订版的意思，但如能列入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的系列丛书，当然很高兴。第二天，冯勤就寄来了“民国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编纂说明，详细介绍了它的定位、范围、规模、要求等。接着，我们就修订时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完成时间交换了意见。于是，这部书的再版夙愿，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冯勤先生的热情关照下实现了。

我很清楚，在眼下追求经济效益的年代，出版如此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势必有着相当的困难。因此，尽管感谢之类的话未能免俗，但我还是要说的。我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远识与魄力，感谢冯勤先生为这部百万余字的长编付出的辛勤努力，没有他们对先贤的敬仰和对学术的尊重，这部只是为专业学者利用的书不可能再版。我要感谢闻立树、李思乐、古为民、秦贤次、蔡登山、商金林、黄道炫、梁文蔷、张素贞、李明宗、潘邦正等先生和女士，或鼓励过我继续深化这一工作，或为我提出过修改意见，或为我提供过新发现的材料，这部书的增订，和他们的无私帮助分不开。我还要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因为在他们的协助下，我才得以查阅了保存在宝岛的诸多珍贵档案。

这部书初版时，我在《后记》中曾简单介绍过它的成书经过，但更多的话未便讲出。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说一点儿有关这部书起因和经过的话。

一九七七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有不少革命家后代，其中不少研究他们的前辈，正在主持开创中华民国史学科的李新副所长，建议我就做闻一多研究。但是，我一直有种意识，就是作为后人不要轻易做自己前辈的研究，因为往往会被人认为难免参杂情感因素，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我申请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是因这个原因未能通过，这更加深了自己不做闻一多研究的想法。

一九八五年，我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二次闻一多学术研讨会，从会上看到的论文，感觉与第一次会议区别不大，无论是材料，还是观点，都存在着重复者多，创新者少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供利用的材料比较陈旧，大致仍局限在一九四八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主编的四册《闻一多全集》，和几本传记与回忆录范围里。当时，我已经有了几年的史料学训练，于是想可以把现有材料按史料学方法做一番较为系统的整理，这样，既可免去研究者的检索之苦，又不违背自己不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初衷。武汉会议后，我第一次回到祖籍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老家。县境公路入口处耸立的“欢迎来到闻一多的故乡”牌坊，碧波荡漾的望天湖和湖对岸的起伏山峦，让我激动不已。这次寻根，坚定了我按照年谱体例编辑一本闻一多资料集的念头。于是，回到北京后，我就马上付诸了

行动。

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已经出版、发表的著述和史料，全部查阅一遍，然后将选择的资料依年月日顺序，进行分类编排，建立起年谱框架。第二步工作，是查阅流散在各种报纸、杂志、档案、文献中的未经收集的资料。这是件普查性的工作，我的目标，是只要能找得到的报刊，不管有没有资料，都要翻阅一遍，为的是尽量减少遗漏。这种笨人的笨办法，占用时间最久，也最需要毅力。

一九八六年开春到一九八八年冬天，三年里我先后到武汉、重庆、昆明、贵阳等地查阅资料，其中仅昆明就连续去了三次，每次两个月。在昆明，除了星期天，我都泡在云南省图书馆。那时图书馆的读者不多，对远道而来的读者，尤其是我这样身份的读者，自然受到不少特殊关怀。至今我仍总是不能忘却，管理报刊的李硕先生热情给我提供线索，他看到我吃不惯云南的辣味，把我请到他家，给我煮面条。这件事已过去了二十四年，我们也做了二十四年的朋友。

我在昆明查阅的是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的资料，它们大多保存在旧报刊中。昆明人对抗战时期的报纸，曾戏称为“云南正义，扫荡中央”，指的是《云南日报》、《正义报》、《扫荡报》、《中央日报》(昆明版)。其实，还有一份《民国日报》也很重要。对于这些报纸，凡是重要时期的内容，我都翻阅了一遍。至于杂志，我主要看的是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几个刊物，它们有《今日评论》、《当代评论》、《自由论坛》、《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现在，有些报纸已做成缩微胶卷，有的刊物在网上也能找到，但是当年非如此不能获得。

在北京，我也有两年的冬天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因为我要查阅的对象很多存在北京和清华，住在那里可以节省很多跑路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室给了我极大支持，闻一多的学生、从广州请到北京主持编辑西南联大校史的萧荻伯伯，给我提供了一间房子，还把他收集到的图书、报纸，以及采访记录，统统拿了出来。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室和孙敦恒教授，给我敞开了他们的资料室，甚至把资料室的钥匙也交给了我，让我任意查找那里保存的任何资料。清华大学档案室也是这样，凡是馆藏档案，任我随意调阅、复印。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室、民盟云南省委资料室、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同样给了我许多帮助。

功夫不负有心人，整整三年，我不仅查阅了凡是能找到与闻一多有关的旧报刊、旧杂志和历史档案，还走访、信访了近百位与闻一多有过往来的同学、同事、朋友、学生。吴泽霖、程绍迥、许复七、陈念宗、顾毓琇、谢冰心、陈岱孙、汤佩松、潘大逵、贺麟、孙大雨、方重、张闻骏、陈衡粹、冯友兰、蹇先艾、沈从文、张光年、冯至、卞之琳、臧克家、吴祖缃、尚钺、李何林、王振华、常任侠、冯素陶、吴征镒、杨绍廷、金若

年、何善周、王瑶、季镇淮、范宁、彭兰、张世英、王达津、姚殿芳、王康、萧荻、李埏、袁永熙、洪德铭、杨明、唐登岷、陈盛年、王云、吴富恒、戴今生、王明、李济五、范启新等几十位前辈，都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顾毓琇、谢冰心、吴泽霖、胡毅、王力、张清常等还给我写了亲笔信，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有些事是永远留在记忆里抹不掉的。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时，写过一首英文诗《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需要翻译成中文。那时，我住在建国门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永安里宿舍，楼下住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袁可嘉先生。袁先生是西南联大老校友，“九叶派”诗人之一，我请他帮助翻译这首诗，他不仅非常认真地把它译了出来，还热情向我介绍了热爱新月派诗歌的美籍台湾学者廖玉华女士。与廖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袁先生家里，谈话时，我冒昧地提起自己很难得到台湾资料，如果可能的话，想与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取得联系，因为梁实秋《谈闻一多》的插页有封闻一多信的书影，我推想也许还有其他信函，所以很想得到这些信函的复印件。我说这话只是表达一种愿望，没想到竟然成真了。廖女士返台探亲时，真的找到了韩菁清。当时，韩菁清因私自赴大陆而受到台湾当局的处置，关在房间不许外出，心情很是压抑。她看到我托廖玉华转赠给她的《闻一多书信选集》上有我的签名字，相信我是闻一多的后人，竟把梁实秋保存了六十余年的闻一多十余封信函原件，托廖女士带给了我。这件事埋藏在心底多年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公布出来，并向廖玉华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至于我的第三步工作资料编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做学问的人，自会了解该书材料的鉴别与取舍是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编辑体例上的长处和短处，也有更多的发言权。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当初编这部书的时候，因为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纂的《闻一多全集》还未问世，因此本书在内容上带有对开明版《闻一多全集》进行补遗的目的，故开明版未收者介绍较多，已收者则多简略处理。这种做法虽然突出了新的史料，也压缩了篇幅，但不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全书的完整性。

最后，不妨讲一下这部书曾经遇到过的难产。一九八九年，《闻一多年谱长编》完成后的第二年，我把这部兼有传记性质的史料编年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心里总记着胡乔木讲过的一句话。好像是在一九七八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不久，一次全院大会上，胡乔木院长说到新近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说要把它办成第一流的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后凡是别的出版社不愿意接受的学术著作，都可以送到那里。可是，我把书稿送去后，半年多没有回音。后来，他们告诉我，社长讲了，说这部书很有分量，有出版

价值，但社长也说了，出版社正向自负盈亏转型，出版这部书需要赞助费。我问赞助费需要多少，对方马上算了一下——四万元。天哪，一九八八年的四万元是个什么数字，是天文数字！

一九八九年初冬，叔叔闻立鹏要去武汉，我想，闻一多是湖北人，一九二八年他就是因为一句为桑梓服务的话才离开稳定的中央大学，到新成立的武汉大学任教，现在是不是故乡也可以为他做点贡献。当年的排版技术还是老式的，书稿摞起来有半公尺之高，叔叔是用小推车拉去的。书送去后的第二年，总编辑卢福咸给我回了信，肯定了它的价值。一九九三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建辉先生到北京，表示经过努力，这部书将与新版《闻一多全集》一起出版。这样，《闻一多年谱长编》与新版《闻一多全集》同时于一九九四年诞生了，同样的封面、同样的装潢、同样的纸张，连印数三千册都没有区别。

我在本书初版《后记》里说："还是故乡的人亲，故乡的水甜，故乡的月明啊！"增订版的出版，则让我感叹："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千年，就是由于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

闻黎明

北京学院路寓所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闻一多年谱长编

扫描二维码
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官方微信

ISBN 978-7-313-08647-1

定价：350.00元（上下册）